

# 血紀

《血紀》\*\*上集\*\*

孔令平 着

仅以此纪念在反对独裁专制主义中

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们！

目录

目录... 1

寫在《血紀》出版前... 4

书评... 5

《血紀》告訴了你什麼... 6

第一章：陷入陽謀的初生牛犢... 1

第一節：「大鳴大放」... 3

第二節：我的少年... 9

(一) 一九五〇年我的家人... 10

(二) 陳戶籍... 11

(三)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13

(四) 余媽媽... 16

(五) 與父親的最後一見... 18

第三節：災難襲來... 19

(一) 躲不開的陽謀... 22

(二) 我的外婆... 23

(三) 馬開先... 24

(四) 荒唐的辯解... 26

(五) 同弟弟的最後團聚... 27

第四節：被揪鬥的日子——\*\*扭曲人性\*\*... 28

(一) 曹英主持反右「批臭」會... 30

(二) 校園裡的牛... 33

(三) 飢餓的大學生... 36

(四) 余餘協和... 38	
第二章：監督勞動的最初歲月... 39	
第一節：南桐礦區叢林... 40	
第二節：趙家灣... 41	
(一) 趙凡父子... 41	
(二) 農民怎麼解決飢餓... 44	
(三) 大量餓死人從此開始... 45	
(四) 大躍進時期的農村... 47	
第三節：一夜進入『人民公社』... 49	
第四節：快步進入共產主義... 50	
第五節：界牌公社... 52	
(一) 高產試驗田... 53	
(二) 王大爺... 55	
第六節：叢林鐵廠... 56	
(一) 草腳碼... 58	
(二) 叛國投敵集團... 61	
(三) 運鐵礦的玩命活... 63	
(四) 迷魂的「摘帽」... 65	
(五) 奪命煉焦場... 66	
第三章：監獄歸宿... 71	
第一節：我被糊里糊塗帶入看守所... 72	
(一) 看守所裡的年夜飯... 74	
(二) 看守所見聞... 76	
(三) 人民公社是農民的墳地... 79	
(四) 初悟與反抗... 83	
第二節：石板坡看守所... 86	
(一) 致死人命的批鬥會... 89	
第三節：回到南桐看守所... 92	
第四節：大躍進後..... 93	

## 第五節：孫家花園監獄... 96

- (一) 入監... 96
- (二) 張臘元和王大炳... 101
- (三) 勞改工廠... 102
- (四) 邂逅蒲世光... 104
- (五) 事故責任的認定... 106
- (六) 春節『同樂』... 109
- (八) 第一次上訴... 115

## 第四章：流放甘洛... 118

### 第一節：流放途中... 118

- (一) 夜宿雅安... 120
- (二) 獄中搶饅頭... 121
- (三) 老母坪—\*\*鬼門關\*\*... 124
- (四) 彭大鬍子最先去死... 125

### 第二節：西西卡的死亡谷... 128

- (一) 同彝胞換蕎粳... 133
- (二) 閻王的「餓死鬼殿」... 135
- (三) 盧建華等人之死... 137
- (四) 張棒棒... 139
- (五) 「死狗」戰... 141
- (六) 死亡谷裡的老鴉叫... 142

### 第三節：黑色的夏天... 144

- (二) 楊治邦之死... 153
- (三) 新「食品」... 155
- (四) 雷田食子... 156
- (五) 為爭「野地瓜」... 158
- (六) 夜「偷」... 160
- (七) 人間地獄... 164
- (八) 甘洛醫院裡的鐵殍... 167

(九) 人間地獄... 170

第四節：撤離死亡谷... 171

(一) 「療養地」... 174

(二) 稀世珍品... 176

(三) 「發」棉衣... 179

(四) 賭性難改... 180

(五) 周老漢也得坐監... 181

第五章：流放鹽源農場... 183

第一節：新的流放地... 184

第二節：偷豬食吃的人... 188

第三節：古柏行... 191

(一) 炒豆子... 192

(二) 雨季到來的時候... 194

(三) 禁閉前的舌戰... 197

(四) 哭... 200

(五) 第一次絕食... 202

(六) 我吃飽了... 207

(七) 辛志華... 211

第四節：在農場小監裡... 213

(一) 金幹事探監... 217

第五節：羊圈裡的鬥爭... 223

(一) 可憐的孩子... 224

(二) 寒月悲歌... 225

(三) 學生兵... 228

(四) 三星閻匠... 230

(五) 糞潑崗哨... 232

(六) 挨打... 235

第六節：第二次絕食... 237

(一) 攻心... 243

(二) 禱告... 245

第七節：農六隊... 248

(一) 抗工... 249

(二) 思想改造試驗田... 254

第八節：參觀... 258

(一) 劉順森... 258

(二) 帶著手铐參觀... 264

(三) 稍加統計的「大寨精神」... 267

第九節：楊修的故事... 269

写在《血纪》出版前

孔令平

这部长篇传记，取材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想通过它反映出中共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一角。所以，它既是我个人一生不幸的记录，也是那个时期的历史悲剧。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份，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份，组成这个时代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也许都在想，自己这一生为什么而生存；为什么而奋斗？任何人在回忆自己一生时，是想为自己已树碑呢，还是想真实总结过去，拿出一点对人类有益的教训以告诫后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有过几年的「伤痕文学」时期，我看「天云山传奇」、「漩涡里的歌」、「牧马人」、「泪痕」，感觉这些作品产生于中共监视之下，留着专制主义的影子。它们不敢真实暴露毛泽东时期的内幕，缺乏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缺了脊梁。

《血纪》记述了我所经历地狱里，一些人间炼狱的过程，他们怎么生龙活虎走进来，被饿死、打死，踢死的真实过程，令人为之惊心！同时记述了他们中不堪压迫的一批人，毅然在刽子手屠刀下举起了「火炬」，他们虽然倒下了，但他们举起的「火炬」永远照亮着这片苦难的热土！

可惜，在今天「一切为经济发展」的指导中心下，在金钱诱惑和生活压力下，人们越来越不了解中共历史上最血腥的毛泽东时代。今天，毛泽东留下的种种流毒没有被批判，真相依然蒙蔽，黑白仍被颠倒。这样，历史完全可能重演新一轮的悲剧，这是我们这一代亲历暴政者最担心的事。

看到年轻一代对中共独裁专制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浑然不知，想到一个个牺牲烈士们的生前嘱托，我无法安享「改正」后的晚年。于是，本着对民族负责的精神，整整二十年来每夜每夜，我在灯下伏案疾书，点点滴滴记下我所亲历的这段血腥历史。

《血纪》寻找到它的根：一小撮掌权的中共顽固派，死守着既得利益不放，死守「独裁」不放。

我想，有着像我一样的情感和经历的海外人士、为中华民族前途而奔走呼号的人不在少数。相信会在大家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使《血纪》能尽快问世，与读者见面。为我们共同总结这段历史，并为中华民族今后怎么走路，提供一点教训。

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

——作者：2007.7

## 书评

### 武直三

孔令平的《血纪》三部曲，全书共一百多万字；是史诗式的展现了作者一家在极权中国的困难图卷；是作者被打成右派之后九死一生的亲身经历、所闻所见，极具震撼性，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此书未曾面世已轰动，二〇〇九年参与此书编辑的荆楚先生，被广西新闻出版局局长秦某、桂林新闻出版局局长陈某等中共宣传部门官员约谈，警告如敢出版，将报复其妻子和孩子。而且声称此书的出版，将影响中国的稳定，有关人等将治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孔令平父母都是一介书生，对抗日救亡和建设新教育有过贡献。孔祥嘉，在一九五一年镇反中，被抓进监狱并蛮横的拒绝通知家属，也拒绝向家属提供判决书。直到一九八二年，四川省公安厅才在发了一纸共三十二个字的《来信来访通知》中说他一九五六年死在狱中。

一九五七年孔令平和母亲方坚志先后以替父亲翻案而打成右派分子，年幼无知弟弟于一九六七年被不明不白杀害。母亲因忍受不了非人虐待而投塘自杀（未果），孔令平也几乎被处死。

《血纪》再现了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高产卫星、社教运动、一打三反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场景，以及人们被活活饿死、被斗争、被打死的心惊场面。《血纪》描述被监督劳动的饥寒交迫和所受非人虐待：遭打骂、戴内圈有倒刺的小铐、吊打绳捆，关禁闭、陪杀场等，还要在饥饿中服苦役。记录了他们被打死、捆死、踢死、自杀死，以及为活命逃亡被击毙，饿死在途中的真人真事……

《血纪》也记载难友们在暴力的侮辱、摧残下，奋起反抗的故事：陈力、张锡锬、刘顺森、皮天明等烈士们将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国家不幸作家幸，一生在苦难的血泪中浸泡的孔令平，终于在把恶呕心沥血的《血纪》贡献出来了。这不朽《血纪》三部曲也将使它的作者成为不朽的人物；孔令平又是幸运的作家。

### 《血纪》告诉你什么

#### 孔令平

这一部长篇回忆录，是通过我一生经历的回忆，用事实揭示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六十年的历史，因为它的真实性，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大陆从一九四九至二〇〇九年期间历史的参考，为不了解大陆真相的年轻朋友，提供一本关于认识独裁专制的读物。

中国的悲剧已引起世人的关注，包括中共内部的异见者，他们在读到这本书时如果引起良知和人性的震撼，感到不应固守着毛泽东独裁衣钵不放，而毅然接受民主，投身到民主大潮中，便是我衷心的愿望。

愿它成为「中国的良心」，留给我的民族，并献给年轻一代。

《血纪》全书分上、中、下三集，全书共一百万字，上集从中共建国写到一九六四年「文革狂飙」，中集从一九六五年写到一九七九年「平反」，下集从一九七九年写到二〇〇九年。

上集，述叙了我的家被中共破碎的过程：我的父母都是新教育的开拓者，他们对抗日救亡和建设新教育有过贡献。我的父亲孔祥嘉，中共对他洗脑后，仍于一九五一年底抓进监狱，判处结果不告知家人，不发判决书。

直到我「平反」后，向公安机关一再追问（共发信十一封），先说下落不明，直到追问到四川省公安厅，才在一九八二年发了一纸共三十二个字的「来信来访」通知，说他一九五六年死在狱中。

如此草菅人命还不算，还对我们一家四口进行了残害：一九五七年我和母亲先后以替他翻案打成右派，我的年幼无知弟弟以「黑崽子」一九六七年被不明不白杀害。我的母亲因忍受不了非人虐待而投塘自杀（未果），我也几乎被处死！

这种对无辜者无缘无故的「灭家」，便是毛泽东口口声声的人道主义！幸好我大难不死，今天我得以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讲述我二十三年冤狱和六十年来所见所闻——

「上集」记载了在农村中我所见到的场景，再现了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高产「卫星田」、「社教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所经历的历史，揭示了大陆饿死几千万人的原因，剥开毛泽东的画皮，这是一个中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暴君；

一个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上集」描述了年仅二十岁的我划成右派后，被「监督劳动」受到非人虐待；记下了我入监的过程，为了扭曲我，逼我「认罪」，我被颈上吊三十斤重的砖头，遭暴打；还要在晚上睡觉时戴上内圈有倒刺的小铐子；使我整夜痛彻心脾，吊打绳捆是我受到的家常刑罚。

一九六四年盐源农牧场小监里关了我与陈力俩人，后来我又在农六队与张锡锷刘顺森等人一起战斗，今天他们都先后去世多年了，若非神灵安排我一个传扬他们的使命，我哪能坚持长达二十年自始至终写完这部巨著？特别是今年清明节，我们再访盐源时，神又将四十余年前的现场完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将当地老百姓亲眼所见提供给我们，以充实《血纪》。

当年流放甘洛，我被饿得皮包骨头，一个一百七十公分的人，靠水肿的双脚支持着三十公斤的骨架，形同骷髅。已这般可怜，而队长并不放过我，白天逼着我们开荒，因饥饿偷地里的玉米，我被捆死在山野里的水沟边喂毒蚊；把我捆在黄桷树下学老鸦叫；我在狱中只有用绝食表达我软弱的反抗，没有人性的刽子手居然剥夺我喝屋檐水的权力；为了侮辱我，在我睡觉时用刺刀划破我的头；用绳子五马传蹄捆着把生病的我抬上工地，至于关我的禁闭、陪杀场、用死亡威胁我更是常事……我惊叹我顽强的生命力，支持着我撞过了一个又一个鬼门关。

《血纪》用大量篇幅揭露「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描述狱吏的贪婪，自私。直到今天这些故事仍被当局禁谈，正好说明中共对血腥的过去十分心虚，更害怕老百姓觉醒，起来声讨他们，推翻他们！

《血纪》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奴隶们向施暴者进行的反抗，

「中集」记载了难友们在暴力摧残下，奋起反抗的故事：

陈力：早先加入共产党，参加「抗美援朝」立过「战功」，后来生活使他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了中共，因宣传铁托而被捕入狱，入狱后更加认清了中共，痛感自己被骗。在狱中留下痛斥刽子手的五十万字檄文，声讨毛泽东，痛斥中共。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昂头走上刑场，他的英勇就义故事至今仍在民间传颂：胆怯而残暴的刽子手，怕听到他临刑前的斥责，割下了他的舌头，并用刺刀逼令他跪下，他却扭过头去将口中鲜血向他喷去。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举起枪用枪上的刺刀向他后膝弯刺去。这壮烈的一幕至今们在盐源老百姓中传颂。

张锡锷：为反抗中共的暴虐，他在狱中举起反抗的火炬，在狱中制作刊物惊动了中共公安部。事情败露后，疯狂的刽子用手用宽大诱他交待出「同伙」，他坦然回答：「要我交待代我的同伙吗？那么我告诉你，全中国在你们铁蹄下受压迫的六亿老百姓都是我的『同伙』」！他牺牲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临刑前被刽子手残暴的用铁丝锁住喉咙。

刘顺森：在狱中高举「火炬」，他渊博的知识和口才成为流放奴隶人人尊敬的良师益友，被当局认为最危险的煽动家。张锡锷的牺牲并没有吓住他，反而更激发了他探求光明的意志，抱着追求光明，一九七六年越狱，被抓回盐源后，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盐源就义，临刑前刽子用手用铁丝锁住了他的喉。

皮天明：火炬忠实的追随者，一九七六年掩护刘顺森越狱，为反抗狗的盯哨和欺侮，用利斧怒劈狗腿子，一九七六年七月28日在盐源农场从容就义。

烈士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被中共宣传所骗，当他们觉悟到被骗后，便以十倍的愤怒向施骗者还击。抱着为真理而牺牲的信念，无悔无怨献出了生命，这种反抗暴力的动力，是中共永远都没有估计到的，这正是中华民族魂在近代的复复生，欲知其中细节，请阅读《血纪》中集。

《血纪》下集记载了中共邓小平开创的后集权时代，以平反冤假案开场，因此我的下集就以「落实政策的马拉松」开始，写下了平反的自相矛盾及受害者为争生存权而斗争，特别是在家破人亡后，修复『家』所留不可克服的「后遗症」，这场冤狱将无尽的苦难留给了下一代。

此外我以典型的案例描述了一群官僚在落实政策中的胡作非为，把这场消弭毛泽东的遗害，变成一场踢皮球甚至向受害人的勒索之中。

《血纪》「下集」以真人真事描述中共「改革开放」的混乱。「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才是好猫」论，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论。正好说明共产党是「没有任何主义」的党。「没有主意」怎么执政？

中共建立的特权却是不可触动的，于是一群自私的官僚变成了国库里的硕鼠，硕鼠的特权加没有主意的「执政」，社会被搞得一团糟。「六四」为什么在北京风起云涌？当年学生举起的大旗中明明白白白写着：「反对腐败，反对官倒」。

结果没有主意的中共在学生运动中分裂了；结果邓小平慌忙决定用坦克碾压「自由村」，创下当今世界惊闻，

于是邓小平惊呼：「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中心」，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正走向灭亡，一股复活毛泽东的力量蠢蠢待动。

我想通过这本书对这个「没有主意」的中共进一言，希望能从中华民族大局出发，从全人类出发，能直接面对过去，对所作所为能向受害的中国人有一个交代待，向全体人民有一个交代待，若能放弃独裁，走民主的路，人民幸矣，国家幸矣，中华民族幸矣！

但愿我善良的愿望不致又一次落空！

子乙于二〇〇九.八.

## 第一章：\*\*陷入阳谋的初生牛犊\*\*

一九五七年四月初，重庆大学校园里春意正浓。这天中午，学生们正在学生食堂用餐时，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校党委办公室的通知：「今天下午两点正，全校员工在新修学生食堂听取校党委书记传达中央重要文件，自带坐凳，不得缺席。」

广播里放着周旋唱的优美四季歌。我端着饭盅，走出第一食堂西侧的大门。同班女同学马开先正坐在门前石阶梯上边吃饭边晒太阳。

「今天下午又要听报告，我们谁拿凳子？」我问。

她转过那张被春光晒得像苹果般微红的少女脸蛋，回答道：「当然是你去啰，我就在这儿等你。」说完她朝我顽皮地甩了甩脑后的小辫，做了个鬼脸。

我是一九五五年考入重庆大学机械系的，大学的生活学习与中学有许多不同，没有固定教室，每一节课上课都是按照课表上排定的教室，时间一到就到指定的教室自选座位，下课就离开。平时自习、复习都没有固定的场所，除了下夜自习归宿和上课以外，同学们都背着书包，各自寻找图书馆或教室，自由度比中学时代大多了。入学两年下来，为选择自习的最佳场所，我便熟悉了校园内所有的角落。

我和马开先选中了松林坡后校门处一幢很旧的教学楼，教室里面的课桌板凳多数都已残缺，很少有人光顾。不过，这儿很安静，周围是松林，空气特别清新。那时，我俩正在初恋，这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一起复习讨论，而又不受他人打扰的固定场所。我们自己动手，修好了两套桌椅，钉了两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小方凳，专供开会和看露天电影时用。

那天下午，传达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声讲话录音。开始时，党委书记郑思群在麦克风里宣布，今天的传达不准作记录。

他的话音一字一板，从那严肃的口气中表达这是一条必须遵守的纪律。原先曾拿出笔记本的几位老教授悄悄收起了笔记本，坐在那里翘首聆听。毛泽东那浑厚的湖南口音，加上录制过程的杂音，虽然影响了收听效果，但



他许多在以往政治学习中没听到的话，令人感到新鲜，与郑校长严肃的禁令，构成了一种与往常多少不同的气氛。

当时大家对这位党和「国家」的最高元首怀着肃然的感情。尽管那录音讲话冗长而杂乱，但现场秩序一直很好，将近一万平方公尺的「会场」上，从下午两点到傍晚六点半，很少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中途溜号。

我至今都记得那慢悠的湖南腔，讲到了赫鲁晓夫和苏共十九大，讲到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讲到东欧局势。当时在我们的政治课程里，联共（布）党史是我们的主修课，对于工科学生，尤其是像我这种「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女，一直没有兴趣去弄清楚那些课程中的真正内容，即使当时因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全世界公诸后，引发一连串共产党阵营内地震般的分裂，也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正视和思索。

我自幼就被「反革命家属」的紧箍咒罩着，一听到反革命暴乱和镇压反革命的话，就如芒刺在背，想的都是挨整和可怕的后果。我入大学的第一年就碰上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每次学习都仿佛在我耳边念紧箍咒语，我从来不敢认真去追问：胡风为什么要反革命？我发言、说话除按团员们干巴巴的老调门重复一遍，绝不敢再多说。

我上中学时，父亲就被捕入狱，在一连串红色恐怖运动中长大的我，始终谨记着母亲的教导：「不要像你父亲那样，不要去过问政治，读好你的书，有了求生的本领，才有一切，其它的千万不要多嘴，不要参与，孩子，你要记住你父亲惨痛的教训。」

关于苏联，我只知道：「社会主义阵营是坚不可摧的，是无比强大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一切反革命阴谋。」

然而，这个下午，我们却从毛泽东的嘴里，听到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听到这位湖南人对被神化的偶像斯大林作了「功」「过」三七开的评价——那个被推崇到「导师」、「父亲」尊位上的苏共头目，成了一个犯了「错误」的凡人！

我们第一次听到一些全新的说法，如：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共产党也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工人罢工游行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没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大量存在的，有时是很激烈」，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民主、说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学术界应当遵循的「根本方针」；如「大鸣、大放、大字报」。

这些说法，如阵阵春雨，让在以往政治运动中寒透了心的大学学子们，无不感到亲切和鼓舞，我注意到那些坐在中心地带的老教授们挺直腰板，聚精会神……

传达会开完后，同学们热烈地讨论起来。甚至有人在学生食堂绘声绘色地讲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潜入苏共二十大，窃取了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秘密政治报告。

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以及刊登这些报导的翻译刊物被抢借一空，大家争阅着这些材料，思索着国内外发生的一切。

我和恋人阿先也不例外，我们两人在我们选定的复习地展开讨论。

一个思想活跃的春天降临了！

### 第一节：\*\*「大鸣大放」\*\*

两天后，教学大楼前挂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巨大红色字幅。

接着，全校的党团员和教师职工，在松林坡大礼堂参加了由党委副书记宋殿宾主持的「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动员会。会场上和周围建筑物的围墙上，张贴着各种彩色标语，上面写着：「正确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动群众，和风细雨的帮助党认真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言者无过、闻者足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那次动员大会上宋殿宾用异常委婉和诚恳的语气，表达了当时学校中共党委的态度，他拍着胸口保证自己带头在这次运动中，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不管有多么尖锐都要接受。

宋殿宾动员大会的第二天，在团结广场又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全校性大鸣大放动员大会，所有的校级领导都登台表态，欢迎大家本着知无不言的态度向他们提意见。紧接着，便是系的、年级的、班的大鸣大放动员会；这些会更具体，更直接地面对着全校的师生员工，要求他们无一「逃避」。

与此同时，全国媒体开足马力，一个劲地鼓吹：「全党全国全体人民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党的整风运动就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尤其是「党外民主人士更要积极帮助党进行整风。」

当局摆出了一副中共「要与人民同心同德，与人民共同建设繁荣昌盛新中国」的决心，展示出「同民主党派人士为建设国家共存共荣，相互监督，披肝沥胆」的坦诚。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这些人的发言中有代表性的，诸如陈名枢的《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我读后，认为陈名枢的讲话全是对共产党的奉承话，即使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下，奉劝了共产党也应当向非党人士听取意见这一条，也是毛泽东自己说的。

至于黄绍竑所说的「以党代政」，倒是涉及到了共产党领导这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不过，既然领导要讲究「方法」，包揽一切可不是好作风、好方法呀！事实不正证明，事无巨细都得由共产党点头，不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才真有点怪。

再说张奚若所列中共四大偏差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四条却真是给毛泽东见仁见智的「把脉切脉」。毛泽东不是诚恳欢迎大家给自己提意见要畅所欲言么？谁又能料到张先生的这一番苦心，正好切中毛泽东的心病和大忌？

至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讲些什么？主张共同「设计」政治蓝图么？四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可是毛泽东自己屡次讲过的话。他不是主张百花齐放么？这一政治设计院，未必不是对他的号召一种热情反映呢！

说到储安平的「党天下」轰动一时，原出于小和尚给老和尚唱颂经这么一点幽默，「党天下」者可以顾名思义了，不像陈名枢那般臣子的卑下，比之黄绍宏更为直接，共产党的霸道，虽然已引起了当年中共盟友们们的「不满」。

专制同民主之争本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主题，然而被红色恐怖所控制的大学生们怎么能懂呢？大小事宜共产党一手遮天难道不是事实么？反对一党专制的微弱呼声，难道不是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时积极主张过的么？

至于罗隆基提「平反委员会」，正好说明党天之下冤海无边的事实么？在那个年代中包含因家庭受到冲击的人那一个没有体会？从执政党的角度考虑，为错案和冤案纠偏，正是一种最好的补正，至诚之见啊！

要知道，这些「见解」提及人权，曾是为中共呐喊和提供援助的「老朋友」们，（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共产党的取胜有他们的一份功劳，）这些老朋友所说的，大多都是共产党曾经提出和主张过的东西。现在反过来应用在执政地位的中共身上罢了。

一针「全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是和平建国新时期」的强力麻醉剂，使三反五反，镇反和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恐怖空气一扫而空。似乎欧洲激烈的大民主是可以和风细雨的「小民主」加以解决的。

就这样，一九五七年旧历三月的阳春花开季节，毛泽东为全国送来了一阵迷人的「香」风！在一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轻松乐曲中，袒露出对中共领导下所出现的民众「闹事」，以引咎自责的「宽宏胸怀」，躬身欢迎百姓的「责备」和「建议」。

他像一个「伟大」的「民主之神」为了国家和人民，来到校园里培植这「百花齐放」的美景来了。春天正是耕种的季节，春天正是显示「造物主」伟大形象的时机。

在中共红色恐怖下已生活了七年的人们，对于这种突然的宽松气氛，感到一种受宠若惊的惶恐，习惯于被剥夺了的民主权利，对言论自由向来讳莫如深，生怕弄得不好便是反革命言论，那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反了才几个

月？

他们习惯于国家大事都由「党的政策」所包代，学校「大政」由党委包代，而从不去用心思考。他们甚至为怕沾着「反动」家庭和「反动思想」，被「追查」，而远远躲开。

因为胡风分子有先例，凡收听外台的均可以投敌叛国治罪下狱，所以他们不敢收听外台，相反，他们认为，中共这种专横的做法都是天经地义的，有民主追求的想法反而是十分危险的，他们懦弱到连自己的亲人在运动中遭到冤屈，而上诉的权利也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放弃了。

至于他们对于党组织那种盛气凌人的作风，更是不敢公开反对。

所以，面对着党团支部再三的诚恳开导，鸣放会在开始时反而冷场了。

叫这些工科学子们说什么呢？他们可以在一场学术讨论中，在答辩一个设计论文时，争得上火。可现在让他们坐在「主人翁」位置上，「凭空」向党提意见，确无准备，也没有想过。

为了检查各班鸣放情况，系党支部书记召集了所属各年级各班的团支部书记会议，专门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吩咐他们必须准确完整地记下一天内发言者的姓名，并摘录发言的内容，规定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前，必须将笔记本交到他的办公室里。

当时不光各班的团支书们闹不清楚要他们这样做的居心，就连系党支部书记自己也只是奉校党委指示办事，共产党的保密制度极其严密，由中央定的政策，要求基层组织只能不折不扣执行，不能问为什么！

我们班的鸣放会，在团支部书记陈思所住的二〇四房间进行。那时学生中党员人数极少，系里一千三百名学生中，才十几名党员。这种本应由党员主持的会议，在班级都是由班的团支部书记代理。

陈思对这种政策性极强的会议，心中没有底，拿不准犯了错，还不知道错在哪里。二年级政治辅导员邓某就曾在这间屋子里，举行过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背靠背」揭发批判会。当时的一位助教因说「学习，是独立奋斗独立拚拼搏的过程」而被划成了胡风份子，后来还送去劳动教养。

陈思并没有想通，这提倡学习的独立奋斗错在哪里？罪从何来？他亲眼看到那位助教被送上囚车。从此，他同党员接触便分外小心，平时传达政治学习，总是按年级的党支部组织委员曹英的话记下，回来逐字照读不敢走样。

这事还没隔上一年，邓指导员杀气腾腾的话音犹在耳畔，突然又要求大家广开思路，鼓励知无不言，大家真没有来得及想通。

陈思根据在系里开会时记录的笔记作了「开场白」，班长郭英华打开了会议记录本。第一天开张就冷了场，开会发言同图书馆或饭堂里的高谈阔论的「乱侃」是绝对不同的。

这可急坏了陈思，像这种哑巴会，怎么去交那党书记的记录本？于是只好沿用历次政治学习的老办法：挨次发言。

结果，所有的发言几乎都与陈思的「开场白」一个谱调，尽管郭英华在记录时作了语言的调整，但无非只是用词的不同，意思却没变。拿到党书记那里，果然挨了批评。

不过，全系各班的情况大致雷同，党书记再作布置，要求各班团支部务必想一切方法，让大家说出「心里话」来。

陈思回来召开了一个团支部的支委会，宣教委员出了一个点子：自告奋勇去找平时就爱放大炮的林娟和刘唐先发言，让他们就班的团支部工作发表意见，组织委员刘奎则建议由林娟最看不起的雷田沛先说话，林娟必会作出反应，大家从中一激，就会让气氛活跃起来。

第二天的鸣放会「依计」而行，雷田沛首先发言，只说了不到十句话便草草终结。果然引起林娟的一番挖苦，说他像一个放音都放不好的录音机，不像一个男同学的样子。她说完后出其不意，话锋直逼班长郭英华，说她的工作作风简单生硬，经常凭个人主观想象组织班里的活动，凡是她不喜欢的就不搞，比方说组织郊游，本学

期已过去两个多月了一次都还没进行，邻班五班已组织去了长寿湖，又去了大足，每周都有活动。希望郭英华在这次整风中好好改一改。

郭英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手拿的笔停了下来，等到提起笔作记录时，竟不知怎么的记法，只好记下几句：「林娟发言：批评班长郭英华思想古板，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毛病，组织班上工作死板，应当改进。」

林娟既开了头炮，刘唐紧跟而上，他举了一个实例来批评郭英华的「官僚」作风。他说：「去年，机械原理上齿轮课时，大家对齿轮变位齿的正负变位的选齿还没闹清楚，认为林教授讲快了一点，希望他能在自习课抽点时间给大家再补一下，偏偏郭英华却反对，她说『自习课就是要自己学习，自己消化，根本没必要全班抽时间为一个小问题而补一堂课』。」

结果，就这么一个主观认识，大家的意见便被轻易否定，这种作风就是主观主义，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对不对？」

为了同大鸣大放的主题相切近，刘唐对这位不到二十岁的班长，连扣了两顶帽子。郭英华不是党员，似乎同「帮助党整风」完全不沾边，虽文不对题，但毕竟有了争论，大家七言八语，鸣放会开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主生活检讨会。

工科学子们的大鸣大放，只局限于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直接发生关系的班干部们。别说年龄还未满二十岁的陈思、郭英华，恐怕就连重大最受人尊敬的党委书记郑思群，也未必弄清楚了中央的用心。

全国有几个人弄得清？毛泽东葫芦里卖的药，这是在运动的后期，乃至十几年、几十年以后，才逐渐地暴露出来。

然而校园里最初贴出的大字报，为平静的校园搅起了一点风波。

我记得机械系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以客气而谦恭的语气，向曹英「进一言」。曹英是年级的党小组长，系党支部组织委员，是某机关调来的「调干生」。他比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嫩娃娃大十岁，他文化程度不会高于小学毕业，是一个已有两个小孩的父亲，从机关专门抽到大学来「镀金」的。

机械系有好几个像这种带着党员和官帽的大龄「调干生」。「解放」初期，为改变知识分子「结构」，在剥削阶级出生的学生中，渗入工农成份，「调干生」就这样来到了大学校园。学习是否跟得上不管，他们的全部能耐，就是言必党的利益，言必训人「阶级意识太差」。谁都对他们畏惧三分。

贴大字报的人，谦卑语言中含着讥讽和挖苦，意思是希望他能在这次整风中为自己洗个澡，与其装腔作势训人不如多读点数学和力学，不至于毕业考试吃鹅蛋，今后工作时「辜负」了党的期望，难以真正为人民服务。

以曹英的文化水平，他未必能领会和懂得。

接着就有第二张、第三张，以至于无数张。曹英在学生中已有绯闻，说他借「政审」和「个别谈话」之机，常常对那些刚入大学的漂亮女孩子们动手动脚。

鸣放期间，闹得最凶就是对膳食科长贴出的大字报。据说这位四十多岁的北方农家子弟，扛着步枪从农村跟着大部队干了几十年革命，曾当过营长，复员后被分配到学校当了膳食科长。大鸣大放别的说不上，唯独一事引起全校轰动，这便是名噪全校的瘟猪肉事件。

不知这位张科长从哪里买进了几百头肥猪，第二天重大膳食科的养猪场便开始发瘟。猪死后卖到学生食堂，顿顿猪肉，但学生们并不知吃的是瘟猪肉。

大鸣大放时张科长上了大字报，瘟猪肉事件使他无地自容，他既说不清何以从不法中间商那里一次买那么多病猪，更说不清楚为什么明知是病猪，却用来毒害三千多名大学学子。

张科长是一个老党员，老八路，做出这件可恶事，便成了众矢之的的「贪官」、「杀人犯」。使他许多天夜不能寐，负着沉重的罪恶枷锁，那些日子成天低着头走路。

看来，学生们有相当的舆论能力，口诛笔伐用得好，足可以监视共产党的不良作风的。这一点并不比当今南韩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差劲。五四运动就有光荣传统，只是因为共产党的霸道，而使学生们处在愚昧和迷信状态，对客观是非缺了理性判断罢了。

张科长的「后台」，便是校党委副书记兼人事处主任宋殿宾，这几年，频繁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一次运动他不扮演「太上皇」的角色？岂止是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就是杀人冤案的制造也首推其人。于是对张科长放的这把火，便烧到了这位平素里颇给人以势压人的「太上皇」头上。

不过，所有贴出的大字报依然很懂政策，绝不会超过「批评」这个框框，语意和用词绝对的「以人为善」，只是在漫画大师林毓森的笔下，将宋主任画成了身材又矮又胖的「退耳」。这幅漫画上，见他每天上班时将脚翘在办公桌上，旁边摆着茶杯和香烟烟，和一些刚刚批示的散乱文件，附打油诗一首，意思是说：宋书记平时办公时，喝茶抽烟烟，草率地批发文件，而不关心师生疾苦的作风，希望他能在这次运动中认真改一改。

另一些对党团干部批评的大字报，基本上只属于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意见。偶尔出现几张附会教授治校，反对党委独揽的大字报，以及批评人民代表的选举由党委包办的大字报，和历次运动中伤害无辜的大字报也是语调低沉，张数寥落，被淹没在对校内各领导干部，提出个人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大字报汪洋大海之中。

后来还出现过几张列举苏联驻华大使馆中，苏联武官和旅顺港总领事馆苏联驻军的兵士，在中国举办的舞会上，对中国女招待动手动脚强行「接吻」的非礼行为大字报。

重庆大学的学子毕竟以工科和技术为「宗」，那时，家庭出身被定为「剥削阶级」的，占学生总人数的八成。「解放」后经过了斗地主、杀恶霸、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恐怖气氛笼罩着全国，那些被沾上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正是革命的对象，虽然暂时在大学生人数上占着优势，但在社会气氛的压力，已形成对他们的精神压力。

以我这种父亲仍在狱中服刑的「反革命」家属，在这种压力下，对「政治」敬如鬼神，自觉「矮人一等」。这种很深的「阶级烙印」，使我每闻「反革命」三个字就提心吊胆，家母的教诲「千万不要涉足政治，平时更要休谈国是」随时响在耳畔，所以我下决心攻读理工科，今后能与一般公民「平身」就不错了。

对政治的戒心，必然使我们这些孩子成为政治的盲人和懦夫。

从美国归来的董时光先生在西师任教，他在鸣放会上发言，以两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人民生活水平的对比，来说明他的观点——共产党在执政上的专断独裁。

重庆大学邀他来向全校作了一次近似民主沙龙的演讲会，他的演讲，给从小就受中共传统教育而闭塞的大学学子们，开了一个认识世界，自由思考的窍。可那次我却没有去。

倒是马开先去了，她回来向我传达，显露出受益匪浅的快感。她说：董先生所讲的全是两种制度的对比，全用事实说话，比方说，在美国，学校的一个教师和学生，可以就学校设备、教学安排、乃至教师待遇向校董事会提出质疑，而校董事会必须给予答复，凡正确的，需采纳并出示改正时间。

还有，美国政府必须遵守美国宪法，尊重任何人的意见；任何人有权批评政府，并通过议员弹劾政府官员等等。

其实，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我们已从报刊文摘中略知一二，只不过被中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自由是有钱人的民主，在那里被剥削的阶级过着被奴役的牛马不如的生活」所歪曲，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将崇美恐美当成了极大的反革命罪恶，不敢正视和思考。

在整个大鸣大放中，我完全处于无知之中，愚昧使我们失去了对世界潮流和进步文化的任何接触，失去了对民主社会的了解，失去了真正生活的一切动力。

压抑使愚昧顽固化，愚昧使压抑合法化。

大鸣大放触动了我们长期的压抑和愚昧，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真是长期处在愚昧和压抑之中的可悲人类！这种状况仍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保证，要不然，为什么毛泽东视「民主」为洪水猛兽，一有露头便要彻底铲除；

要不然他何以在生前掀起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毛氏极权再明白不过，中国人一朝明白了自己愚昧和压抑的可悲处境，独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对于大鸣大放将预伏着一场比反胡风运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狂风暴雨，更是我们这些闭塞的年轻学子们想不到的。

有「百花齐放」的政策，有各级党组织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庄严承诺，谁会想到等待「言者」们的是手铐和监狱！

直到谭天荣在北京大学刷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大字报；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为胡风鸣冤；四川大学冯竹君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声音时，重庆大学才站出了一位冶金系团委书记蒲世光，贴出了一张署名「非团员呼声编辑部」的大字报，旨在替家庭出身不好的非团员学生们，喊一声「反对唯成分论」罢了。

即使如此，全国大学生们的思想仍没摆脱「愚昧和压抑」的牢笼，也绝没超过中共思想的封锁圈。

谭天荣的大字报是以「中国共产党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的口号为结束语；林希翎所呐喊出的民主依然是「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在压抑之下的呼喊，这种同共产主义理论「靠拢」的姿态，并没有丝毫感动毛泽东。

已步入专制迷的毛泽东，此时正在酝酿一次大规模的「阳谋」——向民主疯狂挥动屠刀的「阳谋」。连蒲世光这种对「唯成分论」的小小反对声，也没有逃掉残酷的镇压。蒲世光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捕入狱，并被处以二十年徒刑，尽管这个取名「非团员编辑部」的全体成员只有他一个人。

## 第二节：\*\*我的少年\*\*

一九四九年底，解放军占领了重庆和大西南，随之而来的是「民主改革」运动，清匪反霸、土改、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对数以百万计在国民政府中服过役的人员，大肆捕杀。

一九五〇年我十三岁，常去附近农村看斗争地主的大会，那些被斗的人，有些还是孩子，裸膝跪在炭渣上，双膝血流斑斑，惨不忍睹。公判大会由军管会主持，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城每隔不到一个月就要开一次，每次都有一批人被处以死刑，在北碚嘉陵江边的码头上，每次公判大会的最后一幕便是在那里枪毙人，人血染红了鹅卵石铺盖的河滩，日久变成了黑色一片，虽大雨冲刷，也难以褪掉留下的黑色血痕。

这是继长达五年的内战后，同胞们自相残杀的延伸。

### （一）一九五〇年我的家人

我的父亲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到南京，不久到杭州师范担任校长。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他应顾毓秀先生（抗战时中央大学校长）之邀，赴南京中央政治大学任职，我们一家便离开了杭州迁居南京，接着父亲又经上海、广州，辗转再赴重庆。

一九四八年冬天父亲担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代理校长，次年任分校校长，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重庆「解放」前夕，他匆忙地把我母亲、外婆、我和弟弟安顿到了北碚，住在当年父亲的同班同学兼证婚人刘汉良的家里。

从此以后，我们便定居在这座嘉陵江畔的小城——北碚。

一九五一年他因「历史罪恶」，被当时刘伯承担任校长的西南革命大学召去「学习」。他所在的班称作「特别高干班」。后来，半年的学业届满毕业，历史问题已「交待清楚」，他被遣送回北碚，要他以国民党高级知识分子留用人员身份，听候分配。

不料，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他被当时的川东行署军管会逮捕入狱。

我的母亲，是三十年代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的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她的班主任老师孙起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母亲学生时代的同窗在孙起孟先生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成了苏州女子师范的学潮的积极参与者，曾轰动当年的苏州教育界。后来，这些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外围，一九三九年纷纷从重庆去了延安。

唯有母亲与父亲结了婚，滞留在南京。她悉心办学，一生从事教育，一九四三年在国民政府军工署署长俞大韦的支持下，在重庆双碑创建私立嘉陵中学。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迁居南京，本以为可以过几天和平宁静的日子。

不料国内战火纷起，我们这五口之家又辗转迁徙，像一叶行驶在战火火海里的小舟东撞西突，颠沛流离。

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已呈败势，父亲曾要她携带家人从广州去台湾，她却自恃着过去「光荣」的历史，以及和孙起孟等人的友情，估计共产党不会给她为难，便断然决定留在大陆，等候「解放」。

一九五〇年后，母亲便与中共国务院第六办公厅主任的孙起孟取得了联系，希望在当年学潮中共患难的知己的保护下，得到一个继续从教，平安度日的老百姓生活。以后的事实证明，当年学潮的友谊在毛泽东时代是多么的脆弱。

一九五一年，她在民政局的安排下，在北碚机关托儿所担任了一名「教养员」。

一九五一年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名军人来家中把父亲抓走，并抄了我们的家，他们抄走了母亲用多年积蓄购买的金银首饰和存款，还硬说这是国民党留给父亲做反革命潜伏的活动经费。搜走后也不给任何手续，母亲为此气得三天没吃饭。从此后，我们一家四口，就靠母亲每月三十元工资艰难度日。

我的外祖母生在光绪年间，出生贫寒，十六岁嫁给了一个苏州城的浪荡子，但很快就被遗弃搁置一边。后来因为有了个男孩，才改变了她在家里的地位，可她儿子不久就去世，于是她被当成弃妇，从方家大院迁出。两年后外祖父在花天酒地中死去，那时我母亲还不满四岁。

在那个三从四德的年代，女人不得随意改嫁，只有守着这妇道的名节，方能得到亲朋好友的尊重和资助，外祖母虽不是《镜花缘》中的才女，却实实在在做到了「苦守名节夫死孀居」的节女要求。

自此母女相依为命，外祖母靠着女红和亲友资助度日，自是吃不尽的苦头。她认为苦命，是前世作孽的业报，便一心修佛，常年斋戒，抱着与世无争的态度，默然负着生活的重负。大抵因为严重缺钙，她五十多岁就驼弯了腰。我是在她的怀抱中长大，并在她的教养下铸成了我人格的初胚。

一九五二年，我十四岁，读初中二年级，弟弟六岁，刚上小学。我们住在托儿所的职工宿舍里，这是一幢坐落在半山腰上的三层楼房，我读书的学校离家有五华里。为了补助母亲收入的不足，我从上学时就开始了劳动。

那时，北碚凡半山之间是不通自来水的，家里的用水部分靠雨水，供洗脸洗脚洗衣服，吃的水必须在离家一华里的水井中去挑。自从父亲被送往革命大学「学习」时，我就开始从山下向山上挑水。

一挑装水不过五十来斤的木桶，我只挑得起半挑，楠竹扁担压在我又瘦又窄的肩上，摇摇摆摆走不上百步，便觉得肩上承受不住。水从井口挑到家，我要停歇四五次，累得气喘吁吁。

因为不断的换肩，扁担在我的两个肩头之间摩擦得火辣辣的，疼痛难忍。

倘若遇到下雨天就更惨了，一溜一滑地，在山腰中打穿，不留意一跤摔下，碰伤出血是常有的事。

经过一年的锻炼，我的力气一天一天大起来，肩头上磨破和红肿的地方也长出了厚厚的茧巴，挑着能装一百斤重水的大桶，从山下雄赳赳地挑上来，不需五分钟。从此以后，家里挑水的事就由我包了。

## （二）陈户籍

家被抄以后，每月靠母亲的三十元，要维持四口之家实在太难。初中三年级时，班主任说，如果家庭经济确实困难，可以向学校申请助学金，免交学杂费。但是，申请必须要由街道办事处签字。我们住区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也是朝阳派出所的所长，我写好了申请书，修改了两遍，端端正正地誊写在一张信笺上，拿去找陈所长签字。

派出所在北碚公园坡脚下一个原来的旧庙里。那一天天气很沉闷，天空中渐渐疏疏飞着毛毛细雨。庙宇隐没在梧桐林荫之中，显得十分阴森。走进梧桐树丛中，雨点敲击树叶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有一种神秘感。这是我

第一次与成年人打交道。我才十四岁，又背负着父亲入狱的精神重压，头一次同政府打交道，心里不免害怕紧张。我一边向里走，一边心里直打鼓。

到了门口，我定了定神，努力稳住加剧的心跳，怯生生地站在门外。门里黑洞洞的，看不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报告。」我试探性地喊了一声。没人应。等了片刻，仍不见动静，我向里看去，黑呼呼的什么也没看清。我心中暗想，这里可是衙门，倘若别人把我当小偷，我就说不清了，于是大声吼道：「报告！」

「啪」地一声，电灯一下子亮了起来，借着黄色的灯光，我才看清了那正屋中的办公桌旁，坐着身材魁梧、一脸横肉的陈户籍。一年前我为父亲办户口时，曾跟着外婆来过这里，当时经办户口的人正是他，大家喊他陈户籍。

他从座椅上微微欠起身，懒洋洋地从桌上把腿收下。不知是因为看我是一个身高不足四尺的孩子，还是本来就对我这个反革命家属子女早有印象，他似乎很不满我惊吵了他的好梦，轻蔑地瞄了我一眼，又重新躺了下去，恢复了刚才的姿势。

我连忙跨进门，慌张中将刚才想好的的开场白忘得精光，傻呼呼地站在那里，右手下意识地揣进口袋里，紧紧捏着那张申请书。如此等了三分钟，他才半睁着眼不屑地问：「干什么？」我把申请书拿了出来，嘴里却像被什么塞住，说不出话，只得把捏着申请书的手伸了过去。我觉得伸过去的手在发抖。他终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左手从我手里接过那纸条，右手叉着腰，活像一个夜叉对着一个小鬼。

他看过申请书，右手从叉腰的地方缓缓提上来，摸着那很肥很横的胖下巴，嘿嘿冷笑道：「没听说过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还要申请人民助学金。」说着便把那纸条扔在桌子上。嘿嘿的笑声在空中回响，我觉得脸上好像重重地挨了他一巴掌，脑门里嗡嗡直响，耳根也火辣辣的。

此时，积郁在我心灵上的伤痛一阵阵地袭来：父亲被捕那天早上，全家人在惊吓中回不过神来；母亲抱着才七岁的弟弟躲在床角满面恐怖；抄家时，外婆和母亲束手无策；星期天母亲在地摊上拍卖衣服的窘境；托儿所母亲的同事门对我们兄弟俩的白眼。

那一瞬间，好像天地间本来就嫌我这种渺小生命的存在；无数张扭曲的脸莫名其妙地向我吐口水，如果当时地上突然裂开一道缝，我会毫不犹豫地化作一溜青烟，从那裂开的地方钻进去，永远羞于再回到这个人世中来……

突然一股勇气涌上我的心头，我猛然伸过手把那张扔在桌边的纸抓住，拚拼命地把它揉成一团，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跑出那黑洞洞的大门，我踩着地上的水洼，溅起的泥浆劈劈啪啪在身后直响，仿佛还听见那梧桐林在身后，发出的嘿嘿冷笑。

外婆在洗衣服，我扑倒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

从此以后，那张点缀着雀斑，一张横肉狞笑的脸，和那叉着腰像夜叉的凶恶姿态，便常常闯进我的恶梦中，直到今日仍然如此。

### （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一位姓李的中年妇女是我家紧邻，她在房后搭起一个猪圈，以街段名义喂了四头猪，每天下午以三毛钱一百斤的价格收购猪草。我看准这个机会，每天放学归来，沿途打猪草。从学校到家五里路，路两边是交错的农田，那里面的蛾儿常，马斯苋品种齐全。我每天放学抓紧采集，一背兜大约三十斤，如此下来每月可挣两块钱，够我的学费了。

十四岁的我，羞耻心已经很重，每天早上上学我都背一个背兜，为怕同学们看到，每天我都比其它同学早到学校。到学校后我将背兜藏在教室背墙与后山间不足半米的窄缝里。

等到放学后，同学们散尽，我赶紧从后墙里取出背兜，打猪草回家。此外，在从学校到家里的路途上还有两处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一是北碚医院，另一个是一家地主大宅院——李家花园。



一九五二年李家花园被没收，做了北碚法院的临时看守所。医院和看守所伙食团外面都有倾倒垃圾的山坡，有大量炭灰渣，炭灰渣里夹着许多小块的没有完全烧尽的「二煤炭」。虽然炭灰渣中倾倒着有酸味和恶臭的污水，但我还是常常背着背兜去光顾。

我每天都要在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那时，天已断黑，我背着沉重的背兜满载而归，那里面装的不是猪草，便是二煤炭和柴火。

每当我登上石阶，就会在朦胧的夜色中看到外婆花白的头——她早已在那里躬腰盼望了。还没有等我爬完那七十公尺长的山坡，她便会走下坡来，从我的背上接下沉沉的背兜，同我一起把它一颠一簸地抬进家门。

回到家，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已放在小方凳上，我脱下被泥土、煤灰和锯末弄得又黑又臭的补巴内衣，洗擦满头满脸的灰尘、油汗。洗净之后，再同她和弟弟一起共进晚餐。每一顿饭，她都把最好的菜往我碗里夹。

那时家里一个星期才吃一次肉。外婆总是避开弟弟，在我的碗底设下埋伏，在她的眼里我每天付出得太多。而我总是要从碗底翻出来分给馋嘴的弟弟。这推让之间，倒也使我们很深深地感受到家人相依为命的温暖。那时，家里从不缺柴和煤烧，也从没有花钱去买过。

有时候星期天一大早，我还背着背兜钻进龙凤桥周围的密林中采摘野菜和则耳根，托余妈妈拿到菜市去卖，龙凤河水浸透的丛林中地下泛出一股股腐植的难闻的臭味，下过雨，路也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偶尔还会碰上从草丛中窜出来的蛇，我都从不畏惧，好像老天时时保佑着我这可怜的穷孩子，无论是打猪草，拣二炭，拾柴禾，从来没有受到过意外的伤害。

学校后门有一个砖瓦窑，那也是我少年时代出卖劳力的场所，周围的邻居都夸奖我懂事，特别是紧邻的余妈妈，她常常把我当她的孩子看待。这极大地拂去了因为父亲被捕而带给我的阴影。

那时间我虽又苦又累，但心情还算愉快，学习的成绩也是班上前几名。

那些年我和弟弟从来就没有做过新衣服，脚上以布鞋和草鞋为主，布鞋的鞋底是外婆每天晚上用旧衣裁下的布、糊成布壳，再在电灯下一针一针的纳出来的，鞋面也是用笋壳和碎布裱糊而成，外婆年轻时就在苦水里渡过，对于针线活习以为常，晚上她戴上老花眼镜纳着鞋底的时候常常哼着苏州小调，真的非常的好听。

我躺在她的脚前听她低声吟唱，那声音里充满了慈母的爱。晚上，她几乎天天在半夜里为我和弟弟盖被子，常常深情地吻着我们的脸颊，在她的心中，我们便是她生命的全部希望。

我勤劳节俭的习惯就是在她的熏陶下养成的。那时，为了让我在学校吃中饭时有一点补充，有时，妈妈给我一毛钱，好在附近的小饭馆去端一碗小面，可我从来都没有花过，回来便交给了外婆。为这事外婆常常责备我，并在我的书包里放着专门为我煮的鸡蛋。

有一天从学校打猪草回家时，天色突变，狂风骤起，雷电交加。我急忙背上背兜往家里赶，刚到李家花园，滂沱的大雨便倾盆而泻，我急忙躲进看守所厨房的灶坑中。

一名大约四十岁的中年伙夫走出来，蓝色的背心上印着一个硕大的「劳」字。我联想到历史书上，载着前清的罪犯背上也是这相仿的标记，不过那圆圈中是一个「囚」字。他走到炉堂前，打开火门，用火勾去勾火，一股浓灰夹着浓烈的煤气从炉膛下卷了起来。上好煤后他注意到了我，便操着浓厚的江苏口音问我：「小朋友，你在哪儿读书？」

「北碚一中。」

「叫什么名字？」

「孔令平。」

「多大了？」

「十三岁。」

雨越下越大，他索性叫我进厨房去躲雨，还揭开了放在案桌上的巨大蒸笼，从笼里取出两个馒头来递给我。我猜想我的样子看上去很可怜，我下意识地盯着我脚上大脚拇指已突出鞋帮的破胶鞋，腼腆地接过馒头。

「你的爸妈呢？他们做什么的？」

我警觉地望着他。我知道这就是关我爸的地方，每每上学或放学，途经这里，我都会下意识地朝这群神秘的房子窥视，希望突然有一天他会出现在坝子里或者在某一号房间的窗口洞中，但始终就没有看到过。眼前这位叔叔很和善，告诉他父亲的名字和处境，兴许还会从他这儿知道一点父亲的情况。

他听到父亲的名字后，盯着我看了一阵，似乎明白了什么，便附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你的父亲住在X号房，那背后那排房，你看不到。不知什么原因，戴着脚镣。」他接着说：「这儿带脚镣的人，肯定是问题严重。不是想逃跑的，就是不交代待问题，或不认罪。」说完他又盯着我。

听到这番话，我心里一惊，不但担心爸的安危，还担心他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我们能到这儿来探望他吗？」我问。

「难，不过你实在要看他，可以到张家湾工地，他们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在那里劳动。」

雨渐渐停下来，天色也已黄昏，我本想去掏那炉膛下那刚刚勾下来的二煤炭，但一点心情都没有，于是便收拾起背兜、书包，匆忙赶回家。

回到家，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外婆。自从父亲被捕后，外婆是全家最伤心的一个。我们一家五口中，她的辈份最高，年事也最大。中国民间上辈人对下辈人的关爱，往往超过同辈之间或下辈对上辈的关爱。

这些天来，她常常合掌祈祷，暗中哀叹流泪，也常常向女儿唠叨：「祥嘉已抓走大半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法？关在哪里？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生活上缺什么？不管怎么说，总该去法院问个究竟。……探监你不去，我去。你叫你单位开个介绍信，给我老婆子了，快死的人怕什么？」

母亲心里更难受。撑着这个家，谁还有她的压力大？自从丈夫被捕以后，周围的同事就将她视为异物，往日相处不错的几个人突然间不大同她说话了，即便说话也小心翼翼。那时电影院放电影都是反特影片，组织上非要她去看。每逢政治学习，那主持人翻来覆去讲，被推翻的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千方百计地妄图颠覆这个新生的政权。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了战争，国民党败退后遗留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到处都在蠢蠢欲动，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母亲听了这些话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托儿所没有共产党员，最高领导是青年团支部书记张世模，她认为母亲曾当过中学校长，可能瞧不起她这个刚刚毕业的中学生。出于这种心理，她特别对这个「反革命家属」严加教育，好几次谈话都是以组织的身分份要她「主动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线，主动检举揭发丈夫的反革命罪行，这样才能得到组织上的谅解。」

每一次张世模对于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人一番训斥以后，都会从我母亲露出的恐惧和惶惑中得到一种奇怪的快感。这种快感吸引着她，她便越是用最严厉的口吻教训母亲。

母亲白天脸色异常的苍白，晚上几乎都失眠，常常从恶梦中惊醒，许多次还莫名其妙地昏倒。我看到她常常学习归来，独自对着电灯发愣……

她感到恐怖，也感到困惑：自己犯了什么罪？丈夫又犯了什么罪？仅仅因为丈夫是国民党的校长吗？他任校长时可没有「密告」过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没有被抓去坐牢的呀。

是的，当学生上街游行时，他确实劝说过这些血气方刚的孩子们，那是因为他是一校之长，出了人命他可要负责的呀。他确实把学生的伙食改善得很好，但那也是罪恶么？学生不是反饥饿么？他每天早上起来，拿起扫帚打扫学校的大门口，那也是破坏学潮笼络学生么？如果这些都不对，那么作为一校之长又该怎么当呢？就算那是为国民党做事，但这一切不都已在西南革大向政府交代待过了吗？政府不是说既往不咎吗？

张世模刻薄而带刺的话，不断在她耳边回响，她胆寒了：万一那些首饰，真的被确认为「反革命活动经费」，自己不是也要跟着被抓？

如果真如此，两个没成年的孩子怎么办？七旬老母该怎么活？她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后悔，当初真不该不听丈夫的劝告，强着留在大陆。现在生不如死，她想到了自杀。

#### (四) 余妈妈

余妈妈是我们的紧邻，她的丈夫是托儿所的会计，她本人是一个合川的农村妇女，和母亲年纪差不多。她有五个孩子，最大的比我还小一岁，最小的才一岁多，凭着丈夫菲薄的工资，七口之家比我们还困难。好在她出身贫农，自小就勤劳惯了，一个人除了带孩子包揽了家务，还包下了附近二十多人洗衣服的活。

那时洗衣服特别难，要下到嘉陵江边去。她外出洗衣时，拜托我外婆为她照看三个最小的孩子。因为她特别勤快，也乐意帮助周围的邻人，在孩子们心目中，她就像一个母亲，那层楼的孩子们都管她叫余妈妈。

外婆不便上坡下坎，家里买菜买米便全由余妈妈代劳。我每天中午都看见她背一大背衣服，拎一大篮菜从坡下吃力地走上来。

父亲被捕后，周围的邻人对我家怀着戒备，生性善良的余妈妈便成了外婆和母亲唯一的安慰人。

听见母亲的泣声，余妈妈便会进来安慰她：「你急有什么用？急坏了身子病倒了，外婆咋怎么办？两个孩子怎么咋办？」余妈妈拿过手绢替母亲擦去眼泪。「你看，你们家小平这么个小孩子，挑水、捡二炭，打猪草样样干，成绩还那么好，有这样的孩子你还伤心什么？你生气，气谁？气生病了还不是自己痛苦。再说这几年斗地主、杀恶霸、抓反革命、抓贪污犯，像你这种遭遇的人还少哇？你看对面的王光英。丈夫关起来了，两个儿子比你的还小，还不是很重的负担，可人家还不是照样干活。外婆是善心人，你也是好人，就是你丈夫，什么反革命？我看不出来。我还比你困难，要不是外婆常常照看我的孩子，我能下河去洗衣服挣钱吗？人要讲良心，你有什么难事跟我说。外婆说要去人，我哪一天就陪他去一趟法院，正大光明的，怕什么？」

人也需要点拨，想得狭而钻了牛角尖的人，无人点拨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悲剧，而一经人提醒又往往可以避免。听了余妈妈的一席话，母亲似乎得到了鼓舞，一步一步从想自杀的绝望里解脱出来。

得到父亲每天在张家湾劳动的消息，外婆立即去找余妈妈商量，请她能否抽出一天时间，陪她一同去探望工地上的父亲。余妈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时间就订在本周星期天，那一天余叔在家可以照看孩子，我也是放假，可以一同去。我为外婆准备了一根扎实的木棍作拐杖。外婆准备了一联肥皂，一块毛巾和一卷草纸，装在一个布口袋里。

从家里到张家湾，一大半都是乡间小道。我们那天起了一个大早，我和余妈妈扶着外婆，天亮不久就上路了。

初秋的早上，郊外的空气分外新鲜，但山路却有些泥泞，外婆是小脚走得很慢，许久没有到乡下来了，她不免东张西望。

我格外小心，生怕她跌倒，心里却翻腾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道父亲究竟怎样了，他还健康吗？他的问题有多严重，他能回来么……

一路上余妈妈不断的向路人点头，她的人缘真好。

到达张家湾工地时，大约已是十一点了，远处传来嘈杂的响声；二锤打在钢钎上发出铿锵的撞击声；石头泥沙垮塌声；石匠长声么么的呼号声；杂乱的人声合在一起。

前面没路时，我们才看见山沟中的人影。

「工地」是两个小山丘之间狭长的山沟，山沟里有四五十名身穿带「劳」字背心的人，其中想必也有我的父亲。

我看见草丛中的石缝间还安放着两挺机关枪。我们这一老、一妇、一小，一进入岔口，便引起监视兵士的注意，这里是不准人在这儿逗留的。机智的余妈妈连忙向那兵士主动发问：「唉，同志，请问你到雷音石怎么

走？」那士兵打量我们，确认了是走亲戚的路人

便挥手道：「这里不能走了，绕山梁过去吧！」说着还用手指着东边梁子上，一条被杂草遮盖得很难辨认的小路。

于是我们又扶着外婆装着找路的样子，爬上山梁。

### （五）与父亲的最后一见

在山梁上，下面的人尽收眼底。我紧张地睁大眼搜寻。哨兵没有理会我们，他们正在聊天。我蹲在草丛中，拉着外婆和余妈妈叫她们蹲下，她们立刻会意的弯下了腰。拨开乱草，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看见他了——我的父亲！

他穿着灰色的劳改服，脚上套着脚镣，形容憔悴，步履艰难，头剃得光光的，脸却是黑沉沉的，好像很久都没有剃过胡须。

我心中一阵酸楚，眼泪涌了出来。回头看外婆，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热泪纵横。

父亲埋着头一下一下地挥动着铁镐，此时他肯定不会想到，他日夜思念的亲人，正在山颠的草丛中用泪眼凝视着他。

我们的行踪终于被对面山崖上的哨兵看见了，他们向我们高声吼叫，使劲地挥手，要我们立即离去。

我们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子，在余妈妈的携领下沿原路慢慢退了回去。

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接下来一个星期天，外婆又在余妈妈的携扶下，来到了法院。法院的值班人索要单位的介绍信，余妈妈解释说不知道要开证明才能见到人。人虽没有见到，但在余妈妈好说歹说下，看守收下了外婆给父亲带来的那一联肥皂、一盒草纸和一块毛巾。

当外婆询问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时，那位看守不耐烦地说：「他的案子不能向你们家属说，你回去吧。」

母亲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我们都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她想，只有这样，才能释下沉重的精神枷锁吧。

半年以后，我们接到了父亲从狱中寄来的信，收信人竟是我的名字。信上的第一句话，就是 he 已同意和母亲离婚。他告诉我 he 已判了徒刑，现在正在西康的一个伐木场劳动改造。他说 he 一切都好，身体也很棒，相信我们一定还有相会的一天，只是需要争取了。

他在信的最后写着：「平儿，爸爸对不起你，没能使你成人便要洒撒手了。所幸的是你已经长大，已经懂事。今后一定要好好念书，照顾好外婆和妈妈，生活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我真傻！真的，我怎么就没有看出那洒满纸页的泪痕呢？我怎么就没有查觉到他暗藏着与世永别的绝望呢？我还真以为他会健健康康活在人间，并且终有一天和我们相聚。

我犯了与母亲完全相同的错误，我没有回他的信，轻率地认为，为了我自己今后的生存和前途，我不能公开地表示对他的眷恋之情！

倘如当时我就洞察了毛泽东的一切阳谋，断然地表示了对父亲的亲情，并且写信甚至千里迢迢去西康探望他，也许他会在亲情的抚慰下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也许真的还会相逢。当时我幼稚的幻想，让我付出了终身悔恨的代价！

父亲已离开我半个世纪了，但他的慈父之爱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并且让我自责曾经对他的不敬不孝。

童真无奈的我，幼小的心灵却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求着寄托。当我刚刚迈入其中，便被光怪陆离的科学现象所吸引，生命的、化学的、物理的、电磁的、宇宙的。

当一群人联合起来，打倒另一群人，杀戮、掠夺，产生出可怕的人吃人社会。一部份腐败、穷奢极欲，一部份受凌辱、被杀，这种无休止的人类自杀悲剧何时才能了结？人类为什么不能洗刷这种欺压同胞、欺压同类的污迹，而效仿那些向大自然讨索宇宙玄机的科学家？

我虽不可能像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把毛泽东和共产党当成偶像和再生父母那么崇拜，但也还并不敌视它。既不敢，也不愿。我只是从自身的不幸经历中，产生出对政治敬若鬼神的距离和戒惧罢了。

后来，母亲常以父亲的悲剧告诫我远离政治，甚至不要再像他那样从事教育，他们体会到了教育者的失落和痛苦。我下定决心，不问政治、埋头苦读，立志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或者成为设计师、工程师。

### 第三节：\*\*灾难袭来\*\*

我和马开先逃避大鸣大放，躲在重大后校园那幢我们选择的「世外桃源」里。但是，民主自由的思潮，使马开先耐不住了。我没有能阻止她在接近尾声的鸣放大会上，含着一腔被激发起来的正义，走上鸣放讲台，讲出在三五反运动中的悲剧，并为董时光叫好。

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一张巨大的预设的灾难之网，已经向我们罩来……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已经定好的「右派份子」框框，以庐郁文收到「恐吓匿名信」为突破口，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一场预谋的浩劫，向神州大地劈空袭来。

才开始走向人生旅途的学子们、一群被民主思潮拨动的初生牛犊，陷入了「阳谋」的陷阱。

在重大学生们的心目中，包括那位团支部书记蒲世光，共产党仍是一个威严的「母亲」。他们天真地相信共产党是由「特殊材料」铸成的、是具有伟大人格的优秀分子。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闻者足戒」的「诚挚」许诺，原来是一个陷阱！

这些天真的孩子们没看出，鸣放动员会上「坦诚相待」的外衣里，竟藏着一张「毒草香花六条标准」的罗网。等他们说真话后，便被一网打尽了。

学校的「工人阶级」也被组织起来，由伙食团的炊事员、临时工、门卫们组织起来的一支队伍，从民主湖畔出发，沿着环绕学生宿舍刚修好的马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一路高喊着：「不许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右派老实一点！」等口号。

学校的同学都挤着去观看了，随后，各系还组织了讨论。大家心里还不明白，这「右派」们究竟是谁？尤其没想到游行队伍背后的组织者竟是张科长和曹英们。

想在反击右派的运动中立功的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反击」火药味甚浓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出来。在林毓森张贴那张漫画的位置上，代之以一张巨幅「质问」书。那几幅将张科长画成胖猪，将宋书记画成矮怪物的画已被撕下，并被收藏到校党委的整风办公室里去了。

至于《XX讲教授治校是什么意思？》、《不准XX污蔑党》、《「非团员呼声编辑部」的反革命真相》等大字报更是一个比一个充满杀气。最初被点了名的几位同学，傻呼呼地站在自己贴大字报的地方，感到一场大祸临头了。

有些人刚被推上「右派言行批判大会」的讲台时，就像一群被渔人之网捞起的小鱼，开始还在渔网中蹦跳，声明自己善良的动机，显露出乞求宽恕的可怜相。但哪里再有「辩论」的余地？他们被主持批判的人喝令「不准狡辩！」只有老实交待代，低头认罪才可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凡被批判的人在开过批判大会后，便要接过主持会议者交给的一迭白纸，没完没了地写「我的检查」。

也有很有个性的同学拒不认罪，我看到在机械系组织的斗争会上，二年级的殷世红同学一直昂着头不说话，开过会以后拒绝写检查，但他立刻遭到了隔离、禁闭。在冶金系批斗大会上，蒲世光面对气势汹汹的几个打手，用冷笑来回答，但他也立即被关了起来。

就这样，早春的暖风迅速变成了寒流，刚刚开始活跃的校园空气，变得更加凝重而沉闷。

我侥幸地躲开了这最初的袭击，这要托我严守了不问政治的「忠告」，我既对党天下「麻木不仁」，对「政治设计院」如观海外奇闻，至于《人民日报》上提到李康年的赎买二十年；黄绍竑的批评「以党代政」更是从未研究，就连在松林坡礼堂董时光的报告，我都没去听。

因为我远远躲开了大小鸣放会，所以我也暂时躲脱了「秋后追查」。当各系将一个多月前鸣放大字报的照片作为「毒草」刊登出来，我才惊叫：「好险！」

机械系的年级党小组，在支部宣传委员曹英的组织下异常活跃。曹英到学校来与其是求一技之长，不如说是共产党在学校中的统治骨干，他们班上说他几乎没有一个学科是及格的，他的专长就是「整人」。

此时凭着他多年干「革命」的嗅觉，正是「接受党的考验」，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为他今后平步青云创造良好条件的时候，这种机会岂可放过？

他这些日子特别忙碌，系里的批判会几乎都由他主持，将在大鸣大放中提了意见的老师和同学，一个个推上批斗台。

马开先没有幸免，她被曹英叫去做了特别谈话，她是青年团员，得按六条划定毒草的标准，对照着自己的言行写出检查和认识。曹英威胁她说，所有在董时光鸣放会上跳出来攻击党的人，都将受到严肃的处理。

马开先不愿屈从，突然向机械系主任呈递了退学报告。

她收到了她父母的回信，父母认为她之所以如此，全是受了我的影响。她的哥哥在给她的回信中，明确要她立即断掉同我的恋爱关系。在他们看来，她之所以会如此「反动」，全是受了我的影响。

得知她要退学，我坚决反对。我们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她认为：现在读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她也无心读书。我则认为，不读书，何以在这个社会中求取生存之地？

一天下午，我几乎强拉着她到松林坡我们系主任钱企范的家里。钱教授也劝她回心转意安心求学，可生性倔强的她并没有被说服。当我们从钱教授家里出来以后，我出奇不意地向她表示：「如果你要退学，我们就此决裂。」

一句戏言，不欢而散。唉，我刚撞进了情场，哪里懂得爱情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甜果，一不小心就被摔坏了。

后来，我的不幸遭遇使我明白，马开先的退学选择恰恰是正确而明智的。可惜，悔之晚矣。

放暑假，我独自忧伤地回到北碚，在车站分手时，她说她去城里姑妈家暂住一段时间，在学校没有批准她退学的申请前，当然还得回校。

弟弟迎出来了，接过行李，兴冲冲地喊着外婆。外婆闻声走了出来，照例用她那慈祥的眼睛，仔细端详我，用她那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比寒假回来的时候瘦了。」

母亲依然心事重重，虽然四年前她与父亲正式办了离婚手续，但她没有能力抗住社会的压力和良知的责备。这些年来，她从没给父亲写信，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但内心常常自责，有一种罪恶感，这使她经常做恶梦。

父亲被判刑的通知书和判决书，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开始我们还去法院怯生生询问过，但法院拒绝回答我们，并说他的情况，你们家属无权过问，面对这种无理拒绝，我们就再也不敢问，更从来不敢抗议。

直到二十四年后，我写了数十封信，寻找父亲的下落，才由四川省公安厅发给我一张巴掌大的回函，告之一九五六年五月六日父亲因病死于西康一个伐木劳改营。

## （一）躲不开的阳谋

一九五七年，母亲终于在大鸣大放的「和煦春风」中，突破了沉默多年的心理禁区，小心翼翼的向托儿所所长倪佩兰讲起她对丈夫「反革命案件」的怀疑：不是说革大学习以后，他的所有历史问题都交待代了吗？作为「班主任」的邓小平不是在散学典礼上向他们宣布：「你们终于丢下沉重的历史包袱，从此可以轻装上阵，参加革命的队伍了吗？」不是曾许诺让他充任当时十分稀缺的大学教师么？政府的政策怎么就突然变了呢？

还有，那「反革命活动经费」就纯属子虚乌有了，那家庭的积蓄怎么被当成了「活动经费」呢？

母亲在大鸣大放中的这几句疑问，使她钻入了毛泽东的「阳谋」圈套，让她付出了一生的惨重代价！

我回来后不几天，周生碧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在那里还有张世模，这些年龄上属于我长辈的人，是看着我长大的。她们不得不从心底里承认，在所有托儿所家属的孩子中，我是最勤劳、最刻苦，也是最乖的一个孩子。

入学重大以后，她们改变了过去的眼光，表面上非常客气，相见时显出一种尊重来。但我在她们面前始终保持一种「战战兢兢」的谦恭。

「我们找你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也让你来参加对你母亲的帮助。」张世模说。「你妈妈在鸣放期间给你写过信吗？」

周生碧抽出钢笔，开始在小本子上记起来。我点了点头，并没有领会她们的意图。「这些信谈到你的父亲了么？」张世模接着问，用狡黠的眼光盯着我。我迟疑了一下，又点了点头，但不明白问这干嘛。

「你妈一共给你写过多少信？」

她们想调查什么？

我想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那不都是一些来往的信件么，心中一愣。

母亲确实把她对父亲被捕的种种疑虑，以及她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写信告诉了我，但那又怎么构成犯法了呢？我如实回答：「大概有二、三封吧。」

张世模带着显然是装出来的「宽慰」和「鼓励」对我说：「小伙子，你已是大学生了，前途远大，好好读书，对你母亲要帮助她一下，旧社会的人常钻牛角尖，脑筋转不过弯来。」

她们的盘问使我莫名其妙，十九岁对于我真是太懵懂了，我绝没想到一场横祸已经悄然逼近。

回到家，外婆笑眯眯了眼睛，在她看来，一家四口人，两个外孙，尤其是我，是她生命的寄托和延伸，她是可以为她俩付出一切的。

## （二）我的外婆

自幼父母亲很忙，很少管过我，我的生活起居全是外婆呵护。晚上，我都是睡在她的脚下。

一九五七年的那个暑假，她叫我坐在她的身边，唠叨着那些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故事，讲我是怎么难产降生在南京鼓楼医院中，讲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讲我因为医院护理不当几乎窒息死亡，讲如何从炮火连天的南京逃难出来，从遍地尸首和弃儿堆中，抱着我拼拚命挤进逃难的人群……

她苍白的头发蓬乱地散盖在满布皱纹的脸庞上。我发现她真的已经很老了，背也越来越驼。

说到她的驼背，她便会述说当年的艰辛：「抗战时，我们一家人从南京逃到重庆，经济窘迫，在上清寺租了一间阁楼。那阁楼又矮又黑，平时人在里面是直不起腰的，只是价钱便宜，每月只付五个铜板。白天，你爸妈整天在外奔波，家务活和你全扔给了我。你小时候托妈的福，她奶水特别好，你长得又白又胖，但是你白天非要人抱，于是我就只好成天弯着腰一边背着你，一边洗衣做饭。半年下来，我的背就开始驼了」。

她讲述这些脸上全是幸福。

每当我注视她佝偻、苍老的身躯，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惜。她青年守寡，中年跟随女儿颠沛流离，操劳终日，从来没有过过气派的悠闲日子。我握着她那长满老茧的手，轻声而自信地对她说：「外婆，你为了我们兄弟俩劳碌了一辈子，从没享过福，等我大学毕业，我一定把你接在我身边，给你专门找一间舒适的房间，好好地过几年快快乐乐的晚年生活。」

她笑了，眼里含着泪花。

二十多天的暑假，我的心情始终是阴郁的，面对着犯愁的母亲，心中老是压着一块石头。我不时想到马开先，想起她对生活的绝望。若不是这场「大鸣大放」，我们本打算在这个暑假同车回北碚。她的姨爹和姨妈在西南农学院任教，她可以住在她姨爹家，趁着一个多月的假期，一同去缙云山和北温泉，痛痛快快地玩。

可现在一切都被打破了，假期她竟忙着办理退学手续，今后我们的关系也不知会发展成怎样。

因为心境不佳，我提前了五天返校。弟弟帮助我收拾东西，外婆不停地唠叨冬天的衣物要带好。她好像有一种恐惧的预感，一再地提醒我，在学校不要乱说话，不要同人吵架。她拄着拐杖，一直拉着我的手，颤抖着把我送到那竹篱笆做的小门外。

当我跨上马路，她突然把我叫到她身边，一再地抚摸我的头，我情不自禁将身俯下，把我的脸贴在她那苍白的前额上，吻了吻。我感觉到她热呼呼的泪水顺着脸颊向我的脖子里流。

到了拐弯的地方，我又回过头去，她的身影还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木门边。这一幕像永远不能褪去的底片，储存在我的大脑中，跟了我一辈子。

我对她许下的诺言，也许正是她盼望了一辈子的梦想。但是，它终于成了泡影。而这一别，也成了我和她饮恨一生的永诀！

### （三）马开先

回到学校，刚刚跨进寝室，正碰上留校「工作」的郭英华，她诧异地看着我，问道：「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马开先呢？」我吃了一惊，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回答她：「我怎么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你们吵架了吗？放学那天你们不是一起离校的吗？怎么她那天晚上独自回来了？还酗酒大闹了一场，学校正在追查这件事。」

我说：「我们确是一起出校的，但到了车站，她说要上姑妈家去，便分手了，后来，我就再不知道她在哪儿。」

郭英华便把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向我一一叙说。

那天晚上大约九点钟，马开先提着一瓶白酒和一包糖果独自一人回到了她的寝室并关上门窗。不一会，屋里传出走了谱的歌声，沙哑而不清，但听得出是「丽达之歌」，接着是一阵狂笑，狂笑后又是一阵哭声，后来传出了玻璃摔碎的声音。

有人从门的一条细缝向里看，只见她满脸通红，手舞足蹈在那里「跳舞」。一瓶白酒只剩下了半瓶，酒杯摔碎在地下。

门外的人拼拚命敲门，但无济于事。不一会，里面突然静下来，郭英华赶紧到男生寝室找来陈思和刘大奎。踹开门，只见马开先正大口大口呕吐，屋子里充斥着酒味和发酸的臭气。

听到这里，我知道悲剧终于开始了。我连忙到她的寝室去，在她的课桌前呆坐。

她酗酒和狂舞是因为我吗？女孩子真有这样脆弱吗？她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上哪儿去找她呢？这时，我的心里再也无法平静，我想得很复杂，她是出走还是自杀？

我决定要先找到她的姑妈。想到这里，我便打开她抽屉，寻找她收到的信件。信件提供了重庆城里的两个地址，一个是黄花园某巷十号；一个是在枇杷山公园。



我匆匆走出校门，坐上了开往牛角沱的公共汽车。到了牛角沱，便下车步行。我按信封上的地址，边走边问路，整整在城里找了四个小时，下午四点钟，我终于在枇杷山公园下街的某巷中找到了她姑妈。房主人打开了嵌在围墙中间的小门，里屋竟传出了马开先的声音。

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从楼上迎了下来，看到我，她十分惊喜，接着带着歉意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一块空悬的石头终于从我的心里落地，我装出神秘而顽皮的样子说：「我有特异功能，随便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你找出来。」

我在车上准备好的那些道歉话全部吞了回去，两个人的误解也立刻冰释。

「你吃饭了吗？」她问道。此时我才感到饥肠辘辘。从早上北碚出发到现在，整整九个小时的奔波，疲劳和饥饿竟在这一连串怪诞的过程中忘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阿先主灶，饭菜很香，我们吃得很开心，我也得了教训，暂时对阿先退学的事缄口不提，也没有问她那晚何以酗酒狂唱？她的姑妈对人挺热忱，看不出她是不是同她的哥、妈一样，反对我和阿先的初恋？

晚饭以后，我和阿先漫步在临江的公路上，凭着石栏望去，嘉陵江蜿蜒如带，两岸分布在岩壁上的建筑点点灯光，映着月色，立体的构成一幅很有诗意的图画。

重重愁绪又重新涌上我的心头，母亲的忧郁重新爬上我的心扉，我看着面前的这个阿先，江风拂动着她的白色连衣裙，显得动人而潇洒。

我希望第二天她能同我一起归校，但是她拒绝了。看来，我昨日的辛苦并没有动摇她退学的决心。

学校并没有如期上课，自习占去了大部分的时间。国庆节刚过，团结广场召开了由千余名大学生组成的下乡支农的誓师动员大会。第二天大学生们便开赴井口参加挖水堰的「劳动锻炼」。

下乡支农的劳动大军一走，秋天的校园空荡荡的，几场连续的秋雨之后，更显得寂寞苍凉，一种积郁在我心中很久的不祥之兆，越来越近地向我围拢。

终于有一天，陈思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教室，语气严峻地对我说：「你必须认真反省在大鸣大放中的思想言行，包括与母亲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也包括与马开先的言行。」他还说：「你要看清形势，争取主动，党的政策摆得很明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凡是在鸣放中有过错误言行的都要彻底弄清楚，予以批判帮助，决不能存在侥幸心理蒙混过关。」

紧接着他用严肃的口气警告我：「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这次井口劳动没有叫你去，就是给你充分的时间反省和交待自己的问题，早交待比拖延好，不交待就等于顽抗，性质是可以变化的，希望你争取用人民内部的方法解决你的问题。」说完他给了我一迭稿纸，那纸就是一年多前在反胡风运动中曾用过的，用来让有问题的学生写交待的那一种。

我接过稿纸心里一阵紧张，现在，我终于不得不改变我原先的态度——置身运动之外而自乐了。

不久，我收到了弟弟给我的来信，告诉我是母亲叫它写的，他说母亲已在组织的监督下。周生碧警告她说，这一段时间不准向重庆大学写信。

我立即找到了那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小册子，翻到香花毒草区别的六条标准——对照。我个人在鸣放中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下发过言，更谈不上右派言行。

我不知母亲是不是犯六条中的哪几条。是分裂了人民、破坏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破坏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削弱了民主集中制、摆脱和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还是损害了社会主义国际团结？

我想，即使母亲在鸣放中对父亲提出了几个政策上的疑问，也够不上这六个破坏和削弱的大罪呀。

至于马开先，她在鸣放时说了什么？党天下？教授治校？对照六大标准似乎只有涉嫌摆脱和削弱共产党领导那条了。

在我看来，纯洁无邪的马开先怎么也不可能同「老谋深算」、「阴险毒辣」的资产阶级右派扯在一起。这么一想，我紧张的心态开始松弛下来。但是，母亲忧伤的面容又浮现在我眼前。陈思的警告又使我的神经绷紧了。

从开学以来就一直没有见到阿先，我是直到在下乡劳动队伍中，才看到她的背影。看来，她是在故意躲避我了。她为什么一直躲避我？阿先啊，你可知道，我现在也陷入了麻烦。我是多么想你，多么需要你给我安慰和鼓励。

#### （四）荒唐的辩解

我忽然想到了该写信了。

第一封是：「开先，你知道我母亲的痛苦吗？父亲被捕以后，她一人负担着四口老小已不容易，加上反革命家属的精神压力，她终于选择了同父亲离婚。她年轻时就已经在教育事业上显示才能，她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这一次大鸣大放，本想向组织说清多年积疑，消除认为她包庇自己丈夫的怀疑，这样提出来，没有别意。」

我这封称谓马开先的信，是寄给母亲单位上看的，张世模不是在寻找我和我母亲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通讯吗？让张世模看到这封我给女友的信，更能为母亲辩诬。

第二封是这样写的：「妈妈，你好吗？外婆和弟弟也好吗？整个暑假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当我返回学校时得知马开先因误解了我，伤心过度，竟然酗酒伤身……我真地感到对不起她，她是真爱着我的，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到现在还转不过弯来，开学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她，心中非常挂念，我不希望她辍学，那前途全毁了，后果不堪设想，一个女孩子单独流到社会上闯荡该有多么危险。妈妈，我求你，劝劝她吧，也许她能听你的话，让她去掉那个荒唐决定吧……」

这封称谓妈妈的信，却是寄给马开先的。

两封信，当然要张冠李戴颠倒了寄，称谓开先的信，信封上写了母亲的地址寄给了北碚托儿所，而称谓妈妈的信笺却装进了寄往井口的信封。

这两封信里面包含了多少无奈。倘若当年我就看清了毛泽东心狠手辣的阳谋，我也不会那么可笑地「表演」。

信寄出以后，我心情放松了许多。

日子也真难熬，才两个月的日子就像过了几年，发出的去的信一封也没有收到回信，于是我又担心这些信是否寄到了收信人的手中。到了十二月初，我又提笔写了内容与手法与前面完全相同的两封信。

这次，寄往北碚的信终于有了回音。

#### （五）同弟弟的最后团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弟弟突然出现在我寝室的门口，他的到来，给我孤单悲伤的心吹来了一阵暖风，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忧虑。他手里拎着一个黄色的布包，怯生生地站在门口。见到他，我慌忙站起来，紧握着他的手，那手是冰凉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一大早。」

屋里还坐着其它人，不便多说什么。

他打开黄布口袋，说：「这是外婆关照带来的，天冷了，外婆叫你注意不要生病了。」口袋里装着一双旧毛线打织的毛袜、一双新布鞋，还有一张用手帕包好的二十块钱。见到那毛袜，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她戴着昏花的老

光眼镜一针一针织出来的。

中午时分，我便同他去学生食堂吃了便饭，然后牵着他的手，从后校门慢慢走到小龙坎医院，当时我的痔疮结痂还没有合好，那儿还留着我的病床。

小小的病房没有其它人，是我们兄弟俩谈心的好地方，弟弟坐在床前细说我走以后发生的情况。

「自从你走以后，托儿所一连开了许多天批判会，妈妈和陈玉如两个成了批判对象。妈妈的主要问题就是替父亲翻案，会上会下追她交代，特别追问同你的联系，说什么串通大儿子订攻守同盟。上星期起正式给妈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规定她今后外出和投信都必须事先告知组织」。

弟弟说得很慢，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喉，边说还边痛苦地思索。

他才十三岁，从他呆滞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嫩弱心灵上的阴影和莫名伤害。

妈妈会被划为右派，从假期中周生碧的态度和语气中我早就听出来了，本是预料中的事，所以也不太惊诧。

弟弟接着说：「昨天下午，外婆把那黄口袋交给我，还给我五块钱作车费，叫我马上到你这里来一趟。她说：家里情况不好，要你不要回家，也不要再写信回来，她说你的信被周生碧拿到会上当作死不认错的证据。外婆还关照你就在学校过年，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同人多说什么。」

弟弟讲完，我们两人都沉默不语，心中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脑子里一片空白。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忽然想到，过不了几天就是新年了，今年过年肯定不能回家，便建议说：「今晚我们俩上馆子，算是提前团个年，晚上就同我在病房过一夜，明早我送你上车回北碚。」

弟弟眼里闪了一下，点点头说：「好，今晚我们过年」。

我们兄弟俩手牵手，朝土弯方向走去。我们进了一家饭馆，选了一个窗口临江的座位。既是过年，自然要「奢侈」一点，我破天荒地点了五个菜，是弟弟平素最爱吃的砂锅鱼头、蒜泥白肉、白斩鸡、烧白，还要了一小杯酒。因为舍不得剩下，便慢慢地吃，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把五盘菜全部吃光。

吃完晚饭，我们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踩着石板铺成的人行道向沙坪坝逛去。我俩投在路面上的影子渐渐拉长又渐渐缩短，远方隐隐传来如诉如泣的「拉茨之歌」。在一家卖副食品商店的门市部，我买了一小袋花生米、一袋水果糖，一小袋桃酥，仍装在弟弟带来的黄口袋中，嘱弟弟明天带给外婆和妈妈，关照他们，我在这儿一切都好，请他们不要牵挂……。

十点钟左右，我们回到病房。那晚，我们兄弟俩和铺而眠。他已经很累，不一会便入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望着他童稚的脸，万般愁绪涌上心头。打开临江的窗户，嘉陵江的江风令人清醒、令人断肠……

我没有料到这是苍天安排我们兄弟俩最后的一次相聚，第二日车站的离别竟成了我们俩的生死永诀。

#### 第四节：\*\*被揪斗的日子——扭曲人性\*\*

在井口参加劳动锻炼的大军，一直到年底前最后几天才回到学校。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同班的同学，相别了两个多月，竟没有一个人问起我的病情。他们见了我像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再没有以往的玩笑和亲切的交谈。尤其是没有见到马开先，我更感到疑惑。

我偷偷向刘玉华询问，她很神秘地反问：「你还不知道？你慢慢就知道了。」同寝室同学的冷漠态度，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迫。

一九五八年元旦后五天，陈思和郭英华把我叫到一间教室里，拿出我年前交给他们的那份「检讨书」。陈思十分严厉地训斥我：「你这叫什么坦白交待？给你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你白白放过了给你的机会，你那个材料除了替自己辩解就是隐瞒，照你所写的，还有什么右派言行？」郭英华也一脸怒气地说：「既然你的态度如此顽固，那么从明天开始就向全班同学交待吧。」

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悸，从中学一起上学的小伙伴，怎么突然变了脸？变得狰狞可怕，想到前年清理胡风集团的漏网反革命份子时，一位高年级同学，被隔离反省，没几天便被公安抓入监狱。想到这里我十分害怕。

第一天的批判会叫我坐着辩论，全班同学显然背着我开过「准备会」。我注意到马开先没有到场。青年团组织委员刘大奎是这次批判会揭发我的主要发言人，他是我中学六年的同班同学。

我们曾在一起偷过学校香蕉林种植的西红柿，曾经趁黑夜把学校过河的小船偷走，划到对岸去「夜游」，寒假时在一起打过野狗，在寝室里偷偷煮了「改善伙食」，我们还捉弄过班上一位年龄比我们大五岁的女同学，捕风捉影硬说她与班主任老师「偷情」，弄得来全校当成新闻传播。

总之，一切孩子干的调皮事我们都一起干过。后来由于我父亲被捕，我变得老成起来，这种调皮事才收了手。中学毕业，我们同时考进了重庆大学同一个班，而且同住在一间寝室，颇有「手足之情」。所不同的是他积极靠拢组织，当了团干部，而我因家庭出身问题，被长期关在青年团的门外。

鉴于这种关系，批斗会开始时我并没有产生恐惧感。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手足之情」也要翻脸不认人，硬说我父亲被捕时，我曾哭过，还说过：「共产党乱抓人」。另外，他还揭发说我背地里经常赞扬大右派董世光。

我试图否认这些揭发，当场争论起来。陈思说，我的检查是在事实面前抵赖，并且暗示说我更为严重、更为关键的问题已经被组织掌握。他再次警告我必须端正态度，休想蒙混过关。

批判会，特别好朋友刘大奎的冷酷，让我心中寒透。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斗争会的滋味。难怪我看到斗争自己父亲时，有儿子登台揭发，当场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的。

怎么在政治压力下，人性被扭曲得这样快，这样可怕？

第二天的批判会责令我站在会场的中间，气氛比前一天严肃多了。但我察觉到有一半同学眼里流露出对我的同情，他们并不发言，只是在喊口号时为虚张声势举举手。

上纲上线本是共产党一贯的党风，这一点我已在历次运动中初步领教过了。平时一贯小心翼翼回避政治的我，从来没有去想共产党的好坏，也从来不发表意见，真没想到因为几封同母亲的家信，就被搅进了这次政治运动中。

这么一想，我马上产生了抗拒心理。开始我还承认这些信属于认识问题，但是刚刚说了几句，就遭到了刘大奎和陈思的驳斥，他们硬要把我们母子通信往替反革命份子翻案上套，说我的言行是公然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行为。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反感，我横下心，绝不向批斗会屈服。我一口咬定我在大鸣大放中没有说过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话，并且说刘大奎的检举纯属无中生有。

我的拒不认错态度激怒了包围我的同学们，会场气氛开始敌对。陈思说在全校的斗争会上，还没有看到一个被批判斗争的人有我这么蛮横。会场上响起了口号声。

三天的批斗会下来，我被机械系反右领导小组认定是全系右派分子中态度最恶劣的一个，于是决定对我采用特殊的斗争方法。

### （一）曹英主持反右「批臭」会

从第四天开始，年级的反右领导小组长曹英亲自指挥了对我的批斗会。反右以来，他的反右领导小组，在全系组织了几十场斗争会，这人有一种使被斗争的人在他的面前垂头丧气而获得快感的心理癖。

为了满足这种快感，他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全年二十几名同学都败在他手中，一个个低头认罪，乖乖地戴上右派帽子。

四班的一位女生被他斗得几乎跳嘉陵江自杀，事隔二十五年以后才知道那位女生因拒绝过他的求爱才遭此下场。他得意洋洋夸下海口说，没有在他面前不低头的右派分子，所以他深得校党委的青睐。

那天，曹英将批斗会场专门进行了布置。会场上贴着标语，所有的课桌集中到教室的最后面，反右领导小组的三人成员坐在教室的讲台上，曹英坐在中间。会场笼罩着一种紧张空气。曹英的「三角眼」里，射出凶光。

斗争会开始，他一声断喝：「把右派分子孔令平抓出来！」

我的心一震，被推到会场中间。会场上响起了口号声，我头脑里空荡荡的，耳朵里分辨不出谁究竟在说什么。斗争会开了一整天，我也整整站了一天，两腿发硬，两眼发黑，心里难受极了。

散会后曹英宣布，晚上不准我回寝室，要在他们指定的房间里继续反省，并写出检查交待。这天晚上，三名党员轮流值班，守着我写了一个通宵检查。

天快亮时，我实在支持不下去，想打个盹。头刚刚伏在桌边，就被值班人在我背上打了一拳。

第二天，我又被带回批斗会现场听大家的辱骂和口号。因为一夜未眠和精神上的压力，我的身体已经渐渐不能支持，耳朵里发出嗡嗡的声音。

曹英拿出我早晨交给他的检查材料，当着我的面撕成碎片，一边吼道：「这叫什么检查，重写！」他还骂道：「你这反革命家庭出身的黑崽子，生下来就反动，不过你放明白一点，你在鸣放中写给你母亲的信，她都做了交待代，你怎么赖得掉？现在你越是替自己狡辩，你脖子上的绞索就套得越紧。」

第二天早上，我几乎交了一张白卷。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曹英拉长脸，冷笑道：「你以为你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就可以掩盖你的右派本质么？现在根据大家的揭发，你已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分子，老实告诉你，你的那个反革命老子注定了你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毛主席怎么说的，你那反革命家庭和社会地位，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是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你们千方百计想恢复你们失去的天堂。你的出生就注定你对共产党和人民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你在大鸣大放中越是一言不发，越是表明你的阶级仇恨深！」

照此逻辑，我便明白，对我进行专政是天经地义的了。既然罪恶在我生下时就印烙在我身上，我这辈子就在劫难逃了。

既然如此，还要开什么斗争批判会，还要我向同学交待代什么呢？

又过了一天，曹英突然说：「今天你向全班同学交代你和马开先的关系。」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这么多天来，我还从来没有见到她，她并没有参加我的斗争会。据说她在另一间教室里受到追查，我们被曹英有意地分割斗争。

「你看，这是马开先的交待。」曹英手里捏着一迭纸，狡滑而得意的向我宣示。「你必须老实交待代鸣放期间你和马开先发生的奸情。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处份你，开除你的学籍，现在这些丑事，她已经交待代清楚了，现在就看你的了。」

我此时终于如梦初醒，我与阿先隔绝，原来是工作组的预谋。为完成上级交给的抓百分之十的右派份子名额的任务，反右工作组这几个月来真是煞费苦心！

男女私情是中国封建残余的禁区，现代中国虽不像古代那样，男女授受不亲，但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始终被认为是道德败坏。大学同学中，谁沾染上这种嫌疑，必会招致周围人的谴责，不但父母不容，就是同学之间也会受到冷眼和攻击。

因忍受不了这种攻击，涉嫌通奸的女同学在校园里投湖自尽的事时有发生。我同开先虽有这种生理上的冲动，但始终不敢偷吃禁果。

今天，阿先怎么会这样胡涂，难道她也痛苦到了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抓屎糊脸」的程度了么？

为什么这种严肃的政治批判会搅进这么一出莫名其妙的绯闻？我来不及细细的推敲了，只是下意识地曹英吼道：「把那材料拿给我看。」我盯着他手里的那迭纸，他奸笑一声，把那迭纸收了回去。

「把她叫来同我对质！」我冲冲他吼道，然而，这完全是徒劳的。

正是借用了这一手，会场兴奋起来，批判会立刻出现了高潮，先前一直缄默，并用恻隐眼光看我的几位同学，此时露出来的是鄙视和惊诧。

会场上一片骂声、吼声：「伪君子！」、「下流！」、「装什么假正经！」

那天晚上，我依然躺在那间关闭我的小房里，面前还是那张桌子，桌上还是放着一迭纸，曹英正坐在我的对面。

「何必装疯卖傻，自讨苦吃！」他以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挖苦语气说。「在强大的工农民众面前，哪一个资产阶级右派不向人民缴械投降？别说你一个学生，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全国都有影响的大人物，还要写不完的检查，你算什么？你必须下决心彻底认罪，彻底交待代，今晚必须写出深刻的检查……」

我不知道如何写完了我最后的一次「检查」。我至今已完全不记得上面写了些什么，那几乎是在曹英一问和我的一答中写下的。

「抓屎糊脸吧！」只能如此了。我写完只觉得六魂出窍，恶心想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伏在那桌上呼呼大睡，梦中突然又被一阵震耳的口号声惊醒。

曹英已经走了，屋里静悄悄的，就我一人，我向玻窗望去，黄黄的灯下面，照着一个蓬头垢面的鬼！我心似刀割般难受，脑子里又开始膨胀起来，耳朵里还响着那可怕的回音：「反革命的儿子必是反革命。」

我想，自己是不是神经失常了？我想起那些疯子们在垃圾堆里寻觅腐烂食物，找到后大把往嘴里塞的情景。我一阵心惊肉跳，立即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和脸，待证明我还能判定这些最重要的身体部位时，我才舒了一口气。

从此以后，我便想唱歌，或大声地发些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呐喊。晚上老想出去「散步」，在后校园的环校马路上，觉得凉爽的江风真够刺激，可以使我忘记那些我无法再忍受的苦恼和悲哀。我听得清楚身后跟踪我的脚步声，我便唱歌，虽然我自己都不知道唱了些什么。

我想，我已临近疯狂了，我得躲开这可怕的后果。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中不知有多少与我相似遭遇的人被逼疯、自杀、我算尝试到了那悲剧的滋味。就在这精神快错乱的时候，我忽然从当时盛行的师生写血书向党交心中受到启发，我也写了一封交给党委宋殿宾的「血书」。

斗争会上口口声声说我是国民党的子遗，因而刻骨仇恨共产党，既如此，为了解开这根套在我身上的绳子，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请求中共派我到「对敌斗争」第一线，接受中共的考验。我想，有了这封「血书」在中共手里，国民党孝子贤孙的罪名就不会再纠缠我了。

不料，这恰恰成了套我一生的绞索，这是后话。

只记得陈思、刘大奎、郭英华像看守犯人一般紧紧地跟着我，连上厕所都要守候在厕所门外。但是，他们再没有阻止我大哭大笑和唱歌了。也许他们怕真地把我逼成无法救治的疯子，或寻找自杀，「死了」可不好交代。也许还出自童稚之交的那份良心发现和同情可怜吧！

我以「全校的右派极品」受到了「保留学籍，劳动考查」的最高处分，这是全校顶级右派分子中的第一类。除了按「敌我矛盾」被抓的蒲世光、被劳教的林毓森之外，我便成了性质最严重的「右派分子」。

全校一共七十六名这样的极品，其中还包括四位年事已五十岁左右的老教师，处分既已确定，七十六人集中交总务处统一管理。

我终于从被人四面包围和监视的第二学生宿舍里搬了出来，搬进早先我同阿光一起复习功课，那幢旧教学楼旁边的楼房中，开始了我们正式接受监督劳动的改造生活。

临近春节了。那年的春节怎么过的，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陈思、刘大奎、郭英华像看守犯人一般紧紧地跟着我，连上厕所都要守候在厕所门外。但是，他们再没有阻止我大哭大笑和唱歌了。也许他们怕真把我逼成无法救治的疯子，或寻找自杀。

## （二）校园里的牛

老图书馆崖下，那片长满杂草的老足球场被划为重庆大学农场的耕作基地，这里便是我们这七十六名极品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基地。

五八年二月，春寒料峭，我们七十六个人便靠锄挖、肩挑，将球场周边高低不平的地方填平成一湾足有五亩大的「水田」。「水田」灌满水后，用人力拉着犁耙将它刮平。

拉耙的五、六个大学生一字排开，踩着刺骨的冰水，在水田中歪歪倒倒挣扎着前进。我们满身被溅起的污泥弄成了泥人，摔倒在田里的就更惨了，那是寒冷的早春，冷得瑟瑟发抖，这种「壮观」还常常吸引路过的昔日同窗。

他们三五成群站在高处，指点着这些挣扎在水田中的「牛群」，有时还能听见他们的窃窃笑声。

当年抗日图存时学生走在街头，面对喷来的高压水柱的那种前赴后继、相互扶助的传统美德，不是还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读过的么？今天，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残忍对待起自己的同学？他们的怜悯之心，当真被毛泽东接连不断的整人运动弄得荡然无存了么？

然而，反省起来，我的神经不是也完全麻木了么？我并没有因遭受冤屈，受到这般非人的虐待和羞辱而奋起反抗，当时胸中冷冰冰的，连一点反抗的火星都没有。经过斗争会那剧烈的刺激以后，神经处于麻木状态了。

在我蓬头垢面形同乞丐的躯壳内，只有恨在猛烈生长。遭到无端的残酷折磨和侮辱而不知道恨的人，恐怕不是白痴就是疯子！

到了晚上，脚上总是奇痒难忍，水田里灌进了从教学大楼的蓄粪池里抽出的屎尿，痒大致是勾虫作祟，加上被石块瓦砾划破的伤痕，真是又痛又痒。

这倒分散了精神上的苦恼，使我不再想其它事，每当仰望窗外的夜色想哭泣长叹时，却拼拚命去搔那双又痛又痒的脚板。

有一次，外语教研室的郑老师拉耙时，摔倒在水田里，我和旁边的两个拉耙手却喘着气，既没有马上把他扶起来，又不曾安慰他，看着他一个人蹒跚从水田里爬起来，全身发抖。

在他生病时，我未给他端过一杯开水。后来，每忆这事，都觉得惭愧，面对他，我的人性和这些可爱的同学们毁灭了么？我当时不是只想到个人的不幸，还在千方百计的向共产党辩诬自己的「罪恶」么？

不过，我并没有丧失记忆，正当我们挣扎在水田里向全校同学们，上着活生生的「监督劳动」的「现身课」时，全校的同学正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开展了「红、专」大辩论。

松林坡的大礼堂前的松树树杆上，牵着一排排的钢丝，上面挂着一幅幅用白纸写成的「向党」交心书，这是些令人看后就恶心的杰作，其中许多篇还稳稳带着斑斑血迹。

那抬头的称谓就很令人肉麻，千篇一律以「亲爱的妈妈」开了头，下文抓了些「学而优则仕」或「光宗耀祖」的帽子胡乱戴上，以痛骂自己的「糊涂」。

作者的这些「杰作」是出于真心还是慑于某种「淫威」？若出自真心，我想，前提就是虚构的。以我自比，自幼读书从没有「学而优则仕」的东西，光宗耀祖和剥削他人，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扪心想来，若不是不断的运动步步逼迫，社会的歧视和压迫，我怎能由怕变成恨？

但直到当时，我肯定没有对共产党的刻骨仇视，也更没有预谋的猖狂进攻，我只是可怜和渺小的牺牲品，是一个用来使周围人产生害怕而不敢反抗的牺牲品而已！

至于要讨论这些“交心书”问世的原因，我想当时看到我的同学们如此受人践踏，也未必不会像他们一样写出这样水平的「文章」来！

无奈啊！也罢，且看看另一张怎么写：

那标题是醒目得多了，《拔XX白旗，与XX商榷》：

「近来据我观察，你的思想包袱背得不轻，平日生活无精打采，学习不发言，斗争右派不表态。好像完全置身运动之外，你在想什么自己最清楚，单提你在这次大鸣大放中的错误言论就已不少。你说我们现在没有自由，我们不禁要问你所要的是什么自由？自由自来就是有阶级性的。

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自由；今天有我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自由，就容不了你的资产阶级自由。我们今天只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衡量，你当然会说没了自由。

由此可见，你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来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了。你又说：『我们现在是非都是由党来划，不是按大家认定的标准来划。』你又错了。

难道你所谓『大家的标准』还有与党的标准完全对立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那个『大家的标准』不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么？你又说：『大鸣大放把我弄得糊里糊涂，但确无反党的意思，我只觉得应当尊重事实。』

姑且我们也承认你并无恶意，但是你那个『尊重事实』该首先承认党的领导是无比正确的事实；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无比强大的事实；一切与这个事实相违背的不是错误的就是反动的。

你之所以现在生活消极，犯了那么多错误还认识不到根本的原因，是你长期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你灵魂深处还牢牢树立着一杆资产阶级，只专不红的白旗。但是你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进攻的可悲下场！前车之覆不可不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好厉害的逻辑，彷彿世界上除了共产党的主张才绝对正确，再无其它意见的容身之地！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有「领袖」的绝对权威和个人迷信。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极权就从这里生下了根。

至于那些「运动」，就好比在街上无故地抓了些行人，硬给他们加了一大堆罪名便拉去砍头，砍头时还要他承认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一样。

直到今后证明，一人独裁，一党统治，变成了少数人追逐自己的「权」、「利」给国家带来的不是繁荣幸福、而是灾难绝途时，人民才起来反抗它、推倒它，这要中华民族付出多惨痛的代价？

经历几十年残害的我，意外的苟活至今，回忆起五十年代之大学校园的同学大家庭，其成员中许多人格的卑怯，懦弱和盲从。理性地思考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专制主义暴力的扭曲，一党专制肆无忌惮践踏了人的尊严！！

它的领导就是典型的党独裁的代表，灌输着共产党至高无上的信条，学校一经变成了狂热个人盲目崇拜的发源地。中华民族就面临着自相残杀和毁灭。

然而，生活又以无情的事实鞭挞着校园。当市场上的供应一天一天匮乏，尤其是那个为控制农民而施行的农业集体化，施行以后，全体人民都已尝到它的苦果，所谓的「天灾」正用饥饿惩罚着每个中国人。

每到吃饭时，当每个学生都排着队在领取饭菜的窗口处，领到一个三两重的馒头和一勺白菜时，学生们当然不会忘记十年前，他们的大哥大姐曾在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下，吃饱喝足后，还要走上街头，举起小旗同游行队伍随流着高喊「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

那股世红仅仅说了稀饭清的像「浪打浪」，便被抓了出来斗争，最后关进了劳动教养所。现在，回想到那一时冲动而贴出的「交心书」，该不该有些矛盾和尴尬呢？也罢，共产党本来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何必对他如此「认真」？



问题是，他们真得到了忍饥挨饿时，就不敢说半个「不」字了！

当人们醒悟到这些，起来反对时，国家已挣扎在灾难绝途上了。这要中华民族付出多惨痛的代价？

### （三）饥饿的大学生

五月一日，伙食团传来一个特大喜讯：为纪念国际劳动节，放假一天，五一全天三顿饭可以敞开肚皮吃。这一喜讯确实使我们这七十六名苦役犯振奋不已。

四月三十日下午五点钟我们提前收工，平时最感到吃不饱的江远被派去厨房帮厨，深夜十二点江远回来，兴高采烈地宣布：「伙食团拿出了比平时多五倍的面粉，张科长说，这次让大家敞开肚皮吃。大家老喊吃不饱！其实只差了点油荤，我平时还没有你们吃得多，这次让大家敞开肚皮吃，看你们吃得到多少？」

可中国人就是天生的穷命：食一直是打牙祭时才能见得到的。劳动的农民从来是拿粮食打主食，这些年来这统购一搞，农民连猪也不喂了，猪肉没了，加上我们也成了体力劳动者，原先那点定量当然就不够，这些道理，谁都明白。即使五一节这一天可以美美的撑一肚子，又能管过几个小时？

难道中国真因为人口骤增，土地收入微薄，收到的粮食已不能满足六亿老百姓果腹了么？那形容得似天堂般的共产主义岂不成了海市蜃楼？

我们为明天的「精彩」生活而兴奋不已，江远报告说，明天早上是稀饭、豆干和油炸花生米，中午六菜一汤，馒头随便吃，只是准吃不准包。有人大声喊道：「打二两白干庆祝一下，今朝有酒今朝醉！」

唯独我独自躺在床上想家。弟弟走后，一直没有信来，不知道他们的近况如何了，他们可知道我现在也身陷右派泥潭，失去了自由，今后恐怕难以回家了。最让我牵挂的是外婆，最好不要让她知道我的不幸。

唉，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你不是自称是受苦受难者的救星么？怎么就连我家的四个老人孩子都不能宽恕呢？

第二天早上的稀饭已不比往常，干得能插稳筷子。那豆腐干和花生米大概已经半年没有上过饭桌了。黄豆和花生米是一类统购统销物资，普通商店里买不到，若问为什么买不到，答道：「去向苏联老大哥换机器了。」

中午时分，每一个桌上摆着六碗菜和一盆排骨豆芽汤，主食是白花花的馒头，一桌一笼。那一顿，我吃了五个馒头，刘武吃了九个。

馒头毕竟不是早上的稀饭，加上肉食，下午胃便感到难受，肚子发胀的滋味并不比饥饿好受。我找了个僻静处在那里对肚子进行人工按摩。按摩的人渐渐多起来，按摩许久，仍不能消解，晚饭时就再也不想吃了。

张科长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嘲讽地说：「怎么样？我说呢，这国家的粮食定量是经过计算的，成天喊不够吃，我看是思想作用。不好好劳动改造，却盯着这粮食定量做文章，就凭这一点就该好好改造。」

晚上八点钟，忽然男生宿舍传来了救护车的鸣号声。有人传出消息：冶金系一名学生得了胃穿孔，正被救护车送往医院。阿弥陀佛，我们这七十六名「同改」还算平安无事。

不过躲了今日祸，未测来年灾，年纪轻轻我们已陷在这种绝境中，还不知命中有多少灾难等着我们呢！

批斗示众，杀鸡给猴看过后，我们这七十六个人自忖这堂堂学府、几亩水田，又岂能久留我等被批倒批臭的五类极品，作脱胎换骨的天地？

能想出了一个「大鸣大放」，使出了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划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声名狼藉的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封住刚刚想开口说「不」的口，已属亘古首创、闻所未闻的中外专制独创。

毛泽东很明白，一个不小的知识分子群体划到了「专政」位置上，暂时是不能用「杀」以儆效尤的，对这个已产生出来的群体处置，确实很费了毛公的一番「苦心」。

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他「博大与宽宏」的政治胸怀，提出了一个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已经成为「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群。

这种瞒天过海，既欺瞒了他的党内信徒，也堵住了世界诸公的指责。

以后的历史证明，消化掉这么一个完全出自独裁阴谋的无辜知识分子群体，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比焚书坑儒更大的悲剧。我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消化、改造全过程的幸存者。

五月二十日，全校师生员工在校园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上午十点钟左右，彩旗、标语和横幅，从四面八方风雨操场汇集。主席台上，悬挂的横幅红布写着「重庆大学首批下放干部欢送大会」。主席台两侧是标语式的对联，左边是：自觉响应党的号召，干部下到农村去。右边是：接受农民再教育，决心改造世界观。

校长金锡如在主席台上讲了话，接着呼「下放干部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批因「家庭出身」不良的员工，和社会问题复杂的「干部」共二十余人，站到了主席台前，他们在一片口号声中，戴上了校方特制的「大红花」，游行队伍簇拥着他们登上一辆披红戴绿的公共汽车。接着，彩车开路，游行队伍锣鼓齐鸣，跟着缓缓驶进的彩车沿环校公路绕行一周，以示告别。

这批下放干部，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我们这七十六名「极右」分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工作组，不过这二十几人中除了几位共产党员是专职的特工人员外，其余都各自有问题，他们从此也永别了学校，再也没能回去。

我们七十六人一早就接到命令，叫打好各自的背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分。我们没有资格参加「欢送」大会，我们心中明白，我们才是这次「欢送」的主体。大家默守在黄色楼房前面，默默无语，各自都有难言的悲哀和惶恐。

午饭后，驶来五辆「吉尔」卡车，将我们连人带行李装满每一个车厢。下午一点钟左右，在大彩车的引路之下，我们离开了重庆大学，向着南桐矿区进发。当重大的一草一木，一舍一楼，一一从车旁驰过时，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我毕竟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年了。

我忽然想到了阿先，一直就再没见到她，她真的永远消失了？她终于固执地主动地离开了学校，这总比我现在被押送离校要好得多。不过，一个女孩子在那个时候戴着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今后的路还不知怎么坎坷，她现在上哪儿去了？她的命运又该如何呢？也许缘分就到此结束，我们真的就这样失散了，多么不祥的恋爱啊！

#### (四) 余余协和

当我们从学校押上炼狱之路刚刚两个月，一九五八年七月，余妈妈的大儿子余协和来到了我住的宿舍中。

一进门他见我昔日睡的铺上堆着乱谷草，却不见了我的行李、什物，忙向周围邻铺的人询问，他们都只是简单的摇了摇头，并不答话，问到上铺的那一位，他面露惶恐的回答说「这铺从来没睡过人。」

余协和反复看那满铺堆着的乱草，心里拥起了一阵阵的疑惑，毕竟当时他才十六岁，虽耳闻大学校园里的种种传说，并不太懂这「反右」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是疑虑我这个比他才大三岁的邻居，一个未出茅庐的大学生，怎么会身陷其中？

一九五五年我考入重庆大学时，我家紧邻的余妈妈家中就有了七口人，兄妹五人的吃穿上学，仅靠父亲菲薄的工资，幸好余妈妈没日没夜为人帮佣、洗衣，拼拚死拼拚活赚钱养家。

年仅十岁的余协和也同我一样背着背篋遍山遍野地拾柴火、捡二炭，十四岁初中毕业，本打算辍学在街上找零工，但是慈祥而善良的余妈妈说什么也不让才十四岁的长子失去读书的机会。（直到十几年后才知道，为了筹孩子上中学的学费，在劳累之余还每个月到医院卖血一次……）

一九五五年初中毕业的余协和，以优异的成绩在全市的升学考试中被市一中和市三中同时录取，为了能减少学费，他听从了我的建议，选择了凭成绩减免学费的重庆第一中学，一中是当时重庆的重点学校，又紧邻重庆大学，从此他每遇到学习上弄不清楚的难题都会到我的宿舍，找我这个儿时一同背背篋的伙伴，也兼有一种照应的意思。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儿时同他在一起揩着背兜，满山遍野为生存而挣扎的伙伴，就这么离开了学校，消失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了！

那时的校园已是特务密布，处处陷阱的恐怖场所。

## 第二章：\*\*监督劳动的最初岁月\*\*

从沙坪坝到南桐，进入目的地南桐矿区丛林煤矿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车队一直开抵丛林小学的操场坝里才停下来。借着教室走廊射出来的微弱灯光，我们从车上御下了各自的行李，搬进了一排已没有学生上课的空教室里，打开行李，吃了随带的干馒头，在升旗台左侧水池边洗漱后，已是深夜了。

顾不得那教室三合土地上的潮湿，便打开了被子就地而眠。

第二天天刚亮便被下放干部的领队催促着醒来，全体人员升旗台前集合，由下放干部的组长王怀寿点了名，并按照预先编好的名册，将所有的人分成五个大组，每一个组都配备了四至五名的下放干部，并指定了组长。

我们这个组共十八名右派，四名下放干部，鲁召是我们的主要管理者。四名下放干部中有一位女干部，这次下放唯独她一直很沉默，好像心事重重的。

分组完毕，王怀寿讲了话，他说：「从今天开始，根据党的政策和学校安排，我们每一个右派将分散的到指定的农家，接受农民的监督劳动，这是一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应当认清前途，在这个改造环境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讲话完毕，各队分列出发，我们这个组在鲁召的带领下，穿山越岭，绕着山路走了十余里地，中午时分才到达名叫「界牌」的地方。

南桐是四川著名的煤窝子，矿区大小数十个矿井散落在山丘起伏的山陵中，同农家田舍交织相倚。这里的农村、农田阡陌交错，小溪潺潺，被一个接一个的山包分割成一些小小的村落。

时值初夏麦黄季节，山坡上一块一块麦地里，泛出一种泥土和霉气混杂的气息来。

才下过几天雨，今天正是晴天，却难看到下地干活的农民。麦子好像被草交缠着显得荒凉。但那绿树成荫的小道，倒挺秀美，走在其间并不觉得热，只因为背负行李，手提沉甸甸的帆布书包，走不上三里地大汗直冒出来。

在一处山梁上小息五分钟，迎来田埂上吹来的风，敞开自己的衣服，特感凉爽，似乎驱散了几个月郁积在校园内的烦闷，大家开始说话，指点那嵌在绿荫丛中的点点农家：「小屋平头虚落里，炊烟起处是人家。」

可惜，我们现在落魄的心里总是凄凄惶惶，不知道，哪里才是落脚栖身的住处？

### 第一节：\*\*南桐矿区丛林\*\*

界牌原是一个镇，自从合作化以后，这儿便是一个联社中心。以一座很大古庙为核心，依附它的近百户农家围成一个祠堂，名叫曹家祠堂，这儿就是我们今后集中学习的地方。

古庙里原本彩色的观音，也已剥落凋零，留下了千疮百孔的泥身，香炉也被推倒，半埋在垮塌的泥墙之下。不过，地上还算打扫得干净，堂中摆着十余张方桌，这里似乎是食堂的样子。

当我们这支装束古怪的队伍，背着背包，提着各自的帆布书包，脚穿草鞋跨进殿堂时，引来一大群孩子围观。他们用好奇、陌生、稚气的眼光观察着这一支古怪的队伍；既不像勘探煤矿的地质工作队，又不像来这儿搞合作化运动的工作组。我们自己都感到很猥琐。

两名头上缠着环形盘状白布头帕的人，从里屋走了出来。看样子好像是这儿的干部，那年长的大约四十多岁，鲁召向他迎去，递过重大介绍信，谦让着向里屋走去。那年轻的一面招呼我们，一面吆喝着围观的孩子们。

我们放下各自的行李，各寻座位，拿出毛巾擦着身上的汗，古庙殿堂上的挂钟已经指着十二点了。

不一会，两名食堂的炊事员，端着一个甑子和两大碗菜出来，摆在两张桌上，那便是我们离开学校在农村里的第一餐饭。那甑子里黄澄澄的玉米饭，不见一粒大米，吃下去满口钻，大碗里是蒸的牛皮菜酢，每桌一盘小碟子里是红辣椒粉和盐巴水。

对饥肠辘辘的我们和下放干部感到喷香可口，这是三个月大学校园里的定量伙食和劳动磨练的成果，那一顿我们吃得很饱，很满足。

而那些一直围观我们的孩子们并没有散去，从他们瘦削而蜡黄的脸上那一双双睁得大大的童稚眼睛里，流射出一种毫不掩饰的饥饿和羡慕来。

吃过午饭，下午三点钟，白头帕中年人引来十几名背着步枪的年轻小伙子，我们猜这大概是镇政府武装部的民兵。我们便由那中年人指派：每一个人由一个年轻民兵带路，押送到各自将落户接受农民「监督劳动」的农家。

押送我的是一个年龄稍大于我的小伙子。从他那傲慢的态度便知道，在我们初识的关系中，他是以高人一等的「管理」身份分待我的。

一种敌意已反映到脸上。我背上背包，拎着书包，走在前面，出了祠堂大门，他便保持着同我大约五公尺的距离押着我。我们出了那祠堂大院，在弯弯曲曲的田坎上迂回前行，每到一个岔路口，就会听见他从背后传来的生硬喝令声：「向左」或「向右」。

间或我回过头去想问他朝哪一条田坎上走？便见他警惕地用手握住枪栓，用极不友好的态度喝道：「干什么？」好在，校内三个月的锻炼，已让我明确了身份，习惯于低人一等，对别人莫名其妙的无礼训斥，从不吭声反对或稍现出自尊心受辱的愠怒来。

过了许多水田田坎，进到林荫覆盖的山路。对那田埂两旁田地里种的什么庄稼和景色全没留意，心里充满了孤单和害怕，好像是一只被猎人牵着走的受了伤的小山羊。

看看天色渐晚，背包渐渐的沉重起来，汗水早已湿透了背心，眼里死死地盯着远方，同身后的这个人已是无话可说了，心里却像乱麻缠着，想着，我将去的究竟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地方呢？

## 第二节：\*\*赵家湾\*\*

### （一）赵凡父子

当我们翻过一个山岚的垭口，眼前夹在两座山丘之间的盆地是一弯弯水田，山丘的坡土里荒草丛生，远远看得见，靠左边的山腰间，一座被竹林覆盖泥墙围住的院落，我们沿通向院落的石板小道走去。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那小院落里，三排瓦房围着一片大约五百平方公尺的三合土院坝。进入院子大门，正堂屋阶檐坎上，一位抽着旱烟烟的老人，斜躺在一张很旧的竹凉椅上。那旱烟烟杆足有一米多长，乌黑的像是铜的。

他头上缠着大白布盘，斜襟布衫和齐着膝盖的裤子，那装束和模样活像《乌龙山剿匪记》里的老土匪。他见我们进来，也斜着眼睛朝我们仔细打量，一面把含在嘴里的长烟烟杆拿下来靠在墙上，慢慢地从凉椅上站起身来，沙哑着喊道：「张二娃，咋个这个时候才到？」

「唔，赵大爷，下午三点才从界牌起身，这小子又走得斯文，磨蹭到这个时候，反正现在任务完成了，人交给你，跟队长说一声，天色不早，我还要赶回去。」那张二娃向赵大爷交待代完毕便背着枪，转身走出围墙的大门。

我在院坝的中央放下了背包，两边厢房门口的阶檐坎上，早已站着两家人家的大人小孩。此时的我活像一只被许多人围观的猴子，还来不及看清这即将进入我「改造」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便在十几双陌生好奇目光的逼视下低下了头，呆呆地站在那里，搓弄着我那帆布书包的背带。那时的心情很像做了错事，被老师罚站的学生。

那赵大爷提着长烟烟杆，点燃了刚刚装好的一袋烟烟，一边扎巴着，从正中那排堂屋的阶檐坎上走了下来，上下打量着我，用沙哑的声音问道：「你姓孔对吗？」我惶恐地抬眼望着他，点了点头。

「我的儿子没有回来，你跟我进屋去吧。」他的语气温和多了，我想，此时我一定很让人可怜，便一手拧着背包，一手提着书包跟着他跨上堂屋的石阶，跨进那朱红漆已剥落殆尽的大门。

天色已很暗，借着那盏斜挂在堂屋正中的电灯光，看清这家共三间屋子，正中间的堂屋正中满被灰尘的神龛上，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已由一张毛泽东的彩画所代替，神龛下方放着一个老式的雕花大黑漆方桌，右边是一个巨大的老式大粮柜。

左面墙上开的小门里面，是两张木床和一个旧式的衣柜，木床上罩着的帐子在昏暗中显得又黑又黄，也许许久未洗过了。

每一间房子很大，显得异常的空。堂屋右面墙上那道小门后面，便是一眼土灶，那里面堆了许多麦秆、稻草之类的燃料，旁边堆着一小堆煤炭。

我走进「卧室」的那一间，老大爷点燃了一个松明子走进来，我才看清，天花板顶部有一层厚厚木板铺成的「阁楼」。

一个可以移动的木楼梯，斜靠在一个足有两平方公尺大小的长方形「天窗」口。赵老汉指着那「天窗」说：「楼上是空着的，今后你就住在上面。」

仗着他手上松明子的光，我爬上了「阁楼」，这里倒也宽敞，里面没有点灯，一缕月光从两排亮瓦中射了进来，隐约只见屋角落里堆放着杂物，两只老鼠突然从那杂物里窜出来，沿着瓦缝钻了进去。

地板上到处是泥块灰尘和已经干枯了的树叶，估计那一定是从瓦阁缝里飘进来的，四面的蚊虫发出的嗡嗡声，就像一队飞临空袭的轰炸机。

赵老汉从天窗口里给我递来了一把扫帚，我便开始借着月光和从天窗口射进来的松明子火光，将地板清扫出十平方公尺的位置，打扫干净后，便借助老汉的帮助，将自己的行李就地打开，正好房主人赵队长推门进来。

这是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比我年长两岁，他满不在乎的看了我一眼，便端了一条长板凳，坐在门前的屋檐坎上抽起旱烟烟来。

大约半小时后，赵老汉从厨房里端出了一盆菜粥，一碟子辣椒盐水，菜粥由玉米面搅成，里面放着许多菜叶和萝卜头，吃起来有一股苦味。

赵队长并没打听我的家境和学业，而是简单向我交代了今后的「政策」：每天必须跟大家一起劳动，力所能及，但不能偷懒；不准乱说乱动，有事要到哪里去，必须向他本人或他爹说一声。

吃完饭，夜已很深，我在院落门外的小溪边洗净了一身的泥汗。赵老汉引燃了卧室里堆着的一堆艾草，滚滚浓烟

呛得人无法在屋里呆下去，好一会儿，浓烟散尽，空气里充满了苦艾的烟烟味，那「轰炸机群」也被这滚滚浓烟烟驱散。

我爬上了阁楼，躺在铺开的被子上。夜晚已退热，凉风刮过瓦缝，吹在我的身上还真有一点凉意，便拉着一张被单盖上。透过亮瓦漏进来的那束月光，已斜移到堆放杂物的角落里。虽然白天行路一天，累得精疲力竭，但脑子里还在闪现白天种种的突变。

此时，我的家门，那竹篱笆边上老外婆抚摸我头的那最后一别，又重新浮到了我的眼前，还有弟弟与我临别在小龙坎那最后的晚餐……母亲的眼泪和父亲山头上的相见，阿先含恨的目光，统统都复印出来。

两行泪水悄悄地滚落到我的枕头上。正是：「夜深风竹敲竹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木兰花·欧阳修）。

下乡直接管理我的「教育者」，就是这赵氏父子，赵老汉解放前一直佃地主的田种，做地主的丘二，为地主抬过滑竿，也跟着去重庆跑过码头，那市井经历，市俗见识是这里从未出过山沟的男人无法比的，这赵家湾上上下下二百来号人家都得让他三分。

他一共三个儿子，老大「光荣」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他被尊为烈属，老二又在修筑川藏公路时，因工伤亡故，这都是他的光荣家史。

现在跟着他的就只剩下这个最小的儿子赵凡，年纪才二十二岁，也是合作社赵家生产大队队长兼基干民兵队长，虽然还没有婚配，但据赵老汉说他眼光太高，这弯里的几个姑娘他全都看不起，想到外地去物色一个有文化的。

赵老汉的老伴五〇年就已去世，所以这一排足有一百多平方公尺的住宅里，暂时还只有他父子二人，家里的摆设是当年分田分土时，从地主家得到的「胜利果实」。

如此看来，这父子俩是这赵家湾五六十户人家的「父母官」，将我安排在他们二人的管制之下是理所当然的。

好在我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很快适应了日常的农活，不论下地挖土，挑粪上山，都勉强可以充个数。加上，当时正在从农业合作过渡到人民公社去，农村中的统购统销和定量政策，农民已经怨气连天，对社员是否下地干活，干多干少，并没有人认真过问，只凭生产队工分员做出的工分记载，以供分配粮食的依据。所以无形中，对我的压力就减小了。

时间一久，同这些质朴的农民打交道，还会听到他们的真话，不像学校中满口阶级观念的同学那么复杂，大可不必小心翼翼地不敢说话，防备着祸从口出，防备着有人记下我的「牢骚」话，拿到我的斗争会上施压。所以渐渐的，心里上释了重负，感到轻松起来。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从楼板上轻手轻脚的起来，走出赵家院子大门。这院子之外的环境真很幽雅，茂密的竹林，在围墙四周，环抱着整个小院，院子的大门石梯坎下，横着那通向界牌的石板路，与石板路平行的是一条 flowing 清澈溪水的堰沟，跨过堰沟就是横贯两边山坡的田坎通道。

围墙门口石梯坎两旁两颗绿荫遮天的大枣树，更添了这小院的秀色。四周很静，静得令我总觉得这正常的农家，缺了一些什么？侧耳细听，果然没有鸡叫、犬吠。

问到这赵大爷，他翻着白眼，没好气的说：「喂啥子牲口，社里的干部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通通宰掉，再说，分那点口粮，连人都没得吃的，那还有去喂鸡鸭？」赵家父子俩所住的屋后靠着灶房，还有一个用竹条和木棍围成的猪圈，里面圈着一头尖嘴驼背，骨瘦如柴的架子猪。

赵老汉说，自从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粮食统购了，所以没粮食喂猪了，所有的猪，便由生产队统一圈养，每头猪每天只配给一两玉米，而喂猪的人家自己的口粮都还差老远，那猪便只能吃「草」了，所以一个个都瘦成那样，一过冬天死了一大半，能熬到今天已不容易。

房子的背后，是一片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分自留地。自留地是赵老汉的主要劳动基地。里面种的菜以牛皮菜为主，还有南瓜和地瓜，南瓜的瓜藤牵出了界围老远，那上面的花蕾已开始凋落，园里的瓜果与大田庄稼截然不同，所种的瓜菜长势十分茂盛。

## （二）农民怎么解决饥饿

对我们当前最大的威胁仍是食不果腹。按照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界牌乡镇村舍的收成，合作社分配给全劳动力每天的口粮，仅只有八两黄谷，折合大米不到六两。

赵氏父子自不例外，而我的口粮按城市户口拨发每月大米二十八斤，尚且不够，更何况劳动惯了的赵氏父子？既成一家，三个人当然是一锅吃饭，这严重的短缺部份，当时只好到屋后那自留地里去找，我明白，统购统销的最大受难者，便是这些生产粮食的农民。

五月底，正是桃李成熟的季节。这丘陵地带，听老汉说，满山遍野都是李子树。这个季节李子树已硕果满枝。

口粮短缺的饥饿农民，见着这些果实，谁都会打它的主意，但是合作社制定规定，这些果木树统统是社里的集体财产，谁如果去那树上摘下或打落果子，谁都会因此而受到扣除口粮的处分。

好在近年被强迫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渐渐明白，就是合作社把李子全部收下来拿到市场上去卖，社员们也分不到几个李子钱，倒不如不去收，也不去管，凭它熟透而掉在地下，拣来吃还可以充饥。

成熟的李子既没有人过问了，许多社员中午下班也从来不回家的，反正锅里无米可炊，对着冷灶发呆，不如就在坡上满坡的寻觅那些掉在山沟里、土缝中的烂果子充饥。

有一天，东面背湾里一位叫曾二爷的社员，下午三点钟左右，就在玉米地里喊肚子痛，中途回家休息，回家后见他痛得大汗直冒，在地上打滚，连忙请来邻院村社卫生员。他拿着药箱去他家时，只见他脸色惨白，口吐白沫，曾二娘慌了手脚，请几个年轻人帮忙抬到界牌去，又没有找到担架，还不到午夜时分曾二爷就断了气。

第二天背湾那院子里围满了人，曾二娘哭得死去活来。邻人说这一个月来，曾二爷中午就从没回家烧过火，靠拣山坡上的烂李子过一顿，这一次一定是吃上被毒蛇爬过的烂李子了。

我去看时，那曾二爷全身浮肿，两眼睁开，好像有什么不甘心的冤情。曾二爷死后，那山沟里的从树上掉落下来的烂李子，仍然是社员们充饥拣食的东西，只不过，拣的时候多加了一分小心，充其量把它们包好，拿到堰沟里清洗一下。

### （三）大量饿死人从此开始

水肿病终于开始蔓延起来。赵家的自留地已经跟不上三个人的需要，最高产的牛皮菜已经砍得差不多了，新种上的白菜还只有毬子那么大。

赵大爷已把谷子、连壳都磨成「谷面」并且将四季豆的叶子，南瓜叶、地瓜藤上的叶子勒下来，搅拌在「谷粉」中，以充主粮，开始还蒸成了酢，后来干脆煮成了粥。在我们三个人中，赵老汉最先得了水肿病。

据我亲身经历，这全国性水肿病当从一九五八年夏天开始，一直蔓延延续到毛泽东寿终正寝。得病的原因很简单，饥饿性营养不良，而医治的办法也很简单，吃饱啊！中国大陆上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漫长「饿饭」期。

曾二爷死的第二天晚上，我从蚊鸣中惊醒，饥肠辘辘不能入睡，突然听见，灶房里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劈劈啪啪响声，接着，飘进来一股显然是什么米粑烤出的香味，便悄悄地从天窗里探头往下面看，赵家父子的床上没有人，我便爬下楼梯，蹑手蹑脚的走进堂屋，把头探向灶房，借着那灶膛前平时熏蚊子的火堆发出微弱的火光，看见赵氏父子俩正在火堆里向外掏什么东西，再定睛一看，分明是用铁丝串在一起，正香味四溢的嫩玉米。

自留地里并没有这种国家一类「统购物资」，这火堆里埋的，分明是山坡大田里偷来的无疑。

不一会又见父子俩从铁丝上将些烧得香喷喷的东西抹到地上，堆成一堆。再从那里拣起一个拍净裹在上面的灰，便狼吞虎咽的大嚼起来。

看清了这么一回事，我倒抽了一口凉气，连忙把脚退缩回到了里屋，悄悄地爬回了楼上，心里却跳个不停。

三天以前，下水湾院子里一个放牛娃，借在玉米地里割牛草的机会，偷了十几个玉米埋在草背兜里，被民兵张二娃抓了个「现行」。便连人带背兜押送到这里交给赵队，赵队长便将他五花大绑捆在门口那棵大枣树下示众。

那张二娃才十五岁，怎经得起这等刑罚，早已哭嘶了喉咙，等到晚上把他放下来时，已晕死过去。

晚上界牌合作联社的书记专为此事跑到赵家湾来，赵队长就在那堂屋里向他的顶头上司叨叨诉苦，说社员野得很，山坡上的庄稼守不住，现在天天都有人偷，请书记解决。

当即召开了全体赵家湾的社员大会，就在这小院里，赵队长当着百来号乡亲们正颜厉色的宣布：「这山坡上没有成熟的庄稼，谁去碰，被民兵抓住，挨捆，吃枪托自己受，就是打伤打死也自认晦气吧。」当时，他一脸杀

气，百来号社员没人吭声。

记得十一岁时曾在龙凤桥一带看到过农村斗地主，叫跪煤炭渣，被跪者双膝血肉模糊，看后心中十分害怕。有一个地主婆就因不堪此虐待被逼上吊，但终没有探究其中的是非。

「苦大仇深」的农民未必没有过头之气？后来在重大鸣大放时，就有为这种野蛮的行为被人指责过，说农村中的干部横行霸道私设公堂，结果提意见的人被扣「右派」的帽子。

今天，我竟亲眼目睹了这赵队长对一个年纪不过十五岁的放牛娃，施行如此酷刑，便感到心中非常害怕。这偏僻的小山村，农民们固然纯厚，但也相当的粗犷和「匪气」，小小一个赵队长便是一弯之主，他下的令就是法令，谁都必须执行。

为了偷社上几个玉米，那十五岁的孩子可以整得他个半死。这可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从没提到过的。

想到「战国策」中秦晋乞余的故事，与晋国为敌的秦君尚能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国家代有，补乏荐饥，道也，不可以废道于天下。」为饥晋余粮。何故自家一村的弟兄，竟会如此残忍？

而我自认了身份，岂敢说半个不字？而现在面对赵队长刚才的一幕，我好不心惊。自保为上策，我只有回避，躲进小阁了。

第二天是挑粪上山淋玉米，我刚刚将第一挑粪淋完，天时突变，大风卷着一堆浓云向这边压来，没出五分钟，阴风起处，风雷大作，上山淋粪的社员，匆忙收拾各自的「家伙」往山下跑。我却一不小心踩在石骨子上面，从半坡摔了下来，一只粪桶的「耳朵」也摔断了，左脚被石骨子擦伤了一大片，强忍疼痛，拎着桶，冒着已狂泻的大雨，一瘸一拐的回到赵家，甚是狼狈。

这一次赵老汉很是宽容，不但没有追究那被跌破了耳朵的桶，叫我擦干湿漉漉的一身，洗净伤口的污泥，从神龛上取下一个纸包，那是他平时上山采集的草药，磨成粉自制的专疗跌打的药，倒了少许白酒在碗中兑上，浅浅敷在我的脚上伤口处。我只感到火辣辣的痛，老汉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往那长烟烟竿斗中装上晒干了的茄子叶、巴打巴打的坐在那里抽起烟烟来。从嘴角滑出的一缕缕带着草香味的烟烟子里，不时用眼斜瞄着我。

说也真灵，老汉的水肿渐渐的好起来，我的脚伤也一天天恢复，三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十分微妙的变化，只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看来我的装聋作哑是明智的选择。

自从那一晚上的事发生以后，晚上我便十分的警醒。过了大约五天的晚上，大家入睡后一个多小时，大门被推开，发出微弱的响声，把我从迷糊中惊醒，轻轻的把头从天花洞口向下探望，又是五天前那一晚上听到的劈啪声，接着又是那一股玉米烤香的味道扑鼻而来，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大门又重新轻轻的打开，这下借着微弱的月光，我辨认了那熟悉的身影，不是张二娃吗？此时他的怀里揣得胀鼓鼓的，掩上门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

自从我发现他们父子俩的半夜秘密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天一天在变化。同赵老汉几次谈心便把我的家，划右之前前后后，向他交了底。他的眼里充满了惊讶，「组织」上交给他必须严加管理的人。原来如此单纯。

#### （四）大跃进时期的农村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是毛泽东的爱好，他要成为中国百姓的太阳，岂能不时时发光？赵凡把界牌联社下发给他的所有文件都抱出来了，他说他因为只有初小文化水平，所以虽然联社要求他向社员们全文宣读，但他从来没有读过。现在他决定委托我宣读上级下达的文件。对于这种照本宣科的事，我答应了。

成熟的玉米，刚刚从山上抢收完毕，便碰上连日秋霖，稻田里已熟透的稻子，倒伏在水田里，发黑发霉，无人收割。遍山的地瓜烂在地里发霉，生芽，也不敢私自抢收到家里。谁要是把这些烂在地里的粮食收藏进屋，那么那十五岁的放牛娃就是「先例」。

大伙的目光都盯着的同村的人，虽然那目光极为饥饿和渴望，但对同村人的违规举动会马上喊起来，「看，谁在土里挖地瓜了？」并且报到赵凡这里来。他们最多饥肠辘辘的望着这些烂掉的粮食，以「水肿病」为理由不



出工。静静地忍受农业合作制的淫政之威。

然而大概受了曾二爷亡灵的启示，下湾的几家人，竟趁着深秋的两个雨夜，突击抢挖，把两块大约一亩地最好的地瓜，挖了个精光，还连夜把挖出来的地瓜用炉膛的草灰裹过，下到了两个大窖里。等到过了几天天色放晴，张二娃来向赵队报告时，那埋在土窖里的地瓜，已被饥饿的农民吃掉了一半。

想瞒是瞒不住了，赵队长除了如实上报外，带领三个民兵收缴了地窖里所剩余的全部地瓜。接连还开了三天批判会。这一次，下湾的人第一次齐心，大家闷坐着，一个也不发言。赵凡出于无奈以每人每天扣除口粮二两，时间一个月，向上作了的交代待。

连续二十天的阴雨，我睡的楼板上到处都泛出白色的霉灰。我在楼阁上私藏了许多玉米，那是在收获季节时从院坝里取回留下的。此外，还有那枣树上打下的枣子。因为食物丰富起来，老鼠却常常在我睡觉时，在我脚前窜来窜去，而我一个人特感孤单。

想到复学，我便从书包里取出课本笔记本来，伏在地板上，借着天花瓦片的光，细细地复习起功课来。我还天真地担心到劳动结束以后回到学校功课荒废了怎么赶？

一直到将临中秋的时候，老天才开始收敛起它的哭脸。天刚放晴，赵队长便将赵弯的百余劳动力驱上了土地。首先，当然是抢收已经烂在田里的水稻。工间休息，大家都会把稻穗捏在手心里用力搓，再将搓下的谷粒一把把往嘴里送。乡里人的吃谷吐壳的本事真强，一把黄谷入口，用不了一分钟，就会把那谷壳往水田里吐出，然后嚼那吐了壳的「米」，这倒是「充饥」的好办法，比偷地瓜、玉米、拣烂李子吃，无论从营养和卫生的角度都好。我也跟着大家学，只是那刚从穗上剥落下来带着刺的谷壳，老是「缠着」舌头。

第二天赵凡到界牌去开了整整一天的会，晚上回来得很晚，他带来了界牌人民公社将于下周开成立大会的消息，并且还带回了一大捆「志愿申请加入人民公社」的表格。

共产党一贯的规矩，「务虚」以后就要「务实」了，一个接着一个的群众运动内容虽然不同，但方式都一样。

次日晚上的学习会上，赵队长亲自主持社员大会，嘴里生硬的翻着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总路线这些怪拗口的名词，不时用眼睛打量我，似乎希望我能对他完全讲错了的话多加「包含」。

但从他那别扭而一本正经的态度上，想象得出，这是「上级」十分重视而又极其重要的事情，不能当成平时学习可以交给我。虽然人们对诸如：什么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那里？为什么必须「坚持」社员自愿加入公社的原则？可否不加入公社，甚至于单干等等，一头雾水，这位队长讲得连自己都一片茫然。大多数「社员」仍以鼾声响应。

他却并不顾及这些，只知道「上级下达的任务他只能完成」这一条。当场就把志愿申请加入XX公社的表格，发给到会的每一家。对于没到会的两家人也由他们相邻的人带回去。并且告诫大家，必须在三天之内填好，交上来。

任务一下达。我的事便多了起来，赵家湾五十户人家的上百张表格，几乎全由我一人填写。那三天，从早到晚，我就「脱产」出来成为填表的突击手。虽然我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符合志愿」这个原则。好在上级在这一点上绝不会查实，也不会去检查这些表格真实性的。

### 第三节：\*\*一夜进入『人民公社』\*\*

界牌公社成立那一天，下午我们很早就收工。赵队长集合起参加庆典的代表，天刚黑，就到达了界牌祠堂。入夜，界牌祠堂的宽大院子里灯火通明，靠殿堂那台阶搭起了临时的主席台，正中横幅上写着：「界牌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两旁垂挂着标语，我挤在人群的后面，向主席台望，今天鲁召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正四处寻找我们同来的伙计。

一个戴草帽的人宣布了公社的成立，听出声音，正是我们第一天来界牌时，头缠白布盘的中年人。他向到会的人宣布：这次自愿报名参加加入界牌人民公社的农户，占界牌地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全场报以稀稀拉拉的掌声。接着，便由另一个戴军帽的人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界牌人民公社组织章程》，说这是一个集农、林、牧、副、渔为一体的，政社合一的农村组织，是一个人类社会创世纪的社会制度。

到会的人都不明白，将自己交给了一种什么组织，从此，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会怎样。「人民公社万岁！」、「总路线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和锣鼓鞭炮声，表示界牌地区高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一万多个农民就这样在一晚上，跨入到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天堂」。

散会以后已是十一点钟，虽皎月当空，但在通向赵家湾的山沟道上，连串着星星点点的松明子火光使山道通明，第二天又是中秋的前一夜，赵凡在他的大院里向两百号赵家湾的人民公社社员宣布：为集中力量抢收抢种，完成当前最迫切的「三秋」任务，从现在开始地瓜不算粮食。全村的所有劳动力已正式编为界牌地区赵家湾突击连。

为了庆祝中秋佳节和赵家湾进入共产主义。赵老汉还端出了一瓶不知已存放多久的江津老白干，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围拢来，用土碗盛酒，划起老拳，将赵家院衬托得特别热闹。

不过，事情并不如赵氏父子规划得那么顺利，上了岁数的老头子并不愿为了吃几块地瓜跑很远的路，特别是下水湾的几个老头，他们一辈子都守着自己的穷窝老灶，论资格和成份，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也不会向这赵老头低头。当张二娃领着民兵要来收锅砸灶那天下午，就遇到了李大爷和曾大爷的狙截。

这千年祖宗留下来的灶神牌位岂能毁掉？这不等于给子孙后代断炊么？老头们可是看着这些娃们长大的，仗着祖宗的威仪，按过去的规矩，他们完全可以操起扁担，把张二娃们痛痛快快的打一顿，并从院子里轰出去。

但是老爷子们自知时代变了，平时虽然早就对这帮子「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干部看不惯了，也只好忍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叹息自己管教不严。不过，今天要拆老爷子们的灶就没那么可忍了。

两家的儿孙们站出来同张二娃们对峙，灶没有被拆掉，锅就那么一口，碗就那么几个，爷们的「衣钵」只好给留下。当然要动员这两位耄耋之龄的人，白天去赵家院照看各家的孩子，就更没门了。

这可是赵凡所不曾料到的。两个老人要求自炊，并不抵触社员自愿加入公社并在公共食堂用膳的原则，强求显然说不过去，但已纳入到食堂里的两份口粮要退回去，就难了，若给这两个老人开了缺口，就难以对其他人维持下去。

于是两个想延续灶王菩萨烟火的老人，面临着无粮可炊的绝境，中秋刚过的第二天，两个老人相伴地来找赵老汉评理来了。

赵老汉虽然板着面孔，仍说不过两人的祖宗之训，晚上便召开了赵家两爷子外加媳妇的工作会。三个人一商议，灶还是留下了，但伙不允私开。商量的结果找两家的后生们交待政策，两家儿女在政策的威胁之下，只好说服两位老人，灶虽不拆，但「伙」是不准开了，老人走不动就由儿女送，留着的锅灶，就是为了把凉了的饭热一下用。

风波暂停息下去，赵凡叮嘱民兵们这几天务必加强监督，并在吃饭时，当众宣布，禁止私煨乱煮，谁家违犯了，就砸谁家的锅灶。每天晚上还专门派出民兵在山梁上巡逻，只要看见谁家的瓦房上炊烟袅起，便去那家，必定是砸锅毁灶，定不轻饶。以后的几天，几乎隔一天都会发生砸私灶的事。

正当赵家湾为强制农民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接到了要我立即去界牌公社集中的通知。

#### 第四节：\*\*快步进入共产主义\*\*

到此，下农村的第一堂课，历时四个月下课了，同赵氏父子相处得不错，远不像我初来所想象得那么可怕，相互之间虽说不上相敬如宾，可还算按「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相处。比起在学校同班上的同学相处，反而觉得融洽多了。

走的那天上午，当我从楼阁上收拾好行李下楼时，赵老汉取出一个纸包，塞进我的书包里，那是一包晒干了的红枣。自从劳动开始以来，按学校规定，我们每月仅只能得到两元钱的零用钱，用来买毛巾、牙刷、肥皂之类的日用品。自幼节俭惯了的我，居然还能把这两元的零花钱中积攒下来。此时我想我没有其它可以相送的纪念品，便从笔记本里抽出五块钱来塞到老汉的手里，关照他下一场赶场时，一定去场上买一件新衣服。

看来，相处以后，他们已对右派的敌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他们还不知道我的遭遇以及深藏我内心深处的苦水，他们至少会认为上级所交代待的这个必须监管的坏人，其实是一个天真的学生。

回到界牌，原先丛林分到这儿的二十二个人重新会聚到一起，我和其它三名「同学」加上鲁召一共五个人，住在离公社食堂不到一百公尺远、一位叫王大娘的家里，她为我们五个人专门腾空了一个房间。

王大娘的独生子和媳妇都在公共食堂工作。界牌的公共食堂比赵家湾大了好几倍，炊事员和喂猪的饲养员就有九人之多。在这里吃饭的是附近大约三百名农民和他们的子女。

食堂的旁边还附设了一个供烟烟、酒和小百货的小卖部。食堂的后面一排猪圈还可以圈养数百头生猪。不过，那时，圈里只关了二十多头猪，这些猪原先由各家分养，公社化以后又集中到这儿来的，这是些与赵凡家相似的尖嘴隆骨的架子猪。

不过，这几天沾了地瓜不作定量的光，不仅供应食堂，每顿用大甑子抬出来，让社员吃饱了，好下地干活。还拨出一部份，用来摧肥那些饿得尖嘴隆骨的架子猪。但是粮食管理员却说，地瓜也是有限的，眼看就要挖完后，社员们供应什么还没有决定，于是饲养员从几百头嗷嗷待食的猪里选了两头，另圈圈养，准备过年杀了分给社员们过年。说也奇怪，另圈喂养的两头猪只喂了一个多月的地瓜，便被催摧成了两百多斤的肥猪。

公共食堂里上顿下顿的地瓜，苦了几十个孩子，每顿吃饭时孩子们围着饭甑满甑的选，在地瓜中挑选饭粒，三岁以下的儿童啼哭着要他们的母亲给他们饭吃。公社食堂每顿都是吵吵嚷嚷。

王大娘的媳妇刚刚分娩，奶水不够，想专门弄点米浆来喂孩子，公社粮食保管员却无可奈何的向她说：「每人每天还是原来配给的二两黄谷，对于婴儿额外由公社每月配了二两白糖，人多嘴杂，怎么好在大伙的伙食中专门匀出米来，推米浆？」王大娘无奈，只好写了一个申请，她家里的四个大人只吃地瓜，所配的黄谷专供孩子推米浆。

不料又引起其它社员的反对，集体去找到公社书记，要求把王大娘媳妇从食堂里解聘，参加大伙一起干活。为了一个新生儿，全家人都作出了牺牲，大人们另灶开了「无米」伙食！

## 第五节：\*\*界牌公社\*\*

公共食堂成了界牌公社和附近近百户农家生活、聚会、「学习」的中心场所，悬挂在大梁上的两个麦克风，每到吃饭时就会播出南桐矿区的广播。学生时代，我们习惯了新闻传播的「单音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厌倦这广播中的重复、虚假和枯燥。其中言而失实，言而无信，言而欺骗的地方一天天多起来，反而逆向去思考，才会得到符合实际的真实结论。

而由新华社发出的正版头条新闻，对比我亲身经历农村之所见所闻：庄稼没有草长得茂盛，成熟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农民们饥饿潦倒，断炊绝食，水肿，死亡成了多巨大的反差？

例如一九五八年自河南省遂县，放出一个小麦亩产二千三百斤的社会主义高产「卫星」，而荣登全国第一个小春千斤县以后，全国各地不甘示弱，先后报出亩产四千斤，亩产四千五百斤和亩产五千斤的卫星来。

此时，已是大春结尾，报纸和广播像向赌场上押「注」一般火爆，经过一番哄抬，最终以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的中稻亩产十三万斤的最高记录中标。

与此同时，除了粮食外，广播中相继报导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涉及棉花、油料、蔬菜和生猪等等；有亩产百万斤大白菜，以及重八千斤的生猪这样的「国家金氏」纪录。

这种向全国老百姓撒出的弥天大谎，除了给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提供依据；为搞得人民啼饥号寒的农业打强心针外，还能有什么作用？难道毛泽东当时昏庸到不明真相，连「民以食为天」这种最简单的民生道理，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治国信民道理都不懂吗？

我到农村一年，每当听到「东方红」和「人民公社好」的广播，就会条件反射：那是向中国老百姓公然在说谎。

听不到真实的新闻，已是六亿泱泱大国的悲哀。而今天，当这些从广播中传出的声音，与真实的完全相反时，我们对共产党何止厌恶？

正当毛泽东批转山西洪赵县委《就实论虚》的报告，吹嘘小麦从此以后产量可以达到亩产八、九万斤的神话，是可以冲天的干劲来实现的「革命浪漫主义想象」时，「一天等于二十年」就这样提出来了。

新时代的赵高「恐群臣不听，乃先设宴，持鹿献于二世」之历史丑剧，正迎合他的独裁丑剧在全国公然上演。

可是，就在他的中南海里根据全国各地上报的高产卫星和丰收喜报，津津乐道「粮食多了怎么办」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便降到六亿中国子民的头上。

### （一）高产试验田

根据高产这个方针，界牌公社选定了一百亩小春高产试验田，按照公社干部计算，只要认真执行「精耕细作，稀秧密植」就可以至少达到亩产五千斤水平，算下来比往年五千亩面积的小春播种总收成还要高。于是界牌的党委在国庆节以后，抽集了两百多号劳动力集中兵力打抢播小麦的「歼灭战」。

第一块试验田就选在公共食堂附近一块十亩的大田中。按照兵团指挥部的安排，包含了我们的二十名「右派」在内两百号劳动力，排成四个茬口，公社的干部，兵团的指挥官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三尺长的竹棍，监视着每一排的茬口，发现没有挖到三尺深必须重新返工。

那块田原是界牌最肥的冬水田，为了「深翻」，排了足足两个星期的水，肥泥的泥脚最深不会超过两尺，要把肥泥先挖上来，再将一尺的红谷子老底翻上来填在肥泥上才算标准。

这几乎同挖战壕没有什么区别，最初人们弄得一身的泥巴还不能达到深度。后来便摸索出经验，先将肥泥挖翻转，再将红谷子底土挖松成一些大块，丢下锄头，跳进像深沟般的茬口，将一块一块的红谷子扔到翻过来的肥泥上面，才算达到了深度。

原来的茬口，一上午还没有推进到三公尺远，我们便已经一身泥泞，一身汗水。手打起了血泡，腿疼得站起来直打哆嗦。

这难倒了那位女下放干部，她的个子小，跳下茬口那深沟里已齐到了她的腰，爬上来就更困难了。没到一个小时，便只好蹲在沟里不再爬起来，当她回过头去望那刚才挖过的「田」，竟是一条被自己踩成了像一条泥板样的「红带」。失声叫道：「这哪是种庄稼，简直是折磨人。」

大家听她的尖叫一齐掉过头来，撑着锄头，回头看了看挖过的地方，站在那里发呆，也借此喘气。站在田坎上监视挖田深度的头缠白布巾的「指挥官」走了过来，厉声吆喝着，要我们开动。

她自下乡以来一直心情不好，被人吆喝，自尊心承受不下，便同那白头巾顶起嘴来。全体同学哄笑不止，唯独只有一位同学没吭声，仍在不停的挥动着锄头，继续不停的挖。工地上发生的争吵，惊动了鲁召，他今天也是「指挥官」，看见她在同社里的干部吵架，走过来，叫走了她。

第一天的挖田除了中午一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工间不到半小时的休息，一直到天色发黑才告收工。在迷迷糊糊的夜色中，看看一天下来劳动的「成果」，老农们摇着头叹息说：「这是那一个出的馊点子？今后种下去的麦子，往哪儿扎根？」

不过，我们已顾不得思考这试验田今后的庄稼生长和收获，回到食堂累得连地瓜都不想吃，喝了一点菜汤，便粗略地洗净满身的污泥。正想倒床睡觉，却被鲁召叫到食堂里，由他主持，就那位下放干部的言行，开了一个批判会。

论身份，轮不到我们这些划上右派的同学发言，可是其它三位下放干部却闷坐在那里不吭声，于是鲁召便叫当时继续挖土的同学发言。这位同学把自下乡以来这位女干部的一些牢骚话抖了出来。接收监督的右派，反过来批评起下放干部来，真是违反了规矩。

但细细想来，这种「反戈一击」的立功表现，不是一直被赞扬的么？平心自问：我们这十几名「右派」同学中，谁都是在政治上极端幼稚的受害者，哪一个不想摆脱这痛苦的处境，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好好地念书啊？

听到数落她的种种，我的心里无形之中产生了警惕，筑起一道防范之墙。同这些「右派」们交谈，可不是同大字不识的农民，说话得长一个心眼。

但是由于她的抗争，第二天对挖田的深度明显的减少了，只要把肥泥挖到见老底就够了，进度加快了。即使如此，二百多号人挖这十亩水田，耽误了整整八天。深挖以后紧接着就是碎土、打窝、下种，和盖肥。深翻过来的田面，早被挖土人自己踩成了一个连毛细孔都没的板块，碎土无从下手。

打窝工序又是指挥官严加控制的环节，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两根长短不等的小木棍，短的一寸长，像一根火柴，那是用来量窝距的，长的两寸长，那是用来量行距的。

亩产五千斤，纯粹是一棵麦穗的平均收获量乘上一亩地的窝数算出来的。所以窝子的尺寸仍是「保证」亩产五千斤的首要措施。谁说「疏秧密植」的首创人不懂科学？然而被踩平了的田面，用锄口挖，不管怎么小的力量，带上来那片土，都不止两寸长。

好在，翻过来的田泥还来不及干硬，在柔软的泥面上，若用锄跟去「敲」，倒反而勉强符合规定的尺寸。不过那用锄跟「敲」出来的园窝子，虽然光滑，敲出的地方犹如蜂窝上密密麻麻的「洞」煞是好看，只是丢种子得小心，站直了身丢，那麦子非溅出来不可。其实，那么密的「窝」不等于撒是一样么？

要知道，这是北京的最高指示啊，至于我们，得了的教训，就连牢骚话也不敢公开的说了。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十月，整整一年，田地里几乎颗粒无收。人祸，酝酿了这场饿死人数空前多的大灾难。

## （二）王大爷

年三十晚上，两个树疙瘩在堂屋的地坑里燃起红红的火。王大娘的一家，儿子、娘俩和两个孩子，加上她的大哥，连同我们一共十一个人便围着「火炉」团起了年。

按中国民俗，三十晚上是要通宵守岁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不准备睡觉。王大爷的精神特别好。也许，今晚上这热闹的气氛打破了他长期独居的沉闷，看得出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老式农民，两杯白干下肚，便打开了话匣，叨叨不绝的讲他民国三十年后为地主帮长工十几年生活。

他说：「那时，我佃的是李老七的五亩田，两亩坡土，到了秋收，打完谷子，要交粮是真的，可是，你们知道吧，这儿富得很，天府之国你们清楚吗？」他抹了一下花白的胡须，像一个老教师在教一群孩子。「每年除干打净，七亩地也要收三千斤，除交了租子，再差的年份也要把堂屋里的谷囤子装满，我这辈子还没听说过没得粮食吃的。」

王大娘向他直丢眼色，示意他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但是被酒涨红了脸的王大爷没有理她，继续唠叨着：「一过中秋，我们就跟老七挑粮交佃，那老七也算仁义，早就给我们准备了几坛子酒放在那里，他家开的酒厂，现在还在岩弯那里，你们知道一坛酒有多少吗？大坛六十斤，小坛三十斤。帮他家的佃户，见人一大坛。」

他又倒了一小杯酒，端了起来：「这儿过年，讲的是规矩，主人家挨家挨户，到佃客屋请酒，从三十晚直喝到初五。腊月初八杀年猪，哪一家都要把圈里的过年猪拖来宰了。年要过到十五，肉是吃腻了的，年年都要剩半边，熏来挂起。」他讲得十分的得意，一双长满了茧巴的大手不停的在空中比划。

鲁召已经喝得酒糟鼻发红了，他在那里听他讲，一言不发。长期生活在城市，对「解放前」的农村一无所知的我，从他那平凡的介绍中感到了新鲜。在我的印象中，他说的李老七，就是在五〇年我所看到的龙凤村斗地主时，被农民包围跪在煤炭渣上，双膝流血苦苦哀告的秀才了。这些人至今大多已死去，留下来的也是被民兵们严格管制，不敢说一句真话。当然，问题绝不在这些李老七如何，就像我们今天的遭遇一样。

夜渐渐深沈，王大爷也渐渐关上了他的话匣。孩子倒在他的怀里，在温暖的炉火前沉沉睡去。我却凝望着王大娘开始花白的头发出神，看上去她比我的母亲年长大约十岁。

我脑子里重新翻腾起这一年来传奇般的经历，隔离反省，扣右派，挨批斗，下乡；赵家父子烧玉米；界牌的大兵团作战……

我体会到在这场巨变中，亿万农民的不幸和所陷的惨境，尤其是亲身经历了被报纸吹得天花乱坠的「卫星试验田」的内幕。这是当时在校园里，在宣传报导中无论如何都无法知道的。

就从这开始，我丢掉了少年天真的幻想。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怀疑人性会被暴力扭曲的令人无法看到希望。

## 第六节：\*\*丛林铁厂\*\*

我们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从界牌农村回到丛林煤矿，第二次回到这里，第一景象是人流如海，热闹非凡。在那狭窄的丛林街旁，布满了临时搭起的帐篷篷帐，里面挤住着从重庆、南桐各地调集来的「炼钢大军」。丛林地区政府的大礼堂面前，悬挂着一个硕大的木牌，上书：「丛林铁厂炼钢指挥部」。

大礼堂既是这里大炼钢铁的指挥中心，又是平时炼钢大军暂时的食堂。这儿的吃饭完全是「共产主义式」的，凡参加炼钢战役的「战士」，一律供给制。大甑子里的玉米面糙造米饭可以随你自取，八个人凑满以后组成一桌，可以到伙食团窗口领取一桌饭菜，仅此一点措施，就足以招揽那些城里吃着定量供应的居民们。

那路边街旁的帐篷里，挤着一家一家的妻儿老小，每两个家之间只用一张布单隔开。那里面，嘻笑哭闹，夫妇之间、母子之间、两家之间，纠纷不断，热闹非凡。

我们近一百号劳动力，暂时仍安住在丛林小学的教室里。小学已经完全停课，除了两个看守的老头，教职员工全部抽去建设丛林铁厂的「小高炉」。学校的孩子们当然只好回家，随父母一道去为「大跃进」献身了。

我们连下放干部在内的所有的人员到齐以后，王怀寿才召开了全体人员的大会，他简短总结了下乡十一个月来全体人员的改造成绩，着重讲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伟大意义。

他的讲话很平缓，好像是在背诵一篇熟读了数百遍的经文，使我们这些习惯这八股文的人感到乏味，更因为他所讲的除了中共那套谎言并无新鲜东西。

分别了九个月，他的党棍形象丝毫没有变，由于疲劳，我看见了周围的人都在打瞌睡。

「精神集中一点！」王怀寿吼道，那一排排打瞌睡的人被他的吼声惊醒，重新正起了腰板。

他环看了一下四周，继续用平淡的声音背诵下去：「今年是党中央部署的持续大跃进的第二年，也是决定大跃进总路线成败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在去年农业取得极大成绩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任务，为完成毛主席提出的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中国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跨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他的平声调，表明下乡这一年来他之所见所闻，冲淡了去年初来时的那一股冲劲。这可能算是一种进步。

经他这一讲，我们便明白了，把我们重新集中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全体人员仍按照原来的编制分成五个组，进行了一下午的讨论学习。

第二天，全体人员整队出发，去丛林铁厂炼钢指挥部的大礼堂，参加「丛林铁厂筹建大会暨大炼钢铁誓师动员大会。」

我在墙上读到了一条用绿纸写的十分耐人寻味的「小标语」，上面写道：「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我想写这幅标语的人讲实际的味就很浓了，而且似乎只有这种标语才能鼓动到这儿来的市民们。

按老套式召开的这种大会，本就是过场。会上主持人宣布，七座小高炉，必须在五月底全部完工，六月开始炼钢。他讲了一大堆可以完成这个最低产量的理由。会场里乱哄哄的开起了小会，大家七言八语的全是妇道家常。

我们最初的任务是为丛林铁矿小高炉的建设筹集原材料。这是一些结构古怪的「小高炉」，可以容纳十个人踩动的踏板像农村中的水车一样的「鼓风机」，配套在每个小高炉旁。

当时我们实在没有兴趣关注这些「设备」，我们只顾着吃饭和完成交给的劳动，我们只望着尽早回到学校的一天。

分给我们这一百来号人的具体任务是，将那些从附近农村各地砍伐供「建筑」高炉用的「圆木」运抵高炉建设工地。开始时，早出晚归，没有固定的地点，只是跟在伐木者的身后，砍下就运走。

丛林地处山区，两山夹沟，山林茂密，农村里的宅院里，世代居住的农家，为了自己的环境和水土保持需要，素有植树的习惯。种下的树木，就是缺柴也舍不得砍，祖辈相传形成了这儿茂密的树林，画出美丽村寨，成了农民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人民公社化以后，这些秀丽的山林虽然都充公社所有，现在为了奉献给丛林铁厂的建设 and 建筑高炉，刚刚成立的人民公社首显「优越性」，在炼钢指挥部的安排下，无条件的奉献了所有可供建炉的树木。

于是伐木者持着手令，对附近的农村施行了「三光政策」。唯有那些世代居住在这儿的的老农，才敢对这种败坏祖业的行为表现出反感和心痛。每当这些老者请伐木者手下留情，不要对那些幼林下手而同伐木者发生冲突时，又必会招来炼钢指挥官们的痛斥，扣上破坏大炼钢铁的帽子。

一片二十亩才长成酒杯那么粗的幼林，在被砍伐时，被守林人阻拦，他痛斥指挥伐木的人：「这简直是破坏，简直是造孽。」他当下便被民兵抓走。农民们看到有例在前，谁敢抗拒？

就这样，不到三个月，丛林周围竹木成林、风景如画的山村便成了光秃秃一片。在田坎上，在山坡上，在平时绿茵葱茏的行道边，留下了一个个树桩，那些原本就荒芜的人民公社田野更显得荒凉。

丛林地处山区，从此以后，每到夏季，山上的洪水爆发时，便无阻挡的直泻而下，肆虐美丽的长江，冲刷着中下流的沿江各大城市。

遗憾的是，当二十八年后，江泽民向抗洪救灾中牺牲的民工默哀致敬时，却不敢去清算毛泽东当年给中华民族欠下的这笔孽债。

附近的山林砍完后，砍伐队到远处寻木头，最远的是距丛林足有二十里地的白果山区，这些坑木最小的也有二十公分的直径，每根最轻的也有三十来公斤。抱着一根木头，还不知怎样往肩上放。我们运坑木的规定每天必须跑两趟，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被鲁召吹响的哨声追起，手里拿了馒头，手执绳索和助杵，匆匆上路。

这么大的坑木对于从未用肩来扛的人，真像第一次背十字架，垫肩往往挤到一边隔不着肉。几次换肩便把颈项和背部肩到处擦破，鲜血斑斑，疼痛钻心，可算是下乡劳改以来最苦的「活」。我们白天一身污泥，常在路边沟旁，因重心掌握不好而跌倒，遍体鳞伤。

回到住处，连脚也不洗，忙着给伤处擦一点红药水，碘酒之类，倒在铺上便呼呼大睡，即使翻身伤痛而惊醒又马上睡去。遇到雨天，行走在陡峭路滑的山间小路，踩在碎石路面上，稍一不慎便要滑倒。

有时，一跤摔下，坑木便猛然压在身上，人和坑木一起往下滚，身上被那锋利的石块划伤，血肉模糊。喘喘气，平息以后还要忍着创痛，踉踉跄跄的扛着那带血的圆木往回赶。唉！干吗要我还存着复学的念头呢？有了这个幻想，拼拚了性命也不在乎。

### （一）草脚码

有一天，当我刚上山，便起了大雾，山上顿时四处茫茫，阴风四起，这是要下雨了。气温突然下降，我却只穿了件夹衣，肩上除了一个护肩什么也没有，冷风吹得我直打哆嗦。心里突然很慌，嘴唇发紫，心里明白，这是高山反应，连忙走进了山腰的一户农家暂避。

白果山区的老百姓，常年不断地在堂屋地坑里燃着树疙瘩，我穿着破夹衣和破胶鞋，那单薄的裤子上还沾着一血迹，自忖一定比乞丐还狼狈。

走进大门，怯生生望着那火红的地灶。那旁边正坐着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大娘。从他们花白的头发和面容判断，大约都上了七十多岁，平时路过已很面熟。老两口见我进去，老大爷从旁边拿了一张长凳，面对着火炉，叫我坐下。

那火炉送过来的一股暖流，使我瑟瑟作抖的身子镇定下来。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双脚伸向火边。

老汉注视我裤子上沾着的血迹和脚上的破胶鞋，片刻以后，便叫我把裤脚管卷起来。脱下鞋，双脚上被石片划破的伤口在火光映照下，已现出紫色。他回身里屋，取出些捣碎的草药，又去灶房取了一瓢泉水，为我轻轻洗去血痂，在伤口上敷上他调制的草药，用一块白布替我包好。

我联想在赵凡家落户时，那赵老汉也是用自采草药疗伤的，心里好奇，想问这草药是什么草，但没有开口。

那老奶奶却从地上拣起我穿的那双破胶鞋，叹了口气，进里屋去取了一双草鞋出来，告诉我这是她老伴平时闲下来编织的，叫我穿上后，指着那破胶鞋说：「这哪能穿呢？扔了吧。」

尽管毛泽东天天在摧毁中国礼教的仁慈、宽爱，把人和人变成了除厮杀和仇恨外，什么也没有的野兽。但今天，两个老人用他们的行动证明，植根于人性之上的仁爱，永远不会被暴虐的政治所泯灭。

我将要离开时，老汉走出门外，拣了一小指稻草，教我挫草绳，然后把挫好的草绳，套在脚跟上绕结打扣，便牢牢的捆在我的脚板上，护定我的脚跟踝骨，踏下脚觉得挺轻快。他告诉我：「这叫脚码子，山里人是从不穿鞋的，雨天路滑随便在那个草树上，挽上这脚码，爬山利索又不容易滑倒。」

我穿上了老奶奶送给我的那双草鞋，站起身来，深深向二老鞠了一躬。走出茅舍，回头用心记下了这儿的位置。从此以后，我每经过都常来这儿歇脚，我真想知道他们何以单独的住在这荒山野岭中。

三个月后，当小高炉相继在丛林小学山背后山梁上「站」立起来的时候，也是全国粮食告急之时。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无法再维持下去，所有从城里来的居民陆续地遣送回各自的城镇。丛林街道上的篷帐篷一天天减少，留在马路边的是一些破衣烂裳，竺林沟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清静。

丛林铁厂的伙食团也已落成，从大礼堂搬到了紧靠马路的一幢平房中，所有丛林铁厂的职工重新按照定量吃饭，八人一桌。自取米饭的共产主义生活，仅维持了三个月。

八人一桌取消后，铁矿的工人按自己的粮食定量和经济能力，买回所需的饭菜票。对我们这七十名右派，剥夺了购买菜饭票的权力，每个人的菜饭一律按定量发给了我们。这种定量对我们这些运送原木的小伙子勒紧了喉管，超负荷的劳动本已难以承受，再加上腹中饥肠辘辘，怎么完成规定的任务？

记得以往早上，我出发时都要揣四个馒头上路。现在按定量，只能拿两个，还没来得及在白果山头打转身，肚子里的两个馒头便下了肚家坝。开头几天还忍着，不几天，饥饿便成了我们最大的困扰，我们脑子里成天都在打吃的主意。

开始，我们还用乞讨的办法，每次晚上等打饭的人都走以后，等到结尾时，走到取菜的窗前乞求炊事员，把剩下的菜多给我刮一点。但碰上菜全打完时，便只好饿一顿。

有一天，伙食团长嚷道，发现有人把饭票的数额私自篡改了。我明白，这多半是我们这几十个苦孩子干的事，便想也学着干。

晚上天色已黑，灯光昏暗，上夜班和下班的人正多，瞅准炊事员正忙碌的机会，便把事先一张一斤的票额改成十斤的饭票，塞进了窗口，心里扑通扑通的直跳。

只见那炊事员正要找补，却不料那伙食团长走了过来，抓起刚才塞进来的饭票逐一辨认，恰好，我就碰在了钉子上，当场被抓了一个现场。自尊心对我们已经很淡，当场的难堪还算不了什么，倒是偷鸡不着倒蚀了一把米，那一斤饭票被没收了。

晚上鲁召又召集了小组会，雷尧黑着脸数落我平时对食不裹腹的牢骚话，提上抗拒改造的纲上。这下子辛辛苦苦一年累下来返校求学的希望，被这件事影响了，心中着实懊悔了一夜。最后打定主意，勒紧裤带，苦熬下



去，等到过年以后，看看能否重新返校吧。

然而饥饿毫不留情地折磨着我们，尤其是大肚皮江远，他竟在半个月内吃掉了发给他一个月的饭菜票，剩下半个月只有吊粉肠了。王怀寿看到他一派无奈，对他采取了特殊「照顾」，每天只发给他当天的饭菜票。

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运送木料经过途中，满山遍坡的玉米地瓜地里。那时，玉米已挂了黑须，地瓜也结出疙瘩。然而这些诱人的庄稼，却又偏偏集中在沿途都有农家的山沟底下。

天晴时日，一目可穷数里，白日行窃，极易被社员捉获。夜间打盹又无法赶回住地，便瞄准阴雨晦暗的时候，看准了农家稀少的地带，无人时，便连忙把玉米、地瓜连泥塞进预先准备好的口袋里，慌慌张张赶到半山上的伙食团，趁人不备，便将这些猎物埋在那里的炉膛下面。

等到捞坑木一趟打得转身，又偷偷地去那里取出烧得香喷喷的「加班粮」。但这样作案，所遇风险极大，不是被民兵截获，就是埋在灶膛下的东西被他人扒走，一无所获。

渐渐的，大家也将发给我们每月两元钱的零用钱，凑集起来，去向那伙食团长「分」出些胡豆、玉米之类的东西，就地添了从地里所得的新鲜货，可以勉强吃饱一顿。

然而，无论复学的诱惑力有多大，「右派」们所承受的压迫有多沉，饥饿和内心的冤曲，加上下乡以来对共产党政策之所见所闻，都会产生巨大的反抗力，这种在我们心中增长的反抗，便陆续爆发出来。

面对这种不堪忍受的役使和饥饿，想逃亡的岂止一人？成天同右派们生活在一起的下放干部，对这些蛛丝马迹有了查觉，这正是这些干部起作用的时候了。他们专门开了会，对这七十个人作了进一步的防范，去上山伐木的小组，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下放干部跟着，来去要求集体行动。

## （二）叛国投敌集团

有一天，天下着大雨，白果山已无法上去，王怀寿决定扎雨班，同时派了四个人把邮件和报纸从南坪取回来。上午十点钟左右，值班人发现临时保管室的门关着，听见派去南坪的四个人正小声说话，侧耳听到说话的人杨治邦。是机械系四年级学生，此时他正低声说道：「从这里到綦江再到贵阳，由贵阳再到昆明通公路，可以搭乘汽车出国境到河口或西双版纳……」

据下放干部查他的档案，他在解放前，在昆明当过国民党宪兵。

四个人关起门来讨论去边境方向的路，这引起了神经敏感的王怀寿怀疑：四人讨论附近的交通，一定是想从边境逃往国外。既然如此，便要撬开他们的嘴，让他们招供出来。

他施展出反右派时整右派材料的惯技，先对其中最薄弱的人下手。四个人中，除杨治邦外，其余三人都是刚刚进大学，年龄比我还小的毛娃子，而其中陈国喜出身富农家庭，最为无知，也最自私，是我们中意志最软弱的一个人。

午饭之后，王怀寿将陈国喜喊进了下放干部办公室，经过一下午的审讯，陈国喜被单独隔离反省，其余三人都派专人跟踪，禁止他们相互交谈以防订立攻守同盟。接连两天，在威逼利诱下，陈国喜终于按王怀寿的意图，交代待出第一起投敌叛国集团。据陈国喜招供，这个集团以杨治邦为首。

在那个年代，只要有思想，就算有了犯罪的根据，何况成员有了交谈。中共发明的这种罪名名字叫思想罪。

十天以后，重大的一百号人在升旗台前集合。五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在升旗台旁，那形势够紧张的，一个姓陈的南桐矿区派出所民警，站在升旗台上宣读了南桐矿区公安局的拘捕令，并以「组织反革命投敌叛国集团」罪，逮捕杨治邦、毛贯益和李天德。同时对陈国喜则以悔改立功，免于起诉。

接着，三个人就在五名警察的喝斥声中戴上了手铐，押上了停在丛林小学门口的吉普警车。

从此以后我们格外小心的管着自己的嘴巴，同时也防范着周围的人。处在相同命运之中的这些伙伴并不齐心，有些人可出卖他人。

正好在这个时候，小高炉炼出来的铁，送到炼钢厂去被统统地被打了回来，化验结果证明，它所含的杂质和有害的成份，超过合格铸铁的数倍，是一种无法冶炼，也无法使用的废铁锭。

指挥部傻了眼，连忙分析，当然首先怪那座古怪的土高炉炉温不足，排渣困难，风力不足，燃烧不完全，罗织了一大堆原因。但那「土高炉」是上级指定这么干的，再错也不能直言。

就像种的试验田，乃「元首」处方，谁敢不照办？荒了庄稼，误了农时，谁负得起这大责？然而，铁还得继续炼下去，高炉也不可能马上丢掉，今年的十万吨钢材还要如期完成。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如何提高进炉原材料的质量，那铁矿本就在丛林背山的山顶上，采样化验证明，那绝对是富铁矿。

就只有焦炭是就地从丛林煤矿挖出的煤，经炼焦炉炼出来的，含硫，磷较多，所以唯一能采取的措施就是提高焦炭的质量，建立一条洗煤的设备。指挥部把这个设计并建设洗炼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王怀寿这些天正在担心，杨治邦案虽稀里糊涂以叛国投敌罪宣判了，但，事情本身却在向他提出警告。等待时机逃亡的人说不准有多少？他心中非常明白，在这些年轻的学生中，仅靠「复学」这一点吸引力，正在被高强度的劳动和短缺的口粮抵消。

如果在这时万一发生集体的逃逸，他王怀寿也很难担待这个责任。去白果山扛坑木一直是令他最担心的事，那无异于给想脚板擦油的人创造了便利溜走的机会，所以趁洗炼煤厂即将兴建，便抓住这个机会，将自己所管的重大全体人员，集中到洗炼场当泥水匠。

丛林铁厂新修的库房，暂作我们七十多人集中的宿舍。

当铁厂职工恢复口粮定量的同时，农村中也恢复了每人每天黄谷四两的旧制。那时，在我们刚刚搬去的住地，每天可以看到一个提着瓦罐，从集体食堂进出的老人，听说，这是一位丛林公社的「五保户」。

有一天，出于好奇，我拦住了老人，请他让我看看他们每顿吃的什么？他将他手中提着的瓦罐。战战兢兢地递给了我。我打开盖子向里一看，那里面是一罐照得清人影的黑汤汤。使用他手里的筷子去一搅，便看到搅起来的，是一些牛皮菜和从地瓜藤上勒下来的地瓜叶子。

此时那老人眯缝着水肿的眼皮，喃喃地问我：「这年头，三晴两雨的好天时啊，地里的庄稼，本该好收成啊，咋个弄得连饭都没得吃了？」

我们同丛林公社的农民，又一次为粮食、钢铁「大丰收」，交融到一起，没日没夜地打疲劳战。所不同的是农民们除了白天为秋收秋种忙碌一天，晚上还要打着松明子挑着箩兜为铁厂运矿，妇女、孩子们在公社指定地方，去砸碎那些堆在马路上的矿石，另一些劳动力还要在晚上下田收割未收回的谷稻。而我们白天当泥水匠，晚上则同他们一起蹲到水田里割谷子，或者在收打玉米的晒场上捶打已经晒干的玉米。

唯一能刺激我们日夜加班的，就是晚上超过十二点以后，农民可以在集体食堂里领到三两粮的罐罐加班饭，而我们则可以在铁厂的伙食团吃到三两粮的馒头或三两面条。我们实际上已同当地的农民，成了共渡难关的难友了。

农民们吃过夜班饭「歇稍」，重新回到工地上或水田里，但除非有书记亲临坐阵，下半夜以后，无论在挑矿石的工地，还是在晒场上都是静悄悄的。

倘如有人去收割的稻田里看一下，那儿一片漆黑，侧耳听去便在一片蛙鸣声中夹杂着人的鼾声。如果拨开稻秆去寻，就会看到那些疲惫不堪的社员，横七竖八的睡在里面。

第二天公社的广播喇叭里，照例播放前一天晚上，社员们如何响应大跃进号召，不分白日黑夜加班抢运抢收的「动人」事迹，以及谁也不会相信的关于高产卫星之类的丰收「喜讯」。

### （三）运铁矿的玩命活

洗炼场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我们这支劳动突击队接受了运送铁矿石的任务，转战在通往炼铁厂的马路上。沿着丛林西北面的山崖，一条四米宽的公路蜿蜒着向上，那上面是著名的海孔农场，山顶的右方，隔着一

道万丈深壑的陡峭绝壁上，一个天然的巨大的山洞，隐藏在山峦奇峰之下。山洞的后面有一片巨大的开阔地，据说这便是抗战时期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依凭着这个天堑，靠它上面的奇峰掩蔽驻守的地方。

马路左侧相距两里距离，在那山洞略低的地方，便是今天正在采掘供丛林铁厂的小铁矿。矿工们住在临时搭起的一排工棚里，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带职的工人，也有才开始学的农民，他们用镐头挖掘，再推着矿车，将矿石运到铁轨尽头一个露天矿石场上堆放着，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堆放着的矿石，运回丛林铁厂的高炉旁。

我们将人分成两组，一组将矿石从采矿场挑到马路边，另一组从马路边将矿石一车一车的运达小高炉边，配置给我们的工具是箩筐、扁担和三人一部的人力木板车。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卡死的，必须保证小高炉生产所需的铁矿石供应，

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还增派了重庆市财税系统的二十多个人，加入我们之中。经过分解和计算，每一个人挑矿石的重量，和人力木板车每车的重量都有定额规定，完不成任务是不准收工的。

我被分配在人力车大组。我们这架人力木板车上还有江远和袁如。袁如身材微胖，是一个口才利索，性格开朗，处世大胆而又精明过人的女孩。饥饿的折磨对她并不是一件难以克服的事，她的心中在想些什么无人得知。

拉车运矿，重车上坡是最吃力的，重车下陡坡又是最危险的。为了完成每天所必须完成的任务，每一车都必须满装满载，从车胎压下的弹性变形估计每一车都不会少于一千斤，好在去海孔铁矿上坡的路是空车。运回矿石基本上一路下坡，只有在抵达小高炉才有一段大约五十公尺的缓上坡路。

三个人驾车，上坡时驾辕的中杠必须掌好车把，肩上勒紧套绳，拉长颈项，埋头用力的跨着碎步，呼着号子，以便让两边的「飞蛾」按号子的节拍，保持三个人步调和用力一致，将板板车一点一点向那山头上拉，到了装矿石的地方。连汗水都没有擦净，便赶紧装上满满一车矿石马上离开。

重车下坡，中杠又必须死死的用两臂抬着车杠，以保证车尾下部的刹车着地刹着下行，两边的飞蛾要死死的拽着缰绳，控制着车速，以免冲冲刹失控发生惨祸。就这样晴天顶着骄阳，下雨迎着狂风，起早贪黑，完成交给的任务。

我们三人中因为江远的个头最大，他担负的中杠次数也最多。因为有袁如在一起，说笑的时候，常常冲淡着劳累和苦闷。

有一次江远对袁如说道：「我们这个车啊，天天在演骆驼祥子。」「怎么讲」？我问。「我演祥子，袁如就扮演虎妞，怎么样？」江远挑衅道。

袁如毫不示弱回敬道：「那我就不拉车了，你养得活我吧？」停顿片刻她接着说：「老实告诉你，虎妞喝的燕窝人参汤，穿的绸缎绫罗，祥子喝的五加皮，吃的涮羊肉，你江远怕是看都没看过，想都不敢想呢。」这话里尖酸刻薄，带着刺，谁叫江远得意忘形。

我想倘如老舍见到我们这样子，那么他必会摇头叹息：「怎么了？中国的大学生，就是这般的苦力么？待我有机会也写上一本『丛林沟』来。」

他今天若在这里目睹没命飞奔的人力车，恐怕会叹息，小说中描写的旧北京底层人物，竟让今日的大学生们羡慕不已，因此要停止骆驼祥子的出版了。可惜文革中他跳了昆明湖，这就是历史对现实的嘲弄。

然而，江远用手捂着嘴巴，意思说打住，说话出格，会惹祸的。

「嘿唷！嘿唷！」山谷里回荡着沉重的号子声，汗水顺着脚弯洒在烈日烤得烫脚的马路上。

有一天，上午十点钟，我们拉着空车跑第二趟的时候，刚刚拉进一个山弯的僻静处，江远把车停下来，对我说道：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到山边方便方便，说着便朝路边草丛里走去。我和袁如把车停隐在那里等他，等了好久，后面的车都过去了几趟，还不见江远露面，袁如着急起来，咕嘟着「今天我们的任务完不成该怎么办？」

那草丛还不到十公尺远，我顺着那个方向找去，走到崖边向下看，下面是一个只有宽两公尺的土坎，种着地瓜，只见江远正用随车带的一个铁铲，紧张在挖，边挖边用手抹去还没长成熟的地瓜带的泥巴，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一切我都明白了，江远是挖地瓜的老手，从白果运坑木开始，全仗着公社地里的地瓜解了他不少困难。

此时相对审视，下乡一年多，我们已面带菜色，毫无年轻人的朝气了。

运送矿石的那一段日子，经常晚上做梦，梦到我们所驾板车正从那山上腾空飞下。马路边写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牌，一刹那变成了一些巨大的石碑，突然一声巨响，那石碑群从上到下，一个接一个紧跟着我们的板车向我们倒下来。

我们无论如何的飞奔也无法躲避，最后那些标语像咒语般的悬在空中，发出一片魔鬼般的怪叫，在一片天昏地暗后，我们的板车被这塌下来的巨碑压在底下！。

奇怪的是，那板车像一块钢铁一样硬撑着这堆石碑，使我们能存生于它垫起来的逢隙之下，免了一场「肉饼」之灾。当我们从那夹缝中战战兢兢钻出来，却看见那王怀寿不知什么时候，叉着腰虎视眈眈地站在我们面前，吼道：「算你们的命大！」

真的，我们真的把自己的性命紧紧地攥在自己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真的，从回到丛林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便开始了新的灾难。

王怀寿心里十分明白，他所管的几十个人中，已经渐渐觉悟到自己的处境，他们已对学校复学的诱惑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诺言产生了怀疑。杨治邦案已经给了他第一次信号，现在，难免不会引起连锁反应。

虽然他每天牢牢控制着像雷尧、王山这一类迷信极强的学生，试图把握着每一个人。他明白，现在要凭学校反右那一套办法，恐怕难以控制这些被生活一步一步逼向反抗的年轻人了。

#### (四) 迷魂的「摘帽」

第二天，王怀寿一脸严肃向大家宣布了一桩令所有人振奋的特大好消息：国庆节前由金校长亲自率领的工作组，将来丛林检查一年半以来对右派的思想改造工作。学校将根据在座的人所表现的好坏，考虑给接受改造的人摘掉帽子。所以，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填写右派份子劳动考查期间鉴定表。说着便将手中的一迭表格发给了大家。

这个消息对在场的人确是一剂强力的兴奋剂。人们交头接耳开起了小会。然而大家的担忧远远多于乐观。

王怀寿宣布完这个消息后，是自由发言，雷尧滔滔不绝地叙述自下乡以来的一年半中，学校党委根据共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我们这七十多人「给政策，给出路」的伟大改造方针，王书记如何长期耐心的对我们进行挽救和教育。

听他的吹捧，大家心中虽十分反感，但出自雷尧口中已练成一经，不会产生任何的肉麻和语塞。

国庆节前，丛林煤矿的周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丛林沟非常认真来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区委办公大楼已经张灯结彩，两边巨幅的标语像镇慑小鬼的鬼符贴了满街。

为了迎接重庆大学的「下放干部慰问团」即将来到丛林检查一年多以来的「改造」工作，王怀寿亲自督阵，将我们的住宿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会议室，布置了「改造专刊」，久违的节日气氛又隐隐的来到我们之中。他还亲自检查了每个人的衣着，督促大家拿出了最体面的衣服换上。

王怀寿一大早就到丛林沟的进口处，恭候下放干部慰问团的专车，一直到中午才将慰问团接到我们的驻地。当显得苍老的金付校长站在升旗台上发表了简短的「慰问」讲话时，我们才注意到了，经过这一年半以后，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因为什么原因，原来的二十几名下放干部，只剩下几个人了。

在场的主体几乎就是我们这几十个「极右」份子了，那场面和气氛似乎是专门为我们而安排的。作为实际上的主体，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母校向我们伸过来的手。我看到杨家铭同学眼眶里包着一片泪花，感到一股被抛弃的弃儿又被捡起的那种悲凉。

晚上，和第二天整天，我们便分组的在铁厂的那一间会议室里举行了「改造一年半以来的心得座谈会。」我们这些弃儿暂时忘却了这一一年多以来所受到的痛苦和目睹的种种荒唐事。大家浸沉在复学的迷梦之中。

第二天晚上随慰问团同来丛林的学校文艺组，在丛林小学的升旗台上演出了他们带来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被三面红旗的框框束缚，成了干巴巴毫无艺术味的说教，慰问团的每一个人并不知道我们这一年多来经历着多少痛楚和磨难。

第三天一早，慰问团返校，他们带走了那一大卷这儿的弃儿们精心琢磨写出来的「右派劳动考查调查鉴定表。」

### (五) 夺命炼焦场

国庆节过后，不知道是出于王怀寿进一步收缩监视圈，以加强管理，还是出自丛林煤矿的某一管理人员的建议，我们全体「右派」集中到炼焦场从事专门的出焦劳动。

丛林煤矿出煤洞口的前方，一大片开阔地上排布着一群状如铁锅似的「土炼焦炉」，这是几百年来所沿用的最古老，最落后的手工炼焦法。

在像锅底般的炉膛上面，架铺好一层层的木材后，再从洗炼场运来的洗净的原煤，一层层地铺垫在它的上面，每一层之间用一排碗口大小的原木造好「通气孔」，煤层堆好以后，像一个倒置的窝头状土丘，周围再糊上一层稀泥覆盖严实后，从炉底生火。经过十来天的焙烧，这玩意便成了一炉用来炼铁的焦炭，再将底部的炉膛封闭，断绝空气，炉膛上便「焖成」一炉焦炭，等到熄火后，再用冷水从炉顶灌下，使火红的焦炭冷却，剥开最外层的「球壳」，将出炉的焦炭捣碎取出。

这是小煤矿中最脏、最累、也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所以，煤矿工人宁可甘冒瓦斯爆炸的杀生之险，也不愿从井下抽上地面来干这种活。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无条件服从调派的监督劳动力，是不会考虑我们没有经过培训，没有防毒用品，也没有经验的一群苦孩子的生命和安全的。

没有人指导我们该怎么干，发给我们的是每人一根钢钎，一条竹杆铁爪子和两只口罩。规定我们每炉六个人，一天必须将一炉炼好的焦炭全部出净。我们一早扛着钢钎，铁爪上到炼焦炉前。当我们打开已烧成黄白色的泥层「球壳」时，已感到灼热逼人。

用了好大的劲从四个方向凿开那「焦球」，炉心中暗红的火焰，便从凿开的缝中辐射出灼人的气浪，直扑我们而来。那气浪中，夹杂着燃烧的硫化物所释放的黄褐色有毒煤气，立即使我们感到窒息和昏眩。

我们被这股毒气，逼到炉沿无法再往后退的地方，只好背过身来，脸朝着外面直喘气。

有人想到了水，便跳下炉沿的土坎，找到一个铁桶，提来满满一桶水，朝着炉心中最红的地方泼去。然而这才叫杯水车薪，从泼进水的地方，回卷起一股夹着煤气的白色气浪，猛烈反射回来，差一点没把他击倒，而那炉心处只稍稍地暗了一下。

此时六个人已经脸红耳赤，身上的汗水早已被那不断袭来的热浪蒸发得干干的。只感到皮肤被灼伤的疼痛和呼吸的困难。六个人只好从炉上暂时退却下来，相顾对视彼此的口罩，早已被那热浪卷起的黑灰糊上了一层厚厚的「壳」。脸上除了看到眼珠还在转动外，其它的地方也已成了灰红一片。喉里便觉得被堵上了什么，干咳着吐出来的便是黑色的痰。

刘汉光直摇着头，喃喃地嘀咕道：「没想到，这工作竟这么恼火，这样干怕要作牺牲的准备了。」可是，休息还不到二十分钟，大气还没有喘过来，那雷尧却在附近的炼焦炉上向这边喊道：「今天要出完啊，不出完是不准回去的啊。」刘汉光做了一个不肖的鬼脸，骂道：「假积极，催命鬼。」

我们只好重新站回到炉边，灼热的气浪似乎退了一点，便挥动手中的铁钎，向着那焦炭猛砸，将它们捣碎成水桶那么大的碎块，然后，执着长铁勾，冒着不停地向我们扑来的热浪和令人窒息的煤气，一块一块地把它们勾上岸来。

倘如碰到那大块的焦炭，一个人往往无可奈何，便两人协力去勾，倘如不留神其中的一个铁爪子滑脱，那么那人便可能向后仰跌，跌下高高的炉坎，轻则伤及皮肉，重则跌断手脚。而没有滑脱铁爪的那个人，如果不赶快甩掉手中的铁爪，便会被那沉重的焦块连人带勾拖下炉去，那后果会不堪设想，掉进那火炉中犹如葬身火海，难保性命。

突然间听见有人发出惊叫声，他是我们中个头最小体重最轻，因而也是体质最弱的一个，我们连忙侧头去看他发生了什么？只见他正在那里很吃力地伸着腰，脚上穿穿跌跌，手也不停地在空上乱舞，好像在反抗一股看不见的，正将他向炉中吸进去的力量。

我们便丢下手中的工具连忙将他抓住，并将他拖到距离炉边十公尺远的潮湿的地下躺下。只见他双目紧闭，口里不断地吐着白泡沫，原先红灰色的脸变成了青色，不停地喊道：「水、水、我要水。」

这一天，当黄昏降临，我们这一炉焦炭才出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是更深的下层。加上天已黑了，就是加班今天无论如何都完不成任务了。看焦场之外丛林场口，昏黄的灯光，已爬上了路灯的灯架，抬头望着银灰色的天空，上弦月已在空中露脸，星星点点的星光也同我们一样摇摇晃晃。

我们心里发慌，又累又渴，满身的毛细孔已被焦炭的灰尘粉末堵死，除了眼睛还能吃力的眨动，一身像被捆住一般，也罢，休息一下再作计议。

唯独邻近雷尧的炉子上，传来了「捷报」，他们正在最后的打扫炉底，第一个胜利的完成任务了。

我们炉上的五个人在夜色中暗自吃惊，实在佩服那雷尧的亡命干劲，看来不完成任务还真的要受到严厉的苛责了。那理由是难以辩解的：「为什么雷尧那一组能完成，你们这一组只完成一半？」

但是，我们已顾不上那么多，且回去吃了饭，休息一下再作计议。早上同来的六个人此时只剩下五个。拖着沉重的脚往回走，走出炼焦场的出口一百公尺以外，我猛然回头向焦场望去，炼焦场在夜色中呈现火红一片，各个炼焦炉都争着从那些蜂窝窝状的出气孔中，将数尺长的火舌喷向夜空，交织成了一片火海。

这是白天所看不清楚的，难怪身临焦炉之上便感到灼热烧身，煞似西游记里的唐僧过火焰山，可惜肉眼凡胎的我们，却要从那火烫的炉中取出焦炭来，这不是在火中取栗一般么？

到了食堂，第一个动作便是取过脸盆去盥洗间洗脸，先让自己从煤灰的捆绑下解脱出来，用力擤鼻涕，擤出来的全是黑糊的炭粉。耳朵里也塞满这些东西，两盆水洗下来，水已己是黑色的，解下来的口罩还不敢洗，晚上加班还要用。用力的将灰拍掉，留下口腔处一圈黑黑的印圈，来不及去想，吸进肺里，吞下肚里究竟有多少污物？干这种活真像被夺命一般。

借着取饭菜的机会，打听昏倒在焦炉上那人的情况，说他在医务室，暂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肚子里虽然很饿，却更感到口渴。狠狠地灌下一大盅开水，胃液便被冲得淡淡的，面对着饭菜却不想吞，我呆呆的坐在那里发愣，大家也呆呆地坐在那里，平时的话匣子今天关闭了。

上阵第一天，彼此都对这火中取栗的活感到害怕。想到雷尧那个组已经完成任务，那王书记说什么也要逼我们去加班。又听见刘汉光在那里的咒骂声，吃过晚饭五个人蹒跚着重新回到工地。

「大跃进」以来，白天黑夜，连续的守着工地已成了习惯，不管其效果如何。官话曰：「昼夜加油干，一天等于二十年。」就是病倒了，死也要死在工地哇。好在炉温暖，虽已十一月的冬天，穿着件夹衣蒙头大睡也不觉得冷。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在那一夜里守着这炉要命的焦炭，磨蹭了整整一夜。

白天出完了焦炭，晚上还必须全体加班，去空出的焦炉上运煤炭「造炉」。任务虽调整，出焦的劳动仍是一个难以胜任的工作。即便是炉子完全熄火，打开以后，那股带着浓烈煤气的灼热气流，令人窒息。

为了完成任务，白天几乎不敢休息，付出大量汗水以后，胃口极差；下班后，煤灰依然塞满了我们每个人的七窍，堵死全身的毛细孔。尤其是，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完成那心惊胆战的造炉任务。

从洗炼厂运到炼焦场的煤炭，像一座长长的小山脉，堆放在炼焦场出口处的前方。从那里到小焦炉群，最近的大约三十公尺，最远的足有一百五十公尺。每一炼焦炉的炉面都高出地面两公尺左右，用长跳板搭在上面，以沟通地面和炉子之间的高差。

两个人从堆放煤炭的地方满满装上一筐煤，然后抬着这上百斤的重量绕过高低不平的场坝，最后还要踩着那跳板摇摇晃晃地登上炉顶，将煤炭倒进炉膛才算完成了一趟。对于容量五吨的小煤焦炉，足足要抬足一百箩才够一炉。

两个已在白天出焦时耗尽了体力的年轻人，抬着满筐煤炭，在昏暗不明的炼焦场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前进，稍不留神，两人中只要有一人被路上的一块石头绊倒，那么两个人就会连带那满筐煤炭，跌倒在路上，最轻也要擦破表皮，跌伤韧带。

脚上已经因疲劳缺乏稳力，加上光线黯淡，跳板摇晃从高的跳板上跌下来可就不好玩了。如果人跌伤后，随之坠下的那一箩煤正好又压在受伤人的身上，那么其后果就更惨了，那是有性命之虞的事。

偏偏为了增加「大跃进」的气氛，每到晚上，煤窑出口处的高音喇叭便不停的发出鼓噪声。

进行曲刚刚停，便是一阵阵催命似的喊叫：「五号炉已快装完了，其余各炉加油！」「八号炉怎么掉这么远，赶快跟上」之类的吼叫喊个不停。

我同刘汉光对抬，他在扛绳的位置上耍小心眼儿，虽然我们争执着，但也不停地提醒对方，大家都已十分困乏，加上漆黑的路又被耀眼的炉火晃花了眼睛，跌倒是常有的事。每次跌倒，他都要朝着喇叭的方向诅咒道：「夜班饭吃了不消化是不是？有本事你来试试。」

晚上过了十二点以后，整个的脑子便会不由自主的停顿了指，脚上往往不听招呼的直打「醉拳」。抬着沉甸甸的煤，有时两个人会突然的停下步来，我有几次在后面听到抬着杠，他清晰可辨的鼾声，便索性叫醒他，两人干脆就倒在炉旁呼呼大睡，直到被人从梦中踢醒。

这就是狂噪的「持续第二年大跃进」的最后时刻，我们就是担负着这种有毒的、高强度体力消耗，也是高度危险的劳役渡过了一九五九年最后的两个月。

幸好，托老天保佑，这种带着生命危险的劳动也仅仅只有两个月，就在这两个月中，几乎人人身上都挂了彩，明显呈现中毒的人数占了一半。万幸的是，还没有发生手足致残，中毒丧命的事。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我们这六十余人难保不会有捐躯丛林的悲剧发生。

第二年即一九六〇年春天，留在丛林的六十余名同学和两位老师，集中到广元坝农场，在广元坝农场，学校分别为三十七名同学摘了帽，并回到重大，算圆了他们复学梦。

不过，这两年的监督劳动倒真使他们成熟不少，原先对共产党的迷信，终于在所见所闻中矫正过来。只是迫于压力和自己前途命运的考虑，而把这些所见所闻暂时的隐瞒在心底里。

他们虽然复学了，却永远留着「磨难的烙印」。在以后不断地掀动阶级斗争和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依然是「运动员」。

挨批斗，入学习班，游街，从来没有断过。其中因承受不了这种侮辱而自杀的就有好几位。

例如一九五九年第一个被活活踢死的颜亨楷，那时我们刚下农村，分散在农家，大家又互不通气，直到后来才知道，其经过的情节至今都不清楚。

一九六〇年因无法忍受非人虐待。在厕所里悬梁自尽的尹安民，便是我进了南桐看守所后发生的事。

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仍为坚持其一党专制，而隐瞒这段悲惨的历史，将它轻描淡写为「极左」思潮的危害。

而我们这一代可悲的受害者，仍慑于专制主义的淫威，还不敢公开揭开这一页。

不过，我们终将在中国的历史上翻开这一页，面对着这段历史史实。我们中当年受残害的人将以毛泽东罪恶的见证人，等待着正义的法庭将罪魁祸首推到历史审判台上的一天。

「向征夫之前路，恨晨光熹微」（归去来辞）

一九六〇年春天，由于冶炼出来的是一堆不能炼钢的废铁，丛林铁厂同全国各地一哄轰而上的小土群高炉一样，被迫关闭。

重大「右派」同学离开丛林去广元坝农场集合的那天，炼铁厂的几个工人，指着那些耸立在后山坡上望天长叹的小高炉，摇头叹息道：「那是花了好多工人、老百姓的血汗干的『空事』呀。单单为建立这几个炉子而损失的树木，就是几十年也长不成原来那样了啊，真可惜。」

然而，当年大吹大擂建立这些小高炉的策划者、组织者、督战者，现在却一个都见不着了，他们兴许认为他们不但没有任何责任，还会在以后的个人简历表上填写上这一段「光荣的历史」，说自己如何付出了好多不眠之夜和心血，为绘制三面红旗的「壮举」而贡献了一切。

在即将离开丛林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在用心地思索和总结这一年零七个月，而我却因那本在「反动日记」被人发现，成为又一个脱离这个集体的游离份子，被押到新的地狱里。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被鲁召押送到南桐矿区看守所。

### 第三章：\*\*监狱归宿\*\*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两点钟，鲁召叫我将行李收拾好，同他一起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来不及同朝夕相处的伙伴告别，他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目送我上车，也不知该向我作怎样的表态，因为实在不知道，这是临时的调动或是分批离开南桐。他们不知道，我就此与他们分别了。

车刚开动，我便怯生生地向鲁召问道：「把我调到哪里去？」他看着我淡淡一笑，从那笑里分明泛出了一丝可怜，只说了声：「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我在晃动中昏昏睡去，不知走了多久，只听见车窗外面有人在喊：「万盛到了。」

万盛的市容于我已无任何兴趣，我拎起背包和行李，跟着他就像一只拖着去屠宰的羔羊。当时，我根本没有被逮捕的预兆，我想知道的是，我究竟调到什么地方去。鲁召看着我天真的模样，好像是跟着老师去上学一般，所以一路上对我非常放心。

我跟着他来到一处绿茵覆盖的土墙门口。

鲁召独自走进了办公室，将我一个人留在哪里。我将自己破烂的衣物和「行李」放在墙边，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候了足足半个小时。

突然，监狱的边门打开了。两名警察吆喝着从门边涌出来的十几名光头囚犯，他们一律穿青色囚衣。我猛然想到七年前，我在北碚看守所远远看见那坝子里也是这般模样的人。一个信号才迅速地闪过了我的大脑：「我被关进监狱中了。」由是我想到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下狱了！

倘若在两年前我会惊得全身颤抖，但经过这两年的磨难，似乎有一种久临其间而不觉其险的感觉，脑子里还浮动着大炼钢铁时种种恐惧，而今脱离那里反而感到轻松，认为随便往哪儿送，都比丛林的炼焦场好。

#### 第一节：\*\*我被糊里糊涂带入看守所\*\*

大约半小时以后，鲁召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并不与我「告别」，便径直从我们刚进来的那个门走了出去。

到了此时，我才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心中再次泛起一阵悲哀，又过了二十分钟，我曾在逮捕杨治邦的大会上认识的丁户籍，把我叫到办公室门口，对我全身上下来个彻底搜查。他脱下了我的棉衣，仔细摸完了棉衣



上的每一处缝线和疙瘩，并将它同我的破皮箱打成一捆，丢进了一个标着「保管室」的小屋。然后，有人给我送来了同老犯人们完全一样的青色棉衣，穿上后叫我进到办公室，坐在一张小板凳上，询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进来前的「工作单位。」

当问到因何故被押到这里时，我自己都不知该如何回答，我莫名其妙的按了手印。接着，那位自称姓王的干事，带我走进了阴森的监舍巷道。那巷道均布着两排铁门，每一道的门上留有一个可以左右滑动的小窗口。他将我带到巷道右侧尽头的一道铁门旁，拉开了那道门上滑动的风窗向里张望。

王干事用命令的口气向我交代待：「今后你就住在这间舍房，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在他们中谈监外的事，也不能用你自己的姓名，只可以用自己的代号，你的代号是四一九，除了反省交待等候提讯，你不能同他们谈论与之无关的事。」

交代完毕，打开铁门，我低着头跨了进去，迎面扑来一股霉味和汗臭夹杂的浊气。身后哐当一声，铁门关上了。室内很暗，除背墙上两公尺高的地方，有一个十公分见方的窗口投进一束光能依稀看到室内的概况，还看不清里面住着几个人。

我站在那里，闭眼定了定神，大约两分钟后，我看清这是一间大约十五平方公尺的桶子屋，没有床，门口的进口左侧放着一个马桶，从进门的左墙角开始，地上垫了一圈大约有两公尺进深的稻草，一直铺到靠门右边马桶边。对着门的地方中间地带留着一条长约两公尺、宽不到一公尺的空地面，上面放着鞋。

从右边墙角开始，依次排坐着五个人，都盘腿而坐，每人的身后都垫着一床破烂被子。我呆站在那里，五个人用一种新鲜而警觉的目光打量我。

过了一会儿，地铺中间位置上，一个人从铺位上慢慢站立起来，缓缓向我靠近，发话问：「哪来的？」我因为陌生而防备着，加之两分钟前刚进来时王管教的交代待，所以没有回答。

冷不防对方伸出一记快掌，重重打在我胸口上，我毫无防备，一个踉跄，顺着那拳风的方向跌倒在马桶边。我正要地上爬起来反抗，其余四个人一起吆喝起来。

打我的那人紧逼一步，捏紧着拳头在我的眼前晃了晃，恶狠狠吼道：「既然进来就得懂规矩，从现在开始，你就睡在这个位置，没有我的同意不得移到任何其它位置上。」我只好就地坐下，一声也没吭。

我默默地坐了几分钟，忽然觉得脚上涨得难受，关节酸软，便在自己的踝关节上面的「穷骨头」捏了一把，却是软绵绵的再也弹不回去了。

自从炼焦炭以后，我就开始患水肿病。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回想那些晚上抬着一筐煤上跳板心惊肉跳的景象，事后感到害怕。

也罢，总算离开了那要命的炼焦场，躲开了那道鬼门关，可以在这儿睡上几天，恢复一下几天几夜没合上眼的极度疲劳。我闭上了眼睛，听五个老犯人说些什么。

其中一个说道：「明天就过大年了，家里人怎么还没来接见？」另一个答道：「这年头家里人都没得吃的，哪里还有东西往这里头送。」再一个接着说，「再怎么讲，我工作的单位也要发两把挂面吧。」

听他们对话知道五个人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农民或工人，他们也许还不知道监墙之外，公社的农民每天只分给六两黄谷，工人和城乡居民每月十八斤的口粮中，还要抠一斤出来「备荒」。

经他们提醒，我才恍然想起，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还真没想到，一九六〇年春节我要在铁窗里度过了。自从下乡改造以来，我的脑子里常处于空白状态，有时连自己的年龄和出生年月都记不起来，最开始在学校里受到的强烈刺激，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消磨，使受到重创的大脑处于休克状态，忘记了一切。

这种忘掉过去的自我休克，使我整个神经处于麻醉状态，无论别人怎样吆喝、斥骂、公开的撒谎、肉麻的吹捧、黑白颠倒、对弱者的欺凌等等，全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就连什么时候过年，这种儿时从腊月初八就掰着指头算的日子，都忘得一乾二净。

当我突然孤零零地置身在这阴森、陌生、四面铁桶般的牢房中，我那幅久未拉动的记忆屏幕便开始晃动起来。

白发苍苍佝偻着腰的老外婆，又彷彿在抚摸我的头颅，长呼着我的小名；可怜的弟弟算来已十七岁了，他的爸、妈和哥哥真对不起他，留给他那么深重的「阶级烙印」，使他怎么在这社会中生活啊。他现在是在上学呢，还是在社会上流荡，甚至被关进「少年管教所」之类的地方？

还有，爸，您此刻在哪里？我们一直都害怕来看您，您能原谅我吗？我现在也同您一样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我能与您相见吗？

自从我被划右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往家里写信，开始是因为我真不知怎么下笔，我被弄成这样，错在哪里？是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呀。至于今天为什么会被抓进这儿来，今后又怎样，我就更说不清了。

如实地告诉他们我是冤屈的，不是反而徒增了他们精神的压力么？如实告诉他们我已被关进了监狱，那不是逼老外婆么？上了年纪的人可经受不起这等打击的啊。

倒不如不给他们写信，隐去了我现在的处境，兴许对他们免去了无尽的牵挂。

母亲一定去重大打听我的下落了，当她知道我还保留着学籍，保存着一丝希望的幻觉，觉得「我会那天奇迹般的从学校归来，重新回到他们身边」，这样不是好得多么？而现在我进到这里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

### （一）看守所里的年夜饭

突然一声铁门的响动，幻影立即消逝。监房尽头的大门打开了，整个过道里顿时躁动起来，过道两旁的监舍里传出像一群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发出的窜动声，我们监舍的五个犯人也一齐站了起来。啪的一声，铁门上的风窗打开了，那个刚才出手打我的人，趴在刚刚打开的窗口上向外张望，室内昏黄的灯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亮的，后墙那窗口已是一个黑洞，无法判断此时已是晚上几点了，现在真的是饥肠辘辘，饿得难受极了。

过道里响起了一个长声吆喝的喊声：「大家听着，大年卅的年夜饭提前吃了，等会每个房出来领饭的人多派两个，有菜，还有汤。」

两分钟以后，我们监舍的房门打开了，三个头剃得发亮的犯人，一个挑着箩筐，里面盛的是容量两升的黑色盘子，里面盛的是一盘子饭，另一个端着一个大盆，里面是白菜烩着点点的肉丁；最后的一个挑着桶，一桶里面装的是汤，面上有油星，另一桶装的是空盘子。

我从打开的门中向外张望了一眼，与对面监房趴在窗口边的饥饿眼光碰了一个正着。大家几乎没有过年的欢悦，目光中透出渴望，这顿盼望已久的「年饭」，能否填够一回从未满足过的饥肠？

此时领来的饭菜已排成两排，整齐的放在那「铺」围起来的中间地带。我本能的伸手去领靠我最近的那罐，手还没有伸拢，便被三〇三一掌打回。正要向他理论，五个人又一齐向我吆喝起来，我只好垂手等着。

只见三〇三对每一个罐子都仔细的掂在手里，看了又看，然后不慌不忙的将这些饭菜端给了其它四名老犯人。剩下最后一罐，他取过那个要来的空盘子，取出准备好的一块竹片，用迅速的动作将那罐饭分划成两半，一半倒进那空盘子，将剩下的另一半和那盅汤端给了我。

不明狱中牢霸规矩的我，无法忍受这种公开的欺侮。这年头饭菜就是命，这监牢中每天名分上的八两囚粮，摊掉吏耗、鼠耗、炊事员的消耗，落在这罐子里头每顿有三两就算很不错了。每天两顿、每顿三两、油荤全无，每顿吃喝完，对罐子里的饭迹都要用舌头舔了又舔，名曰舌洗。那时节，水肿病在狱中猖獗，几乎每隔两天，就有人被抬往监狱中专备的「太平间」。

我盯着他端过来的半盅饭菜，又看到他眼里一股凶光紧紧逼着我，我顾不得力量的对比，一股必欲拚命的力量，集聚在我的拳上，便出其不意的打在对方的胸上，并顺手去夺刚才被掖出来的那一半饭。就在那一瞬间，五个人一齐向我扑来。

三〇三喊道：「把他按倒角落去，免得弄脏了饭菜。」于是四人一齐起动手，将我按在左边那墙角里，铺天盖地的拳头向我身上雨点般落下。另一个人已将摆在地上的饭盅子挪到了三〇三铺位上。此时，我已完全失去控

制，不顾一切的挥拳踢脚。没有目标的回击。

正此时，监舍的门忽然打开，押送饭菜的王干事已经走了进来，叉着腰站在那里厉声喝道：「要造反不成？」

我此时已失去了理智，翻身站起来，也不向这王干事诉说起因，便猛地向那三〇三扑去。三〇三连忙应战，从他刚才的位置上抢步上前，两个人扭成一团。等到室内的人将我们拉开，我才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特别是鼻孔湿漉漉的，用手一摸，满手血迹。

王干事冲冲着我吼道：「鸡巴个大学生，狗屎不如的大学生。」

好在监狱中关久了的人已被磨得十分虚弱，经过刚才这番搏斗，双方都受了点皮肉伤。屋里暂时平静以后大家才发现，中间的那一小块空地上已水迹一片，空气里充满了臭味，不知什么时候，那门边左侧角落里的马桶被掀翻了，王干事捂着鼻子走了出去，五个老犯人连忙在门外过道里找到了一件破棉衣，便一齐动手将撒在地上的尿水沾干净。

幸好，盛饭菜的盘子安全地放置在三〇三铺位上。

大家端起了各自的那份饭菜默然无声地吃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我也顾不上去擦脸上的鼻血和手上的污泥，捧着自己的那份东西狼吞虎咽的吞下了，并且一如往常地把饭罐和菜碗底舔得干干净净。

此时，大家才平心静气相对而视，其实，谁都不是鬼，鬼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哪会抢人吃食？缺了牢食，关在这里面的人便不能活下去。正因为都不想变鬼，就只好为生存而争了，不知中国历史上监狱中曾有过多少这种记载。

像这种和平年代的大饥饿，滥及全国，因抢夺食物而发生的杀人事件甚至吃人的事，有史以来闻所未闻。鲁迅先生若能活到今日，他的《狂人日记》所撰写的人肉筵席必会重新改写。

以后的日子里。我才知道，新来监舍的人，头两顿只吃一半的罐罐饭已成不成文的「监规」。本来，任何朝代中新到监中的人，由于狱中的牢饭本来就粗糙难咽，加上初涉讼狱，难免心情难受，在开头的几天不想进食的并不是什么怪事。偏逢这「大跃进」搞出来的饥荒，加上刑狱滥施，每次运动后，监狱人满为患，原先只关一个人或两三个人的房舍，现在竟关上许多人。初来者，被牢头们吓服，牢饭减半，睡在马桶边闻臭气，又是新形势下的新情况。

没有进过监的人，被中共当局严密封锁了监内情况，不知道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监狱原来如此。

「团年饭」吃完，我在黯淡的灯光下，开始抚摸方才格斗时所留下的伤痕，轻轻将我的脸上和手上已结出的血痂抠下，因为没有水，肮脏的手脚只有对搓擦一下便可睡觉，只是那被打泼的尿水浸透了稻草的地方，可正是该我今天安息的地方，加上还没有领棉被，这隆冬季节的夜就难熬了。我忽然想到，一个人倘若遭逢我现在的处境，说不定会冻死或饿死，心中不禁哆嗦起来。

我对着门外的走廊呼喊：「报告。」还好，没过一会儿，炊事犯人依次挨着监舍来收吃过的空饭盅，我把浸湿的稻草抱到过道里，又在那里找到一些破布，烂絮重新铺好，领了一床被子，便将就着那还在散发臭气的地方躺下。

不知道因为刚才流血太多身体虚弱，还是因为天气太冷铺垫太薄，我刚睡下，全身一阵阵发冷，不停的打抖。便重新坐起身来，将被统里的棉絮翻出来看，那中间有一个盆口般大小的洞，只好重新穿上棉衣，裹着那被子睡下。

渐渐地，一切安静下来，我听见监舍外呼呼吼叫的寒风中，隐约夹着远方传来的鞭炮和锣鼓声，想到这国度中的公民们，哪一个都是在鬼门关下忍受饥寒的煎熬，谁还有钱去买鞭炮礼花？

那一定是哪一个单位，哪一级政府正在欢庆「大跃进」的辉煌「业绩」：人说鞭炮能镇妖除魔，驱晦气。

然而这年头怎么这么多倒霉事？而且每逢怪事便鞭炮大作，人民公社成立界牌的鞭炮不断；小高炉建成的第一炉又是鞭炮大作；粮食高产放卫星又是鞭炮不断，这是哪门子邪门呀？

## (二) 看守所见闻

第二天，王管教特别的把监规印成了许多份，每一个监舍一张，贴在监舍的门上，规定吃完早饭以后，由组长领读三遍。对那些繁冗的条款我已经忘记，唯独其中两条至今还记得：一条是不准谈监外的事，一条是不准相互交谈案情。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弄清楚了这五个老犯人各自的情况，这些人同那刚进来的农民一样，身世实在太简单了。紧挨着三〇三的那一个，年纪三十岁上下，原来是万盛公社某大队的仓库保管员，因为从种子库清理大春备耕的谷种中私自挪下了两口袋，被人发现，便以破坏大跃进的罪名下到狱中，等候判处。

第三名是某大队的牲畜饲养员，他告诉我说，公社的牛马饲养从去年国庆节以后就没有配粮食了，他负责喂养的两头耕牛整个冬天就靠发了霉的谷草和盐水维持生命。年老的那头水牛已经骨瘦如柴连站都站不起来，哪能再下水田迎春耕？而他的一家五口中，老娘和两个儿子得了严重的「水肿病」。妻子也久病不起，眼看一家人都要饿死，于是在一个晚上他宰了一头耕牛……

第四名则是为了殴打公社的民兵队长抓来的，他当时已全身浮肿，他说：「我们那个生产队连田坎上栽的芭蕉头都挖来吃完了，队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患水肿病。」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楚。「民兵队长却在寒冬逼我们到试验田去挖田。我说：『我都已水肿到肚子了，要我的命么？我不去。』那民兵队长提着绳子气势汹汹要捆我去，还动手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我想绝了，反正是死，便从床头抽出扁担向他头上砍去。」他就这样被抓进来，好在他出身贫农，不会沾着「阶级报复」与反革命挂边。

第五名是南桐矿区的一个井下工人，在六个人中他的个头最大，他为保命而逃，逃亡中砍伤了追捕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曾曾在丛林煤矿劳动过，他向我坦言说：「你是知道的，我们那点定量上半个月吃了就缺下半个月。」

至于那三〇三，他一直对同监的人绝口不提他本人的案情和身份分。给人一种假象，好像真的最听「政府」的话，但只要联想他对新来犯人扣吊命粮的那种残忍，便可知他对政府其实是阳奉阴违，虽然他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经过几次家属探亲，我们弄明白，他是万盛公社一个生产大队的书记，因逼公社的社员们出工和以旷工为由，克扣社员的口粮，酿成三条人命案，被公社社员告上法院。

看守所每天生活极单调，早上七点钟，过道里便响起了那个王管教的皮靴声，然后起床依次到院子里的水池漱洗，然后读监规，每天重复。

大约三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我们监舍关进来了一个上着脚镣手铐的年轻人，也许这里面关的这几个，还没有见过这种戴全刑具进来的犯人，我猜想，这大概是负有命债，足可以处以死刑的人。那人被关进来以后，三〇三被王干事叫到办公室，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上午九点钟开饭以后，王干事煞有介事的来了，宣布对新来的犯人进行「帮助」。这种取名「帮助」的会，同我在这两年里经历的斗争会完全一样，不过手段更为残忍。多半是让被帮助者在暴打中精疲力竭时，按官方认定的罪名在招供上画押。表面重证据，禁止「刑讯逼供」，其实是利用犯人「以毒攻毒」。

王干事并没有宣布那人为何被捕，又为什么上了刑具，只宣布了他的代号叫三一九，并反复交待了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随即要大家帮助被斗人认清形势，将自己的问题交待代清楚。

我望着他脸上四、五处青包，以及满身泥垢，那被脚镣铁匣擦伤后凝结的血痂，知道他在逮捕时，已挨过一顿毒打。

现在三一九站在监舍中间，颈项已经挂上一对早已准备好的铁桶，每个桶里装着四块砖头，铁桶一挂上，年轻人的背立刻弯下。三〇三走上去捏了一下他手上的铐子喝道：「进到这里就别再想耍花招，要想不再受皮肉苦，就乖乖的招来，免得爷爷动手」年轻人迟疑了一下说：「我叫刘青平……」

话刚开始，他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掌，他一个踉跄几乎跌倒。三〇三厉声喝道：「谁叫你说名字，你叫三一九。」周围响起了一阵呐喊。三一九继续说下去：「我是工人，收听敌台是事实，但我没有投敌叛国。」不等他说下去，背上又挨了重重一拳，又是三〇三喝道：「谁要你交待代案情，你要交待就向政府交待代去，不准你在这里乱说。」

由于水桶的阻碍，三一九艰难的侧过头去，惶恐地看着站在他背后的三〇三。在这种会上，他除了任打是没有一丁点自卫能力的，他确实弄不清楚在这里「交待代」什么？便怯生生问道：「那我该说什么？」颈上的重物使他身形扭曲，额上冒着冷汗。

「要你交待代为什么要狡辩，是想赖？推卸责任，蒙混过关？」三〇三吼道。看来，王干事对他交待代的就是这些了。

「唔，我没有蒙混，我没有抗拒，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投敌叛国，那是周书记强加在我头上的。」三一九涨红了脸，努力的把头向上抬，作出挣扎的姿势，所有的人马上站立起来，将三一九围在中间，你一拳，我一掌，像打排球似的。只听见铁镣在地上发出急速的金属撞击声，以及拳头落在三一九身上沉闷的回应。水桶猛然晃动，三一九终于站立不住，连同他身上的所有附加物，砰然的跌倒在铁门边！

大家住了手，三〇三走近一步，看了看满身伤痕，直喘着气的三一九，那水桶仍套在他的颈上，样子很像古时候套着刑枷，脸上黔字的死囚犯。那杀耕牛的走上前，替他取下了水桶后，三〇三便又将他拎了起来，又是一阵吆喝声，第二次站稳以后，又重复着刚才的那一过程，重新套上水桶，喝令交待代……站起……打倒，一直重复了四次。

最后，我再打量这年轻人，血顺着颈项向下流着，手、脚到处是血。这才将他颈上的水桶拿掉，让他站在中间反省，其余的人再不理睬他，按照老样子扯开了各自的龙门阵。

使我感到不解的是，这些本身已十分不幸的老犯人，他们还患着水肿病，除开那工人外，无一例外的都对那三一九下着拳头，这些同三一九素昧平生、无怨无仇，怎么忍心对这么一个遍体鳞伤的人下手？难道中国人真有那种从别人的痛苦中寻找释放自身的怪僻么？

三一九的「帮助会」一直开了三天，直到三〇三将他从地上再也拉不起来，瘫倒在地上为止。三一九度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三天。最后王干事再次提审三一九。这个遍体鳞伤的年轻人终于在「投敌叛国」的供词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明白，如果不签字，等待着他的将是前三天的继续。

签字后，三一九回到他所睡的那个马桶边位置，再也没有人去理他。两天后，他被调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被转移到了哪里。唯独我却始终没有忘记过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担心他是不是会被处决。

两个月中除三〇三和我以外，大都已调出，同时又陆续地抓进了不少新来者，他们大部分都是附近公社的农民，绝大多数都因饥寒所迫，有为抢一小袋玉米而杀人，甚至为抢一碗粥而酿出人命来的，更多的是因为水肿而抗工发生的各种情节的斗殴、杀人，从他们口中知道，农村中饥荒越来越严重，水肿病越来越烈了，用他们的话说：「曾祖父的那一辈，从湖广遭水灾逃荒来此，便以为这是天府之国，逃荒来时也吃过观音土，但还从未听说这天府之国有遍地饥荒的事，这是什么『灾』啊？」

公共食堂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悄然解散了，许多人家因为锅中无炊，懒得去找回一年前被砸碎的锅盆碗盏。自留地重新回归农家了，但面对着这荒芜的土地，上哪去找菜秧、种子来「生产自救」？观音土成了普遍的「食物」，有的农家整户整户地死于无法救治的「水肿」病，真的是「干村霹靂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绝境。

到了五月份，南桐看守所已从巷道里抬出了十来具饿殍。不过，进来的人反倒说：「这儿比农村好多了！这儿好歹每天还有两顿吊命饭，农村里芭蕉头都挖来吃完了。」

### （三）人民公社是农民的坟地

五月中旬，接连下了好几天雨，天气转晴以后，有一天，丁管教挨着监房的次序点名完毕，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将人关进监舍，在背后的操场坝洗水池放风盥洗后，他手里拿着点名册，宣布凡点到的人，马上到篮球场集合。我们监舍那天除了三个刚进来的人，其余五个人全都在列，其中也包含了我。

丁管教将我们整好队列，依次报数，一共四十个人。他向我们宣布：「今天下乡，支持农业，帮助公社割麦子，每人的饭每顿多加一两米，多加一瓢菜，但是必须完成任务才能回来。」他顿了一下，补充道：「政府相信你们，但也还要把话说在前头，如果遇到老乡，不准同他们交谈，不准单独行动，谁如果想开溜，打死了该背时。」接着炊事员便给我们送来了加班饭。

算来，我已在这监舍里度过了四个月，胃还真有点萎缩，加班饭吃下去，倒也有一点「饱」觉。心中怀疑「公社劳动力缺到这种连关押的未决犯也要派去的程度了么？」

大家吃完饭，重新排好队，四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已守候在看守所的大门外。

跨出看守所大门，没走上两百公尺马路，便是农村的机耕道，那街道两旁半年以前贴出来的标语，纷纷已被寒风撕去，只剩下墙上用墨汁刷出来的标语。

广播喇叭也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声音。过路的居民见到我们，似乎习惯了，并不围追「看稀奇」。

出了场口，我们走了一段机耕道，便踏上了蜿蜒依附于丘陵的小道，队列只好拉成单行，警察们不断地向那些掉队的人发出吆喝声。

这一天适逢初夏，又是晴天。四个月的桶子监生活后，乍然出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精神为之一振，我拼拚命的大吐大吸，想把四个月来，在牢房中存积在肺里的污垢全部吐出。

四个月来没有像丛林那样消耗大量体力，但吃进去的那点营养大抵也只能够维持着吊命，刚入狱时的水肿病并不见好转，还没有走出一里地远，手脚发软，头顶上的太阳射得我眼睛发黑，心中也开始发慌，便拼命的掐着人中穴。但腿已不听使唤，渐渐掉下队列，任凭那丁管教怎么吆喝，也赶不上大队伍。前面的队列不得不停下等，就这样，拖拖拉拉足足走了一个小时。

转过一个山坳，眼前呈现出一弯麦田，四名警察早已拣了那最高处的一个山头上，分作两起撑起了带来的大伞席地而坐，将枪口对准了下面的这四十个人。

一个身穿土布补疤衣物，头上裹着白布头巾的农民打扮的人，早已站在那最上面的田里，身旁还放着一个背篋，此时他走到了丁管教的面前，指着那背篋说：「那是四十五把镰刀。」他们俩交接完毕，那农民顺着刚才我们过来的路上，很快的消失在山丘后面。

接过镰刀，我看着眼前的这弯麦田，不禁想起了一年半以前，我们在界牌公社由那里的书记和社长亲自指挥的杰作、听说夏收时连种子也没收回。只收了一把细细的麦草。

眼前又逢了夏收，面前这弯麦地怎么看也是荒凉一片，在荒芜的杂草里稀稀拉拉的麦穗像是已经收过，但没有收净的一片田野，只不过没有留下麦茬罢了。

下到田里定睛细看，需仔细辨别才能看出麦秆来，不过那距离与前年的竟完全相反，不是三寸间距二寸退行，那窝与窝之间足有一尺多远，走到田里，那些在荒草之中的麦穗，已倒吊在草丛里，需要仔细辨认才能找到。

那时，饥饿的农民出工后，便各寻静背的田坎屋角里睡足了大觉，醒来便胡乱的撒些种子在田里，到了中耕除草，大家排成了一排像散步似的在那大田里「过」一趟。有的田「种」下后就从没有人去看过一眼，碰到公社偶尔检查工作的检查团，一面推口太忙，一面还虚报这三锄三施。

不过，今天对我们来这儿收割的四十个人，倒是一件幸事，要不，这么大一弯足有百来亩的麦田，怎能在一天之内收完？

丁管教把所有的人分成四个大组，每组占一块田，十个人一字排开，一边像拦河里的鱼似的搜索着前进，在草堆里割下那稀稀拉拉的麦草，正因为是「寻找」，不会蹲下来使出骑马桩刷刷的割，倒像是排着队散步似的同那些麦秆捉迷藏。

割下来的麦草难成一把，一块两亩田，稀稀拉拉的东一堆西一堆，集中起来连带着麦草，捆不起一大挑的。

忽然有人发现，那田坎上还按着老庄稼的模式种着豌胡豆，只是因为草更加茂盛，完全遮去了田坎边的豆秆，需要扒开草丛，才能看见那些隐藏在草丛中的豆秆，豆秆开着紫色的小花，结着一两片绿油油的豆荚。于是大家争着靠田坎去割，一边顺手摘下那隐藏在草里的豆荚。

找到后，迅速摘下，不管是黄的还是绿的都塞进自己的嘴巴，那股清香和甜美当然就比「精神牙祭」中的肥大片实在得多。丁管教在山顶上连声喝斥，于是，十个人中便会有一人出来指挥，将田划成十段，每个人包自己

那一段的麦秆收完，也包那一段田坎里草丛中埋藏着的美食。

今天真算争气，还没到中午，这一弯田就已收完了一大半。丁管教走下已经割完的麦田检查，也说不出哪儿还没有割完。便吩咐大家坐在田坎上歇息片刻，大家便就地坐下。唯有几个特别好动的小子，还在那刚刚割完的田坎上，不断地地寻觅着漏网的豆荚。

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哭泣声，由远而近，几分钟以后，就在右侧刚才我们过来的山腰小路上，依次地冒出了几个人头来。哭声越来越近，到挨近了方才那警察撑伞放哨的地方，已看得分明，前面是两个年轻人晃悠悠的抬着一个担架，那担架上躺着的分明是用一床竹席裹着的死人，后面跟着一老两少，都穿着已经破烂的白衣服。头上裹着的白布长带在风中飘荡。

走近我们，一个警察上前拦阻盘问，抬担架的见阻便放下了担架回答。

「怎么在这里埋人？」

「公社规定的。」

「什么时候死的？」

「前天晚上。」

「怎么死的？」

「水肿窜上了胸口，破了皮。」

这几天在狱中不断传来农村里一家人都饿死的消息，今天正赶上我们亲眼目睹了。

「埋在哪里？」

「你看，就埋在前方。」顺着那抬担架人伸出手指的方向，果然，就在那山梁左侧，距那哨位不过五十公尺的地方，密密排着几十个新垒起来的小土冢。两个人重新抬起了担架，吃力的绕过哨位。

我们的目光紧紧地跟着这支送葬队伍，看得分明，那一老两少都是肿眼皮泡的，想来，不光是因伤心而哭成那模样，因为就连那两个抬担架的人也是浮肿着脸。送葬的人中，一个老者走出来指划着，其它几个人就在近处，七手八脚的挖出一个坑洞来，大家比划着又挖了一会，等到那洞足以安放那裹着的竹席以后，便将那竹席抬进刚才挖好的洞穴中。

两个孩子从坐着的地方爬起来，扑向这新的坟堆……

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左右，祖孙三人才相互搀扶，蹒跚往山坡来的方向走去。那老奶奶还在路上跌倒倒了两次，我目送着她那摇摇晃晃的身躯，头上裹着的白布巾在春风中抖动，好像在为她的儿子撒一把纸钱。

恐怕他老人家过不了几天，也会来这儿，躺在他儿子的身边安息。

我们这四十名割麦的人，大多数都是附近的农人，兴许其中还有死者相识的好友亲朋，看到此般光景，心情能不沉痛？同病相怜，自己的家人也包括了自已，不是也在同刚才那死者和他的母亲一样，同赴此难么？

当我们目送着这一老两小的身影消失在这山林丛中以后，大家已无心言语，快快的收拾完最后一块田，丁管教下令收工，此刻，他的心情如何？从他的不吭一声便知一二。人心都是肉长成的，就是他的家未免能避此劫难。

警察们已收下岗伞，我伫立在那山岗上良久的回味着刚才目睹的一幕，不禁回过头去望瞭望不远处那刚刚摞起的新坟。

这种草草浅葬，没有灵柩，坟茔和墓碑的无名死者，同恶战沙场马革裹尸的弃尸又有多大区别？此刻的死者正面对着这一弯弯祖祖辈辈赖以孕养的土地，面对着这一片荒凉吝啬的土地，去向谁诉自己的不幸啊！

苍天将他变为人类，降生到这里时，就同时赐给了他面前这一弯弯安家乐业、繁衍子孙的乐土，他们的先祖们一代代耕种在这里，并不介意当今的皇上是谁，也不管这些统治者如何争夺江山和荣华富贵，只要他们不被当成炮灰抓走，或是把他们从这片土地上驱赶他乡，他们仍可以忍受这些爷们土匪的强惩暴敛，依靠自己的勤劳，精耕细作换回这片土地丰厚的回报。

可惜，这一代的儿女们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从什么时候起一个曾使他们狂热追随的魔王，将他们引到眼前的这种绝境？迷幻式的「社会主义」，使他们眼睁睁的看着这片沃土连年荒芜，连年歉收。最后，竟昏头转向跟着大跃进的大兵团，像着魔似的抛弃了这片土地，让它在荒草中哀叹！

此时，我仿佛听见了那死人，面对着面前这片荒芜的土地，当着苍天的一番对话：

死人说：「土地呀！你怎么不负起苍天交给你的神圣职责，继续用你丰美的庄稼抚养我们，而留下这片荒地，让我们挨饿、直到死去，回到你的面前来？」

土地却在荒凉的草丛里回答：「唉！我原是冰凉无情的泥土，仅仅靠了你们祖先勤劳汗水的浇灌，才从我们身上长出丰盛的粮食，也有了我们盎然的生机。苍天将我们赐给你们，原是回报你们那番诚恳地投入，而现在，踩在我们身上，却不给我们施肥除草，我还能拿什么来回报你们？」

死人跪在地上对着苍天喊道：「老天呀！你为什么让我出生，却给我饥饿？把无穷的天灾降临给我们，让我们活活的饿死而你见死不救？」

苍天震怒了，扯起了浓浓的乌云，擂动起沉闷的雷声，恶狠狠的向着那下跪的人怒斥道：「你这软弱的懦夫，可悲的族类，世界上怎么偏有你们这种人，不看天时，不讲人和，不究地利，不老老实实的干你的活，却听凭着那独断专行的人世魔鬼，向你们胡编天堂的梦幻，而你那可鄙的人格和鼠目寸光，甘愿听凭那魔鬼的驱使和摆布，去干残害同类的勾当，而今大错铸成，饥荒难逃，却还在责怪我，以为我是哑巴，能替你担当所有的恶果？」

我们回到监舍，天已黄昏，大家又聚在那篮球场上，分食着炊事员提来的豆渣煮的加班稀饭。在那饭桶边免不了争多论少，中国人对那瓢稀饭的多少向来看得很精确，也很认真，谁的瓢打满一点，谁的瓢打浅一点都会引发争执吵架。

我喝下了稀饭，同大家一样，辘辘饥肠得到暂时满足。大家抓紧时间洗了手脚，便各回各的监舍，劳累了一天大家很快睡下，不到八点钟，监舍里便响起了一片鼾声，然而不知为什么，躺在铺上的我，脑子老翻动着白天割麦所看到的那坟堆，尤其是那老态龙钟的老奶奶和她的孙儿……

「人已闭门鸟已栖，黄昏冢畔孤儿啼！」我又联想到我的外婆和弟弟，不知道他们能熬过这灾难的岁月么？

「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

#### （四）初悟与反抗

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的颂歌，离开了「作假」便唱不下去的，不过，这假也实在太离谱，那老天爷也真怪，从夏初开始便把暴雨没头没脑的往南方河流交错的沃土上狂泻，使那里水汪一片，庄稼荡然无存。接着又跳过广大的丘陵山川，又没头没脑的把暴雨狂泻到黄河流域，使那儿黄汤一片，哀鸿万里，唯独就欺侮那山陵田野不给一丝雨水，来了个连续一两个月的连晴高温。

这玉皇大帝的雨司、雷公们真够开毛泽东的玩笑，故意同大跃进过意不去。再说，那排成长龙一般，将一盆盆水从山下递到山上去，能解得了几块田的渴？救活几棵庄稼？真来了那么大的旱灾，就凭这种可笑的办法行得通，救得了灾吗？如果这也叫人定胜天，不是愚弄中国百姓么？

耳听那三〇三叨叨絮絮的读报声，恍惚中明白那报纸说瞎话的原因。看透了那满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根本利益的中共，连百姓整户整户的饿死都毫无动容，毫无自责，毫无歉意，往「天灾」上一推了之！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看到这共产党的真正面目，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将我步步紧逼到这种地步，一点都不是「家庭出身」，而是这位混世魔王为独揽皇位，复辟专制而采取的卑鄙手段，我同全国百姓无非都



是这场「政治试验」的牺牲品。一场政治骗局的炮灰！

就在这个时候，王管教开始了对我的预审。我既是莫名其妙的进来，当然面对这无法用语言沟通的审讯者，不知怎样来回答他向我提出的莫名其妙的问题。向他交待代什么？偷人抢人，投机倒把，杀人放火，还是组织暴动？我招惹了谁呀？至于提出那本「日记」就更令我反感，能说明什么？造谣、谋反？到了这种地步，将自己扭曲得来连替自己辩说的勇气都被剥夺了，只会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以泪洗面，以文舒哀，这算哪门子事啊！这也叫「罪」么？

「交待代一下你的罪恶。」

沉默。

「你听到没有？讲讲你写的那本日记的动机和目的。」

沉默。

持续了足足十多分钟的沉默后，那姓王的忍耐不住了，向我递过来一摺纸，「那么，你写吧，把你的犯罪连同认识全部写出来。」

在那个年代里，「罪」，原是一顶被人捏在手里玩弄的帽子，例如，据实申辩，可以说是死不悔改不低头认罪；揭示真相可以被说成「以点带面，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若说「那卫星是假的，那公社报的产量也是假的」便是诬蔑，破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至于说道：「大炼钢铁劳民伤财」，「那报上假报丰收，老百姓饿得吃草皮树根」那就是现行反革命，至少要判十年刑；若说那人民公社化造成农民大量饿死，那么就只有枪毙有余，死有余辜了。

若说「共产党太霸道太专制，该讲讲民主」那么就等着挨斗、挨打、坐监、枪杀吧！反革命帽子反正不花一分钱，帽子公司有的是，斗争会总要不断开下去，不然凭什么来震慑老百姓？监狱拿来干嘛呀？

而此刻的我已被压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两年来，我一直都在挨打，受侮辱，连替自己说句真话的权力也被剥夺的处境。我说：「我没有替父亲翻案，也没有希望国民党政权卷土重来的想法。」回答的除了斗争会、除了拳打脚踢外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这样压抑自己，强迫认罪，兜着圈子打诳语的日子，是一种精神肉体同被煎熬的苦日子，我说真话便是攻击，我说假话良知又不允，这般苦恼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回到监舍，整理了一下思路，我鼓起勇气，提起笔来，在那位王管教所给的「交待代材料」的白纸上写下：「浅谈三面红旗之所失」的大字标题。

我毕竟是学生，虽然患着水肿，但血气依然亢直，又没有太多的坛坛罐罐顾忌，可惜，我的社会知识、历史和文学的知识、阅历和写作能力都受限制，在这些方面我只不过中学生的水平。一种逃避精神折磨逼出来的勇气，一股存于天地间的良知所鼓起来的勇气，这何尝不是中国人良心道德的啼血和哭泣。

这一篇写成，还保留了一个幼稚的青年学生对中共当局的幻想。作为被动客体，作为跪在庭下受审的「罪人」除了呼冤，并寄希望中共领导能体察民情，纠正「错误」，就别无奢求了。

我原想，在事实面前，用一种诚实和真情未必不会唤起当局者的响应，当事者迷，说不定百姓遭受的灾难，中南海里的决策人并不太清楚，要不然怎能忍心让自己的百姓受着这水深火热的煎熬？

但是，我是完完全全的想错了，我把中共理想化人格化了！我这一篇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成了判处我「十八年徒刑」的依据。

对于王管教这是一份不打自招的供词，只要随便的摘下其中的句子都可冠以「恶毒攻击党的政策」予以判决。只是这毕竟不像是一份案情交待代书，关了这么久，不但不「悔罪」「认罪」，竟牛头不对马嘴的阔论起中共的大政来了！

看守所不是「反革命」清谈讽政的场所。大致出于这种原因，他们认为必须给我一点颜色看看。两天以后，他提着一付洋铐子，满脸怒容的走进了我们监舍，大声的责令我起立立正，并将洋铐子狠狠扣到我手上。

这是一付特制的洋铐，铐子里圈贴着被铐者手腕的地方，有几处尖利的倒刺。随后，他便将各监舍的组长统统调集到这监舍，于是，我成了重点批斗的主角，被推到看守所的斗争会上来。

狱中被斗虽然是第一次，但我已看过几次了，无非是吊水桶和挨打，这我知道，早已作了精神准备。我明白，不过这一关，便不能在精神上彻底解脱自己，所以斗争会的开场很利索，若不是因为双手被铐住，我会自动地去提那个足有二十斤重的桶，套在自己的颈子上。

这样做当然会减少参会者故意营造的紧张气氛，而使会议变得「轻松」一些。其它的方式我都很熟悉，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还要因挨打大喊大叫，使得这种用刑，达到预期令人恐怖的目的，只是对这帮子赴会的无赖，最好的方法是闭口不答，装聋作哑。不就那么气势汹汹的几下，是做给王干事看的，效果一经达到，大家就不再纠缠，而王管教如果离开，就等于散会。

使我没有估计到的是，三〇三狠命捏紧我的「洋铐子」，捏紧之后，内圈上的铁棘便深深地扎进肉里，洋铐子的自锁作用，捏紧之后非钥匙是无法松开的，铁刺扎入肉中，同铁钉子钉入十指间相比功力绵长而有力，钉指尖往往因创痛而使人昏厥，人一昏，便失去了令受刑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效果。

这铁棘扎入肉中却是一种长痛，特别是晚上睡觉，当手腕一动，那铁刺就像一把把扎入肉中的利刃，在剝我身上的肉，让我痛彻心脾。人既不会因一时剧痛而昏死，就只有提着神经来体验这种毒刑的功力。整个夜晚，那扎入肉中的铁棘合着心跳的节拍，一下一下地撕裂着清醒的神经，头上沁出了一颗一颗的冷汗，别说少顷安息，就是每一秒钟都在数着过，直到痛昏过去……

王管教和他招来批斗我的那一帮无赖，我可以置之不理，这扎入我肉中的手铐却使我痛不欲生。后来每想到此等酷刑，用心极妙，用不着下油锅、烧烙铁，劳神费力，只需轻轻一捏，便可以使人整夜，乃至持续几天几夜的疼痛不堪，实可作来俊臣《告密织罗经》之近代刑罚新发明而补入「刑典」。

如此用刑，几天几夜下来，我双手贴着手铐的部分便起了一圈血泡，两只手连着手臂已肿成了馒头一样，浓血顺着手铐往下滴。到了这种时刻，我便横下一条心，大声吼骂，痛斥刽子手的法西斯手段。到了晚上，不断用脚和那滴血的手铐去砸那铁门，想借此痛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

那几天整个监舍都在聆听我的哭喊和咒骂。开始，三〇三还站起身来踢我，但我拼拚命地吐他的口水，他自知没趣，看到我已近似发狂的样子，便不再理会我，任我在深夜里发出令人心悸的叫骂和吼声，直到我自己都吼不出声来……

三天以后，被折磨得不像人形的我，终于被解下了那副手铐。解下时，那手铐上，满黏着从我的手颈上撕下的肉屑。整个手颈已经血肉模糊，并从溃烂处发出阵阵带腥的恶臭，而手颈的周围结出了一串串像葡萄一样的水泡。两只手已发烫，那医生皱着眉头，仿佛在嘀咕「还真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并发症，造成死亡和截肢都是可能的。」

只是我命大，靠着苍天的庇佑，熬过了又一道鬼门关。从此以后，每当我看见一些中共描写敌伪对中共党员所用的毒刑，便会自然联想到这一段经历来。真想不到，共产党监狱也会对我这种无过无罪的人，使用如此惨烈的刑罚。

## 第二节：\*\*石板坡看守所\*\*

解下手铐以后，过了三天，我便被押送到了重庆市石板坡看守所。那些日子，我还真记不起我是怎样端起那黑甬子吞食下那吊命饭的。

我早已听说过重庆市石板坡看守所，是四川有名的关押并审理各种反革命要犯的地方。被中共抓捕到的国民党重要官员，都曾被关押在这里进行审理。没想到当局把我当作了重犯。

记不得我是怎样被带进那幢被层层电网严密封锁的监狱大楼的，在进门处的一个大房间里，我被换下了所有的衣服，然后，跟着一个中年民警，走进了大约两公尺宽的水泥过道，过道里亮着电灯，仗着灯光看得清楚，水泥路面和墙壁周围都很干净。绕过两个弯道，我已弄不清我被带到了这幢大楼的那一个位置。

带路的民警在一道铁门面前站住，拉开了铁门上的滑动风窗，对着里面喊道：「〇八号。」里面有人应声，带路民警说：「给你们舍房增加一名新犯，代号四一九，从现在开始，要监督他好好反省，交代自己的问题。」又是一记闷声的回应，那民警关上了风窗，从兜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铁门。

我恍惚地跨进了铁门，面前是一间大约只有十平方公尺的小监房，除了门口大约占整个监房四分之一的地方，并与过道相平的水泥地面是空着的，其它地方都是高出地面大约一米高，用木材做成的「炕」，那「炕」围成了一个L形，很像日本家庭的榻榻米。

屋子里除了四个人和靠在空地左侧放着一个马桶之外，什么也没有。那炕上收拾得非常干净，正对铁门的位置上端坐着两个人，与之垂直方向坐着两个人，全都是光头，盘腿端坐。炕面的木质地面擦得很干净，泛着浅黄色的反光，增加了房间的严肃气氛，这同南桐看守所发霉的地铺显示了水平。

〇八号坐在对着监门的两人中靠右的位置上，看到我已进屋，便站起身来，招呼着原来监舍中的其它三个人，依次挪动了一下各自的座位，在靠门的左侧腾出了一个空位来，那下面正对着放着马桶。正对着铁门的墙壁上，距铺面大约也是两公尺的上方，开着一一条窄而长的缝，太阳光从那缝中射进了屋里，使整个屋子比较亮，足以看清监舍里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角落。

我环视了一下同监舍原先已住下的四个老犯人，那〇八号年龄大约已五十开外，表面看不像三〇三那样粗野霸道，但从他那眯缝着的三角吊眼里射出的那股阴深莫测的眼光估计，他可比三〇三狡猾。从四个人苍白的面容判断，他们都是住在这里有些时日的久客了，不像南桐看守所拘留的人皮肤黝黑，举止和言谈那么粗野。此刻我已经注意到四个人的目光正集中在我的身上，尤其是〇八号，它正盯着我那双包扎着纱布沁着血迹的手。

因为手伤，我无法爬上那炕，便脱下鞋倒坐在炕边，磨动着身子，归到了刚刚他们为我腾出来的空位上，仿效着他们盘腿端坐。我明白，刚刚跨进这里什么也没弄清楚的情况下，最容易祸从口出。监房对于新来的人宛如一个监视器，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马上呈现在审讯室的桌面上。新来的人犯除有审讯人员特殊的授意外，挨斗、挨打多半是因不慎而发牢骚、喊冤枉所致。

在这种当局严密监视的监房内，喊冤诉苦不但唤不起任何同监人的同情，反而会遭致意外的麻烦。况且我手上伤得那么重，拿东西都感到困难，不愿因自己语言的疏忽而带来新的折磨。

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不再继续一片茫然，把自己摆在任人侮辱的境地，我必须彻底埋葬一直控制着我的复学梦，从一个莫名其妙的、无知幼稚的学生位置上，开始转到与独裁政权自觉抗争的位置上来。在这种人生转折的关头上，我必须认真思考我该怎样走这条路，今后需要采取哪些方式和手段。

每天早上大约七点钟，起床号吹响，炊事员送进来的先是一盆洗脸水。老犯人们依次爬下炕来，先埋下头，从那盆中喝进一大口水，对着马桶咕隆咕隆漱起来，有的还将手指伸进嘴里上下搅动几下，再喝水漱口，将漱口水吐进马桶，便算完成了第一道漱口刷牙的工序；然后依次用双手在那盆里捧着水，将头埋入盆中，向脸上浇几下，重点是抹下眼角的污物，再用自己随身带的毛巾擦脸上和手上的水迹。算是完成了洗脸的工序。

我在开始的几天，由于手无法完成洗脸的动作，我也只能漱漱口了事。

两道工序完毕，大家复归原位，盘腿而坐，其中一人便开始用一张专用的帕子，借那洗脸水抹着炕面，抹去刚才溅出来的水迹和灰尘，等到一个多小时后，外面的人，将这盆脏水端了出去。大约九点钟那便是开早饭的时间，这与南桐相似，每一天监舍最主要的节目就在两顿饭上。

听到过道里微微的响动声，〇八已经下了炕，恭候在门边。门打开，〇八号从炊事员的手中接过两个脸盆，其中一个装着一盆蒸好的白米饭，上面扣着两个洋瓷小碗和一个竹片，另一个盆里装的是菜，那菜的品模拟南桐上顿下顿都是萝卜荫好，以白菜和牛皮菜为主，间或还可以吃到豆芽、豆渣之类的豆制品，菜汤里还依稀可见油星点点。只是数量就少得多，菜盆子面上放着与监舍人数相同的盘子和小勺。

〇八号接过两个盆子放在炕沿上，便站在炕下，手里操起饭盆上的两个小瓷碗，借助竹片的帮助，先盛满两碗饭，再将两碗口对口地合上用力按住，旋转几次，再轻轻地拍着碗，使那两碗与中间夹着的饭团脱开，用手接着就成了一团光滑的白色饭球，另一只手从菜盆上取过盘子，将那饭球放在盘子中，上面再将一勺菜扣上，如

此操作，每一个人都会聚精会神从○八号盛饭、合碗、挤压、旋转、拍打，这几个在几秒时间里连续的动作中，精确观察出每一个饭球和每一勺菜的差异来。

分饭完毕，大家从○八号依次接过饭盘时，还在互相盯着其它人的盘子，眼睛里还在嘀咕自己端的那一盘是「赢」了还是「输」了。然后才各自以不同的姿势和速度吃下这份「美食」。

吃完以后，必须用舌头将盘子舔得干干净净。据○八号说这是所里面的规定，剩下的两个装饭和菜的盆子，也轮着次序由一个人用手和舌头将它们舔得像洗过似的干净。

初来的几天，因为手不能捧盘子就只好站到炕下，将盘子挪到炕沿边，像狗似的吃那饭团和菜，不慎撒在炕上的，也要用嘴去含起来吃掉。

回想起初入图圉的这段日子里，常为争一份饭菜的多少而相互大骂，甚至可以同三○三拼拚命一搏，打得头破血流，想我堂堂五尺男儿，拍着胸脯，可以叱咤风云，古之哲人视生死如归者何止千百。承继了中华精魂之我辈，落到如此田地，整日里竟为争那一口牢食，而到了此种可笑的程度，鼠目寸光都不足于贬，那一点人的正气和威严就这么荡然无存，岂不汗颜自愧！

从另一角度去想，也深深地惊叹中国人思维及观察力之精微，关在这里的各种智能型人物，不论其属于何类，都可以凭着目测，从那饭球形成的过程估出它们相差几克，看出同一勺舀出的两瓢菜有多少差异，如此智慧却偏偏地用来对鼻下这口饭食作计较；若同窃取权位的高层中，荒淫暴虐里埋藏的诡秘和龌龊的伎俩比较，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老大中华之贫弱的根，是笨？是愚？还是生性中的缺陷？

人到了处于笼中困兽的地步，又能做什么呢？不信你不妨去听听关在这里的「政治要犯们」在两餐之外的大量空余时间里，又在摆些什么龙门阵吧！

同南桐看守所的农夫们摆谈猪身上的哪一处最肥，以解馋为目的的精神牙祭完全相同。这房里的四位人物成天交流的仍是以解馋为目的的「食文化」，这仍是人处在饥饿中的一种生理本能的反应，似乎与身份分、素质不大相关。

不过，身份分、文化之不同其所讲的内容不大相同罢了。这里讨论的内容有重庆名吃：冠生园的点心、傅园的包子和颐之时的名菜。

当有人说到如何咬开那刚开笼的「富油」包子，那糖油便会顺着嘴角流溢的时候，都会吞着口水无一例外的称许它的美味；讨论家常菜肴的做法是另一个主题。常常因争论烧麦该放几两糖，香酥全鸭上蒸笼前该怎么酥制；芙蓉鸡片该选哪一类鸡脯并怎样下刀等等，可以争论一上午，这比南桐的农夫们就高雅多了。

大家讲到的好多菜名，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以前也从未品尝过。争论是难免的，每到争执不休时，总是由一个排在○八号后面那位，年纪大约六十上下的人作裁判。听他介绍，他曾是云南王龙云的私人厨子，能背诵前清御膳堂的菜谱，你若听他讲宫廷筵席便是他的父亲的绝传，办满汉全席光备料的厨子就够凑一桌人。然而，人随境变，当年视山珍海味如粪土的人，今天关在这里吃牢饭的香劲丝毫不差于任何人，争多论少，照样面红耳赤。

入这石板坡看守所的最初几天，一切都还平静，我照例不大说话，而是静听大家的龙门阵以排遣时光，双手的伤也渐渐的好起来，可以端起盘子吃饭；只是有十来天没有洗过脸，脸上和身上觉得难受，但日子久了，反而没有了感觉。后来在西昌时，我接触到那些山上的彝族同胞，长年不洗手脚的，便不感到替他们难受。

### （一）致死人命的批斗会

有一天下午，民警送进来一个看上去年龄与我相近的年轻人，第一次打破了十来天的平静。进来时，他的脸蜡黄而沮丧，被反铐着手，身上到处沾着血迹，看来是一个刚刚抓住，临时关到这儿来的犯人。虽然他有些惶恐，但性格挺倔强，满头乱发活像一个流窜犯。

○八号随即被叫了出去，凭我的经验和直觉，把他唤出我们这个监房，一定是布置对这小子的斗争会，逼迫他招供什么。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八号回来，果然是宣布对新来者的「帮助会」。不过，我想，这种「帮助会」开起来恐怕比南桐要困难，参加斗争的人，除了我以外都可以配得上他称为伯伯，甚至爷爷的上了年岁的人。这些人面容苍白而浮肿，即使暂时因淡食而没有水肿，也是得着「准水肿」病的老年人。

以老对少，动作迟缓，欠缺了那斗争会必用的拳脚功夫，恐怕未必能致斗争对象「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状态，加上缺了那带着砖块的水桶，倘若被斗的那小子偏像雄鸡公般的不肯低头，又能如之奈何？

正思索间，只见那○八号和那厨师联手，二人站在那小子面前的炕上，一声吆喝，一边一个抓住那年轻人的膀子，直楞楞地从水门汀地上拎起，将他脸对着大家，背对铁门，坐在那炕上凹成九十度的缺口上，我从旁边看得清楚，支撑他整个身体的屁股有大半吊在那缺口上悬空着。

○八号又走上前用脚踢着那小子的双脚，迫使那小子盘脚而坐，坐在那种悬吊吊的位置上，正拼拚命的将身子前倾，使整个身体的重心能保持在炕的内侧，加上反铐着手，为保持重心，不致后翻的努力使他整个身体扭曲得非常奇怪。不一会，我已看到他的额上沁出一粒粒的汗珠。

倘若此时正前方谁若拿手轻轻的推他一把，让他的重心落到水门汀地面的范围，那么，他必会向后仰翻，反铐着的手不但无法在仰翻时紧急自卫，抓住炕沿或改善反翻倒跌的着地部位，反而会加速他的后翻。

如果真地从他的座位上仰翻而下，重重的跌下这足有一公尺多高的水门汀地面，其头颅极可能撞在铁门或坚如石板的地面上，后脑勺脑浆迸裂而亡随时都可能发生，或颈椎脊椎折断造成终生瘫痪，手臂折断终生残废等等悲剧。他小心翼翼地靠盘曲的腿，艰难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想使自己的屁股离开那危险的缺口。○八号把他推了回去，并且索性在他的双膝下面一边放了一个枕头，使他始终处在那种千钧一发的危险中。

他头上冒着大粒汗珠，○八号发出冷笑，不紧不慢地说道：「今天你干的事，必须老老实实交待代，不交待清楚，你休想下来，明白吗？」此时他的三角眼里正流露出一种平时不曾流露出来的得意，彷彿在说：「政府难以撬开的口，拿给我不费吹灰之力。」我心中暗暗地为中国人的「聪明」和对同胞的残忍而叫绝。

谁说我们肆意践踏人权？古之「罗织经」可不适用于今天，时代在前进，使用的刑罚也要前进才好。

那小子双腿在枕上直打哆嗦，没出一刻钟，便用发抖的声音向○八号哀求道：「我说，我交代。」先前的倔强劲已荡然无存。

○八号并没有马上理会他，直等了半小时，只见那小子已汗流浹背才取下枕头，将他拉了进来。那小子显然明白，刚才自己如果稍稍失稳，往后倒栽下去的后果，这不是在拿命开玩笑么？监中死一个两个犯人算得了什么？片刻以后，稍稍平静下来，便开口交待代道：「家里已经有两天没有开伙了，我和弟弟两天已没有吃东西……」

○八号大吼了一声，止住了他的话头：「今天不是来听你诉苦，现在要你交待代犯罪动机。」那年轻人用恐惧的眼光盯着他，害怕又让他重新回到刚才的位置上去。

「真的，我真是为了抢吃的。」他好像在同政府争辩。「一大早，我就像从前几次那样，守在中山路口那家国营食店门口，寻找下手的机会，但是从早晨开始，来这儿买面的都是我强壮的年轻人，他们都带着盘子，盘上有盖，抢那盘子很不容易，挨顿打什么也捞不到的事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虽然我饿得慌，但只能等机会。到了中午，终于来了一个妇女，三十来岁，她和前面几个来买面的不同，手里拿着的是一个碗，肩上还背着一个女用的手提包。我想，机会终于来了，便紧挨着她，装出也是在那窗口下买面的样子，那女人并没有注意我，她从小手提包里取出一个钱夹，从里面拿出了粮票和钱，从窗口递了进去，不一会儿，从那窗口里递出来了那碗白花花的面条。当她刚接过碗正转过身来的一刹那，我双手一起向那碗中抓去，从那碗中抓着一大捧面条，也不管有多烫拼拚命往嘴里塞。那女人惊慌地抓着碗，另一只手却狠狠地抓着我的头发，将我的头向那窗口下的墙上猛撞。我挣脱，忽然看到她挎在肩上的挎包，正打在我的腰上，我便毫不犹豫地去抓那包，猛地从她身上拽了下来，没命地往街上跑。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还没有跑出那条街就被警察逮住，挨了好一顿打，便送到这儿来了。」

年轻人一口气便将过程讲完了，○八号并没有制止他，按监规规定，犯人是不能相互讲案情的，当然更不允许在这种公开场合讲案情。○八号是否得到官方的授意，我不知道。

「胡说，你既是抢吃的，怎么去抢那包？」○八号喝问道。「那里面有钱包，有粮票和钱。」年轻人回答合乎逻辑。「胡说，你明明是抢那皮包，你抢面条是虚晃一招，抢包才是你的目的，老实告诉你，今天，你不把抢皮包的目的交待出来，休想过关。」○八号终于挑明了「帮助会」的主题和宗旨。听到这里谁都清楚那包里有谁都不能动的东西。年轻人似乎也从一头迷雾水中清醒过来了。他除了看准了那钱夹子里装的钱和粮票，他也许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说，你为什么抢那包？是谁指使你的？」○八号站了起来，向他逼了过去，那年轻人恐惧的望着他，带着哭声哀求道：「我真的是饿极了。我抢面条吃……」他语无伦次起来。

但这并不能挽救他。「那么，你就好好反省吧！直到你想说为止。」恶狠狠的将他重新推到了那空缺上，并且在他的两膝处重新垫上了两个枕头。

监舍里又重新回到十分钟前的状态，我只见他脸色苍白，整个的炕上已感觉得出他那种剧烈的颤抖。「啊！我说，我说！」年轻人的两腿显然已支援不住了，他的喊声带着恐惧和哀求。○八号向他渺视了一眼，并没有理他。

一分钟，两分钟，突然，那年轻人恐怖地吼了一声，直挺挺地仰天翻了下去，在那最后一刹那间，我还能看到他带着无奈和痛苦的脸。接着，便是一声重物坠地时发出的沉闷响声。

全监舍的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在一秒钟的寂静中，我看见他的头正撞在铁门边上，一只脚还倒挂在炕边。我判断他昏过去了。○八号却蹲在炕沿边往下看。「耍什么死狗。」他嘀咕着便下了炕，我看见血已经从头下沁了出来。○八号按动了报警铃。

五分钟以后，监门打开了，两个民警将他拖了出去，我最后看了一下他惨白的脸，铁门重新又被重重的关上。

一个不祥的预兆爬进了我的脑子里，我下意识地为他做了一个祷告，心中喃喃念道：「可怜的生灵，可怜的中国小老百姓。」

那小子再也没回来过，外面发生的一切我们都不知道。

我在石板坡看守所经过了十五天，双手才能握笔写字。提审员将我传去的第一门「功课」就是写出材料，交待我写的「反动文章」。我知道，这是认定我「反革命罪」的第二道方式，实际上就是「终审方式」。

重述我的观点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我「认罪」却难办到。我不需要谁来「帮助」，我没有任何行为可以隐瞒，我坦然地面对法庭，按照我所确定的路子走下去。

「装疯」曾是我被划右派和沦于狱中最无奈时刻用的护身法，我既无力去打倒这种疯狂的专制，又骨鲠于喉不能痛斥这种苛政淫威所苦；既不愿屈从于毛泽东的阳谋，更不屑那跪地叩首，从狗洞中爬出的下流动作，只好用装疯来表达我对现实的愤怒和反抗，宣泄被压抑的痛苦。

在石板坡看守所一个多月的韬光养晦，写成交代材料，准备入狱以后，与当局抗争到底。

### 第三节：\*\*回到南桐看守所\*\*

第二次回到南桐看守所，与初来这里时的「学生心态」已不同，短短八个月的监禁，使我再次亲眼目睹了「三面红旗」的成果：人民公社荒芜的土地；至今还隐没在荒草丛中的小高炉残垣断壁；老百姓长期忍受着缺吃少穿而不敢言说。

这年夏天，我在这里看到了赵凡，我俩在放风时相对凝视良久，那晚又勾起了我对赵家湾的回忆，很想找机会问他，怎么也落到我这个地步。但没找到这机会。

看来他与南桐看守所的三〇三，石板坡的○八当属同一类型，这是些人类社会的渣滓，曾是「革命」的柱石，当过中共的枪手，手上沾着无辜者的鲜血，后来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变成了另一批枪手的牺牲品。毛用权和利作绳子，牵着他们的鼻子围着权势团团转，可悲的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意识到自己的可耻。

而我正好充当了毛皇上登基过程的牺牲品。

监狱反省，使我弄明白划我右派的原因：那用「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层层包装的，已被民国废弃的，一人死罪，满门抄斩的连坐法，进一步为毛泽东恢复，并创意为「烙印」罪。

「成分论」乃是无穷冤狱的源头，在历次运动中被中共击倒的父辈们，被重重地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踩在最底层后，无辜儿女们，便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奴隶，成为中国最大的冤海！这些受害者，越用低沉的哀告以求躲避，越被整得惨！

有一位昆虫学家在他临终前说：昆虫的四肢是那么长，而我的生命是那么短！那是对生物生存长河中，不留下痕迹可怜苍生的惋惜。时间对于人的价值，就在他短短一生中留下些不被人遗忘的东西。

可惜，我竟落到了一个不把人的生命当生命的可悲年代，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真觉得活得太累，那时间太长太难过去，可我观察周围浑浑噩噩的人时，我真奇怪，生命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为了几片肉和几俩两粮食，可以费尽心机，这同成天觅食的昆虫有何两样？尤其是那些暂时操纵权柄，肆意浪费别人生命的人，生命对他们实在太贱了！

一九六〇年九月，我带着略呈水肿的身体，背着破被裹就的行囊，提着那口从家里带出来的破皮箱，在警察押解下离开了南桐看守所，到了重庆弹子石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犯人转运站」，开始了我长达十九年的劳改生涯。记得那一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被叫醒，从保管室里取出了自己的行李，便被押上了一辆警车。车出南桐时，最多是早上六点钟。

#### 第四节：\*\*大跃进后……\*\*

此刻，一九六〇年十月份，我结束了两年多的「右派改造」生活和八个月的监狱生活，仿佛一直在一场漫长恶梦中跋涉。我的炼狱还刚刚开始，我将去的地方，是一所更残酷的人间地狱。

我从囚车的窗缝中向外窥望，三个月前当我从南桐到石板坡看守所时，由于双手伤势严重，几乎没有留意这个城市发生的一切。

后来，我从石板坡看守所重返南桐时，囚车的窗门又是紧闭的，什么也没有看见。这一次，到弹子石监狱的途中，承蒙开车人照应，一路上窗门大打开，手上又不戴手铐，我可以附在车窗边上较为自由的，对重庆市的街道容貌好好认识一下。

我想：阔别整整三年，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指引」，经过持续三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再怎么说明也应当有一点新的气派。虽然，我在狱中，重新进来犯人的口中知道，市民每月只有十八斤粮食的供应，每年只有五尺布票，街上买肥皂，火柴都要票；买不到副食品，连盐巴也是每月二两的供应。国营食店里经常出现抢饭和面条的故事。

但百闻不如一见，真想看看这城市被三面红旗搞成了什么样子了。

当囚车开进南坪以后，街道便渐渐进入了我的视野：同两年前一样，街道依然是那么窄，汽车行驶在开裂的路面上，因坑凹太多，颠簸不已，所以行驶速度很慢。街道两旁依然是十年前泥墙、夹砖柱结构的老房。这种黄色和灰色的建筑，高矮不一，使街道变得「衰老不堪」。

临街的房子几乎都是平民住房，商店就夹在矮小的平房中，偶尔一幢三层楼略加粉饰后，鹤立鸡群的引人注目。配以横置木匾上写着「X X路国营商场」的招牌，几乎成为这条街最豪气的代表。不过，这一天大概不是星期天，出入商店的人并不多。

囚车经过两扇朱红的大门，我看清楚那门边的两排货架上摆着稀稀拉拉的布匹。想来这年头，成衣太贵，贫贱的市民们都是手持布票去商店买布，再到缝纫铺中去打或拿到家中自己裁缝。

往里看去，便是热水瓶、脸盆、瓷盅之类的搪瓷用品，从那里面走出来的人手里拿着毛巾、肥皂、火柴可判断，里面是些消耗性日用品，那年代买这些消耗品多半是要凭票供应的。

说到这票，一九六〇年市民每人的布票仅仅三尺，赫鲁晓夫说中国人当时是三个人穿一条裤子，指的就是三个人一年的布票加起来才够买一条裤子的意思。

这话当是市场的供应实况，没有任何的贬义和夸张，可是后来竟变成赫光头猖狂攻击中国三面红旗，引发「中苏关系破裂」的罪证。

囚车再往前走，街的右侧夹在矮小的平民居舍中，在一个平房结构，铺面很宽的商店面前排成一个长长的队列。那队列是由老太婆和中年人组成，手里各拎着一个竹篮。门上立着的招牌上书：「XX街蔬菜公司」，那里面可是人声喧哗，人墙严严实实挡住了里面的货柜，看不清店里的陈设。

我从那拥挤人群的篮子里，看到了牛皮菜和萝卜。两个人不知为什么在那里抢着一个篮子，我听见那柜台里传出来争「两」论钱的吵声。

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粗野的骂声，给死气沉沉的街道增加了一点闹意。

囚车继续向前开出大约五十公尺，又见一个门口挂着：「XX街二段缝纫店」。旁边还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本店服务项目，其中竟有一项是「补缝归衣」！

看那很狭窄的店面里，悬挂的竟是一些洗净了的补巴衣服！这使我注意到了街上行人们的衣着，与三年前的解放服和中山装为主体的衣着没什么区别，色彩依然的蓝、灰、白，三种流行色。

只是所有行人身上穿的全是补了巴的。区别仅在于补巴的整齐不整齐。那巴很有规律，按上衣四点式：两肩，两肘；裤子三点式：两膝、一垫，几乎是统一的。

还有的几乎连巴都没有，巾巾挂挂的一身，那似乎不像乞丐。不过在那个年月里，老百姓的日子恐怕连乞丐都不如。在这稀稀拉拉的店铺中，这种补巴为业的缝纫铺，生意顶火红。

那个年代老棉布是我国唯一的纺织品，老棉布不经磨，一件新衣服，如果小心保护，最多也只能穿一年就破了。布票那么缺，怎不是「遍地补巴衣，不见新衣人」。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在报上注销，叫「节约是美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毛泽东鼓吹节约仍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

不过在这里，实在同他自吹自擂的「市场繁荣」形成反衬。我不禁惊叹，中华民族子民们忍受饥寒的耐力，堪称世界诸民族之最！需知同一时期的经济发达的国家，拿出来救援受灾国家灾民的，都难找一件像中国百姓身上穿的千巴万补的破衣服。

已接近十二点钟了，街的左侧，一个很狭门面，门口排着长长的队列。那店的门口挂的木板黑字，写着：「XX街二段国营食店」。门口几个戴着红袖笼的中年人正在游弋，突然从店里窜出两个扭成一团的人，并没注意正在缓缓向他们驶近的囚车，囚车紧按喇叭，喇叭的尖叫声并没提醒那两人，囚车被迫停了下来。两个戴红袖笼的人按了过去，一面怒吼着：「把他们两个人带到看守所去，真他妈不要命了。」

旁边站在队列中的人叹息说：「凭什么为二两粮票打得头破血流？」我再去看方才厮打的两个人果然脸上都挂了彩。在红袖章的干涉下，两个打架的年轻人才分开，在司机一再鸣笛声中，围观的人让开了道。

我回过头去再望瞭望那渐渐离远的街道，就没有看到一处糖果铺和水果铺。它们在长长的街道上消失了。至于肉店、禽蛋商店现在也所剩无几，肉和蛋统统留给蔬菜公司凭票出售了。

整个城市像死一般的沉寂。马路上看不到几辆破汽车，也看不到忙碌的行人，九月炎热的余威还控制着城市，随着疾驰的风带进囚车，带进我耳朵里的一些隐隐约约念经的声音——听得出那是街段的居民，按上级安排组织朗读报纸和文件，传达党中央的大跃进「捷报」。

我感到了疲倦，开始打起盹来，耳朵里隆隆的发动机响声带我进入了梦乡。离家似乎正在靠近。我现在明白，我已经不能回去了。说不定是永远不能回去了，还好，就让我默默无声的离去吧，悄悄的走开，会避免一场临别的大悲恸……

我又彷彿看到了外婆那花白的头。我不敢想，否则我的心会立即出血，二十年后，九死一生的我重新踏上回归的路，他老人家已与世长逝了整整十五年了。我连她的骨灰盒都没有找到，当我将她的遗像放置在我卧室的衣柜之上，我才号啕大哭了一场，天哪！这真是命中注定的呀！



弟弟在哪儿呢？可知今天哥就要离去，赴那地狱的煎熬么？想到今后，家的重担将会落在你骨瘦如柴的双肩时，泪就会充满我的眼眶，我哪能回答你稚气的发问：「哥，你怎么会犯错？」今天当改口问：「哥，你怎么会犯罪？」

妈妈，我去了，我知道这些天您比我更沉重，如果说我还有一层孩子的稚气和健忘，保护我幼嫩的神经免受过分悲伤而失常。而您一直在用母爱承受我们四人的所有不幸，现在担忧这一老一少的脆弱生命受到威胁和折磨。

此刻，我只有深深的祈祷苍天，不要再将新的灾难降给无辜的孩子和老人，让我们母子俩在天涯两处，共同面对着家破人亡，骨肉分离，承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鞭打，十年、二十年！

我知道我将去的地方是我的父亲先我十年去的地方，如果苍天命定了我们父子俩将归宿于此，那么父亲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命运之神会不会安排我们在这里相聚？

## 第五节：\*\*孙家花园监狱\*\*

囚车在颠簸的街道上，足足开了一个小时，绕过了好几条小街后，驰到了一道巨大的铁门前，那铁门旁边没有悬挂任何的标记，他的右侧，一座大约十公尺高的岗楼上面，隐约可见架着的机关枪和荷枪实弹的哨兵，守门的是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从押车人员的手里接过一张纸，验过以后，便打开铁门栅，囚车便缓缓的驰了进去。

### （一）入监

一进大门，左侧是一个很宽的大坝子，大门左侧靠马路的围墙内，是一个高出大坝一米多高好几百平方公尺的看台，若遇到开大会时，这儿便是临时的主席台。

大坝子周围是用木柱和竹子捆绑起来的临时工棚，里面放着许多长条的钳台桌和钻床，马达之类的设备。大门右侧是两排很长的厂房，那里面机器在轰鸣。

这孙家花园原是一个从毛铁到零件，全都自行加工的小而齐的机械加工工厂。许多穿着蓝色背心、背上隐约有劳字标记的犯人，就是这儿的工人。

囚车一进监门，在左侧的空地上停下，车间前方的一排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年纪四十岁上下，身着白汗衫的中年人。在双方交接之际，我下了囚车，虽然天气很热，但心却很冷，一阵莫名的颤抖控制了我，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几分钟后，我从车上拎下了那又破又脏的「行李」。

偌大的中国国土上，被这些小监狱密密麻麻的控制着，令人喘不过气来。在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里，这儿被称为「下水道」。那监狱的墙壁和车间的墙上全是与大街上相类似的标语，仗着警察和刺刀，监狱对人们的思想和语言牢牢控制，令人沉默。

十分钟以后，白汗衫领我走进黄色办公楼。我拎着那两捆破烂跟着他，到了办公室门口，叫我站在门外，等他和押送我的人进去办了交接手续，大约一刻钟才走出来，白汗衫在腋下夹了一个档案袋，领着我向那一直通向里面的水泥路上走去。

这时已近正午，车间里的蓝背心们陆续从车间里向外涌，他们看见了我，向我投来了一束询问的目光，那目光里分明在说：「又来了一个不识时务的。」

从车间出来的蓝背心们，挤在车间外一长条洗手水池边，用木屑和沙子搓着满手的油污。然后，陆陆续续的又走回车间，拿着自己的「碗」，这些硕大而奇怪的「碗」，是用破洗脸盆和铁皮制作的餐具。

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有没有有心人，在当时就留下这些难得的历史文物，以作为后辈人对这个时期监狱生活的活证物，就像当年在大邑县地主庄院收租院的展室里，四处搜寻当年刘文彩的长工们的破衣服和破碗一样。

一个臂上套红袖章的人，站在旗杆下面使劲吹着口哨，从车间出来的蓝背心们，在饭桶面前按车间排成了十几个队列。红袖章挨着队列从左到右队清点人数，清点完毕，便小跑到站在队列左侧的，也是穿着白汗衫的人面

前报告了人数，只见那人挥了挥手，队列分成两排便开始蠕动起来，鱼贯的走到两个大饭桶边，由站在那儿的炊事员依次发给一盅「罐罐饭」。

接过饭罐的人，将手中硕大的碗迅速伸向菜盆，跟着舀菜的那勺子舞动起来，生怕炊事员打起来的那一勺菜，因碗没有及时凑上去而洒到菜盆里去了。接过菜的蓝背心们便一手端盅、一手端碗，一边走，一边还在回头向菜盆望，好像要看那舀菜的人今天对自己是否公平。

如此一连串的动作完成后，蓝背心们便端着各自的「饭」、「菜」，回到自己那个组已围成的圈子里，席地而坐，并把盅子里的蚕豆倒进硕大的碗里去，一边数着那豆的粒数，几乎无一例外。

我至今还记得，领到手的如果是蚕豆，每一两大约五十粒左右，如果是豌豆，每一两大约是八十粒左右，如果是黄豆，大约每两也是八十余粒。

中午的定量依工种不同有三两、四两和五两三种份额。翻砂和运输工种最高，电工最低，按两数数豆粒可算一种求放心的游戏，倘若吃到的粒数与额定粒数多了出来，便津津乐道向同伴们夸耀称自己运气好。倘若，颗粒数不足，便嘟哝着说自己运气不好，这一顿「输」了。

我跟着白汗衫走过了那足有百米长的水泥过道，再缓缓的顺着石阶梯，一步一步登上那中心地带上的小山头。这儿是一幢很宽的两层楼房，四周围着整齐的花圃，花圃与楼房之间环绕着一条一米多宽的三合土通道，周围打扫得倒也干净。

石梯坎正中是一扇可以滑移的收折铁门。从铁门进入黄楼是一条宽约两公尺的木地板铺成的信道，信道两边便是一些很大的监房。我们进去时巷道里正在开饭，一些头剃得精光，面容苍白，穿着清一色蓝色囚服的犯人正排着队，在一个饭桶边领取饭菜，与下面坝子里所不同的，只是那盅子比那些参加劳动的人小很多。而且他们大多数并没有用铁皮敲成的大碗盛菜。

白汗衫将一名正在发饭大约五十多岁的老犯人叫到门口，高声向他吩咐道：「方伯非，这是刚来的新犯，你看现在哪一个组还有空位，安排一下。」说着便独自离去。

那姓方的一只左眼是斜的，大家都管他叫偏花，头发已经花白，他向发饭的炊事员交待了一声，便领着我顺着巷道往里走。

在巷道尽头，他打开了一个小屋的锁，一股霉气向我袭来，我把我的破烂写上我的名字，放在货架上。他又打开了隔壁的房间，从那里取出了一套同其它人一样的被盖和蓝色的衣裤，交给我。

接着又领着我返回巷道，把我带到了门上写着四的房间。那房间足有六十平方公尺宽，地上是木板的，四面是二十多个地铺，每一个铺上放着蓝色的棉垫、蓝色的被子和枕头。那铺位上已坐着十几个人，此时他们都在津津有味地数着自己罐里的胡豆。监舍组长的铺位是靠门右侧的第一个位置，我便由他安置在左边第六个铺位上。

我将所领的衣被放在我铺位上以后，第一个动作便是去领我的中饭。自入狱八个月来我还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早上起得太早，此时感到十分的困乏。当我领过那最小一号的饭盅，顾不上去细看饭面浮渣，也没有去数那盅子里的豆颗数，狼吞虎咽吃下入监的第一餐饭，吃完便倒头睡在刚指定的铺位上。

整个黄楼分为两层，过道尽头便是到二层楼的楼梯，楼上八间监舍中住的全是在车间里从事机械加工的犯人们。住在底楼的六个监房中是等待转到其它地方的新犯人，靠里还有两间特别小的单人禁闭室，底楼六个监舍中一共有二百多名新犯人，包括正在上诉、「案情待定」的上诉者，和从车间因「抗拒」改造，交到这里来进行批判斗争的「反改造分子」。

新犯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监规，静坐反省和交待「余罪」，所谓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是指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思想，这些年攻击三面红旗、反对人民公社，或因无法忍耐饥寒交迫而奋起反抗的人。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凡是不认罪守法，打上诉喊冤枉的，一律都是「反改造言行」。那政策是中共规定的，具有最高权威性，反对党的政策便是反党已是无疑，因反对错误政策而划为反革命的，也一律只好自认倒霉，于是「申诉」不断。申诉再次触及中共的逆行倒施。

申冤越多，当局施加的压力也越大。

解决这个无法调解的矛盾，便是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这楼下的「新犯组」，经常开斗争会，吊水桶、捆苏联背剑、以「端正态度」为名的拳打脚踢，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那时间常因公开喊吃不饱，或因饥饿逼迫「企图越狱」而送来批斗的人特别多。

以「吃不饱」为内容的斗争会，往往开起来变成了对现实的控诉会，红毛犯人常借人之口，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成了对当局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所以这儿的白天十分热闹，骂架声、打人声、充斥着这里。

清晨五点钟，东方还没有显出鱼肚的白光，监舍外花圃里欢叫的蟋蟀还没有停息它们的鸣叫，整个监狱还沉浸在黑夜的迷蒙中，那令人心惊的高音喇叭，使用它的尖叫声刺破了监狱上空的宁静。

「东方红」开始曲后，便是那单音调的呐喊：「社会主义好。」这调门没有改变，歌辞却作了修改，然而无论是对帝国主义的咒骂，还是对右派份子的咒骂，一清早刚睁眼，就被它弄得神经兮兮的。

大监各监舍的组长立即从铺位上跳起来，用脚踢醒那些入睡还不到两小时，此时还沉睡在梦乡里，困乏不堪的「劳动力」们！他们中大部分人大约在凌晨三点钟，连脚都没洗，和衣而眠躺下的。

一分钟以后，那杂沓沉重的脚步，逐渐向楼梯口移去，一阵下楼的咚咚响声以后，脚步又经过我们舍房门外的过道。

木地板上的敲击声和四壁的回响，使我们睡在楼下的人再也无法安睡。刚刚熄去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灯和岗楼上的强光探照灯都一齐打开，在强光的护送之下，一群蓝灰色的影子忽长忽短的由广播乐曲伴送着进了车间。

接着便是隆隆的机器声，把整个的工厂淹没在「跃进」之中，大跃进的又一天就这么开始，隆隆的轰响一直在监狱上空盘旋，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

新犯组规定住在这里的犯人，早上六点钟起床，按照监规的规定，起床的哨声一响，全体人员都必须爬起来背靠着墙静坐反省。等到七点钟，值班的管理人员打开监舍的门锁，大家才走出铁门，在大楼右侧的洗脸池中取水洗脸漱口。

七点半钟，炊事员送早饭上来，八点以后，吃饭完毕便开始监规学习，或继续前一天晚上没有开完的斗争会。斗争会是新犯组的主要内容，晚上依然是这种堂会式斗争会，有时一直开到十点钟还没有结束。

与看守所完全一样，这儿被押者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实时发现，斗争会是不断发生的，只是平时生活比起看守所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饭后的休息时间被允许在黄楼周围散步，可以围坐在花圃周围捉虱子。

我们监舍三十多名新「犯人」，几乎人人都有轻重不同的水肿病，即使很年轻的人行动也很吃力。平时无论是开斗争会或在花圃边纳凉，谈论的主体必是「吃」。

晚上开饭，全监人员不分工种一律二两，开饭中，端着硕大的洗脸盆改制的碗，再次重演「大碗」跟着炊事员手中的勺子上下飞舞的戏，当所有的人按次序打完两瓢以后，桶中的饭一般都有剩余，于是便挨着次序每人再添一瓢直到分完为止，如此的分配叫「分尾子」。

大监不同于小监，那装着稀饭的大黄木桶虽然已被刮尽舀完，但那附在桶壁上所剩余的残羹，是无法用瓢清理干净的，所以每次分尾子到最后一人，炊事员便会将桶交给那个人，任他用手指细细地在桶边抹净，有时遇到稀饭较稠的时候，那从桶上抹下的足足有两瓢。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大坝子里抹桶的事，让新犯的一个名叫王三的小伙子盯上了。

有一天晚上，他趁炊事员在坝子里分稀饭，没空光顾小监送饭的机会，混在上班人的队伍中到了大坝子里。等到尾子添完了，他便马上端着预先准备好的「洗脸盆」，接过那最后一名犯人用瓢已刮净的饭桶，正用手细细的抹刮那大木桶里的残羹时，新犯组正四处寻找他，方伯非气急败坏的报告值班干事。

当两个套红袖套把王三在坝子里捉到，像拎小鸡一样送到方伯非面前时，仔细看王三，那光头上还沾着在刮桶时糊满的稀饭浆，一面还喃喃的叨念那脸盆里已经收集了足有一瓢的「稀饭」。

王三成了我们监舍当晚斗争的「对象」，这王三说来聪明，他发现了任何人都没有发现的意外食物，为了王三这种「浪漫」，黄楼小监里的一百多号人被管紧了几天，不准我们走下那石梯阶。

虽然大家同是被中共残害，但人心不蛊，想从这地狱里像狗一样爬出去的人到处都是。祸从口出的意外是经常发生的，无所谓告密，更无所谓可耻。为了给自己已经很苦的日子，少添烦恼，所以我对紧邻的前后铺，有一种特别的谨慎，前面铺位上那位，因扶乩而入监的一贯道首，从不与他交谈。

## （二）张腊元和王大炳

我宁可同不善言谈、口钝舌讷的张腊元、王大炳交朋友，他俩都是长寿地区的农民，凭我的直觉，感到他们质地纯朴，虽文化层次极底，但与他们相交起码少了提防之苦。

黄楼右侧，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坡道下面，是铸工车间倾倒下铁炉排出的炉渣和废铁芯的地方，每天从监房清扫出来的垃圾也倒在那里，所以有些破布、用废的围腰、手套等物。我很快注意到，他们俩人常来这里捡些破布，洗净后用来修补自己的旧棉衣。日长之后，我也跟着他们在这里捡破烂。

有一天，我见张腊元独自坐在这里发呆，从他那瘦削的肩头侧面望去，只见那清瘦的脸上厚厚的嘴唇微微颤抖，好像哭泣过，可是眼里并不见泪水。王大炳说他这样对着臭气，可以蹬上一个上午，发呆以后，长叹一声慢慢离去。

从他记事时就没有了自己的家，父母何时相继亡故已说不清楚。十几岁开始，跟着哥哥嫂嫂生活。农村中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就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开始了缺吃少穿日子，从十二岁开始，他跟着哥嫂每天在生产队的土地里挣工分粮。

后来小侄子出生以后，晚上带孩子的事就交给了他，白天干活已很劳累，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保姆那样对孩子按时施尿，尿床是经常发生的，而他哥哥便经常迁怒弟弟身上。老实的张腊元，身上到处是他哥嫂用柴块给他留下的伤痕。

一九五八年，只有十七岁的张腊元，由于天生的呆笨，哥嫂不仅克扣他的口粮，把分到的很少的谷米，留给自己的孩子。并把剩下的杂粮糠菜分成二盆，一盆主要是糠拌地瓜藤是专给张腊元准备的，另一盆加上玉米面是留给自己的，吃饭时先端出弟弟的一盆，等弟弟吃完了再端出他们自己的。

被打傻了的他，明知这是哥嫂对他的虐待，但却不敢说。饥饿的张腊元很快得了水肿，他只有拼拚命在山上寻找野果野菜充饥。日子久了弟弟忍不下去了，有一天吃饭时，他第一次去哥嫂的饭盆里抢饭，嫂嫂被他突然的反常惊呆了，拿起饭瓢往弟弟头上猛砸，哥哥闻声从里屋走出，两个人给张腊元一顿好打。满头血迹的张腊元看到了灶旁砍柴的斧头，猛然抡起了斧头……

血案酿成，张腊元投案，本来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脱下衣服，显示哥嫂给他留下的无数伤痕，然而，善良而可怜的张腊元，口口声声说他杀人该抵命。

法院根据邻居的介绍和他的年龄免去他的一死，判决了他的无期徒刑，在孙家花园关押了几个月，便转到了南充监狱去了。

我们短短相处两个月，他那厚厚的嘴唇，深陷的眼睛，却永远的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无期徒刑对于张腊元公平吗？他的罪孽又是谁造成的？每每我在回忆到他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张腊元被押送南充后，新犯组的室友中，我唯一能诉衷肠的人便是王大炳

根据大炳的自述，他早年丧父，母亲在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抚养他和弟弟两人成人，按当地农村中的普遍情况，找一个能维持生计的劳动力嫁人，于是在生活逼迫下嫁给了当地一个李姓的小光棍。后来，年仅十六岁的王大炳，在亲戚的介绍下，进了重庆一家工厂当临时工。没有多久，合作社成立联社时，姓李的抛弃了人老珠黄的王母。

家庭的不幸和变迁，重创了他的母亲，母亲吵不过那个姓李的，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他们的房子晚上失火，蛮不讲理的继父，一口咬定是王母故意想烧死他，理由是火灾的现场发现了一双烧成半截的女人花鞋，而

有人看到失火的当天晚上，母亲曾提着那双刚洗过的鞋进了厨房，母亲被领着民兵的李姓队长痛打一顿，抢去住房。

闻听自己的家被姓李的强占，母亲受伤，露宿街头，心急如焚的王大炳匆匆赴回长寿，但他低估了李姓的流氓，更低估了农村里中共党员的横霸，母子三人抱头痛哭以后，王大炳和几个同伴将这个事写成控诉材料在工厂散发，并被工厂保卫科以煽动反革命传单立案起诉。

苦难使我俩结下了不解之缘！

### (三) 劳改工厂

我在新犯组只呆了三个月，便被分配到金工车间钳工组，正式成为这支监狱创造财富的无偿劳动力，并在大跃进的尾声中度过了最后两个月的通宵夜战。

最开始，我被分配到制作电机转子用硅钢片的冲模钳工一组。里面放着十来张宽大的钳桌。每张钳台上安装着六至八台数量不同、尺寸不同的虎钳，可以容纳八个人在上面同时干活。

我刚到车间，钳桌上钳工工具和马达的零件混堆着。从马达机壳，转子绕组、硅钢片和螺丝螺帽锉刀宰子等等无序的堆放状况便知道，这是一个管理极差，章法极差，工序不明的手工作坊。

类似中世纪的工奴，没有习惯，也没有时间来清理这些工具和零件，四周的铁货架上杂乱的堆放着零件，弄不清正在组装的，还是报废的。

把我引来的「红袖套」向我介绍，其中一位大约五十来岁，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绷带吊在肩上的人名叫孙经海，是整个钳工车间的技术负责人。后来听大家说它是一位八级钳工，当时，整个重庆市像他这种级别的钳工屈指可数，能凭手工制作零级块规。是这模具组的掌火人。

先于孙经海以前的钳工组技术负责人，因制作模具冲出的硅钢片用来装机后，发生温度超过技术标准而报废了一大批马达，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加刑，并流放外地。

那百吨冲床还是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汉阳造，属前清张之洞时代的遗产，早已报废，加上测量手段几乎只有一个百分表，在配制时没有磨床。孙经海口中不说，心中却犯着愁。以为这简陋的设备和加工条件搭上一只手不说，弄得不好，重蹈前任之覆辙就是喊冤也没用！

从此以后，直到从孙家花园调出，我便与铣刨组编在一起学习。

划线平台的后面并列着两台冲床，靠广场的一台便是夺去了孙师傅右手的一百吨冲床，是一台大约服役了几十年的老掉牙的设备，稍不注意便会造成硅钢片整批报废，或打烂冲模。横过车间中过道的左边安放四台铣床和三台立式钻床，四台铣床中最大的一台旧式铣床，是当年中共新华社印刷传单的大型印刷机改造而成的。

在那台铣床上操作的是一老一少，老者五十开外，但精神挺好，穿着的那件补丁的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显出它与常人不同的身份。经过介绍，我知道他叫潘朝元，在内战时期任过浙江金华县的「县太爷」，在国民党部队中供职汤恩伯部下，任少将军衔。那段日子他终日沉默寡言，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印象。

与他同机床共事的是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年轻人，名字叫陈旦，外表看去很老实，甚至有点招人怜悯。

这台卧式铣床的后面摆着两台立式铣床。一台较新铣床上的操作者姓沈，看上去面色苍白而浮肿。另一台铣床上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平时阴阳怪气的，永远是打不湿扭不干的那种。

我刚调进车间时，陈旦在中午休息的片刻，来我的划线平台找我聊天，说他从前是X X中学的学生，因家贫，读不成书流浪街头，他表示挺羡慕我，希望我能教他看图。后来每次吃饭他都把他的罐罐端到我的位置上来。

有一天晚上陈旦从沈师傅的工具柜里偷了一块肥皂。我觉得这么一点小事，便为难别人，颇有些为陈旦不平，便注意地听起来。只听见那姓潘的愤愤地喊到：「你真没出息，年纪轻轻就知道偷，进到这里来还要偷。」

我翻了那老潘一眼，打心眼里厌恶把相同遭遇的人住脚下踩的作风。虽然我知道，那时间肥皂非常稀缺，市面上的市民凭票供应，每人每季仅1/4联，车间里发给大家用来洗油污的，是每月一小撮碱和锯木粉。

只见那年轻人好像很可怜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对不起，下班晚了一点，碱脸盆不知放那儿去了，我看沈师傅的工具柜开着，顺手拿来用一下，就忘了还回去。」他不停地眨着眼好像要哭。

那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吼道：「不，你这娃儿不老实，上个月还偷了我一块毛巾，国庆大检查才查出来，你是惯偷。」「真不要脸。」潘老汉继续在升温。我感到过份，他还不是因为太穷才偷，在今天这种物质条件下，谁也犯不着为这么一小点肥皂而遭人辱骂。我一边听着铣床组传过来的七言八语，心里很为陈旦不平，也对那潘老头产生了反感。

没想到过了才一个星期，负责洗刨组的张管教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大大地训斥了我一顿，他把我向陈旦讲的得很一般的话，例如说：「形势大好什么都买不到」、「大跃进吃不饱」、「活有你干，饭不让你吃饱」全都抖了出来。

他严厉地警告我说：「政府看见你年轻，又是机械制造专业的，才相信你，允许你单独行动，你还反动本性不改，在监狱里大肆的向犯人『放毒』。」最后，要我立即写出反省，否则就要召开车间批斗会。

我着实地小看了这可怜巴巴的陈旦，没料到，与我做出伪善友谊的他，竟会用我的话来表现自己。

从此以后，我对刑事犯罪的人特别提高了警惕，由此，我也更加体会到，为什么在生活如此之苦，工作如此之劳累的监狱中，人们缄口不言的原因。

另外也开始理解潘老何以如此对待他的学徒，平时又为什么冷冰冰的对待周围所有的人，我们开始接近和交谈。不过，看得出他在告诉我有关他的身世时，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审慎，并不作评论，也不讲他的感情，在那种环境里，人心隔肚皮，一切都只能点到为止。

从他的介绍中，知道他率部在淮海战场上与中共打过很惨烈的仗。解放初，他曾「混入」深圳，准备潜入香港被中共发觉抓获。当时没弄清他的身份分，在广州服了两年刑，刑满后回到重庆，正逢大镇反，他便在枣子岚垭被捕，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他二十年刑期。

他流露出来的伤悲告诉我，他内心一直牵挂着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爱人。也许就因为这种身份分，把我们俩联系起来。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监狱中的挚友和老师，相扶相助直到三十五年后，他含着未能伸张的怨恨离开人间。

#### （四）邂逅蒲世光

由于我的特殊工种，我被允许在所有车间单独的走动，被允许单独上厕所。当时的厕所在翻砂车间旁也只有一个。有一天，我正解完大便，忽然看见邻位置上冒出了一个很熟悉的面孔。「蒲世光」，我几乎惊叫了起来，这位当年青年团冶金系团委书记，曾以人很难理解的心情，刷出署名「非团员呼声编辑」的大字报，并因此而定罪为组织反革命集团。

我在学校并不认识他，后来，他被捕时，我也只在冶金系大门口见过，他被捕后，我们七十六个同学被押往南桐，从此与他断了音信。当时，只觉他怎么会为家庭有问题的「阶级异己」者鸣不平，并因此而蒙冤，所以，虽然只有一面之缘，印象却很深。

两年后，经过南桐的锻炼，对他深刻的印象中渗入了一种敬佩。在这里，他突然的出现并被认出，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份了。然而，他却并不认识我，他见我招呼他，反而非常诧异，转过头去看了看与他一同上厕所的另一个人。我只问了一句：「你在哪个车间？」他用手指了指外面，回答我：「翻砂车间」，便带着一种疑惑匆匆离去。

由于连续的日夜鏖战，几乎没有时间洗衣服。冬天到来的时候，有时连续一个月没换过内衣，也从没洗过澡，加上转运站来往人员复杂，衣服和被盖上染上虱子习以为常了。坐在过道里，脱光衣服，用指甲掐虱子是空余时间的一种消磨法。人在那种环境下，同乞丐已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虱子令人烦恼，所以每当化铁炉开炉化铁的时候，便会有人通知各车间去那里烫虱子。那方法极为简单，只消拎着铁桶装半桶水，将化铁炉内排出来大块的带着火花的炉渣，用铁钳夹进盛水的桶里，在一阵爆炸声中，水桶中的水立即就会沸腾，然后再将长了虱子的衣物按进沸水中……换下来又臭又汗内衣，没有肥皂去污，就只有用这种方法兼去油汗。

借烫虱子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彼此作了自我介绍后，他便询问了我们去南桐的同学情况。我告诉他。去年杨治邦，李天德他们被抓进监狱了。问他碰见过没有？他摇摇头说：他不认识杨治邦们，也不曾听过此事。

接着便介绍了他自己的经历，自从五八年夏天，他从学校被捕后就关进了石板坡看守所。重庆检察院以组织反革命集团首犯对他起诉，这使他愤怒不已，在预审中，他要提审他的人，拿出「集团」纲领和组织成员的证据来。法院明知给他定的罪是强加的，于是回答他，非团员呼声编辑部，既是一个编辑部，那一定是一批人，还要他交待代其它成员，只经过一次预审，便一锤定音了。

蒲世光就这样在石板坡看守所泡了两年，「最后以趁中共整风之际，书写反革命标语，大字报、策划反革命组织，猖狂进行反革命煽动的大罪极恶，处以廿年徒刑。这可是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当时，真要处以极刑，那又怎样呢？当法庭向他宣判时，蒲世光毫不犹豫地向法院申明：「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判处后，蒲世光便被送到这里，殊途同归，我们终于从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的遭遇走到一起来了。相同的归宿告诉我们，我们是同一个政治目的牺牲品。

他告诉我这里共三个车间：铸造车间、金工车间和电工车间，并说出它们的负责人，看来他对这儿的的情况很了解。

刚来的第一天，新犯组的李队长问他，判了多久的刑？他爽快地回答说：「一天！」「什么？」「一天。」他重复地回答着。李队长被这种明显的轻蔑和作弄惹恼了，立即厉声训斥道：「你给我放规矩点，这不像你在重庆大学可以胡说乱言，老子对你的狂妄可以铐你，斗争你。」

然而蒲世光却笑了笑不紧不慢的回答道：「这刑期可是你们给我定的，这话也是你们讲的，怎么就不认？」「你敢顶嘴，你敢嚣张，你以为打不掉你的气焰是不是？」那姓李的毛小子狂怒了，当下安排了晚上开斗争会。

晚上斗争会开始了，姓李的问道：「你说，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向政府说话？」他对着到场的陌生面孔，不紧不慢答道：「一天等于二十年，可是你们这么说的，对不对？我判的就是二十年这也是你们法庭判的。我用你们自己说的话回答你，你怎么就听不懂？向我一个小犯人发火？」斗争者哄哄堂大笑，连那李姓的干事也忍不住把脸扭了过去。

用轻蔑的态度，讥讽鞭打横蛮的人实在是一种上智，何必为自己的不幸而伤心？笑对着暴政，笑对着今天，这种高尚的德行，可不是轻而易举可以修成的，「推古验今，所以不惑」。看来这位同学入门了。

我们本约定，下次开炉时，再在这里约见。可没有料到，五天以后他便被调走了，后来他到那里，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平反后，同患难生还的同学们，都说没有见到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活在人间？他的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笑谈，却至今还流传在我们之间，与他的音容笑貌一起！

与蒲世光相见前后的日子里，我又在金工车间，邂逅南桐看守所认识的「三一九」。那是为解决一个车头箱的主轴孔加工余量不足该如何补救时，我到了车工组那架老八尺车床上，当时他是这台设备的主机手。我最先认出了他，自从南桐看守所斗争以后，他被很快调走，就没听说过他的下落。至于当时在看守所，他如何会严重到像死囚犯那样戴着全刑具入狱，我就不得而知了。

冬天渐渐来临，一九六一年最后的岁月充满了寒气。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在黄色的灯下触摸这些冰凉的铁块，全身都会发抖，人们说肚子里没有货，身上当然是冷的。但除此之外，我常常被一种内心寒冷所控制，废品一天天的增多，那位主管金工车间的分队长，成天红眉毛绿眼睛的盯着报废的工件咆哮，虽然有时参加斗争会的人，听着听着竟闭上了眼睛打起瞌睡来，他们显然是太疲劳了。疲劳得连这位分队长操起铁棍向他们刺来，他们只是白白眼。

##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

这牢头那里能体谅到在如此恶劣条件下，仅靠用手工操作的个人技能，是无法保证毛坯不会发生废品的。其实疲劳至极的人内心虽然有一种本能的反抗，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并没有用废品来发泄不满的想法。在废品面前，人人都在动脑筋，如何弥补。

几乎个个明白，倘被队长认死了某道工序的责任，与破坏生产相联系，轻则遭到斗争，重则加刑！扪心自问，谁都不至于烂到在这里安心坐穿牢底而不想回家的。划线工序是夹在各工序之间的，我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难过起来，几乎所有废品的事件都要把我叫去。

有一天，见沈师傅的铣床四周，站着一大堆人，六名铣工全在那里，分队长也在那里板着脸，只见沈师傅哭丧着脸，双手下垂站在他的铣床面前，沮伤的面对着一大堆待铣的电机主轴。两个机修工已经把铣床的变速箱盖打开，正在卸下工作台。平时专供清洗零件的大油盆里面，堆着从变速箱里拆出来的齿轮、轴和其它零件。

他是一个在铣床上操作十几年的老铣工了，平时虽然不多说话，对工作却非常认真。那时由于每天几乎持续近二十小时工作，一般操作者在工作中打瞌睡，往往忽视对机器的维护，而他坚持每天对他的铣床实行保养，足见他对设备的爱护。他只有十年刑期，已过了五年多了，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他的年纪也四十岁了，对工作不敢马虎。

大约一个月前，他曾向我讲过，这台铣床工作不正常，并且还拿出这台设备的说明书，那上面有传动机构的简图，想同我一起找找铣床每次由低速档换高速档时，发生异响的原因。

问题发生后，我曾多次看到他在每次停机的短暂时间中，打开变速箱盖，用手拨动齿轮，进行检查，但是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我认为，新机床在使用初期，齿轮因齿面误差在磨合期发生异响是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按说明书及时进行保养，更换机油，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要么请机修工，彻底的寻找并加以排除，那非得停下生产，至少也要花两天时间，这首先是分队长不允许的，只有等三保大修时再说。

不过机床可不像人，人可以带病每天二十小时工作，机器不行。

果然，几天后一天早上开机不久，咔嚓一声巨响，正在检查零件的沈师傅连忙去关电闸。但为时已晚，机床被卡住，再也无法启动。开箱检查，齿轮箱冒着蓝烟，主轴上一个双联齿轮被打烂。分队长咆哮着，铣刨组一片沉寂。我捡起那已被打烂的齿，细细看着，想从那齿的缺陷中找到原因，替沈师傅摆脱他所处的狼狈局面。

从那刚刚断裂的白颜色断面看，显然淬火过大，但没有测硬度也未作金相分析，无法作结论。我又在灯光下细细看有没有旧的裂纹，再看齿形结构，能不能在过量根切上找到原因，但没有测定工具，也没有测量手段无法判断，这些非主管人所不能的。

现在，只有听凭那分队长在那里妄下断语了，一味只知道政治挂帅见物不见人，一味只知道暴力能征服一切，不尊重科学的人却是作结论的主人，就是这些横不讲理的大老粗，会吼人，会骂人，再把一切都归于所管的犯人。

斗争会是避免不了的，整个的铣刨组全是陈旧不堪的设备，就这么一台新的立铣，而且是唯一的一台用钱买的设备，这一台当家铣床一停，由印刷机改制的铣床和另一台立铣床是无法承担某些加工的，由此而造成大量的配件被堵在铣床工位，其后果可想而知。

幸好经过对变速箱的彻底打捞和清洗，除了在残油中找到了断裂的齿轮碎片，还什么都没有找到，否则那沈师傅有意将机床打烂，破坏大跃进的反革命罪行，便是无法抹去了。

「我确实请机修工检查过，但是他说，没有测量工具怎么检查？光凭肉眼也只能看看装配是否松动？销子是否脱落？半轴是否晃动？齿轮啮合面吃合得好不好？该装的垫子是否有漏装？润滑油是否加足？」沈师傅沮丧地哀求道。



铣刨组的人谁都知道，沈师傅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平时我与他接触就知道，凡是图纸上他没看懂或工艺编得有误时，他总要叫我把车间调度叫来，直到弄清了以后，才敢动手加工。

三天后，买到新的齿轮装上，结果仍然换不起档，搭上挡开机，发动机嗡嗡直响，就是不转，看来，事故并未排除。修复方案拿不出来，沈师傅的祸算是闯大了，铣床组一连开了一周的斗争会，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大家已经疲劳之极，坐在空荡荡的车间里，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寒风，使参会者缩着头，分队长像审讯罪大恶极的犯人那样，朝沈师傅狂吼。

斗争会开得令人无奈，倘若不是因为没有人比沈师傅技术更高的人代替他，他恐怕早已关进了小监。就是在斗争他的那一周内，他的行动被严格限制了，连上厕所都必需向组长报告。显然，检察机关已对他立案起诉了。

事故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只好把所有的罪过推在沈师傅身上。最后还是找到了机床原来的生产厂家，将整个传动系统全部进行更换，如此闹了整整两个月，才使这台设备重新运转。

三个月后，沈师傅接到法院的判决，以反革命破坏的罪名加判十年，合并原判二十年，但一直又没有将他调走，监狱的管理人员十分明白，求一个无偿劳动的技工并不容易，他们也知道沈师傅决不是故意破坏，像这种不明不白的刑事处份，既可以吓唬所有在押人，还可以继续奴役这些技工。

后来，沈师傅的爱人接到他被加刑的消息，以为盼他出狱无望，只好与他离婚。从此以后，沈师傅更加消沉，人也痴呆了。

沈师傅的铣床破坏一案还没有结束，车工组发生一起学徒工组织逃跑的事件。三名学徒：唐元、徐均和胡大鹏先后被推上了金工车间的批斗大会。这个斗争会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月，成为这一时期鼓噪大跃进而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同新犯组不同，斗争企图逃跑的人还是第一次，因为生产车间开斗争会，必须在完成当天生产任务以后进行。

又只有开斗争会，斗争会又选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到了此时，持续了十八小时的劳动、眼睛都睁不开，谁也没有兴趣在斗争会上干吼，对被斗争者动手动脚。「端正态度」的任务全由红袖套们所组成的「打手班子」担任。

想到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要遭这罪，心中自是恨恨不平。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呼啸的冷风直往颈子里灌，真叫又冷、又累、又饿。为了减轻这种折磨，所以个个都作了准备，把所有的破棉袄、烂夹衫都统统捆在身上，用毛巾或被套当作了围巾将颈项死死地围住。头上包着床单破布之类的东西，单将眼睛和鼻子露出来，如此装备就如同银幕上看到的战俘营里的战俘一样。作好准备后就盘腿坐在那里，安心心的打瞌睡。

## （六）春节『同乐』

从监外不断涌进来的新犯口中知道，大饥荒像洪水般肆虐着老百姓，大街上抢粮店、抢食堂甚至抢菜店的事层出不穷，农村中抢粮仓，攻打县武装部，县政府等以往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终于出现了。特别令当局吃惊的是，这些「反革命暴乱」的头目，竟有中共的地方干部。

当局比任何时候加强了防范和镇压，监狱不断暴爆满，刺刀下「下水道」密如蜘蛛网，就在这种背景下，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噪，渐渐从广播中，报纸上消声了，而我所在的监狱工厂也不知从哪天开始，恢复了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

也记不起从哪天开始，铸造车间就停止了化铁炉，生产那些苏联式的机床床身停止了。那些堆在院内进行时效的铸铁件，也许就永远堆在那里无人过问了。直到一九六三年春天我离开时，被废旧公司用卡车拉走，我想他们多半同丛林铁厂的废铁，落得相同的命运。

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再没被驱赶，日夜不合眼的连续二十小时「困战」，同时也再没那么多废品纠缠我们。自从对唐元三人斗争会结束后，一段时间就再没开这种令人困倦的「疲劳」会了。

尽管我们仍在这铁丝网中，被刺刀比着，穿着囚衣，每顿依然是半罐杂粮一瓢菜，过着牲畜般日子，但精神压力明显在缓解，三年毛氏疯狂的三面红旗消失了。政府官员也公开承认国家很困难，尽管在为暴政作掩饰。

一九六二年春节。我们所在中队准备监狱联欢晚会场地。分队长说话的口气，相对缓和了好多。我第一次听到他对这些劳动力们讲出「辛苦了」这句话。他说国家很困难，厂部正在考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剂和改善大家的生活。

并宣布春节以前提前三天，各车间停下生产，打扫清洁，特别清理，被电焊工的焊机和工具零件堆得乱七八糟的「戏台」。

传出消息，川剧学校的学生要来我们这里进行演出，演出四郎探母、百宝箱等等传统川戏，并且宣布春节期间一直要放假到初五。在此期间家属来探监的时间和范围都放宽了。

政府如此的「转变」，颇令我们吃惊。

不过，大家都学乖了，有话都咽在肚子里。在这高墙深监之内，告密已成为公开，人们因告密而处处防备。每个人早已习惯了在盘石压迫下扭曲自己的本领，每个人都强忍着饥饿而说不说，每个人都对暴政怒目而不言，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良知紧锁在骨瘦如柴的身躯壳里。对无产阶级专政，既恨又无可奈何，久而久之，人连真善美都分不清了，人性被残酷的斗争磨灭了。像乞丐一样，只要有半罐饭，维持着生命，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吧。我这么强忍着自己的情感，一直忍了二十年！不，一直忍到暴政被放弃和清算的时候。

那时，我仍对我说，谨记着：「冷眼观变。」

我这几年来就是被中共抛之荒野的孤雏腐鼠，像一个过早被人抛弃的孤儿。犹如泛萍浮梗，随着风吹而动，从大监狱而至小监狱，又从小监狱而到大监狱。回想前年春节，我被那鲁召带进监牢时还是那么幼稚和无知，来不及用理性的头脑审视面前这条布满杀机的坎坷路，为半碗囚饭而大闹监房，不可不谓匹夫之勇，直到得了一纸判决书，我才预感到，我是把牢底坐穿的命。

只是每逢「佳节」，都难免勾起我对苦难亲人们的情眷。顾附之恩，无以回报。我至今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在高墙之内，离他们也并不远，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他们我的下落，因为，倘若我见到白发苍苍的外婆，驼着背，拄着拐杖由我的弟弟扶着，隔着铁窗与我相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老人家？

看到同一监舍的人被唤去接见自己的亲人，抱回一卷草纸，一联肥皂，知道那是妻子或老父母的一片心。这年月得到这些东西多不容易啊！看着归来者眼角里留着刚刚淌下的泪痕，不免替他们感到伤怀。

其实，我早已习惯了孤独的生活，没有肥皂，我的衣服就从此不用肥皂洗。没有草纸，我用惯了废纸，这些小困难怎能算一回事？

初二这天，大坝子里果然热闹非凡，当我们按照划定的位置坐好以后，四中队的女犯和二中队的老犯，相继从大门进入坝子。这对于一中队四百多号几乎与世长期隔离的关押者来说，两个队的来到无疑增添了节日的热烈气氛。虽然事前分队长一再打招呼禁止「窜队」，但是我周围的人们都争着翘首相望，不断有地人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来，同进场队列中的相知或亲友招手致意，并不理睬分队长的制止和吆喝。

那一天，我同老潘紧挨着坐在一起，他今天带着一个大布包，打开里面，放着针线袋和一卷蓝色的旧布，一副老花眼镜和一件刚刚才领到的破棉衣，看样子是利用这难得的时间补一天衣服。

这一年的冬天，监狱没有新棉衣，发给大家的是不知从哪里收来的旧棉衣，还要确实没有棉衣，又无法过冬的人才能领到。我因此才意识自己身上所穿的，其实比老潘正在缝补的更破烂。从那时候起，我才效仿老潘，准备了针线盒和破布，自己动手补巴，否则就等着衣不蔽体受冷吧。

大家坐定，在喧闹的锣鼓声中，川剧开始。我对川戏实在是门外汉，由于缺乏起码的修养，我甚至对那有名的「高腔」颇反感，如果允许自由参加，我一定不会来的。而周围人讲的龙门阵，除谈接见时收到家属送来的东西而外，便是一日两餐的罐罐饭。

戏台上在唱些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绝境，政治上这个舞台，已够精彩。戏在天天的演，自然有心的人就会天天看，看好这本戏，于我一生也就蛮不错了。

侧眼去看老潘，他正一本正经，全神贯注在那里穿针缝补，不时拿起补的巴来端详一下，似乎津津有味地在欣赏自己的一件艺术品，对周围就漠不关心了。

倒是戏台上的那些演员在卖力吼着高腔，令我颇有感于他们那种不知从哪里来的精力，在这饥饿的年代，真是很不容易的啊！

晚上，戏台上扯起了电影幕布，今晚电影：「乌鸦与麻雀」，看那剧中人物的悲剧，就比中学时代看这部电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现在看这部影片会时时与自己对比，我们正在演出的，比之电影中的悲剧更惨十倍。

只要保持着一片清净的心，悲哀也就不致于那么伤心了。

春节过后，生产一直很闲，除了马达外，原先的产品已逐渐不再生产了。工厂明显的在找活干，新增加的品类，例如电瓶车、拉丝机和洋钉机，因为所来的配件已不是自己生产的铸件，结构也简单得多，事故已渐渐的消失。被关押在这里的人除了因分罐罐饭和稀饭尾子，经常发生争吵外，相处得也平和多了。

人们有了空余的时间补衣服，甚至打牌下棋。到第二年「五一」节时，分队长还组织了一次车间的篮球比赛。而我所关注的是监狱里可以接触到的书籍和报刊，在技术室里我天天都要读报，报纸上的消息也极其低调平和，在经过了一阵狂热的喧闹后，编辑们似乎也在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毛泽东显然在极不情愿情况下，让国家主席刘少奇出面来收拾这被搞得一塌糊涂的烂摊子。

但几年以后，当国家渡过难关，稍有喘息后，黄雀在后，毛泽东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事实上确实证明刘少奇再没有翻过身来，最后死在牢中，充当了现代的活生生的东郭先生，留下了中共专制之下倾辄的历史奇闻。

受苦的当然是老百姓。水肿病像幽灵般，长期缠着我们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囚奴们，当时，铣刨组八个人中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有五个人因患严重水肿病而住院。住院病人最后进太平间是常有的事，狱方对水肿病人配给名叫消肿丸的黑色药丸，然而大家都明白，这怎么能治好这种长期饥饿的「病」？

### （七）监狱医院里临死前的饿殍

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个早上，我醒来就感到发烧，咳嗽不止，胸部气闷而疼痛。后来疼痛加剧，晚上一睡下便感到胸部受到尖锐的刺痛，三天三夜不能入眠，且发烧到三十九度，医生判定为外感引发胸腔积水，窜入胸腔所致。

于是我便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为急性胸膜炎和胸腔积水。当即便留在医院里住下了。后来，医生为我抽出了胸腔积郁的黄水，打了几针，病情有所好转。胸不痛了，烧也退了，只是骨瘦如柴了。

又过了几天，稍能行走，我便怀着好奇心，打听到对面的几间病房是专门住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特级病房，一来，想询问一下我父亲的下落，二来也想了解一下这些「高级犯人」的情况。便在一个下午吃过饭后，私自走进了那编号为〇二的房间。

一走进去第一眼就觉得与大病房有所不同，病床的床位很宽松，若大一间房间只有两张病床，住着两名六十多岁的老头。我进去时正碰到他俩正在分护士刚刚送来的一盅「流汁」，那长脸的长者正将流汁倒进两个盅子里，让那圆脸的先拿，两人一付认真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大监房中的犯人。最后还争着去括那送来盅里的残羹。

他俩喝完了自己的流汁，便向我投来陌生的询问。我开始问他们知不知道我父亲的情况，说出他的名字后，他们都摇头并不回答，眼光里含着长期蓄养的警惕。我又问道：「听说你们二队供应优惠得多，每月每人还有二两白糖？」

哪知道，那圆脸的长者一脸不高兴，板着脸向我正色道：「你是那队的？到这里来干什么？」闻得其中不甚欢迎的口气，我正要回答，那长脸的却开口道：「你问这些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住院规定，病房里的犯人是不能窜病房的？按照监规也是不准窜队的么？」

那口气分明在训斥我，我还没有认真思索说错了什么话，便被下了「逐客令」，讨了这个没趣，一脸羞愧的走出他们那房间，心中老大的不畅快。

想到两位在「旧社会」还颇有地位的人，到这儿来怎么会变得如此的猥琐？连那口流汁都要斤斤计较？是被长期监狱训驯得如此，还是他们本身就养出的防范和忌讳？难道这是一个衰落民族阴暗的心理？看来，在这个牢房里打听父亲的下落，除了一种偶然的缘份，人海茫茫，监狱封闭得比铁板还死。

两天后，由两名犯人抬着一个担架送来了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病人，据说是重庆某看守所的在押犯，那已快入头伏的夏天，病人被白色的床单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头颅在外面，一张像骷髅的惨白的脸，双目紧闭，处在昏迷状态。

护理人员和抬担架的七手八脚将他抬下担架，安置在最里面的病床上。我们这病房一共安放着八个病床，全是呼吸系统的病人。除我之外其余病床上全是生命处在旦夕的重病人。

那刚刚送来的病人，经过医生的一番忙碌，打过强心针后，输液架便在他的床边升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护士手艺太差，还是这个病人的血管已经细到难以用输液针头插入。打针的护士费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将针头插进病人的血管中，过了两个多小时，病人才渐渐地清醒过来。醒来后便一个劲的狂咳，从那撕人心肺的哮喘中，令人感觉到他正在同死神作最后的较量。

那天晚上，同房病人被他的咳嗽声吵得无法入睡。没有人陪伴他，医生指定刚刚退了烧的我为他义务护理：在每一瓶葡萄糖药液输完以后为他传唤护士，按时给他服药和喂开水，喂流汁，接小便，以及晚上等他输完液后，拨下针头……

第二天上午，他似乎清醒过来，睁开眼睛，轻声地嘀咕什么，可是那声音低得来根本无法使旁人辨听。只见他做着手势，示意希望能坐起来，我便扶他坐起，那一身真算是骷髅架一般，将被子塞在他的背后，刚刚坐定，又是一阵猛咳，见他用手指着小便盆，我连忙递了过去，便见他口中吐出一口血来。

九点光景，护士又给他输液，要我替他捉好昨晚输液的手，我细细看去，那手背早已肿得像发泡的馒头，手背上已扎扎了二十几个针眼。看来，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该在那里扎针了，只好换一个手，又费了好大的劲才给他输上液。

虽面对着这个命在垂危的人，从他那黑洞洞口中艰难喘出带着血腥的臭气，令人恶心和窒息，但受同情心的驱使，我还是很细心照顾着这素不相识的病人。

他的三餐是由医生决定的全流汁，所谓全流汁只是普通的豆浆或藕粉，每次我用小匙喂进他的嘴里，但他只喝了几口便摆手，中午配给他的是稀饭和馒头，他每次也只喝几勺稀饭，将馒头紧紧的捏在手中。

看得出他心中好想吃那白花花的「美食」，可惜已咽咽不下去了，如此紧捏着，足足两个小时，也许再也捏不住时，才缓缓地松开手指，馒头掉在床上。

同室的病人见到纷纷议论开了，一个说：「唉，活着的时候，想吃却没得吃，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有吃的，却又吃不下去了。」一个又接着说：「看他那样子隔死也不远了，还打什么针吃什么药？」一个又说：「也不知政府通知他家里的人没有，听护士说，这个人还是长航局的一个副局长。」另一个人接着说：「当官的又咋个？进来都一样，当官的也赏赏当犯人的滋味。」

一个病房七言八语，议论开了，据我所见，在看守所也常有抬进太平间的，也不见送过什么医院，这一个人能从远地送来，证明了他为官的身份分。

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有一条阶级路线管着的，只是他的妻室儿女恐怕此时未必知道，她们的父亲或丈夫住在这里进行抢救，渡过他的最后几天。

不管这个人真是「当官」的也好，或像我的父亲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也罢，这种临终的不幸，未免要勾起面对他的活人们的同情。于他来说，幸好还有一个我为他端水送药，免去了临终时的孤苦无助，我因而联想到我的父亲，倘如也是这般的病危，就不知道有没有人守着了。

接连两天，新来的病员异常的不安，咳嗽呻吟、吐血，不停的呻唤，令整个病房不安。然后是医生的打针、输液，那手脚虽被针头和窜在皮下的药液胀得馒头般浮肿，看着他那痛苦，想到关进来的人，生前受不尽的折磨，为显示政府的「革命的人道」临死还是被弄得这付惨状。

第二天晚上，大概因连续两天的躁动耗废了他仅有的体力，而安静下来，咳嗽也渐渐停止，除急促的呼吸，呻吟也渐渐消失。不料靠门口床位上的那一位中年人却开始恶化，气喘不止，护士忙为他输了氧气，打了针，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才稍稍平息。

两天两夜没有睡好，我困乏已极，大约凌晨五点便熟睡过去，直到八点钟，送「流汁」的饮事员才将我惊醒，接过流汁，我用勺凑近病人的嘴边，他只轻轻地抿了抿嘴，并没有张口，仍在昏睡着。用手掰开他的口送进了药片，也不知他吞下没有，直到中午时分他突然醒来，伸手接过那白面馒头，像很饥饿很想吃的样子，但终于没递进口中，不一会又沉睡去，这天中午，天气亢热，病房里却一反常态，安静异常。

大家都累了，我也迷迷糊糊地睡去。突然嘭的一声，我从迷蒙中惊醒，只见我面前这病人左手垂在床沿上，手中拿着的半边白馒头已掉在地板上。右手还按在胸前紧紧的抓着另外半边馒头，双目已经紧闭，骷髅的脸上微微的一种不屑之情，使我感觉到他已经死亡。

忙看那胸脯已停止了起伏，用手触摸他的鼻孔，先前直喘的气也已平息，我俯身贴在他的耳朵，轻唤了一声，他没有任何反应，忙叫来值班医生和护士为他测了脉搏，然后看了瞳孔，最后，将他盖在身上的白布，拉到头顶，蒙上了脸。

我明白，他已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便从他的右手掰开那深陷在白馒头中的僵硬手指，一边取下那馒头，一边喃喃地说：「唉，可怜的人，阴曹地府中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你不必带这人间的吊命粮去见阎王老爷，今天你自由了，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必为饥饿烦心，为寻觅这烟火食发愁。只可怜你的儿女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死在这里。好在现在你的游魂自由了，即使这监房锁着你的尸身，你的游魂此刻可以去寻找你的儿女亲人了。」

收拾他的遗物才从他的衣袋里得到一封信，那是半个月前他在看守所里写给自己女儿的信，从信中知道，他确曾是航运局的领导，信中他告诉女儿，他已身患不治之病，吐血不止，估计不久将离开人世，在生命最后这段日子，他同意妻子向他提出的离婚请求。也同意女儿和他划清界线，但忠告她，「今天世事险恶，一定要小心处世。」

他的身世我不知道，不管他身前是何许人，但已在囹圄之中，定有他的原因。也许若干年后这妻女知道他如此而赴黄泉，并读到这封临死没来得及发出去的信，有何想法，是该悔恨，还是痛恨？

我呆呆地望着那具被白被单裹着的死者，这具等候火化的躯壳，也不知此刻他出窍灵魂可曾觅到自己的妻儿。忽然我俯下身去将那半边滚在地上的馒头拣起来，与他手中取出的另一半馒头合到一起，悄悄地塞进了那被单底下的骷髅头边，满足他在临死前那点愿望。

他死去第二天，那靠门床位上的中年人也落了气，凑巧的是他的遗物中，出人意外地搜出了一封长长的「上诉」。于是，我想到这些死在狱中的人，临终时在他们的口袋里会不会都有些令人费解的遗物？如果把它们凑合起来，未必不是对这个黑暗政治的一份有力控诉？

现在看来，忠告也罢，申冤也罢，都随着死者一笔勾销，其中一定会有许多永远都没说清的沉冤无法见到天日，埋到了浩浩冥府之中了。

病房中不出三天就接连死去两个人，顿时显得一片沉寂，那些卧床者枯瘦的脸上在想些什么？说不定他们就在明天或者后天，也步这两个先行者的后尘，一同去阴司，谁又能料到？

我忽然感到一种死神擦身而过的恐惧，想到我不明不白的被划为「右派份子」，继而又莫名其妙地关进看守所，想到我们全家人的悲惨遭遇，与其等死，也得弄清冤枉的名份。

知道医院的大门外就有邮筒，投递极为方便。被判刑以后曾经有过申冤的想法，现在被那刚刚死去的人所引发，过去一直苦于无法投递，今天便是时候。于是我找到纸笔，开始写下了第一次「上诉」。

## （八）第一次上诉

第一次的上诉状到了重庆法院，就投在那医院大门外的邮筒之中。

还没有过一个星期，医院的管教把我叫到院办公室去，我感到一种不祥的气氛。那天只有院长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脸上一付冷峻，我在对面的板凳上坐好后，他抬眼看了我一下，冷冷的发话道：「你叫孔令平么？」「嗯。」「什么病住院的？」「急性胸膜炎。」「你知道监规吗？」「嗯。」「政府不究你的犯罪，你有病为你治病，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你体会得出吗？」

沉默，因为我摸不准他说话的含意。「然而，你却不好好的养病，却在病房里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我没有违犯你们的规定。」我辩解道。

「什么？」院长霍的一声站起身来，「你现在是伏法的犯人，敢于在住院期间乱说乱动，现在还要否认，要我给你略点一二么？」他怒声喝道。

我不想去同他说什么，我知道在监狱里只有政府发言的权利，我的解释只能是多余，便坐在那儿闭着嘴一动也不动。

「你们以为一脱离了中队就可以胡言乱语，不守监规？你以为政府的人道主义是软弱可欺么？你以为你是病人就可以借机攻讦党和政府么？」他把话题缩小了，但，我实在还没有识别我讲错了那些话？

「你藉服侍病人，说什么人死了就不食人间烟火了，还说什么带着吊命粮去见阎王老爷，真是攻击我党人道主义，恶毒至极！不，你听听？你还说，监房锁得了你的肉身，却锁不了你的游魂，说再不必为饥饿烦心了，真是恶毒至极！」一连两个「恶毒之极」，使他的情绪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他站起身来，一面吼着，一面用手挥舞着桌子上的一张「检举」。

我终于恍然如梦初醒。半个多月来的高烧，烧得我确实有点胡涂了，我开始对我这几天的「放荡」有所察觉了。

这年头，无论到那儿，都要把自己的嘴封得严严实实，那怕是这群快要死去的人中也不例外，我这一曲给死人送殓时吟唱的内心悲歌，竟不知被那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当作请赏祭「神」的刀头了。

这位写检举的人出于何种动机？难道他真认为这么一纸检举，会使他得到病人特别的优惠，还是想得到「保外就医」？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此刻，我突然地感到了一种特殊的窒息之感，比之在病房中耳闻呻吟，鼻嗅病人吐出的血腥气更加的令我恶心。

但我实在愤恨这个昧着良心，歪曲我说话的恶棍。但是，转而一想，这种人难道还少吗？在当局的高压和引诱之下，形形色色急欲跳出火坑的人，充当局暴政的「卫巫」们，还少吗？倘若不是毛泽东为了独裁统治，制造使任何言论不能存活的文字狱。这病员中怎么会做出这种令人不齿的怪事？

我这么想着却完全无以对答，沉默了几分钟，院长抬起头来，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明天你出院了，但对于你在病房放的毒，必须向政府作出检查。你住院二十多天表现得不好。」他斩钉截铁的下了结论。

我回到病房坐在床边发呆，一点没注意周围人怎么看我。我知道我的病根本还没有痊愈，看看面前的五个垂危病人，会将随口说出的伤心话，当作「反革命言论」写进了我的档案里，就觉得这病房太闷，也不值得任何留念。

我开始收拾我的用具，除了一个碗，一张旧洗脸帕，一把牙刷和漱盂以及内衣内裤，我什么也无须收拾。

邻床的病人见我这般反常举动，向我问道：「要出院了吧？」我点点头。其实这些天同这里的人相处得蛮不错。在病号中比较起来，我是病情最轻，年纪最小的，平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乐意为他们端水倒尿，表面看大家对我挺客气，但此时我的心中像塞着一块异物，看着他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生命危在旦夕的骷髅脑袋里真不知在想什么？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带着我打好的小布包，跟着医院的一名干事归队去了。我的病真的没有好，一路上咳嗽不止。

回到一中队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到我的铣刨车间那块划线平板上去，而是又回到了一中队的反省组。进反省组的第二天，年轻的姜干事责令红袖套方伯非，督促我必需在三天内写好检查。然而我该怎么写这检查？我说：「死人不食人间烟火错在那里，又伤及政权的那一根毫毛？说带吊命粮去见阎王爷不是事实么？又攻击了谁？监房能否锁得了人的游魂？我不知道。人死了当然不会再为饥饿而烦恼！我所说的错在哪里？」

生活教育了我，就像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成千上万过去迷信过中共的人，能抗拒这种教育吗？难道在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来对死去的人说这番话，就叫新的犯罪而必须交待代么？

在医院大门口投的那一封上诉信，肯定是收到了，屈指算来从五八年反右戴帽至今已糊里糊涂的过了四年多，是不是所有中共的冤狱都这样糊里糊涂将人屈打后，胡乱扣上帽子呢？

然而，我在四年来，遭受的奴隶般的折磨和饥饿，同这一块土地上一连串的悲剧竟有机的黏合在一起。

从此我一口咬定法庭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制造冤案，以此公开回答狱方。于是我在狱方责令我写检查的纸上，写了第二封「上诉」，这一次不是投在邮筒内，而是面对面的交给了那位姜干事。

差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我因触犯「监规」而被责令写检查时，我的「检查交待代」，都是这个样子。在这些材料中我痛骂重庆法院，我知道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对我加重惩罚；但在法律已被猥亵，无理可讲的年代，这样做说不一定比一味忍让能收到更好的自我保护奇效。

是非既被混淆，那么诡辩就占了上风，罪和非罪本身就是相对的。定罪的原告，被证明是冤判，照样可以被打成被告，这也许就是「文字狱」的制造者们难以预料的了。

我的「检查材料」果然触动了监狱的管理者。

一九六三年初，一中队的最高行政长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去，他给了我十分微妙的回答，他说：「你在狱中，特别是在医院期间，没有按照犯人的要求规矩服法，屡犯监规，这种不认罪守法行为，是监狱所绝对不容许的。至于你有冤情进行上诉，又为什么不在上诉期内写？何况，我们是执行机关，管不着你原来的判决是不是冤枉，但是我要正告你，在你的判决还没有得到原判机关改正之前，你必须在这里规规矩矩接受改造，而决不容许你乱说乱动。」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二日，由石板坡，凤凰台两处监狱关押的两百余名已决新犯，和一中队经过调整产品结构认为多余的人员一共三百名，集中在孙家花园一中队，下午五点钟由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把我们押上了去成都的火车。

在那一次的大调动中，我和王大炳，潘朝元都被列入了这次发配边荒的名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边荒流亡苦役的生涯！

#### 第四章：\*\*流放甘洛\*\*

在我们同一车厢里的一百多号犯人，许多都是原来在一起的人，除了王、潘二人外，同车的还有那在金工车间被斗争的唐元澄和徐世均等，不知道是因为相互存在戒心，还是因为对于将被派往何处怀着渺茫，我们彼此很少说话，夜间行车在车轮撞击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中，昏昏入睡。

三月十四日，三百多名从重庆送来的犯人在成都宁夏街监狱集结。等待从四川其它县市看守所，陆续来这里集中的人员。两天以后，各路集结的人员到齐，总数五百人。这么多人的集结，调往何处？去干什么？这些事关每个集结者切身的问题，一直还是一个「谜」。

事前，由于严密的封锁消息，我们中只有瞎猜。那几天，我把自己当作一片飘落在湍湍大河中的落叶，不知汹涌的河水会再次将我卷向何方？

当晚，狱方把全体人员集合起来，宣布明天就要出发，所去的地方是一个「土地肥沃，山青水秀，十分富饶」的农场。介绍情况的那个干事用了一大堆诱人的字眼，说在那里牛羊肉当小菜，有吃不完的瓜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的饥饿的囚犯，是一个多么强烈的诱惑？

这一晚上，老潘同我聚在监舍角落里，我低声问他：「对我们将调去的地方有何见解？」他抬起头来，愤声说道：「全是鬼话，要去的地方是西昌地区或梁山州，那里的情况我十分清楚，要说的不毛之地也许过份分，但什么牛羊肉当小菜，瓜果吃不完，全是骗人鬼话，越被他们吹得天花乱坠，未来就越险恶。」

### 第一节：\*\*流放途中\*\*

三月十六日清晨五点，大家被尖锐的哨声吹醒。我们立即从地上跳起来，收拾好各自的破烂，开过早饭，挨着监舍，便在一连串的吆喝声中，五百号人依次被押上停在监狱大操场中的二十多辆绿色军用卡车。每辆卡车上装着二十多人，同携带的行李挤在一起，挤得满满的。

半个小时后，一列长长的军用卡车车队，便在两辆吉普车的「押解」下，浩浩荡荡开出了宁夏街监狱大门。

装载我们的卡车里，每一辆车的驾驶舱中，坐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押车员。在驾驶室的铁板背窗上开着一排小孔，那押车员冲锋枪的枪口，已从那洞里伸进了车厢，对准着挤成一团的在押者。

二十多个人与散发着霉气的破烂行李挤在一起，车顶又被带着浓烈腊臭的篷布严严实实封闭着。本来经过长期的饥饿和关押，体质极虚的流放者如同一群易市的牲口，身在车中的我感到恶心。

我环看四周一个一个面带灰色的人们，有的眯缝着眼睛也许还在做着「牛羊肉当小菜，吃不完瓜果蔬菜」的美梦。

汽车在开出城区，上了公路后，便在乱石子马路上剧烈的颠簸前进，没超过半小时，便有人晕车了。这时还是早春时节，天气还冷，篷布异味的刺激越来越凶，加上剧烈的颠簸使人忍耐不住，一口发着酸臭的秽物，在忍无可忍时，终于在车厢里飞溅开来。

大家想找一把小刀，在那周围的篷布上抠开一个洞，但是所有的硬器在上车时都被押送者收搜一空。不知道谁保存着一把吃饭用的铁瓢，几个人就用那瓢和自己的指甲，去那牢实的帆布篷上抠开了一个小洞，让冷风直向车厢里灌，以驱散污浊的气息。要呕吐的人都依次的去那洞口，把肚子里早上倒进去的两瓢玉米稀饭，翻肠兜肚地倾倒出来。

等不及的人只好就地发作，顿时呕吐的秽物，带着一阵阵的酸臭、充满了整个车厢。于是大家拼拚命的扩大那篷布上的洞口，一直扯到足有碗口大小，那洞便成了大家急救的出口，算是解了围。只是满地都是呕吐出来的秽物，车厢里的人已顾不上那么多了，车厢里就像一群被押着的牲口。

从成都到雅安，是这支庞大队伍千里行程的第一天。当年连接这些川西主要城市的干线，四百里公路依旧是黄土垫地，乱石铺面的「机耕道」。经过雨水冲刷后，路面上坑坑洼洼，汽车在上面行驶，左右摇晃，猛烈颠簸，加剧我们这些牲畜般流放者的晕车。

中午时分，车队到了邛崃，停在城外的小镇上，押车的士兵和军官走进了小镇上仅有的一家食店。我们在押车武装的指定下狼狈下车，每一个车围成了一圈，士兵们取出了干粮桶，按规定每人每顿发给一个由三两面粉做成的馒头，士兵叫来了几个附近的农民，挑来了几担水。

趁着下车休息的机会，我站在那里深深地呼吸着从田野吹过来的冷空气，长长地舒了一下腰。先前被昏车弄得天旋地转的状态，慢慢恢复，一面打整着流在衣服上的呕吐物。

回头向这支押解我们的车队望去：前后有吉普车押送，车上架着机枪，绿色的卡车一字长龙，浩浩荡荡，足足拉了一百多公尺。路边衣衫褴褛面色腊黄的「公社社员们」用陌生而恐惧的目光，看着这条绿色长龙，有的两眼直勾勾盯着我们手中拿着的馒头，样子很是可怜。

### （一）夜宿雅安



天色已晚，车队才开进了雅安城，按当局安排，半小时后，车队开进了雅安监狱，我们从漆黑的车厢里爬出来。三元宫，本是道家修行的场所，如今改成充满血腥味的监狱，已是对先圣的大耻大辱了。道家奉行的是清静无为，主张相互杀戮的凶手都可在太虚，元清之中修成正果。

而今，暴力可以洗劫它神圣的殿堂，却永远改变不了天道的真谛。那屋顶房梁、窗户、雕塑中留下来的八卦图文中，就有那永恒不灭的精灵藏匿其中。此时此刻正在那寂静无声的雕梁壁画中切切窃窃私语，听去宛如晚风拂过的回声。

雅安的监舍比宁夏街的监舍大得多，一个房间里足可以容纳白天两个囚车里的人，我们房中挤着五十多个年轻人，借着微弱灯光，彼此相看，大多都是重庆孙家花园的老熟人，原先在孙家花园那个大坝中，平时被监规约束，很少说话，今天便成了老乡，打破了过去对面相撞从不交谈的僵局，亲热劲一上来，话匣子也冲开了，彼此互问身世，拉着家常。

当五百人陆续被关进监房后，三元宫院内短时间宁静下来，我们感觉到，周围黑洞洞的窗口里投射出来的，是这儿主人们饥饿的眼光。

片刻宁静以后，监舍中有人在喊报告：「报告，要吃饭。」奇怪的是那清脆单调的呼喊，经过那些藏匿的精灵们的回应，竟像一片呐喊。岗楼上投下了一束强烈的探照灯光和厉声的喝斥，好像在给自己受惊的魂壮胆似的。

整整一天，早上落肚的两瓢稀饭，已被颠簸的汽车从肚子里翻净。中午只吃了三两干馒头和一盅开水，一天旅途劳顿急需补充，此时与其说旅途让人困乏和难受，不如说饥肠辘辘使人心慌。

不到一个小时，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几名雅安监狱的犯人头，将刚刚出锅的一大桶玉米面调的粥抬到了院坝里。监舍的铁门后面开始骚动起来，不一会，牢头提着一串钥匙，打开了第一号监舍门，每个人拿着自己的饭钵，鱼贯着排成队，到桶边接回两瓢稀饭，端回自己的监舍。

半个多小时，所有的人都捧着饭钵蹲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片唏唏嘘呼的喝粥声回荡在廊沿里。两瓢稀粥下肚，逼退了周围的寒气，心里顿时热呼起来，旅途不堪忍受的饥渴冲淡了许多。

忽然一个戴眼镜的人高声的提醒大家，他喊道：「你们想到没有，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馒头没吃到。」

经过眼镜一提醒，腹中的饥饿发作了，一位瘦瘦的年轻人立刻响应说：「早晨的稀饭都吐干干净了，一天只吃了一个馒头，肚子依然是饿的。」这年头，同一个家庭，兄弟之间为争一口饭而成仇的有之；农村中为争几个红薯失手打死人进监狱的人有之；大街上为抢人碗里的面条米饭而酿成流血事件还少吗？何况是政府发的一个大馒头。

经方才那眼镜和瘦子的点拨，立即引起了五百来号人的共鸣，有人立刻证实：「对，我也亲耳听事务长给押车员这样交待代的。」年轻人一齐吼道：「刚才吃稀饭时，为什么不把馒头发给我们？」「肯定是押车的老婆娃儿吃了！」大家七言八语议论开了，平时在监狱中绝不敢公开讲的话，现在公开的说出来了。

在粮荒如炙的今天，如果牢狱的看守们克扣被囚者的囚粮而引发的惨案，这狱吏们该罪不容赦！

## （二）狱中抢馒头

「找老管要馒头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人喊道，他一声吼，其它的人一齐响应。「报告！」「报告！」的喊声此起彼伏在三元宫上空响成一片。

在高墙下这些随时可被打骂的犯人，敢于为一个馒头集体与全副武装的执勤兵算帐，最先提醒大家的眼镜，成为带头人和组织者。并且率先的对着铁门上的风窗向过道里喊道：「报告干事，我们车上还有一箩筐从成都出发带的馒头没有发给我们。」

那进来的管教干事朝发声的门走去，「报告干事，我们今早从宁夏街出发时，事务长就向我们宣布了政策，今天路上带的干粮是两个馒头，中午我们只吃了一个，还有一个该晚上拿给我们吃，但一直没有拿。」眼镜不卑不亢的解释道。

不出一分钟，在刚才抬稀饭出来的门中，雅安狱方的一个管教干事打着手电筒走了出来，岗哨上再次打开了探照灯，对这支充满了不安的大队人马，雅安监狱加强了戒备。「干什么」？那人走近以后用手电筒在发出报告声的监门上直晃，一面疾声喝问。

关在十个监舍里整整五百号人，此时全都扒在各自监门的风口上，关注着眼前发生的事。但是，手电筒熄灭了，那人转身向原路走了回去，也不知道他是去询问，还是根本就不与予理会。大家耐心地等候着，大约又过了十分钟，进门口那一方依然毫无动静，看来，刚才进来的那人并没有过问这件事。

于是，第二次报告声浪响了起来，这一次是十个监舍，五百个喉咙同声呐喊。

又过了十分钟，过道上那隐蔽的进口处打开了，刚才抬饭出来的几名炊事员，抬着一大箩筐的馒头放到院坝中央。然而，走过来打开监门的牢头，并没有像刚才那样依次地把监房门打开，而是将所有的监门一齐打开了。

顿时，五百号人一齐涌到坝子里，在探照灯下黑压压的站了一大片，谁也没有被指挥，大家便一齐向那筐白馒头围了过来，将几名炊事员团团围住。

「站开一点，一个一个的来，排好队！」炊事员向越围越紧的人们喊道，「排好队站好，否则就不发了。」押车员迟迟赶到，向着围绕的人吼道。但是人们拥挤着，嘈杂声把几名押车员的吼声淹埋了，五百人开始乱起来。

「站开一点，排好队，一个一个来」那围在最中间的炊事员吼道，声音里带着颤抖，他们预感到一场无法控制的事件就要发生了，就在这一刹那，有人动手向箩筐里抓馒头，这像无声信号，顷刻间所有的人一齐扑向箩筐，顿时人声鼎沸、抓抢、扭打像炸弹般爆裂开。

人们扭成一团，隔箩筐远的拼拚命向里挤，里层的人被压倒，有的整个身子压在箩筐上，盛馒头的箩筐也被踩扁。抢到馒头的拼拚命向嘴里送，向衣兜里塞，馒头在人群脚下踩成碎块，遍地都是踩碎的馒头屑，还有人将碎馒头捧进脱下的帽子里，有的因此手被踩伤，手上脸上到处在流血，院中一片混乱

三秒钟后，被院内大乱惊呆了的岗楼上才回过神来，怒斥与吼声已被淹没，哨兵们拉动枪栓扣动了板机，向空鸣警，机枪喷出了火舌，子弹在抢馒头者的头上呼啸着掠过，伏在三元宫房顶上的精灵们怒吼了，一场监狱内闻所未闻的数百犯人集体抢馒头的悲剧，炸炸呼呼地在上空拉响了。

一分钟后，一队大约由三十名全副武装的看守，端着冲锋枪冲进了庭院，对这群抢馒头的流放者大打出手，饥饿的囚犯被军警打伤，并被军警们驱赶回到监舍，跌倒在地上的人爬了起来，不顾身上在流血，仍在不停地狼吞虎咽地啃着到手的馒头，有的用手紧紧的护着装馒头的衣兜。

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岗哨的认定下，将刚才为首抢馒头的几个人捆翻在地，拳打脚踢。顿时，喊声和哭声大作。

在院坝中当场捆起来的「带头人」，被单独地关在一间专门的小房子里，此时他们身上几乎全是伤痕和血迹，三元宫的监狱当局连夜对他们进行了提审，记录下他们的名字和集中前所属的监狱，以及捕前所在的工作单位。

那眼镜名叫邓自新，原西南毛纺厂的一个工人，那瘦个子叫文廷才，高个子叫锤平波，原来是一个中专学生。

当问到陈力时，提审者问他：「今晚的骚动谁带的头」？他冷笑的回答道：「这一切不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么？如果按时把大家的馒头发发了，会有这场事么？」提审者没有和他计较，明天还要赶路，谁也不敢耽误这次大调动的行期，审问草草了结，到了凉山再作计较。

如此过了很久，随着一排排上锁声和岗楼上厉声的喝斥响过之后，院坝里慢慢的静息下来。成都的押车员开始在各个监舍里清点人数，走廊外不断地有背着冲锋枪的士兵在游弋。

凌晨两点，一切都渐渐地静息下来，疲惫不堪的流放者带着刚刚经受的惊恐和伤痕，蜷缩在拥挤而肮脏的牢房中沉沉睡去，料峭的寒风掠过三元宫上的瓦脊发出阵阵啸声，卷起院坝内那些洒在地上的馒头屑，发出沙沙的响声，有的馍屑被干凝的血迹牢牢的黏附在坝子中间，不肯随风而去，仿佛要在那里作证昨夜发生的一切。

而此刻，恐怕只有那藏匿在道观的精灵们，才能证明这场五百人监狱骚动的真正元凶是谁？

然而，在那个被高墙的枪杆压迫得可怜的中国囚犯们，在中国人连自己挨饿都不敢直言的时代里，今天，竟有这五百个在枪杆子下面驱押的流放者，群起而动，不但敢于直接面对枪杆子索讨属于自己的那份口粮。藐视这铁窗下和枪口下恐怖的秩序，大闹了三元宫，干出了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中国人的反抗没有也不可能被暴政消灭？！

尽管他们是自发的，今天在中共长期黑暗的专制统治下，没有讨饶没有屈服。这一群为生存而搏斗的无名英雄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因为这是些处在长期专制主义下，用血肉身驱在刺刀下开拓民主曙光的人！

以后，这支队伍中许多杰出的人，在流放边荒的苦难中，频繁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反毛泽东专制独裁的故事，在一潭死水的中共监狱中，绘出了一幅幅对黑暗控诉和不屈不挠反抗的灿烂图画。

抢吃，今天已成为中国公开的社会悲剧。只是老百姓间为争一口饭发生的搏斗，无论演得多么惨烈，却无损悲剧的始作俑者。苦的是老百姓，忍着饥饿连「饿」都不敢说！谁说：「吃不饱」或「我饿」，这种生理本能的话，必冠以闹粮，及对三面红旗不满的罪名追到斗争会上。轻则挨斗，重则坐牢，杀！

周厉王「道路以目」的时代竟大摇大摆的复活了，老百姓饿肚子既归于天灾和苏修，谁还敢说共产党半个不字？

人类因没有足够食物而濒临死亡绝境时，妄命抢夺食物，甚至出现同类相食的情况，在人类史中累见不鲜。汉书就有汉末黄巢举事，其部下高欢用车载人肉充军粮的记载。

就是二十世纪的今天，人吃人仍常见于各种刑事案件中。当然，就广义而言，人吃人，可以说成是一种黑暗的社会现象。寓意着统治者的残暴。

一九六三年，当我们从甘洛农场的「鬼门关」调往西昌黄联关，以后调往盐源农牧场时，这个案件的立案卷宗一直跟随着我们，一九六三年，还在盐源正式开庭。

当时，邓直新的口供依然是：「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藉这件事大闹雅安监狱，更没有谁进行有组织和预谋的暴乱，检查官，我说的是事实，我只是饿慌了才伸手去拿那个你们配给我的馒头的。我当时并没估计事态会因此而失去控制。如果我不饿，怎么会为一个馒头而被打、被捆，直到今天，我的手上还留着残迹。」

从雅安到甘洛，邓自新被捆了两天，一直押到甘洛时才松松的绑。长时间的受捆，使他在松绑时，双手不能复原，成了一辈子的伤残。一九六四年他因此刑期由原来的八年加到二十年。

除邓自新外，当晚记录在案的几名为首者，文廷才、邓小祝、锺平波等人都无以幸免的受到加刑的惩处。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端专制主义者，正是靠这种残酷的镇压，镇服着六亿大国的普通民众，让他们长年忍受着饥饿，还不敢吐出「饿」字来。

### （三）老母坪—鬼门关

历史上因押解饥饿的囚犯而发生暴动的事，像著名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义，可以导致秦王朝的倾覆。

经过昨夜的折腾，成都派出的押车人员怀着猛然惊醒的不安，第二天从雅安监狱押往汉源的途中，雅安的狱方增派了警力，每一车的押车员由一人增加到两人。为了进一步镇摄被押送者，当着五百人的面，将昨晚被大捆的五个人并不松绑就押上了囚车。

其实我们知道，这五个人并没有产生妄亡命一搏的打算，更何况这其中的年轻小伙子绝大部份患有水肿而虚弱不堪。

到了天亮时，昨晚那股不知从哪儿窜出的劲已消失，人可不是钢铁，而是非常脆弱的动物，旅途的困顿，加之昨晚几乎一夜未眠，早上，当牢狱们打开监门时，许多人从地上爬起来，都显得艰难。我感到两腿直打抖，两眼直冒火星。

当我吃力的提着破行李艰难的爬上车厢时，我感到浑身发烫，我知道我是病了，上车后便一头栽倒在车厢里，迷迷糊糊的睡去，直到汽车在颠簸不平的车道上重新摇晃着行进。我不希望就此结束生命，抛尸在这放逐途中。

天老爷果然没有抛弃我，当我们最终要到达目的地的那天上午，我的烧神奇般的退掉了。

第三天中午时分，汽车队在离甘洛县城大约几公里的，名叫老母坪的地方停了不来，通向目的地大约二十里了，是一条几乎是由这儿的山民们踩出来的，曲折盘环在大山山腰间的小路。当我们被喊下汽车时，足有三个班全副武装着的士兵已在那里迎候着我们。

想必甘洛农场的管教干部们已接到通知，知道这是一批曾在路途上发起过「暴力抢劫」的危险队伍。要他们步行在山间走这二十里地段，要确保安全。

其实，被长途跋涉拖得虚弱不堪的队伍，已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大家原本水肿，加上连日路途风寒，五百多人仅靠两个随身携带的红十字医药箱来应付各种疾病。能撑到这里暂时还没有人死亡，已属于苍天怜悯。

押送这支重伤的伤病囚奴，走过这最后的二十里地真该担心的是，他们能不能挺住越过这段山路而不被抛尸荒野！

站在老母坪那片吊在半山崖间的巨石坪上向外望去，眼前是一片藏隐在茂密原始森林中的峡谷。就在那云雾缭绕山势重迭的原始老林中，隐隐约约从那峡谷中冒出来的炊烟和破旧茅舍中，找出这儿有人栖息的踪影。这里是汉彝两族为主体的民族杂居地带，就是百姓们所称的蛮荒之地。

我们脚下的这片巨石平坝上，排着几幢刚刚建起来的土木结构的平房，平房前悬挂的木牌上写着：「甘洛县城市建设指挥部」。从左侧傍山一片伸向密林深处地方，已砍下树木一片，依稀看出一条与「天梯石栈」相勾连的马路雏形，远处不断传来隆隆的开山放炮声，告诉我们甘洛城正在被开发中。

两天的高烧已经退去，人很虚弱，但脑子已经清醒多了，面对着眼前这场景，令我立刻联想到四年前，我们从重庆大学到南桐矿区丛林炼铁厂的初期，脑海里映出了大炼钢铁的景象，我们像一群奴隶，被中共任意的驱使着，从一种奴役到另一种奴役。

高烧始退，打着哆嗦的脚才站定，我们五百人便被四十多名士兵集合好，排成一列长队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唧唧琅琅踉踉的被驱赶着，走上了那条通向「神秘」去处的山路。

老母坪上空悬在半空中那像鹰嘴的山石上，仿佛正用它凶煞的目光，审视着这一队从它爪下经过的破衣裳们。饥饿、腊黄、憔悴的面容并没有改变他们固有的年龄。这是一支平均年龄没有超过二十五岁的年轻队伍。

他们怎么也不甘愿此刻一过这「万夫莫当」的关口，等于投入了万丈深渊，五百人进去不到十个月，竟有一半生命就葬送在那深山隐藏的去处，再没有出来……

#### （四）彭大胡子最先去死

行不到一里地，队列中一名大约三十多岁，满脸胡须的人就倒在地上呻吟不止。他的破行李撂在一旁，坐在地上的喃喃的说着胡话，听那口音分明是福建人，看样子是病得不轻了。

押队的士兵走上来不分青红皂白的朝他身上猛踢了两脚，喝令他立刻站起来跟上队伍，但无论怎么踢、吼他都站不起来了。

当兵的便把随行的一名背着药箱的犯人叫来，问过以后，证实他已经发了两天烧，现在的体温至少是四十度，便无可奈何的给他取来水壶，送上两片阿斯匹林，叫另一个年轻犯人背上他的行李，押在队列的最后继续赶路。

一路上因为疾病而停停走走的人越来越多，队伍足足拉了两里多长，派来的士兵被迫分散成好几段，虽然这些士兵本能的残暴想发作，鞭打驱赶这支队伍。但是，那队列中狼狈不堪的状况使他们感到无奈，就这样拉拉扯扯

扯，直到傍晚时分，「先头」部队才到达一片开阔的长满了草的坪坝上，这就是此行的终点——甘洛农场的场部所在地。

当我踩进这片草坪时，天已十分黯淡，天边阴蒙蒙的寒雾已包围着山坪，借着寒雾泛出的余光，我抬眼四顾，草坪周围突兀的山峦中隐约藏着一条神秘的小道。一座无形的「围城」使我陷入八卦阵的感觉

这真是一处天然的地狱，整个的草坪唯有我们刚才进来的地方，才像是一条通往阳间的路。如果把这蒙蒙不清的围城比作一个袋口，那么唯有这条路便是口袋的袋口，谁进来了就别想只身再撞过那袋口。

那平房倒十分的宽敞，其中的一排显然住着这儿的管理人员。因为那儿有武装的警察把守着门口，另一排里则圈着牛羊。不过，那牛圈真是太宽大了，足有几千平方公尺的木柱式建筑中，还没关到二十头牛。

这一夜，我们这五百人就被安置在这宽大的牛棚中，与牛同宿一室。好在，已经快四年的改造生活，早已淡忘了我还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回想汉初，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所囚，而过着牧羊人的生活，十八年与羊共寐。

大陆，从六十年代开始，把人关进牛圈的事已是阶级斗争的家常事。改造的形象莫过于把活鲜鲜的人当作牲畜来驱使。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把当权派也关进牛棚，从此以后，「牛棚」便成了毛泽东堂而皇之称作「改造人的理想场所」。这在索忍尼辛的著作里统称「下水道」，就是法西斯的集中营中也没有听说这名词，当为首创。

中共当局对我们的改造，不过是把我们当作一些用两条腿走路，会说人话的牲畜而已。所以很自然用「牛棚」，形象表示了这种场所，不会回避这种人牛共寐的怪事。

为了寻到一处少沾牛粪和牛尿的水门汀地，而抢着到堆着谷草的草树上抱回尽可能干而新鲜的谷草，铺下铺位以后，打开破行李将那床破棉絮铺在谷草上面，想美美的睡一晚，休息一下病体，看看明天会指派到那一处深山丛中去。

安好铺以后，取过洗脸帕，跟着别人摸黑在草坪的周边一条潺潺细流的小溪边洗了手脚。那溪水冰凉冰凉的，两天的发烧，触到这清凉凉的溪水，很觉爽快。忙过以后，天已全黑。

这一天好像是下弦月，上半夜漆黑一片，士兵们把早已准备好的电石灯在草坝和房子的四周挂了起来，并把由马驮着的干馒头箩筐抬到草坪上，一个老头挑来了水，大家狼吞虎咽地吃着干粮，直到把筐里的馒头屑都分光了。

押解的大兵们，大抵以为目的地已到，一方面对一路上这群十分虚弱的流放者已有了掌握，预计他们决无非份的打算。此刻就不再像一路那样过分紧盯这数百人的行动，不知跑到营地的哪一间屋子里去了。院坝里除了几个值勤的士兵外，白天押解我们的大兵竟一个都没有露面。

吃过干粮，大约又过了两个时辰，已是晚上十点钟左右，才从我们进来的路上传来一阵凄惨的呻唤声，掉在最后的两个人，在三名士兵押送下，唧琅跄走进了这块草坪，那最先倒在路边的满脸胡须的人，在一位同行犯人的搀搀扶下，几乎是爬行到了这里。他那痛苦的呻吟，撕裂着静寂的夜空，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看见他全身都在发抖，我预感他已难于再活下去。

难道这陌生的草坪，这黑糊糊的四周就是冥间么？天啊；他还只有三十岁，就这么被抛掷在这荒无人烟的草野之中？想到这里便不由打了一个寒颤……他似乎想从地上站起来，拼拚命地挣扎了几下，终于没有爬起身来。见他蜷伏着身体，我真难以相信，他是怎样咬着牙关走完这二十里山路，爬进这里来的？

一个便衣提着一盏电石马灯，指挥着两名犯人，把他抬进了牛棚，七手八脚地把他放平在一堆乱草上面，那马灯就挂在他头顶的墙上，在这黑压压的马棚中就这么一个亮点，不一会，一切复归于寂静。

距我睡的铺位大约五公尺以外栓着一头小牛，当我躺下时，我看到它那睁得圆圆的眼里，在黑暗中闪着淡绿色的光注视着我。我睡的旁边是一条尿沟，听得见那里面顺沟流淌的尿尿声，空气里弥散着牛粪的臭味，我嗅出那牛粪中还残存着一股山野野草的芳香。

几天的急行军和劳顿，五百号人大多已经入睡，宽敞的牛棚里响着阵阵鼾声。我仰睡在那草铺之上，不知是因为饥饿，还是因为一种恐惧，久久没有入睡，穿过牛棚的房檐望着天边黑蓝的夜空，月亮已经升起来了，稀落落的星星伴着她眨着鬼眼，出奇窥视着这牛棚中新来的陌生客人。

早春的夜是那么静，又那么寒彻心脾。当我回想白天看到老鹰岩前的最初印象，鹰嘴般的山石上似乎有一股凶肆的眼光在逼视我，预测将去的地方，脑海里一片恐怖。

第二天清晨，我在半酣中被嘈杂的人声惊醒。好一会我才想到我已经到了甘洛，并清楚地辨识身临之境，急忙睁开眼，看见昨天放置那大胡子的地方正聚着好多人，大家正议论纷纷，几个人正忙碌着。

不一会，四个人抬着一张门板，朝牛棚的出口处走去，那门板上直挺挺躺着一个人。我急忙爬起身来，下意识已经明白，便匆匆的向那门板走去。

果然，昨夜那呻吟了一夜的大胡子，正直挺挺躺在门板上。从与他同调来的人口里知道：他姓彭，原来是台湾高山族人，后来因为在战场上被俘，整编以后「光荣」地成为解放军，并因战功当上了连长。不久裁员，落户在四川南充市，在工厂当了一名小干部，后来，工厂清理阶级队伍，把他列为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又不知怎么搞的抓进监狱。

这次从南充监狱调出来时就有严重肝病，到了西昌，便发高烧，一直押送到老鹰嘴时，病情十分沉重。挣扎着连爬带滚，到了这甘洛农场的场部终于咽了气！

当他的尸体抬出牛棚，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那些昨天下午押解的武装和穿着便衣的农场管教们，从后面那排宿舍里走出来，驱散着围观的人群。

我呆呆的站在牛棚的出口处，目送着那张越来越远的门板，直到消失在那「口袋」的出口处。就这样，用门板抬出去，打一个坑，独自埋在这荒山野岭之中了。回过头来看看所有在场的人，此时，一个个都呆呆地面对着同一方向。

一阵莫明名的悲哀再次在我心头掀起，我暗自为他的亡灵祈祷，这是我们这支五百人的流放大军中第一个去上帝处报到的先行者。

他死了，总算免却了后来岁月所受到的磨难，免去活罪也许是一种幸运。

然而，对于站在这里的四百九十九名同难者心中，却压着一层阴云。谁如果不能挣扎着，挺过将受到的折磨而殒身在这口袋般的死亡谷里，谁都会同样被无声的弃尸在这荒野。这就是我们进入甘洛农场的第一个早晨，一个异常清醒和永生难忘的早晨。

## 第二节：\*\*西西卡的死亡谷\*\*

从八点钟开始，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就不停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初上唱片时就是反右派运动。当时的百姓们那里知道，后来中国接二连三上演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就在这首拼拼命鼓噪的歌声中，灾难便一个个降临到中国百姓的头上。

刚刚抬走了老彭，我听那歌就像是摧人命的丧歌。中国百姓被这首歌唱进了水深火热，饥寒潦倒。真不知这要命的歌声还要响多久？但那广播里发狂的回放，似乎说明当局在给自己壮胆了，难道他们此时一样的心虚？

九点钟后，穿着便衣的管教人员拿着点名册，将全体人员站队集合好，便各自呼喊划入名册上的名字。按照点名册早已定好的分流，将五百人分成了四大部份，将分别的被押向山谷深处的四个队。

我被一姓李的年轻人点到后，站在我们那一组的已有一百多号人，基本上都是从孙家花园调集来的，这一次王大炳、老潘同我又分到一个队。

集合好队伍后，我们便各自背上自己的破行李，在那姓李的和五个士兵的押解下，走上了盘旋在山间的羊肠小道。山回路转，出了场部的草坪，便一直在向上爬。这儿人迹稀少，经过一个冬天，路上茂盛的荒草虽已枯黄，但仍把小路严严实实覆盖着。

脚下的路好像是留在荒草丛中一条浅浅的划痕，昨夜的白雾在那划痕上凝成霜一般寒露，一边踢着荒草寻路，裤管已被湿透，加上从路边崖洞中不断喷出来的寒气，好像西游记里妖魔出没的地方，令人浑身发抖。

循着山路，转过第一个岔路口，回首再望那落在盆底的场部草坪，已被乱石遮去。还没走上三里路，草丛底下的石谷子路，用它尖利的石头刺破了我的破胶鞋，我的脚被割伤了。一阵剧痛，我已感到脚底在流血，便坐在一块石头上想脱鞋看看，却被紧跟我的士兵厉声吆喝，我只好站起来一跛一拐地艰难的走，就像被打受伤的牲畜，被主人抽赶着！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山谷深处一个小山寨，听那地名怪怪的，像是翻释名称，叫西西卡。「山寨」的前面迎面而来的是一棵巨大的黄葛树，黄葛树背后排着两列互成直角的平房。

其中靠西的一排，墙已塌掉。几个同我们一样的破衣服们正围着一付墙板筑泥墙。而那南面的一排平房，是经过修筑而成的「新」房子，房顶上冒着炊烟。

那些还在筑墙的「老」犯人告诉我们，这儿曾是五年前，轰动全国的康巴叛乱发生地，那些乱石就是的「叛民」们迭起的工事。

那远地方，应是彝族人曾聚居的村寨，那黄桷树必是寨大门的标志，恐怕只有它才能诉说当年亲见的一切！房前户后稀稀落落留下来的几颗柏树，还保留了当年村寨的遗迹。

当我们这支百余人的队伍，充满了不安和彷徨的神色，拎着破行李，零零落落地进入到黄桷树南侧空坝子时，早我们一步，先来了几个月的三十余名选遣者，从平房中走了出来，他们的年纪比我们大，最年轻的都在三十岁以上。

一个身披草绿军大衣，满脸横肉的中年人两手叉腰，已经虎视眈眈地站在黄桷树下面望着我们。他腰间别着一个黑色的左轮枪套，右手握着枪套里露出来的枪把，左手执着一根一米长的青杠棒，用他透着杀气的鹰眼，紧紧地盯着我们。那模样极像在全国各地上演的「林海雪原」，荧屏上的土匪头子栾平。

等到我们的队伍陆陆续续已经到齐，那位带领我们来的年轻干事，向他凑过去，递上了方才从场部带回的活页夹，两个人咬了一阵耳朵。提着青杠棒的中年汉子，将套在颈项上的警笛长鸣一声，几个管教人员便从南面的那排房子里走了出来，指挥着将新来的队伍和原来的犯人合在一处，排成六列纵队。

一个编制一百五十人，临时分成六个组的甘洛农场西西卡中队，便在那提棒汉子口中宣布成立。那人作了开场白，自我介绍说：「我姓张，是本中队的队长。」他吼道，横肉在他的脸上抽动。在他一一宣布了本队任职的六名干事的名字以后，随即作了第一次中队训话：「呃！你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改造你们才来的，为了把你们这些鬼改造成人，我们才到这娘屁的鬼地方来！」

「你们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到这儿来是开荒改造的，就是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你们的……」他停顿了下来，显然在思索下面该说什么却一时没有想出来，那一瞬间脸部的横肉厉害的抖动起来。

「世界观，」带我们来的那个李干事在一旁接了话，解了他的围。「对，改造世界观」他清了一下嗓门。队列中有人发出笑声，这似乎使他难堪，脸一沉用纯粹的河北腔吼道：「谁他妈的不听话，想从这里脚板上擦油的，就别怪我的枪子不认人！」他亮了亮腰中别的黑亮的左轮枪匣，继续宣布着：「谁他娘敢调皮，抗拒劳动，偷奸耍懒，我这青杠棒就要吃他的肉。」

他把手中的青杠棒向着天空挥舞着，一阵呼啸掠过我们的耳边。队列中一片静寂。看着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心中直打哆嗦。

看来，这儿除了打人没有其它压服这群流亡者的办法。在凶恶的鹰犬面前，我们这群瘦弱不堪的人，简直是一群在狼面前的软弱羊群。

此时，我突然想到昨晚死去的那姓彭的台湾人，下意识的抬起头来看看四周，四周全是高耸的青山，眼前除了一片荒野之外，什么也没有……

中队成立大会开过以后，那张队便向已集合的队列宣布开中饭。并且规定：「今后开饭就照这个队列排好，各组清点完人数后，报告中队长才可依次打饭，吃饭时不准吵闹喧哗。」

说毕，便朝南边那排房子的尽头招了招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两个炊事员，立即抬出了一个装着米饭的大烧箕，放在坝子中一个预先安放好的架子上。随后又进厨房里面端出了一个大盆子和一只水桶，大盆子里装的是黑呼呼的「菜」，水桶里装的是一桶米汤。

饿极的流放者怀着复杂的心情，一齐盯着那烧箕和菜盆。两个炊事员中个子稍矮的站到烧箕的背后，一支手抄着一个在看看守所最常见的小洋瓷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竹片，队列从最右边的一排开始，人们依次地走向那烧箕。

第一个人双手捧着他自制的大铁钵，接过那炊事员手里已刮好的饭团。他盯着那饭团，也许与他原来估计的实在差得太多，错觉的认为是不是还有一碗？便呆呆的站在那里，没有让位给后面的意思。直到那抄碗的炊事员用手去推他，他才极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钵移到菜盆边，那舀菜的炊事员便将一瓢黑黑呼呼的菜叶，舀进了那大钵里面。于是他盯着那大饭钵里连底都没有盖住的饭菜，一面又回过头去盯着那盛饭的烧箕。

突然，他眼睛一亮，盯着了那桶米汤，不假思索的将就手里端着的大饭钵，向那米汤里猛地舀去。这个动作迅速变成了无声的号令，正直着脖子看着前方打饭的队列轰然一声，所有的人一齐拥向那桶米汤。顿时，一场三天前夜晚，在雅安抢馒头的景象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不过这一次在场的没有一个是雅安事件的「为首份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混乱，西面那排房里所有的管教和士兵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那张队长直着眼睛，手里拿的青杠棒一时还不知该向谁打去，眼看一桶米汤被「抢完」，地上到处洒着打泼的米汤，那木桶倒在地上。抢到米汤的一个个咕都咕都的将抢到的水喝下了肚。奇怪的是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士兵和干事制止他们，像看稀奇似的目睹眼前这一场「戏」。

只有那张队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命令两个炊事员将饭烧箕和菜盆抬进了厨房里，直到下午两点钟，他才走出来，厉声的喝道：「娘的屁，你们刚刚才到这里，就抢吃的，不想活了不是？老实告诉你们，这里不是雅安监狱，谁他娘要找死，杀两个拣一双，有什么了不起？」

说着他又摸了摸别在腰间那乌黑发亮的枪套，此时院子里的人全都垂着头，那张队取出了点名册，对中队进行了第一次点名。我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杨治邦」，循着那应声的地方看去，果然是他。自从他们三人在丛林小学被逮捕后，我就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三人的下落，真没有想到我们竟在这里重逢。

当我接过那一团饭和那一瓢菜，定睛看时，那「菜」竟是平常人根本无法下咽的干萝卜婴，不但色黑味苦，而且只有一小撮，那饭不但比在孙家花园还少，而且几乎像干稀饭一样。这点东西对我们这些饿枯的人，乍填饿壑？

接过饭菜，我便向杨治邦凑过去，他告诉我，自五九年春被捕以后很快调到了雷马坪农场，三个月前突然接到调这里的指令，一来就接受这突击筑墙的「任务」，西边刚刚筑好的这排「新房」就是在原来残墙的基础上赶筑起来的。

他还告诉我，那中队长叫张丑德，是一个生性凶残的家伙，为了避免吃眼前亏，他告诫我遇事忍着点，不要去惹他。眼下这儿根本吃不到一点蔬菜和副食，那做菜的干萝卜婴还是特地从几百里以外的西昌买来的。平时厨房的灶头上连盐巴都看不到，凡是能吃的东西都锁在事务长的专用柜子里了。这儿的定量除了「仓毫」等说不清的原因，落到犯人口中的，每天恐怕不足六两。

我的心里对「活下去」发生了巨大的疑虑。便向他发问道：「那么，这么几个月了，你们怎么熬过来的？」他摇了摇头，一脸憔悴。「你们没来时，那张丑德为了我们赶进度，每天按规定量发足了我们的定量，同时每天还放我们下班时到山里挖蕨草根。」他指了指放在厨房外侧的一蹲石磨，「靠它每天晚上把蕨草根碾成浆，过滤以后便将那白色浆液与米共煮，味道虽苦，但可以充饥。」

监狱方面用牛羊肉当菜吃的谎话，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比画饼充饥还可笑。我们将在张丑德的青杠棒下，在高山峻岭的荒野里，现开荒地，再种上庄稼，等到神话实现那一天，我们中便不知有多少骨头，已在荒野地中去



敲鼓了。到了秋收时，命大的能挣扎着活下来，恐怕就寥寥了。

吃过饭，在张丑德指挥下，我们取出库房里已经破烂的绿色军车篷布，七手八脚的支架在那些刚打好的泥墙上，于是便成了我们「临时」监房的房顶。然后按所编的六个组，搬进了这「新居」的监舍中。

地上刚打的三合土还没有完全干透，我们已经管不了那么多，就去那些黄桷树旁的几个谷草堆中抱来了谷草，又一阵忙乱后，便各自按点名册的顺序打开自己的破行李。

当我把行李从坝子里搬进来时看到，挨着我铺位外侧的一个名叫胡俚的小个子，正趁我不在，将已垫在我铺位上稻草挪到他所睡的位置上。我被他这种自私损人的小动作激怒了，待我把自己的行李放下后，便不客气的将那一堆被他抱走的草重新抱回来，那小子又黑又矮，操着一口江津土话骂开了。

唉，真想不到已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还在逞强欺人，一种被人欺侮的羞耻感折腾了我整整一夜。

这一夜，我心里真不是一个滋味，心想在这种保命关头上怎么竟与这样的人相邻？听着山上的风，吹着帆布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又失眠了，西西卡的第一夜，给我极坏预兆。

从第二天开始，中队出动了一个组，进山打野菜，恰恰张丑德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个组。我们每个人配备了一个背兜，满山遍地去摘采野菜，规定每天每人要采三十斤的任务。

阳春三月，野菜虽然品类很多，但还没有冒出地面，开始唯一能大量采集的，便是那些从石缝里顽强生长出来的蕨萁苔。

派出去的人，没有不以寻觅充饥食物为自己的头等大事，而要在这光秃秃的山野里找吃的，首先就要寻找附近的彝家村落，虽然张丑德一再严厉禁止我们同这儿的老彝胞接触，除规定外出打野菜的人，每天必须完成最低的采集任务，还明确向我们规定，若发现谁与彝胞发生不轨的交往，除按违犯监规之禁条处置外，还用彝胞活活打死逃犯的消息恐吓我们。

另一方面，像我们这种纯粹的政治犯，不知会在这些灾难中充当什么样的牺牲品？不过，无论如何，最初人们寻找彝胞兄弟的目的，都是求取生存。

毕竟是边寨，由于民族的成见，以及毛泽东这几年强迫同化政策造成的反抗，他那套农业合作化政策，遭到了这些民族坚决的抵制。所以这儿农村中受到「三面红旗」的破坏，不及内地的农村。附近的村民们保留着大片自留地，每一家还存有有没有吃完的粮食，客观上可以用来救助这些陷入饥饿和死亡边缘的流放者。

开始时，凡出外找到彝胞的人往往「满载而归」，带回了黑糊糊的荞饼和玉米粑！不过他们散居在西西卡附近的村庄，最近的也有五里之遥，这么远的距离以及路途上遇到狗或野兽，及其它种种危险，给这些求食的流放者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加上这里人迹稀少，散居在附近村落中的农家就那么几十户，所能提供的食物也是从他们牙缝里挤出来的，数量有限，流放者须付出较大的代价才可换到。

换到手的食物又不敢公开带回住地，因为张丑德们一经搜出，当即便被没收，何况这一百多号人，鱼虫混杂，就是在求生存的斗争中，也充满了勾心斗角，相互检举并不鲜见。

所以，到手食物便塞进肚子里救一日之饥。偶有藏于野外建起秘密小仓库的，有时遭到了山耗子、兔子或野猫之类的动物，一夜之间偷袭一空。

再说我们身上的钱是被彻底收光了的，同村民们进行换取食物的只能「以物易物」。开始流放者将随带行李中的较为值钱的东西，比如皮衣、毛衣、皮鞋、床单、围巾、毛巾之类的东西带出去，没几天又被张丑德们发现。

对外出打野菜的人出大门时，受到严密监视，一旦发现身上有夹带，便被无缘无故的「没收」。任你费什么口舌和哀求也是拿不回来的。

有的索性把要换的衣服穿在身上，毛巾围在颈上，皮鞋穿在脚上到了外面再脱下来……这其中还有人想出了一个极妙的方法，先把被子捆紧捆好，外裹一床破席子捆紧在背兜底，然后将背兜翻过来，底朝天捆紧在底部的

被盖并不掉下来，于是便倒背着背兜给值勤的人以一个「空背兜」的假像。

不过像这种瞒天过海的作法，也真够惨的，五一节大检查时，张丑德们才发现，整个中队竟没有一件好的毛衣。保存着换洗衣服的人不到一半，多数人的破衣箱里已空无一物。还有十几人连破被盖也没有了。

流放者们挖空心思，像蚂蚁搬家一样将自己破行李中能换食物的东西，都悄悄搬进了附近村民的家里，剩下的是衣无二件的彻彻底底「无产者」。

我要算这一百多号人中最穷的一个，历经南桐的监督劳动，以后经过看守所孙家花园又是近三年的劳役，要讲耳闻目染，什么偷、拿、骗、诈在这种社会大学里本应学到一套「适应生存」的本领。可惜，本质决定了我却偏不染恶习，顶着政治犯这不识时务的帽子，与当局顶着干。

### （一）同彝胞换养耙

上山打野菜才两天，凑巧半路上，就碰到了两个赶着羊群放牧的小伙子。他们俩身上都披着这里的人叫作「查尔瓦」的黑色羊毛披毡，头上顶着大白布盘。我虽然并不相信那张丑德带有恶意诽谤的警告，但毕竟是第一次，单独的同这些从未相交过的异民族同胞接触，还是下意识地带着一种防备对方的警惕。

他们站在一条岔路口弯道边的一块巨石上，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背着空背兜向他们走进。「嗨！上哪去？」那年纪稍长的用生硬的汉语向我招呼道，口气非常和平，凭我的直觉对方并无任何恶意。于是便将脚步停下来，将自己的空背兜卸下来，放在他们立足的那块巨石上。但是从何说起呢？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附近有老乡的人家吗？」

「你到村子里去干什么，是不是换耙耙？」那年长的显然听懂了我的问话，也猜中了我的意图。看来，这里的村民们对我们拿东西到村里换食物，已成了他们人人皆知的事。也许因为交通不便，出于对某些工业日用品的需要，他们也乐意这样的「交换」。所以，只要一看到我们这种打扮的人便知道要干什么。

「唔」，猝不及防地被人道出内心意图的我，显出了一股尴尬的表情。

正要回答，那年纪较轻的小伙子说话了：「你走错路了，这里的人家都住在河溪边有水的地方，照你现在所走的方向是山上了，走到天黑都找不到人家的。」

他的汉话，比年长的那个伙计流利，他的补充显然充满了善意。唉！村落傍水这是一个常识，怎么我会糊涂到连这种起码的常识都忘了？也罢，既然对方已经猜中了我的心思，我也只有把话挑明了。

「你们有养耙吗？」我坦言相对。那两人相对一视，年轻的那一个从他那散发着异味的「查尔瓦」里面取出了一个布口袋，彝族人向来有长年不洗澡和不洗衣服的习惯，所有用的东西都有一股说不清的异味，一般的人会下意识的同他们保持着距离。不过，对于我们这种衣衫褴褛，饥饿潦倒的流放者，就根本没有挑剔的资格了。

那布口袋里装的是两个足有两公分厚，直径像小洗脸盆那么大，颜色呈黑色带着膻腥气的大养耙。一股饥饿控制着我，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成天为饥饿所困的五年里，我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厚实食物的占有欲所支配。

一股充满渴求和羡慕的眼光，从我的眼里迸发出来扫向那布袋，于是，便解下了那条围在颈项上的鲜黄色的新毛巾。

「用这同你换能换多少？」听我这话，那年长的便爽快的从那布口袋里取出一个养耙，并不犹豫地送到了我的手上，我真想不到，第一次同彝胞的交换竟这么顺利。尤其想不到一块毛巾竟换了这么大一个养耙！

我接过来掂了掂，那耙少说也有三斤重，这如果在重庆地区，三十个「高级饼子」未必有这的份量。早知道毛巾在这里能换这么多食物，我真该在重庆监狱里多准备几条带上。

我啃了一口手中的养耙，证明这确实是养子做的，便开始大嚼起来，吃着那耙并不觉得有苦味，也不想在他们面前掩饰自己的饥饿。那两个年轻人看见我那狼吞虎咽的样子，眼睛透出了怜悯和同情。

当吃完它的三分之一以后，原来十分饥饿的胃顿时感到一种满足，直到贴实以后，便停了嘴，看了看面前的两个人，将剩下的大半个养饼，用一张预先准备好的破布包好揣进了怀里，先前对于他们俩的警惕和防范早已荡

然无存，反而对他们的朴实、坦诚产生了一种亲切和好感。

于是我们开始攀谈起来，那年长的开始询问我的家和身世，也问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我开始语塞，别说语言的障碍，对于我的个人身世，就是碰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友，也难以理清其中曲折，我想我当时褴褛一身，已经说明了我的遭遇。敞如我告诉他们，我原是一个在大学求学的学生，以及我的「教师家庭」，恐怕会令这两个人吃惊，他们不会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会落到如此地步，所以只好避而不答。

「读过书吗？」我答非所问的反问道。那年纪小的看了看我，似乎觉得这问提得好怪！点头回答道：「读过，读了小学，后来黑骨头反了，学校关门了我们就不读了。」这是一个非常直率和纯洁的彝族人，那张丑德为什么要恶意的宣传这些可爱的同胞呢？

「这是你们家的羊吗？」我指着山崖下正在咀嚼枯草的羊群，大约四十多头骨瘦如柴。他依然十分率真的回答我：「不，这是我们村二十多人家所共有的。」那语言里有一种遗憾。「那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养羊呢？」我问道。

「那是叫什么『资本主义』尾巴，村里的工作组不准那一家私自养羊，否则就要一律没收杀掉！」他那话音里流露出强烈的不满。

「你们现在靠种庄稼还是放牧？」我的问话一下子打开了两人的话匣子。

「过去这里很富的」，他顺手抓了一把土地里的泥土凑到我的面前：「你看，这土色黑油油的，什么粮食都出得很多。」说完便滔滔不绝地赞美起他们的家乡来：「没有合作化时，这儿家家户户每年收打的粮食怎么都吃不完，像这么四十只羊，过去一家人就要喂那么多，肥肥的，平时从来不愁吃肉。」

「后来，黑骨头造反啦，他们不要共产党，不参加合作社，不要当官的汉人。」他指着右边一排穿着枪洞的石垒群，讲述六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激烈枪战。

当然，康巴事件的内幕恐怕不是他们俩搞得清楚的。那一次事件终于被共产党血洗了。后来，靠枪杆子逼迫，老实巴交的彝民依然没有躲掉合作社的枷锁。

「一切都归公了，这儿驻进了上面派的工作组，清理造反的人，开斗争会，哪一家不听安排都不行。从此以后家家户户再没有丰收节日了，家里短缺了粮食，连牲畜也跟着遭殃。」

那年轻的小伙子露出愤怒的样子，这些年他的家乡发生的一切「巨变」，都在他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反感！

他望着那些在荒草堆里寻觅食物的羊群，停顿了片刻，继续往下说：「一个冬天下来死了二十头羊子，原先由各家集中起来的两百头肥羊，现在也死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这几个做种！有什么办法？合作社不配越冬的牲畜口粮，那牲畜哪能熬得过？」

我们之间这番坦露心迹，使我们初识便成为好朋友，临别时，我们相约过两天我们仍在这里相会，便挥手道别。

往回走时心里特别高兴，今天我的运气真好。趁着腹中有货迅速采满了一背兜蕨萁苔，便兴冲冲地赶回黄桷树。

## （二）阎王的「饿死鬼殿」

回到中队的院子里，时间还不晚，院子里已经堆了一小堆野菜，这告诉我还有人先我一步回来了。我放下背兜，一边喊那代昌达为我「过秤」，一边取过中午的饭菜，准备先上一个厕所后再吃，我把饭钵放在三合土墩子上，便朝那刚围好的厕所走去，听见里面传来轻声的说话声，听那声音极像胡俚。

于是轻轻地走到门边停下脚步侧耳去听，果然是他，他正向张队长报告卢建华早上外出时穿的一套新西装。

听说一名华侨卢建华，法院认定他是一个里通国外的「特务」。别看那张丑德外表一付土匪像，对于这一百五十个人的档案上，几个挂了号的人，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此刻胡俚的检举引起了他的重视。不过，在张丑德看来，卢建华内着西装外出，恐怕不会只是用它来换彝人的玉米粑的。

想到这毒蛇就睡在我身边，心中未免发毛，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怀揣的养料，知道带了回来恐怕反而是祸事。一面回过身去看那距厕所不远的黄桷树下，灵机一动，快步地走出厕所向黄桷树走去，回头去看对面的哨兵正朝我张望，于是我装成寻找东西的样子，重新折回那条打野菜的路，绕了一圈，藏好养料，再回来。饭钵早已空空如也，里面装的中午饭菜不知谁已「代劳」了。

我拿着那空钵闷闷不乐的走进监舍，下意识地看了下胡俚那铺，心中正纳闷间，坝子里张丑德的哨子响了，开晚饭了。

代昌达正在用畚箕将堆在坝子里的蕨萁苔，装进厨房里的洗菜槽，草草清了泥巴，便撮进了厨房的大锅中，煮沸后将熟野菜装入河边的一个大木桶中，用清水「漂洗」。石梯阶下横躺着一条长流着溪水的溪沟，大木桶就放在那小溪边。

第二天清早，代昌达便从那大木桶捞出已变黑的熟野菜，倒进煮开的苦荞粥里，用勺一搅，便成了每天这些劳役者的早餐。这是一种又涩又苦，黑褐色带着苦艾「清香」的东西，我敢说是连猪都不吃的。

每天早上张丑德点名以后，衣衫褴褛的人们端着自已的大铁钵，排着队，焦急地向那饭桶靠拢，依次接过两瓢野菜羹。那接过粥的，一边走，一边还在用舌头去舔沾在铁钵边上的「米」汤。

自从第一顿中饭就发生了因抢米汤的事后，中午便改成了「罐罐饭」，外加一瓢又黑又苦的野菜。开始的一段时间罐子里蒸的是两个人的「定量」，两个人分一罐饭，纠纷当然不断。

到这儿来体质已极度虚弱的流放者，身体更趋恶化，水肿病肆虐着一百多号人。他们中除附近打野菜的人，暂时可以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随带衣物用品，向附近村民换取一点食物，其余的人从一早开始，便在士兵枪托和张丑德青杠棒的押解下，驱向周围的山地从事开荒。

那生荒地底扎满了盘根错节的芦草根，一锄挖下去，锄头便被那芦根咬住。全身浮肿的开荒者常常因体力不足，无法将芦草根挖翻，弄得不好，被芦草根扯住锄头，自己也栽倒在茬口上。

因饥饿昏倒在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起初规定每人两分地的开荒任务，谁也没完成过，那张丑德下了指令，完不成任务的不准收工。为了督战他亲自提着马灯，在深夜四面漆黑，山风呼呼的山梁上，听见后山传来的锄头声。

但是，昏倒在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并不送医院，只令一名姓冯的犯人医生做一下人工呼吸，扎扎几下银针，吃两片药。等到从昏迷中醒过来后，继续劳动。但是，几天以后，有的昏倒的人经救治不能苏醒。张丑德被迫下令往场部医院送。结果，送去的人一去就再没送回来。

### （三）卢建华等人之死

张丑德变得越来越暴躁，用自己手中的青杠棒，抽打那些倒在地上满身浮肿的人已成为家常便饭。工地上一时成了虐打流放者的场所。那儿经常可以听到刺人心弦的呼救声。

自从西装事件发生以后，卢建华第二天便停止了出外打野菜的劳动，并调入了开荒大部队。张丑德对流放者的残暴虐待，在他的心中留下了绝望。连日来不断的有人昏倒工地，送往场部医院的人使这个中队迅速在减员。卢建华被安排开荒工地的第二天早上，便称病不起。

当张丑德杀气腾腾提着青杠棒走进窝棚时，卢建华横躺在乱草堆中。「起来！」张丑德开始用青杠棒去打他的头，卢建华并不理睬他，依然双目紧闭。对于像卢建华这样的犯人，上面是打了招呼的，张丑德忍着卢的「无理」，向棚外喊着黄大中，黄医生提着药箱立刻出现在门口。

「去，给他检查一下什么病？」张丑德向黄大中吩咐道，一面去坝子里集合点名。

十分钟后，黄大中走出了窝棚，向张丑德作了口头报告：「卢建华体温和脉搏都正常，没有病。」张丑德听到这个结论，顿时怒从中焦起，恶向胆边生。他无法容忍这个卢建华对他的藐视，立刻走进窝棚中，这一次他连问都不问一下，拿起手中的青杠棒，向横躺在草堆里的卢建华劈头砍去。

血，立刻冒了出来，卢建华依然一声不吭。张丑德盛怒益发不可收拾，举棒在卢建华身上猛劈！直到张丑德忽然觉得有些不妙才收了手。

卢建华此时双目紧闭，静静地躺在那里，血还在不断地从头上，身上冒出来。张丑德怅然的提着那染着血迹的青杠棒走出了窝棚，喝令在院坝里已集合好的人上山劳动。

谁也没有再去过问他，卢建华就一直躺在那里，中午收工也没有人提及这件事。直到晚上收工点名开饭时，张丑德才发现卢建华今天一天都睡在窝棚中没有出来过，立刻再令黄大中进去检查。一分钟后老黄慌慌张张向张丑德报告说，卢建华失血过多，心脏已十分微弱，已处于休克状态，生命危在旦夕。张丑德才意识到今天「失手」打死犯人了，而且还是一个挂了号的犯人，立即命令两名炊事员抬上担架，将卢建华连夜送往场部医院。

半夜归来的代昌达透露，卢建华抬进医院时已经死去。然而张丑德严密封锁了卢建华死亡的消息，他自己内心最明白他是打死卢建华的凶手。直到场部后来有人来西西卡调查卢建华死因，仍按他的意图写上「因病死亡」四个字。

又过了两天，开荒工地上另一个小伙子赵小光，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突然喊肚子疼。当时

他面色苍白在满坡芦根的荒地上打滚、呻唤。张丑德走过来，先说他一贯不好好劳动，现在是为了躲避劳动装出来的。后来又说他乱吃地里的野生植物，总之是这小子们的错，这一次他不敢下手打人了。但拒绝了赵小光求医的要求，也不准他离开工地回棚里休息，这么一直熬到晚上收工。

第二天早上，当张丑德提着他的青杠棒，驱赶大家上山开荒时，不见赵小光入队，走进赵小光的窝棚，见他扑在乱草堆里一动不动。用他那青杠棒去戳赵小光的头，竟然毫无反应，这使他本能的察觉，赵小光已经死去。马上用手取出一个大口罩，一面喊黄大中，一面将口罩严严实实罩在嘴上。

晚上张丑德召集了中队会，煞有介事的规定：为了保护大家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后任何人不准偷吃生冷。并以此为队规，公开贴在墙上。

西西卡接连发生两起死亡事件，引起了农场场部的注意。尽管在这种草菅人命，把流放者的命当作猪狗不如的年代，可对于急需廉价劳力，刚刚才成立起来的农场场部，一个中队成立不到半个月，短短两天中，就接连发生这种现场恶性死亡总是一个问题。赵小光死去的第三天，场部便派了两名干事到西西卡实地调查连续死人的原因。

几个对「罐罐饭只吃了定量的一半」，认定中队克扣粮食早有怨怒的小伙子，听说来人是场部下来调查卢建华死因的，便围着来人告状，声称「我们的口粮只吃了一半」，「大家靠吃点野菜怎么劳动，怎么活下去」？还有人不敢冒昧，诉说张丑德打人的恶习，这些经历了雅安事件的人，面临死亡威胁，正在寻找求生存下去的斗争方式。

当然，这种控告无异于小鬼向阎王爷告状，不要说来人不可能同情犯人，即使碰到讲一点人性和良心的人，对大家的呼吁也只能无可奈何。何况张丑德早有防范，在他的安排下，向来人提供情况的胡俚，代昌达和李治和之流。尤其是那胡俚，怀着卑鄙的动机为了讨好张丑德，着实将卢建华污蔑了一番。

来人根据这些「犯人」所提供的材料，最后在他头上以「一贯坚持及改造立场，对抗中队教育」的大帽子作了「盖棺论定」。在死亡原因上写着「因病死亡」。而赵小光则作了「偷吃生冷致食物中毒死亡」的结论，在这种任意诛杀无辜的大势之下，无数无辜者就死在张丑德之类的酷吏之手。

紧接着又过了两天，当晚上清点人数的时候，野菜组的组长向张丑德报告，何亮从早上出去就一直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张丑德起床就跑到野菜组来，证明这何亮一夜未归后，便命令立即清点何亮的铺位和行李，检查证明何亮铺上除了一床烂棉絮和一床破被单外一无所有。究竟是何亮的东西平时换东西吃完了，还是昨天早上席卷而去，连这位组长也说不清。

当下，张丑德对何亮作了逃跑的结论，建队不到半个月首开了逃跑记录。也许原先他曾估计这儿四面环山，地形险恶，这些犯人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不敢贸然外逃，殊不知流放者目睹这儿无异于死亡谷，早就有了死里逃生的打算。

#### (四) 张棒棒

特别令张丑德心烦的，首例逃亡，竟发生在他原先估计不会有人外逃的野菜组。野菜组的人逃亡所带来的麻烦比其它组要厉害得多，这些人早晨放出去，满山放野鸭，谁也不知谁去向何方，如果有人早上就跑了，也要等到晚上才能发现，隔了整整一天，已经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派出人追捕吧，在这茫茫大山中间那里去追？

野菜组自建组以来，成了秘密「搬家组」，整个中队的犯人们都已行囊空空，从重庆带来稍微能穿的衣服，值钱的用品，就被这个组的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彝家村寨去了，这些情况张丑德哪有不知道的？但是，派谁打野菜还不都一样么？尤其令人恼怒的是那个阳奉阴违的胡俚，他夹带出去的东西竟是全野菜组最多的一个，只因为这胡俚还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张丑德一时没有撤换野菜组，何亮的外逃终于促使他对野菜组进行了大调整。

当天出工，张丑德即宣布原来的野菜组撤销，它的所有成员全部参加开荒劳动。今后打野菜与炊事员编成一组，他宣布了六个人的名单，全队立即大哗，今后西西卡的一百五十号人的这点口粮又多了几个两条腿的耗子，日子更难过了。

进入西西卡时我本已极瘦，身高一百七十公分，体重仅三十四公斤，可谓真正的皮包骨头，唯独两脚肿得像馒头。开始，每天外出打野菜，不时会碰到好运，换些吃的，精神还有所寄托，每天耗蚀的体力也较小，即使如此，每天背回二十斤的蕨萁苔也会两腿打摆。经常担心会因失去平衡，一跤跌下去便爬不起来。

野菜组撤销，我被编入开荒二组，说也奇怪，开始那几天连续地在夜间做梦，刚刚死去的两个人似乎不愿去阎王殿，几乎每天都走进了我的梦境。我小时候虽素来并不相信人真有灵魂，但从打成右派，便开始接受了鬼神这种信仰，常常以此来理解我所碰到的「噩运」。

不知道是因为恶梦还是太饿，开荒以来抡起的锄头，扎进那芦根盘错的土里以后，就像被那根咬住，既挖不翻转，又拔不出来。锄头前的那一坯土，欺我力量不够，戏谑般的直盯着我。

我同几个形体一样干枯的人，站在布满芦根的黑土地上发呆，这时我不禁想起南桐看守所外出收麦的情况，想到那肥沃的黑土地，被三面红旗的巨风吹得荒芜一片，埋下了多少老实农民的尸骨。说不定明天我会跟着死者一道埋尸在这里！想到了死，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发慌便倒在地上。

张丑德走了过来，我赶紧闭上了眼睛，听见他先是怒吼了一声，用他的青杠棒敲我的头。此时，我已打定注意与其拼拚命劳动，耗尽最后一点体力而死，不如干脆睡在这里，挨你张丑德的棒棒，以死与你一搏。主意拿定紧闭双眼，装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的样子。

「黄大中！」张丑德气急败坏的向山下吼道。不一会，那中年人背着药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他开始为我按摩切脉，如此持续了三分钟，「体温正常」，他怯生生的说。他已经亲眼看到，就凭他一句诊断，张丑德就当着他的面，结束了卢建华的生命，但他又不敢作错误的结论。那张丑德果然在怒喝声中向我的背上抽下了第一棍！我缩成一团，咬着牙关忍着剧痛准备迎接他的第二棍！说也奇怪，这一次张丑德踢了我一下，愤愤的地走开了。

「张棒棒！」看着他提着青杠棒渐渐走远的背影，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这么一个称谓。自从到这儿以后，我总觉得称他为「张队」实在不符合他的土匪尊容，喊起来十分别扭，早就想给他取一个绰号像「张土匪」、「张杀手」、「张屠夫」之类，又觉得太露骨。一般犯人也不敢这么喊！喊不出世的。

唯有「张棒棒」则比较的形神相一，喊出去也不会受到追究。倘若传开了，送进农场场部他上司的耳朵里，说不定还会让他们知道其人在西西卡的作风，今后，西西卡死人也会落原因于他身上，便打定注意，一定把他这个绰号喊出名。

整个下午，我就这么「死」在工地上，黄昏渐渐地压下来，脑子里又在盘算，该怎么结束这台「戏」？也罢，索性就睡在这里装死，看你张丑德，不，张棒棒今天拿我怎么办？主意打定，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等到大家集合好队伍，往下走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关注着张丑德对我的处理。他一面吩咐大家收工，一面命令两个组长，到队部拿来一根麻绳。

队伍走了，他一个人留下来，天色越来越暗在我的周围走来踱去，显然十分的烦躁又十分的无奈。不时的向山脚下望着那两个回队部拿绳子的犯人。我却一动也不动，在这种时候，决绝不能打草惊蛇的。

两个犯人终于提着绳子从山下气喘吁吁的走来，这一次他已无怒意，取过了绳子，便向那二人说道：「你们俩，一个抬手、一个抬脚，试试看抬得动不？」他的口气好像是同人在商量怎么搬动面前这个怪物。

### （五）「死狗」战

我被两个人从地上提了起来，按说两个人抬六十多斤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但是对于虚弱极点的流放者却是好吃力的「活」，还没有抬出十公尺远，我便被抬手的那一个喊「停」，重新放到地上。

「把两手两脚捆在一起好抬些。」他建议道，于是那绳子便派上了用场。

就这样，走走停停，好在张棒棒带着手电筒，便在后面撑灯压阵，足足费了一个多小时，等我们回到黄桷树下时，天已漆黑。张棒棒无可奈何的回他的宿舍时，我的周围已围了一大圈人，我开始哼起来。一个人捧着我的大铁钵，递到我的手里，里面装的是晚上的两瓢苦菜羹，我认出那人便是老潘，他与同赴西西卡，与我在同一个「野菜组」，一直保持着沉默，他的沉默是对这种特定环境采取的一种自卫，沉默其实在某些时候是最好的反抗。

像我今天下午的表演，任打任骂就是不动，也是抗拒劳役的作法，名曰：「耍死狗」。这生平第一次的「耍死狗」，虽然背上挨棒，挨踢的地方痛了两天，但并无巨大伤害。

吃完了野菜羹后，张丑德打着手电筒又走到我面前，看着我正坐在那里双目发直，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恶狠狠地吼道：「装死卖活的，你这家伙就他妈会反动！告诉你，明天还得照样给我上工地去！」

看当时我的外形，无异于一具活的尸体，死亡对我随时可能降临。我被特殊地安排了一个任务，就是跟在开荒挖地人的后面，将那些已被挖断，却仍埋在土里的芦草根抖出来堆在一边。

然而，张棒棒的这种「让步」立即产生连锁效应，几天后，同我一样，放下锄头，与我并排坐在地上抖草根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我坐在黑色的泥土上，脑子里空荡荡的，全身像瘫痪似的。最苦恼的还是饥肠辘辘，便将那粗壮的芦苇根用手抹去泥巴，送入口中咀嚼，可惜那草根干得像竹子一样，嚼不出一点汁来。

张丑德无趣地盯着这些枯瘦如柴的拓荒者，慢慢踱着步，走远了。

我抬起头来舒着长气仰望着天空，天空真美，无数彩色的云变换着奇奇怪怪的图形。小时候，我常常着迷于这些魔幻般的图形，把它们看作是在蓝天上自由奔跑嬉耍的小狗小兔。而今，在我的眼里，它们更像大碗里盛着一个个尖尖「冒儿头」，旁边散开的几片云彩，则像一些盘子里装着的菜肴。

我向身旁的人指点着那云彩说：「你们看，那儿不正摆着一餐饭吗？」周围的人便一齐朝我手指的方向张望，于是大家便认真地讨论那大碗里装的是几两米的饭，一个人一顿能吞下几大碗？一直到张丑德悄悄从远处转回来。「张棒棒回来了！」有人喊道，于是大家便一齐埋下头去。

我的可怜的「死狗」战，迅速在扩大，坐地抖草的人严格的说，按照国际上的规定，像我们这种濒临死亡的状态，即使是囚犯也该住院治疗。但是，在中共统治下，在这蛮荒之地，我们却被驱赶着照样服劳役。

「张棒棒」迅速成为这个队对他的称谓，他当然知道我给他起的这个雅号。在焦急和愤恨之余，他终于接受李管教的建议，改变战术，采取新的措施。

一天晚上，以我抗拒改造，消极怠工，煽动全中队集体怠工的罪名，召开了全中队建队以来的第一次斗争会。殊不知这种老套的迫害手段，对于处在生死边缘的流放者已完全失去作用，张棒棒的打手班子建不起来，开场白那段惯例的「端正态度」只能「暂免」。

那天晚上，「张，李」轮番独白，黄桷树下鼾声微闻，正要散场，大组长慌慌张张报告说开荒三组的两人藉解手，去厕所没回来，窝棚里不见人，大概是跑了。

张棒棒挥了挥手，斗争会停止了，一面气急败坏的命令汤干事，带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立即出发进行搜捕，各组清点人数。一阵哄闹后，西西卡重新进入黑沉沉的夜。

我并没有入睡，倒是替两个瘦弱不堪的逃亡者担忧。天黑路迷，山沟里其实并没有路，任何悬崖绝壁都是张开大口的坟墓，野狼的嗥叫隐约可闻，令人毛骨悚然！前有大山，后有追兵，两个骨瘦如柴的人还不像掉在虎狼群中的羔羊，怎逃这虎口？就是幸免得脱，又何处求生？时下虽已是仲春三月，在这荒山之中，除彝家村寨家园果圃里有一点绿色的小菜地，荒山之中可是什么也没有啊。

第二天下午，汤干事回来了，晚上张棒棒再次召集中队大会，在全队犯人中宣布逃出去的两个人，第二天早上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寨被村民抓获，当场就被彝胞打死。这一次，在他连日忧闷的脸庞上出现了红光，站在一百多号人面前，将两名外逃者带走的两个小布包高高举向天空，活像一个凯旋的士兵用枪挑着战利品向俘虏宣告：

「这就是逃跑的下场！我们的老百姓就有这种觉悟，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叫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谁跑得脱？」

他得意的吼着，一百多号人搭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两名逃亡者，做了什么，谁都对这个张棒棒恨之入骨。

谁不明白，两个不幸的逃生者，是在饥寒奴役逼得无法生存下去，才会如此孤注一掷。如果他们真的死于非命，直接的凶手还不就是你这得意洋洋的张棒棒么？！

## （六）死亡谷里的老鸦叫

翌日晨，出工之前，张棒棒将我单独地留在工棚里，等到大家出工以后，院中已空无一人，两名士兵便将我叫到黄桷树下，将我的双手反背着树身捆在那里。那姿势很像一个负着巨大十字架向地狱走去的人。我因而想起了《神曲》，我该落入九层地狱中的那一层？但是我清楚地明白，我的可怜身世，那一层都没有我容身之地，

如果，我将进入天堂，可这儿怎么也看不见通往天国的大门，于是我才深深知道，这儿就是人间地狱。暴君毁灭了圣教和神灵，泯灭人性和良知，把人间变成地狱。

中午，大家收工归来，张棒棒将全体衣衫褴褛的流放者召集在黄桷树周围，开了一个现场处理会。宣布对我「停止劳动，就地反省」。他冷笑道：「对这个顽固份子我们已向场部批报，等待他的是严厉惩处。」

真不知道是谁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把人捆在树上，背树反省。如此的「严厉惩处」就像一个精神的恐怖咒，会收什么效果呢。他说完后，便正式宣布「不准再有人在开荒时坐在地上抖草了，实在完不成任务的可以减半。」

从此，白天我便独自在黄桷树下，也没有人来理我。其实，对我最难忍的还是饿，饥饿像幽灵一样缠着我，我想起了冥界中的「阎王殿」。阎王殿中有饿鬼的说法，使我确信饿确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此刻，我的四肢不能动弹。饥饿便像鞭子抽打着我，我于是不自觉的口念「阿弥陀佛」。

正念之间，忽然想到不知是哪一位著名的音乐家曾经说过：「唱歌能使人忘掉饥饿」，正好山下飞来了一只乌鸦，围着黄桷树拼拚命的鼓噪，一边用它那已秃掉了许多羽毛的翅膀拍打着树枝，一面发出「哇！哇！」的叫声。

窝棚的房顶上原来筑墙的基建组，正在为房顶铺草作最后的修整，听见乌鸦的叫声，有人拾起石头向那乌鸦掷去，咕噜道：「不知又死了谁了，这几天老是缠着我们这儿叫。」「唉！不祥之兆！那一个还不晓得挨到哪一天！」

那房顶上传来隐隐可闻的议论声。

我抬起头来，却见那老鸦并不离去，人们越是驱赶它，它越叫越厉害，于是我便清润了喉咙，拉长了声调向它应和着，「哇、哇」这喊声由低到高，由闷到亢。房顶上的人一齐向我投来奇怪的眼光。



坐在大约五十公尺远处的哨兵，此刻大约正在打瞌睡，被这阵哇哇的叫声惊醒，站起身来，用手中的棍子向那乌鸦挥去，乌鸦这才拍拍翅膀，很不情愿的掠过枝头飞走了。

而我却不停地断断续续地哼唱着：「哇！」，哨兵端着枪向我走来，在我的面前站住，直楞楞地盯着我，我相信当时我那模样一定很可怕，如骷髅般的身上巾巾挂挂，衣不蔽体，两眼发直。两根像干柴棍一样的脚杆撑在一双发肿的脚上，倘若是夜间听到那声音又目睹此景，一定会认为遇到了鬼。

而他却站在我的面前，像欣赏这蹲「收租院里」的「准泥塑像」。也许他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形象还在喊，喊的又是什么呢？在一片莫明其妙的眼神中他终于摇着头，若有听悟的自语道：「装疯卖傻，疯了，疯子，真是疯子！」哨兵喃喃地咕噜着走开了。

我就这么隔着三五分钟，有节奏的唱到中午。房顶上的人下来了，围住了我，尤其是杨治邦，用一种怜悯的眼光久久注目着我的脚。张棒棒走到我的面前，眼里闪着凶光，一言不发地盯着我，几分好奇和无奈飘进了那三角眼。他回过身去，喃喃地咕噜着：「疯了，疯了，装疯卖傻！」

他当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喊！因为倘若，我用另一言辞来呻唤，他必会与我答话，那就是：「哇！我饿！我饿……」可是，我为什么要让他与我接话呢？「唱歌可以使人忘记饥饿。」我想到的只是一首减轻痛苦的歌。

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把我套上黄棉树，到晚上放我就寝，我就用这个音符，重复的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哇！」三天过去了，农场场部的庞总管教长闻讯专程赶到西西卡，张棒棒当着他的面，用他的青杠棒指着我向他表示：「这家伙死不悔改，不劳动装疯、装死狗、装老鸦叫，什么都装。」庞大管教像观赏一个奇怪的东西盯着我，一脸的狐疑。

从此以后，我在西西卡装死狗，装老鸦叫便成了吏、囚皆知的趣闻，我也因此而名扬甘洛农场。

后来到了盐源，邓扬光曾几度以此来取笑我。他说：「你有什么能耐，除了装死狗装老鸦，你又有什么能耐！」比之轰轰烈烈死于枪口的反抗者，我确实是逊色了。但与那些从你们狗洞中爬出的败类，我又值得骄傲，而我的同难们说道：「怎么啦，你们就把他没办法！」

直到十五年之后，我被当局传去宣布我「无罪释放」的那一刻，我的同难们都还在提起这段令人伤心的趣闻。

他们说：「老鸦和死狗帮你抗拒了那非人的奴役。」而我则坦然地回答他们：「其实，这是一种动物本能的自卫。否则，我也许就同当时那些耗尽体力，饿死在西西卡山上的冤魂一样，无法超越那道鬼门关，也无法活到今天了。」

苍天不灭我，我得感谢苍天！只是回想起那张棒棒，便觉得中国人的愚昧，可笑可悲。其实这一切灾难全都源于专制极权。若非毛泽东陷大陆于饥饿，我们怎会身陷在如此绝境中？

### 第三节：\*\*黑色的夏天\*\*

八十年代初期，我看到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记录的有关数据。杨尚昆按四川省「三年自然灾害」的呈报，承认饿死了一千两百五十万人。根据中共对灾荒一贯瞒报、谎报的惯例，这个数目是被缩减的，实际的数目只有到清算「三面红旗」时才会得出，然而这个数字在毛没有死时，是绝对封锁的。

一九六二年三月，我们流放到甘洛时，已处于大饥荒后期。但是一群形容枯槁的流放者，仍然被驱迫进行高强度的劳作，从而使这些流放者迅速变成饿殍。

西西卡的房顶刚好铺完，几场春雨便降到久旱的西西卡大地上。初降的雨露，本是苍天降给人间「润物细无声」的爱抚，但对于我们这些虚弱不堪的苦役犯来说，却是又一场飞来的灾难。

大雨连降几天，我们憩住的草棚，雨水顺着泥墙，如注地倾注到我们的被子下面。浸透了谷草，也浸透了破烂不堪的棉絮。三合土地面上水汪汪的，就像流水一样。黄褐色的雨滴，渗过屋面的蓬草，趁夜滴打在这些浮肿的拓荒者身上。

开始的时候，疲惫不堪的人们，并无精力去理会那些打在他们身上的雨点。只要脸上不被雨点打着，便蜷着身子躲避，直到满屋都是雨滴，又无处躲藏时，大家才惊慌的起来。

人们相继爬起身来，用自己的破脸盆和大铁钵承接雨水。苦的是被雨水浸透了的被盖，已无法抵挡寒冷，我们蜷曲在湿透的被子里瑟瑟发抖。

若在内地，现在正是播种、插秧的农忙季节。然而对于被困在西西卡的这一百五十名流放者来说，却正经受着一场生死大劫难。

迫于无奈，他下令扎雨班。那雨一下就是七八天，中间没个间歇。被饥饿缠昏了头脑的人们这才想起，一年一度的黄梅雨季已经来临。

极度虚弱的苦役犯，经过这番袭击，发高烧的病人迅速增加，由黄大中送往医院的人，又多半死去。

一场春雨在张棒棒的花名册上，一下子又删去了六个人。张棒棒开恩，命大家趁下雨的间隔，到周围山林中捡干树枝烧成火炉。一来取暖，二来烘干已被打湿的衣被。

于是各监舍马上腾出一块空地，围了几块砖，准备生火。经历了一个冬天，西西卡周围的山林中到处是干柴。不一会，大捆的干柴就堆在各监舍的门口。一阵忙乱，窝棚里腾起一阵滚滚浓烟以后，大家便开始烘烤被打湿的衣被。因为下雨，我也免去了背黄桷树的处罚，跟随大家去山上拣柴。

连日的阴雨，野菜也渐渐接不上了。铁钵里的稀粥越来越稀，人们越来越饥饿。

初降春雨浸透的山林，从地心中蒸发出一团团的白色雾气，覆盖了西西卡四周白茫茫一片。我想，此时此刻，必定会有人打逃命的主意。

果然，第二天天刚亮，就听说昨天夜里开荒三组又跑了一个人。中午时分，打野菜的人便来向张棒棒报信，说昨天逃跑的人，就在不远处被野狼吃掉了。

下午三点钟，张棒棒集合全体流放者，冒雨跟着带信人向出事地点走去。距我们的驻地最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块在五天前刚刚开垦出来的一片荒地附近树丛中，领路人停下了脚步。

在一丛荆棘围住的青岗栗树枝上，挂着一些蓝色和白色东西。定眼细看，树枝上斑斑点点，挂着从一件破棉衣上撕扯下来的棉花和破布条。在树丛脚下的杂草堆中，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赫然摆在大家眼前，那是死者的头颅，以及被撕咬得不成人形的残躯，令人毛骨悚然。

距残躯不到三公尺的地方，扔着一个小布包。在小布包上面，也染满了血迹。仔细再看，周围的树枝和树干上溅着点点的血肉，留下了死者在临死前同野狼拼拚命搏斗的痕迹。死者年仅二十岁，但已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努力回忆着他的外貌和举止，以保存一份记忆，但我仍然想不起来。这是一个我不认识也不曾有过任何交往的同龄人。死者的父母和亲人，还在远方倚门祈望着他能平安回来，但他葬身野狼的腹中，永远不能回去见到他的亲人了。

张棒棒拄着青杠棒站在尸体边，手舞足蹈的向我们进行着现场教育。

人们浸沉在恐惧和悲伤之中，树丛中的雾气里面，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血腥味。除了饥寒、奴役和鞭打折磨之外，还有一群出没于营地周围的野狼，虎视着想逃脱这地狱的任何人。这难道不是当局的精心选择么？

那死者是我们之中还不懂事的孩子。他究竟触犯了哪一条死罪，该送进这荒山野壑中的野狼口中？离驻地这么近，夜深人静中，怎么没听见死者同野狼搏斗时发出的呼救声？我努力地去回想昨晚睡觉前的所有细节，想回忆起昨晚所听到的异常的响动。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察觉。是死者因饥饿虚弱恐惧而无力喊叫，还是他压根就不想出声，抱着宁可搏斗而死，也不想被抓回来活受罪？

我被血腥气憋闷得慌，忍不住，脱口喊道：「哇！哇！」所有的人都向我转过头来。张棒棒不屑地瞪了我两眼，但没有吭声。

不一会儿，打野菜的几个人扛着锄头随后赶到。三个人就在那荒地旁边挖了一个大约只有一尺深的坑。将就着把死者的头、遗骨和那包刨进了坑里，垒起了一个小土包。

尸体埋下以后，张棒棒还用手指着那个小土包恶狠狠地说：「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反改造的下场。」

是的，这就是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无辜的流放者的悲惨下场。不过，他毕竟太年轻了。风沙和泥土可以很快地湮灭了他的血迹。然而却无法抹去这血淋淋的血债。

其实，我对死亡已没有什么恐惧。

回路的路上，我忍不住再次向苍天哀呼：「哇！哇！」只有这样，才能略抒我心中的悲伤。

身临绝境的人，只要死神还没摸到自己的头颅，必然对自己的生存抱着希望，并且有所行动。像这位刚刚死去的小伙子，未必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逃亡成功，便朝着死神手指的方向走去了。

在当时，像胡俚那样不惜出卖自己的同难而祈求获得宽恕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看到希望渺茫后，只好忍耐和沉默。

当然，也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调到另一个可以维持半饥半饱的劳改队。

虽然到西西卡不到四十天，这一百多号人中就已先后死去了十一个人。虽然死神天天都在摸着某一个人头颅，但是只要没有摸到自己的头上，人们依然抱着各种「希望」熬下去。

西西卡没有暴动，西西卡依然无声无息地在等待着死人。人们在沉默，在等死和各种「希望」中扳着指头熬日子。

(一) 人吃人

(二)

(三) 五一节来临了。这一天，也是我们在这死亡谷中熬过的第四十天。我们谁也不会去想共产党何以会对这个节日怀着「虔诚」的敬意？节日，早已对我们毫无意义，充其量带给我们思念亲人的痛苦。

(四) 而这一天引起了死亡谷中大家的关心。因为在前一天中午，王事务长已当着大家的面，煞有介事的说：「场部为了让大家过好到这里来的第一个五一节，专门组织了一个车队去了成都，采购腊肉和干菜。」他这么一句信口说出来的话，谁也不会去细细思索。

(五) 其实从成都来的时候，王事务长「牛羊肉当小菜」的诺言，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上这儿才一个多月，他便立即改口，好像成都那儿又有取之不尽的肉和菜似的，竟会派一个车队去成都运来？这比哄孩子还要可笑。

(六) 中共对我们骗惯了，对这一百多号饿昏了的人，谁还有兴趣去追究他们当初的谎言？不如阿Q一点，把它当作一个希望，真的从成都开回一个车队的肉和菜。

(七) 王事务长看到大家那期盼的表情，因而来了劲，提高了嗓门吼道：「经中队研究，五一节给每个人加大米四两，腊肉二两！干萝卜一两，干咸菜一两。」人群活跃起来，几个骨瘦如柴的人竟举手欢呼起来。

(八) 屈指算来，从春节到现在，整整三个月了，几乎没见过肉是什么样子的流放者，有人在脑海里盘算，二两腊肉切开来有几片？王事务长信口开出来的菜单和加餐粮，能够填饱一顿肚子吗？有人就地发言：「只要政府开恩，哪怕吃饱一顿，马上去死也心满意足了。」这话听来，道出了我们的无尽辛酸，四十天来死去的十一个人，不都是些饿死鬼么？

(九) 大家的眼光，一齐聚焦到了厨房里，盯着那里的炊事「官」，好像会从他们的身上盯出五一节「丰盛」的菜肴来。

(十) 代昌达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我们称他为一号猎犬，是西西卡中队的头号红毛犯人，张棒棒钦点的炊事员班长，他是从成都监狱来的，自从当上了那炊事班长的「官」，便比一般犯人高出一头，炊事组单独住在厨房

里，平时从不同任何犯人往来。

(十一) 代昌达被捕前是有「前科」的，因为偷摸被警察抓过，他充当刑警队「二排」后，专盯「反革命犯」的「反动」言行，并在刑警队管吃、管用，后来，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打伤了人，才被「新帐老帐一起算」关进了监狱。

(十二) 这种败类，历来是「阶级斗争」所依靠的对象，虽然谁都知道其人品极其卑劣肮脏，是一条靠一百多犯人的「血」养得一身横肉的「两脚犬」，奈何我们一百多号人的生活大权，有一半掌控在他手中，我们每一顿的「吊命粮」，就是由他称米下炊，开饭时，又由他手里的勺子，给你的铁钵里装上孰轻孰重的两瓢。

(十三) 因此，大部份的流放者，虽然心里对他恨之入骨，但在表面上却不敢得罪他，面子上还得陪着笑脸，与他寒暄。

(十四) 站在代昌达身后的人叫李治和，是代昌达的搭档，此人是一个将事务长交给他们的全队口粮先行吃饱后，再将所余部份熬成米汤倒进野菜桶里的「克扣能手」，他原是重庆地区的一名惯偷，翻墙越壁，撬锁破门，本是他混迹江湖的看家本领。

(十五) 入狱后，他常将犯人们不堪压迫和虐待的牢骚话打成「小报告」，及时面呈管教干部们，因而讨得张棒棒的信任。

(十六) 雅安抢馒头事件的为首分子，便是他检举告发的，到了西西卡，他便成为张棒棒选择的炊事组人选，爬上了流放者们的头上，变成一只吸血的蚂蟥。

(十七) 李治和的榜样作用，影响了一些人，胡俚多半就是跟他学的，西西卡中队成立四十天，连续十一个亡灵，代昌达、李治和可谓直接的小帮凶。

(十八) 五一节前的下午，大家开始打扫清洁，厨房的外面，围观了一大群囚奴，一向专横独裁的张棒棒，今日破例，第一次向这些围观的流放者表现他的公正。

(十九) 这大概是因为西西卡连续死亡事件，有人向场部报告西西卡克扣囚粮的一种反映。下午三点钟，张棒棒亲自提着秤杆，叫王事务长打开保管室，从里面取出了一块熏得黑黄的腊肉，然后亲自撑秤，并将秤足的四十五斤刻度亮给在场的人看，以此表明没有切下一块私藏。

(二十) 称完肉，张棒棒当着大家的面大声吩咐代昌达：「全部一次下锅，每人三两不能少。」同时还指派了基建组的杨治邦作「监厨」。围观者盯着那黑里透黄的腊肉当场锁进了厨柜。

(二十一) 第二天放假，中午大家特别守秩序，各自围在院坝内被指定的圈子里，每一个组派出三个人从厨房的窗口取回全组的「丰盛」午餐。

(二十二) 今天是「两菜一汤」，那已经蒸满的罐罐饭面上，盖着几片黑中透黄略带「哈」味的肉片，每一个圈子中间，都摆着大小小形状怪异的铁钵，两个人紧张的向铁钵里分进菜和汤。其余的人全神贯注地盯着分菜人手里的勺子，看是否公平，也看勺舀进铁钵里的菜有没有撒到地上，今天的干萝卜特别香，各个圈子里都传来分菜多少的吵嚷声。

(二十三) 菜分完后，大家把领来的罐罐饭排成一列，围成一圈，令一个人背过脸去，另一个人拉开排列着的饭菜中为首的一罐，插入筷子，由背过脸的人任意喊圈子中某某开始拿第一份，其余的按顺序取走属于自己的那份。

(二十四) 即使如此，端到菜饭以后，大家仍然不断地评多论少，那些分饭时洒在地上的萝卜干，当然被捡得干干净净。大家端着盖着肉片的罐罐饭，数着那些黄熏熏的腊肉，多的有六片，少的五片，一直都舍不得吃，等到了把菜汤都喝干净以后，才如珍品般的慢慢品赏。

(二十五) 忽然，开荒三组的那个矮个子组长，带着王事务长出现在厨房门口，并径直向灶边的煤堆走去，只见他操起煤堆旁边的铁铲，当着王事务长的面，在煤堆中刨出一块黑黑的腊肉来，王事务长面对这黑里透黄的肉，一脸尴尬无奈，人们立刻哗然。

(二十六) 原先安静的院坝，立刻乱哄哄的，大家把厨房门口围了一个水泄不通，代昌达、李治和二人被叫了出来，面对着那块沾着煤屑的腊肉。有人拿秤一称，有六斤三两，「看，总共才四十多斤的东西。张队长称给大家看的，叫一点不少下的锅，却被这两条狗衔了这么大一块走！」人们愤怒地呐喊了起来。

(二十七) 「真他妈的歹毒，天天喝我们的血！」

(二十八) 「喂不饱的狗，你们看，代昌达长得像头猪！」

(二十九) 「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两条狗什么时候偷了那么大一块肉？」恶骂和尖叫，喧嚣了整个院坝。人们只有用厉声叫骂来发泄对他们久积在胸中的怨恨。

(三十) 「还有那监厨的呢？那不是一伙的吗？」

(三十一) 「黑心狼，滚出炊事房。」

(三十二) 「滚出来，代昌达！」院坝里一片呐喊声。

(三十三) 张棒棒闻声赶到厨房，看到现场，早已明白了一切，两条狗见主人的到来，像见到救星似的，用乞求的眼光期待在众怒之中得到保护，因为这事真给主人丢了脸，只等着主人如何的发落，脸上的表情十分狼狈。

(三十四) 再看张棒棒，面对着院坝里一片「滚出厨房」的吼声，第一次在那横肉脸上皱起了眉头。他走到那块肉旁边，不屑地朝那两条狗瞪了一眼，狠狠地吐出两个字：「混帐！」随即吩咐，各组派一个人把那块肉洗净，切成小片煮熟，重新分给大家。

(三十五) 大家边吃边在七嘴八舌的咒骂，并要求张棒棒立即把他们赶出厨房，另换新人。在众怒难犯之下，为了平息大家的怒气，他当众宣布「李治和从明天开始，到开荒组参加开荒劳动。」想不到这一次同代昌达李治和口中夺食，竟以大家获胜而告终。

(三十六) 我第一次看到监狱中群起围攻红毛犯人并获得胜利的事，不禁想到雅安监狱那一晚上的情节来，当时的几个主角，虽然已分散到各中队去，但那种反抗精神却留在我们中间。

(三十七) 如果连同我的学老鸦叫以抗拒苦役也算是一种斗争的话，那么这些抗拒既是当局逼出来的，也是雅安斗争的延续，这些斗争证明，我们这一批流放者虽良莠混杂，但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仍然是非分明。

(三十八) 后来我们又从李治和的口中知道，五一节按当时成都的供应标准，干部每人供肉五斤，犯人每人供肉半斤。从成都买回的肉，西西卡中队总共分得一百斤，一半鲜肉，一半腊肉。供应给犯人的肉，实际上是七十斤，结果慷慨的王事务长和张棒棒只拿了一半肉分给大家，且全是腊肉，剩下的肉便全部归存保管室，以供看守们「细水长流」了。

(三十九) 如此说来，这李治和不过是效仿他的主子罢了，比起张棒棒和王干事，真还是小巫见大巫，只怪自己不小心，把切下的那块肉，放进煤堆时被人看见了，才闹得沸沸扬扬。不过，从我们这些随时都有饿死可能的人口中夺食，真是太残忍了。

(四十) 吃犯人、吃死人、吃逃兵的缺空事，自古有之。历史上朝政腐败的时代，军官吃逃兵的缺额以自肥，狱吏吃死囚的缺空以中饱，直至公开克扣他们的粮饷，虽然并不鲜见，但一经上司们查出，轻者掉乌纱帽，重者甚至掉脑袋的。但对代昌达和李治和的处罚，如此轻描淡写，实在还比不上朝政腐败的时代。

(四十一) 在「全国饥馑」情况下，看守监狱的干事、管教们，从失去自由的犯人口里抠出一点吊命粮，从而造成囚犯们大批死亡，则是中共对「历史」的新「贡献」。

(四十二) 为吃一点肉，西西卡的主管人敢于这么做，可见他们平时对犯人口粮的克扣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了。中共不是说给个人的粮食定量是经过计算，足可维持人的生命的么？那么到了西西卡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饿死？

(四十三) 不知在西西卡的日子里，这些「病」死、外逃、打死、毒死的无辜冤魂中，有多少是被这班吸血鬼所害死的？由此推及全国，当年被流放的无辜者中，有多少是被活活的折磨死的？至今没有统计，也没有人提到，更何况，追根溯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不是中共独裁势力黑老大么？面对这种血淋淋的罪恶，侈谈共产党拯救人类，消灭剥削真是太可笑了。

(四十四)

(四十五) 李治和自知到了开荒组，一时半会是进不了厨房的，眼下怎经得起那苦不能入口的野菜羹煎熬？正好，「五一」节前连日阴雨，过了五一野菜告缺。张棒棒安排他到野菜组打野菜。

(四十六) 那李治和自到西西卡以后，仗着他可以自由出入的机会，对西西卡附近的几家村寨早已摸熟，尤其熟悉靠河边的寨子，这些人家有几口人？作息出入规律？粮食堆放到哪里？他都弄得一清二楚。

(四十七) 到开荒组的第三天，李治和趁去打野菜的机会，便首告捷战，晚上提回了一袋大约十余斤重的荞粑，这年月，边寨的彝胞比内地的农民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生产的粮食，照例是农业合作化后，国家搜刮的最稀贵物资。

(四十八) 同四川内地不同，这儿没有种小春的习惯，只靠大春一季栽种，五月份正是大春栽种之季，所分的玉米和稻子已经吃完，只是遍山沟里的荞麦并不缺乏，在这种青黄不接之际，荞麦便成了救荒渡饥的唯一食物。

(四十九) 荞麦粑充饥颇为贴实，所以彝家多半都将荞麦磨成面粉，在锅上烙成大块的荞麦粑，上山干活、放羊打柴时，便用布包着，绑在腰带上，中午不用回家开炊，就山沟里的泉水，啃荞粑充饥。李治和弄来的那一袋荞粑，估计多半是从人家的灶头、锅中收集来的，为了封住他相邻铺位人的口，他十分大方把「猎物」分给周围的人分享。

(五十) 然而，在这惜粮如金年代里，对于被偷的人家，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李治和把别人锅里的东西偷走了，岂不是要这些穷苦的边民的命么？被偷的村民，必将被偷的消息，立即遍告附近的人家，从此便有了戒备。

(五十一) 果然，一张无形的网正悄悄地张开，专等着这位不速之客的第二次「光临」。

(五十二) 李治和第一次出击后，过了三天，他又一次走进了那个村落。这一次，他刚刚进村，就被盯上了。

(五十三) 在李治和翻墙越壁，以为四下无人，还没等他摸进厨房，五六个彝胞青年已破门而入，一拥而上把他擒住。不由分说，亮出早已准备好的棍棒像捶死猪一样，朝着他身上雨点般打去，直打得他皮开肉绽。然后取出绳子将他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任他怎么的告饶呼喊，也不理他。

(五十四) 直到黄昏时分，张棒棒才从打野菜的人那里听到李治和出事的消息，只好带着两名士兵，找到出事地点，天已黑净。先是向村长说情，要他放人，但是捆绑李治和的几家人硬不答应，张棒棒只好又去找公社书记，官腔、私话费了不少口舌，并一再承诺，将他押回中队以后，一定严加看管，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五十五) 直到晚上十二点钟，才把李治和从房梁上放下来，此时，他已经喊不出声来，命在旦夕，深更半夜，又从队上叫了几个体力较好的人把他抬回西西卡。把他抬回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了，抬回来时，并没有听见他哼一声。

(五十六) 我原以为看在他对张棒棒摇尾乞怜和忠心上，在这种重伤情况下，张棒棒会立刻把他送医院的，却没有想到，第二天出工后，张棒棒下令两个炊事员把这条打得半死不活的癞皮狗，抬到黄桷树下责令其「反省」示众。

(五十七) 也许因为我持续几天的老鸦叫，使张棒棒感到对我乏了劲，或者看到我形容枯槁半死不活的样子，感到再整下去，很可能闹出人命，只好放过了我。

(五十八) 我的那个位子，就这样被他占据了，中午收工时，我见到他正仰卧在地上，在长着一身横膘的皮肉上，一条条黑色的棍迹遍布他的全身，从他被撕破的上衣看见，几道血印是吊打给他留下的终生「纪念」，两条胳膊已被黑红的血迹模糊得不堪一睹。除了头脚的血迹稍微少一点，浑身上下，几乎是一个「血人」。

(五十九) 比之几天前看到的那位被野狼吃掉的小伙子的残躯，好不到哪里去。

(六十) 虽然李治和人品卑劣，不足相悯，但看到他那般惨状，不得不令人心惊肉跳。幸好是他占了体质强壮的光，倘若换另一个人，恐怕早去见阎王爷了。

(六十一) 五一节以后，张棒棒重新调整了劳动组合，撤下了一个开荒组，在工地四周开苗园，种菜和打南瓜窝，我被取消「背」黄桷树的处罚后，也没有让我上山开荒，而是叫我为蔬菜地干点杂活。

(六十二) 李治和被抬回的那天，见他像死人一样，脑子里总是翻动他肆意克扣张牙舞爪的劣迹。为了惩罚那些敢于向他争多论少的人，他故意给他们打「半瓢」，甚至还要抡起铁瓢，将不愿离去人手里端的吊命粥打翻在地，不断用张棒棒的腔调训斥对方。

(六十三) 联想到大陆被弄到如此地步，不正是依凭像张棒棒、代昌达、李治和之类的不同层次败类，横七竖八的架成了这台畸形的国家机器吗？没有张棒棒、代昌达之流的为虎作伥，大跃进，三面红旗能这么肆无忌惮破坏整个国民经济么？而今所有惨祸全都转嫁给了全国普通百姓，不靠这台机器的运转和镇压能平稳无声么？

(六十四) 张棒棒和李治和之间不过是一种充满野性的相互利用。在利用中建立起主仆关系，利用价值一旦失去，便被一脚踢开，这便是李治和的必然下场。

(六十五) 我不知道经过这么一次大劫难，李治和伤愈康复后，会不会认识到这层可悲的关系？我敢说，在中共这种逆向淘汰机制下，李治和即使死里逃生的康复了，其损人利己的本性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六十六) 想到这些，我忽然心中闷得发慌。想起了有几天没有学老鸦叫了，于是又一次拉长了嗓门，对着他：「哇！哇！」

(六十七) 李治和在黄桷树下示众一天，所有经过他身边的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望着这条癞皮狗，直到下午五点钟，黄医生来了，经他的诊断，他终于被抬走送进了医院。

(六十八) 两天以后，从医院传来消息，说他已经死了。同所有葬身此处的流放者一样，他被草草挖坑埋进了荒野之中，天道无常，天网恢恢，由不得人间的专制魔王了，他的死印证了「善恶终有报，只差迟与早。劝君勿亏心，冥天不可恼。」

## (二) 杨治邦之死

蔬菜组成立的同时，张棒棒又抽调了一个组，在开垦出来的土地周围铲草皮沤草木灰积肥，以备大春下种之用。他把积肥收方的任务交给了杨治邦。

为了弥补西西卡暂时没有安装高音喇叭的缺憾，场部为各中队订了报纸，并下令各队必须指定一名读报员，每天中午或晚间保证一小时的「读报学习」时间。

中共向来关注「宣传」工作，越是饥寒交迫，就越要控制人们的头脑。通过强制灌输报上的谎言，来达到精神控制之目的，张棒棒把这事选中了杨治邦。

他比我大四岁，自幼父母双亡，因贫穷所迫，在他的一个叔叔介绍下，十六岁补了昆明市一个宪兵的空缺。

「解放军」占领昆明以后，他便编入了「解放军」，不久复员，靠做工读完中学，考进了重庆大学。然而他的宪兵历史「污」点，按照共产党的政策，难免受到严格审查，他已是毕业班的学生，却没有逃过「反右」这一关。

我们同属极右份子，并一起于一九五八年同赴南桐丛林矿区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后来因下雨闲谈，与李天德等人一道，被罗织成「叛国投敌集团」下到狱中。

这次相遇我才知道，他被王怀寿派往南坪取邮件，曾当着王怀寿的面发了几句牢骚，争吵过几句，王怀寿便怀恨在心。

十六岁时留下的「历史污点」，注定了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然而，他生性软弱，背上历史包袱后，一味的逆来顺受。

张棒棒叫杨治邦担任收方员和读报员，除了他的大学生的招牌外，主要看中了他性格懦弱，便于控制。

到了西西卡，我们彼此有了接触，搞清了他的「叛国案」的冤屈，但对于他的逆来顺受态度，我非常反感，后来在与他单独交谈时，我才明白，他已经有妻子和一个六岁的孩子，他的刑期只有七年，按照刑满的时间，应当是后年获释，他还将肩负做父亲的天职。

自从杨治邦接受读报的任务后，每天中午，他便抄起那只破话筒，按照李管教指定的篇目朗读报纸，虽然他多次向我诉说读报的苦衷，他说「肚子饿得发慌，有时读着读着就感到眼前发黑，金光四射，脊背和额上冒出一股股冷汗。」

他明知自己所读的全是谎言，但在「按期获释，一家团圆」梦想支配下，仍然坚持着读下去，听他读得结结巴巴，脸色铁青，有几次我实在听不下去，把他拉到一边悄声地对他说：「唉，你这人怎么搞的，这种差事你也干，你就不能把这事交给别的人么？」但他仍然只是笑了笑，并不回答。

有一天中午，杨治邦像往常那样，读完报纸后，单独到厨房里领用了一份在数量上优于一般流放人的饭菜后，便上山「收方」去了，当他穿过那片每天都经过的灌木丛时，竟意外发现矮矮的灌木下，长着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蕈子，他朝那里走去，随即发现更远处长着更多更大的蕈子。

杨治邦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蕈子，它们原是梅雨季节催生出来的，他为自己的发现惊喜不已，但接着便疑团重重，因为山蕈中有许多是有毒的，再看那颜色漂亮的山蕈，宛如魔鬼变成美丽妖女向人招手，是毒饵？还是救命的草？

杨治邦将蕈掰开来细看，那白嫩的肉里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清香，用舌头去舔了舔，感到并无怪味，在饥饿冲动下，不一会他便收采了一大包，兴冲冲的来到积肥的工地上。看看四周无人注意，便在那火堆的一角刨开一个洞，将那一包蕈子埋在那发着暗红火光的草木灰堆中，重新盖好草皮，便收方去了。

下班后，大家收工回去，杨治邦便独自留在工地上，刨开那刚刚埋蕈的火堆，那蕈已烧得香喷喷的，便独自饱享了一顿丰盛的美餐，殊不知，这正是魔鬼给他安排的「最后晚餐」。

吃饱以后，天色渐黑，杨治邦便踏着暮色，慢慢往回走，还没有走到黄桷树下，便觉得恶心反胃，心里阵阵翻腾，肚子开始隐隐作痛，他强忍着走进了监舍，便倒在铺上。

大约在晚上十点左右，蕈子毒性大作，他的脸色铁青，手捂着肚子在床上痛得打滚，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一股股冒出来，接着便是猛烈的呕吐。

黄大中为他诊断，说是食物中毒，看到他情况危急，连夜抬去医院。第二天早上，送他的人回来说，才进医院，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杨治邦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人间。这里的青山又一次拥抱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撇下他仅六岁的孩子和苦命的妻子，不管他怎样的逆来顺受，仍然没有圆上他合家团聚的梦。

亲眼目睹这位同学和许多同难的生前和死后，我的心反而十分平静。我知道，当死神抚摸着邻铺上的头颅时，距我就近在咫尺，也在审看我这棵枯瘦的头颅呢。

我知道，我随时都有可能被招去天国，反倒为他巴望不久就要回家，同他的妻儿们团聚伤心？！想到这里，我便不自觉地迈向那黄桷树下，对着大山长长的哀号：「哇！哇！」

这一次青山竟发出了悠远的回声，好像同我一起为杨治邦共唱着送葬的挽歌……

### （三）新「食品」



雨水浸透原来坚硬无比的生荒地，也变得特别的松软，蔬菜组的人在打南瓜窝时，意外的发现深土层里埋藏着一根根像地瓜一样的块根。初尝其味，除了一股泥土的腥臭外，还有一点甜，略带水份，生吃很像地瓜，细细观察，这些深藏地底下的块根，用它像筷子般粗细的主根窜出地面后，便长出了一束带着细长绿叶的藤蔓来。

这些藤蔓附着在遍地的荒草上面，须细心察看，才可以找到埋藏它们的地方，我们叫不出它的名称，就根据它的外形颇像地瓜，称之为「野地瓜」。

后来渐渐发现，那些野地瓜窜根极深，一窝野地瓜，可以结出几窝的块根，延伸得很远，循着那根挖得越深，野地瓜越大，虽然它有一股说不出的苦味，但充饥是可以的。

野地瓜的发掘，给西西卡饥饿的拓荒者送来了救命的「粮」。饥饿的人们在野地瓜的引诱下，忘记了水肿和虚弱，把南瓜窝子打得又大又深，超过了定额的要求，碰着好运气，一窝里挖出的野地瓜，足有七八斤重，够饱饱的吃上两顿。

开始时，大家挖出它们，仅用手抠掉上面的泥，最多只在肮脏的衣服上擦两下，便坐在南瓜窝边狼吞虎咽大嚼起来。蔬菜地下埋有野地瓜的信息立刻传到了全体开荒者，一时间，挖野地瓜充饥便成了「公」「私」两顾的风潮，风靡了西西卡。

对这种既能充饥，又有利于开荒的风潮，张棒棒也没有多加阻拦，一段时间后，证实这玩艺儿并无毒性，还指定野菜组的人到山上去搜寻它的藤，将挖出来的野地瓜加在苦菜羹里。

积肥组负责烧制草木灰，准备大田备耕，也有他们寻找「野食」的门道，他们在草丛中搜捕形形色色的蚱蜢、蟋蟀和藏在粪担里肥胖而发亮的「老母虫」，以及那些刚刚脱去尾巴从溪边跳进草丛里的「石蛙」、「癞蛤蟆」和「四脚蛇」等等富含「蛋白质」的品类。

记得小时候，我们住的附近农村，调皮大胆的大孩子，常常用一些形体怪异的「毛毛虫」「蚱蜢」之类的虫子去吓唬小女孩，常常会使这些女孩子们吓得发出尖叫，现在这些虫类，统统都变成我们充饥的「野味」。

捉到以后，便把它们穿在一根预先准备好的铁丝上面，就近的火堆中扒开一个洞，把穿好了的虫子窜塞进火堆之中。过不了几分钟，就可以去取这些烧得很香的「野味」了。

在这些「野味」中，恐怕要数蚱蜢是最常吃的「肉食品」了，拓荒者给了它一个很「肥美」名字叫油蚱蜢，只要火候适宜，把这种虫刚刚烧黄就取出，它的表面就呈现出一种油亮的皮来，放进口中，真还有那肥肉被烧熟的味道。

至于对稍大一点的动物，例如癞蛤蟆，烧的时候一定要取出它身上一种叫「蟾珠」的毒物，并包上一层稀泥，烧成的效果比肉类差不到那里去。

其实饥不择食，人到极饿时，其觅食的范围与动物并没有多大区别。

后来，我成了家，仍不敢忘记毛泽东时代这段身穿巾巾，棉铠甲御寒，尝百草解饥，茹毛饮血的日子。有了孩子以后，为教育他勤奋求学，常将这段生活讲出来教育他，然而环境变了，我的说教被中共另一套腐败意识所冲淡。然而，我不得不提醒年轻的一代：忘记过去，意味着遗忘教训，那是多么危险啊！

#### (四) 雷田食子

开荒一组有一个叫雷田的简阳农民。有一次，他在草堆里捉到了一条四脚蛇，他便从头上脱下了那油腻的破毡帽，把那小动物包了起来，晚上吃「野菜粥」时，只见他用熟练的动作，剥下了皮，然后迅速地装进自己的大铁钵中，两瓢滚烫的粥冲下去，蛇身便挣扎起来，尾巴翘出了钵外，他使用手倒提尾巴，将那不知烫熟了没有的蛇身塞进了他的「血盆大口」中，丢手以后，只见那蠕动的尾巴带着鲜红的血，还在他的嘴边盘绕蠕动，血却顺着他的嘴角向下流。

人们对雷田的这一幕表演已见惯不惊，只听得他自言自语唠叨：「再毒的东西，人比他更毒，只有你毒它的，那有它毒你？」那一瞬间，配以那身巾巾挂挂乞丐不如的穿著，必令人张口结舌，至今，我仍清晰的记得那种场面，那场景在梦中，常常成了恶梦。

二十世纪科技高速发展，自称人类最优秀份子代表的中共，其统治下的劳改队，出现原始人类茹毛饮血的惨状，你也许还会怀疑，但这是活生生的事实。中共当局也许会否认，说这是「反华」势力对他们的中伤和污蔑，但是今天曾在边荒充过军，至今还幸存的人，绝不会把这些深刻铭记在心中的一幕从记忆中抹去！并会向他们的儿孙们讲述。

就是这个雷田，从不向人们回避和隐瞒自己亲身经历的残酷「家史」，当有人问他，怎么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要杀掉？他总是坐在地上两眼发直，呆呆凝望着五月凉山的灰色天空，不厌其烦地向人们重复地述说：

「一九六〇年春天，家里面已断了两天的炊了，我娘双目失明，一身浮肿，躺在床上连坐起来都困难，我和老婆已两天没见一粒粮食了。那几天，我先是在竹林里挖芭蕉头回来吃，后来芭蕉头也挖完了，便到土地庙挖观音土，两个娃儿，大的六岁，小的才三岁，因为那几天吃观音土，拉不出屎来，天天坐在板凳上哭，公社配来的那几两玉米，让老娘和娃儿吃，三个人还要争。

一天晚上，我老婆去井里寻了短见，几个人把她打捞起来就在村头埋了，我娘和娃儿全身肿得像发泡的馒头。那天晚上，我刚端出地瓜藤煮的玉米羹和一盆炒了的观音土做的粑，两个娃儿不去吃粑，却去抢那羹，结果盆打翻了泼了一地，我娘听到声音，爬在床上，用双手在地上去抓那泼在地上的羹往嘴里送。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心中一发狠，抓起一根棍子就向小儿头上砍去，那知道娃儿都是吊着命的，那一棍正好打在脑门上，只见他在地上翻了两下，叫都没叫出声来，两脚一蹬就死了。我看到这里，心里发狠，想到反正是死，便取过菜刀把娃儿的头砍下，丢到厕所里，身子砍成几大块，立马升起了火，当夜就把他煮了……」

雷田停顿下来，脑子里似乎还停留在当年的恐怖之中，此时，他脸色铁青，看得出，他心里非常难受。

「煮好以后，我把娃儿的腿舀给瞎子娘吃，娘吓得直哆嗦，我说：『妈，反正娃儿已经死了，杀一个救一个。』」讲到这里他又顿了一下。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大娃儿看到我那样子，吓得钻在床底下直打抖，我把他拉出来告诉他：『你妈也死了，弟弟也死了。总不该全家死绝吧。就看你弟弟的肉，能不能救活你和你奶奶了。』」

雷田讲到这里，脸上的肉在抽动，我想他一定想哭，但是泪水好像已经干涸了，那干瘦的眼角也没有掉下泪来。迟疑良久，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第二天，队上的治安就把我找去，我就这样判了无期徒刑，第二年改判为二十年。」

听雷田讲故事的人都知道，这段往事他已经反复讲了好几遍了。好像只有讲出来才能减轻他的罪孽感，减轻他心头的压力。

故事已整整过去三年，有时候他还流露出自己能活到今天的苦恼。至于他的瞎子娘和他的大孩子，现在是否还活在人间，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了。而我对这种故事并不陌生，因为那个年代，我听到的类似惨剧真不少。

唐朝末年，黄巢作乱，杀人八百万。河南因旱灾和连年内战发生大饥馑，史书上对他的部将秦宗权曾有「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的记载。已作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倾覆，内战烽起上一段华夏史上的著名悲剧而永志千古了。

而今，在中共历史上，且不说毛泽东在历次运动中嗜杀成性，残害无辜，而在和平年代里，造成这种持续数年的人为大饥馑，演出这一幕幕人吃人的惊心动魄的惨剧。恐怕记载「人相食」的古代史官，都要心惊肉跳。

我不知道，野地瓜是不是减缓了一些濒于死亡者的厄运，但是即使上苍有拯救这群可怜生灵的爱心，魔鬼也要变着戏法与之作对。

有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第二开荒组的两个年轻人，挖到了一颗足有两斤重的草根，草根的芽头上还发出淡绿色的芽苞，但却不像野地瓜，芽头上并没有长着细如柳叶的藤蔓。两个人切开一大块用鼻子去嗅嗅，除了像地瓜相似的生土味外，并无其它异味，再用舌头去舔，甜甜的。于是两人便被那诱人的甜味征服，开始分而食之。

由于饥不择食，两个年轻人对那极不正常的闷味，却顾不上怀疑，吃下那个东西后，不到一个小时，到了中午收工时，两个人的肚子便疼起来，回到监舍，便倒在铺上，捧着肚子哭爹喊娘的打滚，那凄惨的叫喊声，比杨治邦还要惨。

根据他们断断续续讲出经过，黄大中判定为误食了一些种叫狼毒的毒根，当即把他们送往医院，结果在医院里强迫两人喝下肥皂水「洗胃」，又使两人呕吐不止，还没到天黑，这两个年轻人便死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开始的时候，场部对非正常死亡还有些关注，后来被如此频繁的死亡弄得十分麻木，对这死去的两个年轻人，张棒棒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我们监舍东侧的那条小溪，春雨以后，溪水上涨，被溪水淹没的两岸，从水中长出了一种青油油的绿草，它的叶子和气息与芹菜很相似，我们管它叫野芹菜。生吃起来味苦，但不像其它的野草那么粗糙难于下咽，有人大胆的吃了以后，并无呕吐拉肚子等中毒症状。

于是，每天到这儿洗手洗脸的人，都要扯一把，蹬在溪边，就着雨后混浊的溪水，掏掉黏在野芹菜叶子上的泥沙，就像兔子吃草一般的嚼食起来。

没几天，那些长着野芹菜的地方，便留下了一片光秃秃的草椿。至于在水中捞到香附子，挖地时挖到甘草，老虎浆，白药、白芍等等，凡是可以吃的野草树根，无一不是拓荒者充饥的食物。

张丑德三令五申地禁止「偷吃生冷」，但无济于事，饥饿的流放者，简直就像一群饿鬼，不放过任何可以入口的食物，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向荒地要食的精神，决绝不亚于上古时代的神农氏。在品赏这些不知名的草和根时，被状如芋头的半夏麻得舌头发直，说不出话来；被状如野芹菜的毛茛毒得两眼翻白、口吐白沫。这些勇敢的尝食者，有不少因误食毒菌，毒虫而命丧的，笔不胜记。

可惜，生处如此绝境，这些被共产党强化洗脑而麻痹了神经的流放者，却像是一盘散沙，不能团结反抗施暴者，人们因争夺野地瓜而吵架打斗的事，又是经常发生的。

### (五) 为争「野地瓜」

自从我同胡俚发生铺草之争以后，又在偶然中知道了他是卢振华之死的始作俑者，便对他十分憎恶，加上我天性强脾气，对他这种处处欺侮弱者以讨好队长更感厌恶，使我们成了水火难容的邻居。

我早就知道，我平时经常抒发的不满和牢骚，都成了他讨好张棒棒的告密材料。当我因学老鸦叫而扬名甘洛农场后，我对队部的公开对抗态度，人们反倒给我许多道义上的支持，背着大家向我伸大姆指的人不少，我在大家支持下，当着他的面去羞辱他。

说也奇怪，我的这种对立态度，使他欺善怕恶的奴才秉性居然得以收敛。

有一天，我和他挖两个相邻的南瓜窝，恰好在那两个窝之间，距我的窝点不到一公尺的地方冒出了一根又长又壮实的野地瓜苗，我心中早已盘算着只要把我的窝子打大一点，那窝野地瓜，当然是我今天的加班粮了。殊不知，大家刚刚上工地，才放下锄头，胡俚抢先去挖那窝野地瓜，见他那种霸道气，越看越冒火，这不等于逞强欺侮人吗？

于是，我拿起锄头，以我的窝心为园心画了一个大圈，瞄准正好把那窝野地瓜划入我挖的圈中，我指着圈，用锄头比着他吼道：「你挖自己的窝，为啥抢到我的地盘上来了？」

胡俚见我怒气冲冲的样子，就停下了手，稍停一会儿后，他却毫不示弱的反击道：「老子挖老子的窝子，关你屁事」说完他继续的挖。我使用锄头，架着他的锄头，两个人迅速地扭成了一团。

我个子虽然比他高，但浮肿的两脚却是虚的，被他一扑，便被压在了他的身下。突然我对准了就在我嘴边的他那肩膀，在一股久积仇恨心理支配下，使出混身力量聚于牙帮，狠狠地朝那肩膀咬下一口。

他被咬以后，痛得松开了手，朝着我头上脸上乱打。我已经感觉到鼻血流了出来，便顺势举起锄头向他劈下。

正在这时，几个同组的人和李干事把我俩架开，两个人扭扯着到了队部，在张棒棒面前，他亮出那被咬伤的肩头，我当然成了输家。

张棒棒以我严重破坏队规的名义，将我用绳子扎了起来，并且当众宣布：「今后谁挖到野地瓜，谁都不准私吃，一律充公，交到厨房去。」

张棒棒还趁势挖苦我：「你不是狗吧，怎么会咬人。」近旁的人纷纷议论：都是「狗咬狗」。因为张棒棒这种处理，使我在这次斗殴中，蒙上了非议，我也吃了眼前亏。

第二天，老潘在厕所里悄悄跟我说：「凡事都忌任性。对于像胡俚这样的家伙，最妙的办法就要抓住他的弱点，用他的主人去整他，用不着在小事上同他争高低。」

这话很有道理，胡俚最大的优势，也是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霸道任性，阳奉阴违，因他这个优势而出卖的同难，却又经常对张棒棒背地里骂娘发牢骚，报复的机会总是有的，只是要讲机会。

果然有一天，他因为没有完成挖地的任务，而被张棒棒留在工地上，直到晚上九点钟，才放回来归宿，他心里窝着一肚子气，进到屋里，坐在铺上就破口大骂张丑德，我见机会到了，装作解手，走出监舍立即向张棒棒报告。

第一次在张棒棒面前做这种下三滥的事，确实感到很别扭，张棒棒将信将疑的走到我们监舍，正好听见那胡俚的骂声，便不由分说，将他叫到漆黑的院坝里，先是两记耳光，吼道：「你这小子磨洋工，还害得我陪你，你还敢骂政府。」说完便亲自动手，狠狠地捆了他一绳子。

这一次胜利，使我大大出了一口恶气，此后十余年间，我常常利用这种主子打狗的办法，制服了好几个老想在我身上捞油水的败类。

## （六）夜「偷」

按照张棒棒的规划，除苗圃以外，我们监舍和队部前方那片平坦的大坝子，全部是蔬菜地。蔬菜地上最先种上小白菜和白萝卜。这些生长期短产量又高的菜，是用来接替日益枯竭的野菜的。在全国粮食定量的情况下，为了不违反国家规定的统购统销政策，又要解除饿死人的危局，大种蔬菜成了风行全国城乡的一种自救措施。

人民公社化政策，迫使农业畸形的发展。无论是农村的农民或郊区的市民，对种粮反而没有丝毫积极性。因为那是统购物质，又是定量的东西。种得再多，除了口粮外，其余的全被搜括进官仓之中。中共各级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强迫农民种上大面积的粮食。而农民的精力和肥料，当然会施到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自留地上。

西西卡的张丑德也不例外。毛泽东用统购统销的办法来弥补稀缺的农产品，结果越是统购，物质越是连年奇缺。越是奇缺，越要强化统购。直到油料花生、黄豆等百姓最常用的食物，几乎在市场上绝迹为止。

监舍的背后和周围，便是一排排南瓜窝，其间也套洒了小白菜种。所有的人畜肥，集中使用在菜蔬地上。南瓜窝的后面，以及周围山地开出来的荒地，才是大面积玉米和地瓜的种植区。那里面施下的，只是一些草皮肥。

谷雨节过后，门前的大片蔬菜地已葱茏一片，长势甚好。屋背后的那些南瓜，也开始牵藤。奇怪的是，那些种在生荒地上的几乎没有施什么肥的玉米和地瓜，也已绿色一片，长势不错。我想，假如这些作物有充足的肥料，再施以认真的管理，那必是一片上好的庄稼。

看来，西西卡并不是什么鸟不生蛋的荒山野壑，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属于天府之国的川西南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很适合庄稼的生长。只是在专制帝王时代，由于科学水平的低下，山势险峻，交通不便，所以才长期的处在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蛮荒状态。这儿若无暴政的干预和破坏，靠勤劳人民的辛勤劳作，必是天府西部的米粮川。

我上次在三岔路口所遇到的两位年轻彝胞所说的「家家户户有屯粮，牛羊成群衣食足」的农家美景，绝对是他们以前的盛世。就是专制帝王时代也是如此。我们从成都出发时，所说的「牛羊肉当小菜」也并非全是谎言。所以我们进甘洛时，这儿成了一片荒山，实乃是毛泽东暴政之恶果。

古人言，苛政猛于虎。大跃进三年后，全国大饥馑已成汤镬之祸。在缺粮供应的条件下，一轰哄而上，驱赶一群饥饿的无辜囚奴，用枪押着，强迫我们来开辟这些被荒废的土地，才造成了我们靠野菜和草根毒虫充饥，挣扎在饥饿中的惨景，造成我们大批饿死。

现在用我们的生命换来的长势诱人的蔬菜，当然会成为饥饿的拓荒者用来充饥的对象。比之草根和蝗虫，小白菜和萝卜才是人吃的东西。

张棒棒早已加强了预防和警戒。下令除了炊事员和蔬菜组的人外，其它任何人不得进入菜地。他还在我们出工必经的道路上，插起一排半人高的竹篱笆。凡是要穿过菜地到南面山坡上耕作的大田组，都让两名武装士兵一前一后的监视和押送。

即使在严密防范和监视下，那些最先长大的小白菜和大萝卜，仍然经常受到「袭击」。靠近路边的菜地，像癞子的头一样，小白菜被一片片扯掉，萝卜地里也留下了一个个被拔去萝卜后的浅坑。

出工时，经过菜地，趁着跟队的士兵在最后面，前面的人就有人用最快的动作跳越过竹篱笆，将早已瞄准好的萝卜拔在手中，再像蚱蜢一样跳回队列中。整个袭击动作，必须在两三秒钟内完成，如果没有被发现，便将战利品揣于怀中，到工地上再吃。

也有人用衣襟把萝卜的泥揩去，便很快地大嚼起来，一个萝卜下肚，用不了一分钟。为了防止被队列后面的士兵看见，大家相互掩护：当前面有人跳进菜地以后，后面的人会用身体遮住士兵的视线，故意跌倒打闹，以转移监视士兵的注意力。

当蔬菜渐渐长高，人蹲在里面被遮住，对菜地的夜袭行动便开始了。

夜袭菜地，毕竟非常危险，虽然当时还来不及在监舍周围设置高墙和电网，但是每晚都有士兵轮流值夜，蔬菜地当然是看守的重点之一。因为是一片平坝，即使在黑夜，只要手电筒光扫过，任何人都无法躲藏。如若夜间被抓到，恐怕就不是几棒棒就能了结的。

即使如此，每有夜雨骤起，狂风大作，或到下半夜人已酣睡之时，我们的舍房里便有人弄回大捆的萝卜来。也有被抓住的，张棒棒便采用五花大绑的方式，来惩罚每一个落到他手中的人。

有一天，大田组的周均在玉米地里掰了一个刚刚挂须的嫩玉米，被张棒棒捉住，张棒棒除命令周均把嫩玉米连蕊一起嚼进肚里外，还吩咐两名士兵，将他五花大绑。

细麻绳勒进周均皮里三分有余，再将他像拎小鸡一样反背着摧紧，周均连声惨叫，不久痛昏过去。

张棒棒一面嘴里不停喝骂：「我叫你这狗日的吃老子的玉米！我叫你这帮饿死鬼吃！老子今天整死你也活该。」

暴怒使张棒棒满脸的横肉更加凸起，就像要生吞了周均才解心头之恨似的。人命在他野兽般的眼里，简直如草芥一般。为了一个玉米，他几乎弄死可怜的周均。那庄稼本是我们这些苦役犯用血汗换来的，却成了他的了，谁如果因为耐不住饥饿，还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换。

周均就因偷吃了一个嫩玉米，在黄桷树上被捆吊了个半死，直到半个月后，右手仍是麻木的，不能抓稳筷子。

从此以后，他便沉默寡言了，终于在一个没有月色的黑夜，只身逃跑了。逃走以后，张棒棒对他遗下的破烂行李进行搜索，证明他什么也没有带走。大家无不替这个带着伤残的小伙子担心，要翻越这崇山峻岭，岂非易事？他这一去，凶多吉少。

果然不出一个星期。张棒棒便在晚上的队前训话时宣布说：「周均逃到了越西河边的吊桥上，被守桥的民兵发现，叫他站住，他非但不听，反而拔腿狂奔，结果他从吊桥上跌进了几十公尺高的越西河里喂鱼去了。」

不过，张棒棒已没有先前那种幸灾乐祸了。先前一百五十人的「队伍」，尽管从别的地方抽来一些加以补充，此时只剩下一百个人了。

转眼已是七月上旬，但对于我们，刚过去的四个月，好像过了四十年，那片茂盛的蔬菜地里，长出的白菜、萝卜，也已源源不断地代替了野菜，晚上的粥已改为萝卜稀饭，可我们知道这是几十条生命换来的。然而流放者的饥饿，并没有多大的减轻。老虎浆野地瓜依然是大家觅食的主要对象。

在监房大门前，种植了一片辣椒，不知是这里的气候和土壤特别适宜，还是所种的辣椒种属于高产良种，那片一亩地的辣椒，长势特别旺盛，植株都在一米以上，且枝叶茂盛，结实累累。辣椒本是供给本队驻军和干部们作蔬菜的，长势繁茂的辣椒获得丰收，明显的供过于求了，为了讨好场部，张棒棒下令菜蔬组，摘下首批牛角椒专程给场部送去。

西西卡的夏夜，在带给人们静谧的同时，也随风吹来了果实的清香。每当深夜，当晚风徐徐送来各种庄稼的清香时，对于饿得发慌的人们，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虽然张棒棒狠毒的惩罚镇压着跃跃欲试的囚奴，他们白天找不到机会，便频频在夜间进行夜袭。

随着蔬菜日渐长高，监房前的南瓜藤也覆盖了大地，给夜袭者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于是借晚上起身小解的机会，环顾四下无人，便一个纵步，跨过门前大约一米宽的排水沟。迅速匍下身子，伏地向前爬行。到了菜地篱笆边，便悄悄地抽开一个缺口，然后悄悄地潜入青椒地，借着茂密枝叶的掩蔽，贴着地面继续向纵深爬去，直爬到菜地深处，把头略略上抬，就可以触到肥大的果实。

摘辣椒时，要仰躺着，控制住心的狂跳，然后用两只手轻轻摘下，使之发不出声响来。摘在手中后，再侧耳倾听，确知四下无人后，再翻过身来，背朝天空，伏地大嚼。一边吃一边还要侧耳细听，周围若有脚步声，便要立即停止嚼吃。

等到吃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取出束在腰间的口袋，将摘下果实迅速装袋，等满载以后，爬出辣椒丛，又要静静倾听。找到原来进园时的篱笆缺口，再悄悄将进来时放在一边的竹子，一根一根插回原处。等四下无人声时，再翻过排水沟，带着战利品钻进那临时窝棚里自己的窝中。

每次偷袭，至少需一个小时以上，每次偷袭，都会碰到哨兵巡逻的手电筒。不过每次偷袭成功，足可以扛回供好几天「加餐」了。

监舍背后的那一片玉米长势十分旺盛。仅仅四十多天，它们已由小苗长到了一人多高，在腰上挂上了刚出须的玉米娃。

夏天多倾盆大雨，趁着雷雨交加的夜幕掩护，偷袭的目标便改为更能充饥的嫩玉米。

进入玉米地，要比潜入辣椒地困难得多。因为要到达玉米地，首先必须绕过屋廊，再转过整排监舍的墙角后，绕到监房后面，经过排水沟，越过大约二十公尺宽没有掩蔽的南瓜地，才能进入那片玉米地。如此长时间的夜间穿行，碰上穿梭的巡逻兵可能性很大。一般的黑夜，很难安全完成整个的潜越过程。非借雷雨交加和夜幕的双重掩护才行。

然而既是雷雨天，那闪电的时间则无法测定，每次电光一闪，如同白昼。如若恰好碰上巡逻哨兵，极有可能以逃跑的名义，将你就地击毙，故而十分危险。

好在每逢雷雨，那些巡逻兵一般躲在营房里不出来。因为他们都怕高山的雷电劈死自己。他们才不那么死心塌地地「忠于职守」呢。

不过雨夜「偷袭」，雷电是不饶人的，万一击中夜袭人，只好自认倒霉。而且因为过于胆大，久走夜路，必有撞鬼的时候。

有一天夜晚，上半夜还下过一阵雨。到了下半夜三点钟左右，雨住了，月亮也落山了。趁着微微有些昏影的月黑头，住在隔壁的雷田出动了。

雷田刚刚转过墙角，穿越南瓜地的时候，玉米林中意外的射来了一束强烈的手电筒光罩定了他，他还来不及转身，一声么喝，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一拥而上，将他捆翻在泥泞的南瓜地里，几记重拳脚踢，体弱的雷田连哼都没有哼出声，便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他被捆翻在黄桷树下，浑身都是泥土，要不是他伤痕累累的脸上两个发红的眼睛还在转动，活像一具从泥水中拖出来的死人。

看着他令人心悸的模样，耳朵里就会响起他把自己的孩子打死，并煮肉给瞎眼娘吃的那番令人悲悯的自述。他是那个年代里，遭受空前惨烈灾难的普通农民的典型代表，而他的克勤忍让，是中国农民的普遍质量。

他经常对人说：「我前世一定作了大孽，今生才得如此之报。」如此看来，他对无奈杀子背上新的罪恶感。难道苍天真会对他施行这么残酷的惩罚？

大致由于频繁的「夜袭」被张棒棒发觉，以后的夜袭，明显受到了狱方更严厉的戒备和防范。就是在大雨倾盆的夜晚，玉米地上空会时时射来一束束刺眼的手电筒光，尽管如此，夜袭行动仍未中断过。

人们为了克服饥饿的煎熬，对惨酷的处罚，已变得麻木不仁。

### (七) 人间地狱

有一次，我依然照着雷雨夜袭的惯例，选择了一个漆黑的雷雨交加的夜晚。当狂风大作天空的闪电刚刚开始时，我就准备好了一条破裤子扎成的大口袋。

第一阵瓢泼大雨狂泻时，我已越过了门前的屋廊，潜到了南瓜地边。顶着茫茫大雨潜行，雨往身上直泼，呛得我喘不过气来。

借着一阵闪电的余光，我辨认了方向，向着玉米地猛冲过去，脚上绊到了一根指头粗的瓜藤，几乎将我绊倒，刚刚站隐，突然在蒙蒙大雨中，一道手电筒光从远处向我扫来。我赶紧扒在泥浆四溅的南瓜窝中。豆大的雨点，打在我的头上和背上。我明白，只要我的头不超过那片茂盛的南瓜叶，我就不会被发现。

此时，我的精神被大雨冲刷得亢奋异常。手电筒光射过以后，便熄灭了。大地又归于漆黑之中。如注的暴雨和强劲的疾风发出强烈的吼声，时时有雷暴从头上滚过。我开始慢慢向前挪动身体，却辨别不清从哪里爬进玉米地了。

在一片电闪中，我重新辨认了方向，等到那电闪刚刚熄灭，我突然站起身来，迅速地穿过南瓜地，进入了黑压压的玉米林中。

当我接触到着粗壮的玉米植株时，紧张的心才稍稍松弛。摸到壮硕的玉米，兴奋感又使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明白，只要向玉米林的深处前进五公尺，茂盛的玉米林就会掩护着我，而不易发现了。借着滂沱大雨，我就可以大胆猎食了。

然而就在这最后的两秒，距目的地大约只有十公尺远，一束强烈的手电筒光，出其不意的拦腰扫来。我急忙趴在雨地上，听得见沉重皮鞋声在不到二十公尺远的田坎上响了起来。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屏住了呼吸，好险啦。看来，张棒棒已安排人加强了巡逻。

全身被雨水湿透，背上沁出了股股冷汗。还好，那皮鞋声渐渐远去。我没被他们发现。

雨势减弱了，方才那股狂暴的劲头渐渐软了下来。于是我果断地站起身来，向玉米林的纵深处钻了进去，在雨声和风声的掩护下，我迅速的操作起来。为了不留下痕迹，以免第二天被人发现，每掰下一个玉米，便撕去它的壳衣，并把撕下的衣壳全部就地埋掉。近处的玉米已被掰掉了许多，我只能向更纵深的方向前进。

风势虽有所减弱，但雨仍然很大。我顾不得玉米叶将膀子和脸锯出一条条火辣辣的划伤，时间不允许我在那里了。当我去腰间取出那预先准备好的「口袋」时，我这才发现，「口袋」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四下一片漆黑，我已无法找到来路，当然也无法去找那条「口袋」。连忙把上衣脱下，草草将掰下来的玉米扎成一捆。等待下一个闪电，好辨明方向往回走。

正在此时，我突然听见监舍的那个方向，稳稳传来人的呐喊声，心中不禁一惊，以为是谁藉雨夜外逃被发现了。

看来，回去发生了麻烦，赶紧提着那袋玉米，拨开刺人的玉米叶阻拦，向南瓜地方向跑去。正想探头看看究竟监舍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两束强烈的手电筒光已将我罩住。只听见雨幕后传来张棒棒喊我名字的声音。

借着手电筒光，我看见他正夹着那本点名册站在那里。我心里明白，张棒棒雨夜查房，不见了我，便到我返回的路上来截接了。

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五六个人一齐向我围了过来。不出一分钟，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将我抓出了玉米地。

雨下得越来越大，但雷声渐渐平息。黑暗中，我看不清楚来抓我的人是谁，便被绳子紧紧的勒住。几个人连推带搽，踩着高一脚低一脚的泥浆，踉踉跄跄在雨中向前走去。忽然我听见了那轻脆的溪水声，我不知道他们将怎样惩罚我。

张棒棒因为我给他取了绰号，早已对我恨入骨髓，他早就想找个机会狠狠收拾我一顿。我被喝住，方才捆我的人走到我跟前，将绳子狠狠地抽紧了两次，一阵钻心的剧痛，使我立即昏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慢慢有了一点知觉，疼痛重新控制了我，钻心的痛使我大声的呻吟，却完全不能减缓这种痛感。雨好像已经停了，为了减轻那彻心疼痛，我便横下一条心，将那手臂猛的向上抬，殊不知，一阵剧痛以后，我又失去了知觉。

第二次醒来时，下弦的月亮已经爬到那杨柳树上。借着月光，辨出我在小溪的位置。勒紧的绳子，已被溪水泡胀，深深的勒进了我的肉里面，双手怎么也不听使唤。

我大声地吼起来，脸上只感觉一群毒蚊在扑打，彻心的疼痛使我忘记了眼前的一切，我又重新昏了过去。

等我第三次醒来时，已是早晨，我已躺在那棵黄桷树下，身边摆着一副绳子，上面沾满泥和血。我努力的抬起头来，才发现我的上半身竟是光着的，两肩上留着两道紫黑色的血印，双手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好像并不属于我的。

我的一身，几乎是从泥浆里爬出来的，稍一动弹，便痛彻心脾。我努力回想我的上半身怎么脱光了？想了半天才想起，昨晚冒雨掰玉米时，因为口袋丢了，只好脱下衣服当口袋，想起来后，我重新闭上了双眼。

流放者们正在坝子里围着圈喝稀饭，他们不时向我张望，而我却紧闭着双眼真不想醒过来，真不想活着回到这比地狱还不堪忍受的西西卡来。

我感到没有力气再活下去，然而到了奈何桥上，牛头马面却堵着我前行的路，让我重新返回，说我阳寿未尽，活罪未够。

张丑德重新游到我的眼前。他真正感到了痛快了，看到平时敢于挖苦他而又无可奈何的「死狗」今天成了他手中的一条「死狗」。于是得意的用那沾着许多人血的青杠棒戳了我一下头。用挖苦的口吻问道：「你不是说辣椒有维生素吗？你不是说维生素可以消肿才偷辣椒的吗？那么还没有长出玉米米的嫩玉米也有维生素吗，好吃吗？」

我真不想看他。当时，如果我有力量，我会将我口里的血块吐到他的脸上。我紧紧闭着双眼，只听见他嚎叫道：「老子种的玉米，全给你们这帮饿鬼偷光了。你们偷呀！偷完了，饿死吧！饿死活该！」

我感到他有点进步了，因为，他多少已经摆脱那「改造和反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风，并且敢于承认我们是饿鬼了。

这使我想起共产党作家所描写的地主、资本家来，他们对于那些穷苦工人和农民，常常就骂「穷鬼，饿死你活该！」张丑德不是酷似他们吗？「饿鬼」才是这帮吃人不吐骨头的刽子手对我们所用的恰当称谓。

谁都明白，这玉米绝不是这张棒棒种出来的。而是我们这群饥饿的奴隶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短短四个月里，就有四十多名流亡者的尸骨埋在这片土地下面面。

所以这些辣椒，白菜，玉米都带着血腥味！尤其是经他这么一说，倒反而点出这血腥果实里真含有无比毒的毒汁，就因为这毒汁的引诱，使饥饿的拓荒者，再度像我一样遭受摧命之残。



不过这偷却用得不确切，因为「偷」还带着一点人情味，人取不该取的行为才叫偷，而我现在是在面临饿死时，为争生存的行为，何况东西原来就是我们血汗换来的。！

试试看，在平常日子里谁会冒着吃枪子危险偷几个玉米？偷来后还连芯一起嚼下？除那些野地里胆怯的野生动物，像獾子、毛狗才会利用大雨和黑夜的掩护，去偷这种人用劳动换来的农作物。而动物在偷取农作物时，一旦被守地的农民发现是要吃枪子的，所以这叫生存竞争。

在这种大雨天里，被雨淋透的身体随时可能招来天上的雷击，还可能招来巡逻哨兵的枪子，我怎会被这肥头大耳的张棒棒说成是偷？

这一切在他眼里，真把我们当成了偷庄稼的獾子，甚至比獾子还可恶，你听他咬牙切齿的下令：「给我狠狠的揍，狠狠的捆，往死里整！」獾子在偷农作物时吃枪子，是出于农民保护庄稼的行为，尚没那样咬牙切齿痛恨，而我是人哪，是同张棒棒一样的中国人，是生产玉米，养活张棒棒们的劳动者哪，当我们为活命而冒险时，竟遭到张棒棒惨绝人性的豺狼般撕咬。

我从睡在地上的位置上微微地抬起头来，拼拚命地睁开眼睛，但眼睛像被胶封住了似的睁不开，脑子里还在滚动着昨夜恐怖的一幕——天上打着炸雷，玉米地里老管们踏着雨水叭搭叭搭的响声，拉动枪栓的响声，吆喝声交杂在一起。天空中一道道的闪电与四面八方射向我的手电筒光，紧紧地将我包围。

过了好一会，我终于睁开眼睛，向坝子里望去，衣衫褴褛的人们正蹲在泥水洼的地方端着他们的铁钵，狼吞虎咽地喝稀饭。他们偷偷的用惊恐的眼光朝我身上扫过来，有的还在交耳窃窃议。

我在这些褴褛人的人群中，看到了罗旭。昨晚那条装玉米的裤子，便是他从墙里递给我的，本来我们约好一起下手的，大概因为风雨太大，同时他被地边的一束手电筒光阻止，他没跟着我下地。现在他看到我这么一个下场，心里也许既难受又侥幸吧。

我从这些交织在我身上的眼光里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留在自己身上的紫黑色的血印。

我的四肢已不听使唤，连挪动的一下身体的能力也没有。全身像被肢解了一般，除了自己的头脑一阵阵嗡嗡作响外，手、脚、身体都不知长在什么位置上。眼前又是一阵发黑，我重新昏了过去……

## （八）甘洛医院里的饿殍

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我已经躺在一张旧木床上了。我的床边放着一个与床同样颜色的旧木柜，上面放着一些药瓶和一个碗，一股药棉酒精的味道扑进我的鼻孔。

我想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便努力地偏着头四处张望。恍恍惚惚地看到，头顶上灰色的屋顶，以及四周黄色的泥墙。这是一间放着四张小木床的屋子。四张床完全一样，床前各配一个小柜子。除了一张床空着，其余两张床上躺着两个像骷髅一样的病人。如果不是他们那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珠在转动，无异于两具僵尸。

此时，他们正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盯着我看，仿佛在说：「唉：这个人终于还是活过来了」！

邻床两位的床头各挂着一块木牌。我看了老半天，才认出那木牌上写着「流汁」两个字。空着的那张木床上铺着棉絮和床单，床单上还沾着斑斑的血迹。是洗不净了？还是根本没有洗？我想，那张床上兴许刚刚抬下死了的人。

空气显得特别沉闷，光线也特别灰暗。墙上只开着的一个小孔，病房内照明不足。我想挣扎着坐起身来，却全身不听使唤。我努力回忆昏迷之前发生的事，忽然看到我穿的那条满是泥和血的裤子换上了一條满是铺钉的裤子。上身穿着一件印有「病号」字样的蓝色条纹上衣，手臂上还有两处没有补好的洞。

良久，我的脑子又是一片空白。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穿旧白大褂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摸着我的「脉」，从木箱里取出温度计，塞进我的嘴中。他又看了看我的伤痕累累的手臂、肩膀、背部的胸部，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的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又一个年轻人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摆着三个小碗盛着豆浆，是我和邻床三个人的早餐，每人一小碗。

到甘洛农场整整七个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豆浆，肚子里便感到非常饥饿。便在那送豆浆的小伙子帮助下，含着一根麦管吸完了那碗豆浆。而我的邻床，却只呷了两口，便喝不下去了。

不一会，那位送豆浆来的小伙子，端着一个盅子，倒走了那两碗剩下的豆浆。我立刻想到两年前在孙家花园监狱医院的情形。「我现在是躺在犯人医院里了么」？我望着那两个僵尸般的人，看到他们想喝豆浆却喝不下去的样子，一定是离死不远了。

果然我是被送到了甘洛农场的医院来了。三天以后，先我进来的两位不知姓名的骷髅架，先后都被抬去了「太平间」。

进入西西卡七个月来，甘洛农场从各个中队陆续因中毒、水肿破了腹水，被各种原因打得半死而送到这里来的人，仅西西卡就有上百人，他们几乎无一生还。我来三天了，仍没有力气说话。就连刚刚抬到太平间的两位病友，都不曾交谈一句。所以，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何方人士？家庭状况怎样？

唉！这儿算是设在甘洛农场的最后一道鬼门关，我是因重伤昏迷而送到了这里来的。因为我失去了任何知觉，所以全无恐怖感。说也奇怪，经过一个星期，我从半昏迷状态渐渐苏醒过来了。

十天后，那被绳子勒伤的地方都结上了疤，四肢也渐渐可以动弹。不但可以坐起身来，还能下铺站立和小步走动。唯有那一夜被毒蚊叮咬的地方，留下了一片片黑色的斑点。

那天晚上，我昏迷了十几个小时一直还没有弄清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伤口感染还是失血太多？是因为毒蚊在我的血液里注入了大量的毒液还是身体休克虚脱？那晚上我被毒蚊饱食了一顿，想来我的前辈子，一定杀死过很多很多的蚊子，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凶狠地咬我。

就这样，在内饿外伤的夹攻下，在如此简陋的「护理」条件下，我竟奇迹般的硬挺过来了。想来，阎王爷翻过我的生死簿，上面定是写着：「此人阳寿未尽，逐出鬼门关。」

两具骷髅被抬进太平间不久，病房里的三个床位上，又填进了三个新来的人。等我神志渐渐清醒，能坐立和说话后，其中一位向我主动说道：「你的伤势不轻啊。」他说：「你就是孔令平吗？这几天医生考你的体温都是四十度上下。不过看护喂你时，你还能进食，吃了以后又昏睡，现在你好些了吗？」他还告诉我，我被送到这里以后，昏睡了整整五天。

我感到奇怪，我跟他素不相识，他怎会知道我的名字？他指了指挂在我床前的那块硬纸牌，那上面不仅写明「流汁」字样，还写着我的名字。

新来的三个人是从斯足中队送过来的危重病人。这个年代，水肿从脚上开始，向上延伸。一旦过了腹部，肿得透亮的部份便开始破皮。积存在皮下的黄水，便从破皮的地方流出来，带着腥臭。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死定了，这就是当年饿死的人死亡的全过程。

这新来的三个人中，两个人已开始破皮流黄水了。与我说话的那一位姓龙，腹部已肿得透亮，只是还没有破皮。他的行动已非常不便，站起来都很困难，常常坐在床边，脸肿得像胖官。交谈中，他还道出了雅安抢馒头的故事。

原来他也是同一批人中的一员，雅安抢馒头事件中，为首的人物几乎都集中于斯足中队。所以斯足是当时甘洛农场有名的「抗暴」中心。

这位姓龙的人告诉我，他们的队长和干事经常提到孔令平的名字，说：「在西西卡，像孔令平这样的反改造份子，捆起来以后，只会和黄桷树下学老鸦叫。现在还不是要规规矩矩的听从管教和干事的指挥，最近收敛多了，不敢再耍死狗了。」

斯足的情况与西西卡一样，同难们把坐在工地上「耍死狗」，当成普遍的反抗手段。每天，武装人员都要从监房里把不出工的人硬拖上工地。

场部管教科为了镇压这一潮流的漫延，组织了工作组，照样是用吊打来对付抗工的人们。无奈水肿和饿死的人像瘟疫一样流行，短短七个月中，斯足中队约有一半人到天堂去了。

有一次赶到甘洛农场粮仓运米，一下子就跑了七个人，只抓回了两人，其余五人下落不明。不知是死在深山老林里，还是逃出了虎口……

在我能下床的第三天，从斯足来的邻床也破了腹水。两个病人陆陆续续的抬到了太平间里。剩下的这位姓龙的也奄奄一息，轮到我来给他送水倒尿了。第二天，两个死去的病床上，又抬进来了新的水肿病患者。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上苍对我网开一面，特意垂怜，在医院住了十来天后，我已能缓慢的走出病房，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了。

听护理人员介绍，这里原是公社的赤脚医生点，半年前刚建立起来的甘洛农场接收了它的场地，正式更名为甘洛农场医院。

虽叫医院，但除了有些常规的药物，和几十个床铺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病人在这里，基本上是靠自身的抵抗力自生自灭。

送到这里来的人，大半成为孤魂野鬼。当我在这里住到第十八个晚上，护士喊我的名字，通知我出院，返回西西卡。

我的邻床向我道贺，他向我伸出肿得像馒头一样的手，向我挥手致别。悲伤的说到：「我还真想有机会活下来，看看这世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握着他的手回答道：「会的，我们一定还会见面，你们多多保重。」可眼里却忍不住掉下眼泪来。

## (九) 人间地狱

我出院时，已九月份了。拖着水肿的脚，跟着来接我回西西卡的卢医生，吃力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满山的玉米已经成熟，我又想起那天在雨夜里，袭击玉米地的前前后后。

在我眼里，这些将成熟的玉米，像一个个醮满人血的馒头。这些粮食是我们挨着饿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呀。这些粮食来之不易，每一颗玉米子中都浸着我们的血泪。

当我走上山岗，迎面吹来一阵秋风，使我浑身打颤。我从重庆监狱流放出来，为渡过甘洛的鬼门关，从孙家花园随身携带的旧毛衣、旧毛裤、棉背心等，原先装在破皮箱里的旧衣服，几乎全在这里换了养糍吃下肚子里去了。

此时，我身上只裹着一件在孙家花园监狱时发放的旧棉衣，经过流放的千里颠簸和七个月开荒种地，这件旧棉衣早已破烂不堪，变成巾巾挂挂的「棉絮」网。连着它的破布无法御寒，在秋风中同我的身体一道打颤。冬天很快就要来到，该怎么渡过这边寨寒冬？

中午时分，当我转过山坳，我又远远看到了西西卡中队的标志——那棵黄桷树。头脑里不断浮现出八个月所熬过的苦难日子。这是我一生中第几道炼狱？在这道炼狱里，我饱尝饥饿的折磨，饱尝了夺命的苦役，饱尝了张棒棒的青杠棒和绳索，这种摧残在医院才平静了二十天，我又将面对这个魔鬼。

走进以黄桷树为中心的院坝。所不同的是，坝子中间堆着的一大堆从山坡上刚刚收回来的庄稼。坝子里的人，基本上都是蔬菜组的成员。

经过六个月的「淘汰」，原先二十个成员的蔬菜组，现在只剩下十二个人了。他们在那里把其它组收回来的玉米、豆荚、荞麦分类隔开，摊在晒坝上。还有几个人，将收回来的玉米撕去壳衣后，堆在晒场的一角。

看到我跨进了坝子，潘朝元和王大炳便迎着我走过来，关切向我致意，问这问那。

二十几天前，当我刚被两个人放在担架上抬走时，他们都担心我这一送走，还能不能回来？我看了看四周，张棒棒没在场，值班的老管也站在队部办公室那排房子边上。因为秋收，这几天气氛比我被打伤离开时宽松了许多。

晒场上，选出来的「嫩玉米」堆在一边，王大炳一把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将两个烧得香喷喷的嫩玉米塞到我的手里，一面说，张棒棒这几天开恩，下令叫把这些嫩玉米选出来，晚上将嫩玉米子抹下来加在大家的罐罐里。所以，从前天开始，早上和中午，那半罐玉米粩上升到满罐了。

我还看到，那些收庄稼回来的人们，在倒掉背下来的庄稼后，便走到那堆嫩玉米堆前，挑几个扔进自己的空背兜里，然后再将它们埋在山上一堆堆沤制草木灰的「火堆」里，等到回转时，再从那火堆中扒出烧好了的「嫩玉米」。两个月前，这些火堆烧过癞蛤蟆、四脚蛇、老母虫、蚱蜢、野地瓜、鸡老壳以及叫不出名字来的野虫、草根。

人是多么健忘的动物，即使在这种苦难下，在天天与死神打交道的日子里，只要有一丝快乐降临，人们就会把刚才受到的苦难暂时忘却，流放者为眼前的「丰收」，为了几顿蒸满的玉米粩，就会将愁云驱散，喜笑颜开。

当我想到七个月前我们到西西卡来的一百五十人中，因反抗奴役而逃亡，死在丛山峻岭，因抗拒饥饿和奴役死在恶吏棍棒下，因误食山间的毒虫，毒草而死在这荒谷之中，因水肿封喉死在医院的病榻上，短短七个月中，夺去了六十多个年轻的生命，不尽要问，这副「磷绕荒村人似鬼，狐鸣空市草如墙」的图景是谁画的？

想到一个月前，就因夜袭玉米林我被张棒棒几乎打死，甘洛八个月里发生那么多命债，中共拿什么来偿还？推而究之，在全国毛泽东所欠下几千万无辜者的命债，岂容「始作俑者，宁无后乎」轻轻松松了结？

过了几天，李管教放出消息说，四川省劳改厅已经发下了「红头文件」，由四川省劳改厅专门派下了一个工作组，准备在所辖的劳改队中，进行一次身体大检查，经过检查确认患有严重疾病的人，要集中起来送往气候适宜的地点进行「冬季疗养」。

劳改当局也明白，充军边荒的人中，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到了来年的春天，恐怕就要死得差不多了。他们还要留下这批廉价的劳动力供他们驱使呢。

#### 第四节：\*\*撤离死亡谷\*\*

果然，十月底，从甘洛医院派出一支由四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来到了西西卡中队。他们由两名刑满就业人员和两名服刑的人组成。同时还带着许多「消肿药」。这些消肿药以土茯苓为主药，伴以大量的谷糠麦麸混合后，搓成的黑色药丸，美其名曰「康复丸」。

当局装着糊涂，好像不明白长期缺乏营养而致水肿被活活饿死的。偏要装模作样把「水肿」当成一种疾病医治。谁都明白，这种药丸顶不上玉米、地瓜等杂粮管用。

这一天晚上，趁着给全队水肿病人诊断「肿病」的机会，张棒棒站在全队九十名幸存者面前（以后还陆续从其它地方调入补充进来一些人），大声训话，大谈政府的「人道主义」。他说：「国家这么困难，还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千方百计为大家治病，你们要好好地感谢政府……」

我看他一身脑满肠肥的样子，竟然还有脸在这里奢谈「人道主义」？

我想起这八个月里被他整死整残的人那惨像，想到他所管的一百五十人，现在只剩下九十人，对他只感到恶心。

在这里拓荒仅八个月，拓荒的奴隶就死去了一半，看来这个农场办不下去了。

有消息说，开出来的荒地，要交给当地的军工继续经营下去，而将我们全都调走。又有消息说，云南会理锌矿已到甘洛来接人了。但采矿是有毒的，而且劳动强度大得令人吃不消，中毒后一辈子成残废。还有人说，在那里流放的人，宁可自残手足也不愿被活活折磨致死。

听大家议论纷纷，前途渺茫，我感到越来越可怕。此时又有人讲，距甘洛不远的雷马坪农场，底子厚，有很多的粮食储备。那儿的流放者，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但有人却反驳说：那里最近发生过几起劳动力用炸药自残的事件。

又有人说，石棉县的石棉矿，吃得饱，生活最好，可是就不知道要不要犯人去？说那里已全是刑满人员，没有犯人了。总之，大家对大「调动」，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我们经历了甘洛农场的生死炼狱，我想，再难的地方，也不过如此。充其量也就是一堆放在「无产阶级」砧板上任意宰割的肉，听凭当局宰割吧。

从体检小组拿到的体检结果，身高一百七十公分的我，体重仅三十四公斤。水肿缠身和贫血反映的营养缺乏威胁我的生命，至于测出血压、脉搏和最大肺活量，当时对我都不重要。在最下面病史目栏里，「医生」填写了「重症水肿」的字样。

西西卡幸存的九十个人中，除了两名靠大家的血养活的炊事员外，再也找不到不患水肿病的人了。我的身上除了骨头外，再找不到一处可以用两个指头夹住的「肌肉」。靠皮下绷着的水分，我才不致像僵尸般让人感到惊恐。

经过两天的检查，准确的说经过两天的选择，张丑德从九十人中，先挑出五十个人暂时留驻原地。其余四十多人便以「疗养」的名义，调往其它地方。

在这四十名调走的人中，当初从孙家花园调来的五十个人中，只剩下潘朝元、王大炳、唐元澄等不到二十个人了。

「国庆节」前，我们便收拾了自己残破不堪的行李，扔在红眼睛李干事的监督下，离开了西西卡。半年前，足有一百五十名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人群，而今只剩下这么九十人。五十多条生命，就这样丢弃在这青山之中。我们这四十多名被选出的幸存者，来到了甘洛农场医院集中。等待着乘车前往新的流放地。

第二次重返甘洛农场医院，与上次离开相隔不过一个月，已发生大大的变化。每一间病房里，都住满了从各中队调来的「病员」。病房里到处都架着「三角灶」。各病房里，除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碗筷，以及被熏得漆黑一团的「大铁钵」外，「三角灶」里还留着没有烧尽的柴灰或余火。灶边倒着丢弃的菜根和垃圾，床铺上不是一团烂棉絮，就是在乱草上铺了一床破席子。表示这儿住着人。原先黄色的墙壁上，已被烟熏成黑色。这里不像医院，倒像流浪乞丐借宿的临时窑洞。

当我走到二十天前住过的那间「病房」，先前的病友一个都不见了。于是向一位当时临时看护的人询问，她告诉我，原来的病号都先后死了。残酷的命运降临在这些苦难人身上，实在是太迅速了。

听李干事讲，从场部通往老母坪的公路已经修通，我们不必徒步爬出这夺魂路了，而可以乘大卡车离开这里。送我们出关的汽车还没有到，须在这里住上几天，等待汽车的到来。

在这里等车的几天，我们没受到严格的管束，能「自由」在甘洛城游走。同来的伙计们明白，就是现在放我们走，也难于徒步爬出老母坪，除非想找死？

大家合计着，拿出一些还没有同彝胞换完的诸如钢笔、笔记本之类的东西，看看这里的居民需不需要，能否同他们交换一点粮食瓜果，以备路上饿了果腹。

四天后，八辆由甘洛运输公司组织的大卡车，载着两百名连路都走不稳的特殊旅客，从甘洛汽车站出发向着西昌驶去。

这一次的大转移，比十个月前从成都至甘洛的大调动，当局已没有那么森严戒备，每个车厢里除了一名身着便衣的干事，坐在驾驶室里没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

当汽车行驶到老母坪时，我们不禁把头伸出篷布外，想寻找十个月前刚刚到这里那一晚的情景。也许经过的道路已经改变，原先的牛圈没有了。我们已搜索不出那可怕夜晚的情景，只是耳朵里彷彿回响着那台湾人从牛圈里发出的哀告。

现在明白，当时迷茫的去处，原来是一个人间地狱。从老彭开头，在进入这个鬼门关后，陆陆续续死去了那么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这大半年回忆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回忆：西西卡的黄桷树，溪边的毒蚊，张棒棒的

毒打，一个个惨死于毒食的面孔，身患水肿的死尸，原来，甘洛的炼狱是这样构成的。带着水肿的残躯便是炼狱的受练者……

当时死神不止一次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很少想到死的恐怖。今天，在我从那里走出来时，才感到从死神手里挣脱的侥幸！

按照我们汽车行进的方向是南方，按照地理的纬度这儿是亚热带，但是深秋的季节，天气已经非常的寒冷。汽车一过甘洛地界，我就缩进车厢里，并且把自己的烂棉衣紧紧的裹住自己的身体。

中午在越西吃过午饭，下午六点钟左右，到达了喜德，记不起喜德过夜的那一晚，在监狱转远站，还是临时住进了农村公社的大院里，一天下来已使我感到头昏目眩，辨不清方向，我吃过晚饭匆匆爬上了铺，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汽车继续的向南行驶，渐渐从山中穿了出来，一直向下坡滑驰，下午便到了西昌市。我们的「疗养修整地」，距西昌大约二十公里的黄联关。一过西昌，汽车驰上平坦黄土公路上，汽车后面，紧跟着一股股黄烟。树木渐渐稀少，西昌此时已进入旱季，每天都是晴天，但天空灰蒙蒙一片，公路两旁的大片农田已成灰黄色，在一望无边的田野里，孤零零立着稀稀拉拉的柏树，没有留下一片绿影。坐在车厢里看这片黄土同灰色天空凝在一起，说不出是晚秋的萧瑟，还是远疆的荒芜。真像寂静的沙漠，不免猜想，要去疗养的地方，未必又是一个新的人间地狱？

### （一）「疗养地」

下午五点钟，车队前进的方向，渐渐现出一片隐约的白色建筑物，十几分钟后，八辆卡车在一簇白色的建筑群前停下，我马上联想到南桐的丛林，在车上我环视了这一簇建筑群，它的西面，一栋百公尺长桁架结构的屋顶下，是四面敞开的厂房，两蹲拔地而起足有二十公尺高高的灰白色烟囱挺拔直立，直指苍穹，在灰色的秋阳下仿佛像两个失意的巨人，站在荒草丛中仰天长叹！在他脚下，是两座巨大的圆柱形炉膛。

两幢高炉的厂房中，每一个角落都张着许多巨大蜘蛛网，在秋风中拂动，两台锈蚀不堪的鼓风机罩壳和架子横放在它的旁边，不用介绍便知道，这里分明是当年一哄而上，耗掉无数民脂民力的「小高炉」，如今已被人们遗弃。

散在高炉脚下的破碎的瓦砾和矿石，在告诉人们，当年那些从附近城市招徕来的民夫们，如何在高音喇叭的鼓动下，日夜不停汗流浹背蛮干的「壮景」！

它的东面，便是一圈白色围墙所包围的，两幢围成U字形的白壁瓦房。想来，这定是当年昼夜不停的炼钢大军指挥机关的办公室，以及民夫们的宿舍。

最北面那排房子最后几间空着的房子，其中的一间作了临时的「医务室」。我们可以在那里拿到一些医治伤风感冒或拉肚子的常用药物。那儿住着两名「医生」，大约隔三天，就由那里发放由厨房熬制出来「消肿」中草药。

中间并列着的两排平房和北面的一排平房，一共三排整整三十间房间，除两间用作开会用的大间，其余全是每间大约三十平方公尺的「小间」，门上刚用粉笔写着阿拉伯数字，两排通铺分列在门的左右两侧是两排足可以容纳三十多人睡觉的「床」，那上面已铺好了稻草和棕垫。大概用作在这里「疗养」人的宿舍所用。

其实，只要用心去看，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平房，新的高炉，新的设备。只因为一股平地而起的风，把他们吹到了这荒凉的地方，以为可以在这里一厢情愿的炼出钢铁来。后来炼出的又是一堆不能冶炼的「废铁渣」，加上随后的全国大饥荒，才慌慌张张「弃城」而去。

今天这座废弃白色的围城「废物利用」，暂作我们这两百多号生命垂危的流放者的「整修疗养所」。虽然这儿根本谈不上什么「疗养」条件，但对我来说则是入监以来第一次在有「铺」的监舍里安寝，我为自己终于熬出了甘洛的鬼门关，再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背着各自的被盖卷，在头发花白的冯队长带领下，进入了这白色围城的大门。迎面的天井里靠门的左侧，放着一台已满身铁锈的破碎机和一些螺丝、铁管之类的东西。从那破碎机壳上的亮铮铮的铭牌上，可断定这是

一台几乎没有使用过的「新设备」。

全体下车后，就在第一个U形建筑围成的坝子里集合，操陕西口音的冯队长和年龄比他还大的余队长，在集合的队列前作了简短的讲话。将所有的两百多号人编成了十个组，按点名册排队站好后，便宣布到这里集训、治疗期间，必须遵守的「监规」。

内容大致是不准单独外出，不准同老乡们接触，不准偷窃附近田里的农作物等等，然后按照点名册定好的组分别对照门牌号，搬进各自的「监舍」里。我们把自己的破被盖卷搬进各自的监舍，按照点名册的顺序安顿好各自的铺位。

天份有缘我和老潘又编在同一个监舍中。我的铺位紧邻的两位，一个叫王华春，捕前原是金堂县的一个公社大队会计，一位货真价实的「农民干部」。另一个叫韦俊伯，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文职人员，两人出身不同，性格迥异。

王华春从他的行李中取出的东西看，他的家境不错，经过甘洛如此残酷的折磨，还能拿出新的布鞋和衣服，拿出一片片黄灿灿的叶子烟烟，大大吸引了有烟瘾的人。在甘洛抽烟属于奢侈品，当饥饿被蔬菜填充而稍有饱感时，有烟瘾的人便寻觅极为「珍贵」的烟烟叶。

还没有看到王华春拿出来那么大匹金堂叶子烟烟，当然，王华春决不可能慷慨相赠，每一支烟烟都用来换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不过，我却是天生的拒烟者，我不但不愿吸食，而且每闻其味都会反感！所以当他坐在铺位上旁若无人地大口大口吸那金堂烟烟时，都会招到了我的反感。

王华春发现这个矛盾以后，便主动的把他可以换一个罐罐饭的「大炮台」送给我。很耐心的劝我说：「男人不抽烟烟枉活一辈子！」在他的这种「友善」的攻势下，虽然我谢绝了他的大炮台，但我不便因此同他吵架，所以每天饭后他要吞云吐雾时，我就跑到外面去或者去附近土地里寻觅花生、马铃薯这些食物。

韦俊伯就完全不同了，看得出他生性好静，个子高高的，很少说话，闲下来时，便往他那件补得巴上重巴的万巴衣上，再补上新的巴！我因此而学着他，补巴成为我在黄联关「疗养」期间重要的生活内容。

铺位安顿好以后，冯队长又在院子里高声向大家宣布：「这里冬天寒冷，为了帮助大家过冬，大家可以到附近捡些砖头，在各自监舍的中间土墩上搭烤火灶。过几天，指挥部还专门给大家配些炭炭供冬天烤火取暖。」

在甘洛已把防寒毛衣毛裤、棉絮被子「换」完了。冬天正愁受冻。他的话音刚落，大家都蜂拥着挤出各房，找石灰，拾的拾砖头，还没到天黑，各监舍的中间那土墩上，便搭起了形状各异的「灶」，有的还生起了火。

那位在孙家花园就是冷作工出身的辛志华忙碌起来。第二天，他在院子中间栽了一根铁杵，凭着一把榔头，一把剪刀和一个铁墩一些铁皮，便开张了他的「冷作铺」。他的生意很好，可以说从早到晚就没歇过气！他的周围堆满了各种破洗脸盆，专职改制「大铁钵」，每改一个收取两个罐罐饭的报酬。这些改制的铁钵，曾为在这里临时聚居的「疗养者」，煮过了不知多少米饭、马铃薯和地瓜。

「围城」中，两圈并列的U形平房最南端的一排房子，好像是原来炼铁厂的伙食团。那里面有现存的保管室，办公室和供吃饭用的饭堂，厨房的灶台非常气派，里面有供热水的锅炉和供洗菜用的洗池、自来水管等等一应俱全。其规模足可供上千人使用，只是饭堂里面空荡荡的，原先的桌椅已不知去向。

此时头号灶眼里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七八个炊事员在那里忙碌着。一锅已经煮熟的粥，散发出一阵阵闷人的气味，像是马铃薯。

第一天晚上吃的是「马铃薯饭」那些马铃薯听说是乔阿农场四中队供给的，数量颇丰，大铁钵可以盛满，可惜有麻口的味道，吃多了便感头闷，细看那马铃薯表皮已长了芽，严格说这马铃薯含有大量的芽毒素，对人体有很重的毒害作用，拿给人吃是不允许的。

不过，对于刚从甘洛的饿牢中出来的人，这些很命贱的囚犯，是根本不会考虑这些的。有人吃了整整一大钵，结果中毒了，上吐下泻！幸好没有发生死人的事。厨房只好调整煮制的方法，改为削皮切片后用水漂一天一夜，才下锅。

## (二) 稀世珍品

我们周围的农田，全是乔阿农场的耕地，房屋后围墙上堆放着玉米和向日葵的稿秆，正好是我们用来生火和煮东西的燃料。经过半年多甘洛农场的煎熬，我们几乎每个人都锻炼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觅取食物的本领。只消一把锄头，或者一根粗铁丝弯成的铁勾，便可在生荒地挖出各种可吃的野生树根，今天，附近的这些农田，便是我们加餐的地下仓库。

对这些农田仔细分辨，可以判断出那一块土里种的是红薯，还是花生或者是马铃薯。现在，我们竟在偶然中意外地发现了在这片土地中，埋藏着在市面上都已绝迹多年的东西，岂不令人兴奋？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劲，仅凭着铲子和自制的铁勾，不知劳累的挖刨着，天黑了还不愿「收工」。

人们求自我生存的力量是那么顽强，这可是一些疗养的病人。我们之中许多人，都是在那灾荒的大跃进年代，宁可躺在地上动也不动，撑着锄把等到天黑收工的人民公社社员们！一群被中共的狱头们斥为好吃懒做的坏份子！

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人一天下来可以刨到四、五斤甚至七、八斤不等的花生。可以说收获颇丰，当然地里留着这么多的花生，也许是收挖的奴隶们有意留下的。我们把这些收获来的珍品，晒干剥净，充作「补品」，每次煮饭菜时，加进一把。

然而好景不长，没有过几天我们这一群人的「小秋收」行动，被乔阿农场看守这些土地的「红毛犯」盯上了。最开始，一个中年人来吆喝我们，他以土地主人的身份分，喝令我们马上从那里走开，否则就对我们不客气！殊不知经过甘洛这场炼狱，我们谁也没有理会他的恐吓，充其量向他翻翻白眼并不理他。

看看咋呼没起作用，便动手去收那田坎上我们丢在那里的口袋，结果大家群起而攻之，围着他吼道：「你他妈不自己照照镜子，我们挖你们挖过的土，关你什么相干？竟敢抢我们的东西！」他见我们一哄而上，自量寡不敌众，便改了口气向我们解释道：「你们看看，这一片平坦，几里以外都可以看见你们，队长看到骂我们不止一次了，说我们故意不把花生挖干净，我们不好交待代，所以请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再在这里给我添麻烦了。」

我们中有几个人掂掂自己的口袋已觉足够，便甩甩手提着口袋离去了。还有的人继续的在那里刨，并不理会他。那人讨了没趣并不甘心。第二天邀约了另一个人跑到我们的住地向冯队长告状，然而冯老头却不以为然，不置可否。过了两天，那人集中十几个人手持棍棒对我们采取武力驱逐。

为了加强戒备，抽一个人出来站在田坎上放哨。看到对方来势汹汹好及早准备，不过，我们始终不明白，在这些已收完的土里刨几个马铃薯、花生，怎么竟惹得那看庄稼的如此嫉妒？答案只有一条：这些人在野外地里埋有私方「粮」，怕我们无意中挖到了他们「过冬」的宝藏。

不知是谁，有一天在西面那两座高炉的炉腔里，发现了一大堆牛马骨头，凭借风季的干燥，这些骨头表面已呈灰白色，附在它们上面的残肉血丝完全干缩成一些垢物，从表面上可以判断这些骨头是生的。

选出那粗大的筒子骨，用石头敲破，里面的骨髓居然还保持着黄褐色，虽然有些臭味，但既没有发黑也没有生蛆，看样子这些骨头的年限不到半年，因干燥而保存较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在我们到来之前，这儿曾作过牛马屠宰场？还是乔阿农场从别处运来准备烧制后，作来年春耕的肥料？我们不得而知。

倘若在小时候，我看到这么多令人「恐怖」的遗骨，尤其是那一个个骷髅头和张牙舞爪的肋骨，我会害怕而远远躲开！没想到今天，我也同大家一道，从那炉膛中选出粗壮的筒子骨，洗净砸破后，便丢进大铁钵里「熬炼」起来。

经过几小时的「煮」制，那水的表面便起了一层厚厚的油膜。然后取下大铁体冷却一夜，第二天早上，便在那表面上凝出了指头那么厚的「牛油」，虽然带着一点「臭」味，但那可是多年视为珍贵至极的「油」啊！便把它们舀进盘子里，每一顿饭吃饭时，往那菜里加上那么一点。

到甘洛后，就再也没见过油像什么样子，我们之中除少部份的人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中，也许有那么一小瓶的「油」，便会视为珍贵的「营养品」，一般不会轻易与人分享的。



而像我这种事实上已无家可归的人，没想过有一天自己弄到一盅油，虽然这一盅稀贵的东西，原来取之于一大堆来历不明的牛骨头。这年头啊，连寻常老百姓家都没得油吃。

听说一九六三年有了一点供应，我们也有了油的享受权。可惜，从来就没见那菜里有过「油」珠，这「油」被弄到那里去了呢？是不是也用火车载到万里之外的阿尔巴尼亚，去支持那儿的「革命」了呢？

霜降已过，冬天已然降临，微霜初降的早上，我们已冷得瑟瑟发抖，现在才体会到半年前，真不该在甘洛把自己破旧的毛衣和棉被换了东西吃！不过若不是这些旧毛衣救我们的命，我也许已骨头在甘洛打鼓响了，也罢，且裹着这补得巴上重巴的空心烂棉袄，硬着头皮熬吧？好在现在腹中已没有甘洛那么恐慌。我也早学会了缝补，每拣到一点可以作巴的旧布，我便洗净后，往「棉衣」上面补。

早上起来，披着那件很脏的空心棉袄，伸头从窗子上望去，屋顶上起了薄薄的白霜，便只好缩身在破被盖的包裹中，靠着那灶上的残火取暖，一面补棉衣。

王华春已披衣起床，借着炉火点燃了他的金堂叶子烟烟卷，便坐在我的身旁巴塔巴塔地抽个不停，接着便是咳嗽，吐痰。他见我对他的抽烟烟一脸厌烦，便再次友善的向我递过半截「大炮台」来，一边说：「喏，学着抽烟烟吧，不抽烟烟更冷。」我想了一想，准备试一试，看看这烟烟中兴许会有某种解除忧郁的东西，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宁可用自己的罐罐饭来换烟烟抽？

于是我这次并不推谢，而是顺手接过来，点燃以后，便试吸起来。「不对，你这样抽永远学不会」，他见我刚刚吸入口中的烟烟，立刻吐了出来，便认真的纠正道：「要这样，把烟吸到肚子里去，然后慢慢地从鼻子里喷出来」，他一边教一边示范着，并且从鼻孔中缓缓喷出那股股浓烟，陶然若醉。

按照他的示范，我果然猛吸了一口，进入了肺腔之中。等我把那吸进肚子里的烟烟，逼着往鼻腔里过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的头昏，眼睛发黑，恶心而感到四肢发凉，差点翻肠兜肚的吐开来。

连忙停止这种可笑的动作，好半天才恢复过来，熄掉了手里的烟烟。从此以后，我不但没有按他的教法坚持下去，而是断然的谢绝了烟，以至我的一生中，没有这种嗜好。

老韦也坐了起来，按照他的习惯，一声不吭的拿出针线包和那些破布，开始了补棉衣的活，我便同他一起往我那件破棉衣上补上新的破布，一直到早上的马铃薯稀饭煮好以后。

### （三）「发」棉衣

大约十点钟光景，忽闻大门外人声噪动，大炳兴冲冲的从外面走进来，向大家报告了一个特大好消息，装满了棉被和棉衣的一大卡车已经运到，就在大门外，现在要大家一齐去下车。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兴高采烈的穿上衣服，起床跑出监舍，忙碌着把车上的新衣棉全部卸下，搬进了队部的办公室里。

搬完以后，清点总数。结果仅仅只有六十床棉絮六十床被套和七十套棉衣，这对于来这里疗养的二百多病号只够了一个零头。

一场欢喜之后，便是一场忧虑和一场因无法分配而产生的争吵。连带孙家花园算起，这是我进监五年来，第二次遇到监狱方向犯人们发放过冬的棉衣。前次是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旧棉衣，唯独这一次倒是新的，可是数量又那么少。

毛泽东时代，苏联讥讽中共给老百姓的布票是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犯人有此定量已属不错了。

冯队长把大家集合到院子里，并命令大家将自己所有的衣被统统搬出监房，称：「黄联关第一次卫生大检查」。当大家把自己的家当全部搬到坝子里以后，冯老头和汤干事还专门到各监舍进去彻底的检查，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二百来号人中绝大部分，除一条又破又脏的烂铺盖和干疮百孔的烂棉絮，身上穿的巴上重巴的空心棉衣外，便一无所有了。

面对着这些被无二条，衣无二件比乞丐不如的流放者们，冯老头紧皱着眉头。现在回过头去看甘洛农场的七个月，对谁都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洗劫。

冯老头再没有兴趣去翻那些又臭又脏的东西，只好无奈的挥挥手，叫大家把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回各监舍。只是再三嘱咐大家，三天内必须将衣服被盖洗净、翻晒，说五天以后再检查大家的清洁卫生。

看来这二百多号人，几乎没有人具备过冬的棉衣、棉被，这么少的东西分给谁都是难事！无可奈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听凭各自的运气来裁决了。

为了填平补缺，尽量做到大家都有份，冯队还专门作了一个规定，凡抽签得中的，其棉衣和被盖中只能得到一样。这样算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摊上一样，同时还规定凡是得到新的必须把旧东西交回队部，再发给一样没有得到的人，供他们作缝补之用。

就这样，这二百多号病员，在吵吵闹闹中用了三天，才了结了这一场棉衣的发放和分配。抽签的结果，我原来期待能得到一件新的棉衣还是落空。我抽到的是一条棉裤。也罢，除了这条棉裤外，我还分到了一些破棉絮和半床破被单。

按照老韦指点，我用了那半床被单和棉絮裁剪成一件旧棉袄，花了足足三天时间对破布清洗、晒干。除一部份补我的棉衣外，便缝制起我的自制棉袄来。

#### （四）赌性难改

在我的棉袄正要缝制完毕的那个下午，突然听到院坝里喊声震天，侧耳细听，分明是冯老头的怒喝声，我不禁心中一惊，连忙放下手头正在补的棉袄，跨出了监舍门。只见那冯队长满脸胀得通红，站在三号监舍的前方，正怒不可遏的向那监舍里喊道：「你们这些畜生，给我滚出来。」

自从到黄联关以来，从他对来这儿的疗养者们所放宽的尺度，以及在可能范围满足这些患病的流放者的生活需要，及至发放棉衣过程中，所表现出来对人的起码恻隐心，都能让人体会得出，他是中共监狱管理者中，人性还没有泯灭的人。平时对于乞丐不如的流放者，并没有采取鄙视和轻易侮辱，来这里已一个多月，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盛怒的对待流放者。

不一会，那监舍里依次走出五个人来，等他们排成一队，面对冯队长站好以后，冯队长怒喝道，「把你们的牌交出来！」五个人相互对视没有人动。「你去！」冯队指着最后出来的人命令道，那人返回监舍，从里面拿出一付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麻将，和一块用来作赌桌用的木板，怯生生地放在冯队的面前。

院子里已站满了人，人们在窃窃私语。

「把你们刚刚领到手的棉衣交出来！」冯队怒喝道，五个人没有动，只是低着头，像一具具木偶。这种反映，被冯队认为是一种无声的对抗，在盛怒下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从那里操了根青杠扁担执在手中。他虽已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具有东北人特有的高大体形，体魄十分健壮，那一双粗实的大手，握着扁担就像一块长戒尺。

「说，你们刚刚领到的棉衣弄到哪里去了？把钱交出来，把赌的东西交出来！」冯队怒视着面前的五个人，五个人依然像木偶般站着，谁也没动。只听见冯队一声怒喝，那扬起的扁担已经重重地打在第一个人的屁股上，那人立即应声倒地，一迭声的喊：「我错了！我错了！」但此时冯队的手再也收不住了，连连的向那人打去，直到他在地面上打滚，跪地哀求。

「交出来，不交今天就打死你！」冯队怒不可遏。

「我交，我交！」那人带着哭声请求道，冯队停止了手，那人从地上爬起来，一手捂着屁股，踉踉跄跄的回到监舍里，拿出了一把乱七八糟的钱。

「还有！」冯队继续喝令，只见那人用乞怜的眼光看着其它四个人。

「你！」冯队的戒尺指向第二个人，「交出来！」第二个人眼见他的同伙已挨了一顿好打，还是把钱交了出来，不敢迟疑，连忙走进监舍。

「还有你们！」冯队的扁担朝着其余几个挥过去。

「今天谁不交赃，就休怪我不客气！」他的怒吼起了作用，不一会儿坝子的地上便堆着钱、衣物和几小口袋的米。荣老头和汤干事最后走进那屋里搜出了两件新的棉裤和几双鞋。

冯队提着那青杠扁担，在所有参赌人的屁股上各打了五大棍，这才消了气。便收起扁担，将所有的赃物包在那两条新棉裤里，捡起那副牌九，同荣、汤两人一起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临走时宣布，今晚开全体大会。

六十年代，大陆禁赌甚严，然而赌徒并没绝迹，成都的赌场转成地下，赌资是当时最为紧缺的「粮食」，「副食品」之类的实物。五个现场捉到的赌徒，其中有两个人本身就是因聚赌被抓判刑的。后来便随着流放，夹在我们之中到了甘洛，以后又同我们一起来到黄联关。

我们这群来自六十年代社会各个角落汇集于此的人，本来就是鸡凰同巢，良莠参杂，甚至还有相当的人，属于中共的迷信追随者和社会垃圾。

### (五) 周老汉也得坐监

从成份上讲，聚黄联关接受「疗养」的人中大半是农民，同他们交谈便知道，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被饥饿逼迫进来的，有的虽戴上反革命帽子，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为什么坐了牢房？但是这些本质朴质的农民，只会从他们生存的角度论是非，我们这二百多人中，便有一个从乐山地区来的姓周的农民，当时年龄已近六十，个头矮矮的，但精神挺好，也是我们这些病号中体质最好的一个。

也许因为他本人有些耳聋，说起话来声音宏亮，叨叨不绝，加上他喜欢同人拌嘴，且性格秉直，口快心直，好多年轻人常爱逗他玩笑。平时太阳暖烘烘的中午，多数时间都会看到他倚墙而坐，在那里脱去衣服，津津有味地捉虱子，倘若有人挨过去向他挑逗说：「老反革命，讲讲你的英雄事迹」，他便会狠狠瞪你一眼，骂一声龟儿子，便侃侃地讲述他的故事：

五八年那会儿，喊拆了私灶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老子不去，公社的武装民兵到我家要强行拆除我的灶台，老子提起扁担吼道，哪个敢动爷爷的灶王菩萨，老子跟他拼拚了。队上的头头那一个不是他的晚辈？加之他世代赤贫，共产党政策对他，又是依靠对象，所以对这种桀傲放不驯的异教徒就不好下手了，公社上上下下只好向他妥协。

人民公社他不参加，他那块土地也不交出来，当大兵团作战，全村老小都走空的时候，他不跟他们加入「革命队伍」，而坚守在他那份没有「入社」的土地上挖土种麦子。

不过，当五九年下半年，全公社都荒芜一片时，唯独他那一块没有入社的资本主义尾巴，却长着青悠悠的麦苗，地里见不到一根杂草，菜园子里也是绿色一片，萝卜、白菜、葱子、蒜苗、样样尽有。为了防止周围的人们偷袭他的领地，他还专门筑起双层的竹篱笆，养了一条狗，捍卫着他的「世外桃园」。

那一年冬天，周围的农民正熬着饿，向他乞讨地瓜充饥。

他的这个强硬对抗以及鲜明的对比和示范，迅速的传染给了周围的农民。饥饿的农民纷纷以他为依据，找公社要求退社，退土地，公社书记不得不亲自出马，带着四个民兵来作他的「思想工作」，并拆掉他「领地」的篱笆。

「周老汉，你是佃农出身怎么就忘了共产党解放你的恩情，不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却硬要单干，钻资本主义死胡同？」书记土夹洋词，一本正经地「教育他」。可惜，周老汉回答得硬梆梆的：「老子世代为农，只晓得种庄稼为吃饭，懂不起你那些卖嘴的大道理，你是书记，哪个不长眼看看跟着你们走，眼睁睁要饿饭！」

在周老汉眼里这书记是看他长大的，一向是一个没出息的懒娃子，也不知到党校里学了几天，拣了些陈辞烂调到这里训人，所以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

老汉的轻蔑深深的伤害了这位书记，他愠怒的向他吼道：「我天天教育你们，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今天，你这个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就是要毁掉，不然全公社都向你学，我咋向上交待代？」

周老汉没有退让，因为在他看来，保卫他的领地等于保卫他一家人的生命，于是反唇相讥：「老汉生来就是操锄头的庄稼人，你娘没教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么？你娃子今天少跟我讲这主义那主义，各人去把锄头把捏稳点，老老实实种田，才是你做人的道理，今天莫来捣乱。」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令书记尴尬不已，盛怒之下，向身后的民兵下令：「今天给我拆篱笆，我今天砍你这条资本主义尾巴，看你敢翻天？」

「你敢！今天谁敢动老汉的篱笆，老子喊他脑壳开花！共产党的政策也讲自愿，哪个敢横来！」他手里操着锄头，横栏在篱笆前，直盯着瞪着两个民兵。几个年轻人怯生生的后退了，败下阵来。书记狼狈不堪的走了，但是周老汉没有胜利。

第二天，县武装部的人带着一张逮捕证，以「武力抗拒」和「反社会主义坏份子」的名义，将他戴上手铐押到了县的看守所。生性倔强的周老汉一路大骂不绝。至今每每回顾这些往事，他那紫红的脸上就格外涨得通红。

强劲的共产风终于撕开了共产党「自愿入社」的假面具，在输理的情况下，仍然强横霸道的刮倒了他所圈的竹篱围墙，吹散了他的农舍，他终于啣铛入狱。并不因为他「世代佃农」的成份，是「革命依靠对象」而幸免。

不过，他的这段在中国土地上的壮举，却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同情，甚至赢得了中共内部的高层人士的同情，那位冯队长也经常的端着凳子，坐在他身边，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还时时的向他提出一些问题。黄联关的人们，从管教到流放者，都用尊重的眼光看待这位个性倔强而耿直的老汉。

在那个时代，像周老汉这样的穷苦出身，正好做了被压迫而不敢声张的中国亿万农民最质朴的代言人。他们为自己的生存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又招惹上谁了呢？

## 第五章：\*\*流放盐源农场\*\*

比之在甘洛农场的鬼门关里度如年的日子，黄联关五个月时间的「疗养」似乎轻松多了，五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一九六四年三月初，我们这支被当局「修复」的廉价拓荒队，分乘了八辆卡车，离开了黄联关，继续向西南方向四川边界上更远的地方充军！向靠云南边界的盐源彝族自治县前进。

经历了甘洛那道鬼门关的生死搏斗，我们已明白，这种「充军」就是同死神较劲！逃！向哪儿去？中国大陆除无人烟的地方，凡有人群的地方包括这些南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户口像严密的铁丝网。加之遍地布满了中共地方党组织交织而成的特务鹰爪。随时都会像抓小鸡似的向逃亡者抓来！

我们这群懦夫，这群不会偷，不会翻墙越壁，不会隐身术，缺乏逃亡生存本领的人，只好顺着押解人员，把生死置之度外，任凭残暴的当局把我们掷向苦海的那一方！

汽车刚过雅砻江铁索吊桥，便沿着锦屏山峭壁陡岩的山谷中行进，过了小高山大约在卫城区域的峡谷中，到达了一个小地名叫骡马堡的地方，骡马堡顾名思义，本是供出入山间的马帮加粮换草，饮水歇息的一个驿站。

像小镇一样的石板街道，便是唯一的闹市区，满街的马粪疙瘩，穿着各异的少数民族，装扮出又一派「异国风情」。不过，对于我来说，生死两茫茫的心境，是无法领略这奇情异景的。

汽车在峡谷傍山而流的溪谷前停了下来，从高山上流下来的潺潺的溪水旁，峭壁之下的两排两层楼房，便是我们当天过夜的地方。

大概因为深谷之底的位置，四面的高山挡去了寒风，这时节气温比黄联关暖和多了。宽阔的谷底溪水边，菜地里还可以看到绿色的鲜菜和小草。

我们的目标是盐源农场，这儿是盐源农牧场暂时充作场部和医院所在地，我们住的黄色楼房就是医院的病房。我们到这儿来，是进行最后一次的「消肿」治疗，并且作入场前的第一次「身体检查」，这大概是甘洛农场的流放者在前一年的大量死亡，触动了四川省劳改主管中枢的神经吧！毕竟这是些可以利用来进行任意奴役的奴隶啊！

在这里住了大约十来天，服用从峡谷中采集松叶熬制的苦涩消肿水，和配制的黑色糖丸，未免是当局故作的「人道主义」的玄虚。

在黄联关仅仅因为靠着马铃薯和瓜菜，能满足生存的最低要求，五个月便止住了死神与我们猖狂纠缠，再没有发生冒着生命之险的逃亡。

足见，甘洛农场所发生的耍死狗、越狱统统都是中共造成的饥饿和死亡逼出来的。可惜，从重庆、成都为主聚拢来新的流放者中，许多还没有认识这原是专制极权造成的。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在一种惧怕暴政淫威的心理下逆来顺受。中共把他们当成可供役使的劳动力。

经过骡马堡短暂停留后，我们便朝着当局为我们安排的终极目标盐源进发了。三月盐源县的天空，同黄联关相似，万里晴空却始终是灰蒙蒙的。仿佛被一层看不清的雾气充斥着，虽是仲春时节，到处好像还沉睡在冬眠中未曾苏醒。只有那小金河曲折折的流水，在这块灰色的土地上静静的流淌。

汽车越过架设在小金河上的石桥，沿着泥巴山的公路缓缓爬行，翻过了夹在两个山包之间的坳口，面前便出现了一片红色荒丘，大山退到了很远的天边。

一片由一个个被雨水冲刷成沟壑像馒头堆成的泥巴山群上，拖拉机翻过来的红色土地，焦渴地仰望着天空。

被开垦的红土地边上，还留着一些灰白色的「荒草地」，唯有沟壑的底部十里一处，远远看去呈黑色的低洼带里，隐约可见几处蓄水堰塘，里面关着宛如镜子般大小的一潭潭死水。

一些盘旋在这些泥巴山间的水渠，把这一潭潭的死水连接在一起，一直连通到整个这片土地南端的一座大水库里，不过此时，那水渠里干涸得没有一滴水。

### 第一节：\*\*新的流放地\*\*

我们的车就在这堰塘群中最大的一个塘边停了下来。此时大约接近中午，干燥的西北风一阵阵向这里卷来，发出像怪兽般的鸣叫。这儿的小地名叫二道沟，我们跳下汽车，面前像在一个沙漠中的一处沼泽地，它上面的「堰塘」，像一弯不足十亩地的「镜片」，死水在那里泛出绿黑的光，面上一层油垢没有盖住一股股泥腥的臭味，从塘底泛向空气中。

隔着那堰塘百米外，是一群红色的瓦房群。前面两个大约三米高的砖柱，象征着「门」，门前站着—一个手持卡宾枪的士兵。那红瓦房群便是农场的场部！是一个刚从军工手里接过来的新建劳改农场——盐源农牧场。

下车以后，所有的人整队集合。带我们来的卢队长取出点名册，从中点出的一百多人，在他的带领下，沿着向南伸去的支马路继续向前步行。大约走了两里来地，来到一处狭长形的水塘边上。傍着那足有一里长的水塘，又一群红色的瓦房群被一圈已塌垮的短土墙围着。

那些房顶垮塌的地方，四周厚厚的围墙筑得十分坚固，走进中间的那排「楼房」由角钢和圆条做成的楼梯，已锈蚀得很厉害，人走上去有一种晃动的感觉，不得不加把小心。走进屋里、地板上狼籍一片，从那些甩得乱七八糟的破衣服，烂胶鞋、废纸箱看得到原先驻在这儿军垦的人所用的番号，他们搬走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屋角落里还有他们堆放的，没吃完的已经发绿和干瘪的马铃薯。

我们到达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一点钟，在卢队长的指挥下，将那木楼地板打扫—净，并从车上搬下我们的破行囊，按照点名册的顺序，分组将各自铺位铺好以后，卢队长便召集我们全体，在那门形房屋里围成一圈作了「建队」讲话。他高声地喊道：「政府出于人道主义，把你们送去黄联关养得白白胖胖的，现在又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好脱胎换骨，改造自新的场所……」

没有人去听他的政治课，所有到这里来的人，被这片荒凉无比的—土地弄得—心寒如冰，「这里真的是鬼不生蛋，拉屎不生蛆的地方」！有人在悄悄的咕哝着。围墙外，呼呼喧嚣的西北风正刮得如痴如狂，所有的人不由裹紧自己身上的烂棉衣，卷缩成一团，埋着头像刺猬—般。

甘洛农场那—惨景又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心中—了。原先离开黄联关时所抱着的各种—样的希望，已被这荒漠—派和西北风刮得—无影无踪，每个人脑海里，只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我们命中注—定要同死神较量—么？

厨房好像已经开过几天伙了，灶头和吃饭的场所收拾得挺干净，灶房边堆着一大堆的煤炭和不远处堆成的一大堆煤灰。「建队」讲话完毕以后，厨房里的马铃薯稀饭早已煮好，同我所到过的所有监狱不同的是：打饭一律到领取饭菜的窗前排队去领，所以看不到排着队鱼贯走向桶边，端着大铁钵跟那炊事员的铁瓢上下翻腾的情景了。

好在马铃薯粥，比初到甘洛时野菜粥强多了，好歹那还是可以充饥的食物。虽然那马铃薯有些闷人的气息，但吃下去能「稳」住心，不比甘洛那野菜粥令人心潮荒乱的感觉。也罢，无可奈何之下，且看以后又怎么样？

晚上，足有好几百平方公尺大的大房间里，亮着三盏大瓦数的电石灯，对于那么空荡的屋子，显得十分的昏暗。屋外呼啸的西北风狂刮了一天，仍没有明显安静下来的势头。掠过瓦面掀起一阵阵怪叫声令人心寒，身更寒。

我早早地钻进了被窝，伏在那木质的楼板上，静静地听那风声，隐隐夹着一阵阵远处山狼的哀号，令人心悸！也不知是从那瓦楞边，还是从地板的缝隙处，透进来一股股的冷风，吹得我发慌，便将所有的破棉衣全都堆盖在身上，蒙着头也不知什么时候沉沉地睡去。

记得儿时看电影《大梁山恩仇记》对影片中那些身披黑色毛毡、赤脚、脸黑如锅底的彝族人，颇觉可怕，当时哪里知道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而今身临其境，才知道长年生活在这一带恶劣气候下，为风沙洗尘的同胞们为什么没有洗脸洗脚的习惯。

大半年没有下雨，水在这里非常珍贵，起皱结痂的皮肤难以用水每天洗净。渗入到皮肤中的沙尘洗起来特别的痛，还不如让它们堆积在皮肤上成一层「保护」壳。几年以后于是我们的肤色就如同老彝胞一样，变得又黑又粗糙，摸上去就像带着齿的皮刷，真可称为「脱皮换肉」了。

第二天刚亮，我们就起床了，昨天刮了一下午一晚上的西北风，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停止了，朝着窗外看去，那灰白的枯草上结着一层薄薄的霜，天气异常寒冷。我们走下铁楼梯，看见围墙门外的塘中结着一层薄薄的浮冰，谁也没去那儿洗脸。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有热水」，我们便涌向厨房。

按照卢队的布置，这第一天全队的任务是打扫清洁，把楼上楼下，屋前房后的所有垃圾，统统集中到不远处正在沷制的火堆里。此时邓志新和另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却在收集原来的主人丢弃的那些破烂衣服和鞋底，这是为我们的棉衣和烂鞋子作修补用的最佳材料，他们已经收了好大一捆，准备在下午天气暖和时，拿到塘边去洗净晾干。

大概因为气候干燥，这儿不像甘洛满屋霉臭，而是满地的泥沙和厚厚的灰尘，别说扫地，就是人走路都会把地上的尘土扬起，洒上了水，扫地时仍然是满屋灰尘，令人呛得难受。一到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昨天的西北风又将重新刮起，不敢怠慢，所以不顾那灰尘多么呛人，很快把房前屋后打扫一净。

屋外水塘的两侧是两片长长的菜地，那土质就与山坡上拖拉机翻耕出来的土地完全不同了，这大概就是原来驻扎在这里的军工们留下的「遗产」。中间的几大块苗圃中被盖上稻草的地方，早有已住在这儿的「老犯人」从那臭水池塘中挑水为那些苗圃洒水，听他们说那苗圃已洒下了各种蔬菜种子，只等霜期完结，雨季来临将那里面长出的菜秧，移植到那大片的蔬菜地里。

这儿所有农田，已是开垦出来经过种植过的土地。连着二道沟最低的部份是一片宽约五百公尺，长约两百公尺的狭长「平」地，今后被规划为大约三百亩的水田，「沟」的两侧则是泥巴山梁，分布着近万亩的，已被拖拉机翻耕出来的红土地，此时，现在，这些红土地里刨到底都刨不出一滴水印来。

我们初来时，除了那狭长的「塘」水边，有几棵只剩下枯枝的白杨树干外，再也看不见一处绿色的植物。面对着满目的荒凉，听那下午刮起的风声，看着那些被拖拉机翻出的红土地，谁都不会相信，两个月后，雨季到来之际，那茂盛的庄稼会从那地里冒出来。

我们不知道这二道沟地区原来是否有人居过家，但至少，近百年以来这儿是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老百姓照例按照人类起源的一般规律，都聚居在小金河边的梅雨镇，或其它常年有水的地方，否则他们凭什么生存下去？而这些地势高峻的地方，恐怕历来都是这儿的居民们的天然放牧场。

我们全体被分成了五个组，除了一个组每天挑着一挑空粪兜，满山遍野地去捡放牧的牛羊群留在山坡上的粪便外，其余的人，便围在大片拖拉机翻耕出来的红土地周围，将很薄的「草地」连根带泥的铲起来，再用畚箕和箩筐，把它们在就近的土里堆成一堆，用火焙烧，以作瘦脊的红土地施的底肥，谁也没有去想这样做，将会造成今后什么后果，我们只想到，每人每天必须按队部规定的任务，铲足一立方公尺的草皮才能收工。

更令人沮丧的是，每天从上午十一点钟便开始刮起狂躁的西北风，夹着掠地而起的泥沙，飞沙走石昏天黑地，谁如果迎风而立，急速的气流压迫着你的鼻息，使你没办法喘气。而那些随风而起的砂泥，打在你的脸上身上疼痛不已，并且塞满了鼻孔和耳朵。到了中午和下午，风力持续加大，有时强劲的狂风会把人连同挑起来的草皮卷出几公尺以外，然后重重地泼在地上。

然而我们这些没有完成规定任务的奴隶，必须硬顶着这令人窒息的狂风铲草皮，并且迎着狂风一步一颤地挪动脚步，把这些铲起的草皮堆码起来。到了夕阳西斜，风仍没有停止，与风沙搏斗了一天，每个人都像灰黄的泥人，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履，挑起箩筐，畚箕和锄头，蹒跚着走向「营地」。

每个人只能排着队到厨房里领取半洗脸盆的热水，端这份热水，先洗眼睛，然后鼻口，耳朵、竭力清除那些灌进鼻腔，眼睛和耳朵里的黄泥砂。用力的从气管里卡出黄褐色的痰。清洗这「脸」后，那水便成了黄汤。然后再用这黄色的泥水去抹掉沾在双手，肩膀、双脚和身上的泥灰，最后才去冲脚。

日子一久，脸上、手背、脚跟到处都裂开了皴口，血就从那些「皴裂」的地方渗出来，凝结成一点点黑色的干痂！疼痛难忍。用不了多久，脸、手、脚凡是外露在空气里的皮肤便成了黑褐色。

然而，这表皮所受的皮肉之苦，对我们这些经历过甘洛炼狱过来的人算不了什么！唯独只有高强度的体力消耗而带来的饥饿则是最难熬过的。虽然这儿库房里堆积的马铃薯代替了甘洛的野菜，这些马铃薯表皮已发青，人多吃了会头昏甚至呕吐，但对我们来说唯恐嫌少而不能填饱饿壑。

## 第二节：\*\*偷猪食吃的人\*\*

就在排队领取饭菜的窗口过道右侧，一间大约八平方公尺的房子里，临时的关着两头肥猪，据说是准备「五一」节宰杀的。猪圈靠过道一侧放着一个三公尺长的猪食槽，它放置的位置显然是便于喂猪时的方便。那猪食槽中装的是发过酵，酸臭冲鼻的猪食，但其内容是玉米面和马铃薯，同我们吃的东西，没有多大差别。

有人便趁着排得长长的打饭队列，遮住了那领饭窗口中炊事员视线的机会，从猪槽中拣出一个一个的马铃薯，用水冲洗一下，去掉那难闻的酸臭味，便放进自己的大铁钵里充作补歉！

在所有拣食猪饲料的人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位高度近视的邓自新！经过雅安抢馒头事件后，在调往甘洛农场时，在斯足渡过了鬼门关前最难熬的时间，和我一同调往黄联关，当时我们很少交谈。只知道他是离开雅安时三个带刑具的人之一，这次有幸同调到盐源农场来，编在这个中队。

不知道他怎么会披着一件，只有甘洛彝族同胞才用的黑色披毡，我们按当地的土著人称这种羊毛质地的披毡叫「插尔互」。戴着四百度的眼镜，披着又臭又脏的「插耳互」，那邓自新活像一只大乌鸦。

每当排队「打饭」时，这只大乌鸦经常排在队尾，等到排拢那猪槽时，他使用自己的大铁钵在那槽中，将那些剩下的猪食全部舀进了铁钵中。每见此景，我都暗自感叹，在这里流放者和畜牲没有两样，中共把我们变得猪狗不如。

其实仔细想来，这些流放者真比那猪都不如，这里的主人明白，要吃这些睡了吃，吃了睡的「猪」身上的肉，还先得喂饱它们。至于这些流放者，在牢头眼里向来把我们当作「死两个算一双」，比畜牲还不如的奴隶！

「我宁可在那个猪圈里变猪，最后挨一刀也划算」，邓眼镜常常这样自我挖苦自己，当着大家的面，没有任何人反对他。因为，那可不是简单的自我作贱！而是当局对我们惨无人道待遇的控诉！正因为这样，不善交际的邓眼镜却获得了不少的同情。

时间一久，邓眼镜在猪槽内舀猪食的事，传到了李管教的耳中。有一天中午，当他正利用他那又黑又脏的「插耳互」遮着别人的视线，蹲在墙角起劲地剥那猪槽里舀出来的马铃薯时，头上猛然地被一根木棍击了一下。他

抬起他那深度的眼镜向上看，也不知什么时候，脸色苍白的李管教手里执着一根木棍，带着一脸蕴怒，站在他的背后。

邓眼镜被带进了队部办公室，所有吃饭的流放者的目光，一起向那儿集中过去。不一会儿，办公室里传出了「朴朴」「朴」的杖打声。有一记，木棍击中了他的深度眼镜，随着一起清脆的落地声，眼镜落地后，打碎了左面的镜片，还折了一腿。

邓眼镜发出了低沉的抗议声：「我的眼睛，我的眼镜！我没有犯你们哪一个人的私法，你们凭什么私自打人，凭什么打坏我的眼镜？」

回答又是两记沉闷的劈打声。

「你太没道理，我犯法自有国法判我的刑，有过错自有刑具惩罚我，你凭什么私自用刑？」邓眼镜并无惧色的大声叫喊，使所有在场的人为之一振。吃完饭的人没有人离开，已经到了寝室去的人又折转身来，一种无声的集合令，使全队所有人都站在饭堂里，听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对话。

忽然门开了，盛怒的李管教脸色铁青，冲出了办公室，从外面把两名武装士兵叫了进去。食堂里所有的人都屏息静听，大家心里为老邓捏着一把汗。邓自新开始还一直怒吼：「法西斯！你们是法西斯！」但是，随之便转为痛苦的呼喊和呻吟，看来平息了几个月的甘洛暴行又恢复了。狱吏们对待手无寸铁的流放者惯用的一套骂、打、捆、杀四部曲外还能有什么新招吗？

晚上没有召开任何会议，经过甘洛以后，不论哪一个「管教」，大概都认为斗争会对顽梗不化的人已失去作用。倒不如捆、打、吊硬来，既简单又解决问题！

劳累了一天，疲劳已极的人们都各自蜷缩在自己的铺位上，在黯淡的灯光里切切窃窃议论。有人说：「好汉不吃眼前亏，邓自新何苦硬顶？」又有人说：「人到了连喂猪的东西都要抓来吃的地步，还有什么想头？」而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却认为：邓自新之所以遭到如此暴打，还不是饥饿招来的？

除了窗外没有停息的风声外，还夹着从楼下传出老邓痛苦的呻吟，一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大约邓自新已经昏死过去，才听见楼底下有人提着电石灯给他松绑的声音。不一会楼梯响起了脚步声，四个人把老邓抬上楼来，随队的卫生员，提着药箱上来对他进行了诊断，看会不会死人？下半夜他终于醒来。

与他相邻铺的人自动地给他端饭、喂饭、倒尿、倒屎。只要没有管教人员在场，大家都向他问长问短，为他纷纷鸣不平。这是我在孙家花园和看守所里所从来没有见到的。看来，甘洛的炼狱使我们发生了质的变化。

共同的命运和人性的同情，消融了所有调集到这里的流放者之间的矛盾！也消融了他们中相当的人对中共所抱的不切实际幻想！

大约十天以后，手上的伤势还没有痊愈的邓自新，再次被叫到队部办公室。不过，叫他的是西昌法院的一名审判员。那一天就为一年前雅安抢馒头一案，西昌中级人民法院对邓自新进行了正式的「审讯」。

雅安抢馒头的事，已过了一年，先前的人几乎饿死了一半，现在当局重新审理这椿桩「未了的案」，由雅安市检察院提起诉讼，西昌法院正式审理。

提审员那一天对他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审问。审讯完毕，将钢笔递给他，要他在自己的审讯记录上签字时，忽然，他抬起头来对那人说：「这李管教凭什么打我？捆我？无端的打碎我的眼镜？到现在都没法看清周围的人，我的手如果被他捆爪了，他叫不叫犯法？」

这突如其来的责问，使坐在一旁的李管教顿显尴尬之色。那提审员看着眼前眼睛高度近视的人，也看了一眼坐在旁边面色铁青的李管教，竟然一时语塞。沉默了足足三分钟，才找出一句替同僚解围的问话：「管教人员没有发疯，他们执行的是国家政策，总是你不规矩，否则他为什么要打你，捆你？」李干事得到了解脱恨恨补充道：「是啊，你这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家伙，连喂猪的马铃薯都要偷吃，你还算不算人？教育你反抗，不比你打谁？」



不料，邓自新没有示弱，大声的回答道：「你们想想，我是人，你们也是人。我抢馒头，是冒着吃枪子的危险，我抓猪食吃，是冒着生病的危险，你们把我逼成这样，还说是对我们进行什么革命人道的改造！就没想着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

邓眼镜被提审后，全中队的人向他打听有关西昌法院受理雅安事件的情况。卫生员给他一些胶布，让他很用心地把那片摔成三半的镜片贴成一块，又请来精通钳工的小卫，为那被摔断的「腿」，重新配制了一个用铜丝做成的架子，并将那片镶嵌贴合的镜片装在镜框中。

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戴着这付修好的眼镜，渡过了漫长的刑期，他说：「他会珍藏他的眼镜，如果能活着熬到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一定要拿着这一副镜片，向他的儿女朋友讲述这一段故事。」

高强度的体力消耗，饥饿已成为对我们最大的折磨。苍天并无绝人之路，我们不久就在烧制草皮灰的几块红土地里，发现了经历大半年的旱季风霜，被拖拉机翻过的土胚，很好保护着隐藏在它下面的马铃薯，大的有如鸭蛋，小的也有指头般大小，表露在地面土层浅处的，因受到阳光的照射而变得发青，有的已经干瘪。

后来听经营蔬菜地的几位「老军工」介绍，最开始的时候，军人们把马铃薯种子装在拖拉机的播种兜里，靠着拖拉机，将这些种子埋进了被翻耕的土中。以后，雨季来临，这些「种子」便在地里生根、发芽，长出一尺左右的秆来。秋天来临，军人们驾着拖拉机秋耕、秋收。那些藏在地里的果实，随着那红色泥浪抛向地面，那些被铧翻起的泥浪又重新把它们藏在土中。

每天下午，西北风刮得人在风中无法直立时，卢队和李管教一般是不会上山来的，他们把这个跟班的苦差事，交给在这儿驻守的三名士兵，却遭到了拒绝。只好把看守这些流放者并督促完成任务的事，交给了各组的「大组长」，命令他们要按规定的任务收方，没有完成任务的不准回营地休息。

就趁着这个时候，大家像游击队似的散开，在这些地里寻挖着散落其中的马铃薯。用畚箕把它们拣起来埋进正在沤制的草皮火堆中，不出一个小时，便可以从那里面刨出烧得香喷喷的马铃薯了。而且，这些烧熟的马铃薯比伙食团的麻口马铃薯新鲜多了。

### 第三节：\*\*古柏行\*\*

五一节前几天的一个早上，李管教拿着点名册从我们中点出了三十名「政治犯」出列，命令我们打好背包坐上汽车，调往三十里外的古柏，同行人中就有潘老和大炳，老韦等人。从孙家花园出来，唯独我们四个人一直没有分开过，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短暂停留的二道沟，调到盐源农牧场的另一个中队——古柏中队。

同二道沟的荒无一树相比，当时的古柏就两样了，整个古柏中队被一片矮小而壮实的柏树林荫，隐蔽在一座石头山脚下。它四周被一圈一人多高的砖石围墙围住，里面的建筑倚着地形的变化散布在这座石山中。

从最南端的马路尽头，沿着一条竹林小道走去，小道的两旁排列着当地农民的茅屋。顺着小路一直向北，通往那砖石围墙中，开着一个圆形的石门，便是它的进口。走上石门的台阶，进得里面，便是整个古柏中队的所属范围。

进去的右手是一排墙壁隔开了的砖柱平房，这儿便是下雨天供我们吃饭和晚上开会学习的地方，那平房的背后是一排公社的猪圈，每逢雨天我们躲进这儿吃饭时，可以听到那里面传出来的咕咕猪叫声，还伴有一股猪食特有的酸臭味。好在，我们这些处境与猪牛差不多的流放者，并不计较这些。

石门左边，由低向高排列着两排瓦房，紧靠石门的那一排便是厨房和队部的办公室，背后是干部的寝室和家属住地，另一排瓦房是我们的监舍，两排瓦房与石门右面的平房，半围成一片大约一千多平方公尺的小平坝。

循着进来的方向，一直向北穿过那两排瓦房和平坝的尽头，是一个向上的石梯路，走完石梯路向东一拐，便是这石头山的顶部，那上面是一片大约占地一亩多，用三合土打成的平坝，平坝的边上堆着晾晒粮食用的工具。

平坝的南端和东西面，是两排围着它相互垂直的砖结构平房，南端的那一排，保留着墙和门窗，那是堆积粮食的仓库，而东边那一排则只有砖柱没有墙，里面安放着电动机，是雨天收藏未脱粒粮食的场地，靠着南面库房下面的半坡上，便是两排很长的牛马厩棚，里面关着一些很瘦的牛马牲口。

在通道的进口，新建了可供瞭望整个农场的岗哨，其余还来不及按监狱的要求加以改造。

在我们到来之前，那儿已关押了一百多名的流放者，其中最早的几十个人是先于我们一年，大约正是我们去甘洛时，就调到这儿来的「创业者」，他们的穿著和容颜与我们大体相似。虽然已近五月，依然捆着破烂不堪的蓝布棉衣，面色黑黄憔悴。

我们在坝子里放下背包后，便有一个个头矮矮的，身板顶壮实的中年人拿着一本名册向我们走来。按照他已排好的名册，我们搬进了各自的编组中，我和大炳编在一个组，组长宣布，这个组是大田作业组，劳动的任务初定为水田备耕。

在黄联关，我们靠着马铃薯得到了短期补充，现在又来到了这古柏！第一顿晚餐便是干萝卜根煮的稀饭！我们当然没有吃饱，借着已经黑净的监房，我和大炳靠在自己的铺位上，取出从二道沟带来的烧马铃薯，正在悄悄的咀嚼。

### （一）炒豆子

突然，从监舍的黑角落里，一点火光隐隐闪现。开始，我们误认为有人在那儿吸烟烟。不过，那火光却非常大。我还闻到了一股炒豆子的香味，从火光闪现的地方，传过来一阵阵轻微的劈啪响声，那分明是炒玉米或炒豆子的响声。

我和大炳好奇地坐起身来，再仔细地向四周探望，便发现除了刚才那里的火光，还有第二处、第三处，暗红色的火光在黑暗中此起彼落地闪现。很清楚，这小小监舍里有人正在炒豆子。我用胳膊碰了一下大炳，轻声说：「听到了什么？」「炒豆子的声音」！他低声道出了同我判断一样的话。

随即我们便发生了一连串好奇的疑问，进这监舍时并没有看见里面架有炉灶，这火是怎么烧起来的？烧的燃料是什么？用什么「锅」来炒？炒的豆子又是从哪里来的？

「夫炭！」大炳轻声的告诉我！不错，那炒豆子的香味中分明夹着夫炭燃烧的气味，甚至还夹着一股木柴燃烧的烟味。我们不敢动弹，装着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带着点好奇睡去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便跟着这个组的老犯人，挑着箩筐畚箕走出石门，沿着昨天进来的小路走向工地，我们这个组的任务是撒肥料。驻地周围除蔬菜地，四周便是一片大块的水田，这些水田被纵横交错的田坎分割开来。最宽的几条田坎又长又直，是供拖拉机的机耕道，机耕道两侧开有大约一米宽的水渠。

这时节，水渠里长满了荒草，里面也没有水。除少部份靠近大本营的几块水田被拖拉机翻耕过，其它田里还留着稻椿桩，自去年雨季结束以后，一直就没有下过雨，田里都裂开一条条两个手指头宽的龟缝。

机耕道上和几条较宽的主田坎上，堆放着一堆堆的草皮灰、牛粪和森林里才可以弄到的松叶和各种腐植物，我们的任务就是将那些腐植肥料，用箩兜一挑一挑送到两边的水田中间，再均匀地撒开！

我看见所有老犯人下到水田后，边干活边在田坎边的荒草堆里寻拣着什么。怀着好奇心，我也蹲在田坎上细细的看，那里除被割去豆杆而留下的椿桩头外，并没有什么。但是细心扒开荒草寻觅，便可以看到这些荒草丛中，原来还隐藏着许多花花绿绿的豆子，宛如一些彩色的小石子，是我从前没有见过的。

这是一种矮椿桩四季豆，这种四季豆不牵藤，也不择土壤，同内地的种在菜园子专作蔬菜用的四季豆不同，种植它们不需要施肥，也不需要插杆和中耕管理！只要有水份的田边土角，打一个窝，把它们丢在里面，它们自会在土壤里生根发芽，到了秋天便已成熟，在太阳曝晒下，豆荚便自动炸开，并将成熟的豆子重新撒到田坎上钻进草丛，不过它的壳却不像菜用四季豆那么肥嫩可口，那壳比黄豆还坚硬。

我现在终于明白，昨夜那些被炒的豆子原来取之于此！一个人如果工间和中午不休息，边扒开枯草边拣豆，少可以拣到二两，多可拣到三两！足够我们一顿定量的粮食了。

苍天确无绝人之路，与二道沟不同的是，老天爷虽然没有把埋在地里的马铃薯赐给我们，却用干燥的风将前一年藏在田坎、路边、野草丛中的四季豆、黄豆完好不烂地送给了古柏的流放者。不过，得靠自己劳动才能得到。

下午收工回营，我怀着好奇心按昨晚看到的位置，窥察了那里的铺底下，结果果然看到，那里放着用旧洗脸盆改制的「夫炭炉」，里面还装着许多夫炭，只要用火点燃其中的一块，再用气不断地为之「鼓风」，不需五分钟就会燃成红红的大火，便是炒豆子的火源。而夫炭是从厨房或喂猪房的灶眼里，将燃过明火的木柴用水喷熄后得到的，还有的就取之于附近的农家。

怪不得，一到这里的头一天，我便看见在黄联关疗养地，专以改制大铁钵赚罐罐饭为「业余」的辛至华，又重新在院坝里立起了他那根铁棒。现在是改制各种「夫炭炉」了，自然还是老价钱，一个夫炭炉收取两个罐罐饭。

看到这些，我已经明白了，这里流放者中为解饥饿而在「地下」进行的一条龙活动。从拣豆子到生火，炒、煮豆子，倘若，其中无论哪一个环节被人告密，辛至华也休想在院子里公开制作炉子。仅从这一点看，经过甘洛严酷的生死洗礼，这里的流放者清醒多了！。

「火」本是人类发明的。从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后，经过了万年的发展，近代取火普遍使用打火机了。然而，这里的一无所有的流放者，别说打火机就是火柴也十分珍贵。他们取火的方法是从石头中，精选出质地十分坚硬略带脆性的石块，再用一柄断镰刀与之擦碰出火星得来。一种用干透的蒿草搓成指头般粗细的「绳」，是引燃这种火花的最佳材料，我们称之为「火绳」。

当年凡盐源地区吸烟的流放者，每人都备有一个专门取火的小布袋，里面装的是几块石头和一截断铤，还有一包用纸包好的「火绳」。当取火时只要将「火绳」的一头贴在火石边上用左手捏紧，右手用那断铤刀像擦火柴一样轻轻一擦，直到那火绳头冒出青烟，再将它吹旺，现出明火。

中华民族一向崇尚三皇五帝，将他们尊为华夏的祖先。而今这些经历长期炼狱的苦囚们，还在借用祖宗最原始的方法来求自己的生存！这些祖先大概做梦也没想到，经历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在今天还要记这一笔心酸的历史。

经过流放者像老鼠般的寻觅，埋藏在这片土地上所有角落里的豆子越来越多，且品类也在增加。除了田坎上以外，更多的则藏在堆积豆杆的草树下，马厩里的食槽底，晒场周围，凡在前一年秋收时，这些豆杆经过或堆放过的地上，都会发现藏在那里面的豆子。

这种发现，给下一年收获时的流放者一个启发，在收获时，有意捶打那些豆杆，使它们到处的散在草堆里，等到风季来临以后，慢慢再将它们重新找回来！

有一天我们被派去将堆放在晒场边足有两人多高的豆杆，挑到蔬菜地里烧草木灰，意外发现那草垛下藏着一层厚厚的「杂粮」，有黄豆、四季豆和玉米，这些粮食中央部份因稿杆霉变而烂掉，有的生出了豆芽。而周围部份大多完好，估计是前一年在这儿打场的人故意留下的。

挑豆杆的人丢下了挑草的任务，掏出各自带在身边的口袋，拼拚命地抢着装。那王华春和秦石头因争抢而打起架来，惊动了岗楼上的士兵，走过来朝每人的胸膛上揍了几枪托，还勒令所有抢豆子的人统统的把口袋里的豆子掏出来，装在一个箩筐里，送进了厨房。

听说那也算成粮食，折合成定量，回到监舍，两人像斗败的公鸡，相互埋怨。

## （二）雨季到来的时候

处于海拔较高的盐源地区，春耕一直要到谷雨以后才姗姗来迟，然而雨季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饥荒。五月一过雨季来到，草丛里的豆粒也迅速长出芽来，正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饥饿更严重地威胁着我们。

同二道沟只准在同一时间排队，在食堂窗口上领取饭菜不同，这儿仍沿袭监狱的一般做法：三顿「饭」都由炊事员把饭桶抬到院坝中，开饭时，由值班管理人员清点人数后，才按组排着队走到饭桶边，用大铁钵去接回自己那份牢饭。

随着雨季到来，拖拉机倾巢出动，将原来的干田犁翻、耙平。蓄水池的闸门也打开了，从引水渠按着由高到低的顺序，将塘水灌进了犁耙过的大田中。大田组的囚奴便开始重新调整，按照队部的安排，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守着沟渠，一块田，一块田的放水淹田，整糊田坎，拉平机耙不能到达的死角。

于是便没有统一上下班，大田组的人也变成了轮流三班制，吃饭时间，暂时取消了集合点名那一套，变成了「流水席」。

趁着这「流水席」的「混乱」，本来就没有吃饱的劳动力很「正常」的出现「混饭」的事，虽然队部「动用」了加班粮，对每个人的定量加上微不足道的二两，却远远不能解决饥饿的威胁，队部有意安排炊事员，指定了一名尤二皮的人专管犯人的饭瓢子。

有一天，大雨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按正常开饭时间吃过晚饭以后，置晚班的人才出发到三号田，换下那儿整整干了一下午的人，换回来的人摘下蓑衣斗笠，洗完脚，天已经漆黑了。当他们拿着大铁钵朝厨房的窗口走去，领取那两瓢玉米粥的晚餐时，秦石头也夹在他们中间，他用一顶破毡帽遮着自己的前额，想趁雨天天黑看不大清楚的机会冒混那两瓢粥，不料他的大铁钵，刚刚伸了过去，就被尤二皮一眼认出。「砰」的一声，那舀饭的铁瓢将石头手中的铁钵砍翻在地。

石头不忍气，在那领饭窗口前骂了几句，尤二皮把手中的瓢递给了旁边的另一个炊事员，立即跑去报告了倪管教，石头被倪干事「请进」我们吃饭的那间屋子里，先就对他搨了两记耳光，跟着从岗楼上叫下了两名士兵，将瘦弱的秦石头夹在中间，一顿拳打脚踢，石头顿时口鼻鲜血长流。

所有监舍里的人都一齐挤出门，站在檐下观看，那因争豆子而同秦石头有过结的王华春，趁机落井下石，站在我们监舍的门口兴高采烈地数落秦石头偷了几次四季豆，混过几次饭吃。

老傅实在听不下去，拍着王华春的肩膀要他回监舍去，王华春却向老傅吼道：「你为什么拉我？」我听见老傅悄声地规劝他：「别人挨了打，你又何必杀人的下马威！」但是王华春并没有住嘴，依然大声的吼道：「你不晓得，这家伙实在太可恶，平时豪强霸占的欺侮人。」

「你和他有仇也不该在这种场合下报复，你的家里有东西寄给你，但是哪一个也不敢说狠话，都挨过整。」老傅暗示对方也挨过老管的皮鞋尖和耳光，两人在监舍里小吵起来。直到被打得脸青鼻肿的石头，带着一身泥巴，走向监舍来。

大约距那以后又过了两个多星期，伙食团的粮食吃完了，轮到我们这个组到盐源县粮食加工厂去背米，王华春悄悄的带着一双从家里寄来的皮鞋，想半路上卖给附近的老乡换一点钱，却恰恰被这个死对头秦石头发现。

那天出发以后，石头故意的掉在队列的最后面，向带队的童干事告了密，刚到碾米场，童干事便将王华春喊住，问他来背米还带着双皮鞋干什么？王华春支唔半天答不出来，结果皮鞋当场没收。

流放者中，相互因很小的厉害冲突，而借刀杀人相互伤害的事，屡见不鲜。

盐源的雨季，一经来到，便会接二连三地下个不停。间歇出现的雨停也是浓云密布，秧田里的秧苗很快长到了一尺多高。大田作业组分成了几个小组，一部份原先有犁耙和整田「技术」的，放水糊田坎，整耙水田；一部份人便蹲在秧田里，扯稻秧。还有一部份人挑着秧头到已经耙平，整好的水田里，将秧头「打」到田里去，其余大部人下田栽秧。

那位因坚持单干的周老汉，可是赤贫的佃农出身，不能用五类份子的大帽子来吓唬他。而况他所讲的句句实话，从他的口里讲出来，过去的赤贫人家到了栽秧打谷的季节，「老板」也会用好饭好酒招待他们。

年轻人听到周老汉的介绍便明白「栽秧子的酒，打谷子的饭」，是对「苦大仇深」的旧社会的回忆！当然要比现在那种早晚每顿两瓢稀饭，中午半罐饭这种生活，当然会发生巨大的反感！虽口中不敢说，但心里却在嘀咕，手里的活也停了下来！学着人民公社社员的老章法，用「磨洋工」消极抵抗。

栽秧子的进度始终跟不上计划规定的数量，为了不误农时，所有队部的管教们倾巢出动，他们操着手，三三两两不停地吆喝着水田里的奴隶们，不时的驱赶那些坐在田坎上抽烟烟休息的人们。

为赶上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每天必须十四小时以上的泡在水田里，干水田里的活不比旱地，泡在水田里的时间越长，肚子也饿得越快，在水田里，每天上午还不到十点钟，肚子就已经饿得咕咕直叫。于是在水田里，人们的话题，怎么也没离开吃饱肚子这个题目。

茫茫黄汤般的水田中，很快地长出一种叶子很像韭菜的水草来，尤其是夹在秧田里，有的地方一片几乎全是那种水草。连根将他们拔起，便可以拨出一串串附在它根部像蚕豆般大小的块根来。人们告诉我这便是三楞草，它的块根便叫香附子，味甜可以入药，可以生吃。一窝粗壮的三楞草，只要用手去那泥里理着根，轻轻的拔干净，附在上面的香附子足有半碗之多。

饥饿的眼睛迅速盯上了这满布在水田中的三楞草上，初赏这褐色香附子，我马上联想到了荸荠，相比下除块头小也老得多，它们的颜色味道，颇为相似。

记得童年时，外婆常常从菜市买回这些表皮暗红，肉嫩可口的蔬菜来，荸荠可以炒肉片也可以当水果吃，脆而细嫩。眼前这些香附子，又勾起了我的回忆，彷彿重现出她老态龙钟眼里透出的爱怜，喃喃说：「孩子，荸荠可以预防感冒，你从小营养不良，气管炎很严重，买这些是给你治病的，你可以经常吃。」说着一边把甘草、桑树根、洗干净和荸荠装得满满的一锅在灶上煮起来。

唉，苍天有眼，当着这四野茫茫，腹中空空的可怜流放者面前，您又一次奇迹般的把那么多草根，赐到我们的面前，聊以让我们填充饥饿的肚子。

忽然，一记沉重的巴掌刮在我的头上，我猛然一惊，刚才的回忆顿时消失，转过头去，我正好正对着一双幽灵般的眼睛，和那死人般的脸，不知什么时候倪干事悄悄的站在我的背后。

「我已经看你老半天了，你足足有二十分钟没有扯一把秧子。」他阴沉的说，低沉语调令人恐惧，我手里正捏着一把刚刚拔起来的香附子，还没得及想出应对的话，紧接着右手又挨了他重重的一掌，那捏在手中的三楞草，被打落到两公尺外的水中。我按捺不住，怒目抗争道：「你凭什么打人？」

回答我的，是他那强健有力的右手，拧着我破棉袄的衣领，将我从水中像小鸡般提上田坎来，我还没有站稳，便大声吼道：「你凭什么打人？凭什么？」

水田里所有的眼睛，齐刷刷地都向我们这里集中过来。所有的人停下了手中的活，立在田里看事态的发展。

我的右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顿时满眼金光四溅。那记耳光，将我摔倒在田坎上，身体溅起的泥浆把他的衣裤染成大片的黄色。

此时已经横下心的我，护定了下身，迎着 he 雨点般的脚尖，在田坎上像一团滚动的泥球，拼拚命的大骂大喊：「打死人啦，法西斯！」不一会儿走过来一名士兵，用刺刀逼着我从泥泞中站起来，并押着我离开了那里。

我被带回了监舍营地，像个泥人似的站在坝子中央，刚才的冲动降温了，心中打着主意，等待绳捆或一顿毒打，下意识地紧了紧腰中系着的草绳。

那姓倪的铁青着脸走进了办公室。我站在那里，足足两个多小时，并没有人理会我。身上满沾的黄泥，开始干结，一块一块地剥落下来，直到收工。

### （三）禁闭前的舌战

晚上，我被喊进了队部办公室。在办公桌后面，发黄的台灯下，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他便是这个农场级别最高的特工人员，管教科长邓扬光。我看见他面前放着审讯记录纸和一支笔，见我进来他抬起眼睛注视着我，沉默两分钟以后，向我发问道：「你就是那个在甘洛农场西西卡中队，在黄桷树下学老鸦叫的孔令平吗？」他眼里透出一种力图控制对方的压迫。

事隔大半年了，第一次见面就向对方重提旧事，说明这位陌生人一直十分关注着我。在狱中被特工人员特别关注，决绝不是件好事，我没有回答他，心中在猜测今晚不知他又会怎么收拾我？又是片刻的沉默。

接着，他开始过问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漫不经心的听我讲述整个的经过。大约半小时以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张印着红头的文件来，我多次见到过，这是一纸判决书。

他阴沉着脸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了你的申诉，并且驳回了你的申诉。现在正式向你宣读。」我听着他那平淡的宣读声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早作了申诉失败的打算，只是觉得时间隔得这么久，几乎让我遗忘

了。

宣读完毕，他便一本正经的对我进行了常规「教育」：「你的罪恶是不小的，我看过你的全部档案，狡辩没有用。我奉劝你丢掉侥幸心理重新做人，像你目前这样的情况，处处顶撞干部，不认真的劳动是不行的，你是大学生。响鼓不用重捶！你应当明白党的政策。」

那申诉，已快过去两年了，就是我从孙家花园的医院，回到监狱反省组时，借写反省材料的机会写出的。当时，经过了一年的看守所关押和一年多的「劳改」，我开始从关注自己转向关注社会。

失去自由的难受使我渡日如年，饥饿的狱中生活和虐待，让我从幻想的迷雾中，回到我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现实中。我那种蒙冤的痛苦越易加剧，我内心就越烦燥。我不能对原判采取无可奈何的忍受。而必须按照事实，拒绝这冤枉的十八年徒刑。

现在经历了甘洛这段茹毛饮血的炼狱，眼看与我同龄的人，就冤枉的死在荒野中，像我这样不弄清「原罪」，糊里糊涂的牺牲也太不值了。

最初入狱时提出上诉，确有许多幻想，希望有一天「政府」，能本着事实取消对我的原判，其至于纠正加给我的「右派」罪，还我自由。经过几次申诉，尤其我目睹周围的同难们喊冤者不但没有重新被改判，反而「罪上加罪」，招来徕更多的痛苦和麻烦！

特别看到现实中，中共之种种无道，「三面红旗」即使造下那么大的灾难，仍不许人直说，更谈不上改正和认错。！我的脑海里便由「求饶」，变成对奴役我的「政府」进行反抗！我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从烦躁心态转变到坐穿牢底，最后将我的蒙冤与民族灾难统一起来，将个人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中。

今天，面对这位监狱的特工头目。我想，不管有用无用，据理力争总可以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虽然刽子手的良知被蒙蔽着，但有时主动进攻！往往可以取得积极的效果。于是扬起头说道：「我犯的什么？是偷？是抢、杀人、放火、强奸、还是组织集团，用枪杆子同你们对着干？你们中的刑法那一条规定，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子女，天生就该判刑受罪？」

邓扬光操着他背熟的教条回答道：「你犯的是向党进攻的罪，你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你的反革命本质，你在日记上明目张胆的攻击社会主义和三面红旗，你知不知道这是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犯的罪可比杀人放火还严重！」看来这是一个老手，一个死守毛氏教条的「高手」。

「但是，在划我为右派时，还没有『三面红旗』，我在大鸣大放时并没有说共产党的好坏，对父亲被捕连判决书都不给这种非法行为，胆小到不敢向法院索要这种程度，但是重庆大学和法院却置事实于不顾，硬说我替父亲翻案，把右派帽子强加在我和母亲头上，你们才是真的犯了法！」我吼道。邓扬光无可奈何地摆摆手，回答说：「那是你们学校的事，我不清楚。」他推诿了。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要攻击三面红旗？」他把话引到眼前的话题上，我紧紧地盯着他说：「说到这点，请你听我说完，我说的时候请你不要打断我。」预先约法三章后，我说道：「我请你现实的思考，不要按报纸上怎么说。」

「请问，五八年浩浩荡荡的大炼钢铁大军，炼了什么呢？当时建的高炉，今天你见着有几处在冒烟？在荒芜的田园和高炉的废墟之下，破烂不堪的农家茅舍有多少？饿死的百姓有多少？直到今天，老百姓连肚子吃不饱，这又究竟是什么造成的？你们说是天灾，但是天灾这么巧就发生在你们天天唱大跃进之后？你没有思索过吗？你若不是农村出来的人，应当多去问问农民们！你若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那么睁开眼摸着良心自问，这几年哪里有什么全国规模的旱灾？」

「再说，你们不是天天在唱高产丰收和放卫星么？既然粮食成倍在翻，丰收年年有，怎么会弄得连你们也要亲领人马下田种地？你们不是说大跃进三面红旗形势一派大好吗？你们不是说市场繁荣，市场上应有尽有吗？你就没有一点现实的感觉，现在连肥皂草纸都买不到，这不是太假，太骗人了吗？还有，就比方说你穿的这条裤子，也补了巴，这又是怎么搞的呢？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会穷得来一无所有，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不断的滔滔不绝地述说这些浅而易见的道理，列举着天天发生的平凡事实。语气刚硬和不容辩驳，这是五年监狱磨难出的。

邓扬光没有打断我，显然他没有理由也没有信心来否定我。或者，就是在进行思索，这些特工人员内心活动隐蔽得非常深。

「别再说了，你这是把支流和暂时的挫折，当成了主流，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邓扬光终于只有用这种不成理由的话堵我的嘴，但是他这么说几乎没有任何的力量，邓大人理屈词穷了。

其实，加给我的赫赫罪名，就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同他这种有身份的狱吏交锋我是第一次，结果我判断出，监狱管理者的脑袋是多么空虚，他们无法面对现实，而必在事实面前溃不成军！

真想不到今天晚上我有这么一个表达我的观念，和基本政见的机会。

他摆了摆手说道：「允许你把你的想法写出来，但不准你在犯人中散布。」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了一迭纸交到了我的手中。

我接过纸，从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发现什么，不过，管他的呢！我都活到这种份上了，写就写吧！只要写真实的东西，我怕什么？

利用每天下午他给我的特许时间，我就在那间阴暗的监舍里。写完了我入狱后第一批论述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的文章，虽然十分的幼稚和肤浅。我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写出我的冤枉和无辜，在当时夏种大忙季节中，允许我每天花半天时间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对我又是第一次。

从此以后，我成为场部最受「观关注」的人。在这段时间里，邓扬光还指定两个干事，每天给我送来了人民日报！第一次送来人民日报正版上的大幅标题：「评苏共中央给各级党委及全体党员的一份公开信」及其连续报导。一场中共内部的大分裂已经出现，一场国际共运的大分裂正在公开化！。

一个月以后，邓扬光搜去了我所写的全部东西，包括那些写废了的「草稿纸」。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在圆形石门进来第一幢平房和我们的这一幢监房之间，大约一点五公尺的空隙地，筑起了一道连接的泥墙。泥墙上开了一个洞，谁也不知道它是作什么用场的。直到它的正面安上了一道仅只有半公尺宽的木门后，人们议论是不是作堆放杂物的库房？

新的木门安上的二天下午，管教科的陈文仲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根据场部决定，我的问题要进行隔离反省，并且立即叫我把我的铺盖搬进那间刚刚做成的小屋去。我意识到，这是把我押进了监狱中的监狱，进行禁闭反省。

回到我住的监舍中，老潘和大炳们早已出工，唯一留下的是老傅。我默默的整好我的行李，当时并没有感到问题有多么严重！因为我毕竟才二十五岁！既缺乏对中共监狱特工组织的了解，更缺乏对中共上层变化的了解。

不可低估这些下级监狱看守的愚昧，低估他们对他们最高权力者的盲从！因而低估了他们对自己的贫穷饥饿，落后的「忍耐」和麻木无知，在这种基本已失去是非判断能力的人面前，任何对他们的启发都只能唤起他们残酷镇压的欲望，招来徕了自己的「杀身之祸」，狱中斗争是错综复杂的。

预想和估计毕竟是一种猜测。同时还不懂中共对待异己份子的狠毒！老傅只是与我默默握了一下手，我便在这位陈管教脚跟脚下，搬进了这狭长的「小监」。

小监大约五平方公尺，除一张地铺和那窗洞的下面放了一只木桶，木门一关，徒然四壁。唯有那窗孔可以进一点空气和阳光外，几乎等于关在一个铁桶中，我确实低估了中共一贯称作「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不仅要在思想上「党同伐异」，而且必须在肉体上消灭敢于抗衡的异己。看来，对我的「禁闭」凶多吉少。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哪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必须在心理上作好「面壁」十八年炼狱的准备，这一关比在激愤时凭一时冲动所付出的牺牲更难，要熬这一关得凭常人所没有的坚定意志和韧性。

#### (四) 哭

晚上，从田野吹过来的风越过围墙，再经过监舍道道泥墙的阻拦，从那小小黑洞中挤进一点空气，稀释着我这小监里的臭气。打在瓦背上滴答作响的雨点声催发我的孤寂和凄凉，白日里邓扬光那冰冷的眼色和无情的讹

诈，留在我心头的阴影开始蔓延，在这小屋子里变得更浓更沉。

黑夜将我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我感到我的瘦弱不堪的身体是那么渺小，我拼拚命地想站立起来，却像被千斤重荷压着无法直立。

我在朦胧中，看到了西西卡门前那颗古老黄桷树，不知什么时候立在院坝里，在夜雨中瑟瑟有声。

于是郁积在我心中的那口闷气，变成一声长长的呻吟，「哇」的一声，吐到了这夜幕之中，划破了蒙蒙夜雨，「哇」，黑暗的夜空回应着我，同我的呼声汇成了一泻千里，无法收拢的嚎啕。「曾覲歎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茝以掩涕兮，露余襟之浪浪」。（离骚）

这是哭声，是一个孩子，一个还没有从母校乳头上断奶孩子的哭声，他在向世人诉说一群暴徒，无缘无故把他从课堂里拉出来，剥夺了学业，毁灭他的理想，断送他的前途和一生！在茫茫政治陷阱中强迫他挨饿、受冻，在鞭子下强迫完成超过体力的奴役！

今夜，他在哭！

这是一个中华子民在昏乱的世道中，眼见无道暴君任意用饥寒交迫来横加他的同胞而发出的控诉；这是一个独醒的战士，为他的同胞们被愚弄而相互残杀发出的怒吼！他对他的同胞们吼道：「你们就这么心安理得在饥寒中盲目的互斗，相互厮杀，果真一点都听不到这个世界前进脚步声了？」

一夜的哭声，一夜的清醒。这是继看守所那一夜痛哭以来又一夜悲哭，从这一夜以后，我的精神又一次的从我被囚困的肉体上挣脱出来，一步一步地在深沈的夜中走！走！

哭声穿出那小小黑洞，跟着绵绵细雨一次次撞击着监狱的铁壁，哭声扶着深夜的寒风，一阵阵拉开笼罩在监狱上空的蒙蒙雾幕，在那里久久回荡，仿佛在呼唤黎明。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当年的悲哀，我在此刻体会得非常深。

如果我的哭声能催醒沉睡的人们，我愿长哭不已。

然而，夜深人静，院子里却是静悄悄的，从壁上那个小洞望去，在昏暗的天空中，房顶之上那卷着翘角的瓦楞，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在茫茫夜色中傲立天空中的礁石，我听见夜间迷路的小鸟掠着从瓦楞飞过，撞在它的上面，被击碎倒地。不由得想到我自己，也似在这恐怖的夜空里独飞的孤鸟？

远处传来布谷鸟凄惋的叫声应和着我的哭声，我明白失去了自由，牢房中的人远远比不上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鸟。

## （五）第一次绝食

第二天清早，当太阳光束迟疑地从壁上的小孔中，射到我睡的草窝里。院子里一阵杂沓的脚步声，集合开饭，出工的响声——响过。一会儿，送饭的炊事员端着面上盖着一瓢水煮白菜的罐罐饭，放进那壁上的小孔中便走了。

这年月监狱中的「囚禁者」把罐罐饭当作命根，为了多争一口，可以冒着夺命的危险，换得绳捆索绑，许多人虎口越狱亡命天涯，只求饱食而已。记得在看守所为了这小小罐罐饭，我就赋过许多的打油诗，其中一首不妨录在这里：

「方围之中讲罐罐，饥肠辘辘腹中喊。忽闻铁窗响声起，伸颈挺背踮脚看。黑黑一片箩中藏，罐罐不满渣浮面。一呼牢头递过来，双手捧罐怀中看。细数胡豆一百粒，再拈干菜三两片。狼吞虎咽罐见底，不知味苦还是甜。瓢括指抠舌尖舐，俄顷罐空饥未填。双眼回望牢门处，唯见铁窗不见天。」

然而哭了一夜，此时我的胃里难受至极，什么也不想吃。一直到中午，张世雄送中饭来时，才看到早上送来的罐罐原封原样的放在那窗洞上，没有动过，于是他立在那里，将眼光伸进窗口，悄声向我问道，「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叫卫生员来看看，吃点药？」



声音里充满担心和同情，在这种饥饿的情况下，一个人不吃饭一定是生了大病，好端端的健康人只有嫌一罐填不饱肚子的，岂有做这种挨饿的蠢事？我无力向他解释，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回答。

「那么你总得把饭吃了，这年月还要劳动，全靠这点吊命粮，不吃饭，怎么活？」他在窗口上向我喃喃规劝道。

院坝里两个人的声音冲冲着我，喊道：「嗨！把饭拿进去，这可是你的血呀，做什么都可以，千万不可以拿不吃饭来给自己过不去。」他们劝我催我。但是好一会儿，看我仍没有丝毫的反应，只好叹口气，无奈的走开了。窗口上并排地塞着两个罐罐，几乎塞得黑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

下午邓扬光在洞口上出现了，当他在窗口上看到并列的两罐饭摆在那里，迟疑了一下，然后用他那狐狸般的眼光，从罐罐的夹缝中向屋里搜索。

当他的视线捉住我以后，冷冷的向我问道：「昨晚上你闹什么」？他的话极其渺视，这是他一贯用的心理征服法。我仍然闭着眼睛，一点都不想理他，讨了一个没趣后，他悄悄离开了。

两个罐子就这么并立在窗口上，直到晚上炊事员送来了晚饭，看到那窗台上早上和中午的饭菜纹丝不动原处摆着，而我却仍躺在草堆里面壁而卧。他喊了几声，我没有应，于是他立刻抽转身向队部走去。

不一会儿邓扬光来了，打开了我监门上的锁。里面昏暗，浊气扑鼻。他捂着鼻子，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傍晚的风吹着我，使我清醒了许多，我在想应对的方法！

「怎么不吃饭」？他见我后劈头问道，我仍然一语不答，甚至连头也没抬一下。

「是想向政府抗议」？他提高了语音，自问自答，分明在向我挑战。

我仍然没有回答他，我认为，此刻这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态度，能同这种特工说什么呢？说些能触及对方灵魂的话，他必定无动于衷；说些应付他的话，我感到纯属无聊，何况我一夜未眠，又一天没有吃喝，已够疲倦了，倒不如养养神，省得空费口舌，我需要睡觉。

「孔令平，我奉劝你一句，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政府是绝不会被你吓倒的」！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态度冷静。

接着又叨叨的说道：「我对你的教育已经很到位了，你入监以后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过了界限，够得上死罪的，但是我们仍然从挽救出发，不惜精力和代价，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今天又让你独自反省，可是你现在耍出绝食这样的新花招，表达坚持反动的立场，朝死路走，我们也没有办法，教育不是万能的灵药。不过你要想好，这种机会恐怕不会太多。」

他这番话，这几天我的耳朵里都听起了茧！除了这些话外，他几乎再也说不出什么。

随着他的话一完，办公室里又陷入了一片沉静。但是，我忽然若有所思！我这个无意识不吃饭的行动，似乎触伤了这刽子手的神经？少年时代上历史课，曾知道狱中被囚禁者，常常以绝食来表达他们的抗议。例如印度的甘地就是用这种方式，抗议英国殖民主义立场的。

「绝食」是否藐视当局，表达被囚禁者以「死」抗争的决心？我当时并不知道，因为这不是民主社会，政治犯的权力在这里是没有保障的，绝食斗争未必会对草芥菅人命的中共起威慑作用。

但是，此刻我除了痛哭，我还真没想出别的更有份量的形式。既然，对方已经在事实上把我的行为看成是一种「绝食」，仅仅才一天不吃饭，便引起这位邓扬光的关注。那么至少说明，他们对我的不吃饭，至少产生不知怎么处置的效果。好吧！就这么绝食下去，我想！

但是，回过头细细一想，这绝食斗争该怎么进行？有没有方式。比方说，要不要预先向对方发表声明什么的，以表示绝食的原因以及对当局的要求？还有，绝食的期限该定为几天？如果所提的要求全都没有达到，那么可不可以中止绝食转为抗议？同时配合绝食还有没有其它的行动。例如，书面写出申明，或者在身前挂一个牌子写明本次绝食所要达到的目的，绝食是不是只含政府发给的囚粮，可不可以喝水？

这些我都没有弄清楚，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按惯例行事，遭到这个恶棍的奚落？让一场本来严肃的斗争蒙羞。

但是此刻绝食已发生了，来不及弄清它们！暂且，保持沉默吧！沉默既可以观察邓扬光的处理，也是表示对他的藐视。

邓扬光见我一句话都不说，自觉没趣，只好让我回到那小黑笼去。

天色已晚，壁上的小洞还被罐罐饭堵着，我已经看不见那房顶上翘起的瓦楞，只听见布谷鸟凄惋的叫声。不过，我已没有再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现在我最紧要的是清理思路，对待已经开始的绝食斗争！我该向邓扬光提出那些条件？又该用什么方法来告诉对方，也告诉这监狱中同监的难友？暂时我还没有想出来，整整两天一夜没有睡觉，我困极了，不知不觉的阖上眼皮。

这一夜，怪梦连番，我彷彿去了地狱。在地狱的一角上面写着：「饿死鬼大殿」，里面看到我在甘洛医院那些形同骷髅的同难！看到了杨治邦，看到了南桐界牌吃毒李子死去的赵大爷，还看到了那南桐山岗上，抬着饿殍埋在山沟里的父老乡亲们，看到西西卡中队被抬到医院里已经穿破腹水的流放者，和埋在西西卡山沟里我不认识的饿殍……

第二天一大早，邓扬光便来到了我的「黑笼」前，当张世雄送饭来的时候，我看见他吩咐张世雄，将昨天的饭菜全部收回到厨房去，窗台上只剩下当天当顿的罐罐饭。看来昨天晚上这个特工思索了一夜，今天他有备而来了。

看见张世雄把昨天的饭菜统统搜去倒进猪槽里喂猪，我不禁有些后悔。为什么不可以用来送给其它的流放者？他们可是同我一样，此时在水田里捞着香附子的草根在充饥啊！

想到这里，我立即爬到洞口上，朝一个正扛着锄头向大门走去的小伙子招手！「嗨，请你过来！」我乏力的喊道，他立刻走了过来，以为我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事。

走进窗口我向他说道：「快把这个罐罐饭端去吃了！」他显然对我的这个要求感到吃惊，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里。「快点拿走，再过一会儿你吃不成了」我催促着他。

他终于明白过来，向厨房和队部办公室慌张的看了一眼，便像小偷一样，把那罐罐饭，藏在衣服中朝监舍走去了。

当中午张世雄再来送饭时，才发现窗台上是空的。「你吃了吗？好些了吗？」他一边望着我的囚笼，我明白他是在搜寻早上的那只空罐罐，我没有回答他，我只能这样。他继续向我说「把早上的那个空罐子腾给我吧！」我仍没有回答他，我不但没有力气多说话，也不能告诉他任何他想弄清的问题。

张世雄长出了心眼，便去报告邓扬光了！不一会，房门打开了，张世雄走了进来，在我睡觉的草堆里翻遍了，直到证明，那罐子并没有藏在我这里。

邓扬光向张世雄命令道：「从现在开始，你给他送饭一定要注意，不准任何人接近这个小监的窗口，送去的饭如果一小时他没吃，就给我端到厨房里去。」看来他的上司决定向我针锋相对，决绝不妥协。

中午时分，大家吃过午饭，见邓扬光守着我的黑笼子，房门大开着，便围了一大堆人，他们带着关切和好奇，七嘴八舌的议论着，邓扬光回过头去驱散围观者。吼道：「有什么看头，所有的人统统都回到各自监舍去，再过一会就要出工了」！队部办公室，所有的队长和干事都集中在这里，没有人对发生的事发表任何意见，也许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事。

第二天下午，我已被饥饿折磨得非常难受，觉得好像有无数只小手从胃里伸出来，伸到了我的口中，向我催促着食物。这种感觉其实已好多年了，就像在甘洛见到山坡上任何野菜，都可以捞一把向嘴里塞进去，以填补那十分虚空的胃。而现在是一种说不清的毅力固执地在支撑着我，我只好数着脉搏跳动的次数来挨过这难熬的时光。

眼睛一闭，突然浮现出甘洛西西卡的黄桷树；在雷雨交加的夜晚，我匍匐在泥水中拖着一条裤子去田里搬玉米的情景；张棒棒发狠的毒打，绳捆索绑将我扔在溪边，任由一群毒蚊围着我嗡嗡地叮咬！

我想如果这张棒棒还在的话，看到我今天的样子，定会狠狠的骂道：「你死去！死吧！你这种人死一个好一个，死完了老子还可以回家去了，不再守这穷山沟！」

想到这里，我有些后悔了，这监狱的当局哪一个都是不把我们当人的豺狼？我若真因为绝食而死了，也是活该！

「死一个少一个，死两个少一双！」那张棒棒的话又响在我的耳际！若那真的成了事实，还有谁替我申冤，也不会有人替我惋惜。

到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的社会支持，就是同我朝夕相处的这些「同难」们，也未必知道我所付出的斗争有什么意义，更何况这场临时决定的绝食斗争！难道注注定我甘忍几天的饥饿，就毫无结果的收场么？

由于事前缺乏必要的思考和准备，几乎带着一股难以平抑的冤气！我开始想如果邓扬光一直向我施加强硬的压力，那么我该是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到此为止？倘若继续绝食下去，那么何时中止？如果就此而中止绝食，那么我达到了什么结果呢？既然我自己都回答不上几天绝食换来了什么？就未免虎头蛇尾，给人笑柄，实在犯不着此举。

好在我一直处在无言的对抗之中，几天以来我的头脑有些昏了，我的记忆已经模糊，我在努力回忆「绝食」开始的那一天，是因为什么事而引发的？但我有些想不起来了。

就为了邓扬光的提审和对小监的抗议么？噢，对了我想起来了，是因倪干事在水田中无缘无故打我而引发的。

后来就是邓扬光宣布法院对我申诉的驳回，难道为了得当局一个清楚的答案，我就被「逼到」了这一步么？好在我这一次的行动没同任何人商量，就凭咬着牙关表示抗议而已，所以，我可以随时停止下来！

每一次张世雄将送来的罐罐饭拿走的时候，他都表现出一种内心的歉疚，低声对我说：「如果你想要吃东西，就喊我一声，随叫随到。」

但是，三天来我不愿意也没有惊动过他，三天以后，最令我难忍的是渴，听人说人不吃饭可以活好多天，但没有水，生命会随时中止，我现在必须与渴斗。

第四天早上，小监的木门打开了，邓扬光走了进来，命令我把尿端出去倒掉。我奇怪他是在故意地奚落我，已整整四天水米未黏，他不会不知道尿屎从何而来？但我没有理他，算是一种藐视。

几分钟以后，他捏着鼻子叫我跟着他到他的办公室去。我想，当时我的身上一定很臭。从地上站立起来感到非常吃力，站起身来的一刹那，眼前全是金星，勉强地直起身来稳了稳脚跟，一路上打着偏偏。他反复看了我好几眼，便把张世雄叫来，扶着我走到距我「笼子」只有五十公尺远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见我进来，毫无表情的摊开了他的笔记本！两个人就这样对我开始了「审讯」，他一边记录一边不时向我投来一瞥！我想，当时我的样子一定与死人没有多大的区别。

突然我的耳鼓里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响了起来，眼前开始发黑，心中一阵恶心，便索性闭上了眼睛。我听见，邓扬光在传唤卫生员的喊声……不知过了多久，我又重新回到黑笼子中。

中午，张世雄给我端来的不是普通的罐罐饭，而是熬得很清的粥，我闻着那粥的清香。现在就从这里开始，从此以后生活便属于我的了。我端着那盛粥的盅子，想到文天祥，当年于元军囚笼中曾以「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相自励，现在我们应从他的遗着中体会他当时的浩然正气。

送饭来的张世雄一直守在我的身边，他告诉我说，「这几天晚上，犯人的学习变成了讨论我的专题会」，只这么一句，我的心就感到了一种欣慰。

流放者出自本身水平，自会有他们的看法，在这种严刑酷法压力下，他们不敢公开表示对我的同情，甚至还会有各种非议。但我的行动毕竟像一石惊浪，打破了这种囚徒生活死一般的寂静，人们好奇也罢，非议也好，同

情也罢，都是对我绝食的一种回应，而一改过去无动于衷的麻木。

恢复进食第二天，我的脸部开始出现水肿，身上才感觉到奇痒，脱下衣来拿到窗洞里一看，线缝里长着许多的虱子。我看了看那满地铺着的稻草，那小动物也许是那里面孵化出来的。

在这种非人环境中，那邓扬光平时往往口头大喊大叫讲卫生，其实是担心他们自己的卫生太糟，让他惹病上身。晚上，张世雄送晚饭时叫我将已快一个月从没洗过，生满虱子的破烂衣物全部换下，拿去用「开水」消毒。

这一夜，我重新细细的思考和总结了自己迄今才二十五岁的人生。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早已下过的结论，意思是把知识分子的生存基础比着皮，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附在某个阶级皮上自生自灭的毛！。「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依附其上的知识分子也就要跟着消灭。

然而早被自己的「出身罪」罩住了的我，却完全不理解毛泽东这话的「革命精神」，就比不得那嗅觉十分灵敏的曹英了。当时总觉得他几乎像疯狗一样的乱咬我们这些娃娃，是一般有良知的人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的。

一无政治兴趣的我，招惹谁了呢？我们就仅仅因为出身的这张「皮」已不存在了，而必须在一场阳谋中连根铲除？我们的致命点是，不能像当时曹英那样，做一条疯狗。

入狱后，几年的炼狱已使我渐渐领悟到了这点，心中常感到无缘的恐怖。因为封建社会那种诛杀九族，正被中共公开宣称：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效仿。

不过现实却没有像他打的如意算盘那样，「赢得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的拥护」，毛泽东的骄狂独裁，竟遭到他的国际盟友苏联的反对，也遭到了同他打天下的「亲密战友」的反对，更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反对。

使他不得不把架在我们脖子上的屠刀挪开，去对付他新的政敌。但是，「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理论延用到今后，那些他将来需要急于繁殖的毛又该依附到那张皮上？

我因为才换了衣服，身上也没有那样痒，经过一夜休息，情绪开始平稳。

## （六）我吃饱了

掐指算来，我已在这「禁闭笼」中关了十天了。估计这些天，古柏周围的水田已经栽完了稻秧，这几天大批已进入拔秧了。我从排队领取罐罐饭的行列中，看到了身材高大的辛志华，此刻，他正端着刚刚拿到手的罐罐，站在饭桶边，请尤二皮给自己换一罐，却遭到了那尤二皮的拒绝，两个人争执起来。

这尤二皮，是从自贡监狱调来的，听说捕前就是一名跑二排的，因强奸案入狱，此人一双眼睛是飘的，但却像老鹰一样尖，尤其是记忆力特好。也许是二排这一行的专业技能，我们同批从二道沟地区调来的三十人中，仅一周时间，他便能逐一道出我们的姓名。

所以这家伙比甘洛的代昌达还厉害，他掌的那瓢向来长着眼睛，大组长自然就要多「照顾」一点，平时敢于在他的面前争多论少的人，便特别克扣他，为此，打饭时的冲突从没间断过。

每次冲突照例是最凶恶的倪管教出来收场，那人河南口音，平时板着脸从不露出一丝笑容，像是传说中阎王府的判官。讲起话来不紧不慢，使你觉得催命鬼向你发出威逼。听人说，此人曾活活打死两名「逃犯」面不改色。

若尤二皮请出倪判官，「闹」事人便凶多吉少了。我有时怀疑他的心，是否像「冷酷的心」中的主人公被魔鬼偷换了，使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人味。

不消说，对于身材高大的辛志华，罐罐里装的这么小半罐饭，绝对比旁的人更感欠缺，他常常对人说，半罐饭连填牙缝都不够。在黄联关的时候，就将改铁钵赚来的罐罐饭同其它人他打过赌，说他能一口气吞下十个罐罐，结果同他打赌的人是输了。他放怀吞下十罐饭以后，抹了抹嘴巴说了声：「这才差不多。」

我因此对他忍耐饥饿的能力感到惊叹，也不知道如此大食量，是怎样从甘洛的鬼门关里熬过来的？我同他同批调到这儿后，常常看到他独自在马棚里捡洒在地上的饲料，直到天黑。有一次我打趣的问他，怎么练得「夜光眼」的特异功能？

他便把他摸黑在马槽里拣到的东西，倒在亮处给我看，那是些混杂着草料马粪和泥土的四季豆，端着盆子打来了水将它们沉淀、洗净，滩在破衣服上晾在囚室窗子下。仗着盐源的风大，到了第二天早晨，豆子已经差不多干了！他便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再赶着出工。

这种马嘴夺食的方法，很快传授给了同监舍的其它流放者。不过，当时还没发明用夫炭来弄熟这些野食时，只能生吃这些豆子，一股说不出的闷味和马粪的臭味，对于正常人是断然吃不下去的。

眼下又是「农忙」季节，混着马粪泥土的垃圾越来越少，改铁钵的活也没有人问津了，只剩下水田里的香附子草，辛志华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

正当那尤二皮同辛志华，因换罐罐饭而发生争执相持不下的时候，脸色铁青的倪干事拄着一根青杠棒走了过来。

「什么事？」他向尤二皮发问，脸色十分阴沉，话语阴阳怪气，双手将青杠棍背在背后。

「报告倪干事，」尤二皮低声下气喊道：「罐罐的定量每一罐都是一样的，他这个人非要把领到的一罐同我换。」「既然是同样的，我换一罐有什么关系，你不换给我说明你心虚，罐罐有假。」辛大汉不甘示弱，将就尤二皮的话反问道，说着将端着的那半罐饭朝着倪干事的眼前凑了过去，让他来作个公断。

不料，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倪干事挥起了他手中的青杠棍，重重地打在辛志华端罐罐的手腕上。只见那罐罐应声坠地，半罐饭从罐子里滚落在地上。

辛志华正要作出反应，那倪铁脸的青杠棒已像一杆枪一样，直端端的指着他的头，迫使辛志华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在场的人纷纷围了上来。

「集合，辛志华这个组全体集合！」倪铁脸大声命令道：「其它各组都各回各的监房，停止开饭」。三分钟以后，坝子里八个赤着脚，满身泥浆的人，排成一队站在坝子里，端着各自的罐罐饭，有的已经吃完，有的刚刚开始。

「没有吃完的，把罐罐放在一边，全体立正！」倪铁脸下着整队的口令，八双泥脚在他威逼的口令中，按照要求站成了一列。其它的人也都纷纷的退到监房的廊下，站在老远的地方看着他们。

辛志华排在队列的最左边，他的个子最高，最令人打眼！倪铁脸看了一下他的口令执行效果后，慢步的走到辛大汉的身边，用他那老鹰般的眼光逼视着对方。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是打人和捆人的前奏，辛志华感到一股直逼他背心的杀气，做着挨打的准备。

倪铁脸发问道：「你为什么要扭着炊事员换罐罐饭？」

「因为那只有半罐饭，我这么大的个子，那一点粮食我吃不饱」，辛志华直率而倔强地回答。

经三元宫的人，对狱方有一种反劲，当然，这种情绪原本是当局逼出来的。

「我看你不是吃不饱而是吃不了。」倪铁脸斩钉截铁的口气里，有一股令对方难以防备的阴险！说完，转身向站在旁边的尤二皮吩咐道：「从下一顿开始，辛志华定量每顿减一半，知道吗？」辛志华眼里闪烁着怒火和无奈，所有在场的其它的人，都用麻木的眼光盯着这个打人从不眨眼的家伙。

在这里，他的话就是王法。尤二皮耸耸肩，脸上露出得胜者的微笑，彷彿倪管教代替他说出了他本人没有说出来的话：「怎么样？辛志华，想用脚趾拗过大腿呀，看你辛志华今后还敢不敢同我傲？」

顺着八人队列的顺序，倪管教的青杠棒从辛志华的身上，移到紧靠着辛志华站着的第二个人身上：「你呢！你说你每顿饭吃饱了吗？」倪铁脸像鹰一样的眼睛逼视着对方。被逼问的人看到辛志华因为在倪铁脸面前，用真话「顶撞」了这刽子手，便扣去了一半囚粮。又看了一眼那地上的半罐饭，何必自讨苦吃呢？

他的面部表情显得十分矛盾，既不愿屈服于这倪铁脸的淫威，又不愿效仿前者那样白吃眼前亏，停顿片刻，便无奈的干笑了一下，微微的点了点头。

然而，这勉强的点头，显然没有满足倪铁脸想达到的效果，便大声地冲他喝道：「说，大声的回答，你吃饱了没有？」

被这突如其来的喝声震住。那人一惊，脱口而出：「吃饱了！」声音里充满了被强迫和苦涩！倪铁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才将青杠棍指向了第三个、第四个……依次到第八个。他得意的从嘴角边露出一丝狞笑。

「吃饱了！吃饱了！」二百多流放者在各自的监房里注视着这一幕公开，逼人撒谎的丑剧。那撒谎的声音飘逸在天空，在满院子里荡漾，连那耸立在房顶上的卷曲的瓦楞也惊奇得格格作响！

其实平心想来，这种公开的撒谎哪里是倪铁脸的发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被中共的刺刀逼迫下，那广播、报纸等等媒体上每时每刻都在这么做，这位倪铁脸不过活用了这种方法，用来对付在枪杆子下面的流放者们。

原来，强权政治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颠倒黑白，篡改真相的。

倪铁脸得意的笑了，那铁青一块的脸上本来从不见笑容，现在笑起来真令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就像阴司里吃人的鬼。在演完这一幕戏以后，便转过身来对那无可奈何的辛自华辛辣地挖苦道：「怎么样，听清楚了吗？你们全组的人都说吃饱了，唯独只有你一个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在这个劳改队中明目张胆的闹『粮』，攻击我们的粮食政策和劳改政策。你说，该不该认罚？」

说罢，他哈哈大笑，用得胜者的姿势放浪着，扬长而去。

辛志华真是没想到，今天竟为换一个罐罐饭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他弯下了腰从地上拣起那掉在地上，已沾满了泥沙的半罐饭，用手细细抹掉那沾在饭面上的泥沙，朝着那姓倪的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

刚刚才从绝食中恢复过来目击整个过程的我，深深为刚才这一幕所触动。心中不断自问道：「这位今日得逞的倪铁脸真的胜了这小犯人么？今天他可以任意欺侮被他管辖之下的辛志华。明天，他未必不会被其它人，例如他的上司或者他的同事，用颠倒黑白的手段还治其身？」

推而广之，暴君可以仰仗他的权力整治他的百姓，和不听命的大臣。但是，百姓们可以屈服于一时，就像那屈服于倪铁脸的八个「犯人」一样。但改朝换代时，暴虐者心里便明白这就是长期恶行的结果啊？

然而报复暴行是要等待时机的，最难熬过的便是「等待」了，等待是极为漫长的过程，没有足够的韧性和毅力，很难超度这漫漫等待的时间长河，不然，为什么说：「黑暗的长夜漫漫难熬呢？」

倪铁脸对辛自华的处理决定，就从当晚开始由尤二皮不折不扣执行了，这本是那尤二皮深得队部宠幸的原因。当天晚上，当辛志华的大铁钵伸到尤二皮的大铁瓢下面，他只接到一瓢稀饭。辛自华狠狠瞪着这个「仇人」，咬牙切齿的他，当场真想连钵带粥向这个尤二皮的头猛劈下去！可是他终于没行动。

那尤二皮也早有提防，那根用来抬稀饭桶碗口粗的杠子，紧紧地靠在他的左脚边，准备等辛志华一出手，便立即捞起这个家伙将他就地的打趴在那里。我注意那辛志华一直站在饭桶边，强吞着这口恶气，好半天才缓缓地走开了。

又过了两天，晚饭以后。在监房的那一侧，传来了一阵阵乱哄的人声。听去，好像有人在那里发生了抓扯或打架。按规定，晚饭以后的两个小时是「政治学习」时间。但是，长期以来，大家对政治学习，当成是听当局的假话而感到厌恶。所以，只要没有干事在场主持，流放者一般的都把这段时间用来闭目养神，或调侃、摆龙门阵之用，一般说是顶安静的。

但是，此刻却传来了一种响动，好像是发生什么事了，我下意识地把手伸向洞口，侧耳倾听。心中想，不会今天又是谁犯了什么禁律而被挨斗了。

果然，不一会那倪铁脸在大田三组的门口，破着嗓子大喊着。大田组的组长正从监舍里端出了一个冒着一股股浓浓烟的破洗脸盆，里面盛着一盆刚刚被泼熄的夫炭，按倪铁脸的指挥，那被端出的夫炭盆放到了院坝中间，

正对我小监的窗洞前面。接着看到辛志华端着一个大口盅从屋里走出来，径直走到那冒着浓烟的破洗脸盆地方，放在夫炭盆一堆。

看那盅子沉甸甸的样子，我猜那是满满一盅的马槽里捡来的「豆子」。

跟在辛志华后面的，是大田三组另一个组员，拖着一床冒烟的破棉絮，走到了院坝的一边扔在地上，用脚猛踩着那冒烟的地方。我看到这里，心中便猜中了几分，——今天辛志华在监舍里用洗脸盆装上夫炭煮豆子吃的时候，闯了大祸。

### (七) 辛志华

辛志华站在院坝中间，已经吓得脸色苍白。倪铁脸操起了他那随身带着的青杠棍子，先在他的身上猛地抽了两下。便走进队部办公室，不一会同那邓扬光一齐从里面走了出来，并没去询问辛志华，而是向驻着卫兵的小岗楼上招了招手。三个彪形大汉提着绳子从岗楼上走了下来，一直走到辛志华的面前，三方将他围在中间，二话不说拳脚左右开弓，将他打趴在地上满口吐血，满地下滚，当即掏出绳子将他在原地捆了个「四马传蹄」。

不出十分钟，院子里便响彻了他的哀嚎声，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十二点钟。

两个犯人从后院的侧门中，提着一副足有十五公斤的大脚镣走了进来。邓扬光又从办公室里取出了一副内圈带刺的土铐子，院子里响起了一阵铁锤铆接脚镣的捶击声。一名流放者手里撑着一个火把，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给他上好了全刑具。

我的反省室的木门打开了，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两个人把他挟持着，拖着沉沉的铁镣，让他的身体挤进木门后，便将他像扔死狗一样向着漆黑一团的屋里一掼。只听见他一声叫唤，便连人带着铁镣铐重重地摔在三合土的地上。

我的肩膀被他的手铐子猛击了一下，随后便是那床带着烧焦的烟臭烂棉絮扔了进来，木门重新关上，上了锁。夜才重新归于寂静。

随着他的呻唤声。在寂黑一片的小屋里，我先摸到了他的头，只觉得黏呼呼的，那肯定是血。便站起身来，很吃力的将他扶着，靠着墙壁坐了起来。「怎么样，伤到哪里没有？」我悄声的问他。他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在呻唤。

我估计此刻他惊魂未定，不可以过多的打扰他，所以也就保持着沉默。我已完全没有睡意，他的到来，使我再次明白，关进这小屋里意味着什么？

天色渐渐朦胧，东方开始泛出鱼肚白来，借着那窗洞里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线，我吃力地再次调整了他难以动弹的身体，这小屋的总共宽度才一点五公尺，要同时睡下两个人怎么排都难于安置。

费了好半天时间，我才决定两人合成一个铺，好在这夏天，身上可以不盖被子，便将他那床已烂了一个大洞的烂棉絮铺平在我原来睡的铺位上，用我的被子两人合盖，让他至少能躺下，以减少昨夜所受的创痛。

凭着早晨微弱的光线，我看清楚了他全身的伤况，惨白的脸上和头部到处是青包，那肯定是三个士兵的「杰作」。两臂紫黑色的血印已将他的破单衣勒得粉碎，黏在那血肉模糊的伤口上。

铁铐铐着的一双手已经浮肿，脚镣铐箍的周围留着黑色的血印，双脚赤足，巨大的铁镣，箍着的脚板也是浮肿的，沾着血污和泥迹，周身全是糊满了黑褐色的泥血混合物。那总体形象，同中共所映电影里，中美合作所中累遭毒刑的死囚犯完全一样。

趁送早饭的机会，我向送饭的炊事员要了一盅冷水，再用从烂棉絮上撕下来的棉花，一点一点为他悄悄擦洗伤口，还没有轮到清洗他的手脚，那水已成了红黄色的泥血混合液。所幸早上送进来的罐罐饭他的那一罐并没有挖掉一半，这大致因为发生了那么大的事，这辛志华犯有「秋后问斩」的罪。

罐罐并没扣，邓扬光毕竟不像倪铁脸为逞一时威风，做明显违背监狱规定的事。接过他的那一罐，我使用筷子一团一团的撬给他吃，我受过绳捆的刑，知道刚刚挨过捆的人松绑以后，双手麻木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拿东西

的功能。他吃了一半便摇摇头说：「我吃不下了，余下的你帮我吃完。」

在这种饥饿遍布全国的时候，监狱里犯人扣犯人的饭菜，不仅是一种「普通」现象，特别是对受刑的伤者，为免除继续受到同监犯人的残害，不得已奉献出自己的口中之食，仍是当时大陆监狱中又一种普遍「规矩」。

我知道，这个比我高过半个头的大个子，正因为食不能果腹，才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他此刻肯定比我更需要食物补充。

我强迫地喂完了他的那一罐饭以后，还将我们两个人合在一起的一大盅白菜喂给了他一大半。一边劝导他受了伤的身体如果不再吃，恐怕就难以复原了。他默默地吃着，眼里露出了感激的光。

下午，他的情绪好像平稳了许多，便慢慢地地向我讲述了昨晚发生的那椿桩倒霉事的全部经过。那时节，大田中耕早已开始，大田组的任务主要是拔秧子。中午时分，大家收工回来以后，辛志华正引燃他的夫炭炉，将炉中的夫炭吹得火旺。同时把早上泡好的一大盅四季豆放在炉子上煮的时候。

突然汤队长撞了进来。原来，下班的时候他到田里转了一趟，发现已经中耕过的秧子极为马虎，他认为大家只在水田里边走边吹「龙门阵」，田里的稗子和杂草根本就没有动。这位负责大田组的汤队长也是受人追问！便利用中午时间，专门来到监舍，召开一个「责任追查会」。

汤队长的突然出现，使毫无防备的辛志华吃惊不小。慌忙之中，将自己的被子扯过来，遮在正在沸腾的「锅」上，瞒过了汤队长。大家一边开会，那被盖下面的四季豆，却一直在被子下面咕噜咕噜的煮，一直到上班时，大家走完以后，汤队长才最后的离开了监舍。临走时，似乎嗅到了什么气味，回过头去望了一望，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辛志华估计，火已被被子捂熄，便跟着大家下田去了。

殊不知，等到下午大家收工回来，满屋子的浓烟滚滚，那床被子已经烧穿，火苗正往上窜，大家才七手八脚将火扑熄。

「真是冤家路窄，事情遇得这么巧！」辛志华讲完后，重重的叹息道，他自己心中明白，在中共的监狱中纵火烧监的罪名一旦成立，他的命就难保了！更何况这一次偏偏又犯在这倪管教手中，尤其增加了「凶多吉少」的份量。

#### 第四节：\*\*在农场小监里\*\*

可惜，我们俩只有一天两夜同宿在这个小监内的缘份。第二天清晨，小监的木门打开后我被喊了出去，童干事叫我立即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调往他处。

我会调往何处？立刻回想到五年前，跟着鲁钊从丛林去到南桐看守所。那一次「单独调动」将我从保留学籍的右派学生，升格到十八年徒刑的「反革命囚犯」。么这一次呢？难道也「凶多吉少」，再升格的话，恐怕性命难保了。

我该不该对自己说：「现在暂时只能什么也不去多想呢？」临行时，连与我最好的潘老和大炳看都没看到，便被催促着背着破行李向石门走去。当我离开那坝子时，下意识地回过头去，朝那小监的「洞口」望去，只见到那里面伸出一双戴着手铐的手来，分明是辛志华在向我作最后的致意。

「我要被弄到哪里去？」在车子上，我一边向两边张望，一边在揣测将到的去处。行车不到两个小时，吉普车在一片红色楼房群前停了下来，楼前两个砖柱，使我记得这分明是二道沟盐源农牧场的场部所在地，当我被童干事叫下车来，我还不相信，这次把我一个人单独重新「押」回到这里来了。

算来从这里调到古柏才四个月，原先那一潭黑色死水的污塘，已为上游水库放出的水冲灌，沿着堰沟，水源源不断流过，这里已变成一弯小溪河，它的水面足有三十公尺宽，当初的几颗光秃秃的老杨树也已白头转青，那条通向初来时军垦农场的马路两边，狭长灰白的田里，现已是葱茏一片的稻田。

邓扬光夹着一个大皮包，站在那两根砖柱前面，看样子已在那里等候了一段时间了。我提着行李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向着红色的楼群走去，这红色的平房群，分列在一条条石砌成的梯路两旁。我们沿着石梯坎向上走去，走到正中间的那一排右侧，是两列被围在围墙之中最宽大的平房群。走近了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小院子，



院子围墙门口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门口的右侧贴着一张白纸，歪歪扭扭的写着：「库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十二个字。

邓扬光向那门卫说了几句话后，我便跟着他跨进小院内。小院由一圈平房围成。它的下方是驻守这儿的士兵营房，它的上方，按地形高出不过一公尺的石头台阶上才是粮食仓库。粮仓正中的两个房间都上了锁。

在我进到院子来时，左边的房间传出了一阵叮铛的脚镣声，我估计那里面肯定预先关着一个要犯。此时，一定是听见院外有响动声，走到门口处在门缝中张望着我们。

邓扬光又向卫兵嘀咕了几句，那士兵便走进营房取来一串钥匙打开了右边那一间空着的房子。我这时才恍然大悟，这里才是为我专门准备的禁闭室，而古柏的那一个临时夹起来的「小黑洞」，只是将我临时的寄押在那里。我将在这里开始我不知以什么罪名，重新被起诉的新的监狱生活。

我拎着破行李跨进了那刚刚才打开的黑屋。开始进去满眼一片漆黑，只有屋顶的亮瓦缝中透进来的一束微弱光线。亮瓦已被灰尘积垢堆满，透明度极低，听到背后邓扬光悠然传来声音：「孔令平，从现在开始，你就在这里反省，你必须好好地思过悔改。」

我的瞳孔慢慢的收缩，等到我能看清这屋子里的全貌后，那木门已经关上，并且上了锁。小屋足有十六平方公尺，比起古柏的那一间，我完全可以独自在里面活动散步。进门靠右手向里的一角里，已经用稻草铺好了一个地铺。仿佛曾经睡过人，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的遗物。

四周全是用石灰刷过的泥墙，四个屋角已牵满了蜘蛛网，见人进来它们正在那网上游动。除了正面的那一扇门外，没有任何通空气的窗户，整个屋子犹如一个泥墙围成的桶。屋中央从房顶上吊下来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整个的「桶」里便空无一物，只有那泥墙上印着几个从瓦缝中漏进来的模糊光圈。

我打开了破背包，将在黄联关一针一针缝起来的一床破棉垫子铺平，已经足足两个晚上为照顾辛自华而没有睡觉，此刻这桶里突然十分幽静，疲劳迅速地拉下了我的眼皮，忘记了中饭还没有吃，便倒在草堆中沉沉的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送饭的人喊醒，刚才进来的门已经打开，一个宽盘脸的中年人，提着一个竹篮已经站在我小屋的门里边，竹篮里放着一个洋瓷大碗和一个盘子，我从他的手里接过碗，那里面盛着大半碗的米饭。饭上面盖着油煎白菜和红烧茄子。我刚端到手上，那久违的油煎菜香味便扑入鼻中。

唉！除了过年过节，这样的饭菜已与我分别了整整五年之久了。我翻身从地铺里站起来，接过那人手里的饭菜放在地上。此时，从打开的门向外望去，天已黄昏，屋里那悬在梁上的电灯也亮了起来。

送饭人也许看出了我的不安，便说道：「这是干部食堂的伙食，今天本来是吃肉的。但是已经打完，下一次再补给你们。」说完，提着篮子往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补充道：「我姓叶，是干部食堂的炊事员。今后你们的饭由我送，你吃过的碗和盘子可以不洗，等我下一顿送饭时再收回去。」

看那装束明明是一个「犯人」。不过讲话的态度和口气十分和蔼，不像我这几年熟悉的红毛犯人，当大门重新关好上了锁以后，我便坐在「坑」边，从地上端起那盘子，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耳边响起「现在暂时什么都别去多想，先恢复身体再说」，这仍是我劝辛志华的话。

那一夜，大概是因为这可口的饭菜，加上连夜的疲劳，我睡得非常香。一夜没有起过夜，若不是送饭人再次将我从梦中叫醒，我还不知道，这已是我在二道沟小监里第二天的「禁闭」生活了。

早饭是稀饭，馒头和油炸花生米。而且，老叶送来的稀饭，光那米又白又香，用一个小桶装来，足够我饱食一顿。「也许是要杀头前给我们丢一个想头吧！」这么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因为我听说，过去满清时要砍头的犯人，临刑前还要赐给一桌酒席的。不过管不了那么多，究竟是凶是祸，苍天独断了。

我想，这么「养」下去，不出两个月定会催肥的。拉出去枪毙，长得胖一点，政府也顶体面的。要不然，他们自己都会感到寒碜：「枪毙这么一个骨瘦如柴的囚犯也怪可怜的。」权当疗养！

快到中午开饭的时候，邓扬光派人为我和隔壁房里的那位，送来了报纸和一迭白纸，并转告了邓科长的指示：「你们每天必须在这里认真的反省和学习，过了一段时期还要写出学习的心得和反省交给场部。」送报纸的人走后，门外的院子里便寂静了下来。除了站岗的士兵，间隔着在院子里的三合土坝上，来回踱步的脚步声，什么也听不见。

我躺在铺着谷草的铺上，凝视着在那墙壁上慢慢爬动的「光圈」，心里还在回想在古柏的四个月来所经历的前前后后，思考着那位阴阳怪气的「邓科长」向我提的要求，考虑我今后该怎么应付可能发生的事？

突然我的眼光落到刚才邓扬光派人送来的报纸和白纸上，想起一篇新华社发的当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囚禁杨虎成的报导，国民党当局对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关监时，也让他天天读报的。自我划右以来，尤其是入狱以来我所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狱中的政治犯向来受的是拳打脚踢，绳捆索绑，从来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翻开送来的报纸，眼下正是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公开决裂的白热化阶段，双方都为争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不惜代价，将多年老百姓不知道的真相抖露出来，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写下一些文章，表明我的观点，虽知道这些文章都会被当局搜去。

正要聚精会神的运笔，突然我发现我的脚下，一个圆滚滚的黑影，向着与隔壁相紧邻反省室的墙角落窜了过去。房子里黑糊糊的，我被惊了一下。仔细看去，却是一只老鼠，正将身体宿在墙角落里，用它豆一般的眼光盯着我。我挪了一下身，站起来向它走过去时，它便迅速的在墙角里消失了。

定睛一看，正对墙角正隐藏着一个直径大约四公分大小的老鼠洞，我好奇地走过去，趴到地上向那洞里窥望，可是什么也看不清楚。顺手从我的铺上捡起一根稻草，顺着那洞通了过去，隐约听见隔壁房子里有一阵脚镣的响声，大约十来分钟以后，那根我通进去的稻草，仍被扔了过来。稻草上还附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本人陈力，你呢？」

原来隔壁的却是当年雅安监狱抢馒头，大闹三元宫的第一号领头人，后来又在甘洛农场斯足分场大闹队部的陈力，久仰他的大名，不期在这里成了我小监的同伴。

从此以后，我们便借这个洞，传递着彼此所知道的消息，也交换着彼此所写的文章。他告诉我，自从我离开二道沟调到古柏去后，二道沟原来在一起的人都已调散，新成立了三个中队。他是两个月以前因为写文章，并大闹农三队，当局说他是修正主义的急先锋，死不悔改的反改造份子，便将他关到这里来隔离反省。看来我和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关进禁闭室来的。

他从洞里递给我的文章讽喻的笔锋十分犀利，目光深远，志向宏大。尤其是所写的杂文文体流畅而痛快，令我钦佩，他告诉我他的身世和入狱的起因，介绍他的父亲原来是巴蜀中学的老国语教员，在他父亲的教诲和熏陶下，自幼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倘若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里，他本该成为针砭社会时弊的好作家，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许多有益的事，而今天，我们都只有被关在黑牢中的命。

处在海拔两千公尺以上的盐源，一进入九月，旱季便早早来到，每天都是晴天。早晨从六点钟开始，太阳从瓦缝中射进来的光束，投在墙上一定的位置上，便留下了一些小光圈。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光圈便循着各自特定的轨迹，在墙上慢慢地爬动起来，直到晚上太阳下山，他们便从不同的互缝中悄悄溜了出去。每天往复，便成了一个准确的定时器，凭着这些光圈爬在墙上的位置，我可以准确地读出时间。

平时除了门外的卫兵在换班的时候，偶尔将门上的风洞扒开，向里面张望一下，三顿饭的炊事员打开木门成为我们唯一的「客人」。另外，三天一次，将自己的粪便倒进门外摆着一个粪桶里，可以在门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外，我们几乎同外界割断了联系。

特别是深夜，院子里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时，就使我自然的思念起亲人来……在梦境中与亲人们的相聚会。然而我无时无刻都没有忘记我在坐牢，所以在梦中相聚，也总是在牢中相聚，充满了凄惋和恐惧。出现的恶梦，多是与他们诀别，醒来总要惊出一身冷汗。

有一次我梦见我的弟弟被挂在半空中被两个人用铁丝捆绑押送着在云中疾走，身上全是伤痕，却老是看不清楚他的脸。于是我紧紧的追着他，却无法跃过脚下的深沟大壑，呼喊着他的小名，眼睁睁见他消失在云中，便猛然惊醒，醒来横身都是汗水。

想到我被送看守所时，一家老小就数我最精强力壮，本当负起保护他们的责任。怎知道连我自己都糊里糊涂地栽到这牢里来了，也不知道奶奶要哭成什么样子。所以从此以后就断了音信，少些亲人们牵肠挂肚。也不知他们今天落到哪里？他们大概也要在这茫茫的夜中四下环顾！寻找这个「失踪」了的我吧。

痛哉！痛哉！当然，现在既已被监狱中的中共下层狱吏，把我卷进了这十分险恶的漩涡中。不但是右派和反革命，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一分子，关在这黑屋子里听候发落。

打最坏的主意，不久我将从这黑屋子里，押出去绑赴处决的刑场，我也无怨无悔。只希望我的同胞知道我是坚定的为反抗暴政而牺牲的勇士。只要我能堂堂正正的死在刽子手的枪口下，总比不明不白像杨治邦那样葬身于千里荒丘之中强，处决我时，我会面对刽子手的屠刀，高喊「历史将替我昭雪！」

小监里的生活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悠然渡过，一晃我已在这黑屋子里住了二十天，马上就是十月一日了。

### （一）金干事探监

九月三十日下午三点钟我被一阵嘈杂的人声惊起，便放下手中的笔，扒在我木门上，找到一条最宽的门缝向外张望：

一个头发蓬乱，衣着不整的大个子，被人从小院的木门里推了进来，踉踉跄跄地倒在院坝的三合土上，从他涨红的脸，和偏偏倒倒的步履看，这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十分潦倒的刑满就业人员。脸上几处伤痕留着血迹，证明他刚挨过打，两个刑释人员中年人，手里提着一付重重的脚镣跟在后面。

那躺在地上的醉汉一只手在空中乱舞，一面指着那两个提着脚镣的人吼道：

「姓邓的，你要我们一家人去死，我们也不想活，四十块钱，四个人怎么活？怎么活？」那混浊的吼声十分凄凉！不知他姓甚名谁，因何事关到这里来？两个拿镣的人在卫兵督促下，开始掰开他的两脚，为他脚上上好抱箍后，便用二锤锤击铆钉。那声音一下一下，响彻在这「节日」的上空。

「姓邓的，我和你拚了，你今天不解决，老子就不回去，老子充其量一死！老子也活得不耐烦了，姓邓的，我们一家大小今天就到你家里来吃饭，老子一家饿死了，变饿死鬼还要找你。」

醉汉一个劲在吼，不过声音越来越嘶哑。「四十块钱怎么活！怎么活……」他没有间断的吼着，一直到两脚的抱箍都上好了铆钉，他仍坐在那里，眨着慢慢清醒过来的醉眼不停地吼。

两个就业人员，提着二锤准备离开，却被卫兵喝住，打开了隔壁的那房门，命令两人将他硬架着拖了进去，那沉沉的铁镣在三合土地面上，拖出了一束白色划痕，随着一声沉闷的倒地声，隔壁的门上了锁。

还没等两人走出院坝小门，就听见，一连串咒骂和哭泣声从隔壁屏发出来。并用那刚上好的脚镣，一下下撞击那木门，一直闹到天黑。

天刚擦黑，老叶篮子里送来的饭菜比往常增加了一份，今天「过节」，三个碗里都装得满满的，红烧肉的香味非常诱人。我压低了嗓门问他下午关进来的人叫什么名字？他只说了句：「高世清，场部蔬菜组的就业人员」，便不开腔了，我不便多问。

等他送完了饭，刚刚离开小院，那围墙上的木门前又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女人叫门声。

「谁？」守门岗的小子端着冲锋枪，在坝子角落的隐蔽处喊道。一个个子矮小的女人正提着个篮子，在小门门灯下站着敲门，门岗走了过去。

「你是谁，来这儿干什么？」

「怎么不认识啦，我来替高世清送点过节的饭菜。」女的回答，语气傲慢随便，好像同那小伙子很熟。

「那里的话，金干事，管教科交待代过，关在这里的人任何人都不准私自接近，场部伙食团刚刚才给他们送过饭，不用你操心啦。」卫兵已经认出来人，用缓和的语气拒绝着，然而女人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继续喊道：

「怎么？获得公民权的人，连家属都不许接近？」语气里含着明显的抗议。

「不是那个意思，实在是我不敢违背规定，我们有负责人哪。」卫兵继续地用解释的口气加以拒绝。

「这么说，我就只好在这儿等啰」，女人放下手里提的篮子，看来今天是非见不可了。两人相持在木门的里外两侧，沉默了一分钟，女人终于发话：

「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就请你向管教科通报一声，就说我给丈夫送过节饭来了。」哨兵进入旁边的小屋里打电话，五分钟以后，昏暗的石梯坎最上方出现了一束直射小门的手电筒光，一个人影快步从上面走下来，直到距离小门大约只有五公尺的石坎上，用手电筒直端端地射着守候在那里的女人。

女人毫不示弱，昂起了头，迎着这束挑衅的手电筒光大声吼道：「请你懂礼貌一点，用不着用手电筒这么射人，又不是不认识。」她早已认出来人便是邓扬光，邓扬光只好收起手电筒，把它背在身后，左手叉在腰间，极不耐烦的发问：「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来为丈夫送点吃的，明天是国庆节了，邓科长，不可以么？」女人挑衅的口气显然令这位邓科长感到难堪。

「你可以把送来的东西转给卫兵，他们会按你的吩咐去做。」邓扬光压着自己心头正在上冒的火。

「高世清是就业人员，按你们的政策是获得公民权的人，他今天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把他弄到这里来关起？就是逮捕也得出示逮捕证，得拿给我们看，你们什么手续都没有，想把人抓起来就抓起来，这样做，你自己也知道叫什么？请你放明白，我们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女人没有示弱，她那进攻性的口气，咄咄逼人，任何人都会刮目相看。

邓扬光显然被逼得恼羞成怒了，在他看来，这个女人是绝对没有权力来指责政府的，他恐怕也从未受到过这种指责，便高声的喝道：「金梅，我提醒你不要再在这里胡闹，这对你没有好处。」语气盛气凌人。然而今天这女人显然已经发横，其实她的丈夫已经说出来了，一个没法活下去的家庭，一个被逼得走上绝路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况是这位小小狱吏的威胁。于是她提高了嗓门继续回敬他：「你们做事总得按政策吧！逮捕证在那里？就是逮捕了，我们家属还有探亲权。」看来，棋逢对手针锋相对了，不见到自己的丈夫，这女人是决不会罢休的。

营房里的几十名士兵，已全部集中在门边。他们是些刚刚入伍的农民，还没见到过这种好戏。小伙子在交头接耳，对于双方的吵架，信守中立。

邓扬光此时已完全被对手激怒，命令道：「卫兵，把她弄走。」两个哨兵，迟疑地把枪交给了其它人，跨出门去拖她。

不料，她敏捷地向右边的石坎一个剑步，跃离开她摆饭盒的地方三公尺远，然后一个骑马桩桩招式站稳以后准备迎敌，口里却大声喝道：「老娘干革命穿黄马褂的时候，你们还在打横捶呢？谁敢动手？」两个年轻小伙子立即退缩下来，邓扬光见状也开始软了下来，想了想，朝那女人问道：「你要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无非是给我丈夫送口过节的酒饭，就是我们一家人穷得没饭吃要饿死，也让我们夫妻吃顿团圆饭再去死！」

女人语气里充满了悲伤，在场的士兵们一片寂静！邓扬光无可奈何跨进了小门，走到院子里，将他们一个带中尉军衔的人拉到那放电话的房间里。不一会儿，那中尉军官一个人走了出来，打开木门放那女人提着饭盒跨进了小院。

隔壁的房门打开了，女人提着饭盒走了进去。院子里的军人们也渐渐散去，只有那军官还立在隔壁的房门口。他的身后还围着几个好奇的年轻人，他们想知道这一对患难夫妇何以会落到这个地步。

隔壁传来了一股劣质酒的气味，听他俩窃窃叨叨的细语，偶尔还夹着一声啼泣，我猜出他俩正对坐而饮！对坐而哭！一直到深夜十一点已过，女人才在那中尉军官的劝说下，收拾了饭盒快快离去，听到那高世清用混浊的声音在独自低吟：「自送别，心难舍舍……凭澜袖拂扬花雪，溪又伴，山又遮，人去也……」

过了三天，高世清从隔壁放了出来，戴着那付脚镣被两名刑释人员带走。大约又过了十天，我的禁闭室，又关进来一个三十多岁姓张的就业人员。他一进来，我便询问他何以被关到这里面来？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想走。」

「上哪儿去？」

「去成都或重庆，离开这个鬼地方。」虽然我知道，在中国刑满人员的社会地位同犯人并没有多大区别。

毛泽东早在他的阶级成份论中，将一切敢于同他「作对」的势力，统统归结为地、富、反、坏、右、五大类。随着他建立的专制政权，这五大类还将继续扩大，一遇风吹草动，毛泽东心血来潮，五类份子便戴着帽子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挨打、批斗、游街，成为吓唬百姓而被杀的「鸡」。

「就业」和「服刑」其区别仅仅在前者是可以蓄发，选穿蓝色服装以外的衣服；后者光头，蓝服。前者每月廿元钱，自己花钱吃饭，后者用「集体伙食」。算下来前者去掉伙食以后剩余的部份，与后者的零花钱也差不多。

此外前者在允许条件下可以结婚、安家、探亲，后者则什么也没有。不过前者的工资如此低微拿什么去结婚安家？同时就业毫无择业自由，他们如果想自作主张，离开指定的劳动地点，便将受「逃跑」论处，抓回来与犯人「同罪」。

故而就业人员又称为「劳改释放犯」。官方简称为「劳动力」，这叫做：「把他们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中共就是靠树立这么一个被专政的对象，才镇住了数亿百姓。

这一次，姓张的小伙子正好与高世清「同案」，他们不仅在一个菜蔬队服役，这次又组成了「逃跑集团」而被关压起来。进小监以后，金梅还来看过他，并送来了一本《红与黑》。

于是他便向我讲述有关高世清的故事——他原是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一名少校军乐指挥，因什么革掉官职和军衔，由成都军事法庭判处了他三年徒刑，在那个年代是说不清的。

他的妻子金梅，原属同他一个军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高世清被判刑后送劳改队服刑。深深爱着他的金梅已有了孩子，便从部队文工团复员转业到了高世清所在劳改队，成了一名干事。那门卫的小青年称她为金干事便由此而来，按中共党纪，金梅必须与高世清离婚，但遭到金梅拒绝。

高世清刑满释放后，金梅的公职也被革去，党籍被开除，成为中共的又一「叛逆」，金梅身份也从干部变为「劳改释放犯」家属。接着又生了一个孩子，从此以后，高世清便成了四口之家的户主。现在两个孩子大的才八岁，小的才四岁。单凭着每个月仅四十元的工资，要供四张嘴吃饭其艰难可想而知。

在当年，就业人员一般是没有条件结婚安家的。

为了弥补家庭的不足，金梅包下了场部干部们的衣服，靠为人浣衣，起早贪黑艰难度日。不料，就业人员中新近增加了几个家属，也在替人洗衣服，金梅所包的衣服便一天天减少，又禁止去其它地方谋生，一家人经常为孩子而哭泣争吵。不得已，几次向场部提出困难补助均遭拒绝，理由是：「你的工资是就业人员最高的，有的干部也不过这点钱。」故而与场部屡次发生争执。

在邓扬光眼里金梅是下贱堕落的女人，是革命队伍中的异己份子。既然如此，也当自然的被当成了奴隶，划成五类之列。高世清这一家，就是连孩子在内全家人都饿死了，也是死不足惜。

面对着啼饥号寒的孩子，实在无法再忍下去的高世清和金梅只好打溜的主意，可是还没有跑成，计划便泄露了，高世清一家受到了更严密的监视，连盐源的县城都不准去。

就在这种申请补助不给，请求他去不准，一家人靠那四十元一月的「劳改钱」，生活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下，十月一日前，他足足喝了一瓶用酒精兑成的白酒，带着醉意借着酒劲，独自撞进了场部大楼，在通往场长办公室的路上，摇摇晃晃的碰上邓扬光。

邓扬光严厉地训斥他是装疯卖傻，无理取闹。此时高世清酒劲发作心烧如焚，将一腔蓄了不知有多久的怒火，向这位「邓大人」烧去，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人面兽心，骂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伙不把人当人看的豺狼，还扬言国庆期间全家断了炊，就要上他家去要饭吃，否则，就要和他拚拼命。

邓扬光见势不对，立即缩回办公大楼里叫来四名卫兵，将他痛打一顿，然后便将他押到了这里。

听到这姓张的年轻人讲完高世清一家的这段故事，回想起十月一日前一天见到的情况，我不禁想到高世清和他的妻子金梅，算跟共产党当了几天拉拉队的人，一经被一脚踢开掉进监狱中。照样成了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奴隶。

三天后，那姓张的就业人员便被叫了出去，那高世清被带走以后，也再没有回到小监来！小监里又重新留下了我和陈力两人。

「国庆」过后，我便将我写的第一篇，从墙角的耗子洞里传给了陈力。他的语文底子比我好，传给他看，一方面互通着彼此的观点，一方面也含有请对方斧正的意思，两天后他将我写的东西传还给了我，并附上了一张纸条。在我的原稿上留下了多处记号，要我自己改正错别字，并作文句上的修改。

纸条上的大意写道：「入狱多年所见所闻，使我们更加成熟。我相信独裁者最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作控诉的准备，等到天亮的时候向老百姓有一部原原本本毛泽东罪恶的记实，取名『狱中纪实』为好。」

可惜，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幸免牢狱中密如梳篦的搜查，狱中所写的东西只好撕掉。

大约十月下旬一天，吃过早饭以后，给我们送报纸和「阅读数据」、纸笔的年轻干事，手里拿着两张套红印刷的人民日报，又一次来到了小监中，他把报纸拿给我以后传达邓扬光的指示，要我们看后写出心得体会交到管教科。

那报纸上印着红色字体的巨幅标题：「原子弹爆炸在我国试验成功」。那一天报纸满篇是「全国人民热烈欢呼」，通篇的「又一曲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凯歌」。在这一天没有登载其它任何消息，中国可以饿死千万老百姓，而不能没有大规模杀人的原子弹。

我真不知道在饿殍遍野的中国，还有什么前途。

此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还只能从自留地里巴望多收些蔬菜，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中共决策层中直到现在还在唱着人民公社万岁，说不准什么时候又来一个政治运动，就连眼前这点吊命的糠菜也保不住了。

过了几天，邓扬光亲自来到小监问我，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看法和体会写好了没有？这一次我干脆拒绝了他，我告诉他，因为我无从下笔，所以没有写。心中想道，这么一篇东西，对这个头脑简单的民族主义狂，能起什么作用？我只能不写。

又过了几天，曾给我们送来报纸的那位年轻管教干事，拿了一卷纸，第四次来到小院，卫兵打开了两个小监房门，我俩被叫了出来，站在院坝里面对着他，看他满脸严肃打开那纸卷，原来是一张划着两处红勾的，西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布告：两名继续进行反革活动的「死顽分子」被处以枪决。

他笔挺地站在那里，好像在宣读圣旨，那时正逢中午，我们在风中足足站了半个小时，被风吹得全身冰凉，心中明白这是当局对我们的警告。

宣读完毕，他又发给了我们白纸，要我们写出两个月反省的小结，我最后仍决定「交白卷」。

风季已经到来，每到中午以后，呼啸的西北风掠过互背，令人心寒也心烦。尤其是监舍木门与地隔着两公分宽的缝，掠地而起的干风一股股地从那里把院里的泥沙刮了进来。

有一天趁送饭之际，我向开门的卫兵说这个难处，那卫兵倒顶和善，好像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当即找来了两件破军衣，要我用来塞在那缝中，这么做，风沙倒是钻不进来，就是屋里变得更黑了。

## 第五节：\*\*羊圈里的斗争\*\*

眼看天气一天天冷起来，早晨，老叶送饭来时，我看到了对面那排房顶上已开始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轻霜。十一月中旬一个早上，卫兵打开房门后，吩咐我们吃过早饭将各自的行李捆好，听候转到另外的地方去。

上午九点多钟，陈力戴着几公斤重的铁镣，我提着两个人的行李包一前一后地走出了那小院的木门。站在石梯上，朝下望去，小溪的流水已经消失，那情景又恢复到我们刚到来时的样子，只是小溪水面上结出了一层薄薄的冰。

出了场部大门，我们走上一条大约一公尺宽的田坎上，缓缓向着对面大约距离两百公尺远，一排在泥山脚下的平房走去。走完田坎尽头，我们才看到一条很宽的堰沟，横隔在那平房的前面。

此时那堰沟中已没有一滴水，由沙石冲积成的沟底非常坚硬，走过堰沟，是一排由四间屋子并列而成的平房，背后山的前面还有一段半截围墙，平房前面还有一个大约二十平方公尺的土坝子，坝子里洒着许多羊粪疙瘩，留着羊蹄的脚印。

屋子里虽已打扫，但能闻出一股很浓的羊膻气，看来这是一个刚刚腾出来的羊圈。

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最左面两间屋的木门，我被指定搬进靠最左边上的那一间，陈力则搬进了我右边隔壁那间。屋角的一角已铺着一层厚厚的谷草，这里比仓库那小屋更大一点，靠门这边墙上留着一扇宽大的窗户，所以显得比那里宽敞、明亮，可以依凭那窗口，向外遥望面前那片刚走过来的场部蔬菜地，比那仓库的「小监」有了一片开阔视野，只是比原先那小屋更冷。

我打开了破棉垫子和破被盖，将我那口破皮箱安置在「床前」，上面放着邓扬光送来的报纸和纸。环顾了一下四周，泥墙上照样印着从瓦缝里射进来的小圆光斑，只是它的位置与原来那黑屋子不同，我需要经过两天的识别，重新建立起计时的标准。宽大的屋子可以容我在这里转圈、跑步、活动身体。

第二天上午，门外人声喧闹，我从铺上站起来，隔着窗子向外望去，只见八名就业人员抬着一个巨大的绿色哨棚，从对面的场部沿那条我们走过来的田坎，喊着号子向我们这儿搬来。

哨棚到位后，安放在距我这间「监舍」右侧，大约五公尺远的前方的堰沟边上。从此以后，每四小时轮换一次，由驻军派出专门看守我俩的士兵，就坐在那哨棚里站岗，煞似森严。

真的，我俩何德何能，值得场部为我们专派「守护」的卫兵？怕我们身上的瘟疫扩散感染他人？还是怕人心被我们所影响？此种装腔作势，岂不抬高了我俩的身价？可惜，这儿是羊圈而不是封闭的软禁「桶子间」。不过，我们并不计较，因为从甘洛开始，与牛羊共圈本是我们受到的待遇。

我们刚迁入这「羊圈反省室」一个月以后，一天上午八点左右，我正按我自己规定的作息，趴在窗口上作深呼吸运动，忽然看到就在我们走过来的田坎上，六、七个就业人员，正扛着一些破烂的橱柜之类的家具，朝着我们这里走来。相距大约三十公尺处，我已经辨认出，来的人竟是高世清和他的一家。金梅与他一前一后抬着一张大床，后面还跌跌撞撞的跟着两个端小木凳子的孩子。

真想不到我们小监，右面空着的那两间屋子，原是给这一家子准备的。天哪，这不真有点像中共自己的小说「红岩」里所描写的小萝卜头一家么？我正在思索着，那些搬家的人已经走到门前堰沟边上，经过哨棚时，高世清拿着一张纸交给了「哨兵」。然后六个就业人员，七手八脚的把那些破家具，搬进了还空着的那两间「羊圈」里，我们还真成了「邻居」。

### （一）可怜的孩子

高世清在那一次大闹场部受到什么处罚？他的脚镣是什么时候下的，我一直都没有弄清楚，但是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这一家人全家都搬到了「禁闭室」「虎穴」中，与我们随时可能处以极刑的人搬到了一起，那肯定是被当局认定是「全家犯法」的就业人员尖子了。

十月一日前的那天下午，金梅来禁闭室探望她的丈夫时，因为天色已晚，我在门缝中并没有看清她的面容，现在终于看明白了，这是一个年龄已过四十，身材矮小的女人，满布皱纹的脸上和点点雀斑，已经刻下了她所遭

遇的不幸和多年累积的幸劳，人长得并不漂亮。

自从她们全家搬来后，我便天天看到她，每天下午都从场部那边背回一背沉甸甸洗干净了的衣服，晾在她刚刚架在门前两排晾衣绳上，等到一下午的太阳和风将这些衣服吹干以后，她才收好折好，又装进背兜，在傍晚的余辉中将那些衣服又背过田坎，送到对面场部去。

每当看着她那负重的矮小背影的那一刻，我绝不敢同国庆节那天下午，面对邓扬光那番语出惊人的金干事联系在一起，尤其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女郎。

对邓扬光来说，是为了怕他们像瘟疫般影响驯顺的农场就业奴隶们而采取的隔离措施？不过大人姑且该受「反省」，但两个幼小的孩子又招惹上了谁呢？

从那天以后，每天我都能从窗子的铁栏后，看两个穿着破烂的孩子，坐在河边的泥土堆上晒太阳。大女孩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花旧棉袄，上面打满了花花绿绿的补丁，而小男孩穿的是一件又长又大的红棉袄，也许是他的姐姐穿过的，上面的补丁几乎将那原先的底色遮盖完了。那脚上穿的却是补了又补的破布鞋，他的脚趾头还露在外面，在这冰天雪地里冻得通红。

看来那金梅为了两个孩子不受冻，也不知在灯下一针一线补孩子们的衣服和鞋，熬过多少夜。

以后每到太阳将坝子里积下的霜溶化后，我就看到小男孩跟在大女孩的后面，从屋里走出来，在他们每天选定的地方坐下来晒太阳取暖。

那女孩看上去最多不过十岁，而那男孩大约只有六岁，两个菜色的小脸上看不到一丝正常孩子应有的红润，缩着那冻得像红萝卜头的手指揣在怀中，呆呆地望着他们面前的羊圈，不时还向那岗哨，以及那转悠的哨兵投去困惑而有些害怕的眼光，真像一对没有长大的小老头和小老太婆。

每当早上，老叶提着竹篮给我们送饭，两个孩子便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竹篮，当老叶从篮子里取出盛着饭的盂子和菜碗递给我们时，那两双灰色的眼睛就会随着我们接在手里的饭菜紧盯不舍。

看着两个孩子的样子，令我感到心碎。有几次，我情不自禁地从铁窗里伸出手来招呼他们，他们却没有理会我的意思，并不理我。

直到有一次老叶送来馒头稀饭，我拿着馒头向他们伸手递过去，那小男孩便从土墩上站起来，歪歪倒倒的向我跑过来，从我的手中接过馒头，便怯生生的跑了回去，坐在他的姐姐身边。

两个孩子分食那个馒头的镜头至今还保存在我脑子里。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该是有孩子的人了，如果我身陷在高世清的境地，看到我的孩子因为父亲的穷而落到这般地步，我又怎么想呢？

## （二）寒月悲歌

盐源的十二月，白天每天都是万里晴空，但是一到中午以后，那飞沙走石的西北风，就把太阳带给这儿一上午的温暖全部卷走，一入夜晚，寒气逼人。

在皓月当空，夜明星稀的晚上，明月撒下那股沁人心脾的美景，却因荒郊野岭让人感到格外冷，我常常在这样的夜晚吟诵苏武牧羊，或正气歌，然而今天晚上，就在这明月摧人遐想之夜，羊圈的那一头，传来了一曲幽扬凄惋的手提琴声，那是高世清在拉琴。

我早就闻听那高世清在战旗文工团，担任乐队指挥之前就是该团的第一小提琴手，此时那琴弦中溢出来的分明是一曲黄水谣，不过，面对着这冰冷的月光下，那哀怨的琴声里，抒发出来的却是他流放他乡的哀怨，是对他遭遇的绵绵恨意，和他对这个囚禁他地狱的控诉。

我和陈力都从自己的草窝里爬起来，倚靠在那铁栏下，沐浴着那寒月透进来的银光，静静地用心和着他的琴声低低吟唱着：「流浪……流浪」，眼前好像又出现了我们这一群从重庆到甘洛；又从甘洛到黄联关；从黄联关到盐源，提着破烂的行囊疲惫不堪，被枪押着踉踉跄跄的人群。

心潮被琴声拨得乱乱的，想喊，想引吭高歌，可歌从何来？



中华民族在异族蹂躏下，多少同胞背井离乡，出生入死才拚出了一个抗日胜利的和平环境，没想到炮火连天的内战，搅乱了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梦，中华民族到了我们这一代，怎么就生出这媚外的国贼对内逞强的枭雄？

一百年在颠沛流离中做恶梦，而今又遭受枭雄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新灾乱，我们这一群受苦受难的人，难道不是挣扎在这荒山野岭中新一群的流浪者？甚至于比流浪者更不如的奴隶群么？

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的故乡！想着想着，我的泪水流下了腮边，这正是：「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林则徐当年禁烟被贬，作歌一曲谓：「送我凉州泱日程，自驱薄笨短辕轻。高谈痛饮同西笑，切愤沉吟似《北征》，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在昏庸的满清末朝，他自觉无力抗衡群丑，而今我辈，就简直像菜板上的肉被人任意的宰割。

有时候想到绝处，痛感生不如死，然而黄遵宪有诗云：「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篋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好一个留付松阴后辈看，我们这些被暴政流放到这里来的政治犯，无国可报，无君可忠，看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一段抵制独裁暴政的斗争，如实写下来，能「留付松阴后辈看」，就是我们平生最大的告慰了。

我正挥泪沉思，突然一声清脆明亮的女高音，划破那个被琴声撩破的悲凉夜幕，听那歌声悠扬圆润，那噪音的功力，远非三年五载可以练成。现在可是在用她的心在唱，用血在泣诉，用自己悲惨的遭遇，唤醒那些在这夜中正酣睡的人们，那歌声让我立刻想到她背衣服，不，是背一背重有千斤的生活重枷啊？

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那弱小的身躯，牵着她两个可怜的孩子，正翻过那泥泞的小河翻进了小金河，翻进了长江……

那歌声像声声啼血的夜鸟向人展示破碎不堪的巢！那歌中浸进了她心里滴出的血，使听者不得不正视她的苦难，正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无人倾诉的悲伤。

琴声和歌声，把这荒凉羊圈的夜搅得澎湃起来，岗哨里的士兵停下了他那踢踏作响的脚步声，在月光下驻足聆听，周围的荒野断垣立着耳朵，风也凝滞没有响声，好像不愿打乱这寒夜歌声带给周围的共鸣。

我听见隔壁隐隐传来了抽泣声，我也抑制不住自己，把大滴的泪珠洒落在窗檐下的泥墙上，大声朗读秋瑾的《满江红》：「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这才是我内心的回音，一直到很晚，天上开始下霜以后。

我真想这琴声和歌声穿过那面前的空坝，传到对面的监舍里，使更多的心灵为之共振。它可以融化这高墙深狱中的杀机！可惜今夜在这里的听者，除了我和陈力便只有哨兵。可是，我恰恰没有估计到，羊圈里的音乐竟传到了三百公尺外的场部去了。

没几天，邓扬光带着一名军官两名士兵，向我们这里赶来，他们在哨棚里向值班的卫兵不知吩咐什么以后，那戴着大尉军衔的军官，走到我和陈力的窗前，带着警告的语气说，隔壁住着的高世清和金梅一家人非常反动，你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而扰乱了你们的反省。

我和陈力听后哈哈大笑，使那个神气活现的军官顿时陷入了尴尬，停了一会儿仿佛才回过神来，带着怒意训道：「你们笑什么」？

我接口道：「我们又不是普通人受什么他人影响？你们已把我们俩当成了最富有传染力的病菌，而把我们与大监的犯人相隔离，还加上特别的警卫人员替我们站岗，我们招惹谁啦，值得你们如此特别的关照，而隔壁的邻居，是还保持着公民权的就业人员，说影响恐怕恰恰相反才对。」

陈力在隔壁也应和着，「我们同你们的卫兵相处得虽说一般，可从来没看到谁影响谁，平时你们纪律很严，我们可没有跟任何人讲话，隔壁关的是什么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对谁都是和平共处的。」说完他大笑起来，弄得那位大尉反而很难堪。

四个人重新回到了哨棚，也不知道商量了什么，便悻悻的离去了。老邓的来访恰恰好证明：「就业人员」在他们这些牢头们眼里，永远都没有获得「新生」的那一天。因为关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一群被压迫的奴隶

若要说影响，受得最深的，恐怕是对那些站岗的年轻士兵们。他们从农家或工人家里走到这里来，本身还很单纯，难道他们对被弄得穷困潦倒的中国一点不反感？几曲琴声几首歌不会引发他们的深思？就是那邓科长也会心惊肉跳，化解他的成见触动他的人性？现在他跑到这里来替谁发警告呢？

君不闻当年韩信，月下一曲楚箫就瓦解了项羽十万江东雄兵么？难道这动人心弦的歌声不等于告诉人们，他们平时在广播喇叭之中，所无法听到的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伤心事么？

### （三）学生兵

这一天，我正坐在草窝里，合掌闭目，凝神打坐。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功课。一来为了练练气功，舒一下一夜的浊气，二来是养成安静思考的习惯。突然听见，铁栅窗上传来一声问话：「年轻人，做什么呢？」

我微微睁开眼睛抬头望去，觉得脸挺熟的，脑子里细细寻思，猛然想起来，那不是曾在对面仓库里的反省室里，给我找来破衣服塞门隙的那一个学生兵吗？在仓库那边，墙上没有现在这样「敞开」的窗，很难找到彼此说话的机会，现在谁当班，谁都可以走到窗前来同我们攀谈。

我斜看了他一下，看他满面孩子气的脸上并无敌意，年纪大约才二十出头，怎么反而称我为「年轻人」？我没有理他，然而他却并没有生气，他的上司，或邓扬光曾向他们打过招呼，所以对我的冷淡并不感到意外，见我仍闭目禅坐，便在门口坝子里转了两圈又回到了我的窗下，开口喊道，「喂，想出来活动一下身体么？」声音里仍带着友善。

「想又怎么样？你敢放我们出来晒太阳么？」陈力在隔壁发话了，话中带刺。

「好的，你们出来吧，这屋子里怪霉气的，出来晒晒太阳，透透风有利于身体健康。」我们平时被这些卫兵们打惯了骂惯了，我们的敌意是自然形成的。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抱着良知是可以被启发的，因为我们是正义的，即便是对刽子手，原来被蒙蔽的良知是可以经过启发而改变的。更何况这些涉事很浅的年轻人，我们相信我们的影响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边说边从哨棚中取来了开门的钥匙，打开了我们的房门，一边还说：「如果你们的被子受了潮，那么趁这个机会拿到坝子里见见太阳也好。」他一边说着一边拿着钥匙退到哨棚里去了。

我和陈力缓缓地走出门口，迎着久违的太阳，眼前有些发黑，一边揉着眼睛，定好神后，选中了一段断墙的两块墙脚石，并排坐在那上面。

那时，还没有起风，高原的冬天，万里无云，在柔和的阳光下，我感到温暖而舒适，回过头去看房子的那一头，金梅家的两个大人已经为忙生活而去场部了。两个孩子还没出来，整个羊圈周围只有我们三个人。

年轻人放下钥匙从岗棚里出来，走到我们面前，选了一块石头，面对着我们坐了下来。他先问了我们俩是什么「犯罪」？我们说自己是右派，升级进监来的。他也毫不介意的介绍了自己，他说：「我姓锺，入伍之前是成都的一名中学生。」

他向我们介绍说：「我们那个学校有几个老师也是右派份子，他们是全校教得最好的老师，就是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钻牛角尖呢？」

接着他又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还记得他老是担心，「三年自然灾害」今后还会不会再发生？为什么苏联这么快就同我们国家翻脸了？还要向我们逼债？原子弹在我国都已经发射成功了，为什么我们周边的小国家还要反华？

看来这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年轻人，从这些问题中知道，他并不相信他的部队和上司灌输给他的东西。

中共宣传机器，每天放出假话连篇的宣传品，对不动脑筋的人才会起麻醉作用，只要稍肯动脑筋，想一想看到的事实与宣传牛头不对马嘴，便明白了。当然也有死心塌地干蠢事的，那也只能是一部份人。

于是我们俩滔滔不绝的讲大饥荒，讲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我们亲身的经历讲自然灾害纯粹是胡乱指挥的结果。讲原子弹在我国这么贫弱的条件下，不但老百姓不欢迎，就连苏联也不支持。

可惜我们当时同全国百姓一样，被闭目塞听所苦，讲不出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台湾的发展情况，未免在讲大陆的落后时缺乏对比和说服力。

他听得津津有味，当我们痛斥毛泽东的罪恶时他居然没有反对，取了默认的态度，把头转向场部方向，深深的陷入思考之中，两个小时的晒太阳在我们的探讨中很快过去了，已经到了中午时分，西北风呼呼的吹起来，也不知道金梅的两个孩子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坐在隔我们大约五十公尺之外盯着我们。

当送饭的老叶熟悉的身影，稳稳从对面的田坎上向我们走过来时，跟在他后面是换班的岗哨，我们才站起身来，各自回到自己的监舍中，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把坐在对面的两个孩子叫了过来，把给我们送来的饭菜匀了一些给他们，特别是那小男孩，当我抚摸着他的小脑瓜时，我才看到他很久没有剃过头了，我喃喃的说：「可怜的孩子。」

从那以后，凡是这个小伙子值班时，我们就会被放出来放风，甚至于我们还欣赏他从食堂带来的烤馒头和烤山芋，在我们坦诚的交谈中，看得出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他已经把我们当作了他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在中共制造人为仇视而禁锁的中国大地上，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歌声和交流变得友好相处，羊圈反省室里发生的一切证明，「人性」并没有被阶级斗争的毒液所闷死，金梅同卫兵们处得非常的融洽，有时她还专门提前背回洗好的衣服，为这些小伙子唱他们喜欢听的歌，而这些士兵们也常常给两个孩子带些馒头之类可以充饥的东西。

羊圈里发生的这一切立刻引起了邓扬光的警惕，并且很快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几天后在邓扬光亲自督促下，金梅一家被迁出羊圈。临走那一天，因为受到严密的监视，彼此都没有表达惜别的机会，唯独那六岁的小男孩在走上通向场部那条田坎时，还不断的回头向着我们俩的窗口张望。

仿佛他在想，这短短二十多天来那关在黑屋子里的叔叔是谁，那情景兴许已刻在他稚嫩大脑中一辈子也忘不了。托苍天安排，这短短的日子里，缘分已将他们哀怨琴声和歌声，深深凝在这孤屋断墙中，也牢牢地扎进了我们的心里。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红岂终极。」高世清和金梅一家是我蹲小监第一次碰到的就业人员一家，原来常听说刑满以后，与犯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却没有接触和体验过。听那曾同我关在一起的张姓就业人员讲，那金梅原是农场里的小干事，就因执意不与高世清离婚，便招来了同我们为伍的下场，连孩子也不放过。

而孩子们可知，如果这个残暴的世道不变，即使他们长大了，也会因父母亲的「成份」而受累终生。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共内部分裂的内在原因之一，在这个不讲信义不讲忠孝的政党里，所有的成员不都是面合心离的？

一九六五年初，当金梅的一家刚从羊圈迁出后，没过几天，门前的岗哨上也另换了一帮人马，那位姓锺的学生兵也从此再没有见过他，开始我和陈力还没有介意卫兵换了人，照例进行我们每天都已相沿成习的作息：早上起来练练功，然后是看报、写作，就是入夜以后羊圈里一片死寂，不但再听不见琴声和歌声就连说话声也少了。

#### （四）三星阁匠

自从卫兵换防以后，新来的人是些年纪较大的士兵，不像以前让我们出来放风，我们每次说话都要遭到他们的训斥！同我们过去接触的老管一样，个个板着脸，两个眼睛随时都流露出敌意。

换防后的第三天，我正按照往常的习惯，隔着墙大声问陈力一句成语的典故时，一名佩戴上士军衔的中年人，幽幽出现在我的窗前，那人满脸横肉，一双眯缝的细眼，嵌在胖胖的面庞上，下巴还长着一颗令人很讨厌的黑痣，当他的目光碰到我的眼睛后，便用安岳土话嚷道：「你们两个在讲什么？关在小监里还敢隔着墙说话，想找死哇！」他那小眼里露着凶光，胖脸上显得十分轻蔑。

经验告诉我，对这样的人初次见面决不可示弱，否则今后他会不断得寸进尺找麻烦，迟疑了一会儿，隔壁的陈力已经发了话，他说：「人长着嘴本来就是吃饭说话两件事，我们可不像你长着嘴只晓得捅饭。」

那卫兵立刻走到他的窗子面前骂道：「什么野物，敢在老子面前撒野！你这个龟儿子，你这个王七加一蛋竟敢跟老子顶嘴！」安岳土话夹着很重的卷舌音，使他原本的凶像很疯狂，我立即站起身来拖着他的把子向他对答道：「喂，嘴巴放干净一点，你跟谁充老子呢？我们可没得罪你，你凭什么骂人？」但是他毫不示弱，使出一付泼妇骂街的本事骂道：

「我看你这龟儿子，妈生你就变孬种。人还没有变全还跟老子拌嘴。」看来这人是个农村骂架的好手，一面骂一面又朝我的窗下走过来。

「我看你长得够肥的，要过年了吧，够秤了！」陈力在隔壁同他对骂，对于这样的人除了挖苦奚落，没有其它的语言同他对话。

「混蛋，你敢洗刷老子，你不认老子是谁？」恼羞成怒已使他说走了嘴。他向陈力亮着他肩章上的三颗五角星，其实我们早已看清了他的身分份，不过是一个班长。论年纪来讲，只有戴着他的三颗泡泡守到退役了。

三颗泡泡在安岳的穷山沟里够威风，可以吓唬没见过世面的农民。「我看到了，你领子上不就别着三颗泡泡的领章么？三星阉匠！怎么样，好不好你还是一阉匠，回农村还可以替人阉猪儿，找顿饭吃也不枉在部队里混那么多年。」陈力在隔壁狠狠挖苦着他。

「对了，三星阉匠。」我跟着确认道。

「你这小子敢再说一遍，你他妈的臭鸡蛋撞石头，撞破了不如一泡屎。」他气急败坏，语无伦次，骂不绝口。

为了挑逗这个家伙，我从铺上站起身来，隔着窗栏一字一板的大声嘲骂道：「你那颈圈上三个泡泡，该挨刀了。」陈力在隔壁哈哈大笑。

肉脸气得直跳脚，但因为没有找到开房门的钥匙，只好用手里自动步枪的枪托，朝着我监舍的木门狠狠的砸了几下，用拳头在我的窗口直晃幌。我们对他这种令人发笑的歇斯底里又回以笑声。

讨了如此的没趣，上士喘着气回哨岗里去了。我们可并没有把这场对骂记在心上，而是把它当作彼此间为了争各自面子的一场游戏，也是为了保住我们所争来的自由权利对粗暴干涉者的回敬。

对于无知的暴徒，你越软弱，他就越要欺负你，这是我们同这些人相处中，摸索到对方的脾气。

不过，我们还真没想到如此一番对骂，竟被这位心胸狭隘的安岳乡巴佬，当成了一场必欲报复的奇耻大辱。过了几天，他不知从哪里端了两盆锯木粉来，用一些纸引燃几分钟后，便沃成了一盆滚滚的浓烟。就在那燃着烟火的锯木粉上面，撒上了两包「药粉」，并用扇子去搨那锯木粉喷出的滚滚浓烟。等到形成了黄白色的烟雾后，便将我和陈力的门口一处放了一盆，再用扇子将那滚滚黄烟从门缝里搨进来。

一股粉浓烟迅速弥漫了小屋，这残忍而愚蠢的家伙，竟来了这么一出「毒气」战，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屋里没水，也没什么可以用来从门缝里泼出去扑熄两盆毒烟的泥沙。浓烈的毒烟呛得我直咳嗽。看来这蠢猪是想把我们毒死在里面！我们开始大声的怒斥：「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放毒气了！」

法西斯用毒气弹去残杀妇女儿童，都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何况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两个被关在禁闭室里的「囚犯」。这手段他是不是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我们的怒吼丝毫没有阻止住他那双罪恶的手，相反他反倒越搨越起劲。在他发狂的挥着扇子时，屋子里的毒烟越来越浓。

我们只好向对面的场部方向大声呼救：「杀人啦！杀人啦！法西斯杀人啦！」我们的喊声和滚滚浓烟，首先惊动了正在那田坎两侧劳动的就业人员，没到五分钟，场部的那面，一位戴上尉肩章的军官从田坎上跑步而来。三星阉将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慌慌张张把两个盆子端到断墙外用泥沙盖住。

当他们的上司匆匆赶到时，两间屋子里呛人的浓烟开始向窗外散出，毒气盆已经熄灭「不见了」。上尉的脸色十分难看，他的下级此时正垂着双手站在那里，听我们边咳边向他诉说刚才发生的事一声没吭。「盆子哪里去

了？」上尉朝他喊道。

他迟疑的走到断墙外，把藏在哪儿的两个盆子端了出来，依然地木然垂着头站在一旁，不时用眼睛去看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位上司。

也许他压根都没有想到他刚才所干蠢事的后果。只挖空心思，想用这种办法来制裁伤了他自尊心的两名囚犯，并以此炫耀自己在「阶级敌人」面前的革命性，没想到几天前我们那场对骂，以这么一种结果收场！

呜呼！中国人之愚昧可恨，可见一般。这么一个普通的士兵脱下军装便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身上竟埋藏着以残杀自己同胞为乐趣的劣根。这种劣根，我们已经在所经历的大小斗争会上体验过好多次了。

正是中国人由于愚昧而相互残杀的劣根性，才使毛泽东可以轻易加以利用，并煽起大规模内战的民族潜因了。然而，这个逞强逞能的上士，此时在他上司面前已威风扫地，呆呆站在那里，活像条夹尾巴狗。

从此以后三星上士便消失了，我们再没有见到过他。

### (五) 粪泼岗哨

在三星上士，从我们的窗前消失了一周以后，一个满脸雀斑的中士替代原来的上士，在岗哨中充当「头」的角色。从交接班时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他是场部驻军的伙食班班长，有一口很纯的自贡口音。也许他的上司在他来之前，曾因他的前任事件向他作过交代，这位看上去同样自负的人在上班时，一直用铁青的脸色保持与我们的距离，从来不在我们窗下逗留，也不同我们说一句话。

这样也好，虽不像金梅一家还在时，那一段老管们与我们融洽相处的日子，但能保持河水不犯井水，也落得安静些，我们可有我们的事要干。

那时间，场部为驻军所需的蔬菜，专门在场部蔬菜地的旁边，划了一片菜地给他们，还把田坎旁的一个粪坑划归他们使用，这位中士原来可能是个菜农，他来时，便在原来金梅住家的那一头放了一挑粪桶，规定送饭的老叶，我们屋里的屎尿不准随意乱倒，在每晚送饭时必须倒进他准备好的粪桶里。

在他来之前，我们平时的屎尿全倒在那断墙旁边，不知由谁种的核桃树下。经过一个冬天浇灌，过了春节后，那两棵一人高的树上已长出绿叶。

门前堰沟两边去年插下的柳枝也吐出了嫩绿的芽，下过两场春雨后，风渐渐减弱，天气渐渐开始暖和。

我们对中士兴出来的规矩倒也没有什么非议，种菜需肥这可以理解。只是因为陈力戴着脚镣行走不便，现在每天倒尿的桶比原来远得多，两个房间倒尿桶的工作便由我一人承担我也乐意，反正每天我也找着机会活动身体，借此透透气放放风，何乐而不为。

只是偶尔不慎倒洒在地上时，被那中士看到便会板着脸骂我「寄生虫」，使我颇为反感，但我没有同他计较。三五天以后，积粪的桶便装得满满的，开始他安排了一个刚刚入伍的士兵，将那挑粪水挑到两百米外的自留粪坑中倒掉，再把腾空的桶送回原处。

自从羊圈这面，士兵与我们之间，产生了先前那姓锺的学生兵与我们交往的事情后，趁着驻军换防机会，邓扬光收回了我们禁闭室由卫兵保管的钥匙，把它交给了送饭的炊事员老叶。

所以平时，这些士兵是进不了我们门的。那三星上士本欲破门而进，将我两痛打一顿，皆因进不了门而想出用毒气惩罚我们的主意。

现在这位雀斑打着利用我们两个劳动力的主意，也因没有钥匙而未能如愿，有一天下午五点钟，老叶就已送来了晚饭，当房门打开以后，那雀斑从老叶的手里将钥匙要了过去，老叶不敢违抗，只是向他关照说：「管教科交代过，任何人要小监的钥匙，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允许。」那中士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我会跟你们的邓科长说的。」

当我们吃完饭以后，中士不但没有锁上房门，还把我们俩叫了出来，指着那墙头已经装得满满的粪桶，命令我俩抬到对面的粪坑里去。我倒不要紧，可戴着十斤重镣的陈力就难了，我俩都已经整整半年多没有劳动，脚也

是虚晃的，抬着这么满满一桶粪水，加上那粪桶上所系的是一股单调的棕绳，抬起来桶在中央晃动，使我俩一前一后无法同步。

还没有抬出十公尺，那桶里好像有两条大鱼在翻腾，溅出的粪水幌了我们一身。尤其是陈力，越抬越觉不对劲，将那桶粪水抬到距哨棚大约五公尺的地方，停下脚叫放下扁担，站在那里不走了。

那雀斑把脸一抹，眼里射出凶光，口里一迭声的叫骂道：「狗日的劳改犯人，吃了睡，睡了吃，不劳动，老子今天就要强迫你抬！」说着，他手里端的自动步枪枪尖刺着我的腰部，陈力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吼道：「我没有义务替你劳动，你要我劳动叫人把我的脚镣下了，不然我怎么抬？」雀斑又将脸转向陈力，刺刀尖挑着他肩头。「今天老子要你抬，否则老子要你吃枪子！」说着，果然的往枪膛处上了弹夹，枪口对着陈力，眼看又要发生一场意想不到的冲突了。

我同陈力交换了一下眼色，慢腾腾地将那一桶屎尿抬了起来，陈力将他的脚镣，猛烈的拉动，打在岗棚前的石板上哗哗作响。雀斑以为他逞威得势，发出一阵胜利的吆喝：「走！」

刚刚抬到哨棚边敞开棚门的前方，突然间，陈力身子一侧，一个踉跄整个身体带着那桶绳，向那岗棚门口倒去。我顺着这势头，也朝那方向倒去。一刹那，那桶粪水借着我俩的合力，不偏不倚的全部泼进了哨棚中，把棚中的坐椅，防寒大衣，彻底浇洗了一个透！棚里一片恶臭。

这出其不意的行动使雀斑惊呆了，五秒钟后，他才回过神来，尖叫着，跳到附近的那片菜地里，捡起墙角下盆子大的土胚，向我的头上猛砸，我的头上一热，感到已被土胚打中的地方血流了出来。于是把身子缩成一团，一边大声喊着：「打！你打，我跟你拼拚了。」一边打着滚，往他站的地方滚去。

雀斑被这种与之拼拚命的动作惊呆了，迅速的捡起从肩上滑下来的自动步枪，朝着天上扣动了扳机，一梭五发子弹凌空而起。一面又飞速地从断墙角跳开，躲避我滚扑而来的身体。

我顺势坐起身来，指着他痛骂不已，陈力却在那岗哨旁哈哈大笑，这时雀斑已站出与我们十公尺远处，手里的自动步枪对准着我们，一面在抖沾在他衣服上的大粪。一面又不时回头向场部的方向张望。看得出，他正准备看谁来收拾这狼狈不堪的现场。

清脆的枪声立刻惊动了二百公尺外的场部营房。邓扬光 and 一位上尉，一名士兵正急匆匆地从田坎上向这边走来。

大约一分钟以后三个人赶到，一身是泥的我，头上流着血还坐在地上呻唤，陈力叉着腰在那儿朝着雀斑冷笑，雀斑此时当初的威风顿然消失，从岗哨棚中溢出来的尿水还在不断地流，那片被粪水污染的地方泛出一股股奇臭。上尉见到此情景捂着鼻子，哭笑不得。他的部下连连发生如此荒唐事，令他十分难堪。

邓扬光皱着眉头，悄悄地问那雀斑：「钥匙你怎么拿到手的？」

我站起身来，膝盖刚才在地上翻滚时擦破了皮。脸上除了被那土胚击中，耳边擦出血留着伤痕外，身上其它地方还没有伤着。一面拍打满身的泥土，狠狠地向那雀斑瞪了一眼，便慢腾腾地走回我那监舍去。

四个人在窗外说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话，隐隐的听得出，争执得很凶。只听见那邓扬光压着嗓子喊到：「幸好还没有发生更大的意外，否则这责任谁负得起？」当换岗的士兵来到时，四个人才慢慢地离开那里，那雀斑跟在最后，低着头。

不一会，四个人的身影便消失在田坎上的夜幕之中，场部那个方向传来了电影话筒里放出的音乐声，电影也开映了。

一场激烈的风波，总算平息了，从此以后，那雀斑也从羊圈的岗哨中消失了，我们每天的粪便，依旧倒在那两棵核桃树下。

## (六) 挨打

雨季刚刚来临的一个下午，天刮着大风，乌云密布，天色也越来越黑，看样子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来临了，此时当天值班的一个身材很矮的中士，像幽灵般的站在陈力窗下。

陈力正聚精会神地匍匐在铺上，将刚刚捕捉到的一点灵感写在纸上，所以根本没注意到那窗下还扒着一个人。那扒在铁窗下的中士大概因为天色太暗，并没有看清陈力在干什么，眯着眼看了老半天，于是将手中步枪的刺刀在窗条上碰得乒乓作响，大声向里面命令道：「写什么东西，拿给我看看！」陈力突然被这大声喝令声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十分恼恨这家伙无缘无故打断了他的思维，回答道：「你没有任何资格命令我，把我所写的东西拿给你看。」

中士被他的这句轻慢的回答震怒了：「我要你拿出来，你就得拿出来，不然我要你吃枪子。！」他怒吼道，这种拒绝是习惯于欺压囚犯的人绝对无法接受的，陈力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闭目静待，也不答腔，好像窗外并没有人站在那里。

对他的这种藐视，中士的脸气得铁青，一只手握着枪柄，将那枪膛里的弹匣子弄得啪啪作响，但最终还是不敢发作，狞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十分钟以后，老叶一手拿着一把雨伞，一手提着饭篮子，匆匆的送饭来了。

陈力那屋子的小门打开了，当陈力从老叶手里刚刚接过饭盘，还没等老叶返身出来，那矮子已经闪身而入，用他的步枪刺刀顶着陈力的背，连推带挤地将他逼到羊圈前的断墙土堆上，并从岗棚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根棕绳。

捆人是这些枪杆子惩罚不驯者的常用刑罚，我们对换防以来这批军人的反抗态度，积下怨恨，对方随时都想找岔子寻机报复。

他把陈力叫到坝子里，开始用绳子抽打陈力，陈力一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老叶见状，立即收起了空篮，提着雨伞匆匆离去了。而我正扒在窗口上，心里为陈力担心，灰暗的天空开始打下豆粒般的雨点，溅在那十斤重的铁镣上铮铮作响。

中士将绳子套在陈力的肩上，我见此景按捺不住大声吼道：「老管要杀人啦，老管要杀人啦！」中士也许没有想到，与此无关的我会如此的声援，加上倾盆的大雨已经如瀑布般狂泻下来，便放开了陈力，转身一个剪步，射进我的房子里，做了一个快速的擒拿动作，将我掀翻在地。

接着他那双拳头向我的胸部腰部雨点般落下，我立即将身体缩成一团，任随他拳脚相加。足足挨了五分钟的打，腰已经不能动弹，那矮子好像已经打累了，喘着气，放开我，走出屋去。

陈力并没有走开，他仍站在雨坝中，全力的扯着嗓子喊道：「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虽然这吼声在澎湃的大雨中被湮灭得模糊不清，那矮子却从哨棚里将雨衣披好，准备再次向陈力动手。

忽然黑糊糊的田坎上茫茫的雨雾中，向这儿射过来两束雪亮的手电筒光，隐约听得清楚杂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邓扬光和老管的上尉指导员出现了，中士停了手，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只是腰杆直不起来，嘴里觉得一股股血腥臭，头上已经打起了几处青包。等到小监的门上了锁，窗外渐渐没了人声，我才用破棉絮擦干自己身上的泥污，挣扎着爬回自己的草窝。

这一次我受伤不轻，第二天送饭的老叶，还为我带来场部蔬菜组的就业卫生员为我作了检查，包扎了伤口。还好，腰部只是比较严重的扭伤，我躺在床上一连五天，头上的青包慢慢的消退了，腰杆也能曲伸，直到至今，每遇天气变化都还常常发作，一场暴打又像暴风雨般的过去了。

在反省室里，日常与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是站岗的哨兵，这些文化层次极低，受过特种的训练，在大监里养成了对一般犯人呼来喝去，在他们头上拉屎、拉尿已成习惯，我们对他们坚持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的态度，在不断的较量中，使他们原先的盛气凌人的架子得以收敛。我们难免要挨打，但依仗着这点斗争，保护了我们人格的尊严，争来了较为宽松的生活权利。

我们可以在监舍中跑步，练气功，隔着墙壁和陈力大声交谈，讨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甚至于隔着墙唱歌猜谜语，遇到像自贡中士和安岳上士的无理之徒，让他们赏尽被奚落的滋味。几次冲突后，他们自认为对我们这两个人多管闲事，除了自讨没趣，什么也不会得到。

我们在羊圈里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生活秩序，影响到我今后一生，使我们懂得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靠自己用斗争来换得，当然，这要符合社会公理，一个人只有始终代表着正义，那么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后来，当我们出了禁闭室到了大监里，才听说，我俩在小监里的这段生活，竟在流放者中广为传播，甚至传得非常离奇，有人说，我们在小监中与老管们对打，老管用枪打我们，反而子弹弹了回去，使打人的人还受了伤住进了西昌医院。还说我们俩是国外派来的间谍，有人看见小监里经常有女人出入，便是共产党用美人计来套我们的口供，等等。

他们那里知道，我们在小监里整整一年半时间，每时每刻都在同狱吏们抗争，我们这些平凡的故事，没有任何传奇之处，我们能在特种监视下，有歌声，有说笑，有练功打坐，给我们吃干部伙食等等，既有当局的政治目的，也许还有中共内部矛盾在起作用，当年全国大灾荒的严重后果，经济的崩溃导致了中共上层的分裂，已日益显露。

苍天保佑着我们，其中我们凭着人性，道义和良知这些人类永恒的力量，使我们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

很难说清一九六四年，农场的当权者，把我和陈力关在这里，与普通流放者完全隔离反省的真实用意。

既然中共已经分裂，毛泽东的阴谋受到很大「抑制」，我们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经过整整一年半的反省，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追究，悄然从小监里放了出来。

后来听说，当时在我们进小监时，农场管教科上报过我们的「死刑」材料，然而农场的第一把手在批示这个材料时，却说：「这两个人还年轻，又是知识分子，本质上并不是根深蒂固的，根据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为主的政策，仍应坚持对他们教育为主的基本方针，以达到使他们回心转意重新做人的目的。」

放我们出小监的那一天，下掉了陈力脚上的脚镣。在干部伙食的催养下加上我平时规律性很强的生活规律，我的体重增加到七十公斤，这真是因祸得福，不过，迫害也罢、保护也罢，对个人并不重要。

## 第六节：\*\*第二次绝食\*\*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们收拾好自己的破烂行李，跟着邓扬光搬到了紧靠着场部的基建三中队。这是一个刚刚新建的，以关押青年刑事犯为主体的中队，设有机械组和基建组两大组，集中了具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

基建组有从事制造砖瓦的、有从事建设房屋的、有从事木工的，机械组主要是拖拉机耕作、保养、维修，我们所住的羊圈从此空着，一年以后，在这一面山坡上建立的农六队，又将这里当成了真正的羊圈。

就在到基三队来之前，邓扬光一副严肃的面孔向我们宣布说：「经过你们一年多的反省，你们应当体会到政府对你们施行的人道主义教育：反省期间给你们毛主席著作；给你们报纸看；让你们了解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想来你们已经对自己的反动观点有所认识。现在我们又把你们放回大监，给你们重新在劳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机会，希望你们珍惜这个机会，重新做起。现在，你们应当对这一年多反省作一个小小的自我总结，将你们通过反省的收获写出来，特别要重点批判修正主义观点。」

我和陈力听到这番话只是相对一笑，倒是怀疑这位貌似正统，外表严肃的监狱管教头，将我们写的那么多「材料」弄到哪里去了？我们可没有共产党作风，专以装糊涂胡弄人为能事，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完全相反的另一套，在小监中，我们所写的与他所希望的完全相反，难道还不明白吗？

当然在这黑白颠倒的年代，欺骗已成普遍原则，我们俩只好用沉默不答来回答这位管教。他明明知道我们不会写什么「反省」，又拿什么来胡弄他的上司？

基建三中队当时的编制一共一百六十人，我同陈力分别编在两个作业组中，因为已经有一年没有劳动，走起路来有一种虚弱的感觉，尤其是陈力，下掉那沉重的脚镣后，好几天走起路来一跳一跳像一个袋鼠。

当时我所到的小组，正在修补通往古柏和白鸟两个分场的马路，早出晚归全靠步行，而我根本无法跟上，所以仍然在监舍看报。



大约十天以后，管教干事童某把我们叫去，说为了体现政府的人道主义和「感化」政策。规定从明天起，半天参加劳动，半天反省学习。

由于我无法跟队去修路，所以安排给我的任务是给基三队所管辖的砖瓦厂「收方」，每天我要清点在那里劳动的每个人所打砖坯的数目，以及烧制熄火后出炉砖瓦的数目，并写在一本专来记载的本子上。

基建三队的成员多半是关过少管所的孩子们，在饥饿年代里，他们绝大部分都没有上过学，因饥饿而去偷窃，甚至于为了几个馒头而去杀人的就有一半以上。但是这些人中绝大部分良知并没有泯灭。求知欲和追求真善美的人格秉性，依然存活在他们身上。

在强烈的求知欲下，他们把熟记水浒和三国演义的陈力当成不可多得的良师。经常的聚集在他的身边听他从「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一章一回地讲到「宋江怒杀阎婆惜」，说宋江如何上了梁山；从「桃园豪杰三结义」讲到「七星坛诸葛亮祭东风」说赤壁大战。

这些故事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其实这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他们也从戏曲和民间传说中知道过一些片段，但并不知故事的来龙去脉。从他们听故事的专注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把我们当成五体投地的师长。经常围聚着陈力直到深夜十二点以后，不愿散去。

我们渐渐把故事拉向近代，转到他们很少听过的谭嗣同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让他们明白，自由平等是人类美好的追求，并不是毛泽东污蔑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渐渐把他们的兴趣和话题，集中到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

在我们启发下，他们坦露出他们心灵中的空白。例如他们始终没有去想，也从没有弄明白，今天和平建设环境，搞得连饭都吃不起，原因在那里？岂是「天灾」「苏修」可推诿？中国今天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他们为什么从小就没有读书？为什么糊里糊涂就进了少管所？这些长期被中共的欺骗愚弄得一无所知的人们，开始明白一直没弄清的问题。

当他们向我们询问小监里的种种传闻时，我们告诉他们真实的故事。揭露中共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子，干下对人民血腥镇压的种种事实；他们心中许多人因此而茅塞顿开，例如孙明权以后还在抗拒暴力斗争中，做出轰轰烈烈的事。

然而，就在陈力故事会的人群中也有头脑糊涂，对当局抱着幻想的人，陈力的故事会很快被嗅觉灵敏的场部管教教科所注意，邓扬光再次亲临基三队，当面警告陈力叫他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执迷不悟，在犯人中继续「放毒」，声称政府的教育和挽救，不要被错误认为「软弱可欺」；我们的言行一笔一笔的记录在余干事那本记录本上，我们终于惹来了新的麻烦。

九月下旬的一天，余管教亲自主持了陈力所在小组对陈力的批判会，会上余管教翻开他那本记录本，有时间有地点的列数自我俩进入基三队的一个月时间里，在犯人中散布的种种「反动」言论。

可是这一次批判会完全出乎主持人的意外，陈力用辛辣的语言单刀直入挖苦了他：「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么？余干事，你为什么老爱用你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话骗人呢？老百姓面临饥寒交迫还成天喊形势大好？你不觉得食不果腹的境地里，不敢说真话是可悲的吗？你自己已经麻木不仁了，还要强迫别人俯首听命，这不是甘当奴才么？」会场报以哄哄堂大笑。

懊恼成怒的余管教终于撕下了「感化」教育的面纱，当场宣布，对陈力重新带上手铐，并从即日开始，全天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由于我在收砖坯时虚报，在窑子上与陈力相互呼应，攻击共产党政策。故而取消我的收方资格，同样从即日起全天体力劳动。

九月三十日为了抗议这种野蛮的暴力压服，我们早上拒绝起床，拒绝领食囚饭。这一次我总结了上次古柏绝食的经验，预先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队部答应停止批斗会，停止刑具，停止对我们强迫性劳役。

我们心中十分明白，采用「绝食」这种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反抗迫害的政治斗争手段，是不适合于草菅人命的「无产阶级专制」主义的。这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局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我们处在一群对我们十分友好和

支持的青年中，因而是可以产生感染，扩大影响的。

中午，邓扬光来了，他可能是因为同我在古柏的较量中，自认为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掌握了挫败我们的诀窍。他板着脸走进了监舍，一大群年轻人围在屋里，正同我们俩交谈。

进来后，他要大家统统离开，然而大家要看这位头号管教，怎么处置这两个顽固不化的份子？围在房里的人反而越来越多。邓扬光大声问道：「你们俩吃不吃？」我俩不屑回答他这种多余的问题。

邓扬光环顾了一下四周，皱着眉头，现出十分的不满意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带着那余管教边说边走了进来，那口气分明是在指责余管教。余管教没有吭声，但一脸的不高兴，一走进来便怒气冲冲地指挥两个小组长，将我的铺位，搬到隔壁木工组的监舍里，接着又把陈力的铺位搬到一间保管室里。

这么一搬所有围观的人便散去了，一直折腾到下午一点多钟，所有六名年纪稍长的老木工都被叫了出去，屋里只剩下邓大人、老叶和我。

然后向我宣布政策：「我们执行政府的人道主义，从现在开始，每顿的饭菜都按时地给你送来，如果你不吃，那么到了下一顿，便将上一顿没吃的端走，只留下当顿的，你吃不吃是你的事。」

说毕又转身向老叶交代道：「你按时送饭，只有送饭来时才能开锁，送完饭便将房门锁上，」说完后还补充了一句：「他们俩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我和陈力联合的绝食斗争就这样开始，同上次在古柏那次孤军奋战相比，我踏实多了。我知道许多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我俩虽相隔一方，心中对这次绝食能否争取到三个基本要求？没有绝对的把握。但人们的支撑鼓舞着我，监狱方也有明显的分歧。

这是又一次毅力和意志的考验，可以说每一分钟都在受刑，这是饥渴和生命的搏斗，尤其是第四天以后，因为没有水喝，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喉咙里已经打不过转。灵与肉在拼拚搏，每一秒钟都要靠意志来克服饥渴的难受！

正好，天忽然下起雨来，这也许是十月盐源的最后一次大雨。我挣扎着站起身来，爬在窗子上，凝望着灰色的天空，于是，我颤抖着拿起了虫子，将手伸出那铁条窗框，伸向那窗前屋檐滴下的雨水，这可是天赐的自然水。而不是统治者送来的水，为了坚持下去，我喝下了这发黄的屋檐水。

我真没想到，我竟然熬过整整十一天这么长时间！心里虽然已经很慌乱，但脑子里依然十分清醒，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在等待着场部对我们所提要求的最后回答。我的窗下几乎天天塞满了人，他们常常被余管教驱走，驱散了，余管教转个背又来了，他们关切地看着昏睡在床上的我，彼此悄悄地议论。

第十一天下午，农场的最高行政长官高德胜终于露面了。

两名壮实的少年犯把我从床上架起来，跟着余干事，轮流背着我，踩过刚被雨水浸泡的泥泞操场，到了场部那熟悉的石梯坎，我被背上了石梯坎最高处那排平房，背进了「场长办公室」。

坐在我对面的皮沙发上五十多岁的书记兼场长，瘦长的个子，面容苍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尊容。在他的旁边坐着矮胖的陈文仲，今天邓扬光不在。进去时我被扶到高书记对面的椅子上，陈文仲死死盯着奄奄一息的我。

等我坐好以后，高书记开始发话：「今天找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有什么想法？改造嘛，不怕犯错误，我们的目的是改造思想，不是消灭人的肉体，这是党的一贯政策，今天你可说说现在的思想，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他操着一口鼻音很浓的陕北口音，语气柔和。

因为久积的敌意，我筑起了一道心理上预设的防线。略微停顿了一下，他继续慢慢地说下去：「当然，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但是你必须清楚你的身份分，所以你不能无理取闹，提出一些不合实际的要求。同时，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你必须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修正自己的错误。」

看来，这位农场的最高元首，一直都十分关注我们。听得出，他细细地读过我们在小监中所写的东西，同时说话很谨慎，留着充分的余地。

一名工作人员，给我递上一盅浓茶。陈文仲示意要我喝水，他们当然清楚我的身体状况，我摇了摇头，因为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我不可能接受对方任何的食品，包括送来的茶水。更何况还有一个陈力，我们必须采取同一行动，即使恢复吃东西。

我明白，面前的这位农场最高长官，要我说出这次绝食的要求。

「好吧！首先我认为我和陈力都没有错，我们所讲的都是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不能接受变相殴打的斗争会，陈力也不该因此而带手铐。」我说话非常吃力，我自己都能听见我说话的喘气声。

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刚从小监出来，脚是软的，不可能马上参加小组劳动。我们的条件就是在绝食前以书面形式写下的三条，我相信高书记不仅知道，现在要我复述出来，好给个答复对吧，我的话只有这些了。」

又停顿了五分钟，陈文仲发话了：「孔令平，首先，我们并没有对你们进行殴打，谁也没有布置召开你们的斗争会，但是，我们绝对不允许你们乱说乱动，特别是明目张胆地攻击三面红旗和大好形势。余干事开会批判你们没有错，目的还是帮助你们改正错误的认识，就像我们干部谁如果有错误，我们还不是照样要批评帮助，至于有人在批判会上动手打你们，那是错误的，我们从来就禁止这么做，否则怎么叫思想改造以理服人？」

他这一番侃侃论述，很严密。可以说实际上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第一个要求，但没有认错，这乃是中共的「原则」。

「至于刑具嘛，我们可以下掉，刑具本来就是对犯人超越常态的越轨行为一种防范手段，只要你们不再公开放毒，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给谁戴刑具；关于劳动的问题，首先你们是犯人，结束反省，参加劳动是必须执行的，由于开始劳动有些困难，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我们会合理安排的。」

陈文仲的这段宣布，是照已经起草好，经过周密思考和讨论才作的决定，既答应我们的条件，也是替他们打圆场下台阶。

「不过也应该讲道理，大学生嘛，有理性，不要一味的任性。生命是可贵的，不应当用生命开玩笑，所以你们应当正常生活，不吃饭怎么行？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才是他今天要表达的最后意思。

说完这番话他注视着我，我想，当时的我的样子一定像死人一样可怕！。

我被刚才背我来的两个小伙子背回基三队，随后两个小伙子又将陈力背到场部去。

晚上，余干事亲自跟着老叶为我送来了特地熬制的白稀饭，一直守着我直到看我吃完后方才离去。一盅稀饭刚刚下肚，没过半小时，腹中便咕咕直叫，接着便是水泻般的腹泻。刚刚喝下去的稀饭穿肠而过。看来似乎一点都没被身体吸收，反而我的身体就像虚脱般的，大脑似乎已经失去指挥能力，全身轻飘飘的。

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受，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如此整整折腾了一晚上，直到天亮才昏昏入睡。

第二天照例是稀饭，不过里面加进了糖，这一次喝下就不像昨天。身体渐渐的感到暖和，用手触摸自己的脚，已能感觉到那冰冷的脚心。

第三天，前天送我去场部的两个小伙子又奉命要将我背到场部去。但是，我已经能起床慢慢走路，便拄着一根竹竿，在他们的搀扶下，由余干事跟着，再次来到场长办公室。

同前一次的座位完全一样，我的对面除了这位高书记就是陈文仲。不过，在我们的对话开始之前，陈文仲打开了一个放在他面前的绿色档夹，待我坐定以后，一边向我提问，依次的记录下我的姓名，年龄、籍贯、民族、出身和原判罪名，刑期。我知道这乃是一种常规的「预审」。

看来，场部是把这次绝食斗争，当成了一个案子来「审理」了，也许还兼有对我几次申诉的答复，所以，我在心里揣度这位高书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完成这一套方式记录后，陈文仲要我当着高书记的面，畅诉自己

的观点。特别还强调要我「不加保留，和盘托出向党交心」。

我十分厌恶这「交心」二字。这仍是中共的职业党棍们一种时髦的用语，划右派时，正因为这「交心」而使多少幼稚的学生「蒙冤」！

我看了一眼这位脸色苍白，已上了岁数的高书记，虽然也在猜测对方的意图，但是我已经没有学生时代那种惶恐不安，抱着请求宽恕的「幼稚」了。既然已在我的文章和大会发言中，公开讲了中国老百姓所不敢说的。今天当着这位场部的第一负责人，反而缄口和隐瞒，只能表明自己的胆怯和虚弱！所以，我当然要说，不过因为身体极为虚弱，提不起精神来，我的说话中气不足，语音低沉，显得疲惫不堪，中间不时因气换不上，几次停顿。

### （一）攻心

首先，我表达了我的冤枉，学生时代的我，并不符合右派份子六条标准之任中一条，在我幼稚的学生头脑中压根就没想过推翻共产党。接着，便按照我的经历，从下乡一直讲到现在的全部过程，重点讲对「三面红旗」的切身体会，列数中国的灾难现状，痛斥「阶级斗争」的残酷，痛斥中共公开欺骗百姓的愚民政策。

这位农场的第一把手没有打断我的话，从他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的动作，看得出他在紧张的思索着。听到我对毛泽东指名点姓的痛骂非但不加制止，甚至连一点反感的表情也没有。因为我所说的是事实，是平时人们不敢说出的真心话，陈文仲也没有作记录，而是聚精会神听我用了整整两个小时讲完我的话。

当我说完以后，停顿了十分钟，陈文仲好像在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慢腾腾地说出了一番令人深思的话：

「我要告诉你，你若用小说《红岩》里的江姐许云峰精神来对付共产党就大错特错了，你要知道共产党就是搞这一套的，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你，你们不会得逞的。倒不如从现在开始，放弃你们的反动立场，才会有你们的出路。」

听到这位特工头目说出如此令我费解的话，首先，他用他们供奉在神圣信仰神殿里最完美的化身，同我们这种任由他们捆打侮辱的阶下囚并提，令我吃惊。难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供奉的偶像是相似的？也许吧，我们提出的民主思想原是共通的。

可我们算什么呢？平心而论我们的反抗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只是被冤枉的普通人，我们曾对统治者存在若干的幻想，而决无那么「高尚」的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当人间的救世主。我们所希望的不过是被解救，还我自由和清白而已，难道共产党信仰神殿里的尊神也不过如此「平庸」么？

不过从他的话里，倒听出了他们对我们的那种「抬举」，如果，我们的行为果真在他们心目中到达了他们尊重的地步，那倒是要实实在在地洞察他们的内心。其实，承认我们所说的是真话！承认我们代表着真理！只是在「强权」压迫下不好公开这么说，却在无意中露出了自己的内心。

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相信真有那「永贯长虹」的共产主义。

可惜，他们全错了，错在用抽象的、虚幻的，也是反人性的信仰来玩阶级斗争的游戏。说得真实一点，共产主义庙堂里供奉的所有神像，都是些凡夫俗子，有的简直就是人间魔鬼，而决没有大义凛然的神。

此外，这陈文仲的知识未免太贫乏了，中华民族中敢于蔑视敌人，为捍卫正义和人类尊严而视死如归的精英还少么？投江殉国的屈原，骂贼不绝，咬破舌头以鲜血溅贼的颜泉卿，身陷敌营慷慨就义的文天祥，一门忠烈精忠报国的岳飞，至于血战沙场壮志殉国的爱国志士更是比比皆是，为抗日捐躯的名将，就有两百多位，就连中共统治下英勇反抗，杀身成仁的也不在少数。

仅我们这小小农场后来产生出来的刘顺森、张锡锬、陈力等，虽然鲜为世人所知，但他们难道不是为反抗独裁，反对暴政而慷慨献身的英雄么？难道他们的名字不是中华民族流芳万古的楷模么？这是虚幻不实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可想象的，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同高书记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长谈结束了，我无法估计出这样坦诚的交谈会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当时我想假如他对我们的观点表示赞同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那个结论，还适不适用于他？如果

他从内心里很是同情我们，甚至根本就已经一鼻孔出气了，那么他这个二万五千里走下来的红小鬼又将依附在哪一张皮上呢？

「斗争会」当然是毫无结果地结束了。大约因为我俩使基三队的余干事与管教科带来的麻烦，毕竟这个队里有大量从少管所调来的少年犯，这些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就已经心服口服的成了我们的学生了，所以没过几天，我们俩便从这里调到紧邻的农业一中队去。

为了分化我们俩，陈力再度关进了那个中队的反省室，而我暂时的分到了这个中队的第一小组，随组劳动。但暂时不记任务，那时已过了元旦，正是农闲时节，劳改队中农闲时正是驱赶流放者兴修各种堰沟、水渠和蓄水坝的时间。

第一天出工，一大清早农一队的全体劳动力便冒着寒霜，整队向距离五里以外的一号水坝工地开进，按照农场的规定，这年冬天二道沟地区附近的农业中队，担负着给所属中队地区供水的二号坝，加高加厚的任务。

迈过农三队的那个大弯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前年，我们刚从黄联关来到这里的情景。而今，那四周围已经筑起了围墙，围墙前就是我们通向水库的这条初具形态的「公路」。我一连几次的环顾这里，心中想着在猪槽里抓马铃薯吃的邓自新还在不在？想到当年风沙满天，我们铲草皮烧马铃薯的往事。

绕过农三队，我们已看到了横亘在二道沟两侧，截断了上游流水的库坝，是二道沟的最高点，盐源的雨要到五月才来到，春耕所需要的水，都依仗着这水库里的积水来灌溉。

现在，就在这条待加高加厚的库坝上，南侧两台挖土机和三台推土机，正穿梭着将坝的南坡山上的泥土往大坝上填。两侧的泥巴山梁以及坡坝上一千多名挖土打夯的劳动力正在取土，平整，准备加高的坝基。

算来，我已快两年没有参加劳动，劳改队里都在每人头上划了「硬任务」。农一队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新犯，他们的劳动力都很强。而且为了赶在刮风以前，就能完成全天的任务，所以上了工地便会紧张地干起活来，这同基建三中队的少年犯们有很大的不同。

那时节，听说内地的农业收成已有相当复苏。农村已经普遍的回到三自一包的状态。从大家收到的包裹中寄来的东西中多半是腊肉、花生之类，是我们在监狱中多年都没有看到的。然而监狱里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依然的每个月三十斤口粮，每顿端在劳动力手里的还是半罐饭和一瓢见不到油星的水煮萝卜。

这些来自农家的子弟，都亲身经历过「三年灾荒」，他们对少年时代吃草根树皮的日子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明白，是当年人民公社犯的过！只因为在监狱中一滩死水的政治空气下没有说出而已。我经常给他们讲，我们这一代人的灾难是政治的原因。只要毛泽东统治继续一天，老百姓的苦日子就会持续一天。

## （二）祷告

眼看一九六六年的春节快到了，监舍里的人们都会围在一起，议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过年，农村中，自古以来普通的农家都不会亏待这个节气，早早就要从猪圈里牵出早已准备好的过年猪来，整个春节从小年夜开始一直过到正月十五日，讲究的农家都要祭祀祖先，请财神和农神灶神到家，保佑全家在新年里平安，就是杀不起猪的再穷的人也会从亲戚家，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买些猪肉，鸡鸭在祖先面前磕头祈祷。

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正是全家团聚的日子，怎么样都有一刻欢聚热闹的时光，现在，经过人民公社的剥夺，家里能杀得起猪过年的人已经不多，但无论如何这年三十的团聚和丰盛的年夜饭总是免不了的。

现在，这些身陷牢笼的农民，都只有把团聚的梦放到年三十晚上去做。

在监狱中，我已习惯了冷冷清清的独自思念家人。今年的春节是我跨出小监以来，能同许多人在一起共度年三十的第一次。

春节前几天，人们一有空都会围着炊事员打听今年的春节供应，这两年比饥荒年有些改善，按照当时城镇居民的供应，犯人每人都有二两的猪肉可盼！可是这里的老犯人告诉我，自从建队以来的半年中只吃过一次肉，时间久了，劳动力们虽然晚上做梦都会梦见吃肉，可早已养成了不吃肉的习惯，元旦的时候，事务长就宣布，因为供应每人只有二两，不如过春节时加在一起，大家吃得痛快一点。

现在终于盼到这一天，大家少不了围着炊事员打听，得知今年春节每人有三两肉供应，加上上次元旦的二两，足足半斤了，按说办个农村里常见的土八碗席也就够了。

消息传开，凭添了几分过年的气氛，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还算着这半斤肉如果切成回锅肉，那起码也会吃到镍币那么厚的回锅肉二十片之多？然而，在这种猪肉比山珍海味都稀贵的年代，大家最担心的是不是分足了分量？不但队部的库房因「鼠耗」而打折扣，还会不会发生甘洛农场西西卡中队过五一节，像代昌达那样，把肉偷来埋在煤堆里这样的事？这可是谁也说不准的。

这儿的厨房可不像西西卡四面敞开还选了「监厨」，在司务长当众过称后将肉送入锅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炊事员做了什么手脚。

过年那天厨房就事先贴出「告示」，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厨房的大门紧闭着。

除夕的那天上午，没有上水库，所有的人集中在菜地施了一次肥，下午锺管教吩咐各班组按所划区域「打扫清洁」，扫除完毕，便关上铁门，人们在院子里便被禁止外出，于是几个人便端出了小桌，摆上棋盘和扑克在那里玩，有些人在水槽洗衣服。

农一队从甘洛农场一起调来的人除锺平和何建，我就没有相熟的人了。

锺平波是雅安抢馒头的几个主要参加人之一，他指了指南边那个往常堆放农具的小屋，打听陈力的情况。

我向他索问从甘洛农场带到这儿来的那些书，于是走进他的监舍里取来一本「巴黎圣母院」，那书面已经磨得很烂，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丢，惟独这些书是我们的珍爱，监狱里保存一本书是太不容易的事。

看看已经到了五点钟，几个鼻子最尖的年轻人，在院坝里向大家大声宣布今晚的节目是回锅肉，而且扮着鬼脸嗅着从厨房门缝中飘出来的肉香分子。

早已盯着厨房大门各组当天分肉的值星，已将分肉的菜盆洗净，只等大厨房领取饭菜的窗口打开，便端着盆子去完成这最精彩的节目。因为听说每个人的肉平均足有半斤，一个组有七八斤肉，生怕一盆子装不完，所以都准备了两个。

五点半钟，厨房的窗口终于打开了，炊事班长站在那窗口大声向坝子里宣布，各组先把盆子贴上组别，便将它们递进去，说是一次性把肉分完，等分完了肉，各值星把肉端到所划定的圈子里，再依次排轮子到窗口领取罐饭和「油煎菜」。

可是，当回锅肉刚刚分光，各值班员端到自己的盆子以后，便有人在窗口下吼道：「怎么搞的，本组二十个人，每人半斤，足有十斤肉，光肉切碎成片后就可以装满一盆子了，可现在，那菜盆里看到的全是地瓜片，大半盆就装完了！」他这一吼马上就有几个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那炊事员心里有鬼，只是当作什么也没听见，躲进厨房关上了门。

等到大家将自己得到的那一份端在手里，细细数着碗里的肉片，坝子里沸沸扬扬地吵开了。记得我那一次所端的那份，除了六点肉外全是地瓜片，地瓜片与肉在不经意看时颇为相似，炊事员真是精于以假乱真那一套！可是还是被久未见肉的人当场截穿了。

有人端着拿在手里的那一罐，看看别人拿的是不是都一样？经过一番比较后，便端起了自己的那一罐到队部办公室去找值班的锺管教，数着地瓜片里的肉给他看，锺管教只好走到坝子中间，装出很关心的样子，去看那些来告状人端给他的罐子。

突然，他在第三组的监房门口停下了脚步，在那门口处，锺平波正在门口用木箱子垒成了一个高高的「台桌」，「台桌」正面的木板上正对着坝子，贴着一张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毛泽东画像，画像左边，竖着一支用松明子点燃的「灯」，台桌的上面，放着他领到的那地瓜肉片和一罐菜饭。

只见那锺平波布置好以后，不慌不忙的看看锺干事正注视着他，便隔着门前的阳沟朝着那肉和画像，跪下连连磕头！一边大声的喊道：「毛主席啊！托你老人家的福啊；今年过三十吃年夜饭，我才吃上你老人家赏给我的三片肉呀！毛主席呀！托你的福呀；没你老人家我怕要饿死街头了。」

边喊边转过身去，冲着那锺管教喊道：「你们还管不管，是那一个偷肉的也偷个合适，大年三十的，名义给我们有半斤猪肉，结果只有这三片肉。」一边说，一边用筷子挑起碗里面的三片肉在那姓锺的面前直幌，一面又念叨着：「毛主席，你可亲眼看到了吧，这大年三十的，我们就只吃了三片肉过个年哪。」

说话间，那垒起来的木箱子不知道受到什么震动，向着天井方向倾翻过去，随着一声落地的响声，那放在木箱上的油汤，跟着那盛菜的铁钵不偏不倚地泼在毛泽东那张画像上，弄了他一脸的菜和油。

此时那个组的组长，一面拉着锺平波劝他冷静，一语双关的说「有啥问题你向管教干事反映。」

天色已经黑下来，被包围的锺干事已被院子里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大家明明是在咒骂监狱，咒骂共产党。陷在重围里的锺管教除了声嘶力竭地想用吼叫镇住大家，但他已经黔驴技穷，农一队的坝子里闹得像翻了天似的。

大约十分钟以后，救火队队长邓扬光，带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两名干事，急冲冲的赶到了这里。

叫开门以后，两个干事拿着话筒向围在坝子里的人喊话。农一队的人本来都是些老实的农民，一见带枪的人进入坝子，很快就被话筒里的喊话所镇住，纷纷回到自己的监舍中，站在监舍的门里面，向坝子里张望好奇的望着事情会怎样的收场？半个小时以后，锺平波被带进了队部办公室，院子里也渐渐的平息下来。

直到十点钟光景，关押陈力的那间是屋子被打开了，锺平波也被关进了反省室。一年以后，就是一九六七文革发动以后的第二个春天，他就为这件事和雅安监狱的「前帐」被判加刑五年，在加刑中说他出身农民，中专学历。

就在那一次加刑大会上，他面对着在场的万名流放者，铿锵有力的回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又过了十五年到了一九七九年，我听说他获得平反，只可惜，我们相隔几十里地，自从我们离开农一队后，就再没见过面。

## 第七节：\*\*农六队\*\*

春节过了没几天，一个早上，我被一个身披风衣、身材修长、年纪大约三十岁，比起其它狱吏来，外表显得文静的中年人唤出了农一队。带上我的破烂行李，跟着他来到了隔着二道沟，仅一沟相望的农业六中队。

这是座刚刚修好的监狱。如果从天空向下俯瞰，整个横贯南北的二道沟，便像夹在东西两边起伏不迭的泥巴群峰之间。农六队就位于这群峰西面中段的一个山头上，不过从农一队向这里看去，却看不出这里隐蔽着一个新建的，专门关押重刑「反革命」犯的中队。

如果把这个隐藏六队的山头，看成一个面东而立的巨人头，那么这巨人头的后脑勺被削平的地方是农六队的建筑群，留下了这人头面朝二道沟的山坡，使人想象到这是人头的「脸」，农六队就将这张脸隐藏在这个小山头的背后，似乎农六队的造型师一开始就要借这张脸，来掩盖今后在这里发生的血腥罪恶吧！我们从羊圈小监出来，经过基三队和农一队足足四个月时间，却没有发现这里隔沟而建的建筑群已悄悄动工。

当然更不会料到，我未来的十三年青春年华会埋葬在这里。

我在「风衣」的带领下进入这片建筑群时，监狱的围墙还没有筑，这片建筑群的南北和东西方向都超过一百公尺以上，周围是靠西南北三排土墙平房，与东面那「脸」后部削出的最高足有十公尺的土坎围成的，围在中间几乎是方形的坝子，足足有五千平方公尺以上，这便是农六队的雏型。

我被「风衣」带到时，坝子里静悄悄的地，除了几个人在东北角上修筑未修好的围墙，坝子中间到处是一堆堆的积土。坝子中央没有一个人，我在坝子里等了大约半小时，等到「风衣」从队部办公室办了交接手续后，便在他的指定下将自己的破行李，搬进了北面那排监舍靠西的第一间监舍里，监舍也像农一队一样，通铺上铺着稻草，四方的土墙围成一个口袋屋，光线十分的昏暗，从铺草中散发出一股霉气。

那铺上已住着几个人，此刻他们上班去了，我在铺上放下了自己的行李后就走出监舍门。

靠西边的那一排房子一共十五间，靠北面的那一排，也就是我搬进去的那一排也是十五间，靠南边那一面，中间一道宽八公尺高六公尺的两扇铁门上，是一个宽大的岗楼，铁门西侧是一排用作厨房、食堂、保管室的砖墙

房子，铁门的东侧是一排用砖头砌成的屋子，是管教人员的办公室和他们的寝室。那山头未被削去的「脸」，高十公尺的土墩上又修筑了一个岗楼，这岗楼的后面就是瞭望二道沟而修的砖瓦结构的驻军营房，两面两座岗楼中，架着两个巨大的探照灯和两排供机枪用的洞，虎视着下面的整个平坝和监房。

中午时光，工地上收工回来的人陆续到了坝子里，我老远就认出了邓小祝和刘顺森，他们最近才从古柏调到这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除雅安监狱的一段经历，在甘洛基本上分在斯足和西西卡两地，后来在黄联关调古柏时，因为我不久就进了小监，所以同监相处的日子很短。

一见面，回忆这一年多，如像在另一个地方游历了一圈，他们在大监里常听到我和陈力的故事。只是他们听到的不免失真，现在看到我身体长得好好的，都说我因祸得福，并祝贺我健康的回到大家身边。大家又纷纷问起陈力的下落。

农六队现在暂时只有六十几个人，据他们介绍，这里按规划是要集中两百人的编制，全农场刑期在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都要集中在这里。并且还告诉我，今天将我带到这里来的风衣叫李培连。

暂时大家的劳动依然是积肥备耕，除留下了几个人继续修筑围墙，其余的人在附近山梁上铲沷草皮灰，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劳役，将带来严重的水土流蚀。给长江流域带来新的灾难，不过这个损失比起大跃进，人民公社所造成的灾难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整个农六队的坝子还没平整，推土机留下的大量积土没有清除，临时担任中队长的荣老头，将这些平坝子的劳动分摊给几个组，用石灰画出了各组的包干区域，下午收工回来后，驱使大家以「义务劳动」名义继续在坝子里运土挖土，一直干到天黑。

### （一）抗工

这几年，囚粮一粒没增加，各个中队只有靠自己种的蔬菜和马铃薯，一直维持着每顿半罐饭、一瓢菜的半饥半饱日子。像农六队这种刚刚新成立的队，保管室里没有积存的菜，所吃的那点「老梭边」，还是靠临近的农业中队调来的，当年甘洛农场的饥饿顽症好像盯着我们。

大量的体力消耗和营养不良，无异于慢性死亡，山梁上刚刚开垦出来的红色处女地，不像初来农三队土里有未挖尽的马铃薯可找。也不像古柏有马厩里撒落的四季豆可捡。就是逃亡还得翻越东，西两面的大山，因逃亡而冻死饿死在大山上的尸骨随处可见。

我们中相当的人都是从甘洛农场的鬼门关撞过来的，看到这几天「水肿病」在开始蔓延，大家便有了思想准备，与其屈从于皮鞭，接受高强度的劳动而耗尽体力死去，还不如公开抗拒劳动保存自己的体力，当然集体的罢工在监狱这种条件下是要讲策略的，大家必须齐心，拧成一股绳，有了甘洛农场的斗争经验，集体抗工便悄然爆发了。

有一天早上，六组的王士其没有起床，他躺在铺上喊肚子疼。那天正碰上荣老头值班，当六组的组长清点人数时，跑到他面前向他报告，王士奇和罗家文两个人称病没有起床。大值星冯俊白也向他报告说：「昨天下午两个人收工回来就在喊肚子痛，义务劳动也没参加。」

荣老头闻报面带愠色，原本就红光满面的脸变得更加红了，追问道：

「什么病，那么怪，医生看过没有？」随即高声传唤唐启荣的名字。唐启荣从监舍最后的临时医务室跑出来，按照荣老头的命令进了第六监舍，那里面，还在传出阵阵呻吟声。

过了一会，唐启荣向荣队长报告：「两个人不发烧。」监狱规定，为了鉴别劳动力是否真有毛病，一律用量体温的办法来测试。六监舍门口几十个人围观荣老头，看他怎么处置王、罗二人？荣老头已经集合好准备出工的队伍，听唐启荣这么说便厉声喊道：「叫他们赶快出工，今天的任务要完成了才能收工，冯俊伯，你给我下午量方的时候管紧一点。」

在他的催促下，围观者开始向岗楼的哨兵报告人数，列队走出了那两扇大铁门。等到人们都已离开坝子，荣老头便拄着他的拐杖，一瘸一跛地走向六号监舍的门口。冯俊伯跟在他的后面，他的心里最明白两人是怎么一回事？但表面上装着讨好的样子劝道：「你老人家，腿不方便，最好还是不要进监舍了。」



荣老头用眼睛向他瞪了一下，没好气吼道：「你们这些组长也不知怎么当的，昨天下午三点钟我上坡检查，你们那工地上一个人都不见，还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等会儿，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你们十来个人积了五天的草皮，叫你吃下去，你都可以吃下去，今天倒好，索性两个人都病了，连工都不出了。」

说完，便进了那监房，房子黑洞洞的，罗家文睡在第三个铺位上，他正用被子将头死死的蒙着，王士奇睡在最里面的位置上，正侧着身子在叫唤。荣老头走到罗家文面前，用手中的拐杖去挑他盖在身上的被子，却挑不动。一怒之下便狠狠地朝他身上抽了一拐杖，可惜他毕竟装的假脚，比不上张棒棒那河南佬强壮有力。用力抽下去的拐杖碰在王士奇身上却弹了回来，那反作用力反而使他的身子连晃了两下。

「卫兵，卫兵！」他向岗楼上吼道。岗楼上没有马上响应他，于是他拄着拐杖一跛一颠的走到坝子中间去，大声的吼道：「卫兵听到了没有？」岗哨上探出了一个头回答道：「都去场部操练了，这里只留下两个值班的。」

「两个人也给我下来，准备两根绳子，到六号监舍去，把两个睡在床上装病的给我捆起来，押到工地去。」他断断续续地吼道，声音因震怒而颤抖嘶哑，本来就很红的脸变成了紫色，那握着的拐杖，不停的朝地上笃着，笃起了一串的泥洞。岗哨上没有回应他，他站了一会，无可奈何的向铁门走去，不一会门里走出锺干事和余干事来，两个人手里提着棕绳，径直向六号监房走来。

站在门口的唐启荣赶忙向王士奇喊道：「余干事来了，还不赶快起来，免得皮肉痛苦。」说完便悄悄地躲进医务室里去了。冯俊伯站在监舍门口迎着两个管教，尴尬的陪笑道：「两人在穿衣服了，我一定督促他们上工地。」

当两个干事人走到六号房门时，罗家文已经站在铺前，穿上了厚厚的破棉衣，一边捂着肚子还在不停的呻唤，看那样子确实疼得厉害，王士奇也站在罗家文的身后，一边用大毛巾捆在头上，高声的呻唤着头疼，两个拿着绳子的人看到这般模样，显出一种鄙夷的神色。

那一脸雀斑的锺干事吼道：「装得挺像！」那姓余的向屋里四面张望着狡猾地追问道：「人说外伤看得见，内病吃不得饭。你们今天早上吃了饭吗？」罗家文回答道：「没有。」姓余的紧紧追问：「那么饭到哪里去了？」冯俊伯马上接口道：「别人帮拿的也知道谁拿去了。」

姓余的怒吼道：「少给我耍花招，滚，给我立即上工地去。」

锺花脸手里拿着绳子在王士奇的眼前晃道：「你们两个今天就是死也要死到工地上去。」转过身来向门口的冯俊伯命令道：「冯俊伯，人交给你，你负责把他们押到工地上去，告诉你们，听清楚了，他俩那一个敢拒绝劳动，立即回来向我报告，我捆你时不要告饶！」说完转头走了出去。

折腾到这个时候已快十点了，两个人披着烂棉袄，头上缠着破布，像得了重病的病人，拖着似千斤重的脚步，在冯俊伯的监督下向岗哨报告以后，出了大铁门，缓缓向四号梁子走去。

四号梁子上一片由拖拉机翻出来的处女地，像一个光秃的山包上顶着的一片红土，四周大约三十公尺宽的环行草地包围着它，活像一个秃头巨人头的四周围留着一圈乱头发一样，六组一共十六号劳动力便在这圈草皮上劳动。

荣老头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将这些带着泥的草皮铲起来，再运到那刚刚开垦的土地上，隔着一定距离堆码起来烧制成草皮灰。三个人从远处望去，那四号梁子分明只有五六个人在劳动。

当冯俊伯带着两个病号走到时，邓自新说道：「怎么样？没有稳住，还是被赶了出来？」那王士奇把自己的头上包的破布扯了下来，坐在地上苦笑道：「还差点挨了绳子，那锺麻子凶得很。」文廷才却在一旁接口道：「怕什么，今天他真的捆了你，明天我来，我就不相信那荣老头，锺麻子捆得服六队的两百号人？」

「对，大家想想看，甘洛农场死那么多人，还不是因为那些怕挨捆的胆小鬼拚命的去挣表现，结果那些死的人那一个不是肿得像水棒一样。」「对，我们干得越多，越死得早，大家一条心，看那个锺麻子把我们咋个办？」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冯俊伯看了看工地上的人问道：「时间恐怕差不多该换班了」，接着又说道：「你们每个人干什么都要把稳一点，只要不出事，摆平了，少找麻烦怎么都行，你们也替我想一下，组长不好当啊！」说完便朝左面的山沟里走去。

这盐源二道沟，两面山包上，被雨水冲刷出来的山梁之间深沟两侧，分布着许多像人工挖出的地洞，这些凹进地里的泥洞上，都有可遮雨的「帽檐」，大的泥洞可以钻进六七个人，小的也可以藏住两三个人，人藏在里面可以望见外面，而洞外的人，除了正面对着洞口，任何其它的方向都不会察觉洞里隐藏着人。

风季到来时，我们就仰仗这些老天赐给我们的洞穴，在下午狂风大作时，用以躲避狂风对我们的摧残，那时，在「争生存」这一点上，各组的成员保持着空前的一致，连组长们也在内。

大家达成协议，下午大风起后，便将一个大组划成两个小组，一个组的人在工地坚持「顶风」，另一组便在洞里休息，两个小时一轮换，如此做法，主要是蒙队部的眼睛。倘若站在监狱的大门口，远远的向山梁上无论那一个工地望去，都可以看到那儿始终有人在劳动。

大家藉此保住体内的热能尽可能不被狂风吹走。为了使洞里保温，大家还从牛棚边的草树上，弄了些稻草将洞里的地面上铺好，人还可以在上面睡觉，不过饥饿的时候，人是难以入眠的。年事高的国民党军官，脱了产，白天不出工地，就在洞里专门给大家讲「三国演义」。

冯俊伯和文廷才走下左面的山沟，走进第一个泥洞时，只听见徐伯威正在讲，袁绍和曹操的官渡之战，洞中正响着他的声音：「袁绍攻打许昌不克，见曹操放弃了白马镇，引兵延津渡口，摆出渡河架势，袁绍不识此计，率主力西进阻止曹操渡河，不料曹操虚晃一枪，亲领一支轻骑兵奇袭白马，包围了袁军驻守白马的大将颜良，关云长力斩颜良于乱军之中，白马之围遂解。」

这徐老头原是范绍增手下的一名少将参军，成都人，被捕前还在四川大学哲学系教过「尼采」课，颇有些资历。加上狱中平时忍字当头，常常给管教们介绍些当年老成都的佚事，颇得队部管教们的好感，不管是当兵的还是狱吏们如何飞扬跋扈，他都能装出一付笑脸唯唯诺诺，使人无法猜测他的内心。

入狱后他很少参加体力劳动，干些收方，清点人数或看棚之类的「轻活」，连许多一贯靠汇报情况讨队长欢心的组长，都很羡慕他。

冯俊伯走进山洞，便对徐老头笑到：「讲话费精神，你老人家也该歇歇嘴了。」一面把自己装开水的大盘子递了过去。洞里的人知道，到了换班的时候了，便都站了起来陆陆续续的走出洞去，一直到换进来躲风的人，重新将洞子填满。徐伯威喝了水，等大家落坐以后，故事又重新开始。

王士奇装肚子疼的做法迅速的传染给了四组，过了两天四组的组长在早上出工时，向荣老头报告说：「昨晚本组又病倒了三个人现在还躺在床上喊肚子痛。」没料到这一次，荣老头并没有发火，只是瞪了他一眼，口里却嘀咕道：「什么肚子痛，分明是肚子没填饱。」旁边的张清富补了一句：「还是荣队长英明。」

狱吏们能够承认饥饿，向流放者作一点「宽容」，比起甘洛农场和古柏的管教们动不动就穷凶极恶的殴打流放者，也算是一种「转变」。

渐渐的，整组的人便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偷偷地从大风肆虐的工地上溜了回来，蜷缩在各自的监房里。除非荣老头查房查到了，用他的拐杖吆喝着将偷偷回来的人重新赶上山去，或者叫他们在院子里清除那些积土。

有一天下午，三点钟风实在太大，刮得人透不过气来，几乎全队的人都回到了监舍。荣老头在坝子里一面吼着，一面挨着监房把人都赶下铺来追上山去。

当荣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跛的走了出去，屋里就剩下我和徐伯威两人。徐伯威走到监舍门口，向外望瞭望，确认门外的过道上已经没有人时，才把监门轻轻掩上，走到我的旁边，神秘的问道：「你看过最近的参考消息吗？莫斯科和北京都闹翻了，赫鲁晓夫最近在戴维营点着毛泽东数落他！」

我摇了摇头，望着这个平时行为说话都十分谨慎的老头，从来没有露过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的话，今天居然道出内心里还有一个隐藏的世界。

只见他在自己铺位的草堆里翻找着什么，不一会便从乱草中拿出了几张已折得很旧的小报，并向我严肃地说道：「这是我从队长办公室里带出来的，你看后不要再传给其它人，直接还到我手里。」

参考消息，是中共的内部读物，但毕竟不同于普通报纸，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上面摘登着世界各大通讯社所发出消息的摘要，其眼界比国内其它报纸宽得多，有时候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可供分析思考的见闻来，所以这是我们千方百计弄到手的读物之一，并没有这徐老那样的神秘和少见。

于是我将报纸接入手，一面向他点头说：「放心，我看了马上就还给你。」当我接过报纸刚打开，他又将身子靠近我，附在耳朵旁说道：「陈力是我们在成都监狱里的老朋友了，我来场就听说你和陈力关在小监里，其实，你们的看法都是对的，中共早输掉了民心，他们不会长久的，最近你们还听说到什么好消息吗？」

我望着他那微泛红光的脸，心想又是一个将内心埋藏很深，用韬晦对付共产党的人。从此，我们变得亲近起来。

## （二）思想改造试验田

逃工抗工的人越来越多，为了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荣老头将中队所属的八名干事全部分摊给每一组，上下班都由分摊到组的干事领队，并且负责守在工地上进行监督。

同时，通知岗楼上的驻军，派更多的巡逻士兵加强查房，一但发现有无故逃工的立即拉到院坝里罚站。但是，这并没有减少逃工的势头，负责领队的干事不会在工地上挨风吹，岗楼上的驻军也未必按他的布置去做。

有一次，被荣老头抓了一个全组不出工的「典型」，老头子亲自招集会议，把全组人喊到院坝，坐在那里开会「找原因」。其实是让逃工者狠狠被风吹刮着，以示惩罚。

全组人裹着加得厚厚的棉衣，个个将头缩在棉衣里，任凭老头子狂怒的吼却无人理睬他，一直坐到晚上九点钟，整整几个小时，一无收获的散会。六队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犯人，一直维持着原来那种死气沉沉的状态。

直到三月份，陈力也从农一队的小监放出来，押到了这个中队。

李培连当天晚上，主持了中队建队以来第一次十分「正规」的点名仪式，他拿出厚厚的点名册对全队二百多号人进行了编组，我和陈力连同本农场十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历史反革命」，集中的编成了一个小组，他自任为这个小组的「指导员」。

第二天全队停工一天，按照他编的点名册，将全队的人按他所编的组重新调整了监舍。下午，其它的组出工后，却把的我同陈力以及新编组的成员留下来，他从队部办公室端了一张靠背木凳，坐在监舍中间，主持了第一次学习会。

「我姓李，李培连，从现在开始，按照管教科的决定，将你们编成了一个试点学习组，由我负责你们今后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改造。」

「这个队已经成立一个多月了，暴露出的问题特别多，你们都是投入改造多年的老犯人了。我看，思想上还有很多问题，当然，劳动是改造的手段，但光有劳动是不够的，我们共产党人向来以改造人的思想作我们的宗旨，思想没有改造好，劳动也不会收到积极的效果，所以从现在起，我就在这个组做『试验田』，想促进一下诸位在坐的思想改造。」

坐在我旁边的陈力低声说道：「不知道当局又在耍什么花招？」

这两年，我经历了古柏，二道沟小监反省室，基三队、农一队，绝食斗争就达两次，与管教科可谓面对面的斗争。看来今天这位指导员与粗俗的狱吏相比，确有些异样，是中共对我们这些人变换什么手段，还是政治气候的变化，我们暂时难以预料。

「我看这人未必不是更加阴险和狡猾的人。」陈力从鼻子里哼道。

李培连好像已经察觉出我们在议论他，看了我们一眼，继续说：「你们这个组一共十三人，暂时由周学祝担任学习组长，因为现在还处在备耕农闲时间，下午风大，加之，你们的年龄大多都已五十岁以上的人，所以从现

在开始，一段时间上午继续出工，下午则留在监舍里组织阅读和讨论。

学习的材料是《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的有关文章，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学习方法是边读文件边对照，联系国内形势和本人的思想实际，谈谈你们的认识，允许并希望大家能各抒己见，讲不同的看法。」

学习便这样开始了，我们这个组除了我和陈力外，其它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已在公众场合亮相的「狗」们，例如朱国骥、王德权这些都是共产党刀下留人从狗洞中逃生过来的人，为共产党的强权折服，也想从监狱的狗洞里再爬出去。所以这几年一直扮演劳改积极分子角色。

其余的例如李克由、徐柏威、卓元民、母建武等人，对于自己成为共产党阶下囚，蒙不杀之恩已吓了一跳，但看到共产党强奸民意的种种劣迹，心存芥蒂。人到屋檐下除了当顺民，几个泥鳅还能翻大浪？所以在这种「不满」和「无为」两种情绪支配下取了壁上观态度。

这种人会在良知支配下，趋向我们，所以对他们也只能取和睦相处的态度。而花费口舌和精力去对付周学祝、王德权、朱国骥这类人，要改变他们人格上的缺陷，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当然学习过程中免不了激烈的争论，李培连究竟想看什么？他努力想作出一点「思想改造」的业绩呢，还是在接受上峰的旨意？带有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色彩？所以，我和陈力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猜测，带着观察和思考的头脑参加了这场学习。

果然，学习从开头到结束，就是以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的唇枪舌战而进行着。第一天的上午，就按李培连的布置由周学祝宣读共产党宣言。一个小时的诵读，大家倒也聚精会神，我看了看徐伯威，他肯定在想李培连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其实，共产党的派别，一定会在最后表现出来。

周学祝宣读完毕，朱国骥首先发言，这个已经快六十的人，重复着中共的老腔调，从满清末年列强瓜分，讲到日本入侵，他甚至于讲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溃败，讲自己上军校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讲自己的认识和痛悔，最后以原子弹的爆炸讲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说：「中华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站起来！」

他讲话时，唾沫横飞，给人一种激动的感觉。仿佛忘了这么多年来老百姓在中共统治下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或者是他被中共的强权吓怕了，他一点不敢接触四年内战七年革命给老百姓带来比牲畜不如的生活。

听他讲完，陈力再也忍不住了，他列举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以后，说道：「倘若，中共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天堂是在『革命』成功十五年来一个接一个令人心有余悸的运动；是老百姓衣不御寒，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那么老百姓为之捐躯的革命战争还有什么必要？尤其是人们连话都不敢说，否则就要挨打，坐牢，那么中国人谁站起来了？至于原子弹，难道不是老百姓用大量血汗被强迫驮起的战神么？」

接着陈力发言，我补充道：「一个对民族负责的政党，一个对子民负责的领袖，不在于他的口头承诺，而应当对他的行动的后果负责，产生了今天这种后果，老百姓还在继续为这种后果不断的付出生命的代价，却不愿意即调整自己的政策，表现后悔，反而杀气腾腾把这一切上推老天，外推苏联，内怪反革命作乱，继续用罪恶掩盖今天更大的罪恶，这样的人迟早要受到历史的清算。！」

争论如火如荼的进行下去，李培连一言不发，在思考还是想借我们这两张嘴，来宣传他自己想说而又不说的话？至于像徐伯威这些老于世故的人听得来非常起劲，因为我们所讲的可是他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实话。

学习的第二节课，开头仍是由周学祝宣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九年前我在校园里第一次听到传达这个讲话时，完全弄不清讲话人的真实动机，当时欧洲发生的匈牙利事变和波兰独立工会，已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我们这些幼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还蒙在鼓里。

对这一曲美妙的迷魂音，很少人会去探究其中的原因，大学生们所接触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的欧美口号，没有几个能说清楚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包含的内容。政治课每天向我们灌输的全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如何美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可悲的是，谁也不知道今天苏联究竟怎么了，当时我们已听到了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给俄国带来的灾难。

然而，无论是恐怖还是激情，都迅速被今后的社会主义结果所纠正，野心家的狰狞嘴脸也在轮番的「实践」中暴露无疑，曾被欺骗和恐怖所征服的年轻知识群体立即分化，一部分变成了疯狂的专制主义的侏鬼，一部分则变成了专制压抑下的反抗者。就连邓拓、吴晗这些共产党的才子们，也会从大鸣大放时期的「左派」积极分子，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将。

就以我们面前这位正在主持我们这次学习的，原雅安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李培连，当年曾充做该校的右派学生的屠夫，当今重新学习这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他会情不自禁的说道：「这几年确实出现了灾难，许多人饿死了，人民心头压抑的话不敢说。」

看来，李培连比朱国骥，周学祝之流真实多了，这是他从中共的上层得来的解脱，他说「极左的思潮在共产党内占据了上风，革命嘛总有左右摇摆的时候，主流还是好的」，这一番话的言不由衷，会在今后实践中继续得到证实。

「所以，我主张这次学习，大家要讲真话，只有说真话，才能接触自己的思想也才能谈到思想改造。」这是他的言不由衷的苦恼，还是敢于去触「文字状」的禁区，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于是他在这次学习上提出了三个让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一，该如何看待中国眼下的经济困难和饥荒，这些阴暗面是十个指头里一个指头的问题，还是该根本否定三面红旗？第二，中国眼下的困难是不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难免的过程？第三，压制各种反社会主义言论是革命的需要，还是不讲民主施以霸道？这三个问题反映出来了，李培连多少有一点讲理的成份，而讲理是独裁主义绝对忌讳的「禁区」。

不过，倒可以看出他迷信毛泽东的天真，李培连倘若还保存人的基本良知，总有一天他会认识到，在中国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原来真是野心家玩弄的一场政治骗局，所以当争论继续下去，越使他陷入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学习班」既不能按照他的努力，使我们相信中共宣传没有欺骗，也不可能让我们在监狱中，在他主持下变成公开批判毛泽东的讲坛。

有一次争议达到高峰时，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陈力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我看我们这种小组讨论得不出什么结果，除非我们大家都遵守一个规则，也是我们这许多年来实际的法则：『强权便是真理』，否则我们谁都不会相信，中国发生灾难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不可避免的。」

其实陈力点出这一点，才是中国政治的症结，在这个世道里要么屈服于强权的淫威，中共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要么就当盲人瞎子，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才对。

对这个结论，李培连坚决加以反对，他列举了哥白尼和布鲁宜，以此来证明牺牲于强权的人并不承认强权就代表真理，其实强权是不是真理的问题，是同人性的善与恶同时并存于人脑之中的复杂而奥秘的东西，监狱中的狱吏们也不能在内心世界里逃避善与恶的较量。

如此看来这次学习是李培连们，试图用一种稍有人性的「思想改造」来替代绳捆索绑的棒棒主义。

在这个尝试中，他带着一种天真的想法，来替自己信仰上出现的危机解脱，试图证明毛泽东也承认人的理性和感化。不过，他会在更多的人生实践中明白，在专制主义狂的字典里是根本找不到他渴望的理性的。

奉行独裁的狂人是无法容忍忠言的，迄至今日，独裁者只相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

到此时，李培连可能做梦都没想到，北京城里正在酝酿着一场置他的理性于死地的文化大革命阴谋。虽然这位在九年前曾充当「右派」学生的杀手，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他的理性没有扎扎根在专制主义的皮上。

## 第八节：\*\*参观\*\*

正当我们的学习刚进入辩论高潮，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农场接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的通知，要所属的所有劳改单位按照规定的比例，挑选代表，去成都参观由公安厅所组织的「形势教育」专题活动。

参观的内容包括成都的市容，以及当时正在青羊宫展出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五十五面红旗全国巡回展览」和「全国三新产品成果展览」。

中共建政以来，曾组织过几次在押战犯到社会上参观，其用意不外乎是向在押人，展示国家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加速对他们的洗脑，并借此来向国际社会显示他们「劳改」的人道主义，以改变孤立的国际处境。

不过这一次参观，是在国家经历了一次和平时期的空前灾难，一场大规模的饥荒刚刚「复苏」之际，想借犯人之口，来「歌颂」被国内外普遍谴责的「三面红旗」，带有明显的打肿脸充胖子这种自欺欺人目的。

按照省劳动厅分配的名额，盐源牧场派赴本次参观的总名额共二十二名。场部分给六队的名额占了三人。而李培连又从他举办的这个改造思想为主的「试验田」中指派了两个人，一个朱国骥，一个便是我，朱国骥是选出来的思想改造好的代表人物，我当然是「实验田」里要进行「攻坚」的人物。

选择我们俩一起参观学习，「全面」的反映管教科正、反兼顾，有一种「效果」上对比的考虑，也是加强监督，及时收集反映的一种手段。

### （一）刘顺森

剩下的一人，李培连选中了刘顺森。一九六三年从重庆监狱调往甘洛途中，我们在雅安监狱抢馒头事件中相识，但一直分在两处，彼此还没有朝夕相处的机会。这一次相聚，我有机会详细知道了他的出身、家庭等等。

他出身工人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工人，用共产党的话说，祖宗三代都是工人阶级，本属于「革命」依靠对象，就因少年时代读到苏共第十九大上，赫鲁晓夫所作反斯大林秘密报告中，少年敏锐的他，恰对中共产生相反的认识。

后来他又从姐姐在重庆市青年团机关工作的便利，得到了当时从来没公开的党内「机密」材料，更深的认识了中共内部的虚假和残暴。加上一九五八年他亲眼目睹了中共对知识分子无理的摧残，以及粮食定量的灾难性结果，与陈力可谓同一类型的人，成为毛泽东主义的叛逆。

一九五七年，仅十五岁的他，因为在街上散发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传单，涉及当时中共在粮食问题上的「秘密」材料，而被认定散发反革命传单，被抓进了重庆市少管所。

李培连评价他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狂」，这次在两百人中选中了他参加成都的学习，足见管教科对他的重视！

三月十三日，按照场部的通知，全农场选出来的二十二名代表集中在农一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参观前学习，我们三个人带上换洗衣服和毛巾，跟着锤管教再次来到农一队。

离开这里只有两个月，锤平波除夕之夜在这片坝子里的精彩表演，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同他交谈，我和刘顺森商量后，决定趁此机会同他聚一聚，那次相聚彼此非常坦诚。

自从黄联关调到西昌，锤平波一直就在农一队，这因为他的刑期较短，而我和刘顺森刑期都是十五年以上，大家讲了一些分别后的见闻，讲到对这次参观的看法，他态度非常冷淡，说农一队近三百号人仅只有一个名额，而且是一个平时负责出工集合的大组长，用他的话说：「这是做给别人看的，没什么意思。」并且说最近从成都来的人，讲到内地情况，老百姓依然穿补巴衣，半饥半饱度日，所以没有什么可看的。

参观集中的当天晚上，偏偏赶上停电，全场一片漆黑。派出去监督大家的干事一个也没有到，负责这次带队的管教科股长庞玉笃，显得十分紧张，他担心摸黑跑了人就负不了那责。所以赶紧吩咐农一队的余管教，将二十二个人集中在干部会议室，点起了蜡烛，组织了参观第一次点名和座谈。

庞玉笃拿出点名册，点过名以后便叫大家坐谈对这次参观学习的体会，参观还没有开始，「体会」又从何说起？自己被管教科相中，在农场近万人之中，中了这难得的头彩，明摆着要大家对场部进行一番感激零涕的吹拍，对本来就很低下的犯人，受宠若惊，这本就是预料中的事。

坐谈会一开始，朱国骥迫不及待的放了头炮，接着，依次都表了态。说些不辜负之类的奉承话。惟独只有我和刘顺森以及古柏来的代表，始终缄口沉默，因为讲违心话，实在有悖于这么多年的亲身体验，事实的伤痕实在

太深了。这恐怕绝决不是一两次参观所能抚平的。本来沉默表示我们的反对已经是很策略，何必在这参观前夕去扫了这位庞玉笃的兴？

可偏偏他指明点姓的要我讲讲我的感受，既然如此，我也不能不识抬举，便从容的说道：「首先声明，对参观这件事，我本来就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也不会说感恩戴德的话，只是希望我在参观中看到的事实，能与报纸上的宣传相一致就好了。」

那庞股长早就习惯了我这种不冷不热的反调，倒是朱国骥却认为，我应该体会到这是管教科对我的关怀。真没想到，在农六队的较劲他还觉得不过瘾，现在居然到了这里还要纠缠我玩。「感恩戴德」显然被他理解为我对他的挖苦。

不过，事实很快令人信服地证明我的冷淡是对的，按照这二十二个代表估计，管教科会对我们出去参观学习的人，生活应有所表示，大家猜想在这短短的几天参观中，不会再吃每天一斤的定量，其次至少也要在这几天内让代表们不受约束，晚上可以住几天旅馆什么的，以显示政府对我们的宽容和信任。

到了第二天庞股长便将二十二名代表分成了五个组，每个组都安排了一名管教干事跟班，出发前首先就向我们宣布本次参观的纪律，规定参观期间禁止单独行动，有事要离开组必须经本组管教干事同意，否则擅自行动则以逃跑论处。看来我们仍要在枪杆子监督下完成「参观任务」。

庞股长宣布的出行纪律，反映出对大家的不信任，原先欢天喜地的个别「代表」被泼了当头一盆冷水，第一天发言原先激动的情绪已经熄灭。

至于生活，庞股长继续宣布道：「在队上定量的基础上，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食。」原先打算吃几天饱饭的人失望的看着他。散会后，看看时间还早，有钱的人都一齐朝场部走去，在小卖部买了许多饼干、干粮之类的东西带上。

三月十六日一大清早，二十二名「代表」便坐上了一辆带棚的卡车，在另一辆吉普车里载着五名管教干事押送下，卡车向成都进发了。车行途中，大家没有说笑，开始集中那天的新鲜气氛，被庞股长宣布的「纪律」和森严的守备彻底破坏了。就连情绪最亢奋的朱国骥也拖拉着脑袋，在拥挤的车里一言不发。

当然庞玉笃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参观者们在想什么，他们向来是奉命办事，最大的忌讳便是有人从他们的手底下跑掉。

于是，刘顺森开始向朱国骥取笑道：「别垂头丧气的，你当了上万犯人的代表够体面的？」对方报以苦笑！

第一天行程，中午在平川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停车吃午饭，这是我们到盐源来第一次进馆子。原先已听说三自一包以后，农业开始有点复苏，进饭店再不像原来那样，除了交纳粮票和配给一瓢连油星都看不见的牛皮菜外，便只有凭粮票才能买到的「高级饼子」。今天这一顿吃的是玉米面与米拌在一起的「干饭」，三个盘子里装的虽然都是些青菜萝卜之类的东西，但已能品出「油炒」的滋味，每人四两饭，装了一个「冒儿头」，吃下有饱感。

能体面的坐在饭馆里，同干事们异桌同餐，使朱国骥又笑逐颜开起来，吃完饭上车以后，大家还猜今晚西昌会不会住旅馆，因为饭馆都准「代表」们用食，为了体现「参观」的特殊需要，住旅馆又怎会成一件难事？古柏来的两个年轻「代表」还大谈「自然灾害」时期的旅馆，是凭户口和「票证」去住的，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下午的旅途显然活跃了许多。

可是，当我们到达西昌时，敞篷卡车却径直的开到了西昌看守所门外，那时大约是下午五点钟光景，天色尚早，几个年轻人苦苦要求庞股长允许他们能「集体」去西昌街道上「参观」。并说了一大堆为更好完成本次学习任务的好话。

可是这位庞股长毫不犹豫地我们将我们赶进了那监狱的铁门里。还向西昌监狱的守门值班干事交代了总人数，「交差」完毕后，吉普车开走了。

我们这二十二个盐源来的囚犯，排好了队，由那接收我们的干事带领着钻进了黑洞洞的铁门，来到两间显然是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监房里，那里面扑来一股臭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桶盛满尿的罐子敞开放在屋角落里，

地上铺着草，看样子是关押犯人腾出来的监舍。

在车上讨论得兴高采烈的小伙子不开腔了，「旅馆」岂是我们住的？等待我们一路的肯定就是沿途这样的带臭味的牢房。还好，不一会炊事员给我们挑来了菜稀饭和二十二个碗，大家喝了稀饭便倒在那草铺上睡去，半夜里仿佛听到隔壁监舍里传来的镣铐声、咒诅声。

第二天的行程，几乎重复着第一天的样子，晚上又在石棉的看守所里过了相似的一夜，几个年轻人做的「旅游」梦彻底破灭了，如果此时庞玉笃再要组织「代表们」谈「参观前的感想」恐怕就很实在，就不会有人发表「感激」政府的人道主义发言了。

第三天晚上到达雅安时，天色已经很晚，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三元宫，进入雅安城以后，我便从汽车后面开的棚窗口，下意识的张望，想重新回顾一下三年前抢馒头的地方，却没想到汽车在雅安城里，拐弯抹角的把我们送到一处高大建筑的铁门钎门外停了下来，我们将头探出车棚张望，只见铁门旁边的门灯下面，挂着醒目的招牌「雅安砖瓦厂」。

恰好那一天又正逢星期六，铁门紧闭，庞股长一边打着门，一边向黑压压的大楼里喊了好一阵子，才走出一个老头，他一面走来，一面在揉着惺松的睡眼，当庞管教隔着钎门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亮出证件，他才慢腾腾的打开了大门。

汽车开了进去，在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我们下车后，庞股长带着命令的口气，要看守人赶快通知值班干部，守门人回答说：「今天星期六，大家早就回家了，办公大楼里没有一个人。」一边说一边还埋怨说：「为什么你们来前不早一点通知？现在上那儿去找人？」

庞股长只好指着我们这二十二个人向老头说道：「就打开你们的会议室什么的过一夜，明天还往成都赶路。」商量了好一会，我们被带进了一个宽大的屋子里，里面是一排排的靠背长椅，看来今天我们只好将就在这儿「和衣而眠」了。

住处找到后，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我们又走出大门，叫开了近旁一个小饭馆，店伙计为我们重新捅开了已经封好的炉子，在那里每人吃了一碗面。

当我们回到今晚落住的大房间里，庞股长照例把我们交给了守门人，便离开那里，开着车另找住处去了。

我们被锁在办公大楼里，打开那屋子的窗户，庭院里将一股股玫瑰的芳香送了进来，我从窗向外望去，依凭着月黑头，可以分辨出那走廊边黑压压一片的灌木丛，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第二天，已经八点钟了，所有的二十二个人已经醒来，将就着在安在走廊角落的自来水龙头，取出毛巾洗了脸。走出那屋子，其余房门都上了锁。便走出这栋大楼的门，沿着石梯走了下去，石梯的两侧是花圃，里面栽满了玫瑰和月季，昨夜的芳香就是从这里传出的。玫瑰的花藤覆盖了四周的墙角，整个环境倒十分幽静，院子里静悄悄的毫无动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只是奇怪昨天那开门的老头却没有看见，而昨晚进来的大门上一把大锁静静的吊在那里，看样子那老头还在睡觉，这老家伙也真贪睡，看看挂在办公室门口的那口大钟，已经是九点了。

「组长们」没有一个露脸，倘若此时，有人乘机不告而别，这庞股长的约法三章便只好落空。最令我们感到难受的是，昨晚填进肚里的那碗小面实在不抵事，胃里空空的直叫，本无散步兴趣，但是，干巴巴在大门上等，还不如走走。

于是我和刘顺森信步沿着那灌木夹着的过道向里走去。两排平房中一排被变电室占去，空着的另一排好像是车库，上了锁，四周的围墙很高，上面架着电网，估计这里原来可能是规划作犯人监舍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这么做。从墙头上望去，大约两三里远是砖瓦厂的烟囱，原来真正的砖厂并不在这里。

耐着性子，我们一直等到十点钟，依然没有一个人来，仿佛这二十二名代表被人遗忘了似的。几个年轻人早已按耐不住，扒在钎子门的铁条上朝外面大喊「开门」，嘴里咕噜着牢骚和怪话，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便相约着合着拍子，一齐合声大喊！附近楼房里的老百姓，惊奇的打开家门朝这里张望。



看看挂在办公室楼里的时钟已经十一点钟了，人们在墙角找到了一些砖头，不知谁还找来了一根铁棍，不管三七二十一，怒气冲冲的刘顺森对准那铁钎子门上的铁锁砸去，门被砸得乒乓作响。

一个人影在大门外出现了，几分钟后，几名全副武装的民警赶到了铁钎子门外，二十二张嘴开始向民警陈述事情的经过，说我们是到成都参观的代表，昨晚把我们关在这里，饭也没吃，现在快到中午了，还不见带队的人来。还说：「如果我们趁大楼里没人，把所有办公室偷个精光，你们上那儿去找人？」警察们正在商量怎么办，庞股长的吉普车在这个时候开到了。

大门外也围了一大群人，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庞股长下车后，故作惊讶的问道：「昨晚我已经跟他们的队长在电话上联系好了的，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没人来？」又问道：「昨晚开门的那个老头呢？」围观人群中的一个老太太发话了：「他一清早就走了，我看到的。」

刘顺森按不住喊道：「这些国家干部，吃饱了肚子，平时什么事都不干，星期天只顾自己寻欢作乐，连自己的办公室和正事都不干了，我们这二十二个人可是饿着肚子被关到这个时候。」那庞管教立刻板起面孔，隔着铁钎子门苛责道：「你一个犯人骂谁呢？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吵闹撬门？」

围观的老百姓又一阵乱哄哄的议论，听得出他们对这个官僚的横蛮态度颇不以为然。砖瓦厂的队长终于出现了，他提着一大串钥匙，从老百姓围观的人群中挤了过来，费了好一阵劲才把门打开，看样子那锁也不知道被那块砖头砸中，锁心变形了。

铁门打开了，庞玉笃立即把二十二名「代表」重新叫到昨晚过宿的房子里，关上了门，一迭声吼着，要刘顺森明确自己的身份，并且承认今天带头喧闹砸锁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而刘顺森据理力争说，这明明是庞股长一手造成的，大家无凭白故饿着肚子被关了半天，如发生更大的事故，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个人唇枪舌战地在屋子里干开了。

所有同行的二十二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静静地听他们吵架，他们中也许多数人还没有看到这备受打骂的犯人，敢同管教干事们如此顶嘴。

谁不耐烦地吼道：「我们都整整饿了一夜加半天了，到现在还粒米未沾，先把饭给我们吃了好不好？」大家便一哄哄响应，争吵才得停止。我们被叫到砖瓦厂的犯人食堂里吃了饭，这一顿与盐源农场一样，吃的是罐罐饭。

下午，庞玉笃重整力量，由五个组长压堂子，正式的召开了对刘顺森的批判斗争会。会上庞玉笃重申这次参观的「纪律」，强调大家不要以为出来参观，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在他眼里，任何时候只有他们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的份，绝对禁止我们的反抗。

不由分说，当场就以「聚众闹监」的名义，给刘顺森带上了手铐。还说因为念及刘顺森年轻，考虑到参观期间从轻发落。

这可是当年我们看到战犯们参观所绝对看不到的场面，大家亲眼看到这件事的始末，内心再次受到了震动，就连朱国骥都一言不发了，我在临出发前的一番话，果然的言中了。

我们在砖瓦厂就这样多滞留了一天，这天晚上那砖瓦厂的队长总算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派人送来了二十二床被盖，西昌三月底确实相当冷，前一天晚上可以说是冻了一晚上，先前还在唱赞美歌的同行者，也一齐的骂起娘来。

这天晚上我和刘顺森搬了两张长凳拼在一起，背靠在椅背上，一边聊着三元宫抢馒头的那晚故事，大家都围拢来津津有味的听着，忽然，刘顺森理了理手上的手铐，从长椅上站起来用那手铐敲击着凳子的靠背，润润喉咙引亢高歌起来，仿叶挺「黑牢诗」自编歌辞唱道：

「带铐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男儿从此去，壮士不回头。长夜盼天明，拂晓待鸡鸣。」唱罢，声音里带着哽咽，满屋子里的人都鸦雀无声，也许触景生情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何尝不是带着沉重的枷锁，行进在这漫漫流放地的长夜之中？到了这个时候，参观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开心的。

## （二）带着手铐参观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上车时，庞玉笃总算给刘顺森下了手铐，这原因当然是给他自己留面子，眼看就要到成都了，他总不能押着一个戴手铐的人来参加这堂堂皇皇的参观学习吧！

下午四点钟左右，汽车经过新津后沿着平直宽阔的公路奔驰起来。同车的人中家在成都的就有五六人，回到自己家乡，便开始相互指点着窗外，讨论这一带的地名和小吃习俗，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

川西平原的阳春季节，比之盐源大不相同，春分已过，平坦的农田已点点翠绿，这正是栽秧季节，农夫们在田里栽插的镜头，迅速唤回了六年前我在南桐农村里所见的印象，潜意识中，渴望看到面前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心底里绝决不希望那灾难岁月的农村继续持续下去，即使毛泽东还没有垮台。因为灾难的直接承受者难道不都是普通老百姓么？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

六点多钟，我们的车终于驰进了宁夏街监狱，与三年前充军甘洛离开时相比较，阴暗的牢房，碉楼，老天井和狭窄的过道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比三年前，现在监狱范围扩大了，可以来回散步和活动，不像上一次戒备森严的整天关在牢房里不敢出来。

这一次我能独自出入监房，走出狭窄的过道，走进右前方的操场，还可以从那里转过墙角走到很大的广场中。那儿塔着戏台，是提供文艺演出和开监狱大会的地方，我默默看着那宽大的戏台，心中想，多少人从那上面下来以后，便被送上了杀场，或送去流放。

两天以后，各地的人员陆续来齐，监舍里已住满了人，白天天井的小院子里围着一堆一堆人群，彼此交谈互通各劳改队的情况，气氛颇为热闹。

在过道出口的右前方那一片操场中，聚集满了到会的参观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穿着奇异，装扮特殊的少数民族「代表」，有藏族、苗族、彝族。来到这里他们都穿得异常鲜艳，还为大家传讲少数民族的语言，例如「吃饭」怎么讲，「你好」「再见」「走路」等等简单的词汇，吃饭时拿出他们带来的特备黏粑奶茶。为大家表演「吃抓饭」，宁夏街一时变成了中华各大民族的监狱。

我本想同他们交流，看看在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着多少残暴的血腥压迫，中共统治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安宁过，要他们驯服的接受毛泽东那一套「社会主义改造」，必会遭遇反抗。这几个「代表」兴许就经历过被称作「平定叛乱」事变，会向我们提供真实的内幕，了解毛泽东在民族问题上的「霸道」。可惜，一来语言不通，二来到处都是当局的耳目，还别说交谈，便是同他们接触久了都会受到干预。

搬着指头入监已过去七个年头了，在这七年中，我们吞下了灾难的最坏苦果，经历了那么多饥寒交迫和惨无人道的折磨，已远不是七年前的学生时代，可以被假象所蒙骗。我会带着七年炼狱中已成熟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进行有效的「参观」，我会躲避不应发生的麻烦，我会抓住给我的，这种实地观察和体验社会的机会，得到真实可靠的东西。

第三天，全体参加本次活动的上千名代表，在广场上集合，本次参观的组织者宣布，参观学习的布置和日程安排，整个参观活动预计在一周内完成，整个参观人员划分为两个大组，分头进行。

我们这个大组，第一天重点参观春熙路的商场和菜市，及人民南路的市容建筑；第二天参观新建起来的文化宫，以及骡马市的市场和商场；第三天便是去青羊宫参观正在那里展出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五十五面红旗巡回展览；第四天便是去人民公园，参观那里展出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工业成果展览；第五、第六天便是分组讨论和学习，总结各人参观心得和体会。

庞玉笃欢迎大家投稿写文章，同时宣布参观期间七天内，每晚都会在广场放映电影或成都监狱演出队排练的文艺节目汇演。

整个参观都让我们坐着公共汽车到达安排的目的地后，便下车排着队列有次序进行，允许在市面上自由行动的时间几乎等于零，我们同市民最多也只能打打招呼，不可能同他们交谈，四天的参观无非是让我们看看，自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贯彻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

可惜，事物总是存在两面的，用之过滥的「思想改造工作」便成了「假、大、空」，至于农业学大寨，则是一窍不通农业生产的毛泽东，坚持他的根本行不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一精品！他想以此来掩盖推行三面红旗

的惨败，为三年的饥荒和灾难辩解，也是夺回那「三自一包」占领的「农村失地」。至于三新展览恐怕只能作「形势大好的陪衬。」

我们就这样坐着公共汽车，从位于成都市中心西北方的宁夏街出发了。同六年前我到孙家花园从囚车里掠视灾荒的那种萧条相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成都市容、市场确有些起色：商店里有了货物；肉店里也挂着猪肉；菜市的摊位上摆着各种蔬菜和副食；食店门口不再有长长队列排着焦急的市民，倒是店小二吆喝招揽着客人们用餐。

不过，要讲「繁荣」却绝对不够格，堂堂四川省府，连整齐的道路和高耸的楼房都拿不出来。就以肉店里挂着的大小肉小块来说吧，老百姓只能凭着每月半斤的肉票，才能用平价买到。若要吃「计划」外的肉，可不是一般贫穷的市民所能买得起的，当代中国人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是在无产阶级暴政压迫下养成的。靠老百姓节衣缩食换来的市场「繁荣」，不是太可悲了么？

同时「繁荣」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相对三面红旗时代，可以说今天比那时「繁荣」，但是能将时间的长河纵向延伸而比较么？「旧社会」有这么穷吗？如果同「黑暗无比」的旧社会都不敢比，能说「繁荣」么？再比方说，同国外比得么？被中共称为「水深火热」的台湾，就无法作比了，那里除了时时传来炮声，老百姓可是什么也不知道啊。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充其量只能像馋猫似的，嗅嗅那副食框溢出来的诱人香味。或者在挂满西服的商店玻璃橱中，对身上那一套临行时，场部统一发放的新的劳改服自感猥琐，如此「繁荣」倒是凑合了几个年轻的「代表」，他们用家里寄来的钱，买了许多的「蛋黄酥」和「鲜花饼」，塞进早已准备好的包里，准备拿回去美美欣赏几天。

我忽然想到，面前这「盛世」分明是三自一包这种对农民松绑换来的，是牢牢控制着统治大权的老魔头，颇不以为然的，因为这盛世带走了他经营多年的社会主义「大好形势」，有朝一日老魔头元气恢复以后，会不会像一阵风一样，卷走面前的不甚富足的繁荣，重新回到过去？

使我感到「浓厚」兴趣的，是「农业学大寨」展览。我是学生，生来就有一种尊重事实的习惯，毛泽东真拿出一套崭新的政策，以公有制为基础，开拓出一条比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更为发达的农业之路，那么，我们又何妨不尊重事实，同全国人民一道山呼「毛泽东万岁」呢？

然而在这么大的全国灾难面前，这位自称的「革命导师」，为什么不能为老百姓纠正自己的错误呢？

我们参观农业展览的那天，天气特别好，又逢春暖花开的季节，据说，每年在这里都举办花会，惟独大跃进那几年却停办了。我想当年除了大家一窝蜂的去炼铁，炼钢，放卫星而无力举办外，恐怕因为农业受到重创，花木也无源了？

我们穿过布满花卉的走廊，夹在市民行列中进到展览大厅，正厅里挂着新闻图片，摆着的是「改造大自然」的「宏伟」模型，其中当然有大寨大队虎头沟的改造远景，另一个大厅里则存放着一些良种种子和禾苗的标本，以及农业器械，农药之类，据说也来自大寨展览的五十五个典型。

举办展览的说明人，声嘶力竭为毛泽东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唱赞歌，那音调和音色都绝对与当年大炼钢铁的开始曲一模一样，惨痛的经历倒使我担忧这些抽象的图片和模型，除了为惨败的三面红旗招魂外，几乎没看到一点解救饥贫的中国农民，所迫切希望得到的东西。我只好「假、大、空」三个字来概括这些图片和模型。

### （三）稍加统计的「大寨精神」

那一天，我专门带去了笔记本，趁解说人员说教的时间，快速简单地抄下了五十五面红旗的全部「业绩」，一股灵感油然而升，揭穿假、大、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具体的事例，进行一番实实在在的核算，这是毛泽东三面红旗时期没有人去做的事，例如谁也没有去算算一个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投入了多少劳动力和原材料，砍了多少树木，而最后炼了几吨铁？谁也说出一块实验田里投了多少工？费了多少种子和人力，耽误了多少农时？而第二年又收获了几许？这种简单的经济核算本属国家的基本依据，却被毛泽东黑着脸给禁止了。

因此，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年，人们在「紧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口号下干了多少蠢事？是因为没有人想建设需要核算，还是人们不敢算这些帐？揭毛泽东的底？所以在这场大灾难中，竟无人拿出一份有资料，有说服力的调查材料劝阻蛮干，速速悬崖勒马。

是因为大家头脑发热，被毛泽东的气壮如牛「气魄」弄糊涂而没有想到，还是有人想到却不敢为之？尤其在庐山上，那些从朦胧中醒来的开国元老们，早知终没有逃脱囚死狱中的悲惨命运，倒不如在庐山会议上，抛出足有说服力的报告，用资料和事实揭底，就是牺牲了也会名垂千古。

于是，我从五十五面大寨红旗的典型中，选择了一个用简单数字加减法就得出结论的例子——河南安阳县宅北小屯公社，南滚龙沟大队的「事迹」，图片介绍这个大队在党支部「带领下」，选择二庄生产队一条田坎，费了两个冬天时间，投入八千个劳动力，动用两千土石方，筑起一条长十公尺高差九公尺的石坎，将一块平时只能种些豆子的坡地，改造成一块面积二分八厘的平地。

我们不妨把当时最廉价的农村劳力，每个工零点五元计算；并以一元钱一土石方，最廉价的投入来算，为了这二分八厘地，这个生产队便投入了六千元成本，然后假设改造后每年按亩产千斤的最理想收益，按当时粮价每斤六分钱折算，二分八厘地一年收二百五十斤粮食，除去当年人口、肥料、种子的投入，每年从这二分八厘地里取回的最理想收入不会超过八元。

这就是说假设这块田经改造后，风调雨顺，年年获最好的收成，每年所得的八元要补偿耗掉的六千元，得花上整整七百五十年时间。

而七百五十年以后会是怎样呢？不妨让我们回顾七百五十年前，那不正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大元帝国的年代吗？还看华夏，从那个时代流传至今的这种简单的垒石结构，有几个保存着？像这种民间的垒石结构能耐住一百年不被风化和风雨冲刷，便已是「古迹」了，这同毛泽东当年一轰哄而上的土高炉群有什么两样？而大跃进中轰轰烈烈上马的社会主义业绩，到今天没过八年，所剩几何？

三年灾难，数千万同胞饿死这惨痛的教训还不够么？毛泽东在指挥他的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时，真是没有把为之打江山而牺牲的农民兄弟的死活，当成一回事，硬要把他们引向那个不可能有任何「美好前景」和任何收获的无止境的劳役之灾中，让他们备受饥饿死亡的痛苦？看来，眼前这点靠「三自一包」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使民不聊生局面暂趋缓和的局面，竟反而成为他积蓄力量阴谋组织一场，打倒敢于同他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的「党内走资派」的本钱！

独裁欲正酝酿着，一场比「反右派」更大的政治阴谋，使经济上暂时的复苏，面临着销声匿迹的结局，农业学大寨明显的同三自一包相对阵，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将发生的社会危机，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的。

于是我便写下了〈从南湾龙沟这个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这是我留在盐源农场管教科，在文革开始前的一篇有深刻说服力的文章。这一篇当年曾搅动西昌地区的「反动文章」，就是我对这次参观学习最精彩的总结。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正当报纸上起劲的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三家村札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将北京城里，中共内部的「思想交锋」极为浓烈的火药味，从报纸上洒向了全国。

可惜被长期愚民政政策弄瞎了眼睛大多数中华苍生，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就在这时，结束了九天的「参观学习」，我们从成都回到了盐源农场。

从成都回归盐源的路上，暖烘烘的

春天忽然变脸，料峭的春寒使我们因少带了衣服而得了感冒。回到盐源农场，农场管教科再次组织了参加本次参观的二十二人，重新集中农一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参观观后」的总结学习。

庞玉笃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将成都看到的「大好形势」写成「发言稿」，交他审核修改后，依次地在农场所属的古柏，北鸟和二道沟三个分场进行分队传达，藉以教育一直对形势抱怀疑态度的一万名农场流放者。

刘顺森因为路途上挨了刑具，本来早被庞玉笃划在宣讲人之外，我推口感冒不适，提前离开参观小组，回到了六队。

六队的「学习组」全体成员，以空前热情围着我们，询问成都之行的前前后后。一言难尽的我只能平淡的讲述了一路的经过，当说到刘顺森还为被铁门砸锁而挨了手铐的事以后，老头子们都沉默了。

陈力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朱国骥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先回来了？我向他讲了详细的经过，特别向他说：「我写了〈从南滚龙沟这个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后，他问我留下了原稿了吗？我说留下也没有用，经常都要大搜查的还不是要搜去，反正我的原稿已经记在脑子里了，随时都可以写出来的。」

第二天，下午在院坝里碰上了李培连，他的态度十分冷淡，想来庞玉筠已经向他讲了我在参观中的表现，只问了我一句「回来了？」通知我吃完饭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

### 第九节：\*\*杨修的故事\*\*

晚上，他正在办公室看书，见我进去以后，并不马上说话。我盯着他那张阴沉的脸想猜出此刻他准备向我说些什么？凭我的直觉已经感觉到我这次参观有违他的初衷。一个「学习班」推荐出去的人，写出与当局完全相反的东西，等于给他的工作「抹黑」了。但是，我想倘若他正处于一个彷徨的时期，他应当认真的读一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也许他就会明白是非曲直不决定于口舌之辩。

我想只要不是死心塌地地为虎作伥，不盲目崇信而自甘愚昧的人，都不会违背人的认识普遍规律，李培连也肯定一样。

如此静默了几分钟，他慢慢地抬起眼来，似乎文不对题地问道：「三国志想来你是看过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曹阿瞞兵退斜谷』这一章不？」我一时的被他这个出其不意的问话感到不解，竭力回忆起我在初中读过的三国志，只记得曹操失了汉中退守阳平关，在斜谷界口被蜀军围困，其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便摇了摇头。于是他他不紧不慢的把这段故事细细的讲来：

曹操与刘备率军战于阳平关斜谷界口，由于粮草被张飞所劫，遇马超而累累失利，欲退兵恐蜀军耻笑，正在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之际，是夜，庖官给他送来了一碗鸡汤，曹操看到碗中的鸡肋，心中有感。正逢夏侯惇请示今夜军号，曹操随口回答「鸡肋。」惇出帐传令全军，今晚以鸡肋为口令。

行军主簿杨修见传此令，便教随军将士打点行装，准备回程。惇不解而询问杨修，杨修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丞相进退不得，正思考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故出此军令，所以还是早打点行装，以免临行仓促卒。」

夏侯惇闻言置信，正在令军士收拾行装，正好碰到曹操因心烦巡视军营，见夏侯惇军内如此行动便召惇问原由，惇答：「这是主簿杨修解破今夜军令，知道主公已无心恋战，不日就会撤退，不如早作准备啊！」

曹操想起杨修恃才放旷，累次在朝臣和自己的儿子面前，点破他的内心机密，早怀忌恨素有杀他的心思，这一次终于找到了借口，便以扰乱军心的罪名令刀斧手将杨修推出斩首。

第二天，曹操率兵出斜谷界口被马超魏延大败，中了一箭几乎丧了命，这才想起杨修的话，悔不该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杀了道出真话的杨修，才有如此败局。遂下令收杨修尸体，厚葬，并传令班师，带着箭伤回到了洛阳。

杨修因屡次识破奸诈的曹操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因而遭到曹操的忌恨，最后召来杀身之祸的故事，本来就是了解三国志的人所共知的，罗贯中是否怀有警示后世的文人，不可恃才的意思姑且不论，但出在今天社会上，人人自危的时代，在层层封锁，隔墙有耳的监狱这种险恶之极的环境中，李培连几乎是坦白了他的观点，用历史的典故来告诫一个备受监狱狱吏注目的「反革命要犯」。

在他的心目里，是否把我看作杨修式聪明外露的人物并不重要，但这种袒露内心，作为一个狱吏确实难能可贵。他这不等于在告诉我，在对毛泽东的看法上，我们原本是一样的。向我讲杨修的故事，仅仅表明他对我「赤膊上阵」的担忧。

中共党内派斗已演化为公开争夺权力的生死斗争，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那一个派别的成员都会严守心扉中禁忌的一页，否则随时会被自己的「同志」抓住小辫子，引来杀身之祸。到这个时候我明白，他组织我们这个特殊学习班真费了一番苦心。他确认，只要还没有失去人性和良知，处在不同社会层次上的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向恶势力作斗争。

「我看了你这次去成都参观所写的东西，」李培连挑明了今天把我找来的用意。「不过，我提醒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才最能洞察现实，偌大的中国不乏智者和能人，比你见识广的人恐怕并不少，他们今天都在沉默和静观，没有像你那样锋芒毕露，这些人可并不是你能用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所概括得了的。」

也许在这种光明与黑暗，民主与独裁的搏斗之中，一味靠勇气和牺牲是不够的，但是何以证明这种「大智若愚」的沉默，不是为内心虚弱所进行的辩护？观潮和弄潮，所不同的前者是胸无大志，无所作为的旁观者；而后者是不讲时机一味蛮干的莽夫，随时可能成为「铁拳」下的齑粉！

但是，我听得出来，我们对毛泽东其人，以及他今天「革命路线」的认识还有相当的差距！对这位比一般的狱吏思想深厚的人，我何不借这个机会讲出我对将发生变化的看法：

「毛泽东当然不会只是普通玩弄路线斗争的政治人物。他集中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君王之道，在开国之时为了稳固自己今后君临天下作准备，你大概不会忘记他早期所作的『沁园春《雪》』吧！那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古代君王无人能同他相比的宿愿。」

「他想把中国拉回到一个独裁的帝王时代。他的『社会主义』既是他认定的王命，违背这王命等于让他从皇帝的地位退下来，这是帝王根本不能做到的。」

「一个渺视唐宗宋祖，秦皇汉武的人岂能不采用开国元勋所使用的伎俩，他们哪一个不在开国后对开国元勋们大开杀戒啊？刘邦杀异姓诸王，李世民玄武门杀自己的兄弟，朱元璋在得到天下以后，竟会认为他的大臣们一个都不可信。」

就连忠心不二，通达阴阳的刘伯温都只能回青田隐居，对胡丞相以『叛国谋反』罪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你想想，刘少奇像不像胡惟庸啊！」

「难道毛泽东所有发动的运动，不都是在革命的外衣下，为自己黄袍加身作准备么？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他所奉行的公有制的信条，遇到了严酷现实的否定。他必须从这个死胡同里慢慢的拔出腿来，却遭逢了国内，国际那么多的谴责和压力？」

「要他退出历史舞台的声浪，迫使他为保住独裁政权重新组织人马，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憎恨民主，憎恨代表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缘故了，这也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所以，今天不是你所想象的理性和革命的时代。更何况他所主张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已经把中国带到了贫穷和野蛮境地，他已经孤注一掷，走上了消灭一切反对派的绝路上了！」

「所以，只有反抗才是生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不就是因为统治阶级过份的残暴，才逼出了农民造反，『皇天当变』来的么？当然，这可能是渐进的过程，共产党或者放弃它们独裁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促使它民主化的，在我看来就是老百姓的不断反抗和斗争，如果都是些『大智若愚』的观潮派，由谁来改变这种苦痛的现状？」

「现在最需要的是能振臂一呼，让人民不再沉默的义士，即使这些义士有些人会牺牲自己，但他们能换来民众的醒悟不是很值得么？」

对于我这番议论他默默地听完后，没有反驳也没有赞同，我们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但我清楚，对于像他这种开始重新认识中共的人，是不会轻易的表示对我见解的认同的。但是我想总有一天，生活的实践会修正他原来的那一套「信仰」，而今我必须同他保持最大限度的思想交流，获得他的同情和支持，也是我的一种胜利。

可惜，这一次便是我们之间在狱中的最后一次思想交流。

其实，我个人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思考中，才渐渐认识了中共的，与李培连不同的是，我是从对自己所遭遇的无辜迫害，和一家人家破人亡的切肤之痛开始的，而李培连却是从中共内部分化出来的异类。当年反右派运动，我是被无端受整的学生，而他当年却是雅安农学院对右派学生进行残害的打手。在四面红旗的震撼下，我

也未曾想到过毛泽东真是一个千古暴君，他的解放全人类的外衣，以及恶毒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太令人迷惑了。

敞倘若我这一晚上给他讲的这一番道理，拿到一九五八年去向他讲，说不定，我不但不能点拨他的盲区，还可能为他「邀功」请赏提供材料。今天我这样讲，会不会对他的心灵起着启迪作用，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会的。

直到今天，毛的遗毒还在被他的继承人死抱着不愿清算，给人深深的担忧。我是因为我有一种从切身的痛苦中，产生出铲除他遗毒的深切愿望，来写自己的回忆录的。我把这当成我义不容辞的天职。

——上集完

## 《血纪》\*\*中集\*\*

孔令平 著

目录

目录... 1

第六章：文化「大革命」... 1

(一) 激辯... 2

(二) 夜深沈... 4

(三) 最後一點「理性」... 7

第二節：加刑——\*\*第二次判決\*\*... 9

第三節：文化的浩劫——\*\*人權的厄運\*\*... 13

(一) 鑽鑽死角的災難... 14

(二) 「算總帳」... 15

(三) 第三次絕食鬥爭... 19

(四) 鬥爭潘朝元... 26

(五) 王氏膏藥... 29

第四節：牢卒子們的內鬥... 30

(一) 林扯高鬧劇登臺... 31

(二) 「好人」打「好人」... 34

(三) 高歡和童管教... 37

(四) 紅衛兵「墳」... 40

第五節：軍事管制——\*\*打人狂潮\*\*... 42

(一) 「請罪」及打人風... 43

(二) 我被打昏的體驗... 47

(三) 大搜查... 53

(四) 為一張畫像被打得半死...	56
(五) 打中了...	57
(六) 賠殺...	60
(七) 「狗」也挨打...	62
(八) 因報告聲「太小」而凍昏的人...	64
(九) 目睹殺人比賽...	65
(十) 年關在耳...	69
第七章：背負重枷的煉獄...	72
第一節：栽秧和收割...	72
第二節：挑草...	76
第三節：曹季賢：「我要回家」...	79
第四節：飢餓逼出來的.....	84
第五節：暴虐的「罰吃」...	87
第八章：嬗變...	90
第一節：殺一小批運動...	90
(一) 槍殺陳力...	90
(二) 殺蔣正君和劉志和...	97
第二節：九·**一三衝擊波**...	100
第三節：公有奴隸制下的特權階級...	105
(一) 特權...	105
(二) 小秋收...	108
(三) 模範共產黨員張劍波...	111
第四節：十年生死兩茫茫...	115
(一) 尋母...	116
(二) 一包砍皮瓜子...	122
(三) 照像的見聞...	123
第五節：我們還不如你們...	126
(一) 偶遇...	126
(二) 情緣...	130



(三) 歸宿... 133

第六節：喋血蘋果林... 134

第九章：地獄裡的火炬... 140

第一節：打李分站和三代會... 140

(一) 鬥... 141

(二) 張錫錕... 143

第二節：舉起反抗的火炬... 145

第三節：猶大們... 146

第四節：——\*\*八鬥智鬥勇\*\*... 155

(一) 被抓... 156

(二) 奮起自衛... 159

(三) 闖險... 161

第五節：火炬戰士，無愧當今的英雄... 164

(一) 回答審問... 164

(二) 會場上... 167

(三) 從你身旁走過... 170

第六節：上蒼對猶大的懲罰... 170

(一) 陳賢士... 171

(二) 劉資元... 173

(三) 黃學全... 176

(四) 王世春... 178

第十章：「文革」尾聲... 179

第一節：變臉... 180

(一) 報復的挨捆... 181

(二) 「特赦」... 182

(三) 苛刑... 183

(四) 四個馬鈴薯人... 185

(五) 特大喜訊... 187

第二節：瘋狂的油庫灣... 189

(一) 監獄學「大寨」... 189

(二) 神仙土下... 194

### 第三節：尋找光明... 199

(一) 地震棚裡... 199

(二) 逃亡... 201

(三) 追蹤... 203

### 第四節：強弩之末的猖狂喚醒皮天明... 206

(一) 劉順森不幸捕回... 206

(二) 二胡情誼... 207

(三) 掩護... 211

(四) 怒劈狗腿子... 212

(五) 永別了，二十年後再見... 216

### 第五節：變態劊子手林扯高最後下場... 219

(一) 冤魂找上他... 219

(二) 「上馬」和「下馬」... 221

(三) 好險! ... 223

(四) 家庭「革命」... 225

(五) 打死你這爛賊... 226

(六) 重上井崗山... 229

### 第六節：最後犧牲的「火炬」烈士... 230

(一) 濫殺... 230

(二) 為少年精英送行... 232

(三) 縣裡召開的公判大會... 236

(四) 賠殺場的「五類」... 237

## 第十一章：中共後集權時代... 241

### 第一節：風向陡轉? ... 242

(一) 清溝聽聞... 243

(二) 高德勝的死訊... 244

(三) 獄中「自由」... 246

(四) 就業員的窩棚區... 248

(五) 再逢李培連... 252

(六) 山溝裡的平反... 256

(七) 李大漢... 258

(八) 勞改隊的狗也傷人... 260

第二節：看守莊稼... 263

(一) 首次外宿... 263

(二) 夜襲... 268

第三節：「平反」第一回合... 273

(一) 復查人的醜惡表演... 273

(二) 第一次到詹大媽家... 278

(三) 飛起來吃人... 282

第四節：如此恢復自由... 286

第五節：在鹽源的最後兩天... 291

(一) 走狗懺悔... 292

(二) 拜別難友... 295

(三) 陳文仲和鄧揚光... 298

(四) 離開二道溝... 302

第六節：再見！鹽源的老媽媽... 303

第六章：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們在成都參觀前後，中共內部的「宮廷」較量，以「社會主義教育」的形式拉開了序幕。毛準備多時，利用青年學生的盲目輕信，將全國人民對中共的不滿正在轉嫁給「資產階級司令部」！

不識其陰計的彭真們果然上當，拋出了《二月提綱》，並且掀起了二月鎮反運動！當然全國的紅衛兵運動，一些往這個運動中鑽的毛孩子們，輕易上當，充當毛澤東發動的宮廷政變槍手，就在預料中了。

「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開始。在邊遠的鹽源小城同全國一樣，鹽源農場組織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組，派往各所屬的勞改中隊。

這些工作組顯然並沒有弄清楚「二月提綱」骨子裡要賣什麼藥，只憑他們的本能，跟著黨中央的決定走。按照他們對中共運動的理解，照例是抓一批反革命向中央交差。

六隊是農場重點關押反革命份子的中隊，派赴的「社教工作組」陣營特別龐大，由五名科級幹部組成！

六月初正是農場栽種的農忙季節，為了「保證」學習，場部規定下午五點鐘便按時收工。收工回來後，組織我們學習一系列中共中央的「文革」檔案：《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三家村紮札記的反動本質》。

全隊集中收聽了播出的（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後，便以「你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為題，組織了全隊人員的分組討論。

然而這些年，備受折磨害怕中共那套「放長線釣大魚」欺騙的農六隊流放者，大家都以沈默來回答。第一天的分組討論，會場上冷了場。

已經失去了民心，甚至失掉了中共黨心的毛澤東。由於獨裁本性使他不可能吸取教訓退位禪讓。相反的，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開始，到一九六四年，經過了將近五年的準備，一個反對黨內反對派的陰謀終於拋了出來。

《五一六》通知已經攤牌，李培連十天以前的那番講話還響在我的耳際。雖然我的心裡堵得慌，幾次想痛斥文化大革命的險惡動機，可是又覺得應當再觀察一下，到口邊的話被我吞了回去。

### 第一節：宮廷政變．我對文革的看法

第二天場部派出的工作組，再次作了動員，講到了這次「文革」的「偉大」意義，重申這次運動與以往任何學習都不同！宣佈了會場三大承諾：

暢所欲言，各舒已見；對於在開會時公開發表的意見不抓辮子，不作記錄；保證不作秋後算帳。農場的社教工作組組長，政工處蒯處長，見全場依然同前一天一樣冷清，便指名點姓要我和陳力分別在兩個組進行「發言」，並向我們提出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的保證。

這幾年承蒙共產黨的「教育」，讓我明白，毛澤東發動的每一個運動都預先把「革命」對象作了界定，不管你對運動持何種「態度」，只要被劃為挨「整」範疇，是一定逃不掉的。

#### （一）激辯

我清楚的看到，本次運動挨打的對象是中共內一批對三面紅旗不滿的人，其中不乏「海瑞」式的「直臣」，他們並沒有成熟的政治主張，但畢竟在當時較能體察民情，深知毛那套理論帶給大陸的災難，儘管這些人壓迫過我們，與我們本無共同點！但為推翻獨裁勢力，仍有必要同他們聯合。何況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想到這裡，我從凳子上站起來，向蒯處長提出要求「我的發言不作記錄，不負法律責任。」

在得到他的點頭應許後，我開始了我的長篇發言：

「首先，《五一六》通知中一個提法值得在場的人認真思考。」我的開場白吸引了在場兩百號人的注意力，全場鴉雀無聲。

「我們知道，我們國家的名字叫人民共和國，毛主席不是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比以往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進步更民主的國家嗎？這叫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共和國。」

「中共領導人不是說，共產黨的領袖人物都是在革命運動中產生的嗎？何嘗有培養接班人一說？那是只有在封建時代皇帝廢立太子時，才可以說，自己在培養繼位人。而在培養繼位人中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才是封建宮廷之爭。現在這樣說等於承認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皇上的專政，許諾給人民的民主權力全是假話！」

「掛共產主義的羊頭，賣一貧如洗的狗肉的北京領導人，面對年年歉欠收，到處餓死人的局面，卻偏要說形勢從來沒有這樣好，逼著老百姓贊三面紅旗好，這不是指鹿為馬麼？」

坐在我對面的周學祝舉起了手，可惜，蒯處長沒有理會他。

於是我接著將歷史追溯到九年以前，從五七年毛澤東打壓知識份子，封人之口的反右運動，講到「三面紅旗」；

從人民公社和社教運動，講瞎指揮下的一場浩劫；從放衛星到大寨運動，講違背社會正常的運行規律帶來全國大幅歉欠收；從大煉鋼鐵講強征民間勞力，煉得一堆廢鐵，勞命傷財。結果造成大飢荒，餓殍遍野，國家元氣大傷。

「老百姓最初懷著模糊不清的希望，以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會給他們帶來共產主義的繁榮，半信半疑地跟著他的部署走！煉鋼煉鐵，成立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

「結果疲憊不堪的農民從原先的窮困走到了飢餓和死亡！於是大家才明白毛澤東不是神人，他只不過像『燕山夜話』裡，用一個雞蛋的家當落地破碎的泡影，哄了大陸老百姓。」

「歷史終於走到了今天，走到了連他當年的親密戰友都無法相信的絕境中，走到了共產黨領導核心都無法維持統一的一九六六年。因此，任何有現實感的人都應當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毛澤東排斥黨內持不同意見者發起的宮廷政變！」

我斬釘截鐵的為我長達半個多小時的發言作了結論。

也許，「宮廷政變」這麼一說在當時確實語出驚人，令主持會場者出乎意外，大家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好像提出了一個他們沒有想到，也不敢想的問題，讓他們開了竅。使他們「發聾振聵」了。

突然，坐在我對面的周學祝霍地站起身來，向蒯主任遞了一個諂媚的眼色說：「我認為孔令平藉學習會在公開宣揚三家村言論，應該給予批判，還要讓他自己消毒！」

周學祝這人因背是駝的，我們叫他周駝背。李培連因為此人也是右派，具有大專文化程度，平常很擅打「小報告」，所以指定他任我們這個特殊學習班的組長。看來，經過兩個月的辯論學習，對他這種找機會都想從狗洞中爬出高牆的人，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現在他也許看到，他面前又是一個很好的「立功贖罪」的機會，豈能放過？

被人猛然提醒，蒯主任顯得侷促，一面應和道：「對，大家要對孔令平這種藉學習討論，進行放毒的言行加以批判。」

但是，我卻不動聲色的坐在那裡，提醒蒯主任在我發言前所許諾的條件。周駝背見我坐著不動，便走過來拽我站起來，一邊說：

「毛主席說的凡是毒草就要批判，你今天明明用報紙上正在批判的話在這裡放毒，哪有不消毒的。」

我並不示弱，順著他來拉我手的力量輕輕一送，便將他送出了兩公尺外，跌倒在地上。

被這出奇不意的一推所惱怒。周駝背一邊從地上爬起來，一邊拼拚命的狂喊：「反改造打人啦！反改造打人啦！」並再次向我撲過來。頓時我們倆扭成一團，會場中立即哄鬧起來，蒯主任連忙叫人將我們拉開。

正在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鄧揚光從圍牆的拐角處冒了出來，自從李培連接手農六隊的管教工作後，他便從六隊消逝了幾個月。今天突然露面，想必與工作組的派駐有關，說不定他便是工作組的總指揮。

他走到我面前，我才發現他的手上提著一付手銬，身後還跟著兩名武裝士兵。沒問任何話，我便被那兩個士兵按倒在地，反剪著雙臂，戴上了一付沒有任何活動空間的土手銬。看來，他早已準備好了。

陳力和劉順森們一齊發出怒吼聲：「還講理嗎？動不動打人！」

鄧揚光將身子轉向陳力，冷冷的說道：「你少囂張一點，我們對你們這樣頑固不化的份子，有的是辦法。」

今天的鄧揚光把他在古柏的那兇惡的面孔重顯出來。在他的指揮下，我和陳力被兩名士兵連推帶搯地關進了東北那一排，靠崗樓下最角落裡的兩間房間，那裡當時是用來堆放糧種的臨時倉庫。

我和陳力罵不絕口，直到被重重地攆在那屋裡，鎖上大門以後，工作組驅散了圍觀的流放者。

## （二）夜深沈

天色完全黑淨，沸騰的院壩慢慢靜下來。

倉庫裡寂黑一片，蚊子發出的嗡嗡聲從四面八方響起，好像無數轟鳴的飛機在看不見的地方朝我們攻擊！向著我的臉上、頸上亂撲亂咬！我只能用嘴吹著氣，不停地驅散它們！

從方才的激動中平靜下來後，憑感覺我此刻正背靠在一條裝滿玉米的麻袋上，由於身體的壓迫，反銬的雙臂被壓得又酸又麻，努力想站起身來，雙手被手銬箍著的手腕，因手臂的運動而劇烈刺痛，一點也搭不上力。

此時，我才感覺出手腕被箍的頸部，那過小的鐵箍內圈「利刺」扎紮進了肌肉裡，稍一動彈那些刺便會在肉裡攪動，令我挖心般的疼痛，不禁罵了一聲：「好歹毒的鄧揚光！」

憑藉腰力慢慢地移了一下身體的位置，靠腿的力量慢慢站起身來，藉著面前鐵窗織子縫泛進來微弱的光，我辨清了門的方位，便挪動腳步，朝著窗口方向挪去。

我移近那鐵欄的窗子面前，向對面的隊部辦公室的房頂望去，在那房頂與我們的房簷之間，我看見了那一片很窄的夜空。星星在那裡眨著眼睛，而院壩裡卻是寂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

側耳聽去，除了蚊群的轟鳴，四下悄無人聲，便用腳去踢那木門，想弄明白，此時，在院壩裡巡邏的哨兵躲在那一個角落裡，但院裡沒有任何回應。

隔壁的房間傳來了相同的踢門聲，這是陳力給我的回應！此刻在這萬籟俱寂的黑夜裡，彷彿唯獨只有我們倆才沒有睡意。越是如此的清醒，越感到時光在黑夜中停滯一般。

靜謐的夜，像一尊巨大的石頭壓迫著我的心，使我悶得發慌。想到剛剛發生的一切，眼看北京城一場政變風暴已經來臨。中共上層醞釀已久的大分裂，終於演為激烈的內江公開化了。

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就像埋藏在地底積鬱很久的火山岩漿，終要衝出岩層噴發了！此刻正經歷著火山爆發前地殼的沈默時段。

可惜，令我鬱悶的是，為什麼偏偏毛澤東靠了一群孩子先發制人占了上風？形勢會發生什麼變化？吃盡毛澤東苦頭的人民會不會勇敢站起來，在中共對壘的兩軍之中起決定作用呢？

我對著那長夜天空長籲了一口氣。然而當我想起剛剛發生在這院壩裡的一切！那張牙舞爪的周學祝，那變臉的鄧揚光，以及那手足無措的蒯處長，便深深感到偏僻的流放地，還是那麼的黑暗和複雜。

心中悶得發慌，便背過反銬的雙手，挺著胸，貼在鐵欄上面，放開了喉嚨，朝著院子裡高聲吼道：

「為毛澤東賣命的農民弟兄們：你們這幾年嘗盡了飢餓和災難，還不明白，這一切都是因三面紅旗給你們帶來的麼？」這一聲是對那些在崗樓上的士兵們喊出的，因為他們絕大部份都是農家子弟。

「不要再發狂的鬥下去了，這幾年還鬥得不夠麼？階級鬥爭，給你們鬥出什麼來？除了飢餓和災難，你們得到了什麼共產主義果實？」「你們想想，你們的領導人都同毛澤東鬧翻了，連他們都不相信毛澤東的欺騙宣傳，你們信麼？」這是對這些幹部們喊的，又是對看不清形勢的沈默的中國人喊的。

我相信在這深沈的黑夜裡他們會靜靜反思，靜靜權衡，恢復被蒙蔽的理智。

「天快亮了！文化大革命是宮廷政變！連你們的領導們都看清楚了的，你們還看不清嗎？你們該清醒的站在哪一方，」

我大聲吼道：「天快亮了！天快亮了！」那喊聲一迭迭的在院壩裡迴響。

這喊聲是對專制魔王的詛咒！這喊聲像驚雷，震得整個院子嘎嘎直響，震得沉睡的人們驀然驚醒！

這喊聲是沈默了好多年，數千萬地下的餓鬼發出的吶喊，這喊聲如此的淒厲，如此震撼人心。

靜夜適合於人們招回失去的良知。沈默除了證明他們的心虛外，在我看來不會有其他的原因。

除了蚊蟲的轟鳴，沒有任何回應，然而我不相信此時的鄧揚光呼呼大睡沒有聽見；我更不相信，距我咫尺的哨兵沒有聽見；他們之所以沈默，不正是在對我的吶喊進行思考麼？

人到了這個地步，便沒了畏懼。沒有堅定的必勝信念作後盾，就不可能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第二天的清早，當開飯的時候，大田組的組長，曾當過派出所長的王家祥，把飯端到離我窗口不到五公尺的土墩子上，頻頻向我致意，他一再把他的大拇指翹向天空，並且大聲地笑吟：「天明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接著是王大炳、劉順森、周志他們都用不同的手勢，向我致意。

經過一夜的吶喊，雖然很累，但全無睡意，頭腦異常的清醒。而那反鏢著的雙手，最初的疼痛似乎已經麻木了。奇怪的是無論是站崗的老管還是管教幹事，竟沒有一個人干涉我。

吃過早飯，大家出工以後，打開我的房門，為我解下手鏢的是一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年輕管教幹事。當他解下我的手鏢，只是皺著眉頭，望著我那紅腫得像饅頭的手，沒有說話，便轉身走出了院壩。

不一會拿來了一個小瓶子，裡面裝的是碘酒。一邊自言自語著什麼，一邊眯著他那高度近視的眼睛，慢慢地為我擦著兩個血淋淋的手腕，最後他又拿起已經下下來的手鏢，湊在眼前細細地觀察著，再提著那有刺的鏢子走了出去，換了一付大手鏢並將我改成前鏢。什麼也沒說。

好像昨晚他壓根本就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也沒有聽到我的喊聲一樣。

裝糊塗原本就是解脫無奈的最好辦法，這年月誰又沒看到中國的災難，誰又看得清將來會是怎樣的呢？所以還是對我這種態度鮮明的人保持裝糊塗為好。

到此時，蚊蟲已經飛去，我才感到又困又累，便就地撿了幾張麻袋鋪在地上，倒在地上呼呼地睡去。

一周以後，這個新來的管教何慶雲便將我下了手鏢，並且從那間臨時倉庫中放了出來，回到我原來那個組裡。

隨後，何慶雲將李培連組建的學習組解散了，我被編入了蔬菜組。指定周駝背專門對我監督。唯獨陳力卻依然關在倉庫裡。

兩個月以後，正當文革如火如荼之際，他被押解到鹽源縣城看守所，直到四年以後在那裡犧牲。

不久《十六條》公佈了。

《十六條》隻字不提全國老百姓最迫切的生存問題；而是利用各級地方官吏曾在二月中鎮壓學生的機會，定下大民主的基調；向走資派奪權，是決定中國命運壓倒一切的任務。又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向年輕學生們吹響向鎮壓他們的走資派奪權的號令。鼓動他們砸碎「資產階級」教育的桎梏，衝沖出學校，並號召他們在全國進行大串連。

他命令將全國大大小小的倉庫打開，將這幾年全國老百姓節衣縮食的血汗儲備，分發給他們。

甚至不惜將軍械庫打開，慫恿他們為「奪權」而武鬥！這些從學校放出來的孩子們在權欲的支配下，以保衛毛主席為旗號，戴上「紅衛兵」的袖套，肆無忌憚的對社會進行公開掠奪、殺人放火。

借助他的親信和特務，利用學生們對中共統治各級當權派的仇恨，搖身一變裝成了學生們敬仰的領袖。將自己抬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寶座，而全國大大小小的「當權派」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公檢法也暫時全部癱瘓。

當時我同劉順森等人討論到紅衛兵現象時，他說道：「你看現在的中國紅衛兵像不像法蘭西大革命時，波旁王朝路易·波拿巴在霧月十八日組織起來的十二黨人保衛王朝的那一段歷史？」

我答道：「豈止如此，紅衛兵對社會的破壞，遠遠超過了由流氓地痞組織起的十二月黨人，一個獨裁狂人為挽回民心，會在民主潮流的歷史條件下，使用『大民主』這種手段。它的災難要過若干年後才會顯露，不過縱有再多的陰謀，最終還是逃不過對他罪惡清算那一天。」

任何一個社會在變化的「臨產時期」都會有「陣痛」出現。這真是「夏桀之常違兮，乃道焉而逢殃。後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一場空前的民族內戰和浩劫，就這樣開始！

不要以為公檢法的癱瘓，使中共對我們獄中的迫害稍會放鬆，要知道這種癱瘓是毛澤東奪權的需要，只要毛澤東還穩坐在皇位上，對於按他的旨意而劃的五類，歧視和鎮壓只能更加劇，只有幼稚的紅衛兵們為表白對「紅太陽」的忠心，拉出可憐的黑五類來「殺雞給猴看」。

### （三）最後一點「理性」

李培連苦心設計的理性「感化」時期結束了，農六隊瘋狂的軍人逞威、肆意打人的年代開始了。雖然現實的荒唐，絕對不能為他的感化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現實中充滿了欺騙，但總還有讓人說話的時候，毛澤東竟然連這也絲毫不能容忍，他需要吹捧他的奴才，而不是有思想的人。

不久，李培連本人落入獄中，生活的實踐會糾正他原先的幻想。面對著這個更瘋狂年代的到來，我感到當局已無理可講，就只好等著客觀的辯證過程將它演變到「彼岸」去了。

我們擔心在這種時代消亡過程裡，弄不好對政治犯進行大屠殺的慘禍將降臨我們身上。李培連勸我靜靜觀察的意見被我採納了。

從此以後，我改變了過去同當局正面交鋒的態度，保持一種沉默，我的沈默，被高德勝注意到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在我沈默了足足八個月以後，高德勝在六隊主持了最後一次全農場管教工作會議，並指定我為中心發言人。

參加這次會議的是全場各中隊的主管幹事以及管教科的全體成員，共三十餘人在六隊召開。我當時並不完全清楚高的用意，究竟是想借我的口說出他不敢說的話，還是想證明他主張的感化教育所取得的成果？無論如何，我只能原原本本和盤托出我的想法。

第一次當著這麼多專業的管教幹事們來講自己的思想，我表現出了一種費解和懷疑。但是我仍本著一貫的態度，講了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這是一場毛澤東為剷除政治上的異己，而發動的一場宮廷政變。」同八個月前的發言幾乎沒有任何兩樣，雖然我明白，現在誰公開反對紅太陽，紅衛兵可以把你當場打死。

我沒有去看主持會場的人有什麼反應，因為一個人的信念一旦成熟後，會不顧一切的堅持下去。

人們終有一天會從狂熱中靜下來反思這個歷史時期的前前後後，他們終要認識所幹的蠢事，原來都是受了毛的慫恿。等到他們認識這一點時，大致歷史才開始用實事求是來評價。

我那一次的講話足足用了一個小時，會場裡很安靜，沒有人反對我的話，叫我中途反省，那比我在大學時的批判會文明多了。

但是，只要我還沒有被逼感到我的生存受到威脅時，冷靜的思考是我能夠接受的，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不能不隨著形勢的發展在改變自己，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更好的適應生存的需要。不過這不可能說，我在接受強加給我的改造。因為首先，我認為強加在我身上的罪惡是根本不存在的，也不要寄望於我會放棄我已經形成的觀點，因為誰都承認，認識來源於客觀的存在。

到了這一年的年底。有一天，新調六隊任中隊長的郭川小到蔬菜組的菜棚子裡把我叫到一邊，悄悄告訴我說，高書記將去五七幹部校學習了，在去學習之前想特別的找我談最後一次話。

第二天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了緊靠蔬菜地的小河邊楊柳林中，他穿著一身麻色的中山裝，看樣子很蒼老，也很焦慮。我明白他的官早被罷了，革了一輩子的命到頭來，馬上就要變成革命的對象了，可以想像得出，他的心情也許比我們還沉重，但是作為並不知他底細的「犯人」，我不可能對他說什麼了，我所講的全都寫在紙上了，從小監到現在，也有兩年多的時間，想來他都已經仔細閱讀過了，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什麼人，會一輩子記在心中。



正在接受審查的他，把我找來，一定有一種發自內心的牽掛。郭川小是他當年的警衛員，要不是他，我們恐怕這次見面都很困難。

那次談話只問了我現在生活得怎樣？關照我不要辜負他的一片苦心，便慢慢的離開了那裡，搖晃著他老邁的身姿，消失在田坎的盡頭。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過他，但我看到在他這種還保存著良知的中共幹部身上，我的話起到了震撼的作用。我深信他必會在「文革」的煉獄中，徹底的弄清楚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徹底扔掉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幻想，甚至背叛那個追隨多年的中國共產黨。

## 第二節：加刑——第二次判決

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因「二月逆流」而處在癱瘓前夜的鹽源公檢法，根據鹽源農場呈報的四十多名「重新犯罪份子」整理的材料，報經鹽源法院批准，對四十多人所犯的「新罪」，履行了最後一次的職能，在鹽源農場召開了最後一次「公判大會」。

出席這次公判大會，是全場八千名犯人和兩千「刑滿釋放犯」。近萬人從三個分場幾十個中隊，集中在農業三中隊的大壩子裡，聲勢浩大。那一次公判大會，還允許被宣判的人站在審判臺上，表達自己對宣判的要求和態度，儘管中國已處在法不是法，權就是法的最混亂時期。

對我的「加刑」是一九六六年那場「你對文化大革命看法」的學習討論上所作的發言，以及那一晚上上手銬後在保管室裡所呼喊的「反動口號」。以反革命罪被處加刑兩年，那判決書至今我還保存，全文寫道：鹽源縣彝族自治州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六七）法刑字第三十九號：

「孔令平於一九五七年乘黨整風之機，因攻擊我黨的領導，被劃為右派，五八年在農村監督勞動，又大肆進行反革命活動，一九六〇年八月經重慶市南岸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判刑後仍繼續堅持反革命立場，一貫拒不認罪，多次無理申訴。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在犯人中惡毒地誣衊毛主席著作，謾罵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的領導，六六年在學習會上明目張膽地攻擊我文化大革命，並經常惡毒的污衊我社會主義制度，蓄意攻擊我三面紅旗，『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同時還煽動鬧監，呼喊反動口號辱罵我幹部武裝。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查孔犯平頑固堅持反革命立場，一貫不認罪服法，抗拒改造，敵視我黨和政府，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攻擊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審理中孔犯供認不諱，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加強對罪犯的改造，依法與以懲，處特判決如下，對孔犯平加判有期徒刑兩年，合併原判為二十年……」

一看這張判決書反映了鹽源農場當局的應付和無奈，連我的原判是由重慶南桐法院判處，弄成了南岸區法院。我的劃右是「替父翻案」而含糊說成「攻擊黨的領導」。

我明白了，我所交的無數次的上訴，他們根本就沒有看過，便扔進了字紙簍中，他們根據北京的毛澤東「政策」。

後來的管教幹事無論是鄧揚光還是何慶雲、黎爾榮，曾多次在私下警告我：「在這種時候，你還敢把毛主席比作秦始皇，說他比秦始皇還要殘暴不是找死麼？就憑這一點就可以送你的命。」

這話倒真不假，因為無論是從鹽源縣裡傳來的消息，還是後來入獄者親眼目睹，有人就因為在公開場合下，說毛澤東不講理，被紅衛兵當街擊斃。六月卅日晚上我呼喊了一夜的口號，那不明明是當著幾百人對監管理人員的打倒毛澤東的宣傳麼？

後來想起那晚真夠懸的，當時場部的幾個當權派中，只要有一個是毛澤東的死黨，吾命休矣！現在我的加刑，只用兩年刑期便作了結論，平心而論，這確是「大事化小了」。

如此看來，人心是肉做的，只要堅持以正義和理性，憑事實是可以說服某些獄吏的，即使是很頑固的人，我們平時日積月累的反抗，對他們所起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在關鍵時刻顯露了出來。

自從從甘洛的鬼門關裡撞過來以後，心也橫了，對活命已無甚依戀，人不怕死，奈何以死懼之？半飢半飽任人奴役而苟活，不如壯烈去死。在毛澤東橫行的天下，就是有公民權又怎樣？

生活在人人自危的「無產階級專政」壓迫下，敢說真話麼？敢申張正義麼？就連遊行，還得打「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旗，喊著「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咒語，宛如在日本淪陷區時，漢奸們組織的「良民」隊，打著「大東亞共榮」的小旗是一樣的，那可是不恥於人的勾當。

今天倘若那一個敢在大街上喊出，「三面紅旗弄得餓死好多老百姓」這麼一句千真萬確的話，那還不把你當場打成肉餅才怪？

與其在監獄外像烏龜一樣苟活，還不如在監獄裡蹲著，大家遭遇都相同，臭味也差不多，又有大兵保衛，且等著看中共怎麼導演這台好戲，等著把牢底坐穿時，看又是一個什麼結局？

如此想來，便覺得李培連用楊修之死勸我固然表達了他的阿Q精神，卻符合當時的形勢，權且看看吧。

宣判大會的主持人鄧揚光，身穿中山服，正襟危坐在主席臺中央，他的前方台前就是受審人所站的被告席位置，他的面前和被告席地方放著兩個話筒，被告席位置的話筒是留給被審人表態用的。

他的身旁坐著書記員，那瘦瘦的藺幹事正進行記錄，另一側是一個年輕人，正翻著一疊厚厚的檔案，按照排定的先後次序，將一張張判決書依次遞給鄧揚光，使他注意力集中地注視著整個會場，然後接過判決書點著被判人的名字。

待到被判人驗明正身走到台前位置站好以後，便對著他面前桌上麥克風，宣讀判決。宣讀完畢還要被判處人在前臺的麥克風中表態，並走到主席臺的面前領取那一張紙。

當喊到我的名字時，我不慌不忙地走上了前臺，面對著主席臺下黑壓壓一片人頭，鎮定的站好，靜靜地聽著身後鄧揚光宣讀完判決書，當他按慣例向我發問道：「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向右前的話筒挪動了一下位置，正對話筒以後，側身向那女書記員回答道：「藺幹事，請你記下我說的每一個字不要漏掉。」

我視覺的餘光，查覺出此時鄧揚光疑惑的眼睛睜得特別大，便一字一字地吐出了如下的話：

「自從我選擇了我的政治道路那一天起，我便不打算回頭，今後也絕決不會回頭，」這一段話，我想熟知我的鄧揚光一定體會得比一般人更深！

我聽見了麥克風清晰的把這句話傳到了廣場的四方。

我看到在我說完的那一瞬間，就在我的腳下，人們被震動著，彼此交頭接耳，大致是因為在我以前，所有走上我這個位置，接受宣判的人，都一律回答：「沒意見」，便沒有其他的聲音，所以我的回答特別令人刺激。

靠我最近的那幾排人，投過來明顯贊許的目光，我想如果在自由國度裡，他們定會站起身來向我歡呼致意。

此時一股熱流沖衝向我的腦門！因為此時的我，無異於當著這萬人的面莊嚴的宣誓；我會為我的信仰戰鬥到底！

坐在我身後的鄧揚光發出了一聲無奈的命令：「下去」，聲音裡十分愠怒，是認為我在欺侮他的「寬大無邊」，還是認為沒有讓我這顆「花崗石」腦袋不吃飯而後悔，我不知道。

在一萬雙眼睛的目送下，我從容走下了那宣判台，我聽見鄧揚光在距麥克風較遠的地方向誰發話，擴音器裡傳出了他隱約的命令聲：「這傢伙太猖狂了，把他銬起來再說。」

我微笑著走回我的座位，全場的人幾乎有一半的人站起身來看我落坐。

他們在交談著我和陳力在小監裡的那些故事，其中絕大多數人對我只聞其名，不見其面，今日看到不過是一個身披爛棉衣，極不起眼的人。

何慶雲提著一付亮閃閃的洋銬子走到我的面前，叫我站起身來，給我反銬了雙手，全場的視線再一次的向我這裡集中。

宣判會繼續開下去，不過此時的秩序已亂起來，整個的會場好像在開無數的小組討論會，亂哄哄的。

鄧揚光在主席臺上不停地喊著，指揮各隊隊長維持秩序。今天宣判中有四個人是一九六三年路過雅安監獄那次搶饅頭的「主犯」、當宣判到鍾平波時，判決書記著他的兩筆帳，其一記著雅安搶饅頭的帶頭肇事者，其二便是六六年春節在農一隊壩子裡的那一場傑出表演。

我看見他也是那麼自信的走上審判台，當宣判完畢，鄧揚光發問「你有什麼要說的？」麥克風裡傳來了引用「絞刑架下的報告」中、伏契克臨刑時留給世人的一句話：「歷史將宣判我無罪」，話音裡充滿了自信！

是的，歷史總有一天會作出公正的裁決，那一定是在黑暗被清算那一天，而我們已經在今天站在這裡，理直氣壯滿腔正義的向法庭表示了我們的藐視。

今天，這個對無辜者審判的會，變成了申張正義和信念的講臺，我們挺直腰向當局鄭重宣告：我們永遠不會被打殺所征服，也告訴所有在場的人們，當局連手無寸鐵的囚犯都鎮壓不下去，何能去對付全中國的老百姓？

至於鄧揚光自己也許沒有想到，自從這一次主持了全農場的公判大會以後，就再沒有主持過這種會了。尤其可悲的是他已被場部奪權上臺的革命委員會圈定為「走資派」，等著他的是，去場部剛剛辦起來的「毛澤東學習班」，接受別人的審查和勞動改造了！

在狂暴的文革時代，像這種還保持著讓被宣判人表態的公判大會，從此暫告結束。代之以對被宣判者濫用毆打、網綁、鎖喉的種種非法虐囚酷刑，這些慘不忍睹的場面，只有反映納粹監獄對猶太人，以及當年日本鬼子對待被俘抗日義士的影片中才能看到。

今天濫施的刑罰，除揭示那個時代的暴虐，遭到全世界人們同聲譴責外，等待他們的是正義審判。

宣判大會就這麼結束了，我雖然戴著刑具回到六隊，然而換來了精神上的舒暢。

吃過午飯後，何慶雲按照鄧揚光的旨意，佈置了各小組討論會，要大家結合自己的思想談出對今天宣判大會的體會。而我卻被單獨地叫到他的辦公室裡。

「為什麼你今天宣判大會上公開反對？」他冷靜地發問。

「我向來不說假話，心裡怎麼想就怎麼講，你們不是一向倡導這樣嗎？既要我表態，我只能按照我當時真實的想法說。」我的回答，使他答不上話來。然而他卻扯到了另一個話題：「你也看到了，該好好想想，為什麼全中國人民那麼擁戴毛主席？」

我沒有計較他對我的無理訓斥，在中共統治下，弱者的地位只能由強者任意的擺弄！不過，他提的問題卻真的值得深思，為什麼一個殘害那麼多百姓的暴君，還會受到一大群小青年橫流涕灑的擁戴？

能說清這個現象的只能用實例來回答他。於是我舉了赫赫有名的希特勒。

「請問！當年希特勒以國社黨黨魁的身分登上了國家最高元首以後，他的那些『崇拜』者，可能比今天的紅衛兵更加熾烈的擁護這個殺人魔王，難道說希特勒會因此而改變他的法西斯臭名麼？他的張牙舞爪能挽回最後滅亡的厄運嗎？」我回答了他。

利用社會矛盾，利用人們對權勢的盲目崇拜，取得一時聲勢的政治野心家，歷史上比比皆是。這是一個人信仰領域深層次的誤區！宗教的迷信，就是這種誤區的結果，將權力神化，變成想像中不可戰勝，絕對正確的宗教信條，最終將它歸之於至高無上的神。

再例如：跪著走上布達拉宮的石階，去向最高的喇嘛祈禱，卻不顧自己窮愁潦倒的現狀；清朝末年還將一個女人慈禧，神化為主宰一切的「老佛爺」。

如果人類沒有這種盲目崇信權勢的劣根，歷史上恐怕就沒有暴君逞威作福的舞臺了，「暴君」一詞也不會存在！當秦始皇在位時，哪一個臣民不山呼萬歲？

然而多行不義必招致人心的背向！人心的向背又必使暴君遺臭千古！秦始皇駕崩，他顯赫一時的地位和始業也就隨之完蛋！

我不能同這位工農兵學員說清這些道理！歷史的罪過決不可以通過靠權力而轉嫁他人的，不是麼？毛澤東不是把災難轉嫁給了老天爺和為他接生的產婆蘇聯麼？現在又轉嫁給劉少奇們這些曾被他稱作「親密戰友」的人了。

於是我問道，當人們看到毛澤東輕輕擺平劉少奇時，懾於他的詭計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接班人林彪，又怎麼想呢？

何慶雲又陷入了沉思，只是再次告誡我：「多聽聽全國人民的聲音，不要固執己見。」

於是，我只好回答他：「歷史還長得很，文革才剛剛開始，大家都不要把結論下早了，至於什麼才是正確的結論，只能是事實而不憑誰怎麼說。」

他再沒有同我辯論，只向我提了一個要求：「寫一個檢查吧！我們可以取消你的手銬，但要認錯明白麼？」接著他還說了一大堆場部管教科的苦心，說像我這樣大的罪，場部從輕處理，目的在促進我的轉變，要我認清形勢，不要辜負政府的一再挽救和教育。

然而，我沒能接受他的勸告和「好意」，只簡單的向他表態：「我不可能寫什麼檢查，就是寫了，任何人都會認為是假的，我何必幹這種自欺欺人的勾當？但是你今天提的，要我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想想他們何以會如此，我會冷靜下來觀察，並且在觀察期間，管住我的嘴，儘量不替你們找麻煩。」

這算是給何慶雲一個相當滿意的回答了，當時我想，形勢已十分惡劣，必須沈住氣留下時間和空間，觀察這個正在中國大地上席捲的政治風暴，怎樣破壞我們的國家，又怎樣走向它的反面。

就這樣，我就一直戴著那刑具，白天勞動去掉手銬，晚上睡覺繼續上銬，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足足戴了一年零四個月。

### 第三節：文化的浩劫——人權的厄運

一九六八年這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晚上，我戴著銬子睡在床上，翻來覆去沒法入睡，白天激動的餘波在靜夜中又喧沸起來，我真想同劉順森，或者張錫錕傾訴我的內心，但是我無法接近他們，聽見那睡在我前面的周學祝所發出的鼾聲，我便輕輕地坐起身來，這一天正是陰曆的三月下旬，滿天濃雲，院子裡很黑。

我想到院壩裡走走，但那是絕決不允許的，何況我戴著手銬，崗樓上的哨兵是要干涉的，弄得不好還會招來意外的麻煩。

我此刻想到這大監還不如小監，倘如此刻我還在小監中，無論是糧庫還是羊圈，我可以起身在屋裡徘徊，調整一下自己的神經。因為今天，對我來說，可算開始了一個新的起點。當著萬名流放者在審判臺上「宣誓」，可不是一時痛快博博取他們對我精神上的一句稱讚話那麼簡單！

回想三十年我的人生歷程，還不滿二十歲被濛濛幢幢圈成了「右派」，中國人講名份！孔子就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

「右派」這頂我根本就戴不住的帽子壓在我頭上，實際上是用歧視，飢餓和勞獄壓迫我稚嫩的神經，扭曲、扭曲再扭曲。

過度的刺激使我神經失常，過度的失望使我想結自己的生命！我就這麼為反抗個人的不幸，苦苦掙扎到今天。當我親身經歷了中國百姓的苦難，才在我無知和虛幻的頭腦中，紮扎下了對暴君仇恨的根。

然而：「決策不仁者險，陰計外洩者敗」。這便是我今天在審判臺上表達的意願，也許，到了這個時候，我一直被扭曲的神經才得以恢復！看到了中國的前途，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戴在我頭上沉重的大帽子被我甩掉了，我此刻的心情不再那麼壓抑，三十歲是我人生中一個新的里程碑！

#### （一）鑽鑽死角的災難

「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還是愛國主義」一發表，本該由毛所戴的叛徒、內奸、賣國賊罪名統統都戴在劉少奇的頭上。等待著把一大批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五類份子」又要增丁添口了。

那些正被劃為走資派的人，為了逃避厄運，表現自己對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忠誠，更以「極左」面孔對我們進行瘋狂的虐待。

新的場部領導派出了工作組坐鎮農六隊，制定了批鬥計畫，將六隊「頑固不化」的反改造份子進行了排隊，準備一個一個的推上鬥爭會收拾。

這樣的批判鬥爭，從五五年反胡風運動開始，至今也有十三年的歷史，掌握鬥爭會的老當權派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知道鬥垮一個被推上批鬥席上的人，首先要有一個足以使被鬥者精神互解的「鋼鞭」，將被鬥者行為中可以引起公憤的東西無限誇大，不惜無中生有的捏造。

例如：過去管過財務的，可以以帳目不清為突破口逼他承認自己貪污；愛占小便宜的盡可以歸入偷盜；個性強，愛與別人逞強打架、必可以說他是「流氓」；有男女親密跡象的，更可以無中生有的說成「通姦」等等。

但是對於監獄長期關押的我們，什麼都扯不上，於是只好在「語言」和「思想」上做文章，被鬥者語言稍有不慎，便會被無限上綱，扣上「對社會主義或三面紅旗進行惡毒攻擊」或「對偉大領袖造謠誣衊」之類的大帽子。

當然，像我這樣，不用他人戴帽自己就會承認的極端頑劣份子，便會以「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代言人」「帝修反的應聲蟲」之類套上，最後只有用「死路一條」來結論了。

然而，經念得不靈，敲木魚的人會厭煩，有時鬥爭會反被鬥爭者搶了理，數落起老百姓的苦難，共產黨宣傳盡說假話之類的时候，甚至主持會議的還要借被鬥爭者之口，趁機大發牢騷，使鬥爭會越來越開不下去。最後，變成了參加會的人胡謔瞎扯的龍門陣會。

自從《毛主席語錄》問世以後，組織鬥爭會時根本就不講什麼事實。主持人都學會用毛主席怎麼說就給被鬥爭者定了框框。偶然出現那被鬥者，據理力爭，那麼要使鬥爭會取得勝利結果，還必須仰仗操縱會議的打手班子。

文革一開始鬥爭會，無不以語錄開始，打手退神光，演出一齣一齣的醜劇。

四月二十一日，場部宣判大會以後，鹽源農場的氣氛一天緊似一天，首先是崗哨上的衛兵「加強防範」，列出許多新的規定，晚上解小便上廁所，只要一跨出監門必須呼喊報告。如果報告聲音太小，被認為沒有喊，輕則被老管們叫到崗樓下面麵罰站，重則哨兵從崗樓上下來人，一頓的毒打。

進出大門，必須先立正呼喊報告，得到崗樓兵允許後才准開步，否則便要被院子裡的巡邏哨兵攔住又是一頓打！在這種緊張的「階級鬥爭」氛圍下，鹽源農場批鬥牛鬼蛇神的鬥爭會，便從農六隊開始了。

## （二）「算總帳」

九月下旬的一天，剛剛吃過早飯以後，隊長徐世奎和管教何慶雲從出工的佇列中叫了八個人出列：

紅爐房的鐵匠吳興全曾當過鄧錫候員警的成都地頭蛇；木工鄧世權，一個在成都碼頭拜過袍哥紅旗管事的老痞子；當過國民黨軍隊上校作戰參謀，去成都參觀的朱國驥；曾任過原國民政府雅安城防司令的上校司令官王德全；曾是解放軍西藏軍區當過上尉軍需官，因投敵「判國」而受到成都軍事法庭判刑二十年的馬文華；以及周學祝，馮俊伯，代朝謀這些在六隊有代表性的「紅毛犯人」。

他們判刑前身份各異，「罪名」也不相同，但想從狗洞裡爬出去，獲得減刑的渴望卻是一樣的，為減刑而不惜踩在其他犯人的肩上，滿肚整人的壞水都一樣。

被叫出列以後，他們開了足足一上午的會，到中午我們收工回來時，都還沒有從隊部辦公室裡出來。

吃過午飯以後，何慶雲滿臉嚴肅的向全隊宣佈，下午不出工，全隊學習，並把我叫到了辦公室去，先將我的手銬上成反銬。我正猜測不知又要對我作何處理，何慶雲已經告訴我：「今天下午召開你的鬥爭會，反省這麼久，也該把污衊毛主席的言行及攻擊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放的毒，統統地消了。」

自一九六二年我在孫家花園反省室裡挨鬥爭以來，鬥爭會日漸少了，其中的原因，恐怕主要是這些鬥爭會無法開下去，比如說三年前在甘洛張棒棒組織的鬥爭會，幾乎變成了快要餓死的流放者的訴苦會。

近來，所採取的手段變成李培連所貫徹的「說服為主」，但沒理的理怎能說服人？說而不服，反被受教育者反過來說服了。

明明全國弄得來老百姓啼飢號寒，怎可強人接受「形勢大好」？即是方法和態度再講究，要把黑的說成白的都只能枉費心機！

當然魔王在一片反對聲中，正在組織新的陰謀，毛就說，已找到使「社教」運動有效進行新的方法，生養修整已整四年，到他反撲的時機了。

現在，又回到五年前了。對於老參加鬥爭會的「運動員」，自反右以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知道這樣的會早已「方式化」了。

第一步叫「退神光」，先對被鬥爭者拳打腳踢，輔之以口號，讓他先膽寒幾分，失去控制！接著便是在頸項上掛上水桶，使被鬥者無法將頭抬起來，只有埋著頭接受批判，名曰：「端正態度」！

第二步才是檢舉揭發，參加鬥爭的人站在被鬥者面前指奪著被鬥者鼻子，一邊辱罵，一邊戲謔，罵得性起，時不時給被鬥者的臉上，頭上搗上幾耳光，或者幾個人圍著被鬥者像打排球一樣把他當演練拳藝的肉靶子。

最後圍鬥的人玩累了，便讓被鬥者頸上掛著水桶，彎著腰站在中央，而大家便各自吹著與鬥爭會完全無關的龍門陣。

我不知道，中外歷史上有沒有這種「鬥爭會」的記載，還是毛澤東階級鬥爭的新發明，而專其利的。

總之鬥爭會是對被鬥者人格和身體的一種當眾羞辱，因經受不起這種人格羞辱和肉體折磨，文革中死於自殺的人無以數計，除非明白了這層用意，便不會被這種羞辱所擊倒。

何慶雲通知我以後，鬥爭會立刻進行，我還有點出其不意。按經驗，對付鬥爭會我要做的事，便是保護自己的前胸不被暴徒們打傷，今天雙手銬著，剝奪了我自衛前胸的能力，如果心黑的暴徒當胸給我兩拳，打斷了肋骨，或傷了胃、脾或下身，縱然不死也成了終生殘疾。

馬上想到該反穿一件棉被心應戰，哪怕是陰曆八月，為了防止胸部被打傷，熱一點也無所謂，但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硬著頭皮，倉卒促上陣。

我從何慶雲那裡回到寢室正在納悶，鄧自權和吳興全兩條老狗，已經兇神惡煞地跟著我到監舍來，兩人連推帶搯的把我扭到了一年前關押我的那間臨時保管室裡，現在那屋裡已經騰空。

屋子裡已塞滿了人，除「主持」會場的何慶雲坐在一張從辦公室搬來的凳子上，其餘的人全都站著，中間大約一公尺半徑的半圓圈，站著從各組選拔出來參加鬥爭會的打手。

我被鄧自權抓進門來便被他猛地一推，踉踉蹌蹌還沒有站穩，就聽見那吳興全雷鳴般的吼聲：「把反改造份子孔令平抓出來」，周圍的人附會那喊聲一齊吶喊，喊聲震得屋頂的瓦閣子都在咯咯作響。

我剛站穩身子將頭抬起來，冷不防在我身後的馮俊伯和周學祝，一邊一巴掌，打在我的後腦勺上使我一驚，正要扭過頭去向他問理，站在我兩邊的代朝謀馬文華，從左右兩側又給了我兩拳，與此同時站在我面前的王德權和朱國驥，用手指戳著我的額頭吼道：「你看清了，今天專門就是要打你的囂張氣焰，今天你不老實交代問題，便是自討苦吃！」

雙手背銬的我，即使沒有被吊上水桶，在幾個打手的包圍中，也完全失去了自衛的能力。那吳興全再次接連不斷地的呼喊口號，他喊一句，其他的人跟隨應和著，聲音響得像打雷，接著，拳頭雨點似的向我頭上落下來。

神光退完，態度「端正」後，何慶雲假惺惺地止住了打手們的亂拳，眯縫著他的近視眼睛看著我，他今天既是檢查者又是督戰官，他要檢查所組織的八名打手，是否按預先規定的方式在進行。

周學祝第一個發言，這個周駝背自去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公開表示以後，便成了何慶雲最相信的大組長。成立「特殊學習班」時，由李培連提名任了這個小組的組長，雖常常將我和陳力的言論記錄下來，打成「小報告」，但因為李培連主張，「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並沒有多去理會這條狗。

那時他裝出知識份子的溫文爾雅迷惑大家，因為知道我和陳力語言刻薄，打心眼裡渺視他，所以表面上對我倆十分謙恭，從不同我們發生任何正面衝突，縱有不同「看法」提出來之前都要聲明：「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文革風向徒轉，場部「工作組」一進六隊，他便靈敏地嗅出了全國的火藥味，立即變臉，六月二十八日晚上當著工作組的一齣表演，活畫出那種轉風使舵，投機取巧的能事，加上對我的言行都記錄在他那本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能準確舉出說話的時間地點以及原話，這都是何慶雲所需要的。

這些材料既是向我「算總帳」的依據，又是他請賞邀功，爭取減刑的材料。

「今年三月十六日中午，你在第二監舍門口，拿著人民日報指著那上面的標題，向全監舍的人高喊『這樣的世界領袖誰承認』？那標題寫著：『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燈塔』你還說，外國的人不像中國人那樣愚蠢，中國已經在他的引導下，連飯都沒得吃了，現在憑什麼拿來害別人？！」

「第二天下午，你在工地上散佈現在不是秦始皇時代了，不用霸道統治中國是萬萬不行的……」

周駝背的鋼鞭材料剛剛抖出，那個鄧自權便接著喊道：「不許反改造份子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朱國驥也緊接著眨著他那紅腫的眼睛吼道：「孔令平不交待代，今天休想過關！」

周圍一陣「毛主席萬歲」的口號，雖喊得七零八落，喊得肉麻，但十幾個人關在這不透風的屋子裡聲音像炸雷，令人頭痛，根本也不可能有我申辯和發言的餘地，我只好沈默。

「還有」，周學祝拿著他那筆記本繼續地念道：「今年四月五日上午在菜蔬地你向王世春說：『紅衛兵是毛澤東手裡的洋娃娃，想怎麼耍就怎麼耍。』你膽敢污衊紅衛兵，就憑這句話把你交給社會上的革命小將，就要把你捶扁，看你長得幾個腦袋？」

駝背話音一落，王德權立即補充：「你平時經常的把我們願意靠攏政府的人說成走狗、打手。今天要你說清楚，誰是走狗？」馮俊伯氣呼呼地吼道：「對，今天要你說明白，究竟是反動派的走狗，還是我們是政府的走狗。」又是一陣口號聲。吳興權扯足了嗓門吼道：「打倒反改造份子的囂張氣焰！」「孔令平不低頭認罪只有死路一條！」

「說，現在讓他說！」代朝謀吼道！「對，要他說！」馮俊伯和周學祝一齊朝我吼道！突然，我的頭上挨了猛的一拳。隨即一聲：「端正他的態度，他不說，就是軟抗！不說，就端正態度！」那是周學祝的喊聲，這喊聲如同號令，拳頭從四面八方雨點般向我的頭上身上落不來！

為了保護自己毫無屏障的胸部，我不得不將腰彎成一百二十度，前胸緊緊貼在我的雙膝上，背朝著上方，迎接著拳雨。

突然，有誰對我亮在背上的洋銬子狠狠捏了一下！那銬子立即收緊，裡圈的韌口像刀子一般地切入了我的手腕。一陣劇烈鑽心的疼痛後，我感到一股濕漉漉的血水浸了出來。

「好了，大家停手吧！」頭頂上傳來何慶雲的聲音，那聲音裡對剛才這一幕由他策劃的端正態度的開場，十分贊許！我被他從拳雨中「解救」出來，心中明白，為了鎮壓我的「囂張氣焰」，今天這緊湊的鬥爭方式中絕沒有我說話的餘地，在這時我只能咬緊牙關挨打，什麼也不說。

反正這樣的會以折磨人為目的，直到何慶雲向他的「領導」報告說：「我們已徹底鬥垮了這個頑固傢伙，他現在再不敢在小組會上公開攻擊文化大革命了。」

### （三）第三次絕食鬥爭

從下午兩點到七點，我被整整折磨了五個小時，晚上何慶雲打開了我的手銬，那銬子上的血垢已經變黑，他一邊故意看我的手臂，腿腳到處是青一塊紫一塊的累累傷痕，頭上頸上，更是疼痛不敢觸摸，一面還要奚落我，他的幸災樂禍顯然是對自己的詭計一種得意的欣賞，比之一年前，六月二十九日那晚剛來時，第一次打開我的土銬子的臉部表情，有多大的區別！

陳力被關進鹽源監獄，劉順森、鄧小祝，潘朝元被嚴密監視，成為一個個等待批鬥對象，使我無法接近他們，誰也不敢接近我，否則被發現後隨時可以被哨兵拉到崗樓下付以拳腳，在恐怖氣氛中個個只求自保了。

那一晚上我想了很久，最惡劣的時候終於到了。

我不可能對加給我的侮辱保持沈默，不作任何反應，但苦於無人商量，我又一次陷入極度孤立無援之中，已瘋狂的暴徒們更不講理了，如果用絕食來表達我對這場無理鬥爭的反抗，未必能對何慶雲起任何作用。

但是，我只能用這種「最無用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憤怒和反對了。

第二天清早起來，當何慶雲走來打開我的手銬時，我只向他宣佈了我的決定：「我抗議昨天下午對我的無理毆打，從今天開始我將絕食，直到你們取消這種殘暴無理的打人會為止。」我的第三次絕食鬥爭就這麼開始了。

我開始絕食的第一天，天氣陰霾。九月下旬的鹽源已是深秋時節，身上少了血液似的，穿著棉衣還感到冷，今天我摸不清還繼不繼續開我的鬥爭會，所以，早上起來就作了準備，趁何慶雲打開我的銬子後，便趕緊把棉被心反穿著，等待著厄運的進一步降臨。

吃過早飯後沒有喊我出工，特別將王德權專門留了不來，並由他口傳了何管教的三項「指示」：（一）不准我走出本監舍一步；（二）每頓由他負責給我拿飯菜，但過一個小時不吃，便由他收回廚房，任何人不得偷吃；（三）不准我吃其他的食物和水。

交代待完畢便同我一道留在監舍裡，此人雖說當過雅安城的上校城防司令，可現在看不出一點威風凜凜的「師座」氣派！大概由於十幾年的監禁使他身材極瘦，面色臘黃，配以身著千巴萬補的棉衣，像乾柴棒一樣乾枯的雙腳支撐著乾瘦的身體，僅從外表看極像前清時期的乞丐。

平時他的生活極為儉省，凡有吃不完的罐罐飯都捨不得給人，而是留在碗架上，有時放過幾天那飯已經酸臭發霉，仍倒進他那鐵鉢裡，拿到烘爐房的爐子裡煮開了吃。

不久前的一天，我們蔬菜組為了給苗鋪篩一點炭灰，以備過冬菜的保暖施用，在監獄大鐵門前那堆伙房裡倒出來的炭渣中篩灰，休息時他卻跑到附近垃圾堆裡去，撿來一大捧又破又臭的破衣服，那是看守們的家屬倒出來的東西。周學祝問他，撿那東西幹什麼？他說：「洗乾淨了補衣服。」

下班後他果然把這些破爛，拿到自來水龍頭沖洗，當時非常缺肥皂，平時洗衣用的是一種叫酸薑草草根泡水，洗淨後晾乾，就在那件千巴萬補的棉衣上，留下這些撿來的花花綠綠的爛布補的巴。

他說進監獄整整十五年了，家裡從來沒給他寄過一封信，更沒有寄過一點吃的東西，全憑苦苦的熬過來的。看到他同我一樣的孤身一人，如果不是昨天的鬥爭會和今天由何慶雲指派他來「監督」我，我對他一直抱著惻隱的同情心，可現在，我對他充滿了厭惡！

我問他：「你當城防司令那會，看到那些街上的乞丐，比你現在如何？」他尷尬的笑了笑，臉上全是苦澀，在我看來，他活得太可憐！本來可以不管的事，可他卻偏偏要做當局的狗，軍隊中有如此的軍官怎能指揮部隊克敵制勝？

我忍著全身劇烈疼痛，靠在監舍的牆上，靜靜凝視著窗外灰色的天空出神。忽然，王德權走過來，坐在我的旁邊，和顏悅色向我規勸道：「我們已夠苦了，何必還自討苦吃？」我斜視了他一眼，這個把命看得高於一切的人，是根本無法理解我的，我看見了他內心深處，良知被扭曲顯示出來的無奈和尷尬。

「聽說你在場部以前絕食兩次？」他繼續問道。關於我絕食的故事，來六隊以後我還從來沒有向人提起過，他又聽誰說的？我十分注意聽他怎麼說。



「我覺得何必去雞蛋碰石頭呢？比如說你上次絕食留下了什麼呢？大家都說你裝作不吃飯，暗地裡把自己的罐罐飯拿去同基三隊的小子們換雜糖吃。」

說到這裡，他那瘦削的臉上滑過一絲奸笑，彷彿在揭我的短，見我毫無表情，便接著說下去：「所以我說，玩這些都沒用，人不吃飯怎麼可以呢？我看你用不著給自己過不去，人到屋簷下，豈能不低頭，你我又算什麼？我看與其讓人奚落還不如吃飯為好！」他說完這番話，兩隻眼睛試探地盯著我。

對這個猥瑣的王德權，用自己可憐的小人肚腸來揣測我倒也罷了，反正他們根本無法理解我！可惡的是這何慶雲竟如此來詆毀和誣蔑我！

這個政權對大批餓死的無辜農民，尚無一點自責和反省，今天在文革非常時期，發生區區一個政治犯絕食，不是自找苦受麼？想到這裡，我的心裡開始徬徨起來……

晚上，院壩裡下著濛濛細雨，隔著我所在第二監舍足有五十公尺遠，昨天那間對我拳打腳踢的會場，正傳來口號聲和打人聲，鬥爭會照開不誤！只是今晚的主角變成了蔡先祿。

我這時的心，被鬥爭會傳過來的野蠻轟叫和痛苦呻吟衝擊著，我的絕食鬥爭，連阻止召開這種野蠻的打人會都不予與理會！不是非常悲哀麼？但是，我仍然咬著牙關堅持下去！因為我們可不是隨意像兒戲那樣鬧著玩的。我不能壞自己的人格！否則中華兒女對暴力的抗爭都成了兒戲，中國人還有什麼價值和尊嚴？

兩天、三天，王德權不再同我說話，空閒時間他仍在縫補他的千巴衣，炊事員周玉生把罐罐飯送到我監舍門口，他便接過來放在我的床頭，一個小時以後，他又端出去放在門邊的窗臺上。每天就只做這麼一個「動作」，他當然體會不到飢渴每分每秒在撕裂我肉體的痛苦。

我不禁想起兩年前在基三隊那次我同陳力的聯合「絕食」，那時那麼多年輕人關心我們，不但口頭上聲援我們，其中確曾有人，用零花錢買來自己都捨不得吃的雜糖，悄悄塞在我和陳力的鋪下，直到將我倆分開的那一天才被鄧揚光查出搜了去，這王德權聽說我們用罐罐飯換雜糖，大概就是指這麼一回事。

現在，我卻孤身一人，所有同情我的人此時都自身難保，準備迎接不知那一天便輪到自己上臺的「鬥爭會」。

其他的同難們都被這種兇猛的聲勢懾服，遠遠地隔著我，連經過窗口前都不敢向裡望一眼，最多只會在老遠處向我投過來一束同情的眼光。

我雖沒看過民主國度裡發生絕食的事，但我知道有這種事發生時，政府不但要專門進行調查和調解，對絕食人特別保護，在絕食期間還要對他們強制輸液，讓他們保持充沛的體力。允許新聞記者採訪絕食者，政府對絕食者提出的各種要求給與公開回答！

而今天，在「無產階級」專制霸道的淫威下，不但將絕食抗議的消息封鎖在高牆之內，還要用禁止被囚者在絕食期間喝水，以「徹底」征服一個手無寸鐵的抗議者！逼抗議者屈服。

窗外不斷地傳來高音喇叭的雜訊，那是場部的有線廣播站發出來的廣播聲。除了「奪權」、「奪權」的轟聲亂哄哄一片，一點也聽不清楚在說些什麼！但我知道，那喇叭傳出來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聲。

這幾天在中南海，正是紅衛兵揪鬥劉少奇的關鍵時刻，曾被規定為黨員必讀，紅極一時的《論共產黨員的休養》一書，突然成了一本「宣揚修正主義」的大毒草，劉少奇此刻正身陷紅衛兵的揪鬥圍攻之中，也許他正處於人生最無奈的悔恨之中。

北京傳聞，在揪鬥劉少奇的大會上，他對圍攻他的紅衛兵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為什麼你們要違反憲法的規定，剝奪我的人身權，你們這樣做是犯法的。」

可悲的是，這真是：「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歷史自會對劉少奇本人作公正的結論。在我看來，他只不過是一個用「共產黨員的修養」來包裝自己，充當獨裁政治在中國全面實施的吹鼓手，充當寡頭政治出謀劃策的幫兇，一個用三自一包這樣的修補，來延長毛澤東統治的幫閒政客，最後仍落得在獨裁營壘中自相傾軋的犧牲品。

當然，這一切都是因為當時的歷史背景所決定了，封建專制之中是不會產生中國一代民主主義優秀鬥士的，劉少奇自不會例外。沒有民主主義意識紮根的社會中，是不會產生為中國民主事業獻身的領袖的。

有趣的是，從當時北京傳出來的鬧哄哄廣播聲中，有一則當時「北京五一造反兵團」在中南海上演的一幕「揪劉絕食」鬥爭戲。在這個組織發表的絕食誓詞中，依裡哇啦的喊道：「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我們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頭可斷，血可流，絕食到底，不把劉賊揪出中南海誓不甘休。」

當然，在這場戲中所提的絕食鬥爭目標，肯定是要達到的。不過向一個即將淪為囚犯的人採用「絕食」，將他揪出中南海，可謂在中國文革上寫下了一則令人作嘔的笑話！當時也有這種權慾薰心的人會採用這種絕食鬥爭形式，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當時有一句出名的咒語「捨得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麼？」劉少奇算老幾？他不過是披在毛身上穿厭了的舊衣服！在毛澤東字典裡「國家主席」不過是一個隨時可以廢去的傀儡。

不過，被他唆使的五一造反兵團的頭們，這種被人愚弄的人可知，今天愚弄天下人，明天也會被他們的最高統帥當成一雙穿破的鞋，扔進垃圾桶的下場麼？

難怪何慶雲們對我的絕食，採取這樣的卑劣手法。他們既不明白我們在為什麼而鬥爭？也不會把我們的生死放在心上，還以為我也是同他玩這種「訛詐」的遊戲呢！

當然，像何慶雲這類人，壓根就不存在人性，一個「權」字指揮他的一切！這難道不是「文革」教育他們的嗎？這難道不是共產黨對他多年培養的麼？如果當時劉少奇掌權，這些人也會「誓死」保衛劉主席的。

五天以後，飢渴將我擊倒在囚鋪上，與其說是缺乏營養威脅著我的生命，不如說是水在索我的命，何慶雲授權王德權，要他嚴密監視我嚴禁我喝水，存心讓我「生不如死」。我能不能挺過這關，全憑老天爺了。

窗外飛起雨來，鹽源地區十月便要進入風季，在雨季結束以前總要下幾天雨。我聽見房簷水滴進門前陽溝中的滴答聲，雨聲誘惑著我將身體移向靠窗子的位置上，把窗子打開把頭伸了出去，我多麼想它能飄進屋裡來，濕潤一下乾涸如火的嘴唇。

王德權警惕地盯著我，猜測著我打開窗子想幹什麼？於是把頭探出了門外，四下張望著。

那院子裡沒有一個流放者，只有一個披著雨衣巡邏的士兵，見王德權鬼鬼祟祟的樣子，便向他這裡走來，向著站在門口四下探望的王德權喝道：「你幹什麼？」，王德權一驚，立即把頭縮了回來，滿臉堆笑現出一付諂媚的樣子回答道：「我看孔令平打開窗子幹什麼？」

哨兵板著臉指著他的頭冷笑道：「老傢伙你不要耍花招，以為會騙過我的眼睛。」

王德權平白無故的受了這幾句搶白，面上上尷尬極了，心底裡一定在罵道，「老子在過去早剝下你的皮。」但他表面上仍畢恭畢敬的站在那裡，垂著頭裝出一副可憐相。

那士兵走進屋來四下探望，見我睡在鋪上，毫無表情地看著他，便回頭輕蔑的向他喝道，「老實一點，別耍什麼鬼花招」，才慢慢出去了。

王德權一臉尷尬，當著我又不肯發作，只是搖了搖頭，過了一會便開始「繼續勸導」我，重複說些要識時務，不要自討苦吃的話。我已沒有精力去理他，只躺在那裡，繼續舐著乾得冒火的嘴唇。

這一天夜裡，我實在無法入睡，飢餓像貓爪一樣抓著我的胃，可此刻已被乾渴所替代，整個晚上我兩眼盯著天花板，一秒一秒地數著：一、二、三、……腦子裡全是水！水！

聽到房簷水滴在水溝裡的聲音，我忽然想起了放在床底下的尿盆，不知道那裡面還有沒有一點殘留的尿可喝，便爬起身來探頭去看，那床下放著的尿盆乾乾的連一點浮水印都沒有。我想起來了，絕食頭一天屙的尿已被王德權全倒掉了，以後接連已經五天沒有屙一點尿了。

我又盯著那鋪前的碗架子，不知那上面的碗裡有沒有留著沒倒淨的水？我知道，一個正常的人只要七天不喝水便會死亡，那大概是因為血液因缺水而凝滯，無法正常迴圈了吧，何況我還是一個挨打受傷的人。

五天臥床，挨打的地方，青包雖沒那麼痛了，但傷痕依舊，出血處的血痂已乾了巴，我意識到我正向死亡一秒一秒地接近，倒真想一下子昏厥過去，什麼不知道，免去了那份難熬的痛苦。

此時我想，現在所有的人都盯著我，好像正經歷著一場馬拉松的決賽，無時無刻地注意著我的一舉一動，倘若我挺不過去，中途使絕食流產，必會被何慶雲在鬥爭會上，沾沾自喜的奚落說：「對反動派不能講人道，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太寬大無邊，這些人囂張之極，你看現在我們遵循毛主席：『對階級敵人決不手軟』，以及反動的東西打不倒的教導，他們便規規矩矩的求饒了。」

從今以後，我們將絕對服從高定額的勞動任務，將無條件的被無理的抽打辱罵，不敢反抗，像王德權這樣的奴才也會譏笑我：「逞什麼硬骨頭，最後還不是服了拳打腳踢，真是賤骨頭。」所以無論怎麼樣，我必須堅持下去，捍衛人的尊嚴寧可死！

然而，又反過來想，在這幫失去人性的劊子手面前，用絕食正投合了他們殺人的陰謀呢，即使死了，拖出去埋了不算，照樣會被他們以「自棄於人民」相嘲笑，中共統治十七年來，在歷次運動中，自殺的人還少嗎！

這麼多年，無聲無息餓死的中國人有幾千萬！而活人，還不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呼毛主席萬歲。死人能損他一根汗毛麼？而我如果能活到這個專制崩潰那一天，我不但要做埋葬這個制度的掘墓人，還會做這監獄暴力虐待的見證人，這可比悄悄去死強過百倍。

於是我那焦渴冒煙的喉嚨裡，第一次吐出了喊聲：「王德權給我……水喝。」王德權詫異地放下手中的針線，湊過來盯著我，樣子怪怪的，不知道是在觀察我是不是馬上就要死去，還是覺得何慶雲的計畫終於得逞，我是不是要吃喝了？馬上把飯菜送到我的面前，我看見那裡面還有菜湯，我重新閉上了眼睛。

過了一會，我又低聲喊道：「我要喝水」，這一次他聽清楚了，卻連連擺手道：「啊，對不起，何幹事規定不能給你水喝。」他膽怯回答我，既怕違背了主人的規定，又怕我從床上翻身起來，抓住他死去，成了一條他欠下的冤魂孽債。

現在舌頭實在是強住了，說話全是打哆嗦，「水，我……喝水。」我看著窗外的大雨，

說也奇怪，我的每次絕食蒼天都在下雨，是他可憐我而在垂淚？還是灑下這甘霖以支持我的勇氣？我想上一次絕食時，我就是接的那發黃的屋簷水解渴，使我堅持了整整十一天！

想到這裡，我拼拚命地從床上爬起來，那王德權吃驚地注視著我，等到我踉踉蹌蹌的從碗架上面取下了一個盅子時，他才明白，慌忙的來搶我捏在手中的盅子，一面發抖的問道：「你要幹什麼？」我直直地盯著他，估計當時那樣子，一定非常令人恐懼！但是毫無力氣的我，還是被他從我的手上搶走了盅子。

趁他轉身放盅子的時候，我突然衝出了門，赤腳站在陰溝裡仰著頭，那從屋簷上如注般淌下的屋簷水，像甘霖一樣的沖刷著我的焦灼的臉，流進了我乾涸得裂開了血口的嘴唇。

然而我被王德權叫來的人強行拖進了屋裡！被重新按倒在鋪上。

五分鐘以後何慶雲從隊部辦公室打著傘來了，這一次他沒有說什麼！晚上加派了一個周駝背，兩個人守著我！

第六天晚上，唐啟榮進來了，按脈、聽心，一番診斷後，出去拿了一支針給我打了一針。第七天下午，頭腦似乎涼了許多，我被何慶雲叫到了隊部辦公室去。

「怎麼樣，硬骨頭還能撐多久？」他坐在我對面的辦公桌前，戲謔地開口道。對於面前這人，我連看都不願看他一眼，何況，此時我已衰渴到連話都說不出來的程度，焦渴乾裂的嘴唇努了半天，想對他這種卑鄙的手腕提出抗議，想申明，我這叫絕食而不是絕命，

想說「飯是你們給的，為了表達抗議和蔑視，我絕食。但是水是蒼天賜的，我沒有也不可能絕水。」但一句也沒有說出來，反倒是他幸災樂禍的說，「你不是絕食麼，怎麼連房簷水都要偷喝？」

對這種無賴已無需再費口舌，重新閉上了雙眼。良久，他終於開口勸道：「我勸你放明白一點，不要自討苦吃，要知道我們對你有的是辦法，你不過是找活罪受，我勸你不要再去喝屋簷水了，還是吃飯吧，至於你提什

麼條件，純屬多餘，鬥爭會開不開不由你決定。只要你今後不再亂說亂動，我們也沒有發瘋，把你整成什麼樣子，還不是你自已找的，所以，只要你保持沈默，我們不會開你的鬥爭會，這幾天，你沒有說話，你的鬥爭會不是停了麼？」

好一個會下臺階的何慶雲，好一個狡猾的狐狸。

雖然，我絕食開始提的條件答應了，但也只能適用於我一個人，而且還要用封住我的嘴，作為交換條件。不過，到了這種地步我也不想說任何的話！何況何慶雲的承諾，對我也算「小勝」了。我依然閉著眼睛什麼話也沒說。

「這樣吧！你已經整整七天沒有吃東西了，開始吃東西還不能吃乾的，否則腸胃受不了，弄不好會出大問題，今晚我已安排了炊事員為你特別熬了一鍋稀飯，先喝稀飯，把缺的水補充一下，才能開始逐漸進食。」此時他的語言非常軟和，好像又恢復到去年六月三十日，第一次他打開我的手銬時那種態度。

我沒有說話，眼下這個人可不是高德勝，這時我根本開不起口，乾澀的喉嚨好像被黏住了一般。晚上炊事員端了一個小鍋走進我的監舍來，何慶雲早已守候在那裡，屋子裡圍了好些人，其中有劉順森還有蔡先祿，他挨得我特別近。

王德全拿著勺湊過了來要餵我，卻被我推開了，雙手端起那盛稀飯的盅子，卻控制不穩，哆嗦發抖，慢慢喝下那盅稀飯。

稀飯下肚，一股暖流迅速地沖貫著我已僵硬的全身，我想，這時候幾乎要停止流動的血液，開始重新在我的體內流動了起來。

還沒有過半個小時，肚子裡嘖嘖咕咕直叫，我還沒有來得及站起身來，一股水像腹瀉一樣的瀉了我一身一床。何慶雲起身捏著鼻子走了出去。面對著如此失態，我只能閉著眼睛。

接著又是腹瀉，這才真叫對穿對過。比起上一次基三隊來，這一次厲害得多，大約是因為嚴重失水的緣故！

蔡先祿忙著來幫我脫下打髒了的衣服和被褥，順便在我的枕下扔下了一個小口袋，後來我打開看，那是一包他家送來的葡萄糖，我在心底裡默默的感謝這位貌不出眾的人，感謝他的善良，他曾經是虔誠的基督徒，以後每在復活節的那一天，他都要頌讀經文，他常說：「願主清除人們心靈中的罪惡。」

#### （四）鬥爭潘朝元

果然，六隊的鬥爭會，並沒有因我的絕食抗議而停止。鬥爭會場已由原來那間臨時糧倉搬到了壩子裡，還專門停下了生產，有一段時間從上午開始，將被鬥爭的對象扭送到院壩裡臨時搭起的台前，整整一天在壩子裡鬥！其模式、喊的口號、方式與鬥爭我時一樣。

我能起床走動的那幾天揪鬥的是潘朝元，潘朝元是當時農場中所關注的國民黨人員中級別最高的人之一，也是農六隊年紀最大，在官方看來最有影響的「歷史反革命。」他既不屑王德權的下流無恥，又不取張清雲的「見風使舵」。

平時一言一行頗有一點「萬古綱常擔上肩，脊梁鐵腰對皇天」的遺風，所以一直受鄧揚光的關注！被他列為重點監視的對象。

他平時言行一貫謹慎，遇到任何事都不急著發言，而是慢慢觀察。但是一旦出口，必「過經過脈」，切中要害，語言精練，這大概是他的文化素養和長達十七年的牢獄生活，積累起來的，因為他經常利用中共言行的矛盾，散佈與政府明顯對立的言論，而又不被抓住，所以當局始終把他看成一個人最危險的人物。

例如去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和陳力因發表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鬧農六隊，而遭到禁閉。第二天晚上，工作組仍然繼續舉行各組討論會，討論題目依然是：「你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這一次蒯處長指名點姓要我發言，開始他一直不願說話，耐不住蒯處長的一再催促，於是，他便講出了如下一段見解：

「依我看，黨中央根本不可能出現絲毫不統一，這道理很簡單，不是說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麼？何況他說統一戰線是一個法寶，對於非共產黨員的人，尚且要團結他們，共同為中國革命而鬥爭，怎麼可能對一起打江山的久經鍛鍊的共產黨人，說他們是叛徒呢？如果誰這麼說，我認為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蔑，對共產黨的誣蔑就是犯法。」

「所以，我認為，我們不能隨便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於人民內部矛盾。第一條就規定得清清楚楚，他說：有利於團結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人民都不允許分裂更何況中國共產黨內部。至於文化大革命是怎麼一回事，我確實糊里糊塗的，我們是接受共產黨長期教育的，不敢亂說，也不能亂說。」

這一段話講得那蒯處長在旁連連點頭，那周學祝看主持會場的人都在點頭贊許，也想唱一段文革頌歌，又覺得這不是時候。

我與他相處，始於我剛剛到孫家花園工廠第一天，有緣使我們至今很少分開過，我瞭解他藏而不露，秘而不宣的個性，在六隊我不止一次聽他講戰國時期齊魏爭霸中「圍魏救趙」的故事。

對秦始皇統一六國的評價，他講出來的就不是中共文革對嬴政統一六國的肯定，而是講他濫徵民工修長城，築阿房宮，對當年僅兩千萬人口的國家行督責暴政，對無辜老百姓無端殘殺，以為這樣可以保住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了。然而，他在沙丘剛剛歸天，陳勝、吳廣便在大澤鄉揭竿而起，劉邦在沛縣聚眾起義，秦王朝便在人民的反抗中，結束了短短十五年統治。

由於他平日待人寬厚，時時站在長者位置上給周圍的人幫助，他年事已高，無論資歷和知識都是六隊的同難中無人相比的，大家都尊稱他為「潘翁」。

他平時作為，被當局在犯人中的耳目收集，何慶雲對那「潘翁」稱謂十分反感，因此就認定他在六隊中處在「坐地使法」和「搖鵝毛扇」的位置，特別受到「關照」。所以繼我的鬥爭會，便把他推上了批鬥會的「主席臺」上。

不過，他畢竟不像我借「申訴」為屏障，常出怨言。開我的鬥爭會，我說的話信手拈來，平日抗拒出工頂撞幹部「違犯監規」的事，不勝枚舉，只消何管教一佈置，向打手班子一交代待，便立刻可把我抓出來，打罵齊下或刑具交加，或絕食收場，頗有點死豬不怕開水燙，令何管教感到棘手。

可鬥爭他就不那麼容易了，說言論他並無公開攻擊中共的東西，講他公開抗拒出工，呼喊煽動性的口號，或逃跑就更沒有證據，縱然可根據「語錄」本的條條給他加罪，但要鬥垮他就不容易，所以他的鬥爭會往往以冷場結束。這次何管教經反覆收集，找到三條「鋼鞭」要他在批鬥會上「老實交代待」：

第一條是根據當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下發的檔案，要求各地利用文革的大好形勢，認真清查在管期間的歷史反革命份子，過去沒交代代完的餘罪。

何慶雲進行了排隊，認為他極有可能「餘罪未清」。因此，在這次「批鬥運動」中要他主動交代待：解放前夕任金華地區行轅主任期間，殺害共軍的餘罪。

第二條：根據周學祝的記載，兩個月前有一天在開晚飯時，因天下了雨，院壩裡地上有點滑，抬飯的炊事員在進入監獄大鐵門時不小心滑倒，隨著抬飯槓子從他的肩上滑脫，盛著滾燙的稀飯桶傾斜著地，巨大的慣性使飯桶幾乎側翻傾倒。坐在蔬菜組最前面的老潘失聲驚叫：「飯桶要倒了。」

被後面的周學祝聽成「共產黨要倒了」！並加油添醋，說當時潘朝元正在讀報，那報紙上正是北京「反二月逆流」的綜合報導，他脫口而出這句話，分明別有所指。

這便成了鬥爭潘朝元的第二大罪狀，叫做極端仇恨無產階級專政，公開詛咒共產黨垮臺！要他在這次鬥爭大會上徹底交代待。

第三條：也是根據周學祝的筆錄，當時根據犯人的食油供應，每人每月有二兩菜油，二兩豬肉。炊事員為了集中使用這點油，平時按勞改隊常規每頓都是無油的水煮菜，每週安排一頓油煎菜，被稱為「小牙祭」。

這可是一個月只吃得到四次的油煎菜，所以每逢打小牙祭時，炊事員為了打給每個人的菜儘量公平，所以每瓢菜總要沾點油湯，舀時手中的瓢篩了又篩。

有一次，潘老端著一份剛剛從菜盆裡接過油煎馬鈴薯絲，帶著詼諧的口吻說：「喏，你們說人參貴，我看那李正祥打菜的樣子，真把馬鈴薯絲當成人參鬚了，哎，人參鬚，你們說像不像？」

這句話經周學祝一番製作，變成了在勞改隊吃一頓馬鈴薯絲比吃人參還要精貴，實足反映了潘朝元對現實生活的不滿。

今天說到這些，你未必相信當時監獄裡充滿荒唐，狗腿子挖空思想立功減刑，到何等卑鄙的程度！，

經何管教一整理，潘朝元犯有殺解放軍隱瞞不交代待；在服刑期間攻擊黨的「人道主義改造」政策；公開詛咒共產黨早日倒臺，三大罪狀，潘老成了隱藏極深，死不accept「改造」的歷史反革命份子。

「文字獄」是中國封建專制實行獨裁的手段之一，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初，民國廢棄不用的這種殘忍做法，被各級爪牙濫用，其汜濫遍於中國。文革時期姚文元寫出《評三家村札記》，把文字獄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歷代王朝中在文字上做文章的著名皇上，便是出身微賤當過和尚的朱元璋，由於忌諱他當和尚的童年，所以對「光」「禿」一類的字眼十分忌諱。朱元璋起事，曾被官軍稱為賊！做皇帝後，他最忌諱這賊，在官員進表中不能用「則」。

有一次，一位官員上表中有一段文字：「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他看後罵道：「生」者僧也，「光」是剃髮，說我是禿子，「則」是明目張膽說我當過賊。於是，降旨殺頭。

毛澤東畢竟不像朱元璋這文盲，隨意加以附會，但民間有人說「朱毛聯手」他便硬說是影射「豬毛」來咒罵他。寫他的語錄，錯一個字而落入死獄者何止一人？朱元璋還只限於在官員上表和儒生作文上大造文字獄。

對毛澤東三個字犯了名諱的老百姓受到追查，坐牢的就更「群眾」性了。姚文元、康生等人用筆殺人，使著名中共黨內秀才鄧拓喪命。過去在宮廷裡發生的慘絕人寰勾當，經毛澤東的文革寫作班子一效仿，便成為遍及國中之災了。

像鹽源這種偏僻的山野之地，周學祝這樣的小佞鬼都會根據流放者的隻言片語，牽強附會的拿到鬥爭會上作為鬥爭材料，在全國各地也不知有多少？畢竟是近代，殺人也貼告示。

文革期間看到貼出殺人佈告，動輒就是一小批，這些佈告中，根本不以「法律」為準繩，抓住「犯人」的隻言片語，死在佞鬼們製造的冤獄的無以數計。

何慶雲扭著要潘朝元交代「餘罪」就鬥了他三天。那正是我開始絕食以後，鬥爭會的場地離監舍較遠，那幾天，我睡在床上聽不清楚那裡在鬥爭誰。加上王德權的嚴格監視，我也無法知道鬥爭會的全過程。

直到後來，我才聽說，就連「潘翁」這個戲稱，也被說成反革命份子加的「官號」，用來煽動人心之用，被何慶雲一口咬定，鬥爭會變成了對他的逼供審訊。恐怖氣氛，籠罩了農六隊，那幾天人與人相逢，眼色不對都要拿到鬥爭會上追究。

還好，「偉大領袖」，因施政上太不得人心，使皇威「一落千丈」。加上共和多年，共產黨的信條，已無封建皇權那麼大。他的復辟，以及為復辟而恢復的封建時代種種酷刑，施行起來有相當阻力，所以才不至於肆無忌憚校仿古代皇帝的做法。但其玩弄百姓的手段可謂集古今之大成所沒有。

## （五）王氏膏藥

從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農三隊召開的那次全場宣判大會後，農六隊便成立了「嚴管組」。何慶雲將平時認為對政府最不聽話，想越獄逃亡的人收進了這個組中，這個組出工時，要集合點數，並由兩名武裝士兵押解外出，劉順森，王世春，劉資元，鄧小祝等人便是這個組最初的組員。在八月批鬥的人中這個組便占了三人，鬥爭會最後一名運動員便是嚴管組的王世春。

雖然這個人平時喜歡信口開河，嘩眾取寵，按其人品和素質不是當局特別關注的重點人物，然而他的一段對毛澤東語錄的「評論」，確是別開生面，十分「惡毒」，因此而將他關進了小監，並上報材料至鹽源法院，準備以他「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罪惡秋後問斬。

事情翻開一年前的老帳，去年十月份在全隊疏通堰溝的勞動時，他向身旁的人挑逗性的發問：

「都說毛澤東語錄靈驗得很，一句頂一萬句，但你們可能不知道，這紅寶書靈在那裡？」大家都摸透了他的脾氣，為了嘩眾取寵經常說一些笑話。便有人逗他說：「王世春，你又有什麼新發現？不妨說出來我們聽聽。」他便做了一個鬼臉說道：「紅寶書」，可以燒成灰作毛氏膏藥，也可以口服，包醫百病你們可曾聽說？

周圍的人都把臉轉向他，尖起耳朵聽聽他說些什麼？王世春見大家的注意力已被他吸引過來，便歪歪嘴做了一個令大家發笑的鬼臉開口道：「江湖人士王世春特為大家開出『寶書一族』藥方，供諸君一試，爾等聽著：有病可以治病，無病可以強身。

你若是害了多年的老哮喘，可以取毛主席語錄一本，燒成灰後用水沖服，立馬平咳止喘，化痰祛寒，每日早晚服用，十天一療程即可以斷掉病根，此方名曰：《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散》；

你若患多年不治之風濕老頑疾，則可將寶書灰調入老白乾二兩貼於患處，只消一夜，你抬不起的手，直不起的腰，舉不動的腳，都會靈活恢復如年輕時候一般，此方名曰：《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追風祛濕膏；若不加酒，孕婦則敷在小肚皮上，則可以保胎補血，養陰養血，此方名曰：《好得很，完全不是什麼糟》安胎藥；小兒用來貼肚臍眼，包管他夜不流尿，不哭不鬧，此方又名：《網舉目張》膏！咳！還可貼在你的丹田上專治陽痿，保管你雄風勃起，此方又稱：《東風壓倒西風》春藥，如此良藥各位不妨都試用一下。」

當時正值文革初潮，打人風初起，空氣已被弄得十分緊張，被他這麼一取笑，大家都哈哈大笑不止。「萬歲」經典，如此嚴肅的禁區，竟被他輕鬆之中奚落無餘。在周圍一片哄笑鬨笑聲中，被值班員馮俊伯掏出筆記本記錄下來，當晚即報告鄧揚光。

不過，當時還沒有任何人注意。事隔一年後，卻被何慶雲翻了老帳，指示批鬥小組將王世春推上了鬥爭會的「主講台」。

殊不知，一連三天挨打鬥爭，王世春便招架不住了，立刻在批鬥會上連連認錯，希圖用告饒的方法使鬥爭會不再繼續下去。他說：「那天發生的事，本來在逗大家樂，並沒有想到就此犯下了侮辱偉大領袖的滔天大罪。今後絕不敢胡說八道了。」殊不知他這麼一自白，反倒激怒了主持會議的人。

如此精心組織的批鬥會，豈容幾句認錯就可金蟬脫殼？非但沒有讓他「下去反省，寫出檢查」了事，反而加大了「火力」。

接連幾天的鬥爭，暴拳已使王世春遍體鱗傷，將他的左腳打癱，腰部打傷，彎著身子，再也抬不起頭來，在拳打腳踢下王世春跪地求饒，聲淚俱下的認了「罪」，一面抓屎糊臉把什麼「想組織監獄暴動」、「組織反革命集團」。這些根本與他風馬牛不相及的屎盆子，都拿來扣在自己頭上，還上挖曾祖父那輩，說他的祖先如何如何對共產黨刻骨仇恨，把死去一百年的亡靈，也請來在鬥爭會上陪他挨鬥，賭咒發誓，再也不敢污衊毛主席了。

殊不知一百年前共產黨還沒有出世，這不明明又讓何慶雲抓了辮子，把自己越套越緊？再次的拳打腳踢，逼著他寫了一個洋洋五千字的「交代材料」。承認他是六隊中最最狡猾的反改造份子，而被戴上刑具下到小監中，聽候「秋後問斬」。

直到三年後，林彪事件發作，對「毛主席語錄」在犯人中清查時，他才從小監中活著出來。

#### 第四節：牢卒子們的內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份，「鹽源農牧場的革命委員會」經過一年多的磋商後宣佈成立，「革命委員會」主任是一個從西昌軍區派來的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本場一個取名為「紅色造反總部」的頭目，叫林高明的人當上了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角色，原來農場的領導幾乎全部靠邊站。

高德勝消失了。聽說，他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驛馬堡被關在牛棚裡接受「監督」勞動，李培連也在那裡。

在宣佈革命委員會成立的大會上，原任西昌勞改大隊隊長段其豐，親自為成立大會佈置會場。從八月鬥爭系列會一互沒有露過面的鄧揚光站立一旁，成了為新上任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講話時，端茶送水的服務員。

### （一）林扯高鬧劇登臺

「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不幾天，那位新上任的革委會副主任林高明，便親臨六隊為重刑政治犯作「形勢和政

策」報告。

這一次，我親自看到了這位幾次交過白卷的農校中專生的「風采」，也看到了靠邊站著等候進入三結合領導班子的段其豐對林主任的恭維。

八點多鐘，就在院子裡平時開鬥爭會的地方擺著一張桌子，鄧揚光畢恭畢敬的宣佈報告會開始，請場革委會副主任林高明為大家宣讀中央文件。

林高明昂著頭很神氣地從鐵門牆角處走出來，坐在段其豐專門給他端來的靠背椅子上，鄧揚光為他端來了茶杯。等他入坐後，兩個戴著紅袖套的年輕人，也從那隊部辦公室走了出來，並站在林副主任的身旁。

我猜兩個青年人，多半是林高明的「保鏢」，一身軍服，標準的紅衛兵打扮，這大概算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紅衛兵了。

此時，我只能憑外表來判斷這三張「陌生」面孔，年輕挺威武的，像在哪兒見過？我突然想到了近代京戲！那打扮不正是臨摹舞臺上的麼？不過，當我再去看看那站在一邊的段其豐和鄧揚光時，腦海裡頓然閃出了三個奇怪的字：「走馬燈」。

時隔大約半年，原先的主角變成了跑龍套的，而新主角又換了新演員。

「今天向大家宣讀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最新檔案。」林高明拉長了嗓音長聲悠悠的宣佈報告會開始。這種顯示氣派的方法又不知是從哪裡學來的？想了一陣，便立即想到，每天廣播裡傳出來的副統帥就是這個聲調？不過，他這麼一開講顯得怪警扭的，我的身旁響起了一陣輕微的笑聲。

「在宣讀檔案之前，讓我們打開毛主席著作，先來學習一段毛主席的指示。」林高明頓了一下，壩子裡立刻又鬧轟起了一陣笑聲，而他卻用威嚴的目光鎮壓了這笑聲。「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是一篇光輝照人的著作，誰又在笑？真討厭！這些反革命！」他又停了一下，用眼向會場裡搜索著。但沒有看到是誰，於是便朗聲的繼續讀道：

「農民在村裡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甜夢，鄉里消息傳到城裡來，城裡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街談巷議。」

又是一陣哄笑，林高明停頓下來，他暗自想：這也真警扭，平時說順了的字，怎麼同這上面寫的字就不同了？比方說這紳字怎麼是這樣寫的？酣字怎麼寫成甜。巷字怎麼變：：成港了呢？大致自己都被弄得莫名其妙，讀起來怪拗口的。

所以，也就不好再「鎮壓」下面的笑聲了，只好拗著口繼續讀下去：「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曹得很……」他突然中止了，覺得特別難讀，平時在嘴上背誦的「順口溜」讀起來怎麼一下子全走了樣？一瞬間會場上再次發出了一陣笑聲。

鄧揚光慌忙地走過來，附在他耳上輕輕說了幾句，顯然在提醒他讀別字的地方，這使他非常難堪，逗了這些犯人一笑倒也無所謂，需知毛澤東的著作，一字一句是萬萬改不得也錯不得的，就在這些剛剛倒地的走資派中，就有許多人因竄改毛主席語錄的。而這些犯人中，恐怕少不了因曲解毛著或撕毀語錄而被打被關。

自己不是當著造反派的「同志們」面，一再宣誓不折不扣的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麼？但是這錯別字，如果碰上了關鍵字一錯，就是事關「問罪」的原則問題了，豈不嚴重？想到這裡，面對鬧哄笑不止的會場，他的臉上浮



現出了一層難看的沮喪。先前開場時那種神氣活現的表情頓然消逝了。

然而，這又怪誰呢？毛主席不是說，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應當批判麼？不是說越有知識越反動麼？不是說最為乾淨的還是大字不識的工人農民麼？讀幾個錯別字，不正好表現出那很「純」，很「乾淨」的勞動人民本色麼？勞動人民本來就是大老粗，去他媽的「本本主義」。

想到在學校讀書那會兒成天玩耍，師道雖顏面掃地了，苦讀正被批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早成了過街老鼠。文化大革命來了，拿著紅本本搞「批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抓出老師喊打倒「臭老九」，那真帶勁，自己雖讀到中專！還是覺得不學為好，學了既苦，反而成了「革命」的對象！

而今雖如同文盲，不過這也並沒有什麼不好，出了校門，拿著紅本本，奔全國，搞串聯，背誦著那上面的「經典」，也並不去弄清那上面寫了些什麼？

「奪權」靠的就是權術和出生成份，今天混到了這種地步，當上了這麼大農場的副主任，還不正是靠著在軍內的老漢和造反派兄弟們的支持？他腦海裡這麼一想，又恢復了先前那種神氣活現的樣子。

然而，當官也真不容易。首先，要讀從上面轉發下來的檔案，做報告、寫文章可就不像「串聯」、「奪權」那麼痛快！過去，不顧一切的去抓別人的辮子，就是鑽「當權派」不讀毛主席書的空子。現在讀錯了一句毛主席語錄都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座位打了一個掉，方才知道：「其實，讀書沒有用心還真碰上了今天這種麻煩！」

看來，為解眼下的尷尬局面，只有把手中的那紅本本關上，講自己已經熟悉的行話。

於是，他便將手中的紅寶書輕輕的扔在一旁，左手撐著下巴開始用他熟練而粗魯的口氣訓話：「我聽說你們當中有他媽幾個老混蛋，老反革命，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看不清今天一派大好形勢，硬要雞蛋碰石頭，同偉大共產黨對抗！以為自己那條命碰你一下濺你一身蛋黃。」

「聽說還有幾個大學生，特別囂張，讀了幾天臭書便扯高氣揚！你們哪一個敢站到這裡與我較量一下？老子不把你那扯高氣揚的勁頭打掉，教叫你永遠不再扯高氣揚，我就不姓林。」

說著便站起身來把他的皮衣向兩邊撩開，露出了別在腰上的槍套。先前臉上一時泛起的尷尬頓時一掃而空，代之以一副橫空出世的「氣慨」。

他這一番話中將「扯高氣揚」四個字讀得特別的響，將十二萬分的反感和仇恨都落在對他的奚落和挖苦上。

但是我想笑卻笑不出聲來了，這小子太狂，扣人帽子用了「成語」「趾高氣揚」卻沒弄清它的本意！同時還將趾字讀成了「扯」字！這一字之差便使這成語成了不類不倫！趾！指的是名詞和器官，而扯則是動詞，而今這中專生竟用來挖苦面前這些衣衫襤褸的囚徒！這味道有多酸卻是品不得的。

也罷！既然他喜歡用這個詞，並深惡痛絕這種對他藐視和不恭，就用此作了他的「雅號」吧！於是六隊給他取了一個方便大家都好稱呼的綽號：林扯高。

然而，尼姑坐不穩法台！

林彪事件敗落以後，他便從革委會副主任的寶座上迅速跌落下來，並被分配到農六隊當一名普通的管教幹事。在以後的幾年中，我目睹他怎樣借六隊的張錫錕「反革命」重案，用無辜者的生命染他的紅頂子，讓他東山再起，一度又奪回了失去的權力。

接著又被他的「同志們」重新推下臺來，直到九年以後，毛澤東命歸黃泉，文革收場，他的政治賭注也跟著全部輸光時，還癡迷到進入駐軍營房偷取槍枝，逃往耗牛山，揚言要「繼承毛澤東的遺志走井崗山的路」，最後以「上山為匪」的罪名被他的「同志們」送進了大牢，這是後話了，本文在以後章節中，還將繼續寫這個小丑的故事，給讀者一個完整交代。

六十年代，瘋狂的奪權運動使這些沒有靈魂的人渣，在「革命」浪潮中沉浮，出現林高明現象，全國十分普遍。他們是一批獨裁者手中的槍手，在被高層玩膩後，便拋在一邊，後來帶著他們一起殉葬！

他的訓話完畢，對擺在他面前的檔案看了看，也許意識到像他這種文化程度，萬一將檔中的關鍵用辭讀錯，被他的同事們抓住可不得了，因讀錯語錄而被抓進監獄的事，他親手就辦過好幾個案子，他明白周圍那些想打他主意的人正緊緊盯著他。於是他把它交給了守候在旁的鄧揚光。

一貫主持會場的鄧揚光正巴望著靠攏造反派組織，從被打倒的泥潭中早些「解脫出來」，見這位革委會副主任新上司如此賞識自己，便畢恭畢敬接過「林主任」遞給他的檔案。他明白這樣重要的事派給了自己，已經證明被打倒以來，他向新的權力靠攏了一大步，官復原職是指日可待的事，這叫做革命的「歸隊」。

可知，他在失去權力的一年中，受過不少的委曲和奚落，像他這種人不可一日無官位的，怪不得他今天態度這樣謙卑。

接過檔案端坐在方才林主任的位置上，清了清嗓門，他一字一句地宣讀：「關於在鹽源農牧場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決定！

當宣讀革委會成員名單中讀到林高明的名字，鄧揚光用一種說不出的目光，向坐在一邊的林高明致意。

革命委員會的誕生，表示毛澤東導演的宮廷政變已向政權基層擴展，文革兩年了，在奪權中失勢的人們正盼著這場「傀儡戲」的收場，這對於置身其外的我們，只冷眼旁觀小丑們鬧劇，並無任何興趣。

閻王殿裡誰做閻王，小鬼們都是上刀山下油鍋的料，「災害」年代，我們大量死於飢餓，而文革期間又大量死於棍棒和殺場。文字獄肆虐著中華民族！表面看太上皇用一種仇視知識份子的面孔，依靠像林高明這樣的連一個檔案都讀不下去的「文盲」們。

從那次大會以後，林高明開始取代了原來的何慶雲，暫時成為六隊的主管幹事！不過，尼姑坐不了法台，林高明的「主管」官運並不亨通，僅僅二年，便又重新被何慶雲奪了過去，並由此而演出了一場場笑劇！

我在下面講述的故事，與官方檔案裡記載的不同，這些事，反應當時社會關係進一步被扭曲的真象，作為文革的特寫，它們更真實的揭示了這個執政黨的又一段歷史。

其實文革初潮，無論是老當權派，還是躍躍欲試的奪權派，誰也沒有摸清這場宮廷政變的本質和毛澤東布下的遊戲規則，大家都直覺到風向陡轉的形勢，崗哨上和隊部這幾天異樣的變化，沒有人給我們傳來準確的「內部消息」，須說是一牆之隔，隊部那邊傳來的追殺聲和慘叫聲，誰也說不準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 （二）「好人」打「好人」

一九六八年大約十月初的某天晚上，大約九點鐘，我們聽見隔牆的隊部辦公室過道上，傳出了一陣陣吶喊聲和棍棒相擊的聲音。監獄的大門突然打開了，我們看到了滿臉是血的張事務長，正手提一根被打斷的青槓棒，從圍牆拐角處閃身而出，向那打開的鐵門狂奔著，在他的身後緊緊追趕著四個士兵，狂喊著：「抓住他，抓住他！」一齊跟著張事務長撲向大鐵門外，消失在夜幕之中。

大約五分鐘左右，通往場部的那條下坡機耕道方向，傳來了幾下清脆的槍聲。接著，童幹事以及新來的高歡，一齊從隊部辦公室向大監門外跑了出去，何慶雲關上了監門，暫時又什麼也聽不見了。

到了第二天便聽見住在養豬場的蘇代卓說：「昨晚張事務長被打傷了，現在住在醫院裡性命難保。」大家議論開了，問炊事員，張事務長什麼事得罪了當兵的？他也含糊糊說不清。

只說六隊今年自己餵的過年豬，推說過年要自己殺的，拒絕駐軍要一頭豬的要求，前幾天就在幹部小食堂裡吵起來了，那些當兵的是「支左」派，誰惹得起？吵架時候，當兵的就揚言要收拾張事務長，叫他小心點。

但是，我們想不到就因此動刀動槍的殺起仗來。當然，當兵的又全是新兵，二十歲左右的人，本來其中大部份都加入過紅衛兵，現在又是毛澤東最信任的支左部隊，就憑著手裡的槍桿子誰敢違抗他們？

不過，獄吏對囚奴作威作福，並沒收斂，因而加大了對關押囚奴的任意打罵。從六八年的開始，他們重新規定了一套對犯人更苛刻的「報告」制度。

白天出工收工，一律都要向崗哨上「報告」，沒有得到他們的回應誰都不敢動一步，凡是他們認為稍不順眼或違反了規定的人，都會拉到崗哨下面的「反省圈」裡，罰站並被拳打腳踢。有一段時間白天站在那裡挨繩子的人幾乎天天有，六隊院壩裡一時鬼哭神嚎。

當時分管蔬菜組的，是同我們一起從甘洛調來的湯幹事，我們早已風聞，他原是國民黨部隊的起義投誠人員，對於像他這種歷史背景的人怎麼會被留用於監獄成為一個管理犯人的幹部，我一直不清楚。

因為在戰場上受傷，他的右眼被打瞎，左腳被打斷，平時總是戴著眼鏡，走路也是一跛一拐的。大抵正因為與同事相比他自覺矮人三分，所以平時對我們還和氣，當時我們因為一直吃不飽，偷吃生蘿蔔、黃瓜是常有的事，他看見了也要把臉背過去，裝著什麼也沒看見，平常幫著菜蔬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正因為這樣，我們一直對他都非常尊重，不同他頂嘴，也不做使他感到為難的事，只因為他手中的權力太小，事事處處他都要小心翼翼，有幾次我因為肚子痛，向他請假去醫院看病，他都回絕道：「你去找何幹事吧！」

知道他膽子小，我們再沒向他請過假，只是偷偷的到醫院看病，即使抓住了，也只是說「我自己來的」便與他無關。

然而崗樓上這些當兵的，卻一直對他呼來喝去，把他當奴婢在使用，最令他為難的，便是冬天對他們的蔬菜供應！。

一到冬天，嚴霜和西北風使二道溝地區的菜地裡，再不會生長新鮮的蔬菜，農六隊大約五畝靠著水塘的菜蔬苗圃地，冬天靠那水塘裡積存下的死水，維持著蘿蔔、大白菜過冬，這些數量有限的鮮菜靠用炭灰「護兜」，稻草「護頂」，僅能滿足幾個幹部的供應，冬天犯人們吃的，全是夏天曬製的乾菜。

按照場部和駐軍在建場開始時所訂的「協議」，駐軍的蔬菜基本上由他們自己生產出來，場部為他們專門劃出了一片土質最肥沃的菜蔬地，還向他們提供需要的菜種和菜秧，不過，這些剛剛脫下千巴萬補的破衣裳，剛剛辭別「糠菜半年糧」的農家子弟們入伍以後，一穿上嶄新的軍衣，吃上優質伙食，用不了多長時間便忘掉了原先是老幾。

尤其以打砸搶為能事的「中學生」，習慣了拿來享用的習慣，那由場部劃給他們那片最肥沃的蔬菜地，經常長滿了亂草無人照料。

他們所吃的蔬菜基本上都是從鹽源縣城，甚至從兩百里外的西昌城裡用車拖回來的，然而駐軍們常嫌菜不夠鮮，特別在隆冬季節很少吃到蔬菜時，便向場部攤派，農六隊的駐軍把手直接伸向槍桿子底下這六隊「隊部」，於是每年從秋天開始，崗樓上的士兵對「鮮菜」的需求，便成了隊部最煩心的事。

那不到一個班的營房駐地，不知有什麼不可洩露的東西，平時絕對禁止囚奴們進入的，送鮮菜的活最先指定由守苗圃的夏守愚承擔，後來又改為菜蔬組長賀春濤，總之由老管親自選定的人來完成。

一九六七年以後，給營房送菜的差事，全落到了湯幹事一人頭上。我曾不止一次看見他背上一個小背兜，跛著腳一癱一拐的爬上那通向崗樓的梯坎，為這些年輕人送菜上去，冬天菜枯，於是他每天都要爬上梯坎，好像是這些士兵的勤務兵。

這些士兵卻很以為自得，不管地裡已砍不出什麼鮮菜，湯幹事心中一百個不情願。但支左時期，場裡的科長們，尚且要被挨整，何況他？也只能在背地裡咕嚕道，「一個個年輕力壯的，不但挑好吃的要，自己吃的菜還要給他們送到手邊。」

雖然這麼說，在槍桿子下面只好規規矩矩的服從，忍氣吞聲的承擔這個誰也沒有指派他的任務，宛如當年日本佔領時候的皇協軍，強迫維持會的村長，完成交給他們的攤派一樣。

守苗圃的犯名叫夏守愚，其窮兇極惡不在周學祝之下，當時六隊常住在外守棚子的僅只他一人，為了經營苗圃這個他個人的安樂窩，這個老傢伙手段之一，便是千方百計討好這些橫不講理的兵大爺。為了投這些士兵的好感，他專給他們供平時缺稀的菜。有時候幹部食堂都吃不上的菜，而在士兵的「伙食團」裡卻應有盡有，不但質量好，而且經常不計秤。

為了防止囚奴擅自撞進他的領地，夏守愚專門沿水庫，用竹地做了一圈欄杆，整個苗圃地留著兩道小門，一個通向六隊，一個通向場部，誰如果擅自進入他的苗圃，公開毀掉他小門的人，都會被老管門押到六隊壩子裡崗哨下的「反省圈」裡，挨他們的鞭打。

有一次快過春節了，因為苗圃地裡還留著大約只有三厘地的芫荽和小蔥，上面蓋著厚厚一層穀草，隊部向夏守愚打了招呼：「這點料，是留給幹部食堂過年的，沒有經隊部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取用。」

這事很快就被崗哨上的士兵知道了，開始還用命令的口氣，攤給湯幹事為他們辦點小蔥和芫荽，湯幹事回答說「苗圃裡已沒有這種菜了，你們不如到西昌採購」，想不到兵大爺自己跑到苗圃地裡，很快找到了那片芫荽地，便毫不客氣的將僅剩的全部挖淨。

湯幹事趕來問是怎麼回事？那士兵卻向湯幹事喝斥道：「你不說苗圃什麼也沒有嗎？姓湯的你還是識相點，否則有你好看的。」

那湯幹事明知是夏守愚串通了老管們幹的，卻並不敢去責問夏守愚，而是朝著挖得亂七八糟的泥土嘀咕道：「這那像解放軍，簡直比土匪都不如。」

這叫一報還一報，槍桿子裡出的不僅是政權，更出霸道，獄吏們也有被欺侮的時候。

### （三）高歡和童管教

自從六隊的鬥爭會中止以後，「軍管時期」到了。

張事務長的挨打，只是我們所見到的第一幕，自嚴管組建組以來，新來的高歡因特別對犯人下得了毒手，所以分管了嚴管組，這人同古柏中隊的李鐵臉都是北方人，沒有其他的本事，就是打人很下得了手。

那時每次嚴管組收工回來，都有人因各種雞毛蒜皮的事被他叫出列，站在崗哨下麵面「反省圈」裡，免不了挨他一頓毒打。特別是他那厚厚的軍用皮鞋，鞋尖處釘有鐵塊，被他踢過的人，要青腫幾個月才會消。

短短不到一年，在他腳尖下受傷的人，不會少於十人之多，故有外號人稱高鐵腳，然而，他的鐵腳也只能在備受凌辱的流放者身上逞威。

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個夜晚，晚上值班點名的正輪到他，按照往常的規定，他應當拿出點名冊，一組一組點名，清點人數確已到齊，才可下令解散，各回各的監舍就寢，後來有相當一段時間，值班的人為了省一點事，點名改為各組報數，各值班員只要清點本組人數到齊，便可報告值班幹事，由值班幹事發令解散。

既然「規矩」經過修改，這高歡自不例外，點名時並沒有帶點名冊，叫各組值班員自己清點人數。

當晚壩子裡響過報數聲後，中隊值班大組長馮俊伯向高歡報告了人數，他解散的命令剛響過，立即從崗樓上射下了一束白熾探照燈，崗哨上傳來一聲西充口音的大吼：「誰叫你們解散的？」

聽到這一聲吼，站在燈光下的犯人誰也不敢動，每個人心裡明白，在這段時間裡，誰如果違抗這些當兵傳出來的喝令，就是被打死也只能自認倒楣。

大家靜靜的觀察這高歡如何解決這種尷尬局面，只聽見那探照燈的背後另一個人又大聲吼道：「姓高的，幹啥吃的！晚上點名不帶點名冊，這就是你的工作態度？政府的工資就那麼好拿嗎？你這種馬馬虎虎的工作態度還配稱得做管教幹事？」那語音聽來幾乎像打雷，其語氣的尖銳同管教們平時對犯人的訓斥幾乎一樣。

那高歡被崗哨上傳下的命令喝住，平時那種對付犯人的威風勁此時不知哪裡去了，在探照燈光下站在那裡發呆。好一會，喃喃的向崗哨上的哨兵解釋道：「以往都是這樣清點人數的。」那崗哨上頓時發火道：「你還有什麼理由嘴硬，要不要你們管教科長向你說話？」

高歡心裡明白，站崗士兵哪有資格來管幹事們的事！這不等於爬到我高歡頭上拉屎嗎？當著這兩百號犯人朝我臉上吐口水，我這臉往哪兒擱？

沒想到他一點都沒有發脾氣，而是順從那士兵的命令，低頭一聲不吭向大門方向走去，不一會他取來點名冊，開始點名。

不過，那點名的聲音在顫抖，在槍桿子逼迫下點名，夠他銘記一生的。

解散後，大家回到自己的監舍，靜靜地聽那隔牆隊部辦公室有什麼動靜。按照我們的估計，平時那麼兇狠的高歡，不可能無緣無故受這一肚子氣而善罷甘休的，他回到隊部必會搬出救兵，狠狠地教訓那哨兵一頓。

可是我們想錯了，當時隊部靜悄悄的什麼反映也沒有。

第二天高歡就從六隊消失了，再沒有露面。為這件事六隊曾經議論了很長一段時間，有人說高歡本來就有軟處被支左部隊抓住，又有人說他去場部告狀提出辭呈再也不回六隊了，但這種明顯的黑吃黑竟被流放者目擊，共產黨不就講一個權嗎？誰在權力鬥爭中占上風，誰就贏得一切。

嚴管組的人不少人挨過他的踢，至今還留著傷痕，便齊聲咒罵這高鐵腳。

從此以後，晚上清點人數的「制度」又換了新方式，除按往常那樣站隊集合，還要有值班幹事按點名冊點名完畢，才由值周犯人大組長，向崗哨上報告當晚在監的總人數，等到崗哨上值班的哨兵回答一個「去」後，點名才算完畢。

如果那天碰上的那個哨兵情緒不快樂，存心刁難，在向他報告了人數後，卻遲遲的不喊出那個「去」字，那麼全體人員，包括當天值班的幹事還要傻呼呼站在那裡陪那士兵，被人捉弄慣了的流放者，早已對這種捉弄習以為常，然而這不明擺著欺侮到獄吏頭上了麼？

沒過幾天，晚上當班的是童幹事，六隊八名幹部中數他最年輕，調來農六隊後，同其他幹部素無來往，在六隊兩年多，只知道他下班後別的地方哪兒也不去，常一個人上水庫釣魚，誰要有事找他，在水庫上准會找到他。

「文化大革命」鬧得沸沸揚揚，唯獨他那派都不介入，我們聽說，他是場部的一名「逍遙派」，自從張事務長發生意外後，六隊就把事務長的工作分給他管。

那天晚上他仍按原來的老規矩，晚上學習後，他空著兩手走到院壩裡，當天值班的代朝謀，口令集合以後，他漫不經心說：「各組清完人就解散吧！」代朝謀猶疑了起來，站出列，悄聲把現在點名的規矩向他講了一遍，但他喊道：「你在講什麼呢？我聽不清楚，別哆嗦了，白天勞動了一天還沒有累啊，報數！」

各個組七零八落的報完數，完了，童幹事一聲解散的口令剛響過，崗樓上果然響起嚴厲的苛責聲，又是那個固執的西充佬，此時帶著怒不可遏的語氣大喝道：「站住！怎麼，規矩不懂麼？又要復辟麼？」

但是童幹事根本不理他，一面向大家擺擺手，一面好像沒聽見似的，扭頭朝監獄的大鐵門方向大步往回走。所有的流放者並沒有散去，而是站在那裡，看看這場神仙仗又會怎麼結果，西充佬怎麼對付這個「逍遙派」。

崗哨上的探照燈立刻打開了，燈光的光芯死死地跟著童幹事，「站住！站住！」西充人氣急敗壞地吼道：「回來，不然老子要開槍了！」童幹事停住了腳步，回過頭去對著探照燈射出的地方平靜回答道：「要幹什麼？」

「老子要你懂規矩，重新點名！」西充人在上面繼續咆哮道。不料，這位平時很少說話的童幹事抬起頭來，朗聲哈哈大笑，只聽他說道：「什麼玩藝兒，也不照照鏡子你算老幾？」話音剛落，身體已經走出了牆外的拐角處。

緊接著輕脆的衝鋒槍聲響了，一梭子彈打在對面小監的圍牆上，爆起了一股股飛濺的泥灰，探照燈光映出一股青煙，空氣裡散發出一股濃濃的火藥味！

隔著牆辦公室那邊傳來了喧嘩嘩的人聲，剛從場部調到六隊的最高行政長官，軍事代表林原喊下了崗哨上那個西充人，那西充人拿著手槍，惡聲罵道：「不按規矩辦事，老子一槍斃了你，你又把老子怎麼樣？」

那童幹事毫不示弱，回敬道：「量你小子沒那個狗膽，我可不是高歡。你小子可是狗拿耗子多事，你以為你是什麼人啊，你不過是一個普通當兵的，現在敢不敢把你的槍再對著我開一次？」

此時，崗哨上站著所有的哨兵，好像一觸便要爆發火併拼似的。

又過了一會，大鐵門外響起了汽車喇叭聲，看來警方和獄方的高層人員聞訊趕到了，牆外的爭吵聲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依舊是童幹事值班，表面上仍同往常一樣，就是嚴管組這一天卻沒有出工，因為哨兵說他們今天沒人帶隊，嚴管組樂得休息一天。

晚上清點人數時，童幹事還是昨天那若無其事的樣子，按照報數的老規矩點完人數以後，便向當天值日的組長周學祝努了努嘴，示意他向崗哨上報告人數。

以後點名就按照這個方式進行下去，看來這是雙方經過一天一夜的爭執達成一個新「默契」，既沒按士兵們的規矩辦，又表示尊重警方的存在。

只是犯人們多等了幾分鐘，增加了一道犯人值班組長向崗哨報告的方式，像這種神仙打仗倒楣的總是犯人，但獄警雙方這種逞強好勝，弱肉強食的法則在文革期間多次引發武力衝突，他們本就沒有什麼統一可言。

我們從這麼一點小事上，看到全國引發武鬥血案的起因，原來就這麼簡單。如果那一天童幹事和西充人再發展一步，難保不會有一場新的血案在六隊演出。

為了毛澤東政治上的需要，全國此時也不知有多少年輕人，因互不相讓，殞身在大大小小的武鬥戰場上。

這段日子裡，無論是白天和晚上，我們都常常聽見不知何方傳來的槍聲。

#### (四) 紅衛兵「墳」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們正在蔬菜地為剛移栽的菜種地施水時，聽見農六隊山樑背後，從鹽源方向傳來了密集的槍聲。槍聲越來越近，還沒到十點鐘，中隊長郭川小跑到蔬菜地裡傳令大家馬上收工，回到監舍後，大鐵門便被上了鎖，在壩子裡巡邏的士兵，喝令我們，不得在院壩裡閒逛、偷聽。

那時，隊部辦公室靜悄悄的，好像幹事們都出去了，直到吃午飯時，也沒有看到一個人影，到下午三點鐘，羊圈方向槍聲大作。

自從四月，六隊連續兩個月輪番批鬥會後，我們便籠罩在恐怖的氣氛中。這天下午，我們被哨兵攆回自己的監房後，劉順森向我遞了一個眼色，我便按照往常的約定，進了廁所。

今天，廁所裡一個人都沒有，我們倆選取了兩個相鄰的蹲位蹲下後，他告訴我：「揀糞的人帶回最近北京發生的最新消息，毛澤東與劉少奇火拼，劉少奇已被暗殺，楊尚昆已發動了兵諫。」他一面說，一面將一捲發黃的紙塞在我的手裡，那是不知那一個造反組織散發的傳單。

北京發生越來越公開的內訌，我們早有傳聞，劉少奇是否被人暗殺，楊尚昆是否因發動兵變而被拘捕，這些並不重要，何況，在我們這種被嚴密封鎖的情況下，在共產黨徹底垮臺以前，我們永遠都無法弄清楚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何況弄清這些消息的可靠性有必要嗎？

我們最最關心的是，毛澤東的獨裁已到了眾叛親離的程度，他的統治和開創的獨裁統治，究竟還有多長的壽命？在行將滅亡時，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倆進監獄時，都還二十歲，單純而又幼稚，入獄不到十年在煉獄中重新認識中共，但我們還不成熟，在這種複雜形勢下，單憑一腔熱血同專制主義去拚鬥，還遠遠不夠。

曾幾何時，監獄裡一陣打風就使一切都變了。現在恐怕像王世春那樣公開講「毛氏膏藥」笑話的人沒有了，我也不會像去年六月那樣在禁閉室裡公開吼「天都快亮了！」我們是否應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以修正，否則你我死絕了，這筆中共所欠下的債由誰來清算？

我們都深深陷入了沈默之中。

那天晚上，大監鐵門緊緊的關閉著，下午離開這裡的幹事們好像並沒有回來。晚上九點鐘，也沒有按往常那樣，集合點名。只聽見崗樓上傳出了哨兵的命令，「各組清點人數，回房睡覺，晚上不准出來走動。」表面上看，很平靜的夜裡，一種說不清的危險不知潛伏在那個角落裡。

大約十二點鐘左右，與我們一溝之隔的農一隊響起了密集的槍聲，接著就是一陣陣的哀樂，我估計就在附近，今天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如果那哀樂是在給武鬥中的死者送行，那麼那槍聲是在為死者致哀了。

哀樂持續到了第二天，第二天農六隊依然閉門不出工。直到下午才看見幹部們回來了，他們神情疲憊，衣袖上戴著白花……

幾天後，本組派出去揀糞的蕭肖弟良悄悄告訴我，鹽源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武鬥，從西昌開過來的全副武裝的紅衛兵造反兵團，與鹽源地區的保皇組織，在鹽源縣城裡激戰了兩天兩夜，死傷無數。

他看見那天下午五點鐘左右，從鹽源縣城開出來一支足有七八輛卡車的車隊，逕直開到了本農場農一隊大門口。這時天已黑了，護送卡車隊是十幾名全副武裝戴紅袖套的年輕人，沿農一隊進門處的過道上還布了若干的崗哨，監視著漆黑一片的野外。

車隊進入農一隊的大門後，從車上卸下了好多用白布裹好的擔架，當晚在壩子裡用綠色的帆布，搭起了一個巨大的棚帳，並在裡面設下了靈台。然後，在森嚴的戒備下，將這些白色的擔架抬進了靈堂裡。這些白布裹好的屍首，就是那天在鹽源的武鬥中「犧牲」的亡靈，靈堂裡奏湊起了哀樂。

從第二天開始，幾十名被挑選的就業人員，在武裝的紅袖籠監視下，就地挖了兩個大坑。坑挖好後，那些屍體就被安放在裡面，上面壘起了高三米的大墳塋。留下一個坑，大概是供下一批武鬥犧牲者用的。已經落成的大墳包周圍，插著用鐵皮和木牌製作的靈牌和挽聯，上面寫著死者的名姓，和「以血還血」、「討還血債」之類的標語。

從此以後的一段時間，農一隊的大壩子，便被紫紅袖籠的年輕人武裝看守著，平時不准任何人進去。

大約又過了一個多月的一個夜晚，那裡又一次響起了槍聲，一支不知從那裡來的紅袖籠，夜襲了這處墳地，據說是曾與他們發生武鬥的紅色造反組織，揚言要「踏平」這個山頭，挖出被埋的人，用他們已經腐爛了的屍體，去祭那場血腥戰鬥中被打死的戰友！雙方又一次血染了這個山樑。

嗚呼，在這種「和平年代」裡，究竟有什麼血海深仇在雙方心中解不開？難道他們連自己被人操縱，都不曾絲毫察覺？難道他們在打著誓死保衛他們領袖的時候，卻沒有好好想一想，這個領袖給中華民族帶來的除了空前的災難，貧窮、飢餓、同胞相殘殺外，什麼也沒有嗎？

而今這些愚昧的死者找不到一處墓穴，他們的亡靈在這荒郊野外徘徊，擔驚受怕！

我替這些死去的年輕人悲哀，可知道曾辛辛苦苦撫養他們成人的母親，聞得他們的兒子竟落到慘死武鬥場的下場，會怎麼傷心欲絕嗎？

中國年輕一代的人性怎麼會泯滅到這種程度？他們那強烈的復仇心怎麼會落到與自己相同命運的同胞身上了呢？這難到是中華民族的災難麼，它的後果會是怎樣呢？

想到這些我感到了恐懼，我一定會在今後的無數夜晚中，做著相似的惡夢！尤其是，我怎麼都沒想到，差不多就在這同一時期，千里之外我的弟弟被造反派無緣無故的害死，我的母親因此而投塘自殺，我的家正處在毀滅中……

我們曾住過羊圈反省室背後的那山頭上，原來是一片稀稀拉拉的松林，我們常常在這裡鏟草皮積肥。就在這一段時間，場部發了通知，禁止我們在那裡出入。後來，每當我們聽到從那裡播出的哀樂聲，便知道，那裡又增加了一片新的墳地。近段時間，那裡傳出的哀樂聲隔兩天就有一次，場部的幹部們真不知犯了什麼煞星，怎麼在短短時間內接二連三的死去？

——兩年以後，當那山坡靠堰溝的土地上種上了蘋果樹，我們去那裡栽樹，有機會再去那裡，結果舊貌換了新顏，原來稀稀落落的松林中，生出了幾十個新墳墓。

從那些墓碑上的記載，知道這些墳墓的主人都掛著政委、指導員、幹事等等頭銜、年齡都在三十歲上下，這些死者雖談不上那一級官員，但畢竟是「高踞」在我們之上的「國家幹部」。

墓碑上還記載著他們「悍懷毛主席革命路線」，因公殉職的事蹟。

可惜這些死去的人到死都不明白，自己在中國的專制主義復辟的巨大災難中，充當了可鄙的犧牲品！甚至於其中許多不悟之徒，在武鬥被槍殺時還狂呼「保衛毛主席」的口號。

### 第五節：軍事管制——打人狂潮

當然，神仙打仗五類更遭殃，在造反派們對監獄中大大小小當權派實行打倒在地時，又以更窮兇極惡的方式對付高牆之內的「政治犯」，除了用各種藉口動輒對我們體罰打罵，還加強了對我們實行精神上的折磨！給人洗腦是執政的共產黨對待老百姓，更是對待知識份子的一種精神虐待。

追溯起來，一個運動一開始就是「學習檔」，檔是什麼？檔就是規範人們行動的準則，在沒有法律的中國，就是靠「檔」強行規定今後應做些什麼，反對什麼。

當然洗腦是以專政作後盾的，專政是強行貫徹「檔」的保證，每個運動每個學習，非達到人們接受並認准一個新的規範才甘休。大家所做的高度統一了，便剝奪了社會成員的獨立思考的空間，對產生的後果不會再有異議。

開鬥爭會、開批判會是一種恐怖的洗腦。文化大革命，人們經歷著一種瘋狂的「大民主」洗腦，大字報滿天飛，鼓譟噪「壓倒一切」的主旋律。人們唱的是東方紅，東風壓倒西風。頌的是「大救星」，人們在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後，就像被魂被追掉一樣，只會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看的書只有毛澤東選集。

當我們聽到了「鬥私批修」、「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這種聳人聽聞的口號時，洗腦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峰。

我們用奇怪和肉麻的感覺，看到紅衛兵們狂跳忠字午，「早請示，晚彙報」時，一種新洗腦運動正瘋狂摧殘人性。可怕的是紅衛兵們，支左士兵們不容許我們在心裡面說些反對的話。我們最終沒有逃掉，令人噁心的「邪教」禮拜教父的儀式。

毛澤東一面縱容盲從的紅衛兵圍鬥「走資派」，一面就靠殺人和恐怖的「無產階級專政」來解脫全國餓死人的大罪大惡。

#### （一）「請罪」及打人風

就在我們站隊的院壩裡，東南方向的崗樓下，那裡佈置了一個早晚請罪台，臺上懸掛著一副毛澤東的彩色畫像。

按照崗樓上士兵們的規定，每天早上集合開飯和晚上集合安寢時，我們都必需站在那畫像前，將頭埋下完成向毛悔罪的儀式。

長達五分鐘之久，向一個魔鬼畫像低下倔強的頭，內心是何等憎惡！良知被強力扭曲的難受勁非同一般，這就是知識份子的軟弱！屈從是我們的可惡之處。

然而，腳趾頭終於沒拗過大腿，大家只好服從口令，站齊佇列立正，脫帽、低頭。然後由值班大組長領頌：「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他的頌聲剛一落，全體列隊回應「我有罪。」並六十度彎腰。

這時候我和劉順森，鄧小祝等人像木樁一樣地立著，嘴巴也封住了，一種莫大的侮辱，使我無法彎腰完成這喪失廉恥的動作。

「啪！」我的後腦勺上挨了重重一把掌。「把腰桿彎下去」！我身後正站著一個滿臉盛怒的支左兵，用兇神惡煞的兩眼狠狠地盯著我，我沒有理他，仍昂頭站著。「啪！」又是重重一記，這次是用槍托打的。頓時，我滿眼金光直冒！隨即聽到一聲斷喝：「出列！」我們幾個人一齊被叫到崗哨下的那片「反省區」內站著，一直罰站兩個小時。



為了應付這種對人的侮辱，每天早晚我都打光頭，免得那儀式舉行時「脫帽」的尷尬，預先修正我的姿勢從集合開始就保持著低頭，身體前傾，免去了更為難受的「鞠躬」。儘管如此，我們因沒有向那畫像鞠躬而累遭拳打腳踢。在毛澤東授意下，士兵們把魔鬼的威風發揮得淋漓盡致。

藉著文革淫風，六隊的駐軍越來越頻繁干預獄政，他們一面指責對我們「鬆懈」，作出許多新的規定，喊「報告」成了打我們經常的藉口，也成他們最快樂的事。

每個士兵隨身攜帶著兩件兇器，一根長一點五公尺，頭上磨得極鋒利的鋼長矛，用來專門刺人，一把長一米的青槓劍用來專門打人。

按照新要求，流放者出工收工除必須整隊報數外，還要向哨兵報告。哨兵認為佇列中有誰沒有站好，或報數聲太小，即令立即出列，站到崗樓下的反省圈裡。因不慎站進那圈裡，躲不過一頓青槓劍，打夠了才准離開。如果出工的人中有人未到，全組必須站在那裡等。

個人進出廚房或外出，要整衣、立正、報告，老管隨時以你某一動作沒有做好，而把你弄到反省圈裡，修理一頓。

一到晚上一舉一動更要小心。晚上是禁止任何人進出「警戒線」的，所謂警戒線是沒有範圍的，由他們隨意劃定，圍牆邊，廁所以外，大門口，到處都是他們指定的警戒線。越出警戒線不但要被打，還有可能吃槍子。

最令人提心吊膽的是半夜起夜上廁所，走出監舍門時，必須穿好衣褲，不准打赤膊，不准衣冠不整只穿內褲。然後立正高呼：「報告管理員，犯人某某上廁所」，待到解手完畢，走出廁所必須整好衣褲，高呼：「報告管理員某某犯人解手完畢回組」，又需得到哨兵一個「去」的回應，方能走動。

僅為了小便，哨兵可以因你衣服未穿好，報告聲音太小，未經哨兵答應，或報告用詞不當等藉口，而受到青槓棒「教育」，挨打的人，每晚上不計其數。

緊張時，晚上院壩裡被打慘叫聲徹夜不停。發展到翻身都必須喊報告，否則青槓棒侍候。晚飯是稀飯，每次起夜，在跨出監舍門時，就好像跨進了一個夜鬼橫行的恐怖世界。

小便脹了卻得忍著，實在忍不住了便要先作好準備，從穿衣到向崗哨報告的用詞，都要先想好，稍有不慎任何一個細節都可能帶來毒打。

有時為了避免上廁所，將尿撒在預先準備好的便盆中，如果老管們一旦發現或者早上拿到廁所去倒時，被老管抓到了，又是一頓青槓劍。

有一天蔬菜組的王文典上廁所解小便喊報告時，哨兵說他一邊提著褲子，一邊捏著生殖器，因而被認為是對哨兵的侮辱，當即被叫到反省圈裡，三個老管圍著他一頓毒打，使他的左腳脫臼，當場昏死過去，後來竟成了殘廢人！

然而風水也有輪流轉的時候，那在鬥爭會上對同難大打出手的吳鐵匠，便撞了一次「鬼」。

這天下午五點鐘光景，他從廁所解便出來，正在轉牆角的地方，不留神同哨兵幾乎撞了一個滿懷，那年輕人立即勃然大怒，用手中的梭標指著他的臉逼他退到牆裡。沒等吳老頭站穩，不問緣由，便將那長矛直刺他的左膀，頃刻間，鮮血立即流出，那年輕人連眼都不眨一下，將矛頭猛地抽出，血從那矛刺處像泉水一樣噴出，浸透了他的袖子。

面色慘白的吳老頭蹲在地上，他那一頭白髮在痛苦抖動，然而這刺刀見了紅的士兵還沒有息怒，抬起他那裝有鐵板的軍用皮鞋，朝已蹲下的吳老頭猛踢，一面還發狠地吼道：「看你這老雜種，還長不長眼？」

周圍有人脫口驚呼道：「殺人了！」喊聲還沒完，那長矛尖又轉向了那喊的人，嚇得他連忙打住。

五分鐘後，士兵揚長而去，衛生員唐啟榮慌忙走過來替他脫下棉衣，進行包紮，才看到。那雙刀利器正好割斷了手臂的動脈血管。

吳興全被老管刺成重傷，使一段時間被壓抑的農六隊囚奴，紛紛議論：「這老狗是命中註定，活該！」「惡人自有惡人收。」

「當犯人的真可憐！那吳老頭已無兒無女只是孤身一人了，死了也沒人來認屍呢！」人們從不同角度出於複雜的心情，來評論這個在鬥爭會上像瘋狗一樣狂喊的「狗腿子」。

吳老頭挨刺，對那些鬼迷心竅，想踩在別人身上爬出監獄的人，無疑起著「當頭棒喝」的警醒作用。當時隊部組織批鬥會的「八人小組」，全都挨過打或挨過皮鞋踢，這些士兵在肆虐時才不管那麼多呢！「文革」使人的獸性大發作。

這段時間，除了在院壩裡因進出大門，夜間解手而弄得雞飛狗跳外，老管們還「深入」到各監舍去，在那裡又擺開了一個「戰場」。

夜間查房是老管們的專職，也是這些變態年輕人逞兇作惡的最好時間，「文革」時期有「好人打壞人活該」作護身符，支左部隊打死人是不會受到追究的，夜晚肆虐，是這些喪失人性的年輕人發「洩」獸性的最佳機會。

不過，我始終沒有弄清楚，這些年輕人為什麼會變態到這種程度？從他們身上我因此理解了德國和日本士兵，在二戰期間發生的法西斯暴行。

然而，不知道因為打人太多，心中發虛，提防被打的人也有抱一命抵一命的拚拼命心態，夜間突然從身後襲擊他們。老管們對夜間流放者們的睡覺作了新的規定！規定睡覺時禁止蒙頭；頭手必須伸出鋪蓋外面；禁止在沒有喊報告時翻身；禁止在武裝巡邏離開監房時坐起身來；禁止在室內跟在巡邏者背後；禁止夜間起身不喊報告；禁止出監舍不喊報告。

士兵為了自己的安全，每個人都貼身穿著防彈服，查房時戴著剩下眼睛沒有蒙的大口罩，手裡握著青槓劍，只要見到蒙頭睡著的人，便不問理由也不打招呼，劈頭就朝那蒙著的頭砍去，因腳露在外面被打的人不計其數。

有一次，因為天氣有點冷，蔬菜組的楊家模白天太疲倦。蓋的被子在睡著時蒙住了眼睛，被查哨的老管劈頭一劍，那一劍正劈在楊家模的鼻樑上。

被猛擊驚醒的楊家模立刻驚慌的坐起身來，捂著鮮血直淌的鼻子。打人的士兵，立即退後兩步，抽出長矛準備迎敵，藉隨身攜帶的手電筒，看清楊家模的鼻血湧流不止，才收了長矛離去，當作什麼也沒有發生。

整個監舍被楊家模的驚叫和呻吟驚醒了，大家又不敢坐起身來，眼巴巴的看他用棉花塞住鼻孔，直到天亮了，唐啟榮才來，送到醫院確診鼻樑粉碎性骨折。

還有一個大田作業組的人被查哨的老管幾乎打瞎眼睛，被打後眼睛流血不止，當時不敢聲張，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到醫務室看，唐啟容看時他的左眼全是血，送到醫院檢查眼球破裂，成了終身殘廢。

至於手腳伸在外面被打傷的人就更不計其數，打傷後只在唐啟榮那裡包紮一下，還得繼續一瘸一拐的去出工。

因提心吊膽防腳被打，整夜不得安睡。有的人乾脆把被子縫成一個封閉的被筒，睡覺時將腳放進筒中，再用繩子紮緊，再熱的時候也不敢露出來。

我們稱士兵們這種夜間打人，叫「鬼殺」，鬼殺使文革以來已被弄得恐怖不堪的流放者，更提心吊膽過日子，晚上一度緊張到要小便前起床前就在鋪上先喊了報告，等到證明可以不挨打時，才小心翼翼地坐起身來，起了床，站在門口，辨別出門外無人，才向崗樓上喊報告。

文革中，這些打人成性的野獸，晚上變成了一群吃人的毒蝙蝠，在六隊這塊陰森的地獄裡到處亂飛，使我們生活在精神極度緊張之中無以緩和。一夜之間光監舍的報告聲就吵得人無法睡覺，毒蝙蝠好像隨時都可能出來吃人。

在這些打人狂中，有一個人因特別下得了手，使我無法忘記，這是一張保持著死人般陰沈的臉，在夜晚就像一個幽魂，他的名字我無從知道，只知道姓衛，每次他值班的晚上總要擺點流血事件才安心。

一到晚上，每到一個監舍，他都不會直接往裡撞，而是站在門外，像幽靈般閃著狼一樣的眼睛，向屋裡細細搜尋，一旦發現目標，他才跨進門，輕輕走過去，一直走到這個目標的面前，以閃電般的速度將手中的青槓劍猛的砍下。

這一劍砍下去，傷殘甚至性命的後果他是根本不考慮的，他只想從被打人的驚叫呻吟中得到快感。

從他出現以後，晚上寢室裡還沒有睡著的人，只要聽見一種特有的擦著地上輕輕的腳步聲，藉著夜色微弱的光，看見那鬼影子出現在門口，身上的汗毛就會倒豎起來。

有時，行兇後，看見他走出監舍，卻沒有想到他卻像鬼一樣的悄悄站在門外，誰如果這個時候發出咒罵，他立刻要殺回馬槍，把剛才被打的人押進崗哨下的反省圈，用更殘酷的懲罰對那人「炒回鍋肉」，所以即使被打得鮮血淋漓，被打的人還要強咬著牙不吭一聲。

我們中不免有人挨打後，對這種暴行嘀咕幾句，偏偏在這恐怖中一些新的變態鬼蜮，比周學祝、代朝謀更為惡毒。大抵為了向打人的士兵討好，往往將有人發牢騷的話記在一張白紙上。偷偷的塞給巡邏的士兵，讓發牢騷的人接連挨打，使得在緊張挨打之後，連聲都不敢吭。

鬼殺和無恥小人的密報，像一把無形的鉗，夾著囚奴的喉嚨，大氣都不敢出。

自從六八年春節時，湯幹事因一點芫荽和蔥子，被兩個老管炊事員當著流放者的面羞辱以後，隊部便將向崗哨上辦菜的事交給了蔬菜組的另一個組長賀春濤。那「崗樓重地」向來是不准犯人涉足的。

這賀春濤使用了一副專用的鐵勾交給老管們，每天十點鐘他在把菜辦好以後，用籃子裝好便提到那反省圈裡，上面的哨兵放下鐵勾來將菜提上去。

誰也沒想到，這送菜的機會成了賀春濤告密以取悅崗哨的「秘密」渠道，寫成的告密紙條放在籃子裡，瞞過了大監裡流放者的眼睛。使毒蝠準確的知道哪一個犯人，什麼時候說了老管們的「壞話」，及時加以打殺。

我因前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加刑會上戴上手銬後，因拒絕寫悔過書，便一直戴到第二年的八月份。白天一天的勞累已使我疲憊不堪，晚上還要戴著手銬，被監舍裡不停的杖責，呻吟吵得幾乎無法入睡，這種折磨越來越使我忍受不住，八月十一日這天夜裡，我幾乎又是一夜沒有睡覺。

第二天早上起床時，我坐在床上憤憤的說：「這簡直比法西斯集中營還厲害，晚上這麼打人還叫我們白天幹活不？」

睡在我旁邊的陳登也隨口接嘴道：「現在連晚上翻身都要喊報告了……」既然開了口，打破了好幾天的沈默，我便索性說下去：「真的，越是忍氣吞聲，這些當兵的越不把我們當人看。」周圍的人都用贊同的眼光看著我，可是沒有人再敢接下嘴，他們害怕犯人中的鬼蜮，害怕夜裡出沒的毒蝙蝠。

殊不知，我這兩段話，原封原樣的被賀春濤記錄在一張紙條上，並且在上午十點鐘，隨同當天送的菜一齊傳遞給崗樓上面！

## （二）我被打昏的體驗

高原八月的夜，雖然時處盛夏，不但不熱，反而十分的涼。這天晚上大約十一點鐘，下弦的月亮剛剛從高牆東北方的閣亭上露出臉來，把一縷慘白的光投瀉到這高牆中。

東北風呼嘯著掠過五號樑子的曠野，越過圍牆，刮著監舍房頂的瓦楞發出複雜的怪叫撲進這片空壩中，又由四周圍牆反射以後，院子裡寒風颯颯，十分寒冷。

此時從黑洞洞的監舍門窗裡不時傳出的「報告」呼叫，以及斷續的被打人發出的呻吟，誰如果站在這陰森森的壩子裡定會不寒而慄！然而這正是毒蝙蝠出沒的時候……

晚上，因為我戴著手銬，為了便於起夜，我的頭是朝著過道方向睡的。承蒙何慶雲的關照，我是緊緊挨著周學祝，以便隨時都置於政府耳目監視之下，一天的勞累，我已忘卻了早上起床時發生了什麼事。我的另一側陳登剛已呼呼大睡了，我也帶著極度的疲憊剛剛進入了朦朧中。

突然，我光著的頭上被刺刀猛戳了一下！我立即驚醒睜開眼，一道雪亮的手電筒光直刺著我的眼睛，我立即閉上眼，隨即坐了起來。恍惚中我看見了一個戴著口罩的人，正持著那把鐵梭標站在我的床前，在手電筒光照射下白得發亮的劍頭，正指著我的鼻尖。

「下來！」那人向我命令道，聽那聲音極像平時打人最厲害的姓衛的年輕人，但因為他的聲音是從那大口罩後面發出的，聽去異常的混濁。我只好順從他的指令，爬下了「床」。

此時，我從對方特別的冷峻中意識到今夜日子不好過。迅速追索我白天的言行，那句冒犯了這打人狂？是不是因為我早上起床時說的那兩句話。

但轉而又想，今天白天一天中本組從來沒有人同老管接觸過，周學祝上下班也一直在一起沒有離開過，而且白天也從沒有人提起這件事，事前沒有任何預感。

心中正思索著，他那長矛尖在我的臉上晃了一下，下令道：「走！」這動作和發令聲使我感到一股寒氣逼來，立即把破棉襖用在身上披著，作好了即將挨打的準備！便緩緩邁出監舍的門，向院壩裡走去。

在靜夜中手銬發出輕微的撞擊聲。慘白的月光投射在我的身上，幾顆星星在灰白色的夜幕中眨著狡詐的眼！好像是鬼在狞笑。夜風抖開了我的破棉襖，我感到一股陰慘慘的冷，好像正步入魔鬼出入的地方，牙幫子禁不住打起寒顫來，直到走進那反省圈裡。

因為始終沒有回頭，弄不清剛才把我押送到這兒的年輕人是誰，也弄不清此刻他站在我身後的什麼位置上。準備用什麼樣的兇器，採用什麼樣的刑罰？如此默默地站著，我試圖用耳朵發覺那小子在我的背後在幹什麼？

我明白，這些人對人用毒刑是很想得出花樣的，加上這麼一年多來武鬥中所見所聞。恐怕歷史上所有酷吏使用過的怪刑，都一齊在今天派上用場。今天，我會受什麼刑呢？

但是，我站了足足十分鐘，卻聽不見背後任何動靜。先前那爬上額頭的恐懼開始滑落下來。只是身上特別覺得「冷」。

十分鐘後，一陣輕微的腳步聲從遠處向我身後移近。剛才那一股恐懼，又陡然地爬上了我的額頭。

為了驅除這種恐怖，我使勁地聳了聳肩，把手銬撞得砰砰作響。一個陰沈的聲音終於在距我身後大約五公尺的地方向我發問了：「孔令平，你知不知道，現在叫你上這兒來是幹什麼嗎？」這一句，我聽清楚了，這是摘下了口罩發的本人的原音，這分明是那個打人連眼都不眨的傢伙，姓衛！對了，肯定是他。

但是，我還是想不起來，我在哪一點得罪了他？於是平靜地回答道：「不知道」同時也在準備挨打。

今天這魔鬼確乎不同於往常，那說打就打，說刺就刺的殺手風度，到現在還沒露出一點來。

「嘿！」一聲冷笑，「那麼好吧！你就想一想，別玩你那硬骨頭的一套！老子的刺刀是不認人的。」聲音裡透著殺氣，是想殺我幾刀，我的心頭一熱？聽命吧！但究竟又為什麼呢？可是刺刀遲遲地沒有向我刺來。

難道，他也玩「貓吃老鼠」那一套？為了捉弄已經被貓抓傷的到手獵物，「貓」在最後把耗子扯裂享用前，一定會把那遍體鱗傷的獵物放開，讓它跑，甚至還躲在老遠的地方，細細欣賞那耗子臨死前的垂死掙扎，以盡其樂趣。

經過幾次捉放，直到那耗子連爬起來的力氣也消耗盡時，才用腳爪去翻動它！直到貓玩膩了，耗子也氣絕身亡再逗不起來以後，才把它吃掉。

如此對峙了三分鐘，想到他那手中的長矛，只要一抬手隨時便會插入我的身體內，便打了個寒顫。

背後飄來陰森的問：「哼，你不是很聰明嗎，怎麼自己說的話不到一天就忘了？」我已感覺出貓已經完全玩夠了，該伸出利爪的時候了。但我感到奇怪，早上監舍裡，我和陳登不過兩三句話，怎麼這麼快就傳到了這惡鬼耳中了。

那兩句話不論是把監獄比作法西斯集中營，還是說老管不把我們當人看，都對他絕不過分。對於失去人性的毒蝙蝠也不會計較別人怎麼說他，它們根本沒有人性，也沒有羞恥心，只要告密者沒有另外的添鹽加醋，就憑這兩句話怎麼會陡起殺人的動機來？

想到這裡，剛才還籠罩著我心頭的恐懼在漸漸的消失，被貓撕裂的感覺我已經習慣了！

「我並沒有說什麼。」我平靜地回答著，這麼回答當然準備著挨打了。只是這一次，那姓衛的並沒有像往常那樣歇斯底里的狂叫，用聲勢來造他打人的氣氛。略略停頓了一分鐘，從牙縫中擠出來的惡氣一字一板說出：「毛主席老人家教導我們，凡是反動的東西不打不倒！」

隨著那個「倒」字的脫口而出，我就感到我的身後橫掃起了一股疾風，那風向從背後橫掃到我的面前，就在我鼻子下方，正對人中的穴位上，挨了十分沉重的一棍。

頓時滿眼火星直迸，口中噴出了一股血腥的氣味，當即門牙被打斷，嘴唇被打爛，滿口是血。耳朵裡噙的一聲巨響便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感覺不到了。

這可是我入監以來所受到的最利索的處罰，後來每當我想到當時的感覺，便會奇怪的想，吃槍子不過也是這個味道吧。

行兇前用教主的語錄給自己的暴行找個理由，這種當時最時髦的作法風靡全國，不知道古今中外的邪教，可否有例在先？

院子裡「撲通」一聲，隨著我的倒地，便一片沈寂。那一瞬間，可以聽得見晚風帶來十里外小金河邊農舍的狗吠聲。而那一刻，灰色夜空中，先前眨著鬼眼的星星也失聲驚叫起來，慌忙地躲到近旁的一片烏雲背後，慘白的月亮也躲進了雲端……

如此凝滯了半分鐘，那姓衛的傢伙終於按捺不住他裝出來的冷漠和沈著，一種因為沒用恐怖征服對方，以刺激自己殺人獸性所爆發的靈魂失落，猛烈刺激著他，掄起他手中的青槓劍發狂地向我身上亂砍。

院壩裡頓時一陣劈劈啪啪的響聲，然而越是如此，越使這頭瘋狂的野獸發狂，因為砍下的每一棍，就像砍在死物身上，除枯燥的「撲撲」聲外，卻唯獨缺了被砍人的慘號和告饒帶給他的刺激和快樂。

十分鐘後，大監門的轉角處閃出了林原的身影，他的老婆此時正是成都軍區，支左辦公室的紅人，成都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他這種身分使他具有號令崗樓上所有軍人的力量，上次童幹事與軍人的僵局，便是由他出面調解的。

此時，他大步地朝我們走來，顯然他已經聽了許久，知道牆內發生的事，所以他邊走，邊喝令那姓衛的住手，這瘋狂的野獸終於收住了手中的青槓劍。

林原走到我的面前站了半分鐘，一句話也沒說，轉身走向菜蔬組所在的二號監房，吩咐彭文學將我從院壩裡背進監舍去。回身又到辦公室去，拿來了戴手銬的鑰匙，替我解下了那副手銬。

截至今晚為止，那手銬在我的手上足戴了一年另四個月，被我的體溫冷暖了整整五百個夜晚，被我的手頸擦得雪亮亮的。

從那一天起，沒有經過正式的宣佈，再沒有給我重新上銬。

唐啟榮也提著藥箱走來了，人們開始七手八腳的對我「急救」。

大約到了第二天凌晨三點鐘光景，我才在大家的搶救下，漸漸甦醒過來，睜開眼睛，我的第一感覺便是周身像在冰窖中似的寒冷，禁不住牙幫磕出聲來。隨即感到滿口的血腥味，想吐掉那口中的瘀血卻使不出力來。感到口腔空蕩蕩的，用舌一頂，上排的門牙已經沒有了，用舌頭去舐，剛剛一伸出來，便碰著厚厚的血痂……

我低聲地呻喚起來，彭文學忙向我的唇邊遞來了一匙溫開水。我漸漸恢復了記憶，我想起來了，想起幾個小時前，我站在崗哨下的反省區內；想起了那姓衛的猙獰的面目，心中明白我遭受到的一切。便想扭動身軀，掙扎著坐起身來，陡然招來一陣劇痛一點也沒有遂願。

不光是頭部，還有胸部，雙臂，腰桿全身幾乎都不聽使喚，動到那裡，那裡便是一陣疼痛。

後來我傷勢好轉後，清點了全身大小四十幾處青痕血印，重點分佈在雙臂肩部和身軀，真是慘不忍睹！人間的仇隙與友情一樣，本是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感情產生的，這種無緣無故的毒打，就是在封建時代也難看見，衙門中當差的差役要杖打囚犯，也要「堂上」大老爺開口。就是關在大牢黑房中用刑，目的在逼出口供，而我挨的這頓打又算什麼呢？它只是征服者對奴隸的任意虐待！

老天爺見證這一樁樁血腥事件，記載著這些魔鬼所欠下的筆筆血債，這種無緣無故虐殺無辜，除了當年日本鬼子曾在中華大地上犯過，便只有在今天！

一部份中國人，無端的殘殺另一些無辜的中國人，這罪惡該到何年何月才算結束？那些年代，中國無端被殘害的冤魂屈鬼，何年何日才能冥目？！

然而禍事還沒有結束，在那個年代無辜被打傷的人誰也不敢救助，倘如誰向他伸出救援的手，便是「立場錯誤」，連救援的手也要被砍斷。對我們這些已經擺明的「階級敵人」，無產階級「人道主義」是不管用的。

我們這些人，經歷那麼多出生入死，活到現在已很不容易，現在，在這種打殺高潮期間，被這些野獸打傷後，非但不得請假就醫，第二天還得照常出工。誰如果批准受傷人留隊養傷，那麼誰等於自找麻煩，除非權力能壓倒元兇。

當時，農六隊因晚上呼報告，「不慎」被打傷的，沒有一人敢留下來休息的，比如本組的王文典、陳孝虞、鄧家訓，楊厚模等人先後挨過打，而且，王文典的腳還被打成脫臼，向湯幹事請假，湯幹事不敢准他休息。白天還要被背著上蔬菜地，「你死也死到工地去吧」！湯幹事無奈的說。

我這一次受的重傷，幸得林原的干預，總算第二天倖免了「死」在工地的厄運，一直臥床十天，方能起來走動。

然而，在那一段時間裡飲食，拉屎、拉尿我都無法自理，口腔上顎被打爛，飯食只能吃「流汁」。我咬著牙關，忍著疼同傷殘作鬥爭，但是，開始幾天由誰來給我端水送飯，倒屎倒尿便成了大問題！那姓衛的惡鬼，看見我睡在床上，雖然暫時不便發作，但是隨時都在尋找岔子。

從我開始臥床的第一天他便向蔬菜組宣佈：「誰要是替孔令平送水餵飯，便要得到相同的下場。」而且放出風來：「像這樣頑固抗拒改造的份子，就是死了真是大快人心！」

彭文學告訴我，他聽見童幹事曾與那姓衛的兵爭執過。

童幹事說：「你把人打死了，你也脫不到爪！」

衛回答：「毛主席老人家早就說過了：『好人打壞人活該，打死兩個數一雙！』」

童幹事：「共產黨的政策怕不是你說的這樣呵！」

衛回答：「現在是階級鬥爭非常時期，打死幾個階級敵人是革命的需要！」

童幹事只好冷笑而不再答他的腔。

開始，雖然我周圍的同難們可以悄悄給我拿飯菜，也可以到那間才搭好的熬藥房裡煮成稀飯。但是誰也不敢餵我，尤其是誰也不敢替我倒屎尿，因為雖然那姓衛的沒看見，內部卻有奸細，被姓衛的發現了可不得了。

在這個難堪的時候，潘老站出來了。

我受傷的第二天中午，收工歸來，他將他蒼老的臉貼在我的額頭上輕聲問道：「怎麼了，沒傷著致命處吧？」那天中午的飯菜便是他一口一口餵給我吃的，並且當眾向大家宣佈：「今後他的生活由我來負責，我這大把年紀了，活也活夠了，就是死也沒什麼，我不相信給一個重傷的人送飯餵飯就犯什麼法。」

他是與我共渡過八年患難的長者，在我最感困難的時候，面對兇殘的野獸挺身而出，冒著危險保護我更使我倍受感動！在這種精神的鼓勵下，我咬緊牙關，發誓用最快速度恢復身體，倔強地站起來，一定要儘快站起來！

從那天起，每天早起，他便端著我的尿盆，當著哨兵的面穿過屋前廊沿，端進廁所去倒掉。每頓飯食，由他專門替我領，煮成稀飯再小口小口的餵進我的嘴裡。一邊餵，一邊低聲的向我講商紂王挖比干心，把箕子監囚成奴的故事，結果周武王終於在朝歌。討滅了暴虐的紂王。

晚上蔡先祿來看我，給我送來一小墨水瓶的藥酒。我感激地接過他的酒以後，便悄悄地叫他把耳朵貼在我的嘴邊，請他務必將潘老服侍我的事向林原報告一聲，並請林管教阻止那姓衛的向潘老下毒手。

從此以後，我便在床上先練手，先活動上肢，再對受傷處按摩，加強了腿部和腰的活動能力。三天後，我的手能夠拿東西，能夠自己端飯吃，口腔裡的傷勢也很快恢復！

一周以後，我能坐起身來並能左右旋轉身體，還能將腳從床上自由放下地。十天以後，我便能下地走路。

正當我可以勉強下地走路以後，一個晚上大約十二點光景，一束強烈的手電筒光將我全身射定，我被強光所驚醒，避開那手電筒光的一瞬間。我看到了那張毫無血色的臉！想起古柏那位李管教，凡是心腸歹毒的人其臉色都這麼慘白，彷彿被魔鬼將他身上的血吸幹，變成了一具僵屍鬼。

今天他沒有帶口罩，他那鐵長矛鋒利的刃口，已在我的光頭「輕輕」點劃起來。心中一沉，做了對付新「懲罰」的準備。然而，這一次他在我頭上劃了兩下便收住了那長矛。

我頭上響起他那「鬼魂」一樣的命令：「從明天起，白天老子再看到你睡在這裡，招呼你的腦袋。」

在當時條件下，即使鬥贏他未必光彩。匹夫之勇不可取！為了早日恢復受傷的腰腿，我不能再躺下去了，我必須站起來。因此，明天我決定到工地去。

第二天一早，陳蕭肖虞、蕭肖弟良牽扶著我慢慢走出了大監的鐵門。從鐵門到菜蔬地三百米遠的距離，我們三個人走了半個多小時。

到了菜園地，他們又幫助我在一處靜僻的背山坎，在潮濕的泥土上墊了一床蓑衣。那一天天氣晴朗，空氣特別清新，從此以後，我便堅持天天上山，在大家監護下，渡過了這一段養傷日子。

### （三）大搜查

每逢過年過節，令我們最難堪和傷心的事，便是以衛生為名，對我們進行的徹底「大搜查」。

說令我們難堪，是因為我們好不容易利用休息時間找到的一些另類書籍，為積累知識所作的筆記，若不精心掩藏，就要被何慶雲搜索一空，不但為損失珍藏的東西而心痛，弄得不好還要被辱罵和毆打。

大檢查那一天，先將我們集中在壩子裡，一列士兵站在集合隊伍的後面。每個人都戴著一個大口罩，嚴嚴實實封住了臉，以防檢查過程中，犯人被窩和床上的臭氣或細菌侵入他們的鼻腔，僅留一雙鷹眼，監視著院子裡每一個接受「搜查」的人。

站隊集合以後，宣佈檢查，由中隊長宣佈「紀律」：禁止私自出入監舍；禁止來回走動；禁止藏埋東西；禁止離位；禁止相互交談；禁止互遞物品；凡有藏匿各種違禁物品的，必須立即交出。否則，後果自負。

野獸是以踐踏人類的文明為樂事的。「文革」時代，這種搜查便成了見「字」便收的程度。見到我寫的，那怕是抄下來的一首古詩，也要拿去。所以我特別憎惡這種搶劫式的大檢查。這種突如其來的大搜查，簡直是一種公開洗劫。

這種以「檢查衛生」為名的搜查，目的是將反抗的火種，消滅在最初的萌芽中。對流放者僅有一點糧票、現金一律沒收。發現私刻的公章、介紹信、手抄文件除沒收外還要盤問追查。

「文革」時期，非毛氏的一切書刊都一律要被搜去，一律沒收。所以，每一次衛生檢查，也是對我們的一次精神虐待。

檢查開始，我們依次在士兵監視下，抱出各自的行李衣物放在自己的身旁。直到將監舍裡要檢查的東西搬空。

然後，一批檢查人員進入監舍，仔細地翻尋鋪草、床板和牆隙、壁縫，找到隱藏其中的物品，便丟在一個預先準備好的籬筐裡。

收去的東西，多是一些充飢的土豆、玉米、黃豆、大米等等。也有藏在床板和草堆中的「禁書」。所謂禁書，是指一切非毛著或非馬列著作的文學、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等讀物。也有平時為削馬鈴薯皮而準備的小刀，或扒找豆粒用的小鐵鏟之類的「鐵器」。

每一次「大檢查」，總要從監舍中搜出一大堆東西，並無理沒收，我稱之為「三光」。

另一批檢查人員，依次對站在院壩裡的流放者進行全身搜查。並令打開行李，對行李中的物品進行搜尋，搜尋最嚴密的是衣物、被蓋和鞋子。不光要仔細的搜索每一個荷包，還要反覆地按捏每一個補丁。從中確實也搜出了不少的糧票和現金，甚至還有縫在補丁裡面的各種「證件」和「書信」之類東西。

大檢查，蹂躪著我們灰色的心靈。僅僅看那堆放在自己身旁雜亂無章的破爛，看到發黑的血斑油污，都勾起自己悲慘命運的痛苦回憶：哪一天發燒在被蓋上流下的汗跡；哪一天被劃傷了腳板感染化膿留下的膿血；哪一天因被捆被打留在衣被上的血污，都展現在我面前，讓我細細咀嚼！

我那口已經破爛得無法上鎖的皮箱，手提把子早已折斷，那裡收藏著我的全部家當：裡面放著兩件舊毛衣，那是十年前母親密密織成的紀念品，帶著母愛留在我身邊；幾件補上重疤的破衣褲，是我在黯淡的光線下用歪歪扭扭的針線縫補好的護身物。

「焚書」本是毛澤東洗腦的重要舉措，抑制知識廢拙百家乃「文革」的重要保證。獄中我們的書是平時鄧揚光們最關注的，借大搜查機會正好是搜盡這些書的最好機會。對此獄吏們執行得很堅決。

幾年來精心珍藏而保存下來的書：一本發黃的唐宋名家詞選；三本補了又補的範文瀾編寫的中國通史，以及一本殘缺不全的呂振寧編寫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這可是我們在獄中的唯一精神食糧。

一些讀書筆記，那裡面是煉獄中抒發出來的精神傷痛和嘆息，一直就是鷹犬們緊密追蹤的目標，這些手記和詩文，一次一次被搜去，一批批被焚毀，有心的鷹犬還專門在手記中尋章摘句，尋找在政治上致我於死地的「證據」。

每次大搜查，最令我擔心的事，便是我們挖空心思藏匿的那些書以及所寫的手記。預測到大檢查之前，我預先將它們包紮並藏好，到大檢查那一天，身在院壩中，心卻掛念著那些書籍筆記的安全，注視著他們打板撬磚、抄鋪翻草，生怕那些藏了又藏的「心血」被他們搜走。

為了讓它們保存下來，我們不得不把它們硬塞在堅硬的鋪板下面，忍受粗暴的擠壓，或藏在瓦縫、泥牆縫隙中飽受泥汗之苦，甚至被塞在廁所頂上發霉的麥桿中，這些書籍好不容易逃過了幾十次搜查而倖存了下來。

「你寫這些東西幹什麼？想變天是不是？」面對這些鬥大的字不識一籬筐的老管和士兵，只能取沈默和忍受的態度。你可以對這些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獸兵鄙視，卻無法對這種無理糾纏提出任何抗議。

這些沒有人性的政治獵犬，在殘酷對我們進行精神虐待中，起著特殊摧殘心靈的作用。

現在，看見他們用小刀劃開平時我辛辛苦苦縫好的補疤，從中翻出一大堆破棉絮，便感到獄吏在用一雙利爪從我身體裡取出五臟六腑一樣。

這些侮辱性的盤問，在某種意義上勝過審訊，它把我所過的不堪回首的地獄遭遇挑出來，擺在我面前，再次回鍋煎熬。

「你的衣服裡為什麼縫著糧票和人民幣？是用來逃跑吧？說！你準備什麼時候跑？」「這袋米是從那裡偷來的，你知道這是違犯監規的麼？」搜查出來後，他們毫不猶豫丟進旁邊的籬筐，而你只能眼睜睜看著無端暴虐，卻不敢反抗。



流放者為了保護好家裡寄來的，從牙縫裡擠出來的幾斤糧票和幾塊錢，被發現以後，十有八九便被奪走了。還要你承認有逃跑的動機。倘若你因此稍露不滿，那麼等待你的必是一頓皮鞋腳尖，或兩記重重的耳光。每次大搜查，都會演出一幕幕令人心驚肉跳的慘案。

「這是從那裡來的？你把它藏起來有何意圖？想行兇麼？」當他們從被檢查人的雜物裡搜出一個普通鐵釘時，便會如此斥問，叫人如何回答？他們不會想到，這些帶著明顯的誣陷和挑釁式的找岔子，對人的傷害有多大？

每次「大檢查」等於上了一堂恐怖的現場課，無論獄方如何在宣傳機器上吹噓改造成果，說他們「把鬼變成人」的鬼話，只會讓人認識中共的欺騙是多麼露骨和無恥。

我們就在自己的一堆破爛不堪的衣物面前，咀嚼過去辛酸的往事。

大搜查是獄吏和獸兵抽動的一條精神皮鞭。在流放者毫無防衛能力的情況下，這條精神皮鞭抽打你，使你的心再次出血。

幸好自從我在大學中精神失常過以後，從此我的神經便麻痺了，在監獄中，幾乎每天都會受到強烈的刺激，因為見慣不驚而熟視無睹，又因為熟視無睹而精神麻痺。

久而久之，我對「大檢查」中打人之類的暴行已司空見慣。我沒有毛澤東畫像，更無他的像章，倒使我少了挨打的擔心。

每次搜查，持續時間至少是五個小時，且往往是虎頭蛇尾，一般是從我這種「著名的」政治犯開始。開始時搜查十分過細，一邊搜查一邊盤問，輔之以打人、斥罵、撕衣拆被。

到十一點鐘，對犯人的身搜查，往往才進行了一半，搜查的人大致因為人困肚飢，便加快了速度，不再像開始那樣窮搜猛查。趕在中午十二點鐘以前，便草草地結束。使後來接受檢查的人才往往僥倖躲過一次「洗劫」。

到了中午時分，在監舍裡翻箱倒櫃的獸兵，便一個個從屋裡鑽了出來。一面拍打著身上的灰塵，摘下口罩。一面抬著他們的戰利品——從囚奴身上、行李中以及監舍裡搜出來的一切。

而流放者則帶著痛惜、飢餓和失望，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糧票、現金、大米、鹽巴、藏書、筆記等，一齊抬進了隊部辦公室。

緊接著，各組自行回到監舍，收檢整理被抄得亂糟糟的「窩」。清掃整理著滿地鋪草和泥灰，又一陣塵土飛揚。

打掃完畢，也清理完畢，各自暗暗地計算著這一次自己被搜去的東西。有抱怨的，有咒罵的。最後，在無奈之中，將院壩內曝曬了一上午的行李，重新搬回到各自的鋪位上，默默無聲地坐在鋪邊發呆。

#### （四）為一張畫像被打得半死

有一次，當大田組搜查徐世均時，令他打開木箱，老管從木箱下面搜出了一張墊在棋盤下的畫報，畫報上有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畫像。

老管把畫報放在那木箱上時，臉上露出了一臉兇狠和猙獰，他向場外招了招手，五個獸兵立即圍住了徐世均。

徐世均還是一個一臉稚氣的剛滿二十五歲的年輕人，被捕時還是一個中專的學生。

此時他被五個獸兵包圍起來，個個用兇神惡煞的眼睛瞪著他，他已預感到飛來橫禍，面色鐵青，全身直哆嗦。

大禍臨頭了，五個人將他圍定，發難的獸兵指著那畫報，向徐世均厲聲質問道：「誰叫你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像來墊棋盤？」

年輕人已被嚇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傻呼呼地直立在那裡，等待五個如狼似虎獸兵的發落。

「揍這狗日的，看他今後還敢不敢毀壞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一個彪形大漢話音剛落，便是一記黑虎掏心，從背後對徐世均「開拳」。

於是這個可憐的年輕人，便像肉排球一樣，在五名獸兵的猛擊下，來來回回被雨點般的拳腳猛擊。聽著他撕心裂肺的慘叫，他的胸膛中似乎已被擊碎，流出來的血似乎堵住了喉嚨，他已經叫喊不出聲來了。

沒有犯人敢圍觀，甚至於看一眼都不敢，所有接受檢查的流放者，都必須老老實實地呆在自己的原位上，偷偷地看一眼露出一種慘不忍睹的恐慌。

在一陣短促的慘叫聲和「嘭嘭」的拳擊聲中，徐世均倒在地上，發出低沉而又痛苦的呻吟聲。這時候，五個獸兵像惡狼一樣將他的五臟六腑從胸腔中摳出來，他已爬不起來了，五條惡狼才暫時歇下手來。

徐世均像死去一般爬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頭枕著的地方，被嘴裡流出的一大灘鮮血染紅。

等到大搜查以後，唐啟榮才把徐世均送往醫院，醫生面對著這個身負數十處嚴重內外傷的年輕人，失去了救活的信心。唐啟榮回來後，回答圍著他詢問的人只有一句話：「要看徐世均的命大不大了。」

兩個月後，徐世均大難不死，仗著他的年輕和蒼天垂憐，他居然從死神的魔掌中挺了過來，不過醫生說他斷了六根肋骨，加上嚴重的內出血，已成了二級殘廢。

後來我見到徐世均，他已不像從前那樣腰板挺直。而是彎駝著背，面色臘黃。為了一張畫報，徐世均付出了終生殘廢的代價。

## (五) 打中了

中共監獄的非人處境，一直是逼迫年輕人大量逃亡的原因。在甘洛農場的人都明白，長年的飢餓使人生不如死，逃避飢餓選擇越獄的人雖知道，隻身徒步跑出四周包圍的大山，半途就會凍死餓死在冰天雪地，或充作狼群的獵物。仍不斷有人去觸這張死亡的網。

到了鹽源農場，靠各中隊種出來蔬菜的補充，減緩了大量死亡，飢餓依然緊隨著關押在這裡的每一個奴隸，加上虐待和殘害，囚奴逃亡也從未間斷過。

逃亡能否成功取決於兩個因素是否具備：第一，選擇的逃亡路線是否正確，能否避開警方追捕；第二有逃亡過程中對付各種惡劣環境的適應本領，二者不可缺一。

在當時戶口管理嚴密，到處是特務，到處佈滿了「群眾專政」的密網中，千里逃亡談何容易？所以逃亡者一般都必須「偷」，具備躲開人群生活的能力。

「偷」為老百姓所憎惡，留下了痕跡，也為追捕者提供了線索和目標，加上老百姓都是連飯都吃不飽的，心存戒懼，能理解逃亡者，並提供庇護的人實在太少，所以逃亡者從逃亡開始那一天，便同死神同行了。

逃亡者在最初外逃的幾天，幾乎毫無例外的要夜行日宿。為了躲開老百姓，多半露宿荒野，以山上的莊稼為食，為逃過追捕，忍受著大苦大難。

我在獄中因適應不了外逃的生存條件，想到即使僥倖逃出了監獄，在這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天下，我又能逃向何處？一個人能奈何這個統治嗎？

所以我雖對出逃者的勇氣和求生存的本領十分欽佩，但一直未能親自嘗試過它的滋味。

原先的農六隊靠西那排房子被改為小監後，農六隊遷到了院壩北方的那排房子裡。反省室將原先的大監舍隔成了十六間單人小監舍，每一間反省室都裝上了鐵門，門上有特製的可左右滑動的監窗口孔和報警裝置，巡邏哨兵，不分晝夜地在反省室前方壩子裡來回游曳。

關進這裡的人要躲開哨兵的眼睛並要穿越幾道圍牆，才能越出監獄，即使本領高超的人也難以從這裡逃出去。

文革在全國打響後，關進反省室的人一天一天的增加，一九六八年以後，反省室的十六個房間一下處於滿號狀態！關進來的人除了「言論罪」，就是「逃跑罪」占最多。當局因提審地方不夠用，反省室變成了收監「預審室」的隔離小監，從這裡經草草審訊以後，速判速決。

所以小監裡幾乎像流水席，走了一批又進來一批，為減少小監房數的不足，有時待審的人就交給嚴管組邊勞動邊受審。這一時間，加刑的人數，處死的人數，都達到這個農場的最高峰。

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個下午，從古柏地區送來了一個「慣逃犯」，據說他原判刑期只有五年，關押還不到兩年時間裡就跑了十次之多，這是一個只有二十歲出頭的小夥子，本身就是為了偷糧食而入監，純屬於一個求生者。

為了防止他再次逃亡，把他送到了六隊來，專門關進了小監三號監舍裡，但是一種求生的本能，使他靜不下來。

進入三號監舍以後，他每天都在盤算著脫身的方法，坐在鋪位上抬起頭看了看沒有做望板的屋頂，從那上面出去本是最理想的，但是那足有六公尺高，沒有學過輕功，又沒有繩子和可以墊腳的東西，登上六公尺屋頂談何容易？於是他把眼睛滑向前後兩道厚厚的泥土牆上。

反覆思考以後，決定選擇從小監進門方向牆上開孔的方案。進來之前為了挖洞在布鞋裡縫了一根兩寸長的鐵釘，準備了一個洗臉盆，用來挖山上已成熟的馬鈴薯煮熟充飢。主意打定，從第二天開始了行動。

第二天炊事員送飯時，他脫下了衣服，露出背上那幾處被打傷流膿的傷口，懇求炊事員晚上給他一盅子開水，讓他洗淨瘡口的膿血，並從鞋子裡取出鐵釘，一切準備完畢。

等到晚上九點鐘，只聽見查房的老管按照往常的規律，從第一監舍打開門上的風窗，檢查並無異常現象以後關上風窗，再打開第二號監房的風窗，依次把最後的監房查看完畢，聽見那哨兵的軍靴在三合土上踩著的叭搭叭搭聲漸漸遠去，消失在小監圍牆的那道小門上。

他一躍而起，將那盅要來的開水倒在泥牆上，用麻利的動作用鐵釘在想好的地方開洞，一邊開一邊量，不大不小只要能爬出去……

就這樣一連三天，一個完全能爬出去的洞已赫然出現在眼前，剩下只等天老爺幫他了。

時值七月下旬，這一天中午天氣特別悶熱，到了下午六點鐘光景，濃雲密布了天空，呼呼的狂風大作，到送晚飯時，天色已變得特別黑暗，眼看一場暴風雨就要來臨，天公終於給了他一直盼望的機會。

他最後下了決心，藉著狂風的掩護將自己的被套撕成了許多布條，搓成布繩後將臉盆底朝外的捆在自己背上。

晚上七點鐘開始，房頂上響過了一陣急促的雨點聲，接著瓢潑的雷陣雨便夾著狂風，將門外的壩子變成一片茫茫的雨霧，天色越來越黑，三號房這個整裝待發的人，正全神貫注的盯著雨中的壩子，藉著那頻繁耀眼的雷電光，他躲在門後，從風窗的小縫裡向外張望。

等到今晚值班的綠色雨衣身影，由遠而近的走過來，打開風窗向裡望了一眼後離去時，他立即躍起身來，利用送飯時送來的最後一盅水，將那一盅水朝那僅只有一個指頭就要通穿的凹坑上潑去。五分鐘後，便用鐵釘打通了足有臉盆那麼大的洞。

一股強大的雨霧被狂風捲刮了進來。使他倒抽了一口涼氣，便在雷聲掩蓋下迅速爬出了洞口，藉著漆黑和茫茫夜雨作掩護，在頻繁閃電的引導下，只一分鐘便穿過了前面那一片空壩，過了隔牆上的小門，進到大監門旁。

進入隊部辦公室前的走廊，靠辦公室的遮掩，他向崗樓上緊張窺探，現在只要穿過走廊，並穿過那崗哨下面狹窄的彎道，向右一拐便到操場壩了。

一道強烈的閃電以後，雨勢開始減小，他不能再等待了，立即起身彎著腰，順利地穿過了足有三十公尺長的走廊，雖然在穿越時遠處的閃電不斷，但那崗哨上大概正在躲雨，或打瞌睡竟沒有發現他。

面前是最後也是最危險的關口，他的心狂跳著。他估計，這雷聲完全可以蓋住他跑步的響聲，幫他跑出那最狹窄的彎道隘口，於是便緊貼牆角重新聳了聳背上的臉盆，等待最後逃出鬼門關的那一殺那。

一道耀眼的閃電和一聲巨雷響過後，他已分辨出，穿越這拐角隘道口的轉角位置和面前的障礙物，就那一剎那間，他驀地立起身來，向那彎道口衝沖過去。

就在步入那僅一點五公尺寬的拐道處，他忽然覺得什麼也看不見了，慌忙地用手去摸，想用手感判斷出處於轉角的位置，已經摸到了。就在這一瞬間，他背上的洗臉盆，撞在牆角的內側，發出一聲「砰」響。

這聲撞擊，招來一束手電筒光直端端從哨樓上向他頭上照定他，同時發出了一聲喝令：「誰」？他知道，自己已到了生死關頭，退後只能死，死前還要挨一頓毒打，拚拼命向前衝則還有生的可能。

不再猶豫，使出全身的力氣，他向面前的籃球場射了出去，幾乎就在同一秒鐘，崗樓上的機槍響了，「達達，達達」夾在雷鳴聲中，槍聲劃破了寂黑的夜空。

小夥子一個跟頭向前栽去，憑他急速向外撲去的慣性，重重地慣倒在操場上，頭部和胸口頓時冒出一股股血注，他掙扎著站立起來在大雨中連晃了幾下，還是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而那頭部和胸部流出的血，隨著大雨，向前淌了足有十公尺遠，留下了一條殷紅殷紅的血帶！他便臥在那裡，背上還背著那臉盆，一動也不動了！

緊接著，網哨上傳出了一片歡呼聲：「打中了！打中了！」高喊著：「毛主席萬歲！」這時大約是晚上十一點鐘，雨也漸漸停住了，崗樓上穿著雨衣的軍爺們，紛紛從那上面連跑帶跳的跑下山頭，圍著操場裡死者屍體的周圍，七嘴八舌地在爭功。

爭論無非誰最先發現逃犯；誰先射手電筒喊「站住」；誰扣動機槍的扳機；第幾顆子彈擊中屍體的那一個窟窿等等。當然他們認為這不是在殺害一個普通的求生者，而是一個「革命警惕性」結出的「碩果」。

槍聲和歡呼聲，使剛剛就寢的我們，估計牆外又發生了一次殺人事件。不過這段時間對槍聲聽慣了，聽到槍聲就以為不知是哪一個老管，追殺哪一個看不慣的幹事！那場因點名，老管鳴槍威脅童管教的事還沒過多久呢！

我們已習慣了「紅色恐怖」，當兵這段時間飛揚跋扈把我們當成習武的靶子，稍不留意就要吃青槓棍，所以一到晚上，外面發生再大的事，也不會去看個究竟，裝成什麼都沒聽見。

此時除了各監舍靠窗口的人，扒在窗口上向崗哨上遙望外，所有的人都躺在自己鋪位上，用耳朵聽。

院壩裡依然平靜，沒有一個人影，而那崗樓上所能看到的雜亂的手電筒光和老管們七嘴八舌的爭論，此外什麼也看不清。

## （六）賠殺

一個小時後，雨已完全停止，響過頻繁查哨和院子裡此起彼落的「報告」聲後，院子裡漸漸安靜下來。天空一片漆黑！大約到第二天凌晨四點鐘左右，一名軍爺走進我睡的監舍，將我從迷糊中叫醒。我還沒來得及弄清我又犯了什麼？又要受何處份，想該如何應對？便被催著穿好衣服，跟著他走到院子裡。

不一會兒，另一名老管從嚴管組監舍，押著李克嘉向我們走來。

這李克嘉原是蘭州大學應用物理學系的學生，在農六隊的幾名「右派秀才」中，他是唯一的刑事犯。因兩次越獄逃亡，所以才被押到這嚴管隊來，加上「逃心未死」，來六隊後被編進了「嚴管組」。

他剛來，我倆並不瞭解，平時很少交談，只因他拉得一手好二胡，把內心傷痛，凝聚在弦上，加上閒熟的琴技，在二胡聲中揉進了哀怨婉約，使我頗受感染。所以每當他坐在走廊裡調好琴弦演奏時，我會側耳聆聽，從琴聲裡聽他傾述內心自白。

此刻我和他被押著，經辦公室前的長廊，一前一後帶到牆外籃球架那躺著屍體的地方，彼此都在猜，又不知哪股禍水發作了？老管用手電筒指揮我們倆，面對屍體，坐在籃球場周圍的石蹬上。

陰暗中響起那姓衛的聲音：「你們倆是一貫死不悔改的，今天就讓你們守在這裡，好好看他的下場！你們如果還要對抗，那麼你們的下場也會這樣！」

那聲音陰陽怪氣充滿了殺氣。說完，手電筒光熄滅了，此時天還沒亮，四周一片漆黑，死者距我們僅只有三公尺遠，一股血腥氣朝我們撲來。

四周死一般寂靜，我們被黑暗中看不見的眼睛緊盯著，我明白，要我們在這時守屍體，目的在對我們進行精神摧殘！這叫陪殺場！

雷雨剛剛掠過的天空，狂風捲走了天上的濃雲，幾顆星星從雲端偷偷窺視這裡，奇怪的望著危坐在死人旁的我倆！我的心進入了幻覺：忽然覺得面前那倒在血泊中的，是一個失去魂魄的狐狸。

為掙得自由生存，想回歸廣袤荒野中的淒息地，從魔鬼籠子裡逃出來，逃得如此悽惶，如此倉卒，以為黑夜裡，雷雨已鎮住山野的魔王。卻想不到，剛逃出關他的鐵籠子，便被魔王的利劍劈倒。

我彷彿看見他的遊魂從血腥軀殼中飄然而起，從容向我們告別，說它已自由了，可以回到他親人聚居的地方，向他們傾訴這些年在地獄中所經歷的苦難……

山坡上隱約傳來號泣聲，大概是死者的親屬，聽去分外悲慟？其實這倒好，人終有一死，像這種鼓足勇氣痛痛快快赴死，了卻多少這地獄的悲哀？

再回過頭來，望那夜霧鎖著的看不透山頭上，崗樓傳來談笑風生，魔鬼們在慶賀他們殺人成功！阿彌陀佛！我垂下眼皮，雙手合攏為躺在我面前的這無辜靈魂祈禱。

山谷底的霧氣繞著我面前這具屍體，將一股股血腥味，沖著我的鼻孔灌來，使我猛然驚醒，我的幻覺消逝了，在這靜謐的籃球場上我感到噁心。

天漸漸發亮，微茫中，白霧從溝底升起，隱約聽到五號樑子山頭上，傳來雞鳴和狗吠聲，而我仍僵硬地坐著，經過三個小時熬夜，我多麼想睡一會兒。

高牆裡有了響動聲，起床的哨聲響過後，人聲嘈雜起來，兩個軍爺才將我們叫回監舍去，大家正在在集合，集合後，照例完成每日的「請罪儀式」，請罪完畢，駐軍班長站在佇列前，神氣活現宣佈昨夜當場擊斃逃犯的戰果，並向一切「亂說亂動」的人警告說：「誰繼續想跑，誰就會遭到同樣下場。」

一夜大雨後，今天天氣晴朗，我帶著沒有完全恢復的傷和一夜疲乏，躺在菜蔬地那背坎的蓑衣上，同組的人圍著我詢問昨夜所見到的情況，我搖頭說：「天一片寂黑，什麼也沒看清楚，等到天亮時，只看見那人撲在地上，背上還捆著個洗臉盆，究竟是誰，是怎麼回事？我一無所知。」

到十點過鐘，從小監倒糞回來的蕭肖弟良才告訴大家，昨夜三號小監靠監門方的牆被挖一個大洞，才從古柏過來的犯人乘雷雨逃出，並被當場擊斃，大家聽罷都默默無言。

中午收工回來，路過籃球場時，我還能遠遠看見躺在原處的那人，經過整整十四個小時，又是熱天，在太陽下曝曬了一個上午，從那死者身上飄起來一股血腥氣。

中飯後，何慶雲把大家集合起來，排成一隊走出大鐵門，走到籃球場上，全隊二百號人以死者為中心，圍成一圈。

那死者已由原來撲地倒下狀態，翻了一個面，面部，眼角和頸上兩處被開花彈拉扯得血肉模糊煞是嚇人。一大群金頭蒼蠅繞著那屍體嗡嗡直叫，原先血水流過的地方，變成一條黑紅色血帶，一股股腥臭沖著圍觀者，令人頭昏、噁心。

何慶雲在那裡高聲訓話，無非是講無產階級專政如何的銅牆鐵壁，誰要是膽敢逃跑以身觸法，必定粉身碎骨之類的話。誰也沒去聽，現在已無需他再加精神壓力，在這恐怖和令人噁心的場景中，大家的神經已緊繃到極點，現在稍不注意就要挨打，誰都把自己當成菜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恐怖和沈默真是一對孿生兄弟。中共頭子靠槍桿子，使中國大地空前的恐怖，也使中國百姓空前的沈默。「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話表示，誰在今天掌著槍桿子，誰就可以操持別人的死生大權，不過需要補充的，恐怕槍桿子裡不單出「政權」，還出「壓迫」，出「罪惡」！

正此時，果然聽見「撲通」一聲，佇列中有人倒在籃球場上，大家將臉一齊轉了過去，見倒地的正是潘老。一夜幾乎未眠，加上六旬年紀，平時營養又差，身體本來不好，在太陽曝曬和血腥氣雙重夾擊下他昏倒在地。隨即又有兩個人兩眼發黑，支持不住蹲了下來。一陣騷動後，何慶雲才下令回到監房，人們便牽扶起潘老，慢慢回到鐵門裡去。

晚上學習，何慶雲佈置各組就昨晚發生的事，進行專題討論。題目是「你對昨晚發生擊斃逃犯的認識是什麼？」誰也不想說話，想到眼下所處的恐怖氣氛，除了沈默再不該有任何反應。

### （七）「狗」也挨打

為了加強「警戒」，隊部對去辦公室報告的制度作了新規定。凡到隊部有事向幹部請示時，不但要在院壩裡報告老管，得到允許後，還要在轉過隔牆進入辦公室的走廊下，再呼：「報告某某幹事，X X請示工作。」等到隊部辦公室裡傳出了回應聲，才能跨上走廊，進入某一辦公室時，還要再呼一道報告，得到辦公室內幹部的回答後，方能進入。

繁褥重複的報告，曾引起崗樓士兵與幹事之間激烈爭吵，神仙打仗，犯人遭殃，夾在其中的流放者往往還要受到老管的刁難，因此，一般情況，犯人是不会向隊部報告任何情況了。

而向幹事們打交道的無非是各組大組長，由於老管們對報告的挑剔和不滿，使他們兩頭為難，在挨過幾次訓斥後，值班大組長，在報告時心情特別緊張，生怕一不留意而挨罵，挨打。

一天傍晚，周學祝去隊長徐世奎那裡請示學習，也不知道是出於害怕不敢大聲報告呢，還是出於更加詭秘的心理而產生的竊聽欲。他先在走廊下怯生生的喊了一聲「報告」，就肅立著靜靜等待，分明聽見辦公室有人聲，但就是沒有回答，他偷偷望了一下崗樓上，怕大聲報告受到上面的干涉，又輕輕喊了一聲「報告」，裡面依然沒有回聲。

持續了兩分鐘，他耐不住了，在沒有聽到室內傳「上來」的回應時，便輕輕走上了走廊。站在徐世奎辦公室門外，他正側耳去聽，殊不知裡面的徐世奎正好推門而出，看見面前隱約站著一個人，天色昏暗沒看清那是誰，不禁一驚。

「誰？」徐老大厲聲發問，「我。」周學祝戰戰兢兢回答：「隊長，我來向你請示今晚學習……」徐老大從驚恐中回過神來，立即轉為惡怒，向他一拳打去，那駝背像一個皮球滾進了階簷前的排水溝，臉正好磕在溝坎的三合土上被劃傷，血流了出來。

盛怒的徐老大，又向他身上連踹兩腳，並將他從溝中像提一個落湯雞一樣提起來，大聲吼道：「你膽子不小，偷聽什麼？」

哨聲一響，他令全隊集合，一身血污的周學祝，站在佇列前，徐老大再次訓示：「今後任何人去隊部報告，都必須按規定，否則後果自負。」當場以偷聽隊部為理由，撤銷了周學祝蔬菜組組長職務，由馬文華擔任。

就這樣，對我的監督人，由周駝背換成了馬文華。此人原是解放軍一名駐西藏部隊的上尉軍官，據說因投敵判國被軍事法庭判處十八年徒刑，其人究竟如何？我並不清楚，不過在靠擾政府爭取減刑上，他不會比周學祝遜色。

狼狽不堪的周駝背，從此以後再沒有「文革」開始那種「熊勁」，從蔬菜組搬到五組去後，便從「槍手」變成了死狗。他本人左手殘疾，大田組的高定額勞動一開始就使他喪了膽，承受高強度的勞役，不完成任務，晚上刮風下雨都要呆在山坡上，還要接受大家對他的冷嘲熱諷和「夾磨」。

自此以後，我經常看見他總是低著頭，發黃的臉上一愁莫展，看到他那付狼狽像，一群人圍著奚落他時，我還勸大家不要過分。雖知他狗性難改，但我確實缺乏痛打落水狗精神，幾次我見他晚上八點過才回來便勸他慢慢適應。

有一次農忙，我們蔬菜組抽調人參加大春栽插時，他悄悄向我道歉，說過去是一時糊塗，做了許多對不起我的事，希望我原諒他。

嚴酷的現實會改變一個人，嚴格說，我自己也是在殘酷壓迫下，才從一無所知變成今天這樣子。我想，一切在文革中陷身的共產黨人，不管他們地位有多高，過去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多真摯，對中共抱有多少幻想，都會在受到打擊時認識到自己的迷悟，幡然醒悔。

真善美既遭無情的猥褻而泯滅，人和人之間剩下的只有相互的敵意和殺機。以利害維繫人和人的紐帶，會因利害的衝突而斷裂。

因此，「階級鬥爭」除教會人奉行陽逢陰違，更使人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處於亂世，因文字獄猖狂，往往壓抑自己內心的憤恨，低頭當「良民」，避免當局敏感的話題，防範那些身邊的異類。不過，恰恰是當局的殘暴，使那些想靠我將他墊出監獄的狗，也在轉變。

### （八）因報告聲「太小」而凍昏的人

地處雲貴高原的鹽源，就是在夏天，氣溫一般在三十度以下，腹中憑白菜蘿蔔這種粗纖維，皮下脂肪長不起來，身上散發的熱能全都被高強度勞動所耗掉。所以，就是三十度的「盛夏」季節，也要身著棉衣，以防一陣風吹來惹上感冒。

一件棉衣發下來，便要一年四季頂著穿，加上棉花和棉布的質量又差，穿著棉衣幹活，與肉體和農作物的磨擦碰撞加劇了破損。所以一件新棉衣，穿了一年已破損不堪。

按規定，一件新棉衣要穿四年才能領換新的，要維持四年之久，全靠平時一針一線的縫補，在那個條件下，另花錢只夠用來買針線，平時一到休息和假日，補棉衣便消耗了我們許多空餘時間。

為禦寒對那破棉衣破了又補，補了又破。到服役四年，一件棉衣要麼已成一堆爛油渣，穿上比乞丐不如。要麼就比原來重量超出兩倍以上，全用針線拉住的千巴衣，特別在手臂和肩頭處，有的地方是由十餘層的破布縫疊起來。俗稱「棉鎧甲」，比劉文采地主莊園的展出的展品，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衣著上講，冬天和夏天的區別，僅僅是夏天可以靠一件「空心棉衣」渡日。而冬天必須靠「棉鎧甲」，它樣子很古怪，穿上身就變了一個駝背形體，就像一個東鼓西凹的極醜癩蛤蟆。

好在，那種條件下，全不講衣著美觀，圖的僅僅是不受涼、不生病這個要求活下去，當時想如果我能活著走出這地獄，我會在今後寫下記實，拿來展現於人，我想目擊者，定會非常驚奇我們此時的適應能力。

一九六九年冬天，正當文革狂飆肆虐大陸，二道溝農六隊也特別冷。到了年底，一連又下了幾天雪，元旦剛過，院壩裡積雪一尺多深。

這天一大早，大約凌晨五點鐘左右，忽然從那雪封的院壩裡傳來一陣陣踢踢踏踏的跑步聲。

我聞聲從被子裡探出頭來，向黑暗的窗外望去，灰濛濛的天空裡鵝毛般的雪片還在不斷地從天上撒落下來，鋪蓋這銀白色的壩子。一陣木板鞋敲打雪地上的聲音，正從崗哨下方傳來。

藉著銀白地面的反光，一個瑟瑟作抖的黑色人影正在壩子中跑動。雖然天還沒亮，仍依稀可見此人正穿著一條破單衣，下身穿著一條短褲，腳拖一雙木板鞋，正沿著壩子周圍艱難的跑步。

一邊跑，一邊從打戰的牙縫中擠出斷斷續續的哀號：「我錯了……我改……」那聲音嘶啞、顫抖，伴著那在寒風中不斷撲打的破單衣角，發出的「撲」「撲」聲，聽去格外揪心。

「大聲一點！」崗樓上傳來厲聲的命令。「看你今後喊報告還在喉嚨裡打轉不？」崗哨狠狠嘀咕著。

又一個因哨兵判定報告聲音太小，而被罰在雪地裡光著身子跑的流放者就在眼前，對這種事已見慣不驚的人們，被他的喊聲驚醒，到窗口邊來看時，也沒有多加理會，各自又爬回自己的鋪位上睡去了。

然而那顫抖的認錯聲不但沒有提高，反而越來越含糊。

「嘍」地一聲，一聲十分沉重的響聲，從那結冰的三合土壩發出，那含糊細弱的認錯聲和木屐敲擊雪地的聲響頓然中止。

院壩中，他倒下的地方四周一片雪白，唯獨在他身下留下了一彎淺淺的殷紅，又像是血，又像是他的最後一點體溫融化的冰水。

當唐啟榮把他背回醫務室去時，才認出這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來自自貢的農民，那幾天還在發燒，他大概不知六中隊的「規矩」，現在，總算一切了結了，此時，他那發紫的唇邊流出一抹淺紅色的白沫，鐵青的臉上雙目緊閉，呼吸十分微弱，光裸在外的肩膀、手臂、大腿和腳板已呈現紫青色，心臟還在微微搏動。

就為了這莫須有的「喊報告的聲音太小」的藉口，一個小小哨兵就可以虐殺這個中隊的任何一名手無寸鐵的囚奴。這便是光天化日之下，無產階級專政監獄內每天都要發生的慘案！大陸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處處可見可聞。

悲乎，哀乎？然而，慘聞還會接連見到聽到。

### （九）目睹殺人比賽

監獄本來就夠小的，晚上必須龜縮在高牆內，白天不得超越「隊界」！到了這個時候還要在「隊界」之內「劃地為獄」。

流放者提心吊膽的過日子，提防自己被無端拉到崗哨之下挨一頓毒打。所以，此時關押在這裡的囚奴，希望僅僅是平安渡過勞役的一天。少受些飢寒，少挨些拳腳，每頓端在手裡的罐罐份量充足，唯此而已。

一九六九年的春節剛剛過去，在大雪剛剛收斂，冰雪初融，大地回春時，蔬菜組由湯幹事安排我們在六隊駐軍營地後坡，面對二道溝的山坡草坪上鏟積草皮灰肥！。

因文革狂鬥，為了避免可能招來的麻煩，我們的野外作業地點，經過軍管會專門劃定：下令：「超過他們界定的範圍，一切勞動力的安全概不負責。」

有一天吃過早飯，我們帶上各自的工具，跟著湯幹事來到了六隊緊靠二道溝這片草地上。

大約有一年時間沒到這裡來了，站在高處看著下面的二道溝，透透空氣，放鬆一下這段時間受驚嚇的神經。

一年前，對面農一隊壩子圍牆裡壘起的墳堆，靈堂已經不見，墳包已被周圍的荒草包圍。時隔一年，今年的春節並無人拜祭他們，也沒看到看守它們的人，這般荒涼使人不禁想，去年守護他們的戰友那裡去了？

再把目光轉向右側，稀稀拉拉的松林間隱隱約約的墳塋面前，留下一些白色的花圈還依稀可見，看來他們的家人，在過年時來祭奠過他們。

死者去矣，生者留下悲哀，他們總有一天會明白，早早葬身在這裡的兒子、丈夫究竟為什麼而死！

「人乞祭余驕『老公』」，窮山野塚只生愁，賢愚千載知誰說，滿眼蓬蒿共一丘！」再過若干年後，又該如何評價這些荒丘中的亡靈，和他們的愚蠢？

順著場部幹部的墳場向下看，那排曾經囚禁我和陳力的羊圈，依然保存著，現在已由六隊接管。指著這排房子，我向陳孝虞講起三年前的往事：「喲！那排房的最後兩間房子，就曾是高士清和金梅往過的地方，也不知道這家人到那裡去了？」我嘆了一口氣，陳孝虞馬上回答道：「我聽醫院裡的人談起過他們，現在他們住在驢馬堡，金梅還照樣幫人洗衣服。」

羊圈對著場部的那條田坎，而今已經「改造」，泥巴的田坎上，鋪上了整齊的石板。那通向場部方向的盡頭，糞坑依然保持著原來那個樣子，不過眼下那糞坑裡的糞水早已在入冬前被就業人員挑乾了，而今那裡積著半窪由四面的冰雪溶化後流進去的泥水。



山坡下，場部那片蔬菜地被整得頗規範，四四方方的菜地周圍是排灌的水溝，此時被冰雪紮成白頭一片，十幾名就業人員在中耕去秋種下的越冬蔬菜，為它鬆土施肥。

場部辦公室那邊，正播放著廣播體操的樂曲，時間已過了十點鐘，一個「勞動力」正挑著一挑糞水從場部那面，沿著通往羊圈方向的石板路，一搖一晃的走過來，顯然是給剛鬆過土的白菜椿頭施肥的。照這幾年種菜積累的經驗，開春後，這些菜椿頭會發出今年第一批的白菜葉子，用來供場部的幹部和駐軍。

蔬菜隊的刑滿人員，成年累月忙碌在田間，但享受他們勞動果實的人，從沒有把他們當成人看。

差不多就在同時，一列戴著紅袖套的「糾察隊」，正順著羊圈門口那條護溝機耕道，從南邊馬路上朝著羊圈方向走來。

軍管會已成為農場的權力機關，這些戴紅袖套的巡邏兵，是從武鬥組織紅衛兵中挑選出來的，他們人人善於武鬥，在農場作惡稱霸，無人敢惹，其兇惡程度比明代錦衣衛東廠有過之而無不及，見所需的無論糧食水果，想拿就拿，誰也不敢阻攔，見著不順眼的動輒打人，沒人敢還手。

六隊發生的血案多半出自他們手中，就業人員當面恭稱為「軍爺」，背後人人都罵他們為鬼子兵，處境低微的刑滿釋放犯，對這些不肖子孫除了背後幾句唾罵，實在奈何他們不得。

同殺手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兇，要披一件合法的外衣一樣，有時候最兇殘的殺手需要光冕堂皇的面紗，這往往比任何戰爭更可怕，更防不勝防。

文革對勞動力任意屠殺，已成為不需要任何法律方式就可以進行的事，這在大權在握的軍管會政府手中，更加方便更有效率。

軍管會貼出「告示」：凡發生與巡邏執勤的士兵正面相撞，或尾隨其後在五公尺以內者，巡邏人員可以當場採取「自衛」措施，一切後果均由「違犯者」自負。這等於給肆虐成性的「支左」戰士，大開了隨意肇事的方便之門，軍管會的巡邏人員可以借自衛的藉口，擊斃任何勞動力後，不負人命責任。

當這個「告示」公佈後，便不斷發生就業人員在半路上碰到「糾察隊」，因回避不及被打傷甚至傷命的事。例如最近北島中隊的一個就業人員，沒有注意到在圍牆拐角處與巡邏兵相撞，當場就被擊斃。

所以不僅六隊的囚奴，因各種各樣「不小心」而被罰站和被打，軍管時期，當兵的任意虐殺「五類份子」，當時是一件極為普通的事。

眼前，只見那挑著糞的「勞動力」，剛剛走到這一段石板路的中段位置，那隊從機耕道上走過來的「糾察隊」，正好走到了石板路與機耕道的交叉口，為首那一個士兵好像發現了獵物，把本來挎在肩上的半自動步槍摘下來，端在手裡，突然的來了一個右轉彎，從機耕道上轉到了石板路上，以電影裡當年日皇軍那種武士道「雄姿」，刺刀指向挑糞人直逼過去。

那人見前方一支「糾察隊」正兇猛向自己逼來，早已嚇得魂不附體，石板路兩側菜田旁都是半公尺高，兩公尺寬的排灌溝，這些天已被溶化的雪水灌成了泥漿，別說挑著這滿挑的糞水，便是空手也難於跨過水溝躲避。

慌亂之下只能掉過頭來，挑著糞水往回跑，可是肩上挑的那挑糞水死死地拽著他邁不快步，說時遲那時快，有意向他逼過來的糾察隊，緊跟在他的背後相隔越來越近。

那刑滿人員搖晃的身軀終於控制不住，擔子裡的臭糞潑了出來，就在距大糞坑十公尺處，為首的士兵手裡端的步槍槍尖已刺進他的破棉衣中，紮到他的脊背上！由於猛然一驚，那兩桶糞水連同扁擔便從他肩上滑落下來，飛向路中，重重地摔在石板路上，糞水全部傾倒在兩側的菜蔬地和水溝裡，散發著惡臭。

在慣性作用力下，那就業人員失去了平衡，歪歪倒倒的跌倒地上，整個巡邏小隊五個人立即圍住這個「獵物」。

為首的那士兵用槍尖指著那躺在地上瑟瑟作抖的人，命令他從地上爬起來，並把他一步一步地逼向大糞坑邊上，接著命令他轉過身去，面對著那個有三公尺深的裝著一窪泥水的糞坑。

從山坡上目睹它的經過，使我馬上想到一年前用長矛的矛尖，挑穿動脈幾乎喪命的吳鐵匠。

難道用刺刀在光天化日之下，刺進一個毫無抵抗力的人，會激起強烈的刺激感，使這些兵獸性大快麼？我的心為這就業人員一陣陣緊縮著！

卻見五個士兵不知商量什麼後，為首的士兵從懷裡摸出了一個跑錶，走到那勞動力背後。突然飛起一腳，向他的臀部踢去，同時按動跑錶。

順著那腳風方向，那人面朝著大糞池直直撲進糞坑中，撲通一聲，坑裡濺起了一股惡腥的水浪，待到這可憐的「活靶子」掙扎著濕漉漉身子站起身來，破棉衣已經浸透，頭部和腿上擦出的鮮血立即沁了出來，站在冰冷的齊腰泥水中，整個身體因寒冷和恐怖而哆嗦著直發抖。

然而站在糞坑邊，殺勁正旺的「軍爺」，立即用刺刀指著他的頭，吆喝著逼他沿著坑邊上下臺階，一步一滑的爬上岸來，並按刺刀的指揮，重新站在方才撲向糞池的那個位置上，面對著糞坑。

第二個軍爺又飛起一腳，像踢一個冬瓜一樣第二次把他踢進了糞坑。與此同時，那為首的立即按動跑錶，記載著這個活靶從被踢進糞坑，到爬出坑邊所經過的時間。

此時，我什麼都明白了，這五個士兵在進行一場比賽，看誰把這個活靶踢進糞坑所經過的時間最短。

輪到參賽的人。拼命的催促著掙扎在糞坑裡的活靶子，而他因挨了不少刺刀，傷勢越來越重，

此時的「活靶子」除了一片告饒和哀求呻吟，再沒有其他表示。

當那活靶子第二次在刺刀威逼下，從糞坑中爬起來時，血已經浸出了破棉襖，只見他跪地哀告免其一死。然而比賽才進行了兩個人怎能中止？於是第三個兵令他第三次站回原先位置上面池而立。隨著一腳又是撲通一聲，跑錶按下，活靶子第三次撲進了糞池。

當這個滿頭滿臉血水和泥巴染紅的「冬瓜」，第四次想爬上糞坑邊上時，呻吟和哀告聲已完全消逝，他再也爬不起來，於是第四個參賽者把他從池中像拎小雞一樣拎上來，還不等他站穩，就飛起了他那殺人的腳！

這一次，坑裡在響過撲通聲後，隨著濺起的泥漿血水就寂然無聲了。活靶子面撲在糞池裡，任憑第五個殺手，怎樣用刺刀戳他的頭也沒有動彈，他就這麼泡在泥水中再也沒有爬起來。

岸上的劊子手們七嘴八舌的爭論後，便排好隊，挎上自己的槍，嘻笑著揚長而去。在五個殺手身後，揚起了他們起勁的爭執聲：誰的腳風利索、在這場比賽中誰用的時間最短！

站在山崗上目睹這場屠殺的我，看得身上直冒冷汗。

「糾察隊」離開十分鐘後，菜蔬隊才閃出五六個人來，前瞻後看了好一會兒，七手八腳地把這個血肉模糊的人從坑中抬出來，我們看得很清楚拖上來的已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

緊接著，才從場部開出來一駕馬車，幾個人連忙把這個活靶子抬上車，送進了醫院。

幾天以後，場部蔬菜組傳來了消息：當天送進醫院時，那人已被泥水嗆死，身上無一完好的皮肉，肝膽破裂慘不忍睹，並在當天下午就地埋掉。在通知成都死者家屬中竟稱：「該員暴病而亡」，卻隱去了這場活活被踢死的真相。

嗚呼！目睹這場慘劇始末的蒼天、后土，你何以沒有施展你的神力，阻止這種無緣無故的兇殺猖行於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

嗚呼！這腥風血雨何時才能了結，還這個世界起碼的公理和正義？

嗚呼！無辜的死難者何以如此軟弱，對橫遭的暴力不奮力反抗？強橫的劊子手就這麼失去人性，在虐殺無辜時不受到良知的制約？

嗚呼，面對這種公開殺戮的遊戲，竟無人敢申張正義，豈不令人沮喪！

嗚呼，這階級鬥爭扼殺人性，將社會道德摧殘殆盡，造成的使整個社會粉碎性危機，將把華夏帶到哪裡去？

嗚呼哀哉！難道從一九五八年以來十餘年間數千萬飢民為毛澤東三面紅旗殉身還不夠，還要讓這場使公理泯滅，使蒼生塗炭的文革，徹底毀滅中華民族不成？

### (十) 年關在耳

一九七〇年舊曆年三十下午，六隊的囚奴們按隊部的規定，打掃完了清潔，準備像往年一樣，再過一個冷冷清清的春節。這天下午，我洗完了衣服，已是六點鐘了，大家正準備著自己的「食具」，各組值星將分肉的臉盆洗了又洗，在分到肉以後，組員們盯著肉盆子。

勞累一年，到了年底，盼吃頓飽飽的年夜飯，但裝進自己碗裡的仍只有這麼幾片回鍋肉，和四兩米的罐罐飯。

家裡有人的還可以接到一封灑滿親人相思淚水的家信，若家裡已經無人，那就只有守著這頓年夜飯，像鍾平波那樣，跪地求告於人間的惡魔了。

這時，大監的鐵門裡兩名士兵，押著一個戴破犢帽的囚奴走了進來，人們並沒留意在過年的時候，還有人進農六隊來。

自文革以來被抓進這裡，關進小監的人隨時都有，何況這期間正逢「嚴打」高潮，幾乎隔一天就有人往小監送，加之此刻大家都在聚精會神盯著分肉，並沒有查覺到，大監鐵門裡又來了「新客」。

帶他來的老管剛剛從隊部辦完了交接手續，交給了小監的看押者。來人被本隊的老管押著正向小監的門裡走去，從那人戴的破帽子缺口處冒出來幾根希希拉拉癩毛知道，來客是一個癩子，身上披的爛棉衣上沾著泥土和斑斑血跡，證明他剛被挨過打。

那時，他的全身發抖，鐵青的臉上憔悴的眼光，死死落在那些擺在壩裡的「碗」裡，那是十分飢餓的眼光。

沒走出幾步，他忽然向押解兵喊道：「我還沒有吃飯，我要吃飯。」並且賴在那裡不走了。那老管向他猛推一掌，使他身不由己地向前一個跪倒在地，疊聲哀求道：「我還沒有吃飯，我要吃飯……」聽到這喊聲，我立刻想到前一年被槍殺的劉志和。

在臨槍決時，他曾反覆不停地在小監裡吶喊：「我要吃飯」。這喊聲，劉志和的判決書上是這樣寫的：「該犯惡毒的、以裝瘋來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精神失常，使人失去了正常人具備的防衛能力，癩子在押送者面前的哀求，並沒有喊醒士兵的惻隱心，只見那兵將他從地上一把提起，連推帶搯的向小監隔向木門處搯。伴著癩子不停的哀求聲，他和隨帶的布包，便被塞進了木門裡。

不一會，隨著小監鐵門關閉的鈍響和一陣上鎖的聲音，那喊聲便被兩道監門阻隔，聽去十分微弱。但仍可清晰地聽見他在喊：「我餓，我要吃飯……」直到除夕的夜幕罩住了六隊的大院。

夜，漸漸地深了，明天便是大年初一，按中華民族的傳統民俗，今夜該是闔家團圓，圍在火爐邊促膝守歲的時候，雖然一九六七年，刮了一陣破除四舊，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的風，但這個古老的民俗並沒被毛澤東取消。

過了十二點鐘，監舍裡的嘈雜漸漸消斂，我和潘老還圍在爐火的餘燼旁。

靜靜的夜裡，崗樓上猜拳行令狂喊和笑聲分外清晰，那擦著瓦楞呼嘯掠過的北風，夾著從小監那裡傳來斷續的哀號和乞討聲，也變得十分清晰：「我沒有吃飯，我要吃飯。」

小監裡的哀號和崗樓上的歡笑，在農六隊上空交響，組成了一曲無法用音符表達的樂章，可惜，生活在其中的中國人有幾人能聽懂這樂章？

就像有人在撫琴而歌，歌詞云：「黑夜沉沉鎖九州，除夕之夜唱歡愁。幾人高臺呼風雨，幾人鐵窗對枷鎖。幾人橫行霸中原，幾人流放在邊亭。幾人崗樓飲美酒，幾人小監啼飢寒。」

「革命」的暴力恰恰選中了在這年關時節，把精神失常的人關進牢房裡，讓他喊出無法生存下去的呼叫：「我沒有吃飯，……我要吃飯！」那癩子的喊聲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清晨，他在飢餓中熬過了一九七〇年的舊曆年底，卻沒有人去理會他。

第二天天亮時分，小監那面的喊聲依然沒有停頓，只是變成了斷斷續續的呻吟，而狂歡一夜崗樓上的老管正在沉沉大睡，六隊的上空很平靜。

初二，初三那小監裡叨叨的呻吟仍沒有停息，人們說兩年前劉志和在同一監舍發出的呻吟聲又響起來了，難道那被槍殺的劉志和冤魂不散？

第四天的夜裡，也就是大年初三，那癩子的呻吟聲，突然變成了吶喊，雖然那吶喊是那麼嘶啞和虛弱，但分明含著待發的控訴，我預感到某種凶兆正悄悄地逼臨到他的頭上。殘暴的地獄統治者要維持地獄的平靜，不允許在這裡破壞他們秩序，但是完全失控的癩子，堅持他的吶喊，好像唯有這樣，才能減輕他所受到的痛苦。

果然，這天夜裡，小監裡響起打開鐵門的聲音，從牆那面傳來了老管盛怒的喝罵聲：「你這找死的賤骨頭，在這裡閒得不耐煩了是吧，老子今天就給你退燒。」接著就傳來了一陣沉悶的棒擊聲，像殺豬匠捶打死豬的那種沉悶的響聲。

這陣棒打整整持續了半個小時，果然奏效，喊聲終於收斂了，小監的那面暫時又恢復了平靜。但是第二天天亮時分，他痛苦的吶喊聲又再度揚起，雖然那聲音已相當微弱，聽不清他在喊什麼，那嘶叫令人不安。

按小監規定，被關押人員每天的屎尿，是由蔬菜組的人挑著糞桶去挑出來的。大家排定了輪子，挨次去完成這個「任務」，這一天剛好輪到我。

早上起來，我在得到崗哨的許可後，便挑著糞桶跨進通向小監壩子的小門，將糞桶擺在圍牆邊，坐在牆邊靜靜等候。

值班老管依次地打開了各監舍的鐵門，喝令住在裡面的禁閉者，將自己的便盆端出來倒進那牆邊的糞桶裡。當打開關癩子的五號監門時，只聽見從裡面傳出陣陣呻吟，並不見有人出來。

就在這時，我看見四個士兵，每個人手裡操著一條一公尺多長的青槓棒。那青槓棒上，沾滿了六隊政治犯身上的鮮血，心裡一陣緊張。

四人中為首的那人手裡還提著一根繩子，從那小監隔牆的木門中走了進去，逕直向五號房打開的鐵門裡走去，不一會兒就看見那癩子的雙腳被捆在一起，門外的兩個人像拖死豬一樣，把他從裡面拽出來，一直拖到了壩子中間。

我立即倒抽了一口涼氣，眼看一場慘禍又要發生了，想避開，已不可能，只好硬著頭皮看下去。

那癩子的破氈帽在拖出五號監舍時掛在鐵門的門檻上，而它的主人已血跡斑斑，簡直變成了一具活屍。被兩個兵倒拖出來時他還能掙扎，拖到院壩中，還欠了欠身子，好像想坐起來，但沒有成功，只軟綿綿地躺在地上。

四條漢子將他四面圍住，一聲喝令，操在手中的青槓棒，雨點般朝那已不成形的活屍上打去。一邊吼道：「這可恨可惱的傢伙，吵得老子們連年都過不清靜。」現在把它當成了出氣的活靶子，讓這幫兇手盡情解恨。

開始，癩子還能對砍下去的青槓棒抽筋似的微動。如此持續了五分鐘，那癩子便對落在他身上的棍棒毫無反映，先前淒慘的喊聲，變成一串「呼，呼」的出氣聲，直到從那口、鼻中噴出的血泡發出撲次、撲次的響聲，四條漢子才收住手中的棍棒，向那地上躺著的屍體不屑地唾著口水。

整個小監暫時一片寂靜，周圍的空氣凝結著，凝住了從小監窗洞裡射出來的眼光。我木然站在那糞桶邊，低著頭，面對躺在我面前的屍體暗暗祈禱，如此過了大約十分鐘，從小監的隔牆外傳來了報告開飯的喊聲，已是早上八點鐘了。

大監裡正在集合，傳來點名聲和徐世奎的訓斥聲。

四個老管重新拿來一根繩子，將捆著屍首的繩子接長了一截，倒拽著那已經血肉模糊的身軀，經過小監的木門向著兩扇大鐵門拖去。在那拖出去的地上，留下了一條癩子染成的血路，只有那頂沾著泥垢和血跡的破氈帽，在五號監舍的門檻上，目送著被拖出去的主人。

監門口停著一輛人力板車，車上擺著一床破草席，被軍爺叫來的三名囚奴，七手八腳用破草席將那拖出來的屍體包裹好，只見他死死瞪著眼，似乎不甘心落氣，到死沒有閉眼，直到用一塊布蒙著他的臉，將他甩上了板車上。

上午十點鐘光景，三名囚奴拖著這輛裝著癩子的「靈車」，翻上了六隊山後四號樑子的山路。當我已把從小監挑出來的糞，倒進籃球場外的糞坑，順著後山坡向四號樑子走去時，正看見那板車停放在山前選好的一個土壩前，在那裡挖一個土坑。

沒到中午，又一個受盡暴政摧殘，最後被活活打死的無辜生命，連同他無法陳述的冤，一齊埋葬在那裡了。

## 第七章：背負重枷的煉獄

### 第一節：栽秧和收割

過了穀雨，鹽源的氣溫還保持在十度以下，一大早，天濛濛亮，我們就被趕進那徹骨冰涼的水田裡扯秧，咬著牙一泡就是六個小時，直到中午才站起來舒一下快要折斷的脊背，當時只覺得滿眼金花四射，將捲起的褲腳放下，去裸關節上捏一把就是一個窩，這是營養不良和勞累的警告。

肚子早已空了。拖著滿身泥汗的身子爬上田坎，領到半罐玉米粿和一瓢沒油的乾白菜吃過午飯，便在隊長催促下重新回到水田裡。直到天黑，辨不出栽下的秧子是否插穩時，才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從水田裡爬起來。

晚上洗腳以後，看看滿腳的傷痕，分不清是劃傷還是凍傷，睡在被窩裡暖和後滿腳奇癢。每當此時，我常常想起我的父親，不知他的生死下落，夜間因惡夢常常哭醒！

栽秧剛完，又奔赴五百畝麥田，槍收已黃熟的麥子。夏收時節，每天保持十二小時以上的勞動，奴隸們只能用磨洋工減少體力消耗。然而，徐老大和何慶雲像驅使牲畜一樣，每天天色已漆黑不見五指，還要我們將收下的麥子運回山頂曬場，連夜脫粒。

收割是農活中最耗體力的一種，其實與其說這是一種最累的活，不如說徐老大一加再加的勞動定額，使體弱的囚奴難以勝任。

為鞭撻我們按時完成「槍收、槍栽」任務，規定每天必須完成的割麥和栽插進度。將每天必須完成的田畝數攤給班組，不完成是不准收工的。

晚上九點鐘天已黑淨，田野裡四下響起了蛙鳴，囚奴心裡常說：「當人還不如小青蛙來得自由自在，叫累了就睡覺了。」

收工回來後吃過晚飯，何慶雲和徐世奎將沒有完成任務的班組，集合在院壩裡圍成一圈，召開取名為「找原因」的小組會，讓勞累一天的囚犯們坐在壩子裡吹冷風。

大家被磨疲了，「找原因」也習以為常，反正沒法完成高定額的任務，久而久之，一到吃過晚飯，每個人都會將棉被把自己裹成一團，任壩子裡冷風狂吹，直到深夜十二點鐘，徐世奎從辦公室走出來，圍成圈子的地方已鼾聲一片。

後來徐世奎改變策略，下給各組的任務劃到個人身上，規定誰先完成任務誰就先回監舍休息，這麼一劃一時見效，身體較好手腳麻利的年輕人，果然按時完成了。

徐世奎嘗到了分開幹的甜頭，割麥定額也隨之一再增加，由開始每人每天四分地追加到一畝地，監獄的高額任務，與酷吏們的殘酷壓榨追相逼迫我們。

只苦了身體虛弱、手笨腳呆上了歲數的人，他們常在晚上收工時才完成全天一半任務！。

徐世奎有了口實，站在田坎上譏諷那些沒完成任務的人說：「你們看看別人為什麼能完成，而你們就偏要拖？這不說明你們一貫軟拖硬抗？所以，今天非得完成任務，否則就在田裡過夜吧！」

說完，留下徐伯威打著一個燈籠，吩咐他：「你在這裡守他們，一分一厘的任務都不能少！」說完拍拍屁股走遠了，交給徐老頭陪著。

經常完不成任務的是身材瘦小的蔡先祿、鄧小祝們。天色黑淨了，田野裡靜悄悄的，只聽見被留下的人緊一聲慢一聲的割麥聲，他們在豆影般的燈籠光下，向著好像永不到盡頭的麥茬發呆。

有一次，蔡先祿實在累得不能睜開眼，就坐在田坎上打瞌睡，這可令田坎上的徐伯威十分著急，開口道：「唉！你怎麼在這濕漉漉的田坎上睡覺呢，你會得病的，我們也不能等到天亮守通宵啊？」

徐伯威是六十好幾的人了，體弱多病的蔡先祿也是四十出頭的人！蔡先祿站起來揉了揉眼睛，望著前方沒有邊際的麥子絕望的說：「這日子我怕難熬到出監獄那天的……」

留在田裡的人，經常要在第二天凌晨三點鐘，在徐伯威那悠晃的馬燈下回到監舍。

收割的奴隸們一上麥地便蹬開雙腿，右手緊捏鐮刀，集中全部注意力，運足氣力，左手順著穀桿從茬口右邊那棵開始捏成一把，依茬口向左邊割去，最後將已無法再增加的穀把，放到左側身後邊。

囚奴們像一頭牛順著割倒的麥桿向前衝，汗水從背脊溝裡向下淌，一直淌過小腿彎再滴在自己踩過的腳印上，兩腿打哆嗦，直到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才慢慢直起腰桿，扭著那幾乎不聽使喚的腰，緩緩地站了起來，用捏緊的拳頭在背上和腿部輕輕捶擊著。

待到恢復一下，不聽指揮的兩腿站在那裡喘過大氣後，抬眼看前方的終點還有多遠？再回過頭去看身後放倒的穀桿向前推進了幾米？不敢怠慢，重新蹬開雙腿，彎下腰繼續著剛才的動作。

從穀桿上抖下來的像細針一般的粉塵，沾到身上與汗水沾在一起，紮進肉中會起一串串的紅痱子，先前還感到又痛又癢，後來它們就隨著汗水流了下來，變成一條條黑紅色的汗垢。

捏著穀桿的左手和捏著鐮刀的右手，經常因慌忙趕任務打架，一不小心鋒利的刃口滑到手指上，在左手的指頭上割出一條傷口，輕則鮮血長流，重則可以截脫一節指頭。

不管出現那一種傷情，立刻用右手按著傷口，然後在傷口上撒上自己屙的尿，再從自己的破棉衣上撕下一塊布包紮好，以免因感染增加新的痛苦和麻煩。

傷包紮好後，還要繼續割下去，一天的任務是不能打折的，決不會因為手被鐮刀割傷而休息或減少任務。

由於定額太重，割傷手是經常發生的，每收割一季度，割傷指頭的總有十幾個人，囚奴們出現這種傷與毒刑比較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過度疲勞和大量出汗，出現兩眼發黑金星四迸的情況經常發生，輕則噁心，重則昏倒，此時腦門和背上，由原先的熱汗變成冷汗，耳朵裡像無數轟炸機嗡嗡作響，心裡很虛。因心臟承受不了，弄不好會發生虛脫而一命嗚呼。

古柏大隊就曾發生過這種事，但草菅芥人命的當局，照例會在死亡原因中批上「因病死亡」四個字。

蹲在田頭，頂著烈日，望著頭頂上的藍天，會使人想到「白毛女」的歌詞「老人折斷腰，兒孫筋骨瘦」！這樣的日子要到那天才到盡頭？楊白勞還有一個女兒相依為命，還有一個家可歸，而我們除獄吏的苛責和侮辱外，還有什麼？

農忙時節送到田坎上來口口聲聲稱之為「改善」生活，只不過平時罐子裡的玉米巴加厚了兩毫米，平時連油星都不見的「奈溫」菜，增加了半瓢。不過，累過頭的人，因汗水出得太多，反而不感到餓。

每次農忙到來，只有消耗本來極其瘦弱的身體，汗水浸濕了衣衫，冷風一吹便會立刻感冒，晚上發燒了誰管？倒在發霉的鋪草上用被蓋嚴嚴實實蓋上，靠發一身汗減輕病痛，第二天還得照樣出工。

所以，每次農忙季節一完，都會出現大量病號，許多人就因此而一病不起，到醫院再也沒有回來，把自己一堆白骨拋在這荒山溝了。

那些完不成任務的人唯一辦法，就只有用自己的玉米巴騰出一半來請人幫忙完成。交換的條件是論田畝計值，每由別人割一分地便出一兩玉米巴。

用自己的玉米巴求人完成任務的做法叫「賣血」，為幾個玉米巴替人流汗的叫「賣汗」，血汗交易都是當局的重苛逼出來的，這種事在勞改隊中是很平常的交易，蔡光祿，鄧小祝是經常賣血的人，本來營養就缺，這樣作的結果無異加速死亡而已。

記得一九七五年，我從菜蔬組調到大田作業組。第一天參加割麥勞動，一天只完成了定額的一半，卻累得我腰桿都直不起來。晚上到了八點多鐘，看看天色已完全黑盡，距離規定任務的茬口足有二十公尺遠。

何慶雲走到我面前，幸災樂禍的嘲笑我：「怎麼樣，我看像你們這種臭知識份子勞動關過不了，到就業隊去怎麼混過勞改關的？」我沒有理會他。第二天便帶上棉衣作好提前準備，任務要是再完不成，就只有露宿田間的命！

上午拼命趕，使自己不掉在近旁人五公尺內，猛然間鐮刀滑到左手的小指頭上把手指砍去了一截。血像水般的滲了出來，我丟下鐮刀，將割下的指頭帶著沒有割斷的骨頭按在一起，鮮血一個勁往外湧。

這時正碰上值班的郭川小，他走了過來，忙將唐啟容叫了過來，將我扶到溪溝對面的農場醫院，下午回六隊以後，便將我分派到曬場上加入脫粒組的勞動，逃過當年收割這一關。

農一隊就發生過，因夏收躲避這種高定額，橫下心來，用鐮刀將自己左手三個指頭砍掉，成了殘廢編入老殘隊。

真是苛役猛於虎，人真是太脆弱了，冤獄中，不知有多少人為高額勞役所逼，死亡或殘廢的，沒人統計。

## 第二節：挑草

收秋一過，囚奴們酸痛的筋骨，還沒有來得及舒展，被汗水浸透的爛衣服還沒有洗淨，連日熬夜眼眶裡充血的血絲，還留在眼圈裡，一年一度的挑草熱，又以灼人之勢向苦役們捲來了。

降雨量本來就少的鹽源，一年四季從五月開始到十月結束的雨季，滿足不了植物生長所需的水份。大半年時間風沙滿天，乾渴的野草，在紅土地裡，竄出很長的根，從很深的地下取回雨季才降下的水，延續草原的生機。

三面紅旗人為造成飢荒後，為了解決糧食的恐慌，決策者用他們的權力將黑手伸向這裡。拖拉機盲目把原本缺水，艱難生成的自然草原開墾出來，草地被連根翻轉，大片的原始牧場變成了大片紅色土地。

墾荒不僅把山樑上的草地變成瘦脊的紅土地，為了給這些紅土地裡種下的莊稼「施肥」，又把周邊餘留的草地連根鏟掉，使這裡光禿一片。到了冬天，生活在這裡的牛羊群，就進了鬼門關，牠們望著光禿禿的紅土地發呆。

在這兒生活的牛羊群同備受大躍進之苦的中國百姓一樣，也被強迫地接受這種「中國式社會主義改造」。

那時間農場飼養的牛羊群，經常莫名其妙地倒在放牧途中。這些倒斃在路邊的牲畜，便是給囚奴「改善」伙食的「肉」，這就是在成都初調來時，幹部們許諾過的牛羊肉當小菜的依據。

盲目翻耕出來的土地，失去草層為它們保持濕潤，乾旱和嚴重缺肥，使播種在它上面的作物長不到半公尺高，這些土地種上一季，往往連種子都收不回來，眼巴巴看著把勞動力和機械耕種的投入無畏消耗掉。投入的無代價勞動力，抵不上這種盲目開墾造成的虧損，這種損失對於獨裁者，是無動於衷的。

為解決冬季各中隊的牛羊群所需的草料，各中隊只能向小金河附近的公社農家收購。然而小金河稻穀區，收割的穀草卻是有限的，它被農牧場周圍的各個農業中隊所爭搶，價格便一再攀升。由最初的每斤兩分錢漲到每斤五分錢，當時的大米才一角二分錢一斤，一斤稻草等於六兩穀子，僅這筆開支就足以使虧損的中隊負債。

國營農場的經濟虧損，在毛澤東時代是很普遍的。

由於各農業中隊對穀草的搶購，中隊只好從遙遠的河谷地帶，運回各中隊牛羊所需的越冬穀草，馬車的運力越來越無法勝任！於是，牲畜越冬草料的需要，便由剛剛從搶收戰場上下來的囚奴們用肩頭承接過來。

每年，徐世奎都要從二十里外，垂直高差達兩百公尺的河壩稻穀區，購回二十萬斤的穀草以備冬荒！按每人每天運回一百五十斤計算，並動用全隊一半勞動力出動，至少也要運半個月。於是，每當秋收完畢，又一個大量消耗我們體力的勞動——挑草，再度落到我們肩上。

從挑草那天開始，六隊到河壩地區綿延二十里山間小路上，一條由一百號勞動力挑著大捆的草網，艱難攀登上山的「壯景」便出現了。

別說挑著體積超過身體兩倍的重擔，迎風向上掙扎，一個人就是空著手，來回走兩趟行程三十里的山路，都得汗流浹背，腳上打起血泡。這每天要完成一百五十斤草的挑運。對於體弱的勞役者，又是一場要付出拚拼命代價的折磨！

這時雨季剛過，爆烈的風季便接著到來。

早上五點鐘，晨星還來不及收淨，挑草的人就帶著一根扁擔兩付繩子和一身的酸痛，以及永遠無法恢復的疲勞，撥腿在昏暗不清的山間小道上奔跑起來。人們心裡著急，因為一到下午西風驟起，挑著那大捆的草爬山就更吃力了。

早上六點鐘，河谷的村落剛剛才嫋起稀疏炊煙。挑草的隊伍便在一片狗吠聲中，進入了生產隊的曬場。他們顧不上看清周圍的環境，急急忙忙從草樹上拖下一捆一捆的穀草，用最快的速度捆好草挑子。

趕緊挑著沉甸甸的草擔，飛步在田間的石板路上。出得村寨便是曲折、上升的山路，押行的槍桿子向來只站在山顛最高處，向下監視這像螞蟻般分散在山路上的人點，看他們向上一步步蹬，艱難向上移動無動於衷！

這是一副極其壯觀的圖畫！藝術家也難構思出這幅襤褸衣著的苦役隊伍，把它們的任一個段落，攝下來都是控訴和悲歌！

牛啊！牛！你這善良的牲畜，你可知道你咀嚼的每一根草，就是那些累死累活掙扎在半山中的苦役身上擠出的血汗麼？

他們太陽穴上，突冒出筷子般粗大的青筋，額上淌下豆粒般的汗珠滴滴跟著他們腳跟，灑落在那羊腸小徑上。發紅兩眼瞪著高高的山顛，待到爬上坳口，太陽才羞澀的露面，用他明亮的眼睛，盯著那曲折山路上，星星點點像螞蟻向上移動的奴隸們！

登呀上登，咬緊牙關，一步血一湧，一步一喘氣！在肩頭上一閃一閃的草挑，就像背負著的十字架。草擔子在肩上從左邊換到右邊，又從右邊換回左邊。磨起血泡了，破皮處流黃水了，再疼也要忍！黃水乾過就成厚厚的繭巴！

當腳步登著最陡的石坎，兩腿便直打哆嗦，冷汗夾著熱汗在背心裡流淌，如果氣力不支或一陣大風，會把你連草帶人捲刮下去。

此時，誰也管不了誰，誰也不巴望別人的扶助，掙扎著站起來。回頭望望那山腳下，抬頭望望山顛上，兩頭茫茫，嘆口氣重新收拾好草網子，把牙關咬得更緊，吭哨！吭哨！用低沉的呻吟，唱煉獄的歌。

我的手因為幾次刑具摧殘手指發麻，捆起草來無論如何使勁，老收不緊繩子，加上捆草技術差，碰到草網大一點，鬆鬆的草網幾次撞在前方的坡坎上，便從繩中鬆脫，加上毫無定向的亂風一吹，散了架的草滿山坡都是。



挑回去的草是要過秤的，秤不夠任務就沒有完成，麻煩事也跟著就來。被迫在路上停下草擔，將散掉的草網重新網綁，在亂風的干擾下好不容易將草網好，往肩上一挑，走不了幾步又散了。

如此地，散了又捆捆了又散，後面的人一個接一個從我身旁過去，有人第二趟都打轉身了，還看我在那老地方，同那堆存心同我過不去的亂草較勁。

氣力耗盡了，我乾脆停下來想恢復一下體力，再重新捆好草繼續上登，但身後已沒有其他人了，背後的刺刀頂著我的背，只好胡亂的捆好草網，硬著頭皮拚拼命追趕！

有時候我真想帶一個打火機藏在身上，把那草網連繩子一火燒掉，但前後都是人，幹這樣的事未免有些傻，只好將回歸的時間一再後延。

下午的風勢越來越狂，風吹乾了我身上的汗水，刮起來的泥沙重重打在我乾癟的腳桿上，皮膚上皺出了無數細細的裂口，血從那些皺開的裂口裡滲出來。

在風口上，風在我草擔上增加了百餘斤的副壓，不但無法前進還要逼著我倒退回。風還用它的巨掌捂住我的鼻子，壓迫我的喉嚨，使我張大了口也喘不過氣來；風裹著我的雙腿，使我無法開步。

於是在狂風中掙扎的我，使我想那越吹越猛的風將我輕飄飄的舉起來，飛向雲端，飄過無數的山谷，飄進白茫茫的雲海，飄向那沒有人煙的地方，躲在那裡永遠結束這煉獄之苦。

這時的心情，這時的風聲，會使我譜出一曲樂章，它的名字就叫「風！」

有一次上午，正當我第一趟草挑過那道最窄的隘口時，我碰上了王德。碰上他時，他身上那件破爛背心已被汗水浸透，顯出斑斑跡印，面前是剛散架的草網，他坐在地上望著散落一地的亂草發呆，我見他臉色潮紅，不停喘咳，知道他肺結核發作了，出氣很臭。

這些年來，六隊瘋狂的打人風，以及徐世奎對「狗類」的渺視冷落，使許多榮膺「狗」類稱號的人都開始沈默。只有他反常的變得更「靠攏」政府，可惜何慶雲也好，徐世奎也好，似乎對他平時的告密並無特殊興趣！眼看他的肺病如此嚴重，也好像視而不見，照樣攤派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所要完成的任務，一絲一毫都沒打過折扣。

此時我見他雙眼直直盯著面前停放的草網，便在旁邊停下了我的草擔，喃喃自語道：「中國人就像一堆亂草，他們是無法捆在一起的，非要一根繩子才能將他們強迫套住。」

見他注意聽我講話，臉上有一種乞援的請求，心中不免湧上了同情，暗暗嘆息：「真是被煉獄壓扁了的人。」走到他面前，默默同他拽著繩子一人一端，不到五分鐘就將那草網重新捆好。

我跟在他的後面，想他被勞役和疾病折磨得如此，還自稱「毛澤東思想的信徒，」既如此，在「普天之下莫非黨臣」的中共統治時代，相同的信仰為什麼沒讓徐世奎、何慶雲對他產生一點惻隱心？卻押著他完成這樣的勞役？

夜裡，北風掠過監舍房頂的瓦楞發出陣陣轟叫，白天挑草早已累壞的苦囚們都已酣睡，昏暗角落裡，傳來王德發出陣陣猛烈咳嗽聲，他今天天色黑盡了才回到監舍，大概下午的風寒使他病情加重了，他的咳聲帶著一種不祥之兆。

突然間，一道慘白的手電筒光刷了過來，一個幾乎被口罩籠住了臉的黃馬褂，悄悄停在他的鋪位前，王德下意識的坐起身來，卻冷不防腳上挨了一棍。他唉喲一聲，連忙睡下縮成一團瑟瑟發抖，只聽見那手電筒向他吼道：「這麼晚不睡，看見我又不喊報告，誰知道你想幹什麼？」

「報告……我咳……我感冒了！」他斷斷續續的解釋，聲音非常微弱。聽得出來他此刻發燒得厲害，睡在旁邊的人，本想替他解釋，幫忙喊唐啟榮過來看一下，然而想到平時他那種可恨可惡，沒人吭聲。

### 第三節：曹季賢：「我要回家」

秋收過去，監獄裡勞累的奴隸們，田間勞役剛剛結束，又熬過發燒的運草熱，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年！

冬天像往常一樣，一早起來的白頭霜，令人畏縮著手腳，到了中午狂風大作，括在人身猶如刀割，鹽源的老百姓，已躲在炕邊紅火的老樹疙瘩周圍取暖了。

但是，在中共監獄裡，從不會讓囚奴們稍歇下來，冬天歷來是當局當作興修水利的好時節。盤旋在二道溝狹長山溝裡的水渠，和分佈在下游進入甘海的大小水庫，就是二道溝兩千名囚奴在冬季開挖出來的。

這些年除了一九六七年大規模武鬥停了兩年，到六九年以後，「農業學大寨」的運動又如火如荼捲括起來。

各中隊分攤的改田改土工程每年都在增加，挑草任務完成以後，二道溝全長幾十公里的排灌堰溝，便從水庫出水口開始徹底的清理，農六隊擔負二道溝最末端的那一段，從靠近梅雨的最低位置開始。

照場部統一規定的作息時間，上午八點鐘奴隸們便在榮老頭和徐世奎的催促下，帶著鐵鍬、鐵鎬、扁擔、畚箕出得監門，頂著刺骨的風霜，越過五號梁溝谷的河彎，來到清溝現場。

在零下十度嚴寒中，值班老管把軍用毛皮衣領拉到下巴下，除留下一雙眼睛和鼻子，將臉頰嚴嚴實實的護著，懷中揣著雙手，也被皮大衣的袖籠子保護著，腳上厚厚的絨毛皮靴不斷在結了冰的田坎上來回踩著，發出踏踏聲響。

遊動在溝底下的瘦弱的奴隸們，穿著自己千針萬線的棉盔甲，腳上套著布膠鞋踩著像刀子般的碎冰層，用鐵鎬將凍成冰塊的泥沙挖鬆後，再裝進畚箕裡，甩到高過自己頭頂的堰溝坎上。

零下十度的冬天，手腳被沿途的風霜凍僵，一到工地大家便放下工具，四處找尋堆積在田坎上的玉米桿和向日葵稿桿，經過二十幾天日曬霜打，已乾得用火一點便可熊熊燃燒起來。大家紛紛從田坎和背溝處抱來那些稿桿，用打火石引燃後，團團圍住沖天的烈焰取取暖來。

不過，那些枯乾稿桿燃起的大火，最多持續不過十分鐘，就像安徒生童話裡賣火柴的小女孩，點燃一匣火柴一樣，眼前並沒有出現耶誕節的肥鵝和衣帽就熄滅了，十來分鐘留下了一堆灰燼。

徐世奎追著出工的隊伍趕上了工地，便將火堆的餘燼弄熄，把戀戀不捨離開火堆的奴隸們，驅趕到各自劃定的界段上。

山谷中傳出鐵鍬鑿開冰層發出的鏗鏘聲，鑿到特別硬的冰層會濺出火花，震得人虎口發麻。

徐世奎不停的吆響著：「你們開工這麼晚了，還要磨洋工，我倒不怕你們軟拖硬抗，今天劃定的任務，非完成不可，完不成晚上打起燈籠火把也要完成，馮俊伯！」他喊著收方員，要他拿著尺子一段段的把每個人的任務劃出來。

他的眼光落到一個穿著破爛「黃馬褂」的身上停了下來，這是一個身材壯實，剛剛從南充監獄調來的「新犯」，聽說是由軍事法庭開庭判決的，名字叫曹季賢，他犯什麼「罪」，又為什麼偏偏關押到農六隊來，我們都不清楚，只聽說他為爭風吃醋，同他的上司決鬥。

從他調到農六隊僅三個月時間裡，從來不與人交談，除了偶然長籲一聲「放我出去」，才知他並不是啞巴。不過平時從他那呆滯的目光來判斷，這人顯然又是一個精神上受過猛烈傷害的人。

跟隨大家進入山谷後，他便坐在距大家不遠處凍得硬梆梆的田坎上，兩眼望著銀灰色的天，好像他腦海裡正翻滾著理不清的冤屈，即使大夥鬧烘烘圍著火堆取暖的那刻，他仍無動於衷。

蔡先祿向他喊道：「唉：曹軍爺，不要再想那些不痛快的事，到這裡來先暖和一下手腳。」他好像沒聽見一樣，像一塊石頭端坐在那裡，嘴邊又滑過了他自己才聽得見的那句咕嚕：「放我回家」。

徐世奎向他走過來時，奴隸們已離開了火堆下到溝底，唯獨只有他還繼續保持原來的姿勢，坐在原來的地方，好像有意在用抗工回答徐世奎似的。

這些年來，在高壓政策下，依靠繩子和鬥爭會，以及士兵們的拳打腳踢，加上「殺一小批」的威脅，六隊一些人的棱角被磨得差不多了，自從一九六八年後，有幾年沒有人公開的抗拒勞役了。

徐世奎見穩坐原處的曹軍爺，低聲喝道：「曹季賢怎麼搞的，大家都開工了你在想什麼？今天每人清理溝泥的任務規定是六公尺，你沒聽見嗎，完不成任務你就要守到深夜也回不去的」。

但是這句話沒有收到任何效果，他索性把頭埋進兩大腿之間，看樣子天氣太冷，他好像在瑟瑟作抖，徐世奎暫時沒有理會他，走到渠邊去檢查那裡奴隸們的清渠進度。

五分鐘以後，手裡拄著拐杖的榮老頭走了過來，當他用他的獨眼睛看到坐在田坎上的曹季賢時，使用手裡的手杖去挑曹季賢身上穿的那舊軍裝，一面咕嚕道，「你聽見沒有？趕快起來到你劃的地段去，今天必須完成規定的任務」。

這榮老頭已退休兩年，憑著他失去左眼和一條假腿，憑著他打天下的老本，退休後，勞改局安排他專門旅遊休假，他到全國各地周遊了一年，感到不自在，勞改局又特別地批准了他的請求，留在六隊繼續管犯人。

看來他認為六隊的政治犯歸順了，反正一個孤老頭閒著也無聊，閒不慣了，今天他冒著嚴寒的天氣，來清理溝渠的工地上遛達。

一上工地就碰上這個曹軍爺。當榮老頭的拐杖戳著他身上時，仍像一塊石頭一樣，不理會也不吭聲，這使榮老頭心裡好不自在。

隔得最近的余賦見狀，從溝裡探出頭來，低聲替他解釋說：「他可能病了，昨夜咳了一夜，我們挨著他睡的人都沒睡好」。榮老頭對自己在犯人面前遭遇不理不睬感到萬分惱怒，「有醫生證明嗎？」語氣裡分明含著怒意。

為了驅使奴隸們帶病出工，各中隊給醫院打過招呼「非經領導同意，任何醫生都無權給犯人開出休息的病假條。」一般犯人即使害了病也必須像健康人完成規定的任務。因病在工地上，臨到死亡前才往醫院送的人很多。視犯人的生命如草芥，這是勞改隊裡人道主義慣例。

曹季賢本人既沒有想去看病，也不知道在這樣險惡環境下如何保護自己，他那失常的大腦裡只有一個單純而簡單的想法：「放我回家。」

可惜，這榮老頭不但不知道他的底細，只知道管束犯人，他可是六隊成立後的首任中隊長。

現在他被這個壯實年輕人對他的藐視激怒了，用拐杖敲打著腳下的冰層，吼道：「我看，這傢伙是好逸惡勞慣了，這種態度是公開抗拒改造，對這樣的人，說服教育起不到任何作用。」

他的聲音武斷而直率，沒有商量的餘地。一面抬起頭來向坐在高處的值班士兵命令道：「你們下來，把這個犯人拖到溝裡去！今天非給他點顏色看看」。

兩個老管無奈的站起來，把毛皮的風帽推到腦後，從原來地方走了下來，他們走到曹季賢的身邊，猛然一個擒拿動作，將他按到地上，扒下了他的棉衣、棉褲和膠鞋，任他怎樣掙扎反抗，又怎敵得過這些訓練有素的監獄看守？

兩人從腰裡掏出一根隨身攜帶的麻繩，將他的雙手反剪過來捆成了一個「蘇秦背劍」的姿勢，然後將這個只穿著單衣的人推進了河溝之中，重新回到原來的座位上。

曹季賢那雙赤著的腳，在冰水中迅速變成了紫黑色，兩條腿瑟瑟發抖，反叉著的兩手被捆的大拇指，沁出了紫紅色的血，雙肩將他的頭扭曲成一個十分奇怪的樣子，面如茶色嘴皮發烏，咬緊雙唇一聲都沒有吭出來。

他像一尊堅硬的化石，僵立在冰水中，時間就這麼一秒鐘一秒鐘的過去，堰溝裡的奴隸們都停下手中的活，看曹季賢他那樣子，說不出心中的滋味！

突然撲通一聲，「化石」終於堅持不住，像被融化了的冰人，直直地倒在溝底的冰水中。

仁慈的榮老頭才慢慢地走過來，命令站在曹季賢身旁的兩個奴隸先將他捆在大拇指之間的繩子割斷，七手八腳地將他架到山坡上，只見他全身青紫，像一條冰凍的活屍。

有人忙抱了穀桿來，就在他身邊燃起了火，有人把他被脫下來的衣服，披在他的身上，在場的人全部圍了過來，山頭上只聽到徐世奎從遠處傳來的吆喝聲，而那位獨眼榮老頭，在親自目睹了他一手製造的傑作後，便悄然拄著他的拐杖，從山底下那條小路上走回去，漸漸消失在轉彎的地方。

他今天沒有料到這曹季賢，竟以不屈姿態出現在他的面前，畢竟年紀大的人不像殺氣正旺的年輕士兵，當年的紅衛兵可以血刃對手，用刺刀剖開對方的胸膛而面不改色。

他今天面對的是一個手無寸鐵的囚犯，是一個同他一樣穿過黃馬褂的人。是他親口下令讓曹季賢幾乎凍死！雖然他永遠不會對自己的罪惡發生懺悔，然而他害怕了，慌慌忙忙的逃離了，這老傢伙！

「動工，動工，有什麼好看的！」狹長的溝谷裡傳來了徐世奎聲嘶力竭的叫喊，他拚拼命地驅散在曹季賢周圍的圍觀者，一面命令跟班的衛生員和兩名流放者到河對面的醫院去取擔架。

曹季賢經過火烤烘暖的措施，仍然不省人事的昏迷在工地的田坎上。

「這哪是把我們當人看待，連對待牲畜都不如！」圍觀的人壓低了嗓門憤憤的控訴著，人們心中充滿了壓抑！「比劉文采地主莊園的水牢裡所展出的還要殘忍，何況那水牢是藏在地下室裡不敢公開露面的」。

「什麼改造人，分明就是摧殘人，法西斯！」幾乎所有在場的人同聲譴責剛才的暴行。

突然有一個完全不同的聲音在喊道：「活該！誰叫這曹季賢穿黃馬褂？這年頭，當兵的哪一個不是心黑手辣，想來他過去整起人來一點都不會比別人差，我看哪！用不著在他的身上浪費同情心」。

人們七嘴八舌的議論著！

一九七〇年初，當他穿著黃馬褂，第一次出現在農六隊的壩子裡，就給這裡的奴隸們蒙上一種天然的敵意，那時他成天低著頭，好像一隻掉進了羊群裡的小狗，任何人對他都抱著一種防備。

好奇的人向他提出問題，他一律不與回答。也許人們提出像「你是怎麼到這裡來的？」是連他自己都沒有搞清楚的，除非牢頭們聲色俱厲地問他：「你犯什麼法？」他答非所問的嘟囔著，重複一句簡單的話：「放我回家吧」。

吃飯、起居他也不問別人，有時候竟然傻到用手板心去接自己那一瓢白菜。但從他矮而壯實的身體猜測，他原是一個挺有氣力的莊稼人，只因為在入監時受的刺激太深，使他沉浸在半睡眠狀態，流放者戲虐的稱他叫「曹軍爺」。

因為行動遲頓，在六隊那個環境下，他沒有少挨老管們的拳腳，在獄吏們的眼睛裡，被囚在六隊的人都是「牛鬼蛇神」，都是他們隨意打罵的奴隸。

出工勞動，他總是拖在隊伍的最後面，每天加給奴隸們的勞動，尺滿稱足他也不例外，農六隊的囚奴經過長期的磨難歸順了，都會在下地以後忙著趕自己的「任務」。但是，他好像木頭人似的，坐在田坎上發呆。

為了他沒有完成當天的任務，六隊有的是制服他的辦法，挑燈夜戰免不了他；繩捆索綁，鬥爭會這些能治服奴隸們的「行之有效」辦法，都一一試過了。但他真像一個不怕開水燙的死豬，隨你怎麼整他，他都會用同樣一句話來回答整他的人：「放我回家！」。

這種近乎癡呆的情況，漸漸使何管教和徐世奎感到頭疼。因為，一個人壓不服，其他的人都會跟著仿效。何慶雲有一次向他威脅說：「你不要以為你這樣我們拿你沒辦法，六隊的劉志和，就是因為『裝瘋』，還不是照樣把他槍斃了！所以你如果繼續下去，就只有自絕於人民！」。

無論那一個國家，決不會對瘋子格殺勿論，除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在中共監獄中把犯人不當人看，隨意侮辱他們的自尊是家常便飯。一般來說，處在生死線上的「重刑犯」不傷皮肉，已經起不到什麼作用。可有一次，徐世奎因傷及了這位曹季賢的隱私，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說：「你曹季賢別裝瘋，老實告訴你，你幹的事是任何人都鄙視的，你趁你妹子從鄉下到你那兒探親，強暴了她使她懷孕，軍事法庭判你十年，我看是判輕了，你還繼續裝瘋賣傻，真不知道羞恥」。

本來，徐世奎這麼刻薄的挖苦，出於對曹季賢的無奈，沒想到他再也沉不住氣，大聲的抗議道：「你說的是假話，軍事法庭那些不是人的傢伙，勾結起來，把營長幹的事，全都誣在我身上……」接著他帶著哭聲斷斷續續地當著在場的人，毫無遮掩的講了出來。

「那營長才是真正的大流氓，前年我妹子探望我，他把她安置在部隊的招待所，那裡知道，才住了兩個月，我的妹子就懷了孕。妹子還是一個處女，吃了啞巴虧，不敢聲張，悄悄私下告訴了我，氣衝衝的我找團長揭發這件醜事，不料被團長反誣一口，說妹子房間的鑰匙只有一把，平時是保管在我手裡的，一口咬定，招待所的人看到我一連幾晚上上妹的房裡住，把這事硬栽在我的頭上。我跑去找師長，師長說這事有損我軍名聲非同小可，成立了一個調查組，調查組調查結果還是把這事栽在我頭上。我被關進了軍法庭禁閉室，受到軍管會的刑訊逼供，我就是這樣冤冤枉枉到監獄裡來了！」

憤怒而失去理智的曹軍爺，決定槍殺他的營長，沒想到還沒進入這營長的房間，就被發覺了，師長毫不客氣把他送上了軍事法庭！

倘若這位軍爺還有一點骨氣，就不該在身受雙重羞辱下，依然忍氣吞聲就範於勞改隊，他應該勇敢的站起來抗議軍事法庭的誣判。可惜他沒這樣做，把他抓進監獄後，才聽說妹妹墮了胎。

這樁醜聞，以女人的墮胎了結了，證據已經消滅，誰幹的「好事」也恐怕只有他的妹妹才知道了。

現在，幾乎被凍死在清理堰溝工地上的曹軍爺，被三名流放者抬進了醫院。最後因為命大，經過醫院搶救，他蘇醒了過來。可是那兩條被冰雪凍得組織壞死的腿，給他留下了終身殘疾。

他當時才二十幾歲，中國人中蒙受這種類似之冤的人太多，中共的組織機構，毒刑和邪教作弄過多少無辜的蒼生啊？

#### 第四節：飢餓逼出來的……

按史書上記載，歷史上的水旱災荒只短期發生在局部地區。但毛澤東統治年代，災難的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飢餓持續的時間幾乎是他統治的二十八年！我們就在他統治期間，整整忍受了二十多年的飢餓。

秋冬之季，在牛圈馬廄的飼料槽裡撿豆子和殘餘的玉米；用平時穿破補爛省下來的一套單衣或一件棉衣，向周圍農民換回一小袋糧食或兩斤鹽外，就只有在坡上揀地裡的玉米馬鈴薯，以補充在餓得發慌時添加。

就是這樣節省用換來的一點食物，也為豐衣足食的徐世奎們不容，他明確向崗哨上下令，凡發現奴隸們換來的食物，一律要加以沒收。

為了盡可能躲開鷹犬們搜查，我們選擇收工的高峰時間，趁大家一擁而進，崗哨不容易發現夾帶時收工，在所帶工具上想辦法，將一小包食物藏在棉鎧甲作掩護的背上；或將所帶食物藏於糞桶和籬筐裡，藉這些既臭又髒的農具打掩護，每次帶糧食回監舍，總是提心吊膽，生怕被發覺。

收工站好隊，等到哨兵們喊一聲「去」後，才安下忐忑的心跳，回到監舍或廁所裡哨兵看不到的角落，取出這些東西。但經常仍沒有逃過鷹犬的眼睛，每天收工，或多或少在崗哨下面，擺著各式各樣搜出來的食物。

後來，奴隸們發現在進入監門之前，靠著廚房的高牆轉角處，有一個與廚房相通的角落，於是有人試著，在進入監門之前，就在那牆角處將所帶的糧食拋進來，在進得大門後稍等片刻，再以進入廚房打熱水的名義，進入那個角落，從那裡取出剛拋進來的糧食口袋。

這樣做最初成功，但是事久之後這個秘密也被狡猾的徐世奎發現了。於是他便在奴隸下班時，悄悄埋伏在那牆角處，守株待兔的將扔進來的糧食口袋——截獲，毫不客氣的沒收，扔進了幹部別墅外修的雞舍兔棚裡。

一九七二年林彪事件後，中共虐待犯人的暴行，在輿論譴責下，召開了武漢全國公安工作會議，將嚴禁逼供信和禁止虐待囚犯的官樣文章寫成指示，下發給各地的勞改隊和監獄。瘋狂一時的打人風有所收斂，在生活採取

了一些做法，允許監舍可以生火取暖，在靠近廁所的地方開一排灶，專供病號熬藥，煎湯之用。

但虐待成性的徐世奎，仍藉口奴隸們將公家土裡的糧食偷來煮食，經常將奴隸拉到崗哨下面問罪，輕則砸鍋毀灶，重則將人拉到在崗哨下面繩捆索綁，奴隸們為反抗飢餓的抗爭，一直在這裡成為一個重要內容。

囚奴烤火的主要目的，仍是解除飢餓，所以在監舍裡一直保持著搭灶生火的習慣。徐世奎命令巡邏士兵對「私煨亂煮」進行取締後，將監舍中的灶拆除，用繩捆索綁對付「不聽話」的人，人們只好另覓新的「廚房」。

監舍盡頭的廁所角落，是選定的最佳地點，這裡雖然臭氣逼人，但一來這可以遮風避雨，且這個地方距離崗樓最遠，被長長的監房擋住了老管的視線，不容易為士兵所發覺。

三塊石頭，支撐著大鐵鉢，架柴點火十分便利，如果老管來了，三塊石頭一拆，灶膛的火便迅速熄滅，掃入廁洞幾乎不留痕跡。只要在這裡作炊者留神，不要讓灶裡冒出炊煙，把哨兵從崗樓上吸引下來，自可在這裡安然炊煮。

從此以後每天下班時，挑回來的籬筐糞桶裡，增加了向日葵桿和玉米桿，只要挑進廁所將三塊石頭架好，把柴禾塞在三塊石頭下，點火後便扒在地上只管用嘴死勁地向灶膛裡「吹氣」，待火燒旺後，便可以煮飯了。

當然為了安全，派人在轉角的地方盯著壩子和崗樓，見到已被老管查覺，或者何慶雲徐世奎的身影閃出大門向廁所撲來，便立即通知蹬在那裡燒火的人，迅速撲熄灶裡的火種，緊急處理煮在鍋裡面的糧食，儘量能在他們到來之前收拾得乾乾淨淨。

這種廁所立灶煮食的遊戲帶著極大風險，萬一讓徐世奎們發現，鍋灶毀了不說，看看快要煮熟的東西全被倒掉，煮食者被捉到反省圈裡，還要對鋪位大搜查，把不知經過多少風險才弄到手的充飢物搜去一空，煮食者等待著毒打或繩捆。

經過一番驚險，當一盆食物，端到煮食者面前，被煙灰嗆得通紅的臉上浮現一絲笑意，幾個人顧不得燒火時留在臉上的黑灰，就地圍在廁所裡，狼吞虎嚥的分食著，而將方才的驚險忘得乾乾淨淨。

若干年後，當我伏案捉筆時，回憶這點點滴滴的親身經歷，我又一次會深深感到人求生存的本事真是可嘆！

如果說在流放者之間有過基本的統一，恐怕只有飢餓時才有過。就連周學祝馮俊伯對於廁所作炊這類事也是不願干預的。

七十年代後期，沾著收穫的季節，當局一方面為了維持高強度勞動定額的順利貫徹，一方面處理那些無法進倉的嫩玉米，同甘洛當年情況一樣，按三斤折算一斤大米辦法，利用晚間大家收割完畢，圍在壩子裡把這些嫩玉米子從它的鬚上抹下來，連夜的在廚房裡磨成漿。第二天蒸出來的玉米粑，才有一年中僅有幾天的滿罐，拿給大家「歡慶豐收」。

秋收後，壩子裡堆積著滿山遍野收回來的砍皮瓜，砍皮瓜是鹽源的土特產，它不擇土壤，不求施肥，只要將它的瓜子丟在土裡，到雨季到來，便會生根發芽，夏天開花結果，這種瓜長老後，皮是硬殼，故名砍皮瓜，肉質甜中帶酸，沒有南瓜那麼好吃，但它的瓜子卻是名貴的白瓜子。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華，上海公報確定中美建交以後，其中簽訂的商貿協定中，據說中方拿來同美國簽約的產品，就有這種白瓜子。聽說當時這種用於外貿的瓜子價格高達幾十美金一公斤。為了創收「外匯」，鹽源農場的書記們也拿這種特產，充作外匯物資去迎合外國人。

春耕時，農場的紅土地裡，滿山遍野丟下這種瓜子，到了秋收後，大量的砍皮瓜，隨著收穫玉米，一齊收到了各隊的壩子裡。收割玉米桿一完，大田組便安排幾個病號剖瓜取子，剩下的瓜殼本是餵豬的飼料，湯幹事叫拿到廚房去充作菜蔬，成了填補流放者餓壑的理想「副食」。

秋收後到冬天這種無油的砍皮瓜，准許流放者多打一瓢。我們過的生活真是連豬都不如，吃飯時，面對上頓下頓的無油砍皮瓜，誰都會嘆息：「時逢艱辛，砍皮瓜也用作充飢的上好菜餚，未知後人知道，天荒地老背負蒼天，一年流汗，可換回個啥？」

鹽源農場開墾出來的紅土地，本來都種著馬鈴薯，自從採用在玉米地裡套種砍皮瓜後，玉米地裡沒有挖淨掩埋起來的馬鈴薯，到來年春天便會從地下抽出芽來。所以夏日到來，玉米地長滿了「野生」的馬鈴薯苗，徐世奎曾三令五聲下令糧食地裡將馬鈴薯苗剷除，可流放者卻偏偏要護著它們。

秋天收割玉米桿時，馬鈴薯早已枯藤。一直要等到拖拉機秋耕時，流放者跟著拖拉機，將深翻出來露出土面的馬鈴薯撿起來，收藏在山洞和草樹下，藉著風季來臨的乾燥天氣，完好地保存下來，是來年春荒的貯備之一。

不過收藏這些戰利品時，絕對是秘密的，被隊部發現或被其他的流放者看見，便會白白的被人拿去。狡兔三窟，在廣大的農六隊地面上，埋藏這些儲備糧的地方遍佈山野，收藏得越多，越能抵抗冬春的飢餓。

春天本來是一個萬物復生的美麗季節，但恰恰是流放者最難熬過的時間。經過一個冬天，夏天藏在地下的馬鈴薯已基本上吃完。於是就輪到動用自己的衣物和兩元零用錢，向附近農家交換。大膽的人還用農具去同農民交易，不過，一經發現是要挨摑挨打的，其罪名當然是破壞生產。

渡過這段「春荒」比甘洛農場好不了多少，為了勝任高強度勞動，流放者的精力，幾乎都集中到尋覓食物中去了。

甘洛那不堪生存的歷史，雖然已過去整整十年，但飢餓卻像魔影般的跟著我們，因偷摘沒有成熟的蘋果，或在玉米地裡偷一個剛剛掛鬚的玉米，被摑被打的事，依然是囚奴們的家常便飯。

### 第五節：暴虐的「罰吃」

中午收工回來，跟在衣衫破爛，疲憊不堪的囚奴列隊的後面，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被反摑起來的「越軌者」跟在後面，他的頰上吊著一個糊滿泥巴的蘿蔔或玉米，等隊伍進了大門在壩子裡站好，那被摑的人照例被叫到反省圈裡。

有一次輪到平時沈默寡言的張華富，為了一個剛從土裡拔起來的蘿蔔，被當兵的逮住，扎扎實實挨了一個五花大綁，那「偷」的蘿蔔就甩在他的身旁。

大家開過飯，他也足足被摑了一個小時，從崗哨上下來的哨兵才將他鬆綁，並命令他從地上撿起剛才還掛在他身上的蘿蔔，喝道：「把它嚼來吃了」。張華富傻眼站在那裡，沒想到挨了一繩子，還要把這個泥蘿蔔連嬰吃下去。

我在獄中看到老管們的私刑毆打、網綁、罰站是經常的，但第一次見到連泥帶蘿蔔嬰罰吃的懲罰。張華富遲疑了起來，那士兵便吼起來：「你不是要吃蘿蔔嗎？現在我就看你把它吃下去！」他擰笑著。

在士兵的淫威下，張華富像一頭野豬把那蘿蔔連嬰帶泥嚼吞了下去。

囚奴有一種乞丐特有的消化能力，再髒再臭，總之從醫學觀點，吃下去會生病的東西都會消化掉。士兵瞪著眼睛看他吃完，然後給了他兩記耳光，便大搖大擺離去，好像對這種「新刑罰」兌現，對他產生了一種心理上的滿足。

我因此從劊子手身上總結出他們有「虐待癖」，用來解釋這種反人性現象的內在原因，否則很難說清這些對奴隸的暴虐！

中耕季節，被太陽烘得水汽很悶的玉米林裡，藏在高出人頭的玉米桿茂盛的枝葉下，要完成任務的奴隸們，忍受玉米葉上抖落下來的粉塵沾在皮膚上的奇癢，忍受像蒸籠般悶熱的水氣，大汗淋漓的緊張勞作。剛剛才吐出粉紅玉米鬚的玉米，用它魔鬼般的芳香，誘惑著在它旁邊為它培土的流放者。

大約十點鐘光景，早上的半罐玉米粢早已滑進大腸，空虛的腹中就會發出一種令人難受的飢餓信號。靠我不到五公尺的餘余波，向四方窺視了一下，看到帶槍的士兵們躲在附近的山洞裡打撲克，便向他身後的人打了一手勢，兩人竄進了更密的玉米林中，不出一分鐘，便取來五六個一尺多長的玉米。

二人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撕開裹在玉米上的綠衣，以麻利的動作迅速地將撕下的玉米殼分散埋在土裡，蹲在潮濕的地上取過那乳白色的玉米，立即開始大口嚼起來。

兩個人狼吞虎嚥的用不超過三分鐘的時間，速戰速決以後，便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坐著休息。那余波兒本是生產隊的「慣偷」，其手腳之快是全隊少有的，他自己就介紹，說他一夜之間把生產隊放養幾十隻鴨子全部偷完，第二天在離鴨棚五里路的鄉場上全部賣掉。

這偷玉米的事，簡直是小菜一碟。所以縱然守玉米林的人已多次發現林中的玉米被偷，但從來沒有捉住過。

有一次終於被跟蹤在後面的何慶雲，發現了蛛絲馬跡。他在壟兜的玉米土中意外發現了沒有遮蓋好的玉米殼，跟著那行玉米查去那正是余波負責的那一行，扒開一看，一大堆剛剛從玉米棒子上撕下來的殼立即現了出來。

下班時，兩個年輕人被叫出列，三個士兵把兩人，紮紮實實的捆了起來，並將那堆從地裡撿的玉米殼捆好，吊在他們的胸前，令所有在田間拔好玉米的人統統站到田坎上。

聽到遠處場部的廣播喇叭裡，傳來了下班時才播放的「社會主義好」的輕鬆樂曲，囚奴肚子早已嘸咕吵開了。當兵的押著余波兩人走在後方，向山下的六隊蠕動，聽到當兵的對兩個被捆的人發出苛責聲：「今天老子要你們兩個把這玉米殼全部吞下去。」

我心中不覺一怔，這當兵的不是說著玩的。蘿蔔嬰加泥巴尚可以嚼來咽下，這玉米殼上全身是細針一樣的粉末，加上那硬質的殼衣，就是甩給牲畜用來餵馬也難於下嚥。這不等於要活活地撐死兩個小夥子嗎？

我真為他們求生而承受毒刑感到痛惜。我更替那些「砸爛舊社會的鎖鏈」站在無辜者頭上作威作福，把囚奴當作豬狗不如的「黨棍」，感到羞恥。面對著這一群惡棍！我又為自己書生氣的軟弱感到氣憤。此時，我跟著大家，一齊向監獄走去，看看老管們今天又要幹出什麼虐待人的新花樣？

走進鐵門，兩個被捆得大汗淋漓的年輕人，按老規矩站到崗哨下的反省圈裡。不一會崗樓上走下兩個士兵，鬆綁後，一大堆綠色的玉米殼從兩人身上散落下來。一個士兵向兩人下令道：「你們反正是要吃的，我今天就看你們兩把這地上的玉米殼全部給我嚼來吃掉，你們知道六隊的管理爺這一關是不好過的。」

說著他死死的盯著那撒在一地的玉米殼，一面用槍上的刺刀去刺余波的手，我還以為剛才在工地上兩個老管只是在捆人的時候，順口說說而已，看來他們是當真要看人怎麼吃下玉米殼了，心中又是一緊。

余波入獄的時間太短，缺少對監獄中這種非人虐待的應對經驗，仗著平時手腳麻利，看到別人受到種種虐待，老以為不會落到自己身上，所以頗不檢點，今天是輪到自已了。

兩人膽怯地望著站在旁邊，端著刺刀虎視他們的士兵，直到兩個當兵的眼裡直冒凶光，用刺刀在自己身上劃出了一道道血印，才從地上撿起那玉米殼，無可奈何地塞進了自己的嘴裡。然而嚼了好一陣實在無法吞食下去，用一種哀求的眼光看著那兩個士兵。

不料守著他的士兵槍尖紮扎進了他的肉裡，使他猛然一驚，拚拼命的將包在嘴裡的玉米殼狠狠吞下。頓時他翻著白眼，剛剛吞下的玉米殼立刻翻腸兜肚地全部吐了出來，而那執著刺刀的士兵和崗樓上的圍觀者，報以哈哈大笑！

徐世奎背著手走了過來，看到滿臉脹得通紅的余波嘔吐不止的慘狀，只皺皺眉頭，頗不以為然的罵道：「那一個教你們偷吃生冷，隊部對你們天天都在教育，你們就是當成耳邊風，看來光憑口說沒有用，非得讓你們賞賞辣子湯的味道，這叫自作自受，活該！」邊說邊從他們的身邊走開了。

六隊的看守們，在對付關押在這裡的囚奴們，發揮他們的創造性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有時候折磨人的辦法，是正常人不敢想的。光這罰吃，曾逼著小監裡關押的瘋子吃下糞便，硬逼著張華富連泥帶嬰的咽下蘿蔔，而今又逼人吞下玉米殼，不知道他們這些暴行，何時才被清算？

他們盡可造下種種天理人心不容的罪孽，在當時這樣的事在六隊圈子裡，卻成了劊子手取樂的刺激。而對於我們這些同命運的人因為看多了，而變得麻木不仁……

## 第八章：嬗變



六八年以後召開的公判大會，再沒像六七年四月份的那次公判會那樣，還保存法律的一點形式，允許被判刑人陳述自己的意見和要求。

從六六年到七七年，「文革」猖獗的十一年中農場每年都要召開好幾次規模巨大的「殺人」公判會。每次殺人的人數，多則十幾人，少也有三五個。

整個公判會，將被判處的人五花大綁後，先將他們打得頭破血流，然後由武裝士兵將他們反綁雙手，押上場來已不成人形，讓這些被整得生不如死的人跪在台前，以恐嚇眾多的囚徒。整個會場，充滿恐怖至極的氣氛，直到公判結束。

然而，從一九七七年開始，毛澤東建立的個人獨裁，受到來自人民的普遍抵制，處在四面楚歌中，中共內部的「走資派」不但沒有因「文革」而退出歷史舞台，反而取代了毛的權力，逐漸走到了前臺。

殺人正是毛共獨裁走投無路的表現……

## 第一節：殺一小批運動

一九六九年的「嚴打鬥爭」，是瘋狂的文革屠殺達到高潮。鹽源農牧場的許多政治犯，在這場殘酷的殺人運動中先後被殺。

### （一）槍殺陳力

一九六二年三月，由重慶和成都監獄匯集起來的五百名「勞改」人員，在調往甘洛的流放途中，大鬧了雅安三元宮監獄，引發著名的四川「監獄搶饅頭事件」。在那一晚上，在監獄探照燈的照射下，我看到了一個高個子的人在振臂高呼：「我們這一點吊命糧，都要被老管剋扣，真是喝人血不眨眼，大家去把本該我們的囚糧搶回來！」此人就是陳力，

事件過後，我們這支隊伍被調到甘洛，他被押去了斯足中隊，我被押到西西卡中隊。殘酷的煉獄使成渝兩地集中的五百人，在短短十個月中，就有一半埋骨在這裡的荒山野嶺中。

一九六四年十月，在經歷了生死磨練後，我倆逃出了甘洛的鬼門關，作為倖存者，我們最後在二道溝的「反省室」裡相逢了。

在小監裡，我倆打破了小監的規矩，彼此傳遞資訊。並隔著牆，在反省室裡交流了彼此的身世。

一九五一年，陳力剛從初中畢業，年僅十六歲就應徵入伍，「保家衛國」的大紅花，使他在無知中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開赴朝鮮戰場。經過兩個月訓練便跨過鴨綠江，充當了中共的炮灰。

日以繼夜的穿插戰和急行軍，在滾滾濃煙戰場上他們徒步穿插到三八線附近，參加了血戰上甘嶺的戰鬥。冒著地毯式的轟炸，在地道裡進行「保衛祖國」的宣誓，這一切是戰爭和炸彈不能講清楚的。

慘烈的戰鬥七天七夜下來，他所在的排只剩下了最後兩個人。倖存的陳力當上了代理排長，成了當時人們稱之為「最可愛的人」。身負八處重傷的陳力抱著機槍，向衝上來的美國士兵掃射，直到流血過多，昏迷過去。

經搶救清醒過來以後，陳力睡在離前沿陣地僅兩百公尺的擔架上。炮彈夷平了他所守的戰壕，如果不是後續部隊趕上替換下他，他已經永遠葬身在異國他鄉了。接替他守衛陣地的後續部隊，全在炸彈轟炸下成了齏粉。

倖倖存活的他因此獲得了三等功臣的「殊榮」，並在火線的醫院裡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然而冷靜下來後，身處異國的他，卻在尋思為什麼而戰？潛意識裡一種模糊的後悔爬進了他的腦海。

不久韓戰結束，他復員回到了重慶。

復員回到重慶後，陳力被安排在位於化龍橋的重慶彈簧鋼板廠，作廠長辦公室的秘書。在工廠生活兩年中，一九五五年，他在「內部參考」上讀到了鐵托的「普拉講話」，讀到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發表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和農業勞動組合的論述，接觸到與蘇聯不同的工廠自治管理等文章。他對工廠黨委會包攬一切、大權獨霸的作風產生了很深的反感。

陳力回憶當時兩名工人因家庭負擔太重，不得不抽出時間為鄰人修補鍋盆，換些零用錢以補不足，被黨委書記抓住，上綱上線，殘酷鬥爭，除批鬥外，還將其開除。說他們利用公家材料為自己謀私利，是資本主義的典型。

而這個書記卻可以平時不勞動，靠公款三天兩頭出外「旅遊」。

工廠因管理不善，浪費隨處可見。成噸的鋼條在天井裡鏽爛。設備因沒人及時保養，很快變成了廢鐵，工人的消極情緒在普遍滋長。他同黨委書記就企業管理產生了爭執。爭執多了，兩人之間的成見日漸加深，這種承見，很快招來書記對他的挾私報復。

南聯盟所發表的文章，對他的早期啟蒙，使他對這個制度產生懷疑。陳力在一九五七年的在大鳴大放中，發表他對工廠管理的見解，在鳴放會上斥責他的頂頭上司，說他是一個飽食終日無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廠管理。

同時他拋出了一套工人成立自治委員會，由工人選舉產生的委員會獨立行使管理的辦法。

那一次發言，他贏得工人們的陣陣喝彩，也贏得了一頂右派帽子，從此削掉了他的「官職」，並被開除黨籍。

一腔為真理而鬥爭的理想化為灰燼後，他從辦公室搬了出來，搬進了後勤組，由秘書貶為受管制的清潔工人。

這場初露鋒芒的較量，使陳力認識了中共是一個是非不明、不講道理的官僚集團。不值得任何留戀，更不值得為它獻身。

緊接著，陳力又親身領教了大煉鋼鐵的荒唐鬧劇，在三面紅旗萬歲的狂噪中，切身體驗了毛澤東帶給全國人民的災難。生活的經歷，使他從對中共的迷惑中清醒了過來。

當共產主義的海市蜃樓消失以後，他看到了中共的驕橫跋扈，看到了中國百姓被奴役和飢寒煎熬的現狀，看到了人們連挨餓都不敢直言。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使他對中共的敬仰、追隨，轉變為懷疑和敵視，經過縝密的思考，成為反對獨裁追求民主的戰士。

一九五九年，因為繼續的反對工廠黨委，被保衛科扭送沙坪壩區看守所。接著，在看守所裡，又同管教幹部們唇槍舌劍，使他的「反革命」日益「升級」。

有一天，有人發現監獄廁所裡的牆壁上，有人用鐵釘歪歪扭扭地刻寫著「打倒共產黨」五個字。監獄管教如臨大敵，立即封閉了廁所，把所有在押的犯人趕回了各自監舍，並立即進行字跡鑑定。

根據管教幹部所收到的「檢舉」和獄方的「筆跡鑑定」，獄方武斷認定這一「反動標語」係陳力手跡。

在提審他時，陳力憤怒地抗議了這種憑空捏造，斷然加以否定。他說：「這種對『糞便』進行宣傳的行為，實在是一種既無用又可笑的的勾當，我是絕決不會幹的。」

他說他會公開陳述他的政治觀點，而不會作這種蹲在廁所裡寫幾條標語給屎看的蠢事。

但是，看守所的獄卒們不顧他的申辯，把這條「反動標語」硬栽在他的頭上。並以此作為鐵證，宣判了他十二年徒刑，從右派份子升級為反革命份子。

在我進入孫家花園監獄後的半年，陳力也隨之來到了這個監獄中，並於一九六二年發配甘洛農場，成為五百名「流放大軍」的一員。

在途經雅安監獄的搶饅頭案件中，陳力又被當局認定是為首的鼓動者，成為甘洛農場的重點監管對象。

我在西西卡中隊同死神較勁，同「張棒棒」肉搏時，陳力也在斯足中隊公開的拒絕勞役。我倆因為公開喊出：「我們要生存」的口號，遂被當局認為是對犯人進行破壞性鼓動宣傳者，是最危險的反改造份子。

一九六四年，當我們經黃聯關來到鹽源農場，以後不久，我被調往古柏，陳力卻留在二道溝地區。

同年八月，我在古柏被關進了反省室，陳力在二道溝地區被關進了場部的小監。直到九月，我們合併一處不期而遇。

從此以後，我們倆便成為農場中人人注目的「反改造分子」。並戴上了一頂時髦帽子：「國際修正主義的急先鋒」。後來，我們又被關進了「羊圈」，直到一九六五年十月，當局才將我倆放回到大監中。

一九六六年五月，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狂飆初起時，在農六隊討論文革的學習會上，我又當著在場的犯人和幹部，公開為文革下了「宮廷政變」的結論。這在當時視若禁區，而不敢「妄猜」文革內幕的情況下，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我們相信，當時的這種「揭密」，對農場的幹部們起了很大的摧醒作用。尤其當時就預言了毛澤東路線將因中共黨內的分裂而走到盡頭。

感謝老鼠在足有四十公分厚的泥牆上穿洞。我倆便依靠這個洞，傳遞著各自寫下的文章和資訊，而今想來，他的文章記載了監獄的暴行，揭露了中共的虛偽，抨擊毛澤東復辟專制主義等等，成為最珍貴的監獄「遺筆」。可惜，我們沒有辦法將它保存下來。只能依憑著我的記憶，回憶其主要內容了。

記得當年在報紙上讀到「燕山夜話」的文章時，諷刺高產衛星為「一個雞蛋的家當」；譏諷頑梗不化的「皇帝」在事實面前，還要遮掩真相的「皇帝的新衣」；勸誡主觀武斷的「領袖」認錯回頭的「放下即實地」，這些文章中不無溫和的規勸。

而陳力的文章沒有任何的溫情和幻想，而是直抒胸懷，痛斥毛澤東，斥其禍國殃民，痛快淋漓。

他在獄中寫下的五十萬字，每一個字都是射向獨裁統治的一顆子彈，每篇文章都是一柄直刺獨夫民賊的利劍。

記得有一篇描寫人民公社化時期，一個農家五口人餓死了，最後只剩下一個大娘。老大娘來到埋葬她年僅十六歲的兒子的墓前哭唱的吊亡詩，情節哀惋淒涼，如泣如訴，我當時邊讀邊流淚。

這些年來，當局強逼老百姓從每月十八斤吊命糧中扣掉兩斤，還美其名曰：自願獻給社會主義建設；毛賊忍心看著百姓穿補疤衣、吃觀音土，卻「無私」施捨為他唱讚歌的國際乞丐霍查希爾之流；他評述一九六四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是「從飢寒交迫的百姓身上抽出血輸給瘋狂戰慄下的狼群」。

點明原子彈才是中國的獨裁狂用來唬人的「紙老虎」，除了使周邊弱小民族不敢對中國的胡作非為表示異議外，無異於「玩火自焚」。

在陳力的筆下，毛澤東是比周厲王還要殘暴、比楊廣還昏饋的暴君。是一個連百姓家中一隻碗都要搶到手，再拿到國際政治賭場上「豪賭」的賭徒。是一個撞進知識殿堂裡強擄豪奪祖國文化遺產的巨盜，是一個連加法都不會文盲村夫。

嬉怒笑罵，盡情鞭撻！思想靈活，妙筆生輝。陳力藉一個因飢餓求生被置死地的中國人的憤怒控訴，為死於運動的中國數百萬冤魂吶喊。淋漓盡致，痛快之極。

他還寫了大量的詩文，不僅表達了他壯志未酬、報國無門的悲哀，表達他追求真理反被殘害的吶喊，抒發他對毛澤東極權統治下中國未來的憂慮。這就是陳力的文風。

可惜，所有這些極為珍貴的文稿，恐怕全都被當局燒毀了。當時，誰也無法保留這些東西。

一九六六年七月，當何慶雲將我從農六隊糧食庫房的小監，轉到大監一個星期後，一輛藍色吉普車開到了農六隊的監獄大門邊。陳力被兩名員警從臨時小監裡押了出來。我看見他拖著沉重的腳鐐，一隻手反背著一床破棉被，另一隻手拎著一個藍布包，從容不迫走過農六隊前的大壩。所有在場的人都目送著他，陳力一邊走一邊不時停下來環顧四周，頻頻點頭致意。與我們一一告別。

當我倆的眼光最後一次碰撞以後，便成了留在我腦海中再也沒有褪掉的記憶。他那坦然平靜而爽朗的笑容裡，不但給我傳遞著難以割捨的情誼，還暗含著永別的囑託。

陳力昂首而去了，以一種義無反顧的決絕，一步一頓的堅定步履，走向刑場。為他的信念和正義而獻身。陳力一步一頓地走出了農六隊的大鐵門。大鐵門邊，留下了陳力永遠無法消退的身影。

這麼多年來，為了保護我們追求真理的神聖心扉，我們習慣了在棍棒和繩索下同監獄當局對話，習慣了長期伴著鏢鏢渡過寒冷的冬夜，習慣了在陰暗的小監中寫下對獨裁者口誅筆伐的檄文。我們不會奢望當局會賜給我們自由，也從不幻想個人的前途。在如此深重的災難之下，面對當局的種種誘惑，我們只是報以輕鄙一笑。

我們曾為相隔千里、十年不聞音信的親人倚窗舒懷，也曾為這種發自肺腑的牽掛而吟誦斷腸的哀歌。但此時此刻，陡增了一種與難友生死永別的悲傷。

我曾目睹許多與自己生死相許、患難與共的夥伴從容就義，並多次從飲彈刑場的同伴身旁擦身而過，每到此時，都難以控制內心的哀傷！

公判大會會場之慘烈，常使我惡夢連連。血腥的恐怖籠罩著全國。陳力在鹽源縣城被槍殺，我們不知道具體情形，難友多方打聽見證人，才大致獲知如下情況：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在戒備異常森嚴的鹽源縣看守所裡第五號監舍，一大清早，陳力像往常一樣漱洗完畢，然後整整衣著，再將被腳鏢擦傷的地方用綁腳布重新包紮好，便正襟危坐在鋪滿亂草的「床上」閉目養神，靜靜等候著獄卒來給他打開鐵門。

十天以前，在縣法院一間秘密的審訊室裡，審訊官向他宣佈了西昌中級法院對他所作的死刑判決。判決書說他「瘋狂地、明目張膽的反對毛主席，攻擊文化大革命。」

審訊官宣讀完畢，便把判決書遞交給他道：「現在允許你提出最後要求和遺言。同時，請你告訴法庭，你的死刑宣判應當通知你的什麼家人？」並宣佈給他十天的上訴期限。十天上訴期不提出上訴，便在第十一天驗明正身，執行槍決。

面對著這個膽怯的「法官」，陳力從容地回答道：「我感到遺憾的是，當年美國人的大炮沒有置於我死地，而今我卻死在我曾誓死保衛的共產黨人手裡。」

對於這個宣判，陳力早已有了思想準備。在他看來，屬於他的時間只剩下十天了，他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尤其感到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獨夫民賊毛澤東死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

陳力的母親已經亡故，父親是巴蜀中學的國文教員。家教自幼薰陶和老父的悉心指點，造就了他深厚的文學功底和流暢犀利的文筆。文革狂瀾如火如荼的時期，他的父親也被打成了學校的「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朝不保夕。

陳力堅信，他的獄中著述，會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最後十天中，陳力唯一的心願便是想盡一切辦法將他的著作保存完好，以留給後來的人們。

後來這些遺著不知是焚毀了，還是封存在檔案中了。同我在獄中的著述一樣，至今也不知保存在那裡。

八點鐘光景，通往小監的鐵門被打開，隨著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監舍門上傳來了開鎖聲。監門打開以後，兩名押解士兵急速地跨了進來。

陳力從容地從鋪位上站起來，兩名如狼似虎的士兵已經竄到了他的身邊。一左一右，猛然地將他掀翻在地。並且死命地將他的頭按到地上，讓他感到一陣強烈的窒息。

一陣強烈的劇痛後，他的嘴巴被撬開，舌頭被割去，滿口鮮血。原打算在生命最後一刻振臂高呼的想法成了泡影。

陳力拚拚命的用腳上的腳鏢，向按捺他的士兵猛烈的撞去。然而這一切都成徒勞。他被緊緊地壓著沒有動彈餘地。

十分鐘以後，陳力被反捆著雙臂，由那兩名士兵挾出了監舍。那間收拾得很整潔的「監房」，現已亂成一團。

兩名士兵挾持著五花大綁的他，走出住了三年多的鹽源看守所，將他推上門外停的一輛軍用卡車上。在六名士兵簇擁下，他站在車廂的中間。

卡車啟動，向鹽源縣城的主幹馬路馳去。車頭上的大喇叭裡傳出歇斯底里的嘶叫，這時，陳力滿口是血，發不出任何聲音。他的耳朵裡，突然響起了犧牲在北京西城菜市口譚嗣同，題於獄壁的絕命詩：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天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他那視死如歸的壯烈場面，已用他的血將要講的話留給活著的人了……

街道兩旁擁擠看熱鬧的人群，上了年紀的市民並不認識囚車上的人，也不知道他犯了什麼？

囚車很快地駛出了鹽源的街道，隨即直奔公判大會會場。

上午十一點鐘，在一處高高的山崗上，在一處可以看到山下的小金河蜿蜒流淌的開闊地上，陳力被槍殺在這裡。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日下午，我們雇車找到陳力被害的刑場，那裡已是一片茂密葳蕤的白樺林地。林下仆倒一塊斷成兩截的水泥石碑，石碑上大書「刑場」兩個大字。這次重返鹽源，我才從文天華、李祿雲、呂洞良等倖存難友的口裡知道，陳力被殺害前，已被割掉了舌頭。行刑前，行刑的獸兵強摠陳力下跪，但陳力仍然高昂著不屈的頭顱……獸兵遂用刺刀從陳力背後刺穿了陳力的膝彎，再將其殺害。

陳力被殺害後，我常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我身陷囹圄，無法與他見面，「獻身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陳力被殺害後多年時間裡，我都沒找到他五十萬言遺著。

但我發誓，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會將我們這段同獄吏鬥爭的歷史，告訴中國的下一代，請他們知道毛賊東獨裁的殘忍本性，再不要相信他們在「革命」名義下的花言巧語，牢記只有民主才是中國今天所要實現的目標。

告訴全世界，中華民族反抗暴虐統治的精神永存！以慰藉他在天英靈。

## （二）殺\*\*蔣正\*\*君和劉志和

同全國各地的監獄和勞改隊一樣，鹽源農場接連召開了好幾次「殺一小批」的宣判大會。就刑的人有越獄者，有外逃的拒捕者，有企圖越出國境線的人，有斥罵專制魔頭的政治犯，也有純屬為了湊數的莫明其妙受害者。

槍殺陳力前一天下午，何慶雲和榮老頭站在佇列前宣佈：「全體人員今天下午不出工，打掃清潔。明天鹽源縣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要在這裡召開公判大會。」何慶雲還特別強調：「從宣判大會開始，直到宣判大會結束，禁止六隊的任何人外出。」氣氛更加肅殺恐怖。

第二天一早，場部開來了一卡車士兵。不一會，崗哨上面以及周圍的圍牆上到處都是戴綠色軍帽的人頭。南邊的和西邊的崗樓上架起了機關槍，到處都是伸向六隊院壩裡的黑洞洞的槍口，一進入會場，就能感受到恐怖的殺人氣息。

九點鐘以後，各中隊相繼進入農六隊的兩扇鐵門裡的指定位置。

「殺一小批」運動以來，這樣大規模殺人宣判會，已是第三次了。我和劉順森、蔡先祿等被當局重點「敲打」的人，安排在緊靠臨時搭建的主席臺前。目的是讓我們看清死刑犯臨刑前慘不忍睹的每一個細節，以擴大恐怖效果。

當押解待處決犯人的囚車開進了農六隊的兩扇大鐵門時，全場的眼光都朝囚車看去。主席臺上的麥克風裡不斷傳出「安靜、安靜」的喝令聲。大家屏住呼吸，不敢喧嘩。

瘋狂的「殺一小批」運動，撕下了改造政治犯的遮羞布，僅這一次宣判會，就奪走了八名反抗者的生命。

蔣正君出身於一個工商業兼地主的家庭裡，從娘胎裡出來，就屬於毛澤東劃定的黑五類，是被這個政權永遠踩在腳下的人。

他天性軟弱，在沒有被當局逼上絕路前，他努力地逃避著政治。他僥倖逃過了反右派的打擊，然而逃得過初一，逃不過十五。

他原是美術學院的學生，他的雕塑和繪畫天賦，在毛澤東時代不但沒有為他造福，而是最終把他送進了地獄。

大躍進後，書已無法讀下去，一九六〇年的大災荒中，他背著畫板賣藝求生，流浪各地。但是在那個餓殍遍地年代，人們只關心能果腹的食物，誰又有興趣請他繪畫？窮困潦倒中，他扛過苦力，拾過破爛。

拾荒中，有一次撿到了幾根銅絲，拿到廢品收購站時，被懷疑偷盜電線，將他送進收容所收容審查。

收容所裡的管教員組織了鬥爭會，逼他承認撿到的電線是有意的反革命破壞，飢寒交迫的他求生不能，轉而求死，橫下一條心，破口大罵收容所裡的管教人員，於是他被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得到一張蹲監八年的判決書。

判刑勞改不久，蔣正君被送到鹽源農場。開始，他被編在農二隊，當局發現他會畫畫，讓他繪毛澤東人頭像。那時文革已進入軍管時期，蔣正君自告奮勇雕塑了一個毛澤東半身石膏像，石膏像塑成，獲得了軍管會的賞識。於是將繪製「毛主席在安源」的巨幅油畫任務交給了他。

蔣正君花了一個多月時間，繪製成一幅高三公尺寬兩公尺巨幅油畫，擺在場部辦公大樓的前面。

從此各中隊都相繼請他作畫，在軍管會特許下，蔣正君背著畫板出入各隊部，成了一名專業「畫師」。他每到一個中隊，享受著幹部食堂免費就餐的待遇，在食不果腹的年代裡，這已是相當豐厚的報酬了。

蔣正君在畫畫過程中，在各中隊結交了不少朋友，這些年輕人都是在文革派鬥中的失敗者。他們充滿了逃向國外的幻想，認為只有到了國外，才能過上自由富足的生活。

不久，各中隊毛澤東塑像告一段落，出乎他的意外，他沒有被招回場部，而是重新回到了農二隊。蔣正君疑神疑鬼，懷疑他在各中隊商量外逃的事情被人檢舉。

就在這個時候，蔣正君碰到了當年在孫家花園裡的兩個「老前輩」，請他們分析他被突然召回二隊的原因。兩個「老前輩」是看守林業隊蘋果園的，一個在國軍中擔任過中校軍醫的黃孝德，一個是任少校副官的陸存虞。從此他和兩位老人結為朋友，互通消息。

他在繪畫期間積攢了些錢和糧票，因為聽說距雲南邊界上的李彌殘部就在附近，便向兩人詢問那裡的情況。有一次兩位老人向他畫了一張李彌殘部所在地域的示意圖。沒想到這張隨手繪製的草圖，在「殺一小批」運動中，竟奪去了五條人命。

沒出幾天，傳來了蔣正君逃亡的消息。並說他組織了一支龐大的逃亡隊伍。這次盲目出逃，很快就被抓獲，軍管會硬說兩名國軍軍官是這次投敵叛國的黑後臺。

於是，一個以蔣正君和黃孝德為首的叛國集團的案卷，便報到了西昌中級人民法院的辦公桌上，這一「叛國投敵集團案」的涉案人員達四十餘人，在本次宣判大會上拉出去槍殺的達五人之多。

當時，槍殺一批人是不用經過最高法院核准的。直到十一年後，他們自己復查的結果，這個所謂「叛國投敵集團案」，全是屈打成招羅織出來的大冤案，不過是一幫年輕人聚在一起瞎吹。但是人頭已經落地，事後的「平反」又有多大意義？

另一個被殺的人劉志和，更令人驚嘆，當局把一個精神失常的人也推上了斷頭臺。劉志和捕前原係重慶的一個街道派出所所長。因在國民政府時期當過員警，還掩護過中共重慶地區的幾個地下黨員，他應該屬於中共潛伏在國民黨員警裡的地下人員。

中共奪得政權以後，給了他一個派出所所長的官，文革初期的四清運動中，他的歷史問題被紅衛兵們揪出，認定他是一個「隱藏極深」的國民黨特務，將他判了十年徒刑。

劉志和入獄後，老婆改嫁跟了他人，三個孩子無人照料流落街頭，他經受不了這些精神打擊，被逼瘋了。從此口中常念念有詞，一上工地，便坐在工地上唱歌，見人就傻笑，任憑老管怎麼打他和捆他，都沒有任何改變，且病情越來越重。

寒冷的冬天裡，劉志和將自己的被子撕成一條一條的，送給別人補衣服。同病相憐的同難制止他，他除了傻笑外，還將棉絮撕碎拋向天空，說是九天玄女來接他了。

晚上，劉志和裹著爛棉被，凍得瑟瑟發抖。然而毫無人性的老管罰他站在霜雪鋪地的壩子裡，看他狂喊狂跳以此取樂。

開飯時，劉志和拿過罐罐飯，往裡面抓泥沙，再用手抓著連泥帶飯的往嘴裡塞。何慶雲眯縫著近視眼武斷地說，劉志和在裝瘋，用裝瘋來發洩他對共產黨的仇視。並狠狠的對他說：「你真瘋的話，為什麼還知道排隊拿飯？」未經醫生鑑定，便把他關進了小監。

劉志和被關進小監後，從早到晚都可以聽到他從小監傳出來呼喊報告聲。到了深夜，聽見他高聲的吼叫和唱歌。

巡邏的獸兵聽得厭煩了，從辦公裡取來小監門上的鑰匙，打開他的監房，給了他一頓暴打。夜半傳出的慘叫聲十分淒厲。我常常擔心，總有一天，劉志和會被活活的打死在小監裡。

有一次，老管打開劉志和的監門叫他出來倒屎尿，他突然將手伸進自己屙的屎尿中，抓出來往自己臉上一把一把的糊，一邊糊一邊還向老管們浪笑說：「抓屎糊臉，抓屎糊臉！」獸兵用槍托拼命的打他，並逼他抓屎吃，只見他一面吃自己的屎，一面浪聲大笑。

監獄主管明知劉志和精神失常，不但不對他治療，反而更加緊了對他的虐待。有一次，一個獸兵用鐵絲套在他的頸上，牽著鐵絲驅趕著他，好像在耍猴戲。逗得圍觀的獸兵哈哈大笑。作孽啊！人到了這種地步，還受到這般折磨。

最後殘暴的監獄當局竟把劉志和湊成了「殺一小批」的人數，稀哩糊塗地把他送上了刑場。以免他再在監獄中叫喊不休，落得個耳根清淨。

槍殺劉志和的那天上午，兩個戴著大口罩的士兵，像拎一隻小雞，把他拎到行刑判決的位置上。只見他披著一身巾巾掛掛的破布，滿身糞跡。所經路上，灑下一路惡臭。

槍決劉志和的死刑材料上認定：他以「長期以裝瘋作掩護，大鬧監獄，肆意詆毀共產黨的改造政策，驗明正身執行槍決。」

劉志和站在車上，臉色鐵青，拼命地想抬起頭來，彷彿要從地獄裡扒開一條縫隙透口氣似的。為使他臨刑前變得安靜些。聽說給他注射了鎮靜劑。

只可憐他三個流落街頭的孩子，不知道他們還活著不？他們若能倖存下來，得知他們的父親在獄中因思念他們成瘋，後來又被慘絕人寰地虐殺，不知道他們將作何感想？

阿彌陀佛！從今往後，六隊再也聽不見劉志和那淒厲的狂喊亂叫了，再也聽不到他三更半夜裡的哀嚎了，看守和獸兵總算六根清靜了。

在這一加刑的人中，還有一個人因說話沒忌避「毛」字而判刑的。因為他平時說話常說：「你這人得壞了毛病！」「你別毛手毛腳的！」「你這毛脾氣」……竟往「偉大領袖」身上扯，成了給他加刑「法辦」的依據。

立案者問：「中國字有那麼多，什麼字不好用？偏要用這個『毛』字？」「你知不知道『毛』字是誰的姓嗎？這一次念你沒有見識，算從輕發落。以後再不注意，就要掉了腦袋。」

五十名被判刑的人到齊，每個赴刑者在兩名軍警挾持下，五花大綁被推到台前，排成長長的兩列。他們早已被打得血肉模糊，緊緊捆在他們身上的繩子入肉三分。

手臂和肩頭已呈青紫色，不到五分鐘，「繩刑」發作，他們便前仰後翻地痛苦掙扎起來。

我坐在會場的最前面，清晰看到他們臉上的痛苦痙攣，清晰聽到他們的痛苦呻吟，不敢正視。

主持人緊一聲慢一聲地宣讀著每一個人的判決書，整整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每宣判完一個判決，高音喇叭裡立即響起歇斯底里的口號聲。

我只能默默替受難者禱告，盼望盡塊結束這場恐怖的酷刑。

陳力被害後，我想在共過患難的同難中尋找他遺留的物品和遺筆，可惜沒有收穫，直到十年後，我得平反回歸重慶，去到化龍橋彈簧鋼廠和巴蜀中學，想找到他的舊址，都失敗了，被中共封死的大陸只有中共的頌歌，大量血腥的罪惡，被封殺得無影無蹤……

## 第二節：九·一三衝擊波

正當史無前例的文革屠殺，在大陸掀起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暴力恐怖時，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央廣播電臺的喇叭裡，傳來了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珍寶島的火拼消息。在冰天雪地裡激戰，孫玉國成了新的英雄，衝突表明，中蘇兩大國的分歧由「嘴仗」，不可避免的升格到「武力格鬥」。

從此以後，社會主義陣營正式解體了。

何慶雲在組織農六隊的政治學習時，面對劉順森等人提出的問題，掩飾不了他的迷惘和無知，好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給他空虛的腦瓜裡墊了底。

陳力被槍殺前，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開幕那一天晚上，我們集合在院壩裡，收聽開幕式的實況錄音，我們對林彪作毛的接班人並不感到意外，至於將這個決定寫進修改的黨章，沒去思考為什麼，也不會想它的後果。

獨裁者間不可避免的傾軋，在權力爭奪中很快暴露出來，僅只隔了兩年，毛澤東便在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中，上演傀儡大換班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溫都爾汗的叛逃經過，只有在中共的檔案揭密時才能大白真相，但溫都爾汗事件，像地震一樣震鬆了毛澤東的皇位寶座。

毛澤東害死了他的政治盟友，也換來了危機四伏牆倒從人推的報應。長期被他愚民政策鎖在閉塞狀況下的大陸百姓，就猶如在死一般寂靜的夜空裡聽到了一聲驚雷，揭開這個無產階級專政鐵幕，那裡原來掩蓋著一些各懷鬼胎政客們，演出的爭權奪位醜劇。

中共對老百姓封鎖嚴密，九一三事發當天，國內的新聞、廣播、報刊對這一事件沒有報導！似乎北京城壓根就沒有發生過任何事，大概經過一陣磋商後，新華社向全國公佈這個消息時，按照毛澤東的詔令，全國上下同聲譴責和聲討林彪。一個「批林、批孔運動」從幕後推了出來。

此時林彪形象由副統帥，變成了孔夫子的忠實追隨者和門徒。下發的批林批孔檔案說他，言必稱「克己復禮」；言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由「毛主席的好學生和繼承人」變成了懷著鬼胎的封建時代「雅儒」！

當然，毛澤東大權在握，任意評價歷史人物，不僅是他的狂妄，更是他一貫獨裁的需要。

距九月十三日整整相隔十二天之久，九月二十五日藉國慶日例行的衛生大檢查的掩蓋，農六隊又一次進行了有專項內容的「大搜查」，不過這一次與過去任何一次搜查不同，屬於我們在獄中所遇到的最奇怪一次。

上午八點鐘，全隊進行集合，宣佈衛生大檢查開始。然後，我們被士兵和管教幹事們團團圍住，按一般的搜查方式，依次地將各自的行李搬到壩子中，只是感覺氣氛與以往那種人為緊張和恐怖有些不同。

輪到我了，兩個老管走到我的眼前，先叫我取出「毛主席語錄」，這是場部統一下發給每個人人手一冊的必讀物。

蹬在我面前的那年輕士兵，從我手中接過那「紅本本」後，翻開了扉頁，直截了當的把那篇林彪所寫的「再版前言」撕了下來，丟進一個專門準備好的匣子裡，同時在他的筆記本上劃上一筆，臉上毫無表情。



兩個搜查人草草翻了我的行李，整個對我的檢查不到五分鐘便結束，還不到十一點鐘，全隊的檢查便結束了，抬到隊部去的是一籬筐紙片。

以後對九一三事件，當局就沒有正式的宣佈過，我們當時也知道，他們之所以對此事諱莫如深，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惶恐。他們的最高統帥發生了什麼？他們是絕對說不清的。

其實九一三事件剛剛爆發，鹽源縣的農家已從國外的廣播裡獲悉了這個消息，那時在外撿糞的張華富，每天下午，都會在梅雨鎮獲得一些在國內報紙上得不到的消息。

九月二十五日大檢查中，我們一直都在觀察六隊的老管們的反映，他們顯然早已在幾天前進行了專門學習！大檢查一完，老管們失去了往常的驕橫勁。

令人奇怪的是，那個林副統帥，最高權力眼看就歸他了，怎麼突然倉皇坐著飛機撞死在溫都爾汗？「批林批孔」也好，「克己復禮」也好，在人們心理上此刻投下的全是騙人的疑惑。

林彪事件觸動他們去思考：江山如此不太平，就是當一個賣身殺手都會感到無可靠主子可倚，使他們在心理上對殘暴發生動搖。

其實中國的專制主義在任何時代都是極端自私的，人性都沒有的殺手，同情友愛心全在「鬥爭」中泯滅，奢談「鬥私批修」，在靈魂深處鬧革命，明擺又是欺人之談？

郭川小曾是高德勝的貼身警衛，身材高大，他的豪爽和直率，容易溝通我們間的鴻溝。

林彪事件剛剛才過，這天在苗圃我碰到了他，等他按往常那樣，撿了一個苗圃用的木架當作小凳坐下後，我向他發問道：「郭隊長，林彪事件發生以後，有沒有在你們學習的『內參』中透露出一些內幕，講出來，也讓我們長長見識。」

他眯縫著胖臉上的小眼睛看了一下我，微笑著回答道：「我們學習還不是跟你們一樣，基本上就是報紙上登載出來的那些東西，對這樣的大事，誰也不敢妄加評議。」

在六隊郭川小，算是農牧場中最瞭解我的幹部之一，對他少了許多介懼，於是我說道：「現在報紙上登的東西有幾分是真實可信的？還不是毛主席怎麼說就照著登，就比方這林彪，一會兒說他是全黨全軍學習毛主席，緊跟毛主席的榜樣，是毛主席最信賴的接班人！怎麼說變就變了，變成叛徒、野心家？」

他依然平靜回答我說：「你這個人總是愛鑽牛角尖，所以吃了不少虧，原因就在你不認輸。但是我還是要奉勸你，事事得講究實際。中國有句俗話，叫好漢不吃眼前虧，現在的形勢下老是同毛主席過不去，行得通嗎？別說你一個小小的犯人，就是中央的大人物哪一個鬥得過他？林彪同他鬥，最後還不是自討苦吃，摔死在溫都爾汗的大山裡？依我看哪！平時不開腔的人並不是蠢人，遇到政治上的問題，大家怎麼說，我就怎麼說，叫大智若愚，沒人會說你傻！」

這種裝糊塗，恐怕是獄吏的普遍態度。像林彪事件這樣的大事連一般的中國人都看得出來，這位下層「獄吏」豈有不懂的？既然懂了而故意裝糊塗，是因為怕惹禍上身？

「那麼，你當然知道林立果的小艦隊，能不能透露一點五·七一工程紀要？林彪說，不說假話辦不了大事，共產黨有幾句是真話？當年林彪肉麻地吹捧說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革命領袖，是萬歲萬歲萬萬歲時，這種露骨的假話為什麼毛主席就查覺不出來？」

郭川小猶豫起來，為了掩蓋自己避免作正面答覆的尷尬，他向遠處的夏守愚喊道：「給我端一根小板凳來。」

等到夏守愚慢慢從棚子裡將板凳送過來後。他在冬瓜架下坐好，開始回答：「我不是早就跟你說，我現在只考慮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一切不該我思考的問題，我是絕決不會去想的。」

「當然林彪紅極一時，是他的運氣！我們跟著也喊：『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而現在他的陰謀大暴露，我們就說他是一個陰謀家。」

他為什麼會這樣？我們這些老百姓是無法知道的，也沒任何資料解釋這一切，我們就知道他的私心大膨脹，現在不是重新在鬥私批修嗎？我覺得你也不要再鑽牛角尖。中國的政治就是這樣，私心雜念太重，林彪這樣的事不知道今後還會有多少？」

他的回答反映了一個中共黨員，對共產黨的認識。中共上層的權力鬥爭終於使他們意識到自己不過是這個戰場上廝殺的雇用兵！他們只能奉行「隨大流」。

「那麼在你看來毛澤東選定林彪作『接班人』，是不是把他當成與劉少奇搶奪權力的槍手在使？」我這樣的提問是對中共信仰的公開挑戰！

然而他回答說：「誰也摸不清他的用心，過去他把劉少奇指定為接班人，後來成了水火不容的仇人，還可用廬山會議去解釋！而現在又同林彪反目，只能用『權力』爭奪來解釋。

林彪說要搶班奪權，讓人看不懂。當然毛澤東不是神人，事事都料得那麼準，但他畢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說實話，我們何嘗沒有發生過與你同樣的問題，但我知道這是不能亂講的，我勸你不要老在這些問題上鑽牛角尖，車到山前必有路，中國有的是能人，用不著你瞎操心。」

看來，對這次有關林彪事件的探討，郭川小已夠坦率了。在經歷林彪事件後，中共營壘裡的多數人，都從他們對統帥的盲目崇拜中走了出來，郭川小是四十出頭的中年人，從小跟隨紅軍從陝北山裡打出來，可謂當今的新貴族，但將近三十年的實踐，他終於明白他的周圍，那些崇奉共產主義的信徒，原來都是些很自私的人。

於是他變成了只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很現實的人，此刻在他的心裡不再裝著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空幻路線鬥爭，不再有那種拚命殺的熱情，當然也不會違抗他的領導去做各種危險事，只要盡責，便是他所追求的滿足。

討論到此該告一段落。

我立即把話題轉到我們最喜歡的歷史故事上面去，因為那無傷大雅，隔閡可以彼此化解。

今天我有意講起了秦漢交替時期劉邦誅殺異性王侯的故事。我問他：「韓信在被殺時，曾仰天高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還有什麼其他的意義麼？」他眯縫著雙眼，彷彿在思考著什麼，但他不能講！

林彪公開叛逃這件事，給這裡平時張牙舞爪的老管們，似乎下了一劑猛烈的退火劑，猖獗一時的打人風收斂了，那套隨時可嘗老管飽拳的繁瑣報告制度，也無聲無息的取消了。

打人的魔鬼好像暫時被林彪帶到溫都爾汗的雪山上去了。

不知道是因為換防還是調整，原先那批對我們任意施暴的暴徒，不知何時悄悄地離開了這裡，六隊圍牆裡的秩序暫時又回到了「文革」以前的樣子。每晚的政治學習，再也沒有像林扯高那樣督促各小組，向學習者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林彪事件以後，流傳對中共高層的種種猜測，夾著社會上流行的各種小道消息，一時十分活躍。處在獄中的奴隸們彷彿看到一線希望，廣播裡重複播放著「批林批孔」的聒噪，竭力掩蓋中共正處在一個斷層上的那種尷尬。

「無產階級專政」銅牆鐵壁的神話被打破了。

人們在舊秩序的慣性作用下漸漸復歸平靜，但魔頭不歸天，壓在中國人民頭上一黨專制大勢未去，中國是不會出現突破性進步的，當然變化需要時間！

農六隊流放者，還要在徐老大和老管淫威下，完成每天十個小時的超強勞役，晚上疲備不堪的人們，在學習時間仍一如既往，在自己的鋪上呼呼大睡，或者點燃自卷的蘭花菸煙，用燥辣的菸煙雲驅散疲勞。

大陸被毛澤東的中共任意踐踏已為世界公認，為了求真，在此期間，一位義大利的記者安東尼奧尼，對神秘大陸現狀完成了「寫真」，他採用實地拍照，再經匯總的方法，將中國大陸的實況展現在世人面前，並以《中國》，命名了這部新聞紀錄片。

為了突破中共密探的阻撓，聽說他不得不採用照相機代替攝影機，拍攝成片後，為了能完整順利的通過中國海關，他不得不化整為零，分批送出大陸。《中國》在國外上映轟動國際影壇，這部紀錄片拍攝的成功，耗費了這位民主鬥士的多少心血啊。

《中國》中有危房相倚的老百姓住所；有破爛校舍；有依橋而立的晾衣竿上晾著破衣爛裳；有在街頭爭搶鎊幣的乞丐，這些真實的照片，展現了一個真實的《中國》。

蔡先錄因此感嘆道：「安東尼奧尼，如果能進入中國監獄，他定會把我們挨打挨捆，完不成任務，晚上圍坐院壩等等監獄實況攝入他的《中國》」。

張錫錕說：「一個外國人冒著危險不遠萬里，遠涉重洋，掇下這部真實的作品，一定會永載在中國歷史上。」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必然孤立於國際社會中。

### 第三節：公有奴隸制下的特權階級

六隊的最高行政長官徐世奎，最懂得他的身份和如何扮演在這種特權群體中的角色。他非常明白，他只能在中國專制下所規定的許可權範圍內，才能取得歸於自己的那份待遇。他明白，同歷朝歷代的傳統封建專制的統治者相比，他的地位和財富佔有，有特殊的形態。

在他管轄下，分佈在三坡夾兩溝有兩千畝的旱地，以及谷底的五百畝水稻田，上百頭大小牲畜，在名義上屬於國家的公有財產，但是沒有主的財產，是根本不會有的。抽象屬於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是無法運行並保存下去的。

實際上，農六隊所有的生產活動的指揮權，基本上都掌握在他的手裡。日常安排兩百多號勞動力的苦役，決定什麼時候從事農耕，什麼時間新修水利，什麼時候安排通知場部的拖拉機來翻耕土地，什麼時候買什麼化肥，飼料種子和農藥，怎樣分配所收的農副產品，蔬菜瓜果，連什麼時候把出槽的肥豬送給場部等等全都要經過他的批准，或直接由他定奪。

表面上他只是一個名義上的隊長，實際上是這個小小農場的主人。

#### （一）特權

不過，權力形成的過程中不斷翻新的運動，使他養成了按規矩辦事的習慣，他明白弄得不好，「走資派」的帽子可以隨時套在自己頭上，丟官不說，還要使他傾家蕩產，被人抓住政治上的把柄，抓進監獄使他遭到滅頂之災。

所以他做的所有事，都必須按中共中央的規定辦。他可以任意地奴役和驅使兩百多號勞動力，但必須表現他的忠於職守；在政治上，他只要嚴格管住自己的嘴，從不產生與組織相悖的丁點想法，不說任何有忤黨中央的話，不做任何規定之外的事，也不超越他的黨給他的那份待遇，雖然，他的組織發生最高權力的交替，連他自己都捉摸不定。

在平均主義低工資的標準下，他過的日子遠遠超過了農場的普通員工。一九六九年他把老婆孩子以及丈母娘從偏僻農村裡遷到這裡來，一家四口憑他每月僅四十元錢的工資，過著應有就有的日子。

舉一個同樣一家四口，工資僅比他少六元一個月的高士清一家作一對比，高士清的一家四口，加上一個能幹勤勞的老婆金梅拚命的幹活，還不能維持一家人最窮苦的生活，一九六四年金梅大鬧管教科，是在連飯都吃不上情況下，被逼著為生存而發生的，便足可勾畫出普遍就業人員的窮愁潦倒，金梅帶著孩子要上鄧揚光家討飯吃的悲劇，是農場裡盡人皆知的事。

然而同樣四口之家，同樣工資收入的徐世奎，卻過著完全不同的日子，住著兩間一廚的套房，按照國家的標準只收了每月五角錢的象徵性的水電房租，房間裡裝修用的高檔木料，油漆得光亮亮的傢俱，都按場部的內部價格支付。

毛澤東那個全民窮人的年代，特權者的福利待遇是按照「供給制」的標準供給的。一家人的伙食除了按國家定量的糧食、布匹之外，每天所消費的蔬菜肉類油類統統按內部價格計算，中共這種「內部」價格的供應，是特權的人們才能享受的待遇！所以，他們的日常生活完全不符合商品社會公平交易原則。

我在這裡無法列舉徐隊的所有經濟活動，僅僅列舉了公開暴露的部份。

至於徐隊還要經常在家裡款待周圍的生產隊長和廠部的同事們，吃酒划拳，饋贈親友可以按照統一的標準予以報銷，雖然六隊名義上並不屬於他私有，但只要他沒有違忤他的組織，在任期內，可以支配他所管轄下的任何物資。

他可以以工作名義報銷額外開支，這些開支根本是他的那點工資無法支付的；他可以從一個隊調到另一個隊去當隊長繼續維持著他的權力。

中共公有制，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小集團，佔有表面屬於公有，實際上屬於一批人私有的經濟，這是毛澤東想建立的初期專制社會經濟基礎。

每天早上他都站在監獄的大鐵門邊，看著一個又一個從他身邊走過的作業組，心中馬上盤算起每一個組今天的作業地點，檢查各組在出工時是否做好了今天勞動的準備，帶上該帶的工具、種子和化肥。

在鐵門邊最後送走了蔬菜組的組員，便叫住了從崗樓裡出來的夏守愚，問當天駐軍要他送什麼菜，叮囑他必須在九點鐘準時把菜辦好給他們送去。

同時還將一隻早已準備好的菜籃子交給他，要他在辦老管的菜時，順便也帶辦他家一天所需要的菜蔬。

這夏守愚，之所以一直處在比六隊任何囚奴特殊的環境裡，就因為他像一條狗一樣監視著蔬菜組的犯人，同時他能準確地領會隊長交給他的特殊差事。

僅就他給隊長家送去的菜，絕對是菜園地最好的品種，價格是由場部規定的，但在數量和品種上都是象徵性的開了個數，僅這項每天所消耗的蔬菜，幾乎是沒花錢就由這夏守愚源源不斷供給的。

在目送著夏守愚走後，他習慣的順腳走下大監鐵門前面那條通向一號溝的小道，這是一塊二十畝的高產玉米地。最近他便在這塊最肥沃的旱地上，種上了一片由他最先從新疆引進的核桃林。

五年前場部林場的果木專家組，在為農場規劃今後所發展的果木栽培計畫時，根據這裡的土壤和地理氣候條件，提出了一個培植核桃和板栗的種植計畫。

為了取得從來沒有在這裡種植的新品試種依據，林業組提出了小面積試種的計畫。頗有心計的徐世奎，主動承接了這個試種的計畫：劃出一號溝玉米地，組織了專門的試種人員，從場部接回五十顆樹苗，從栽插到施肥，治蟲剪枝經過了兩年時間，這批樹苗長到了兩公尺多高，長勢很好，到了第三年以後，便正式的封林結果。

自從一號溝栽上這片核桃林後，他每天早上守著大家出工後，都要先在這裡轉上一轉，晚上吃過晚飯後，他還要帶上自己的老婆孩子在這裡散步。

一九七二年，他的核桃林開始結果，這一年秋天五十顆核桃樹回報了總共四百斤的核桃，試栽成功後，他便將一號溝的玉米地全部栽上了核桃。在結果時派專人日夜守護，到了九月份臨近核桃的收穫季節，園子裡便增派了一條大狼狗，並向六隊的囚奴們宣佈，任何人禁止隨意進入園區。

收穫的時候，整個的打桃、撿桃他都專門派蔬菜一組的人去完成，他自己親自帶著大狼狗，守在從鐵門到一號溝的唯一很窄的過路上。直到裝滿核桃的大籬筐在嚴密監視下，一籬一籬的運進他指定堆放的隊部辦公室，並親自上鎖。

核桃從栽樹，澆水，中耕管理流過汗水的奴隸們，誰都沒有嘗過這核桃是什麼味。

在那個年代，核桃是在市場上絕跡許多年的滋補品！價值高達每公斤五十元。從此掌握在徐老大手裡的每年幾千公斤核桃，便被他當成了交際應酬，巴結上級的最好禮品。每年他除了上交場部和送給駐軍的一部份外，還用它們打通與六隊有一定業務關係的客人。

當然，他還必須注意對六隊的幹部們一碗水端平，免得因分贓不均，造成他的同事們相互「狗咬狗」。

除了核桃的開發取得成功，大片的蘋果樹早已成林，在山地上繁衍大片的果林並不容易。

鹽源風季特長，在第二年雨季尚未到來時，山上紅土地裡經過幾個月乾旱沒有一點水份，種的果樹苗全靠奴隸們的雙肩，將水從低谷的溪溝，一挑一挑翻坡上嶺的澆灌，否則將成片乾死。

靠水近的果樹苗，兩年後就開花結果，到夏天長得鬱鬱蔥蔥的果樹，帶給徐世奎豐收的竊喜。於是他將所屬的幾千棵果樹用竹籬圍成了果林，每到夏季果子成熟季節，便派人巡迴防守。

為防止飢餓的囚奴摘未熟果子充飢，他增加了兩頭訓練有素的惡犬，來回巡守，並宣佈嚴厲的紀律。

從每年六月份結果，到十月份收摘時，果園的竹籬笆上掛著：「閒人嚴禁入內」的警示牌，規定凡私自超越籬笆偷摘蘋果，一切後果自負。但是成天在地裡幹活的奴隸們那能禁得住？凡捉住偷吃蘋果者都要抓到崗樓下進行「反省」，輕則挨打重則挨捆。

八月中旬，果子已漸成黃橙色，每遇大風雨之夜，滿地落果，奴隸們就是看見了，也不敢私自偷越那警示牌。那些落果徐世奎都派飼養員專門去撿來餵豬，也不准成天勞累的流放者吃一個！鄧自新們又成了新的受罰者。

所以這裡長出來的每一個果子都帶著血腥味。

從一九六九年開始，六隊的果木林就在充滿血腥味的環境下，由每年收摘幾百斤，達到年產幾十噸水平。這些果子是不屬於糧食類的三類物資，不必上交場部，全部留給了隊長們變賣和「內部調劑」。

徐世奎用來學會建立公共關係，也學會賄賂上級部門。

## （二）小秋收

權力在他的手中運用得十分得體，憑他掌握的農產品，在這裡換來所需的東西，他雖不是地主、資本家，實際上比一切剝削者更貪婪的進行掠奪。

六隊的獄吏，基本是六十年代從部隊退役的軍人，退役後，頭一件事便是從家鄉或附近農村中，挑選一個農家女結婚成家、生兒育女，在勞改隊裡扎紮下根。

五月下旬和九月秋收，忙壞了從農村遷來的獄吏「家眷」。初來六隊的家屬膽子還很小，撿了地裡的一株麥穗，也要看看周圍有沒有人看見。

後來跟著徐世奎的媳婦一道下地。那女人說：「看，這些拋灑在地裡的莊稼多可惜，我們如果不撿還不是被周圍的農民撿去了。」

她們管這種將拋灑地裡的莊稼，撿回自己家裡的行為叫「小秋收！」一年下來，一個人可以揀到幾百斤糧食，比供應的口糧還多！

分到隊裡擔任幹事的男人們，跟著徐世奎，學會如何無情驅使奴隸們從早到晚幹活；學會了利用各種「狗們」給他們提供各種「情報」，對付那些不聽話的「反改造份子」。更多學會了如何利用本隊資源，為老婆孩子們過得更富裕一點創造條件。

當他們看到徐老大不花一分錢，就為自己的小家庭修了「土別墅」，於是利用當年鬧地震，場部專門調撥用來修地震棚的材料和資金，緊靠徐老大的「別墅」，新修起一幢幢新的土別墅，比徐老大更氣派更適用。

在這些新的土別墅週邊，修起了飼養雞、兔的圈。兩口子配合得非常默契，用從地裡撿回的糧食，不花一分錢地養起了家禽牲畜。在六十年代被割去的「資本主義」尾巴，到這時，便公開在自己的特權下，迅速長起來了。

至於每天這些小家庭所消耗的蔬菜，那是徐老大按「供給制」規定好了，只要向夏守愚打一聲招呼，那人就會將上好的蔬菜，準時的送到各家去，這些菜只是象徵性的記了一個斤兩。

每年搶收季節，徐世奎用一切辦法，驅使瘦弱的奴隸們完成超強度的勞動定額，但奴隸們只將成熟的莊稼砍倒在地，沒有割淨沒有收完的麥穗到處都是，尤其是藉玉米桿隱藏的玉米就更多了。

開始，郭川小把飼養員叫去，跟在收割的大隊伍後面，明確規定，撿到的糧食，由各飼料房自行使用。但是飼養員撿這些東西對他們本人沒有任何用處，何況同幹部家屬爭搶又何苦？得罪了這些女人等於得罪了這些管自己的幹部，於己十分不利。

偏偏徐世奎又將飼養房調來撿麥穗的人，調到曬場上擔任糧食收藏的工作。他之所以作這樣安排，不無他的私心作祟，收割人拋灑在地裡的糧食，是這些隊部家屬最豐富的小秋收收穫啊！

拋灑在地裡的糧食，偏又被在附近放牧的老鄉們發現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農場收割的地盤上引來了越來越多的公社社員，他們背著大籬筐也跟著小秋收的隊伍裡，與這些幹部家屬爭搶著灑在地上的穀穗，倘被徐老大看見後，便叫值班士兵驅趕這些社員們。

山裡人生性粗野，這些年人民公社造成的飢餓逼迫他們！直到七十年代，社員從公社土地上掙得的口糧，長期不敷果腹。生存使他們對政府忍無可忍。

他們把自己的窮苦，部份歸罪於來這裡開辦農場的勞改隊，口口聲聲說鹽源農場從他們手中占去了他們的土地；山坡上被開墾出來的紅土地，使他們失去了放養牲口的天然牧場。

所以，他們一開始就懷著敵意，注視著農場的一舉一動。平時，在農場的地上偷成熟的莊稼，成了極平常的事。現在在收割的土地上，撿一點灑在地裡的玉米、穗株是天經地義的！

所以，他們對徐世奎的禁令置若罔聞，撿莊稼的農民反而有增無減。有一天徐老大帶著人，從撿山的婦女手中沒收了她們的背兜。

可是徐老大沒有料到，這些被搜去背兜的女人並沒離開，而是守在徐老大的歸途必經的過道口，等收工後，趁他只有一個人回隊時，十幾名婦女便攔住了他的歸路，向他索要被「沒收」的背兜，他們拿著棍棒，捏著石頭塊，如果不是看山人及時趕到，徐老大定會遭到她們一頓暴打。

經過這次驚嚇，徐老大通過上司，同公社武裝部的民兵協商，達成協定，公社的社員們可以撿掉在地裡的莊稼，但一定要與六隊的收割隊保持三十公尺的距離，跟在隊上小秋收隊伍後面才被允許，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

人生來就想富裕起來，在農場的地上，獄吏的家屬在地裡撿到的莊稼，除供給他們餵雞、養兔所需外，還拿到市場上與農民們交換成糧票寄回他們老家，這恐怕也只有毛澤東時代的獄頭，才有這種得天獨厚的額外收入。

這種「小秋收」也給長期關押獄中的男奴隸，一次接觸異性的機會，跟在奴隸們身後的幹部家屬，本來就是一群從農村裡來的女人，平時他們被監獄的隔牆所阻，在嚴密監視下沒有和囚奴接觸的機會。

被專政劃定的界線，使她們同她們男人一樣，對這些奴隸保持著冷峻的態度。可是在小秋收「戰場」上，這種近距離的收割，完全打破了彼此不知不理的屏障，提供了男人群體與緊跟其後的女人群體有說有笑的交流機會。

本來就已被高額勞動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奴隸們，發現與異性的「交流」，有刺激神經達到消除疲勞的作用，奴隸中本來就有許多刑事份子，他們中不乏相貌英俊的小夥子，而幹部家屬的女人中也有敢於打破「封建觀念」，舉行突圍的風情女子，他們在同一塊地裡，不免眉眼傳情發生莞爾一笑的時候。

有時，女人們對向她們有意投來的玉米注視良久，時間久了便有難以克制的衝動，在玉米林中靠茂密的莊稼作掩護，雙方第一次牽手，並迅速交換了相約的紙條，使這種久積的感情得到突破，超越在常人眼裡很難突破的禁區。

但是男女間這種極令人敏感的突破，最容易被其他的女人查覺。日子久了，麻雀飛過都有影子，緋聞便在女人中傳開了，也預示著一場預想不到的災難悄悄地逼近了牽手者。

在農六隊最後幾年歲月裡，暫時拘禁過幾個刑期很短的刑事犯，按照共產黨的政策，這些刑事犯法者，仍被當成「內部矛盾」看待。

為了某些利用目的，允許他們能單獨出入六隊大門，並容許他們在監獄之外過夜。其中有一個小夥子，白淨的臉皮和周正的五官，頗受家屬們注目。

六隊自張事務長被老管們用棍棒打出六隊後，接替他的位子是一個姓王的幹事，此人因小兒麻痺症成了先天性跛子，偏偏他的妻卻是一個性欲很強的女子，為什麼要嫁給一個跛子我不知道，其中定有她難以啟齒的原因，她因自己的男人在生理上無法滿足自己，在場部家屬圈就有各種關於她的蜚言。

王跛子主動請求調來六隊，恐怕就含著割斷這個女人同場部相好們的聯繫，平息她各種風言風語的目的。

本來，王跛子可以甩掉這個女人，可是他卻偏偏要纏住她，儘管她一再提出離婚，卻遭到王跛子的拒絕。在那種條件下，與獄吏的女人私通是要以「破壞」軍婚罪名論處的。

調六隊沒有多久，這女人在秋收中遭遇了同這小白臉的「秋波戰」，不久雙雙墜入情網。

也不知什麼時候兩人突破禁區，有了秘密的約會！小白臉利用他可以單獨行動的機會，兩人開始暗中私通，然而麻雀飛過都留影子，何況這女人在場部就有名氣，肯定惹人上眼。兩人在場部私會的消息，經過家屬中那些長舌婦女的傳播，禍事終於降到了「小白臉」的頭上。

十月間一天中午，小白臉被五花大綁地捆回了六隊，並且關進了反省室。送來的那一天他已被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據說，當天中午時分在農三隊後面的草樹中，兩人赤身裸體被王跛子在這裡來了個「捉姦」拿雙。

王跛子找來的幫手，將小白臉痛打了一頓。女人反正已撕破了臉，只受了一頓羞辱。而吃虧的當然是「罪上加罪」的小白臉，好大色膽的囚犯，竟敢動到獄吏的頭上來了，肯定不會輕饒！

不過，兩類人員中，廣為傳播這一則「佳話」，沸沸揚揚的人言，首先幸災樂禍取笑那六根不全的王跛子。若按他先天的殘疾本可贏得人們幾聲同情，但他卻屬於令人痛恨的獄吏，反而替女人說話的人占了上風！說她是一個敢頂著專政壓力，尋求自我解放的女人。

從那以後，我就再沒有看見過她，有人說她被王瘸子五花大綁的捆回了她的原籍。有人說，她失蹤了，八成被王瘸子黑辦了。而等待小白臉的是法院的嚴厲判處。不過這一事件的主人公，在關押囚奴的勞改場所，上演了一幕悲劇。

他們敢於藐視「無產階級專政」的血盆大口，以血的代價唱出他們追求幸福的一曲。值得鹽源農場失去一切的人們稱讚。

### （三）模範共產黨員張劍波

一九六九年，北烏中隊調過來了一名叫張劍波的管教幹事，四川內江人，論其長相，一雙兇狠的鷹眼和鷹勾鼻子配在一臉橫肉的臉上。平時，他臉色鐵青，毫無笑顏，給人一種陰險可怕的印象，左眼皮下長著一顆豆粒般的黑痣。平時虛著眼睛看人，這臉印古人所云「其心不正，其眸睫焉」的老話。

據說原來他是內江法院刑偵處的預審員，因為善於用詭計和毒刑逼供犯人，所以曾被內江法院多次表彰過。並號稱模範共產黨員，在他的辦公室裡懸掛著「無產階級忠忱衛士」的錦旗。

文革時調住西昌，因為他辦案有功，特別擅長對付「思想犯」，六隊又是全場出名的「反改造份子」集中處。加上在嚴打運動中突擊辦案的需要，便專門把他調到六隊來。

長期的淫威，使殘害無辜的職業殺手，養成一種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無中生有的吃人野性。

在鹽源農場辦理集體槍殺蔣正均的反革命集團案中，他初試牛刀，僅從該案人犯的口供，就定下反革命集團結論，揮下屠刀一次就處決了五名「反革命」成員，那一個案子所處理的同案人員達四十餘人！他自己就說過：

「上面既然要殺一小批，還有什麼手軟的。我們辦案人員就是要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殺人不殺人，殺多少人，都只能以政治形勢的需要決定！至於思想這個罪，不一定要什麼證據，藏在人的腦子裡誰說得清？有個一兩句言論便可以定罪！」

正因為他頗能精通文字獄作辦案的主導思想，所以在文革中凡是辦不下的案子都請他專門定罪，由於職業需要，漸漸養成習慣，使他喪失了人性，發展到連自己的妻子也成了他殺對象。

到六隊來以後，他的作風是深居簡出，行蹤詭秘。平時並不像何慶雲那樣拋頭露面，嘮嘮叨叨，與流放者很少交談，當他的眼睛盯上了你，便在背地調集卷宗。每到這種時候，他使用內江人常用的話：「內江的老招牌，告才曉得！」那麼，你就得留神，你的名字已在他的「生死簿」上勾銷了。

六隊近年來案子中，槍殺陳力、蔣正君等人，都有他提供的預審口供和簽署的處決意見，他還審訊過潘朝元、蔡先祿等人，並簽署了死刑意見，只是因為在上報到西昌地區中級法院時未被核准，而免去刀下鬼的厄運。

我也是他下過屠刀的人之一，當時殺人真是太容易了，凡是有反革命言論的，具體的說，只要沾著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的「反動」言論，都可以整理材料上報處決。

他之所以狂批殺人的預審報告，出自他那升官的欲望，以及為滿足自己獸欲的追求，只要用一兩句話，甚至似是而非的編造，便下了惡毒攻擊偉大領袖，誣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結論，判決死刑的意見也就出來了。

然而殺人太多會造成心理上的極度虛弱，庭審陳力時，陳力怒目極視，嚴詞批駁的態度深深震撼了他，陳力犧牲後使他經常通夜惡夢，夢見陳力，提著他的頭來向他討命債，嚇得他無處藏身，驚出一身冷汗從夢中驚醒。

第二天，他的鄰居馬幹事問他昨夜又夢見了誰？半夜三更的在屋子裡怪叫，他卻不予回答。神經上的負壓，夢境中的惡鬼見多了，使他歇斯底里，無法控制。在這種扭曲的心態下，他原來就十分墮落的道德更加墮落，他本來就生性好色，為了解除晚上的失眠，越來越用異性的刺激來解除他的恐懼和煩惱。

在鹽源農場，多年有一個女人暗中陪伴他。他對於老家帶到農場來的結髮前妻感到乏味，由乏味到乾脆把她送回老家，以免留在身邊，「礙手礙腳」。結髮老婆回老家後，他就同這個騷女人由暗地轉為半公開同居。

張劍波從這個女人的奸宿中，用刺激來減少他的精神壓力。但是自從他們變成了半公開同居以後，那女人越來越不滿意這種不明不白的關係，雖然張劍波的工資大半歸她掌握。

為了公開的名份，她幾次催促張劍波與「前妻」離婚，可恨的是，他妻子兩個在當地公社頗有勢力的弟弟，卻堅決反對舅老信這種陳世美作風，離婚遇到了無法抗拒的阻力，在那個時代，辦理正式離婚手續，只要有一方不同意，便會維持原來婚姻。

林彪事件以後，「殺一小批」的嚴打運動暫時停了下來，以此為專職的張劍波也開始閒起來了，他便借這個機會向鹽源農場的管教科請了兩個月「探親假」，心裡盤算著怎麼來解決他的婚姻煩惱，經過與姘居女人的商量，在他的心中萌生了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計畫。

在老家的故居，這幾年一直寡居的老實巴交的妻子，意外在鄉下家中迎接突然歸來的丈夫。她雖然已經耳聞她的丈夫在鹽源已經同一個野女人私住在一起，但怎麼敢去阻止這個兇惡「丈夫」的私情？所以一直以息事寧人的態度，容忍了張劍波。

幾次她收到張劍波寄來要她簽字的離婚書，但卻因兩個兄長的反對，只好以不理睬的態度裝成什麼也沒收到。

這次她對他的突然回家，頗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欣喜，心裡對他並沒有發生懷疑和提防。

回家以後過了幾天。有一天張劍波到公社飯堂裡買了幾樣下酒菜，從自己的手提包裡，取出一瓶精裝瀘洲大麪，說是農場春節團聚時，發給幹部們的，一直留著捨不得吃，這次特地帶回家，同久別的妻子共飲。

女人經不住丈夫端著酒杯殷勤相勸，便接過酒來半杯下肚，不出半個時辰酒力發作，那女人感到口舌麻木，腹中絞痛，面如死灰，七竅來血倒在地上一命嗚呼了。（關於張劍波殺妻屬實，但其過程是聽來的不能保證沒有訛傳。）



張劍波見事已得手，連忙取出預先準備好的鋤頭鐵鍬，把床搬開就床下連夜挖了一個深坑，將她的屍體推入坑中掩埋，面上還鋪了一層石灰，到天亮才收拾完畢。

第二天向鄰人放出風聲，說她回娘家，已兩天沒有回家，裝著很焦急的樣子去她的兄弟家「尋找」。

經過一番緊張表演，他自認為可以瞞過這些村裡人，最後以他的妻子離家出走，到公社武裝部報案了結。

她的兩個兄長雖然心裡一團疑惑，但因為弄不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便去他們姐姐家，裡外找尋，村民們七嘴八舌的議論，誰也說不準，她是外出遇到意外事故，還是什麼原因失蹤。

活生生的一個人突然失蹤，暫被張劍波編造的謊言瞞過去。然而，一個女人為什麼在張劍波回來以後失蹤，引起了村民們的懷疑。

被妻子陰魂附著的張劍波，懷著惴惴不安回到了鹽源。然而內江市的軍管會在這個女人的兩個兄弟督促下，成立了專案調查組，將張劍波列為重大嫌疑人。對張劍波平時為人霸道作風十分不滿的當地村民，在張劍波回鹽源後，自發去她家的房前房後，尋找蛛絲馬跡。

有人發現，張劍波家裡常有金頭蒼蠅繞屋不去，根據這個現象他們發現，女人床底下有新土痕跡，而且懷疑那新土上面為什麼蓋有一層生石灰？最後終於從那裡挖出了早已腐爛的屍體。惡貫滿盈的張劍波，到了死期來臨的時候。

儘管鹽源農場軍管會，在接到內江報來的消息後仍取遮掩態度，要內江當局考慮到張劍波的身分份，不要過份張揚，不要造成不良影響。

後來，又把張劍波劃在隱藏在共產黨內的蛻化變質份子，悄悄把這個「模範」黨員辦公室裡懸掛的「無產階級忠忱衛士」錦旗摘了下來。拒不介紹這個兇惡的殺人犯的犯罪事實。但內江他的老家，老百姓早已將這起兇殺案沸沸揚揚的「傳開了」。

死者的娘家，在祭奠她的會上撫屍慟哭，要求當地政府將張劍波押回內江召開公審大會，並交給她的家屬們處理，但卻遭到了政府的斷然拒絕，雖然張劍波很快處死，但他的罪行遠遠沒有揭露，民憤遠遠沒有平息。

當局可以因「言論」罪，「思想」罪，把無辜的老百姓拉到鬥爭會上，一連幾天無休止的批鬥，卻對殺人兇犯保護有加。

中共大小官員憑手中掌握的權力，天天在對手無寸鐵的無辜受害者犯罪，他們比封建專制的統治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古代的士大夫階層可以拿著皇上賜給的免死牌，橫行鄉里，抵罪，所能免去的也僅僅只有死罪。

而中共的黨員幹部靠掌握在手上的特權，犯了罪可用降職革官相贖，一般黨員還可以用黨籍換得豁免。今天，腐敗和貪污成風，與這層豁免的保護密切相關。在他們的罪惡還沒有充份暴露時，連「檢舉」他們都要倍加小心。

像張劍波這樣的劊子手，所以能大膽毒殺前妻，就是因為這種特權所提供的保護作用，全國像這類似的凶案，也不知有多少沒有披露出來？

小秋收中，從這些拾玉米的女人口中，知道這些女人相當多生活得極不幸福，那些平時對犯人虐待成性的獄吏們，養成了他們殘暴的習慣，回到家對自己的女人也一樣施行暴力。平時把他們當作發洩性慾的奴隸，遇到不順心的事，便把她們當成隨便打罵的「出氣筒」。

當然，這些基層獄吏們的家屬，畢竟靠自己的男人。在全國還在飢餓的時候，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她們有吃不完的糧食，還有吃不完的雞兔肉，她們是一群受人欺侮的「幸運兒」。

鹽源農場的各勞改中隊，因為全關押的男犯，客觀上沒有這些幹部對被關押者，施行性侵犯的條件。

在就業中隊就發生過多次醜聞。就業人員在當時條件下，能娶妻成家的人本來就不多，但那裡的管教人員往往利用職務便利，趁就業人員的親友、姐妹、女兒來隊探親時，發生藉安排住宿的機會，趁夜潛入招待所，對她們實行姦污的事。

碰上這樣的事情，女方經常吃了啞巴虧，不敢對外張揚，除非產生了不可挽回的後果。

可以說，由毛澤東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一方面，使大批的無辜者淪為淫威下的奴隸，另一方面，製造了一個無惡不作的特權階層。他們在專政這個保護傘下面，幹著人性淪喪的壞事，當然也埋藏了種種深沈的社會危機。

#### 第四節：十年生死兩茫茫

一九五九年我被重慶大學強迫扣上右派帽子，無理踢出校門，送往南垌礦區接受監督「勞動改造」，留在我心坎上除一腔冤屈怨恨外，還有一個對我親人的牽掛，該如何處理這骨肉分離之痛？

當時我很渺茫，看不清地獄前方何處才是盡頭？想到撫養我的老人忍著從心頭割肉之痛，我的心便像被刀割般難受。

外婆和弟弟在父親被捕時，已經歷了一次心靈的重創，接著又是母親劃為右派，這雪上加霜後，現在我又遭入獄大難，當時我想無論如何不能告訴他們，給他們層層創傷的心上再灑上一把鹽。

既是中共菜板上的肉，把我們一家趕盡殺絕，我們就只好忍受這「滅門」之災的降臨！

入獄後把一切可怕的後果埋藏在我的心底，萬般無奈中，我只有選擇不告而別。十九歲的我要像男子漢一樣獨立承擔一切，但家人將承擔怎樣的牽掛和傷痛。

剩下的孤兒寡母會不會踏遍千里尋找天涯淪落的我？常使我陷在不知如何處理的兩難之中！我只能如此了。

入獄開始的那段歲月裡，我往往在夜半睡夢中哭醒。

最後，一個決心與命運抗爭到底的信念控制了我，當時想，除非我從監獄裡沉冤昭雪那一天，我能體體面面的回到親人中去，絕不會以「帶冤」之身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主意打定，我就突然消失了。

從此就再沒有向家裡寫過一封信，告訴他們任何關於我的資訊。從那以後，我獨自任由勞改隊發配充軍，從一個鬼門關到另一個鬼門關。

算起來，我在獄中渡過這段日子至今已整整十五年了。每一年的中秋之夜，我都要透過瓦背上擠進來的月光想念他們。每逢大年卅日晚上我會擺著從廚房端來的飯菜，默默地坐在我的鋪位上，面前擺著四個碗和四雙筷子，合著掌，祈求他們在遠方平安。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還」，千里孤飛的失群之鳥，終有回巢的時候，「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悲歌·樂府

對親人長年的眷念，像一杯永遠無法喝盡的苦水。屈指算來，我已「三十五歲了。先前還是一個稚氣的孩子，十五年已變成了未老先衰的小老頭。如果那倚著竹籬，盼我歸來的白髮外婆還在人間，那麼她已經是八十五歲了。

有一天，心靈的感應像一股強電流衝擊著我，使我強烈地感到一種說不清的預兆，隱約感到這些我日夜縈思夢繞的人都不在人世，

一種不能再與他們相會的恐懼催促我，我不能再音信杳無的繼續下去。否則，我也許永遠都找不到他們了，那麼就算我從這裡活著出去，我將要終身負罪，我既對不起日夜盼我歸來的老外婆，也對不起艱辛中撫育我的母親。

#### （一）尋母

一九七三年春節期間，就在這股尋親思潮的衝擊下，我結束了十五年的固執。第一次提筆向母親寫了獄中給她的信，全信僅用了一百多字，因為十五年的變遷，我不知現在我到那裡去尋找他們！該怎麼去尋找他們？

「媽媽，已經整整十五年沒有給您寫信了，我仍按十五年前的地址試著寫這封信，倘若你能收到它，就請立即回我的信。我這是在四川西南邊陲上一個小縣城裡給你寫信，希望這封信能接上我們之間已斷了整整十五年的聯繫。

您的孩子孔令平一九七三年二月於西昌鹽源九〇九信箱六中隊。

這一百字寄走了我整整十五年對親人的朝思暮想，也寄走了十五年築成的自閉，我想這封信她如果不能收到，那麼至少告訴我一家人全都亡故，倘若這封信寄到她手裡，那麼我估計得出，在這個文字獄緊鎖，我們間唯一可溝通的窗口上，魔鬼正用怎樣的眼睛監視著這些信！這第一封信，必會受鬼蜮們的盤查，嗅出階級鬥爭的火藥味。

然而這一百個字，堆積整整十五年的血淚意欲噴濺出來。就宛如一個丟失了母親整整十五年棄兒的呼喊，在誤入地獄的不歸路上，尋找歸途！尋找她的喊聲！

所以我縱有再多的怨恨要傾訴，但委曲和苦都不能露出絲毫，否則一不小心就會徒生枝節，不但我這一百多字不能打破關閉了十五年的親情大門，還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我這封問親信，整整過了五十來天，與其說因為她在十五年來從北碚托兒所任教，到目前在一家鄉村醫院接受監督勞動，需要輾轉傳遞，還不如說，經過了多部門拆信檢查層層審閱，耽誤了這麼長時間。

三月二十五日，蔡家醫院的門房叫住了母親，說有一封從西昌寄給她的信。

昨聞西昌來信，她心中一驚，自一九六七年小兒子失蹤後，已整整六年，她沒有收到任何信件。

從一九六六年文革以來，至今整七年，北京，上海，那些她曾寄託過希望的，她年輕時代的老師和同學們，突然好像從大陸這片海棠葉上消失了，從此再沒人給她寫信，使她隱約感到，當年學生時代的好友，也在文革中自身難保。

那麼，現在又是誰從西昌給她寄來了久久盼望的信呢？

當她急忙來到門房，從小張手裡接過這一封臘黃的信時，她心中交織著一種複雜的預感，「莫非小兒子方興有了消息」？當她注意那信封被人拆開過好幾次，有的地方已經撕破，她也只能坦然相對。

其實自己已沒有什麼值得當局神經過敏的。這麼多年來地處北碚邊沿的小鎮醫院，被強迫監督勞動的母親，對所受的人身侮辱和非人虐待早已習以為常。她的家已被查抄過十幾次了，「革命」群眾搜去了他所有稍稍值錢的物品，連一身像樣的防寒棉衣都沒有給她留下。

前年就為給自己縫一件禦寒棉衣，招來一頓毒打和鬥爭，使她斷絕了生活的念頭，那次她燒掉了珍藏三十多年的老照片，並且決心投湖自殺。

然而蒼天卻安排了她絕處逢生，她被救生還，並在附近農民們的安排下，一個小女孩在她的身邊伴她聊度晚年……

然而此刻他來不及思考得太多，捏在手裡的信封上所寫收信地址，分明是：北碚機關托兒所，那字跡好熟悉。她的心緊張起來，立刻又去看那信封上所留下寄信人的地址：西昌九〇九信箱，郵戳上印著：西昌鹽源。這會是誰呢？她連忙拆開了信封，拿著信箋的雙手在微微顫抖：

「媽媽」這稱謂使她從一場惡夢中驚醒，從她那昏花眼睛裡閃出了一束十幾年從未有過的喜悅來，難道是失蹤六年的興兒？興兒，你在哪裡？你真還在人間嗎？這麼長的時間媽為你流過多少淚？你可把媽想壞了呀……

一股暖流溶進了她身上的每根血管，縱使枯木逢春老樹新芽，好比行進在沙漠上快要渴死的探險者，忽然發現了一縷清澈的甘泉；一個深埋在地底下將要絕命的礦工，觸到了救援者的手，那驚喜和絕處逢生交織在一起的感情，千頭萬緒般鑽動在心頭！

兒娃，你可知道媽媽活到今天多麼不容易！

一陣激動的初潮拂過心頭後，她又重新在老花眼鏡背後去分辨那熟悉的字體，寫在那發黃信箋上的就這麼短短幾句話，信的落款是孔令平。

再翻看那信封的背後寫著這孩子囑咐郵遞員的話：「郵遞員，如果這封信的收信人已調往他處，請務必將這封信轉到她現在的單位上去。」

現在終於明白了，含憤斷絕音信整整十五年的大孩子此刻現身了！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廿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孩子呀，這麼長歲月你到哪裡去了呀，你可知道這十五年來，我怎麼盼你的音信？然而每次都在黃昏之後，失望的望著街燈。你的外婆哭過不知多少次了，直到她臨終還不停喊你的名字呀！而我熬過了多少斷腸的長夜，有過萬千次祈禱麼？

唉！我的孩子呀，你縱有再大的冤屈和難言苦衷，也該托夢向你的媽媽報一個吉凶吧，然而你卻一點聲息都沒有。

在那個時候，為娘的也身遭劫難，我因禁錮之身又不敢多打聽，寫信去重大問到你的下落時，他們從不告訴我關於你的情況。

從此生死兩茫茫，直到今天，你才突然從地下鑽了出來，向我喊道：媽媽，我在這兒呢！

天哪！這是真的嗎，這是在我做夢，還是蒼天安排的悲劇呢？如果這是一場悲劇，那麼這是多麼殘酷的悲劇？這整整十五年來，我的淚水都已經哭乾了啊！

母親連忙找來了放大鏡，又拿起那個臘黃的信封反覆看那郵戳，再一次證實是西昌鹽源縣發來的，她又拿起信箋——是大孩子的親筆手跡，一點都沒有錯啊，十五年了，連這麼熟悉的筆跡，竟一時想不起來了。

淚水再次模糊了她的眼睛。唉！真的老了，沒用了！她把那臘黃的信，擺在小桌上，好久才回過神來，將那臘黃的信收折好，再將它放在自己的枕下。

此時一個年僅七歲的女孩，正挨著母親身旁。這就是兩年前一位附近農婦送來的「乾女兒」。此時她正瞪著那童貞稚氣的眼睛望著她。

她認識方興哥哥，不過那時她僅只有兩歲，只記得他長得很高很瘦，但為什麼突然走了，從此以後，就再沒有回到母親居住的小屋子來？

一切都怪怪的，小腦筋裡盤旋著一連串疑問：媽媽是那麼善良，她成天為醫院打掃清潔，不像其他人偷奸耍滑，醫院把所有的重活和髒活都扔給她，而醫院的人為什麼總是找岔欺侮她？為什麼媽媽在忍受人們欺侮時，總是低著頭，好像醫院裡有一根令她無法解脫的繩子，牢牢捆著她？

今天還是第一次看到媽媽這麼高興，她注意老人的一舉一動，數著她戴了幾次老花眼鏡，一會兒取出那臘黃的信封，看看又放回原處，雖然她什麼也不懂，但為母親難得的高興而高興。

現在她才知道原來自己還有一個很大的哥哥，他可是在她還沒生下來時，便離家出走的，媽媽從沒有講過的啊！他長得像什麼樣子？她只能依憑她所見到的方興哥哥的照片，想一幅很大很大的圖像。

他真是一個奇怪的人，聽說在重慶大學念書時就離開家了。他為什麼要離開家，為什麼離家這麼多年從沒回過家呢？今天又怎麼知道媽媽在這裡？

她那小腦袋瓜裡翻滾著一連串的疑問，看媽媽在她佈滿皺紋的鬢角邊撲刷刷流下的淚，心裡猜測著，這大哥哥什麼時候才回家呀？她知道在這種時候，媽媽不喜歡打斷她的思考，就是問她，她也不會回答你的。

晚飯以後她躺在小床上，盯著媽媽重新從枕頭底下取出了那臘黃的信，然後戴上她那付老花眼鏡，在電燈下面重新細細讀起來，彷彿那信寫得好長好長，一直就沒有讀完似的，一邊讀，一邊又在擦著眼淚。

媽媽為什麼還在傷心呢？大哥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她想著想著閉上了眼睛，去了她的夢鄉。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告夢見之。夢見在我傍，思覺在他鄉。」（樂府）

這一夜是多麼尋常的一夜，母親望著身邊已沉沉睡去的小女兒，她沒有睡意也無法入睡，他得馬上去找回這個失散了十五年的孩子，最好此時，她能插上翅膀，騰空飛去……但望斷茫茫華夏，他在那裡呢？

想到這裡，於是翻身下床，去抽屜裡尋找出那本很舊的地圖，這還是興兒的遺物，在方興出走時她就反覆地看那本地圖，想從那地圖上找到孩子所去的地方，可是她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了，地圖上沒有一絲孩子出走的痕跡。

現在有了：西昌鹽源。在模糊的老花眼鏡後面，她終於找到了那個位於她所在位置西南方向，相距她足有千公里的鹽源縣。

憑著她的靈感，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正在歲歲崇山一片，人煙稀少的地方服刑役，她得馬上給她寫信。

於是她伏在小桌上，開始提起筆來，但是千頭萬緒如亂麻的腦子裡，怎麼開這封信的頭？第一封信中該告訴他什麼呢？

手上的那張信紙，揉了又寫，寫了又揉。

她知道自己和兒子今天的處境都很危險，縱有千言萬語，也是萬萬不能在信上傾瀉的，她知道所有信件都要被對方監督的人拆開檢查，尋找「階級敵人」「蠢蠢欲動」的線索，於是，這封信便這樣寫道：

「親愛的平兒：從我收到了你的信後，你給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一想到我重新獲得了我心愛的兒子，便全身有勁。熱烈地渴望著有一天我們能母子見面，我仔細地翻閱了地圖，我知道你是在四川的邊區，離我這裡很遠很遠。但我的一顆心離你是那麼的貼近……」

「我在這裡想告訴你，我於一九五八年下放農村勞動，一九五九年又下放工廠車間勞動，一九六二年調到蔡家場這家醫院，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你外婆在北碚逝世，臨死那幾天，我和你弟弟守在她身旁，死前她一直喊喚著你的名字！

「弟弟於一九五九年在四十四中畢業，考入重慶電力學校，六二年壓縮回家，一直跟著我，六四年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落戶在我附近的一個社員家中，母子二人朝夕相處，生活尚好，文化大革命他瞞著我，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離開了我，從此音信全無，生死不明。

「我在這所醫院整整十二年了，這所醫院離北碚四十里左右，汽車不到一小時。規模不大，是綜合性醫院，附照片一張，你媽媽已經老了，希望你也能給我一張相片，要說的話很多，下次再談。」

這便是一個在遭到家破人亡後的母親，同闊別十五年沉淪監獄的唯一兒子寫的第一封信，那中間被壓抑得喘不過氣來的辛酸，只能「領會」。

她知道，要把家破人亡的噩耗告訴天涯一角的孩子，又讓當局放過它，必得寫些中共強迫人們說的「話」。

她微微閉上了眼，想到在中共建國的二十三年中，自己同丈夫，老母親和兩個孩子組成的平常百姓之家，就因丈夫的歷史「罪」，不但他本人入獄至今不知生死，母親在憂憤和潦倒中去世，兩個無辜的孩子一個在「勞改」，一個生死不明。自己孤伶伶一人被醫院的造反派任意踐踏侮辱，這究竟是為那門？

而今大孩子居然還在人間，就算一種最大的「快慰」了。唉！這種遭遇豈可用「生不如死」所能概括啊？

她重新望瞭望那張剛剛才寫完的信。拿起那破籐椅上的棉墊子靠在小女兒身邊躺下，此刻腦海裡再次回到十五年前，腦子裡全是大兒子的音容。可惜，照片已經完全燒掉了，敞若不是那楊婆婆，自己早成了池塘裡的水鬼，這個家就算無聲無息在暴政下消失了。

現在想來，楊婆婆的話果然沒錯，她那時就勸過自己，「像你這樣的人中國多的是。憑什麼要走這條絕路呢？就不能長著眼睛看看這世道還會變成什麼樣？」那話裡可是一種預言，一種普通老百姓在黑暗中的等待，一種希望啊！

她想著想著，腦海裡又呈現出大孩子的樣子，活鮮鮮的，寬大而長圓的臉蛋，白皙的皮膚，從淘氣的童年直到中學時代……背著背兜撿二煤炭的身影，晚上伏燈讀書的身影，又重新回到眼前。

記得他考上大學離家時，幾乎整整一夜同兒子促膝交心，諄諄勸導他：「千萬不要去從政，那是一個說不清的危險領域；也千萬不要去從事教育，你父親就是一個活的教訓。你選擇了工科，有一門專長就是自己一生一世安身立命的本錢了。」這可是父母從動盪的年代裡，為躲避暴政總結出的切身體驗。

可惜，這樣的躲避，依然沒有躲過劫難。為什麼中共連這麼一個勤奮苦讀的孩子也不肯放過啊？

想到這裡她痛苦地翻了一個身，於是又想到自己同大陸上受殘害的知識份子一樣，她自己又招惹誰使她家破人亡？想到這裡，她只能打住了，唉！今晚被那些痛苦思緒擾得亂麻一團，總是高興不起來。

「時難年荒事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吊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州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白居易）古人的災難有今天這麼沉重麼？

漸漸地，她在朦朧中感應到自己的骨肉，正在無數大山相隔的那一面向她呼喚，於是她真的騰空飛起來了，穿越那重巒疊障的山脈，在那霧氣繚繞的馮虛之境，她找到了自己可憐的孩子，他襤褸一身，瘦骨嶙峋。不過那一刻，撲進她懷裡的依然是那又長又圓像雞蛋一樣白淨的臉……

記憶可真是一個怪東西，十五年過去了，處境艱澀，音容依舊，就這樣母子相逢在夢中，相擁在幻境。醒來時，淚水浸濕了一片枕頭和被蓋。她望瞭望熟睡在身旁的小女兒，替她蓋好露出被外的手腳低聲嘆了一口氣。

當這一封信從何慶雲的手中交給我時，他那臉上堆著一臉奸詐的笑。

「現在，你總找到精神寄託了吧！你看你的母親還健在，她可不像你處處同政府對立，你可要好好讀讀她的來信，不辜負她對你的希望。」他說著，把信交給我。到此時我們母子斷絕了十五年的聯繫，終於接上了，不過十五年前那時，負氣天真的想法，已被十五年的折磨徹底糾正，此時此刻我才知道，我日夜牽掛的親人除了母親，都已不在人世！欲哭無淚，斷腸天涯。

從外婆去世的年代，可以判斷，因為長期無人照料，飢餓年代死於營養嚴重不足，而我的可憐的弟弟，真想不到會慘死在造反派的亂槍之下。我又回想起當年小龍坎的夜。我真沒有想到我和他共進的那一頓年夜飯，竟是他共進的最後晚餐。臨別時沒有遺留下一張照片，我那斷腸的追念又向誰表達？

母親有了下落，我該向她簡單講一下我這幾年來的遭遇，以及我生活在監獄的概況。後來我才知道，母親所在單位掌權的造反派們，不僅公然無視公民通訊自由的法律規定，把我們的信件私下拆閱，還因為這些小痞子為表現自己的政治嗅覺靈敏，而把信中他們所不認識的字句和不懂的詞語，拿來集體「破譯」，對信中用到「亡羊補牢」，「撲朔迷離」等辭句，整整研究了一個上午。

他們為此專門找來新華詞典，按照那些詞的字面解釋，一面按照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點逐一分析，把亡羊補牢說成是我想待機逃出牢房，把「負荊請罪」說成拿起杖棍毀滅罪證，牛頭不對馬嘴的解釋以後，還要責令母親作出解釋。

可笑的是他們竟會以蔡家醫院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向鹽源農場的革命委員會寫來一封信，要求鹽源農場對我嚴加追查和管教。

在接到母親下一封回信時，要我寫信中不要用成語。

哭笑不得之餘，我只好用常人寫信的四段式，即稱呼、問好、說事、祝身體健康。這大概就是文革對社會改造的一大成果吧！

從那以後，遠在千里外的我，算是結束了孑然一身，舉目無親的孤獨，每逢過年過節不再獨唱悲歌。還能同其他有家有父母的流放者一樣，收到一小包慈母一針一線縫好，熨上她體溫和關愛「禮物」。

她把省吃儉用下來的每一分錢都變成了兒子身上穿的背心，腳上穿的鞋，洗臉用的毛巾，以及糧票。

我知道在這物質極匱乏的年代，寄來的東西來之不易啊！在那一小塊肉，一截香腸，一包水果糖中凝聚了多少深情。！

這一年秋收季節，我在山上那些爛在地裡的砍皮瓜中，挖出了許多白瓜子，把它們洗淨曬乾，用晚上學習時間，蜷縮在屋角落，一顆一顆地剝出它們的仁，再用一塊毛巾縫成一個口袋裝好，準備找機會帶給她。

## （二）一包砍皮瓜子

第二年，剛剛刑滿的王大炳，回長壽探親。我便委託他在途經北碚時將瓜仁帶給母親，並拜託他，把母親生活的情況如實告訴我。

一九七四年冬天，王大炳在闊別重慶整整十五年以後，第一次回到重慶，並且專程沿途詢問，找到了北碚蔡家場東方紅人民醫院，然而，他還沒有進入這家鄉村醫院的大門，便被傳達室裡的「門衛」截住了。

「你找誰？」那門衛從黑洞洞的窗口裡，向外上下打量著這個農民打扮的陌生人。

「啊，你們有一叫方堅志的嗎？我是來給她捎信的。」大炳直言尋找的人。

「你是從那裡來的，找她幹什麼？」門衛死死盯著來人，好像要從來人身上發現什麼秘密似的。大炳好像一個被盤查的人，一身都感到不自在。

整整十五年了，就像一個隔世的來者到了一個令他恐懼的環境中，他猶豫了一下，只好將我托他帶給母親的信，一包瓜子仁拿了出來。一面懇求他說：「我是從西昌鹽源來的，是方堅志兒子的朋友。這次因為回家探親，受他的囑託給他母親帶來一包東西和一封信，拜託你是否能通告一聲。」

門衛把信和毛巾包接了過去，掂了又掂，滿不在乎回答道：「那麼你就在這裡等著吧。」說罷，轉身進去。

不一會，便走了出來，一臉嚴肅地向他喊道：「你要見的這個人是我們單位的重點監督對象，任何沒有本單位的介紹信，不能同她單獨見面，我已請示了領導，你帶來的信和東西，我們可以代她收下，並且轉交給她本人，你走吧。」

這閉門羹，使大炳倒吸了一口涼氣，他向門內窺望，那不就是一所普通的鄉村醫院麼？裡面的過道上穿梭著赤腳的普通農民病員。

心中暗暗後悔，如果不去門房打聽，逕直走了進去，說不定根本沒人問他是什麼人，今天自己找了麻煩，先暴露了自己的身分份。看來，今天這麼大老遠的來，母親是看不見了。如此看來，母親的處境，十分不妙。

當大炳回到鹽源，把蔡家醫院所見情況告訴了我，頓時對母親的擔憂壓在我的心頭。她在信中不厭其煩的寫道「要聽黨的話」，恰恰證明她是多麼無奈，母親所受的精神壓力，超過生活在槍桿子下面的我。

這一年春節，我照樣收到了她寄來的一斤豬肉，並在信中告訴我，我給他帶的東西已經收到。一再要求我能將半身的近照寄給她。

在獄中，我們的相片一直由當局攝製。所以，母親這小小的心願，對於失去人身自由的我，還真成了一件大難事。我的身邊已有十多年沒有保存過一張相片了。為了滿足她的要求，我一直在尋找去鹽源的機會。

鹽源地處雲貴川高原，在這個漢、彝、藏、苗等民族雜居的地方，有廣闊的牧場，放牧的牛羊群，和過路畜群，撒在這一帶草地上的牛羊糞一直被農場各隊爭搶。徐世奎也不示弱，在春耕栽插完畢後，便派了一個由六人組成的小組，長期駐外揀糞。

這個小組在馬路邊租了一間公社的小茅屋，六人吃住都在裡面，每天所揀的牛糞便堆積在屋外馬路邊，等到湊足了可以用解放牌拉上幾車的數量後，便臨時從場部抽調汽車，再派兩個人跟著汽車一起到積肥的地點為汽車裝牛糞，當時裝糞的人一般指派菜蔬組的人。

## （三）照像的見聞

當我和肖弟良接到裝糞的「指派」後，在我的衣服包裡，把平時捨不得穿的一件「半新」中山服翻了出來。

在獄中大家都一樣，勞動時穿什麼，並不感到衣衫襤褸的羞澀。為了不讓母親看到我的光頭犯人像，我向陳孝虞借了他的呢帽，就這樣，把衣服和帽子包好，匆匆到場部汽車隊上了汽車。

汽車開抵目的地大約是上午十點鐘了，為了騰出照相時間，我和肖弟良用了不到一個小時便把車裝滿，估計汽車往返至少需兩個小時，就抽這段時間，汽車開走後，洗了手腳，換上中山服，我倆便向鹽源縣城中心走去，這是我來鹽源十年來，第一次「自由」上街。

鹽源就只有縱橫交叉成十字的兩條街，那天顯得很冷清。因為一心想尋找照相館，並沒有過多留意街上的市容。

不多一會，我們就在一家臨街小店門口，看到懸掛在街邊的照片劇照。走進去，裡面坐著一位中年婦女起身向我們打招呼。問我照的幾寸，便吩咐我在一張長木凳子上坐下，沒到五分鐘，我的尊容便拍了下來。

開票的是一個老者，他向我詢問道：「聽你口音，可不是本地人，你們是臨時到這兒來出差的吧？」我含糊應了一句，沒有在意他對我們的關注。

相照完了，身上感到發冷，便取隨身帶的「鎧甲」披在身上，沒想到那老者立即用一種異樣的眼光盯著我，披在我身上的可是一件全身上下，沾滿牛糞的吊巾吊掛「體無完膚」的爛油渣。

這些年老百姓雖然也穿得破破爛爛，但畢竟還沒有爛到這樣程度，加上「鎧甲」散發出來的臭氣，使那位老者立刻判斷出我們的身分。

他當即表示，我所照的相片不能取走。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我和老肖費了足足半小時的口舌，我還掏出了母親給我的信，向他說明我照相的來由，好說歹說最後店主人答應，要我必須一周內來取相片，不准取走底片。

真想不到「勞改」連自己照相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更想不到這麼一件「鎧甲」，竟被當成了勞改標誌惹出麻煩來，也罷，比起「破帽遮顏過鬧市」來，我雖不如故人，我就偏偏要穿著這「萬巴衣」遊一下鹽源街頭！

便大搖大擺的敞開破「鎧甲」，向前走去。只覺得那上面數十塊破棉絮和破布條隨風飄擺動，撲撲作響，衣服上糞便臭味也隨風散發，使我一時獲得那濟公活佛的瀟灑感。

馬路漸漸變得乾淨起來，左手隔馬路大約十公尺地方，出現了一排圍牆。前面斜放著兩個很寬的玻璃櫥窗，櫥窗上的玻璃剩下幾塊殘片，那裡面貼著許多「文章」。

左面櫥窗裡，彩色的刊頭上貼著：「革命大聯合，復課鬧革命」十個大字，右面櫥窗貼著「批林批孔、鬥私批修」八個醒目大字。

櫥窗間夾著寬大約十公尺的水泥過道，是學校校門。校門右側牆柱上掛著「鹽源中學」四個大字的木板校牌。

到鹽源整整十年，只聽說鹽源中學是鹽源縣唯一一所完全中學，也是這個縣的最高學府。雖經文革血洗，橫掃牛鬼蛇神弄得它面目全非，但此時校門很安靜，沒有碰到一個學生進出。

校門口的屏風牆擋住了我們向內窺探的視線，正好，一個十六歲左右的男孩子，從屏風右側閃身出來。我忙向他問道：「你們的學校還在上課麼？」他詫異地望著我，搖了搖頭，接著又點了點頭，露出一種不知如何回答的神色，便匆匆走進那「屏風」消失了。

我實在想看一下，文革以來學校被紅衛兵整治得怎麼樣了？正想向裡面走去，但又自覺不妥，自己這付尊容，冒冒失失往裡撞，倘若被紅衛兵攔住，找我的麻煩，我該怎麼說？於是收住了腳步。

這些年，六隊收納了一些從文革沙場上掃進來的學生「另類」，從他們口裡知道，在學校裡，上了年紀的教師除逃亡在外不知去向的，留在校內低頭苟且渡日的「良民」，其狀況並不比五類好。

校園成了革命闖將的習武場，十三四歲的毛孩子，個個都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使槍弄棒的「紅小兵」。



我的目光集中到校門兩邊玻璃櫥窗內貼出的「文章」上。這是些字跡潦亂，錯別字連篇，文理不通的傑作。

好半天我才讀出，兩個櫥窗裡雖有「堅決把復課鬧革命進行到底」的承諾，但許多「紙」上寫著「打倒X X X小爬蟲」，留著文革年代的野蠻味。

好在在「文鬥」約束下，只保持著口頭上的「殺氣」，並沒有血跡。

我極想去看看那屏風後面在演「什麼戲」，便同蕭肖弟良商量道：「你想進去看看嗎？」老蕭肖露出猶豫的面色，忽然屏風後傳來一聲大喝「幹什麼的？」那口氣顯然衝著我們在問。

我們立即停住了腳步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年齡比剛才那孩子還要小的孩子。不過，他身著草綠軍裝，正站在校門中間叉著腰，雙眼雄視著我倆，顯得幼稚又野蠻。

我原想以交朋友的心態同這些孩子們談心的，但看到面前這孩子那威風凜凜的樣子，使我原先已堆在舌尖上的話，倒了一個拐，全部的吞回肚裡去了。滿不在乎地回答說：「怎麼，不可以參觀一下麼？同志」。

那小孩居然勃然大怒，挑釁的喊道：「誰是你的同志，我看你們就不是什麼好人，該不是從監獄裡逃出來的犯人吧！」

糟糕！我們的衣著成了我們身份的標記，在鹽源城裡，讓這些孩子們都能認出來。我和老肖會意地相對一視，此刻我再不想像瀟灑的濟公，萌生對校園懷舊和好奇心了。

但我們今天招惹誰呢？難道就因為我們的形象也犯了王法？使那男孩用這種口氣訓斥我們？想到這裡，便板起臉，儼然以長輩的口氣訓斥道：「小朋友，說話要講禮貌，不要讓別人聽到像沒有受過家教似的。」

那孩子看我們不但沒有被他嚇走，反而還教訓他，立刻更兇惡地吼道：「你們再不走，我就喊人了。」看來，這裡是進不去了。

爭吵聲很快把校園裡的學生們吸引過來，屏風後面轉出來了五六個腦袋，年齡基本上是十五六歲，一齊用好奇的眼光盯著我們。聽得他們竊竊私語議論說：「我敢打賭，他們肯定是鹽源農場的犯人。」

兩個女孩子向男孩嘀咕了一陣，回過身便朝我們喊道：「你們趕快走吧？」老肖拉著我的袖子，暗示著犯不著同這些不懂事的孩子稱狼。

面對著這種被人趕出來的尷尬，我的心裡很不是滋味，悻悻離開了那校門，老肖向我解釋：「現在這些孩子，我們惹不起，我們的身份不同，本來今天上街又沒向隊長報告，出了事還不是由自己負責，何必同這些孩子一般見識。」

學校沒看成，反而用阿Q精神來安慰自己。一面向著那裝牛糞的地方大步走去，任那風吹破棉甲發出的拍拍的響聲，一面心裡還在消化今天一天的不愉快，咀嚼在相館裡受到的冷遇，和在學校門口的閉門羹。

這一天，我像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在這少數民族聚居的國土上，不但看到它極其貧窮，更體會了它精神的極度空虛。如此在中共禁鎖下封閉的社會，如何去面對一個文明世界敞開的大門？

### 第五節：我們還不如你們

林彪事件以後，記不起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六隊的山樑上那片寬大的馬鈴薯地裡，在我們下午收工去挖馬鈴薯的隊伍中，加入了一些年齡大約從十五到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從他們的口音和打扮上判斷，這些孩子不是本地農民。

經過我們的接觸和交談才知道，原來這幾個人是從眉山和樂山來的中學生，是不久前下放落戶到這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下鄉知青。其中年齡稍大的，是「大風大浪」中撞蕩過來的「老紅衛兵」。

不過從他們中年齡最大的孩子看，他們雖在撞蕩江湖中沾染了江湖習性，對人對事絕不像當年我們中學時代那種書生氣，只是還沒有脫掉孩子氣，於是產生了一種說不清的印象。

## （一）偶遇

高原地區，下午只要太陽一接近地平線，出不了半個小時，天就黑下來了。這天下午，我匆忙完成了草皮任務，頂著下午的狂風，躲到山樑低窪的山溝那片平時馬鈴薯長勢最好的地裡。一為避風，二為了挖馬鈴薯。那天下午運氣不錯，不到兩個小時，我就挖了足有半畚箕馬鈴薯。

看看太陽已經開始落到三號梁的背後，知道時間不早，便收拾起鏟草皮的工具，將挖的馬鈴薯裝進了一個小麻布口袋，正準備挑起籬筐往回走。

距我大約三十公尺遠處，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小夥子朝我喊道：「把你的畚箕給我裝一下」，那口吻完全是命令式的，教人聽了好不自在。我沒有理他，挑起自己的「行頭」逕直向山坡下走去。

這時他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將我攔住，一改剛才那種強行索要的口氣，帶著稚氣和請求的口吻說道：「大叔，我忘了帶口袋了，挖了這麼多馬鈴薯，只好向你借你的畚箕裝一下了，明天下午三點鐘，我一定準時在這兒把畚箕還給您」。

我看了看他那帶著懇求的眼睛，從他那曬得黑黝的臉上淌下的汗珠，和他那件在風裡飄拂的破衣見到了他的窘困。再往四周一看，山上已經只有我們兩個人了，夜幕已經漸漸降下了，風還在呼呼的吹。

心中想一個才二十歲的孩子，還在窮山溝裡為填飽肚皮忙碌，喚起了我一絲同情心。於是便停下腳步，放下了肩上挑著的扁擔，並從籬筐裡取出了畚箕向他遞了過去，一邊問他：「你叫什麼名字，聽你口音不是本地的社員，怎麼會到這個地方來？」

他接過畚箕，迅速把剛才甩得一地的馬鈴薯撿了進去，一面回答道：「我叫冷軍，原來是眉山中學的學生，畢業兩年了，當時滿以為中學畢業後可得到一份工作，巴望著學校或用人單位的通知，沒想到通知我的街道居委會，要我在三天內到居委會報到，接受到農村插隊落戶的安排，後來便把我們分到這裡來了。」

從他簡單的回答裡充滿了灰色，不同於這個時代無法無天的紅衛兵們。

在監獄裡，這些年來陸陸續續接觸到，打上「文革」烙印完全嶄新的一代，例如沈良玉、潘羽方、孟平等人，他們性格中的自以為是、渺視一切，與我們這些同樣在共產黨校園裡泡出來的淺見自私，膽小怕事，形成鮮明差異。

我曾用心思索過，形成我們之間代溝的原因：恐怕首先要歸功於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地位，我們那個年代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革命」運動，學生被打上了資產階級烙印，一直處在被整的社會地位上；而現今的學生又是毛澤東調教的「奪權槍手」。

當然學生因成份不同烙著家庭的印記。黑五類的孩子，處於被歧視的位置上。紅五類的孩子，一旦奪權使命完成後，他們將落根於什麼樣的社會階層，是統治階級還是和我們一樣成為奴隸？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

不過這不會影響他們的性格在形成中，被各自特殊的遭遇和條件左右。

所以我決定抓住眼前這個年輕人，聽聽他的自我介紹。便不顧天色已晚，索性放下籬筐坐在地邊。一邊看他撿馬鈴薯，一面同他聊起天來。

「你住在那個生產隊？」我問道。

「梅雨三大隊。」他回答道。

「是住在生產隊長家裡還是社員家裡，還是同其他一道分來的知青住在一個地方？」我繼續問道。

「剛來時分散在農家，後來生產隊長說你們還是自己住一處，自己管伙食，公社專門給我們分了一間房子，我們同時分來的人便集中到了一起，自己開伙。」

「你們的口糧是多少？有工資嗎？」我問，年輕人搖了搖頭，好像回答起來特別困難，我見他已將地上的馬鈴薯撿完，裝了整整一畚箕。不過那裡面混著許多生了芽和爛掉一半的，便順手將不能吃的甩掉，隨口說道：

「這些已經含有毒素不能吃了。」

他顯得很難為情的說道：「不怕你見笑，其實我們比你們還不如，你們一天還有三頓飯，我們全靠自己了，工分糧不夠吃啊。講老實話，我們一年之中就沒有吃過飽飯，到了這種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只有靠在山坡上打遊擊過日子了！」他苦笑了一下。

天色已黑下來，他撿起那甩在地頭的綠色破棉衣，提著一畚箕馬鈴薯向我點了點頭，便朝東北方向的土壟子沿著下坡大步走去。

第二天，他果然守約，準時把我借給他的畚箕送回到昨天相約的地點，與他同來的，還有三個比他年紀更小的孩子，看上去大約都不滿二十歲。

第一次打交道就能守約，這讓我們之間的距離大大縮短了。大家挖了馬鈴薯後，看看時間還早，便圍坐在土邊的石墩上侃起龍門陣來，同他一起來的是同他一道來這裡落戶的同學們。

「你們知道，我們是犯人，同我們交朋友，你們不怕麼？」我看著那最小的孩子問道。可是孩子們回答得很懇切，他們說：「犯人怎麼樣，其實我們連你們都不如，我們過的是有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

這同冷軍昨晚上的話是一樣的，也是我們接觸到的這些「知青」們共同發自內心的哀嘆，一個剛剛走向生活的年輕人就背上這沉重的包袱，還在那裡去尋找他們的「廣闊天地」？

「你們到這兒來當知青，不是說完全根據你們的自願麼？你們為什麼要選擇到這兒來落戶？」我問道。

冷軍立即回答說：「我們從中學畢業後，是沒有大學可升的，中學畢業表示我們的學生生活結束了。那時，如果不沾著親戚朋友在工廠或政府裡工作的光，找份工作比什麼都難。總不能老守著在家白吃，街道的居委會三天兩頭來家裡作工作，要我們報名上山下鄉，說農村有廣闊的天地，我們雖然也知道那是騙人的話，但並不敢反對。後來便硬性下了下農村的通知！」

冷軍的話還沒有說完，那最小的孩子便接口了：

「居委會的人把農村說得天花亂墜，說這裡牛羊肉當小菜，我爸開始還懷疑，他問居委會的人，上山下鄉有沒有一個年限？一年還是兩年期滿後回家，分不分配工作？我們做夢都沒想把我們弄到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一晃過了兩年多了，至於回城工作就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既然受了騙，為什麼不回家呢？現在回到家裡為時也不晚啊？」我打斷他的話。

「沒那麼容易了，上這兒來時，我們的戶口是跟著我們過來的，現在想遷回去要辦戶口根本不可能。但是你們都知道沒有戶口的黑人，派出所可以隨時辦你的收容，把我們抓了起來。」冷軍恨恨地回答說。

我終於有點明白了，這些小青年是怎麼被騙到這裡來，欺騙加戶口足以堵塞他們返城的路，這窮鄉僻壤，對於再難治的調皮學生，足可以使他們就範，天真的學生怎麼玩得過北京的政治流氓？

「那麼你們現在的口糧是多少呢？」四個孩子為了回答我的問題開始鬥起帳來，大致結果是，去年大春，一直到國慶日以後，才開始分糧食。

每人分得的工分糧大約是二百五十斤穀子，這些口糧到了今年五月份早就吃光了，小春分配的口糧，馬鈴薯加麥子每人折合只有九十多斤，還不夠償還向公社已經借來吃空的口糧。所以他們只好出來「打野食」，包括撿農場土地拋灑的糧食，無怪乎他們老是說：「我們還不如你們。」

當我告訴他們，我們每天的定量只有一斤一兩，如果讓我們自己來開支，肯定也是寅吃卯糧，僅僅這麼一算帳，就把我們間的隔閡全打消了。

原來除了政治上的不同外，實際上處在相同的地獄層裡。無非我們戴著一頂令人望而生畏的反革命帽子，行動有槍桿子押著。而這些小青年頂著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桂冠，在身不由己和忍飢挨餓上，頗有同病相憐之處。怪不得他們說「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於是，我產生了到他們住地作客的想法，便提問道：「你們住在一起嗎？」四個人不約而同的點點頭，孩子們對我將造訪他們「家」表示歡迎。當下告訴了他們住的地方，商定兩天後下午四點鐘，在他們的院子裡相見。

按照約定，我預先準備了一小口袋大米，那天在約定的地點，山坡的農家大院裡，冷軍已在那裡等候我了。

我走近才看清楚，原來他們所住的地方，就在我們秋天挑草時必經的路上，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今天我們有緣相逢。

當我跨進大院的門便聯想起十五年前，我被放逐到南桐農村中那戶姓趙的家中，腦子正回憶往事時，一股豬圈的酸臭夾著霉氣撲鼻而來，這與十五年前幾乎完全一樣。

西廂一間大約十二平方公尺的小屋，便是他們的「家」，農家的豬圈就在他們屋的背後，這又使我聯想到起南桐界牌大隊那一段集中居住生活。

不過，他們的環境比我們當年還差，屋裡光線極暗，整個小屋除門以外，在側面的牆上開了一個二十公分見方的小窗孔。

憑著黯淡的光線尚能辨認出，小屋裡放著兩張上下鋪的床，兩床之間擺著一張舊的小桌子，那上面就是他們四個人「吃飯」和「學習」的地方。

小屋顯得十分擁擠，床上亂放著他們的被褥，因為光線太暗，看不清那被子髒成何等程度。

進門的屋角堆著馬鈴薯，一看便知道，這是從我們三號樑子土裡揀來的「口糧」，門口廊沿下，是一個用幾塊大石壘起的「灶」。

四位主人忙著洗鍋淘米，洗馬鈴薯。用堆放在院子背後的玉米桿，向日葵桿生起了火，半個多小時後，一盆香噴噴的米飯和一鍋熱騰騰的馬鈴薯，便放上了那張桌子上，沒有菜，只用一個土碟子盛著鹽和辣椒水，五個人圍坐在木板床上，邊吃邊說著各自的遭遇。

四個人中冷軍年齡最大，經歷最複雜，那天下午，也主要是聽他的故事。

他從讀書，講到當紅衛兵；從北上串連中途退回講到武鬥；從破四舊講到打砸川西一帶的寺廟和文物，從肆無忌憚講到內心的懺悔，整整講了一個多小時，類似的經歷我已聽過，只是地點時間不同，並不感到特別新鮮。

不知不覺天已黑淨，廊下的爐火早已熄滅，放在小木桌上的盆子裡剩下的馬鈴薯全都冷了，我站起身來將堆在盆子邊的馬鈴薯皮丟到屋前的土地裡，時間已經很晚，我猛然想起，進入六隊的那兩扇鐵門，不知是否關了，進去時，崗哨會不會找麻煩，便連忙起身告辭，匆匆直奔五子樑子而去，耳中還在不斷的響起他們的聲音：「我們的日子還不如你們」

從那以後，我們不時在我們的山樑上看到他們為生活而掙扎的身影。

## （二）情緣

文革後期，我對二胡產生了濃烈的興趣，這種善於抒發心底悲情的樂器，從沒有人手把手指點過我，李克嘉編到農六隊時，農五隊原先佔據的房子改建成了小監，他入獄的時間比我晚一年，當我們在一九六四年從黃聯關押送到這裡來的第二年，他才從成都監獄押到這個農場。

一九六六年，他從農五隊編入六隊後，由於累次越獄逃亡，所以名揚鹽源農場，成了農場第一流「反改造尖子」。

一九六八年夏天，那次在農六隊籃球場擊斃一名從小監逃出來的囚奴，當夜被老管叫出來陪「殺場」的就是我和他。

大約從六七年開始，每到晚飯之後，他便坐在監舍房前的廊沿下，拉起悠揚的二胡曲子。在我聽到的「江湖水」演奏中，除了從廣播裡時不時傳出的中央樂團的演奏，我還沒有聽到過像他所演奏的催人淚下。

其實他演奏的仍然是劉天華的老作品，不過經過他的手，那二胡兩根弦裡，流出來的真有「幽咽泉流水下灘」，「別有幽情暗恨生」的情調。那一宛流淌的清泉，淌入聞者的心坎裡，會讓人仰空長嘆，輕梳自己所遭遇的悲苦人生。

我聽得出他所奏出琴聲分明在用心與人交流，一曲一調便是心在嘔歌，那琴弦上所飛出的，其實是他心的哭聲和吶喊！

我便下決心，一定要學會這種能表達內心的樂器。

我想，在這種特定環境下，也許借助於這種樂器同人交流來得更容易，更能表達心的聲音。

當然，我知道要學會用二胡與人交心，對於像我這種連它的基本指法都不會的人一定很難。為此，李克嘉送了一把淘汰的二胡給我，另贈「心領神會，自己摸索」的八字真言，什麼也沒有教我。

與此同時，我托上山伐木的李相華為我從山上帶回幾塊黃秧木，並請擅長木工的人自製了一把新二胡。

聽眾告訴我，拉啞胡進步不大，認為既要練習就必須按上卡子把聲音抖出來練習。於是我大膽的安上了二胡的高音卡，讓我的「殺雞殺鴨」聲接受大家的評議。

農六隊的幾位「胡琴手」，琴聲有別，三個月後，當陳孝虞聽到我的琴聲後，驚奇的問我道：「還從來沒有聽你拉過二胡，不料你也會這一門。」還問道，「你是什麼時候學的？」我微微一笑問道：「能打上等級麼？」他說：「不錯，只是聲調太悲傷太壓抑了！」

這正是「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高山流水有知音，他對我的誇獎，證明我用琴表述了我的哀傷，被他聽出來了。

只要聞者能聽得出那琴聲中的悲傷，便證明我這種用琴說話的初衷得到了實現。也唯有能聽出那悲傷的人，便是親身領受這種處境的同情者。

唯願從琴弦上抒發出來的壓抑，能喚起精神麻痺的人，從昏昏渡日中驚醒。我想連自己的處境都不知悲傷的人，就不可能想去改變這種處境了！

這一年下半年秋播到來之前，蔬菜組被派去毛牛山上為菜地積肥。那裡是以松柏為主要樹種的原始森林區，成為聚居在那裡的彝族人放牧的場所。

因為多年積存下來以松葉為主的腐植土，以及遍地牛羊拉撒的糞便，便是我們積肥的主要原料。

進山那一天，我帶上的除了被蓋衣服，還帶上了李克嘉送給我的那把二胡，汽車把我們帶進了原始森林，一個小時後，在密林中的公路旁邊，一幢中式大莊園裡停下。

這大宅院便是我們暫住的地方，進入大院大門左側廂房的樓上，爬上樓梯在木樓的地板上鋪好了地鋪，下午就進了山林。

來到大自然中棲身而居，久被鐵窗之下長期閉塞的心靈暫時獲釋。這兒再也沒有報告聲和監獄那股恐怖和陰森，時值深秋，那林間散發出來的自由氣息，慰撫我心靈長期受到的壓抑。

「森林真美！」我大聲呼叫著。陳肖虞在遠處傳來了驚呼，「看，好大的蕈。」他手裡正捧著一朵足有半斤重的紅白相間的山蕈。我們都圍了過去，相互詢問，無人能說出它的名稱。

繼續搜索，那在樹下和草叢，石壁中藏著黃色的紅色的、白色的蕈還真不少，久在外住的李相華給我們指點那些是無毒的。於是我們邊收攏腐植土，順便的撿回了那些山蕈。

莊園附近的水井裡，正好有幾個彝族的女孩子在那裡取水，水裝進一個像罈一樣的瓦器中，頂在頭上便赤腳踩著山間小道的石子路，很快消逝在密林中。因為語言的障礙，我們沒有同這些取水的女孩子交談過，但那情景絕對比畫上的生動多了。雖然她們頭腳甚至臉上都是「花」的，但那絕對是美麗的。

堂屋裡升著火。鐵鍋裡煮著一大鍋下午撿回的葷子。我獨自爬上樓梯，取下掛在牆上的那把二胡，調整了一下弦的緊度，輕輕開始拉了一曲「良宵」。朝著木樓上的小窗子向外望去，暮色的白霧已徐徐覆蓋了遠近的松林，漸漸地我陶醉在琴聲中，有意讓那些飛進密林深處的旋律，召喚那些無家可歸的幽靈！

忽然，在那上來的樓梯口上，半暗的燭光中恍惚地冒上了一個人頭來，緊接著從那裡傳過來一聲低聲的呼喚「老孔」。

我吃驚地轉過臉去，獄中十五年，人們一直呼喚我為「孔老二」，用「老孔」相稱的同難實在不多，尤其是這個蔬菜組。「孔老二」的稱謂使我同大家很貼近。這「老孔」的稱呼，聽去卻極為熟悉，我很快分辨出來，並且幾乎失聲驚叫道：「冷軍。」

果然是他，他很快地跨了上來。在農六隊山樑上我已有很久沒看到他了，萬沒有想到竟會在這個地方重逢。我丟下了二胡，迎上去同他緊緊握手。再看看他那模樣，黯淡的燭光下，只覺得他瘦了些，不知是什麼時候還戴上了眼鏡。樓上沒有凳子便只能坐在地鋪上。

入坐後，我發問道：「你怎麼也會到這個地方來？其他的幾個同學呢？」他開始慢慢地講出這一年來的變化：「原來在一起共患難的四個同學，只有一個得到了城裡的招工指標，據說是他父母疏通了縣招工辦公室裡的負責人，回城去了。

「剩下的三個人去年冬天合計偷殺了公社的病羊，被抓住挨了民兵一頓打同公社鬧僵了，便回了眉山。」

「老爸死後，我的家便不再存在。正好碰上鹽源公路局的養護段招工，我報了名，臨時工工資每月二十元，除掉伙食以外，每個月剩下四五元零用錢。但生活上比原來在農村裡，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安定一些」。他叨叨講述一年來的經歷。

「這幾天我們住的道班正好也在這座大宅院，下午六點鐘收工回來，正在弄飯，便看到你們從樹林中回來，夜色中看到你，因為光線太暗，我還不敢認，直到吃過晚飯聽到樓上的二胡聲，循聲找來，剛剛爬上樓來，果然是你。」

### （三）歸宿

他一邊講，一邊摸著我放在床上的琴，羨慕的贊道：「真沒想到你還會拉這麼一手好二胡。」聽到他這一番相別後的介紹，在昏暗的燭光中，我注視著這位邂逅相逢的「知青」朋友。

臨時工是暫時的，每月收入僅這麼一點，轉瞬間已經二十四歲的人了，到了成家的時候，但，誰又願意同他同甘共苦？目前條件讓娶妻安家成了奢望。生活的教育，使他把我們的命運連接在一起了。

在山上停留的僅僅只有兩周短暫的時間裡，他每天晚飯後都要爬上我所住的樓閣來「殺雞、殺鴨」的練習二胡。

我告訴他我的體會是琴為心聲，不一定要跟著別人的老套子練習，只要學會基本的指法後，便可根據自己的耳朵和感覺拉出好聽的旋律來。

兩周後，我們從那裡離開的時候，他依依不捨向我辭別。那一天，他送來了一個瓶子，裡面裝著配發給他們的白糖，並且一再的摸著我帶上山的那一把二胡，我明白他的心思，當即把這把二胡送給他作為分別的紀念，並在那琴上刻下我的名字。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一年以後，即一九七五年初，我在農六隊的圍牆裡，讀到了一張由當時成都地區某法院蓋上了公章的「嚴打佈告」。佈告中公佈的那一次槍斃的十幾名名單中，其中排在第三名的朱紅批筆下面，赫然印著「冷軍」的名字。我楞住了，天下同名姓的人多的是，這冷軍難道真的湊巧是他嗎？

於是站在那佈告下詳細地讀起來，當我讀到這是一個眉山中學的學生，又介紹他曾落戶鹽源縣梅雨公社落戶後，我的眼前活現了他的身影，再去讀被槍決的「罪惡事實」，那上面寫道：

某年某月某天的一個晚上，他翻進了某農宅，準備偷走那人家放在屋裡的一背兜三十多斤玉米子，當下被主人發覺，阻攔他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黑暗中，兩人打了起來，老太婆還一面吼著。冷軍順手揀起一根扁擔，將阻攔他的老人打倒在地，匆匆搶走了那一背玉米子。

不料那老太婆當即倒地身亡。又一起為搶三十斤玉米子，賠上一老一少兩條人命的悲劇，便發生了。這樣的悲劇，在窮蹙飢餓的毛澤東時代，可說是天天發生著。

不用懷疑，冷軍翻牆入室，只為了偷一背玉米，當然是飢寒所迫。而年輕的冷軍之所以下手殺人，難道不是道德淪喪、人性泯滅的結果麼？

在他們身上留著文革「你死我活」的畸形烙印，被長期的中國飢餓現狀所逼迫，這冷軍為三十斤玉米子，而早早付出他年輕的生命！

他那殺雞殺鴨的二胡聲，彷彿還響在我的耳邊，想到「你死我活」這句文革時髦的語言，以及對道德觀念的摧殘，他會早早丟失年輕的生命嗎？

這麼一張佈告在我讀來，怎麼也是當代「知識青年」對毛澤東悲慘命運的控訴，我在監獄中萍水相逢的這位「知青」，就這樣在地獄大門上跳進萬劫不復的火坑中。

後來，在我落實政策以後認識了更多的「知青」朋友，他們命運大致相似，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在進入中年和老年時回首過去，往往會與我一樣，扼腕嘆息這段不堪回首的歲月！

而這一代被欺騙的孩子們，無論從道德修養還是知識都是空白，文革把他們變成了滿腦子空空的愚民。

真不明白，這追逐獨裁復辟的毛魔頭，為什麼對於無知的青年學生會如此捉弄傷害？難道這種對中國社會毀滅性的破壞出自他的本性？

難道，在中共獨裁統治下，像冷軍這樣無知的青年學生歸宿就是死亡嗎？

## 第六節：喋血蘋果林

鹽源的地理位置，從緯度看應屬於亞熱帶地區，如果不是因為海拔較高，使它形成旱季特長，秋冬風沙大，冬季嚴寒的高原氣候，這裡應是氣候易人的地方。幾年試種蘋果和梨子存活率較高，種下的樹只要在苗期經過灌溉、培土、中耕後，第二年就可開花結果，就是種在紅土坡地上也是如此。

如此年復一年，成活的果林便從山溝裡向山上延伸，幾年後，各隊的周圍逐漸變成了果木林。囚奴們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勤勞動改造著這荒漠紅土，果木林使原來的紅土地變成了片片綠州。

只是在中共暴政之下，這些綠州下面不知埋著囚奴們多少白骨？

二道溝地區的場部，為了專門供應幹部和武警的蔬菜，將二百多名刑滿囚奴，繼續留在這裡種植蔬菜。被中共稱為「刑滿釋放犯」是身份特殊的「公民」。

一九七二年開始，在菜地周圍種上了果樹。幾年後，這些果樹長大成林，管理人員在蔬菜地周圍用牆圈成了果園。

原先關押我和陳力的那個「倉庫」也劃在果園圈裡，從圍牆牆頭上日漸冒出來的果樹，已覆蓋了早先那些紅磚建築群。

從內地引進的一批良種蘋果，每到夏季結實累累的果樹上，碩大的果實壓得碗口粗的樹枝躬身垂地，果子的芳香招來一群群蜜蜂。為了防止刑滿人員和流放者偷摘果子，蘋果成熟後，刑滿人員，便被禁止踏入那林中。

原先的圍牆加高到三公尺，牆頭布著鐵絲網，並專門買來兇惡的狼狗。從此果樹園子變成了陰森森的禁地，在幾次不知情的「小偷」越牆翻入，被狼狗咬得血淋淋的慘案發生後，就絕少有囚奴們進入那園子了。

直屬場部的三角洲而今也是綠茵覆蓋，原先的基三隊改為機修廠和木工車間。從成渝兩地押來的少年犯進行了改編，大多調往其他中隊，留下的修理工和車鉗工，成為機修廠的骨幹。但他們永遠都脫不掉「刑滿釋放犯」那張皮。

一個叫郭賢的老師傅，有一手好修理和駕駛技術，場部專門為他配了徒弟，既作幫手也作學藝的學生。

郭師傅性格內向，不大說話，對獄中的殘酷壓迫，都抱著「忍」字當頭，息事寧人的態度，成天埋頭修車，開車時極少與人口角爭吵。

派給他的徒弟叫孫明權，據郭賢介紹孫的父親原是一名屠夫，母親早亡。文革開始，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家被抄，年僅十五歲的孫明權，流落街頭成了「黑七類」。後來因飢餓所迫幾次行竊被抓住後，少管所判了他三年徒刑，並把他流放到這裡，刑滿後便安排到機修廠當了郭賢的徒弟。

孫明權性格內向，從小所遭到的厄運，埋下他爆炸性的反抗基因。在鹽源農場他飽嘗奴役。不過他在咬緊牙關，默默承受給他的種種不公正待遇，積蓄它們，把它們變成引爆後可以毀滅一切的力量。

在機修廠一晃六年，孫明權已是廿四歲的年輕人了。

一九七四年的一個秋天傍晚，孫明權吃過晚飯，沿著通向場部的馬路，向場部大操場走去，那裡今晚放映露天電影。

那時正逢蘋果收穫季節，馬路左手，高高圍牆圈著的蘋果園，不斷向路人散發出果子的香味。

平時路過總要撿一塊石頭，向那沉甸甸的樹桿打去，掉在牆外的果子便是他的狩獵物，但此刻他抬頭看時，發現園內的果子剛被收掉，鬆了包袱的樹桿重新挺直了腰，馬路上稀稀落落掉了一地黃葉。

這時，跟來了兩個小夥子正向場部快步走去，看到孫明權在那裡發楞，便向他喊道：「孫明權，電影開映了，還站在這裡等誰呀？」孫明權沒有回答他們。他發現，那扇平時留給刑滿人員出入果園的小側門半掩著，推開門跨了進去。

天色黯淡，茂盛的蘋果園靜悄悄的。周圍果樹，果子剛被下完，樹下草叢中偶爾還露出半邊白而帶黃的「落果」。

他扒開草叢拾起一個來看，卻是爛掉半邊熟透的果子，砸爛被棄的果子東一個西一個藏在草叢裡，看樣子，因為時間匆忙來不及收拾「戰場」。

那側門大概也是匆忙中忘記了上鎖，於是他重新扒著草叢，一邊尋找，一邊在又大又黃的果子中挑選起來。這裡的蘋果都稱得上「極品」，果實不但香甜而且碩大，大的都在半斤以上。

沒花上十分鐘，他在草叢裡撿了六個「落果」，裝進褲包已鼓鼓的裝不下了。最後揀的兩個拿在手裡，正準備從那鐵門裡離開時，忽然背後果林深處傳來了女人的尖叫聲：「站住！」

孫明權縮回了腳轉身過去，那女人正從黃色大樓的方向向自己走來。他已經認出此人是場部的會計彭XX，在所有場部的女「幹部」中，這彭某一向以對兩類人員刻薄著稱，人稱「母老虎」。

此時她的腳上正拖著一雙拖鞋，好像吃過晚飯後剛洗過澡，上這兒來散步的。

孫明權停下了腳步，心中思量這女人究竟喊自己幹什麼？

那女人走近他，相距大約五公尺的距離，帶著訓斥口吻喝道：「誰叫你私自到果園來的？知不知道這兒是不准你們進來的。」

孫明權對這種訓斥非常反感，這片果園從栽種到管理，他都一手一腳參加了，這女人憑什麼不准我進來？

「你們這些賊性不改的傢伙進來偷什麼？把你偷的蘋果全部掏出來放在地上。」女人帶著輕蔑和侮辱的口氣命令孫明權。



孫明權木然的站在那裡，沒有聽從那女人的命令。面對著這個母老虎，此刻他還真沒有想出對付她的辦法，如此僵持了五分鐘。

「聽到沒有，把你偷的蘋果統統給我拿出來放在地上，你曉得偷一個蘋果罰多少錢麼？」女人繼續潑聲吼著。

「我沒有偷，園裡果子已經下完了，我路過這裡在草堆裡揀到的爛蘋果」。孫明權被逼開始申辯，口氣裡滿含著委曲。

「撿的？你上那兒去撿這麼大的蘋果？」女人指著他手裡拿著的水果尖聲喝斥道：「還有，你是怎麼進來的，從那兒翻的牆？」

「後院小門是開著的，我進來時看到蘋果已經下完了，才進來撿幾個落果。」孫明權一邊指著身後的小門，一邊將自己手中的蘋果向她遞了過去，說道：「你看，這果子是摔爛了的。」

「你敢頂嘴，你敢說不是偷的，今天人贓兩在，被我抓到你還敢狡賴？」女人暴躁起來，母老虎的威風抖露無餘。

面對這個蠻不講理的女人，孫明權有些激怒了，他站在那裡，滿面帶著怒色一動不動。

那女人伸過手去，抓他衣服中裝得漲鼓鼓的蘋果。眼明手快的孫明權盯準了那伸向他的手，迅速抓住它輕輕地向右一帶，順著那撲來的勢子，母老虎在出其不意中輕飄飄向前撲去，做了一個「狗搶屎」。

前腳向前一個趑趄，後腳上的拖鞋因跟不上她肥胖的身體，被摔在一邊。赤腳站起，這可是她沒有防備的。

當她站穩，狼狽地立在草地上後，立即發潑地尖聲狂吼道：「快抓賊！……你還敢打幹部！」氣急敗壞下，她滿臉通紅，語無倫次，先前的盛氣凌人迅速變成了狂怒。

兩個幹事聞聲從辦公室樓裡跑出來，那女人見援兵已到，越發發起橫來，一邊尖聲狂吼：「抓住他，抓住這賊兒子，這傢伙狗膽包天了，偷東西還要逞兇打起老娘來了！」一邊從地上撿起那只被甩掉的拖鞋，朝孫明權劈頭砍去。

孫明權此時像一個石頭人一樣，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任憑那潑婦用她的鞋在他的臉上括，鼻血立即沁了出來。女人仍不甘心，指揮從辦公室裡出來的人，把他扭送進了辦公大樓。

直到深夜，三個小時的電影散場後，孫明權的師傅郭賢才接到場部的通知，叫他到場部辦公大樓去「取」回自己的徒弟。

郭師傅接到孫明權時，他剛被鬆綁，遍體鱗傷。當著孫明權的面，那女人還著實教訓了郭師傅一頓，說他管理不嚴，徒弟出來偷蘋果打幹部還不知道。

少年因父母傷害而流落街頭所積鬱的恨，已在他年幼的心靈中深深埋下火種，他常說，來他家抄家人是一群虎狼，入獄後，非人的煉獄加深了這仇恨。

而今天他因幾個落果受到這女人這般侮辱，更使他感到活下的艱難，人們並不知道他內心的痛楚！但他卻因性格內向，忍受這新痛舊傷。

彭幹事對孫明權侮辱後，他依然和他的師傅一道，每天一大早，駕著推土機到正在修築的二號水庫大壩上，直到傍晚才帶著疲勞，為開回的拖拉機上油、保養。郭賢沒有察覺徒弟在想什麼？孫明權挨打的事，漸漸被人們淡忘了。

有一天，孫明權在工間休息時跑到炮工班去，並從那裡拿了十個雷管和一包炸藥，放到駕駛室裡。郭賢只皺了皺眉不解地嘀咕道：「要那玩藝兒幹什麼？炸魚麼？」孫明權趕緊附和道：「附近一個老鄉想到小金河去炸點魚要的。」

郭賢臉上掠過一絲狐疑，但他清楚這位徒弟的性格，多問了反而自討沒趣，看看徒弟正在忙著洗抹車身，也就信以為真，不再追問下去。

距「偷蘋果挨打」事件大約兩個月，這天下午，孫明權向他的師傅請假：說自己肚子疼了好幾天了，今天想到醫院開點藥，便離開了工地。

大約已五點多鐘，已到下班時間，辦公大樓裡的人開始向大門口走去。孫明權獨自一人蹲在大門右面，看見有人從裡面走出來，他也開始站起身來朝著左側的圍牆走。他邊走邊盯著從辦公大樓出來的人，那彭幹事的身影出現了。

孫明權等到那女人從自己的背後超過後，慢慢轉過身來，跟在她後面，走過拐角，迅速趕到她的前面，猛然一轉身指著她，大聲的吼道：「姓彭的，老子今天要跟你算總帳！」

說時遲那時快，孫明權將披著的工作服一掠開，露出穿著背心的身子來，那胸前密密麻麻的捆著十個雷管，頸項上吊著一包炸藥，左手捏著導火索，右手摸出打火機！

那女人猛然見到的，竟是兩個月前親自處罰的年輕人，面對著他的那一雙幾乎在燃燒的怒眼，這位平常向來把就業人員當成奴隸，想打就打想罵就罵的母老虎，早已魂不附體，心中明白這年輕人要幹什麼？連「你要幹什麼？」都沒有問出，臉色頓時蒼白，兩腿發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來。

她想喊，但因為突然的恐懼使她喊不出聲來，恐怖地盯著年輕人手裡的打火機。她知道，自己的性命已拽在小夥子搬動打火機的指頭上了，此刻她看清了這個年輕人，這被她騎在頭上拉屎拉尿的「下賤胚」！

對方的眼裡射出來的那種蔑視自己、仇恨自己的目光不但使她內心在顫抖，而且感到一陣深深的懊悔，雖然這種悔恨只是一瞬即逝的念頭。甚至於她想下跪，她想求饒，但是，已經太晚了，此時她所有的注意力，死死盯著那已經點燃的導火線，火向著那雷管燃去……

突然間，她拔腿就跑，然而哆嗦的兩腿怎麼也抬不起來。

隨著她一聲尖叫和絕望喊聲，轟然一聲巨響，在一股強大的氣流和火光中，雷管的碎片帶著那從孫明權身上撕下來的血和肉，向圍牆上，馬路上，以及探出牆來的果樹枝上，四面八方飛濺而去。

而那早已嚇得魂不附體的胖女人撲倒在地，周圍更遠處的行人有的被氣浪沖出幾步遠！強烈的爆炸聲淹沒了人們的驚叫和喊聲！。

十秒種後，硝煙慢慢散去，留在原來那個地方的是孫明權倒在血泊中的殘軀：他的胸膛全部炸空，他的五臟六腑帶著殷紅的血肉，重重地貼在那圍牆上，掛在樹枝上，灑落在馬路上……

唯有那頑強的頭顱以及那血肉模糊的臉上；那雙似乎永遠不會被征服的倔強大眼睛，還睜得大大的死死地盯著前方，好像正在檢查他的對手是否與他同歸於盡！！並向所有目擊者，控訴這女人對自己無緣無故的侮辱；傾訴出他長期積鬱在胸中的怨恨！！

兔子逼急了還咬人呢！他們把我們欺壓得太過份了。」有人在吼，

「只可惜孫明權沒有在辦公室下手，在那裡一條命少說也要賺他幾條！」有人在議論。

「死一個換一個，值得，孫明權真男人！」

男人們在人群中向死者翹起了大姆指。稱讚孫明權才是真正的漢子，孫明權終於用他年輕的生命作代價，出了他們心頭共同的惡氣！

女人們發出驚嘆和惋惜，稱讚著這個平時貌不驚人沈默寡言的年輕人。這是沈默了十年的鹽源農場數千就業人員，第一次表達他們同殘暴的獄吏同歸於盡的憤怒。

孫明權的名字，一定會記載在鹽源地方英雄史冊上，為後人所傳頌。

無論是男人和女人都對那母老虎發出了齊聲的咒罵，在議論中：「遭老天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惡人也有這樣的下場。」是共同的。

三分鐘後，場部警鈴大作，足有兩個班全副武裝的士兵，列隊跑步進入「出事」現場，他們用刺刀和警棍驅散著圍觀的人群！。頓時，救護車的長鳴，士兵的喝斥，警犬的狂吠，跑步聲亂作一團。

鄧揚光拿著一個喇叭，聲嘶力竭地向圍觀者吼道：「統統給我回去，這裡馬上戒嚴，不回去的統統給我抓起來。」然而，沒有幾個人理他。他的狂叫被淹沒在人們的鼎沸之中了。天空裡響起了槍聲！

又過了大約十分鐘，所有周圍的馬路通道，田坎上都佈滿了荷槍實彈的士兵，騷亂終於沒有發生，鄧揚光著實捏了一把汗！

第二天，郭師傅被抓進了小監，發生在場部的這樁樁驚天慘案迅速的傳遍了整個鹽源農場，也傳遍了鹽源縣城。

自從林彪事件以後，中國大地上瘋狂的「階級鬥爭」沉靜了片刻，這個農場當兵的打人風暫時收斂了一陣。林扯高也從農六隊調回場部，並取消了他的革委會副主任的頭銜。

不過，在群魔亂舞的年代，倒了一個林彪又接上一個更凶的江青，臭了王力、關鋒，又會鑽出遲群和梁效來，一群群的打手，一幫幫的小丑，走馬燈似的充當著專制主義的厲鬼。中國人已經在二十年裡見多了，只要毛澤東那老魔頭的靈位「大難不倒」，亂必會繼續下去。

獨裁者既將遮羞布徹底撕掉，便操起加緊鎮壓和分化兩把屠刀，對稍露頭的人民反抗會毫不客氣地與以剷除。「嚴打」運動一個接一個，所謂「思想」罪犯，當時是國家機器的主要打擊對象。

孫明權事件正好猛烈地觸動了當時鹽源農場當權派們的敏感神經。

孫明權事件的第二天，以「全體黨員和造反派，立即行動起來，擦亮眼睛，對敢於以身示法進行反革命報復破壞，和顛覆政權的反革命活動以迎頭痛擊」的巨幅橫幅；伴之以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誓把批林批孔鬥爭進行到底的時髦大字報，像一層層白色的網，覆蓋了鹽源農場的場部三角洲！各隊加強了警戒，打人風再度掀起。

不幾天，場部召開了「宣判大會」，孫明權被迫判為死刑。郭賢因此株連下獄嚴刑審訊。一批「言論」犯和越獄犯押上了刑場。各個隊都加緊了「搜尋兩類人員的反革命復辟活動」的「偵破、立案」工作。

說也奇怪，在如此凌厲的「紅色」恐怖中，從場部又傳來新聞，說自孫明權自殺後，凡路過那段馬路時，都會聽到那貼著他血肉的圍牆上，發出一種聲音來：倘若是場部的管教人員路過，會聽到「惡有惡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的吶喊，並夾著不知從那裡刮出來的陰風，煞是恐怖；倘若是勞教人員或流放者，那聲音會變成「我死而無憾，朋友記住替我報仇。」

這奇怪的傳聞活靈活現，又一次轟動了農場。

於是場部的幹部便親自督陣，從蔬菜組抽調了幾十個勞動力，用了整整一天，將那牆上和地上的血跡一片一片刮去，然而那很深很深的印跡，就像烙在那圍牆和馬路上，怎麼刮也是殷紅的；而那依稀可聞的聲音便一直沒有斷過。過路者在那裡可以側耳聆聽……

直到六年後，在我平反獲釋剛要離開這個農場時，我還特地去那兒向這位可敬的英雄道別，默默謹記他的囑託！！

## 第九章：地獄裡的火炬

一九七四年，林扯高以主管幹事的「頭銜」，重新回到了農六隊，與何慶雲一道，對六隊的幾個重點政治犯進行「嚴格管理」。

林扯高這一次「捲土重來」，還真有不少「進步」。也許在經過了一陣「折騰」後，他獲得了一些經驗教訓。這次回來，他已將過去那種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嘴臉收斂許多。

他集中精力，將矛頭對準「思想犯」，想從這裡撈到政治資本，實現他捲土重來的野心。他回到農六隊後，變得十分陰沈，而不像過去那樣動不動就大呼小叫和大打出手。

他的新「招」，便是收買犯人中的人品卑劣者。像劉資元、王世春、陳賢士這一類想通過告密立功的人，被他收進了網中。戴上一副關心他們前途的假面具，主動找他們談心，並許諾他們一旦有立功表現，立即整理材料，請功「減刑」。只要他們積極靠攏政府，受獎的可能性會多於馬文華、周學祝這一類公開的「狗」。

### 第一節：打李分站和三代會

林彪事件後，紅衛兵造反運動完成了「打倒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派」使命，退出了歷史舞臺。地方上的舊政權已由「革命委員會」接管。而「革委會」卻由兩個相互對立的「造反」組織組成。

在西昌地區，一個從文革中衝殺出來的群眾組織，名曰「打李分站」，是以打倒西南王李井泉而命名的；另一個組織，則是由工人、農民和軍代表聯合組成的「三代會」。兩大派別都打著「誓死保衛毛澤東」的旗號，絕對服從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號令」。

無論兩派怎麼標榜自己，都不會放棄對「權」的爭奪。他們因人事安排、物資分配、事件處理、機構調整等展開激烈的爭鬥，隨時可以「大打出手。」

#### （一）鬥

兩大對立派別的緊張對峙，其實都是毛澤東幕後操縱的皮影戲，被愚弄和相互殘殺的人們，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使全國人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

在和平年代裡，人們不去耕作織造，卻在「階級鬥爭」的毒焰中，睜大了血紅的眼睛，為所謂的「觀點」和「路線」，進行著你死我活的「殊死搏鬥」，甚至「壯烈」犧牲。夫婦、父子、兄弟概莫能外。

「打李分站」和「三代會」除繼續擴大各自的地盤、繼續武鬥。鹽源大街上出現了裝備精良的「毛澤東思想宣傳車」。為了防止對立的派別搗毀宣傳車，這些宣傳車還裝上了鋼甲，宣傳設備不光是一個高音喇叭和擴音器，還配有印刷機，沿街隨印隨發各種傳單。

傳單除「最新最高指示」外，主要是攻擊謾罵對方，或揭露對方核心人物的隱私。

以「戰地採訪」，「紅決」，「女民兵」刊出的文章，不但品味低俗，文理不通，且往往刊出某人的「隱私」，以招攬群眾。

有一陣子，某個國家元首送給毛一筐芒果，分散到全國各地展出。於是各地將這枚芒果奉為「聖物」，由「毛澤東思想宣傳車」載著這枚芒果，一路上披紅掛彩，敲鑼打鼓，浩浩蕩蕩地遊行。各地派專車組織隊伍隆重接送，演出了中國歷史上令人作嘔的鬧劇。

除了「毛澤東思想宣傳車」，「打李分站」和「三代會」還動用了飛機，從未見過飛機的鹽源人，突然聽到空中震耳欲聾的轟鳴聲，鑽出茅舍舉目仰望。孩子們驚奇的呼叫著：「看飛機！看飛機！」當飛機掠過低空時，從尾巴甩出了一串串傳單，凌空而降。

山民在滿山遍野搜索這些宣傳品，以為是「天書」或神符魔咒，後來，他們接觸得多了，也就見慣不驚了。

這些傳單也不斷出現在農六隊的山樑上，經在外居住的同難撿來，傳到我們的手中。

我們透過這些傳單，獲得許多資訊。如有關劉結挺、張茜挺的故事，如郭祥林在重慶的種種陰謀等等，才知道他們生活的極端荒淫無恥。

不過這些宣傳品，不像官方報紙那樣經過層層審查，幾乎看不到一點真實東西，這些傳單上記述著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事變，至少為我們提供了一睹中華大地上「文革喋血」掠影，對農六隊政治犯有特殊價值。

我們能從中分析出大飢荒後的大陸亂象，以及社會內部醞釀的危機。有助判斷這種局面還能支撐多久？

我記得有一份傳單記錄了重慶潘家坪武鬥的情況，將參加武鬥的派別、學校、學生人數、指揮者、動用的武器種類、雙方死亡的人數登載出來。

有一份傳單記錄了雅安激戰。看到「戰場實況」的照片，彷彿使人親臨了懵懂青少年橫屍街頭的慘景。

有一份記述某次造反組織在人民商場揪鬥「四川王」李井泉的專題報導，為李井泉陪鬥的是省長李大章，批鬥會現場是由成都各大院校紅衛兵佈置的。坐在批鬥會場前面的，是些上了年紀的農民老伯。

批鬥會開始，紅衛兵剛給李井泉戴上高帽子，準備拳腳相加讓其「端正態度」時，卻惹惱了站在前排的「農民伯伯」，他們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

成都本是二李經營多年的老巢，站在會場前排的「農民伯伯」原是二李帳下的走狗。當即警告說：「莫看李井泉這幾天走麥城，總有一天，『西南王』還得官復原職。到那時候，今天在這裡鬥過他的人有你好果子吃！」

這話果然有效，「農民伯伯」們立即擺出封建家長的威儀，當場訓斥主席臺上那幾個躍武揚威的毛娃子。四川人又多有說話帶把子的惡習，辱罵加上唾沫橫飛，年輕氣盛的紅衛兵，豈能容忍這幫「保皇派」侮辱，喝令把這些「保皇份子」扭出會場，於是升格為拳腳較量。

這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們事前已有了準備，一聲口哨，會場周圍幾百人立即一齊擁出，雙方大打出手，臺上台下亂成一團。

這可急壞了站在高凳子上的李大章，連呼「不要再打了」。殊不知鬧劇還沒有收場，急忙從北京「飛」過來的中央文革大員，匆匆趕到出事地點。

二李在混亂中，挨了不少的暗拳飛腳，臉部也掛了彩，惴惴不安連忙恭聽北京的仲裁。

這場混戰的罪魁禍首當然是李井泉。光是「挑動群眾鬥群眾」這條罪名，就夠這個平時飛揚跋扈的「西南王」吃不了兜著走了。「農民伯伯」雖是「來頭不小的人物」，但是李井泉除了乖乖地寫檢討認罪外，他還敢作什麼？

裝正神，唬惡鬼乃毛魔頭一生中最得意伎倆，這是中共在大陸舞台上自相傾軋中產生的長項，用來治國怎不一團糟？

讀罷這則頗具嘲弄意味的報導，我和張錫錕相對一笑。平時對老百姓作威作福的當權派，不過如此！

## （二）張錫錕

張錫錕原是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學生，他的身世和遭遇與我不同，他上北大的第二年，便碰上了大鳴大放。他講到譚天榮在北大學生論壇上的演講，對譚天榮膽識欽佩。但他又為譚天榮感到反感，說他演講到最後時，仍高呼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一九五七年劃定的「右派」根本就不存在，是毛澤東為達到他獨裁目的，憑空捏造的「犧牲品」，陰謀被他解嘲為「陽謀」。隨意坑害幼稚無知的學生，則證明他為達到獨裁，不擇手段肆意殘害無辜的秉性。以後，一廂情願發動大躍進，證明他並無治國能力。在造成對國家建設的嚴重破壞後，還堅持從史達林那裡學來的殘酷清黨伎倆，發動「文化大革命」，更顯示他政治上的危機和昏亂！

中共建政後，在史達林操縱下的苛政，害苦了大陸黎民百姓。從毛澤東折騰中，我倆對慘遭蹂躪大陸所達到完全一致的認識，使我們結下了深厚友誼！

學生時代我倆都成了毛澤東的「陽謀」犧牲品，不久進入監獄，他來到農六隊，便編在嚴管組中，成為當局重點監視的「反革命」要犯之一，由於相互隔離和周圍告密的耳目眾多，所以彼此一直沒有深談的機會。

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我在農三隊召開的加刑大會上公開聲明「決不改變自己政治道路的腳步」後，在瞭解到我和陳力在小監裡的種種事蹟，便產生了與我交往的願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系列瘋狂的批鬥打人會上，他也被列為被批鬥的對象。但是他的性格內向，一向沈默寡言，沒有在公開場合下拋頭露面，當時並未被當局十分「關注」。

陳力犧牲後，我們有一次在廁所裡單獨相遇，他主動向我傾述衷腸。

他說：「早就知道你和陳力的事蹟，很欽佩你們的眼光和膽識，大陸十分需要你們，我願在同獄方展開的鬥爭中成為你忠實朋友，希望你也把我當成你忠誠的朋友。」

接著說：「我想請問你，你與陳力相交多年，有沒有保留下他的遺著和遺言？我覺得，今後我們任何人只要活著出去，都有責任找到遇難者的家屬，告知烈士的死難經歷和他們的遺志。」

他這番話，使我很感動，在陳力犧牲以後，我終於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戰友，心中感覺鼓舞。但我遺憾地回答他：陳力被押送去鹽源看守所時，只留下過一篇名叫「評當今秦始皇」的雜文手稿，經過幾次監獄裡搜查，也被獄方搜去了。現在我沒有留下陳力生前的一紙一字。

每一次大搜查，獄方都要將我們所寫的隻言片紙通通搜光。所以，在我們這樣的環境下，只能用大腦去保存彼此的言行。

自那次互吐心聲後，他曾幾次建議，組織獄中的秘密社團。

但我認為中共通過嚴厲的思想控制，絞殺了所有反對思想，中共特務網路極其嚴密，使主張民主改革的黨派和個人，難於存在。

同全國其他監獄一樣，鹽源農場所關押的六千多名在押犯人，三千多名刑滿釋放人員，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關押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已所剩無幾。

大部份「反革命分子」是在飢餓逼迫下的自發反抗者，他們的知識，基本還是中共所灌輸的那一套。對自由、民主政治、人權保障相當懵懂，倘若在現在對他們就提出自由民主、人權平等、三權分立等政治主張，只能使他們瞠目結舌，不知所云。面對組織嚴密的中共政權，輕視幾十年的洗腦，忽視老百姓和我們在認識上的差距，必遭打擊。

毛澤東所劃定的五類份子，都是人為劃定的政治靶子，「五類」群體就像在中共貓爪下的一群耗子，它們並不存在一個共同目標，目前不會團結一心形成反抗力量，所以建立組織的時機還不成熟！

在沒有號召力很強的政治綱領，沒有切實可行的政治主張時，要達到思想的統一，形成組織是相當困難的。弄到不好，不但預期目的不能達到，反而會造成意外的犧牲。

但是，民不聊生是民主革命的催化劑，中共的倒行逆施，客觀上給民主運動開闢了前途。目前應集中精力宣傳民主思想，揭露獨裁政權的反動面目，至於建立組織，要特別謹慎行事！現在我們，一要團結有識之士，二要進行積極的啟蒙教育，為中國革命做準備。

林彪事件的巨大震撼，為毛賊東獨裁勢力敲響了覆滅的喪鐘。緊接著，孫明權一聲復仇的爆炸聲，促進了政治犯在政治上的聯合。在這種形勢下，一個爭取民主的綱領誕生了。

回顧我們所經歷的反抗歷程，是一個由自發到自覺的過程。一九六二年，我們這一群從四川各地流放到邊寨的囚奴，一開始就帶著反飢餓、反迫害、反奴役的火種。

三月十五日三元宮搶饅頭事件，是在連說句「我餓」都要遭到批鬥的年代發生的，面對刺刀我們喊出「不准剋扣我們的囚糧。」雖然這次反抗是自發的，但它是一次以群體對監獄秩序的否定，也是一次對暴政和槍桿子的挑戰。

在「文革」妖風初起、風雨如晦的時候，在農六隊的五月之夜，我們公開喊出打倒毛澤東，並喊出「天快亮了」的口號。在萬馬齊喑的沉悶大地上，以一種「以卵擊石」的姿態，向獨裁者表示對我們的藐視。

五月之夜，對毛澤東專制暴政的公開揭露和抨擊，使監獄當局異常恐慌。隨後，農六隊又刮起了對手無寸鐵的囚奴狂暴的打人鬥爭會，文字獄造成的恐怖暫時抑制了反飢餓、反奴役的怒火，但讓人們更看清了中共的殘暴本質。

反抗的火種已點燃，並以集體抗工、越獄、絕食、等形式與當局展開唇槍舌戰的鬥爭。使那些本來對當局還抱著幻想或猶豫不決的人們，逐漸發生轉變，他們中產生了堅定的反暴戰士。

## 第二節：舉起反抗的火炬

陳力犧牲後，農六隊的囚奴們並沒有被血腥的屠殺所嚇倒，對被暴打的流放者進行慰問，囚奴間一次握手，一口藥酒，一次療傷，一聲問候都帶著群體的溫暖。人們在反抗毛澤東獨裁暴政的旗幟下，越來越團結了。

當時正鬧地震，農六隊所有的囚奴們便集中住在地震棚裡，得到了更為便利的交流條件。

管教人員組織的學習，變成了張錫錕等人擺「龍門陣」的場地。在這些龍門陣裡，除談古論今、借古諷今之餘，還組織了集體越獄的探討。

大家已感到，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靠個人單槍匹馬的同獄吏們幹了。組織起來向施暴者進行抵抗，在幾個堅定份子中醞釀。為了爭取更多的人投入到反暴鬥爭，要求中堅份子具備機智和勇敢的人格魅力。

一九七五年秋天，一期由張錫錕、劉順森、夏光然等人主筆，命名為「火炬」的刊物，以手抄形式，在農六隊問世了。

《火炬》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告農六隊全體流放者書」。它以回憶的形式，列舉了文革十年來在農六隊發生的一樁樁暴虐血案。

列舉了當局對流放者殘酷的折磨奴役的事實，讓大家直接面對自己悲慘的處境，摧醒那些習慣於麻痺、沈默、逆來順受的人們，呼喚大家團結起來，奮起反抗！

《火炬》以大家親身經歷的飢寒交迫，揭示毛澤東獨裁暴政給大陸人民帶來的苦難。

《火炬》以獄吏們的殘暴為例子，揭穿當局所謂「革命人道主義」的虛偽。一再提醒大家，不要上鄧揚光等人花言巧語的當，做出親痛仇快的蠢事。

《火炬》以林彪事件為例，說明中共上層不可避免的正在互鬥中走向滅亡，曙光正在升起！

《火炬》是農六隊的血性男兒在高牆下的振臂高呼，是烈士們在就義時發出的吶喊，是所有被壓迫的奴隸鬱積在心底的血淚控訴。

《火炬》以「民主必將戰勝專制，光明就在眼前」相號召，結束了整個版面。

高舉火炬的人們十分明白，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大的可能便是「以卵擊石」。他們懷抱著「哪怕燃燒自己的生命，也要放出耀眼光芒」的精神。寧可站著死，不要跪著生。

一張小小的啟蒙性刊物，點燃了人們的反抗火種，這是面對黑洞洞的槍口豁出命來的壯舉，是推翻專制暴政拯救人民拚拼死一搏吹響的衝鋒號。

伴隨著《火炬》的誕生，一場正義與邪惡、罪惡與善良、人性與獸性的搏鬥，也在農六隊展開了。

就像電影《大浪淘沙》所描寫的那樣，在大革命洪流中，人分流成三種：一種是能在混亂中看準光明前景，成為社會進步的中流砥柱；一種是不辨方向，自願當了渾渾噩噩的中間份子；第三種是屈服於邪惡勢力，最終成為叛徒。

這裡所說的叛徒，並不是公開身份的「紅毛犯人」。例如馬文華，周學祝、代朝謀等，姑且用「糊塗」來概括他們。

因為他們的身分是「公開」的，至少還保持著一種「坦白」的東西，容易應對

唯有那些平時振振有詞的怒斥暴政，聲色俱厲的反對毛澤東獨裁，反對流放者悲慘處境比任何人都喊得響，對獨裁政治抨擊最為「激烈」，以搏取同難信任，背地卻出賣他人的才是最可怕的佞鬼。

張錫錕低估了叛徒的無恥。這份初生的刊物的首批讀者中，就有這種佞鬼。

### 第三節：猶大們

當滿腔熱血的勇士剛剛在地獄裡舉起《火炬》時，一筆出賣他們的骯髒交易，也悄然開始了。在我敘述這個悲劇之前，先介紹一下四個出賣靈魂的叛徒——陳賢士，劉資元，王世春，黃學全。

陳賢士，時年二十六歲。我並不清楚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只知道他多次因越獄，從其他隊弄到六隊來的。一來就編入嚴管組，同張錫錕編在一個組裡。

他來六隊的最初幾天，對當局憤怒和反抗溢於言表。然而，調六隊來的人，隨時都要準備接受大刑侍候。尤其像陳賢士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爬蟲，老管們自不會輕饒他。他一來六隊，嘗了幾次辣子湯還罵不絕口，頗像一條「反改造」的好漢。

在小組會上他自我介紹說：捕前是重慶某工廠工人，家庭出身屬於「紅五類」，文革以後，當了造反派的小頭目，一九七一年在指揮派系戒鬥中負了「血債」，後來被「稀哩糊塗」判了刑。

用陳賢士自己的話說：「我雖然只有小學文化，但一直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造反中殺了幾個走資派，本來就是革命的需要。把我抓來判刑，一定是法院的路線錯誤。」陳賢士的輕狂癡迷，說明毛氏邪教的毒液已浸透了他的骨髓。這種人入獄後，豈能安心熬過煉獄？

林扯高看過他的檔案後，便將他收入告密組中。

從那以後，他幾次同老管發生衝突，都是林扯高幫他解的圍。還給了他一個嚴管組「組長」的頭銜。

有一天晚上，林扯高把陳賢士單獨叫到辦公室去，簡單的問訊以後，便轉到正題：「你的出身與一般犯人大不相同，我也知道你是忠於毛主席的，犯了錯誤弄到監獄來，心裡很不服氣。但是你想過沒有，勞改隊裡硬抗政府，只能把繩子越套越緊。想儘快的出去的話，還得自己去創造立功的條件。」

林扯高一面說話，一面注意觀察陳賢士的表情，看到陳賢士並沒有領會他的意圖。便繼續開導他說：「關在六隊的人，都是一些極端仇視共產黨的反革命。他們現在每天都在進行反革命活動。現在是黨考驗你的時候了。看你是站在反動的立場上？還是當機立斷，與他們劃清界線爭取立功？」

陳賢士抬起頭來，好像若有所思。林扯高提高了嗓門繼續向陳賢士指點迷津：「根據我們現在掌握的情況，你們組的張錫錕等人現在活動頻繁。如果你能抓住他們的反革命活動證據，及時向我報告，我可以向你保證，只要你能立功，我可以整理材料上報，給你記功減刑，甚至提前釋放」。

聽到這裡，陳賢士的眼睛亮了。他同林扯高原是一條戰壕裡的「兄弟」。只因為打死了人，才關入監獄，此時兩人一拍即合。

林扯高隨即取出一瓶白酒來。兩人滿斟共飲，酒勁漸漸上來，林扯高藉著上沖的酒興，開始發洩出他內心的憤懣來：「老子還真他媽受一幫老保的高囊氣，何慶雲算個啥？六隊那麼多攻擊毛主席的言論，他都當作耳邊風，還要騎在老子的頭上說三道四。自己治不了犯人，卻想治老子，老子今天幹出點名堂來，抓幾個死心塌地的反革命，讓人看看，是我林高明管用，還是你何慶雲管用。」

「來，碰個杯，你發現問題後，作好記錄，我作好審訊準備。咱倆在農六隊抓幾個像樣的案子出來。看看是我林高明厲害，還是你何慶雲厲害。」林扯高端起酒杯向陳賢士的杯子一碰，便一飲而盡。陳賢士只好恭恭敬敬地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自從那天晚上兩人密謀後，便狼狽為奸，一明一暗，裡應外合，撒下了一張罪惡的大「網」。

從此以後，陳賢士便眯縫著他那對賊眼，豎起了長長的耳朵，緊張地盯著這農六隊的兩百號囚犯，然而，陳賢士始終沒有搜尋到《火炬》的痕跡。

伏在牆角裡讀書寫字的夏光然，已多次敏銳地察覺到陳賢士的那雙賊溜溜的眼睛，並告訴了張錫錕，使陳賢士很快失出了跟蹤目標。



陳賢士借生病臥床的機會，偷偷翻查了張錫錕所寫的廢紙片，全是些唐詩宋詞，或是一些從字貼上臨摹下來的書法，還有一些「打李分站」散發的「宣傳品」。無論陳賢士怎樣尖著耳朵竊聽，可除了聽到半罐玉米粬軟硬和白菜鹹淡之類的議論外，便一無所獲。

劉順森在地震棚裡擺開了評書攤，向圍聚的流放者活靈活現的講演杜月笙與范紹增結下莫逆之交的故事。

對於杜月笙，陳賢士聽說過。范紹增是誰？陳賢士把聽到的東西向林扯高密報。兩個半文盲想了老半天，也鬧不清劉順森講的是什麼暗語？

兩個狂妄自負傢伙，知識卻貧乏得可憐。後來陳賢士繼續的去監聽劉順森擺的龍門陣，上海灘，上海灘！劉順森講的黃金榮遭綁架，杜月笙結拜戴笠，全是些從來沒聽過的故事，未免使他失望起來。

於是他又伸出他的長鼻子，在床底下東聞西嗅。那裡是一小袋大米之類的東西。就這樣，陳賢士緊張搜索了兩個星期，依然一無所獲。

在林扯高所召集的不定期碰頭會上，一無收穫的陳賢士，灰溜溜地耷拉著腦袋，這次林扯高對他黑著臉，心裡便有些慌張。讓陳賢士奇怪的是，辦公室裡卻增添了兩個新成員。

一個名叫劉資元，四十多歲，此人平時極少說話，顯得城府極深，農六隊建立之初，劉資元因策劃了幾次越獄，事情敗露，當局便將他當成重大政治犯關進了嚴管組，可以算得上「嚴管組」建立以來的「元老」。

文革以後，劉資元依然「反心」不死，獄方得到檢舉，證明他多次在獄中煽動他人「鬧監」，所以一直被監獄當局認定是「重點監督對象」之一。

文革初期，被推上批鬥臺上的便有劉資元，理所當然，劉資元也成為陳賢士監督告密的對象。

劉資元平時沈默寡言，在詩畫上頗下功夫。一有空就鋪開紙硯，細細地臨摹顏字貼。陳賢士總覺得他筆下潛伏著某種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劉資元也成為陳賢士搜查的重點。

陳賢士意外的搜到劉資元用隸書抄寫葉挺的斷頭詩，便拿來向林扯高告密。想不到，竟碰上劉資元也在坐。

同來開會的另一個人叫王世春，更出乎於他的意料。一來六隊，陳賢士便知道王世春是出了名的反改造分子。聽說王世春在國民黨軍隊裡服過役，「解放」那年，王世春才二十歲。「解放」以後，背著國民黨軍警憲特的皮，成為歷次運動清算的「歷史反革命」。

論出身，準確的說，王世春不過是一個「學生」。在大飢餓年代，收聽了臺灣的廣播，進行過外逃的嘗試。案發後，中共對他新老帳一起清算，重重地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入獄不久，王世春就結識了文廷才、劉順森等人，並一起從重慶發配到甘洛。以王世春受盡酷刑折磨的苦難經歷，本不會對共產黨產生任何的幻想。但王世春的性格軟弱，嚇破了膽，害了軟骨病，被中共用暴力征服。

為博取同難們的開心哄笑，他常迎合大家發表異論。他擅長火上澆油，懂得見風使舵。常策動別人幹頂風冒險的事，一旦事態擴大，當局追查，他便馬上抽身而去。所以，王世春在六隊得了一個「老蝙蝠」的綽號。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雅安三元宮的「搶饅頭」事件，當時站在鄧自新後面的王世春，一再慫恿鄧自新下手：

「別看你平時那麼來勁，饅頭擺在你面前，你卻不敢拿了。」鄧自新性格剛烈，在飢餓刺激下，怎經得起王世春的激將法，便第一個去籬筐裡抓饅頭！

釀成這場騷亂後，追究誰先帶頭時，王世春卻不吭一聲。結果幾個搶饅頭的人都沒有逃脫加刑的處理。為首的鄧自新加刑十二年，而在背後慫恿的王世春卻安然無恙。

六隊成立以後，累次發生逃跑、鬧監、頂撞老管、集體怠工事件，都有王世春的影子。但他每次都逃過了追查。嗅覺靈敏的何慶雲，發現他常常扮演背後教唆角色。「老蝙蝠」的綽號，就是何慶雲所贈。

有一天，何慶雲終於抓住了王世春「王氏膏藥」的笑話，說將「毛主席語錄」燒成灰和酒服下，男人補氣壯陽，孕婦保胎安神，包醫百病，神奇無比。

王氏膏藥的笑話將他推上了六八年的批鬥會上，以「惡毒誣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連續的鬥了他一個星期。他在打手的暴打之下，認罪告饒不迭，甚至跪在地上苦苦認錯。

被打得遍體鱗傷的王世春，還要照常下地勞動，批鬥會以後，何慶雲一不做二不休，整理他的材料，將他加刑五年，合併二十年。不但讓這個「老蝙蝠」受盡了皮肉之苦，也觸及了靈魂。

王世春曾是陳力的「好友」和崇拜者。陳力慷慨就義後，六隊院壩裡發生的樁樁血案，把王世春嚇倒了。在生死抉擇的面前，王世春走上了另一個極端！

在這次「告密會」上，陳賢士看到，擺在林扯高辦公桌上的，是一張被揉得很皺並被撕成幾片後再拼貼好的一張紙。

陳賢士眯縫著眼睛盯去，那紙上寫的標題是「告農六隊全體苦難同胞書」。認得出這是張錫錕的筆跡。陳賢士的心中一驚，他苦苦搜尋的東西，竟被他監視的人提供了出來。

三個人心態各不相同，相互冷冷對視了一下。王世春和劉資元，一個是怕見陽光的老蝙蝠，一個是城府很深的老油子，兩人都清楚，此舉叫做「出賣難友，認賊作父」，是獄中難友最嫉恨的卑鄙行為。一旦被發現，就別想在監獄中平靜混下去。兩人作出這種叛賣行為，確實經過了一番思想鬥爭。

林扯高今年三十歲，從他投入「革命」起，為了追逐權力，整整奮鬥拼搏了十年，才坐上農場革委會副主任的寶座。不料風雲變幻，林彪事件之後，他馬上被人拽了下來。後來經過一段韜晦陰暗的日子，經過一番奮鬥後，才坐到今天的位置上。

經過一番的冷落和挫折後，林扯高再也沒有初出江湖的盲目高傲和自信。而是面對現實，打算一步一步的做出成績來，把何慶雲趕下臺，然後步步高升！

林扯高重回六隊以後，便依靠場部的舊勢力，把競爭目標對準革委會「準」一把手的何慶雲，對準那個把他踢下來的人，一是報奪權之恨，二是為自己往上爬掃清障礙。林扯高搞出一個「重大反革命案件」，來回敬這個「鄉巴佬」，把他「打」下去！

現在，林扯高見面前三人一言不發，指著桌上的那張紙嚴肅地說道：「六隊的情況，你們比我清楚。今天拿到的證據證明，一個人數眾多、組織嚴密，名字叫『火炬』的反革命集團，一直在農六隊進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動。

他們把矛頭直指我們全國人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號召被打倒的資產階級反動派，起來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目前竟然發展到在獄中公開出版反革命刊物的地步。這個極為罕見的案例，說明農六隊在過去抓階級鬥爭不力。執行的是資產階級路線，給了階級敵人以可乘之機！」。

說到這裡，林扯高的情緒亢奮起來。陳賢士的積極性也被迅速調動了起來，而劉資元仍像當初那樣，臉像一潭死水，不置可否，毫無表情。而王世春則轉動著滴溜溜的眼珠子，好像在打什麼主意。

停頓了片刻，林扯高繼續提高了嗓門說道：「你們已經拿到了重要的證據，這很好，破獲農六隊多年存在重大反革命集團案，已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正在整理材料，給劉資元，王世春記功減刑，但這還僅僅是開始。因為農六隊的反革命集團案件，絕不可能只是張錫錕一個人，而是涉及到農六隊相當一批人。」

三個叛徒中，除了陳賢士聽得眉飛色舞外，其他兩個人如同醃茄子一般，一直苦著冷冰冰的臉。

無論是劉資元還是王世春，他們都非常清楚，被他們告密的《火炬》廢稿，充其量只是揭露監獄的黑暗罷了。一個反革命集團連綱領都沒有，怎麼立案？

然而，自從劉資元和王世春二人被林扯高「召見」以後，農六隊本來就繃緊的神經，就更緊張起來。

張錫錕們因遺失了一篇草稿，便注意到有人對自己盯得特別緊，平時上廁所，都有人腳跟腳的跟進來。每一次練書法，都會有一束詭秘的眼光從遠處射來。

我素有匍伏在鋪位上作讀書筆記的習慣。有一天下午下雨沒有出工。我按照老習慣正在記錄尚書《禹貢》篇中大禹治水的記敘。因為古文基礎差，資料又來之不易，我除用心的讀，一面翻著一本破舊的辭典。

突然何慶雲一頭撞進了監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將我寫的筆記本搶去。接著站在監門口細細閱讀起來。直到看清楚全是尚書原文的摘引，才將筆記本慢騰騰的還給我。

何慶雲的這一反常舉動，立刻引起了「火炬」撰稿人的戒備。但直到此時，張錫錕還不知道失蹤的廢稿，已經被王世春交到隊部去了。

《火炬》就這樣在刀尖上誕生了。從創刊號開始，一直在獄中秘密傳看。火炬廢稿失蹤，使張錫錕警覺起來。因為張錫錕等人對劉資元和王世春嚴加防範，所以林扯高再也沒有得到《火炬》的蹤跡，但另一隻黑手正向它伸了過來！

一九七三年，張錫錕的童稚之交黃學全，因為接連越獄被關進了小監。關進小監的第二天晚上，黃學全竟掀開了小監的房頂再次出逃，開了從小監房頂上越獄的先例，也創下了三個月內連續逃亡五次的新記錄。他被抓回來以後，免不了一頓毒打，並給他戴上了一副足有十五公斤重的死囚腳鐐。

按照管教科的意見，想借這次「雙打運動」把他槍斃以儆效尤算了。

處決黃學全的意見落到林扯高手裡。林扯高在查閱黃學全的檔案時，發現他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一個工人。因為「收聽敵臺，試圖叛國投敵」被判刑。而這一次抓回來的審訊記錄只是逃跑。

林扯高提出，共產黨人在處死任何一個工人階級時，都要萬分慎重，因為這與階級鬥爭的教義相抵觸，儘管他也知道黨內鬥爭是你死我活的，但他畢竟太嫩，未曾掌握遊戲規則，例如對何慶雲不知如何下手，才能拔掉這眼中釘。

眼下只能在管教工作上做文章，現在，他決定把黃學全招來問一下，問他既出身工人階級，為什麼要與共產黨對抗？既然犯了罪，又不安心服刑，而是一而再的帶罪潛逃？

但是黃學全卻沈默著，好像對於這個問題，他根本就沒有去想過一樣。

「你犯什麼罪？」林扯高在明知故問。

「收聽敵臺，試圖叛國投敵」。黃學全回答得很遲鈍，也很勉強。

「收聽敵臺」確有其事，但「叛國投敵」他壓根連想都沒有想過，他一直都沒有弄明白，法院為什麼把這個罪名劃到自己頭上。

文革期間，這種案例極為頻繁，林扯高見多了這種案例，他想弄明白這些「罪犯」是怎麼想的。於是繼續問道：「說說你的想法」。

黃學全再次陷入沈默，對於這種令他極難說清的問題，他一直回避著。當時是怎麼想的呢？自己是工廠的電工，電晶體剛剛在中國問世時，他對這門技術特別感興趣，憑著自己的愛好和摸索，居然成了全廠的電晶體專家。在廠裡，無論那家的收音機壞了，都要找他修理。

既然幫人修理收音機，那麼調試電波頻率便是一個工作方式，為校正頻率，他只好將收音機對準「美國之音」頻段上，裡面傳出來大陸的真實消息，很自然地吸引了他，這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通篇假話迥然不同，長久地收聽，使他產生奔向自由的幻想，但作為一個普通工人，豈能逃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魔掌？

文革一開始，黃學全在「試一試」的支配下，按美國之音提供的通訊地址發出了一封信。這是一封投石問路的信，可他萬萬沒有料到，他這封普通信件，竟給他帶來了一場橫禍。

不久，黃學全便結了婚，蜜月後，忽然有一天，工廠的保衛科接到一張法院的傳票。

就這樣，黃學全毫無思想準備，就被拘留並被逮捕，接著被稀里哩糊塗的判了刑，直到他知道再也回不了家，他才開始後悔起來。

剛判刑不久，結婚還不到一年的嬌妻便提出分手，黃學全十分「著急」，這些後果他並沒有想過，不知該如何面對。

入獄開始階段，黃學全像曹季賢一樣，只知道說一句話——「放我回家」。

他是一九六八年才從成都監獄發配到鹽源的，因為是「叛國投敵罪」，刑期是十五年，所以很快地將他轉到了六隊，在這裡，黃學全碰到了他在成都的鄰居張錫錕。

監獄裡的高強度勞役和飢餓折磨，使黃學全無法承受，加上對嬌妻的懷念，他最直接的主意便是「逃」出去，日思夜想的嬌妻使他心裡只有一個「逃」字，彷彿只有逃，才是解脫痛苦的唯一出路。

來六隊才三個年頭，累計逃亡的次數已達幾十次。而每一次的出逃，除了一頓毒打之外，依然沒有逃掉勞役和壓迫。

黃學全的頻繁逃亡，倘若落到任何一個政治犯的頭上，早已是身首異處了，在文革中被槍殺的政治犯，逃亡者占很大比例，蔣正君一案，就殺了五個人。每一次「嚴打」運動，總有幾個出逃的反革命犯被殺害。

僅僅因為他的盲目和幼稚，並不帶任何政治目的，所以才到今天沒有被處死。

黃學全帶上重鐐後，何慶雲一臉陰沈地警告他，「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會寬大無邊，你已經逃了二十多次了，我看只有一顆『花生米』，才能解決你『的確涼思想』。」（所謂「花生米」，這裡特指子彈。因為子彈與花生米顏色和大小相近，中國民間常把子彈俗稱為花生米。所謂「的確涼思想」，是指在追捕逃犯過程中，雙方快速奔跑，產生很大的風力，使人感到涼爽，故名「的確涼思想」。）

黃學全被林扯高叫去，心中不免感到緊張：「這一次是要殺我麼？是殺我前的問話麼？」

黃學全進了林扯高的辦公室，林扯高突然問道：「你同張錫錕是鄰居嗎？」

對於這個與處死他毫不相干的提問，黃學全淡淡的回答「是」後，就一疊聲的哀求道：「我不想死，我還年輕，我希望政府給我最後一次機會，我要悔改……」

林扯高看破他內心的緊張所在，告訴了他一個驚人決定：「經隊部過研究決定，最後再給你一次機會。從明天開始，下掉你的腳鐐，把你放到嚴管二組去勞動，若再逃跑，你的死期就到了。若有立功的表現，我們可以根據你的表現，對你寬大處理，甚至於釋放你。所以你的命運，就在你一念之間，完全由你自己掌握。」

黃學全眼睛一亮，這是他這段時間裡日夜盼望的東西。但他隨即便陷入了沉思，一想到那漫長刑期，沉重的苦役……這十五年怎麼熬過去？

林扯高繼續說：「六隊的情況非常複雜，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張錫錕正在出版一個《火炬》地下刊物，如果你能提供線索，甚至於拿到證據，我包你減刑，你明白麼？」

黃學全睜大了眼睛，既驚喜又疑慮，他簡直不敢相信那對準自己腦袋的槍口，就這麼輕輕地挪開了，但隨即明白，林扯高所說的出路，是要出賣他人才能換到，且要出賣在街巷裡一起長大的張錫錕。

張錫錕雖比黃學全年長幾歲，但兩人從小親密無間，加上兩人的母親又十分要好，兩家一直是和睦相處的要好鄰居。自從兩人身陷囹圄後，兩個老姐妹便「同病相憐」、相依相伴相安慰了。黃學全來不及細想，起身走出林扯高辦公室，當他跨出林扯高的辦公室時，才感到腳鐐下得並不輕鬆，如果真那樣做了，下掉了腳鐐，卻換上了一副沉重的良心枷鎖。

那天晚上，黃學全一直在小監裡苦苦思索，久久不能入睡，第二遍查房後，他索性坐了起來……長時間的靠牆坐著，門外的查哨人也再不像過去那樣橫蠻干涉他。

第二天一大早，沈官科便在一名士兵的押解下，拿著幸子和二錘來為他打開十五公斤重的腳鐐，重鐐去掉後，雙腳顯得輕飄飄的。他跟著林扯高走進了嚴管二組，陳賢士用異樣的眼光盯著他。

三個月前，黃學全便是從這個組逃跑的，抓回來那天，陳賢士用自己腰間的皮帶，像抽打牲畜一樣足足抽了他幾十下，至今在他的肩上還留著那次皮帶抽打的血印，他狠狠地瞪了陳賢士一眼。

從小監出來，黃學全心情並不輕鬆。他不知道是堅持「逃」呢？還是聽林扯高的「忠告」，從此收心？並按照林扯高給他指明的道路去走？他整天心事重重。

敏感的張錫錕已經注意到黃學全心緒「不佳」。可他並不知道此時的黃學全已對他構成了嚴重的生命威脅。

為了幫助這個兒時的小夥伴從苦悶中解脫出來，張錫錕想把火炬傳遞給他，讓他看清當局的黑暗和自己該爭取的前途，但是夏光然卻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夏光然認為，火炬剛剛問世，種種跡象表明，已經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所以目前的讀者必需是對當局不抱絲毫幻想的人。而黃學全本人思想極不成熟，他的「慣逃」純粹屬於個人瞎撞，不帶任何政治目的。且平時與火炬成員說不到一塊。

同時獄方不明不白地去掉他的腳鐐，還把他從小監釋放出來，其中必有蹊蹺，在沒有弄清原因之前，應當慎重，等到把情況摸清楚，證明他是可以團結和信賴的人以後，再向他傳閱也不遲。

可惜，張錫錕並沒有聽取夏光然的忠告。

為了《火炬》在傳閱中出現變故和意外時迅速切斷聯繫，以保護火炬成員的安全，大家規定，火炬的傳閱必須「單線」進行，接讀火炬的人，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將「火炬」送回給他的人，而不能私自另傳。

當張錫錕從菜蔬組收回「火炬」以後，便鄭重地當面傳給了黃學全，並且約定第二天必須親自還給他。

黃學全沒有想到，《火炬》竟輕而易舉地落到了自己手裡，第二天早上，黃學全蹲在廁所裡偷偷地讀完這份地下刊物後，反而猶豫起來。

首先，黃學全不明白這份「材料」有什麼特殊價值，裡面所講的都是真話。同時想到張錫錕是自己的童稚好友，對張的人品才華頗為敬重，出賣一個好人，在良心上過意不去。何況這林扯高是行騙慣了的人，即便交給他，未必會兌現他的「減刑」承諾。

但黃學全轉而又想，機會到了自己手上，白白放過，豈不可惜？林扯高既已講明瞭條件，總可以試試，想來想去，黃學全一時拿不定主意，便蹲在廁所裡面緊張思考起來。

張錫錕可是給自己規定了時間，他必需立即作出決斷。

正在猶疑不定的時候，劉資元突然地撞了進來，黃學全對於平時極少說話，為人陰沈的劉資元，也是十分敬佩的，他常看到劉資元在慫恿其他年輕人同管教人員頂撞時，而自己不露聲色，現在遇到這事不妨向他討教。

於是黃學全把「火炬」遞給了劉資元，並悄聲問他怎麼辦？正在這時，壩子裡正在催促出工，劉資元便接過「火炬」藏進衣兜，兩人匆匆離開了廁所。

劉資元讀完這份刊物後，如獲至寶。苦苦跟蹤幾個月的「火炬」，竟然這麼輕鬆就拿到了手，那上面登載的，至少是四個人寫的文章，但每一篇文章都沒有落上作者的名字，全是一個人的手跡，他知道是張錫錕的手跡，劉資元感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自己已經走出了第一步，只能一步步走下去了。

他本想立即把它交給林扯高，但迅速又改變了主意，手裡這份「火炬」同前面那篇撕碎了的「告六隊全體同難書」，只能提供張錫錕一個人的證據，而林扯高的意圖是以張錫錕為缺口，挖出潛藏在農六隊中的「反革命集團」，單憑這份「火炬」，不但達不到這個要求，還會打草驚蛇，讓已經獲得的線索全部斷掉。

劉資元主意拿定，迅速回到監舍，將「火炬」塞還給黃學全，並囑他必須按照張錫錕規定的時間將火炬歸還給他。

林扯高極為讚賞劉資元的「放長線釣大魚」處理方法：「現在，火炬已經露面，當務之急是抓住其他撰稿人，務必一網打盡。」

林扯高召集劉資元、王世春、陳賢士和黃學全一起碰頭，極力誇獎了劉資元和黃學全，盛讚劉資元的「機智」。一面向他們交代待要做的幾件事：除了火炬的撰寫人外，還要弄清傳遞者，弄清組織綱領，千方百計抓一個「現場」，繳獲全部證據。

一張由敗類們拉開的網，就這樣不露聲色的向張錫錕們圍了過來，然而，拉網的幾條狗卻各懷鬼胎。

陳賢士無疑是積極性是最高的一個，可惜他卻是個低能兒。本案已發展到了這種地步，在林扯高的記錄中，他基本上沒有任何作為，但由於林扯高的偏愛，卻將整個任務交给了他。其中包括對劉資元和王世春的「監督」。

而劉資元最看不起陳賢士，對他參與進來極為反感。

王世春是最瞭解張錫錕底細的人，對林扯高尚且看不起，也決不會把陳賢士放在眼裡。他憑直覺知道，「火炬」在哪些人中傳閱，不過，那只是猜測，並無證據。所以他不願向陳賢士透露，甚至不願向林扯高透露。

黃學全是四個人中最懵懂的一個，事前無任何蓄謀，事後也不知道怎樣幹。僅憑林扯高莫名其妙寬大保住了性命，又在無意之中輕易的得到了「火炬」，可又失之交臂。因拿不定主意而傳給他人，黃學全還來不及品出「立功」的價值，「頭功」卻被劉資元奪去了。

因為與張錫錕童稚的友情，黃學全是最容易從張錫錕的口裡掏出「火炬」成員的人。但對陳賢士一直抱著深深的敵意，不想在這骯髒的交易中與他「合作」，偏偏林扯高卻規定他必須服從陳賢士的調遣。黃學全與王世春也抱著河水不犯井水的態度。

四個猶大在破獲「火炬」重案中，處在奇怪的關係中！

陳賢士身上揣著一個筆記本，成天盯著張錫錕，用心的記下同他來往的其他人員，記下接觸的地點和時間，張錫錕幾次進廁所，他便尾隨跟進去，想現場抓證據，都落了空。

嚴管組出工，一路上都有槍桿子押著，所以，若要傳遞《火炬》，一般都是在廁所進行。

出工以後，張錫錕的鋪位被秘密的搜查了好幾次，收穫都等於零，連原先已經浮出水面的刊物，也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 第四節：一一·八門智鬥勇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上午，這一天正是星期天，天空中烏雲密布，北風呼嘯，天氣特別寒冷。吃過早飯以後，所有的流放者都捲縮在各自的鋪位上，拿出針線縫補自己的破爛棉衣。院壩裡只有一兩個人在走動，陳賢士此時正拿著一本「紅旗」雜誌，坐在靠窗的鋪位上假裝看書，將自己的臉虛掩著，一雙賊眼卻盯著院壩裡。

九點鐘光景，嚴管一組的周志出現在二組的門口，他向坐在中間位置的張錫錕遞了一個眼色，張錫錕正在鋪位上抄寫《中國政治思想史》，似乎並沒有理會他。

周志慢慢地離開了門口，向廁所方向緩緩地走去。約莫一刻鐘以後，張錫錕才慢騰騰地爬下了床，若無其事向廁所走去。

看到張錫錕這一行動，陳賢士迅速向黃學全發出了暗號，黃學全跟著走進了廁所。此時，暗角的蔡先祿也迅速地下了鋪位，怪聲怪氣呼喊報告向張錫錕警告。陳賢士卻先下了床，逕直向隊部辦公室走去。

##### （一）被抓

這一天，周志將《火炬》看完，按張錫錕的規定，準備在廁所當面歸還。正當周志取出「火炬」交還張錫錕時，黃學全已跨進廁所。張錫錕正將火炬和一卷撿回來的「傳單」往棉衣裡塞，見黃學全進來，遲疑了一會。直到聽見蔡先祿高聲呼喊報告的聲音，便覺得情況不對。

周志在廁所轉角連忙將頭探出廁所外，看見院子裡林扯高正疾步向廁所走來，失聲叫道：「不好」，便立即返身同張錫錕一道，拚拼命的將火炬撒成碎片，並往嘴裡塞。

廁所外已響起急促的腳步聲，林扯高已飛步跨入廁所。此時，黃學全已站了起來，阻止正在吞嚼「火炬」紙片的張錫錕。兩個人立即扭成一團。

一場靈魂的搏鬥終於打響了。

跑進廁所的林扯高狂喊一聲，向張錫錕撲去。頓時，廁所裡的林扯高，陳賢士、黃學全同張錫錕、周志五個人扭打在一起。一方是拚拼命的撕碎和銷毀「火炬」，一方則拚拼命的從張錫錕和周志的手裡去搶奪塞向嘴裡的碎片。

此時，崗哨上的警鈴大作，何慶雲帶著兩名士兵迅速趕到，並且封鎖了廁所，院壩內站滿了流放者。一些人試圖靠近廁所，但被武裝的士兵制止。

兩分鐘以後，周志被反捆著押出了廁所。隨後，何慶雲同另一名士兵將張錫錕押了出來，陳賢士和黃學全跟在後面。何慶雲一面厲聲驅散圍觀的流放者，一面押著張錫錕向鐵門走去。

圍觀者個個神情緊張，都在輕聲議論。唯獨劉資元和王世春，卻站在嚴管二組的監舍門口叉著腰，遠遠地站在那裡。

何慶雲向崗樓上招呼，不一會，駐守六隊的全體武裝士兵擁進了院壩。不到五分鐘，所有的流放者都被趕進了各自的監舍，六隊宣佈戒嚴。

林扯高獨自一人蹲在廁所裡，將從張錫錕和周志手裡搶下的火炬碎片，放在廁所角落的三合地上一片一片地拼湊著，並且拿著一把火鉗，將掉落在糞便坑裡的碎片紙一片一片夾起來，與放在牆角的火炬殘片拼接一起。最後，把從周志手裡奪下的散落一地的造反派傳單收集在一起，取出預先準備好的照相機，從不同的角度攝下了照片。

與此同時，何慶雲正用電話向場部緊急報告，鄧揚光立即「指示」：場部管教科近三十名幹事隨後趕到農六隊，要求何慶雲嚴密封鎖，不准任何人離開現場，並由何慶雲調動六隊所有的警力，密切的監視那些列為重點的人員，防止他們銷毀反革命活動的證據。

十點鐘光景，六隊辦公室擠滿了從場部匆匆趕來的管教人員，林扯高指手劃腳地將所有趕來六隊的人員分成幾個組，每個組配一名本隊幹事。

然後，精神抖擻地在院壩裡吹響了緊急集合的哨音，指揮六隊的全體流放者按組別排成八個縱隊。

何慶雲則背著手，臉色陰沈地向大家宣佈立即進行「大檢查」，並宣佈了「五禁止」的檢查紀律：禁止任何人離開座位走動；禁止上廁所；禁止相互傳遞東西和撕毀紙條；禁止交頭接耳；禁止東張西望以目傳情。

崗樓上的士兵架起了四挺機關槍，整個壩子裡的氣氛緊張萬分，使本來感到寒冷的空氣更加顯得寒冷，所有流放者被恐怖氣氛壓迫著，連頭都不敢抬。

近三十名由管教和武裝人員所組成的搜查隊，戴著大口罩站在各組的隊前，並按照各組排列的次序，檢查每個囚奴的行李。

在隊部開具的黑名單中，我屬於「火炬」集團的重大嫌疑犯之一，一名從場部調來的管教人員同何慶雲對我進行了「重點」搜查。

搜查開始前，我還在蔬菜一組，兩個人腳跟腳地跟著我進到監舍，先命令我將所有的行李抱到院壩裡，然後命令我將鋪位上全部的鋪草搬到門外一個角落。

當著他們的面，命我將所有的鋪草翻開，直到證明草裡面並沒有藏任何東西後，再叫我把床板折下來。

兩個人翻來覆去地查看那上面有沒有挖的「洞」，再搬開每一個床架的隼頭，看看那裡面是否塞有紙片之類的東西，然後在牆上搜索每一條縫隙，一直搜尋到房頂，再搜索到瓦楞。

最後又爬下床鋪仔細地用手電筒查看床底下的泥土，一邊敲打一切可疑的地方，好像尋找那下面埋著什麼似的，僅對我鋪位的檢查，整整折騰了兩個多小時。

長期沒有打掃的床鋪下面，灰塵和霉氣令人窒息，他們帶著大口罩，逼我按他們的要求操作，直到確實搜不出任何可疑的東西後，才將我押到院壩裡的破爛行李面前，命令我就地盤腿而坐，不准東張西望！

接著兩個人開始了對這一堆破爛的「解剖」：用剪刀剪開我的破皮箱，折開每一個夾層和每一條縫隙，包括皮箱上已經不能鎖上的「鎖」和提手把，直到證明破皮箱裡什麼也不曾藏匿，才將它扔到了一邊。

我看著到那口跟隨著我南奔北撞了十五年的伴侶就此徹底解體，心裡便湧起了十七年前我提著它走上車站的那一幕，一陣酸楚湧上心頭。

接著，他們搜尋從箱子裡倒出來的破爛，將我的筆記本和所有的紙條全都丟進了一個盆子裡，然後，打開我的破棉褥和那床足有十斤重的被蓋，用剪刀剪開我那床破棉墊。

那是在勞動之餘，千針萬線將一些從破棉被上撕下來的破棉花和破布鑲拼縫合而成的，折開那些線縫，便是一堆又爛又髒的破棉花。兩個人對那裡面的每一個棉疙瘩捏了又捏，直到確認裡面並沒有任何東西時才罷手。

拆完了棉褥，又用同樣的方法拆被子，折完被子上的幾十個補巴以後，便將裡面的棉絮翻過來，又對裡面的棉花疙瘩捏了又捏。

天色漸漸地黑下來，從上午十點搜查到晚上八點鐘，整整折騰了十個多小時，還在繼續搜查，沒個停歇的樣子。

夜幕籠罩了六隊的上空，崗哨上打開探照燈，探照燈像兩條火龍，虎視眈眈地監視著院壩裡的每一個角落。此時，我的位置上幾乎全是些碎布片和破棉花，我的唯一財產，便是那些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書、筆記、信件全部的丟進了盆子裡。

搜查完畢後，何慶雲才叫我站起來，並脫下了我身上的那件棉衣，那棉衣足有十餘斤重，那是由幾十塊破布以補釘連成一體的，樣子極醜，但卻解決了我過冬的大問題。而今場部來的幹事卻不由分說，拿起剪刀便對我這件冬天的護身寶一陣解體。

那天晚上很冷，呼出的氣在夜空中凝成白霧，我穿著單衣瑟瑟發抖，牙齒禁不住咯咯打顫，在慘白的探照燈光下，我被剝得精光，只穿著一條內褲，實在沒有查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後，便叫我脫下內褲彎著腰，還掰開我的屁股，直到證實裡面沒有夾帶為止。

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被這麼徹底的搜查，但我已冷得發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抵抗寒冷上，內心裡卻燃燒著一股怒火，多次向何慶雲提出抗議：「你們究竟要幹什麼？處罰人也不能用這種辦法」。場部那人瞪了我一眼，將一件檢查過的棉背心扔給我披在身上。

我想，那天如果不是我胸中燃燒的那股怒火，我真會被凍死的，有幾次我拚拼命的咬著咯咯作抖的牙幫，竟將嘴皮咬破，從口裡滲出血來。

搜查一直持續到了深夜十一點鐘，才將囚奴們全部趕進了各自的監舍，張錫錕則被關進了小監，從此就再沒有出來過。而我從菜蔬組搬到了嚴管二組，睡在張錫錕原來的鋪位上。

面對這場搜查留下的一片狼藉，我朝那口跟隨著我十八年的破皮箱瞥了一眼，心中湧起一股無名的怒火，感到自己的身體在怒火中燃燒。

扔掉破皮箱後，我只好用一塊破布包好我隨身的換洗衣服，便靜靜坐在鋪上。被蓋和墊褥都成了碎片，我無法睡覺，周身好像從冰窖中爬出來一樣，身上一點熱氣都沒有。

此時，估計大約是凌晨兩點鐘了，心中掛念著張錫錕，雖然他早已作了犧牲的準備，但我為他感到萬分痛惜。

他同陳力一樣，來不及留下一點值得紀念的東西給我，而我自己稍有不慎，在這個殺人如麻的環境中，隨時都會招來同樣的結局。



壩子裡的探照燈一直亮了一個通宵，除了聽那瓦背上陣陣呼嘯的北風，就是院子裡老管查哨的馬靴聲。

## （二）奮起自衛

我在室內發黃的燈光下，裹著那床已撕破了的被蓋，蜷縮著坐在那裡，細細回憶今天在這裡發生的事。

像今天這種無理搜查，我們本可理直氣壯向當局提出抗議，但大家被空前的恐怖氣氛懵住了大腦，「火炬」的戰士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過來，沒有人對此表示抗議。

今天獄方什麼也沒有搜查，估計他們不會善罷甘休。

林扯高經如此嚴密的搜查，竟沒有從我們身上搜出「火炬」的一字一紙的「證據」，想到這裡，身上感到稍稍暖和了些，頭腦也開始清醒過來。

現在，我不能對他們的瘋狂搜查和無理侮辱表現忍讓，我要給林扯高和何慶雲留下心中有愧的感覺，我必須對他們無休止的糾纏作出反應。

想到這裡，我鼓起勇氣，高聲的向壩子裡喊道：「我冷，給我棉衣」。那聲音在寂靜無聲的六隊院壩中格外響亮，像炸雷掠過夜空。

不知是太疲倦，還是因為劊子手的心虛，哨兵對我的呼喊並沒有答理。就像九年前文革開始那個晚上一樣。

我又一次猛烈的吼叫起來，這一次在大門處亮起了一束手電光，何慶雲拿著一件撕破了的棉衣走到我面前，扔在我的身邊，一面惡狠狠地威脅道：「孔令平，你規矩點。這不是一九六六年了，你放明白點。」

我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反唇相責：「你憑什麼撕我的棉衣和被子，那是政府給我的人道主義，你撕爛了它們就不管了，裝作不知道。」我用這樣的口氣責問他，把他們精心營造的恐怖氣氛給衝破了。

我知道此刻全監舍的人都在看著我，都在聽著我的抗議。此刻我對獄方的大聲抗議，是何慶雲沒有想到的，本來撕毀衣服被子就是盲目的，在六隊的反革命集團問題上，何慶雲和林扯高又有矛盾，林扯高虛張聲勢，等於是對何慶雲主持管教的全盤否定。

何慶雲面對這個局面，大概在心中暗想：六隊這些年來的成績並不是你林扯高一筆能抹殺得了的，而林扯高不但沒有把孔令平這樣的主犯嚇倒，反而還借此攻擊起我們來了，我看你林扯高怎麼收場？

表面上他壓低了嗓門喝道：「現在夜深人靜，我不同你計較，你也該清醒一點，自會有人叫你吃辣子湯的。」說完抽身向大門口走去。

我並不想放過這個機會，緊緊追問道：「你們憑什麼把我同張錫錕硬扯在一起？憑什麼把我送進嚴管組？是看到我這幾年沈默了？於是你們想怎麼整就怎麼整了？你們不是正在貫徹武漢公安工作會議的嚴禁打罵犯人、嚴禁逼供信的規定麼？今天搜查所造成的，完全是林扯高一手操縱的」。

這一聲怒責，憑我直覺判斷，何慶雲完全能聽得出我話外之音，聽得出矛頭所指。在派性上，何林兩派一直勢如水火。在這個矛盾中，我要充分地加以利用。

我向何慶雲的大聲責問，是給火炬撰稿人和傳閱者一劑鎮靜劑，我告訴他們，統治者內部存在著分歧，他們十分虛弱，他們的矛盾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千萬不要因為張錫錕和周志被關進小監而洩氣動搖，千萬不要因為幾個敗類的醜惡表演而看不清形勢。

另外，還想告訴大家，林扯高今天其實一無所獲，本來就有矛盾的隊部，就像一群瘋狗，在沒有咬到人時候，他們會自相撕咬起來，現在應當分析形勢，採取相應措施，而不是驚慌失措。

何慶雲不吭一聲地匆匆結束了這場「嘴鬥」，快步地走向院壩，迅速地消失在大監鐵門邊。

我在昏暗中穿上他剛剛送來的那件棉衣，比我那件千疤萬補的「鎧甲」暖和多了，寒冷的威脅減緩後，心中似乎踏實了些。

秩序又恢復平靜，前一天晚上所造成的恐怖氣氛，迅速消逝了。農六隊在第二天的出工時，恢復了以往的嘈雜和說笑。

第二天早上出工，我跟著嚴管組，雙手空空地到了改土工地上，因為我沒有工具，便給裝滿泥土的板板車幫助啟動和倒土。只是昨夜一夜未眠，到了下午眼皮重得像掛著鐵錘，很想打瞌睡。

此時何慶雲順著田坎走過來，本不想理他，可他偏偏盯上我一個人站在那裡，既沒有拿鋤頭挖土，又沒有往板板車上裝土，便問道：「你怎麼不動？」神情很冷漠。

「你沒看見車子還沒有打倒轉麼？」我也以冷冷的回答。

「你的工具呢？」

「在蔬菜組。」

「為什麼不帶來？」

「糞桶，糞瓢，扁擔，這兒用得上麼？」我譏笑地回答。

所有嚴管組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注視著我，我心中明白，此時我的一舉一動，都會在囚奴中產生影響。帶班的士兵也用驚奇的目光看著我，沈默了幾年以後，我又有稜有角地再現當年的鋒芒了。

何慶雲內心充滿了矛盾，他並不希望昨天的突擊搜查，找出「火炬」的組織綱領和名單這類證據，但他對幾個最頭痛、也是下過「苦功」的反改造「尖子」心中無底，不敢理直氣壯地拍著胸膛保證，也不敢在管教科的面前與林扯高公開的爭論。

大搜查沒有搜到任何證據，使林扯高落空，卻使何慶雲心中暗暗竊喜。即使遇見我如此輕蔑的向他發洩不滿，他也不計較。

林扯高的確是大失所望，費了足足半年時間，本想一舉在六隊撈一網大魚，結果除了張錫錕，還是張錫錕，現場抓住的人只多了一個周志，雖說逮了一個傳遞「火炬」的現場，但周志又有什麼用，充其量是個週邊成員，被重點懷疑的火炬其他成員，一個也沒有抓到。有關反革命的組織證據、綱領和名單，一個也沒有找出來。

僅憑一張「火炬」刊物和幾張「反到底」的傳單，仍然不能對這個團夥案子定性，所以林扯高正盤算如何撬開這些人的嘴，供出他所需要的東西。倘若將所有的「嫌疑人」統統關進小監，又怎麼應付慶何雲的冷言嘲笑？

張錫錕被關進小監的第二天，便被林扯高從六隊小監轉移到林業隊旁一處新修的秘密監禁所。那裡有圍牆鐵絲網，那裡的工作人員不再是犯人和刑滿人員，而是一批不知從那裡招來的工人。

林扯高對六隊的保密工作十分懷疑，生怕繼續關在六隊，讓小監與大監通氣。他需要在嚴格分割的情況下，獲得被審者自相矛盾的口供，從而找到突破口，得到意外的審訊效果。

從此，張錫錕與農六隊的政治犯斷絕了一切聯繫，西昌地區法院和四川省高等法院組織了專案班子，專門審理「火炬」案，但是因為所拿到的僅僅是張錫錕和周志兩人傳遞的一份手抄刊物，以及陳賢士和劉資元們提供的似是而非的證言，顯然證據的不足，必然引起對於口供的「認定」和「反認定」的爭執。

好在林扯高和何慶雲之間勢同水火，可以變成我們反駁林扯高的有利條件。這是一場鬥智鬥勇的較量，我們中的任何人在被審訊時的語言失誤，都會給我們帶來殺身之禍。

### （三）闖險

在這場鬥智鬥勇鬥決心的較量中，值得我們驕傲的是，所有火炬的成員都明白，營救他人等於營救自己，六隊的政治犯們越來越成熟了。

一天晚上，何慶雲把我叫到了辦公室。文革將近十年了，何慶雲雖每年都有幾次將我召到他辦公室裡，但以前大多是單個對談，內容多半是我與管教方面發生的衝突，或發生像林彪這樣的政治事件後，或嚴打運動中詢問

我對形勢的看法等等，這次卻不同以往。

一走進何慶雲的辦公室，何慶雲的身旁坐著兩名陌生男子。兩名男子臉上很嚴肅，我猜他們是張錫錕專案組的人，兩名陌生男子，一個作記錄，另一個像是這次預審的頭兒。

我平靜地坐在小板凳上，等候對方的提問。我知道，何慶雲在表面上是陪審人，實際上是這場戲的主唱。

我與何慶雲長期打交道，彼此都瞭解對方的底細，我知道何慶雲對林扯高鬧出的這個「反革命集團案」很不服氣，所以有意的給我留下替「火炬」抗訴的空間，何況這幾天我已多次主動出擊，在指責林扯高亂來和捕風捉影時，何慶雲表面上制止，但從他臉上的表情卻在鼓勵我放膽抨擊，一吐為快。

我也知道中共的預審過程，是沒有什麼法律依據的，不憑事實一貫是先入為主下結論，然後再編造口供使之與結論相符，所以冤案特別多。

但這次正是在文革進入尾聲時候，何況武漢工作會議上有「重證據，嚴禁逼供信」的最高指示，多多少少對先入為主的瞎乍乎有所抑制。

提問之前，何慶雲伏在辦公桌上抄寫什麼東西，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但我怎麼也覺得他在裝模作樣。

連日來，我在工地上抓住他缺乏證據，以及很不正常的大搜查，撕棉衣被褥等等站不腳的做法，主動進攻。我明白何慶雲此刻在高等法院的專案組面前，可說對火炬案一籌莫展。三分鐘冷場以後，主審官按常規提問姓名籍貫後，便直截了當的向我提問道：

「今天就火炬一案正式提審你，你不要兜圈子，而要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向你提出的問題。」

我本想反駁他，申明自己與火炬沒有任何的瓜葛，有理由拒絕回答。但我還是克制了自己，且靜靜聽他怎麼說。

「首先，你要老實交代待你所知道有關火炬的全部情況，你要立爭主動交待，我們的政策一貫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立即反問道：「你憑什麼說我知道火炬的來龍去脈？並且要我交待些什麼？」

「你別裝蒜，我們有大量的證據和檢舉材料，證明你就是火炬的成員，現在是要你主動交代。你要知道，抗拒是沒有出路的。」

何慶雲在一旁冷笑著，裝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我明白他心裡想的恰恰相反。

提審人接著說：「要你交代『火炬』反革組織成員和組織名稱行動綱領，難道你們自己幹的事，還要我們來提醒嗎？」

「怪不得何幹事經常搜我的東西，現在大概已經死心了吧，你所得到的檢舉是一些捕風捉影的東西，我知道你們完全可以據此下結論，既如此又何必來問我？」我堅定的回答道。

提審員被我這麼一駁卡住了，辦公室裡，兩分鐘的沈默後，好像今天的審問不可能有什麼進展了，於是改換了問題：「你看過『火炬』嗎？」主審官的提問，顯然在迂迴出擊。

「如果說沒看過，你們已根據林管教放出的空氣說，農六隊至少有大半的人都看過它。我當然是在你們已經認定的人中了，就算我如實回答說我一無所知，你們也不會相信。但是我覺得我們無須爭論誰是否讀過『火炬』。」

「你們不是說『火炬』滿篇都是造謠，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衊，那麼你們可不可以把它公開的拿出來批判？也讓我見識見識？就像你們經常在你們的報紙上刊出反動文章供大家批判那樣。如果它只是批評你們，那麼你們應當清楚，這與公開提出打倒共產黨、推翻政府、號召暴動是兩回事，我想你們應當分清批評你們與組織反革命之間存在著原則的區別，這是不可以任意定性的。據我知道，『火炬』中還有你們散發的傳單，有這種荒謬的反革命組織麼？」

我的這番駁斥，頗令西昌派來的預審員感到吃驚，也許在他們接觸監獄中的政治犯中，很少能夠擊中要害，把揭露當局的性質與對他們的指控嚴格區分開來。

他們也明白，所「拿獲」的證據，充其量是對中共黑暗統治的揭發，是一份傳單！它極有可能是個人的行為，甚至是個人的寫作，由此而斷定是一個反革命組織的綱領，只有草木皆兵、神經過敏的人才會這麼做。

這使我想起了蒲世光以「非團員呼聲編輯部」寫的一張大字報，就被認定是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冤案。中共的基層官員，連法律的基本界定都沒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亮出自己的底牌，反映了它的極端無理蠻橫和無知。

他們的底牌已經亮出來了，我已經斬釘截鐵地駁斥了他們下的「集團」結論，因此，追究其他的諸如由誰起草？怎麼傳看等等已沒有意義了，繼續審問下去，完全是多餘的。對我的預審就這樣草草結束。

接著劉順森，夏光然、陳容康、鄧自新幾個被他們認定的重點「火炬」份子，也經歷了這種相似的「預審」。由於有我的反駁給整個案子理出了頭緒，法院的瞎乍乎只能一無所獲。

林扯高想通過預審獲得「反革命」集團材料算是徒勞了，六隊殺氣騰騰的形勢被擋住了。

### 第五節：火炬戰士，無愧當今的英雄

現在最令人擔心的是，林業隊特別小監裡的張錫錕和周志的安危了，尤其是張錫錕的危險處境，又處在嚴密隔離下。中共最容易在他身上使出哄騙和恐嚇的手段，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當年他們對蔣正君的「反革命集團案」的羅織，就是利用了這種手段，株連了幾十人，編造出一個龐大的「反革命組織」。

但是我們深信張錫錕有著非凡的人格，他所抱定的不惜為真理壯烈犧牲的宗旨，令人敬仰。但我們為不能營救他而深深自責，我們深信他能戰勝當局的詭詐。

林扯高不甘心，於一九七五年三月，又把劉順森和夏光然關進了六隊的小監中。

然而，當局煞費苦心的隔離，並沒有切斷張錫錕和農六隊的戰友們的聯繫，還不到半個月，林業隊的人便從特別小監的工作人員那裡，弄清楚了張錫錕他們的生活處境。

林業隊裡傳來的消息說，張錫錕和周志雖然被嚴格隔離關押，但還沒有給他們上刑具，每天都有高等法院的人對他們施以「人道主義」的攻心戰。他們的伙食由場部幹部食堂送去，這使我聯想到十一年前我和陳力被關在場部小監的情景。

#### （一）回答審問

處境最危險的是張錫錕！在大陸獄中「組織反革命集團，圖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反革命組織罪名一旦成立，為首者必面臨處決的結局。

當局在十一月八日這天，既沒抓到任何證據，除那張在廁所裡截獲的刊物，法院要定罪的證據一個也沒有。現在對張錫錕的認定只能靠張錫錕本人和我們的口供，所以張錫錕被抓進特殊小監的那一刻起，他的口供決定了他的生死，也決定著其他火炬成員的生死。

不久，從林業隊傳出了有關張錫錕的一段審訊經過：

預審員：「現在，再一次向你交代待政策，從你手中現場拿獲的『火炬』是你的手抄本，從你們所出的刊物證明你們有相當的組織能力。這個刊物上所登載的文章，文風和內容決不是一個人所寫，而是由幾個人寫的，你也知道獄中組織反革命宣傳難逃一死，但是我們仍抱著治病救人的改造目的。如果你能在事實面前很快交待出你們的同夥，我們仍可根據『坦白從寬，將功補罪』的政策，減輕你的責任，甚至於可以免除追究你的刑事責任，你應當仔細地想一想。」

張錫錕：「我已經反覆向你們講清楚了，你們搜去的『火炬』屬於我個人的行為，我想你們的技術鑑定會得出這個結論的，你們已徹底把六隊翻了一個底朝天了，難道還不相信自己搜查結果嗎？所以，我覺得你們不應當節外生枝，至於你說我不甘心滅亡也好，說我蠢蠢欲動也罷，這些話我已經聽你們說了幾十年了。難道飢民們起來造反，要你們下臺，也是反動階級企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嗎？這不是太可笑了嗎？被你們劃為被消滅階

級的人越來越多，這表明什麼？我是一個學生，我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被你們誣讟的被消滅的剝削階級。」

「當然權力掌握在你們的手中，今天你們可以隨心所欲，對我要打要殺。但是你們怎能殺掉你們自己所造就的、反對你們的老百姓？我們認識上既然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我們永遠都無法說到一處去。至於你們說我組織反革命集團，那也是你們的主觀認定。要我招供出你們想像中的反革命組織，那是你們的一廂情願。我勸你們不要枉費心機，我是不會在你們認定的供詞上畫押的。」

這一席話，令預審員驚心動魄。

預審員：「那麼，我想問你，在你們的『火炬』中，哪些文章是其他人寫的，比方說那些是劉順森寫的，那些是孔令平寫的。我們掌握了充份證據，這些人是你的同夥，你幫他們隱瞞也是瞞不住的」。

預審員在用認定的方法，迫使張錫錕交代待，這是中共慣用的手法：口供代替證據，推理代替事實。他想逼迫張錫錕招供「集團」的成員。

張錫錕仍然從容回答道：「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他們不屈於你們的壓迫和淫威，敢於說真話，你們都可以懷疑。這麼多年來，哪一個中國老百姓沒有挨過餓受過凍？你們編造的美好謊言還少嗎？」

「這麼多年來，你們為了欺騙百姓，吹噓什麼農業大豐收，捏造高產衛星，強迫善良的農民在人民公社吃草根樹皮，讓他們全家餓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把城市居民和工人連哄帶騙去建造小高爐，煉出一堆堆毫無用處的鐵疙瘩。還吹噓什麼十五年超英趕美，最後讓他們落得連遮風避雨的家都沒有。」

「你們效仿秦始皇在全國大興冤獄，把老百姓為你們打下的江山，變成了無人敢說話的人間地獄。你們逼迫善良百姓忍飢挨餓還嫌不夠，還要逼迫他們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驅使他們備戰備荒。」

「我們為你們把全國搞得餓殍遍野，還把這種惡果上堆給老天、下推給蘇聯感到可恥。你們讓盲目無知的青少年在文革沙場上喋血殞命，為了瘋狂的夢想造的孽，千秋萬代都不會忘記。」

「神州大地已被你們搞成了人間地獄，你們的罪惡昭昭，何需我去書寫。就是我寫出來，也可以用一個成語來描述，叫『罄竹難書』。文革中你們逼迫我們在毛澤東的像前請罪，你們的人『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我只覺得可笑。」

「至於你說到劉順森、孔令平，肯定你們還會懷疑其他什麼人，可以說農六隊中二百多號人中，沒有一個人不在心底裡痛恨你們。只是懼於你們的酷刑和棍棒，才忍受著你們的作威作福。你們硬把所有反對專制的人，當成一個組織嚴密的集團扯在一起，那只是你們的胡說編造。果真這樣，你們不是變成極少數的孤立份子了麼？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說，反革命是極少數麼？」

「劉順森孔令平他們都是我獄中的好友，同你們所論斷的『反革命組織』是兩回事，我們根本無須成立什麼組織，制定共同綱領。我們認為在監獄中這種反抗你們的行動，是無須什麼綱領來約束的，你也不要枉費心機了。」

預審員提出的問題，招來了張錫錕的嚴辭反駁，他們反而在張錫錕面前變成了受審者。在這個視死如歸的人面前，已經不能用常規的方法得到新的口供，審訊記錄上是什麼也記不上去了。

當然，張錫錕真是一條令人佩服的硬漢子。他所提出的問題，是辦案人員沒有弄清楚也無法回答的，一個小小辦案人員，既然缺乏證據，也只能照事實來作結論了。他繼續問道：

「好吧，看來你是頑固抗拒了，不過其他的人未必同你一樣，他們自會交代待問題，現在留給你更多的時間，好好反省，直到你想通了，再來交代待吧？現在你要交代待『火炬』的另一些問題。你是什麼時候寫『火炬』的？一共你寫了幾篇文章？你的動機和目的是什麼？有誰看過你的『火炬』？你在獄中是怎麼傳遞『火炬』的？……」

這裡完全可以引用當年共產黨曾說的一句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是一把中國民主運動的星星之火，燒毀毛澤東所建造地獄的星星之火。

審訊就這麼持續下去，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開始，火炬案的審理一直持續了整整八個月。六隊似乎重新恢復了表面的平靜，我也從嚴管組調到了大田組。

曾一度關進小監的劉順森和夏光然，也從小監裡放了出來。除了周志和張錫錕一直關在林業隊，並從那裡不時傳來有關他們如何同審訊員相對峙的英勇故事。這些故事全是由管理特別小監的工作人員傳過來的。

張錫錕以他偉大的人格，征服著一直看守他的人們。這些工人在講到張錫錕時，個個翹起大拇指。而我們最清楚，如果不是他的英雄氣概壓住了劊子手們的囂張氣焰，六隊此時還要被林扯高搞得雞飛狗跳。

這時西昌地區大鬧地震，謠言紛傳，我們仍然住在地震棚裡，相聚在一起收集全國的政治形勢，冷靜地考慮我們的對策。火炬不能再出版下去了。但從地獄裡舉起的火炬，卻照亮了許多人的心靈。

四個叛徒中，最滿意的當數陳賢士了。他的刑期本來只判了五年，在獄中不知不覺的混過了三年，林扯高提出提前釋放的申請獲得批准，決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 （二）會場上

一九七五年八月，由西昌地區法院簽署的對張錫錕反革命集團的判決中，判處張錫錕死刑，立即執行。以同案主犯，判處周志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當局對政治上稍露反對鋒芒的人所採取從重從快的嚴厲打擊，是毛澤東獨裁暴政的唯一手段。因為火炬傳遞的不慎，使張錫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然而可敬可嘆的是，張錫錕毅然用自己的身體切斷了「火炬」同其他成員的聯繫。六月西昌中級人民法院專案組的組長向張錫錕作了最後一次提審。

專案組長問：

「我們已根據西昌檢察院對你在獄中組織反革命集團、出版反革命刊物的起訴，經過八個月的偵查，在查明事實真相以後，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即將對你作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處理，並報最高法院批准。但在這個最後的時刻，我們仍從挽救你的立場出發，希望你能徹底地交代待出你們的組織和同夥。這對你來說，是最後一次機會。如果你能交待出『火炬』集團的其他成員，我們仍可以根據黨的立功受獎的原則，對你重新量刑處理，我們甚至可以向你保證，如果你選擇坦白交代待的道路，不但可以免你一死，甚至可以考慮對你的特別處理。給你選擇的時間只有三天，希望你慎重考慮。現在請你回答，你是否願意考慮交待？」

對方已經黔驢技窮了。對張錫錕採取的最後誘惑也失敗了。在張錫錕的面前，始終擺著一條出賣他人以求自己苟活的路。然而，獲得了超然精神力量的張錫錕，冷笑面對魔鬼的誘惑，拒絕走這條路。

他坦然回答道：「要講我的同夥，全國六億人民都反抗你們的暴政，他們都是我的同夥。你們胡說自由民主世界是人間地獄，而你們卻在中國大量的殺人，把中國變成了真正的人間地獄。但是被你們殺的人越多，這個政權就滅亡得越快。至於講赦免，我毫不客氣告訴你們，你們還沒有這個權力。只有人民才有赦免你們的罪惡的權利。我很樂意無愧的死去，同被你們無故殺害的許多中國人一樣，我是正義的。我堅信人民是會紀念我的。因為我是在反抗獨裁、反抗你們的暴政而犧牲的。我不但可以告慰我自己，也可以告慰六億同胞。不管你們今天接不接受我的觀點，但總有一天，你們會看到我現在所講的話是正確的！」

這擲地有聲的鐵骨爭言，便是張錫錕犧牲前的最後宣言。

這次最後審問後，張錫錕被錘上了十五公斤重的死囚腳鐐。審訊者在佈告上所劃的紅勾，反映了他們軟化和欺騙政策的失敗。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當局最後向這位始終沒有屈服的戰士，宣佈死刑判決後。並定於次日在本農場執行槍決，問他在生命最後的二十四小時還有什麼話要講？

張錫錕仍然淡淡的冷笑了一下，然而這冷笑中，卻帶著一絲遺憾，一種壯志未酬的遺憾，接著，張錫錕便以鏗鏘有力的聲音留下了最後幾句話，這幾句話立刻傳遍整個鹽源農牧場中的上萬名流放者和刑滿人員。

「這二十多年來，我親眼目睹你們在罪惡的政策和獨裁專制的制度下，廢民主，殺無辜，失民心，破壞建設，一步步走向衰亡，並看著你們一步一步地走向滅亡。然而，我十分遺憾的是，我沒有活著看到你們最後滅亡的那一天。但那一天就要到來了，當那天到來時，中國一定前進了一大步，那一天我會同譚嗣同在天堂裡同人民一道分享民主革命的成功！」小監的工作人員，用動情的語言繪聲繪色地向外傳遞了這位民主鬥士最後預言。

那時正是蘋果成熟的季節，看守們在果園裡為他挑選了一盤又大又黃的蘋果，為他特別清洗了臨刑就義的衣裝！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農六隊的流放者在凌晨六點就被催促起床。為了製造一個恐怖的氣氛，何慶雲在集合隊伍前，宣佈了今日公判大會的紀律：

「不准帶凳子，不准帶紙筆，開會時必須端坐在指定的位置上，臉朝前方，不准相互交談，不准移動座位，不准交頭接耳，不准在會議過程中離位解小便，不准與其他隊的人員相互打招呼交談。」

何慶雲宣佈完畢，陰沈著臉打招呼：「整個會場今天都有巡查的員警，誰違犯，誰被武裝捉到，招來的麻煩後果自負。」出發前，何慶雲還命令各組的組長對參會者進行了一次搜身，發現所帶的紙筆通通搜去。

八月底的鹽源，按以往的季節，已進入風季。然而這一天卻特別的反常。滿天烏雲密布，讓人特別的沉悶。我望瞭望那濃雲覆蓋的灰色天空，覺得心裡特別的壓抑難受。我不知道，天要下雨還是要哭泣？不是說蒼天有情麼？

會場被整整兩個排的士兵包圍著，我們進入會場時，便看到那些隱藏在圍牆外的綠軍帽嚴陣以待，主席臺後面高約一點五公尺的矮牆上，架著機關槍。

牆頭上綠軍帽下像狼一般兇狠的眼睛，盯著壩子裡已進入會場的赤手空拳的人，就像防備某一個人振臂一呼，其餘的人便會像洪水般朝主席臺方向壓過去，劫了法場似的。

在主席臺兩側的露天看臺上，是數百名來自各中隊的隊長、幹事們，因為他們都是獄中的老油子，明白所關押的犯人都是一群被壓得服服貼貼的奴隸。此時倒輕鬆隨便，顯得滿不在乎。

能容下萬名人的會場，被橫豎交叉的石灰線劃分成許多的方塊。列隊進入方塊的各隊囚奴，要規規矩矩的囚禁在裡面，不得絲毫越界。

主持今天大會的是場部革命委員會楊主任。坐在楊主任身邊的，是西昌中級人民法院的院長。楊主任不時從麥克風中傳出埋怨聲，責備各隊的隊長沒按他的指令預先進入方陣內，不時地傳出他起立整隊的號令聲，直到十點鐘光景，才安定下來。經他這麼一弄，原先十分壓抑的氣氛，緩解了許多，人們開始亂哄哄的交談。

宣判大會開始，楊主任故作鎮靜嚴肅的起立，左手揮動著早已準備好的紅本本，念著預先選定的公判會常用的經文，宣佈大會紀律！

他講話剛剛落音，主席臺兩側走上來兩名全武裝的士兵，發出一陣厲聲喝叱。短牆後面立刻回應出一迭殺聲。這使人聯想到專制時代公堂兩側峙立的差役，以木棒擊地，齊聲吼出「威……」的吼聲。

就在這陣陣逼人的沉悶氣氛下，一陣歇歇停停的雨點打在會場中，接著便將一場大雨狂瀉下來。

矮牆上二十多挺機槍黑洞洞的槍口虎視著台下，槍口好像隨時會因會場哄亂而噴出火舌來。三合土壩子裡，近萬名盤腿危坐的人們，雖被大雨澆淋，卻沒有一個人站起來。

會場內近萬雙眼睛盯著主席臺兩側的各隊獄吏們，他們在大雨猛砸下，有的人東張西望，向可以遮雨的走廊跑去，有人正在張開事先帶在身邊的雨傘，卻被矮牆後面的虎賁們叱住，使得這些想溜的人尷尬的縮回到原處。灰溜溜的收下了剛剛打開的雨傘，使用手帕，或脫下外衣，頂在頭上。

我在台下正襟危坐，雙目微閉，索性順勢地脫下了帽子，任憑豆大的雨點從光頭上淋遍全身，雨水順著衣服和褲子在雙膝盤攏的交叉處，流到了三合土地下，彷彿是上蒼在流淚，替冤死的人們作亡魂超度的祈禱。

忽然廁所方向傳來了一陣騷動，有人在那裡歇斯底里的吼叫，只見幾名全副武裝的士兵正用木棍，驅趕著圍在廁所周圍的奴隸們，警棍落在他們的頭上和身上，發出一陣陣朴樸聲，有人捂著沁出血的頭在躲避著警棍，但沒有人叫喊。

看臺上的各隊看守，有的正在向自己管理的囚犯佇列張望，有的便從看臺上走了下來，混亂持續了十幾分鐘後，廁所周圍的人被強行驅散，大雨也開始收住了陣腳，楊主任才走到主席臺前，抬頭望瞭望漸漸散去的烏雲，麥克風重新嘈雜起來。

他一聲令下，一群虎賁兩人揪一個，將三十多名犯人像餓虎撲羊似的推到了主席臺前，每一個被押上來的人遍體鱗傷，滿臉是血。

當時慣例，被宣判者都在短牆後面被暴打一頓，並緊緊的網綁以後，才推到主席臺前，此種慘絕人寰的酷刑虐待，我們早就見慣了，被處決前還要被糟踏成這樣，全是做給活著的奴隸看的，在這群慘不忍睹的佇列中的第一名，便是張錫錕。

分別十個月了，此刻見到了他除了滿臉是血，五花大綁外，還見他喉嚨在艱難地抽動，他有一腔溶著熱血的話要當庭一吐，或是想振臂一呼，向台下的奴隸們喊出準備好了的囑託，但他說不出話來，因不能吶喊而掙扎著。

就在這一瞬間，全場一片啞然。唯有我和一切火炬成員，正強摠著心中湧動的怒火。抬起了頭，正面迎視著張錫錕的目光。

就在這時，我看到主席臺上左側何慶雲卻低低地埋下了頭，何慶雲正坐在張錫錕的背後，看得出他一臉慚愧，關於他內心的想法，我早有耳聞，傳說他的妻子最近經常向他嘮叨：「世情險惡，少做一點缺德事為妙。」怪不得近一年來，他常顯得沈默寡言。

在審訊中，張錫錕視死如歸的精神，強烈震撼著他的心，使他意識到自己雙手已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便在心理上解除了武裝，何況動盪不安的社會，難說今後は誰持掌大權？。

奇怪的是，今天主席臺上，卻不見林扯高，他可是殺害張錫錕的直接兇手。今天，林扯高本該高高坐在首席位置上，他該不是怕面對張錫錕吧！

在楊主任的一聲口令下，接著是喇叭裡播放出一陣聲嘶力竭的口號聲。這時，一群帶槍的獸兵押下了那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一陣沉悶的槍聲響過之後，喇叭裡又傳出一陣口號聲！

細雨滴在我的臉上，正好同湧出的淚水順頰而下。此時，我像一個禪定的菩薩，將手中摘下的帽子緊緊地捏著，捏出水來！

### （三）從你身旁走過

我記不起廣場中的方陣怎樣在楊主任的吆喝聲中起立，又怎樣魚貫著走出那農七隊大鐵柵門，我記不起自己怎樣在槍口嚴密監視下踏上馬路，只記得距鐵門約五十公尺遠的馬路右側，排列著今天槍殺的八具屍體。張錫錕頭朝下方，背著那塊臨刑的鐵插牌，斜躺在路邊白樺樹下的土堆上。

這樣的展示，是嫌公判大會上把臨刑者死前折磨得血肉模糊還不夠恐怖。故意將這些血肉模糊的屍體放在路邊，在我們經過時重新體驗一遍。

為了紀念，我邊走邊數著路邊的白樺樹，從路邊第一顆樹開始數到第七棵樹下，我清楚地看到，張錫錕臉上淌下的兩道濃濃血痕。他雙目緊閉，顯示出捨棄一切的堅毅，臉上佈滿對災難深重民眾深深憂傷！！而他那微微張開的嘴，彷彿還在講述他壯志未酬的遺憾和囑託。

我在槍口監視下，一步一鞠躬從你的身旁走過。口中叨念著：



「安息吧！張錫錕，我親愛的戰友！我將牢牢銘記你的囑託！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為徹底埋葬這個罪惡的專制制度奮鬥不息！只要我一息尚存，我要把你的光輝彰明世界；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一定要讓你的靈魂復活！」

## 第六節：上蒼對猶大的懲罰

四個猶大是陳賢士、劉資元、王世春、黃學全。

在林扯高主持下，為四個人整理的減刑檔案報到了場部，但是除了給四個人改善了一下環境外，他們並沒有檢到什麼骨頭。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四個叛徒立即受到了上蒼的懲罰。

張錫錕被關進特種林業隊小監後，黃學全便從嚴管組調了出來，同我一起分到大田二組中：劉資元據說老毛病犯了，正在申請保外就醫；至於王世春調出嚴管組後，牢騷話也跟著多了起來，大致因為他想要的東西落空，失望的情緒流露出來：早知如此，他真不該上林扯高的賊船，成了六隊人人喊打的犬類。

四人中最滿意的當數陳賢士，他的刑期本來只有五年，在獄中不知不覺已混過了三年。一九七五年五月，他便背上了行李，神氣活現的跨出六隊的大門，到場部機修組報到。

去年，因孫明權復仇爆炸株連的郭賢，因「證據不足」，從小監裡放出，重新回到機修廠，剛從六隊調來的陳賢士，被安排當了郭賢的徒弟。

一九七五年六月，陳賢士仗著他的年輕和流氓本領，上班不到兩個月，便同一個就業人員的未婚妻廝混上了。

九月底，離張錫錕被害還不到兩個月，場部派郭賢駕駛一輛輪式拖拉機來給農六隊兩百畝冬小麥地翻耕。

### （一）陳賢士

早上八點，郭賢按時將拖拉機開到農六隊大門前，拿著派工條獨自到六隊辦公室去辦手續。車上留著陳賢士。自從他離開六隊幾個月來，陳賢士還是第一次重回故地。

他躡著二郎腿，得意洋洋地斜躺在副駕駛室的坐墊上，並不時地用一雙賊溜溜的眼睛盯著從六隊走出來的流放者。

前一天夜裡，同女人廝混熬過通宵的陳賢士，感到特別的疲倦，但這是他「體面」走出來的地方，所以仍強打起精神，準備迎接昔日一起勞動人們的羨慕眼光和詢問。

但是從鐵門裡不斷湧出的人從他身旁經過，大都對他投以冷冰冰的目光，沒有人理睬他，就像他不存在一樣，有的還偷偷議論著什麼，對他指指戳戳。

以往秋耕時，場部派來的拖拉機手，向來被當成「貴賓」接待。今天受到人們的冷遇使他感到尷尬和惱怒。

正在沒精打采的時候，突然有人挑著一擔蘿筐向他走來，一迭聲的向他招呼。原來是黃學全，一個同他狼狽為奸共過「事」的猶大，「嗨！你倒好，混到跟拖拉機這個美差了，怎麼樣？」

黃學全朝他招呼道，那口氣裡說不清是挖苦，是嫉妒，還是羨慕。陳賢士從坐椅上微微地欠身坐起，不管怎麼，畢竟有人跟他打招呼了，實在是來之不易。

陳賢士答訕著回應道：「哪裡哪裡，黃大爺，你也混得滿不錯，今天去上肥吧？」他故意的這樣問，藉以抬高自己，排遣一下剛才受到的冷落。

可旁邊的代朝謀卻向黃學全吼道：「嗨，別在這裡廢話了，那邊的工具還沒有拿完，大家都等著你呢」。

代朝謀本來就是組長，一樣受過林扯高的眷顧，只不過沒有任何功勞，連骨頭都沒撈到一塊，必然對拖著一塊大肥肉的狗產生嫉妒，狗狗相爭本是天性。

陳賢士朝著這兩個漸漸遠去的背影狠狠地唾了一口，便閉上了眼睛養神，心裡重新回想起昨晚的好事。

吃過早飯，郭賢駕著拖拉機到了麥田，陳賢士下了車，找了一個僻靜的背風田坎，躺在蓑衣墊上沉入了夢鄉。

等陳賢士從迷糊中醒來，已是十一點半鐘了。他翻身爬起來朝麥田方向望去，只見郭賢師傅正將拖拉機開回來，在機耕道上顛簸著，郭師傅在幹田裡打了一上午的滾，已是滿身泥灰，他熄火下車，陳賢士走過去，為剛剛熄滅的拖拉機灌注黃油，檢查鬆動的鉋口螺絲。

半個小時以後，陳賢士重新坐在副駕駛的鐵椅上面。郭賢開著車子，翻過田坎沿著機耕道緩緩地向曬場上爬去，這樣安閒的日子，可是他昧心整人換來的，不禁從心底承認自己實在交了「好運」。

拖拉機在經過水渠的彎道前，唐啟榮背著藥箱也上了車，他把藥箱放在副駕駛座位的後面，便站在陳賢士身後，搭乘便車上曬場去。

拖拉機轉過架在堰溝上的過道，郭賢轟大油門往上方駛去，車輪在一個暴露在木橋橋面的水管接頭上啃了一下，整個拖拉機顛動的瞬間，陳賢士隨著車身的跳動，像一個皮球直端端的從副駕駛座位上，頭朝下地栽了下去。

等郭師傅急煞車時，拖拉機帶著慣性，從跌在地上的陳賢士身上壓了過去。郭賢同唐啟榮都不約而同地驚叫了起來。

車停下後，唐啟榮翻身跳下拖拉機。只見陳賢士正躺在拖拉機左後輪後面，抱著頭痛苦的抽搐痙攣著，臉色由灰色變成鐵青。

從麥田裡下班路過的人圍了過來，見陳賢士正發狂的用雙手向天空中亂抓，一把抓住了唐啟榮的褲腳。唐啟榮尖著嗓子叫人把曬場上的門板抬了下來，準備將陳賢士抬到一河之隔的場部醫院去。

但是圍觀者七嘴八舌議論著，誰也沒有動，大家反而傳出責罵聲：「看他今天小人得勢的樣子，誰去抬他？」「張錫錕的陰魂不散，現在找上他了。」……

這時有人喊住剛剛從城裡回來的馬車，彭文學還不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幾個人已七手八腳把陳賢士抬上了馬車。唯有唐啟榮尖聲阻止道：「他不能坐馬車，要人慢慢地抬到醫院去。」可是沒有人理他，卻催促著彭文學：「趕快走啊」。

彭文學會意，抽動了馬鞭，那馬兒便放開四蹄，在坑坑窪窪的機耕路上，朝著三號梁子上狂奔起來。

繞過五號梁再經過油庫彎，到場部醫院足有十里路遠，彭文學心中明白，陳賢士經過一路顛簸，在路上就要過奈何橋的。

馬車狂奔著，五分鐘後，當馬車衝上三號梁的最高處並繞過油庫灣時，彭文學回過頭去望了一下車上的病人，只見他已一動不動地趴在馬車板上。於是彭文學停下車，走到他的面前用手去觸陳賢士的鼻孔，已沒一絲的氣。再將他翻過身來去看他的瞳孔，證實他已經死去了。彭文學長舒了一口氣，裝成什麼也不知道，繼續抽動馬鞭朝醫院奔去。

一個罪惡的靈魂終於進入了地獄，當他的屍體在醫院的大門停下來時，在那裡等待的唐啟榮並沒有責怪彭文學，而是喃喃的說，「車上三個人，要說最危險的，是站在副駕駛後的我。而坐在椅子上的陳賢士，卻偏偏栽了下去。這不是張錫錕的冤魂找上他了麼？」

陳賢士從拖拉機上栽下來身亡的消息，在六隊迅速傳開，也在場部附近的幾個中隊傳開了。

陳賢士雖然因叛賣告密得到提前釋放，得意揚揚的進了場部拖拉機組。妄形之下，姿意胡來，奪人妻，幹著喪盡天理的事，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痛苦之上。但他卻萬萬沒料到，天理不容，張錫錕被殺害不到兩個月，鬼使神差讓他葬身在拖拉機的車輪之下。

馬太福音中對猶大的結局是這樣寫的：「……猶大看見耶穌，已被定了罪，就後悔，把那三十塊錢拿來，向祭司長和長老說，『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們說：『那與我們有什麼相干，你自己承擔吧』。那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裡，出去吊死了。」

猶大臨死時，還有一種抱愧和自責。而這陳賢士是連抱愧之心都沒有。

毛澤東思想薰陶出來的人，根本就不會悔過，他只好進入地獄，讓地獄的大火來煎熬這骯髒的靈魂吧。

在陳賢士調往拖拉機組差不多同時，劉資元也從嚴管組調進了蔬菜組，這種調整，顯然是林扯高對他的「獎勵」，也是林扯高的許諾。

## （二）劉資元

四個猶大中，劉資元是最接近火炬的人，與其說他反對火炬的觀點，不如說他被當局的恐怖所嚇倒，當他明白張錫錕正在出版火炬時，他知道殺頭的危險正向火炬成員逼近。由於劉資元內心深處十分輕鄙林扯高，但不相信「天地之間有正氣」，有鐵著心用自己的腦袋甘願為真理獻身的英雄人物。劉資元雖然對毛澤東的黑暗統治不滿，但對今後的政治局勢卻一片模糊。

文革初期，因為他的牢騷，成為六隊批鬥的重點人物，張錫錕一度把他當成在六隊的知心朋友之一，可惜張錫錕卻忽略了劉資元素質上的缺陷，此人是一個自私、心胸狹隘、缺乏服從真理的人。

他的懦夫天性佔據了上風，在與張錫錕的交往中，劉資元越來越感到，同張錫錕接近，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經過了無數次思考，他決定與張錫錕和火炬成員劃清界線，以求自保。

現在，當劉資元以出賣「火炬」公開亮相後，原先能同他講幾句話的人，突然變得陌生起來，有些人眼裡還射出蔑視的目光，一些人站在遠處，戳著他的脊梁骨竊竊咒罵，他深深感到孤獨和無助。

這種心理上的痛苦，是他沒有估計到的，就像為三十個金幣而出賣耶穌的猶大一樣，一旦骯髒的交易成功後，那冥冥之中的正氣，便天天折磨著他。使他原本就虛弱的內心，更加脆弱。不過他的靈魂已經墮落，但他仍看不起粗俗的林扯高，更看不起下流的陳賢士。

自從張錫錕被害後，林扯高曾對劉資元許下的減刑和提前釋放的諾言，像一句永遠無法兌現的空話，再沒有被提起過。

劉資元過去犯過頭痛病，最近越來越加劇了，開始時，他還以為是一般的傷風感冒。但頭痛一天天加重，每到深夜都會發作，而且持續時間越來越長。

好幾次到場部醫院就診，醫生似乎猜準了他的內心活動，囑他「病由心起，只有把心情放鬆，注意調養，自會痊癒」，但他服了鎮靜藥後，始終不見好轉。病情反而日益加重。

有時候從夢中痛醒，連呼「張錫錕」。他醒來說，夢見張錫錕一臉是血，站在他的窗下，正向他喊道：「還我頭來！」於是驚得一身虛汗，頭痛驟起，夜不能寐。

當陳賢士墜車身亡後，六隊便紛紛傳言，說張錫錕的陰魂不散，要不然還不到兩個月，便從冥界伸出手來，拉陳賢士去陪命，還說劉資元的頭痛病，定是張錫錕不甘心，第二個賠命的人就是他了。

劉資元聽到人們的紛紛議論，心中更加發毛，有時頭痛發作，他跪在床前喃喃禱告。何慶雲聽說後，向他說道：「劉資元，把你從嚴管組調到菜蔬組，本是政府人道主義的挽救，你可不要時冷時熱。」

張錫錕被害後，他就再沒看到過林扯高，本來可以把林扯高當成一把保護傘，現在去找誰來兌現提前釋放的許諾？

日趨加重的精神壓力，終於使劉資元在一個早上倒床不起，何慶雲還警告他：「別用裝死狗的辦法來要脅政府，」後來同意讓他到醫院作一個徹底的檢查。

醫院對劉資元的怪病也感到無可奈何，正好有一個從西昌剛調來的醫生，在對他診斷後說，他患了一種名字挺古怪的精神病。也不知是這位醫生在賣弄醫術，還是真有其病。劉資元便是以「頭風病」收進了農場的醫院。

「三國演義」中曹孟德患過這種古怪的毛病。說華佗曾為丞相治過這種病，不過要開顱取瘤，這引起了奸雄的大忌，華佗因此喪命，看來這頭風病確有其病了。

劉資元住院後，「頭風病」日趨惡化，常常從晚上十一點至次日早上，通宵達旦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聲，有人說，這是張錫錕的幽靈來找他了，又有人說他是為了保外就醫故意裝出來的，誰都說不清楚劉資元的病究竟是怎麼回事。

醫院地處二道溝的最下游地段，從兩個大水庫放出的水，經過幾十公里蜿蜒曲折的堰溝流入這裡的總渠，然後再經過總渠注入甘海河，再流到小金河中。

經過二道溝流放者持續十年的艱苦勞役，醫院附近的稻田，已是農場的主要稻米生產基地之一。

醫院距總渠僅五十公尺，為了取水的方便，醫院就在總渠旁邊修建了一個面積二十平方公尺、深為五公尺的大水井。每天清晨五點鐘左右，醫院的炊事員便要早起床，打著手電筒到這個儲水井挑水煮飯。

一九七六年的春節，初五的一天早晨，刮了一夜的西北風，終於開始安靜下來，挑水的炊事員打著手電筒來到井邊，放下水桶後，對著凍僵了的手指連連哈氣。

挑水的炊事員覺得奇怪，今天醫院二樓的病房靜悄悄的，沒有聽見劉資元瘋狂的痛苦呼喊。等到手指頭稍稍暖和可以動彈以後，他便提著水桶砸開薄冰，向井中投去。

說來奇怪，水桶砸破了冰層後，卻像擱在什麼東西上面並不下沉，於是，炊事員用力將水桶按下取水，可是好像有一種軟綿綿的東西托住了水桶，怎麼也按不下去，待他再次的用力一提一按時，突然，水中冒出了一大堆黑糊糊的東西，在天色還沒全亮的時候，難以分辨究竟是什麼東西。

於是那炊事員索性把兩個桶都提了上來，從衣兜裡取出手電筒朝那堆東西照去，但看不清楚，好像是一件泡在水裡的棉衣，他嘀咕道：「誰把爛棉衣扔到這裡，缺德。」

於是把手電筒再移近仔細一看，不看則罷，一看周身的汗毛頓時倒豎起來，原來棉衣領口處分明是一顆人頭，頭髮還在冰水中散開，臉面朝下。

炊事員一驚，丟了魂似的扔下扁擔，拔腿向廚房狂跑。一邊跑，一邊大聲喊著：「有人跳水啦！」

十分鐘以後，兩個看守醫院的門衛便同他一起來到出事地點，三個人用扁擔和抓勾還是無法打撈上來，後來又去醫院叫了幾個值班的醫護人員，靠兩根繩子，七手八腳把那具屍體拽了上來，此時天已大亮，撈上來的大胖臉，面朝著天，臉腫得活像一隻吹漲了的死豬，一時無法辨認出究竟是誰。

各病房立刻清點人數，唯獨不見了二樓四病房的劉資元。翻找他的遺物，留下的是一大堆寫滿字的紙：隸書、楷書、不見任何遺書之類的東西。

有人說：「一定是張錫錕的冤魂夜夜與他爭理，最後把他引到這裡結束了生命。」有的說：「一定是頭痛得無法忍耐，想到這個自我解脫的辦法。」還有的說「這是天老爺的懲罰，天理難容啊。」正因為他不可饒恕的罪惡，上帝在把他打入地獄前，活活地用頭疼來折磨他，使他也體驗一下「生不如死」的滋味。

一個罪惡的靈魂，就這樣丟下了這具醜陋的軀殼，下到地獄中去了，同病房的人再也不會被他徹夜的大呼小叫吵得無法入睡了，沒有人同情他，也不知他的家在那裡，不知當局是否派人通知了他的家屬。

當天便將他草草埋了，仍葬在六隊的五號樑子上，那兒是奴隸們的「公墓」。

### （三）黃學全

在出賣張錫錕的四名「猶大」當中，要數黃學全在何慶雲心中的印象最壞，那是因為他累次的逃跑，創下了農六隊逃跑的最高記錄，也成了全農場的最高記錄。

黃學全每次外逃，何慶雲都要到場部管教科登記。在申請追捕組的追捕令時，何慶雲照例會受到場部管教科的批評，最少也要受到埋怨：「你是怎麼搞的嘛，你也太大意了，抓回來才幾天，怎麼又跑了？」

一九七六年，當黃母獲悉黃學全有立功表現，六隊正在整理他的檔案，一種熾熱的希望使她欣喜若狂。她向所有的親戚拉債，在那種副食品靠票證供應的年頭，通過走後門拉關係，弄出很多的高級餅子、炒麵、豬油，每

月裝在大桶裡，給她的寶貝兒子寄來。

六隊的流放者，看到黃學全家裡按月給他寄來了這麼多獄中稀缺的副食，都以為他的家裡是當今的哪一級權貴，殊不知這一切，都是黃母砸鍋賣鐵傾家蕩產籌集來的。黃學全本人未必清楚在這些千里寄來的東西裡，藏著他母親從身上擠出來的血和淚。

在大田組的日子裡，黃學全除自己暴飲暴食盡情「享受」母親的血汗外，還用所餘的東西請人幫他完成每天的任務，以逃避挑燈夜戰的懲罰。用高級餅子收買其他的勞動力，又招致了組長的妒忌，常常藉口他的任務完成質量太差，給黃學全小鞋穿，難免晚上「找原因」。這種逼迫，又促使他窺測逃亡的機會。

當然對這個不孝不仁的人，老天爺並沒有饒恕他。

正在窺探逃亡的機會時，不知他從什麼時候開始，便感到腸胃不適，奇怪的飢餓感，使他暴飲暴食，而毫無節制的飲食，使他的腹痛一天天加劇起來。

半個月以後，黃學全發現排出的糞便是黑色的。唐啟榮告訴他，可能是胃出血。要他在飲食上注意節制。為確診自己的病，黃學全專門請了假去醫院檢查化驗。化驗的結果證實是腸胃出血。

由於病理上帶來的恐懼，加速了黃學全最後一次的逃亡。從醫院出來的當天下午，他乘四下無人的機會，倉皇的向梅雨方向逃去，可還沒有逃到梅雨時，就被唐啟榮察覺，立即派人去追，結果在梅雨的山溝裡截住了他，只見那時他正蹲在地上，胃疼使他臉上沁出了豆粒般的汗珠，臉色慘白。

帶回六隊後，終於倒床，他日夜打定主意的逃亡計畫被迫中止。

然而全組的人卻紛紛議論，說他純粹是自己飲食無度，家裡寄來的東西太多，造成他死吃爛撐的結果。

徐世奎也公開指責他，還將家裡寄來的營養品扣下，不再發給他。平時看不慣他的同組人，無不火上加油，代朝謀擺出自己的威風，還催促著已經倒床不起的黃學全出工。

那時，按隊部規定，凡是未被醫院收住的人，一律要出工。黃學全真的被代朝謀押到了工地上，聽任同組人冷言冷語的譏諷，然而不出幾天，黃學全在工地上開始吐血。

那是一九七六年夏天，距劉資元在醫院自殺剛好半年，唐啟榮因此把他送進了醫院。

這一次，醫院對黃學全進行了確診，認定他患有晚期胃癌，並預計他最多只能活一個月，醫院對他開了先例，向他母親發了病危通知書。

接到病危通知書的黃母，懷著不安的心情匆匆從成都南下，千里迢迢的奔向鹽源。

無需去責備黃母為不孝兒子所付出的一切。因為偉大的母愛是人類的共性，儘管不孝肖子辜負了自己的母親，而母親對兒子的愛，卻永遠是無私的。

黃母到了鹽源農場醫院的病床旁，見到了奄奄一息的兒子。她知道癌是絕症，如今白髮人送黑髮人，她是一路哭一路淚來到鹽源的。出於母愛的天性，她已做了一個母親可以做到的一切，悲痛之餘，她才知道張錫錕的遇害，以及獨生兒子的極不光彩行為。

原來張黃兩家的母親，素來都以姐妹相稱，交往十分的親密。

第二天，她匆匆趕到鹽源縣城，買了一大捆香燭紙錢，打聽到埋葬張錫錕的墓地就在五號梁子上，便特別的找了一個人領路，陪同她一起來到埋葬張錫錕的墳前，默默擺開了香蠟，擺上特意選好的幾個大蘋果，一包花生米和一包切好的臘肉，放在準備好的三個盤子裡，便開始在那墳前閉目，口中念念有詞。深深鞠躬，請求張錫錕原諒她不忠不孝的獨生子。

而今兩個孩子，一個已埋在面前的土堆裡，一個還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她彷彿聽到兩個孩子兒時嬉笑聲，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大聲地向著那灰色的蒼穹悲嚎起來：「錫錕哪，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死得冤！死得冤哪！我對不起你啊。黃兒對不起你啊，您就看在我這個孤老婆子的面子上，饒了他吧，饒了他吧……」

喊著，喊著，她已經跪倒在埋葬張錫錕的土包前面。一面用她那蒼老的手撫摸著那墳堆上的黃土，一面向墳包連連叩頭。

天邊突然響起了驚雷，狂風陡起，濃雲已從四面八方的聚攏過來了。「走吧！黃媽媽，天要下雨了，再不走，就……」那帶路人帶著傷感，催促著這個近似瘋狂的老女人離開。

老淚縱橫的黃母抬起頭，在帶路人的牽扶下，一步一顫地離開了五號樑子。

然而，黃母不管怎麼的哀求，不管怎麼的表白，都已經遲了。一個星期以後，她那嬌生慣養大逆不道的獨生子，終於在病床上咽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兒子死了，黃母希望能把這個寶貝兒子的遺體運回成都，但遭到了場部的拒絕。

根據場部的規定，凡是服刑期未滿的流放者死後，必須就地埋葬。無論黃母怎樣苦苦哀求，當局還是在黃學全死去的第二天把他裝上了一個簡陋的「棺木」，由四個人抬著，送上了五號樑子，同張錫錕相隔了一個小山頭埋下。

安葬的那一天，黃母跌跌撞撞來到幾天前才來過的地方，上得山來，尋覓張錫錕那墳包，在她昏花的眼睛中，她驚奇看到幾天前親手擺的三個盤子和香蠟不見了。在那裡，分明擺著一束剛剛從田野採來的弄得十分整齊的十樣棉花！

張錫錕犧牲後僅一年，出賣他的三個猶大，相繼帶著罪惡去了地獄，這決不是巧合。

天地間自有一股正氣潛藏，它通過懲惡揚善來顯示自己的威嚴。

#### （四）王世春

出賣張錫錕的四個人中，還剩下了一個王世春。

一九七九年我獲平反回到重慶時，他被調往農二隊，林扯高對他的「許諾」本來就是一個欺哄，一會兒說答應給他記功，一會兒說答應給他減刑。

王世春當然明白，共產黨是一群連自己都要欺騙的人，更何況是對他這種「老牌」的歷史反革命。他算是四個人中最早懺悔的一個。

農二隊過來的人說，王世春已經在流放者中公開認錯，懺悔，請求大家原諒他！並說他常常夢見張錫錕，說他等待著上蒼的懲罰，原先那套嘩眾取寵的表演也消失了，默默地過著平淡的「囚奴」生活。

直到一九八三年，據在重慶的馮俊伯講，他已經滿頭白髮，背也駝了。當局給他一頂「刑滿釋放」的帽子回到重慶後，原想依附於三個已成了家的女兒，沒想到親生的女兒一個也不接納他。

無奈下，便用刑滿釋放後領取的幾千元安置費，在上清寺附近的小巷子裡擺了一個書攤，以出租小人書為生，晚上就蜷縮在一間只蓋石棉瓦的小樓閣裡，渡度著他的餘生。

據周圍的居民講，白天，王世春在小人書攤前，還向一群租書的大人孩子們講述他「寶書藥方」那一段故事「……嘿，用這膏藥貼在小兒的肚臍眼上，叫他不哭不鬧」。圍觀的人們報以哈哈大笑。這大概是在他的煉獄中，最值得引以自豪的故事。

但是那一段出賣張錫錕的故事，他永遠也不敢再提起。

當時有市民問他：「嘿！老頭，你那兩下子怎麼不去朝天門做點江湖郎中生意？」

大約在重慶生活了兩年，王世春也感到無顏去同鹽源農場裡的人見面敘舊，孟平曾碰見他，並告訴他我的地址，要他來找我敘敘舊，但是他一直沒敢來。

我肯定不會去找他，一來沒有時間，二來不值得。直到他死，我都不知道他在哪裡擺書攤，只聽說他死後三天，街坊鄰居因多日沒有見他出來擺書攤，才撞開他的小門，只見他直挺挺躺在一張破床上已死去多日了，身上只裹著一床破被蓋！

## 第十章：「文革」尾聲

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治國論，是以暴力和欺騙兩手為出發點的，他對黑五類、右派無緣無故的殘害，正是建立在人心可以用暴力扭曲，用欺騙麻痺的，中共所謂「改造」便是交替使用暴力和欺騙兩手，以達到奴役人的目的，可惜時間長了，無論當局如何玩弄手腕，絲毫沒能改變我們的反抗。

文革開始後，陳力便從農六隊押赴鹽源縣監獄隔離反省，無奈的中共準備用「處決」來鎮壓一切反抗力量，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帶著花崗石腦袋去見上帝的人總是有的」。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陳力終於被殺。

槍殺陳力，證明當局的「改造」政策已失敗。他們無法使陳力屈服，但他們不甘心失敗，想繼續在我的身上撈一把，以體現他們的洗腦「改造」術。

管教科仍將我留在蔬菜組內，從事無定額的勞動，定期找我個別談話，允許我「暢所欲言」，以體現他們的「感化教育」。抓住我同農六隊其他政治犯認識差異，有意的擴大矛盾，製造隔閡。

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六年間，我沒有挨過網綁和毆打，算是體現他們改造我的「苦心」。

一九六八年，在文革最猖狂的年代，在我以絕食抵制對我的無理批鬥毆打後，何慶雲主張對我施行「高壓強制為主，兼以懷柔為輔」的政策，把我當成「思想改造」的試驗田。

他們期待著，那怕我在口頭上認了「罪」，遵守勞改制度，講他們所灌輸的話，便是他們對政治犯「改造」的一大政績。認為通過我能影響一大批人。

但是，我向他明確表態說：我是無辜的，根本沒有必要認罪，而不認罪，就談不上「改造」，更重要的是，中共的主張是反人民、反民主、反人性的東西，怎能說服我？

每次我與何慶雲正面交鋒時，往往是以「改造」我開始，卻以他被我反駁為結束。

一九七四年「火炬案件」發生，特別是他們處決張錫錕時，他表現出來的視死如歸的精神，給劊子手巨大的心理震撼，使他們用毛澤東思想改造人徹底失去了信心，其實改造是欺騙和奴役的代名詞，奴役是靠暴力進行的。

所以，徐世奎當著全中隊的面，氣急敗壞地說我是「只配用釘錘錘的『核桃』」，並且公開警告我「張錫錕的下場，就是你的下場」。打殺是獄吏們最後的最簡單的手段！

「文革」九年來種種倒行逆施，證明毛澤東的欺騙已盡失人心。革命委員會頻繁的人事變動，武鬥的升級，各種謠言的雀起，民間盛傳的有關江山易色的謠傳，亂世之末的徵兆，紛紛表現出來。

預言家說毛牛山上有神人顯靈，說中共天下拆開一個共字，便是二十八年。又說毛澤東的繁體字共二十八畫，印證著他的天下只有二十八年的壽命，這是最流行的說法，毛澤東已走完了他的稱帝路。

### 第一節：變臉

在——八搜查「火炬」撲空後，面對著我提出的抗議，惱羞成怒的何慶雲，將我調出了蔬菜組。我明白當局將採用更強硬的措施替代「說教」。

當然，他們更希望從我身上搜出有關「火炬」的證據，可惜一無所獲。處決張錫錕，更進一步證明對「頑固不化」的份子，改造必告失敗。所以他們撕破了臉，想用高強度勞役，逼使就範。

我被調入大田組以後，屬於勞動力最差的人，所以每到春耕和秋收，我常常是晚上坐在壩子裡「找原因」的常客。

### （一）報復的挨捆

一九七五年夏天某日，中耕玉米時，我們在四號梁玉米地裡除草施肥，天氣異常悶熱，在茂密的玉米林中密不透風，奴隸們揮汗如雨忙著完成規定的任務。

那天早上起來，我就感到頭悶，帶著一種中暑的感覺。我想自調出蔬菜組後，要加倍領受何慶雲的報復，所以我沒有請病假，希望熬過幾小時病症自行解除，殊不知，到工地不久，便滿眼金星，頭昏胸悶想嘔吐，眼前一片黑，我便倒在茬口上。

旁邊的人忙於完成自己的任務，並沒有發現我，等他們排上第二個茬口時，正好何慶雲檢查已經拔過的玉米，鑽進玉米林裡，才發現躺在地上的我。

他陰沈著臉問道：「你看所有的人都快拔完第二行了，只有你一個人躺在這裡睡大覺，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我明白，他所說的老毛病就是指「耍死狗」。

從甘洛開始，我便是以「耍死狗」聞名全場，何慶雲估計我從菜蔬組調出來後會「舊病復發」，他鼻子裡哼著冷氣，陰陽怪氣地說道：「這麼多年，我們苦口婆心地給你講道理，長期等待你轉變，安排你無定額的蔬菜勞動，你卻不識相。看來對你還是要來硬的。」

我依然躺在那裡沒有理他，他見我如此藐視他，火冒三丈，踢了我幾腳，便走出了玉米地。

中暑的感覺越來越嚴重，頭昏沉沉的，感覺發高燒了。

不一會兒何慶雲便帶著兩個士兵來「請」我了。兩個士兵沒有說話，將我拖出玉米地，在何慶雲的授意下，將我按倒在地上，拳打腳踢後將我捆了起來。

捆好後，抓住繩子，反背在肩上狠狠催緊。頓時，我感到骨頭快散架了，呼吸急促，一陣劇痛後，那士兵還不甘休，將勒緊的我雙腳凌空，整個身體旋轉起來，頓時我的胯關節像撕裂了一樣。

當他將我從他的肩上放到地上時，我已無法站立，從士兵的背上滑跌下來，一動不動的睡在潮濕的地上。

收工時，我像昏死了一樣，幾個人抬著我進了鐵監門放在六隊大壩子中，鬆綁以後，我被人扶進了監舍，唐啟榮診斷，說胯關節脫臼。

我被弄成胯關節脫臼，只允許我休息了兩天。第三天，何慶雲親自命令代朝謀將我押到工地上去，「就是死也給我死到工地上」，他吼道。

蔡先祿和王文典害怕我再吃「眼前虧」，悄悄地向我說，「反正醫生開了假條，你的任務是不算的，與其在監舍裡繼續被節外生枝的找麻煩，倒不如到工地上去休息、曬曬太陽、換換空氣，總比呆在監舍裡強。」

我就由他們攙扶著上了四號梁子，躺在帶來的一床棕蓆衣上，無可奈何的被迫出工了。

從此以後，我就帶著韌帶拉傷的傷痛，每到陰雨季節，左胯關節都會穩穩作疼，有時嚴重得要借手杖支撐著才能走動，每當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起這次受刑。

### （二）「特赦」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北京城爆發了毛澤東生前第一次規模空前的反獨裁、反專制的學生運動。預示著毛澤東的獨裁統治進入癌症晚期。

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從廣播中傳出的哀樂中，已能隱隱約約聽到反對中國一人獨裁的吶喊聲，天安門上喊出了「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四月五日一聲驚雷，壓抑民眾向全世界吹響了「神州欲變，風雨已迷天。昏星暗月，紅日當頭已顯難。姐已想統赤縣，自稱武則天。長江日夜向東流，聚義群雄在人間」的號角。

將江青公開比作姐已，毛澤東理所當然就是暴虐無比的紂王了。

為了對付兩百個赤手空拳的祭掃哀師，獨裁者竟出動了三萬民兵，九個營的正規軍，三千名公安人員，在天安門廣場上演出生無人道的大屠殺。毛澤東已經感到自己坐在一觸即發的火山口上。

中蘇兩大國為爭奪老大地位而劍拔弩張，客觀上為中美關係的解凍創造了條件。一九七二年上海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開啟了一個新歷史進程。

根據上海公報的有關條款，一九七五年中共頒佈了對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的特赦令，對所有在押的國民黨人員實行大赦。

經過二十多年的苦役摧殘和公開殺戮，當年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已所剩無幾。倖存下來的人，也垂垂老矣。已年屆六十五歲的潘朝元，便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熬過了二十多年的煉獄，在一九七五年「國慶日」前，離開了鹽源農場，回到了重慶。

我的胯關節韌帶受傷剛剛康復，特地利用了一個下午的空閒，趕到場部去拜望他。

我找到那裡時，他們都在休息，我見他們全部睡在地鋪上。五十多個被遣送人員，大部份我都認識。其中有一半是要回重慶的。年齡最小的也五十歲了。雖然已脫下了平時襤褸的勞改服，換上了統一縫製的制服，表面上似乎精神了許多，但那強打起來的精神，無論如何都掩蓋不了二十年煉獄的傷痕。他們所經歷的歲月，早已刻在他們佈滿皺紋的臉上了。

他們出獄後，還能活幾年？中共對他們進行長期洗腦，已將它們中的絕大多數變成了政治上的啞巴，晚景淒涼。

無產階級專政卻還要在他們身上大做「人道主義」文章，中共宣傳機器像當年特赦戰犯，在報紙上接連登載他們的報導和照片，掩蓋他們身上煉獄留下的傷痕和血腥氣。

那天下午，我同潘朝元、徐伯威、張清雲會面，坐在「街心花園」的石凳上促膝談心。原想好好暢述一番，可惜我們四人落座後，是談十五年來的獄中苦難？還是回憶鐵窗裡傷心歷程？風風雨雨豈是幾句話所能暢述的。

若講眼下的政局，從珍寶島衝突到尼克森訪華，將這二十年的事件串竄在一起，在這裡能暢談麼？何況老頭子們的棱角早已被煉獄磨鈍了。

於是我們只好默默對視，相對無言，靜數對方額上的皺紋。

默默無言許久，我便問起回歸的日程安排，潘朝元簡單的追述著相別了二十多年妻兒的下落，我拿出預先準備的筆記本，請他留下重慶最先落腳的地址。

潘老告訴我回重慶以後，暫時留住在女兒家中，還不知重慶方面的「統戰部門」如何安頓他？

徐伯威則告訴我，他回成都，也暫落腳大女兒家，他的條件比潘朝元似乎好一些，成都市的參事室已向他發來了邀請函，請他寫一點回憶錄和孫子兵法注釋之類的東西。

在潘老返回重慶後的一個月後，我就接到了他發來的第一封信。說他在距菜元壩不遠的黃沙溪一家百貨商店站櫃臺，每月薪水四十元。

看來中共將他們奴役了大半輩子，還要靠自己用勞動來換取極低微的報酬以饗晚年，這大概就叫共產黨「改造人成為自食其力者」的結果吧！

張清雲也來了信，他寫得十分耐人尋味。介紹成都地區的生活水平，說小菜已是二十分一斤，而豬肉是三分一斤。張清雲在信中雖沒有直言一路陡漲的生活費用，卻把每月四十元收入的拮据狀況作了陳述，可謂曲筆通幽。

我給潘老寫的回信中，只是囑他抽空去看看我北碚蔡家場的母親，他果然就在第二年抽空去了一趟蔡家場。

潘老是我在獄中所遇到相處最久的長輩，一九六〇年，我在入獄時就認識了他，一九六三年初，我倆同批發配涼山的甘洛農場，一同渡過了甘洛的鬼門關，又一同從甘洛送到西昌鹽源，彼此成為獄中的生死之交，他正直的品格銘刻在我的心中。

### （三）苛刑

一九七四年初，我們正在籌畫「火炬」時，李克嘉從地震棚裡越獄潛逃了，他的出逃，事前沒有任何人知道，他身材魁梧，擅長野外生存，只要逃出去，抓捕就有相當的難度，所以在六隊，他一直沒有脫離過嚴管組，這第二次逃亡，立即引起了監獄當局的重視。

出逃第二天，場部成立了陳文仲為組長的追捕小組，向西昌及四川境內發了通緝令，各公路要道、水路、橋樑都發了他的近照，設卡嚴查，重點捉拿。

但是半年過去了，李克嘉卻沒有任何消息，好像他逃出了當局布下的「天羅地網」。

這一年夏天，又發生了黃學全從小監屋頂越獄潛逃的事件。一連跑了兩個要犯，六隊的氣氛顯得格外緊張。

因為林扯高和何慶雲積怨很深，互鬥的結果，氣出在押奴隸身上，一度因林彪事件而緩和的氣氛，再度緊張起來。

打人風潮也在六隊壩子裡重新掀起，黃學全不久被抓回，並根據林扯高的提議，把他從小監放到大監，以赦免他的死刑為條件，要他告密「火炬」。

七五年十二月，出逃近兩年的李克嘉，也被場部的追捕組帶回了六隊。

那時，正是北風凜冽、嚴霜覆蓋的季節，我們身穿特製的棉鎧甲仍冷得瑟瑟作抖。剛剛吃過早飯，便看到追捕組兩個成員將李克嘉從大鐵門外押了進來。

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李克嘉，就像是一頭被亂槍打得全身窟窿，再用鐵絲捆起來的野獸。真不知他是怎樣熬過這酷刑的？在凜冽的寒風中，李克嘉赤裸的雙臂幾乎呈紫色，上身只披著一件大紅背心，而他的手臂和肘腕被兩根粗鐵絲纏裹著，深深陷進了肉裡，手腕上還銬著一副鐵銬，膝關節部位又被粗鐵絲纏鎖著，腳上套著雙藍色布面膠鞋，雖沒上腳鐐，卻比上腳鐐更難開步。

這些年來，凡被捉回的「逃亡者」，照例是被「修理」得遍體鱗傷，慘不忍睹，好像不用這種殘酷手段，就不足以產生震懾作用。

李克嘉押回當天，就在「反省」圈裡整整站了一個上午，寒冷的天氣，使他瑟瑟發抖，到了中午，大家收工回來後，何慶雲才叫唐啟榮和一個鐵匠為他剪斷已嵌入肉中的粗鐵絲。

剪下的鐵絲帶著發紫的肉，每剪一段他都發出一陣痛苦的喊叫，何慶雲想用這種慘不忍睹的現場，來恐嚇六隊的逃亡者，但我看來，這又是一份對無產階級專政極好的控訴。

李克嘉被抓回，人們對抓捕他議論紛紛，有人說，在鄭州抓捕他時，追捕的人衝進李克嘉藏身的地方，遭到了他赤手空拳的拒捕，終因寡不敵眾，他被越來越多的民兵和公安制服。然後就像捆野獸一樣，用鐵絲捆了起來。

也有人說，李克嘉被抓到以後，在押送的路途上掙脫手銬，還打傷了押送者，再次逃掉。被當地民兵包圍捉住以後，惱怒的追捕者，便不用手銬，而用鐵絲把他捆了回來。

這天晚上點名集合時，正逢林扯高值班，他夾著那本深綠色的點名冊，還沒開始點名，就扯開嗓子喊道：「你們已經看到了，頑固不化決心與人民為敵的李克嘉，現在被抓回來了。你們不是說李克嘉都已經跑了一年多了，恐怕再也抓不到他了嗎？」。

今天，你們也親眼看到了他的下場，誰也不要再心存僥倖，想逃脫人民的法網。李克嘉今天的下場，再次證明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論段『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到滅亡』的正確。六隊還有人反心不死，也只有死路一條。」

林扯高揮舞拳頭，神氣活現，好像六隊囚奴們的命運都攥在他的手心裡。

聽林扯高眉飛色舞的訓話，在文革已接近尾聲時，六隊接著發生張錫錕事件，現在又親眼目睹李克嘉被弄成這樣，感到劊子手已經瘋狂，會不會來一次垂死前的大屠殺？大家都在思考怎樣渡過這段時光？六隊的氣氛非常緊張。

李克嘉被關進反省室，曾風聞他將同張錫錕一道押赴刑場，準備「秋後問斬」。但過了幾個月以後，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出人意外他卻從小監裡放了出來，而且沒有重新關進嚴管組中，而被編入大田二組。

當人們盤問他出逃的動機時，他拒絕回答，好奇的人們於是猜測，他有一些沒人知道的隱情，北京城裡爆發的「四五」運動，是不是與他有某種聯繫？

大約在四月底，因為天安門事件，引發了監獄當局那根異常敏感的神經，借五一「大檢查」名義，六隊進行了繼七四年十一月八日大搜查以來又一次徹底搜查。主要搜查我們從報上摘抄下來的天安門詩作。

#### （四）四個馬鈴薯人

鹽源盛產馬鈴薯，十幾年來，我們利用「工餘」時間在地裡翻檢這些「加班糧」，從沒人想到用它來進行藝術造型，然而李克嘉卻用馬鈴薯來造型人體。

他先用小刀將馬鈴薯刻出了頭和身子，再雕出眼睛、鼻子、面頰、嘴和耳朵，還用了彩筆勾畫了眉毛和頭髮。在身上畫上彩色的衣服，最後將馬鈴薯人的下端切平，四個小巧玲瓏栩栩如生的人體藝術雕塑，被他擺到他的木箱子上。

更為奇特的是，四個馬鈴薯人中的一個，畫上了齊肩的長髮。三男一女四個馬鈴薯娃，擺在李克嘉的箱子上看著李克嘉。

這一年，「五·一」大檢查時，檢查人命令李克嘉抬出木箱，他按照檢查人指定的地點，將木箱連同四個馬鈴薯人，一起搬了出來，放在檢查人的面前。

四個馬鈴薯雕塑人像，一下子吸引了林扯高的注意力。林扯高瞪大了眼睛，直接走到李克嘉的位置上，站在四個馬鈴薯人面前仔細端詳審視，然後指著四個馬鈴薯人，一臉嚴肅地責問李克嘉：

「這是什麼？」

「馬鈴薯。」李克嘉漫不經心地回答道。

「我是問你，你把四個馬鈴薯做成了什麼？」林扯高厲聲的喝斥著。既不願意當眾點穿啞謎，也不想李克嘉面前示弱。

「人體造型。」李克嘉很隨便的態度被林扯高理解成對他的藐視，在林扯高看來，四個馬鈴薯娃，是一起很嚴重的「政治事件」，四個馬鈴薯娃，正好擊中了林扯高心中的鬼胎。

這些年來，經歷了獄中文字獄的長期迫害，知道當局可以隨便找一個藉口，為一句話，一個動作，一個表情，動不動對囚奴一頓毒打。

三年前的徐世均，就因用有毛澤東畫像的報紙包東西，差點要了他的命。不過，李克嘉沒有絲毫驚慌，反而嘲弄了對方，使林扯高十分狼狽。

「你別裝蒜，李克嘉，你是大學生，我知道你們這些臭知識份子，向來喜歡用暗語、影射之類的手法散佈你們的反動觀點。你今天必須向我交代清楚，這四個馬鈴薯人你指的是誰？你雕這四個小人的目的是什麼？」林扯高直點正題，逼問李克嘉。

李克嘉依然平靜的回答道：「我可沒有任何意思，我覺得好玩，閒著沒事，隨便雕雕，怎麼？犯了那條法？」語氣裡顯出明顯的諷刺。

林扯高的火氣上升：「混蛋，我這是在問你！你做的四個人究竟是影射的誰？別給我裝蒜。今天不交代待清楚，有你的好果子吃。」

兩個人的對話看似玄虛，當時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了。中國政局的動盪和分裂，到了文革晚期，毛澤東已無力繼續控制局勢了。

中國自古以來就盛行巫蠱之術。民間對於奈何不得的敵人和仇家，往往請來巫師，仿造對方的形象，紮成一個草人或布娃娃，並在草人或布娃娃的身上寫上仇人的名字及生庚年月，然後施以「法術」，用咒語、火燒、溺水、針刺等方法來詛咒仇家。據說如此作法，可以使之心神不寧，或發狂生病，甚至於遭到橫禍。

巫蠱之術傳播很廣，我只是聽到過這方面的故事和傳說，並沒在生活中看到這種把戲真見效，小時候看到小夥伴玩過這種遊戲：紮了一個小布人，說是某個欺負過他的人，然後用手比作槍，對準小布人，嘴裡發出叭叭叭的槍聲。

共產黨執政以來，嚴厲取締了宗教和民間信仰。巫師道長的咒語和法術早已絕跡。怎麼到了今天，林扯高會把李克嘉的馬鈴薯人當成了巫蠱之術，相信這李克嘉在監房中作法，來發洩對當今的不滿？

林扯高平時一貫瘋瘋扯扯，六隊流放者確實沒把他放在眼裡，但張錫錕一案以後，卻給我們上了一課。斷不可小覷這個頭腦簡單的傢伙。他照樣能用毛澤東那套整人方法，把我們送上斷頭臺。

此刻，林扯高看著四個馬鈴薯人，臉上露出一股陰森森的殺氣。李克嘉已經感到了一場殺身之禍正在向他逼來，所以沈默不語，靜靜地觀察。

「李克嘉你說說，不多不少，你只做了四個馬鈴薯人。又不多不少，只有一個女人。你別裝糊塗，你究竟借此來影射誰，咒罵誰？你是聰明人，你知道，攻擊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算是自由公民，弄得不好也要殺頭的，何況你是個犯人？」

林扯高幾乎將四個馬鈴薯人的性質點穿了。院壩裡的人們，即使平時不關心政治的，也被他點醒了，便將眼光一起掃射了過來。

製作這四個馬鈴薯人，純粹出於李克嘉的藝術欣賞？還是另有所指？問題的嚴重性恰恰在於，經林扯高這麼一「認定」，只消將「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罪名按在李克嘉的頭上，那麼李克嘉的生死簿，就攥在林扯高的手裡了。

此刻的李克嘉已完全明白，他的四個小馬鈴薯人，已把他推向了「絕境」。

李克嘉被再次關進了小監，而且情況比上次從鄭州抓回來嚴重得多，除了套上十五公斤重的死囚腳鐐外，還加上手銬。

四個小馬鈴薯人被當成了「罪證」，被林扯高小心翼翼地裝進了一個特製公文箱裡。隨即，比張錫錕更殘酷的刑訊加到他的頭上。李克嘉無意中，成了林扯高往上爬的墊腳石。

然而，李克嘉在小監關了五個月後，便傳來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政治氣候陡然驟變，他不但保住了性命，還因此獲得了提前釋放。

## （五）特大喜訊

就在緊張追捕劉順森等三人的同時，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豬圈裡淘豬糞，突然聽到場部的高音喇叭裡一遍又一遍的播放著《蝶戀花·答李淑一》。中共把這首詞曲當成喪歌。每當中央廣播電臺裡反覆播送這首喪歌，人們便知道中共的某位要人一命嗚呼了。

由於連日廣播都有毛澤東健康情況的公告，我猜想這哀樂便是宣告毛魔命歸黃泉了。正挑著豬糞向場部方向走去，卻被興沖沖的陳孝虞叫住。

走近以後，陳孝虞附著我的耳朵告訴我：「特大的喜訊，老頭子駕崩了！」因為特別的興奮，兩人緊緊擁抱，我情不自禁的滿臉熱淚。

我倆放下手中的工具和糞桶，快步向六隊正面那個小山頭上跑去，想在那裡聽聽從廣播裡傳來的更多消息，然而那高音喇叭裡除了一遍一遍播送的《蝶戀花》，便是冗長的治喪委員會名單和訃告，此外，就聽不到多少有價值的東西了。

我首先想到毛澤東歸天，象徵他的專制皇權結束了，我相信，天怒人怨的毛家皇朝解體，比之歷史上任何暴政來得更快。

毛澤東對中國人民所欠血債，僅他提出大躍進的三年中餓死的人，（由於中共有意塗抹嚴密封鎖，至今沒有一個精確資料），僅四川一省，後來廖伯康說至少一千三百萬。和平年代餓殍遍地，冤獄國中，白骨成山！

同時瘋狂地擴軍備戰，畸形發展核武器，想把中國帶進萬劫不復的核戰大災難中！至於說到他對文化、教育，科學、衛生、工農業生產等等領域的蹂躪破壞，用「罄竹難書」都難以概括。

毛澤東獨裁解體後，是出現一個新的專制主義政權呢？還是順應世界潮流進入一個民主時代？這雖難以預見，但可以肯定，魔王挖空心思為保住其專制帝國永不變色的夢想，以文革徹底失敗作了絕筆。

現在，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這場空前大災難，已載入中國歷史最黑暗的一頁。

不過，他在廿八年的經營中，所建立的專制制度，機構盤根錯節，百足之蟲死而未僵，獨裁並不就此結束，中國社會還要經過一個長期痛苦的改造時期，才能從專制深淵中走出來。

我還估計，毛澤東歸天，一段時間因爭奪權力，難免親毛嫡系與「走資派」的火併，一時雖然難預計這場火併

拼的結局。但在世界民主大潮流衝擊下，東方專制主義被迫退出歷史舞臺的時間已經不遠，最起碼地說，無論他們打什麼旗號，皇帝已經不能再登上歷史舞臺了。甚至終生任職這種人類歷史最落後的政治制度，也要在中國消失了。

那天晚上，何慶雲臂戴黑紗，紮著小白花，組織六隊的全體囚徒坐在壩子裡，喇叭裡廣播喇叭一再重播這一「特大喜訊」。農六隊所有囚奴，心裡壓抑喜悅相互傳遞著，悄聲議論。

在中共這輛專制列車上，劉少奇被弄死了，林彪叛逃身亡，江青無駕駛大局的能力，最後毛死前匆匆忙忙拉了一個華國鋒，給他定下了「按既定方針辦」而閉上了眼睛，他這種做法又能延續多久呢？

毛澤東靈堂裡鬼氣瀰漫。看得出前去弔唁的人們，各懷鬼胎，都在磨刀霍霍，雙方在身後藏著一把利刃，企圖一劍擊倒對方，奪取政權一劍再定乾坤，結束這場權力爭奪的惡戰？

第二天，與隊部辦公室相隔的那堵牆上，何慶雲將老魔頭的三尺相框掛在上面。算是臨時佈置的「靈堂」。

八點多鐘，何慶雲宣佈全隊不出工，將全隊人員列隊集合，參加「向毛澤東遺體告別」的追悼大會。佇列拉開，人與人之間保持一公尺的間隔，他宣佈，開會期間不准任何人交頭接耳和喧譁嘩，專等廣播喇叭裡傳出向毛澤東遺體告別的那一剎。

主持儀式的華國鋒宣佈告別儀式開始，廣播喇叭裡一片肅穆，三鞠躬後，遠處隱隱約約傳來了嚶嚶的哭聲。

而在農六隊的壩子裡，卻傳出了一片清脆的耳光聲。這是農六隊的囚禁者在刺刀逼迫下，發生的一場「送瘟神」最後一次「悔罪儀式」。佇列深處，傳來了一聲聲詛咒。

「你在念什麼」？一個獸兵，一面朝那些不願低頭的腦後勺上劈著響亮的耳光，一面追問從佇列中發出的聲音，但是誰也沒有吭聲。

站在前面位置上的鄧自新回過頭去的時候，立即被衛兵走過去抓住：「你看什麼？」鄧自新回答道：「舒展一下頸子，已經受不了啦。」那名衛兵無法反駁，卻朝著鄧自新劈下一掌。鄧自新立刻反抗起來：「我犯了什麼

法？那有在追掉會上還打人的？」然而衛兵並不回答他，又是重重的劈下一掌。

我昂著頭站在那裡，結果我的頸項上也被重重的劈了一掌，佇列雖然還維持著原來的隊形，卻激起陣陣喧嘩，莊嚴肅穆的氣氛一掃而光。

只有何慶雲端立在佇列前方，如喪考妣，對身邊發生的騷動喧嘩裝做沒有察覺，只是呆立垂頭，三鞠躬做得虔誠恭敬。

魔頭升天了，經過魔頭幾十年的經營，此刻雖已沒有任何公開反對他的勢力。但此時此刻，統治者在更瘋狂的爭奪權力，會對反抗者施以更殘酷更瘋狂的鎮壓。災難也許將延續一段時間。

毛魔頭歸天的時候，正值劉順森從農六隊越獄的四天之後，重慶市的警備區接到了鹽源發過來關於劉順森出逃的通緝令，文革中，接到這類「邊關」發來的緊急通緝令，負責捕捉逃犯的人都禁不住要罵娘，罵那些勞改官員都是一群飯桶，拿了國家俸祿，連幾個赤手空拳的犯人都看不住，還要別人去擦屁股。

其實，鹽源監獄方自己都弄不清楚劉順森、孟平、楊漢群三人的準確出逃路線和目標。

近一年來，四川省勞改廳所屬的各監獄，發給重慶地區要求協助拘捕歸案的案子有增無減，當時，僅鹽源農場管教科的檔案櫃裡，就擺著幾十個沒有歸案的逃犯檔案，這種現象似乎更說明了政治氣候的變化，醞釀著某種動盪。

就在毛魔頭歸天這個時候，劉順森三人正坐在一輛從雅安開往成都的班車上。

## 第二節：瘋狂的油庫灣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〇九獄方正驅使二道溝的奴隸集中在油庫灣，召開一個「奮戰一百天、改造油庫灣」的誓師動員大會。

油庫灣因鹽源農場油庫所在地而得名，站在它最高處，向西俯瞰可以看到小金河從鹽源縣城外緩緩流過，回過身來，一條長五百多公尺，雨水沖刷而成的溝壑就叫油庫灣，它是一條頂部平均寬度大約五十公尺，而它的底部則被沖刷成寬度一百公尺的山溝。

### （一）監獄學「大寨」

所謂改造油庫灣，就是把這條因雨水沖刷而成的溝壑，用流放者肩挑背磨填成一灣梯田，並在這灣梯田一側的山腰上，修出一條寬八公尺的公路，成為由鹽源農場進入鹽源縣的通道，設計者把它描繪得十分宏觀。

根據測算，整個工程的土石方量大約一百萬方。如此浩大的工程，要求集中在這裡的一千名囚奴一百天內完成，這就是說，每人每天要完成十立方的挖土和搬運的工作，當時挖方的定額是兩立方，就是要求現今上油庫灣的囚奴完成正常情況的五倍工作。

平時喜歡畫漫畫的陳容康，在地上用石頭作筆，畫了一個天平。天平一頭吊著一個瘦骨嶙峋的流放者，手上端著一罐三兩的玉米巴，另一頭是一座大山，大山將人高高舉起，懸在空中，無法下來……

毛澤東晚年掀起的「農業學大寨」運動，本想掩蓋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慘敗，然而他是用新的罪惡來掩蓋先前的惡果。他把全國大飢荒歸罪於老天後，想出驅使農民，勞命傷財的改土改田，美其名曰「愚公移山，人定勝天」的「大寨精神」。

中共農村的基層組織，以每年完成改田改土的工作量作為政績考核，年復一年，原來土地表層的沃土，被「大寨田」埋入地下，形成貧脊的瘦土，加上農民被剝奪了土地的所有權，積極性完全喪失，土地歉收日益加劇。

而每年在這些農田建設的大軍中，也不知多少農民，累死在改田改土的工地上，而壓在農村最底層的五類份子及其子女，更是受害最慘烈的群體。

老魔頭升天後，陰魂不散，繼續殘害人民，下層官僚繼續奉行不顧勞動者死活的大寨精神，油庫灣的改造便是其中一例。

經過十年文革，農六隊反抗迫害的力量遭受了殘酷摧殘，像陳力、張錫錕等優秀份子，紛紛慘遭殺害。其他的人，像鄧自新、陳蓉康、陳孝虞、賴開明、王文典等，經過長期的黑審、鬥爭、繩捆、鑿銬、毆打的折磨，磨鈍了稜角和鋒芒。

油庫彎改造工程打響後，我們在槍桿子押送下，在油庫灣工地上，再次承受暴政的蹂躪。

工程的第一天，天還沒有大亮，我們便肩扛工具，推著板板車，向工地進發。

進入工地，藉著燈光，我看到：兩面是黑壓壓的山頭，入口處，就像是一扇進入地獄的大門。

工地上還亮著電燈，高音喇叭裡「東風壓倒西風」的狂叫，向我們壓來，好在我們大多數人都經歷過瘋狂的大躍進，麻木而無所謂。

廣播裡播放著「鳥兒問答」，陳蓉康走到我面前，低聲向我問道：「這首詞是什麼時候寫的？什麼時候發表的？怎麼過去從來沒有聽到過？」我搖搖頭。對著這地獄的入口打著寒顫，天氣特別冷。

不一會，徐世奎來了，馮俊伯緊跟在他的後面，兩個人用皮尺在荒山坡上比劃了一番以後，便要在要挖地方劃出了第一根石灰線。接著，徐世奎站在土坡上宣佈：「從現在開始，油庫彎工程正式開工，今後，由馮俊伯負責把每天要完成的作業線劃出來，必須完成才能收工。馮俊伯所耽誤時間算半個工。」聽到他這一命令，所有的流放者都搭拉著腦袋。

「畫地為牢」，鄧自新嘀咕道。

大家心中明白，這是一條在當天絕對沒有希望完成的「任務線」。就為這條線，可以犧牲工地上苦役犯的休息和睡眠時間；為這條線，可以抽乾他們的血汗；為這條線，還不知道誰會被埋骨於黑幽幽山溝中，毛澤東最得意的軍事化管理，再次搬到苦役犯身上，任務像軍令一樣，以不可違抗的形式，壓迫著每一個人。

陳蓉康還在興味濃烈地吟誦著那首詩：「炮火連天，彈痕遍野。」他背誦著：「怎麼得了，啊呀我要飛躍……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他讀著讀著，突然罵道：「這也叫詩麼？流氓！流氓詩。」他嘆著氣，憤憤然對著廣播聲傳來的地方呸著口水。

黃占幫推了他一把：「幹活吧！什麼天地翻覆，現在是泥土翻飛，要你腿桿跑斷，筋骨壓彎，汗水流完，那才叫放屁。別聽了，幹活吧。」

陳蓉康拿起了畚箕和鋤頭，開始上起土來。

「唉：中國人真可憐，霸王在城頭上飲酒作樂，奴隸們在陣前拚力廝殺。什麼天地翻覆，外國人哪裡曉得，我們已經有多少年沒見過土豆紅燒牛肉了。」他一面發出低沉的嘆息，像是從地底下發出的呻吟。

奴隸畢竟還是奴隸，儘管意識到必需反抗壓迫，但是十幾年的挨鬥挨打和折磨，磨掉了我們中青年時代的血氣方剛，變成了馴服的勞動機器。

改田改土是我們每到冬天都要從事的苦役，它的工序極為簡單：挖土，上土和運土。按照實作經驗，運輸距離在二十公尺以內，一個人挖土，可以供應三個人上土和一個人推車，每個作業組大致由五人組成。

現在為了不讓任何人閒著，五人作業小組，就配備兩台板板車。

推車人將滿載的車推出去倒掉同時，還停著一輛空車供人繼續上土，等第二車中的土上滿了，推土手剛好將空車拉回來，再將已裝滿土的車推出去，滿負荷運轉沒有停歇的時間！！

照這種安排，平均每人每天可完成的最高土方量不會超過三方。而面前的那道白線，是按照每人十二方土的工作量劃出來的，縱然將勞動時間延長一倍，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完成四天工作量邁過這條線。

然而，奴隸們依然埋著頭，默默的幹活，推車的把裝滿泥土的重車推出去倒掉後，就趕緊把空車拉回來，利用下一車還沒有裝滿的機會，才可以喘上一口氣，上土的則利用裝好了一車泥土以後，空車還沒有拉回來，或者挖土供不上時，才可歇一口氣。

無論是那一個環節落後了，就會馬上聽到站在高處的徐世奎喝罵聲。

他的喝罵聲像一條皮鞭，一下一下的抽打在我們身上。這大概就是長年累月習以為常的規矩，就像耕田的牛，駕轅的馬，在皮鞭抽打下，每每因驚恐而無奈前進一樣。

隨著時間一刻刻過去，挖土的茬口在一點點推進，而推土手推出倒在溝谷的紅土，一寸一寸的向溝中延伸，倒出去的紅土被車輪輾壓著，變成了一條條漸漸伸長的帶子。

早上起來，無論天氣有多冷，只要開工，不出五分鐘，就要脫下披在身上的棉「鎧甲」，光著身子迎著寒風，揮汗如雨。汗水滴在那一條條被車輪輾出的帶上，泛著紅光。

到了上午十一點鐘光景，寒霜融化，西北風卻從山坡的高處刮下來，亂風常常把泥沙刮進我們的眼中，使我們睜不開眼睛。

好在眼睛有一種排泥沙的能力，劇痛一陣，擠出黃色的眼淚，可以恢復視力，實在不行，用衣服揩一下，繼續趕，否則，自己工作的茬口拉在後面，徐世奎又會站在高處叫罵了。

「催命鬼！」黃占邦朝著徐世奎站的地方恨恨地說，一面幫楊家模搬開被泥沙糊住的眼睛，猛吹他緊閉的淚眼。

「換一下吧！」推土手把空車推回來，喘著粗氣喊道。他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了，一邊甩著酸痛的膀子。

「虧你說得出來，楊厚模眼睛都要瞎了，你還換他去推土？」黃占邦打抱不平的喊道。

「那麼你試試，這千斤的重車誰能推上一整天？」胡亞東漲紅了臉，不停的甩著膀子。看樣子他真的吃不消了，他快已五十歲的人了，入獄已十幾年，大躍進年代，他還只有三十出頭，大躍進的折磨奪走了他的壯年。

陳明九接過他手上的車把喊道：「條條蛇都咬人，誰叫你滾到這個爛泥坑裡來呢。」說著搖搖晃晃將滿滿一車泥巴推了出去，胡亞東不敢怠慢，拿起鋤頭上土，蹲在一旁的楊厚模一邊還在流淚，一邊站起身來繼續上土……

緊張的勞動，使人忘記了時間，早上吃的半罐玉米粑早已化成了屎，進大腸了。但汗水流多了，反讓人不感到飢餓，過度的體力消耗，使人全身乏力，體力不支，上泥時，因端不上車，而灑落在地上；推土時，推著推著就眼睛發黑。

苦役犯大量出汗，而又缺乏鹽水補充，稍一停歇，冷風一吹，就傷風感冒，六隊的工地上，第一天就有十幾個人得了感冒，頭痛耳鳴，但誰也不敢歇息片刻。

中午時分，彭文學駕著馬車，把午飯和水送到了工地上，奴隸們歇下來，用自己的破衣服擦了擦滿是泥土的手和滿身的汗水，便向馬車圍了過去，每個人手上端著飯盅，圍著馬車上卸下來的水桶，一大盅水下肚，汗水便如注逼了出來。

整整一上午的超強勞動，胃酸大量消耗掉，胃口極差，拿著罐罐飯，對著它發呆。今天罐罐飯比起以往增加了一截，菜也是平時一周才能吃到的炒馬鈴薯片，算是對勞動者拚拚命的一點回報，然而可惡的西北風，惡作劇地把泥沙刮進罐罐中，彷彿催促囚奴們快吃。

吃過飯還不到十分鐘，山坡上值班的老管就催大家動工，他們坐在荒坡上面，不像往常那樣有哨棚可以躲避風沙，便想早點收工。

代朝謀爬上山坡，看了看一上午的「戰績」，一上午的拚拚命，茬口只前進到全天任務的十分之一，於是向站在茬口前的人吼道，「隊部是下了決心的，今天劃的白線不挖完，是絕不會收工的，下午不抓緊完成，就只好在工地上睡覺了。」人們都瞪著他。

「反正就這麼一把老骨頭了，充其量就丟在這深山溝裡算了。」蔡先碌喃喃地嘀咕著。



高原的深秋，天空上沒有一絲雲彩，早上八點鐘，太陽才從毛牛山口露出臉來，照著這片紅土地，照著這群又黑又瘦的苦役犯，為他們那過度勞累而嘆息，除了徐世奎的叱罵，沒有人安慰他們。

單調的鎬頭挖土聲與車輪前進的聲音混在一起，勞累至極的人們，挨到下午七點鐘，太陽悄悄跌進了西山坡後面休息去了，但工地上的囚奴還在燈光下揮汗如雨。

彭文學趕著馬車把晚飯送上工地的時候，星星已悄悄的爬上了天空。大躍進的噩夢整整過去十八年了，它那不眠之夜又復活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勞累了一整天的奴隸，早已困乏不堪。很想就地倒在泥土上，閉上疲倦的眼睛。但不遠處發出了一陣粗暴的催促聲，當兵的已換了執勤的人，新值班的老管，正催促想閉上眼睛的人。

十幾年來，農場的房屋，道路，農田，水庫，都是我們親手創造，可是暴戾成性的獄吏們，絲毫也不會愛惜這些創造財富的奴隸，他們對我們使用的語言從來就是繩索和棍棒。在暴戾成性的獄吏摧殘下，奴隸們大量死亡。然而這一切，被捂得嚴嚴實實，不為世人所知，這樣的苦役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我們到什麼時候才能像人一樣生活？

開工第一天，工地上的高音喇叭，從早晨到深夜，不停地叫嚷著：「不須放屁。」幸運的是，今晚隨著喇叭安靜下來後，工地上的電燈跟著熄滅，工地上一片漆黑，這真是老天救人於危難，在土地上的各中隊，被迫收工回營。六隊也不例外，我們在漆黑裡摸著收拾好工具，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黑洞洞的監房。

第一天，我們從早上六點幹到了第二天凌晨一點，整整十九個小時。留給我們睡覺的時間只有四個小時。就這樣幹，徐世奎宣佈，我們「欠下」三分二的任務沒有完成。

第二天，早上五點鐘，當疲倦已極的奴隸們還在酣睡中，廣播喇叭又嘰哩哇啦吼叫起來。睜開惺忪睡眼的人們，又在槍桿子押送下，高一腳低一腳趕到工地，耳朵裡塞著「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崗山」的吼聲

陳蓉康在我後面罵道：「人都快要死了，還喊給誰聽？」

從此以後，工地上那條催命的白線，一天天往山坡上爬。中間的溝被填得越來越狹窄，越來越深。挖土的茬口也一天天在升高……

## （二）神仙土下

挖土也改變了方法：在茬口下方挖空一條槽，使茬口上幾十噸的泥土虛懸在凹槽上，再在虛懸的泥塊上面，將鋼纖釘插進放土的縫裡，用力一撬，使整塊土方垮塌下來。

這種取土方法被稱為「神仙土」，比之一鋤一鋤的挖就快多了，但是因為泥層的鬆緊度不一樣，掌握得不好，基腳槽口挖過了頭，泥土還沒等到鋼纖釘撬動它，便自動垮塌下來，傷及下面沒有防備的人。

有些土質較硬的神仙土，基腳挖好以後，無論鋼纖釘怎麼撬動，那空懸的土方卻老放不下來，使急於搶任務的人們在下面乾著急。

然而這種帶有人身傷亡危險的挖土方法，卻是囚奴們採用的最常用方法。皮鞭下的高額任務，使奴隸們無法顧及自身的安全！

隨著茬口一公尺一公尺向前推進，茬口高度也一點點升高，一個工段經過兩周挖土，茬口的高度都會在兩公尺高程左右。從旁邊去看，要放的泥土便像一個張牙舞爪的妖怪，張開血盆大口，好像隨時都要將腳下的奴隸吞進肚子裡去。

當神仙土快要垮下前，它會移動自己幾噸重的身軀，發出輕微的沙沙聲。挖土手就憑藉自己的經驗和特別敏感的耳朵，捕捉到這種「神仙」發出的信號，向它下面上土和拉車的人報警，大喝一聲「來了」。

所有在危險區裡的人，憑著這一喊聲，便立刻向四方彈射出去。緊接著一聲悶響，幾十噸泥土，捲著強大的氣浪垮塌下來，揚起巨大的煙塵。

神仙土下面的奴隸們，若發覺垮塌的時間過遲，或風聲破壞了「神仙」發出的危險信號，或聽到的信號太弱，都會造成悲劇。

偏偏每天上午一過十點，強勁的西北風呼嘯而來，好像是專門為那神仙打掩護似的。每次狂風大作時，挖土的人什麼也聽不見，就只好憑經驗和直覺來判斷。往往神仙借狂風的掩護，施展著它的神威。

工地上因放神仙土而傷人的悲劇，像魔鬼一樣纏繞著大家。尤其是那些本身就體弱，過於勞累的人。

蔡先祿，這位身材瘦小，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的小老頭，一位厚道和善卻又顯得有些迂腐的中學教員，常常固執地與人爭辯，他卻是大家公認的善良好人。

在油庫灣的工地上，看他推著平板車運土，一車滿載的泥土超過他體重十倍，堆過了他的頭頂。從旁看，與其說他在推車，不如說他用瘦弱的身體在同它拼命。

每一車的啟動，他都要把脖頸伸得特別長，漲得通紅的臉上青筋暴突。他已把最後氣力使出來了，可那千斤重車還呆呆地站在那裡不想走，到了這個程度，旁邊上土的人都會幫他推一把。車子啟動後，見他搖晃著全身，踉蹌前進。

不知哪一股力量支撐著他，他一車又一車的推土，每天要把近百噸的泥土推出去倒掉。工地上經常可以聽見他低沉的哼唱：「我們折斷腰，兒孫筋骨瘦！」當年楊白勞所唱的悲歌，而今出自他口，伴以他低沉渾厚的男低音，變得很悽愴悲涼，聽了讓人想哭。

「蔡老師的歌聲太悲了！別再唱這老掉牙的歌了，換一曲吧。」陳蓉康非議道。

蔡先祿並沒有理他，繼續的吟唱這兩句歌詞。寒冷的空氣中他的牙在咯咯作響，喘著粗氣，但歌聲沒有停。

「樣板戲不嫌老，唱樣板戲！蔡老師。」鄧自新在鄰近組裡向這邊喊道。

蔡先祿瞪了他一眼：「要麼你唱來聽聽！」

「好的！」鄧自新回應道：「你們可聽好了，這幾天廣播在喊什麼？聽清楚了：『久有帝王志，重上萬歲堂！千里來尋舊窩窩，皇宮變了樣。到處警衛密探，還有刺刀守衛』，你們聽清楚了沒有？」鄧眼鏡來勁了。

他用的喜兒的曲調，唱起來別有風味。工地上頓時活躍了起來。「鶯歌燕舞，鶯歌燕舞，你們看黃占邦才叫鶯歌燕舞呢」。

經鄧自新一指，大家抬眼看到站在高高的坎上放土的黃占邦。他身上那件棉鎧甲，早已撕成了無數的碎片，在大風中飄揚飛舞著。

上油庫灣工地以來，每天二十小時的勞役，哪有時間對破損的萬疤衣進行縫補？每人身上穿的棉鎧甲，都變成了幾十條的巾巾掛在身上，被大風一吹，就成了四處飛揚開的亂毛，這裝束，人們相互看慣了，倒也不覺奇怪。但陌生人看到，必然心驚：一個個都像從地獄裡爬出來的鬼？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陳蓉康苦笑一聲，長聲悠悠地跟著那廣播員的聲音唱道：「好一個換了人間，好一派鶯歌燕舞。」

我環視了一下整個工地，錘擊聲、挖土聲，已經淹沒了這廣播傳過來的「歌聲」。這些衣衫破爛筋疲力盡的奴隸，確實是毛澤東統治下「到處鶯歌燕舞」的生動寫照。

「不需放屁，啊呀！我要飛躍！」剛剛把車拉回來的蔡先祿，朝著廣播喇叭的方向唾了一口吐沫罵道：「什麼狗屁詩，廣播員還一本正經的朗讀這下三爛的東西，不感到羞恥！？」

「唉！你可別小看哪！『先上九天攬星星，再回河裡捉王八』，這可是你想都想不出來的絕句！」鄧自新又向蔡先祿喊道。

蔡先祿原來是國文教員，他聽鄧自新添上這麼一句，接口道：「對，讓我想想，該怎麼改，明天上工地來，讀給你們聽，怎麼樣？」

「你別唱『兒孫筋骨瘦』了，別老是苦自己，改一首唱唱吧！」鄧自新在隔壁工段喊道。

流放者討論廣播裡傳來的毛詩新作時，忘卻了曠日的疲勞。就在他們的注意力被廣播裡傳來故作呻吟的「詩歌」所分散時，死神卻已悄悄地站到那神仙土坎上了。

當蔡先祿口裡唱著：「哎呀：我要飛躍……不需放屁，」一面運足了氣力雙手抬起那滿載泥土的平板車，弓身向前啟動時，突然站在高處的黃占邦驚慌地喊道：「來了！」大家還來不及抬頭，只覺一股陰風從山坡上疾撲下來，足有三公尺多高的神仙土像一堵建築物崩塌，一堆很大的泥土夾著呼嘯聲，撲了下來。大家立即向四面空地飛彈開去。

蔡先祿卻夾在平板車兩車把手之間，躲閃不及，隨著一聲巨響，倒下的泥石流重重地壓在平板車上，壓斷了車把，壓在他瘦弱的身軀上。

整個的現場，像中了一顆開花炮彈，煙塵四起！同蔡先祿拌嘴的鄧自新，從鄰近的地上失聲驚呼：「哎呀！老蔡遭了，快救老蔡啊。」

人們在灰塵中向平板車撲去，所有在工地的人都自動放下手中的活，圍攏來拚拼命用手扒開壓在蔡先祿身上的泥土。鄧自新和黃占邦一面刨土，一邊指揮趕來救援的人。

足足花了十分鐘，人們才從平板車下把蔡先祿搶救出來。只見他奄奄一息，臉色鐵青。抹去他臉上沾著汗水的泥漿，那心臟還在跳動，只是雙目緊閉。

鄧自新把蔡先祿抱在懷裡，焦急的呼喚著他的名字，用手試著他的鼻息。

「掐他的人中穴，作人工呼吸！」周圍的人出著各種主意。在大家手忙腳亂的搶救中過了一會兒，蔡先祿的嘴巴開始蠕動，一股鮮血從嘴角滲了出來，接著眼珠子在緊閉的眼皮下動了一下，脈搏開始加快，鼻中也呼出一口氣來。他那幾分鐘前的笑容，還掛在嘴角上。

唐啟榮背著藥包從下面的「田」裡跑了上來：「趕快要馬車，誰跑回隊部去叫？」大家正在手足無措的時候，徐世奎倒背著手走了過來，他臉色冷淡無情，顯得十分不耐煩，他一面吆喝著圍在這裡的人群：「關你們什麼事？還不各就各位，你們的任務就這麼拖吧！」他吼叫著，人們紛紛的散開。

看到蔡先祿奄奄一息，徐世奎口裡不停的嘀咕道：「叫你們小心一點，你們就是不聽。」把事故責任推在受傷人的身上，這就是中共下層人員對「奴隸」慣用的手段。

唐啟榮找到了一架留在工地上的涼板，指揮著黃占邦，鄧自新等人抬著蔡先祿向場部醫院奔去。

自從上油庫灣工地以來，矮小而體弱的蔡先祿，同死神擦肩而過的險事已不止發生過一次了。

前兩天，在他推車倒土時，因為拉不住平板車車把，他和車一同翻下足有二十公尺深的溝底，幸好人和車一起翻下溝底時，平板車滾落在一邊，避免了重車壓在他的身上，但滾下來的泥石壓著他，在他身上留下數處傷痕。

當黃占邦等人七手八腳的把他從溝底拉起來時，徐世奎卻在上面吼道：「趕快把車拉上來，你們在搞什麼名堂，思想開小差。」

平板車被拉了上來，徐世奎並不理會已數處受傷的蔡先祿，而是令人立即檢查那輛平板車摔壞了沒有，一面催促大家馬上動工。

有人建議，跌傷的蔡先祿回監舍去休息一下，上點藥。可是徐世奎卻惡狠狠地吼道：「我不怕你們裝怪相，今天完不成任務，你們就給我在工地上守一夜」。

大家早已習慣了牢頭對待奴隸的冷酷，蔡先祿坐在地上，用破布擦著手上和腳上的血，他的兩膝蓋已經青腫，黃占邦主動接過他拉的車，示意他坐在地上歇一會兒。然而生性倔強的蔡先祿，卻從地上站起來，從黃的手上奪過車把，一瘸一拐的繼續推。衝沖著徐世奎喊道：「我就是死了，也不會把自己的任務賴給大家！」

由於過度疲勞，死神隨時在窺視我們，現在當我看到蔡先祿被人抬走時，走過去掀開蓋在他頭上的破衣服，看著他緊閉的雙目和嘴角上一抹鮮血，不知是不是最後一瞥？心裡怎不湧起惜別之情，我的淚水忍不住流下來。

想著這些年來他的俠肝義膽。每次有人挨鬥挨打受傷，都可以看到他拿出自己珍藏的白藥精和藥酒之類的東西，一次次為傷者送去自己的慰藉，讓對方感受這難得的真情，看他一次次為需要幫助的人送去關切和溫暖。

後來，蔡先祿雖然從死神的手裡逃了出來，但腰部成了終身殘疾

由於六隊的工地上連續出現兩起骨折的工傷事故，場部派駐工地總指揮在我們工地上開了一個會。徐世奎蠻橫的一口咬定蔡先祿受重傷，純屬他個人的疏忽大意，立即引起了奴隸們的非議。

隨著工期的推進，奴隸們工作的時間越拖越長，剛開工的一段時間，按場部規定，外線用電最遲不得超過凌晨一點鐘，拉閘以後，荒溝裡一片漆黑，徐世奎無可奈何的收工。

因關燈影響任務完成，第二天，徐世奎自可搪塞指揮部。完不成的任務，便上交給了路燈值班室。所以晚上熄燈時間也一再延長。

即便這樣，徐世奎親自劃定的白線，從來沒有完成過。

凌晨時分，疲憊不堪的奴隸們歸去的時候，已是微霜初覆，北斗星也西墜在犛牛山上。到了油庫灣規定完成的最後幾天，奴隸們為了節約往返耽擱，乾脆就在寒霜紛飛的時候，選一個比較平坦的地方，席地而臥，蜷縮在自己的棉鎧甲下呼呼大睡，彷彿經過一場戰爭，這裡橫七豎八的躺著許多屍體……

有一天，我被紅色的光束照射得什麼也看不見了，手裡提著的車把，突然沉重了好幾倍，使我無法提起來，眼皮也像吊著兩隻沉重的鐵蛋。忽然覺得眼前火星紛飛，心裡發慌，反胃嘔吐，一股冷汗從背心中竄出來。兩條腿怎麼也不聽大腦指揮，面前那條暗紅色的光束彷彿升了起來，伸向遠方，伸向黑暗的星空！

過了好久，我才從昏迷中甦醒過來，最初感到奇怪，我怎會躺在泥土中？看著那架停在旁邊的板板車，我才慢慢想起，我是昏過去了，睜開眼睛，又闖了上去，我奇怪身上什麼時候結下了霜。更奇怪這麼冷的天，我還沒有凍死？只覺得渾身疼痛，無力站起身來。

周圍怎麼這樣安靜？微微的側頭四下張望，才在晨光中辨別出與我同組的夥計們。我暗自在想，這麼冷的天，這麼厚的霜，該不會又有人凍死在這裡？努力回憶昨天的情景，農三隊又死了一個奴隸，不清楚是凍死還是累死的。

工程進入最後收尾時期，工地上每天都有人昏倒，醫院的病房已爆滿。

其實如果讓那些勞累死去的人，吃飽喝足美美的睡上幾天，便可以自動復原的。

沒有人統計，短短三個月，有幾人累死在工地上。幾人被砸成手腳殘廢，毛澤東的接班人接過「四個堅持」、「兩個凡是」的衣鉢，隨時都把這種野蠻的桎梏重新套在中國百姓的頭上。

一九七七年初，油庫灣工程「如期完成」。當我們離開這令人咒詛的工地時，我們誰也不知道，以後，還會有這種瘋狂的運動？

人類社會已經建入電子時代。而中國的勞動者，還被「大寨精神」愚弄著，用最原始的勞動工具，拚拚性命，去完成愚公移山的拓荒蠢事？這是毛澤東駕馭中共奴役百姓的一貫作風。也是一大罪過！！

工程完工的最後一天，下午六點鐘，被摧殘得不像人形的隊伍，身穿比任何時候更巾巾掛掛的棉鎧甲，肩扛勞動工具，拖著平板車，踏著隆冬時節下過的一場大雪，翻過三號樑子時，當場就昏倒了兩人。他們在雪地裡等待著唐啟榮回六隊叫來馬車，將他們送去了醫院，後來這兩個人再也沒有回到六隊。

讓人傷感的是，再也聽不到蔡先祿和鄧自新的一問一答，蔡先祿唱的「兒孫筋骨瘦，老人折斷腰」彷彿還響在耳際，鄧自新改編的：「久有帝王志，重上萬歲堂！千里來尋舊窩窩，皇宮變了樣。到處警衛密探，還有刺刀守衛。」至今沒忘。

以後的幾個月裡，水腫病再度蔓延，我想，人是何等脆弱的動物，苛政暴行一加碼，人道主義丟得無影無蹤，共產主義的豪言壯語，全成了夢囈和昏話。

後來，當農場的領導領著上級前來視察，在公路上指手劃腳的吹噓他們政績時，卻不講這些「政績」是奴隸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也許再過幾年，山洪爆發，幾十分鐘，大水就會衝垮這些泥質田坎，連那又直又平的公路一起沖毀，重現一個荒涼的山溝！

我不知道，這樣的工程有沒有經過勘察？還是僅憑他們的好大喜功，來迎合一曲「鶯歌燕舞」的學大寨狂想？

毛澤東年代，人民浪費在這種瞎指揮下的「建設」真是太多了！太冤了！數以億計的民夫和像我們這樣的囚奴，就為這些「宏圖偉略」的實現葬身荒溝！兩千兩百年後，秦始皇復活了！

從油庫灣撤下來後，我們關心劉順森的下落。也許他們會給我們帶回好消息。原來能打聽的線索，幾乎全部中斷了，我們對他們的處境很擔心。

### 第三節：尋找光明

一九六九年，毛澤東清除劉少奇的陰謀順利結束。在四月份召集了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接班人的身分，寫進了新的黨章，演完了這場戲以後，毛澤東總算解除了多年的心腹大患，國內暫時平靜了一段時間。

但就在這一年，因珍寶島軍事衝突，中蘇兩國已劍拔弩張，毛澤東號召備戰備荒，把注意力又集中在對蘇的戰爭準備上。

一九七〇年初，雲南通海發生大地震，接到報告後，皇上忙令新華社封鎖消息。不但不組織搶救，還拒絕國際救援組織的人道救助，只對災區運去了幾十萬冊《毛主席語錄》和幾十萬枚毛澤東的相章，可憐幾十萬通海同胞，連呼救聲都被禁止傳出，便活活地活埋於地下了。

#### （一）地震棚裡

當時，距通海並不太遠的鹽源，除了感到了大地在搖動外，並不知道通海老百姓所遭受的災難。

忙於爭權奪利的中共各級官僚，只要災難沒有降臨他們的頭上，依然故我，對毛皇上備戰備荒的指令窮於應付的各級政府，哪裡還有精力組織災後救援？

六年後，唐山被大地震夷為平地，使數十萬人喪生。這一次大地震發生在北京附近，遠比通海慘烈，北京受到強烈震撼，中共才如夢方醒，立即向全國地震區發佈統一號令，震區城鄉以竹木為骨架，草席作圍牆，帆布和塑膠薄膜作房頂，一窩風地搭起了「地震棚」。

地震棚頂就像紙一樣，大風一吹就會掀去，無法遮風避雨，至於建立預測地震的設施，防止災難的種種措施，那是吼給百姓聽的瞎咋呼，並無實際行動。

戒備森嚴的監獄也不例外，只要圍牆足以保證犯人不趁機越獄逃脫，鹽源農場也驅使奴隸蓋上了地震棚，並將我們趕進了地震棚中，將原來的監房統統上了鎖。規定沒有經過隊部的允許，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打開監房自由出入。

從此以後，所有犯人除開飯外，仍按老規矩在壩子裡站隊集合，工餘時間大多都捲縮在地震棚裡。

地震棚內用一些破草席分隔成了許多「房間」。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互通的大帳棚。雨季期間，沒有大風破壞，還可勉強應付，到了風季，狂風大作，整個蓬頂就像會被掀掉。

簡陋的地震棚，等於將全隊人員集中於一個大監房中，倒方便了大家互通資訊。流放者各自將白天所獲得的資訊，到了晚上傳送到地震棚的所有角落，每天，分散在各組的火炬成員，將收集到的情況交流後，立即傳給大

家。

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兩大派的鬥爭越來越白熱化，在這種政治氣候乍暖還寒的形勢下，監獄方面也加強了戒備，院壩裡的武裝執勤，由原來的一人增加為三人。院牆外的巡邏頻率幾乎增加了一倍。

林扯高被停職反省後，林何之間結束了長達七年的權力鬥爭，何慶雲重新執掌了農六隊的管教大權，但從鹽源縣傳來的各種「謠言」，卻使何慶雲越來越擔心，中共上層的分裂，使他失去了安全感。

他懷疑所依附的「當權派」，能否確保局勢渡過這段動盪時期？他的內心既沒有底，也不知該怎麼辦？他在場部子弟小學當老師的老婆，幾乎天天在他的耳邊吹枕頭風，要他在這種政局不穩時期，做事不要太絕，要給自己留條後路等等。

當時，流傳在鹽源老百姓的謠言空前活躍：例如「紅天已暗，白日正顯」；「夜觀星象，東北方紫微星為黑氣所蔽」；「東方定有一異人收拾毛氏江山」；又說「當今政府犯了地煞，故地震不斷，幾年內必有血光之災降落神州，到時血流成河，屍骨成山」。

表面上看，這是一些毫無根據的民間謠言，其實正反映了民間渴求毛澤東專制及早滅亡的心願，渴求一個民主政府上臺，以解人民於倒懸。

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時期，正是各種謠言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時候，例如東漢末年太平道，就有「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步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瀕臨死亡邊緣的農民，往往借助一些宗教傳說來號召和組織人民起義。

今天，處在封閉狀態的大陸，與封建社會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人民也像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情況相似，借助迷信和謠言反映他們的要求。在鹽源這種十分落後的地區，現在出現大量謠言就不奇怪了。

當時，正是各種地下組織如雨後春筍蓬勃生長的時候，由於中共對國境外的反共活動一向戒備森嚴，更由於中共的反滲透措施，中國的民主運動幾乎沒能與境外接觸。

而國內的地下組織，基本上是一些由中共內部分化出來的政治上的反毛派，他們立足於奪權以反毛澤東獨裁外，並沒有形成民主建國的政治綱領，但是，形勢正要求國內的反獨裁力量聯合起來，沒有統一目標、行動綱領、組織方式等，就不能反抗表面仍然十分強大的獨裁勢力。

六隊的政治犯，就是基於這種認識，謀求向外界尋找出路。當時我們尋找的是反毛澤東個人獨裁的地下組織。

為了分散當局和士兵的注意力，劉順森在地震棚的中心地帶擺了一張小桌子，撿了一塊楠竹片當作驚堂木，開講評書。他以在少年時代積累的豐富歷史知識，用他天才的智慧和出色口才，借古諷今，那時，他講的是姚雪良撰寫的長篇小說《李自成》，以及相關的歷史故事「紅蓮教」。

每天晚上，在劉順森的評書桌周圍，聚集了一大群聽眾，在人群後面，還經常站著當班的巡邏士兵，這些士兵與其說受人指派來監視劉順森，不如說被他精湛說書所吸引來聽故事，聽講的人築起的人牆，成了火炬成員交換情況，分析形勢的最好掩護。

## （二）逃亡

火炬成員交換了國內形勢的基本估計後認為，中共獨裁勢力和「走資派」的較量，已到了最後攤牌的時候，「四·五」運動的信號表明，北京城裡因權力傾軋而釀成的全面內戰隨時都會爆發。

在這個時候，被關押的政治犯，隨時都可能遭到統治者的毒手，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在這種情況出現前早作打算。

所以，應該有人越獄，去尋找那些處於地下、並有相當民眾基礎的民主組織。

根據大家收集到的情況，決定派人去重慶尋找活動頻繁的「人民黨」，對於這個組織，當時只是耳聞，並不知道具體情況，因為在獄中，我們不可能知道詳細情況，一致決定，由劉順森同熟知重慶的孟平和楊漢群一同越獄，去完成這極其危險的使命。

在這以前，農場的流放者，經歷過無數次逃亡，但這些逃亡，僅抱著個人目的，而沒有某種政治目標，這次是農牧場建場來，第一次為尋找地下組織的探險行動。

一九七〇年，蔣正君為首的那次大逃亡，就因為缺乏統一的認識，對形勢估計錯誤，缺乏一個明確的目標，最後，很快被破獲，幾十個人都成了當局無情打擊的對象，當場被處決的人就有五人，留下慘痛的教訓值得記取。

火炬戰士們把平時省吃儉用每月僅兩塊零用錢聚集起來，交給了劉順森作為路費，大家同劉順森商定好出逃路線，研究出逃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意外。

預定逃亡前，鐵匠房的沈官科和蔣真富，利用全天在鐵匠房的機會，先將一個木梯子預先送進三號監房，計畫借夜幕的掩護，利用惡劣的天氣，來掩護出逃第一步的成功。

九月初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大家正在地震棚裡「讀報」，蔣真富在小解時，用鋼絲鉗迅速下掉了三號監舍的門鎖，預先藏在廁所裡已整裝待發的劉順森三人立即跟出，迅速地進入三號監房。五分鐘後，在廁所裡的皮天明，從容從廁所裡走了出來，將下掉的鎖重新鎖上，以麻痺巡邏哨兵查哨，不致於馬上發現劉順森等出逃的痕跡。

這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當皮天明回到地震棚以後，所有參加這次行動的火炬戰友都舒了一口氣。

劉順森、孟平和楊漢群三人藉著風雨聲和夜幕的掩護，將預先放在三號房裡的梯子抬到上鋪去，很快架上了房頂的橫樑，楊漢群第一個爬上去，利索地揭開了房頂的瓦片。

瓦片揭開，狂風捲著大雨向他頭上灌壓下來，三人各自紮好緊身的小包袱，頂著大雨，迅速登上了房頂，順著瓦溝匍匐著向下方的屋簷爬去。

突然，崗哨上的探照燈打開了，強烈的光束射穿白茫茫的雨霧，從房頂慢慢地橫掃過來，三人緊貼在瓦溝中，借屋頂的掩護，等探照燈光從身子上方掃過去。兩分鐘以後，探照燈熄滅，整個的房頂又重新淹沒在雨夜之中。

三人側耳靜聽，崗哨上並沒有任何動靜，屋簷下的圍牆通道裡也沒有巡邏兵。便迅速地從屋簷上躍起，跳在圍牆與監房間的過道上，很快找到預先埋藏在那裡的鐵鍬，用它在牆上挖開一個洞，三個人爬出洞口，來到圍牆外的那片玉米地裡，在大雨中直起腰來，檢查了一下隨身攜帶的小包，互相拉了拉手，慶賀越獄計畫的第一步順利完成。

三人站在大雨中猛吸著新鮮空氣，這是他們入獄來第一次站在牆外呼吸「自由」的空氣，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激動，再回頭望瞭望那聳立在大雨中高高的圍牆，判定了自己所處的位置，立即竄進了茂密的玉米林中。十分鐘以後從這片玉米土裡出來，踏著鬆軟的泥土，走上三號梁子的彎彎梯田。

三人不敢逗留，順著出工的機耕小道，迅速越過二號梁頂。身後隱約傳來地震蓬中的嘈雜人聲，判斷是學習完清點人數的時候了。

他們知道，自己的「失蹤」，已為留在監舍裡的人掩蔽過去，放心地沿著山樑上的機耕道走去，找到平時洗手洗腳的山水窪，在那裡清洗了滿身的污泥，立即順著馬路直奔鹽源縣城，當他們看到了鹽源縣城的輪廓時，大雨也停上了。

三人敞開被大雨濕透的衣服，藉著下半夜吹來的涼爽晚風，吹乾了衣服。又辨了辨方向，直奔預先聯繫好的縣城郊區一家院子，天還沒亮，登上卡車離開了鹽源。

### （三）追蹤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當農六隊的囚奴們從地震棚裡出來時，嚴管二組的組長樊有才才發現劉順森失蹤。他不敢遲疑，立即去隊部報告。

他明白昨晚例行查房時，還在稀裡糊塗報告全部到齊，僅此一點，他就負有「謊報人數，掩護外逃」的責任，經過緊張思索，向隊部謊報說，劉順森於黎明時分失蹤。

正當樊有才向何慶雲報告劉順森失蹤時，嚴管一組的馮俊伯也氣急敗壞的跑來報告說，他們組跑了孟平和楊漢群，說劉順森大概是在大家都熟睡時逃走的。

但哨兵卻向何慶雲報告，說三號監舍房頂揭開了瓦，室內發現架在屋頂的樓梯；監獄圍牆也被打了一個大洞……根據腳印判斷，大約是在大雨開始時出逃的，有些腳印已被雨水沖掉……這與馮俊伯和樊有才兩個奴才所報告的情況完全不同。

「火炬案」爆發後，林扯高虛張聲勢，企圖把何慶雲多年的工作成績一筆抹煞殺，但嚴密搜查後，卻一無所獲。結案時，已被抓住的「火炬」線索，像一把無法抓牢的短髮一樣滑掉了，倒使何慶雲緩了一口氣。

為了證明自己在六隊的工作成績，在場部，何慶雲賭咒發誓，拍著胸口保證：「六隊絕不可能存在一個組織嚴密的『反革命集團』，也沒有可能與社會上的任何『反革命組織』存在過聯繫，張錫錕等人不過是一時頭腦發熱，寫出什麼『火炬』刊物，充其量不過是發洩對現實的不滿。在隊部嚴密監視下，組織集團，既不可能，也沒有這種能力。」

張錫錕被處決後，六隊短期相對「平穩」，「火炬」似乎隨之熄滅了。

現在，何慶雲聽到劉順森、孟平和楊漢群三人越獄的報告後，使他感覺問題遠比估計的嚴重。

對火炬重大嫌疑人劉順森突然出逃，何慶雲又該怎樣向場部交代待呢？特別令人氣惱的是，這件事情發生前，居然沒有一個人向他報告過一點跡象，當劉順森等人跑了足足八個小時以後才跑來報告，還隱瞞了真相。

何慶雲猛拍桌子，對馮俊伯和樊有才厲聲訓斥：「你們監督到那裡去了？不但事前沒有任何報告，就連逃跑初的實情也是假的，你們是不是同劉順森串通好了，來欺騙政府？如果一旦證實你們欺騙政府，絕決不輕饒。」

眼下的事件證明，原以為已熄滅的「火炬」，又在六隊燃燒起來了，何慶雲不得不對張錫錕寧死不屈、慷慨就義的正氣所鎮懾，嘆服「火炬」的頑強。

張錫錕啊張錫錕，你一個文弱書生，你的精神和靈魂力量，竟是這樣堅強！張錫錕啊張錫錕！你寧願一人獨擔罪名，從容走向刑場，也不招供任何一個同夥，這太可怕了！

想到這些，何慶雲不禁心驚肉跳。

這個可怕的「火炬」啊，他們不露一絲證據，證明他們比以往更成熟、更嚴密，逃亡前經過了周密策劃，現在許多細節，突然的擺在何慶雲這個老牌特工的面前，使他感到十分棘手。

三號監舍的房門是誰打開的？以後又是誰鎖上的？梯子是什麼時候拿進去的？又是誰拿進去的？昨夜點名是誰在點名時虛報人數？「火炬」有多少人？預先又怎麼商定的？出逃的目標是什麼？會不會與外界的某一組織和政治集團有聯繫？是怎樣聯繫的？

一連串的問題困擾著何慶雲，而他原先確實是過於自信了。

夜深了，何慶雲頭腦中仍然是一團亂麻，他懷著重重心事，輾轉反側。這些天來，老婆反覆地向他嘮叨，勸他看清形勢，不要把壞事做絕，給自己留條後路。還說如果中共政局發生變化，他何慶雲未必不會被清算，甚至惹來殺身之禍。丟下她和孩子怎麼辦？

老婆的話語雖屬「婦人」之見，卻觸到了他的靈魂深處的隱痛，是繼續追查下去？還是就此收手？裝著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不知道？

劉順森、孟平和楊漢群三人出逃的第二天，農六隊出奇的平靜，靜得讓人擔心。好像大事就會出現。我們都在為劉順森、孟平和楊漢群三人祈禱，估計他們已經在這麼長時間，走出了當局布在西昌地界的第一道封鎖網，如果行動順利，一天一夜的功夫，可以到達石棉的地界了。



但在這種平靜下，更需要大家警惕，並密切注視隊部的反應。不僅可以從中判斷劉順森等人行動的成敗，更要警惕何慶雲耍花招，多年的經驗證明，何慶雲比林扯高狡猾得多。

晚上集合點名，何慶雲拿著點名冊，仍像往常一樣的清點了人數，隨即很平靜的樣子講了話，他說：「昨天晚上上的幾個亡命徒，趁著雷雨的機會跑了，六隊跑人已不是一次兩次了，黃學全還敢在小監裡掀開房頂逃跑呢？李克嘉那麼厲害，最終還不是落網了。所以隊部一點都不擔心，用不了三兩個月，短則十天半月，三個人就會伏法。」

接著，他話鋒一轉，口氣強硬地警告道：「現在社會上有些謠言，這不足為奇，階級鬥爭就是這個樣子，你們中的極少數人，不要以為一點謠言，便天下大亂了，因而躍躍欲試，劉順森便是其中的一個，實話告訴你們，無產階級專政的銅牆鐵壁是永遠不會垮的，像劉順森這樣敢於向鐵牆上硬碰的人，到頭來都要像張錫錕那樣，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場。」

這一套陳詞濫調，我們聽得多了，早已不起作用，只不過是虛張聲勢，藉以掩蓋他心裡的緊張而已。點完名解散以後，何慶雲便把樊有才叫到了辦公室。他是何慶雲最近指派的嚴管二組組長。

現在何慶雲對「火炬」有了新的認識，雖然他與林扯高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但不得不承認，利用奴才監視「火炬」的方法是正確的。他放棄了對火炬份子採用說服教育的「陳腐」做法。

經過多年考察證明，像馮俊伯、周學祝這類人，已變得十分油滑，往往陽奉陰違，在需要時，表面上助威吶喊，而對記功減刑的空口許諾不再相信，尤其看到陳賢士等人的下場後，更趨於明哲保身，並不想把壞事做絕。於是，在何慶雲的心裡，已失去了利用價值。

而樊有才是一個刑期只有十年的刑事犯人，初來六隊，並沒有接觸「火炬」，也沒有什麼政治觀點，這樣的人，盲從性極大，極容易被獄方許以小利加以利用。

此人長著一雙三角吊眼，一雙轉動得特快的老鼠眼睛，給人一種「十五貫」中婁阿鼠的形象。就憑這種臉型，就知道此人心術不正，適合用作鷹犬，所以何慶雲把樊有才當成咬住「火炬」蹤跡的如意人選。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樊有才對這種地獄般的煎熬，高強度的苦役，以及半飢半飽的豬狗食，使他筋骨散架，度日如年。這種生活，才過去兩年。還有漫長八年，怎麼熬？

何慶雲把樊有才叫進辦公室，問他為什麼在劉順森逃跑的當天晚上毫無察覺？是不是把隊部交給他的任務當成了耳邊風？昨夜為什麼沒有按部隊佈置在地震棚集中學習？聲色俱厲質問樊有才，說隊部多次向他敲了警鐘，說劉順森的評書中必有名堂，要他注意劉順森借說書搞什麼活動，但是他卻沒有放在心裡。

接著何慶雲便一連串的提問：昨晚狂風大作時有那些人離開了地震棚？是去廁所解手還是幹其他的事？劉順森是什麼時候離開地震棚的？三號監房裡的樓梯是什麼時候放進去的？三號監舍的門鎖是誰預先下掉的？

樊有才本來對劉順森這次逃跑的事一無所知，事後懷著鬼胎千方百計撒謊，掩蓋清點人數時的失察。充當了劉順森逃跑的掩護人，現在，他似乎有些後悔。

自從何慶雲叫他重點監視劉順森後，他只把注意力放在劉順森寫什麼、傳什麼、傳給那些人上面，卻沒有注意到劉順森在神不知鬼不覺中作好了出逃準備，比如說劉順森出逃的路線，路資的籌集，出逃的目的，可能的去向等等，樊有才實在是一無所知。

至於何慶雲問到樊有才當晚二組在清點人數時，是誰在冒名答應？樊有才幾乎沒有絲毫察覺，並且直到他們出逃十個小時以後才發覺。

看到樊有才緊張困惑的表情，何慶雲並沒有過多的責怪他。

其實樊有才的內心是極其複雜的，自從他被何慶雲委派接替陳賢士的角色以來，目睹對「張錫錕案件」告密立功的人都先後暴死，六隊陡起的張錫錕英魂不散的傳言，猛烈衝沖著他，在充當何慶雲密探的幾個月裡，有人用「做壞事要遭報應」來警告他。雖然他向何慶雲報告過，但何慶雲只是好言安慰而已。

何慶雲的好言安慰並不能解除樊有才的心理壓力，古人雲：「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蒼天報應」論多少制約著他。

當天晚上，何慶雲對樊有才進行一番教育後，接著就是更進一步的許諾。

在強烈誘惑的驅使下，樊有才從何慶雲辦公室出來以後，便陷入緊張的思索之中。

第二天中午，樊有才便去找馮俊伯。對前天夜雨前後離開地震棚的人進行逐一排查。最後定下了八個人。除了劉順森三人在逃，還剩下五個人。當然不等於說開鎖、上鎖、打掩護的人一定就是這幾個人。也不排除其他人的可能性。

第二天，樊有才和馮俊伯便將提供的八人黑名單，擺到何慶雲的辦公桌上。何慶雲根據兩人提供的情報，最後將重點調整為三個人。懷疑他們是給劉順森逃亡的策應者，作為重點監視和審問的對象。

#### 第四節：強弩之末的猖狂喚醒皮天明

從油庫彎撤下來的第二個月，一九七七年的春節後，有一天早上，何慶雲宣佈上午延後出工兩個小時。

##### （一）劉順森不幸捕回

等待出工的奴隸們，被叫回到各自的監舍中，眼睛盯著大監的鐵門外。十點鐘左右，三個戴著刑具的流放者，在四個帶槍老管的押解下，在鐵門前露面。

我驚得差一點喊出聲來，原來三人正是我們日夜懸念的劉順森、孟平、楊漢群。他們出現時，劉順森走在最前面，上身穿著黑色的燈芯絨上衣，手上戴著手銬，蒼白的臉上留著一路的風塵，但並沒有喪氣，彷彿在思考著自己的失誤。

孟平和楊漢群反捆著雙臂，緊跟在劉順森的身後，他們三人從大門進來後，並沒在壩子裡停留，而是逕直關進了對面的小監中。

從他們出逃至今，還不到半年時間。一種不祥的結局，正在向我們襲來。

在何慶雲臉上，流露出一種得意的冷笑。他不像林扯高那樣虛張聲勢，他要對付的是有「經驗」的反改造老手。

當局在破獲蔣正君集團案中嘗到了甜頭，他們會用同樣的方法來對付抓回來的三個人，以摸清出逃時的掩護者，和火炬的懸疑內情。

第三天，劉順森便被單獨送到鹽源看守所，以便對這次逃亡，進行分隔審理。各個擊破是他們破案慣用的絕招。

根據陳力的先例，我立即預感到劉順森凶多吉少。

三人被抓回的當天晚上，何慶雲在集合點名時，陰險的警告六隊的火炬份子，他說：「劉順森的逃跑，涉及六隊的一大批人，在出逃當晚為他打掩護的人就有好幾個，現在這些人趕快站出來坦白交代，凡是主動交付出問題的，可以從輕發落，如果屬於他人交待出來的，後果自負。」

他一邊講，一邊用他鷹隼一樣的眼光一掃視著大家，好像在捕捉獵物。

其實，早在劉順森出發的第二天，何慶雲便根據樊友才所提供的黑名單，一直沒有放鬆對掩護者的追查，令他感到奇怪的是，黑名單中的人，並不是他平時最關注的火炬份子。其中相當一部份是入監不久的年輕小夥子，這使他意識到，「火炬」的影響在擴大。

按照樊友才提供的情況，何慶雲最終將目光收縮在三個人身上，這就是皮天明、賴開明和蔣真富，其中以皮天明為重點。

皮天明是兩年前從古柏逃跑而送到這裡來的年輕人，根據樊友才報告的情況，有人曾看到劉順森出逃前幾天，皮天明曾將樓梯抬到熬藥灶的旁邊。

根據這個線索，皮天明最先受到何慶雲的提審。

何慶雲說：「麻雀飛過都留著影子，你不要以為你做得秘密，就可以蒙混過去，你好好交待吧！」當即遭到了皮天明理直氣壯的否定：「那梯子是大家用來晾衣服的，誰都用過它，搬來搬去，全看哪兒晾衣服合適，怎麼能因為我搬過梯子，就一口咬定我參與了幫助劉順森逃跑？」

皮天明的回答，使何慶雲難以繼續追究他，同時皮天明來六隊才一年多，火炬的黑名單中，並沒有他的名字，談不上是火炬的追隨者，更談不上是火炬成員。

按照何慶雲的判斷，幹這件事的人，應當另有其人。

儘管如此，何慶雲並沒有否定樊友才提供的情況。他覺得六隊的全體政治犯，都會成為火炬追隨者，這讓他感到既可怕又擔心。

「火炬」果然像一個可怕的幽靈，不但沒有隨著張錫錕的處決而消失，反而在六隊到處遊蕩，劉順森雖然被抓回來了，但他外逃的目標、任務和組織關係，至今一無所獲。

## （二）二胡情誼

皮天明押到六隊，是一九七五年九月的一個下午，那天他身穿一件花格子襯衫，衣服上沾著很多泥巴，手臂上留著兩道被繩索勒過的黑印，臉上還有傷痕。

他才二十來歲。在他那黑黝黝的臉上，在兩彎濃黑的眉毛下，瞪著一雙倔強的大眼睛裡，閃爍著不甘受人侮辱的剛烈性格。看到他的樣子，便聯想到我自己，我也是這個年紀來到鹽源農牧場，至今已是三十九歲的中年人了。

皮天明隨身攜帶的破爛行李上，插著一把斷了一截龍頭褪色的舊二胡。一身裝束，很像一個走江湖的落魄藝人，腳上穿著一雙舊皮鞋，前面已經裂開了口，從裂口中露出腳的大姆指。

那天值班的鍾花臉，將皮天明帶到嚴管二組的門口，並把當時的陳賢士喊出來，要陳賢士安排皮天明的鋪位。沒過幾天，我們才知道他叫皮天明，是從林業隊逃跑抓回來的「犯人」。捕前是重慶一所中學的學生。

他們的可塑性極強，當他們一旦瞭解世界後，就會與自己貧窮處境作對比，從不成熟開始，發展成毛澤東的堅定反抗者，場部拖拉機組的孫明權就是一個例子，皮天明又是另一個典型。

他初到六隊正「火炬」案發的時候，他親眼目睹張錫錕案的處理經過，張錫錕視死如歸的人格魅力，使他深深折服。當他受到劉順森的影響後便開始認識社會黑暗的原因，很快成為火炬的追隨者，從初入監獄時的「逃」變成「反抗」。

自我學拉二胡後，耳朵裡常回蕩著母親當年演奏的《二泉映月》，而今我在鐵窗下演奏它，便用來安慰自己受傷的心靈，我不懂樂理，人們評及我拉的二胡說：「你在琴中哭泣。」

我深信音樂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垓下一戰，漢軍的竹簫楚歌，吹散數十萬楚兵，可見音樂能表達語言無法表達的感情，即使在文革最瘋狂的時期，連生性暴戾的士兵，聽到李克嘉演奏二胡時，也會聞琴而靜，沒對拉琴粗暴干涉。

工餘時間，他迷上了二胡。從二胡中所表達的內心獨白，溝通了囚奴們的心靈。靠二胡我結識了李克嘉，後來又邂逅冷軍，現在又碰到皮天明。

有一天，我正在獨自調整二胡的音調，一曲「良宵」還剛剛開頭，便見皮天明站在我的床頭看。我停下了弓，用探詢的眼光看著他。

他稱我老師，很大方的向我請教二胡弓法。想到皮天明初到六隊時他帶著一把二胡，那身江湖藝人裝束，理應對它瞭若指掌，怎麼會來向我請教弓法？在六隊，當二胡老師非李克嘉莫屬，我哪敢被人稱作「老師」？

我連忙挪動了一下身體，請他坐下向他說：「我是初學的，拉得不好，不敢妄自為師，還請你指教。」

皮天明搖了搖頭，顯出他的天真，說道：「你別誤會，我根本就不會拉二胡，但聽到你和李克嘉的琴聲，我幾次都想拜你們為師，極想學會這門樂器，可是李克嘉送進小監了，所以我只能拜你為師了。」

那時因四個馬鈴薯人，李克嘉第三次關進小監。

我好奇的反問他：「我看到你才到六隊帶著二胡，我以為六隊又增加了一個愛好音樂的人呢。」

「唉！說來話長，那是一件紀念品，我從進監獄的那一天開始，便一直帶著它，這是一位我在中學時代鐵哥們的遺物，」皮天明回答我，眼睛變得灰暗起來。接著向我講了一段有關那把二胡的故事：

「他比我大三歲，那時，我們都是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員，他拉得一手好二胡，我就是從他那裡才知道『二泉映月』的，聽他演奏這首曲子，常會情不自禁的流眼淚。」

「有一天下午，我在他的寢室裡聽他演奏二胡，天色漸漸黑下來，突然聽得校門口人聲鼎沸，來了一群與我們觀點敵對的造反隊員，個個手裡操著大刀，我們還沒看清楚他們的臉，他們就已殺奔我們的寢室來了，那時重慶武鬥正在高潮中。」

「三個大漢見到我們，不由分說便朝我們倆亂砍亂殺，我倆還來不及奪門而逃，寢室的燈也熄了，黑暗中，只聽到他慘叫一聲，就撲在我的身上，我只覺得血從他的身上流到我的身上，聽見寢室裡有人在亂翻，我在他身下不敢動彈，只聽見其中一個人說道：『都被收拾了，快走吧！』」

「我在黑暗中等了幾分鐘，聽聽四下沒有動靜，便挪開壓在我身上的哥們，黑暗中只覺得他渾身是血，已經說不出話來，摸他的鼻子，還有一點氣，便趕緊摸著黑，連背帶爬的把他背到了附近醫院，醫生說他已經死了。」

「我回到學校，找到了他丟在那裡的二胡，想昨晚的可怕經過，若不是他壓在我的身上用生命保護了我，我恐怕也不在人間了，我拿起二胡一看，龍頭被折斷了，就將這把二胡留作我永生紀念品吧，便把它帶回家，收藏起來。」

「血債要用血來還，當天下午，我們集合了更多的同學，向昨夜襲擊我們的組織發起了大規模反擊，我在那次反擊中，懷著滿腔怒火，只想替已經死去的哥們復仇，進入陣地拼刺刀，我見人就砍，自己也多處負傷，那時我才十五歲。」

皮天明停頓了一會，好像還陷在往事中，「沒幾天，警備區清查那次血鬥的兇手，我就被抓了進來，臨出家門時，我什麼都沒帶，就帶上了這一把沾著哥身上血跡的二胡。」

「文革」中像這樣的故事太多了，那把被折斷龍頭的二胡，引起了我的注意。

如今，當我面對皮天明的請教，反而讓我為難起來，弓法和指法，我是講不出來的，想了半天，我只能用「練」來回答求教者：「憑著你的聽覺，用你的心去指揮你的兩手，反覆修正，以求達到手和心的一致。除了『心領神會』之外，我確實講不出多少奧妙。」

於是皮天明回到他的監舍，取出了那「紀念品」，坐在我的對面，跟著我調好音調，緊了緊二胡的弦把，便開始拉起來。

初學二胡的人，包括我在內，最怕初拉出來的殺雞殺鴨聲遭人恥笑，所以總是把卡子取掉，依依呀呀的先拉給自己聽，一面修正自己的弓法和指法，經過一段時間的「啞練」，達到可以讓人聽的程度後，才敢將卡子安上。開始時拉弓的手極輕，發出很低的聲音，絕不敢放肆，以招致聞者的非議。

然而皮天明則完全不同，一開始，便將卡子安得高高的，拉弓的手，下得極重，共鳴箱飛出的聲音，就像一頭公牛在昂首高叫，對別人的恥笑，甚至干涉，他全都不予理會。

我從他不怕恥笑專注而勇敢的態度，看出他極強的個性。看到他聚精會神的正襟危坐在那裡，不覺暗自驚嘆：一個理直氣壯不護短的人，坦誠到連自己的失誤都不加掩蓋的程度，表明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人，而沒有任何虛偽加以掩飾。

也正是這勇敢和專注，才是最快學好一門樂器的捷徑，他說，這可是他那忘年之交的哥們生前告訴他的。但是，皮天明這種毫不加掩飾的真誠，卻被鬼蜮之徒所傷害，失足於他們布下的陷阱中！！

從此以後，每當奴隸們收工回來走到六隊的圍牆外，就可以聽見皮天明十分刺耳的「殺雞殺鴨」二胡聲。但是，即便滿院子充滿他憋腳的琴聲，總比打罵呻吟聲好聽得多。

看他的拉琴姿勢，並不拘泥，坐累了，就跪在鋪位上，凝神聚氣十分虔誠，開始還有人對他的琴藝評諷譏笑，時間久了，開初討厭他琴聲的人們也漸漸聽慣了，沒有人對他再加嘲諷，反而還有誇獎他的琴技進步很快。

於是，我對皮天明的坦誠、勇敢、執著的性格產生了好感。為了更深入瞭解他的內心，我常主動找他聊天拉家常，漸漸地，從他對身世的介紹中，我發現了他那雙倔強的大眼睛裡，包藏著一眶人間的辛酸：

他的父親是早先銀行裡的一名普通職員，他出生於一九五四年，五歲就失去了生母，因為家庭貧寒，繼母很不喜歡他這個前母留下來的孩子，自從繼母生下弟弟後，什麼家務事都要他做。

文革開始那年，皮天明才十二歲，父親去世不久，繼母帶著才滿四歲的弟弟，離開了家。從此他拉過板車，過著半流浪的生活，後來在一次打群架中，結識了他的哥們。

文革武鬥中。皮天明的哥們被打死，他奮起復仇，落入監獄。年僅十五歲的皮天明，落到以少管所為家的地步。

在大陸這個大監獄裡，人們的悲劇太多，人們遺忘的事情也多，在這個人口太多的國家，像皮天明這樣渺小的生命，只是千千萬萬中的一個。這些被文化大革命遺棄的渺小生命，被少管所收留，在少管所裡，他飽嘗了拳頭和虐待，監獄像一個消化弱者的垃圾箱，消化了他們弱小的生命。

「我發誓，我要毀掉這吃人的垃圾箱，即使我去死也在所不惜。」皮天明在介紹完自己的身世後，一字一板的說道。從他那倔強的眼裡，使我看到了又一個孫明權式英雄影子。

我作為「反右」的犧牲品，而皮天明則是「文革」犧牲品。雖然年齡相差整整十六歲，但仍有共同之處，黑暗的社會，使我們走到了一起。經過練教二胡，我們的心距離越來越貼近了。

### （三）掩護

皮天明調來六隊時，張錫錕剛犧牲。他十分尊敬張錫錕，聽到「火炬」的前前後後，他伸出大姆指說：「無怪乎那麼多人都欽佩張錫錕。他雖然死了，但死得值。他才配得上頂天立地的好漢！」

他十分崇敬劉順森，用心聽他講解歷史，很快成了他獄中的新「哥們」。這不光因為他們先後在重慶「少管所」關押過，劉順森的正氣以及他淵博的知識，讓皮天明的眼界日益開闊，從而把劉順森當成了良師益友。

劉順森在作越獄的準備時，曾徵求過皮天明的意見，因為他是在文革武鬥白熱化時才離開重慶，比我們離開重慶要遲得多，更加熟知文革變化以後的重慶。

皮天明在得知劉順森將到重慶去，拿出了自己身上的十五塊錢，並且表示願意為劉順森出逃作掩護。

出逃的那天晚上，皮天明潛入廁所中，預先下掉三號監舍的門鎖，當三個人成功的進入三號監房後，又由鐵工房的另一名鐵匠將鎖鎖上。六個人配合得很順利，使專門盯梢的樊友才，沒有絲毫察覺。

現在劉順森抓了回來，根據樊友才的告密，何慶雲為縮小懷疑圈，最後鎖定在皮天明身上。因此何慶雲把皮天明再次叫到隊部去，作了一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說教後，隨即叫樊友才立即調整皮天明和賴開明兩人睡鋪的位置，將皮天明的鋪位調到緊靠著樊友才的位置上。

並在小組上宣佈，從即日起，皮天明、賴開明兩人不得單獨行動。無論是上廁所，洗衣服，到醫務室拿藥，都必須事先通知樊友才。此外，還作了一條特殊規定，原先由全組人輪流扛全組農具的任務，從即日起由二人包幹。

從此，何慶雲每晚都要把樊友才叫去，聽取他對兩人的反應。特別強調要他搜集皮天明、賴開明兩人同其他人接觸的情況。何慶雲還想在他們身上發現隱藏的線索！

在下班扛工具的時候，皮天明遭到了押隊的槍桿子幾次暴打。樊友才對他的歧視性的規定和老管們的暴力，使皮天明壓抑著怒火。血氣方剛的皮天明，立即作出強烈的反抗。

一九七七年四月，以「反革命越獄集團」立案的「劉順森專案」，上報西昌法院正式預審。西昌地區派出的專案小組，在鹽源縣和六隊兩處監獄中同時開審。

越獄集團的成員首先被定為皮天明和賴開明。何慶雲想從兩個年輕人身上牽出更多的人。為了放長線，暫時沒有把二人關進小監。

皮天明被隊部傳訊。當他坐在那張被審人專用的小板凳上時，他雙眉緊鎖，目光卻炯炯有神地盯著面前的預審人員。

皮天明雖然第一次登上重案犯的座位上，但態度冷靜。

預審人員問到：「你是何時何地參與了劉順森反革命集團逃跑計畫策劃的？」皮天明抬起頭來冷冷的回答道：「你們既然都早已認定了，幹嗎還來問我？」

兩個預審人一開始就吃了閉門羹，失望地問道：「你知道在你們的逃跑計畫中，本次逃往的目的地是什麼嗎？」沈默！

「你在這次逃跑中所分擔的任務是什麼？」

皮天明重複著他已經回答的話：「不知道。」

看來，靠這樣的審訊一無所獲，審訊者同何慶雲交換了一下眼色，何慶雲對皮天明說：「我們對你作的交代，已算仁至義盡了。你應當明白，抗拒從嚴的後果。」

於是，預審的開場白又回復到政策交代待第一步，在上級法院面前暴露自己的無能，使何慶雲感到十分羞愧。

對於樊友才的步步相逼，皮天明開始都默默地忍受下來，他來六隊時，最瞧不起這條癩皮狗。鋪位調整後，他從來沒有同他說過一句話，他認為同樊友才講話，會污染自己的嘴巴。

每天下班後，皮天明照例端坐在他的床前拉二胡。他用這種表面上的若無其事，來隱藏內心的痛苦掙扎。

隨著對劉順森的審問加緊進行，樊友才對皮天明盯得更緊，也更猖狂。除了繼續在勞動上對皮天明施加壓力，還當著皮天明的面，幸災樂禍說「現在劉順森已被立案，案子馬上就要水落實出，劉順森的案子，不是一般的案子，誰掩護過他，少說也得攤上一個無期徒刑。現在有人不但不悔改交待，還要抗拒，大概是嫌自己的刑期短沒有過癮，真想弄個無期徒刑，守著吃一輩子牢飯吧。」

當夜深人靜時，他撫著隱隱作痛的傷疤，回顧他走過的這二十六年的人生之路，好像走得太久太累，他感到沒有什麼值得他留戀的東西，與其無端遭受著樊友才這隻瘋狗的撕咬，不如一拼了之。

然而沒人察覺出他即將爆發的怒火！白天，他仍顯得那麼平靜，即使在工地上挨了打，回到監舍，也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只拿起他那破二胡用力的拉著，借那樂器聲，壓抑著心中的怒火。

這是一場爆炸到來之前的潛伏期，他那琴聲中好像是一種對於親人的祈願，也好像是萬馬奔騰般的內心在怒吼，好像牽掛著遠方的親人……每天清晨起來，他的眼裡殘留著淚痕。

男兒有淚不輕彈啊，看到他將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被痛苦深深折磨，我只能暗暗地為他感到難過。

#### (四) 怒劈狗腿子

出工的時候，樊友才不斷對皮天明怒喝。苛責皮天明動作遲緩，磨磨蹭蹭。當大家已站好佇列報數的時候，皮天明還在摺全組人的鋤頭。

當樊友才再次向他吼叫時，皮天明狠狠地瞪了這條老狗一眼，看著樊友才洋洋得意的樣子，一股熱血衝上了皮天明的腦門。

殺！殺死這條狗！殺死這條為虎作倀的傢伙，剷除這個汙物，伸張那被壓抑得太屈辱的心靈，有時用殺戮對付狗腿子迫於奮而自衛。

正因為這樣，當舞臺上的武松殺死西門慶時，換得觀眾的是掌聲和喝采。這段時間裡，皮天明的二胡拉出萬馬奔騰的聲音，我聽出那琴弦裡飛出來的決心，不禁心中一怔，但那時不知道他要幹什麼。

第二天清早，他以修鋤頭為名，向木工鄧世全借了一把磨得鋒利的斧頭，趁大家不留意，便在早上出工時順手放在門邊的角落裡。位置正好正對著樊友才的鋪位，當門打開時，斧頭被遮住，而當門關上時，順手一操就可以捏在手裡，這是他想了又想作出的決定，對累累咬傷他的狗，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時候到了。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鹽源，這天時值初夏農忙時節，太陽特別的大，天空沒有一絲的雲。

中午，剛剛從工地上收工回來，大家等著開飯，樊友才端著一盆水坐在鋪前彎下腰去，正沖洗那顆沾著汗水的禿頭，這時，皮天明從監舍裡緩緩地向門口走出來。

突然，皮天明把門關上，從牆角邊操起了那把利斧，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對準樊友才那水淋淋的光腦袋揮起斧頭，朝著那腦門猛砍下去！

樊友才聽到關門聲，抬起那禿頭，正與那利刃迎了個正著，那一瞬間，一股血帶著白花花的腦漿從樊友才的禿頭裡飛濺出來，直撲在門板上，牆上和床頭上，一股血腥的氣味飛向監舍的所有角落！

樊友才「啊」了一聲，便倒在床上，血像打碎了開水瓶一樣，染紅了他的鋪。

而此時的皮天明，眼球幾乎要瞪出大眼眶，舉起斧頭向正在上鋪嚇得縮成一團的王維松喝道：「聽著，你這條癩皮狗，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做的骯髒事，今天本要用你們兩條命抵我一條命，看在你家有老父，姑且饒你一命，記住，今後不得作惡，否則就是這條老狗的下場！」

王維松，這個向樊友才提供皮天明掩護劉順森出逃的人，此時嚇得魂不附體，縮在牆角瑟瑟發抖，面如土色，大氣不敢出。

這突如其來的事發生後，全監舍的人驚得鴉雀無聲，大部份人用欽佩的目光注視著皮天明。緊閉的門被皮天明把守著，親歷這場恐怖事件的人，還來不及作出反應，一時間，整個監舍靜寂無聲！

皮天明手執斧頭，冷冷的看著那在血泊中掙扎的樊友才，持續了兩分鐘，微微一笑，猛地捏緊了手中的利斧，毫不猶豫的對準了自己的腦門心砍去。

鮮紅的血向那門上飛濺開去，在那上面劃上了斑斑印記，這時他才打開了大門，搖搖晃晃的跨出門檻，便跌倒在門前的水溝邊。

被人扶起來的皮天明突然清醒了過來，他掙脫了扶他的手，獨自踉踉蹌蹌地從水溝邊爬起來，走到院子中間，面對著在壩子裡的囚奴盤腿坐下，鮮血已染紅了他的上半身，在陽光下顯得特別的紅！

老管們面對他這種行動，一個個呆若木雞，看著他盤腿坐好後，大聲地唱起歌來！他唱的歌辭是：「天地有正氣，雜然付流形……」歌聲同他的琴一樣，開朗激昂，正是他心地光明的自然流露，還增添了一股視死如歸的氣概。歌聲衝沖決了牢房的鐵門，衝破了封鎖六隊多年的沉寂。

聽見他的歌聲，我才領悟到，無論是平時拉的二胡，還是此刻唱出的歌，都是他對這人間地獄的控訴，在皮天明這短短二十六年人生中，罪惡的人間使他清醒，他既然沒有力量砸爛這個罪惡的世界，就除掉一個惡鬼吧，

現在就藉著歌聲走向解脫。

告慰他短短二十六年人生，最有意義就是做了一件除惡的義舉。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用心聆聽他的歌聲裡所要表達的最後囑託。

人們這時才從惡夢中驚醒，過道上的人一陣驚叫，監舍裡的所有人聞聲湧到了二號監舍的門口。有喊報告的，有喚唐啟榮的，有喊搶救的，頓時亂成一團。

沈官科大著膽子，從監舍裡一躍而出。從倒在血泊裡的皮天明手中奪下他還緊握著的利斧。有人向崗哨上尖叫道：「殺人啦。」

所有獄中難友全都自動集合在院壩裡，他們誰也沒有說話，神情肅穆，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眼前這一幕。

皮天明在六隊找到了同他心心相印的兄弟，他對劉順森的出逃抱著極大的期望，現在他的兄長被抓回來了，等待劉順森的凶多吉少，偏偏像樊友才這樣的人，還想踩在他的身上立功求赦。

哨樓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顯然在發出某種指令。

此時，正是收工的時間，剛剛回來的流放者不斷湧進大門，院壩裡的人越來越多。何慶雲、徐世奎和老管全都來到了現場，老管們都下了崗樓。唐啟榮正指揮著幾個嚴管組的人把樊友才扶上了急馳而來的馬車，也把皮天明扶了起來，鮮血染紅了監舍的門口和水溝。

新來的中隊長余胖子，同何慶雲，徐世奎和鍾花臉一語不發的站在往日點名集合的台前，余胖子張開大嘴，露出發黃的大牙，傻呼呼地看著皮天明發愣。

過了好一陣子，余胖子才猛然驚醒過來，連忙吩咐唐啟榮和幾名組長，把樊友才從血泊中抬到醫院去。

皮天明因為大量出血和過份的刺激，昏迷了過去。他側歪著身子，倒在自己盤腿唱歌的地方。太陽照著皮天明，好像在他的身後布著一圈金光閃閃的光環！

那天集合開飯，大家默默地吃飯，沒有人說話，也不知道口中的滋味。人們似乎剛從一場惡夢中醒來，回味著剛才看到的一幕，有人在悄悄議論著什麼，也有人擔心皮天明的安危。

半個小時以後，唐啟榮從小監走出來，並向隊部辦公室走去，半個小時後，才將樊友才送去醫院搶救，從農場醫院傳來消息：兩個生命垂危的人，都急需血漿。

中午飯後，人們看到皮天明被幾個人扶著關進了小監，聚在壩子裡的人，才開始散去。

余胖子得到場部指令，要他想盡一切辦法搶救樊友才，因為陳賢士的死已在就業人員中鬧得沸沸揚揚，如果樊友才成為第二個陳賢士，那麼今後還有誰敢公開靠攏政府？至於皮天明也要救活，讓他押赴刑場充當「反面教員」。

在下午出工時，余胖子在全中隊徵求自願的獻血者，報酬是為獻血者每人發給十斤糧票。當余胖子向六隊的流放者徵求獻血者時，當天下午就有三十多人報名願為皮天明輸血，而申請為樊友才輸血的，只有兩名組長礙於隊部的淫威而勉強報了名。

大約三點鐘，醫院專門組成的搶救小組，帶著輸血用的血袋和鑒別血型的設備趕到了六隊，他們被限制在小監那陰暗潮濕的房間，對已經昏迷的皮天明進行了「搶救」。

醫生看到皮天明昏睡在稻草墊起來的囚鋪上，於是對這種惡劣的衛生條件提出抗議，說他們無法在這麼骯髒的地方救活這個生命垂危的受傷者，但兩個最先獻血者，早已躺在皮天明的身邊了。

鄧揚光守在場部管教科，表面上裝得十分冷靜，但內心卻像十五個吊桶打水，孫明權與彭幹事同歸於盡的事一直像噩夢一樣纏繞著他，這些年輕的「反革命」，不同於一直堅持用非暴力手段與他們鬥爭的老一輩犯人。



文革中捶鍊出來的年輕人，奉行以暴易暴的手段，而所有的獄吏，可不願犧牲於亡命者的手下，這正是鄧揚光所不敢面對的「人性危機」。

所以文革以後，他們的殘暴相對的抑制著，而把施暴的事轉交給年輕的老管們。劊子手到了這時，內心的虛弱才充分流露出來。

晚上集合點名時，余胖子一再鼓吹政府的人道主義，把他們對皮天明出於政治目的的施救吹噓得天花亂墜，佇列中立即響起了各種議論，油庫灣那近似奪命的勞累還沒有完全恢復，皮天明被樊友才步步緊逼的前前後後，都是大家親眼目睹的，還好意思拿人道主義往臉上貼金？

給皮天明輸血的人何嘗不明白，救活皮天明，就是讓他在刑場上去死，但出於人類同情的本能，不希望看到他因失血而死，皮天明的衝冲天義舉激發了人們樸素的感情。

與此同時，在醫院裡，兩個醫生忙碌著，不停的為樊友才測血壓和脈搏，一口袋血漿高高的懸在他身邊的鐵架上，樊友才躺在病床上，他的頭部進行了消毒處理，迸出腦漿的地方，蒙蓋著一層白色的紗布，醫生們明白，就是手術成功，大難不死，樊友才也是一個白癡。

可惜，儘管所有的措施都用盡了，下午六點鐘，只見樊有才在病床上痙攣了一陣，隨即臉色變青，呼吸弱得像一絲快斷的線，心臟也漸漸停止了跳動，他沒有挺過這最後的一夜，死神牽著他下了地獄。

而皮天明卻在骯髒的四號小監活了過來。

皮天明斧劈樊友才的故事，一時成為鹽源農場各中隊最熱門的話題，人們談論皮天明時，總要聯繫他可憐的家世和遭遇，就連那個逃過死劫的王維松，也以敬佩的心情向人們介紹皮天明的家人，他本是皮天明的鄰居。

人們談到他拉琴，都交口稱讚他的毅力和意志，他的一言一行，成為六隊人們敬仰的偶像，大家敬仰皮天明的義舉，讚揚他除了一條害人蟲。

三個月以後，西昌法院以「反革命報復殺人罪」，判處他死刑，立即執行。

又是一個蘋果成熟的季節。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是一個晴朗的日子。上午九點鐘，我們正在監獄大門口前的垃圾堆中篩炭灰。一輛藍色的解放牌卡車，鳴著警笛，駛過小木橋，朝著六隊的公路急馳而來，停在大鐵監門外。

四個身穿白色民警服的人從卡車上跳下來，手裡提著一副手銬走進了鐵監門，大約半個小時以後，隨著一陣清脆的腳鐐聲，皮天明那熟悉的身影出現在鐵柵門中。

那天，皮天明穿著藍色的勞改服，手上戴著手銬，腳上還拖著一副十五公斤重的死囚鐐。在他蒼白的臉上和額頭上，留著兩條長長疤痕，使人想起了三個多月前他盤腿而坐的那一幕，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依然那麼屈強、自信，顯出他永遠都不會被征服的心靈。

四名員警跟在他身後，皮天明出了大門，略一停頓，抬眼環看了一下四周，眼光迅速掃向正在垃圾堆中篩炭灰的我們，於是嘴角邊湧起了一絲微笑，然後聳了聳肩膀，轉過頭挺起胸脯，拖著腳鐐向那輛卡車一步一步移去，鐵鐐在他腳下發出有節奏的撞擊聲，所有篩垃圾灰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向著皮天明的背影佇目而望，看到他的身影漸漸遠去，腳鐐發出的撞擊聲也漸漸遠去！

### （五）永別了，二十年後再見

皮天明明白，他就義的時刻到了，他用堅定的步子向他的歸宿走去，雖然他的肉體將永遠擁抱著這荒涼的邊漠，但他的靈魂在升騰。

他的聲音裡沒有一絲的怯懦和哀怨，只有慷慨就義前那種蒼涼和悲壯，正如他坦誠率真的男子漢性情！

他的喊聲，仿如洪鐘大呂，撞擊著山谷中這死沉沉的地獄，也好像一個被壓抑了幾十年的巨人猛然驚醒，發出仰天長嘯，他的喊聲猶如一股洶湧澎湃的巨浪，沖刷著每一個人的心靈，所有的目擊者心潮起伏，我的熱淚奪眶而出。

此時，我心中湧起一曲送別的悲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與壯士的這個最後的照面，一直留在我心裡。

我突然的想起了他常說的一句話：「我發誓要毀掉這吃人的垃圾箱，即使我去死，絕不後悔。」

十五公斤重的鐵鐐拖在他身後，發出有節奏的響聲。他走到了汽車邊，四個民警兩個人在上面拉，兩個人在下面舉，將他連同鐵鐐一齊舉上了車廂。隨著一聲腳鐐撞擊車廂板的響聲，他已經站在那卡車上了。他轉過身來，臉朝著我們，高高的舉起那帶銬的雙手向我們再次拱手致意。

「永別了，難友們！別了，二十年後再見！」

後來有人十分懺悔地回顧道：看著樊友才欺負皮天明，扛起全組人的工具，一路跌跌撞撞，卻沒有幫幫他，甚至看到皮天明遭受老管的皮鞋腳尖時，也無動於衷，對皮天明拉二胡也橫加干涉……倘若時間可以倒流，一定要用自己的一切來彌補這些過失！

汽車啟動緩慢地向前駛去，皮天明還在向我們招手……

汽車馳過了路邊濃蔭覆蓋的蘋果園，正是早熟蘋果成熟的時候。從綠葉中露出一個個微紅的果實，吐出一陣陣誘人的芳香。

「給我摘個蘋果吃！」皮天明向著白制服說。

汽車停下了，兩個白制服埋頭鑽進了密林。不一會捧著幾個又大又紅的蘋果向皮天明遞去。

皮天明接過蘋果，毫不猶豫的大口嚼了起來。他畢竟才二十六歲，生活才剛剛開始。生活的甜頭他沒有來得及品嚐，然而，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

我突然聽到距我三公尺遠的陳孝虞的抽泣聲。這最後的生離死別時，我們才感到與他兩年多的相處太過短暫，才感到與他血肉相連，難捨難分。

我遠遠的佇立在垃圾堆前，一直淚眼濛濛地注視著他，看到他大口吞嚼蘋果的樣子，忍不住淚水往下流淌，一滴一滴的滴在腳前的泥土中！

這一夜，我翻來覆去的睡不著，耳朵裡總是回蕩著他拉二胡的聲音，腦海裡迴旋著他那開朗的音容笑貌：「你教我拉二胡吧！」他真誠地請求我，「音樂是心靈的語言，隨心所欲吧！」我這樣回答他。

記得有一次，他坦率地問到我，人的一生該追求怎樣一種理想？我含糊地回答他：「你還年輕，怎麼在一生中選擇自己奮鬥的目標，只能用心去考察就是了。」

想到他的決定，未免匆忙，不聲不響，沒同任何人商量，暗暗下定了決心，令人心疼，也令人欽佩！

三個月前，他盤腿危坐在院壩中間，血流滿面，引亢高歌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響在我的耳中！「永別了，二十年後再見！」這摧人淚下的告別，使我無法入眠。

第二天，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九點鐘，鹽源農牧場的全體流放者，再次被押解到農七隊的那片大壩子裡。走進這個壩子，就有一股血腥氣撲面而來。

鹽源農牧場的獄吏們在這裡留下了多少血跡？那圍牆後面的草坪上，一個個敢於反抗迫害的奴隸，就在這裡紛紛倒下，然而反抗卻前仆後繼，一次比一次更為壯烈。現在又一位喋血英雄，就要在這裡從容就義。

進入會場，四周的牆上照例佈置著黑洞洞的槍口，各隊帶隊來的幹部們，三五成群的在那長長的廊沿下，各侃各的龍門陣，會場裡鬧轟轟的。

大會一開始，依然殺氣騰騰地把將被槍殺的人扭上主席臺前，受刑者依然被打得皮開肉綻，「四人幫」雖已粉碎了大半年了，可毛澤東的衣鉢幾乎被全盤繼承下來，無產階級專政依然是中國人民頭上的緊箍咒，所不同的是，主持會場的人，卻換成了鹽源縣法院的院長，他口吃的講話，少了些文革時期的殺氣。

這段曲折的歷史，每前進一步，都是艱難的，殺人還將繼續下去。

廁所的一角，夏光然找到了農二隊的當年同皮天明同案處理的張磊。兩人便蹲在那裡悄悄地交談著：

「知道皮天明家在那裡嗎？」夏光然問。

「好像在漁洞，我和皮天明本來並不認識，只是在一次搶砸一個百貨商店時，結成了一夥，那一次，實際是兩個造反組織聯合幹的。」

夏光然思考了一下，繼續問道：「農二隊還有其他人知道皮天明嗎？」

張磊思索著回答道：「倒是有幾個，但他們知不知道皮天明的家就很難說了。」

夏光然拜託張磊一旦打聽到皮天明的下落，一定通知一下六隊撿牛糞的鄧洪元。

火炬成員十分清楚，自己是在尖刀上與統治者作拚拼死的鬥爭，隨時都可能遭到殺害。當這種情況發生以後，每一個火炬的成員，都有義務弄清楚他的家人和地址，收拾好犧牲者的遺物。一旦有機會，將死難者的事蹟告訴他的親人們。

在監獄中，我們雖然沒有組織綱領和規章，但是生死相依的情誼，比任何組織章程更使我們緊密聯繫在一起，可惜皮天明案來得太突然，事前也沒有預先同其他人商量，更沒向任何人託付他的後事。

在毛澤東時代的監獄中，稀裡糊塗被冤枉整死的人太多，若不是生前的好友為之代勞，許多人就算不明不白死去，也無人知曉。尤其是在那個年代，一人入獄，誅連全家，加劇了骨肉分離的悲劇。

就在皮天明斧劈樊友才的當天，就有細心的火炬成員為他保存了他帶到六隊的那口破皮箱和那把他一直癡心演練的二胡，暫時收藏在鄧洪元那裡。

如果遺棄他的繼母和兄弟還在重慶，在得知皮天明壯烈犧牲後，能為他點一束香，也算讓他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後來，我回到重慶以後，專門兩次去漁洞尋找劉順森和皮天明的家，望著街上的行人，我茫然四顧，劉順森留下的地址早已人去屋毀，至於皮天明，更像是無根的樹了。

當年這一血案早已埋入地下，所有的當事人先後的離開了人世，對於尋找他們的家人，我始終沒能如願。

## 第五節：變態劊子手林扯高最後下場

十年前，林扯高剛跨出農校大門，就來到鹽源農牧場，籌建「八一五紅色造反兵團」。在小夥計們簇擁下，他在場部掀起了造反風暴，圍剿走資派，爬上鹽源農場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寶座，掌握著近萬名囚犯和「刑滿釋放犯」的生殺實權，可謂勢焰燻天。

但是，林扯高用打砸搶開劈出來的仕途，是一條充滿荊棘的曲折道路。在六隊，他陷入了同老保份子何慶雲等人的難以調和的較量中，以他盲目崇信、直線思維的簡單頭腦，那是久居官場「老保」的對手？

幾個回合下來，林扯高不但沒有制服對手，反而被對手一腳踢了下來，被削去了「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頭銜，只掛了一個一般幹事的職務。

自從七五年十二月李克嘉被抓回以後，已有半年沒見到林扯高了。傳說他被派去學習，又傳說因為他「老子」被審查，他也受到追究。

林扯高的沉浮，一直是我們觀測政治風雲變幻的風向標，一九七六年五一節前，林扯高神氣活現地突然出現在六隊，參加了這次大檢查。

### （一）冤魂找上他

一連串的挫折打擊，使林扯高的銳氣磨滅了，也動搖了他的自信。

自從張錫銀被害後，林扯高莫名其妙地感到緊張，他開始惡夢連連，並常常從惡夢中驚醒，醒來總是大汗淋漓，驚悸異常，卻又說不清夢中的究竟。

有一段時間，因為惡夢，林扯高對夜晚特別感到恐懼，入夜不久剛剛人靜，便感到窗外有異物閃過，原來風吹門窗令他心驚肉跳，因此在自己寢室的窗子外加上鐵柵。

一到晚間，林扯高便將窗子緊閉，為了不被恐懼控制，每晚都要吞服安乃靜。但這種措施也只起暫時的作用，時間一久，安乃靜也失去效力。因為晚上休息不好，白天便感到煩躁和疲憊。他開始大量的喝酒，並趁著酒興，摔盤砸碗，以此來抒發內心的鬱悶。

六隊的幹部本來就對他的驕橫跋扈看不順眼，對他淺薄無知而狂妄十分反感。此時更對他冷潮熱諷，挖苦揶揄反正沒好臉色給他看。他從廠革委副主任位子上摔下來後，不但失去了權力，且變成了人見人厭的老厭物。

我想，使林扯高內心異常煩躁的真正原因，應該是他內心深處的邪惡權欲，是他失去權力的失落感。

就在陳賢士被摔下身亡那個秋收季節，林扯高莫名其妙的產生了一股學開拖拉機的勁頭。按照他的身分份，他本可以向場部提出申請，到場部正式舉辦的拖拉機駕駛班學習三個月，領取正式的駕駛執照後，才正式駕駛拖拉機。

但是駕駛班的負責人卻是他仇視的老保份子，林扯高不願放下架子去懇求對方，而是霸王硬上弓，看中了每年都要到六隊翻地的郭賢師傅。

郭賢在徒弟孫明權復仇自爆的餘波還沒有平息，接著又遭遇陳賢士墮車身亡事故，本來就膽小怕事的他，就更加小心翼翼了，他比任何人都早出車晚收班，以此來消弭監獄當局加給他的精神壓力。

有一天，郭賢來六隊翻耕的時候，被林扯高攔住去路……林扯高搶上了郭賢的車，命令郭賢教他開拖拉機。

面對這位紅極一時的革委會紅人，郭師傅左右為難。按場部的明確規定，駕駛者若是就業人員，不得任意接納學徒，更何況眼前這人，是全場聞名的造反派頭目，倘若再次發生陳賢士這類「意外」事故，那麼新帳老帳一起算，他一生就完了。但是郭賢又不敢公開拒絕他，弄得不好，自己就討打了，無可奈何的郭師傅，只好讓林扯高坐在副駕駛的座位上。

說也奇怪，這位平時野性十足的造反悍將，自從跟郭師傅學開拖拉機以後，便變得虛心起來，每天攔住郭師傅駕駛的拖拉機，坐在副駕駛座位上，聚精會神地觀察著郭賢的每一個動作，不厭其煩的請教，並不理會郭賢流露出來的討厭。每天耕完地，林扯高還幫郭師傅打掃油膩的車身，加注黃油。

郭賢卻完全是另一種心態，他隨時都在提防這個「徒弟」給他帶來意外的麻煩，郭賢知道，林扯高性如虎狼，什麼時候不如意，便會把自己往死裡整，順了他吧，出了事故自己擔當不起。所以抱著敬神鬼而遠之的態度，想甩掉他的糾纏。

於是郭師傅趁在小食堂吃飯的機會，向何慶雲報告了這件事。何慶雲婉言勸阻了這個派鬥對手，然而他把何慶雲的勸阻當成耳邊風。

每天翻耕土地時，林扯高照樣坐上拖拉機，漸漸地，他強迫郭師傅讓出駕駛座，喧賓奪主的坐在郭師傅的位置上，並命令郭賢坐在一邊指正自己的操作。林扯高第一次啟動拖拉機時，因為油門與離合器配合掌握不好，拖拉機立即熄火。

老式拖拉機的柴油發動機，要用一根繩子拉動飛輪，以帶動啟動馬達，再迅速的調整氣門點火，這是一套麻煩的啟動操作，林扯高哪裡掌握了？好不容易啟動了，僅控制油門跟上啟動的動作，已累得郭賢師傅滿頭大汗。遇到轉彎時，踩油門不及時，跟著又熄火了，於是重新啟動。

一個上午，就被這種啟動 - 熄火 - 再啟動折騰過去了，郭賢雖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但拖拉機還在原地打轉，地沒有翻耕出幾分。

按照場部規定，就算是正式報名學習駕駛的學員，剛學會駕駛，是不准在農田裡操作的，誰擔當得起誤了農時的責任？怕惹事端的郭賢，只好忍氣吞聲的伺候好這位新徒弟，提心吊膽地擔心他操作不當打壞了零件，受到追究。

翻耕任務被耽誤，負責秋耕秋種進度的徐世奎跑了過來，向林扯高喊道：「你這是搞什麼名堂？」但蹲在車輪旁邊的林扯高，忙著再次啟動，並沒有答理徐世奎。

徐世奎被林扯高這種輕慢無理激怒，衝著他吼道，「誰教你來瞎折騰的？你今天的崗位在哪裡？快給我走開。」

林扯高受到這種近乎挑釁的指責，站起身來，對著對方怒目圓睜：「我要幹什麼還輪不到你來指劃！」林扯高一邊恨恨回擊，一邊捲起袖子，以一種打架的習慣動作來回應徐世奎。

何慶雲在不遠處看到這個情形，便走了過來，仗著有徐世奎撐腰，改變了好言相勸的態度。向林扯高厲聲的申斥道：「你講不講理，場部有規定，沒有駕駛證的人是不准開車的。何況你是一個幹部，生產任務這麼忙，你卻在這裡胡鬧，已經折騰大半天了，拖拉機還在原地打轉，你要胡鬧到什麼時候？」

面對著六隊的兩位土霸王的夾擊，林扯高發起橫來，「你們這些鐵桿老保，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還死死抱著守舊的老黃曆，死心塌地的當保皇派，處處同我們作對」。林扯高用造反行話來回答。

他們的爭吵，吸引了搶播春小麥的幾十個「勞動力」的圍觀。大家停下手中的話，看看六隊的「神仙」怎麼打仗？

徐世奎火起，便不顧什麼「政治影響」，一把抓著林扯高，把他扯上田坎怒斥道：「你給我滾。」

## （二）「上馬」和「下馬」

林扯高不甘示弱，一邊從徐老大的手上掙脫出來，一面繼續吼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最近指示我們，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又叫反革命修正主義者，他們和我們革命群眾的根本分水嶺，便是對待革命群眾的革命態度。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是幹還是不幹，是上馬還是下馬，路線鬥爭搞了那麼多年，天天在教育你們，為什麼你們老是聽不進去，死心塌地的站在反動的立場上，反對我們革命派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上馬？看來繼續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是多麼必要。」林扯高吼叫著，不斷捏緊拳頭，在徐老大面前晃。

站在一邊的何慶雲，看著圍在周圍的幾十號囚奴，十分難堪，呆若木雞。何慶雲這種表情，顯然助長了林扯高的氣焰，他繼續用教訓的口氣喝道：「上馬，還是下馬，是當前革命派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的根本分水嶺，你們自己不幹，還硬把我們拉下馬，我們是絕對不會屈服的」。

這一段當時毛澤東的口頭禪，不管帽子合適不合適，就像魔咒一樣，套在對方的脖子上，使對方瞠目結舌，敗下陣來。

徐老大沒趣的悄然離開了，何慶雲面被對方的帽子扣過來，也心虛起來。

在那個年代，辭令越左越吃香，不管「左」得是否合理，也不管「左」得如何可笑，儘管何慶雲知道林扯高不過想過一番駕駛癮，哪裡談得上什麼「革命」、「上馬」？但他尷尬的站在那裡，任由這個狂徒重新啟動拖拉機，得意洋洋的把拖拉機開動起來。

郭賢看到自己搬來的救兵也沒能制止住「徒弟」，只好站在那裡，看著林扯高駕駛突突冒著濃煙的拖拉機，在大田裡掙扎前進。

目睹這場鬧劇，我心想，平時對犯人一凶二惡的徐世奎和何慶雲，原來也是一副賤骨頭，林扯高用毛澤東這條鞭子一抽打在他們身上，就像抽打在一個溫順的牲畜身上一樣，立刻使他們老實起來，不覺感到好笑。

正遐想間，突然看到林扯高駕駛的拖拉機在盡頭轉彎時，拖在後面的鏟口深深的紮進了田坎中，拖拉機連連冒出黑煙，發出刺耳的吼叫，把田坎啃出了一個缺口，拖拉機被巨大的阻力攔住，在兩塊田坎中間熄了火。

這齣洋相，立即點燃了何慶雲已被潑熄的怒火，他覺得這個傢伙的「革命」咒語，等於當著眾多犯人的面，重重搥了他一記耳光。使何慶雲怒氣發作，一個箭步，竄到熄了火的拖拉機面前，衝著束手無策的林扯高怒聲喝斥道：「你給老子滾下來，再這麼胡鬧下去，老子就對你不客氣了！」

說著，便伸手拽住林扯高的衣領，一把將林扯高從駕駛座位上拽了下來，兩個人立刻扭成一團！

幾十個種麥子的囚奴，聞聲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這是在六隊十多年來，第一次看到兩個管教在田裡進行精彩的相撲表演。

格鬥表明，看似統一的隊部，早已是貌合神離，現在終於連表面那塊遮羞布也撕掉，將爭強鬥狠的真面目暴露在囚奴們的面前。

圍觀者抱著看戲的心情，唯恐有一方敗下陣來，中斷了這場好戲。

這麼多年來，我們都對這兩個作威作福的傢伙敢怒不敢言，不管誰被打傷誰，都替自己出了心頭的惡氣。

本想離開現場的徐世奎，這時也停下腳步，看到兩人扭成一團，並不置可否樂得看熱鬧，他雖對林扯高十分厭惡，但對何慶雲也沒什麼好感，兩個獄吏發生火併，徐世奎站在哪一方都不妥當。獄吏間相互談不上友誼和信任，也不會有拔刀相助那點江湖義氣。

站在高處的老管，更是抱著袖手旁觀看熱鬧的心態，前些年武鬥高潮中，他們聽從軍管會指劃與獄吏瘋狂廝殺，互有傷亡，仇恨還留在他們的心裡。

兩個人在泥地裡滾成一團，使出平生氣力，都想把對方壓倒在身下，狠揍對方一頓。從年齡上看，林扯高占著年輕的優勢，但從力量上看，二人不分上下，兩個人在泥土中翻滾著，誰也沒有占著絕對優勢。

正在酣戰得難解難分的時候，榮老頭看到這邊人聲喧譁，便從田次上拄著拐杖走了過來，等到他到人群中，看清是林扯高與何慶雲正打得難解難分，便擠進人群中，喝住了兩個滿身是泥的人，眨著他的獨眼，衝兩人喊道：「你們都給我停下，到場部去解決。」

兩個沒有分出勝負的鬥雞，鬆開了對方，拍打著滿身泥土，撫摸著各自的皮肉傷，一前一後的到場部評理去了，榮老頭邊走邊嘀咕：「真不像話，在犯人面前大打出手，影響都不顧了。」

奇怪的是，第二天，林扯高依然出現在郭賢開來的拖拉機上，林扯高格外得意，何慶雲好像洩了氣的皮球，連理都不想理他。

今天的任務是翻耕山樑上大面積紅土地，所以改用了寬犁鏵，拖拉機也由輪式拖拉機換成大馬力的東方紅履帶拖拉機。

翻犁到中午，郭賢檢查了一下油箱，發現柴油已所剩不多。

午飯過程中，郭賢還沒放下碗，這位剛學會發動、踩油門基本操作的「新學徒」，迫不及待的甩開郭賢，獨自爬上拖拉機，開往油庫加油去了。

等到郭賢聞聲從食堂趕出來，拖拉機已經開出幾十公尺遠了，郭賢連忙跑進隊部辦公室去報告徐世奎。

### (三) 好險！

開車剛上癮的林扯高，精神抖擻的駕駛著那台履帶拖拉機，沿著通往場部的機耕道向那座必經的木橋上馳去。

在接近木橋時，林扯高減低了油門，放緩了速度，可那方向桿，卻不知怎麼搞的，不聽使喚起來，眼看拖拉機已越來越駛近木橋，但拖拉機卻明顯的偏向橋身右邊。林扯高急忙向左打方向桿，力圖使拖拉機從木橋中間駛過去，但拖拉機卻完全違背他的意願，偏偏越來越向右邊駛去，逕直向橋右側的河床衝下去。

林扯高萬分驚慌，手忙腳亂，急剎車的踏板也不知那兒去了，右腳亂踏了一陣，也沒找著，眼看整個車身已伸出了右邊橋墩，懸伸在空中，若再前進一米，拖拉機的重心就要移出橋墩，林扯高就與拖拉機一道墜下十公

尺深的河溝，首創鹽源農場的特大新聞：「林高明同志以身殉職」了。

不過，閻王爺的生死簿還沒他的大名，被嚇得冷汗直冒的林扯高，慌亂之中，終於踏中了緊急制動踏板，拖拉機排煙管吐出一口黑煙後發動機停止了轟鳴。整個拖拉機嘎然站立在右邊的橋墩上，前半部的履帶凌空懸出橋墩外，煞剎似一頭躍起的怪獸立在橋邊。

「好險！」這時，聞訊趕到的徐老大一行人失聲驚叫了起來，大家圍著懸在橋墩上的拖拉機散開，七言八語的議論開了。

一分多鐘以後，嚇傻了的林扯高才回過神來，他從駕駛倉裡慢慢伸出頭來，雖然強裝鎮定，卻沒有掩飾住險些喪命的驚恐，臉也變得煞白。一聲不吭的下了車，坐在剛下過雨的泥濘路邊，像洩了氣的皮球，喘著粗氣。

徐老大叉著腰，忍著一腔怒火，並沒有理他，一個勁催促代朝謀趕快到場部報告，請他們趕緊派一台拖拉機來，將這個停在橋墩上的怪獸，從懸崖邊拖回來。

這件非同小可的事故，像一瓢當頭冷水，潑熄了林扯高心頭的狂躁之火，使他一度的陷入了沈默。緊接著，發生李克嘉被抓回以及馬鈴薯人案件，又使林扯高像打了雞血一樣，重新振作了起來。

為了審理「馬鈴薯人案件」，林扯高經常在深更夜半提訊李克嘉，故意的讓他亢奮的吼叫聲傳到壩子裡，好像是為了挽回面子、重新樹立他的威信似的。

可惜的是，緊接著毛澤東一命嗚呼和「四人幫」被捉；緊接著，李克嘉又被放出小監；再接著，又是場部處理他無照駕駛，險些車毀人亡的嚴重違紀事件。

當然在這一連串的事件背後，決定著林扯高沉浮的，是中國政治氣候的驟然變化，他的沉浮，幾乎是毛澤東獨裁政治變化的晴雨表。

因為無證開車險些車毀人亡事件，場部「革命委員會」專門的通知了他已退役的父親，並當著他父親的面，撤銷了他管教幹事職務，責成他停職反省。

林扯高被停職以後，知道大勢已去，便請假回到老家探親。

照理說，在那亂世年代，無官一身輕，對他這種文化層次極低、又無專門技能、長期沾著政治紅光的人，是一次極好的隱退機會，或回家當農民，拿起鋤頭耕耘自己田園，或復員到工廠，當一個普通工人，過自食其力的日子。

然而這位林扯高，既不服「四面樹敵」的處境，更不知道「亂邦不入」的道理，在盲目尊崇毛澤東的愚昧信仰下，他並不甘心接連的挫折。

在權力爭鬥「場」中，林扯高的內心失意和煩躁，找不到渲洩管道，加上平時結怨眾多，敵手難免對他施以落井下石的報復，使他空虛的神經更受嚴重刺激，越發失去了常態。

#### (四) 家庭「革命」

回家期間，他不但沒有閉門思過，好好反省一下連栽跟斗的原因，反而像得了神經病似的，老是找岔子同老婆過不去，輕則怒斥她目光太短淺，小市民習氣太重；重則拳腳相加，一邊打，一邊還振振有詞說：「反動的東西不打不倒。」

對老婆施暴之外，又對他僅六歲的兒子也看不順眼，稍不聽話，便會抓住孩子的頭髮住牆上撞，用他那雙習慣打人的手，在孩子身上施虐。

周圍的鄰居實在看不下去了，隔著窗戶勸阻林扯高，林扯高卻吼道：「那個敢干涉造反派的革命行動，就是找死。」

母子倆平靜生活被他攪得恐怖不安，過了幾天，老婆因為受不了這種虐待，趁他不備，收拾東西，牽著孩子回了娘家。

那知道妻子對林扯高的忍讓和逃避，反而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妻子出走的第二天，林扯高怒氣衝衝地追到老丈人家，血口噴人，誣賴妻子行為不端，要追究她的姦情等等。

林扯高不顧老丈人的阻攔，一把抓住妻子，將她拖回了家。

當天晚上，林扯高便將妻子捆在木床上，像審訊犯人一樣，要她老實交代，還抽出腰間的皮帶，狠狠地抽打她。

林扯高六歲的兒子眼見母親被父親虐待，抱著他的大腿，苦苦哀求，但已失去了人性和理智的林扯高，反而將這個只有六歲的孩子，捆在辦公桌上。

可憐母子倆嚎啕大哭，哭聲驚動了居委會，才出面邀約了幾個老大爺老太太，敲開了他的家門，把母子倆放下來。

就在這天夜裡，疲倦不堪的林扯高鼾聲大作，母子倆乘機逃出了魔窟。

等到林扯高一覺醒來，面對空蕩蕩的屋子，開始有一點後悔，但他上那裡去找回他的妻和孩子？

當林扯高沮喪的回到了農六隊時，隱瞞了失去妻兒的悲劇，那時我們正苦戰在油庫灣工地上，林扯高在工地上露面時，他那一貫冷峻無情的臉，他那動不動就念著語錄盛氣凌人地訓斥流放者的作風，突然收斂起來。

我們當時雖不知道他探親回家發生的「暴力革命」，但卻知道他因無證駕駛闖禍，受到場部的處分，成了「准犯人」，成了沒有什麼權力的一般幹部。我們只是對他抱著敬神鬼而遠之的態度，並沒有把他當成「落水狗」來「痛打」。

林扯高回六隊的第一天帶班，便在我們這個組挖方的工地上，選了一個高處的位置，面朝我們盤腿而坐。沈默很久，也沒人答理他，許久，開口的第一句話，便特別實在：「唉，你們一天要幹多少小時才能完成任務？」距他最近的陳明九順口回答他：「二十小時都完不成。」接著補充說，「起碼要七十二小時才能完成。」

林扯高聽後，便在那裡認真的推算起來。最後像發現什麼秘密似的驚訝問道：「那不是要整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覺才能完成嗎？」蔡先祿答腔道：「是呀，林幹事，你看隊部下達的任務，不是存心讓我們不睡覺，要我們的命嘛？」

這話使他若有所思，平時隊部給囚犯們下達任務時，他向來就沒把流放者當人，否則，拿什麼向上級邀功？。

他呆呆地望著灰濛濛的天空，此時已是飛沙走石的冬季，他望著在狂風中掙扎的囚奴，像第一次親身感覺到他們苦難似的，於是又問道：「隊部都沒有給你們加班糧麼？」

陳明九一半帶著挖苦的口氣回答他：「林幹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場部有規定，深夜加班要過十二點，我們才能吃到三兩玉米粑。」

面對著這一群皮膚曬得黝黑的苦力，林扯高也許體會到了，他即使遭受了再大的不快，但比起這些苦囚來說，仍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獄，殘酷的現實能觸動他的良知嗎？

他從坐的地方站起身來，在這狂風呼嘯的黃沙中，一路掃視著這片忙亂的工地，最後將目光停留在工地那幅巨大橫幅標語上：「抓革命，促生產，奮戰一百天，堅決拿下油庫灣的改土任務」，便一面搖頭，一面喃喃自語「文革流產了」，一面從坐的土堆上走開了。

身後卻傳來蔡先祿的喊聲：「林幹事，幫我們反映一下，這樣幹，我們還活不活？」

大約過了一個多星期，一天凌晨四點鐘光景，當疲憊不堪的囚奴踏著開始下霜的泥土從工地歸來時，距離六隊大鐵門三百公尺遠的山坡上，便聽見從崗哨棚裡傳來了一迭棍棒打人聲和追趕吶喊聲，有人被棒棍擊打，發出沉悶的「朴撲撲」聲和呻吟聲。

陳蓉康低聲的咕嚕道：「不曉得哪個挨了！」他前面的楊雲門卻隨口應道：「真的被打死了，倒還痛快了，再不受這種折磨了。」



隊伍裡沒有人回應，細細聽去，夾在那雜沓腳步聲中，竟是鼾聲。幾天幾夜幾乎沒有睡覺了，站著和走路都想睡覺，這時正值下半夜，風聲已收斂，鼾聲聽得十分的清楚……

### (五) 打死你這爛賊

前面的囚奴已經走到了六隊的大門口，我突然看到，兩名士兵左手拿著手電筒，右手持青槓劍，正在緊緊追打林扯高。

只見林扯高雙手抱頭，在士兵追趕下，正在隊部走廊裡來回逃竄，追打的人卻邊追邊喊：「打死你這爛賊，打死你這爛賊！」

林扯高躲避不及，身上連中數棒，正拚拼命繞著走廊的柱頭抱頭鼠竄，企圖向外逃走。卻被籃球場通道口兩道手電筒光罩住，於是一前一後四個人，四根青槓劍將他圍在中間。

正在林扯高將挨上一頓痛打時，操場外突然傳來徐世奎的喊聲：「天還沒亮，林高明又在鬧什麼？」倘若沒有徐世奎給林扯高解圍，他難逃一頓痛打，四條漢子將手中的青槓劍撐在地上，七言八語地圍著他罵開了。

一個人手裡舉著一隻豬蹄向他劈頭擲去，並大罵道：「林高明這個爛賊，幾輩子沒吃過東西了，天不亮就跑到老子廚房來偷肉，你以為老子不知道，老子看你進來賊眉賊眼的樣子，就曉得你在心裡想什麼，你他媽的真不是人。」

另一個接著吼道：「你總是到廚房來偷東西，上星期天我給班長留的半隻滷鴨子，你進來一趟，就不見了，害得我還遭到事務長批評，說！是不是你偷的？」

「你別裝蒜，這段日子，只要你到我們廚房來，就要丟東西，不是油瓶子，就是佐料罐，今天現場逮住你，說！你偷了幾次？別給他囉嗦，到他寢室去搜。」

四個人當著徐世奎的面，一面數落著林扯高一樁樁劣跡，一面推推搡搡逼他開了寢室的門。果然，從林扯高寢室裡搜出來的臘肉香腸、雞腿菜油、佐料等應有盡有，其中可以立即辨認出來的，便是從老管廚房裡盛佐料的罐子……林扯高在贓物的面前，帶著臉上的血跡，只好低頭不語，任憑責罵。

其實，老管對林扯高「順手牽羊」癖好早已察覺，第一次抓獲時，從他荷包裡扯出了一條剛剛酥好的魚，炊事員並沒有過份聲張他當著別人出醜，林連連賠小心和認錯，事情也就當成開了個小玩笑算了。

那知那林扯高失去了控制，像染上了毒癮，三番五次去老管廚房看炊事員做菜，看見了，便要「嘗一嘗」，或順手牽羊。

掌勺的廚師想戲弄這個厚顏無恥的傢伙，有一次，炊事員冷眼瞄著林扯高下手去抓盤子裡的熟兔肉時，便取出鍋裡燒得滾燙的油勺，向他的手打去。滾燙的油在他那隻手上烙下了幾塊黑疤，算是對他的小偷醜事留下了記號。

從那以後，炊事班長便向徐世奎打了招呼，禁止林扯高再去他們的廚房。

但這一次夜半行竊，被老管逮了個正著，不但遭到一場棒打，並因此鬧得沸沸揚揚，使林扯高「揚名」全農場。自此以後，他的醜聞不脛而走，他的綽號也由林扯高變為「林瘋兒」和「林偷兒」了。所有的人對他刮目相看，都把他看作是精神失常的瘋子。

林扯高混到了這個地步，可謂顏面喪盡，「革命」的遮羞布扯破後，便赤條條地裸露出一個貪婪無恥的無賴真身來！隨著那些小偷小摸來的東西一件件從他的寢室搜出，這位文革初期鋒芒畢露的革命闖將，便徹底現出了他的原形。

回看林扯高十年文革生涯，他在六隊所演出的一幕幕鬧劇：無論是抓反革命典型人物，還是破獲反革命集團；不管是組織血腥批鬥會，還是羅織殺人材料。一樁樁，一件件，無不暴露出他對流放者的喪心病狂的迫害心理，無不說明他的內心兇殘。

至於林扯高跟何慶雲的明爭暗鬥，與場長們的奪權較量，無不反映出他善觀中共上層的政治風雲而投機鑽營的秉性，他所幹的一樁樁事，都記載著他的無賴本性。

他中毛氏邪教的毒太深，以為照著魔頭的教義行事，縱不能振臂一呼，天下回應，也可出人頭地，稱霸一方。這種趁亂打劫的舉動，在當時很常見，文革初期的「革命鬥將」，大都屬於害了這種病的人。到了文革後期，這些人奮鬥十年卻一無所獲時，便在信仰危機中墮落了。

林偷兒終於越來越狂了，有一次，他從油庫彎的工地上往回走，繞道去場部。當他經過林業隊賣蘋果的開票處時，看到一名就業人員家屬，將一背兜蘋果放在開票處約二十公尺遠的石坎上，他一看路上無人，便迅速地蹲下身子，背上蘋果，拔腿就跑。

開票的老太太聽見身後的腳步聲，回頭一看，見自己那背兜蘋果被人背著，已經跑出十幾公尺遠了，便顧不得開票，慌忙追了上去，一面追一面叫喊抓賊。

林扯高聽見身後有人在喊，便撒腿狂奔起來，當他跑出了一百多公尺遠，看看已到了場部蔬菜組的地界，正要往六隊的彎道上跑，卻偏偏被蔬菜地裡趕過來的四五個「勞改釋放犯」攔住了去路。

其中一個高個奪下他背的背兜，其餘的幾個人一擁而上，不由分說，便動起拳腳來。對他左右開弓，給了他一頓飽拳。

他們大部都是附近幾個中隊的刑滿釋放人員，大家議論紛紛，一時傳為笑話，傳遍了整個鹽源農場。

林扯高偷竊上癮，已到寡廉鮮恥的地步了，他很快從農六隊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當年，就在這裡他主持了第一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開辦典禮，並在這裡整治過被他劃為「走資派」的人，農場書記高德勝，以及六隊的李培連，都曾在這個學習班挨過打，受過刑，想不到今天，他也被另一批掌權者「請君入甕」了。

隨著清算「四人幫」深入進行，地方上開始清理「四種人」仍以路線鬥爭的方式來達到清算的目的，翻雲覆雨，波譎雲詭，只不過，玩人和被玩的人換了一下位置，整個的文革便是一場人玩人的大悲劇。

不！這場悲劇應當追溯得更遠，幾乎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共的起家。毛澤東一直在中國這個政治舞臺上導演著人玩人的悲劇，像林扯高這樣的悲劇人物比比皆是。一個平時對「囚奴」們作威作福的特工人員，至此已被完全阿Q化了。

毛澤東把林扯高變成了爭奪權位的鬼魅，一度成為決定全農場囚奴命運的主角，後來在權力角逐的鬥爭中，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中了毛氏邪教之毒的人，大致都同他一樣，一旦中邪，就沒有人性，不認父母，不認妻兒，在他的眼裡，除了鬥爭、整人，所剩的是極為淺薄的損人利己。到了撈不到稻草時，便成了見東西就偷的人渣。

## （六）重上井崗山

一九七九年，我獲平反回到重慶後，聽到傳來有關林扯高新的消息。

這年冬天，毛牛山冰雪封山後的一天，天還未亮，一個人影正向山上疾步攀登，他的手裡提著一支左輪手槍，這個人衣著單薄，臉色鐵青，一邊向上急步小跑，一邊還不斷地警惕地回頭張望身後的動靜。

這時，這冰封的荒山早已沒了人影，大雪早已淹沒了原來的馬路，原始森林已被大雪壓得如同一床大得無比的棉絮，如果大山深處沒有人接應，那麼他多半只有凍死或餓死在山巔上，然而他卻堅定的向山峰登去。

林扯高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裡聽到傳言，說毛牛山上就有王洪文組織的武裝部隊，又聽說一大批「決心緊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的人，都拿起了武器集中到山上，決心再走井崗山之路，這夢囈般的鬼話，他也信以為真。

於是林扯高打定了主意，在一個早上，天還沒亮，他便從學習班翻牆進入部隊營房，偷偷竄到了一個他平時很熟的連長寢室，偷走了他的手槍和一匣子彈，然後，大搖大擺的從營房大門走了出來。

當值班的衛兵盤問他時，他只回答說到馬路上跑一跑，鍛鍊鍛鍊身體，說著就裝出晨跑鍛鍊身體的樣子瞞過衛兵後，便迅速的取道農七隊，逕直向直通毛牛山的公路飛奔，朝著那白茫茫的山上奔去。

一小時以後，被偷了手槍的連長發覺自己的槍支不見時，便四處尋找，問及營房站崗的衛兵有沒有外人在早上進出時，衛兵才告訴了他一大早林扯高從裡面出來過。

連長馬上意識到危險的事就要發生了，連忙召了兩名士兵帶上了槍枝，匆匆忙忙向農七隊追來，到了農七隊再從那裡的守門人處，證實一大早林扯高的確經過這裡，獨自向毛牛山方向走去了。

三個人直撲毛牛山追趕林扯高，一個多小時以後，追趕的三個人終於看到了茫茫白雪之中的林扯高身影，緊接著便是包圍、喊話，茫茫大山中響起了稀疏的槍聲。

不過這並不是什麼工農起義軍的槍聲，而是抓捕林扯高和林扯高拒捕發出的槍聲，槍聲斷斷續續的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大約林扯高偷來的子彈已經打光了，終於被三個軍人制服，束手就擒。

林扯高被押回農牧場以後，在審訊中，他除了對偷槍上山的經過供認不諱外，卻拒絕「認罪」，等到法庭最後將一張判處他二十年徒刑的宣判書遞給他時，他公開的撕了那份判決書說：「判決書上稱他『上山為匪』是對他的誣蔑，上毛牛山，就是要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重上井崗山之路。」

第二年，又聽到另一種傳說。說林扯高在幹部學習班上，公開的散發「傳單」，號召在學習班學習的成員集體突圍，衝出牢籠，再上井崗山打遊擊，因此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活動，組織挑動人上山為匪……被判二十年徒刑。

兩種傳說都說，林扯高要「重上井崗山」組織武裝起義，然後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並被判處了二十年徒刑。這真是「風水輪流轉，禍福本無常」。

毛澤東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走資派，卻反過來把他的嫡系傳人關進了大牢。

有人說，張錫錕犧牲以後，英魂不散，先後捉了陳賢士，黃學全，劉資元等三個猶大去，最後還把林扯高的魂魄攝了去。

## 第六節：最後犧牲的「火炬」烈士

隨著北京城裡專制魔頭命歸黃泉，閻王殿裡為爭奪最高權力的火併也激烈地爆發出來。中共掌握兵權的軍中將領，一舉將毛澤東的嫡系傳人「四人幫」投入了監獄。

毛澤東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帝王夢，嘎然破滅：他的鐵桿親信們成了陪葬品，其餘的爪牙也樹倒猢猻散，丟下「反帝修」大旗，跟隨新主子追逐「人民幣」去了。

才登上統治舞臺的華國鋒和其他頭目們，面對毛澤東丟下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為了展現他們強權的力量，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場瘋狂的殺人運動，歷史再次留下了專制主義的血腥罪行！

當時，發生了聞名全國張志新案，張志新案件很多內幕被重重遮蓋著，後來為張志新平反昭雪時，只說是毛遠新幹的。在張志新精神失常的狀態下，先對她進行輪奸，再割斷了她的喉管，再予以虐殺。

在鹽源縣法院處決了皮天明以後，西昌高等法院便加緊了對劉順森「反革命越獄集團」的審理。

皮天明斧劈樊友才的案件，使鄧揚光增加了更多的疑團，他們沒有預料到火炬的影響擴散得那麼寬，新增加的孟平、皮天明、楊漢群，是他們所沒有料到的人物，這些年輕人都拒絕交代關於火炬的其他成員情況。

### （一）濫殺

鄧揚光本想沿著火炬的線索，找到六隊反革命組織綱領、成員名單、活動計畫、與社會上的聯繫等情況。但審訊了幾個月，因毫無進展，只好以逃跑的幕後策劃者名義，將夏光然、賴開明、陳蓉康等人關進小監。

徐世奎在六隊的二百號人面前惡狠狠地威脅道：「你們不要以為共產黨出了『四人幫』，就天下大亂了，你們總是錯誤估計形勢，認為時機已到，可以組織越獄，可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於是蠢蠢欲動，但是我要警告你們，你們這些人不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是不會甘心的！」

那段時間，他們組織了專門的審訊班子，對五個人輪番的突審。對夏光然、賴開明和陳容康威脅說：「如不交代，將要算總帳。」

因為「火炬」是對他們這麼多年來的罪惡的揭露和控訴，不除掉這個記載他們罪惡的幽靈，令他們寢食難安，火炬幽靈一直徘徊在鹽源農牧場。

大開殺戒的屠刀，藉著在全國掀起新一輪殺人運動，再次向我們頭上高高舉起。我理所當然成了他們的審理重點之一。只是因為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而沒有被關進小監。

蔬菜組的一名神經極不正常的殘疾人劉開雲，就因為說了幾句對宋慶齡的瘋話，就被關進了小監，後來竟被牽出去槍決。

劉開雲因何判刑我不知道。但他來到六隊時左手因受刑致殘，他與人們說話時語無倫次，根本無法交談溝通，人們都知道他是一個精神病人，而這種精神病的病因，則來源於中共的暴政虐待和恐怖高壓。

劉開雲因為左手殘廢，隊部將他安排在菜蔬組，平時就讓他一個人牽著一頭種牛放牧，他放牛時，老朝著那頭牛嘮叨著胡話，並常發出嘿嘿的傻笑，幾個無聊的年輕人常常戲弄他，可他一點也不介意，每天可以聽到他在小溪邊語無倫次的嘮叨，但不知他在說些什麼。

沒想到，九月二十七日鹽源縣城的公判大會上，劉開雲竟與劉順森一道，被處死刑。宣判他的罪行是：「瘋狂的誣蔑和攻擊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所謂「瘋狂誣蔑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劉開雲曾說過，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重慶曾與宋慶齡睡過覺。

劉開雲與我年齡相當，抗戰勝利時才八歲。一個不足八歲的童稚，怎麼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這純屬一個精神病人的胡言亂語，據此，竟對一個無辜的精神病人實施槍殺。

這些年來，我親眼看到多起對精神病人被處極刑或虐殺的案子，僅六隊，就有一九六九年的劉志和，還有一九七四年大年初四被活活打死在小監裡的「癩子」。他們身受雙重殘害，神經失常，得不到應有的人道主義治療撫慰，反而遭到肉體上的消滅。

更何況精神病人口出狂言，言辭荒誕，劉開雲被槍殺，實屬中共傷天害理。

不久，我在工地上受到徐世奎多次警告：「你還在為你的右派進行翻案，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只有給你兩顆花生米，你才肯甘休，你已表演得夠充分了，只有叫你永遠喊不出聲的時候，你才會安靜下來。」

事過幾十年了，他那咬牙切齒的殺氣，仍令我記憶猶新。

對於這種殺氣騰騰的警告，我經歷過多次，心中有數，估計我又一次被申報了死刑材料，理由便是多次「無理申訴」。

申冤，被當成「死不悔改」，成共產黨殺人的理由，出身「黑五類」要殺，瘋子要殺，說話犯忌要殺！反對暴政主張民主更要殺！！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沉冤深似海！！

## （二）為少年精英送行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清晨五點鐘，天還是黑糊糊的一片，六隊的大鐵門就打開了。前一天晚上由何慶雲親自點名挑出的五十名流放者整隊後，在八名荷槍實彈士兵的押解下，走出農六隊，步行二十里，去參加鹽源縣城召開的「公判」大會。

在這五十人中，「火炬」的嫌疑人占了一半，十幾年來，何慶雲費盡心機，都沒使這些人回心轉意，現在他讓我們眼睜睜看自己的同伴被殺害。這種劊子手震撼我們心靈經常用的手段，我們稱之為「陪殺場」。

五十名「陪殺場」的隊伍走在昏暗的路上，山路上本來就坑坑窪窪，加上前幾天下了今年的最後一場雨，水窪遍地，泥濘難行，此時天還沒有亮，腳踏著碎石或淤泥，深一腳淺一腳的走，好幾次幾乎摔倒。

因為下過雨，又時值深秋，我感到特別寒冷，想到劉順森今天與我們永別，五更的寒意，重重包圍了我。

我抖了抖身體，清醒了一下頭腦，這種「陪殺場」，我經歷得太多，但是我深信這倒行逆施，不可能持續下去，否則，人類就被邪惡征服，人類將面臨滅亡。

走在路上，耳裡響起了劉順森最愛吟唱的牢歌：「戴枷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男兒從此去，壯士不回頭。長夜盼天明，拂曉待雞鳴！」我們曾一起在牢房裡合唱這首歌；唱著它，我們送走了多少熱血志士飲彈刑場；唱著它，在恐怖暴行中舉起火炬，照亮了黑暗的地獄。

追逐「火炬」燃起的希望，我們一同渡過了六千多日日夜夜，共同熬過了苦難。此時此刻，讓我再為你低吟這首牢歌，講述你的故事：

劉順森出生在一個幹部家庭，姐姐是中共重慶市團委的一名官員，是當時「根正苗紅」的「紅五類」，本可以借此平步青雲，混一個新貴的位置。

然而，天質聰穎勤奮好學的劉順森，為了追求「真」，看明日獨裁者的真身，選擇了一條反叛之路，這是一條被打擊、被專政、並注註定獻出一生的「絕路」。他同中共權貴的姐姐發生了一場又一場的爭論，直到被逐出家門。

一九五五年，他就在同學中發表講話：「你們讀到鐵托在普拉的演說嗎？鐵托的觀點是正確的，因為他主張不能過早實行農業合作化，否則，其結果就是對農民的剝奪，你們想想，現在就對農民實行統購統銷，必然扼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就危險了」。

老師聽到後，既驚奇又害怕，在家訪時，憂心忡忡對劉順森姐姐講：「你們家有一些社會上沒有的資料，告訴你弟弟，看了以後，千萬不要在同學中講，否則會被看成反革命教唆犯，惹出是非來，非同小可。」

劉順森聽後，卻據理力爭說：「內部消息為什麼不可以告訴人民？人家的預言是根據當今社會的真實作出的，用不著幾年，就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沒過四年，大飢荒果然席捲了整個中國大地。

沙坪壩是重慶的文化中心，一九五五年，大專院校正在大張旗鼓進行反胡風集團運動，正在沙坪壩一所中學就讀的劉順森，氣憤的說道：「中國的知識份子太軟弱了，他們在暴力下不敢講自己的思想，口被封住了，胡風只說了點學術界的怪現象，就被打成反革命！今後誰敢說共產黨半個不字？」

校長聽到後，再次找他姐姐說：「你該管管你弟弟啦，經常發表一些令人心驚肉跳的話，總有一天會招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到時悔之晚矣！」

氣急敗壞的姐姐動手打了劉順森，並說，「你是劉家的不孝子孫」。將他趕出了家門。

劉順森毅然的離家出走，父母老淚縱橫地把他送到姨父家，那年，劉順森年僅十五歲。

一九五七年，劉順森剛剛跨進高中的門檻，就帶著同班的同學，將反對「黨委專斷」的大字報刷到了街上，在那張大字報上，劉順森公開抨擊了人民代表大會是共產黨的橡皮圖章，人民沒有自由，各級共產黨組織包攬了大小事務，是歪風邪氣的避風港。

嗅覺靈敏的街道幹部，拿著撕下來的大字報找到了他姐姐，姐姐沒好氣的說，我已經沒有這個弟弟了，你們該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吧。於是在反右後期，劉順森被送到少年管所，並且再也沒有出來過，實際上成了一個少年「右派」。

勤奮好學的劉順森，一頭紮進少管所的圖書室，如飢似渴地學習各種知識，如同進入了知識的寶庫，在少管所造紙廠裡的故紙堆裡，找到了不少一般人不感興趣的資料，有從市委那裡送來的蘇共二十大內部檔案；有供中共中級幹部參閱上面蓋有「密」字的內部資料，時值瘋狂的大躍進年代。

他同許多中國掙扎在飢餓中的老百姓一樣，親身體驗了他曾大膽預言的災難成為現實，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和思考，想從書本上找到災難的原因。結果，他發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存在著巨大的錯謬，並破天荒的提出造成中國

災難的原因是中國的迷信和個人獨裁。

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最需要防止野心家用「社會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來閹割民主。同時他認真閱讀了中國古代經典著作，四書五經無所不讀。花這樣大的功夫苦苦閱讀和思考，對於一個不滿二十歲的中學生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可以說，他是中國思想界湧現出來的早慧天才。

在毛澤東統治的中國，是絕不容許這種青年湧現出來的，毛澤東只希望他的御用文人鸚鵡學舌地用馬克思的隻言片語來欺蒙民眾，而不允許他們獨立思考。

劉順森最終認識到毛澤東是中國近代的最大獨裁者，並痛斥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最大敵人，這注註定了他以後漫長的監獄生活。

由於博覽群書，劉順森積累了淵博的知識，使當時只會背誦毛澤東語錄的共產黨獄吏們，不敢在他面前搬弄他們的老祖宗經典。在許多場合下，因為他無情的糾正這些管教所「引用」馬列原著，而弄得對方十分難堪，醜態百出。

在同何慶雲一場關於農民地位和狀況的爭論中，劉順森當即向在坐的人們背誦《資本論》中論證農民的大段原文，然後侃侃而談：

「馬克思從來沒把農民看作社會主義革命的同盟軍，他說小農經濟是發生資本主義的溫床，但是，在我看來，中國農民卻是一個最可憐的階層，在中共打天下的時候，農民們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可是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他們卻沒有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在四面紅旗的試驗中，農民大批的餓死在人民公社的茅廬中，至今還在飢餓線上掙扎。侈談共產主義不是很可笑嗎？

可以說，目前中國的億萬農民的理想，僅僅還是吃飽肚子，這僅是人生存的本能要求，而不是空洞許諾的共產主義！」

「中國農民是中共施行共產主義犧牲品」。劉順森的這段話，尖銳的諷刺了這個「管教」。

唉！縱然劉順森是對的，但他應當明白，他的命運卻掌握在別人的手裡，自古以來為真理而犧牲的人雖不少，但在這個謊言充斥的時代，說真話的人，是要冒殺頭的危險啊。

劉順森博覽群書，精通典籍，他從《道德經》到《天演論》，從斯多葛學派到馬赫，縱橫馳騁在先哲們的哲學園地裡，使動不動拿著紅本本訓人的獄吏們自慚形穢。

在這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劉順森雖然衣衫襤褸，鶉衣百結，且遭受飢寒和奴役，面色蒼白，嚴重貧血。然而，他的精神是富有的，面對粗野橫蠻的士兵，面對如狼似虎的獄吏，他橫眉冷對，從內心深處藐視他們。

三元宮有他的吼聲，在甘洛農場斯足分場墾荒時，他組織了幾十個水腫病人，持續了一個月的集體抗工，甘洛的鬼門關前，他聚集全隊數十名生命垂危的人，攔住四川省勞改廳派下檢查「工作」的警車，控告管教隨意打人和剋扣囚糧。

到鹽源以後，劉順森與我們相處的十三年歲月中，他幾次在批鬥自己的大會上據理力爭，讓主持會場的人只好萬分尷尬地收場。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倆被「推薦」去參觀成都的「農業學大寨展覽」，我們利用這一次機會，更多的瞭解毛澤東把中國搞成了什麼樣子，出發前，他用辛辣的諷刺，對朱國驥之流的阿諛奉承下了一副「醒腦湯」。

參觀隊伍才出發，龐玉篤便撕下人道主義的偽裝，不顧劉順森是參觀代表的身分份，竟惱羞成怒給劉順森戴上手銬，劉順森在激奮之下，自譜曲自填詞，吟出了黑牢歌——帶枷長街行有力截穿了管教科的偽善面孔。

當有人在遭到無緣無故的辱罵和毒打時，會聽到劉順森的抗議噓聲，然後幫助那些被打傷的同難，渡過受傷後的難熬日子。

劉順森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已不畏強暴的形象上的。長期的監獄折磨，使文質彬彬的劉順森變得「粗獷」起來，他的肉體上留著劊子手的累累鞭痕。

劉順森酷愛古代典籍。當時的獄中，除了《毛澤東選集》和《語錄》外，幾乎搜光銷毀了所有讀物。一經搜出，便目為「四舊」，予以銷毀。在這種情況下，劉順森卻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他珍愛的書籍，甚至不惜與獄吏和獸兵爭搶，一本《詩經》，一本掉了幾篇的《論語譯注》，一本霉跡斑斑的呂振宇編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一套范文瀾編寫的《中國通史》。

監獄當局搜去了劉順森所寫下的每一張紙片，並將其付之一炬，使這位文史天才沒有任何遺著留下，憑著他超凡的記憶力和聰穎睿智，他常常站在獄中的講臺上，給周圍的難友傳授知識，傳播正義良知。

在流放者的眼裡，劉順森不僅是一部活的四庫全書，更是一本百問不厭的活字典。像當年陳力一樣，他身邊常常聚集著一大群渴求知識的年輕人。

在鹽源農場十三年的漫漫黑夜中，劉順森是難友們公認的良師益友。

何慶雲只好虛張聲勢板起臉說：「你別放肆，你要對你說的話負責。」

林彪在溫都爾汗機毀人亡的消息傳來，劉順森用二戰後期對希特勒幾次密謀暗殺故事作對比，來說明世界上的任何獨裁者必然敗亡的下場。他說：「國內經濟繼續惡化，縱使毛澤東孤注一擲發動文化大革命，用更大暴力清除異己，卻並不能挽回他徹底失敗的命運。」

不久，在劉順森的倡議下，六隊舉起了反抗的「火炬」。記載在鹽源農場反抗專制暴政的閃光一頁上。

張錫錕從容就義以後，劉順森繼續高舉「火炬」，懷著探求光明、追求民主的赤子之心，帶著孟平和楊漢群，在難友的掩護下，冒著生命危險，翻越圍牆，直奔重慶。去尋找反抗暴政的地下組織！

可惜，他們三人就像穿梭於魔網底下的小魚，不幸誤觸魔網，而沒有逃脫被抓回的厄運！

### （三）縣裡召開的公判大會

叭的一聲，我的右腳重重絆著一塊石頭。因為用力過猛，大姆指的指甲被踢破，血從那裡沁了出來，痛得鑽心，使我猛然從沉思和回憶中痛醒過來。

看看拉遼的隊伍已經繞過了四號梁的埡口，東方也漸漸地呈現出一片魚肚白來，在昏暗的晨光中，山下的鹽源縣城的輪廓已在薄霧中顯露了出來，我忍著鑽心的疼痛，跛著腳跟在隊伍中下了山崗。

八點左右，我們這支「陪殺場」的隊伍，已經到了距縣城僅一公里的小金河上的石橋上，天上沒有雲彩，太陽從山后冒了出來，就像離地僅三尺高似的，早晨的鹽源縣城，空氣凝固，一絲風也沒有，昨夜的寒氣，還沒有退去。

街道上仍然殘留著豬牛羊屎的痕跡。雖然被人打掃過的，但在太陽光的照射下，仍散發出一股羶羶臭味，體現出邊荒小城的粗獷。

今天的鹽源縣城，如臨大敵，從石橋開始，戴著紅袖套的荷槍實彈的民兵，每隔二十公尺，就站著一人。他們瞪著一雙雙虎視眈眈的眼睛，注視著這支「陪殺場」的隊伍經過。

剛剛跨入鹽源縣城，一幅「堅決鎮壓一切敢於反抗的反革命份子」的紅色標語，橫跨大街，我們從這副巨大的標語下走過。

馬路兩旁參差不齊的泥牆上，貼滿了白紙黑字的標語，字體就像是小學生寫的：「堅持兩個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你辦事，我放心！」；團結在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等，跟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一樣。幾張「打倒四人幫」，「粉碎王、張、江、姚的反革命奪權陰謀」的舊標語，被撕去一半，在風中抖動，嘩嘩作響。

再往前走了十分鐘，馬路上的人群漸漸的密集起來，一群頭裹大白布的當地人，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著我們這支衣衫襤褸的隊伍。幾個身穿黑紅相雜衣裙的彝族婦女，不停地朝我們指指戳戳。

我們要到達的最終地點，是縣城中心的一片大壩。大壩由各式建築物四面包圍組成，可以容納數千人集會，六條寬度不同的巷道，從壩子的中心向四周輻射出來，中間留著許多被雨水積成的泥窪和土堆，殘留著許多菜葉和豬糞，看樣子，這裡平時是鹽源的集貿市場。

大壩被幾條粗大而醒目的石灰線分割成了十幾個方格，壩子東面樓房牆下，砌著一個高出地面一公尺的三合土平台，平台上方，撐著一幅十公尺長的紅色橫幅，上書「公判大會」的字樣，坪台前已站著四名全副武裝的士兵，營造出一種殺人的氣氛，這便是今天大會的主席臺。

我們進入會場時，何慶雲同一個約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握手寒暄後，隨後領著我們走進緊靠主席臺前的第一個方格內，看來我們算是來得早的人了，八名「保鏢」留在圈外，喝令我們席地而坐。

二十多年來，對於這種殺人大會，我已記不得參加過好多次了，每次參加這樣的大會，我都感到灰暗和傷心，要好些天才恢復，尤其是看到我的戰友一個個在大會上與我訣別，心中更痛苦難熬，今天，我還第一次到鹽源縣城「陪殺場」。

也許是昨夜幾乎徹夜未眠，加上今天早上又起得特別早，又走了那麼多山路，我感到特別困倦。腦子裡很亂，剛剛坐在地上，便覺得眼前火花四濺，我閉上雙目，好一會兒，便覺得右腳指頭特別痛，脫下那只黑色血痂黏在一起的鞋，從破棉衣上扯下一塊棉花，默默地擦去傷口四周的血污和泥沙，再用破布包紮起來。

漸漸地，鹽源農場其他勞改中隊的人員陸陸續續進入會場。他們在帶隊人的指揮下，將廣場前面的白色方格一個個的填滿。我回頭看去，一片灰濛濛的人頭大約有八百人左右，廣場四周的方格內，還空空如野。「陪殺場」的主角，仍然是鹽源農牧場的流放者。

過了不久，壩子周圍的六條巷口漸漸的擠滿了人群，這是些頭頂大白盤、穿著補疤衣的當地農民，他們是被公社組織來「受教育」的？還是自動跑來「看熱鬧」的？我不得而知，他們懷著強烈的好奇心，翹首向我們張望。相互交頭接耳，使會場很嘈雜。

#### （四）陪殺場的「五類」

到了九點鐘左右，北面巷道的深處傳來了一陣陣吆喝聲，不一會兒，一群形象沮喪、面色臘黃的人，在民兵吆喝和押解下擠了進來。

為首是一個柱著竹棍的一癩一跛、頭髮花白的老者。身上那件滿是補丁的衣服上，沾滿了油膩。他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一個鏡框是用白色的膠布貼好的，另一邊乾脆只留著半片鏡片，他胸前懸掛著一尺見方的木牌，上面用紅筆寫著「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份子。」從他這身打扮便可看出，他忍受著長年的鬥爭折磨，有人說他是原鹽源縣委書記，也有人說他是辦公室主任。

緊跟在老者後面是一個長須白鬚的老人，他穿著一件補疤疊補疤的中式長衫，頗有點古風裝束，我估計他是一個老教書先生，他的臉上倒還乾淨，但表情木然，看不出憂愁和哀傷，脖子上吊著一塊大木牌寫著「國民黨特務」。可從他那副寒酸像來看，很難將他同電影裡的「特務」聯繫在一起。

再後面便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她嘴裡正不停地自言自語叨嘮著什麼，兩隻手不時向空中揮舞，好像在發表演說，也像一個樂隊的指揮。她的衣服已被撕成布條，在風中飛舞擺動，有的地方還露出皮肉來，臘黃的臉上帶著一種久經折磨而精神失常狀態，她的胸前吊的牌子上寫著「地主婆XXX」，走起路來時，胸前乾癟的乳房擺來擺去。

「地主婆」身後，是一個大約五十多歲的男人，頭髮亂蓬蓬的，卻被剃去了一半，半邊白、半邊黑。我知道那叫陰陽頭，在那個年代，是專門用來侮辱被批鬥者的，以此迫使他們低頭認罪，他在佇列中始終沒有抬頭，胸前掛著一塊白牌，沒有任何字。

在最前面的四名頗具特色的「演員」後面，依次跟著大約五十多名形容憔悴衣衫襤褸的人群，他們的臉色灰暗，毫無血色。



隊伍的後面，還跟著一個大約十三歲的小男孩。那孩子赤著腳，穿著一條像刷把一樣的褲子，他的身上雖然沒有掛木牌，但他瘦削的臉蛋上，已經不存在孩子的稚氣和童真，只透露出一臉茫然和恐懼，讓人看了特感同情。

最後入場的，是由兩個年過六旬的小腳老太婆領頭的人群。照樣是衣衫襤褸，補疤累累，兩個老太婆一搖一晃的進場，顯出一副急欲前行卻無法快步的樣子。

跟在老太婆身後是幾十名衰弱不堪的「病號」，兩個套著紅袖套的民兵在後面大聲驅趕喝叱，但老太婆好像擔心被石塊絆倒再也爬不起來似的，戰戰悚悚仍然走不快。

靠西南面的巷道裡，也擠出來了一支隊伍，大約也有五六十人，胸前也掛著牌子，他們是鹽源公社的五類份子代表，那些人的衣著更破爛，樣子更像當地的農民。

靠北面的巷道裡擠出來的，是鹽源各鄉鎮的被管制份子和五類份子代表。他們衣著襤褸，面容憔悴，看得出這些「代表」平時除了忍受極度貧困外，還要受到民兵和積極份子加給他們的壓迫。

他們被押來，是接受教育，還是跟我們一樣「陪殺場」？

來參加「陪殺場」的「五類」，有好幾百人。一個幾萬人的小縣城，就有這麼多黑五類，可見社會被扭曲到了什麼程度？

當壩子裡所有白色方框被填滿後，已快十一點鐘了，白線方框以外的地方，已圍滿了看熱鬧的白頭帕，「白頭帕」與「方框」之間，被幾十名民兵站崗阻隔，切成了一條間隔大約一公尺寬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便是人為畫定的專政和被專政的界線。

不過，隨著會議的進行，這條分界線很快便被擁擠的人群破壞，被專政者，很快同當地人擠成一體。

一公尺高的主席臺上，坐著七八個主持會議的人，台前站著四名全副武裝的士兵，臺上台下，倒是界線分明，各自身份也分明。

看看方格填滿，大約過了半小時，主席臺中央，端坐在那裡的一位矮個中年人，手裡端著話筒，用嘶啞的聲音宣佈——「公判大會開始」。

今天的殺人大會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就是免去了全場起立和讀毛主席語錄的方式，主持人簡短的講了今天大會的宗旨後，便一聲令下：「將罪犯押上來！」麥克風裡傳出了沸騰的口號聲，會場上並沒人喊口號，聲音原來是早就灌製好的錄音帶上播放出來的。

此時，四十多名腰配短槍的員警，每兩人押一個，以幾乎以百米賽跑衝刺的速度，將二十多名赴刑者推到主席臺前。

全場頓時啞然，我的心也陣陣緊縮，在光天化日下，當著鹽源縣城的父老鄉親的面，對臨刑前的受刑人進行慘無人道的毆打的酷刑，正在赤裸裸展示著。

二十多名受刑者，每個人被繩子緊緊網綁，血流滿面，不成人形。死刑之前還要承受一次死去活來的折磨，這便是「無產階級專政」對人民的現場「教育」，這種對人性和人類尊嚴的挑釁，至今想起來，仍心有餘悸。

我抬起頭來，在三十幾張血臉中搜索著劉順森。當我終於從他的姿勢判別出他來時，心狂跳起來，回想去年九月，我在他逃離魔窟前的一天下午，同他道別，囑他一路珍重，一路平安，卻沒想到，那一次道別，竟成了我們的永別。

同張錫錕、陳力一樣，此刻劉順森正被兩個虎賁反剪著雙手，按倒在前臺，將他的頭幾乎按到地上，在繩索網繫下，他無法伸直脖子，沒有抬起頭來，看得出他用全部毅力強忍著痛苦。在生命最後一刻，仍保持著大義凜然。並不像相鄰赴刑者那樣前仰後翻。

我深知劉順森的個性，他不願讓難友看到他滿臉是血，增加難友們永訣的痛苦，既然繩鎖喉頸無法喊出壯烈的呼聲，還不如乾脆就保持沈默。

後來我才聽難友介紹，劉順森被槍殺前，被鹽源農場醫院的周延陽注射了啞針（估計是強力麻醉類藥物），使他發不出任何聲音。

自古以來，為名節和理想而慷慨就義者，無不抱著「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的精神，劉順森同張錫錕一樣，在審訊中痛斥大陸的獨裁專制，留下了「金甌已缺總須補，為民犧牲敢惜身」的誓言。

好一個「金甌已缺總須補，為民犧牲敢惜身」的慷慨遺言，這也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後叮囑。

在刑訊時，他平靜回答劊子手：「你要問我的同黨麼？我可以直言告訴你們，六億中國人民都是我的同黨，你們可以殺我，卻無法撲滅人民對你們倒行逆施的憤怒。你們可以消滅我，卻無法抹去你們犯下的累累罪惡。」

劉順森在就義前所寫的絕命詩，和他寫下的許多天才論述，全部被劊子手搜去，他的遭遇證明，根正苗紅的出身，只要反對中共的倒行逆施，同樣要遭到格殺勿論。

劉順森等人被押下主席臺良久，隱約從遠處傳來槍聲，坐在廣場後面看熱鬧的「白頭帕」躁動了起來，我聽見傳來了嚶嚶的哭聲。赴刑者中定有他們的親屬在其中。在我心中，又填了一筆中共對我們所欠的血債，此刻我只能把這一筆筆血債，深深地埋心底，直到幾十年後寫在這本書中。更等待清算中共獨裁那天的到來。

### （五）血的祭奠

四十年前，在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下，我在外婆的懷抱裡，逃出鬼子的鐵蹄。我們這一代飽經苦難的人們，一直在心靈深處發問：為什麼日本人肆無忌憚的欺侮我們？那是因為黑暗的獨裁統治使國家貧弱，那時為反抗異民族入侵而舉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抗戰勝利後萬眾一心團結一致民主建國。

大陸在中共挾持下倒退到黑暗年代，我們這些飽經苦難的人，應該告訴今天的年輕人，我們是如何在「革命」的說教中，換來了飢餓和貧窮，換來了奴役和折磨，換來了血腥的屠殺！大陸已被中共「淪陷」，從惡夢中醒來的中華兒女當改「抗日救國」為「抗共救國」才對！

當我神思恍惚中走出會場時，我木然地隨著隊伍押出鹽源小城。

這麼多年來，我親自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為追求真理、為挽救國家和民族而壯烈犧牲的戰友，他們的形象活躍在我記憶裡。

我的耳邊又響著他們鄭重囑咐：一定要活著走出這口活棺材！一定要把這段苦難經歷告訴世人！並為這段歷史作證！

可是，我們所期待的那場暴風雨卻遲遲未來。我們低估了大陸獨裁勢力的頑固性，低估了專制制度在人們頭腦中的思維勢能；低估了中國容忍暴政的「寬宏大量」；低估了中國人在長期暴力威脅下無知的程度。

毛澤東死後，並沒有被焚屍揚灰。他的像反而還掛在天安門城頭，遺體也被供奉在天安門廣場，供一大群愚昧的民眾頂禮膜拜。

「始作庸者，其無後乎」。雖然毛澤東的嫡系傳人被一個個投進了監獄，雖然「凡是」派不得不讓位於鄧小平，然而歷史好像仍停滯著，邁不出大步。

而「改革開放」，獨裁衣鉢依舊，並以一黨專政替代了原先的一人專政。中國人民所期待的民主政體並沒有實現。中國人民的遲頓，使新的執政者贏得了對獨裁政體修補時間。大陸步入了一個無冕皇帝的集體專制時代！

天氣太悶熱了，該有一場席捲這片污濁、野蠻的暴風雨降臨，以沖刷這片滿是罪惡的土地。雖然我們曾預言過，只要毛澤東這個惡魔命歸黃泉，他所開闢的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帝業，會隨著他一道葬身在歷史的沉渣中。

我們期待到中國民主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們一定會隆重祭奠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皮天明等人。只要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長存下去，代表人類進步的民主潮流，一定會沖跨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堤壩。

我相信，我所記載的先烈事蹟，終將成為中華兒女反抗專制暴政的一段史詩，定會為後代傳頌！

## 第十一章：中共後集權時代

在結束毛魔王二十八年的血腥統治時，因為剷除了所有還在萌芽中的反抗力量，使取代中共的力量並未形成，人民被迫容忍了現狀。然而歷史還是翻開了新的一頁：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經過十年「文革」，被毛澤東視為洪水猛獸、並一直踩在腳下、必欲置之死地的「走資派」宮廷政變成功。

二十八年暴政，毛賊使人民處於飢餓貧窮的狀態，所有生活資料，包括必不可缺的糧食、布匹、油鹽、燃料等等，都要「憑票供應」，更不要奢談住房和交通了。當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所造成的迷信、恐怖和愚昧漸漸消失時，人們才開始回到了現實中。

鄧小平選擇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代替狂熱的階級鬥爭，

他們選擇了緩和矛盾卻不實行民主的機會主義策略。把政權當作掌握他們手中的法寶，不願歸還。他們一面聲稱不可能將取得的政權拱手讓人，同時希望在取代毛澤東一人獨裁的條件下，出現一個集體掌權時期，實行和平改良。新的歷史時期就是在這個基本方針指導下出現的。

一九七八年，剛剛掌權的「走資派」，抓緊推進兩大改革：

第一，為了緩和已處在「崩潰邊緣」的國民經濟，首先要找回萬民被毛奪走的飯碗，解放被凍死的農業，他們的救世良方便是「三自一包」。

第二，調整被毛澤東弄得極其緊張的社會結構，解放打翻在地並踩上一隻腳的中共各級舊官吏，使這些人成為掌控國家機器的新主人，以清除「文革」扶植起來的「造反派」。（這種換湯不換藥，大大阻礙了社會民主的進程。）

同時為了收攬民心，將毛澤東圈定的龐大的「五類份子」來了個一風吹，其中也包括對一九五七年無辜受冤害的右派進行平反。

一九七八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全國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序幕。一時間，似乎有一種萬象更新的新氣象。

我們這一代人，腦子裡充滿了近百年來遭受列強瓜分的恥辱感。使我們從小就把「振興中華、立志報國」當成公認的價值觀。在經歷日本入侵，國破家亡的刺激後，「愛國」便成了我們至高無上的原則。不管是誰，也不管帶什麼政治色彩，立志報國是第一原則。可惜我們並沒意識到，為竊得政權的毛共已將大片領土出賣給了蘇聯了！

當我被莫須有扣上右派帽子時，我表現出的驚慌失措和誠惶誠恐，至今都令我感到羞恥，面對無理剝奪我讀書的權力，我只是傷心落淚和萬分痛苦，而不去思考災難的原因，在大學求學的我在政治上什麼都不懂。

連番的批鬥會上，我不但沒有理直氣壯抗議這種陰謀迫害，反而想方設法為自己申辯解釋，說自己從來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想法。

但是，我越是辯解，就越使迫害升級，我的申辯不但沒有獲得饒恕，反而使我變成「死不悔改的極右份子」。

### 第一節：風向陡轉？

嚴酷的事實糾正了我的幼稚，毛澤東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倒行逆施，使我認識到中共宣傳的東西全在騙人，所以我的政治道路的選擇，不是因為我的家庭出身，恰恰是共產黨的倒行逆施。

經過長達二十三年的地獄煉獄，我把自身的苦難同中國的災難結合起來，獄中的鬥爭，使我越堅定了反對獨裁的信念，於是，我開始了真正的「脫胎換骨」，開始了精神和靈魂上的新生，成了一個執著的反專制戰士。

二十年來，我不斷為自己的冤獄據理力爭，從入獄那一天起，到一九七九年獲平反，整整二十年，持續申訴百餘次。

一方面揭示那個年代冤海無邊，同時也巧妙保護了自己。同獨裁專制作鬥爭的過程，就是我伸冤與抗爭相交織的過程，而我的伸冤過程，就是我揭露共產黨的血腥、暴戾、腐敗的過程。

一九七八年，母親帶著欣喜來信告訴我，她已獲得平反，這一年平反冤假錯案，像一陣熱風，融化著毛澤東幾十年冰封的專制地獄，許多呻吟於地獄的冤魂，遍佈全國各階層的「五類」，走出了地獄。

我拿定主意，要借這股「平反風」洗刷冤情，正大光明從地獄的大門走出去，同時決意將二十年獄中所見所聞，以及囚奴們長期的苦役折磨，烈士流血犧牲的樁樁事實公諸於世，傳給我們的後代。

偏僻的鹽源，像冰封大地裡陽光照不到的死角。這裡的冰雪遲遲難以溶化，九〇九獄方對平反「冤假錯案」似乎沒有任何反應，「落實政策」既沒有宣傳，又沒見有多少人改判獲釋。

到了這個時候，我同母親的來往信件，照例都要被拆開檢查，我還得用隱晦苦澀的語言，同檢查者對話，既要說出二十年冤獄對我的摧殘，又要表達含冤二十年上告無門的悲哀，為了能將信寄給母親，要說多少言不由衷的假話？

事實將會證明，解除長期冤獄，還要經歷痛苦而曲折的過程。

何慶雲和徐世奎，壓根就沒把六隊二百多號流放者當人看，今天卻要為最反動的傢伙「平反」，心理上怎能接受？他們害怕這些人獲得平反，對自己不利。

還在一年以前，在槍殺劉順森和劉開雲時，徐世奎還惡狠狠地警告那些「不認罪伏法的反改造份子，是「自尋死路」。今天風向陡轉，要為右派平反了，他能接受嗎？這種變天又不翻天的把戲，著實令人困惑。

唯獨那位平時愛說些風涼話的「逍遙份子」馬大炮，卻不時從場部，甚至從成都帶回一些從未聽過的新鮮見聞。

然而毛澤東歸天已兩年，報紙上雖然一陣陣吹平反的風，可在華國鋒兩個「凡是」鐵幕下，對製造冤獄的鬼蜮們既沒有撤職處理，又沒有受到任何譴責。中共把所有罪過，由一個替罪羊江青背著。

這使我明白，舊的國家機器，不可能否定自己。一黨獨裁下，就是改良都難以推行！「平反」就更難，眼看平反冤假錯案與「偉光正」要撞車了。

### （一）清溝聽聞

經過十幾年的修建，二道溝上游最高處修起兩個大水庫。並在水庫與各下游各中隊間，修建了綿延幾十公里的環山溝渠，依靠這些溝渠，將水庫的水引進了幾百畝水稻田裡。這些水渠像曲折的腰帶，盤繞在水庫以下山頭的山腰間。

夏天因山洪爆發，從四周光禿禿山包上沖刷下來的泥砂，淤塞了這些水渠，所以來年春播前，各中隊都要抽出勞力清理這些環山溝渠。

監督這些勞動力的獄吏和士兵，在水渠上方找一個便於監視的地方，圍起一個臨時哨棚，居高臨下的監視著清溝工作。

每一年的清理淤泥，按參加清溝的人頭劃成了幾十段，勞動任務落實到人頭，並規定幾天時間內完成。

正巧這一次我被劃在哨棚下面那一段，這天，我正在溝裡除淤泥時，突然從頭頂上飄下來兩個人的對話聲：

「這些天遞上來的申訴狀，占了全隊一半，聽說榮山茶廠的反革命犯都放了三分之一了，搞來搞去，搞了這麼多年，我們管的都是些冤枉事」。這是何慶雲的聲音。

聽到這話，我停止了手上的工作，以免弄出響聲中斷了他們的對話，我想從他們的談話，獲得有關落實政策的消息，於是我索性停下來側耳細聽。

「上面不是說了嘛，過去抓人和判決是對的，今天給他們平反也是對的。反正你我只能跟著政策走，法院也真是扯蛋，把那麼多不該抓的人抓到我們監獄來，找我們的麻煩。」這是徐世奎的話，帶著明顯的埋怨。

「話也不能那麼說，就拿張錫錕的案子，是你和我親自整的材料，經過長達半年多時間的審理，管教科幾十號人都討論通過的，前天就聽西昌中級法院的人說，要重新調查這個案子。」何慶雲說。

「就是嘛，這種案子若在兩年前拖著不辦，肯定說我們是修正主義路線作怪，誰反對槍斃張錫錕，至少就落個同情反革命的罪名。今天倒好，還不到三年，又要你重新審理，說是錯案，如果誰頂著不辦，又說你抗拒政策，對抗中央。古柏的老康就是一個例子，職務都被撤了，還掛起來反省。我真搞不懂『路線鬥爭』是怎麼回事？怎麼才算對」。徐世奎困惑的語氣裡，含著抵觸。

「搞成這樣，都怪那個林高明，他一到六隊，天天大呼小叫，說六隊的反革命份子要翻天，天天把我們當右傾夾起來整。今天倒好，他夾起尾巴走了，爛攤子卻丟給我們來收拾。」何慶雲素來與林扯高不和，現在林扯高倒楣了，何慶雲當然不會放過說風涼話的機會。

「我是準備好，六隊把人放完了，你我都回家扛鋤頭去。」徐老人在作後一步的打算了，這些年來，徐世奎在六隊占山為王，老婆孩子也生活得安逸富足。他當然清楚，他的一家是寄生在六隊兩百號奴隸身上的，犯人沒有了，他這個家也就該搬走了。

何慶雲倒顯得豁達些：「路線鬥爭就是這個樣子，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早就說過，在中國出修正主義隨時都是可能的……」他的話突然中斷了，他知道不能再說下去，否則就是「反黨」了。

「李培連不但獲得平反，還升了官，你我都寫過他的材料，他若在農牧場不好相處啊！」徐老大觸及到具體問題了，因此，他打定主意，「走為上計」。

我屏住呼吸，全神貫注側耳聆聽，這可是將近二十年來，難得聽到的話。這番內心自白，才是整人者內心的真話，二十多年來，人們習慣了聽假話套話，能聽到他們肺腑之言，倒是機會難得。

我抬頭向哨棚望去，只見徐何二人同「帶班」的兩名士兵正盤腿坐地。

士兵的思想畢竟單純，在「支左」時，他們只知道用青槓劍砍人打人，在需要的時候，他們也只知道執行命令捆人，他們在「支左」中猖狂打人，他們本是泥腿子出身，在毛澤東的大躍進中，曾經嘗過野菜或觀音土的滋味。

入伍後揚眉吐氣，過著飯飽肉足的生活，便心甘情願被人當槍使，決不去侈想生活之外的事，無產階級專政少不了這樣毫無頭腦的「槍」，也少不了像徐世奎，何慶雲這樣的「槍手」。

## （二）高德勝的死訊

清理水渠的勞動剛剛結束，郭川小又調回了六隊，替代了已經年老的榮老頭。

郭川小調來以後的第三天晚上，便把我叫去隊部辦公室去，待我在小凳子上坐好後，便低聲問我：「你知道高德勝書記的下落嗎？」我感到他的問題好突兀，搖了搖頭。

他停了一下，便告訴我：「他已死了，死得很慘，是被造反派們鬥爭，打斷了左側的全部肋骨，並把他關在驛馬堡附近的水碾房裡，又不給他醫治，結果打斷的骨頭穿破了皮，傷口化膿感染而死。

死的那幾天，他在小屋子裡成天喊叫，很淒慘，但沒人敢理他。也不准家屬去看望，還說他死不認罪，死有餘辜。」

他還說：「文革初期，造反派鬥爭高書記時，其中有一條罪狀便是袒護你和陳力」。

這麼多年共產黨的殘酷是盡人皆知的，歷史上法家提倡嚴刑峻法，毛效法商鞅、李斯，使他得了一個暴君美名，對不聽使喚的人絕決不會手軟。

聽郭川小講完後，我倆低下了頭，一時沈默不語。掐指算來，他死去快一年了。說到這裡，郭川小望望我，進一步補充道：

「你和陳力被管教科申報了兩次死刑。但是高書記說『這兩個人出身學生，是可以通過教育來挽救的，共產黨人強調的是改造人，而不是消滅他的肉體，何況，這兩人在犯人中影響很大，改造好了，一定會帶動一大片，有利於我們的思想轉化和教育工作。』」

高德勝這個調子一定，我死刑得免，看來我之所以能夠倖存下來，確有高書記極力保護的一份功德。

關於高書記，我確曾聽過他的種種傳聞，文革後，一九六六年冬天，我與他在六隊的蔬菜地邊見了最後一面，當時見他穿著布鞋，臉色蒼白。記得那一次見面，他簡單詢問了我的近況，說了幾句「認清前途」的話，便匆匆離去。

從此，高德勝和李培連便從二道溝「消失」了，郭川小今天告訴我的這些情況，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關於我被申報死刑的說法，我早已耳聞，但何以又免了這死刑？卻一直懵然，這次聽到郭川小的話，我的腦海裡再度重現了十三年前在基三隊的絕食，並在一九六四年的國慶日前，我與高德勝的第一次對話，那是一次思想交鋒，我相信，那次我的坦然和正氣，一定深深地觸動了他。

這使我相信，共產黨決不是他們自吹的鐵板一塊，恰恰相反，由於它的不得人心，它的內部正在融化分裂，慘無人道的對待高德勝，一定是倣效了中央高層中對待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的手法。

想到這裡，我問郭川小：「他的家屬還在嗎？」

「在，還在驪馬堡，這些年來，因為高德勝的問題，家屬也被整得很慘。」

這一席對話，使我們間的距離拉得很近，我們相對沈默，我在心裡祈禱著亡靈。大約五分鐘後，我抬起頭來，對郭川小說：「我想，該寫一份悼念高書記的信，以表達我對他的哀思，請你轉交給他的家屬，」他點了點頭。

對於高德勝所加入和維護的黨，我沒有任何好感，但對於高德勝這樣的黨員，我認為他是中共隊伍裡沒有喪失人性的一員。

在複雜的社會中，一個人誤入某種政治組織，誤信某種信仰，本不足為奇，曾迷信於邪教的人，並不等於邪教頭，相反，應當相信人心都是肉長的，即使一時執迷，幹過壞事的人，有一天大徹大悟幫助我們，這樣的人，應視為我們的朋友。

那一夜，郭川小和我交談到深夜。他詢問了我最近收到母親的來信沒有，問到母親的身體和近況。我告訴他，母親已經摘去右派帽子，並在為我「平反」，上下奔波。

我也向他詢問了一些有關平反政策的問題。最後，郭川小宣佈，從明天起，我被編入雜務組。

雜務組是一個由農六隊的木工、鐵匠、飼養人員和機修人員混合編成的小組。我的任務是跟著來六隊翻耕土地的拖拉機，幫他們打鏟和保養拖拉機，這樣一來，平時，我可以滿山遍野的在外面跑，而不必在小組裡列隊報數，集體出工，收工。只是到了晚上，仍回六隊的監舍歇宿。

第二天，我便跟著來六隊耕地的拖拉機，坐在後面的鏟口上操縱升降鏟口的盤子，我的「師傅」是東方紅拖拉機司機李進。

為耕地打鏟，這可是一個極苦的差使，這時風季還沒有結束，經過一個冬天乾旱，山樑上幹透了的土地，在鏟口和履帶的翻動下，掀起一股股紅褐色的「濃煙」，然後被肆虐的西北風捲起來，裹纏著整架鏟座。

我坐在上面，看不見方向，呼不出氣來。每天，只要一開鏟，用不了半個小時，我的混身上下便被紅塵裹成一個灰人，頭上背上，就像上了一層塗料似的。

幸好，我是剃光頭的，洗臉洗頭並不麻煩，只是吸進肺裡的大量泥灰，七竅之中堵滿了泥沙，嚴重損害我的健康。

用李進的話說，「這那裡是人幹的話？」但我很樂意的接受了，因為即使打鑼時苦不堪言，但我獲得了久未有過的活動空間。

從此以後，我結束了站隊集合、報數出工，連小解都要呼喊報告的那種生活，結束了稍不如意，便遭到苛責、毒打的提心吊膽地獄生活。

### （三）獄中「自由」

到雜務組後，我能單獨的進出監舍，還可以去場部子弟校的閱覽室，在那裡讀到裝訂成冊的「參考消息」，過去，我在垃圾堆中偶爾撿到一張，便如獲至寶，雖說「參考消息」屬於中共特意篩選出來的內部讀物，畢竟比假話連篇的人民日報有了些新內容。

同時我還可以去其他隊約會同難朋友，從他們那裡直接得到平時無法聽到的消息。晚上七點以後，我可以去場部的任何一個中隊看露天電影，去當地老鄉家裡作客、買米和買肉，不再擔心徐世奎躲在大門內側，突然向我襲擊。

我可以去農家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去和他們交朋友，去打聽「平反」的有關消息和政策。可以去場部的任何一個地方，只要在晚上十一點鐘回到監舍就寢就行，姑且把這種生活叫做「自由」吧。

自由是太可貴了，冤獄剝奪了她整整二十多年了！經歷漫長的歲月，我才獲得這份「自由」，並且是以為拖拉機打鑼這種苦役作代價換來的。

開初那幾天，深夜從場部歸來，路過蘋果園，聞到那沁人心脾的蘋果芳香，我真想變成一隻棲息在樹下的蟋蟀，再也不要回到那陰森森的牢房裡去，無怪乎哲人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郭川小的妻子姓廖，是場部一名倉庫保管理員，許多年來，她對我們的處境流露出同情，我們管他叫廖老師。

為了避嫌，她在表面上對我們保持著嚴格的界線，而顯得冷漠，但每遇到流放者被處罰的時候，她都會通過丈夫替當事人解圍，在監獄這種嚴酷氛圍中，已是難能可貴了。

自我被調到雜務組後，有時也可以去幹部食堂吃飯，便時常與廖老師照面，有一天，她在球場外碰著我，硬是拉我一起去她家吃午飯，我不好推辭。去隊長家做客，對我來說，是二十幾年來第一次，未免感到拘束。

進屋以後，桌上已擺好飯菜。郭川小從廚房裡拿出一瓶酒，斟滿了一杯送到我的面前，為了不掃他的興，我接過酒杯只呷了一口，他拉扯了一陣閒話，便道出他的本意，說他的兩個孩子，女兒初中畢業準備報考中師，兒子也小學畢業準備考中學，兩個孩子在場部的子弟校讀書成績平平，希望我能給他們兩個孩子補補課，能讓他們順利的考上學校。

我沉吟片刻後回答：「我的學業已整整荒廢二十多年了，中學課程雖然用過功，但這麼久了難免遺忘，需要先對現在的中小學教材熟習一下，然後什麼時候補課，也需要向雜務組長彭文學打個招呼。」

郭川小聞言，抽身從裡屋拿出三本書來，那是他女兒正在學習的語文、數學、政治和印刷的講義，他一邊遞給我一邊說：「關於補課的時間，就在每天下午，雜務組嘛，回頭我向彭文學說一聲。」

給中隊長兒女補課的事，就這麼定了下來。

每天下午，我準時的來到郭川小家裡，經初步摸底，郭川小女兒的功課相當於小學生。而他的兒子則連四則運算都不會，這便是文革的重大成果。

好在廖老師平時對孩子管束甚嚴，成績並不是最差的，經過我的輔導，孩子們進步很快，但我沒有把握，經過短期複習便可以考取學校！為了給孩子們補課尋找輔導資料，我便到農牧場子弟校圖書館借一些升學考試的複習資料。

從場部走過來時，我一路都在回憶這裡的舊貌，慢慢判斷出這兒正是當年的基建三中隊所在地。

十五年前，當我從西昌黃聯關押來二道溝時，正值冬天，當時場部幾排紅磚房子的前面，就只有一灣狹長的水溝。

溝裡的水黑黝黝的，很像是城市裡的下水道，冬天的幹風，刮走了這片紅土裡所有的水份，唯獨在這裡還保存著這一窪「黑水」。

十幾年來，但各水庫中浸下的地下水，匯集成了一條寬約二十公尺的小溪流，囚奴們又在河溝兩岸種上了樹苗，幾年後成了一條綠色走廊。

與這條綠色走廊形成的同時，在當年的基三隊旁邊，建起了許多簡陋工棚，成了就業人員的主要住宅區。住宅群的主人在工棚前修築了石板小路，形成了一條「小街」，農場場部周圍蘋果林中間，現在已建成場部子弟校的校舍。

一道圍牆，將就業人員的工棚隔在外面。許多年沒來過了，今天算故地重遊。

學校最角落的地方，是圖書館和閱覽室，我剛剛走進過道，便碰見了來這兒不久的魏朋萬。他原是昭通地區的中學教師，平時沈默寡言，幾乎不與任何人交往。他身材矮小，加上眼睛近視，才四十多歲，便顯得特別蒼老。

在六隊時，他經常完不成任務。每到農忙時節，他成了「挑燈夜戰」的常客，好在他特能忍耐，一直逆來順受，十五年勞役，咬著牙，默默忍受著無端的侮辱。從沒見過他頂撞過幹部和衛兵。

子弟校遷到這裡後，魏朋萬接到了場部人事處的調令，安排到這個學校當國文教員。調令下達那一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工資由原來的每月二十元增加到三十五元。覺得福從天降，大抵是因為他歷來逆來順受老實聽話贏得了農場的好感，但根本原因是因為學校師資奇缺。

現在他幾年前鐵青的臉色，已帶上紅潤，與他在六隊時成天哭喪著臉可謂「判若兩人」。握手寒暄後，魏朋萬便邀我去他的辦公室小敘，我才得知這所子弟校原來是從驢馬堡遷來的，文革期間，原來的老教師關的關、逃的逃、病的病、死的死，雖然老教師都與公檢法沾親帶故，依然沒有逃掉文革的劫難。

連李培連這位響噹噹的馬列主義專家，尚不能免卻牢獄之災，像高德勝這樣從雪山草地上爬過來的人，尚且死在造反派的棍棒之下，教師們豈能自保？

#### （四）就業員的窩棚區

從學校教學樓向下望去，在一牆之隔的地方，便是就業人員的窩棚家屬區，呈現在窗戶下面的，便是那些用破石綿瓦、牛毛氈和木板釘在一起的窩棚屋頂。

看到這些破爛的屋頂，使人聯想到抗戰時期重慶臨江門碼頭下，傍山而建的貧民窟，想起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淑貞，拖著一老一小吟唱「月兒彎彎照九洲，幾家歡樂幾家愁」，而今居住在這裡的囚奴們，已唱不出這樣的歌了。

那些在監獄中熬掉了十幾年青春年華的男子漢，就在這裡燃燒著生命的餘燼。男人難免有七情六欲，也想找個女人成家，但每月僅有二十塊錢的勞釋人員，到那裡去尋找共度渡「寒窯」一起過日子的女人？「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便是這些就業人員的自我調侃。

就業人員中相貌英俊的勤勞小夥子，就連場部的幹部家屬，都會盯著不轉眼的，卻很少正常的女子，願意落嫁到這些鴿子棚裡來。

雖然如此，這些鴿子棚中的女人，還是一年年在增加，嫁進來的女子或是「黑五類」；或是窮得為幾斤糧票便可委身他人的乞丐女；或是相貌奇醜或有生理缺陷的女人；或是被人遺棄的二婚嫂。

我和魏朋萬的話題，很快轉到這些鴿子棚裡的「居民」身上，就業人員中良莠不齊，層次懸殊，其中不少陳賢士之類的人渣，也有像王大炳這樣的老實巴交大好人。



女人們品性各異，有純樸天真的山裡妹，也有賣慣了皮肉，擅長算計別人的野雞；有為幾斤糧票就可姦奸宿一夜的「大姐」，也有不堪侮辱而自殺的女人。

貧病交困，文革對社會倫理的極大摧殘，在這些密佈的鴿棚裡，天天都會發生打架鬥毆、坑蒙拐騙、爭風吃醋的奇傳緋聞。總之，在這片綠茵下，天天都在上演真實的悲劇。

我知道王大炳自去年刑滿後，便留在場部養豬場餵豬，他幾次托人帶信叫我過去一敘，我調到雜務組以後，得知他從長壽老家接來一個農村姑娘，並計畫在一九七九年春節結婚。

多年來，王大炳對我的熱心幫助，我一直都銘記於心，聽到他將成婚，我決定抽時間去向他表示祝賀，拿出兩年積蓄的零用錢，去鹽源縣城買了一床緹花毛毯，作我送給他的結婚禮物。

七九年元旦後的一天，我沿著堰溝邊的小路一路尋去。

他的「新房」，原是農一隊的菜棚子，經過改造，小屋的泥巴牆已刷過石灰水，大門也是新釘上的，唯一的一扇窗戶也安上了玻璃。

小屋前大約三十平方公尺的三合土小壩子，打掃得挺潔淨，就怕夏季炎炎赤日曬在牛毛氈上，會使屋裡變成蒸籠。即便如此，對一個刑滿人員來說，已是來之不易的理想居所了。

我走到門前敲門，大門應聲而開，一個大約二十來歲的姑娘迎了出來，她身穿一件蘭花舊棉襖，雖補了幾塊疤，但洗得很乾淨，腳上穿一雙紅色的新布鞋，瘦小的身子後面，還垂著一對烏黑的辮子，很靦腆的瓜子臉上，左眼帶著淺淺的疤痕，顯得比右眼小。見有客人來了，禮貌的請客人進屋。

我跨進門時，大炳正在灶前忙碌，見我進來，起身熱情地招呼我。我掃視了一下這間大約十五平方公尺的泥牆「新房」，地下是剛剛打成的三合土，門左面一張木床，上面放著兩床大紅的被子，木床擋頭的木架上，擺著自製的木箱。屋裡收拾得很乾淨，連灶旁的葵花桿，也堆放得整整齊齊。

靠床的牆上貼著一個大紅的喜字，而床頭的上方則貼著一張紅色的雙子圖，女主人說，那是娘家專門從長壽縣裡買來的，表示娘家人對新婚夫婦早生貴子的傳統祝福。

我把帶來的禮物放在木箱上，順手接過大炳給我遞過來的木凳，在圓桌旁坐下，談話自然落到女主人身上。

她來自長壽縣白鶴公社，父母雙亡，有兩個兄弟，都是當地農民。本應談及她家鄉的風土人情，以及聯姻始末，包括婚姻介紹人。但她開口便將她家的糧食收成帳，娓娓道來，打破了拘謹。

她說她一家四口，一九七八年分得黃穀四百五十斤，玉米三百餘斤，地瓜八百斤（折合口糧兩百斤）。收打的胡豆、麥子、豌豆之類統統折合口糧總計一百五十斤，如此合計起來，四口之家全年共分得口糧一千一百斤。四個人平均，每人不到三百斤。

因為一切家庭副業全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因而副食品極度稀缺，這點口糧全用來填肚皮也只夠半年。穿衣服要靠布票，一家四口一年可以分到四丈布票，要完成國家的棉花徵購任務才能領到；一家四口的菜油票，每人每年只有一斤，也要在完成油菜子徵購任務後才能領到；除過年過節，平時見不到豬肉；菜裡是從不放油的。她講這些時，如數家珍，全然忘記了拘謹靦腆。

雖然我對這些情況早已知道，但聽她一一數來，仍讓我感到驚心，再次證實農民仍處於飢寒貧苦的悲慘狀態，這大抵是她願意遠嫁鹽源，並跟一個比她大二十多歲的就業人員一起過日子的原因。

她天真的告訴我，她今年已經二十二歲了，還很少有聽見雞鳴狗吠。說到這裡，她還講了一個她小姑養雞的故事——

「小姨懷孕了，農村習慣，坐月子要殺幾隻老母雞補補身子，但整個生產隊已看不到雞的影子，不知她從哪裡弄了幾隻小雞來餵，又怕生產隊知道，便把雞用木箱裝起來，關在豬圈頂上面餵。但是圈起來餵是要糧食的，一家人一分自留地全種上了紅薯，好不容易等到小雞長到半斤重左右，卻被公社當書記的舅舅知道了，說是資本主義尾巴，逼著小姨殺了小雞，砸了雞籠。」

「她被逼無奈，只好把五隻小雞全部殺掉，當時捨不得吃，便燻好後掛在房樑上，想等到生孩子後吃，沒想到被黃鼠狼叼了去，為這件事，小姨還傷心的哭了一場。」

當時的農民到了後半年，都要向公社借第二年的糧食渡荒，於是公社便成了壓在當地農民頭上的債主，而農民成了公社的債務人。實際上，這個「國家」，又是由一些大大小小的書記組成，在這個奇特的奴隸社會裡，農民成了公社的奴隸，哪能當家作主人？

我從王大炳家出來的時候，已是深夜十二點了，他一直陪著我走在鋪滿炭渣的小道上，在寒氣逼人的夜裡，風已漸漸平息，從蘋果園中吹過來果子的芳香，使人感到舒暢，只是在河邊黑洞洞叢林深處，卻隱藏著時隱時現的詭異。

近年來，新近釋放來的許多文革闖將，習慣了打砸搶，把文革的畸形也帶進了這鴿子棚貧民區中來，一個人單獨在夜半穿過那片密林，常會遇到蒙面「好漢」的行劫。

流放者本來赤貧，誰也沒有多大的油水，但面對突然竄出來的「蒙面人」還把一把尖刀頂著自己，在驚恐之中，任憑對方將兜內僅有的幾塊錢搜去，再把手腕上的「山城」牌手錶抹去，這樣的事發生多了，業者們相約來到管教科投訴，希望「政府」採取措施。

按常理講，這狼牙府豈容搶劫？可搶劫案頻發，偏偏沒有抓到一個，於是一到了晚上十點以後，便很少有人單獨在那片密林中行走，不得不從那裡路過，也要邀約上三、五成群結伴以壯膽。

以後當我回到重慶，更體會到在大陸，那柄對準「政治犯」的刺刀，卻對刑事犯完全無能，對刑事犯罪這種放縱，使正常秩序難以維持，人們敢於公開攔路搶劫，卻不敢公開反對獨裁和伸張正義。

王大炳打著手電筒，我手裡拿著一根棍子，我倆剛剛轉過蔬菜隊與農三隊交界的岔路口，突然聽見不遠處傳來呻喚的聲音，接著便是一陣雜沓的腳步聲。我倆停下腳步，警覺起來，大炳打亮了手電筒，向那方向照射去，我也下意識地捏緊了手中的木棍。

在手電筒光下，距我倆大約二十公尺遠處，兩個人影扭在一起，跌跌撞撞地向我們走來，一股熏人的劣質酒精氣味向我們撲來。

定睛看清，原來是一男一女，那女人似乎很清醒，她正死死地用手拽著那個喝得已經爛醉的男人，而那男子的嘴裡還在不斷嘟囔著「酒話」，看到這情景，我倆才感到鬆了口氣。

大炳說，那女人的名字叫銀枝，是鴿子窩棚裡的頭號新聞人物，傳說她原籍綿陽，為生活所迫，當過「王大姐」，而被關押「勞動管教」，就地服了兩年刑。獲釋後，被基三隊的一個小夥子接到這裡來安了家，但不久，小夥子暴病身亡，銀枝重操舊業，成了鴿子棚區爭相追逐的對象。

那女人胖胖的臉上佈滿了雀斑，一個大而扁塌的鼻子幾乎是貼在麻臉上的，一對豌豆大小的小眼珠，很像華君武筆下的漫畫人物，但她才三十出頭，臉蛋雖醜，身材卻很勻稱性感，加之以頗講究衣著，善於打情罵俏，她的男人一死，就迎來了周圍更多的男人。

為她而爭風吃醋的事情頻頻傳出，她既成了窩棚區裡的話題，也成為了周圍幾個犯人中隊的「新聞」，她雖受到許多人的指指戳戳，但也得到不少人的呵護，銀枝的日子過得並不困難，她可以同任何男人相好，只要她樂意。

此時，她見我們倆站在那裡站著不動，便向我們喊道：「過來幫幫忙，把他送回去。」我們便走上去，把那醉倒的漢子扶了起來。

於是，銀枝接過大炳手中的手電筒在前面帶路，我們倆扶著他搖搖晃晃地送到了場部蔬菜組的集體宿舍。

送回了那醉漢，我們倆才重新往農六隊走，我想，這鴿子棚決不是大炳這樣的老實夫妻久居之地，所以勸他在完婚後，應儘快想辦法回到長壽老家去。

這年的五月份，大炳申請返回長壽原籍的報告獲准，他迅速辦了離場手續，回到他的故鄉去當農民去了。

這一天，他專門備了一架馬車，拉上所有的行李和媳婦，離開了這消磨掉他二十年青春年華的魔窟，雖然迎接他的另一個天地絕不是「福地」。

### (五) 再逢李培連

一天，馬大炮站在六隊壩子裡的土墩子上，高聲向壩子裡吼道：「李培連從監獄裡放出來了，昨天他的老婆坐著場部派去的吉普車去驢馬堡接他出來，不久，場部還要專門為他召開平反大會。嘿！嘿！」這馬大炮在故意向我們播「小廣播」。

我早耳聞李培連被劃為走資派的「黑幹將」了，後來又聽說他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一晃十年過去了，十年前聽他講楊修故事的情景還在眼前，不料，如此謹小慎微的共產黨秀才，也難逃牢獄之災。

林扯高奪權，李培連坐監；林扯高發瘋，現在李培連又官復原職。這原因在那裡？監獄的看守們困惑了，什麼時候毛澤東的鐵桿，才能悟出這一切原是被「階級鬥爭」所戲弄？

幾十年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怪圈裡跳舞，演出一場又一場自己捉弄自己的醜劇。

好像不殺人就不抖不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淫威，「文革」以來貫例，每年國慶日前後，當局都要召開相當規模的公判殺人大會，「文革」高潮的幾年，每次講殺一小批，動輒是十幾二十多人。

中共說不這樣，貧下中農就要回到萬惡的舊社會，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結果在毛共統治下餓殍遍野，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一九七八年十月前夕，鹽源免去了這一年的「公判大會」，九〇九各中隊還免去了以「檢查衛生」為名的大搜查，過去常對「反革命」敲打和恐嚇的話，也收藏了起來。六隊多年繃得極緊張的神經，鬆弛了一下。不過，二十多年受夠欺壓的囚奴們，反而感到疑慮，生怕這又是一次「陽謀」？

這一年「國慶」期間，在農一隊的大壩裡，與以往只放映幾個「樣板戲」大不相同，連續放了兩天露天電影。影片十分新穎，頭一天晚上是鮑國安主演的《隋煬帝》。第二天晚上放映的竟是再三受到批判的大毒草《桃花扇》。

文革中「借古諷今」這頂帽子，壓死了多少知名藝人？說國民黨時代藝人是任人玩弄的玩物，曾幾何時，這些被「解放」的「玩物」，竟在中共控制的舞臺上紛紛罹難。連玩物都不是，變成了一群罪不容誅的奴隸。

毛澤東只允許他們鸚鵡學舌唱頌歌，歌功頌德，山呼萬歲。可這些人偏偏要借古諷今，惡毒影射，攻擊三面紅旗和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武斷說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懷恨在心，所以必須「改造」「消滅」。「文革」中大批藝人慘遭鬥爭抄家，本人被逼投河上吊，古裝戲因此銷聲匿跡。

今晚舊戲在銀幕上出現，令人耳目一新，其實「隋煬帝」仍屬新劇，不再是高喊毛主席萬歲的樣板戲罷了。

在演出「隋煬帝」的這天晚上，我在農一隊的露天電影場上，與整整十一年沒見面的李培連夫婦相遇。

那天下午七點鐘，我們吃過晚飯以後，便整隊向對面的農一隊出發。當我們的隊伍剛剛跨進大壩子圍牆的大門時，便在圍牆外的草坪上看見了周麗萍。

一九六五年，受高德勝委託，李培連調到農六隊，對重刑的政治犯實行「感化」教育的試點，我和陳力便是這個試驗田的「試驗品」。

聽說一九六七年底，李培連被打成「五·一六」份子，不久就被關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住進了「牛棚」。

當年革命委員會曾逼迫周麗萍同李培連離婚，卻遭到了她的嚴詞拒絕。於是她的命運便像金梅那樣，被解除公職，帶著未滿十歲的女兒，到北島與女兒相依為命的熬過了十年。

想不到今天，竟在這裡不期而遇，她看見我以後，立即向我打招呼，十一年不見，苦難在她的臉上刻下了很深的皺紋，頭髮也剪得短短的。在夜色朦朧中，周麗萍已鬢髮斑白，完全是一個五十開外的老太婆了。

當我走近她，正要詢問李培連的下落，周麗萍卻向我伸出手來。

二十多年來，我們同所有管教人員存在一條無法逾越的溝壑。管教人員視我們為可以隨意侮辱的賤人，而在我們的眼中，他們是一群失去人性的豺狼，彼此之間，是奴役和被奴役的關係，除了冷眼和敵意，便是警惕和小心。

記得一九六六年一次學習會上，李培連說：「我和你們僅僅是認識上的區別，我們用自己的觀點來改造你們的觀點，所以不應該把這種關係變成人格上的等級和界線。」這種與毛澤東所主張完全相悖的說法，也許是他的一廂情願，也許是他的欺騙，誰知他內心怎麼想？

「文革」終於使李培連夫婦跨過了與我們間的鴻溝，此時，回過頭去看看這條剛剛跨過的鴻溝，便會明白這不是毛澤東所布下人與人間的陷阱而已，否則人與人間怎會互鬥，怎會互相殘殺？

周麗萍扭過頭去向馬路上招手，我順著她招手的方向望去，離我五十公尺左右，一個穿著灰色長褂的人正從夜幕中向我們走來。這便是十一年前這個農場管教科的才子，被認為全農場理論水平最高的李培連。

在暮色中，我細細打量他。此時此刻，他與十一年前風流倜儻迥然兩樣，臉已變得蒼老凝重，顴骨高高突起，額頭和兩鬢已布下很深的皺紋，鬢邊兩縷白髮在微風中顫動。十一年前那種自信和鋒芒蕩然無存，換上了一抹抑鬱和失望，特別是他那件打著補丁的中式長褂，與他十一年前西式風衣顯現出的瀟灑外表，已迥然兩人。

十年來，李培連丟掉了西方的派頭，而返古到華夏古裝。看來十一年的監禁生活，少不了毒打、刑具和折磨。五七幹校也好，牛棚也罷，關禁閉反省也好，反正是坐牢，磨去了他原先的棱角和「威風」，沖淨了他篤守的共產主義信仰。

這十年中，他實際上已淪為階下囚，真正到了他說的「我和你們僅僅只是認識上的區別」的境界。而他善良的妻子和女兒，也因他的誅連，渡過了不堪回首的歲月。

生活本身使李培連親身體會到，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可不是用楊修的故事取迴避而躲得開的。

時間倒轉回去二十年，李培連剛剛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是「新中國」稀缺的第一批法官。那時他還沒有踏進法院的門檻，而是分配到雅安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任教。

第二年的反右運動中，李培連充當了圍剿「右派」的劊子手，參與並製造了當時轟動全國的雅安農學院反革命案件。使得上百名雅安農學院年幼無知的學生和一些天真的老教授淪為反革命份子，陷身囹圄，許多人含冤死去。

這個浪潮過去後，緊接著便是大躍進。在毛澤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凱歌聲中，大陸上卻迎來了空前絕後的大飢饉。作為知識份子，李培連也許在災難面前開始反思，也開始有所醒悟。

不久，他便從學校調到鹽源農場。很快成為高德勝所倚重的人。

他在翻閱了我和陳力等人的檔案以後，從六五年開始，便鼓吹對農六隊「最頑抗」的反改造份子推行「感化」教育，可能是他對雅安農學院所犯罪惡一點內心懺悔或補過吧。

在當時險惡政治氛圍下，李培連敢於公開向我講楊修之死，是需要膽量和勇氣的。其實在當時，中共內同他相類似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代表人物當數北京市委書記吳晗了，一九五八年，吳晗是最先向右派發難的打手，章羅聯盟的帽子，就是吳晗給章伯均和羅隆基扣上的，殊不知事隔八年，他卻因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最先祭了「文革」的血旗！

現在站在我面前的李培連，恐怕已經「嘗盡愁滋味，欲說還休」了吧，他一定還記得跟我講楊修故事這件事。多年以來他奉行明哲保身態度，結果同樣難逃厄運，身陷囹圄。說明對獨裁者取忍讓和順從，換不來獨裁者的憐憫。

李培連向我走過來，並伸出了手，這十年遭遇，突破了我們之間的界線，我握著他的手覺得非常粗糙，感覺到他的手上有一層厚厚的老繭。

十一年前的舊事，我們都記憶猶新，想當年那些激烈的爭論，以及我不顧後果直言直陳的話，一定對他產生過震撼。否則，他也不會用楊修之死來暗示我要我學會保護自己了。

我們互道了「你好」後，就語塞了，雙方心裡縱有千言萬語，在這種大庭廣眾下，一時難以暢述。此時，電影也開映了，我們三人從就業人員的隊伍中弄到一條長板凳，就在大片就業人員和犯人的座位後面，安放了座位，靜靜觀看那銀幕上閃動的畫面。

中國歷史長河中，數以百計的帝皇匆匆而過，唯獨其中的暴君，在民間廣為流傳，首屈一指當數秦始皇，再就是隋煬帝了。

西元六〇四年揚廣登上帝位，他用文帝積累的民力和財富揮霍無度，修行宮，鑿運河，炫耀國力，窮侈極欲，武力侵略，用百萬人民的生命來滿足他驕奢欲望和擴張野心。

煬帝在位十四年間，黃河流域的百姓生靈塗炭，流離失所，最終逼出了農民大起義，他也死於叛將之手。

李世民說他「廢行德治，竭天下民力於一己侈奢」。魏徵說他「窮天下之物為自己獨享」。隋煬帝對內肆無忌憚，搜括民財，修建行宮，剛愎拒諫，陰險多疑，曾揚言誰向他進諫，即便當時不殺他，以後一定要殺掉他。

銀幕上再現了當年老百姓生靈塗炭的一幕又一幕，使人聯想到當今的毛澤東，毛澤東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破壞，隋煬帝還遠遠不及。

我和李培連一邊看電影，一邊低聲議論，我們談到一九五七年開始的文字獄，從他的沈默中，我已感到觸及到他的痛處。人無論如何無奈，充當別人的槍手總會感到難堪。

於是我繞開話題，談到文革，他依然像從前那樣深藏不露，但禁不住我的追問。他說：「這是一場剿滅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災難，也更排斥西方先進文化和倫理。講忠孝信義是封建的糟粕，講平等自由博愛是資產階級面紗，殊不知沒有道德規範的人，便成了赤裸裸的野獸。」

當我說到中國這二十八年來，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實踐，實際上是被野心家利用推行個人獨裁的遮羞布。因此，中國出現了一個典型的獨裁復辟時期，他點頭同意。並指著銀幕上的楊廣，狠狠地說「壞在他的身上」。

如此看來，那些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人們，在經歷了這樣的實踐後，恐怕再也不會相信共產黨的宣傳了，這可是無數人用性命換的教訓啊。

但願這種認識，將對未來的社會發展起作用。

我問他現在做什麼工作？他搖搖頭說：「暫時什麼也沒有幹，在家等待組織的安排。」語氣中顯示他的灰色和低調，像他這種誤上共產黨賊船的，年過半白，才發現少年壯志成灰的人，在中共內恐怕為數不少！

電影放完了，李培連仍陷在深深沈思中，銀幕上的兵荒馬亂以及宇文化及用利劍直逼楊廣胸膛的畫面，在我的腦海裡留下了陣陣餘波，我相信也在他的腦海裡留下了反思，這種「借古諷今」的電影，能提醒台下的觀眾嗎？文化人的苦心大概就顯示在這裡了。

從壩子走出來，我們就此分手，直到一九七九年我獲得平反出獄，再也沒有碰到他們夫婦。聽人說，他已調往其他的單位，但沒有人知道究竟是什麼單位，是高升了？還是另調了？但我看，李培連在今後中共的政權下，混碗飯吃倒不成問題，但要想實現他的一番抱負，恐怕就困難了。

因為，在中共的奴役統治下，不是用人才，而是用奴才。奴顏媚骨、厚顏無恥、蠅營狗苟的奴才是獨裁統治所需，而有責任心、有社會擔當能力、有良知和骨氣的人，遲早會成為中共政權的死敵。

## （六）山溝裡的平反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平反冤假錯案的初潮，終於湧進了鹽源農牧場，湧進了這堵圍得像鐵桶般九〇九的下水道中。

近三十年來，全國有數以千計的像九〇九這樣的集中營，在這些「下水道」裡，關押著大量的服刑者和就業人員，其中屬於「政治犯」的人數，佔有相當大比例，在鹽源農牧場中，政治犯約占三分之一強。

因莫須有罪名，受到刑罰、折磨、飢餓、槍殺而冤死的人數，全國不會低於數百萬。由於承受不了精神折磨和非人虐待而自殺的人，可說比比皆是。

在歷次運動中，當局在對受害者宣判時，往往以「惡毒攻擊」，「污蔑黨的方針政策」，「企圖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等想當然的罪名，不但毫無法律依據，而且不按法律方式，以「黨的政策」和執法人的好惡來定奪。

所以，毛統治時期，獄中關押的「反革命」犯，絕大多數都是冤案。因「不認罪」而死於獄中者，難以計數。

在農六隊這個魔窟中，徐世奎和何慶雲習慣了使人「認罪服法」。只要誰公開說自己沒有罪，或者寫上訴材料偷偷寄出，一經發現，都要嚴查到底。輕則鬥爭，重則加刑，甚至於處死。

陳力、張錫銀、劉順森這些被當局殺害的「反改造份子」，那一個不是為反抗冤獄而慘遭殺害的？

專制時代，罵皇帝，甚至影射攻擊皇帝都是死罪，而今對毛澤東稍有不敬的言辭，也要粉身碎骨。有了中共公開提倡，小人們挾私報仇，抓住仇家對當今統治不滿的言論置之死地。階級鬥爭的三昧毒火，封死了申冤的門，進監的反革命份子，就別想正大光明走出牢門。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執政，不願去觸動共產黨的統治，甚至不願搬掉實行改良的絆腳石，而是利用原來的各級官吏來「撥亂反正」，工作豈有不受阻撓之理？

平反冤假錯案，本是鄧小平「撥亂反正」的第一步，卻受到舊政府衙門的重重阻礙。那有自己否定自己的道理？要翻夾私報仇的冤案，比登天還難。

所以平反並不像以往整人運動那樣雷厲風行，而是被中共各級官吏軟磨硬拖頂著不辦。被平反的人，依然要夾著尾巴過日子，他們在落實政策辦事機構的門外排起長長的隊伍，像乞討施捨的乞丐。

一九七八年夏天，第一個登門為農六隊平反的是從德陽法院來的人，他們對德陽監獄的管教幹事蔣平富進行了悄悄飆別，蔣出獄的那一天，幾乎沒有人知道，大家還以為他是正常調動，調到了另一個中隊去了呢。

接著是對曹季賢，李克嘉等人平反出獄，才開始了有點平反冤假錯案的動靜。

開始獲得平反的人，原是共產黨的基層幹部，或是家中有父兄在朝為官的人，當他們被「外調人員」傳訊後，回到監舍，才把自己平反的消息傳給了獄中其他難友，這個消息像春風一樣，感染了六隊所有的「反革命犯」。

一時間，寫申訴的人，一傳百，何慶雲們最忌諱的情況終於發生了，一向揮舞著「認罪伏法」大棒的徐世奎也沈默了，平時窮兇極惡的惡吏，被迫改變盛氣凌人的態度。一面用「我們是執行單位」的盾牌，應付受冤人的責問，背地裡想如何賴掉該負的責任。

關在六隊的人，有很多是農村抓來的，寫不出訴狀，便來找我代筆，從一九七八年六月開始到一九七九年初，半年時間裡，找我寫申訴材料的有二十多人，每到收工或星期天，我抬出一張破桌子，在院壩裡擺開書案。

在六隊多年，同監人是不准交談彼此案情的，否則，便要在大會上批鬥，故一室相處多年，彼此並不知道所涉案情，到了請我寫申訴狀的時候，才把他們的隱情和盤托出，使我對毛澤東時代各階層狀況有更全面瞭解。

農六隊一直被當作無產階級專政死敵的集中地。其實這個被視為反革命重刑隊關押的人，絕大部份，原來都是一些很單純的受冤者。

他們中除了不小心誤撞毛澤東所設禁區外，就是被飢餓逼上梁山的本分農民，這些冤案冤情其實很簡單：

有因為汙損了一張毛澤東人頭像，被判刑的廖某；

有因為替機關寫標語，將毛主席萬歲寫成毛主席一歲的陳某；

有在殺過年豬時隨口說了一句「豬毛算什麼東西」，便被仇家誣告，說這是指桑罵槐的咒罵領袖，被判刑的；

有因忍不住說了句林彪一臉奸相的楊某；

有因為在一九五九年發現妻子與民兵隊長通姦，而大罵武裝部的向某；

有在一九五九年打開生產隊糧食保管室，任社員一搶而空的牟某；

一九五九年在萬縣發生的公社社員哄搶糧食事件。被稱為「武裝暴動」而判刑的王某（後來某作家以此為原型寫成了小說《犯人李鍾桐的故事》）。

……

這些冤案主人公的名字，已記不準確，但他們的案情可編成毛澤東冤案錄，是這一時期官逼民反的大曝光。

這一個個案件的主人公，許多是陷身文字獄的普通市民，被長期沒為奴隸；更多是樸實憨厚的農民，僅為生存身陷囹圄。

六隊開始平反後，何慶雲的心情非常複雜，眼看過去被踩在腳下的反革命一個個獲得平反從大鐵門走出去，感到尷尬又擔心，過去做的許多違背良心的壞事，令他心虛。在這段時間裡，何慶雲口中雖然將「認罪服法」改成「有錯必糾」，表面服從黨中央新政策。

眼看那麼多冤假錯案被推翻，他擔心現在一風吹的案子，到今後又說犯了「路線錯誤」，被重新否定怎麼辦？所以對平反工作採取一拖再拖。

暴力不僅扭曲了受冤人，同時也扭曲了這些專政基礎的打手們，以我在本文中所介紹的張劍波、林扯高、張醜德、鄧揚光、龐玉篤、何慶雲、徐世奎等人，他們都被荒謬階級仇恨毒化成失去人性的打手！他們從不去想想被害人的冤枉怎樣痛苦；現在幾十年過去，如果他們中還有人活著，不知是否找到了毛澤東這毒根，在總結一生時有所漸愧而悔悟？

因違背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共產黨整個施政綱領全錯了。同時建政不建法律，在執法中沒有共同認可的標準為依據，留給執行人隨意變通的空間。所以對處於弱勢的百姓憑好惡任加冤害，無法無天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恰當概括。

### （七）李大漢

我因腿被狗咬傷臥床的那幾天，李克嘉平反獲釋的消息，在六隊引發了一陣熱議。

李克嘉也是有一定「名氣」的反改造份子。十幾年前，他是唯一的以「刑事犯」的名義而被長期關押在「反革命隊」的大學生，在六隊的十四年中，他從來沒有談到過因何入獄，想來興許有一段不願公開的隱私。

許多年來，李克嘉以抗暴聞名農場，他的身高一米八，體質強壯，得了一個「李大漢」的綽號，也因為身強體健，營養消耗量特別大，所以他對每頓僅只有半罐的玉米粬產生的不滿也更強烈。

他創下了一個又一個反抗飢餓的故事，收穫馬鈴薯時，憑著他的身強力壯，可以在半路上攔住滿載回隊的馬車，把成筐的馬鈴薯從車上卸下，埋藏在山溝裡，以備冬天飢餓時果腹。收穫玉米時，他曾將整整一板車的玉米，神不知鬼不覺的交給老鄉，在收穫完畢後，再去那裡取回。

然而久走夜路必有撞鬼的時候，老管崗樓下面的反省圈裡，經常可以見到身軀高大的李克嘉挨摑挨打，日子久了，徐老大和何慶雲便乾脆把他分到嚴管組去，用槍桿子押著上下班。

然而，即使如此，李克嘉仍然將大包的玉米子裝進口袋帶進監舍，他那件厚棉衣裡，裡層縫了一條貼身的大口袋，那口袋裡裝十斤玉米也看不出來，他便靠這件特製的大鎧甲，將地裡能夠擄獲的「進口貨」混過崗樓檢查。卻又經常被帶班的老管識破，只要看到那崗哨下的反省區中有李克嘉的身影，便會見到他身邊被撕下的「口袋」，以及從那面掏出來的玉米，剝光那棉鎧甲後，便對他非捆即打。並當著他的面，將那件鎧甲撕得粉碎。

然而，剛撕毀一個包，過不了幾天，他又會再縫一個包背在背上，他為果腹，可謂百折不撓。

為了逃脫飢餓的折磨，李克嘉越獄了，他逃跑次數不多，但動作驚險。兩年前，他從成都火車站月臺上帶著手銬，飛車越窗而走。回來時，竟被用鋼絲捆著手臂，其形狀之慘實在罕見。

然而，李克嘉與『火炬戰士們』不同。我們不大交流對於獨裁政治的看法。一九七六年因為四個馬鈴薯人，他幾乎被林扯高置於死地，這個馬鈴薯人事件，是純粹巧合，還是知到共產黨權力爭奪的內幕？我不得而知，也沒有交流過。

但是，一場反「四人幫」的傀儡戲，卻使他因禍得福，那次被關進小監不久，便從小監裡放出來，緊接著獲得平反，這裡面一些情節，使人猜測他與中共有無人知道的關係和隱情。

現在，李克嘉就要出獄了，他是六隊最先獲釋的「反改造」尖子，離開六隊那天，人們向他祝賀。在他啟程返回雲南大理老家時，臨行前，取出了一本珍藏了十幾年的『樂府詩選』送給我。

他珍藏的這本書，得以保存至今，可謂珍貴之極，算是十四年朝夕相處的紀念。

我打開它，上面題有（贈別）五律一首：「來時風蕭蕭，別去正花朝，並轡多殞命！遺諧意應高，文明天地久，大業永不凋，四化更新日，詩書念我曹」。這麼多年來，赤手空拳同獸警們的鬥爭，使我難以忘懷。

相別後，我聽人說他去大理投奔他當省委書記的大哥，並擔任過縣文教局長的職務。以後他還參加過市長的競選，他期望的「四化更新日，大業永不凋」，將遭遇什麼結果？我自有看法，加上我們政治追求不同，以後就斷絕了聯繫。

二〇〇九年四月上旬，我返鹽源會見倖存難友時，難友們對他嗤之以鼻。

據難友說，陳龍富於1985年逃亡路過雲南找到李克嘉，本希望得到他一點幫助，但李克嘉不但不念昔日難友之情，反而先隱住陳，然後偷偷向公安局報案，並領員警來捉他。幸好陳龍富及時發覺逃脫，才免遭李克嘉暗算。這種出賣昔日難友的行為，使他成為大家心中不恥的小人，這是後話。

這年五月雨季來臨時，有一天郭川小把我叫到隊部去，說隊部決定：從今天起派我出去看守五號梁上的玉米。按六隊規矩，凡單獨外居的差使，不是政府信任的人，便是將刑滿釋放的人，這種差事是何慶雲、徐世奎絕不交給我的，我預感到，我出獄的時間已臨近了。

郭川小通知我後，便催我趕快回監收檢行李，當天就搬到看守棚去。

### （八）勞改隊的狗也傷人

一九七九年的四月的一天，我到林業隊去。田井陌托人帶來「口信」，說他回重慶時，專程去北碚看望了我母親，說她現在已平反，生活好多了，盼我早日回家，還給我帶來二十斤糧票和一些副食，要我去他那兒取回。

第二天中午，我趁拖拉機在四號樑子耕地的時間，翻過山樑去了林業隊。

當我翻過山坳進入油庫灣時，踏著兩年前拚拼著性命造出來的大寨田坎，腦海裡重現那幕令我不堪回憶的圖景。

修築堤面寬度達1.5公尺，最大高差30米，長100多米，儼然一個小型水庫的攔洪壩。然而這『壩埧』僅是一塊乾田的田坎，為了這「政績」，我們被驅使曾每天16小時苦戰。農場的『官』那裡把我們當人在用？

那年冬天的奪命苦戰油庫灣主體工程雖已完畢，但這項工程所帶來惡果，很快顯示出來。



經過兩年雨季洪水沖刷，梯田兩側的排洪道，已塞滿了泥沙，洪水越過溝渠，灌入田中。用泥土堆積起來的田坎，在洪水浸泡下紛紛跨塌。落差最大的七號田，已被沖出了幾段缺口。所以這兩年，雨季一過，只有派人對缺口進行「修補」。

此時正是初春時節，基建隊正在用混凝土重新安裝排洪涵洞。

中午時分，修補田坎的就業人員都已下班回隊吃飯，田坎上散亂堆放著工具。當我漫不經心地從那裡經過時，忽覺身後一聲響動，一股冷風從身後向我襲來，我還沒有來得及轉過身，就覺得左小腿肚子上被猛烈地叮咬了一下。

我回轉身去，一條足有一米多長的灰色大狼狗，正惡狠狠瞪著我，兩排鋒利的尖牙上還銜著從我棉褲上撕咬下來帶血的棉花。那畜牲兩腿前扒後蹬，一副躍躍欲向我撲過來的姿勢，如果不是那鐵鏈的約束，我不知會受它多猛的襲擊。

我低頭看了一下我的左小腿，棉褲已被這牲畜撕破，血順著褲腳流到了腳跟。一股怒火從我胸中燃起，心想我已被人欺侮了二十多年，今天這畜生也來吃我一口？便忘記了疼痛，順手從地上操起一條青崗木扁擔，朝這條牲畜劈頭蓋腦的砍了過去，那畜生的背上頭上和腿上已連連被我擊中。

那畜生出乎意外的受到猛烈反撲完全被震住，慌忙掉過頭去，抱頭鼠竄，那窮兇極惡的吠叫，變成一迭聲淒厲的告饒聲。最後捲縮著身子，將頭埋進了涼棚的席子下面，發出一長串淒厲的哀嚎，任我在它的屁股和背上猛打。

聽到大狼狗連聲哀嚎，田坎那一端，三個人沒命的向我跑來，邊跑邊喊：「打不得，打不得」。我認得是場部蔬菜組看棚子的人，等到他們跑到，我才收住扁擔。那年長的喘著粗氣向我喊道：「別打了，這狗是李隊長花兩千元買回來照看蘋果園的，今天把它借來，讓它看一下工具。你若把它打死了，我們可賠不起。」其他兩人死死地抓著我的扁擔。

我狠狠瞪了三個人一眼，看了看那只把頭死死埋在席子裡的牲畜，它身上幾處已滲出了血。便扔了扁擔，彎下腰捲起那被狗咬傷的左腿褲腳管。血已滲了半邊褲腿，在揭開的地方小腿肚中間，露出一個血肉模糊酒杯口那麼大的傷口，血從傷口處不停地往外湧。

三個就業人員蹲下身子，一面看我的傷口，露出不知是同情還是畏懼的眼光，並連連催促著我趕快去醫院做手術。

從那兒到醫院少說也有三裡地，我看了一下傷口，思量了一下，頭也不回大步地沿著那條通往場部的大路走去。血順著我的小腿流到了後腳跟，又一滴一滴地灑在我走過的馬路上。所有過路的人都用驚奇的目光看著我。

當我匆匆跨進場部蔬菜組的大門，蔡幹事從裡面迎了出來。他看我這副尊容，顯出驚奇的樣子，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坐下以後，向他簡單的講了剛剛發生的事，並說明來意，請他把蔬菜組的馬車借給我，把我送到醫院去。

他看了看我的傷口，說蔬菜組的所有馬車今天一早都被派到城裡拉化肥，現在還沒有回來。所以只好派兩個人，用板板車把我送到醫院去。說完，要我坐下稍等一下。

五分鐘以後，我便坐在板板車上，由兩個人拖著向醫院走去。

進入場部大樓大門附近，已是下午一點鐘了，不知因為剛才失血過多，還是打狗消耗了大量體力，我的肚子特餓。

從懷裡摸出三兩糧票和一塊錢，交給兩位拉車的人，請他們到場部食堂弄點飯給我吃。他們接過我的飯票，不一會兒便端來了一大碗。板板車周圍聚滿了即將上班的就業人員，他們向我問長問短。

這時，剛調到場部蔬菜組的楊厚模走過來，向我喊道：「你要出獄」了。

我不解地問：「何以見得？」

他一本正經的說：「狗都在攆你，便是預兆。這勞改飯你吃了快二十年了吧。總算被你熬出頭了」。說著，板板車重新啟動，一路上碰到不少熟人，都說被狗咬傷是一種吉兆。

這一天，非但沒有到田井陌那裡去取回母親帶給我的東西，反而傷成這個樣被人用車拉到醫院去。但我對這條傷人的惡犬，已重重教訓了它一頓，打得它連連哀嚎，出了一口惡氣。一路上受到那麼多人的祝福，使我的心情感到舒暢。

車到農一隊門口，適逢抽水房的李相華從那裡經過。他看了我的傷勢，說他這就回隊通知郭隊長，請他下午派馬車到醫院來接我回隊。

下午兩點鐘，板板車將我拉到了醫院，在兩位拉車人的協助下，我被送進了手術室。值班的醫生看著我那麼大的傷口，又看我幾乎毫無反映的表情，便馬上為我消了毒，剪去已經被咬翻的那些皮肉，打了破傷風針。

為我動手術的醫生問我打不打麻藥針？我搖了搖頭。逢合手術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從此以後，在我的左小腿肚子上，留下了一道足有八公分長的疤痕。

下午五點鐘，彭文學奉命駕著馬車來接我，回到六隊後自己走進監舍，直到這天深夜，原先被興奮所抑制的痛感才開始發作，這一夜，我輾轉未眠，痛徹心扉。耳朵裡響徹著楊厚模的叫聲：「狗都在趕你了，該回家了！」

是啊二十年了，我該回家了，牢底坐穿了，人也到中年了。我生命最燦爛的時光，都被冤獄無端消耗掉了。未來的歲月，前途未卜，吉凶難料。疼痛直到天明，一夜無眠。

因為腿傷，郭川小特別批准了我臥床休息。在獄中二十年，因這麼一點傷，竟破例臥床休息，這是我第一次享受到「人道主義待遇」。

一周臥床，配以吃藥消炎，傷口沒有發生炎症和異常。

閒來無事，便想起了給母親寫信，信上雖然說我被狗咬，但筆觸卻很輕鬆，二十年的苦難磨出來的人，被狗咬了這麼一口，實在算不了多大的事。

殊不知這輕鬆的一筆，卻急壞了千里之外的母親。正巧與她同看此信的還有一個名叫鄒銀雙的女醫士，本是北碚防疫站的一名幹部，巡迴下鄉，駐在蔡家場醫院。在她得知我被狗咬以後，專門去防疫站為我配製了狂犬病的疫苗，用航空寄來。只是那藥寄達鹽源時，我早已拆線痊癒，並下地勞動了。

接著，母親在第二封信裡，除詢問我的傷情，還附有鄒銀雙的照片。母親來信介紹她今年二十六歲，一直還未出嫁，因為同情母親的遭遇，在蔡家醫院便認母親作了乾娘。她讀過我寄給母親的那些信件後，不但羨慕我的文才，也同情我的遭遇，並暗示母親，願意等我回到重慶。

那一封信提醒了我的婚姻，這本是人生大事，而今像我這樣的四十開外的老童子，戀愛已被冤獄埋葬。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處在生死未卜中，忘卻了自己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每天只盼著有一口飽飯吃，不挨餓，不受人侮辱！哪有條件去妄想女人？。我凝視著那張像片，她會成為我未來的妻子麼？於是我對那相片長嘆一聲：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時多？去時朝雲無覓處。」後來，每當我看到這張像片，便想到在母親的身邊竟有一個女人等著我，便感到心跳臉紅。

## 第二節：看守莊稼

這些年來，不知是老百姓特別餓，還是特別窮。農民們從階級鬥爭的緊張關係回歸現實時，釋放出一種追求物資的爆發力。

農場周圍的老百姓一直對拿著槍桿子，強迫他們的農場頭們懷著敵意。偷農牧場地裡成熟的莊稼成了一股風，開始時，是個人在夜間的行為，守莊稼的人一般都在白天，任務是防止附近老鄉放牧牛羊群時，因無人管束而傷害莊稼。

白天值班的人說，一片片剛種的馬鈴薯晚上被人「挖去」，由個別人的小偷，漸漸發展到大批人的奇襲，有一天夜裡就挖掉十畝地的馬鈴薯種，從足跡看，至少也有二十個人來過。

面對老百姓的行動，只好加強防範，晚上，每個山頭增派兩個人駐守，發現有人立即吹哨警報，這種消極的防範，雖然起了一些作用，但並沒有因此使老鄉不來夜襲，所以新增了巡邏隊，我便是指派的巡邏人之一。

### （一）首次外宿

得到指派後，我回到監舍，收拾行李。周圍的人都圍著我詢問，是不是被釋放回家了？哪一天動身？當他們知道我被派出去守莊稼時，都勸我，不要去招惹老鄉，以免引禍上身。說這裡的老鄉極野蠻，晚上出來偷莊稼都帶著刀子和棒棍，對於阻攔的人，輕則棍棒相加，重則刀劈斧砍。

但憑我對老鄉們的瞭解，雖個別人性情兇悍，但絕大部分是山區農民，他們對統治者恨，但又無可奈何，對「犯人」經過瞭解，越來越同情了。

下午兩點鐘，我背上了被蓋卷，端著臉盆和碗具，暫別了我的難友們。

十八年了，我第一次在山坡上單獨住宿。與我同時派去看莊稼的還有老吳，他提著一盞油燈，我們收拾好那莊稼棚中的涼板和稻草，天也漸漸黑下來。

當夕陽滑向西邊的地平線時，漫漫的霧氣從山底下升上來，滲入到那黃昏夜空中。此時，若站在山樑上向西看，牧羊人被夕陽染得特別紅，在他們鞭子指揮下，牛羊群轉過山坳，漸漸地隱匿在山後面。我和老吳直到天色黑盡，田野裡草蟲爭鳴才回到小屋。

第一個夜晚，蚊鳴四起，我和老吳回到屋裡，將白天採來的青蒿架在玉米桿上，燻出濃濃的青煙，頓時安靜了許多。

這一夜躺在坑上，精神特別興奮。側身去看從門口映進來的晴朗夜空，繁星點點，又將我帶回三十多年前的童年時代。

不知何時沉沉睡去，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清晨。我趕快爬起身來，沿門前那條二十公尺寬的過道開始跑步，享用這清晨新鮮的空氣。

太陽還沒有露面，那東邊牛毛山下青灰色山巒中，早行的牧羊人，已在山坳唱起了悠揚的山歌。不一會兒那牛群羊隊，一個一個從山間閃身出來，這詩情畫意在內地是見不到的。

由於我長期生活在六隊高牆內，一直都沒有機會接觸和認識周圍的農民，特別是經常來到六隊地界的牧民們。守莊稼後，我很快同這些牧羊人認識並建立了友情，他們是上了年歲的老婦人和十二、三歲的孩子。

那時還是「人民公社」時代，能同大人們一道放羊的，不是生產隊長的孩子，便是會計的孩子。大人劃著界線，但孩子們卻不以為然。

同孩子們交談，知道他們唯讀過小學一二年級便輟學了，我記得他們中最小的年僅十歲，他能夠非常自如的躍上牛背，騎在牛背上做著各種動作。他們對村裡大人們發生的吵嘴打架從不隱瞞的告訴我，只是因年歲太小，還弄不清楚那段歲月中「人民公社」複雜的人際關係。

在我看山中，有緣認識了兩位老大娘，一位姓劉，那是去年秋耕，我和李進駕著拖拉機在北坡的蕎子地認識的。

六隊收割蕎子，地裡照例是撒得遍地都是，隊部的家屬對它們不感興趣，如若是流放者去撿，就只能拿去作飼料，若要是誰拿去吃，被何慶雲們抓住，那就是自找麻煩。所以，那些蕎子都爛在地裡。

這個秘密，被那位劉大娘發現，於是在拖拉機正要翻耕的地裡，她便來了一個「小秋收」，殊不知中午時，她背著背兜，翻過山樑時，被看山的「抓住」，硬說她是偷的，不准她背回去，雙方僵持著，滿山都是罵架聲。

正在這個時候，我和李進走過去，替她證明確實是地裡撿的，才使她得以脫身。兩天以後，當我們在另一個山樑上耕地時，老遠就看見她在地邊向我們招手，待我們停下拖拉機，便見她提著一個口袋向我們走來，口袋裡裝的是一塊羊肉。不容我們的推辭，說什麼也要讓我們收下。最後我們只好掏出身上的三塊錢才收了她的「禮」。

這一次我守莊稼棚，第一天便見到她和另一個大娘，正向我們的小棚子走過來，走到跟前，我從棚子裡出來向她們打招呼，讓她倆走進棚子裡。她向她的同伴介紹道，「這是小孔，開拖拉機的。」又指著她的同伴說：「這是詹大娘，梅雨六隊的，我的鄰居。」

兩位老人年齡都已六十開外，與我母親相當，只是山裡人，勞動成了習慣，所以身板很結實，那詹大娘，右眼正在發炎，經常眼淚滴答，她說山裡人窮，沒錢去鹽源看眼睛。

她倆放牧的羊群每天都要從這裡經過，從此以後，她倆便是小棚裡的「常客」。在山上，整天守候著牛羊群，加上這些牲畜又必須在有草有水的地方，從早到晚是不會回家的，中午的飯菜便在前一天準備好，用特備的罐子裝好，裝進帆布包，到了中午打開挎包，就地撒兩根樹條當筷子，席地而坐，便吃起來。

山裡人長年如此，並不在乎飯菜的冷熱，飯後也不喝水。在我們看山前，兩位老人中午從來沒吃過熱飯，喝過一口熱開水。

山坡上除積水窪中的雨水，要喝乾淨水是沒有的。我和老吳是趁去伙食團打飯時，用盅子接一盅水到山上洗臉洗腳，山上多的是前一年留下的玉米桿，只消三個石頭一架，自製的鐵鉢便是鍋，喝開水熱飯菜還是很方便。

我們來後，這棚子也成了她倆中午熱飯喝水的地方，我們彼此一天一天更熟悉了。從那以後，她倆每天都要帶點牛羊肉來，表示我們為他們提供生活上便利的謝意，中午「共進午餐」的時間，也是我們拉家常的時間。

詹大媽眨著流淚的左眼試探問我：「你為什麼會到裡面去的」？我明白她的困惑，她們所聽到的宣傳，把我們描述成什麼樣的惡魔我們並不在乎，這年頭中共的顛倒黑白已成習慣，所以儘管我們被說得如此可怕，相信的人並不多。

但是事情的真相，對於這些老實巴交的農民，卻難以用幾句話說清楚的。面對她的提問，我只淡淡一笑，隨口說，農村裡五類中，反革命排第四位，問道：「你們村的反革命難道都是殺人犯麼？」她搖了搖頭，這樣類比，使她明白，我們是些受苦人。

「你今年多大年紀，家裡還有人嗎」？詹大媽繼續發問。

「四十二歲了，我家裡還有一個老母親也同你一樣大年紀。」聽我這麼回答，詹大媽嘆了一口氣。她的大兒子是梅雨六隊的隊長，今年已四十歲了，算是我的同齡人。

「你進那裡面究竟是為什麼，你判了幾年？」她重複地問我，顯然想知道我的身世和底細，但是，怎麼告訴這位面善的老人呢？說自己是反對政府她們會有什麼反映，驚異，恐慌還是同情？說自己是被冤枉的，她們會理解嗎？說自己被監獄看守無緣無故欺壓，她們能相信麼？

想了一會，告訴她：「我是一個右派！刑期是二十年，已經坐了十九年了。」兩個老人聽了頓時一驚，面前這人怎麼在監獄裡關了十九年？那定是很大的罪，不是殺人放火，就是拿槍造反？尤其她倆想不到，我入獄時才二十二歲，驚訝的問道「啊呀！你怎麼二十二歲就進監牢了？」這口氣對我這個文弱人這麼年輕，在監獄中關押了這麼久很惋惜！

從那以後，兩位老人一有機會就要問我，年紀輕輕幹了什麼「傷天害理的」的勾當？不滿足她們的好奇心，是不會甘休的。

有一天，天氣特別晴朗，我們就坐在西山坡，面向梅雨鎮，我向她們講述了二十二年前的故事：我如何在大學讀書，學校如何的大鳴大放，我因為什麼而被劃成右派，以後，又如何去農村勞動考查，如何不服，又如何被

處十八年徒刑，又如何反對三面紅旗加刑為二十年。

當我講到當年的飢餓，喚起了她們的共鳴，梅雨公社也一樣的樹皮草根都吃完，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家人得了水腫沒法救，詹大媽的老人就是那時候死的，埋在梅雨的山腳下。於是兩個老人不斷地嘆息，不斷地的安慰我，說我命太苦，嘮叨著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她們告訴我，在這二道溝和梅雨鎮間方圓幾十裡地，幾百戶人家中除了兩個高中「秀才」，就沒出過一個大學生，不識字的村民對「秀才」的仰慕，雖經文革浩劫，也一直沒有改變，供在堂位正中的靈位上，「天、地、君、師」從未移過！

隨著交往的加深，詹大媽在我的同意下，把兩個正在小學讀書的孫子，帶到我的棚子來，那天，她要兩個孫子為我行了拜師禮，對我說道：「我們鄉里人就盼一個有文化的人，讓他們跟你多識幾個字。」從那以後，每天下午五點鐘，在我的莊稼棚裡便多了陣陣孩子朗朗的讀書聲。我樂意這樣做，不獨以此來表達對老人的關懷和謝意，也以此來消除我和老吳的寂寞。

兩個孩子大的在梅雨公社辦的帶帽中學讀書，小的在公社小學讀二年級，大媽告訴我，他們沒有老師，教他們上課的是村裡的會計，每天上兩節課，有時候會計有事，整天就放假，他們只好在家割牛草，餵豬。大孩子已十三歲，連小學課本上的字都認不完。

詹大媽給我送來的「束修」之禮，是我多年沒見過的核桃和蜂糖，我只有拿出平時省下來的零花錢，偷偷塞在她的帆布包裡，可是第二天就退還了我，這使我明白，她們發自對孩子們的母愛。

看山守莊稼的這段日子，母親幾乎每十天給我寫一封信，來信告訴我說，她的問題已經獲得改正，右派帽子不是「摘掉」而是「吹掉」的，並說她正在跑重慶大學，每一次都把重大對問題的復函夾在信裡給我寄來，我知道這些信灑著她的汗水，那時我還不知道乘坐重慶市的公共汽車有多麼打擠。

出山後，生活漸漸走了正規，每天上午繞著放牧牛羊的跑道上小跑，活動四肢，兼有檢查所轄八百畝玉米地有無異常情況，便與老吳輪流著回隊取飯菜，下午六點到晚上八點鐘，為兩個孩子補習，直到夜色朦朧，送走兩個孩子，我便去溝邊取水，洗臉洗腳，有時借浩月當空，對著一輪明月，我坐在棚子前的青石板上，取出二胡拉起「蘇武牧羊」來。

幽揚的二胡聲常帶我到埋於山崗前的張錫錕、皮天明「墳前」。其實那裡並沒有墳，殘暴的當局是想把他們徹底的消滅掉，不留痕跡，但怎麼都無法消除烈士們在人們心中留下的偉大形象？

恰好，今年八月二十五日是張錫錕遇難三周年的日子。原先火炬的成員，陳蓉康鄧自新已分別回了家，其他戰友已經雲散。這天我又去了那裡，我站在他們葬身的亂石包前，向那裡行了三鞠躬，並將一柱香插入亂石中，默默對著蒼天，天地若有情，怎麼允許這些英雄從中華民族中抹掉？我想天地中正氣永存，中華民主事業永存，火炬精神也將永存。

守山的日子，比之在監舍小組中，確是輕鬆多了。玉米沒有成熟的那一個多月裡，我還常常在夜間去場部看電影，有時和兩個孩子一齊去。一個月後，那玉米的植株長到兩公尺高，茂盛的玉米林，密不通風，已背了半尺長的娃娃，掛著淡紅色的鬚須。

記得當年才到這裡時，這五號梁梁種的蕎子植株不到半尺高，秋收時連投下的種子都收不回來。後來，利用毛牛山上運回的腐植土，配以化肥，種下玉米的年產量逐年升高，紅土地也變成黑色，原來過去土地荒成了紅土，變成「鬼不生蛋」，仍是「人禍」造成的。

徐世奎對我在山上的「勞動」似乎永遠都不會放心，經常在中午，大家休息時出來查哨，說現在玉米已是懷胎時節，必需須加強守護，對我和老吳明確規定中午時節，我們必需在玉米地裡看守。

為防止他在中午突襲檢查，所以中午我們不會呆在看守棚裡，而是披著一床蓑蓑衣，鑽進茂密的玉米林將蓑衣墊在地上睡午覺。

有時，我在玉米林中睡著了，被詹大媽發現，她責備我說：「睡在潮濕的玉米林裡會受涼生病，也會得風濕，老來會得大病，如果你今後回家，你媽看你一身是病，會很傷心的。」

我口頭上雖然答應改正，但中午時間太長，在玉米地「午休」實在是無奈的事。

有一天，我在去農二隊那條小路上不遠處，在玉米林裡鋪上蓑衣開始睡覺，不覺進入了夢鄉。恍惚中聽到兩個路人的講話聲，那聲音很熟，我被驚醒，側起身來透過玉米葉縫向外望去，原來是農二隊的兩個幹部，正坐在距我藏身處十公尺的路旁歇腳，其中一個是農二隊的中隊長，人稱夏麻子的。另一個便是農二隊的王事務長。在玉米葉的庇藏之下，路過的二位並沒有查覺出我。

只聽見那夏麻子正大聲嘎嘎的吼道：「政治犯都要平反了，這是今天的政策，你沒見嗎？老鄧上臺了，中央組織部換人了，胡躍邦當組織部長了，他說全國各地落實政策進度太慢了。你沒看到嗎？過去只要說錯了話進監的統統都要放。」

那王事務長接口道：「我就不相信，難道過去抓的反革命都是好人，造成冤假錯案都是黨的政策失誤？」，聽去，他在發牢騷。

夏麻子就比他高明，他回答道：「這叫政治路線，過去搞的是階級鬥爭路線，連鄧小平都幾乎成了中國反革命的總頭子，今天卻是鄧小平掌權了，又變成鄧小平路線。過去不抓人是錯誤的，今天不馬上放人同樣是錯誤的，這叫路線鬥爭的需要，懂嗎？」

夏麻子這番開導卻招來了王幹事的洩氣話：「那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你我不如趁早收拾行李回家當農民去。」這擔心同徐世奎一模一樣。

兩個人說到這裡，便站起身來拍拍屁股，逕直沿著放牧大道向場部走去，我也從地上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目送他們走下山坡，消失在轉彎的地方。

## （二）夜襲

連日天晴，五號標上的玉米，已由一片蔥綠變成橙黃。莊稼漸熟了，收割季節也越臨近，越接近收割時候，我們越感到緊張。一個月前老鄉們對馬鈴薯的興趣，現在加倍轉向這片長勢良好的玉米。靠路邊的一圈玉米已經稀稀拉拉，被人光顧得差不多了。

我們對於老鄉的興趣是理解的，人民公社使他們一無所有，農民對糧食的緊張比市民更甚甚。他們偷竊改隊的莊稼與我們實在毫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犯不著拿命去同這些帶「武器」的農民較量，能夠做到監守不盜已非常不錯。

為避免口舌之爭，我們將那搬掉玉米留下的光桿——砍掉，為徹底消滅痕跡，我和老吳還點火把它們燒掉。劉大媽問我們抓到過偷玉米的人沒有？我只笑了笑答道：「抓了又怎樣，不抓又怎樣？」話已講到這裡，我便把前天中午發生的事，向他們一五一十講出來。

那天上午十點鐘左右，老吳就注意到四五個婦女背著打豬草的背兜，從梅雨偏東的方向鑽進了玉米地。直到中午時分，一個婦女，背著滿滿一背沉甸甸的「豬草」，從那玉米林裡鑽出來。估計她在地裡已潛伏多時，想到中午時分，我們回隊拿飯時，才走出玉米林。

老吳卻一直注意這幾個人的動向，見這女人慌慌張張鑽出玉米林，便追了上去，攔下了她的背兜，將那「草」嘩拉一聲倒在地上。一背去了殼的黃橙橙的玉米倒了一地。可萬沒想到那女人立即耍起橫來，反誣一口說老吳對她動手動腳的。

此時玉米林裡埋伏的其他幾個「夥伴」，一齊從玉米林裡湧了出來，將老吳包圍起來，剛才那女人仗著人多勢眾，反而把老吳揪住，要把他弄到公社大隊的武裝部去。其他的人揚言，要把老吳捆起來。

幾個女人七嘴八舌說，這些玉米地原來就是梅雨三隊的土地，地裡長著牧草，是大家放牛羊的地方。而今你們來了，拖拉機翻了地，就連地邊的草皮也被鏟完。冬天牛羊沒有草吃過不了冬，全是勞改隊造成的。

我們今天在地裡掰幾個玉米是應該的。你們還倒我們的玉米，沒收我們的背兜，當真認為我們好欺不是，叫你們隊長來，我們也不怕。

我聽他們的七言八語，正尋思如何解脫老吳的困境，郭隊長已帶著五六個人聞聲趕來。那一群婦女見來了那麼多人，畢竟還是心虛，一個一個都溜走了，唯獨剩下剛才倒掉玉米的那女人，她說玉米也不要了，只要把背兜還給她。

我從地上拾起那空背兜，遞給了那女人。那女人接過傢伙，飛也似地跑下山去，追上她的同夥們。

我剛把故事講完，跟著詹大媽一起放牧的小男孩從外面走了進來，神情十分神秘地附在我的耳邊告訴我說：「今晚梅雨三隊的人集體出動，要來幾十個人全都操短刀和木棒，你要小心」。

這孩子從不說假話，一群武裝的農民，就要在今晚光顧玉米地突擊搶收了，這些缺吃少穿的農民，把怨恨發洩在自稱是代表他們利益的政府身上，雖然來者氣勢洶洶，但他們怎能改變處於弱勢群體狀態？我們是奴隸，本與我們毫不相干，自可跳出圈外。

明知今晚要生事，為了自身安全，今夜不在棚中睡覺，或去詹大媽家，或就那一個山溝野壑蹲一夜，任村民們自便。但郭川小那裡怎麼交代待？況且逃未必是上策，弄得不好，農民反而不會饒過，想到自己處在被人吃的地位，在這複雜的情況下不好處理。

中午去伙房拿飯時，我便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郭川小。

那一夜，正逢六月下旬，一輪殘月在晚上十點鐘才爬上東邊山頭上，月光映著這片廣闊的山樑，靜靜地，沒有風，雖盛夏卻很涼爽。溝壑中一米多高的青蒿草叢中，爭豔山丘的十樣棉花，在月光中，黑聳聳一叢一叢令人感到迷惑。

好像，那最深的草叢中不知什麼時候，已藏伏著手提短棍的夜襲者，他們仗著這些草花的掩護窺視我們，準備在我們沒有提防時竄出來，將巡邏人打昏在地撲向玉米地……

郭隊長派來近二十名增援者，每人都帶著短棒和臉盆，天黑前，就已聚在我和老吳的棚子裡。大家討論怎樣對付今晚的「武裝衝突」，意見一致，今夜只能虛張聲勢：一面不斷遊走，一面敲打竹筒臉盆，使整個山上都有聲音，告訴那些暗藏的偷襲者：「這裡今夜有大隊人馬看守，你們還是回去睡覺吧。」

叮囑大家，短棒是用來防身的，不到萬不得已，千萬不可動手。即使發現了偷盜的人抓到了贓物，最好倒掉他們偷的玉米，勸他們回去。

守夜者按照商訂好的辦法，當夜幕已將山頭封住時，一迭聲的喊聲和口哨劃破了道道山樑。二十幾個人編成六個小組，從不同地點輪翻呼喊對面山頭上的人，有意的怪叫和大笑，還有人長聲幽幽的唱著山歌，好像整個山頭上都是看露天電影歸來的人。

然而必盡勞累了一天，精力漸漸不支，隨著夜漸漸深沈，山頭上的人聲也漸漸地稀疏下去，有的喊著喊著卻傳來了鼾聲。

就在各山頭漸漸「靜」下來的時候，危險也正一步步的從山溝中湧了上來。

此時郭川小帶著五六個小夥子，從四號梁那邊吆喝著朝這裡走來。他們每人手裡拿著一條青槓扁擔和一支手電筒，將那些已睡著的守山者重新喚醒。老吳故意向郭川小那方向詢問已是幾點了？對方回答已是凌晨兩點鐘了，分明提醒夜襲人：時間不早了，回家睡覺吧。

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突然聽到靠梅雨方向的山溝傳來了吼聲，接著離我大約只有二十多公尺遠處響起了急促的跑步聲。沒想到，如此層層設防，偷襲者還是潛入了玉米林，那裡面傳出掰玉米的響聲。

守夜者驚動了，十幾支手電筒同時射向那個方向，玉米林中嘩啦啦一聲響，一支背背兜的人馬從裡面撞出來，朦朧中黑壓壓一片。我同幾個人跟著向那個方向跑去，一腳被一塊石頭絆了一交，爬起來低頭一看，原來是一個一尺多長的玉米棒，打開手電筒一路照去，那路上稀稀拉拉到處都是。

看來偷的人心很虛，只顧逃跑卻把剛剛到手的戰利品丟了一地。我們把他們趕出了六隊地界，郭川小便鳴哨收兵，一路上將灑在路上的玉米撿起來，送到曬場上去。

沒過多久，東方已呈現魚肚白。一場夜襲就這麼輕輕鬆鬆地對付過去了，一晚上沒有睡覺，雖然嗓子喊啞了，但終於沒有出事，不管怎麼說這一夜也和平度渡過了，

正當郭川小集合大家，佈置白天休息和勞動時，突然代朝謀氣喘吁吁地跑來報告，隊部門口靠核桃林那半邊坡上的玉米昨晚被盜。郭川小聞訊，臉色一沉，沒想到昨晚的夜襲者竟玩起聲東擊西的計謀來，見五號樑子防守嚴密難於下手，便將大隊人馬遊擊到隊部門口下手了。

連忙率眾趕到三號樑子。大家還沒有走攏，便看到那地裡桿倒葉垂狼藉一片。順著那坡地向油庫彎那條路走去，在坡邊的一個深岩坎下，留下了一大堆夜襲者撕下的玉米殼，估計那數量至少幾千個，面對這堆玉米殼郭川小直搖頭。

大家回到六隊壩子裡已是八點鐘了，他臨時作出決定，早上出工除蔬菜組留下少許辦菜的人，其餘人全部投入突擊搶收，這一年的秋收」就這樣提前了。同往年一樣，在大隊掰玉米的流放者後面，照例跟著「小秋收」的幹部家屬，而一夜沒合眼的守山者，只給了不到四小時的睡眠時間。

昨夜表明，別看這邊遠山區的農民，不乏組織能力極強的人，乾脆今晚改變戰術，用埋伏靜聽的辦法，守株待兔。發現異常後立即相互通知，集中人力以對付來襲者。除了五號樑子的玉米地，其餘的人，一旦有動靜便立即打口哨，以集合各路「人馬」。

大家分了組，按郭川小布的點埋伏下來。這一夜雖是陰天，但山上依然朦朧可見。

大家靜靜等候，十一點鐘過了，老吳急急地向我們走來，一面壓低嗓門向我們喊道：「聽見沒有，靠農二隊那只角有響動。」大家屏住呼吸伏地細聽，果然那邊傳來了輕微的劈帕聲，大家一齊向那方向奔去，那起初微弱的聲音越來越清楚。

就在距我們不遠處，玉米林深處傳來由掰玉米和腳步聲混合而成的聲音，少說也有幾十個人，眼下就要同這些夜襲者「短兵」相接。大家都在思考：怎麼同這麼多夜襲者交手？

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明白，夜襲人為防止被人逮住，腰間都別有武器。幾天前農二隊還發生過守莊稼的就業人員，被強襲者用鐮刀砍傷的事。誰也不願冒險，正僵持著，一片火光向這裡遊游來，郭川小率領一支巡邏隊五分鐘以後，同我們會合。

面前這片玉米林，頓時被火光照得通明，大家藉著這股力量，齊聲發喊向玉米林中圍了過去。裡面的夜襲者驚慌起來，嘩啦嘩啦的從玉米林縱深處向外「撤」，火光中看得清楚那些衝沖出「重圍」的，並不是什麼兇神惡煞全副武裝的強盜，其中大半是頭纏白布的婦女。

只見她們一手提著背兜，一手用力拔開阻止她們前進的玉米桿。當她們從玉米林縱深突出，到達地邊的小路後，便向山溝方向奔去，那些剛剛掰下沒有撕去殼衣的玉米，撒在山坡上到處都是。

剛剛追過第一道山溝，卻被一陣迎面打來的石頭堵截回來，唯獨兩名中年婦女，被郭川小們攔住生俘。守夜人將她們圍住，不知道因為害怕還是在火光下怕被人認出，她們把頭埋得很深，圍在頭上的大白布帕，將她們的臉遮得很嚴實，只有她們身上已很破爛的補巴衣，在剛才突圍中被玉米桿撕成了幾大片。

其中一個腳上穿著很舊的布鞋，也不知被那一根埋在地裡的玉米樁樁，扯斷了鞋絆，只好拖著鞋站在那裡，使她顯得彆扭而又可憐。這山裡的農婦，因為窮，平時下地幹活是從不穿鞋的，今晚出來夜襲，把只在家裡上坑時才穿的「當家鞋」也穿上了。

就這麼打扮的兩位被俘者，手腕裡斜背著兩個大背兜，背兜裡只剩下了幾個玉米。我藉著火光注意去看，她倆的腰間確實背著鐮刀，但卻並沒有棍子和其他兇器。看來這是兩個典型的農家婦女，與「暴徒」完全是兩碼事。

她倆站在火光下，一句話都不說，也不抬頭，圍觀的人七嘴八舌說起來。郭川小向她們問道：「你們是哪那一個生產隊的？」對方沒有回答也沒有動，好像木頭人一樣，「你們偷六隊的莊稼有幾次了，今晚來了多少人？」對方只是略微的抬了抬頭，依然絕口不答。



「你們是啞巴呀！」老吳插嘴道。「你們這些人，平時小偷慣了，今晚你們搶勞改隊便是搶國家，搶國家是犯法的，要勞改的啊！」

也不知道兩個女人是被嚇著了，還是壓根就反感，仰或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能脫身？依然不說話。「好了！你們兩個自己說，今晚的事該怎麼處份你們？」郭川小繼續的追問著。此時兩個女人才微微挪動了那白帕巾，露出一直藏匿的臉，嘟囔著：

「今晚怎麼這麼倒楣？玉米沒偷著，衣服都撕破了，鞋也弄壞了，二十幾個人都跑脫了，就剩我們倆了，唉！都怪那鞋子不爭氣。」，拖著鞋的女人狠狠把那雙鞋！脫下來向背兜裡一擲，把幾個還剩在裡面的玉米全都抖在那裡。

「隊長，我們這是頭一次，就放過我們吧！」她倆微弱的聲音，將自己心裡的虛弱暴露無遺！

「抓住你就是第一次，沒有抓住的就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現在把你們帶到我們那裡面去，關在小監裡，再通知你們的隊長，明天取人。」郭川小嚇唬這兩個鄉下女人，他一邊說，一邊還在笑。

然而沒見過世面的女人卻當起真來。連忙喊道，「隊長，我們真是頭一次，就放過我們吧！」喊聲裡一片懇切。

此時那些驅追夜襲人的守夜隊員都紛紛回來了，殘月從偏西方向的厚厚雲層裡鑽了出來，時間大約已是凌晨兩點了。郭川小向兩個女人正色道：「這一次念你們是第一次被我抓住，且放了你們，但背兜必需沒收，下次您們如果再來，被我抓到就沒有那麼便宜了，起碼要把你們關幾天禁閉，你們聽見沒有？」

兩個女人聽說放她們走，拔腿要走，但隨後便回過身來，去拿自己的背兜，被喝住。老吳把那個脫了鞋的女人的鞋從背兜裡甩給了她，兩人才撿起了鞋，依依不捨快快離去。

自從同集體夜襲人面對面的較量後，我們先前對他們的恐懼，頓時化解。這些來夜襲的「小偷」，根本就不是一群全副武裝的「亡命徒」，而是一群普通的農民。

他們之所以變得有點「打家劫舍」的野味，實在是被二十多年半飢半飽，缺食少穿的生活逼出來的。他們知道自己的不幸，並知道反抗，這就很不容易了，算是他們二十八年來的一大「進步」！

尤其是他們已會用古來兵法之常用計謀，昨夜的聲東擊西，今夜的接應撤撤退，都說明他們反抗的成熟。

一部「水滸」，雖沒有概括今天，卻更包含了今天，中國歷史上占山為王的綠林豪傑，哪個不是被官府和暴政逼擊來的？這些夜襲人使我領受到當年梁山泊打家劫舍的味道。

後來每當我看到從那茂盛的十樣花叢中，突然鑽出幾個背大背兜的身影，便很自覺地走開，對這樣的衣衫襤褸者應當也必須閉一隻眼睜一隻眼。從此整個的五號梁梁山坡便顯得十分的平靜。

### 第三節：「平反」第一回合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張青富專門從隊部到山上來通知我，說重慶來了專案的外調人員，要我立即回隊接受「提審」。一面悄悄對我說：「平反有著了，是重慶大學來的人。」，

我帶著難以說清的心情，回到棚子裡換了一件乾淨的「勞改服」，向山樑走去。一路上，那提審的說法一直在我心中攪動，那法院顛倒黑白，使清白的我身陷囹圄二十年！廿年不白之冤使我對法庭充滿憤恨，怎容得它再來以「提審」重述舊事？

但我馬上明白，我將同虎狼對話，文字獄的餘悸還籠罩著周圍，稍不留意會惹上新的麻煩。隨即想到「提審」中可能發生的情況：對方若故意裝成不瞭解案情，讓我重述舊事，我能不能壓抑內心的厭惡？面對這無法可依的「法庭」，我該如何與之抗爭？

若僅僅因政治需要，我這種情節簡單的冤案，是全部推翻呢？還僅僅在條文上作些修改？這二十年來，我一直以「誣害」一詞抗訴重慶法院。

但是，我馬上想，張青富告訴我來人是重慶大學的，這在耍什麼把戲？難道重慶大學是製造我冤案的元兇？

### （一）復查人的醜惡表演

二十三年前，我在重大讀書時陷入右派的前前後後，此刻又浮現在我的眼前，那時我還不滿二十歲。

中共建政初期，靠宣傳營造出一個唯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形象，迷惑統治著人們，廣播、電影、大小開會，街頭宣傳，學校教育，把共產黨的英明偉大說得天花亂墜，幾乎不容我產生對共產黨的懷疑。當然更不能把英明偉大的共產黨組織，想成冤枉我的兇手。

所以第一次把我推上鬥爭會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對這種莫須有的冤情不敢公開反對，沒想到這種天真的馴服，正好是共產黨的陽謀家們，想要達到冤枉人並封人口的需要。

兩年以後，我在南桐界牌公社和叢林煉鐵廠，親身經歷了毛氏三面紅旗，以後又在南桐看守所，親身體會到全國人民的災難，從而醒悟到這種「陽謀」的毒辣時，我已被釘死在「反革命」的大牢裡了，那時我與所有被冤枉的人一樣，想過輕生。

我身旁的受難者一個個餓的餓死了，犧的犧牲了，我從他們的身旁走過來，走過了漫長二十年煉獄，我才明白赤手空拳的我，同完全畜謀的，武裝到牙齒的魔鬼較量，無異於以卵擊石。

回想我在空虛和失落中走上人生；在中共所布下的政治騙局中，從一個孩子熬到了中年；在暴政帶來的災難中從無知走到成熟。並痛下決心同這個吃人的制度抗爭到底。！

托蒼天保佑，我是僅存下來的倖存者之一，我總算看清魔鬼共正由強大走向滅亡。

罪這字，在寺院裡，是佈道主侍用作誨人的常用語，兒時進得佛堂，往往方丈見面帶凶相的不善之徒，便雙手合什連連頌念「罪過、罪過」，但並不知道這「罪」所指什麼。

長大了，念書以後，隨著知識的增長，懵懵懂懂知道，那是宗教勸人修行的戒律，後來讀到佛門十戒和勸人向善的「百過格」，始接觸先知們靜坐禪和思過悔罪的方法。這同中共法庭所講的罪，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即使對中共，學生時代，我也從未冒犯過它。

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罪！

想著想著，六隊的兩扇鐵門就在我的眼前，我迅速調整了思路，從容地向何慶雲辦公室走去。

當我跨進門時，何慶雲站起身來，向我指著那辦公桌前為審問專備的小木凳，示意叫我坐下，我拉長了臉，冷冷地向那辦公桌後的陌生人盯了一眼，心中又重新溫習了一道剛剛想過的對答詞。

何慶雲神情木然的坐在左側的靠背椅上，辦公桌上放了一包「大前門」，滿屋香菸煙繚繞，看樣子，他們已經在這裡等了一會了。

辦公桌後面，坐著兩個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頭髮已經花白，大約六十開外，鷹鼻上面一雙兇悍的眼睛正注視著剛剛進來的我。年輕的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小夥子，我想這大概就是重大來的外調人員了。

兩分鐘沈默以後，那年老者滅了菸煙蒂開始「提訊」。

「我們是重慶大學保衛科的，」老頭不緊不慢地的開了場：「受校黨委委託，專程從重慶坐飛機來對你一九六〇年『反動日記』一案重新復查。」老頭停頓了一下，他眼睛裡露出一種凶光，接著說：

「首先，你要認識到共產黨的政策歷來奉行有錯必糾，有錯必改的方針，我們從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輕易放過一個壞人，這次對你的案件進行復查，再次證明黨的光明正大，你要認識到，這是組織上對你的關懷，同時也是給你的一個很好的機會，你要把當年有關本案的情況如實的向我們提供。」

果然，來人是重慶大學的，這種由學校出面進行復查故案的做法，恐怕只有中國共產黨統治下才會這樣做。難道我的案件，當年是由校黨委提供線索和事實，只不過報到重慶法院去完清一個法律手續？如此看來，法律不

過是中共各級地方組織玩弄的戲法，難怪說中共無法無天。

現在，面對刑期執行了二十年了，我申訴了那麼多次，累遭「強行剝奪上訴權」，累遭批判鬥爭後，這老頭再來「糾錯」，並說中共的政策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令人感到可笑？

更堪有那麼多人已含冤九泉，被槍殺的，打死的冤魂，能容忍這老頭子今天在這裡胡扯麼？冤案已成事實，還說什麼有錯必糾？玩弄掩耳盜鈴的把戲，恐怕只有鄧小平這類在毛胯下三起三落，幾乎被弄死的「走資派」，才想得出來！

他們怕政權跨台，執政黨易位，失去統治的寶座？又怕毛澤東的死黨真的繼承「正統」，逃不掉被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的厄運，才想出這緩和矛盾的做法？

所以就是再尷尬，也得讓我們這些受害者，忍受這種不倫不類的把戲，高喊「有錯必糾，有冤必改」來掩蓋過去所造的罪逆。

當然，在中國還沒有產生與共產黨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缺了監督，玩這一套是非常容易的事！怪不得人們議論，鄧小平只能在政治上小偷小摸！

想到這裡，我看了看坐在審訊位置上的老頭，共產黨也虧了這些通曉變通的基層老官僚。當年就是這些官僚，奉旨把全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實行焚書坑儒，而今又靠他們把這麼多的血債一筆抹掉，還要二十年死裡逃生的人，向冤案製造者磕頭謝恩。

尤其我每年都在申訴，憑什麼把這些向重慶市法院申遞的狀態，向重大保衛處復述一道？這不是捉弄人麼？所以我一向認為法院就是毛澤東玩弄的木偶。

而我現在領會二十年前諸安平所說的「黨天下」，有著多深刻的真知灼見。我那時還沒有理解這個小和尚在向老和尚進言時，已看透了毛澤東，共產黨。

面對這個老滑頭，而不是面對重慶法院，照理我可以拒絕一個學校保衛處所提出的問題。原先準備好義正嚴詞的控詞需要調整。

但轉而一想，我的冤案根子在學校黨委，而學校的黨委是奉黨中央的政策行事的。沒有我被劃為右派，我怎能身陷囹圄？我之所以二十年來沒有找學校，便是深深知道這個皮球在中共的腳下從學校踢到法院去了。我不能鬧笑話，做完全無用的事。

而今天球又被法院踢回學校了，所以我立即問道，「請問學校也負責刑事案件的審理麼？我不希望在這個方式不明的情況下，回答與本案無關的組織提出的問題。」

我的回答，引起那個做記錄的「書記員」特別的驚愕：他停下了手中的筆，抬起頭來長時間的注視著我，老頭也好像被問住了，何慶雲也無話可答，復查問案陷於僵局。

其實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是中共早向全國老百姓公開宣稱了的，不過這個黨一直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由誰來代表？說工人或農民那才真是瀟天大謊。現在看到，左右共產黨的，原來是幾個中共中央的頭。它是那樣的少，簡直可以個人的名字命名。過去二十八年的執政黨就是毛澤東黨。

不過黨這個名詞在字典裡並不光彩，它是有共同利益的人群，為實現共同利益的集合體，在中國「結黨營私」，可以概括為皇帝控制的大臣們操縱全國大局的集團。它從來就是小得可憐的

其實有關描述黨的名詞幾乎全是貶意，什麼朋黨之爭，黨同代異都是表述爭權奪利的名詞，至於孤群狗黨，黨棍，黨禍更是老百姓用來罵人的。

曾經在中國歷史上釀成冤獄國中，政局動盪的閹黨，例如明朝的魏忠賢，就留下了殺害忠良的千載罵名。

同其他人一樣，二十多年前，我被第一次推到鬥爭會上時，那種失魂落魄，至今想來真是羞愧難當。

當我糊裡湖塗的跟著同學們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像父親時，我是絕不會意識到我正充當了他攫取皇冠的擁護者。後來又強迫我們充當了他的犧牲品。

而今看穿了反右派的鬼把戲後，我的內心滿是懺悔和痛恨。

毛澤東當年將我劃為右派，鄧小平在二十年後又為我平反，統統都是為建立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需要，在這種翻雲覆雨之中，我既感到被捉弄的悲哀，又十分無奈。

眼下為了早日出獄，我也只能裝聾作啞。不過，要我跪著承認自己的錯誤，我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面對老頭子的提問和要求，強忍著內心的反感，還是把當年我幹的荒唐故事從述了一遍。

那老頭子悠然的抽著菸煙，把口裡吐出的圓圈甩得老高，看得出他對於我所講的荒唐往事，並不感到絲毫興趣。這種故事，在當年出身不好的大學生中真是太多了。

戲，演了二十年，我幾經生死，總算到了收場的時候了。

我從他那老奸巨滑的眼裡看到他正打著主意。他裝出替我昭雪的那張面孔是多麼虛偽，其實他正打著從我身上撈取好處的算盤，對我心裡滴下的血，除冷笑和渺視外，不會產生任何同情。

大老遠從重慶坐飛機到鹽源來，總不能空手而歸！

「噢！對了，證據」老頭狡猾的眼睛露出假裝的為難，告訴我說，收集證據是他平反的最重要的工作，「請你把那兩封從南桐寄給重慶大學的信，詳細加以交代待，最好你能向我們提供這些信件的郵局的收據。」

這又一次在觸我心中的傷疤，當年我向我稱為母親的學校黨委，表白自己絕無對她的「反心」，為加重自己的誠意，用大學生向黨交心的時髦形式。這兩封血書，同當年許多年輕人的交心書一樣，除了證明我心理上的失態，能說明什麼呢？同時誰還記得這段思維混亂中的細節？

何況，整整二十三年，我經歷農村，看守所，監獄，流放等幾個場所，歷經數以百計的大搜身大檢查，連原來的判決書都沒有了，怎麼可能還將兩張郵件的收據保存下來？我意識到這個老頭在故意的耍弄我，以獲得卑鄙的愜意。

於是我搖搖頭回答說，「時間已過了二十年，我已無法想起當年我幹了些什麼，至於郵件的收據我完全沒有印象，現在要我拿出這些證據豈不是強人所難？難道因為拿不出郵局的收據，就可以改變事情的真相嗎？」

我的語氣變得憤怒起來，這老頭沒有吭聲，那坐在一旁的何慶雲也明白那麼多封申訴信，他肯定拆開看過的。

我現在只有悔恨當年的無知，對重大黨委毫無防備，我真相信這個組織就是我的「母親」，可沒有想到，它毫不猶豫的給了我二十年牢獄之災！

可是老頭的臉色沉了下來，悶聲問道：「那麼你現在回憶一下，二十年前，從南桐叢林煤礦的集中地，在你的鋪位上搜出來的那本日記，是從那年那月開始的，都寫了些什麼？」

這又一次紮到了我的痛處，這本日記作為判我十八年徒刑的原始依據，早已被法院收去，至今肯定還保存在法院的檔案中。現在，我已不屑再去回憶當年為擺脫痛苦，挖空心思偽造出來的東西。

我在二十年中已反覆說清，我已脫胎換骨，我已從乞求寬恕中認清了中共！認識了自己，這是我從煉獄中得到的最大收穫！！

既然已經明白了，面對這個坐在我面前的黨棍，我心裡燃起的是一把怒火！於是怒聲回答道：「你們既然什麼都掌握了，還問我幹什麼？難道這一切重大黨委沒有責任嗎？」

這一聲責問使老頭收斂了，他不再像開初時那樣盛氣凌人，他既不能用施捨恩惠來哄我感恩，又不能就此翻臉。嘀咕著說：「我辦了這麼多右派案子，頭一次看到你這樣惡劣的態度。」最後匆匆收場道：「好吧；給你一點時間，把今天提訊中所有的問題，仔細的思索一下，並寫出材料來。」

老頭子結束了對我的第一次提審，對這個第一次見面的老頭，對他故意挖傷疤的提問，我已經最大克制了。既然是為我昭雪，我本應站在原告立場，聘請律師在法庭上辯護。但情況絕不是那麼一回去事。

他要我現在裝扮出一個被整後，受到恩赦的玩物。可我提出的質問卻使他吃驚，我因此想到其他獲平反的右派同學委曲求人的處境！世道沒有變，當年整人的人又是今天執掌平反大權的人！

他身邊那個書記員停下了記錄，按照老頭吩咐，從皮夾裡取出了一疊白紙遞給了我。

懷著一肚子苦澀，我走出了那辦公室。對這種戲謔的平反，我毫無快樂的感覺。因為，坐了二十年牢我現在已將牢底坐穿，才來『平反』！天下那有這等無理的『衙門』，這等荒唐的事？

走出鐵門便碰上王文典和蕭肖弟良，他倆倒是懷著美好的祝福，詢問提審的經過。我苦笑著感謝他們的關心。

## （二）第一次到詹大媽家

下午詹大媽和劉大媽又來莊稼棚了，他們倆最關心我落實政策的「結論」。我心裡因為有疙瘩，不願向他們提到鄭老頭演的戲，因為這兩個善良的老人是不會懂得「人肉筵席」的。其實像他們這些勞苦的民眾，幾十年來，又何嘗不是在中共擺下的筵席上，任統治者的筷子，挑來挑去的吃呢？

當我回到莊稼棚，詹大媽在門口坐著，她已經聽到老吳說重大來人的事，見我走上山來起身迎著我，告訴我，下午六點鐘，一定要到她的家裡去，她有事告訴我。

過去她和劉大媽曾幾次邀請我去作客，都被我婉言謝絕了。因為當地人的習俗，凡是去人家裡第一次作客，都不能空著手去。我窮犯人一個，用什麼去作第一次見面的禮物？而且，去人家那裡作客，肯定又吃又包，我會因此而十分尷尬。

但今天此刻，被重大來人整整三個小時「提審」，弄得心情極為煩燥，如果趁此去梅雨走一趟，散散心興許會沖掉剛才的不快。

同時想到在這兒已經整整十五年了，還沒有像樣樣的去普通百姓之家作客。對他們的風俗人情所知甚少，說不定什麼時候要我捲舖蓋回重慶，這種一無所知還是一種遺憾。想到這裡，我打定主意，今天下午六點以後去梅雨走一趟。

同每天一樣，下午七點鐘各組已收工完畢。山樑上靜悄悄的，除了有一兩個揀糞的人影在四號樑子晃動外，看不到一個流放者。此時兩個老大娘已背起了帆布飯包，呼喚著各自的畜群，沿著那條老路緩緩而歸了！

夏天的鹽源山坡上，下午要到八點鐘夜幕開始降臨。此時距天黑足足還有一個小時，我向老吳打過招呼，便跟在詹大媽放牧羊群的後面，緩緩地同她一起向山下走去。

詹大媽開始詢問今天白天，重慶來人「提審」的情況。因為我實在不想再談「提審」事，有意問她的小孫子今天那裡去了？

忽然她試探性的向我說道：「你也快脫法了，苦日子也熬出頭了，人也四十二了，該馬上成家了。」

真的，愛情、戀愛、婚姻，這人生中一個重要里程碑，竟被漫長的二十多年冤獄給埋掉了，至於愛情和性的欲望，也在這段與死神和魔鬼的搏鬥中無意忽略了。實我何嘗沒有渴求一個善良女孩子在我的身邊？！然而所有一切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都一次次被殘酷的處境化成瞬間幻影消失掉了！

母親給我寄來那張鄒銀雙的照片，一直就夾在我的筆記本中，說不清是什麼感情，有時候，想到自己危險的處境反倒覺得獨自一人更好，因為一人而無牽無掛，就是在我一朝面對死神時，也少卻了後顧的憂慮，心中反而平靜。

不過，現在我該如何回答身旁這位老人的關愛呢？倘如說：「大娘你就別管了，我不會結婚的」。那就未必太失人情常理，只好用沈默靜候著她往下要說的話，果然她開口了：「小孔，你有文化，人也挺好，脫法以後就在我們梅雨鎮安個家，我替你介紹一個對象。」

平常交往中我知道她是一個說一不二的人，說出來的話一定要辦到，聽她這口氣大約已經為這件事籌畫多時了。「哪！我們公社的農機站裡，我的一個侄女在那裡當工人，今年才二十七歲，我看你們挺般配。」

我實在沒想到，今天她特意邀我去她家作客，竟是為我當紅娘來著。心裡不免掠過了一陣緊張。

像還沒紮根扎根的水面浮萍，當時我對今後的前途還沒有定準，何況母親在重慶眼巴巴地等著我，說什麼我也不能在這裡安家！

面對老人的一番好意，我無法生硬的拒絕，只好說道：「還早著呢，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脫法，脫法以後幹什麼，弄不好會連累別人的。」

但是她卻很認真說：我那侄女兒，人雖然有點胖，但是體力極好，人也能幹，今天我已經將她約到我的家裡，你們見見面。」她這番熱心很難拒絕。

天色漸漸地昏暗下來，將到梅雨村，那些在河彎裡的大小被綠茵環抱的村落，在暮色中升起了嫋嫋青煙。走過草坪，沿著一條青石板路再往下走，便是村莊的地界了，這地方，我們每年挑草都來過。

她把兩個一同放牧的孩子叫過來，吩咐他們繼續向前，把羊關進公社的羊圈後，一定要上鎖。

關照完畢領著我向一條青石板路走去。石板路被大樹覆蓋著，十分的涼爽，幾隻蜜蜂嗡嗡作鳴，平添了矮牆茅舍裡的安靜和祥和。「文革」的烽火沒能燒著它。

大約快九點鐘了，天色已經很黑，經過的園子裡傳來挖土的聲音和人聲。詹大媽告訴過我，現在土地包產到戶了，家家戶戶都起早貪黑的。

如此走過了十幾家人家，在一段半截泥牆和一幅柳條編的小門前停了下來，詹大媽向門裡邊呼喚著她的兩個小孫子，兩個孩子蹦蹦跳跳著從裡面跑出來，一見他們的奶奶把老師請來了，立刻迎上來打開柳條門，很有禮貌的喊了一聲：「老師，請進屋裡坐。」

我跨進柳門，只聽見一陣陣蜜蜂的朝王聲，那大約只有三尺寬的屋簷下，整齊放著六、七個蜂桶，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村婦女，正戴著用白紗布做的防蜂帽，在一個蜂桶裡舀蜜。我才明白詹大媽送給我的蜂蜜，都是自家採集的。

從柳條門到「堂屋」，大約十五公尺長的石板小路兩旁，長著茂盛的蔬菜瓜果。走完石板路跨進大門進入堂屋，迎面就是一個留著草木灰的火炕。這是山區百姓人家家家都有的取暖設施，每逢夏天，落雨後天氣很冷，主人引燃火炕裡的樹根疙瘩，一家人圍著火炕取暖烘乾被打濕的衣服。

「神龕」上留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堂屋中間除了一張木方桌和四條長板凳外，屋角裡放著一些還沒有來得及收拾的農具和幾個老樹根，川西地區的貧苦人家大致都是這樣。

詹大媽進門摘下她的帆布碗袋和蓑衣，一面招呼我坐下。這時一位四十歲上下的男子從裡屋走了出來，大媽向我介紹，這是她的當生產隊長的大兒子，我每天上課所教的兩個孩子便是他的兒子。

大媽把兒子叫到一邊，在他的耳邊吩咐了幾句話後，他便出門去了。兩個孩子正在裡屋完成他們的作業，大媽也去灶房里弄飯去了。

我跨進了孩子做作業的房間，那屋子裡除了一個糧食櫃，兩張古式的木床和舊木櫃外就再無別的家俱了。看來這位平時為人慷慨的大媽家裡實在很貧寒。在那個年代，農村人一家人能有幾間土瓦房和自留宅園，賺一個溫飽，便是很富足的人家了。

這時天色黑盡，採蜂糖的女主人收了白面紗，脫下防蜂帽和手套走了進來，去灶房換下詹大媽。大媽便端著剛泡開的一杯茶，走進了堂屋遞給我，介紹說：「鄉下人喝茶全是自己種的。」我恭敬的端在手裡呷了一口，那茶是甜的。

她坐在我的面前，向我聊起了農村的熱門話，她說，土地包下來後，今年她在承包土裡收的玉米，比往年從公社分的糧食增加了兩倍，現在一家人的口糧不愁了，還可以用來餵豬。說著她興致勃勃地領我去參觀她家新修

的豬圈。裡面餵著一大一小的兩個豬。

她指著那大架子豬說，今年的過年豬有了，到時候殺過年豬時，你無論如何都要來吃我們的「刨湯豬」。緊靠豬圈，是用竹篾圍成的雞圈，到了下半年她打算餵幾十個雞。

看來農民沒有從毛澤東的人民公社裡得到溫飽，這些年農民們總算吃盡了苦頭，這個大救星帶給他們災荒飢餓的苦果，到頭來還得靠自己的雙手，依靠自己的勤勞才得解脫。

詹老大出門足足過了一個小時才回來。不過他並沒有請來詹大媽要他去請的客人，說：「今晚農機站不湊巧，臨時加班，預先沒同人家約好，所以只好改期了。」

說罷便從懷裡摸出了一張兩寸照片遞給了我，說是姨妹托他將照片帶給我，當時鹽源的相館還沒有彩色照片，我接過那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個標準的村姑打扮，穿著白色印花的襯衫，胖胖的臉蛋旁垂著兩根又粗又短的黑辮子，腳旁放著一個花籃，背井和畫面並不十分協調，但她那種青春活力的氣息散發出一種誘人的光彩。

「怎麼樣？大娘隨即向我發問道，我用點頭和微笑來表達我的模稜兩可，那絕決不是因為我的眼界太高，恰恰相反，脫離生活太久了，在我重新回到生活中來時，那種拿不定主意的心情使我有一種身不由己的感覺。

正是「殘雪暗隨冰筍滴，新春偷向柳梢歸，可憐鬢髮蹉跎老，每惜梅花取次稀。」（北宋—張耒）

大媽已將豐盛的晚餐放到堂屋的桌上，自從一九六二年我從重慶監獄流放西昌，至今整整十七年了，除了幾次在甘洛，黃聯關用衣服換糧食，應邀到農家正式作客還是第一次。

同詹大媽一家圍著方桌共進晚餐時，我像一顆乾渴多年的老樹，沐浴著這個溫馨家庭的甘霖。而今我已四十多歲了，來到這個家庭裡，有一種說不出的陌生，對著面前的菜餚出神。細心的詹大媽觀察到我的哀傷，不斷為我夾菜，用寬慰話分散我的注意力。

那一夜，我十一點鐘才離開詹大媽家，我的兩個學生打著手電筒一直把我送到五號山樑子六隊的地界上。我踏著深夜露水初降的草地，藉著下弦月灑下的銀光，獨自回到了我的莊稼棚裡，老吳也剛從農場場部看完電影歸來，大約已是深夜十二點了。

這一夜我躺在床上想，我正面臨一個重大的轉捩點。

回重慶後，我以怎樣的身份踏入社會：五類？准五類？獲平反者，還是被政策施捨的人？社會會以怎樣的方式接納我？我又怎樣立足在現實中？在陌生中怎麼找到自己的位置，建立新的社會關係？

詹大媽的話和她的關懷又一次重現眼前，母親寄來的那張照片，以及大媽拿給我的照片一齊都閃在我的腦中，人真是非常微妙，二十年監獄裡想都不敢想的事，現在突然擺到我的面前，要我面對，要我選擇。

然而，我不能在當局流放我的地方安家，這算是我對命運的抗爭吧！上午那老頭「審案」的對話，老頭的戲謔和官腔令我厭惡，那口氣裡的施捨和恩賜令我憤怒！我在火炬中寄望的巨變並沒發生。

好像我仍生活在以往一樣的環境中，使我對即將踏入的地方產生疑慮，那不是鮮花佈滿的美好世界，興許又是一個隱約的陷阱。對前景茫茫未知的擔憂油然而湧向我的心頭。

### （三）飛起來吃人

幾天後，隊長再次派張清富來莊稼棚裡喊我回隊部「傳訊」，這次是重大專案組的復審，也是終審。出我的意外，上次提訊的主角沒有在場，坐在辦公桌後面的那一位在第一次預審中的書記員。

「我姓崔，是重慶大學保衛處的。」年輕人自我介紹道，口氣很和藹，「這次重大保衛處專程派鄭老師和我來這裡是對您的右派，和一九六〇年的「反革命」一案，重新調查審理。為了弄清幾個關鍵的疑點，上次請您寫的材料寫好了嗎？」

估計他才從政法學院畢業，對共產黨那套還不熟悉，我從上衣口袋裡掏出兩張昨天寫好，應付鄭老頭的「待查材料」交給他。

他將材料接過手，看了兩遍便夾在一個卷宗裡放進了公事包。沉吟片刻，又問了一些當年反右派的細節，以及叢林集中地另外的幾名同學。最後問到我的家庭情況後就結束了整個的「復審」。

其實連這次「復查」都完全多餘，事情擺了二十年，不會變質，一切都看「共產黨」怎麼作弄我了！

重慶大學的調案人員是什麼時候走的，我並不知道。離最後一次問案大約五天後的中午，我從看莊稼的棚子回伙食團取飯時，胖胖的馬事務長站在籃球場壩子中間，高聲把我叫住，一邊從懷裡取出一封信遞給我，「諾，這是你們學校那個姓鄭的老頭臨走時托我轉交給你的。」

馬事務長向來講話聲如洪鐘，且多幽默，大家都叫他馬大炮。當我從他的手裡接過那封信時，聽他解嘲似的吼道「你算有本事，鬧了二十年，居然把案子鬧翻了，不過不是鄧爺爺，你一輩子都難翻身。」

我看那信封印著重慶大學四個紅字，心中一愣，這鄭老頭何必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的「公務」呢？難道還有什麼要用「書面的審問」才可以弄清的嗎？

我拿過信，並沒有扯開它便轉身離去。

「噢，還有」馬大炮繼續站在那裡向我喊道：「那姓鄭的再三關照，要你回重慶後，先要到重大保衛處去一趟，因為，關於你落實政策的事全由他們負責，他們要向你交代待有關的政策。」

我心中一怔，難道這裡面裝的就是正式的平反通知？於是把信揣在懷中，快步的提著飯籃子沿著小路向山樑的看守棚走去。

回到棚中顧不上吃飯，便急忙把信拆開讀了起來：「孔令平同學」那信箋上抬頭的稱呼，已與我相違了二十三年！。

繼續往下讀去：「這次我們專程從千里外來到西昌鹽源為你落實政策，通過我們大量艱苦細緻的調查，終於才基本上查清了你的問題。」

讀到這裡，一種感激的衝動湧上了我的心頭，但不知為什麼，我始終對那鄭老頭產生不出任何的「報恩」情來。他的信與他的提審竟如此不同，令我困惑，繼續地往下讀：

「現在我們已完成任務回重慶了，因為聽說西昌一帶盛產蜂糖，核桃和大白瓜子，本打算順路帶些回去，但因為從重慶來的時候走得太急，帶的錢不夠，現在隨身攜帶的錢只夠作回去的路費，經與你們馬事務長商量，請他能為我代購蜂糖十斤，核桃十斤，大白瓜子十斤。所用的錢，他答應暫時為我墊一下，我回重慶設法給他寄來，請你在回重慶時能順便將這些東西帶回，在重大保衛處面交給我。」落款處寫著鄭樹勳的大名，時間是一九七九年七月。

讀完此信，心中一沉，剛讀信時冒出來的感激之情，頓時被後面這段文字像一盆髒水潑熄，想到十天前坐在「法堂」上提審時，他那施捨和盛氣凌人，使我噁心。那正是：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一班齷齪堂構相承。」封建時代，權臣弄權，使朝綱敗壞，惡吏猖獗，冤獄叢生。往往貪官污吏藉著冤獄的塗毒，對無辜者趁人之危敲詐勒索，「竹槓好敲受冤人。」「衙門八面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就連普通獄卒也用得滾瓜爛熟。

清朝末年，冤獄氾濫，近百年中國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大清王朝被民主革命所推翻，究其原因，猖獗的冤獄和腐敗的吏治是一種催化劑。

中共奪取政權後，毛氏二十八年統治，被民主革命浪潮卷沒的各種沉渣，以空前速度重新泛起，其數量之多，情節之荒唐，比前清末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冤案配上「解放人類」、「光明磊落」、「革命」、「有錯必糾」這些漂亮外衣，打扮得說不上來的醜惡！

它不但演唱了中共統治的老底！更向世人昭示，「革命」和「改造」怎樣掩蓋獨裁專制的地獄黑幕！而我不但親身經歷了這個地獄的全過程，臨到收場時，還要親身領受一下，共產專制的惡吏「敲詐勒索」是怎麼回事？雖然演員的扮相太令人噁心。



其實這鄭老頭說來也夠愚蠢，勒索的東西如此低微，既不是黃金白銀綾羅綢

段，竟是區區十斤大瓜子、十斤核桃、十斤蜂糖。其價值之低微創勒索之「記錄」！所用的障眼法更令人可笑，需知那馬大炮雖與鄭老頭「同朝為官」，可素不相識，憑什麼要為鄭老頭去墊錢購買？鄭老頭的真實意圖從這封信裡已一目了然，對他初審時的一本正經全都戳穿了。

就是在大清末年，吏治腐敗的慈禧時期，這索賄的事一經老佛爺查到，「怪責下來」，也要對索賄人依律嚴辦的，輕則丟官、重則丟命。再愚蠢的「官」都不至於貪財亡命到連後果都不顧的。

索賄也得講技巧，一般都授意下屬，擺設陷阱，使受害人就範而巧取之。絕決犯不著為三十斤山貨留給被索者以書面把柄。

要麼這鄭老頭實在配不上官場老手，要麼索賄已成「無產階級」專政合法之風，被索者就是去告官也奈何不得。不過這種煞似小流氓對小百姓的勒索，竟玩到我這種重刑犯頭上，也太輕視了二十年改造的功力！

把我這種當局視為頑梗不化的反改造尖子，交給如此平庸的老流氓審理，真是對我莫大的渺視。原判如此粗俗已夠鬧笑話，複判又如此兒戲，可悲的政治犯在草菅人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死亡大半，還要對其倖存者任意猥褻，只有在中共獨裁統治下才會發生！！

好在當局嚴密封鎖著新聞媒體，使得像這樣的醜聞被死死捂住，否則就憑這大量官場腐敗拿來公開曝光，這個政府早已是干手所指，難以維持下去了。唉！新聞封鎖對於保護中國黑暗的專制統治真是太重要了啊！

好在，我已習慣了忍耐，對於殘暴和腐敗的中共各級官吏，既已認識清楚，中共的嚴刑峻法會在監獄中輕易打死瘋子，像劉康雲、劉志和等因說胡話可以拉出來槍斃，甚至像那癩子可以關起來亂棒打死，在我頭腦裡烙下的「暴政」烙印太深，難以忘懷。

至於官員走後門，公開索賄行賄，因媒體被嚴加封鎖，所知甚少，現在總算親身經歷到了。

向一個一無所有的政治犯索賄，在現今民主國家裡是不可思議的。這鄭老頭所以公開索賄，仍因官場腐敗到了無可顧忌的程度了。

可我還必須清醒地面對現實，因為平反回重慶後，我首先得找工作，尋生活的基本條件。而今後工作的安排，待遇的高低，還不憑這老滑頭簽字的「鑑定」意見？倘若順他的意願，安排一個好工作，多拿的待遇補上這三十斤山貨，算得了什麼？

怪不得當時回校落實政策的同學都帶著「貢品」，先拜「落實政策」的菩薩。敞若在這個問題上不通竅，慢待了菩薩，意味在新生活開始，就給自己今後設下了坎坷，難道我二十多年還沒受夠麼？

這麼一想真還不敢得罪這鄭爺，想我死裡逃生撞過了重重牢獄關，今天自己的命運還操縱在這鄭老頭手裡？不禁悲從心來。

要不乾脆先發制人，把這封信往上交，告倒這老惡棍，從他的手裡奪回今後命運的操縱權，興許是上策，但轉而一想，我的舊案子還沒翻過來，現在政策還沒落實，反把落實政策的人告了一狀，這連環狀子又怎麼了結？

何況現在我所依憑的，僅是鄭樹勳托馬大炮帶給我的信，這封信並不足以證明鄭老頭勒索的證據，這種共產黨內污七八糟的事，也只能「查無實據」了！

包公已死快一千年了，今日以說假話和諂媚為能事的官場中，那有斷奇案的清官生存餘地？清官也成右派或右傾份子了。既然黑白不分，積重難返，真告官又搬不倒，豈不是引火自焚？當然我憑著這二十年練出來的「橫勁」也不怕誰了，但畢竟已過四十歲，還有多少精力能在訴訟裡打一輩子滾？

不過細算三十斤山貨，在那個年代都屬一類統購物資，市場上是憑票供應的，沒有票是看都看不到的。若論黑市，以蜂糖每斤三十元計，十斤蜂糖就要三百元才能買到，核桃也差不多就這個價，三十斤山貨備齊非一千元人民幣。

對每個月僅兩元錢的赤貧奴隸，則要足足服刑四十年才能湊足，也許落實政策會領到一筆安家費，就用這筆安家的款子全用來買鄭樹勳所索要的「見面禮」，帶上這沉重的三十斤，遠涉千餘公里，乘了汽車換火車，就把獄中的破衣爛裳和被蓋全扔掉，還不知怎樣將它們運回重慶，當面交給鄭老頭！

想到這裡，便對這個面目猙獰的鄭老頭子好生痛恨。這一夜我翻來覆去的睡不著，直到了天亮了，還沒有想出一個應對的良策，思來想去，不如把這封馬大炮交給我的信，又奉還給他看，看他讀後，有什麼高招？

馬大炮畢竟是中共獄吏圈子裡的人，興許能說清這信裡的內幕，拿得出一個比較周密的應對方法。

於是一大早我便去隊部找他，那時他正在食堂裡用早餐，從我手裡接過那信箋讀罷便淡淡一笑。邊搖著頭嘆息道：「這幫人也夠厲害的，飛起來吃人，吃人還不吐骨頭。」

這真是局內人看局內人，看得多了便真了、深了。中共政府機關這種勾當，他已見慣不驚了，「飛起來吃人」可謂對公檢法真實的寫照，不但吃人不吐骨頭，而且連骨頭毛髮都要吃淨，我被他們關起來吃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僥倖生還，還嫌沒吃夠，追著還要再咬我一口。

馬幹事既如此評價，我便說道，「馬幹事你是知道的，我整整服刑二十年，除了破衣爛裳一無所有，那裡拿得出這筆錢來進貢？再說回重慶交通不便，路又那麼遠，要我馱三十斤貨回重慶，不是要我的命麼？那重慶來人我又不敢得罪他，我該怎麼辦？」

他瞪了我一眼，站起身來在廚房前的壩子裡來回踱了兩圈，回到屋裡向我說道：「你只當不知道這封信，信沒有直接交給你，而是交給我的，回重慶照樣去看他，因為你今後的工作要他經手安排，所以你千萬不能得罪他，如果你見到他時，他什麼也沒問就只當一切都沒有發生，倘若他真要問你這件事，你就一口咬定，沒有接到我轉給你的信，明白嗎？」

看來只有裝糊塗了，有時處理棘手的事，還真是「難得糊塗」好。

眼下只好如此而行，至於這姓鄭的在我今後的工作上作什麼手腳，也只好聽天由命了。這是我即將出獄時，遇到對飢餓行為裝作什麼也沒聽見，什麼也沒看見的第一例。像我這種直性子人，心裡有說不出的彆扭。

後來我才明白社會上這種事太多了。見死不救，見人被搶劫或遭侮辱而裝聾作瞎，見邪惡也要逃避，大概成了中共統治下的一種社會風氣。

雖然如此，但鄭老頭這封信，卻在我內心蒙上了一層陰影。在我面對著即將開始的生活，就有一種朦朧的感覺：在中共統治下，未來是一個用新方式人吃人的社會，是的，我被從政治犯的人肉筵席上撤下來，又被裝進另一盤子裡，端到另一桌筵席上任人「品食」。

命運注註定我這輩子是被人吃的命。

#### 第四節：如此恢復自由

九月五日上午，七點鐘，當我回廚房取早飯時，在鐵門邊童幹事叫住了我，說「接場部通知，要你上午九點鐘去辦公大樓管教科辦公室，有重要的事向你宣佈」。

掐指算來，從64年黃聯關到鹽源至今，我已在這裡渡過了十六個年頭了。蘇武牧羊十八載，而我雖不能自比蘇武，但不屈不撓同當局抗爭卻有共同的地方。

十五年來，到管教科辦公室僅只有兩次，第一次便是64年九月，我從古柏押過來那天進過那裡，隨即被鄧揚光帶進了臨時反省室。在那裡同陳力一道渡過一年多小監生活；第二次，便是65年十月十日，我和陳力進行聯合絕食鬥爭，高德勝派人把我背到了這裡。

兩次來這裡都記載著難忘的事件，甚至可說是人生的轉捩點。這一次我心中明白，平反雷聲響過多時，該是下雨的時候了。

但是經過這麼長的反覆觀察，看到鄭樹勳對冤案當事人的「恩賜」付帶勒索，看到獄方那種穩若泰山的樣子，預感到未來遠不樂觀。

所以此刻我毫無興奮之感。反而平靜地思考這鄧揚光如何來見我？我如何來應對這根打了我十六年的黨棍。

吃過早飯，整理了一下衣服，便延著那條通向場部的小路緩緩向那裡走去。過了小木橋，繞過就業人員的窩棚區，走到圍著蘋果園的圍牆，使我想起了孫明權。那圍牆已經粉刷過好幾遍了，可怎麼也刷不掉那隱約的血痕。

深藏在果林中的黃色辦公大樓，已重新拆建，淹沒在鄰近十幾幢四層樓房中。那裡興建的場部食堂，學校，商場圍成了一個小小的城堡。走到場部的大門卻是又一番世界，原先是「河灘」的地方，已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商業街。

還記得，今年五月送大炳回原籍時來過這裡，那時兩個推土機正在平地基，當時並不知道，這裡平出來是幹什麼的。

想不到短短半年，這裡便完全建成了另一個世界，剛剛鋪好的三合土街道兩旁，新建起了好幾幢一樓一底瓦房，領先形成的一些店鋪已開始營業。

我緩緩走過小街，看清那些剛開張小店的主人，似曾相識，他們都是多年與我同難的流放人，只是向我打招呼的人，我卻叫不出他們的名字。

當我跨進黃樓裡的管教科辦公室大門時，壁上的時鐘指著十點鐘，我到農場十五年裡是第三次跨進來，雖然從形式上講，我將獲得同鄧揚光相平等的身份，但我明白，此刻我還是他菜板上的肉。

但我有一種沒被征服的奴隸重新站起來的自強感，至少心理上我是強者，我在路上想了一大堆與他見面時奉送他的話，請他們把中央文件拿給我看，並一條一款算好我的損失該怎麼補來？

從道義講，鄧揚光和多年使盡慘無人道手段的獄吏們，就是跪在我們面前，任我們唾罵也不過份！當然，我明白這些毛澤東起用的惡棍，不過是一些毫無靈魂的工具，昨天準備在絞刑架上處決我們，今天卻可以若無其事的向我解釋他們當時的無奈。！

心裡正準備見到鄧揚光如何講話時，一些年輕人從裡面走了出來，這些人我從來沒見過，心裡掠過一層疑慮，好像過去那些打罵我的人全都回避起來，換上另一批新面孔。

鄧揚光沒有現身，這使我原先準備好的那些話，只好暫放一邊。

一個年輕人接待了我，我跟著他跨進了辦公室，裡面坐著幾位這次落實政策的人。他招呼我在一張辦公桌前坐下後，詢問了我一些生活的近況，然後在他面前的一疊文件中翻找了一陣，從裡面拿出一份來遞給我，一面對我說道：

「你一九六七年加刑兩年的案件，經我場管教科上報後，又經鹽源縣法院復查，根據現在政策，對你重新進行了改正判決，這就是改判書，請你過目並簽字。」

我接過那張紙，這是一份由鹽源縣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裁定書，編號為鹽刑複（79）第100號，其全文如下：

「被告孔令平，男，現年41歲，偽官吏出身，學生成份，江蘇鹽城縣人，大學文化程度。六〇年六月因反革命罪經重慶市南桐礦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67年又因反革命罪經鹽源縣人民法院加刑兩年，合併原判共執行二十年，孔犯對加刑兩年並無異議，但根據黨的政策（而不是法律——作者），我院仍對其加刑兩年的主要事實進行了復查，經復查認為，孔犯在改造期中，以寫書面彙報和改造總結的形式，向政府公開闡述他個人對國家政治生活，對黨的方針政策的觀點和認識的大量文章材料，不是出於推翻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這些材料中有的認識是對的，有的認識屬嚴重政治性錯誤，是教育問題不應成為反革命罪行，給與加刑處理。現重新裁定如下：一，撤銷鹽源縣人民法院（67）刑法字第三十九之判決，二，宣告無罪。

鹽源縣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看了這一紙判決，使我想到十三年前，我在農三隊宣判的萬人大會上，公開聲明的情節，鄧揚光氣急敗壞當場為我上了反銬。

從此開始，我一步一個腳印走到今天，這十三年中，不顧多麼危險，向毛澤東獨裁拚拼死一搏。我們舉起了反抗迫害的「火炬」，我們中最優秀的戰友倒下了，但我們終於活到了今天，冤獄垮了，中共自己否定了自己！

對我個人，面對這一紙判決，面對相同的事實，所作的兩個截然相反結論，這種由同一個法院出具的認定和否定的結論，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經不起我一駁，說法院是被人捏在手中的玩具，確是恰如其份，現將原文抄錄於後，也一併公諸在此：

鹽源彝族自治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69）法刑字第39號文

公訴機關：鹽源彝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孔令平，男、現年29歲，家庭出身偽官史（錯字），本人成份學生，大學文化程度，現押鹽源農場勞改：上列被告，因反革命一案經本院審理查明：

孔令平，於一九五七年整風之機，猖狂進攻被劃為右派，58年送農村監督勞動，又大肆進行反革命活動，一九六〇年八月經重慶市南岸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待刑十八年。判刑後，仍繼續堅持反革命立場，一貫拒不認罪，多次無理申訴，66年六月三十日在犯人中惡毒誣衊毛主席著作，漫罵我們偉大毛主席和黨的領導，又66年六月在學習會上明目張膽地攻擊我文化大革命，並經常惡毒的誣衊我社會主義制度，蓄意攻擊我三面紅旗「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搞早了……同時還煽動鬧監，呼喊反動口號，辱罵我幹部、武裝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

查孔令平頑固堅持反革命立場，一貫不認罪服法，抗拒改造，敵視我黨和政府，攻擊誣衊我偉大領袖，攻擊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審理中孔犯供認不諱，本院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加強對罪犯的改造，依法與以懲處，特判決如下：

對孔令平加判有期徒刑二年，合併原判為二十年，刑期自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二日起至1980年三月11日此，如不服本判決，可於接到判決的第二天起十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及付本，上訴於西昌地區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員：劉延仁，書記員刁燦明

一九六六年四月18日

判決書錯別字連篇，這原是文革的文風，不足奇怪，暫且不說。毛澤東在世，因攻擊他的禍國殃民政策，而慘遭冤獄者千千萬萬，甚至因一句話，一張畫像，一張標語的筆誤而犯了忌諱，遭害者比比皆是，我不過是其中之一例。

不過他死後，中共後繼者對罹難者只走了一個「平反」過場，毛澤東說是「路線鬥爭」，鄧小平說是「有錯必糾」，捉鬼放鬼拿百姓作犧牲品，拿百姓生命當「政治需要」，玩給百姓看！這裡除暴露獨裁者草菅人命；自相矛盾和自欺欺人外，還說明它沒有任何政見，既無信仰和理想，也無法律和信義！真是無法無天。

對我個人，從一九六六年四月18日加刑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平反，中間經歷了十四年，對同一事件作兩個截然不同的結論，其根據不是法律，而是「黨的政策」，而政策是誰當權，誰就說了算數，雖總體上都一脈相承。例如無論宣判還是平反，一律稱被害人為「孔犯」，這種獨裁專權目無法紀的政體，無論是鄧小平還是毛澤東本質上是一樣的。

所以中共獨裁政權若不改變，暴政就會重新捲土重來。

眼下能告慰倖存者的，無非是我們等到了把牢底座穿的時候，我們今後可以不戴「勞改釋放犯」的帽子，在刑滿以後得到一個公民的稱謂罷了。

加刑會上我當著一萬人的面公開表態，「自從我選定我的政治道路後，我從來沒有回過頭，今後也不會回頭。」那是同專制復辟鬥到底的決心。

若按「惡毒攻訐誣衊毛主席著作……同時還煽動鬧監，呼喊反動口號，辱罵我幹部和武器，反革命氣炎極為器張」，在那時已夠判死刑的標準。

毛澤東開創了中共一黨獨裁。代替法律定罪的是是一大堆由政策制定的帽子，扣上這些帽子就定下死罪。四人幫被打倒，給他們戴上的帽子依然毫無法律依劇，這些毫無公認的條款，鄧小平只換了一個說法，說那是極左。

現在對我的『重新裁定』中用：「該犯主觀上並沒有××云云。」不過在玩弄詞藻而已，中共依然保持「無法無天」。所以就是平反我仍將被人擺弄，距離光明正大，依法論處的到來，還有一大段距離。

但無論怎麼說，我的反抗換來『重新裁定，』證明歷史向前進了一步。最重要的是，踩在最底層的五類份子帽子一風吹了。由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作國家生活的最高原則，換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

毛澤東頑固推行階級鬥爭的禍國方針被取消了。

當我將這一張「平反書」折析疊好，放進了上衣口袋，那年輕人囑咐我本月下旬，就來管教科辦理離場手續。這麼說來，我幾天之後就可以踏上回歸重慶的路了，而按我原判十八年的徒刑，我已超過了服刑時間，我的監獄生涯在中共建政三十周年才結束了。

阿彌陀佛，我在回到重慶後，還將領到第二張獲得重慶法院的「改正「通知書」，以及重慶大學的改正右派、「恢復學籍」兩張『紙』。雖然這些通知書如同廢紙，除了證明為了政治需要，中共對一個無辜學生無緣無故作弄外，還能說明什麼？可惜今天我卻沒有看到當年宣判我的原凶，使我準備好的話沒有宣洩的機會。

從黃樓出來回歸的路上，碰到的就業人員向我爭相詢問。

其實這半年來，相繼都有人獲釋，但我的獲釋特別引人注目，這也許是我多年來是這裡同當局「以卵擊石」的代表，處於絕對弱勢的我，曾在毛澤東最顯赫時代被數次被申報死刑。現在能站立起來走出監獄，無論對獄方還是對我的同難都會產生強烈的反應。

我的同難們會從我的平反看到政治氣候變化了，無產階級專政在他們心中長期沉甸下來的畏懼消弭了；對暴力壓迫缺乏必勝信心的人，都會堅定他們反抗壓迫的信念。當然我能親眼看到不可一世的毛澤東這麼快隨著他的歸天，結束了他所開創的暴政時代！是我最高興的。

但我不是勝利者而只是倖存者，中國今後的路還長。

那天晚上，我在棚子裡久不能寐，回想起陳力、張錫錕、皮天明就埋葬在四號樑子上面朝二道溝的懸岩邊。在守莊稼這段日子，我常去那裡憑弔他們，至於劉順森的遺骨還不知道留在鹽源城下的那個地方？

今天我只能坐在四號梁的山包上靜聽風的呼嘯，好像在聆聽他們從天堂喊出的聲音，他們被猶大出賣，今天真正復活了。

他們活在我們心中，活在這個邊荒農場的一萬名流放者的心中，他們的傲骨使我想起戊戌變法的譚嗣同，臨刑前在前清陰暗的牢房裡，雋刻出流傳百世的不朽詩篇：「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倫」。此刻又響在我的耳際。

再傳大的人物也不能靠個人的力量扭轉乾坤，所有為民主事業而鬥爭的人不僅憑的是：「海枯石爛乾坤滅，無為瓦全寧玉折」的勇力，更需要對世界潮流和對人類未來的信念。

想到一九六六年四月18日加刑以後的十三年中，死神天天在我的身邊轉悠，從我的身邊拖走了最有骨氣的同難：那時壓根就沒想到，會由中共同一法庭來對這些判決進行推翻、為我和犧牲的人們——進行平反。

中共內部的分裂，顯示出了它滅亡的第一走，張錫錕臨犧牲的預言，僅僅三年就開始實現。他說：「我看到你們的衰亡，但遺憾的是沒有看到你們的滅亡！」

如果說眼下我們得到平反表示中國專制力量向民主勢力「讓步」，那是因為毛澤東做得太反動，太不得人心，連中共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平反僅僅是緩和一下國內太激烈的矛盾，也是為今後開始以建設為中心的道路作鋪墊，為挽救瀕臨破產，國庫空虛的國民經濟注射強心針而已。

令人擔憂的是人民還處在沉睡中，需知中國社會全靠人民去推動和改變。而人民在沉重的災難下中保持安份守己的狀態，中國的自救何時成功？毛澤東長期對輿論封鎖使老百姓不敢想，不敢說，老百姓失去了進取的動力，變得老邁古板，便是中國的絕症。

眼下這種自上而下的糾正冤假錯案，卻不能撕開這個無產階級專政鐵幕下的種種黑暗，甚至於還產生像鄭樹勳這種公開以施捨者的身分，堂而皇之向平反者索取賄賂的怪事，豈不令人擔心？！

如果無辜者在冤獄中不明不白的死去，而不問其原因；如果幾千萬老百姓活活餓死不被清算；執政黨在國家大政方針上繼續出賣民族利益，那麼這獨裁的毒瘤，會在中國的肌體上生長，並在一定條件下惡化。

新的野心家操縱國家權力，換上了新的外衣。而舊病復發時，再出現一次社會的動亂並不是一件聳人聽聞的事！我們二十多年坐監，豈不冤枉？人民這麼多年吃的苦豈不是白吃了麼？

## 第五節：在鹽源的最後兩天

想到兩天後，我將要離開這裡，便想同多年共患難的人們敘別。只可惜，當年發配來的人，這些年來犧牲的犧牲，他調的他調。同他們中已故的人只能在墳上「話別」了。

聽說賴開明還在副業隊，還聽說高自新和金梅也在那裡，而且副業隊距離我們不到十裡，來去兩小時，同時，在從副業隊轉回時，可以去醫院，然後去農一隊看看那裡還有哪些故交，於是我決定第二天便去副業隊。

副業隊剛剛成立兩年，原先這兒是利用牛羊皮毛作原料，專門製作皮革製品的一個手工工廠。從南充監獄調來的人中，有相當部份是做皮鞋和皮衣的工人，而今成為這裡的技術骨幹，後來將各農業中隊和基建隊的殘疾人調來進行了充實，建成了這個中隊。

這一天早晨八點鐘出發，九點鐘到了這裡。新建的圍牆裡面樹林繁茂，進門口的幾棵大黃桷樹，綠茵把它遮蓋得十分涼爽。這兒靠梅雨鎮，頗有些山清水秀的風味。

裡面已建成了兩個車間，一個皮鞋車間，那裡面陰暗潮濕，一股濃烈的香樵水氣味撲鼻而來，幾十名就業人員，忙著排料、制楦、下底、縫紮、上漆；另一個車間是皮衣車間，裡面十幾台縫紉機上堆著滿滿的成衣或半成品。另外還有一個房間是專供兩個車間用料的鞣制場。

走進皮鞋車間，我很快就認出了從六隊調過來的人，他們都是十五年前從南充監獄經過死緩改判後調來的。我與他們多年相處，知道他們的底細，這些人在進監前，是普通的農民，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多半因飢餓逼上了殺人之路。

當年他們由死緩改判後，因為刑期都是二十年的「重刑犯」，來時便編到六隊。到六隊後逐漸認識陷他們於絕境的是誰？成為我們的同情者。

### （一）走狗懺悔

十幾年來，從南充改判來的人因為俯首為奴，被認為是放心的勞動力，所以刑期未滿為充實副業隊，便調到這裡成為第一批副業隊的勞力骨幹。

見我走進來，他們都放下手中的活，站起來同我握手問好。最裡面的地方站起一個人來，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從我身上撈取了資本，獲得提前釋放的馬文華。

十年前，周學祝因涉嫌偷聽隊部開會，當場被徐世奎宣佈取消值班員，重新指派他接替周學祝，搬到周的鋪位上，成了我的緊鄰和新的專職「監督人」。

記得他從南充監獄調來六隊時，操一口很濃的廣東話，帶著口吃，身穿黃馬褂。知道他原是共產黨員，在部隊是一名上尉軍官，後來被西藏軍事法庭以『叛國罪』處以無期徒刑，如果他真看清了中共內部黑暗，毅然投奔光明，我們會刮目相看，以禮相待。

可沒想到他一到六隊後，原形畢露，在鬥爭會上充當何慶雲組織的打手班子，在各種場合下充當維持會的會長，經常聽到他訓斥被老管打得遍體鱗傷的奴隸。自從何慶雲選中他睡在我身邊，我平時的一言一行就很快的

傳到何慶雲耳中。

有一次在出工時，一本他遺忘在鋪上的「告密記事本」被我無意中拾到，那上面一條一款記載著我的「反改造」言行，時間地點和人證。

這種特務動作，在六隊並不常見，因為殘酷的役使和飢寒交迫的生活，使流放者基本上與六隊管教人員抱敵對心態，「告密」一直被認為是最無恥的行為。像陳賢士這樣的出名人物，也是抓著重大線索告密，不屑對牢騷話作記錄的。

那次在農六隊召開對蔣正君等的死刑宣判會上，鄧揚光宣佈對他減刑八年，到一九七五年便提前釋放了。是不是還有原判對他量刑上過重的原因，我不得而知。

監獄中的「政治犯」是五花八門的，不過我想，他若早知進了勞改隊才後悔，何必當初走到「叛國」絕境去？

記得中學時代，從課文、小說、電影所看到的，被稱為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產黨員簡直完美無缺，嚴然聖者的形象。幾乎所有描寫與「國民黨匪徒」的智鬥，周旋而不昧，或在被捕後，經嚴刑拷打而不屈，「視死如歸」的無畏氣概曾使我「感動不已」，所以對「共產黨員」產生過「敬仰」。

然而被神化的形象與生活中真實的黨員一比較，他們的自私狹隘，勾心鬥角，玩弄權術為平常百姓所不恥，從此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極為反感。到了獄中，見到無論是鄧揚光、何慶雲、還是張魔德、張劍波、林扯高等等的「改造者」，還是淪為犯人的陳賢士和馬文華，都讓我認識「共產黨」員究竟是怎樣一批人？

與馬文華已四年不見了，現在剛一見面，過去積鬱在心中的鄙視，立即爬上了我的臉，剛要把身子轉過去，他那滿堆笑容的廣東臉已迎上來，熱情的把手伸給了我。

一代怪才李宗吾，以其名著「厚黑學」曾名噪中國處世講壇。他宣揚一種治世良方，說一個人若想事業有成，在待人接物上必須臉「厚而無形」，心「黑而無色」。他的洋洋揚揚百萬字論述，就是把「臉厚、心黑」作為人的修養目標。

能做到厚而無形、黑而無色，便是進入了處世的最高境界，不過市俗中平常百姓，能為某種事業的成功，變臉於瞬間，處險惡的世事應付自如，能夠心不跳的人並不多。

此乃在舞臺上成功的必備條件，裝腔作勢，心裡早有了主意，等到別人相信對方的善意時，其實他心裡卻恨得你咬牙切齒，有了整治你的計謀，想把你一口吞掉。你能鬥得贏他麼？像我這樣的兩個回合三句話沒講完，便把真東西抖了出來，那有不輸之理？

此刻面對他的笑臉和胖胖的手，我還來不及思考該如何對陣時，自己的手已被對方緊緊攥住，身不由己被他攔進了他的宿舍裡。這一舉動立刻讓我想起六年前在鬥爭會上，他那獐獍的臉和那本密密麻麻的「告密記事」。

不禁想，難道我這有力的肩頭將他提前墊出了勞改隊還嫌不夠，今天又想在我身上打什麼主意？

身子邊往裡挪，心裡卻起了警惕。但轉而一想，今天我的身上，恐怕再沒有他所需要記功的材料。倒是相反，該我用尖酸刻薄的語言奚落他了，他不敢把我怎麼樣。

心裡很快平靜下去，而且有了自己的主張，且看看他今天葫蘆裡要賣什麼藥？於是我微微一笑，跨了進去坐到他的床上。

這是一間大約十平方公尺的小屋，裡面擺了四張上下鋪的鐵床，一共住著八個刑滿人員。

屋裡亮著發黃的電燈，使人感到昏暗而壓抑。一股因潮濕而泛起的霉氣迎面而來，這住房比場部蔬菜隊還要差。副業隊是就業隊之一，他們的勞動生活條件與犯人隊相比較，除了不受老管一舉一動的管束，並不見得有多大差別。

「賓、主」坐定，不一會工夫，他雙手捧著一盅泡得很濃的下關沱茶，熱情向我說：「幾年不見了，今天你是稀客，你還從來沒有到這兒來過，我正好昨天剛從鹽源托人買了幾斤新鮮羊肉，剛燉好，看在我們多年的交情，今天一定要請你喝酒。」

這種異常熱情中有沒有其他的意思？我還沒有查覺出來。常言道：「來而不往非禮也。」怎好以冷冰冰的面孔，回答對方的盛情？好在從六隊調來的人都知道過去的事。

馬文華在這裡依然是組長，大家對他的「陰陽面孔」並不陌生，也不會有人查覺出我對他的尷尬。

這時已是大約十一點鐘了，他忙著去伙食團端剛煮好的羊肉，並且拿來了兩瓶白酒。於是我站起來回應他的「盛情」，走出門外招呼所有原在六隊的人都進來，並且特別叫人請來了賴開明。

不一會十來個人圍在小屋裡，擠得滿滿的，小桌上擺著羊肉和酒，大家端起各自的酒杯，聞那酒是用酒精兌水而成的，酒勁很足。

於是我站起身來對著大家笑了笑，說道：我因為今天沒有準備，本該由我帶酒來請大家吃一個告別飯，現在不好意思，就借馬組長的酒獻給大夥，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生活順心。」說完端起酒來與大家一飲而盡。

我不會喝酒，喝了那口就停杯了，他卻自斟自飲，酒過三巡，紅雲開始布上了他那微胖的臉，話也叨嘮不絕起來。「真的，真沒想到，你現在比我強。」他喃喃的說著，把手裡的酒在我的眼前晃了晃，便向自己的嘴裡灌了下去。

「你比我強多了，我都知道了，你現在已經平反了，熬出頭了，自由了，你的前途無量，我真該好好地祝福你，而我可不如你，我還是一個勞改釋放犯，刑滿了又怎樣，提前釋放又怎樣？還得規規矩矩，到哪裡去還得請假，不批准還得上班，老婆孩子也不會來了。」

他說話斷斷續續不願結束，看來有醉意了，這很好，醉後心情也釋放了，醉後方能吐出積滯在心中的真言。他站起身來搖搖晃晃，但雙手卻緊緊抱著那盛白酒的碗，雙眼發紅。

「你醉了」，黃大力站起身來，用手按著他那端著酒碗的手，想阻止他不要再喝下去了。但是他卻將黃大力推開，搖晃了幾下身體，恢復平穩後，又給自己斟滿了一碗酒，對在坐的人吼道：

「你們知道嗎，前年我回汕頭老家，老婆改嫁了，兒子也不認我了，我告訴他們：老子提前釋放了，可那臭娘們竟說什麼，『你這輩子就休想脫掉勞改釋放犯的皮，如果跟了你這種人一輩子受人歧視，一輩子倒楣。』你們評評理，老子五十多歲了，活了一輩子到頭來成了一條無妻無子的老光棍……」

酒的力量也夠神，他的這翻自白，非借酒精之力是不能傾瀉出來的。

所有在場的沒有人說話，都在靜靜地聽他自我介紹：「真的，我真是一個糊塗蟲，年輕時候，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當兵了，還當軍官，那娘們整整比我大五歲，明明是她勾引我，鬧翻了我不幹了，就一口咬我同強巴頭人的女人勾在一起，所以軍事法庭說我同叛匪相串通，真他媽的怎麼會鬧成這樣？我糊里糊塗地栽在女人的手裡，……反正說不清了，老子也反了」

他已經滿嘴酒精氣，說話斷斷續續，聯繫不成整體，一雙手在空中猛劃著，好像又回到了當年「康巴叛亂」戰場，又好像他正同他的上司拚命，「唉，我真糊塗，你說我是文化程度不高還是怎麼回事，其實，跟著毛主席幹革命我是真心的，想不到這輩子竟栽在臭婊子手裡……」

我看著這個醉醺醺的傢伙，從他斷斷續續吐出來的酒話中，我似乎弄明白了他的底細，這是一個「兵，」一個頭腦簡單的工具，他哪裡知道，當年康巴叛亂的真相，他也許至今還不明白，女人使他走上絕路，他剛才酒話中所提到的，興許就是誘他走到今天的人吧？

看來他並沒有讀過「厚黑學」，也沒有那種臉厚而無形，心黑而無色的本領，說穿了，他不過是一個不知羞恥的無賴。

「你要原諒我……」他那發紅的眼睛直勾勾盯著我：「別人罵我說，我是踩在你身上提前釋放的，這不是宣判大會上公開的事嗎？我知道，你恨我，我那時目光只有那麼淺，做了對不起你的事，你別與我一般見識……」

醉後吐真言，看來一個人最痛苦的事，便是回憶這一生做的虧心事，這是在良心發現和處境悲慘的雙重刺激下，才會發生的，他同林扯高本屬同類人，這種人該死後下地獄。



我望著他，一邊想在中國，就出多了這種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也沒有人格的怪物，他們愚昧、輕率、唯我至上。那簡單的頭腦，恰恰是當代專制復辟狂最好利用的槍。

直到今天他腦子裡還擺脫不了忠於毛澤東，他根本不知道誰把他們帶到絕路上去，只好帶著他那花崗石頭腦，去見他崇拜的神了，而他那種損人的本能，決定了他不可能不做壞事，並且永遠不會有幡然悔悟的時候。

今天他之所以在我面前吐出真情，是因為他一直想置於死地的人，居然從獄中獲得了平反，想到當年被他踩在腳下的頑石，居然會堂堂皇皇無罪出獄了，而他還是一個刑滿釋放的老光棍，這內心深處的不平衡，才是剛才那番自白的理由。

這算我行將出獄時偶逢的奇事之一。這種當著大家面的公開道歉，說明專制主義的崇拜者是一些沒有任何信仰的人。

暴力扭曲他們的靈魂，而當暴力消失時，便一片茫然，「追悔」是失足者常有的感情，記下這段故事，告誡那些思想糊塗的人！

## （二）拜別難友

在鹽源的最後幾天裡，我本打算多會幾位有共同經歷的朋友，小結一下我們所共同經歷的歲月，留下他們的地址，以便今後聯繫。可沒安排聽馬文華的胡扯。偏偏這一段孽緣未盡，被他糾纏了兩個多時辰。下午一點鐘我才擺脫他的糾纏，同賴開明出得皮鞋車間。

在大門口正好碰到整整十四年沒再見到的高世清、金梅夫婦，兩人頭髮已經花白，高世清穿著灰色西裝，金梅穿著皮衣，手裡提著手提包，與十四年前，場部糧庫禁閉室所見到的他們相比，已完全兩樣。後來在羊圈裡聽見他們的琴聲和歌聲，可從未面對面交談過，甚至連打招呼的機會都沒有，然而我們成了好朋友。

「一切會重新開始」金梅滿臉燦爛的說，她很自信，她是把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完全剪掉的人。可這一剪，就使她從年輕狀態，一夜間變成了白髮婆娑的老太婆了。

我想起十四年前兩個穿著破爛不堪的孩子，每天早上都要在羊圈前的田坎上望著自己的母親，背著重疊疊的一背衣物，沿那條小路向場部走去，那一幕又浮現在我的眼前。如果姐弟倆還活著，現在已是妙齡少女和小青年了，但當時看見他倆匆匆離去我沒問。

我們揮手道別時，大約是下午三點鐘左右。按照原來的計畫，我應在歸途中去農一隊和醫院，然後再返回林業隊，在那裡去取托田井伯為我製作的木箱。

那時還沒有包裝口袋，又沒錢去買皮箱，我在監獄中的破衣爛裳可以丟掉，但節省下來的兩套「新衣」和一套棉衣，我仍想隨身帶走，世隔二十年了，出去後每人每年定量的布票，衣著一定不寬裕。

過了醫院便是農一隊，想起十五年前我們在馬鈴薯土裡尋找散落馬鈴薯的情景，那時滿目黃沙，一灣死水，兩岸紅土地，真不知這路該怎麼走才到它的盡頭？

就像一個由命運牽著的盲人，耳邊響著淒厲的呼聲：「來吧！犧牲和鮮血伴你同行！從這裡走過去興許有你一線生機，一切聽命吧我的孩子！」

整整十五年中，在我們中誕生了陳力，張錫錕、劉順森這樣的英雄！在黑暗中舉起火炬，從百年來民主鬥士的手中，接過了反獨裁爭民主的大旗，至今我們仍可以感覺出這面大旗在上空招展！他們的肉體就安息在這裡，他們的靈魂需要祭奠。

當我將離去時，必須同他們——道別！！將他們生平留下的話寫在紙上，表示我至誠的祈禱……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獨自向農七隊走去，鹽源的九月已是深秋時節，路旁一叢叢荒草中，十樣棉花迎風怒放，風季悄然臨近了。

那一天，天氣陰沈卻沒有下雨的跡象，沿著大路的農七隊地界裡，沒有看到一個流放者。我沿路走來，從路邊採來一大束盛開的十樣錦花。

農七隊圍牆後面的荒草壩子裡，張錫錕和皮天明就倒在那裡！由農場執行槍殺的人，除了農六隊的公判大會外，基本上是在這裡就義的。

今天，五年過去了，那些路邊的白楊已高聳入雲，像一座座紀念碑！此時我腦海裡已湧現出當年飲彈後，倒豎在路邊張錫錕蒼白的臉。一面走，一面數著白楊樹的棵數，數到第七棵樹下，站在那裡向西方深深鞠了三躬，並把採來的十樣錦花端端正正放到那棵樹下。

默禱大約五分鐘後，睜開眼，回過身去，才發現十來個跨著書包的學生，奇怪向我看著，他們中有幹部的孩子，也有就業人員的孩子，他們不解於我當時那古怪的動作，好奇我何以朝路邊的白楊樹禮拜？

他們不知剛剛過去年代的黑暗！那草坪，是灑著許多人鮮血的刑場，張錫錕、皮天明便在這裡飲彈犧牲，他們更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在這裡就義？暫時我無法用幾句話同他們溝通。

我站在那裡同他們對視著沒有說話，也許這種對視引起他們的竊竊耳語。

距離七隊的圍牆大約百米的地方，此時我聽見那山坡處傳來推土機的轟鳴聲。遠處，三台推土機正在那裡將小山丘推平，而那填土的地方正是三年前烈士的喋血處，如今正被一堆堆紅土淹沒！

我向那裡走去，登上一堆還沒有推平的小土包，面對著推土機，我站穩了腳，眼睛向那紅浪翻騰的地方搜索，想尋到烈士們被槍殺的位置，但那卻是枉然。

不竟悲從心來，我舉起手，振臂呼喊著他們的名字，一面將手中的十樣錦花向那紅土撒去，期望那花瓣引導我去辨認英靈們的血跡，然而七彩花瓣四散著隨風飄零，忽東忽西，久久在空中徘徊，似乎不願隨便落在那裡。

倘若有一天，人們為紀念這些偉大的英雄，想尋找槍殺他們的地方，他們的後代子孫上那兒去找他們的遺骨，以寄託自己的哀思？想到他們成了葬身在這裡的孤魂野鬼，我的心能平靜麼？

一路走來，到了油庫灣，沿左側的公路，走上最上面那塊「大寨田」，我的眼前再次呈現出兩年前，我們在徐世奎驅趕下，在這裡連續三個月挑燈夜戰，這是我今生最後一次體會大寨精神。

此刻我又彷彿聽到那滿山谷鋤頭和號子聲，看到蔡先綠矮小的身軀，吃力推著那十倍於他體重的板板車，哼著那楊白勞低沉的哀歌向前艱難的走。

我想哪一天，任人烹宰的奴隸們站起來？

走到三號梁的最高處，站在通向鹽源的山隘口，透過被狂風攪得混濁的白霧向下看，山下那曲折迂迴的小金河像蛇一樣，盤繞在鹽源城下。十五年來灰暗的鹽源好像一個少見陽光的小城。我瞪大眼睛，尋找那山頭，看見了緊挨縣城中心的一個小白點，認得那是鹽源公判大會會場，陳力、劉順森就是在那裡就義的。

我失聲高喊：你們犧牲在那一處呀，在我離開鹽源城的那天，我該到那片山頭，那一塊石頭前，來與你們告別，致我的哀思！？

從二號梁回到我住的莊稼棚，屋裡聚著向我告別的人，這一天我感到特別的疲倦，心裡說不出的滋味，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大家取出筆記本，叫我簽名留念，我取出了筆本記下在坐的人通訊位址，想回到重慶後，有機會給他們寫信。

第二天，九月十二日，也是我離開二道溝倒數第二天，我便按原計劃一大清早去了五號樑子的亂石堆前，下面白茫茫的一片，這是二道溝的最後一段，那高高聳立的亂石堆中，安葬著張錫錕。

四年前黃學全的媽媽曾在這裡祭拜他，想懇求他能饒恕她的獨兒，老婦人不明白，帶罪的靈魂只有上帝才能赦免。當時因為搞不清張錫錕遺骨在那一塊石頭下面，便選了一塊最大的亂石，那裡留下她焚香的灰燼。

九年前，陳力的遺體也葬於四號梁上，我也一直沒弄清他的遺骨準確的位置。

此時，我從懷中取出寫好的悼詞，當我燃起那張紙，朝著滿目荒涼的山崗行了三個禮，口中念道：「我將要離開你們了，如果你們在天有靈，那麼請助我將我們共同經歷的這一段故事，寫給世人，告訴他們我們所經歷的

苦難和原因，讓歷史不要重演獨裁復活的悲劇。」

大地在那一刻特別的靜，好像在同我一起向我的難友們告別……

### （三）陳文仲和鄧揚光

九月十三日，按照上次場部管教科的通知，我去那裡辦理最後的離場手續，這一次接待我的是曾把我比作「紅岩」人物的陳文仲，當我跨進辦公室，我們兩人的眼光突然碰到一起，他立即埋下頭去，而我原來準備給鄧揚光的那些話也被壓了回去。

自從65年在高書記主持下，我們那場辯論後，迄今我們整整十四年沒有見面了，但我明白，他對站在自己面前的這個對手是太瞭解了，用他的行話來總結，「一個實足的無法挽救的花崗岩腦瓜」。

然而，十四年過去了，管教科不但沒能把我改造過來，反而對這花崗石奴隸「糾正冤案」，不管他此刻內心是否另有想法，他都得首先向對方宣讀：「宣告無罪」的結論。

他今天該用什麼來講「形勢大好」這句話，處在他的位置上，說過去共產黨是對和錯，都難下結論，心裡卻疑雲滿佈，這共產黨究竟是怎麼了？毛澤東一死怎麼就全變了？不是說，修正主義復活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的嗎？既然預見到了，也採取了措施，怎麼一個多月，這紅色江山就易幟了？

當然過去毛澤東可以隨心所欲的擺佈全國大局，所以他死後，別人也可以隨心所欲的推翻他的那一套，擺佈他統治的江山。

陳文仲此刻，只能對一切都不表態，對面前這個要他親自辦理離場手續的人，緘口不提往事為好。他是政法學院的科班生，潛意識中的良知，使他既不能在我這裡自討沒趣，又不敢有違於他所代表的政府，除了以辦事員的身分去宣佈今天的政策，還有別的辦法嗎？

這就是中共政策的「靈活性」，這比按法律條款論是非，隨心所欲多了。

這裡不存在使他感到為難的地方，他仍須理直氣壯坐在「法官」位子上，宣佈說，「你過去的案件是錯判了，現在與以糾正」。

於是他從他的文件夾中抽出一張紙來說：「過去是極左路線作祟，在當時形勢下法庭作出的判決是對的，現在形勢發生了改變，改正過去的判決也是對的，你簽字吧！」。

倘若改判人向中共提出賠償損失，那麼他會從抽屜裡抽出兩把刀來，一曰：你不要不知好呆。如果鄧爺爺不給你平反，你還能翻大浪不成？你還不乖乖繼續坐牢？一曰：向前看，你不是沒有看到像你這樣的人多得很，你不看看國家主席也是受迫害致死的麼？這叫做歷史造成的，向前看吧！

前一種說法，自有一種施捨者的味道，那鄭樹勳不是占了這一成，才敢在平反人頭上括一筆浮財麼？理由是說不清的，紅吃黑也罷，極左路線也好，在制服對方後，還補上一句：「我忠告你，好好吸取教訓，後半生就夾起尾巴做人吧」。麻辣俱全，被「平反」的人還得忍氣吞聲「感激零涕」。

然而這辣味對我這種「花崗石」的傢伙能接受嗎？可知我是被他當作是華子良式的人物，軟硬不吃。弄得不好這種私下敲的竹槓，不但不能讓對方就範，還要打到自己身上。受害人肚子裡這麼多年來的這把火發起來，指著他的鼻子又是劊子手，又是為虎作倀張的亂罵一通，豈非自討沒趣？

看來在今天這種時候，必須及時變臉，唱紅臉唱白臉反正戲已經演完，別不識時務！大道理可以講，氣可以順，講賠是不可能的。

但今天絕對不能拿平時對犯人的臉給對方看。那鄭老頭因為不瞭解孔令平是提著頭玩命的傢伙，所以才做了那蠢事！

於是他輕輕咳了一聲，做了一個讓我就坐的手勢，臉上也堆起了一朵似笑非笑的雲彩，停頓半分鐘，照已準備好的臺詞繼續朗讀下去：「根據中央政策檔的規定，在對你的問題經復查改判後應回到重慶，由重慶法院對你作進一步的結論並安置」。

念完後又停頓了半分鐘，也沒看我一眼，便從公事包裡取出了回重慶的「路條」和戶口登記的介紹信，說道：「這路條是你沿路買車票和住宿旅館的證明，搞丟了在路上遇到麻煩自己負責。」

與戶口登記介紹信夾在一起的，是今年年底前你所「享有」的「糧票」「布票」和「油票」，這些都是全國通用的票證。」

「目前你的身份份仍是刑滿釋放人員，因此，平反兩年所補發給你的工資，按就業人員月工資每月23元，扣去伙食、衣服費用十四元，每月應補發給你九元工資，一年另七個月所得的「補發工資」是一百七十元（折合二十美金），另外按同一標準發給了你十個月工資（計230元）作為回鄉生活費，再加上回重慶的路費總共八百元」。

輕輕鬆松的一句：「宣告無罪」加上八百元的鈔票，就是中共政權對一個無知無辜的青年學生，進行長達二十三年殘酷壓榨和奴役後，給予「平反昭雪」的全部體現！這種憑共產黨決策者揉麵團的「政策」把戲，沒有人的尊嚴，有的是強權下的蠻不講理！！有的是弱肉強食！

怪不得那陳文仲除了照本宣科的讀，再也無法講。因為這是沒有理講，也沒有臉面對受害者講的呀。

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以反對剝削為口號的中共黨人，是怎樣在階級鬥爭藉口下，對受害者進行壓榨的。榨幹了他們的血以後，還要拎著這些受害者的脖子喝道：「姑念極左路線對你錯判，免你死在監獄中，還不快快向鄧爺爺謝恩」。！

那可不假，在中國再大的中共頭面人物也給弄得死無葬身之處，劉少奇、陶鑄、賀龍！數不勝數，「階級鬥爭」的犧牲者是很悲慘的！

但是我們招惹誰了呀？憑什麼要把我們這些老百姓押到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剝奪最基本權利，在飢寒交迫和皮鞭抽打下，在九死一生中奴役二十年？我們這二十年創造的價值和損失可以用八百元人民幣來補償麼？中共對無辜者的殘害能用「路線鬥爭」極左思潮「擴大化」來塘塞麼？最令人可笑的向受害者說：「向前看」，便將一切都一筆勾消了。

我們是普通老百姓，我們在喊出「中國，我的祖國」時，是因為我們要受這個國家的保護。否則還叫什麼祖國呀，我們憑什麼無憑白故遭受共產黨加害？既然已經加害到這個地步，我們這些僥倖活下來的受害者，有資格向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喊道，

「我們是一群生在中國卻沒有祖國的人！我們是一群需要正義和人道來保護的受害倖存者，期待著你們救救我們，期望你們譴責這個國家的執政黨。譴責這世界上最專制蠻橫的政府。支持我們向這個黨討回無端剝奪的生命權！！」

像這樣的執政政府，有什麼臉向世界人民表白自己的偉、光、正？這同綁架的匪徒有什麼區別？我真想聲淚俱下的哭訴這二十三年來所受的人身折磨，並以原告的身份向國際法庭控告當事人。

然而，我到那裡去尋找這正義的法庭？在這二十多年間，無辜死去的人成千上萬，我又算什麼？今天在這魔窟中，在一個把人當作草菅芥的年代，能活著從監獄裡出去，已是萬分幸運了。

我看他從皮包裡取出那錢，本想抓起那錢向他臉上擲去。當時倘若我真這樣做了，他充其量只笑一笑，拿出那套地痞絕招，將散落一地的錢一張張撿起來，再拿到他的上司那兒討好說：

「這平反真是狗坐轎子，拿錢放人居然不知好歹，對這些花崗石腦袋只配用子彈敲破它們，這才是毛主席教導的。」

何況今天我圖了一時痛快，能對這專制政府損一根毫毛麼？倒不如現實一點，權且收下這錢，以後再細細算帳不遲。

不過，當年勞改廳的頭頭們像綁架那樣，用卡車像押送牲畜一樣把我們送到這兒來，今天我還得用這筆錢去買車票，住旅店，自己回重慶。

於是我壓著心頭的怒火，從他手裡接過那疊鈔票，有意在他眼前掂了掂，報以冷笑，連同那放在桌上的路條、票證和戶口證明，一齊塞進了我預先準備好的口袋裡。

正要轉身離去，這時從門外過道裡傳來了鄧揚光的喊聲：「老陳，那古柏的人，你處理了沒有？沒什麼好向他解釋的，告訴他，我們是執行機關，他有什麼意見，去找原判單位，我們無權決定……」

當他一腳踏進門來時，與我撞了個面對面，沒想到他現在才現身，更沒想到一直想敲破我這顆花崗岩腦袋的人，今天搖身一變，成了鹽源農場落實政策工作組組長。

想我十五年來，在這鹽源農場，他像魔鬼一樣糾纏著我：將我送進古柏反省室的是他；把我送進二道溝小監的是他；在農六隊指示打手對我輪翻批鬥的是他；幾次指揮破壞我的絕食鬥爭的是他；主持加刑的是他；今天導演這出平反戲的又是他！

好深的緣份，！過了今天我也許就見不著他了，他的躲避是出於心虧，還是害怕且不管他，我不明白的是，我與他素昧平生，他又何必這麼追著我苦苦折磨摧殘？如果他沒有讀過我的申訴，瞭解我的冤曲，衝撞著職業而無可奈何，倒是可以把這帳算在「極左路線」上，但是他是全都瞭解的人。！

這麼多年來整了農場那麼多無辜的人，他不感到良心有愧麼？管教科所報那麼多死刑材料，難道他不心驚肉跳麼？而他做了那麼多傷天害理的事後，究竟得了多大的好處？升了多大的官？

人性在他是死滅了，他是一具活僵屍。

我攔住了他，喊道：「鄧科長，我們打了十五年交道，明天我就要走了，你總不至於現在還躲著我，是不好意思還是內心有愧？」

他見我話中全是刺，尷尬回答：「你的案子自會有人負責辦理，我們是對事不對人，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向辦理你案子的人說。」一面說，一面繞開我向辦公樓深處走去，我回過身攔著他喊道：「你不是在這麼多年一直把我當頑固不化的花崗岩腦袋麼？你們槍斃了那麼多人了，你問心有愧麼？」

也不知道是我這幾句話逼得他回不過神來，所以急於要退出這種場合，還是因為他果真忙於處理其他的事，他只在最裡面的辦公室，拿了一疊像檔案之類的東西，便慌慌忙忙出門向樓下走去，只說了一句，「我沒有功夫和你瞎扯」，便匆匆下樓去了，等我追了上去時，已經不知道他向那一條路逃遁了。

#### （四）離開二道溝

於是我拎著我的帆布包下了黃色大樓，向四號樑子大步走去，心中計算著時間。從感情上講，在監獄這口盤剝我整整二十年的活棺材裡，我一分鐘也不想多待呆，路條既已拿到，我可以馬上離開這裡。

時值九月下旬，磨盤山已開始下雪封山，這幾天去西昌的班車車票已相當不好買，每天只開一班公共汽車。要一大早到公共汽車站排隊買，什麼時候車票售完，什麼時候開車，不能預售。

無論如何我都要趕在九月底以前回到重慶。

從黃樓出來時，已是中午時分，心中盤算，今晚只好在鹽源再過一夜，明天趕一個大早，儘早到鹽源車站去買明天的車票。為了能在明天早上到達鹽源汽車站，也為了同兩位關心我的大媽最後敘別，所以我決定今晚就到詹大媽家住一夜。

主意打定，我從管教科出來後，去五號樑子取了我收拾好的行李，將我的舊棉衣和勞改服捆成一個包，準備留給詹大媽，山裡人布票特別緊缺，平時注意到詹大媽一有空閒便補衣服，將我穿過的舊衣服送給她一定能派上用處。

我將換洗衣服和母親寄來的毛衣裝進木箱裡，箱子底下放著五百元錢，這是我服刑二十三年的全部資產，經過「文革」大亂，加上這麼多年來，老百姓缺吃少穿，小偷也十分猖獗。回程路上萬一所揣的錢被扒了去，我只好沿途乞討回家了。

下午三點鐘，我道別了六隊相處十幾年的同難們，挑著兩個小木箱，跨出了六隊那大鐵門。沿著五號樑子向梅雨方向奔去，當我登上它的最高點時，我回過身來，向那隔著我已一裡遠，隱埋在半山中的六隊圍牆望去！想當初來時，我沒想到會在這裡渡過我一生最寶貴的十六年，也沒有想到今天中共會用平反名義使我獲釋。

低頭向下俯視，望那六隊，好高的泥牆好陰沈的牢房。！那深壑之下埋葬了多少人的怨恨，連同他們的白骨啊？僥倖我還逃脫了虎口。現在以「自由」人身份，向這人間地獄望別，好像才從一場二十年的惡夢中醒來，驚險之至！

然而光陰蹉跎，一晃已從二十六歲的小夥子變成四十二歲的中年人了，只是人到中年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

想起武訓傳中的記載，十五歲的武訓去張舉人家槓長工，整天被奴役苛待，牛馬不如的幹活，卻不發給工錢，直到三年後，他滿以為張武舉應當補上這筆血汗錢，沒想到在他去張舉人那裡結帳時，這個秀才抱出一本假帳來，硬說武訓的工資早已支付完了！等武訓傻張著嘴申辯時，卻被張家的奴才打了一頓，並且逐出張府。

對比武訓來，我還沒有被打出「勞改隊」，至於張舉人拿給武七的那帳本，我確是真的得到了，不過那時間可不是三年，而是整整二十三年！

我回到重慶北碚，兩年後，根據當時中共中央六號檔，我起草了一份索要在這裡十五年勞役，起碼該補工資的信，寄給四川省勞改局，請他們轉給這個農場，指名點姓寄給了農場管教科，結果這個農場卻給我回了這麼一封信，現在全文抄錄下來：

《孔令平，你十二月二十二日來信提出：「要求重新補原來工資的問題」。你當時在我場「改造」那是犯人，哪有什麼工資級別？更無從談起補發原來工資的問題，當時你的原判還沒全部推翻，就是全部平反需要補發工資也只能找原判法院，執行單位不承擔補發工資的，當時你在文革期間被加刑兩年（實際服刑一年另八個月）後經鹽源縣法院裁定宣告無罪，我們根據有關檔精神按當時就業人員的工資標準補發了你的工資這是正確的毫無異議的。其次，要求發給數量足夠的安家費，這是沒有任何一個檔規定要對一個「勞改釋放犯」發給足夠的安家費用的規定，你這種要求是錯誤的，也是不可能的，相反的，我們根據上級規定發給你安置費，生活費和路費這是符合政策精神的。

鹽源農場管教科一九八二年元月5日》

武訓因不識字為張武舉白乾了三年，最後被打一頓逐出張府，從而痛惜自己不識字，萌生行乞舉義學的念頭。而我也只能在這裡記下這筆「無產階級專政」對我欠下的工錢。

和武訓一樣，我同樣是一個被封建惡勢力吞噬的受害者，所不同的，當時的滿清政府還大大讚揚武訓的義學精神，光緒皇帝准許武訓穿黃馬褂，並頒發了一塊「樂善好施」的匾額，兼作牌坊的橫額。

統治者的滿人尚能知道扶持教育贏取民心，郭英華祥說：「武訓死後……鄉民送者數萬，悲哀得未曾有過，人一生能有此報，足矣！」

而我呢？

## 第六節：再見！鹽源的老媽媽

九月十四日下午五點鐘，我就到了梅雨的山腳下，挑著行李沿石板小道往下走去，轉過幾道彎就到了詹大媽的柴門前，隔著籬笆向裡看，與兩個月前第一次來時不同的，堂屋大門外，用竹籬笆圍成的三合土院壩裡，鋪著一層還沒有曬乾的穀子和一堆玉米。四周堆著像小山頭一樣的玉米桿，幾隻蜜蜂從牆頭上飛出，嗡嗡的繞著那些稿桿不知尋找什麼。

詹大媽和兩個小孫子，正在曬壩上收拾沒有脫粒乾淨的玉米棒，她的大兒子和媳婦正在園子裡挖土，趕著種上越冬的蔬菜全家人都在忙碌著。竟管他們並不富裕，但田園的樂趣和溫馨卻籠罩著這個家，令人不由得生出一種羨慕來。

我在門外放下行李挑，輕輕地推那柴門，可是那伏在屋簷邊的小狗卻竄了出來，站在壩子裡對著我汪汪的叫個不停。

兩個孩子立即回過頭來，認出是他們的老師來了，一邊喊，一邊跑過來開門，爭先恐後把我的行李擔子拎進了堂屋裡。

詹大媽站起身來，笑咪咪地朝我走來，一面牽著我的手走進堂屋。正在挖地的詹老夫婦也丟下鋤頭跟了進來。就連那條狗也直甩尾巴向我表示歡迎。

被這盛情的迎接所包圍，我立即感到了家的溫馨，忘卻了白天在場部管教科所留下的不愉快，堂屋裡正燒著樹疙瘩，我在爐火邊的長凳上坐下來。

「手續辦完了吧」？詹大媽問道，一邊坐下，一邊給我端來一杯水，兩個孩子靠著我坐下，大媽接著嘆了口氣說：「要你們這些從重慶來的大學生留下來是不行了，現在總算好了，我說嘛，好人總有好報。！」

她快樂的嘮叨著：「這下馬上可以看到你的老母親了！唉，你媽怕六十多歲了吧，這些年怕頭髮都等白了喇」，我望著他那滿布皺紋的臉，體會著天下慈母的心。

真的，媽媽大概接到我將回重慶的信了吧，也許她正在遙遠的蔡家場搬著指頭數著兒子的歸期了！

「在這裡住幾天吧，你這一回重慶，恐怕就再難回到這兒來了，今後還不知道能不能再見到你呢」詹大媽的挽留充滿著惜別的傷感，然而我早定好了明天要到達西昌的計畫，所以沒有回答她。

大媽起身到灶房去了，兩個孩子湊在我身邊，不斷向我提出許多天真的問題：「從鹽源到重慶有多遠？坐車一天能到麼？」「重慶也像鹽源街上那麼熱鬧麼？」「重慶也像這裡有牛有羊麼？有草場麼？」「重慶也有那麼多土地種馬鈴薯和玉米嗎？」

我卻默默計算：從鹽源到西昌，過了金河到達驛馬堡，出了驛馬堡還要翻越小高山、磨盤山，還不知山上飛雪沒有？馬路是否已經封凍，明天一早在公共汽車站買得到去西昌的車票嗎？倘如買不到，是在鹽源留宿一夜第二天再走，還是改趁運貨的卡車？

「講一個故事吧，老師！」孩子們請求道。

這是最後給他們講故事了，所以得講一個有意義的，好讓若干年後，孩子們長大成人時，回憶起故事，明白其中的寓意，也回憶這位重慶來的老師，和他們相處的日日夜夜。

「好吧，我就講一個古代的阿拉伯童話，名字叫「國王山努亞和他的一千零一夜」。我開始為孩子們講起來，兩個孩子目不轉睛地盯著我。

我知道鹽源山裡的孩子，特別是經過文革荒廢的孩子，暴政剝奪了他們的一切，使他們一貧如洗，更剝奪了他們求知的權利。

照說已是初中生了，但他們還未聽到過阿拉伯的故事。所以向他們講這個故事時，我還要介紹故事的來源。從他們傾聽的面部表情裡，我能體會出他們是多麼渴望知識啊。

「在很古很古以前，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海島上有一個名叫薩桑的國家。傳說薩桑王國的國王山努亞非常殘暴，每天要在國內民間，從老百姓家裡強迫他們交出一個女孩子和他成親。但是，過一夜後，等到第二天早晨雞叫頭遍，便要殺掉這個女子，第二天又要在國內再招一個女子，過一夜後，第二天雞叫以後，又要將她殺掉。如此重複了三年，國王殺掉了國家裡一千多個年輕的女孩子」。

我講到這裡看了一下兩個孩子、大孩子張大了嘴巴，顯得十分驚訝！小兒子乾脆把他的小手扒在我的腿上一聲不吭。

「薩桑國的老百姓在這種威脅下，為了拯救自己親生的女兒，紛紛帶著女兒逃命他鄉，眼看薩桑王國已經沒有年輕女子可供他的要求了。於是國王向宰相命令道，「如果宰相完不成任務，那麼就要抓他的兩個女兒進宮」。

這一天晚上，宰相愁眉苦臉的上朝歸來，大女兒桑魯卓一再追問父親為什麼這樣的悲傷？宰相向自己的女兒把國王要他徵召民女的事說了一了遍。女兒卻自告奮勇，向父親講了她的主意。」

「第二天宰相無奈，只好順著女兒，親手把她交給了國王，哭著同她告別。但是女兒卻笑著安慰了自己的老父親，並要他明天上早朝的時候在宮裡來聽取她的消息。

晚上桑魯卓在宮中掌燈的時候就向國王講了第一個精彩采的故事，一直講到第二天早晨雞叫，故事還沒有講完，聽得入神的國王想聽桑魯卓繼續講完這個故事，終於第一次免去了處死她的計畫。

第二天，宰相上朝時果然一早來打探女兒的下落，當他得知女兒昨夜並沒有死去，一塊石頭才從心上放下來。

第二天機智的桑魯卓又用新的故事從掌燈時開始講，講到第二天雞叫。故事又剩下一個尾巴，國王再次免去處死他的決定。就這樣桑魯卓整整的向國王講了一千另一個故事，使國王最後決定不再殺死她。

從此改掉了他殘暴的習慣，並且吩咐府宮中的文官，把桑魯卓所講的故事一個一個地記錄下來，便成了留傳至今的阿拉伯童話」。

我的故事講完，兩個孩子還沉浸在故事的情節中，久久回味著故事裡的情節……

天黑下來了，詹大媽的大兒子已經忙完了「自留地裡」的活，收了工具，進屋裡擺開了桌子。不一會，詹大媽把一盆香噴噴的玉米湯元端上了桌子，今天她特別的做了幾個菜，端出了平時從來不上飯桌的豆腐肉。詹老大還取出了從梅雨場上買回來的高粱梁白酒，全家人都為我送行。

大媽不再提他侄女的事，她知道那已是不可能的了。談話中最多的還是我回重慶以後怎麼找工作和安家，她嘮叨著：「你看，你已經四十二歲了，前半輩子給監獄泡蝕了，回家以後頭等的大事就是趕快找一個賢慧的姑娘把家安好，等有了孩子，別忘了把你們的照片寄給大媽看。」

吃過飯，她又親自陪我一同去劉大娘家裡去了，劉家同詹大媽只隔了幾家人，我也是第一次上她家，也是最後來同她老人家告別。

在鹽源前後整整十五年中，監獄將我同老百姓完全割斷了，兩位老人是我最後在六隊交識的鄉親，算是緣份，也是留給我對這裡的紀念。這兩年多來得到她們的照應和教誨，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回重慶後，我按照詹大媽給我的地址，立即給他們寫信，還將我和母親合照的像片寄給了她們，不久也收到了他們的回信和她們各自的「全家福」。

回到詹家，已是晚上十二點鐘，時間雖然是陰曆七月下旬，但天氣已非常冷，一輪下弦月在樹叢之中為我們照路，野地裡已是夏蟲啾啾：寒風吹動著樹影婆娑，雖然寒氣很重，但我心裡充滿了兩個老人給我的溫暖。

當我和詹大媽推開那個竹柳混編的小門，進得園子裡，詹老大一直還坐在門檻上等我們，兩個孩子已經熟睡。

他見我們回來立起身來，按照他母親的吩咐已為我準備好了床和被蓋，因為家裡沒有多餘的鋪位，我被安排在與他同塌而眠！

當我睡上了那床，只覺得床面凸兀不平，伸手去摸那床板竟是柳條編的，睡上去柳條之間相互摩擦，呷呷作響，而且我感出每聯結兩根柳條的地方，就是一個又硬又凸的疙瘩，頂在身上就像赤身睡在乾柴堆上似的，如「臥薪」一般。睡不大一會兒便覺得混身頂得疼痛難忍，不斷的翻身又怕驚著了睡在另一側的男主人，只好強忍著。

不大一會聽見詹老大已鼾聲大作，知道一天勞累了，到此時怎麼也會酣睡，而我實在沒有辦法入睡，便悄悄地坐起身來，不僅為詹家的窮苦深深感觸。相形比較也為自己感到慚愧，睡這床對我竟如臥薪一般，可山裡人苦慣了習以為常。

我坐在床邊，望著從那從窗外透進來的月光，一邊想到二十二年前我從學校被押送到南桐趙家灣，接受「農民」監督勞動的第一夜，好像也是這麼一個月夜，只是南桐的五月，氣候可比鹽源的九月份熱得多，那蚊蟲四



起的情景宛如昨日。

不過那趙家的床，卻不是這樣難睡，那趙家的家境也如這詹家一樣，只是那時吃的糧食，卻因人民公社和大躍進，而緊張得連民兵隊長也在所轄區的公社玉米地裡，半夜去偷燒玉米吃。那提心吊膽的景況至今猶如昨天，現在過去了整整二十二年，仍宛如前天。

農民終於靠三自一包有了一點可供填飽飢腸的糧食，其他的依然是那麼窮苦，在我剛下農村時，受到共產黨盅惑宣傳，那趙家父子對我們多少都有點「監視」的敵意。

但恰恰是生活實踐告訴和教育了他們，這二十二年來，我曾經接觸和認識了那麼多貧苦的農民，他們從懷疑我們到同情我們，就如這詹大媽的一家，雖然他們本身還沒有認識到陷他們這麼多年於飢寒交迫是誰？但他們已經從自身的苦頭中體驗到這個暴政了！

堂屋的正中已經將毛澤東的畫像取下來，供上了祖祖輩輩的天地靈位便是信仰的轉變。信仰來源於生活，靠硬灌怎麼能樹立？當我想到在農六隊看守莊稼的最後幾夜，看到當地農民夜襲玉米的那翻猛勁，我便感到，陳勝吳廣的馬蹄聲已經在這片過份衰老的民族土地上響了起來，我為民心的叛逆而高興，又為我們國家的明天而擔憂。

因為趕早要去鹽源車站買票，何況一夜幾乎沒有睡著，聽到雞叫兩遍，我便熬不住起床，收拾好自己的行李，那時月亮已經偏西，北斗星還掛在天邊，時間不到五點鐘。

詹大媽大約也是一夜沒有睡好，此時她已經起床，生了灶火為我熱好了昨天晚上的玉米湯元。詹老大和大嫂也被驚醒了，我忙示意不要驚動孩子們，便匆匆地吃了「早飯」挑著行李，走出了柴門。

臨走時，我向詹大媽手心裡塞了把錢，那理由也同給劉大媽的理由一樣，臨行匆匆已經來不及給她老人家買東西留作紀念，讓他自己撿喜歡的去買吧。至於包裡面的衣物，確實是因為這年頭布票太稀貴了，留給小孫子們縫縫補補還用得著，她收下了那包衣服，給她的錢卻堅決不收，她說，你留下的舊衣服那已足夠留著紀念，至於錢，你領到的也不多，回重慶要路費，回去後安家還要用，就留著自己用吧。

一面提出一個沉甸的口袋，一邊說，我也沒啥好送你的，這是一點自家採集的蜂糖，你帶回重慶，給你老母親嘗一嘗。

我沒有推託，收下了老人的一片心，趁她把我送給她的衣包拿進屋的時候，趕緊把錢押在那鬧鐘下面。

挑著的擔子卻被詹老大搶去了，只好拎著包趕了出去。大媽和詹老大就在黎明朦朧之中一直將我送到小河的橋邊。

我一再請他們回去時，驀然在晨熹之中看見那銀白頭髮下受過傷的眼眶裡含著一汪眼淚，不禁心中一酸，情不自禁地也掉下淚來。

一邊握著她那粗糙的手，用臉挨了挨她那花白的頭，便從詹老大的肩上接過我的行李，揮手向他們告別，轉身向橋上走去。

當我走出一百公尺遠再回過身來，還見她仍屹立在橋頭上向我揮手。唐人有詩雲，「世亂同南去，時清獨北還，他鄉生白髮，舊國見青山，曉月過殘壘，繁星宿故關，寒禽與衰草，處處伴愁顏」。

到鹽源城裡天已大亮，看了看時間，已是七點鐘了，以前我有幾次經過這座小城，但都是坐在汽車上或出外勞動，或被押著去刑場。

在這裡生活了整整十五年，來縣城實地走在街上，只有兩次，第一次是為了給闊別十五年，剛剛才接上聯繫的老母親照一張照片寄回去。那已是六年前借了來鹽源縣城上牛糞的機會，那一天，除了在像館照了像，還參觀了它的最高學府，直到現在我仍清淅的回憶得起那學校門口的佈告櫥窗。

那時鹽源小城除了縱貫東西南北的幾條大街外，便是錯雜排列的矮小平房和分割小城的小巷，大街上攤著一堆堆豬屎牛糞，大街上不時有鈴聲悠悠的馬隊，穿著很髒的馬幫。卻沒注意車站，更不清楚車站在哪裡？

第二次便是兩年前，在這裡被押著來陪劉順森殺場的日子，那一天是我一生中，心情最痛苦的日子。回憶那地方，想不起我眼前的景物是些什麼？

挑著行李我一路問去，很快找到了車站，我才發現這是幾排很舊的房子，候車室裡的牆上泥土已剝落下來。七點鐘，買票的窗口還沒有打開，前面已經站好了五六個等著買票的人。

我排好隊，便向站在我前面的一位本地居民打聽，平時召開宣判大會的「中心廣場」。那人望著我說，縣裡還沒有修好專供開會的中心廣場，只在一個交叉的路口上劃了白線，他指著那交叉路口的方向。

不大一會，賣車票的小窗口打開了，我買到車票後，問好開車的時間。那售票員回答說，「至少還要過兩個小時才發車」。便將行李一併寄放在寄存處，獨自一人向著交叉路口的方向走去，一面不斷的詢問馬路兩旁的商店裡的店員：「平時召開公判大會的地點該怎麼走？」一直問到那塊方圓大約十畝地的開公判會的地方，定睛一看這裡那是什麼廣場？而是幾幢房子用它們的外牆圍成的一片空地。

前年槍殺劉順森的公判大會會場，是用紅布將幾幢樓牆圍成了一圈。當年幾個通街口的過道，顯然是這些房群之間沒有封閉的巷道。

看到這些「巷道」，我立刻在眼前浮現出那天「公判大會」被民兵押著陪殺場的幾隊五類份子隊伍，時間才過了兩年，我就從一個陪殺場的極端反革命份子，變成了「准公民」，提前釋放了。

我慢慢地走上當年佈置主席臺的土丘上面，面朝著整個「廣場」俯身去尋找我當年埋頭默哀的地方，眼前頓時浮現了那些赴刑人慘遭殺害前五花大綁，被打得泥血滿面，遍體鱗傷的赴刑者。

劉順森低著頭一聲不吭的站在前排，他臉色蒼白，青筋突暴，以最大的毅力控制自己始終不發一聲。

我聞到了血腥的氣味，感到一陣昏眩，連忙蹲下身子，坐在地上歇息片刻，才從地上慢慢地爬起來，向著台下當年烈士們挺身就義的刑場走去。

站定後，畢恭畢敬的行了三個禮，再一直走向臨街的幾家店鋪打聽，前年公判大會槍斃的人埋到哪裡去了？

他們張大了眼睛，很奇怪地看著我說：「凡是鹽源開公判大會槍斃的人都埋在西面的松林坡下，怎麼知道你找的人是那一個墳？」我便順著他們所指的方向望去，遠看有一片松林的小丘陵，丘陵上的一些小土包隱約可見，長著荒草。

我便加快步子向那裡走近一看，那些被雨水冲刷的地方留下了泥水的痕跡，什麼也分不清楚了，散亂的荒草中有幾處燒成灰的紙錢殘燼，不知是誰給誰留下的。

一陣悲潮湧上我的心頭，想當年反抗毛澤東獨裁死於「非命的」民主鬥士們，犧牲得如此之慘，被媒體禁殺了消息，使他們消失得無聲無息，而今無影無蹤了！想到這裡，我面對著那荒山亂石堆肅立著。朝著那土山坡再次三鞠躬。我想蒼天如果有眼，我寫的他們獄中的英雄事蹟，終有向黎民公開的一天！

當我回到車站時，正趕上班車將要啟動，售票員在那裡剪票，並大聲地催促那些去西昌的旅客快快上車。

我連忙從行李寄存處取了我的行李上了車，知道今天要翻小高山和磨盤山，便打開了帆布的手提包取出了預先就準備好的棉衣。汽車隆隆開出了車站，我從車窗裡向著漸漸退到身後去的小城，投去最後告別的一瞥。

現在，我要踏上東歸的里程了，對著車窗玻璃中滿臉皺紋的我，那臉唯一保存的是屈強和憤怒，其中也許有一種希望。耳聽隆隆車聲夾著風聲，隨著急速駛向遠方的農田，鹽源縣城越來越小，我不禁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中集完

《血紀》\*\*下集\*\*

孔令平 著

目錄

目录... 1

第一章：惡夢剛醒... 1

第一節：歸程... 2

(一) 陳容康的家... 6

第二節：訪張錫錕的家... 8

第三節：被暴政摧毀的「家」再組合後... 13

第四節：同母親重逢... 19

(二) 相親... 20

(三) 范小妹... 23

(三) 汪禿子... 24

第二章：落實政策的馬拉松... 29

第一節：回校... 29

第二節：衙門口前的『上訪者』... 35

第三節：草菅人命的中級法院... 40

第四節：區統戰部的官架子... 42

第五節：第二次回重大... 45

第六節：政治需要... 50

(一) 老秦... 51

第三章：一段教書的日子... 53

第一節：走人戶... 53

第二節：二十四中學... 56

第三節：在課堂上... 60

第四節：天下靠自己去爭... 63

第五節：對母親的歧歧視... 65

第六節：我的初戀和婚姻... 73

(一) \*\*「片斷」的第二個讀者\*\* ... 75

(二) \*\*逆緣\*\* ... 77

第四章：母親擺脫了傷心地... 82

第一節：劉老先生相助... 83

第二節：解救范小妹...	85
第三節：峨眉遊...	87
第四節：第二次落實政策...	95
(一) 重回北碚...	95
(二) 搬離蔡家場...	98
第五節：盧文南...	99
第五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04
第一節：進入工廠...	105
第二節：鬧嚷嚷的達標...	113
第三節：遭逢絕境的農汽廠...	134
第四節：柳暗花明...	147
第五節：李倫的兩手...	157
第六節：我為一榻安身處而爭...	168
第七節：專汽大業的破滅...	172
第六章：如此霸佔民宅...	180
第七章：暴政扭曲下人性的畸變...	190
第一節：右派...	190
第二節：幾個常見社會現象...	194
(一) 「假」像猖行...	195
(二) 紅衛兵遺毒...	198
(三) 冤獄繼續氾濫...	199
第三節：人性的復甦...	200
第八章：風雲滿布的年代...	202
第一節：山雨欲來...	202
第二節：六四，大陸民眾在怒吼...	207
(一) 在北京...	207
(二) 在我周圍...	210
(三) 今天和昨天...	212
(四) 屠殺...	213

(五) 歷史會記住這天... 218	
第三節：「六四」以後的那幾天..... 221	
第四節：從遊行想到的... 227	
第九章：在中共摧殘下我的家解體了... 232	
第一節：致命的跌跤... 233	
第二節：對母親的懷念... 237	
第三節：為保護生存權的一場官司... 238	
第四節：我的父親... 240	
第五節：合葬... 243	
第六節：孩子在絕世裡掙扎... 243	
第十章：退休後的打工... 248	
第一節：四輪摩托... 248	
第二節：槍桿子也搶民品... 252	
第三節：城市貓... 259	
第四節：在勁隆公司... 267	
第五節：腦出血·**打工的終止**... 271	
第十一章：尋訪... 275	
第一節：尋找烈士的家... 276	
第二節：馬開先的下落... 277	
(一) 線索... 277	
(二) 訪少年學友... 279	
(三) 意外得來... 284	
第三節：王大炳和他的女兒... 288	
第四節：潘朝元... 298	
第五節：夏光然... 311	
第六節：散落在市井裡的鹽源難友... 321	
第十二章：前途... 327	
第一節：市井公害... 327	
(一) 如此建設... 327	

(二) 乞丐、娼、賭、毒... 329

(三) 假... 333

第二節：臺灣是中國的希望... 334

(一) 不該出現的... 334

(二) 對臺灣的希望... 339

第三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41

(一) 「真善忍」與「假惡騙」... 341

(二) 群體事件——\*\*民憤\*\*... 344

第四節：獨裁的沒落... 350

後記... 356

第一章：惡夢剛醒

惡夢醒來，猛然一驚，不知身處那裡？剛從地獄出來，我該到那裡去？啊！該回家了，回家本是同久別親人團聚的旅程；是同父母親人久別後的第一次擁抱；而我首先要向他們傾訴在地獄中險些喪身的經過。

災難無緣無故降臨給剛剛才19歲的我，我被丟進了地獄整整二十三年。在地獄裡，我失去了所有美好的回憶。

從少年時代起，大陸就被蘇俄控制，今天我們居住的這片海棠葉，無緣無故的碎裂成幾大片，這那是我的祖國？我的家？生活的故土破碎成這樣，大家都在反思，為什麼過去的夢碎得這麼慘？

我們家本來人丁不旺，小小的五口之家，以教書為業，教書匠本與世無爭。我的父母終生辛勤育人。卻沒想到，被口口聲聲以解放人民，建立繁榮富強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弄得家破人亡。

一九四八年正是中華民國國難當頭，懷著對三民主義的忠誠，懷著對國家前途的憂慮，我的父親辭去杭州師範校長職務，毅然應顧毓秀先生之請，去南京接任中央政治大學重慶分校校長之職。

就因此，三年後，他首先進了中共的大牢，從此音信杳無。當局向我們全家封鎖了他的消息，連判決書都不給。

直到1984年，經我反覆追查，才從四川省勞改廳證實，他已於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在勞改營中死亡。

從那以後，和平年代裡我們的家，就在中共淪陷區裡惴惴度日，在黑五類的泥坑中掙紮，在「階級鬥爭」的大火中燃燒。

我失去了撫育我長大成人的外婆；我再也聽不到她講述炮火連天的南京城裡，我在國難中降生。少年時代她駝著背同母親一起掙扎在大風大浪中，艱難的帶著我和弟弟長大。

二十三年前竹籬門前，她用蒼白的鬢髮吻別我時，我怎麼也沒想到這竟是我和她生離死別！

我的弟弟生性軟弱，從小就負著『黑崽子』的重枷，飽受社會的欺侮。我永遠不會忘記二十三年前我和他在小龍坎的『團聚』，更沒料到那次團聚又成我們的生離死別。

「文革」奪走了我唯一的兄弟，母親因經不住這個打擊和造反派的凌辱，燒去了僅存多年的老照片，準備跳水自殺。

今天，離家整整二十三年了，原先的家已被中共消滅，現在只剩下了唯一的母親，她幾經生死，而今不知如何？我現在正在回到她身邊的歸途上。

她能重新振作，同我一起再建我們的家麼？我們能重新恢復過去的一切麼？

從一九四九年，在「無產階級專政」暴力下，槍桿子逼著我做烏烏托邦的惡夢。現在惡夢過去了，當我醒來時，到處還聽得見啼飢號寒聲，城市像經歷戰亂，滿目蒼夷。

「共產主義」給大陸留下一場災難欺騙。現在每當陰雨夜晚，無數冤魂都會在夜空中發出索命的喊聲令人聞之心驚。該犧牲的犧牲了，該得到的卻沒得到！

但是，對中華民族造下那麼大的破壞，而中共好像並無反悔，反到若無其事的又在津津樂道宣揚「四個現代化」的胡謔了！當我艱難的從下水道裡爬出來時，他們對我們悲慘的過去，並無絲毫同情。

尤其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慘痛的現實中，怎麼還無人發出重新振作的疾呼？為什麼受壓迫者至今還不敢喊出：「還我同胞的血！還我們百年來用生命爭取的民主自由！」

難道恐怖還沒解除？惡夢還纏著大多數人？

舊夢既碎，我們的未來需要新的夢想。但是做新夢得講新追求，中華民族追求什麼？禮，義，廉，恥。然而大陸有麼？今天的大陸人沒有廉恥，更無禮義，夢都不知從何做起，大陸仍在淪陷中？原來我們都受騙了！

我已四十二歲，二十三年來，在獄中向中國獨裁勢力拚鬥鬥爭中，與我一起充軍邊荒的摯友們，多被中共殺害，蒼天將我倖存下來，我該怎樣不負犧牲人們在天之靈的矚托？不負中華民族的重托？

所以首先我該把這二十多年獄中所經歷的都寫出來，期望大家讀後擺脫惡夢的纏繞，警醒過來！

## 第一節：歸程

汽車在黃沙滾滾的公路上顛簸，這情景與當年我們從黃聯關到鹽源時並無兩樣。不過那時是64年初春，而今已是79年深秋，風沙絲毫改變它的頑劣脾氣，任性的吹到今年的夏初。夾著砂石的風沙打在臉上很痛。

到了驢馬堡已是下午一點鐘了，在路旁的食店裡匆匆吃了中午飯便上路，下午便是翻越小高山這段全行程中最艱險的一段。

汽車掛上一檔，吃力的向山上爬，氣溫也越來越冷，我把預先準備好的棉衣從提包裡取出來穿在身上。

漸漸的，路面開始變硬，汽車的輪胎在翻越幾段隘口時開始打滑。現在從車窗裡向前上方望去，在那白霧繚繞之處，隱隱現出白雪皚皚的山頭，有「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之感。

司機把車停在山腰間的枯草坪上，從駕駛室的坐墊下面取出了預先準備好的「鐵腳碼」，套在汽車的輪胎上，沿著越來越窄的曲折山路蜿蜒爬進。

偶爾在山隘口或轉彎的地方，出現一些屋頂很尖的茅草屋，看不清楚那屋裡是否住著人，我想那一定是平時護路的道班偶爾歇腳的地方。大雪封山時，他們都離開了。

雪景漸濃，松樹上掛著一串串的冰棒子，這景色是住在平地上的人們所難以看到的，也是我幾次經過這裡時沒看到的，因為以往都是被槍押著，蹲在被雨篷嚴嚴實實封住的卡車車廂裡，無法掀起蓬布去觀看雪景。

現在坐在公共汽車裡，從車窗回首下望那些尖尖的茅屋，像是在一片雪景上依偎在松樹林的小風帽，很像我童年時喜歡的賀年片景象。

不過此時，在我腦海裡給這景色著上了森嚴可怕的背景，那寒氣逼人的松樹，個個都像手中端槍的老管，它們站在馬路兩邊，好像在監視從他面前經過的每一輛喘著大氣的汽車，咄咄逼視著車裡的每一個旅客。

無怪乎在我被監禁這裡的十五年中，我們中因忍受不住這監獄非人折磨，冒死逃亡成功的甚是寥寥，就算是一路逃掉鷹犬追捕，在進入大山後，也難以翻越這叢山峻嶺。餓死和凍死在這大山裡的逃亡者不計其數，大山裡留著他們的骸骨。當年選中鹽源作監押的禁地，構思堪稱奸詐。

汽車還沒有爬完最高峰，天色已暮色蒼茫，但山巔卻成一片銀白色的海洋，我的身上此時越發的感到寒冷，肚子也餓得咕咕直叫。此時想起從鹽源出發前準備好的饅頭和水壺，慶倖那水壺裡的水還沒有結冰，便從衣包裡取出，揭開蓋子，一口饅頭，一口水，邊吃邊喝起來。

向下滑行的速度漸漸加快，兩旁的雪景也漸漸消失，大約又過了兩個小時，便到了山底平地，此時天已黑淨，車已駛近黃聯關，氣溫也回升到原來的溫度。

我伏在車窗上，想借那夜色月光，找到十五年前我們曾經住過的地方，但是兩旁稀稀拉拉的平房中，卻沒有看見那兀立的煙囪沖了。問左右的乘客，知不知道這裡原先的高爐群？他們說那早已拆掉。

人世蒼桑，二十年前一轟而起的怪物，早就埋在荒草叢中了。

然而這一頁歷史永遠留在我們這一代的腦海裡，毛澤東肆無忌憚拿中國百姓作試驗，役使他們，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代暴君。當年許給老百姓的共產主義，使中國白白折騰幾十年，餓死，整死幾千萬老百姓，中國人幾代人的血汗變成一堆黃土，中國的百姓怎不潦倒？

汽車在茫茫夜色中向西昌急馳，道路也越來越平坦整直，路旁的建築群也越來越高大，越密集，整齊排列的路燈一直伸向遠處，一座繁星點點的城市在地平線上距我們越來越近。

那天邊天幕燒成了半邊紅色，與十五年前我們剛到黃聯關時，黃沙茫茫的景象大不相同，文革十年，恐怕也只有在這裡大大變了樣。

汽車馳抵城區，馬路邊巨幅的石刻語錄碑上，赫然現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這不就是當年朱洪武的座右銘麼？只是這「不稱霸」真有些招搖撞騙。這裡便是被一代「導師」所定的導彈發射基地。西昌因而成了中國西部軍事重鎮。

在鹽源這幾年我們在地裡勞動時，常常見到頭頂上蘭空深處，一縷灰白色的煙雲劃天而過，接著便會從犛牛山上，傳來一陣隱隱驚雷般的悶響，文革大亂年代，林彪的愛將吳發憲曾奉旨在此，苦心經營多年。

在當時崩潰的中國經濟沙灘上，兀立著這麼一個龐然大物，尤如在骨瘦磷峯的劣馬上馭著一個全付鎧甲的戰神。獨裁者從極度貧弱的國民經濟母體，擠出帶血的奶，三十年灌養這尊全付鐵甲的戰神。

汽車在強烈的燈光和電弧光交相輝映下，馳進了一個燈火輝煌的工地，這兒正在修建一個巨大的火車交換臺站和站前設施。從車窗裡我望見了那凌空躍起，盤旋左右的立交橋。

汽車駛過了這段工地後停了下來。火車站的旁邊就是長途汽車站，藉著這如同白晝的燈光，我很快找到了車站旅館，跨進了服務員為我安排的房間，壁上的鐘已指著零點正。

牆外還閃著電弧光以及隆隆響聲，我此時已疲倦至極，無心觀賞，抓緊時間洗臉洗腳，很快躺上床，帶著旅程第一天的疲乏，迅速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從床上醒來已是早上七點鐘，起床後第一件事，便是去車站購買當天去石棉的班車票。洗漱完結，跨出門外，望天空卻是一個上好的晴天，昨晚旅途的風寒已經消失。買到車票後，循著昨晚原路，再次看這建設工地。現在這個龐大的建築群，在太陽光下泛著一片銀灰色，顯得冷峻和殺氣。

八點半鐘，我已挑上了行李坐上了開往石棉的班車，這一天的行程，比之前一天已大不相同，氣候特別暖和，不但棉衣穿不上了，就是穿夾衣都還有些熱，公路兩旁的田野上人們正忙著秋收秋種，氣氛已不同於十五年前。

那時的農民，被牢牢釘死在人民公社的圈地上。飢寒交迫的人們，無力整治自己的家園，任田園荒蕪，荒草叢生，比之任何歷史上的專制王朝更淒涼。而北京的御用筆桿子還狂叫什麼「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曾狂熱擁戴過毛澤東，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連篇謬論的鄧小平，等毛歸天後，斷然「篡竊位」，取毛氏所欽定的後繼人而代之，第一刀便割掉了那套在六億農民頸上的絞索——人民公社。



這本是「民以食為天」的治國安民的基本出路，既談不上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談不上由此而邁入四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傳說，北京為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時，憤怒的石井山鋼鐵廠的工人，曾去懷仁堂請願，要求他校仿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舉動，將裝在水晶棺中的這個魔頭，挖出來放進煉鋼爐中焚屍揚灰，卻遭到鄧氏的拒絕，他說：「三七開吧，誰人孰能無過？我看他七分功績三分過失」。

一錘捶定下了和盤接過專制政體的衣鉢。毛澤東反了多年的儒家忠孝節義的「文化大革命」，絲毫沒有反掉這個小夥計頭腦中的「正統」觀念，也許小夥計懂得這層道理：叛逆，叛逆，終將禍及自身！

汽車進入鐵索濟，那傍橋而立的廣場依然如故，只是那原先的露天看臺已經封閉改成了一個遊樂中心，那裡還依稀可聞其間傳出來打麻將的嘩嘩聲，在這兒就業安家的「刑滿釋放犯」就此留滯在這裡。當年中共用槍桿強迫下來刑滿人員，今天成了從內地來的「移民」，那裡成了新移民區。

投宿石棉一夜後，翌日一大早，整個石棉城還蜷縮在灰濛濛的月光下，我就登上了開往雅安的班車，開始了我回歸的第三天里程。

我對雅安記憶所以深刻，是因為在流放邊荒整整十七年中，留下過值得我紀念的歷程，這裡有三元宮，磚瓦廠它們曾留下我們的反抗印跡。

眼前雅安城在青依江的環抱中無比秀麗，在寬暢湖心蕩漾的遊艇，點綴著湖面，這畫景雖不能與西子湖比美，身臨其境仍有一種陶醉之感。但因為二十二年在黑牢中度渡過，在我生活中烙下的陰影卻揮之不去。

忽然間聽見一迭聲「叮叮噹」的清脆敲擊聲，遠處一個漢子挑著一付籬筐，一邊敲著刀塊朝我走來，這是四川傳統賣麻糖的叫賣聲，我已有二十多年沒聽見這呼賣聲了，記得十三年前我去成都參觀中就講過一段觀感，我說，「什麼時候能看到沿街叫賣的民間小吃，就證明我們國家被卡死的經濟開始復甦了」。

這話聽來有些粗俗，但細細想來，獨裁者借對資本主義的砍殺，一併砍殺了人民求生的所有出路，獨裁倒是建立了，但人民求生計的毛孔卻被堵死了，他那管老百姓的生存呀！

我向小販招手，他走過來，我便掏出了兩塊錢買了半斤，找到了一個石凳坐下吃起來。

迎著涼爽的秋風，看著馬路上結伴相依的男女和牽著孩子的老人，在街心盛開的菊花叢中散步，這是多美的人間啊？為什麼獨裁狂，給老百姓留下這麼長時間可怕痛苦，為什麼他這麼仇視人民安居樂業的生活？

於是我想「魔鬼可以使美麗的城市淪為地獄」。

沿途問道，找到雅安監獄的大門，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三元宮被槍押送的流放者，用胸膛抵著槍口在牢籠裡喊出：「我們飢餓，我們要吃飯」，並且在全付武器的員警槍口下，赤手空拳一哄而搶。

這反抗暴虐的星星之火，從一開始就帶進了剛剛建立的甘洛農場，它越燒越旺，持續十餘年，當年帶頭搶糧頭，吟唱帶鐮長街行的人，接著又高舉起了「火炬」，他們一個個倒在劊子手的屠刀下，這又多麼悲壯。

毛認准了強迫農民在集體經濟中，才能使獨裁政治長治久安。

經歷了漫長的二十八年歷程，大陸中國人為之付出了不低於六千萬人的生命代價，毛澤東那套強姦民意的東西，再無法施行下去，才不得不改頭換面。

當然，民主事業的成功和國家長治久安的路，還很遙遠。

獨裁和民主的爭論直到今天還在困擾大陸的人們，「四個堅持」像一把高懸的利劍，隨時都會落在被認為「資本主義」自由化人士頭上。彷彿離了這套，他們就坐不穩江山了。

「改革開放」今成中共的權宜之計，叫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

回歸之路，在連續四天更換的客車車輪下飛逝過去，當我座在飛馳在川西平壩上的汽車裡時，我被那筆直的柏油馬路和兩旁高聳入雲的楊樹，以及一望無邊的良田所吸引。這塊沃土上的農家，比鹽源來是桃園了。

然而即是天府之國，又怎經得起豺狼般統治者的幾翻蹂躪？記得一九六三年初我們從成都發沛甘洛時，路經此地仍是一片荒涼！

車進入市區，入夜的成都市上空，被輕逸的歌聲所環抱，這又與當年滿城「紅燈記」、「林海雪原」，「紅色娘子軍」的騰騰殺氣不同了，「好一朵茉莉花」，那柔美動人的歌聲從那些剛建好的水泥方格裡飄逸出來。

這一夜，我便在西城區找了一家旅舍住下，按照我歸程的計畫，路經成都，我首先要拜訪張錫錕的母親，這要先去尋找住在西城區大菜市的陳容康。

陳家和張錫錕是鄰居，但是這麼長時間了，張家已經搬遷，究竟搬到那一家？卻沒留下確切地址。

陳容康前一年回成都後，給我來信，說他已找到了張家，但並沒有寫地址，而是留下了他自己的地址。所以我來成都先要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找到他，再由他帶我去張錫錕家。

### （一）陳容康的家

第二天一早起床以後，我從旅店房東那裡問明瞭去西城大菜市的路徑，便直奔那裡。一鑽進菜市街，其「熱鬧」程度與十三年前來成都參觀時差不多，商店裡存放的幹鮮貨比之六十年代豐富多了，但街道依然是那樣的狹窄，那樣的破，房子依然是那樣的舊，那樣的黑，甚至可以說比之當年參觀時更髒更臭。

共產黨的老套，逢假節日或有人參觀檢查，預先就要向被參觀地方打招呼，清潔做了又做，檢查複了又複，直到某個地方官員點了頭才可讓參觀者進入，所以即使骨子裡又窮又爛，也要振作精神打扮一翻，免得失了「社會主義的面子」，現在距「國慶」還有好幾天，城市以它的原貌迎接了我。

穿過大約只有兩公尺寬的石板路，那巷子裡到處堆積腐爛的菜根、菜葉，那道旁的陰溝裡流著黑幽幽的污水，散發出令人噁心的臭氣，雖已時值深秋，天氣也有點冷，但爬在那些爛菜攤上的蒼蠅卻挺忙碌，一群群揮之不去。

我埋著頭在巷子裡幾乎穿了半個時辰，忽然我在一個岔道口上，看到了一個背朝著我的老乞丐，除了蓬亂的頭髮那披在身上的一件黑色的破棉衣，那背影好熟悉。

我便停下腳步來看他，他的面前放著一個酸臭燻天的泔水桶，他正用他雙手，拂打著蜂擁在泔水四周的蒼蠅，一邊伸出一隻拖著巾巾吊吊破布的手，在那泔水桶裡摸著，摸著，摸出了半個泡得脹脹的饅頭，他的眼光一亮，便將它狠狠地送到嘴裡，好像在同四周的蒼蠅爭搶一樣。

這一瞬間，立刻使我想起了從泔水裡撈馬鈴薯的鄧自新，二十年中共的監獄真把他們從人變成了鬼，同時也才讓我們看清了中共。

我從他身邊走過，深深嘆了口氣，不過那老乞丐的注意力此時在那泔水桶裡，並沒有向我伸出手來。

按著門牌的號數，找到了陳容康的門牌時，我楞住了，那分明是一個又深又黑的大院，我伸頭向裡面望去，那裡面住著五、六戶人家。

正當我跨進去時，陳容康剛好從一間小屋裡走出來。我們已分別兩年了，但他還是那個老樣，瘦瘦清矍的臉上戴著深度的眼鏡。我剛剛跨進大院他便認出了我，迎上前來握住了我的手，將我拉到大院左側最裡面的一間小屋，一面問我何時從鹽源動身的，打算到那裡去，今後幹什麼？

我回答他說，農場只給了我加刑兩年的「平反」通知書，要等回重大後再看重慶法院怎麼來收這場二十年冤獄戲？

拉開一方用白布做的門簾，他將我引進了小屋，屋裡大白天開著電燈。像這樣四壁沒有一扇窗的口袋屋，白天不開燈是同黑夜一般的漆黑。

屋裡靠門的角落，一位大約與我的母親年紀相似的花白頭髮老大娘，正坐在一架縫紉機上補衣服，那衣服至少也有四五個補丁了，不用介紹，我便知道這是他的母親，向她行了一個禮。

我環看了一下小屋。小屋大約十五平方，正中放著一家張舊式的八仙桌，兩張小床以桌為對稱中心，安放在那裡。左側牆邊靠縫紉機是一個三開大立櫃，右側屋角一塊打滿布丁的藍布將屋隔出一角，裡面放著煤油爐和碗筷炊具。

一看就明白，這母子倆吃喝拉撒全在小屋裡。不過房子雖小卻收拾得挺乾淨，因為擺設的家俱只有那麼幾件，所以小屋裡並不擁擠。只是那臨街爛菜的臭味，以及成群蚊蒼卻從那門縫處偷偷地竄進來。

陳伯母告訴我，她原來在一家街道辦的被服廠上班，陳容康回家後，為讓陳容康頂她的班，她已退休，並告訴我，她的退休工資每月才三十元，陳容康剛頂班，工資每月二十四元，母子倆將就著這間小屋，相依為命的住下了。

我問道：這大院裡住的人都同她一個單位嗎？她點了點頭說道，成都最打擠的就是住房，這周圍幾十家人除了她和陳容康外，那一家都住著三個人以上。尤其是弄堂口左側那一家，兩個大人三個孩子，還不是擠著沒辦法，屋裡安了兩張大床外，家俱幾乎只好全放在過道上，為此與鄰居經常爭吵不休。

陳伯母一邊同我們聊天，一邊又從「廚房」裡取出一個大瓷盆，走出屋上街買早點去了。

我問陳容康離開農場時管教科對他作的結論是什麼？他淡然一笑說「刑滿釋放犯，雖然名稱很怪，總算讓我回到成都同老母在一起，算刑滿人員中的幸運兒了。」

我又問他：「四十出頭的年紀了，總不能繼續打一輩子光棍。」他搖著頭，指著這小屋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和媽媽的工資只夠吃飯，還別想吃好的，那來的錢娶老婆？再說即便有人願意嫁給我，又那來的房子住？暫時我是根本沒有結婚的打算。」

我心裡為我們悲哀。一次反革命冤案，毀了我們的一生，而今都是四十開外的人了，還處於最底層，留著人生的基本問題不得解決，難道我們真的被壓在最底層翻不了身，成了社會無人疼愛的棄兒？

接著他詢問還有多少人留在農六隊，問到陳孝虞，鄧洪元、夏光然，鄧自新等人的近況。我告訴他，他們都先後去了北鳥，有的回家了，暫時還沒有聯繫。

正談話間，他的母親端著一大盆白糕走了進來，拿出三個碗從廚房裡取出熱水瓶，在三個碗裡倒上了開水，三個人圍著八仙桌，坐下用了早餐。

陳伯母介紹他十幾年的生活往事，占著離菜市場近，常能買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時陳容康哥哥也跟著他母親住在這棚屋裡，小孫子才幾歲，每頓吃飯時吵著要吃乾飯，全家人為了保證孩子每頓單獨蒸一小碗飯，剩下的糧食，三個大人就把它攪在菜羹裡吃。

全國老百姓照樣都得熬社會主義苦汁。現在不管怎麼樣，早晨還能有白糕一吃，總比以前好。

她嘮叨起來，「比以前好」這種滿足感，想起來真可愛，中國百姓的忍讓力可說實在太強，只要那種飢寒交迫的日子，不重新再來，就很滿足了。

老百姓的忍耐不是一種土壤麼？中國人為什麼在暴政下只知道忍，而不敢反抗？當年抗擊日本侵略者那種前仆後繼的精神那裡去了？

## 第二節：訪張錫錕的家

下午，我們告別了陳伯母。由陳容康帶路，走出菜市場向西城市中心解放中路走去。

他邊走邊告訴我，有關張錫錕的未婚妻在成都遇難的情況。張錫錕被捕後，她也在成都被捕，一直關押在成都監獄，後來兩人同期在兩地遇難。

身心已遭受嚴重摧殘的張母，因聞得兩人雙雙遇難，便昏了過去，從此得了老年癡呆症。如果有人在她面前提到張錫錕三個字，她會立刻抱住他，呼著張錫錕的小名，沒有人能勸阻得了。

所以他的大哥，便拒絕一切登門尋找張錫錕的人。即使有人去他家作客，他都有言在先，千萬不要當著老人面，再提到這個令母親傷心欲絕的名字。

大約半個小時後，我們便在一片水泥樓群裡找到了張家的門牌號1268。登上五樓，陳容康扣開了那扇緊閉的大門。

一個戴著眼鏡，頭髮花白的男子走了出來，當他看到老陳帶來一個陌生人時，皺著眉頭，並沒把我們讓進裡屋，而是從門裡閃身出來，向老陳問道，「今天有什麼事嗎？」當老陳介紹了我，說明來意並向我介紹，他便是張錫錕的大哥。

關於他我早已聽說，一九五七在成都一家報社工作的他，因為如實報導了大鳴大放的校園動態，便說他鼓吹資產階級右派言論，成為成都新聞界極右份子，送去勞教。最近他才剛「落實政策」，得以繼續回報社工作，這裡的房子也是才還給他們的老房。

我們握手之後，他叮囑我，因為母親的健康狀況，不要當她的面提張錫錕，張錫錕這樣一對戀人雙雙被害於同一天確實很少，毛澤東對柔弱知識份子的殘暴，在人類歷史上都少見，稱毛皇上是法西斯頭子一點不過份。

經過提醒，我有了思想準備，張大哥才輕輕推開房門，把我們讓進客廳。客廳裡顯得空蕩蕩的。這當然是「革命群眾」的功勞，像這樣的家庭不知經過幾次洗劫，早已一無所有。

臨窗的一張木凳子上坐著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兩目呆滯地望著窗外的蘭天，我想那便是張錫錕的老母了，身邊還坐著一個年紀四十歲上下的女人，手裡正織著毛衣，我猜那便是張錫錕經常提到的小妹了。

看著我們進來，老人並沒有抬眼看我們，而是一直死死地盯著窗外的天空，好像她正在尋覓那隱藏在天幕上的什麼，張大哥向他的妹妹使了一個眼色，那女人便收拾起了手中織毛衣的針線，一手攜扶著老母進裡屋去了。

大哥將老母進去的房門輕輕關上，我們三個人落坐，開始時一種壓抑使大家靜默了幾分鐘，我知道，先於我來到這裡的，已有過幾批鹽源農場的刑滿人員。所以，對於張錫錕犧牲的前前後後，似乎沒有再多說的了。

坐在椅子上木然的我，心裡不禁自問道：「這便是張錫錕的家麼？二十三年前是什麼樣子？有過歡樂和團聚嗎？那時，這位張大哥就沒有結婚安家麼？還有這位小妹也沒有出嫁麼？」

母親的樣子就不用再提，二十三年中幾經苦難怎樣重新回到這個家？這裡有多少辛酸的故事啊！

張大哥似乎從我的眼神裡查覺到我腦子裡在想什麼，開始用低沉的語調講他的母親，「這幾年來她一直是這樣獨自發呆，有時傻笑，張錫錕和他未婚妻被殺害後，對她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他繼續介紹說：「母親原來也是一個中專畢業生，為了撫養我們三兄妹，辭掉了工作，在家操持家務，我們三兄妹的學習成績都很好，這都與她的教育分不開。一九五七年，我們兄弟兩被劃為右派後，家就被粉碎。父親不久死去，剩下一個小妹，也被街道上強迫弄到農村去，從此便剩下了母親孤身一人。」

「有一天街道居委會的人對她說：『你的娃兒都是反革命，這是你教育的結果，你有責任也應當悔罪，所以要真改造自己，農民種出來的糧食不能白白的把你這種人餵著。從明天起你要自食其力，不然國家發給居民的口糧，你就得不成了。』」

「為了生存，從此她便在居民委員會的強派下，替人帶孩子，掃街道，替百貨公司拉板板車。凡是別人不原幹的事都派給她幹，周圍的小市民用冷眼對待她，她自己也明白自己的身分，只是忍氣吞聲的幹活，否則她就拿不到『糊口』的糧票和生活費。」

那時被拉去鬥爭，戴高帽遊街的事是家常便飯，還叫她每一個月要寫思想改造的報告交到段上去。」大哥說到這裡略略停頓了一下，好像在清理腦子裡被刻得亂糟糟的傷痕

「被人欺侮還不准還嘴，這就是群眾專政。小妹從下放的農村裡跑回來和那居委會主任講道理。結果反被轟哄了出來，說她擾亂社會秩序要拘留她。」

沒多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街道居委會的指使下，紅衛兵四次抄了她的家。將我多年珍藏的字畫拿走了，說是封資修的東西一律要沒收。他們一來砸鍋，砸碗，母親看著這群強盜不敢說話。

過了不出半個月，第二批紅衛兵又來了，將家裡幾件父親遺留下的衣服全拿走，還逼母親交出我沒有帶走的日記和信件。

第三次紅衛兵把家裡的家俱全部搬走了，只給她留下一張小木床。第四次，紅衛兵說你這個反革命老婆子，沒有資格住在這裡，便將她趕了出來，住進了一間又髒又黑的小屋子裡。並向她宣佈，不准她同任何人接觸，不准她的女兒回來看她」。

「後來那街段的主任通知她，她二兒的女朋友，因為猖狂反對毛主席將被槍斃，要她去看，她像犯人一樣被押進公判大會的會場，親眼看到自己的媳婦飲彈刑場。回來後，便再也不講話，只有每到傍晚獨自倚在那黑洞洞的門口，盼著那些不歸的孩子們，殘酷的現實將她終於逼成了這樣！」

客廳裡靜悄悄的，誰也沒有出聲，大家都陷入了悲哀和沉思，好一會兒，大哥才繼續的往下講，「我是去年落實政策的，二弟他們倆竟然永遠不歸了，托鄧爺爺的福，回成都後，我回了報社，不久二妹也回來了，我們這個家大難不死的人，想不到還有團聚的一天。」

「我剛回來的第二天，便去找母親她老人家，原來的房子不在了，問了好幾個人才找到一個胡同裡的那間小黑屋。走進去，便是一般難聞的臭氣，她呆呆地坐在小床上，看到了我竟然白著眼，好像不相識的陌生人。」

「我說：媽媽我回來了，她仍然呆呆地望著我，我看她滿頭的白髮，衰老不堪，屋子裡的臭味便是她撒在身上的屎尿，她已經完全不成人形了，」

說到這裡，大哥的眼睛紅潤了，停頓了好一會兒繼續說道：「我們的老屋已經拆掉，按政策的規定，補給了我一套報社家屬的舊住宅。搬家那天，她死活不走，也不說話，幾個人只好把她抬到這裡來。」

現在經過大半年的醫治，她的神志才慢慢恢復，知道吃飯，解便。但是從此以後像白癡一樣。醫生說，她得的是老年性癡呆症。叫我說，這便是被他們逼成這個樣子的。」

今天，我原帶著一種內心的敬佩，想來安慰一下這位英雄母親。原先準備了一肚子的話，竟被眼前聽到的這殘酷故事，全壓回到肚子裡去了。我知道大哥只是簡單的講了他的母親，至於他個人，還有他的妹子，大致都有各自不堪回首的往事。

面對著癡呆的母親，面對著這對強忍內心巨痛的兄妹，我什麼也說不出來。此時，我才明白，何以在我還沒有跨進門來時，大哥便走出門來打招呼！

看來這是一個相當堅強的人，所以才坦然面對所有不幸。

大哥的話一完，客廳裡又陷入了沈默，對於我們三個經歷了「階級鬥爭」風暴摧幾十年的人，更多的恐怕是思考！！

過了好一陣，話題轉到「落實政策」上來，我們都是過來人，關於平反，我和他心裡都很清楚，這僅僅是中共權力鬥爭的需要，不存在對過去的檢討和悔意。他的報社給他一套舊房，作為沒收原來住宅的補償已是天大恩賜了。

當我將要告別時，我才從我的跨包裡取出了一付「松柏圖」，那是我離開鹽源之前托人上鹽源縣城買好的，上面有我寫的題詞：「張錫錕難友永垂不朽。」現在彷彿只有借這付畫來講述我今天無法講出的話。

將它送給大哥以後，我們便起身告辭。出得門來，走到樓下，夜幕已悄然降臨。沿著通向外面的馬路，我走出幾十步外，猛然回首，抬頭朝剛才的陽臺望去，見那上面一個白髮蒼蒼的身影，不知何時悄然地佇立在那窗口下面，我明白那是她十年的慣例。

這是二十多年的心頭傷，每當黃昏時分，失去兒子的母親，仍在翹首盼著孩子的歸來。聯想到此時此刻，我的母親也會在蔡家醫院的窗口下，倚窗遙望著我的歸來。

可憐天下父母心哪，我的母親比起張錫錕的母親，也許算幸運的，她畢竟還沒有逼成老年性癡呆症，她畢竟活到了自己失去的兒子歸來時刻。

回到旅舍已是晚上十點鐘了，這一夜又失眠了，躺在床上，一閉上眼睛馬上就浮現出今天下午的情景，張媽媽那一頭白髮，滿臉憔悴，倚靠在窗子下麵，形容呆滯地望著我。

好不容易睡著了一會，就見她拄著拐杖向我走來，走到我跟前突然開口道：「你看見我的老二了嗎？他在那兒，你能帶我去嗎？」

我驚出了一身冷汗，乍然醒來，才晚上十二點鐘，便坐起身來想著可憐天下的慈母，可憐我們不幸一代的母親，其實她們比我們還不幸，除了承擔社會的歧視欺侮外，還要承擔對孩子挖心般的牽掛。

坐在床上越來越亢奮，便索性起了床，打開成都市的地圖，按照我原先的計畫，拜望張錫錕家已經完成，若要拜訪成都的舊友，一來時間倉卒促，來日方長。二來住在成都市區除了陳容康和張錫錕外，其他人的位址我還沒記載，所以準備天亮就去火車站買回重慶的車票。

當我走向火車月臺時，心情說不出的感慨。二十年前，我經過這座城市，從重慶彈子石監獄押到了涼山甘洛，而今我又從這裡提著簡陋的行囊從回渝城，想到當年同時押赴西行的人，現在所剩無幾。我的眼前浮著那些當年槍押的無辜年輕人的身影，和太平間裡水腫的同難，我們究竟是為了那一樁，要遭遇這場不明不白的殘害？

按理講「右派」是中共內部的劃分，自從中共建立之日起，因爭「聽誰的」？內鬥從沒間斷，美其名曰「路線鬥爭」，特別是毛澤東登位，在他不可告人的動機下，這個鬥爭日漸殘酷野蠻擴大。

毛把黨內的權力鬥爭延伸到全社會，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便從共產黨內延伸到全體知識份子。使當時毫無政治傾向的青年學生，也成了這場鬥爭的犧牲品。

現在中共仍在為這場罪惡辯解，用「擴大化」替毛詭辯。其實完全無知的學生，才是被整得最慘的政治犧牲品，他們被糊里糊塗扯進這場是非之爭，接著又面對中共在「三面紅旗」的恣意胡來。

保持良知的人，為反抗暴虐登上了政治午台，他們唱出了一曲曲抗暴壯歌。其實他們並無涉足中共權力爭奪的想法。

然而今天，對他們行苦役二十三年，連起碼的工資都無理剝奪，對他們善後處理草率應付，證明中共是一個殘暴成性，極不負責任的黨。如果它不放棄追求專制獨裁，還政於民，難說不會再出現「反右派」相類似的慘禍。

我已年過四十，體弱多病的殘身上刻著好多好多的傷痕，現在踏上歸程時，還得重新開拓自己的生活，尋找還十分模糊的生活起點。

當我上了火車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對那車窗玻璃映出來又黑又瘦的臉發呆，我十分清楚知道，我的青春年華伴著災難永遠埋在遙遠大山那一側了。

從這一點上說，我和那些犧牲葬身在那裡的難友並沒有什麼兩樣。如果說我是在回家，那麼今天我只是去同我那白髮蒼蒼的老母親重逢。

### 第三節：被暴政摧毀的「家」再組合後

當火車緩緩開動時，車輪撞擊鐵軌發出有節奏的響聲，將我疲憊的神經鬆馳下來，我拉開車窗，任疾風吹拂我的頭。遠處田野在茫茫暮色中越來越模糊，我好像身不由己的飄了起來，飄離火車，在茫茫一片中，漫無目的向前遊去。

乍然間來到一處白霧茫茫的森林之中，從那望不見的深處，傳來了一陣老女人嗚咽聲，循聲奔去，漸漸地從白霧繚繞中見到一處隱約的茅草房，那哭聲便是從那茅草房裡面傳出來的，便好奇的推門而進，才看到半昏的屋

裡，一個白髮滿頭的老太太，背朝著門坐在一個小木凳上哭泣。

我正躊躇著站在門口不知所措，不料她卻已經轉過頭來，然而她那披頭散髮，老淚縱橫的樣子，使我無法在黯淡之中看清她的臉。正徬徨時，她卻站了起來，向我撲過來，並喊道：「兒啊！你怎麼不認識我了呢？你走了這麼長的時間，怎麼連信也不寫一封，害得我天天哭，眼睛都哭瞎了。」

我連忙接過她伸向我的手仔細地端望，她的眼睛已經瞎了，而那臉頰右側的額頭上一個米粒般大小的黑痣，是我母親的標誌。看那面容蒼老得比我當年的外婆還蒼老，尤其是那雙被淚水和眼屎黏成的眼睛同外婆幾乎沒有兩樣，真沒想到這二十三年竟把她變了這般樣子。

認定後，我在她面前撲通一聲跪倒，連連磕頭，喊道：「不孝兒讓老母如此折磨，望母親賜罪」。那老人忙用顫抖的雙手，扶我站起來。想不到同母親一別二十三年卻在這荒無人煙的地方相逢，正擁抱著相泣，哭聲振動曠野。

忽然門外有人大喝道：「好大膽的孔令平，我們抓你好多天，今天果然不出我們所料，你在這裡同你頑固不化的母親在一起，你這傢伙二十年來從無反悔的念頭，今天竟敢私自越獄，還不趕快同我們一起回鹽源伏法？」

我聞聲趕緊回過身去，認得來人正是六隊的何慶雲和鄧揚光兩人，正想開口反駁，一付冰涼的手銬已經套在我的手頸上了，我被兩個兇惡的獄吏拉扯著走出茅屋，拚拼命地掙扎著。

此時回頭去望，那老母和茅屋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我驚叫了一聲，猛然醒來，卻是南柯惡夢。

我坐旁的車窗已被鄰近座位上的旅客關上，車廂裡電燈倒很亮，肚子裡感到飢餓。正好裝滿晚餐的小車被服務員推了過來。我買了一口袋的白麵饅頭和一包榨菜，就車上的開水吃起了晚餐。

鄰近的幾位看樣子好像是出差的，見他們已經取出一個折疊好的小木板，打開以後，是一張一米見方的牌桌。架在兩排座椅的中間後，取出一包麻將倒在那小桌上，希裡嘩拉的打起了麻將。

車廂裡附近座位上的幾個人都圍上來。一時間吆喝聲、搓麻將的聲音混成一片，我心中感到厭煩。於是獨自起身，走到本節車廂後面的座位上去。

大難過去，原來的家人大多已失散亡故，被破壞的家根本無法修復。生還的人們便在相似命運的人中，力求重新組合成一個新家。

離開鹽源前母親來信，要我回重慶時，回到北碚前，先去九龍坡區的李家沱我的「妹妹」家裡住兩天，再由她安排回到北碚蔡家場。

所以我到重慶下火車沒有在菜元壩，而是提前在九龍坡車站下車。說來，這是母親又一段傷心事：——

一九七二年，孤苦無告的母親因縫製過冬的棉衣，被蔡家醫院的「革命群眾」誣為偷了醫院的棉花和布，鬥爭了一場，還挨了一頓毒打，本來就因失去僅有的小兒子，已萬念俱灰的母親，在挨打的當晚去蔡家的一口池塘自殺，被醫院一位職工的母親救阻。

第二天附近一家名叫胡德明的農村婦女，因可憐母親的遭遇，將自己僅七歲的女兒抱給了她認作義女，後來還為母親物色了一個老伴，善良的蔡家場農民為母親作此安排，既可相伴母親的晚年，又可以在被人欺侮時，有一個保護她的人。

小女兒的生父，因信奉一貫道，而被下獄勞改，刑滿後便一直在德陽九五工廠就業，另一個與他同一工廠的就業人員鍾治淵，曾是母親在抗戰時期辦學的二十五兵工廠的一個學工，原本就認識母親。

有一次兩人一齊到了蔡家場，經過胡德明的介紹和撮合，一九七五年母親與鍾治淵結成老伴，鍾老伯的女兒黃雪梅，當時就在李家沱的重慶國棉六廠做擋紗工，於是商定好，我回重慶後，先去雪梅家裡，以認同一個重新組成的家。

按照母親的安排，當火車過了小南海以後，緩緩馳抵九龍坡時，我懷著陌生而悵惘的心情，挑著行李下了車，踏上了這片陌生的「故土」。

李家沱與南坪相隔不遠，一九四九年，父親就任中央政校重慶分校校長時，我們就住在南溫泉，雖然李家沱僅隔南泉不到十裡地，但因當年居住短暫，我從來沒到李家沱街上去過，沒有一點它的印象。

下車時大約是第二天凌晨四點鐘，寂黑一片之中，一時還找不到身處的位置。正站在那碼頭的鐵門出口處張望，突然從下面傳來了一聲機動拖駁的長鳴，一陣從那個方向吹來的江風提醒了我，正前方便是嘉陵江出長江的交口處。

定睛看去，在澎湃的江水聲中，點點燈光和朔江而上的機動船正在夜色中穿梭，而剛才同我一起下車的旅客大約十幾個人，都朝著左前方一條依稀可辨的小路往下走，已經距江面五十多米了，聽見有人在喊，「快！輪渡靠岸了」。於是我毫不猶豫的挑起行李，急忙跟著往下跑。同這些「同路人」一同登上了開往對岸的輪渡。

站在輪渡的甲板上，天將黎明的夜風，吹得我十分的清醒和舒適，聽著船底拍擊江水的聲音。在我的記憶裡，在這條江上坐船，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

那是在重慶大學讀書時，每次進城，上午下到中渡口的渡口，登上輪渡，朔嘉陵江而上到朝天門。下午再順江而下回校，想不到就此以後的二十四年，我竟連輪渡都沒有看到過。

輪渡靠岸，我夾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沿著石梯，登上了河邊菜市，此時天已朦朧，早起的小販早已忙碌開了，我詢問了去李家沱正街的路。

等我挑起行李走過菜市，再穿過幾條寬闊而靜靜的大街，按照『妹妹』來信中的地址找到她的「家」時，天已放亮。

在一幢四層樓旁的面前，我向在那裡坐著的一位守夜執勤的老伯打聽，這裡有沒有一位叫黃雪梅的住戶？那老大爺立刻知道我是「遠方」來客。他十分熱情地幫我卸下肩上的擔子，一手提著其中的一頭，將我帶進走廊裡第三間房前，敲響主人的房門，裡面的主人好像也早有準備，從裡面迎了出來。

我打量著迎出門來的兩位，個子矮矮的大約二十多歲的女主人，想來便是我的異姓『妹妹』黃雪梅，而那位年紀不出三十的男主人，一定是我的異姓『妹夫』李修平了。

主人的住房僅僅只有二十平方公尺，他們的孩子還在夢鄉中沒有醒來，看看壁上的掛鐘才六點過一刻。

「早就知道你回來的消息，就是不知道確切的時間，不然怎麼也應當到車站去接你的，」李修平接過我手裡提著的行李，那語氣像對自己久別的大哥那樣。「妹妹」連忙走了出去，從過道對面的「公用廚房」裡端來了一杯熱茶。

「本是昨晚八點的車票，原來估計到重慶應是早上，沒想到半夜就到了，驚吵了你們真是對不起。」我解釋說，話裡的歉意是真的，因為這個毫無血緣關係的「家」，對我完全是陌生的。

『妹妹』和『妹夫』招呼我坐下以後，『妹夫』說道：「今天先洗一個熱水澡，去去一路上的風寒，再好好地睡一覺，你來這裡，這就是你的家，一切都隨便一點。」

他感到了我的侷促，一邊說，一邊走進了廚房。『妹妹』也跟著走了出去。夫妻倆的熱情，一點都沒有露出毫不相識的隔膜。對我這個二十年從沒感受家庭溫馨的流放回歸者，送來了一股說不出的溫暖。

屋裡只剩下了我和床上還在熟睡的孩子。

我細細的看了看這間僅二十平方公尺的房間，一張床一個大櫃，一個靠窗的辦室桌已夠擁擠，這便是當年住房相當「寬裕」的三口之家。看看床上熟睡的孩子，他大約只有五歲。但是今晚難道我也住在這兒麼？心中一陣納悶。

目光順著那床的擋頭，向上移去，那上面掛著一張七寸的黑白「全家福」照片，其中便有我日夜思念的母親，真是做夢都沒有想到，這就是我的未來家庭的成員？一種說不出的疑慮浮上了心頭。



正陷入沉思，『妹夫』走了進來，一大桶熱氣騰騰的洗澡水已放在過道一側，一間只有三平方公尺的洗澡間裡了。

『妹妹』從街上端回了油條和豆漿，孩子也從夢中醒來，見了我並不顯出陌生。她一邊為他穿衣服，一邊向孩子說，「舅舅是大學生，知識可淵博呢！今後呀！你要好好跟舅舅學文化學知識，將來也是大學生。」

此時！我才感到了一陣尷尬，我怎麼就沒有想到給這個「外侄」帶一件玩具或是衣物之類的見面禮呢？唉！從進了這個屋子的第一秒鐘開始，說話、坐、喝茶、同孩子交談，每一個動作好像都是我生平以來的第一次。

『妹夫』告訴我，『妹妹』在重棉六廠上班，這房子就是六廠的家屬房，而他自己在區政府的食堂裡當炊事員。

這是一個普通工人的家庭，他們對於我的熱情不但是因為同情，還因為他們對知識的渴求和羨慕，其實他們沒把我們當作「階級敵人」看。

我在『妹夫』的安排下，睡上了屋裡那張唯一的床，他提著菜籃子上街了，臨走時，將那臨街窗戶的窗簾放了下來。

這一覺，我睡得很香，什麼時候叫醒我起來吃的中飯我都記不得了，下午又繼續的睡，直到五點鐘，算是把接連幾個夜晚失欠的瞌睡全補上了。

『妹妹』帶著她的兒子已經回來，吃晚飯的時候，『妹夫』告訴我，他的老父親就在這條街的下半段，開了一家裁縫鋪，說父親原是這裡土生土長的人，當了一輩子的裁縫，論手藝算是附近最好的，遠近的人都找他裁縫新衣，所以他的鋪子生意不錯。

上個月母親拿來了幾段料子，請他給我打兩套合身的中山服，只因估量的尺寸不一定合我的身，所以一直還沒動剪刀。現在，正趕上我人來了，正好去量一下，於是在他的陪同下到了他父親開的裁縫鋪去。

他的父親五十多歲，一看便知道是一個熟練的裁縫，他指著我身上穿的藍布衣服（那本是用勞改服改制的）說：「現在不興再穿這種土藍布了，把新衣服儘快給你打好，你也體體面面的穿著回北碚」。

量完我的衣服尺寸，我們告辭他回到『妹妹』家的路上，我就想，總不能和他們一家擠在一個屋子裡過夜。所以一路留神看看有沒有旅館，但是所經過的路上竟沒有一個旅館。

進屋時我才看到，在靠窗戶那一塊唯一的空地板上，鋪好了一個地鋪。『妹夫』宣佈我和孩子今晚睡床上，他們倆口子睡地鋪。

這種反客為主的安排使我更加難堪，我執意要去尋找旅館，說已經給他們添了很多麻煩，怎麼能為了我攪亂他們正常生活？

夫妻二人堅決反對說，既是一家人就不應分彼此。還說我把他們當外人看，再說重慶市住房本來就很緊張，一家人中兄弟倆都結了婚，就因沒有房子，而住在一間屋裡的也是常有的事。同時這麼晚了，上那兒去找旅館投宿？

爭論了好久，最後達成協定，『妹妹』一人睡地鋪，理由是她的年齡最小。人雖然睡下了，可是我的心裡卻一直都在不安。真沒想到我這個來客，給別人平添了這麼多的麻煩。

「回家」的第一站就夠拘束了，加之白天睡得太久，我睡在床上就像睡在針毯上般難受，翻了幾回身仍毫無睡意，我實在不願再這樣窘迫了，打定主意，明天，我就動身回北碚。

下半夜我一直都在側耳細聽，窗下馬路上有沒有人起身走動，好不容易聽見有人推著小車沿路掃街的聲音，我便悄悄地坐起身來，穿好衣服，正向窗下伸手去取行李，卻被中間的地鋪隔著。我看了看和衣睡在那裡的『妹妹』，正躊躇間，『妹夫』已經醒來。

他睡眼惺忪的問我怎麼這樣早就起床了？我支支吾吾地回答他，我想趕早班公共汽車回北碚去了。他聽說我要走，連忙坐起身來，說：「媽媽交代待了的，要你在這裡住幾天，說什麼也要等給你制的衣服打好了以後，換

了衣服再回去，再說到北碚要換幾次車，你一個人是找不到該怎麼走的，今天你要走，我連假都沒有請，誰來送你呀？」

他這一嚷，吵醒了睡在地上的『妹妹』，兩個人一齊阻攔我今天回北碚。我這剛跨進這個家庭的「新成員」，患上了「邊緣症」。哪能那麼容易溶入一個陌生的新家庭？現在只好忍受這種拘束和窘迫，服從主人的安排，暫時住幾天了。

三天後，我終於換上了「姻伯」為我趕制好的新中山服，『妹夫』專門的請了一天假，由他陪同我一起從李家沱回北碚了。按照我來的路線，重新坐輪渡返回江的北岸，到九龍坡車站乘坐去沙坪壩的客車。

廿多年過去了，客車經過小龍坎時，那狹窄的街道還是那樣，只是當年我住的醫院已經不在，我竭力搜索著那裡，尋找當年我和弟弟「團年」那家飯館，但是我卻沒有找到，也再看不見他那憨厚的臉和瘦高身影了，一股悲哀再次猛烈地掠過了我的心頭。

當車過楊公橋時，我又想起了當年剛考進重慶大學的那一段生活，為了節省開支，我從學校回家經常是穿著草鞋步行走路。記得那時早上五點就起床趕路，整整要走十個小時，途經的地方全是農村村落，直到下午五點鐘才回到北碚。一雙新草鞋就在這長途歸途中穿破了底。

當汽車經過雙碑時，我把頭緊緊貼在車窗上，這是我童蒙時代的搖籃，詹家溪！我曾在這裡頑皮，那兒有我童年的美麗回憶。

記得媽媽有時到沙坪壩去了，我就向外婆說，今天該我好好玩一天了，便到附近玉米地裡取下那紅紅綠綠剛發出來的玉米須，用飯粒貼在嘴上，手裡舞著過年去磁器口買的大刀，裝成戲臺上的楊家將，在院子裡同幾個同齡的孩子們「殺仗」。

詹家溪小學不知道還是不是那個老樣子？高自強是我的啟蒙老師，那時，我感到她比我的母親還嚴厲，記得她常常講：「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後來我才明白它的意思。唉！不知道她現在還在那裡麼？她還健在麼？

我從車窗裡望見了那遠處的松林坡，那山上也是我常常獨去的地方，睡在松樹底下，靜靜聆聽江風吹打松樹激起的濤聲，有一種我自己才聽得懂的大山語言，像詩。天晴的時候，我又最喜歡到山頂的花園裡去，睡在花叢下面麵，靜靜的欣賞繞著花朵繁忙採蜜的蜜蜂鳴叫。

童年美麗的畫面，被二十三年地獄的惡夢，擠到了一個最小的角落裡，突然碎成了幾片。只是沒能消滅的天真無邪片斷，此刻又漸漸恢復過來！

想到再過一會兒，我便要見到整整分別了二十二年朝思暮想的老母親，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緊張湧向心頭。媽媽就是在這裡，經歷她中年時期最悲慘的十八年煉獄！

在這裡她經歷了她老年喪子之痛，直到痛不欲生，投塘自殺！

當汽車緩緩爬上山崗，在橫貫蔡家的交叉路口停下來時，惶恐佔據了我，這是一座鄉場，一座中國大地上普通的，在當時又是那麼貧窮邊僻的鄉場。

那大約只有兩公尺寬的石板街道的兩旁，歪歪斜斜地矗立著兩排高矮不同的泥夾竹牆結構的平房。

我和李修平走在街心，從路人的眼光裡帶著陌生，我想大概因為我看上去又黑又瘦的緣故。

距場口兩百公尺，機耕道左側寬約二十公尺的石臺階後面，立著一排兩層的樓房，中間是雙扇的大門，大門的右側懸掛的白漆木板上寫著：「北碚蔡家鎮人民醫院」九個大字。

雙扇大門的前面，站著三個穿白大褂醫士模樣的人，冷冷地看著我們走進醫院大門，並不答理。我跟在李修平的身後，逕直朝著門內的樓梯走去，上了二樓向右拐進了過道的第三個房間面前，才停下了腳步。

李修平輕輕地去敲那門，那門是虛掩著的，一敲門，門就打開了，屋裡並沒有人。他擰著行李跨了進去，一面告訴我：「到了，媽媽就住在這裡」。

我跨了進去，將行李放在中間那床的前面，李修平說，媽媽就睡在這裡，說完他走了出去。

#### 第四節：同母親重逢

我一個人留在屋裡，這是一間二十平方公尺的病房，屋裡放著三張病床，每個床頭都安放著一張舊辦公桌，桌上放著煤油爐和裝著油鹽醬醋的瓶瓶罐罐，床下和兩側都堆放著紙箱，木盒等物。

整個房間便以這三張床為中心，三分整個房間。每一張床之間留著很窄的過道，僅只能一人通過。雖沒有布簾隔開，但一看就明白這裡住著三位單身職工。

耳朵裡響起了雪梅的話：「在重慶地區像我們這層樓一家人占了一間房子住，是最好的人家了……。」我終於明白，何以母親要我在「妹妹」家多住幾天的原因。

看來母親受了二十二年罪，共產黨給她「平反」了，卻連自己安家立身以渡晚年的立椎之地都沒有。

在我回來之前，為了安置我，恐怕不知向她的「組織上」費了好多口舌？最後仍只有無奈的在這個集體宿舍裡，迎接我的歸來。

我再次環視了我的「家」，我今後的路要從這裡作起點嗎？

十分鐘後，過道裡傳來了腳步聲和講話聲，李修平回來了，他的身後緊跟著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媽媽，我立刻回想到我離開她時的臉貌，沒想到二十三年後她已蒼老得那樣！但我仍能根據輪廓認出，那便是我二十三年來魂牽夢縈的老母親。

她與當年撫著我的頭，依依惜別的老外婆，真是一模一樣，最大的特點是背也變駝了。

當我們母子的眼光第一次接觸的那一瞬間，我便被一股上湧的血堵住了胸口，一時連話都說不出來，只是走上前抱住了那花白的頭，親吻那滿布皺紋的額頭，當我的胸前已沾滿了母親的淚水，當血液猛地衝開了被堵塞的心竇，這二十三年有多少的經歷要講，有多少哀怨要訴，有多少淚要流啊！

而媽媽卻一個勁地用她那乾癟的手輕輕地拍打著我的背，佇立良久才喃喃地說出：「這下好了，總算回來了，總算回來了！」

我看著桌上的鬧鐘，已經快12點了，忙把話題岔開，故意發問道：「媽媽，中午了，該做飯了！」媽媽才鬆開了手，擦了擦老淚縱橫的臉，去那床邊紙盒裡取出一塊肉來，李修平接過手，到盥洗室裡洗淨，大家忙著生火炒菜，從伙食團打回米飯，三個人圍著那張辦公桌，吃我回到母親身邊第一餐「團圓飯」。

我們正吃飯，兩位與母親同室的醫生，端著飯盒子走了進來，母親向我介紹了她的同房，與母親差不多年紀的那一位，家住北碚街上。另一位比母親年輕的醫生住在沙坪壩。看來在這間屋裡，無家可歸的就只有母親一人了。

從六八年弟弟出走後，整整十多年，她就這樣孤苦伶仃，守在這人間地獄裡。！從現在開始，我的到來成了她新生活的開始。

午飯以後，李修平回李家沱去了，他晚上還要上班，母親一再向他道謝，並且說，過年時一定到李家沱團年。

我被新任的醫院黨支部書記王光明，安置在樓下一間病房臨時住下，距我住的那房間不到10米，巷道的盡頭，就是停屍房，我並沒有去看整個醫院還有沒有其他空著的房間。

初來乍到一大堆問題要解決，有一個窩暫能住下，懶得去同醫院的「領導」發生磨擦，何況二十三年挫磨已使我習慣了忍讓。

二十三年來，我也不知同多少死人打過堆，自己一半也是從陰間裡走出來的，自以為一身正氣，不怕夜半鬼來抓我。

現在回想，那醫院的黨支部夠體現『落實政策』！

## (二) 相親

兒子長大成人後，傳統的中國母親，恐怕沒有比關心自己的孩子婚姻大事更重要的事，那怕她們一直處在社會底層，我的母親也不例外，當一九七三年她接到我第一封信後，一直沒有忽視給自己的兒子物色一個對象。

但那個年代，凡沾上黑五類的，就等於染上了永生醫不好的絕症，準備著跟男方不幸的家庭，一輩子受人歧視。

所以好人家的女兒，自願接受一個「黑五類」，或者是刑滿釋放人員，實在太少，但是恰恰就在這畸形的「階級鬥爭」社會中，卻藏著一些讓人費解的故事，我的故事得從我給母親的通信說起。

一九七三年我和母親整整十五年音信杳渺無，一旦接上通信聯繫，我對親人的思念和所受的委曲，會自然流露到這些信件之中，乍讀起來有的像無韻詩。可偏偏這些信件都先要由蔡家醫院造反派的頭過目，這些經過文革鑄造出來的近乎文盲的寶貝，是連普通的抒情語言都讀不通的。

那曾用柴棍搥打母親的劉巴，卻像發現了「秘碼」似的，以為又是表現她的階級敏銳性的好機會，便將我的信拿到他們學習會上公開朗讀。要大家討論這些『反面』教材。

偏偏在坐參加學習的人中，有一位從北碚衛生防疫站來蔡家醫院蹲點的醫士，名叫鄒雙銀的姑娘，卻被這些內容新穎的信件吸引，她不但在討論會中解釋那些被劉宣樹說成「隱語」的典故，例如亡羊補牢一詞被劉宣樹說成，我想殺了羊子從牢房裡逃出來。

散會後，鄒雙銀私下向我母親索要這些信，這位才二十三歲，還守在閨中未嫁的姑娘，找到了一個機會向母親表露了她的內心，並認母親作乾媽。表示願意等我到刑滿以後。

母親聞訊大喜，即刻將這個消息寫信告訴了我，並且在那封信裡附上了她的照片。後來當我的「平反」開始進行時，我被場部蔬菜組的惡犬咬傷，她聞訊後，為我配製了狂犬疫苗，用航空掛號為我寄到鹽源。

我回到北碚時，鄒雙銀已調回了北碚防疫站。當時沒有電話，母親把我回來的消息，寫了一封信寄給了她，一周後，她回了母親的信，約我在那一周的星期天去北碚見面，地點定在大菜市街口。

母親打開了她放在床頭的紙箱子，從裡面取出了專門為我織好的新毛衣，新毛褲，以及一雙才買的新皮鞋。可是當我穿上這些新裝時，衣袖和褲腳都短一截，媽媽感慨地搖搖頭說，「在我的腦子裡，你還是那麼小。」

是呀！我被劃為右派離開家的時候才十九歲，一個稚氣的孩子便被「反右」的惡浪從她身邊捲卷走了，而今過了二十多年，留在她記憶裡的那個孩子，怎麼能同現今站在面前的，從獄中滾打出來的中年人相比？

看媳婦可不是鬧玩的，人家是醫士，總不能讓自己的兒子一付寒酸相像，出現在人家的面前。幸好有那兩套從李家沱帶來的中山服，勉強的可遮蓋裡面短小的毛衣。

只可惜那皮鞋足足小了兩個碼子，穿上腳實在夾得開不起步，還不如自己腳上那雙從千里路走回來的蘭色解放鞋，既來得輕便，又舒適。

媽媽要馬上去街上買一雙，卻遭到了我堅決的反對，我的理由是，對方只講究外表，而不是看重我的內在，她又何必等我到今天？

於是在母親的督促和省視下，我穿上了新毛衣，新的中山服，只是這雙解放鞋卻被我固執地保留下來。

穿著一新，母親從不同的角度對我全身上下看了又看，勉強地點了點頭。

星期天早上八點鐘，我和母親在蔡家場那十字路口，上了去北碚的汽車，九點鐘我們準時按照小鄒指定的地點等她。三分鐘後，一個穿著十分講究的姑娘，從市區的方向向我們走來。

母親連忙迎了上去，我也立即認出，這便是母親寄給我相片的那一位。

只見她身著一套灰白色的新西裝，經過了特別的熨燙，白色的大翻領襯衣外面打著一條黑色的領帶，頭髮也是剛剛燙洗過的，微微的蜷曲，卻黑得發亮，腳上穿著一雙擦得油亮的黑皮鞋，手臂上背著一個白色皮包，還沒有走近，就將一股清香的香水味向我送來。

這身打扮，當時要算是講究的白領人士了，與我身著灰色中山服腳踏蘭色解放鞋，皮膚黝黑顯得土裡土氣的裝扮相比，很不配稱。

我很笨拙的放下兩手，不自在的臉上推起了笑容，其實我自己都覺得笑得極不自然，簡直可以說是裝出來的。

一陣侷促的壓力之下一時不知怎麼開口，看著對方笑吟吟的樣子，見對方已將手伸向我，我才木然的將放在身邊兩隻僵硬的手伸了過去，握了握她肥胖而白嫩的手，便慌忙收了回來。

我已經完全不記得她看到我第一眼是什麼表情，還好母親已經拉著她的手，朝著通向市區的那條路走去。我才像解了圍似的，放下被弄得緊繃繃的身架，跟在她倆的後面，簡直就像是一個跟班的僕人。

但是幾分鐘後，我那在獄中多年形成的自信，超然和獨傲，很快矯正了我最初頗有些狼狽的侷促，心裡卻還在不斷地的埋怨自己，虧你還是一個身經百鬥的猛士，怎麼見著一個女人便輸掉了應有的男子威嚴和陽剛？不是說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麼？今天怎麼會變得如此？

於是我挺起了腰桿，將那方才僵硬的手背在背後，若無其事的顯示自己是在同「朋友」一起逛大街。可惜，我們依然沒有講話，我也依然沒有走上前去同她並肩而行，只是默默地跟著她倆的後面，想著該用什麼問話來試探對方。

醫學方面我一時找不出恰當的問話，至於文學歷史，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的開口。於是，我們最初相見的瞬間，給對方留下了致命的印象，直到兩個月後，母親才告訴我說，小鄒當時就坦然地問母親：『他怎麼是這個形象，又黑、又瘦、又老，連話都講不出來？好像監獄把他關傻了一樣！』

唉！早知我的形象那麼糟糕，怎麼也不會匆忙跟著母親到這兒來出洋相。

我們沿著中山路，母親和她走進了百貨商店，我卻毫無興趣的站在商店門口等了足足十五分鐘，當她們倆出來時，我和她又對視了一下，我能感覺出，她那眼光裡含著一種挑剔，我原先準備好的話和天真好奇的發問，不知為什麼全都咽了回去！。

我終於鼓起勇氣發問道：「防疫站隔這兒有多遠？」「噢，大約一裡多路」她回答得很隨便，而且讓人無法把話接下去，我的這句打破僵局的主動，被她簡短的回話擋住了。

看著她仍挽著母親，按照原路重新折了回來，我仍然傻呼呼地跟在後面。回到了開始約會的菜市口，看看時間已快十二點了，母親選了一家臨街的飯館點了幾個菜，三個人共進午餐，我瞅著堂倌還沒有把菜端上來的空擋，第二次鼓起勇氣試圖打破我們之間的僵局：「防疫站工作忙吧！」我第二次主動發問。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說：「還好」，接下去又是沈默。

就這樣，經過我兩次努力，想打開同她對話的話匣子，卻沒有成功。接下來，只好閉上嘴默默無言的坐在那裡，直到母親張羅著堂倌把菜端上來，各自悶著頭把飯吃完。

吃完飯後，她便起身告辭，說她下午還要值班，便提著她的手提包離去了。我出獄後的第一次「約會」就這麼尷尬的結束了，以後我們幾個月都沒有見過面，直到母親講出了小鄒見到我第一面的印象。

看樣子，頭次見面便改變了她四年前的初衷，不過母親告訴我，小鄒並沒有明確的表態，是拒絕還是維持，還是待觀察，這給母親始留下一線希望。

所以她一再催促我打主劫戰，但我明白，我們這個經過「階級鬥爭」沖洗過的社會，幾乎不可能發生卓文君和司馬相如那種美麗的故事了。

何況我並不具備才子的條件，對方也絕非佳人。不過，我這種形象，難道不是冤獄造成的麼？對方因同情心還是因我在書信中那點文才產生的感情，有四年的等待已不容易，雖然這四年的等待因對方的又黑、又瘦、又老

的外表而告吹了，這本是二十三年改造的功力所要達到的目的，『無產階級專政』真的把我變成了鬼，又能怨誰？

既然對方是那麼脆弱，我又何苦免強挽回？

所以我不想再給她寫信，我們之間的玫瑰預約便這麼告吹了，但第一次約會，我面對「愛情」這一當頭棒，是對我自信的打擊。我必需直接面對二十三年冤獄帶給我的婚姻難關，並且預伏著後半生建立家庭的坎坷不幸。

### （三）范小妹

然而，生活竟這樣玄妙莫測，沒有幾天，母親在七年前認的幹女兒，范萍和她的弟弟范山，一起來了，范萍那時是一個只有十五歲的小姑娘，正在附近的二十四中學讀初中二年級，而范山還只有十三歲，在蔡家小學讀五年級。

范萍既是母親認的幹女兒，而且是她在最淪落時結下的母子情緣，我理應稱呼她為妹妹，當時我倆相差整整二十六歲，便稱她為小妹妹。我們初次見面那天，她穿著潔白的毛衣，褲子雖然打過補丁但很乾淨，特別是她少女的靚腴，帶著特有的矜持。比起鄒銀雙來更多了素補和誠實。

進門時她手裡提著一個竹籃，裡面裝著萵筍和蘿蔔，進屋後，將它放在母親平時作炊的小桌下面麵，站起身來喊了一聲大哥，並問我什麼時候回來的？

第一次見面，我心裡很緊張，雖然，我當時已四十二歲，什麼風雨世面都經歷過，唯獨二十幾年與女性完全隔離，見到她，同她說話十分的口訥。

范山手裡提著一個竹子編的笆箕，裡面的蝦子活崩亂跳，撞得那笆箕朋朋直響。看來這姐弟倆對母親的生活習性和愛吃什麼很熟悉。母親一生中喜歡吃魚蝦，當時市場上是買不到魚類食物的，那怕這種小魚蝦也與市絕緣。

他們告訴我，姊弟弟倆平時經常在池塘、田邊、摸到魚蝦便把它們關在竹籃裡，放在塘裡養起來，等到積累到一定數量，便給媽媽送來了。

這姐弟倆的出現，頓時給本來顯得冷清的「集體宿舍」增加了許多活力。弟弟催著姊姊姐姐快去拿盆子來放些水，說再遲一點，竹籃裡的小魚蝦們都會「渴死」的，兩人忙碌起來。

媽媽見兩個孩子，滿臉堆笑的問「你們怎麼這麼長時間都沒有來呀，媽媽呢？」小妹笑著回答：「哥哥沒有回來時，媽叫我陪在你身邊，現在哥哥回來了，我們就不好來了。」

媽媽回答說：「這幾天你們沒來，還怪想你們的，如果再不來我就要到鄉下來找你媽了。」

中山搶著回答：「這幾天豬兒有點病，媽媽忙著煎藥餵豬，所以一時沒空，這會兒她還在場口抓藥，她叫我們先來這，一會兒她就會來的。」

正說著樓下一迭聲的已經喊了起來。隨著一陣咚咚上樓的腳走聲，一位比母親年輕，精幹的農家婦女已經出現在樓梯口了。

從她那黑黝的皮膚和滿臉皺紋，看得出這是一個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也是苦了一輩子的地地道道的農民。穿著一身藍布的棉衣，腳上是青布布鞋，一進門來便一迭聲的向母親道歉，叨叨的說道：「大姐呀！我早就該來了，聽說哥哥回來了，那天都想來看看哥」。

母親連忙牽著她的手，給她端了一杯早又準備好的茶。胡媽笑咪咪地說道，「大姐呀！你真好福氣，有這麼一個好兒子，又是大學生，身體又結實，現在落實政策以後，政府一定會安排一個好工作。今後呀，你總算有靠頭了。」

轉過身來向我說道：「哥呀！這些年你媽沒有少吃苦，醫院裡的那些沒良心的欺你媽是右派，人又老實，又是一個人，淨拿髒活、重活給她幹。還常常無緣無故的打她罵她，我們蔡家場的農民個個都替你媽打抱不平。他們越欺侮你媽，我就偏要認你媽為乾親家。」

接著講道：「每次過年過節，我們殺了過年豬，就要給她留一塊肉，打了糍粑也要給她留一塊糍粑，總之，我們有啥吃的，她也有。」

「有一次我正提著一塊肉，在大門口就碰到了劉宣樹，她正顏厲色的警告我說：『你們老是與右派份子劃不清界線，如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沒收你送給她的東西。』我馬上反對說：『你搞清楚點，我是貧農，不是你們可以隨便欺侮的，你如果敢沒收我的東西，我就要你好看』」。

「她看到我態度如此硬，便連忙改口說：『我不是對你，我們的上級有規定，對方堅志這樣的階級敵人，就是要嚴加看管』。我回答她：『我們當農民的，才不管你那一套，我們只知道醫院的人欺侮一個老太婆太過份。』」

聽她介紹，知道這是一個口直心快，心地善良的農家婦女。在她的內心裡有一桿公平秤，雖然她沒有文化，但她有中國婦女特有的正義感，她不迷信誰家的宣傳，她是憑她的直覺來認識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 （三）汪禿子

從鹽源回到重慶時，只帶回1980年的糧票和布票，到蔡家後，才明白城裡的居民什麼都要憑票才能買到，不光購買糧、油、布，就連買肥皂、鹽巴、豆腐、肉、反正生活上所有必須品，都要票證去買，母親特製了一個專門存放票證的小木盒，每次上街除帶錢外，還必須從那裡取出要買東西的票證。

鐵托早把票證比作套在中國老百姓頸上的三根絞繩之一，真是一針見血。所有的票證都要靠戶口簿領取，這就是說，沒有戶口的人在大陸上便不能生存。戶口便是「黨和政府」控制所有老百姓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回到母親身邊，除了糧票布票，其他所有票證都是母親的。我還沒來得及上蔡家派出所辦理戶口。為生活所迫，上戶口的事，刻不容緩了。

當我取出鹽源農場開具的上戶口證明和介紹信交給母親時，她皺著眉頭，那介紹信上，關於我的身份寫的是「刑滿釋放人員」。理由是開介紹信時，重慶法院並沒有對我的原判進行平反，而在年齡欄中寫著41歲。

鄒銀雙的婚約告吹後，在母親心上結下了一個無法向人道破的「疙瘩」，她拿著介紹信看了半天，便毅然把42改為38，改過後，又仔細地戴著老花眼鏡審視了許久，滿有把握地拿出自己的那本戶口簿來，告訴我，她今天專門請了假，同我一起去派出所上戶口。

看樣子她的心情不錯，兒子真的要留在自己身邊了，今天總算可以到派出所去，在自己那只有她一個名字的戶口後面，添上了兒子的戶口。從此以後這裡便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口之家了，這可是她盼望了整整二十二年的事。

她整理了一下她的花白頭髮，便起身同我一齊向蔡家派出所走去。蔡家派出所就在石板路右側的一個門庭陰深的院子裡。

一提到派出所，我會想起少年時代，去朝陽派出所遞申請助學金報告時，那陳麻子的羞辱，那是深深刻在我的腦海中，永不消褪的傷疤。

後來，經歷整整二十三年的冤獄磨難，對於派出所這種衙門，一直把它當成欺壓善良百姓的閻王府。

走進派出所的辦公室，裡面坐著三個人，坐在外面的兩張桌子面前一男一女，身著警服，態度傲慢。當我們倆走進去後，那女的白了我們一眼。

母親是這裡的「常客」，過去她每進來一次，便如小鬼進了閻王殿，不是交「思想匯彙報」挨訓斥，便是接受遊街的決定，或是「交代待問題」。

現在雖「平反」了，但骨子裡那種小鬼見閻王的心理依然使她心有餘悸。我感覺得到她進來後，態度十分拘謹。拿著戶口登記簿和鹽源開的介紹信，走進靠裡面的那張辦公桌，那裡便是蔡家場人人畏懼的汪禿子。

這姓汪的傢伙，我剛回來幾天就認識了。

回來的第三天，我上街買菜，那天正逢趕集，我走到集市的中間，看見那裡圍著一大群人，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個叫化子模樣的跛子，正攔著一個身著民警服的胖胖禿頭中年人，要他開一張殘廢證明。

從圍觀趕集農民七嘴八舌中知道，那乞丐是附近大隊一個曾被劃為「反革命」的村民。而那胖「警官」，便是面前坐在最裡面的汪所長。幾年前這汪所長組織了一次五類份子的「遊街批鬥」，在遊街時，將這個「乞丐」的左腿打斷，從此喪失勞動力，生活無著，變成了乞丐。

後來民政局為了整頓市容，收容了全區所有的「叫化子」，對這人說：「只要有當年組織批鬥會的人開一張殘廢證明，便能領到政府發放的基本口糧。」

於是乞丐鼓起勇氣在大街上將汪所長攔住，請他給一條活路。

不料那汪禿子，不但不給他開證明，而且，一把將他推在集市街邊的污水坑中，弄得這本已不成人形的「乞丐」簡直像一個鬼，然後揚長而去。

我目睹這人欺人的一幕，一種本能的憎惡，徒然從心裡升起。詢問同我一起目睹這一幕的醫院門房小張，他告訴我：「這汪禿子原是北碚法院的一個預審員，曾利用職務，掌握一批小偷流氓掌紅吃黑，才從北碚法院貶到蔡家場接了這戶籍的差事。」

舊性依然不改的他，拿著轄區的小偷、扒手依然行『黑吃黑』那一套。尤其是他對「五類份子」的手段，更是心狠手毒，我的母親當然是他任意欺侮的對象，想起這些我抖起了精神。

「汪所長，我的兒子從鹽源回來了，今天費你的神給他上一下戶口」。母親怯生生的向他開口道，一面把戶口名簿擺到他的辦公室桌上。而那汪禿子卻像沒有聽見似的，依然的在看他的報紙並不答理。

我向他座位上方的牆上看去，那上面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不禁想到舊時衙門，升堂的中間都掛有「明鏡高懸」的大匾，但從來是黑暗無比，賄賂重重。而今中共執政幾十年來，「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字，向來是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遮醜牌。

戶口既管著一個人生存的基本生活資料，上戶口的人就仗此，成為被上戶口者生存的決定者。想到這裡，我的眼光，又從那牆上情不自禁的向下滑來，一直滑到了他那肥大的圓臉上，我才發現，那鼻子周圍也有同陳大麻子一樣的麻子，心裡對他那種不理不睬的傲慢充滿了憎惡。

二十多年來，我在監獄中天天同這種人打交道，他們的欺軟怕硬的卑鄙心理，我不但瞭解，並且學會了一套應對的辦法。但是儘管我的心裡已經對他產生了惡感，仍覺得還不到發作的時候。

如此忍耐了幾分鐘，見他仍在那裡看報，依然沒有理會母親，直到母親再次請求後，他才慢吞吞的放下了報紙，愛理不理的將母親放在辦公桌上的戶口名簿挪到面前，慢慢地從辦公桌的抽屜裡取出一張紙來，懶洋洋地取出鋼筆，頭都不抬的發問：「姓名」？那介紹信上明明寫著的，他卻不屑一看。

我被他這種挑釁性的態度激怒了，母親已看出我的怒容，向我連忙使了一個眼色，低聲下氣的回答道：「孔令平」。

「姓別？」「男」。

「年齡？」「38歲」。這一次那汪禿子才抬起頭來打量著我，我蒼老的面容，使他奸詐的眼睛裡露出一種拿到對方短處的詭秘。

他拿起了甩在一旁的介紹信細細地看起來，母親改動的筆跡被他識破了，他奸笑著得意的站起身來，用一種逼視的目光對著我：「這年齡是你改過的嗎？」我對他這突襲一時還沒準備，母親已慌忙接過話來：「沒有，沒有的事」。

然而他這種多年培養的，抓到獵物便窮追不捨的獵犬本領，使他精神抖擻起來，從他辦公桌上猛地站起身來，大聲吼道：「你還敢替你的兒子狡辯，這明明是塗改了的筆跡，還不馬上老實交代待？」



看來這傢伙是訓練有素的，對於處在壓迫階層的五類也是欺壓成性的，出口成章的「行話」對階級敵人是用慣了的，不會走樣。

儘管五類的說法已被取消，但在他的狗眼裡，我們娘倆，一貫只能是被他訓斥，被他呼來喝去的奴隸。

此時我的一股無名惡氣直沖腦門，終於按捺不住，走到母親的前面，惡狠狠向他吼道：「改了個歲數怎麼啦，你要做什麼？」

這種以惡對惡的戰術，便是煉獄中培養出來的，在監獄中對張棒棒，徐世奎，何慶雲這般惡吏我使用過，對於麻臉中土，三星閹將，我也使他們難堪過，雖然我這種硬碰硬，使自己吃了許多眼前虧。

那汪禿子，對這一招，感到吃驚，因為他一時沒對答上來，對母親的盛氣凌人態度，一時沒找到該如何應對。

呆滯了一分鐘後，他立刻從自己的椅子上跳起來：「你這勞改釋放犯，看來是沒有改造好，你今天敢公開頂撞？」他的臉漲得通紅，向我撲來，擺出「階級鬥爭」操熟了的打手架勢，指著我的鼻子吼道。

那一男一女也一齊站起來，將我圍住，好像就要拿出手銬子或繩索之類的東西，像收拾犯人那樣將我壓下去。

母親見這形勢對我十分不利，怕我因為衝動而吃虧，慌忙地攔著我，要我不要說話，並且用身體護著我。我明白越是鬧到這個地步，越不可退讓。

「怎麼？要動手打人哪？還是文革那一套？四人幫那一套不是？」我厲聲地喝道，這一招果然靈驗，那姓汪的退縮了，重新的坐到他的椅子上。

我見這句話奏效，便連珠炮似的反擊道：「姓汪的，你放明白點，今天我是來落實政策的，你還公然的稱我是勞改釋放犯，中央三令五申的平反冤假錯案，就是你們這一幫子人軟拖硬抗，頂著不辦，今天又不為什麼，就要做出一付打人的架勢，老實訴告你，不是四人幫的天下了！也不是你們這些人為所欲為的時候了！你今天只要敢動手，我非把你拉到市委辦公室去說個所以然。」

汪禿子被我這翻怒斥弄啞了，一時還弄不清楚我的背景，居然對答不上來了。母親見勢，馬上打圓場，向汪禿子解釋道：「我兒子心情不好，脾氣也不好，你別同他一般見識。」

殊不知這反倒助長了禿子的勢頭，他一迭聲喊道：

「你們母子倆既是落實政策，就應當模範的遵守政府法規，戶口是國家的重要法度，任何人都要遵守，竄改戶口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你們知識份子比我們老大粗更懂得。按理講，就憑你們竄改戶口這一條就夠刑事拘留的條件，今天，你這戶口就拿不走了，等我們查清以後再作處理。」

我不知道戶口管理有沒有規定，對於塗改年齡這樣的事該如何處理？但我心裡只想到絕不能向這仗勢欺人的狗退讓或認錯，便從椅子上霍地站起來，一邊喊道，「別理他，看他把我怎麼著。」一邊拉著媽媽的手向門外走去。

當我們離開了那陰森的院落出得街上，母親先前的那陣好心情全都消失，十分沮喪的一路上嘆氣。戶口沒有上，到惹出這場麻煩是她萬沒有想到的。後悔自己考慮不周到，但誰又能理解她的這番苦心？

我只好勸慰她：「我們又不是偽造戶口，更改年齡這種事，本來就不是一回事，敞若他要繼續找麻煩，我們一樣生著一隻嘴，諒他也做不了什麼」。

下午躺在床上想，蔡家場在汪禿子這樣的惡棍把持下，母親當然受了不少的欺凌。然而，想到重大保衛處的鄭樹勳那張奸詐的臉時，我的心裡一陣陣在發冷。

等待沉清冤獄的人，命運卻操持在這幫虎狼般惡吏的手中，前途豈可樂觀？看樣子我們這一群剛脫離虎口的羊羔，又將掉進狼群的包圍中。

我接著馬上要回重大，了結未了的舊案，可我拿什麼去見鄭老頭？

馬大炮的主意本出於無奈，十斤大瓜子、十斤蜂糖、十斤核桃、就像三十噸的巨石壓在我的心上，當我空手前去時，我作好的是一個最壞的打算！

今天這汪禿子那種像要吃人的態度，使我壓根沒對前途有什麼樂觀。充其量有份工作有一碗飯吃，便是共產黨的法外恩典，我能同周圍的人平起平座，保持一個普通百姓所起碼具備的人格嗎？

按照鄭樹勳離開鹽源農牧場的約定，我在回到重慶後的一周內就要回重大保衛處去報到，他這個「約定」屬於私人規定，還是對落實政策人員的一種規定？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從鹽源回到重慶的時間並沒有卡定，而且何時從鹽源動身也沒有說死。更主要因為我實在為難於三十斤的索取，所以回重慶後，我遲遲沒有到重慶大學去。

眼看十一月份已過，年底即將來臨，我總不能過著不工作也沒有工資的失業日子。雖然母親說，我回來後，她的工資已經恢復到每月七十多元，養活我沒有問題。所以我回到她身邊，是否工作暫時並不是十分迫切的。

但我耐不住了，於是決定十一月底，無論如何都得回重慶大學去。

## 第二章：落實政策的馬拉松

如果因為母親賜给了我生命，要感恩於她的生養之恩；那麼我求學的學校賜给了我生命的內涵，不但鑄造了我的靈魂，還教會我知識和適應社會的本領，所以理應稱為母校。

學子與母校的感情譬如孩子對母親的感情，在離開這塊我曾居住過、生活過的地方整整二十二年後，重返這裡，也有一種懷舊之情。

可惜，這種感情卻因這場人禍蒙上恥辱，蒙上了綿綿的恨！

雖然理性上我知道，羞辱來源於中共統治階級的一小撮，來源於毛澤東，但同我朝夕相處的同學們，應該有起碼做人的良心，有起碼的判斷能力和是非標準吧，然而偏偏坐在北京城頭的毛澤東，竟用他想出來的「六條標準」支配著他們，把當年這場荒唐運動搞成一場令人膽寒的煉獄！使數萬無辜學子傷身於荒野邊陲！

令人驚嘆的是，毛澤東怎麼想得出把學校變成人咬人的場所？讓品性卑劣者變成狗，向毫無防備的學子恣意殘害，報復，取樂？

現在，當年整人的打手們藏到那裡去了？是心虧理虛躲了起來，還是像狗一樣藏在暗處，等待再爬起來反咬一口的時機？

回校的一路上，頭腦裡不斷發生奇怪的問題……

### 第一節：回校

從北碚坐車到沙坪壩，下車後步行向重慶大學走去，二十三年前的街道依然如舊。記得剛剛入學時，我在這條街道上買過文具、參考書、理過發、吃過飯。

還記得離大校門不遠，有一家餐館，做的麻婆豆腐辣得令我叫絕。我那時覺得這是我吃過的做得最棒、價格也最便宜的菜了！經過那裡，我有意覓尋，卻不見了當年那餐館，沿街的理髮店文具店也改作其他店鋪了。

當我走到那兩塊刻著「重慶大學」四個紅字的石柱碑前，二十三年前我離開它的那一幕立刻浮現在我的眼前，二十三年前我們從這個地方，被押上大卡車送到南桐礦區去「強制勞動改造」，那一天在風雨和太陽交叉作用下，風雨操場鑼鼓喧天「歡送上山下鄉幹部」。

全校遊行隊伍，使我們這幾十個被「開除」的異類，徒添了歧視。

今天，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剛從地獄裡走出來，滿臉帶著過早刻下的皺紋走進校門，循著回憶的引導先去沿江馬路，當年那兒曾是我被門得昏頭轉向後常去的地方，我在那裡呼天喊地，在絕望中希望有人救救我……

商學院的石頭房子還是老樣子，它能抗住日本鬼子的炸彈，同樣也抗住了「文革」的槍炮！再往前走，化學實驗大樓還是那廟宇式構造，只在那遼闊的中間地帶，添了幾座樓房。

在當年饒家院古老的建築前面，我看見門口懸掛著：「重慶大學落實政策辦公室」的牌子。不過，此時，我不想馬上就進去，因為我還沒有弄明白，在經歷了這『脫胎換骨』後，來這裡幹什麼？

是向他們去訴說自己想都沒想到的災難，給我安撫麼？是拾掇那些被破壞的幻夢，向人們呈訴滿腹的憂傷？還是去見一個連一無所有的窮犯人都想再榨點油水的鄭樹勳？是去認錯、求饒，以可憐來換取下半生的安穩？

為弄清楚今天來這裡是幹什麼的，我還需要思考，更需要走遍當年在這裡曾留下記憶的每一個角落。弄清楚「反右」是一場我個人的災難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是母校的過失，還是當年被整的同學、教師的過錯？是我們的過錯還是專制主義不可饒恕的罪惡？

我在饒家院旁徘徊後，便向著松林坡大禮堂方向走去。二十三年過去，原先就已破舊的禮堂還在那裡，只是當年掛在那些松樹幹上滿貼的大字報，交心書和血書卻無影無蹤了。

追溯這兒的狂熱，便能瞭解學生是一個可塑性多麼巨大的群體。

由於他們的幼稚無知，他們具有何等可愛而又何等可怕的雙重性。

他們可以呼喊民主的聲音；又可被獨裁野心家所利用。

創造美好未來，同毀滅正義和科學，同時都可以為之！就看誰在操縱他們。所以這是好事壞事都可做出來的群體，當年共產黨對學生的操縱使校園裡陷阱滿布，現在想來還使我不寒而慄！

再往前走便是學生食堂了，我們當年在這裡聽「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傳達時，卻不知道「陽謀」的含意！那些當年張貼大鳴大放的專欄早已不知何處？而今只留得一片荒涼，隱約可聽見當年在這裡的爭論和嘆息。

轉過彎道便是我們當年的宿舍。我在當年住過的地方呆呆站了好了一會兒，仰頭上望，還清楚的記得曹英們是在那一間屋子裡組織的輪番批鬥會，將被劃成右派的人鬥得昏頭轉向、精神失常。

當年曹英威逼我的聲音猶存耳際，我就是在這裡掉進了「陽謀」的陷阱。掉進了『偉大』中國共產黨所布下的階級鬥爭的天羅地網，我就在這裡把自己癡迷的個人幻想，變成一場二十三年地獄裡的煉獄。

轉過身去，便是圖書館後背山底一角，我們當年這群心靈惶恐的孩子們，曾拖著犁耙掙扎在剛剛被新鮮糞水泡灌的水田裡，幹牛的活，脫人的皮，從此，地獄的烈火就在我身邊燃燒起來。

就這樣的一路尋來，！當年在求學的這個搖籃裡，除了歧視虐待什麼也沒有！同學間的那種天倫的感情，全被當年亂舞的群魔扼殺了。

現在，我要重新認識這個曾生活過的地方，重新瞭解那個時代校園裡的主人，再認識這個始作俑者的中共集團，除整人和對社會的破壞，它有光明的一面嗎？

如果說我在這故地重遊，拾到了當年沒有發生，現今已改變了的東西，又產生一個最大的疑問：當年整我們的人現今有幾分省悟？他們怎麼就全消失了，像鬼一樣？毛澤東還沒倒，圍著他的獶孫們就散了？

重大保衛處仍在原來的老地方。不知為什麼，一進入那保衛處的小院我就感到壓抑。說實話，若不是為了將來的工作和「平反」，我是絕不會主動去跨這個門檻的，

走進大門，在過道上，我向一個穿中山服的中年人詢問鄭樹勳是哪個辦公室？他指了指走廊盡頭倒數過來的第二間屋子。我整理了一下思路，準備好了幾種不同情況的應對，便走了上去敲了一下門。

門打開了，開門的正是四個月前在鹽源「提訊」我的人。不過此時白胖的臉上堆滿了笑容，一改一年前「審案」的凶像。

一見是我，他很客氣地請我進去入座，還謙禮地倒了一杯茶，一面寒暄一路辛苦之類的客套話，他的這種態度反而使我警覺起來，一面小心地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心裡卻在揣揣度對方要耍什麼花招？

此刻我忽然對空手而來感到難堪。倘若今天我提的是一個沉甸甸的大手提包，一進門就打開提包，按照三個月前他開出的那張貨單，將「賄物」一點點地數給他，恐怕對方會關上房門，在喜形於色的同時，會對我的安置有一場討價還價的口舌。

他一定會說出幾個緊缺人才的單位，說那裡的規模如何，工作條件如何，工資待遇如何，建議我到那裡去上班。我也會提出諸如住房，獎金等等的要求，甚至還會請他幫忙，回重大工作。

雖然這是我花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對方所說的也弄不清是真是假，但我想我也許就有了一個可以摸進去的後門。

但是，一旦我進了他的圈套，今後還會不會沒完沒了發生新的勒索？現在我偏偏不肖此舉，採取了馬大炮的建議，此刻裝做什麼也不知道，只聽憑命運安排了。

在他指定的座位入坐以後，我便從帆布挎包裡，將鹽源農場加刑的平反判決和介紹信取了出來，我留意到他緊盯著那挎包，從他的眼神中我明白他在想什麼？一種不能明言的難堪掠過了他的嘴唇，他接過信看了兩遍，想開口問什麼，可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

過了一陣，他繞著彎子問道：「我這次到鹽源專門為辦你的案子出差時，走得匆忙，有些想在鹽源順便辦的事忘記了，就連自己的路費都沒有帶夠，多虧你們那個隊的馬司務長照顧，臨行時，還給我補足了買飛機票的錢。回來後，我給他寄去了，你回來時，他沒有向你說什麼嗎？」

我看了看他那狡猾的臉，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臉厚功底，便立即按馬大炮的囑咐，很誠懇的傻呼呼地搖著頭。

到此時，他才明白，過去在其他人身上使用奏效，並得到好處的手段，卻在我這裡放了瞎炮。面不改色的對我宣佈：「關於你的右派問題，是由我校落實政策辦公室來辦的，至於你60年所判的反革命一案，要經過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處理了，我已將調查材料和結論轉給了他們，你只能去找他們！」

如此看來，要我到這裡來，純屬是這鄭樹勳的三十斤索取的需要。因為無論去落實政策辦公室或去中級人民法院，都無需來這裡轉一個彎！而平反以後工作的具體安排，恐怕更不是重大保衛處所能決定得了的。

於是我心裡暗自慶幸倖，幸好沒有按他開出的三十斤見面清單，費盡心機去一一備齊，再路遠迢迢的帶到這裡來當面交給他。

但是，轉而一想，重大保衛處畢竟是我平反的第一個環節，也是具體的落實者。其他環節，還不都要根據鄭老頭的最先意見辦理？這個意見有多大份量我一無所知，所以，我在他面前怎樣做才不失誤，我還沒有主見。

「諾，現在我就帶你到學校落實政策辦公室去。下面的事是他們負責的。」沈默幾分鐘以後，鄭老頭一面把我剛才交給他的材料還給了我，我下意識的看了看他的表情，心裡想著，我的到來肯定讓他大失所望，便跟著他走出了保衛處，向饒家院走去。

黨委辦公樓，學生時代一向被我們看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機關，它決定著我們今後的政治命運，實際上也就決定著今後一生的命運。入學三年，我就從來沒有到這裡來過，生怕在這裡被問住，節外生枝的自找麻煩。

我被鄭老頭帶上了二樓，走進了一個寬敞的屋子裡，進了屋，按照室內的辦公桌判斷，在這個辦公室裡辦公的人員足有二十餘人。

每一個辦公桌之間間隔的地方放著凳子，大概專供來訪者和正在等待結論人的座位，所有辦公桌上都堆滿了各種卷宗。

聽說自去年開始，這兒每天都要接待上百人次的來訪者，他們都是等待或辦理各種甄別手續的人。所以，這兩年來，這兒成了重慶大學最忙碌的地方。

後來重大黨委書記高書記告訴我：「解放三十年來，這麼一個總員工不到四千人的學校，就有四千人先後在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社教、文革運動中挨整，現在平反了，問題一下子全都擺了出來，黨委的壓力一下增加了幾倍！」

我不禁想到，運動一來，為了政治的需要，把學校這種培養人才的搖籃，變成了按政治需要製造人整人的監牢，現在，又因新的需要將抓進來的「鬼」放出來。這忙碌的黨委在做什麼不是很清楚嗎？說中共對文化的摧殘，對教育的褻瀆，在這裡證據齊備。

鄭樹勳把我引到辦公室中間的一張桌前，那桌後坐著的是一位年紀大約四十多歲戴眼鏡的女士，像是從系裡抽出來的老師，交待了幾句便獨自離開辦公室下樓去了。

從她年齡上判斷，當年也是一個與我年齡相同的學生，她知道中共捉鬼放鬼的內幕，完成「糾錯」嗎

等我坐下後，她從辦公桌抽屜裡取出一式兩份登記表來，在上面填寫上編號後遞給我，一面向我發問道：「你就是機造六零七班的學生孔令平嗎？」我確認以後，她便吩咐我用鋼筆公正地把表格填好。

我接過那表一看，表的名稱是「重慶大學落實政策人員申請表」。心中對這「申請」一詞頗反感，暗想道：把我們這些無辜的學生當年捉弄夠了的中共，而今又因政治需求予以平反，怎麼會要我們填上「申請」的字樣？好像是因受害人主動「申請」，才有今天的「平反」。

尤其在該表首欄中，首先要填寫：「當年劃右的主要依據」？

二十多年間，我的申訴不下百次，卻沒有人理會我，反而在各種場合下威脅我，說我在為反革命言行狡辯，該罪加一等。想到這裡，我望了一下面前這位女士，心中的氣想借此向她發洩。

想起當年曹英們組織的批鬥小組，對我這個什麼都不懂的普通學生，使出那麼卑鄙手段，按他們事前編好的罪名，不惜四天四夜不准我睡覺，捏造馬開先與我見不得人的「醜聞」，並要我在精神錯亂時認招；把「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誣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種種屎盆子統統扣在我頭上。

現在，是要我將這些完全莫須有的罪名重新羅列一遍？還是恢復這段被中共的暴力扭曲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往事真相？

痛斥縱然可以使我所受到的怨氣得以釋放，但自我接觸鄭樹勳以來的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給平反留下被稱作「反右是必要」的尾巴，反而要求我將當年扣在我頭上的屎盆子，重新認可並對冤屈製造的元兇表示「謝恩」，我豈能就範？

過去無緣無故，而遭迫害的無辜者何止千萬，但有志以自已遭遇的冤害留下親身經歷，告誡後來者的卻不多了。

我想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濺始作俑者一抹污漬。我要作專制暴政的見證人，犯不著為一欄的填寫感到困惑。

想到這裡，我便在這一欄中寫下了兩個字「出身」。這樣，既如實地反映了我的遭遇，也說明當年相當多的人僅因家庭出身被劃成「右派」的，這既吻合毛氏初衷。同時執行平反者也較易接受。

她看了我填的表，目光長時間的停在「當年劃右的主要依據」這一欄內。

正好，鄰近辦公桌上幾個廿多歲的年輕人圍了過來，他們多少帶著點好奇心向我詢問二十三年前發生的事，從年齡上判斷，當年他們還沒有出生！看看他們臉上掛著天真，想到告訴他們當年發生的「反右」經過，興許會有利於他們手頭正在辦理的案件儘快落實。

我在追述往事時特別提到了馬開先，講完了這些過程，我希望他們能幫助我找到馬開先，因為重大黨委一直拒絕告訴她的下落。

正在這個時候鄭樹勳回到了辦公室來，他吩咐戴眼鏡的女教師，取出預先早已列印好的「重慶大學機械系黨委辦公室」簽發的「紅頭文件」，鄭重其事地向我宣佈：「經校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反覆查核，報經黨委批准，現在對你在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份子的處理作出了改正，這是改正通知書。」

我從她手上接過那份「紅頭文件」那上面這麼寫著：

「查一九六〇屆，機造七班學生孔令平在五七年整風期間，曾出於幫助黨進行整風的動機，對黨的政策提出過一些意見和看法，在這些意見中由於受當時社會右派思潮的影響說過一些錯話。但仍屬於教育問題，不應當以此作為向黨猖狂進攻的依據劃為右派份子，現在為糾正反右擴大化的錯誤，特予以改正，對他本人恢復被開除的學籍」

所有「改正」通知書都千篇一律這樣寫的。

中共用這輕描淡寫的套話了結「冤案」怪輕鬆的！！西方人講人權，中共視為無稽之談。！既然當時是我「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當受教育！怎麼處置都說得過去，充其量是「處置」不當，中共何錯之有？

只可惜，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對無辜者屈打成冤、偏要打著「平反冤假錯案」招牌：拿到世界上去誑騙人，我怎會同意？

不料那鄭樹勳卻從一旁插上話來：「你看，你還有什麼意見？」他那胖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秘。他也許真以為，二十三年的煉獄已把我們全都變成了隨人戲捏的火巴

蛋，今天面對這樣的「改正結論」會感激零涕！

但他看出了我的反感，心中已明白，便把臉一沉，煽風點火的說：「你這個人認識上就是愛鑽牛角尖，吃了幾十年的虧還不見大改，你想想這次平反，校黨委下了多大的決心，排除了多少干擾？既體現了黨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錯必糾，又體現了對犯錯誤同學極大關懷和人道主義，來之不易啊！你還不快向系的黨組織表示感謝嗎？」

他一面說著，一面向那戴眼鏡的女士送去諂媚的一眼！

我狠狠的白了他一下，冷笑著說道：「這二十多年多虧我年輕命大，還沒有被整死！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不過，今天我是來拿平反通知書的，你們不是『糾錯』麼？如果我還保持著人的羞恥心，我為什麼下濺到向害我的人認錯的地步？」

由於激動，我猛然的站了起來。

此時我的臉一定是鐵青的，捏著：「恢復學籍通知書」的手顫抖著。

那戴眼鏡的女士看見我那可怕的神情，怕我一怒之下將它撕掉，連忙從我的手裡將「通知書」奪了過去，連連說「現在這通知書還不能發給你，只給你看看並讓你簽上意見的，等到你的原案平反後我們才能給你。」

還告訴我，重大經過一年的調集檔案，核實材料工作已結束，現在已申報重慶中級人民法院，今後要催就催法院了。

第一次回校『落實政策』只好空手而歸了，我站起來看到鄭樹勳正在那裡赫赫奸笑。由於我缺乏冷靜沒能按捺對他的憎恨，不顧一切這「惡棍」撕破了臉！提著手提包，出門下樓，憤憤的走出那圓形的石拱門！走出黨委辦公樓，忘了怎麼走出校門趕公共汽車了。

在車上，滿腦子還在翻騰在落實政策辦公室裡的那一幕。

回到蔡家醫院整整兩個小時後，心中仍未平靜。鑽進了樓下我那間停屍房前的臨時住處，往床上一躺，什麼話也不想說。

母親見我從重大回來情緒非常不好，到我的房間裡，輕輕問我是不是遇到了什麼麻煩？我只是搖頭，並沒有回答她。那晚上，我連飯都沒吃就睡覺了。

## 第二節：衙門口前的『上訪者』

經重大以及那汪禿子的「教育」，令我更加明白：

對落實政策不可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和奢望，反而還要提防著這些心存詭意的鬼蜮，玩弄各種伎倆、設下種種圈套！中共的政策，是統治者任意揉捏的麵團，我們這些初生之犢，糊里糊塗坐監，現在又被莫明其妙平反，各級衙門在捏這個麵團時，是絕決不會考慮受害人二十多年傷害的。

我忽然想到了自衛，便從我的行李中，將馬大炮轉交給我的，鄭樹勳那封勒索信翻了出來，就燈下寫了一封給孫起孟的信，告訴他承蒙他的關照，我才得已回到母親身邊。並且把鄭樹勳這封信一併寄去！

過了幾天，情緒慢慢隱定，重大方面既已答覆我以後去催促重慶法院，只有了結我一九六〇年「反革命」一案，我才可能得到一份工作，並得到至今還押在蔡家派出所的戶口簿，也才可能得到我因生活需要的糧票、布票、油票。我還要繼續活下去！我還有未完成的事業！一切都還剛剛開始。

十二月二十日，我去了在下半城的重慶中級人民法院。

這一天十點鐘，我才到了位於南紀門的重慶法院門口，如果我不是必須從這裡領到我今後的「活口」。我是寧死也不願上這閻王殿來的。

它高高聳立在半山之上，儼然以掌握生殺大權藐視著在他下面的重慶老百姓！我走到門房門口，一個披綠色軍大衣的值班民警，向我索要介紹信，我說：「我是來催辦落實政策的事，也需要介紹信嗎？」

他回答說：「我怎麼知道你是誰？這是對犯人進行審理宣判的機關，不允許誰向裡面亂竄，如果你因催促案件而來，那也應當持你們單位開具的介紹信，說明你的身分份以及事由。你一無所有的往裡面鑽，找哪一個處室，找誰都不告訴我，我也沒有辦法向裡面通報啊！」

此話有理，上次在重大，我為什麼就沒有想起開一張介紹信？

在學校和法院兩個機關，如何呈遞公文，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回想當初南桐法院由誰審理我的案子，我就一直沒有弄明白，也從來沒有人向我明示過。

糊里糊塗的在供辭上簽字劃押，被辦案人當成麵團，捏出了十八年徒刑，我還蒙在鼓裡不知道，這幾乎要了我的「命」，到現在，我那十八年徒刑由誰判的我都不知道。

唉，年輕時代的我簡直是一個迷路羔羊。向預審人員預先放置的陽謀套子裡鑽，等到殘酷的監牢使我猛省時，我已經被關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籠中了。二十年裡我想從這個陽謀的圈套裡退出來，是多麼不容易！

想到這裡，我便把我的名字以及學校和原來的案情，向那守門人作了一個簡單介紹。他聽後拿起電話筒一連撥打了幾個部門，回答都說，對我的案件他們不知道。我無可奈何的向那高聳在幾十個石梯上的「閻王殿」望了一眼。

他見我一臉的焦慮，便建議我最好到市委辦公大樓的信訪辦公室去瞭解一下，看看像我這種案件該通過什麼渠道來問？

我就這樣，在這道衙門面前，被守門人理直氣壯的踢了出來。

也罷，去市委見識見識，看看落實政策的門檻裡大小衙門水有多麼深？

當我到達七星崗時，正是吃午飯的時候，我在附近的小麵館裡胡亂地吃了一碗面，就來到了市委正門。兩個全副武裝的軍警把我攔住，我心中暗忖：這裡才是重慶老百姓的真正閻王府。

我還是二十三年前來過，二十三年前，為了向當時的市委呈訴情況，便將我在大鳴大放期間，與母親的全部通信，送到這裡來。

我哪裡知道，這對於陽謀來說，劃成右派本不需要什麼證據，只需家庭出身就可以了，二十三年後，我再次來到這裡，深深痛悔當年我的天真和糊塗塗！。

兩個兵將我擋在傳達室裡，那裡面值班的老頭告訴我，專管平反冤假錯案，是統戰部下設的「信訪」辦公室。並指著那距正門兩百公尺的一個小巷，說沿小巷進去便是信訪接待辦公室，我便向那小巷走去。

還好，這一次總算沒有碰到什麼盤查和障礙，進了裡面，辦公大樓的門卻緊閉著，它的面前一條大約五十公尺長的走廊中，長條凳子上早已排坐著二十多個人，一看就明白，他們是在等待那兩扇緊閉的大門打開。

我看了看手錶，時間還不到一點鐘，按照機關辦公在下午兩點鐘的常規，還足有一個多小時，便問起那排坐在最前面的女人，她說她是今天早晨七點鐘就來了，一上午才接待了十幾個人，等輪到她，已經到下班時間，只好繼續再等兩個鐘頭，等到下午再說。

我望著這些候在走廊裡，排著輪子等候接待的人，他們大多上了年紀，為了「信訪」不惜餓著肚子在等。

看著長長的佇列我開始躊躇起來，要是按照最前面那人所說的，上午才接待了十幾個人，那末，下午未必能將排在這裡的人全都接待完，白等一下午，空手而歸，不如趁早離開。

但是路遠迢迢從北碚到這裡，空手而歸未免遺憾。既然來了，且看看情況再作決定吧！

坐在我前面的兩位老人，一位白髮蒼蒼，看上去已是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再前面的便是一位滿臉皺紋年過六旬的獨臂老頭子，從他們滿臉的愁容和疲倦神態看，像經過一場戰爭後，等候在市政廳門外，排著長隊等著撫恤的死難者家屬。我聽見那獨臂老人正在向老太太傾訴他的遭遇：

「解放前，我是水上派出所的員警，幹我們這一行的，兵荒馬亂年代為一家人生活，誰又完全沒一點靠山？那段歷史我早就在解放初就交代了。那時我只是個小小水上員警，無非是幹了點水上緝私，船到碼頭作些檢查之類的事。憑我熟悉水路、精通技術，當了幾十年的水手！那算什麼特務？」

「文革一來，新來的革委會主任，把我當員警的事重新翻出來，逼我承認解放前當過特務，把我送到學習班裡關局子，唆使我的老婆和兒子不認我。」

「我說：『你們對我的歷史已經查了多次，現在還要我無中生有亂招一通，是什麼居心？』那當官的說我頑抗，開除了我的工職，把我送去勞教。」

「在勞教所裡，一面對我用刑，一面逼我承認當過特務，左手被打成骨折，又不給我醫，直到我的傷口化膿爛了長了蛆，才送勞改醫院。醫生說：『送來晚了，只有截肢還可以保我的命。』我的手就這樣廢了一隻。」

走廊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說著將那空蕩蕩的左手袖管，用右手揀了起來讓大家看，繼續說道：

「上個月航運辦公室的人跑到勞教場，說要落實我的政策，現在查明我確實沒參加過特務組織，所以要恢復我的政治名譽。但這十年來家沒了，老婆嫁人了，我已是殘廢人，兒子也不願收留我，我到哪去安身？所以我向他們說，我不能空得個平反的名份等死，給我一間房子吧。」

可那整我的局長說：『你已經退休，給你退休工資就夠了，你一定要回長航現在能幹什麼，何況現職的人都還沒有房住，我又拿什麼給你？』他們打殘了我，就這樣撒手不管了，誰來服侍我的下半生呀！」

說到這裡他嗚咽著哭了起來。

大家聽著，沒有人開腔。在座的人哪一個都有一本心酸帳，像他這樣的受害者在中國這個年代處處都是。有誰來管這些被歷次運動弄殘了的老年人？

當年因執行單位對各種受害人草率處理，今天，這些受冤者，不辭萬里行乞，赴北京上訪，死在路途上的人多的是。沒有人去統計這個冤孽深重的數字！……

看著他那樣子，我又聯想到我的母親，她也同樣因為年事已高，被整她的單位所拋棄。至今還留在蔡家醫院，受那裡欺侮過他的人喝斥，虐待。

心中還在翻騰，又聽見那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接著開始念口念 叨起來：

「我就這麼一個獨兒啊……」



她第一句話，便使我聯想到魯迅筆下，「故鄉」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那是她剛滿五歲的兒子被山裡的狼叨去以後，逢人便要訴說的話！雖然面前的她，比之祥林嫂蒼老得多。而且從她那身打滿補丁的棉衣看，她比祥林嫂的遭遇更慘。

且聽她說道：「文化大革命中，我兒單位，八一五的頭頭！硬說他是『老保』，還捏造說他過去還參加過啥子七星黨，便把他抓起來關進黑屋子裡！我聽到後，人都嚇傻了。我就這麼一個兒啦，我跪在那個姓曹的面前，請他看在我這孤老太婆份上，高抬貴手，饒他一碼！沒想到，我那脾氣剛烈的兒子卻從關他的黑屋子裡逃了出來，唉！」

老太太陷入了沉思，停了一下繼續說：「我看到他，叫他趕快跑，哪裡曉得，他卻去找那個姓曹的「算帳」。當場還打了起來。那姓曹的當下便叫派出所把我兒抓了起來，硬把他說成反革命行兇報復，抓進了監獄判了十年徒刑，把他送到新疆勞改。從此以後，我兒就再沒有回來過……」

「現在，托鄧爺爺的福，我兒寫信回來說他的案子平反了。既然平反了，那就該回來呀！我都已快八十的人了，身邊又沒得其他人，跑這個地方都跑四次了，每次都喊我等！可是，我們這些老人能等多久呀？我的兒呀！你又為啥呀？真的老娘有個三長兩短，連個收屍的都沒得……」

邊說她嚶嚶的哭出聲來。然而在場的人沒有任何反應，好像麻木一般。人間的塗毒，有時比野獸更殘暴，奪去她兒子的不是狼，而是與兒子共事的人。

那些主持平反冤案的官僚們，從沒想過，二十多年那麼多冤案牽及到多少個家庭？這成了久積的社會腫瘤，平反多成過場，使這腫瘤越來越大！

今天坐在長廊裡的二十幾個「代表」，就同全國千千萬萬的冤獄受害者一樣，好像是一些奉了特大赦令的「罪犯」親屬，彼此間除了陌生竟找不到相互安慰的話，當然更談不上同仇敵愾了。

若以個人身份，跑到共產黨本市的最高衙門來求解脫和赦免，『平反』必定流產，路遙遠兮，前程漫漫。

我正思考著，長廊裡一陣騷動，看我的手錶已是下午兩點半了，「唔！遲到了」我下意識的喊了出來。可那兩個年輕人卻絲毫沒有顯露出一點內疚，而是一臉的傲慢，大搖大擺地從這二十幾個上了年紀人面前穿過。

偏偏求訪者中有幾個低三下四，向兩個從他們面前過去的人點頭哈腰。好像自己原是來乞討似的，那兩個年輕人卻像來施捨什麼一樣。

當辦公室的大門打開後，長廊裡等候了幾小時的人群全都向門邊湧去，只聽見那排在前面的人不斷地嚷道：「喂！排輪子，不要亂，按次序，不要亂。」好一陣子的推推搡搡排成了隊，不過已不是坐著而是站立著。

我看見剛來辦公的年輕人不緊不慢的放下公事包，取過了自己的茶杯，走到裡面泡了茶才坐下，從為首大約五十歲的女人手中接過遞過去的材料。

那女人叨叨的敘說自己的丈夫、兒子和被抄家的經歷。好像一個溺水已久的人幾經沉浮後，才抓著一根救命稻草。

不料，還沒等她敘說完畢，那年輕人便顯得不耐煩了，不屑的說：「後面的人還多！你把話說簡短一點」。一面打開材料，沒去聽她的哀哀呈訴。看完材料，拿出登記表，截斷了對方的述說，一問一答的在那上面填寫了信訪人的姓名、性別、年齡及事由等等。

寫完後便向求訪者說：「你這個案子應去找××法院」。那女人馬上說：「我已經跑了十幾次了，每次都叫我等，落實政策以來我等了兩年了，這案子拖到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啊？」那接待人並不理她，拖長了嗓音喊道：「下一個！」

我看見她那帶著深深不滿的表情，遲遲不願從座位上站起來，等到這個時候，今天她整整等了七個小時了，中午還沒有吃飯，原想有一個積極的結果，可惜這裡仍把她當成皮球，踢回她不願再去的法院衙門。

我深深同情她的飢餓疲憊，只見她在那裡悶了幾分鐘，無奈的站起來。那一瞬間，她剛剛的座位便被排在她後面的上訪者佔據了。於是，又一串新的急促的敘訴，將女人送出了辦公室的大門。

第二個上訪者，幾乎重複著他前面那人的過程：嘮叨，填表，接待人向他說應當去找××機關，所不同的，這個上訪者提出請信訪辦開一張「介紹信！」

可接待人以譏嘲的口吻回答他：「我憑什麼給你開介紹信？憑你的材料，憑你的口述？我們信訪辦公室對你的情況在沒有確證時，根本無法下結論，所以你只能找基層，他們既負責你的案子，他們才瞭解你的情況。」

結果，在求訪者反覆要求下，那接待人才寫了一個曾於某年某月某日，來過市委信訪辦的證明，塞在信訪人的手中。

看到這裡，我已經完全明白，連這種重慶市最高的衙門，依然的同其他單位一樣，將這些可憐的上訪者當成皮球，從這裡踢出去！

明白這種結局，我便不想再在這裡挨那年輕人一腳，便提著我的帆布書包，決然出列，向那圓形的石門走去，自動的被「踢」了出來！

### 第三節：草菅人命的中級法院

比起上次去重大的「上訪」，這一次簡直就是徒勞而返！官場在辦理「平反」時就有這樣的艱難！平反的漫漫歷程就這樣拖下去！這對於上了年歲的人可是一件最殘酷事啊！

回來後第二天正是星期六晚上，同母親同室而住的鄭醫生和丁醫生都回家了，宿舍裡就剩下我們母子倆。點起煤油爐，煮好麵條，母親知道我兩次上訪的過程，見我悶悶不樂，便述說起為落實我的政策，她花費了一年半時間的馬拉松「上訪」過程：

「我去重慶大學，正是去年的大熱天，我一連去了三次，每一次都叫我等！那時天太熱，為了防暑每次中午我就吃一牙西瓜。

幾個年輕人看見我這麼大的歲數了，動了惻隱之心，勸我不要再跑了，說中了暑倒在馬路上就麻煩了，有問題只要寫封信來就夠了。我去南桐法院前後跑了六次！最後一次，我在下汽車時摔倒了，還是被好心的路人將我扶到醫院去，幸好還沒出大事。

那法院的一個老吳過去也是右派，悄悄的告訴我說，現在辦事就是這樣，當事人再急辦事人絕不會急，一直等到上面來了文件，『火候』到了，再大的案子也一風吹。他勸我不要再跑，跑出病來還不是自己吃虧」。

聽到母親的這段話，我心裡非常不安，當時我急著早日出獄，沒有為她的安全多想，萬一她真的在這種馬拉松長賽中倒在路上，那可是我一生都無法原諒的罪過！她可是這世上我僅有的親人了。

現在這樣，連肥皂票都要占她的，我怎不慚愧，所以明知在中共官衙裡跑，變成皮球被人踢來踢去，我還得硬著頭皮被人去踢！

我的平反，果然拖到了一九七九年最後一個工作日。十二月二十八日醫院書記通知我：下午重慶法院打來電話，要我在第二天上午，去重慶法院刑事偵察二處領取判決通知書。

拖到一年最後一天，官僚機關的辦案夠拖拽選的。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第二次來到重慶法院，走上那臺階，走進辦公室，一個姓丁的年輕人接待了我，並把一張紙遞給我，這不禁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南桐看守所，一個中年人把一張同樣大小的紙，遞給了我。

我就這樣被兩個辦案人，在監牢裡殘酷地戲弄了整整二十年，這種殘酷遊戲真是絕古今之未有！

我沈住氣一言不發的從那小夥子手裡接過這張紙，坐在那木凳子上閱讀起來：標題：

四川省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79（60）刑上申字第58號。

全文如下：

申訴人：孔令平，男，現年42歲，江蘇鹽城縣人，大學文化。原系重慶大學學生，一九六〇年八月因反革命罪被南桐礦區人民法院（60）刑字第69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孔不服提出上訴，經我院（60）刑上字第58號刑事判決書，維持原判，駁回原判，本人不服反提出申訴。現經本院再審查明：孔令平自一九五七年五月至一九六〇年一月，先後書寫的日記詩詞，沒有擴散，並作過交待，在此期間還向我黨政機關投遞信件等，均不構成反革命罪，原以反革命定罪判刑不當，應與糾正，本院特判決如下：一、撤銷南桐礦區人民法院（60）刑字第69號刑事判決書，和我院（60）刑字第58號刑事判決書。二、宣告孔令平無罪！本判決為終審判決，當事人不得上訴。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好一個草菅人命的「判決」。就這樣，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九年整整二十年的生死劫難，被重慶法院輕鬆的用三百多字劃上了句號！

就這樣，我，一個普通中國老百姓的生命在中共「革命」運動中，被任意蹂躪和摧殘達二十多年之久，待我們奴隸不如。「反革命」一詞，像一個麵團一樣，在他們的手裡捏來捏去，玩著：「有」，「沒有」的詞眼，將法律猥褻得比兒戲都不如！

我憤怒喊道：「整整二十年你們睡醒了不是？在獄中一開始我就一再申明這是一個假案，你們全不理會，二十年來我寫的申訴百餘余封，你們裝聾作啞，今天若不是上面有政策，你們還會矇蒙下去，你們那像辦案的機關？」

那姓丁的漠然看著我，一臉無奈，他知道自己也是一個任人使用的槍手。面對這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我心中萬丈怒火又怎麼發洩？

1619年，美國一位叫詹姆斯頓的白人，從荷蘭奴隸販子手中買下了二十個非州黑人，帶回美國充當奴隸，從此開始了美國黑奴的歷史，他們的吃苦耐勞和繁衍，使他們漸漸充當了美國建設的主力，到一九七〇年黑人已超過75萬人，其中奴隸占70萬。

由於基督教的傳播和深入人心，1860年林肯任美國總統，於1864年發佈解放奴隸宣言，黑人為爭取社會平等進行了百餘年可歌可泣的鬥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牧師馬丁·路德·金提出的，黑人民權鬥爭。一九六四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明確：美國國內的公共設施實行種族歧視，被視為犯法。

在中國，毛澤東用階級鬥爭實行變相奴隸制，把人為分成紅五類、黑五類。中國倒退了幾百年，今天這種遺毒遠沒徹底肅清，我們這些黑五類，應向馬丁·路德·金學習，發動中國爭取民主和人權的鬥爭，牢牢記住：在中共統治下我們的權力只能靠自己爭，天下要靠自己去闖。

此時的我，不是當年如羔羊般的馴順者了！就在那小夥子要我簽字的那張紙上，我留下了：「本人對本案保留繼續申訴的權力。」十四個字。

#### 第四節：區統戰部的官架子

這天下午，我回到家裡，母親告訴我，被蔡家派出所扣押了兩個月的戶口簿，今天也由醫院的王書記送來了，不過母親補充說：「蔡家派出所對王光明講，要你寫一個檢查交到派出所去！」

我回答道：「別理他。」在我的眼裡，這是一群騎在百姓頭上的政治痞子，現在同他們多說一句話，都有損我的自尊！

然而，1980年的元旦，對於我們母子倆，畢竟是渡過二十三年劫難，死裡逃生後重逢的第一個元旦，可惜，媽媽當年想得太絕，將原先的遺照全部燒掉了，現在只有在頭腦裡留著他們的遺像，寄託對他們的紀念了。

恰好，那一天下午，小妹和范山也來了，他們帶來了一塊豬肉和糍粑！我們忙碌到晚上十點鐘！按照中華民族的傳統習慣，將在春節才吃的團年飯，提前到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31日晚上，就在我那間臨時房間中擺下象徵性祭品！一縷香煙迎接我的父親、外婆和弟弟「回家」團年。

我為他們盛上了飯，擺上了酒，然後跪在地上祈禱他們的在天之靈。默默懺悔我對他們的不孝！特別是我摯愛的父親，他是我們全家中最早進入天堂的人。

元旦一過，我就帶著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鹽源縣法院的刑事判決書和重慶大學關於我右派的改正書，到北碚區委統戰部要求他們根據政策，安排我一個「對口」的工作，並處理我的「善後事宜」。

統戰部長姓賀，用一付不冷不熱的面孔接待我，給人官氣十足，架子不小的印象。像這種人既不會對被害人以同情，更不會考慮被害人的困難給予應有的解決。他看過我遞給他的「平反」文件後，叫我去樓下的『接待辦公室』去找吳慶華。

這吳慶華頭髮花白，大約五十多歲。我向他說明來意後，他打量著我，從抽屜裡取出兩張表格遞給我！我接過表格一看，那是兩張「落實政策人員登記表」，中共的統治，唯獨這種文牘式的檔案材料建立得十分細密，凡涉及人事調動，不管跑那一個衙門，毫無例外的拿出這種標題不同、內容一樣的表格來。

回重慶僅三個月，跑了重大、法院和中共市委，就填了三次這種表格。

當他看完了我給他的那一迭材料和我填寫的表格後，問道：「你是重慶大學機械系的學生嗎？你也知道的，根據中央及省委檔的精神和規定，落實你的政策是由我們區統戰部負責的。不過，我們的權力和範圍有限，所以，希望你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來對待我們對你的安置。」

吳老頭明白貫徹共產黨的政策，必令我「大失所望」，所以預先給我打一針預防針。我正等著他的下文，他突然口風一轉，先行發問道：「先說說，你想幹什麼工作？」

在毛澤東暴政時期，向國家輸送建設人才的大學已紛紛關門，幾十年來技術人員的枯竭，連中共的上層官員也驚呼「人才難得，人才貴寶」。所以我不但不應成為統戰部難以安排的包袱，簡直是用人單位力爭的「缺貨」。然而，這位吳老頭向我推薦了北碚區屬的幾個街道工廠。

國營廠和集體廠，待遇和地位大不相同。這又是中共領導下的怪像：國營、部屬大工廠的工人，優於地方國營企業裡的工人；省級企業又比市級企業優越；市級企業又比縣級優越；縣級又優於街道工業。當工人也要分貴賤，講運氣。

工人被劃分出等級，體現了「國家」對企業的「分別對待」，在資金，設備原材料十分瀆乏的條件下，先滿足直屬中央的大企業；然後層層降格。輪到那些處在最底層的街道工業，不但生產舉步維艱，工人們連最低工資收入都難以保障。

「可不可以考慮將我安置到北碚境內的北碚機械廠或是紅岩機械廠？」我請求道，我已經是中年人了，在求職時當然要選擇，這兩個廠說不上好，只是比較正規一點，生活待遇也相對穩定一點。

「啊！那可不行，這些工廠是市屬的單位，我們區委是沒有權力向這些單位安置人員的。」吳老頭斬釘截鐵的回答。

「但是，根據中共中央有關的檔中，沒有規定我們的就業安置非由區一級來安置。那上面只有：「由哪一個單位處理仍由那個單位安置的規定」，我竭力忍耐著，既要揭對方在誑騙我，又不好同他爭執，因為這是我來找他們。

吳老頭冷笑道：「如果你有依據，那麼你為什麼不去找重慶大學，偏偏要跑到這裡來？」對方果然耍賴了，我明白，「平反」的門檻之外，還有「尋找」工作的門檻！對於我們這些從地獄裡爬出來的小鬼，在共產黨的衙門下要想順利生活下去，還不知道要爬多少門檻？！

我看了看面前這個老傢伙，又聯想到鄭樹勳。我想離開鹽源時，就該聽從他的吩咐，像背十字架一樣，將他所需要的三十斤貢品一斤不少的從鹽源帶回來，也許現在我不至於在這裡犯難。

可我仍書生氣貫足，滿以為只要獲得「自由」，在這個經歷十年文革浩劫，「人才」奇缺的社會中，哪有求不到職業的道理？

沉靜片刻，吳老頭終於又拿出另一個辦法，改口說道：「區屬的企業你既不願意去，那麼你去中學教書怎麼樣？」吳老頭的這個建議倒真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需要。

不過，這是一種政治的需要！須知，一九六六年為了摧毀政敵，學生成了毛澤東的政治別動隊！而今新的中共官僚，上自鄧小平，下自官復原職的中共大小官吏，哪一個沒有嘗過「紅衛兵」的拳頭？剛從別人踏著的「一隻腳」下爬起來的中共「新」當權派，沒忘記當年紅衛兵的厲害。

對待多年「傷失」理智的學生，不論是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還是遍佈全國，成千上萬的中小學生，可不是簡單動用民警就能治服得了的。弄得不好，這些被毛澤東調教多年的造反「小將」們，一旦被毛澤東餘孽所號召，造起反來是絕不好收拾的！

能走上課堂約束學生的老師，一時的「奇缺」起來！我在鹽源時便知道，為了籌集農場子弟小學的師資，不僅從管教人員中抽人，還從就業人員中過去教過書的人（例如魏朋萬）叫去當老師。

蔡家場的幾所學校中將教師子女以「頂替」名義，請去濫竽充數登上講臺的人就更多了！然而，社會風氣既已被毛澤東破壞到這種程度，將老師當作最低賤「臭老九」的遺風依舊！教師不但在待遇上低於當時社會上的其他職業，在人格上得不到起碼的尊重，他們依然受到學生任意侮罵，甚至家長可以到學校替孩子苛責老師！好像老師是他們雇傭來的保姆。

對於我個人，「老師」這個職業，卻有一層與別人所不同的隱痛！我的父母原來都是忠厚老實的「老師」，他們曾在國難當頭時為中國新文化做過貢獻，結果，父親慘死囚園，母親遭受右派橫禍。雙親之痛使我發誓，絕不重走父母的老路。報考大學，絕不填師範，出了校門再不回頭走進校門。

中共不能寬容「教書匠」，在我心裡留下的傷痕沒有癒合。想不到在落實政策的名義下，要我去接受這個我早已不願幹的工作，於是我十分果斷拒絕了吳老頭的「安置」。我的理由很簡單：「專業不對口，學非所用。」

第一次初訪區委統戰部就這樣無果而歸了，帶著怏怏不快的心情，我回到蔡家。母親聽完我去區委落實工作的經過後卻說道：

「共產黨的組織原則你是清楚的，既然統戰部的意見要你去教書，你不妨考慮一下。重慶市第二十四中學，就在蔡家，是一所規模很大的學校，有高中部、初中部，離這裡也不到一公里，隔家也近，要不你抽個時間去那所學校看看，也好作準備。」

我看著她那多年生活重負壓駝了的背，面對那張滿布皺紋的臉，想到她好不容易盼了二十多年，才把自己唯一的孩子盼回來了，當然是盼他常伴身邊，再不離開。可是她怎麼就忘了在中共統治下為辦教育，不但使她耗盡了畢生精力，還使她飽受了二十幾年的苦難？

對她的勸告，真不知怎麼對答，只好含糊回答道：「你不是從小就叫我不要走教書這條路嗎？要不然，我再回一趟重大，按政策我該由重大落實善後處理，看看他們拿什麼主意？」

## 第五節：第二次回重大

1980年一月，我第二次去了重大，在公共汽車上我在想：去重大找誰呢？本來，我的案子既已由重慶法院改判，那麼按方式理應去法院落實我的人身賠償和善後處理，我這一趟該去市中級法院找那姓丁的小子，但我單槍匹馬的能去找法院評理麼？那裡有關於冤假錯案的處置規定嗎？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一個只有獨裁者政策，卻無法律可依的地方，執政者可以隨心所欲的頒佈政策整人，以後，新的人上臺又興另一套政策；在這種不與人民約法三章，也不受人民約束的獨裁統治下，有評理的衙門嗎？！

於是我便想到當年負責處理我們右派的人事處主任宋殿賓來。聽母親說他因為愛人出身地主，在文革中受過很大衝擊，坐過牢，掃過廁所，有過與我們相似的經歷，興許他會良心發現，現在會作出與當年完全不同的處理。

於是我再次回到重大，在學校傳達室詢問宋殿賓的住所。那門房告訴我，他在文革時離開了學校，現在在楊家坪的市衛生學校任黨委書記。我要尋找的當事人還沒有「官復原職」。

但是，我既又一次來重大，總不能白跑一趟。按照守門人的指點，在大校門右方的一排兩層樓住宅中，找到老校長金錫如的家。

學生時代，除全校性大會上在主席臺上見過他，後來在一九五九年的五一節，在南桐叢林小學聽他宣講摘帽政策外，我還從沒對他進行任何私人拜訪。

此次來訪又沒預先通知他，似乎很唐突。心裡準備好了見面怎麼開口，便登上了那排房子二樓樓梯。

他的房門虛掩著，我輕輕地扣了一下門，不一會兒，從右側的臥室裡面走出一個背略微駝，個子高高的，大約七十歲左右的老人。他見到我便問道：「找誰？」我從他沙啞的北方口音和長形的臉上喚起了當年的回憶，這便是中國著名的動力專家，名噪中外的金錫如了。

只是我不相信堂堂大學校長住得如此簡陋，家裡也沒有一個負責通報的保姆或秘書，疑惑地向他問道：「金校長在家嗎？」他取下眼鏡，仔細端詳了我好一陣才回答道：「我就是，你找我有什麼事麼？」看得出他正竭力回憶面前站著的我，只是相隔二十多年，加上他年事已高，在數以萬計的學生中，一時無法搜索到我這「倒楣」學生的影子。

我向他鞠了一躬，自報了姓名後，便跨進了客廳。客廳的面積大約十來平方公尺，靠窗的平櫃上堆著厚薄頭精裝書，放得很亂，好像主人剛剛查閱過資料，沒來得及收拾。兩張單人沙發中間隔著一個茶几已經很舊，茶几上堆著紙筆，零亂放著。牆上掛著的幾幅對聯上滿佈了灰塵，兩扇通臥室的門關閉著，裡屋靜悄悄的，不知道住著多少人。

當我在沙發上落坐，開門見山的將我的經歷和來意講出後，他的臉上顯得十分礙難，恐怕像落實政策這一類問題，在我之前還沒有人來打擾過他，因為這種事，實在與他毫無相干。

一九五九年他帶領學校到叢林煤礦「慰問」下放幹部工作組，僅僅是受黨委的指派，履行公務而已。今天事隔二十年，對於當年反右和現在的平反，他恐怕很少過問，對突如其來我的造訪，簡直不知所措。

聽完我的自述，立刻回答道：「啊！我已退休多年，對學校和行政方面的事，已完全脫勾了，據我所知，你的問題應當由重大落實政策辦公室解決的。」停頓幾秒後，他又說道：「關於你想找個合適的工作嘛，我現在正受民主同盟的委託，籌畫在涼山地區辦一所職工大學，正需師資，你不妨再過半年與我聯繫！」

聽到他這話，我對他的善意指點表示感謝，但對他的推薦我已來不及考慮了。當我站起身來，突然從左面的那間臥室裡，傳來了一陣男孩哭聲。

他連忙去開那門，裡面的床上正睡著一個形體殘缺的，大約已有十七八歲的男孩。因患有先天性小兒麻痺，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原來這便是他最小的兒子，剛才因為睡著了將尿撒在床上，醒來不見「保姆」，而發出啼哭聲。他趕緊去替孩子更換衣褲和床單。

此時我才注意到，他的腰間繫著一條圍腰，好像正忙碌著家務。不好過多糾纏他，便起身告辭。

看到這位聞名中外的老教授，堂堂重慶大學的老校長現狀如此，便知道十幾年文革將知識份子怎樣作踐！不過，此時顯然不是細說詳談的時候，匆匆告辭，結束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拜訪……

走出金校長的「家」，看表已是十一點半鐘，走出校門，在門口的面攤上吃了一碗抄手，想到此時去拜望錢主任正合時宜。記得一九五七年校園裡鳴放剛剛開始，我曾為了勸止馬開先離校而陪她一起去過他家。

當時他住在後校門松林坡的專家別墅裡，而今二十三年過去了，他是否還住在原處？便去門房詢問傳達室的值班人員，他們告訴我，他現在住在濱江馬路的家屬區。

在一幢底層低出馬路的四層樓房裡，我終於找到了他的家。

我想從松林坡的別墅搬到這裡來，一定是文革的「功勞」，只是不知道當年他受了怎樣的衝擊？

沿著濱江馬路，在一處石梯下面走到底樓，叩響一扇木門後，出來開門的是一位五十歲上下的婦女，她在門口攔住了我說：「錢老師正在午休，沒有要緊的事最好不要打擾他，你有什麼事嗎？」她打量著我。

我猜想，她一定是錢夫人了。於是我說：「我是錢主任五十年代的學生，自我離校後二十多年沒有回過母校，今天因為路過重慶，特地來探望他的。」

她聽說後，將我讓進了門裡。這是一間大約只有8平方公尺的小書房，那窗子正好開在馬路的下面，這同當年他那個松林坡別墅的小會客廳實在無法相比。

屋子裡面，書櫃已將小書房占去了一大半。臨窗下面，安放了一個課桌和一張靠背椅，使人感到了主人的清苦。桌上的檯燈，桌面玻璃下面的許多舊照片，都使人想像出魯迅筆下的三味書屋。

那玻璃上已經覆蓋了一層薄薄的灰塵，想來是河風將窗子上方馬路上的灰塵，隨意撒在上面的！

女主人等我坐定，才告訴我：「錢老師因患腦血栓多年，記憶已完全喪失，現在行動不便，基本上像一個癡人。所以，一般情況下我們都拒絕想會見他的人。」

聽到她這個介紹，我又環顧了一下這間狹小簡陋的小書房，想開口向女主人發問，他們是什麼時候從松林坡搬到這兒來的？但馬上轉念一想，這肯定又是主人一段辛酸的經歷，何苦去勾起她對不愉快往事的回憶呢？

正在此時，裡屋的門打開了，一個一頭花發的老人扭曲著身子，拄著拐杖，趑趄的出現在門檻上。女主人見到他，趕緊跑過去將他扶住，我也沒有顧及自己作客的身分，走過去幫著她將他扶上裡屋的木床上坐好。

此時，我才注意看這位當年風采綽約的錢主任，而今枯槁的臉比那金校長還要瘦老。他正用手死勁地比劃著，好像竭力想說出積鬱在心裡的話，卻始終不能說出口來，臉因激動而歪斜發紅，看到這淒慘的形狀我好不難受。

問到了張可治老師，他可是當年與黃錫凱先生齊名的中國著名機械理論家、重大機械系的臺柱子教師！不料，女主人卻告訴我一段想都想不到的往事：

文革期間，有一天下午，機械系的幾十個學生，將他帶到團結廣場升旗台後面，那片高出地面兩公尺的草坪上開批鬥會。大家在七嘴八舌以後，幾個惡作劇的學生便強迫他爬在地上學狗叫！還拿著一條教鞭，命令他學狗在草地上爬著轉圈子。

圍觀學生嘻嘻哈哈，忽然一個學生說他屁股翹得太高，是翹尾巴，不問清紅皂白，一記耳光，將他那600度的近視眼鏡打落在地上。

可憐這張教授教書把眼睛弄成了高度近視，眼鏡一被打掉他便成了「瞎子」，急得他爬在地上滿地的摸，團團轉，越發逗得圍鬥他的學生們哈哈大笑。

此時天已黑下來了，張老師的眼鏡也不知被誰藏到哪裡去了，他還在那草地上一味瞎摸。圍觀的學生卻一哄而散去食堂吃飯了，只留這睜眼瞎子還在那裡亂爬亂摸！不知不覺他爬到了那草坪台的邊上，從那兩公尺高的崖邊，一失足，頭朝下跌了下去，當即一命嗚呼！

文革時我早已離校！對文革中校園裡種種暴行，雖有所耳聞，卻沒有親自體會過。

今天，我本意想嚮往日的師長們，為我指點求職的門路。沒想到，卻從他們身上上了文革一課。親身經歷文革浩劫的錢教授，剛才表現出的想說又不能說的那份痛楚，不知寫下來沒有？有多少人像季羨林寫牛棚雜記的回憶錄？現在他只能仰著花白的頭仰天向蒼天傾訴了。

當我拜別錢老師，走在通往後校門那濱江馬路上時，我再次回想起當年我在這裡徘徊的情景！帶著幾重傷感重遊故地，很想見見久違的故友，尋訪一下當年在叢林煤礦一起共渡右派煎熬的同學。

便折轉身來向著民主湖方向走去，因為我聽說，當年從廣元壩生還的右派，現住在我們求學時的男生第二宿舍。

當我走近這座已破舊的「學生宿舍」時，那熟悉的門窗再次喚起了我二十三年前的追憶。故地重遊如像惡夢，彷彿又聽見那窗戶裡面傳出的口號聲，夾雜著隱隱哭泣聲。我用力揉了揉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看得分明，那窗戶裡此時飄出來的是一縷縷白色的蒸氣。

大樓的側門，當年宿舍朱紅漆門已變成黑色，兩頭上樓的樓梯被亂七八糟的桌椅雜物堆滿封死。只是過道依舊，從打開的門裡望去，原先每間只有十二平方公尺的房間，隔牆已被拆掉，現在變成了二十多平方公尺的大房間，改作了住家戶。

走進樓來，見過道上排著一式的爐子，過道中間放著盛潑水的桶，潑水的酸臭與爐中溢出的煤氣相混合，令人特感難受。這裡成了二十三年後，保下自己一條命，獲平反回校的當年右派同學的家。

我在中間的樓梯口上，碰到的第一個當年難友，便是當時地質系四年級的王智山，因為他是調幹帶薪讀書的學生，是當年我們這七十幾名極右學生中年紀最大的一個，今天他已五十多歲了。

一九六〇年春天至今已整二十年，當年赴南桐一起勞改的七十六名「右派」至今剩下生還的不到二十人。

這二十年的煉獄對任何人都是「脫胎換骨」的，何況這張不經老的臉皮？如果這些分別了二十年，當年共患難的同學乍然相逢於路上，肯定會被當作不相識的路人而失之交臂。

幸好在這裡，在一個明知故友的故地，所以即便是臉皮已皺成了疙瘩，但只要「匡架」尚能識別，一定還會驚訝的認出來！

此時他正從過道中間的樓梯口上走下來。手裡拿著布袋，看樣子是要上街去買米，當我們面對面相碰，目光相接良久，他的眼裡便泛出了驚訝的光，失聲喊道：「孔……孔令平」，接著便緊緊握我的手，拉著我重新上樓，將我「迎」進了他的「家」。

過道裡的煤氣，使「家」的環境很糟，但無論如何這「窩」比起南桐煤礦或廣元壩的集中營來，便有「天壤」之別！這裡至少可以自炊自煮，有一個妻子廝守，在身心困乏的時候，可以休養補充。

王智山的愛人看上去挺老實，像北方的中年農婦。我在他那間二十平方公尺的房間裡入座，沒多問這些年來的生活和工作，卻先談當年在叢林煤礦一起渡過的拉板板車，運坑木、燒焦炭，偷地瓜的令人心酸往事，因為那雖然苦不堪言，卻是烙在我們心上共同的傷痕，這些傷痕是無法褪去的。

他告訴我六〇年我被捕入獄後，叢林溝所剩下的右派師生除少數的回校復學，其餘留下繼續改造的四十多人被押往廣元壩農場，在那裡繼續充當名義上不叫勞改的勞改犯。

集中在廣元壩的幾個老師因抗不住飢餓和高強度勞動，先後死在那裡。所以到了一九七八年原先七十六個發沛南桐的師生，只剩下二十多人出了鬼門關。

我從王智山家裡出來後，又去隔壁的江明遠家和附近的王澤庸家。

在江明遠家，正巧陳興國跑來了，這陳興國是當年「楊治邦投敵叛國」案的檢舉人，在當時的「右派」圈子裡，留下了「出賣」同學的惡名，不久前楊治邦投敵叛國案得到平反。使我立即聯想到因吃毒蕈死於甘洛的楊治邦，便把他的故事講給他們聽。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無論從素質，政治見解，都是一些被毛澤東生拉活扯充作『階級鬥爭』的犧牲品。根本不存在，更談不上同共產黨「平分天下，輪流坐樁」了。所謂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向黨進攻，全是毛澤東的捏造。

當年被劃為右派的人，充其量對中共的霸道進行了批評，絕大部份對中共存有幻想，在這個「群體」中，經過共產黨煉獄後才開始分化，相當部份人拋棄了幻想，堅決反對毛澤東獨裁，成為民主的自覺追隨者，其中最優秀的人物，在反抗暴力鬥爭中光榮獻身，例如陳力張錫錕和劉順森，是我們的驕傲！

當大家七嘴八舌談到雷繼堯的時候，講到他在叢林甘當王懷壽的耳目時，大家發出一片噓聲，連陳興國都指責他幹的缺德事。十八年後，他因在教職工中非法集資第二次進了監獄。算老天長眼給他應有的惡報。



以求職為目的，我第二次回重大，對老校長、老系主任、老右派同學的拜訪，雖沒有解決我當時的問題，卻意外聽到「文革」中社會上和學校發生的真情實況。

## 第六節：政治需要

母親為了擺脫蔡家場這被人踐踏的處境，爭取按中共檔所規定的條款從回托兒所。八零年元旦剛過，她便親自去北碚將她準備了好久的「禮物」，送到北碚托兒所去。

這天我見她一個人坐在屋裡一聲不吭。便問她是不是生病了，她搖搖頭，老半天才嘆氣告訴我上午去托兒所的經過。

蠻不講理，毫無同情心的托兒所領導，以母親年齡大，即將退休為理由斷然拒絕了她的請求。她辛辛苦苦製作的教具和伏燈寫成的教材被拒收。

當年劃母親為右派的時候，就因為她生性倔強，雖身受歧視，但對無德無才的團支部書記卻常流露看不起的情緒。今天又不肖於逢迎拍馬，不善於「走後門」，教育局的「領導」無視她的正當請求。

小小一個區教育局，和它管轄下的托兒所，便是當時社會的縮影，當官的絕不會根據母親製作的幾件玩具和撰寫的幾本教材，在工作條件、生活起居、住房、待遇等等方面按中共平反冤案的規定，給她起碼的安置。

這事發生後不幾天，臨近春節的一天上午，醫院黨支書王光明，走到我住的那房裡來，向我說：「有兩個教育局的人在我的辦公室裡找你談一件事。」我心裡很詫異、區教育局與我素無關係，我既不認識它的任何職工，也沒想過要找他們談母親的事，他們找我又幹什麼呢？

進入王光明的辦公室，我見裡面坐著兩個人，一個瘦瘦的大約五十開外，另一個大約只有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兩人等我坐好後，那位老頭開門見山的說：「你已經回來四個月了，統戰部已將重慶法院和重慶大學對你的平反材料給我們寄來了，我們今天是代表區委專門來對你的工作進行落實的。」

他一面自我介紹道：「我叫羅士進，是區教育局的政工股幹部。」

此時，我心裡已經完全明白，聽那姓羅的叨叨不絕的講教育與四化關係的大道理，頌揚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當老師是一件光榮的職業等等後。最後說出教育局的人事決定：將我安排到二十四中當教師。

他說：「你的母親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冤屈，好不容易將你盼回來了，你回到北碚蔡家場同母親團聚，體現了黨的人道主義關懷。這也是你們母子倆期盼了好多年的，我們根據區委統戰部的意見，周密考慮後才做出這個決定的。」

聽他左一個「照顧」，右一個「團聚」，使人肉麻，我本想就母親的落實政策，要去教育局找他們的，沒想到他們自己跑上門來，這些人一肚子壞水，母親在這裡受了二十年折磨還不夠，現在打起我的主意來了。

「我的母親花了那麼長時間製作了幼兒的教具，編寫了你們正緊缺的幼兒教材，跑到教育局來向你們苦口婆心講情，要求你們能按政策規定，調回教育局；再說她現在年事已高，這蔡家場交通極不方便，這個醫院員工長期欺侮她。

你們不但不考慮有關規定，也不顧及她的困難，反而以她將退休而拒絕她的要求。現在你又跑到這裡來，貓哭耗子，想把我們母子倆永遠栓在這偏僻的鄉鎮上。我老實告訴你，這個二十四中我是不會去的！」

我一口氣把對方的真實意圖當場戳穿！好像出了一口惡氣。

當面戳穿了假面具，來人自己也覺欺人太盛，心裡歉疚，屋子裡暫時沈默了。正在這個時候，母親從外面走進來。

那羅士進畢竟是政工幹部，明知自己虧了理，滿臉堆笑的向母親說：

「你和兒子，受了不少委曲，我們都理解，但是托兒所安置你也有相當困難，現在住房是所有安置單位最感緊張的事，他們不想本單位多一個快退休的人。落實政策中你們有氣，還可以向我們身上出，我們又去向誰發

洩？這都是四人幫造成的，所以大家還要本著向前看的精神，才能解決問題。」。

我望著他，知道他不過是奉命辦事的辦事人員，我也沒有必要找他出氣。沈默片刻，他便向母親說：

「你老人家還是勸勸你的兒子，總不能老是賭氣。再說，拒絕區委的安排，老是呆在家裡不工作，也對你們沒有好處。如果你兒子現在願意到二十四中報到，我建議工資可以從一月份開始拿。現在中學就差這樣的受過正規教育的大學生。至於你對這樣落實還有意見，可以通過組織方式再行調整。」

我們送走了羅士進後，回到母親的寢室。我再次望著放在母親床前那一紙箱的兒童教具出神，母親從事了一輩子的教育工作，想不到我們母子到了今天這個時候，還要為自己的工作而焦慮。

### （一）老秦

第二天，正巧來了一個病人，上到二樓來，口稱是來找母親的。看他滿臉的鬍鬚，頭髮蓬亂，精神非常憔悴，身上穿一件灰色打補丁的棉衣，很髒。母親很客氣的接待了他，一面向我介紹這個「病人」的歷史和遭遇，這是一個同母親有過相似命運，共過患難的蔡家「黑五類」成員。

他姓秦，二十三年前，同母親曾經一起在北碚煉鐵廠接受「強制勞動改造」，那時他才二十多歲，原籍是蔡家地區土生土長的人。

一九五七年曾是北碚區農貿公司的一個「幹部」，就因出身地主、口風不慎，反右時被扣上沒改造好的地主子女和右派雙重帽子，同母親遭遇相似，凡倒楣事都有他的份：運動一來，當「主席」，運動一過，便充作廉價勞動力。

北碚鐵廠解散後，他先於母親調到蔡家供銷社，接受「監督勞動」，當搬運工。

一九七一年，他在表兄幫助下，討了一個家住鎮供銷社不遠，蔡家的殘廢農村姑娘為妻。因為他必須一大早起來為供銷社下苦力，下午又匆匆在下班後趕回家忙自留地，實在受不了，便主動放棄了「公職」回家當「農民」。

他今年五十多歲，看上去已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常常傷心的說：「每天在地裡勞動，分不清灑在地裡是汗水還是淚水，要不是看在兩個孩子這麼小，我真想一死百了。」

風裡雨裡掙扎到今天，除一個茅草屋，連床好棉絮都沒有，兩個孩子大的只有七歲，沒錢上學掇學在家，打一點豬草，小的才五歲。妻子是一個殘疾人，除了餵豬便什麼都不能做。那個年代農民的日子比搬運工還苦，家裡靠他一人賺的工分，不夠四口人的基本口糧，平時開支是拿不出一分錢的。

一九七八年好不容易他盼到了平反的那一天。不料他除了得到供銷社給他一紙「糾正右派」的通知書外，公職卻沒有恢復，也沒有工作和工資，於是他拿著檔跑重慶市委、跑四川省委，像乞丐一樣排在長長上訪的佇列中。

時間花了兩年，除了跑路給他留下幾千元車費的借債，給他頭髮增加幾處斑白外，一無所獲。

中共北碚區委統戰部冷冷的回答他：「當年你是自願離職的，而不是組織上開除了你的工職，所以不存在恢復工職的問題。」

供銷社的黨委書記翻著白眼對他說：「你自己要辭職，我們有組織規定，如果你硬要求恢復原來的工作，那我們就只好請上級怎麼處理吧？」從此以後，他要再上訪，都只得一個簡單的回答：「回去等著吧！」

時間就在漫長的等待中過了一年又一年，眼看兩個孩子因窮無法上學，妻病不得治療！除我的母親在他來醫院看病時給他一點接濟，很少有人理他。

母親對我說：「只要你用心觀察，他那形象就像油畫『受難者』中將頭伸向蒼天的老農。看到他的遭遇，想到世上比我們更慘的人大有人在，我就感到已沒有什麼可求的了。」

老秦的到來和離去，對我產生很大的震動，全國處處一樣，到處都會碰到這些落難者，

所有獲得平反的人，都吃盡毛澤東的苦果。既然平反是自上而下的一種施捨，有它的政治目的。落實到具體的人，工作也好，待遇也好，豈會超出共產黨的恩賜？也不會讓受害者擺脫當奴隸的命。

老秦走後，母親勸我說：「我看，你就不要固執了，他們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就像收拾那姓秦的那樣收拾你。橫加一個抗拒組織安排的帽子，事情就麻煩了」。

接連幾天，我心裡被落實工作的煩惱攪成一團亂麻，壓抑的心情需要釋放，便將自己關在我所住的那間病房裡，從牆上取下那把從鹽源帶回來的二胡，獨奏起來。

空山鳥語，空山鳥語，我可是連小鳥也比不上啊！在中共天下裡，我們只是一群關在籠中的小鳥而已……

正在這時，護士小陳在我窗下喊道：「快去糧店領過年的花生和糯米。」這提醒我，回重慶的第一個春節悄然而至了。

### 第三章：一段教書的日子

按照中國民俗，臘月二十九是祭祖的日子，明天就是這個日子。不過，文革時期，民俗被誣為封建殘餘而一掃光了。今天，母親同宿舍的人都已回家過年，整個樓裡冷清清的，只剩下幾個病人和我們娘倆，儘管比在獄中好，但仍感到孤伶伶的，心中正懷念死去的親人，中午胡媽來了。

小妹仍像上次那樣，提著竹籃跟在她的後面。見面以後，媽媽像待孩子那樣，忙拉著小妹給押歲錢，一邊問：弟弟怎麼沒有來？

胡媽回答說，「他們的爹還沒到家，範山去火車站接人去了，抽這個時間，把給你們留的過年貨送過來。」

說著，從小妹手裡接過籃子，取出準備好了的臘肉和湯圓面，並說，「明晚團年飯，乾脆你們娘倆到我家，同老頭子一塊吃。」

母親答應，倘如鍾老也回來了，我們初三來鄉下，母女倆便告辭回家。

#### 第一節：走人戶

第二天除夕，鍾治淵沒有回來，因為我和母親在四川沒有其他親人，所以就把範家當作自己的家。按民俗我和媽媽初三去了範家。

這患難結下的乾親家，住在蓮花大隊中部一個土山崗上，距醫院兩裡地。在山岡的埡口，泥牆圍成的瓦房群裡半隱在竹林之中。

門外是一口大約兩畝多地的池塘。我想，範山姊妹兩為母親送來的小魚，多半就出在這池塘裡了。

當我和母親在山埡口露頭時，范大叔正在房邊的自留地裡辦菜，看到我們走來，連忙向院子裡喊道：「山，乾媽來了！」胡媽聞聲從圍牆的門裡走了出來，她栓著圍腰，正在餵豬。我看見她走到門邊的剎那，小妹緊跟在她身後，但她並沒有跟著母親走出門來，而是閃了一下又縮了回去。

我們走上埡口，范大叔迎著我們走來，當我們走近他，伸出手去的時候，他侷促地搓了搓滿手的污泥，口裡歉聲的說道：「髒！髒！」。這是一個身體結實的老人，雖年過花甲，但那矯健的步履頂有精神。

聽母親說他因為「解放」前當過一貫道點傳師，所以「解放」後不久就被抓起來判了五年刑。刑滿後一直留在勞改隊，監獄把他的耳朵弄聾了，平時不大與人交談。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他依然是一個「刑滿釋放犯」。

可是從他那樸實憨厚的老農型臉上，實在無法同中共宣傳中，對「一貫害人道」所宣傳的陰險狡詐嘴臉聯繫起來。

我和母親在胡媽和范大叔的陪同下，跨進門檻，一股農村特有的豬溺酸臭撲鼻而來，門裡的左面豬圈裡睡著兩個剛剛從集市買回來的仔豬。

胡媽走進裡屋，忙著洗手，並從碗櫃裡取出早已準備好的湯圓面，和芝麻花生拌的「心子」，放在臨窗的木桌上搓著湯圓。這屋子既是他們的灶房也是他們的飯堂，柴火就占了整個房間的1/4，灶邊堆著從後山坡竹林撿回來的竹葉，鄉下人的節儉，恐怕世界其他國家都少有。

小妹忙著將堆在裡院的柴火撿了幾根進來，用柴刀劈開，然後劃上火柴將已經放進爐膛裡的亂葉敗草點燃，並且向灶上的鐵鍋裡摻水。做完這些便坐在柴灶口外的小凳上，給爐膛裡不斷的添加那些樹葉。

我突然從那爐膛裡射出來的紅紅火光中，看到她那張充滿青春少女的臉，那是一張很美的臉！

不一會鐵鍋裡的水燒開了，胡媽將搓好的湯圓下鍋時，媽媽連忙招手說：「剛吃了早飯不久，就不要煮那麼多了。」胡媽笑道：「過去你到我這裡來，我也沒東西招待你。今天，我們櫃子裡有的是糧食，哥哥今天又是第一次到我們鄉下作客，你們都不要見外，今天這湯圓一定要吃夠。」

說著取過一個大碗將已經浮起來的湯圓舀了一大碗，吩咐小妹遞給我。

我連忙起身道謝，一邊說：「我哪吃得了這麼啊！」范大叔卻笑道：「鄉下人沒什麼招待你們的，湯圓吃夠，你不要見外。」說著自己拿起一個大碗滿盛了一碗，坐在我對面與我對吃起來。

這可是二十三年來頭一次，范大叔的直率和真誠，胡媽的熱情，小妹略帶羞澀的拘謹，都濃濃洋溢著農家的天倫之樂，讓我和母親溶化在中間，分享他們的快樂。

我們邊吃邊聊，話題當然是「昔不如今」，這可不是共產黨報紙上像宣傳「舊中國」那樣，向老百姓「灌輸」的，實在因為昨天的飢餓在農民心中留下的傷痕太深，所以自然而然的談昔今對比。

胡媽指著廂房裡的兩個用竹席圍成的糧囤，告訴我，去年一年土地包產到戶以後，三個人的土地足足收了四千斤糧食，幾乎是過去公社集體生產時所分得口糧的三倍多。她說到這些不禁嘆了一口氣說：「過去哪裡是人過的日子？今後希望政策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農村人有口飽飯吃就知足了。」

說到范大叔的工資，都花到范萍姐弟倆讀書上了，經濟上很緊。她說：「我就因為沒有讀過書，所以臉朝黃土，背朝天的過了一輩子。城裡人不種莊稼照樣有口糧吃，鄉里人累死累活種地，只圖填飽肚子，這吃虧就因為沒文化。所以，今天我們把家庭所有收入都花在兩個娃娃讀書上了。」

說到這裡她又千叮萬囑的嘮叨開了：「哥呀！你是大學生，你的文化了不起呀！范萍是你妹妹，正在二十四中初中三年級，明年升高中，正在關鍵時刻，今後呀，就拜託你多多費心幫助她，讓她初中畢業，無論如何也考個中師什麼的；有個出頭的日子，不要像她娘那樣，當一輩子睜眼睛，守一輩子窮山溝……」

吃罷午飯後，母親提議，胡媽和小妹同我們一道去作坊溝，向當年救助過她的老朋友拜年。

母親介紹說，這作坊溝在二十年前是蔡家場「赤腳醫生」點，蔡家醫院成立之初，便將這裡暫作臨時的門診室，為解決吃水困難，醫院院長決定自己打井，當時母親剛從北碚來這裡接受醫院的監督改造。

醫院給她的工作，除當時全院誰都不願幹的清潔工：燒鍋爐、消毒、打掃院內院外，一天下來已累得精疲力竭，晚上還要強迫她加班掘井。給她每天劃定的加班任務不完成不准睡覺。

強迫勞役很快摧垮了她本來十分虛弱的身體。時值隆冬，我的弟弟在黃桷坪電力學校讀書沒回來。有一天大清早，住在附近的田大媽起來打水煮早飯，就看見打霜的地裡，打井工地上躺著一個人。

她忙走過去一看，認得是醫院的那個最受人欺侮的方老太婆，見她躺在那冰凍土地上已不省人事，奄奄一息，便高聲呼喚她的大兒子，趕快把母親背到她家裡的床上。

田大伯連忙把屋中間的火盆加了一個樹疙瘩，燒了一盅姜湯，一邊用火暖和她凍僵的身體，用姜湯灌進她的嘴裡。好一會兒，母親才慢慢醒過來。

母親暈倒在井邊的事已過去十五年了，從那時留下了善根。

後來母親每提此事，都誇田大伯大媽的為人，說：「要不是田家老兩口，她恐怕就凍死在作坊溝的打井工地上。」從此，母親就認了這個異姓「姐姐」。凡是過年過節，一有機會她都要到這裡來作客、拜謝恩人。

今天是第一次帶著我給田家拜年來了。

田家的宅院，四周用葡萄架和竹柵子圍起來一片土壩子，乾打壘土築牆，瓦房後面是一片茂盛的竹林。當我們一行四人從馬路上走到那通向院子的田坎時，一隻小黃狗汪汪的向主人報了信。

屋裡的主人，一位花白頭髮，大約六十多歲的大娘走了出來，一見是我們，飛快地迎上來，一把拉著媽媽的雙手連連的喊「拜年！拜年！」聽母親說她比母親大兩歲，但那矯健的動作顯得比母親年輕。

這一天天氣晴朗，葡萄老藤上已開始有了芽苞，我深深吸著田園新鮮的空氣。母親從提包裡取出了兩件衣服來，這是她在蔡家百貨店，專門給田大伯大娘買的過年禮。

我們圍坐在葡萄架下，大媽打開話匣，叨叨述著往事：

她說：「當時醫院那個叫劉巴的多次向我說，方堅志是壞人，貧下中農不要被她的表面可憐樣所蒙蔽。可我告訴她說：『你們年輕人還是積點德，你們也是要老的，欺侮一個孤苦伶仃的老人要不得。』後來那女人還向我們大隊書記說我同情右派，書記問我，我卻回答他：『他們也講個天地良心！那老方平時又沒招誰惹誰，憑什麼欺侮人家？』」

親人相聚，無話不說，看看太陽西斜，我們起身告辭，結束了一整天「走人戶」之行。臨別時，田大伯囑我：「你媽那些年吃了不少苦，你今天回來了，一定要守在她身邊，不要像你弟弟，到今天也不知道那裡去了。」

說到弟弟，當年從電力校畢業被下放農村，開始就在這裡落戶，至今田大伯的兒子還保存著弟弟當年使用過的農具，這麼十幾年了，弟弟下落不明，每提到他，母親都很傷心。

## 第二節：二十四中學

大年初五的上午，醫院開始上班，母親在掛號室裡剛剛打開掛號室小窗口，窗外站著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他們向母親詢問道：「請問孔令平老師在嗎？」母親抬起頭來，詫異地盯著他倆；兩人面孔很熟悉，只是一時記不起是誰來。

心中暗自尋思；兒子到蔡家場才四個月，哪裡相識的年輕朋友？便發問道：「你們是哪個單位的，找孔令平有什麼事嗎？」那女青年回答道：「我們是二十四中的教師，今天奉校領導的委託，專門來找他商量工作的。」

我在王書記安排的「招待房」裡，接待了兩位二十四中的來客。來人主動自我介紹，男的叫李興全，女的叫韓澤紅，兩人都是數學教師，上學期放寒假之前，數學教研組組長周興在安排下一學期的課時分配時，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按教育局的「命令」，二十四中初中部增招了兩個班，卻沒有增派相應的教師。增加的課時，硬分攤到原有老師的頭上，當時老師們的課時負擔已大大超過規定，加上教師們的抵制，學校教務處只好用減少學生周課時的辦法來解決。

結果這事不知是哪位學生家長向區教育局反映了，二十四中的領導被狠狠批評了一頓。所以，從下學期開始，只有將所缺課的課時分攤給任課老師，數學老師每人平均每週增加了四個課時。

小韓老師哭喪著臉訴苦道：「經過這麼一加，我每週就要承擔32課時的工作，也就是說，每天要在講臺上足足站五個課時以上，幾乎天天都要上聯堂課。在課堂上一站就是一上午，我們女同志最怕連站一上午，上學期我就發生過上了一上午課，走下講臺昏倒在教室門口的事。」

「算算看，每天上五小時的課，加上備課、改作業，每天都要保持十二小時的工作量。這哪裡是在教書，簡直在拚拼命！我們年輕人可不想早死，如果下學期真要強行加課，我就只有請長假一條路可走了。」

教研組長周興只好請何校長來解決。這何希廉因作風霸道，聞名蔡家地區，人稱活閻王。後來大概因為文革中被衝擊過，坐了九年「牛棚」，打掉了他的霸氣。四人幫被打倒，他官復了原職，總算領了些教訓，說話做事

收斂些。

當周興把他請進數學教研室時，他滿臉堆笑，帶著他多年難改的奸笑向大家說：「大家的辛苦我是知道的！對我校缺乏數學老師的事，我向區教育局多次反映了，但現在教師正缺，教育局也苦於無人，加課時的事，實在希望大家能諒解。」

說到這裡他眯縫著眼睛，帶著討好的口氣說：「不過，最近教育局告訴我，一個家在蔡家場的落實政策人員，原來是重慶大學的學生，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現在正等落實政策，就在蔡家場，他母親在蔡家醫院，你們都認得。如果你們哪一個能把他說來頂你們的數學課，那麼，我就答應：誰說服他就減少誰周課時五小時，你們看怎麼樣？」

被超課時工作量壓得喘不過氣來老師，誰不想有人來分擔一下過重的負擔？何希廉今天把招人進校，用減少課程的條件交給了任課的老師。

何校長反右時整過不少的老師，被整的老師心有隱痛，現在，凡是出面去請老教師，都會以年事已高相拒絕，迫使他想出用老師去請老師的絕招。

兩個年輕人也清楚，但無奈事已至此，經過全教研室討論，便公推了兩個年輕人到醫院來試探一下。

我聽了他們講的故事，兩個年輕人眼睛裡那請求援助的眼神，馬上聯想起重大一行時，那錢企范的愛人所講的故事，想到被毛澤東摧殘的臭老九可憐狀態，也想到那些同樣被害的驕橫一時，一無所學的年輕孩子們的可悲。我可以置當局的硬派軟騙於不屑一顧，但我卻不能無視這些被害師生的請求。

想到這些天來，母親的勸告，心中一直被攪得很煩。當然教師也是一個神聖的工作，只因為這些年累受摧殘，地位低微，待遇菲薄，才無人問津。

為使我的生活儘快走上正規，結束目前這種心神不定狀態，我還有許多事要做，不能老在謀職上空費時間。

既如此，不妨去二十四中當一段時間老師，在我熟悉情況後，再另作他圖，於是我爽快地答應了兩個年輕人的請求。

小韓老師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教育局都無能為力的事，他倆竟沒有花上十分鐘就輕而易舉的敲定了。感到最沉重的工作壓力一下子便得到了減輕，連連向我表示感謝。我把他倆送出醫院的大門時，他們一再的和我握手道別，李興全還叮囑我，生怕我變卦。

第二天他們又高高興興地給我拜年來了，這一次他們從自己的「書包」裡取出了一包兩斤重的白糖說：「學校領導委託他倆給我拜個晚年，這白糖是學校春節發給全校教職員工每人一份的過年貨。」

說著又從書包裡取出一本高中一年級的數學教科書，和一本數學參考資料以及兩個備課本、一支鋼筆。

周興正等著消息，一聽說我已經答應任課，當即便安排了工作。

由於我初上講臺，還有一個熟悉過程，暫時把高中一年級一二班的數學課交給了我，周課時總共十六節。我申明：「我沒有上過課，怕不能勝任」。

李興全卻說：「你別謙虛了，像你們這樣五十年代的本科生，現在正緊缺著呢！怎麼說你比那些文革期間鬼混出來的師範生，強上百倍。」

我就這樣，在脫離了數學課本二十五年之久，因流放而荒廢了二十三年學業的老學生，未經師資培訓，出獄後一步就跨上了「高級中學」的講臺上。

好在，我在中學求學中數學和物理基礎很扎實，加上在鹽源時，為郭川小的兩個小子補習功課，尤其是我對工作一貫很強的責行心，不會「誤人子弟」，把教書僅當作只拿薪水的手段。

下午范小妹和弟弟來了，提著的菜籃子裡裝著一籃子雞蛋，那是胡媽平時積攢下來的。

當她聽到我要去二十四中教數學時，高興極了，當下就跑回家將書包提來，她已初中三年級了，她說：「數學和物理從沒聽懂過，一上課，課堂裡亂哄哄的，大家各講各的話，老師也不干涉。老師是頂班的，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搞懂，講起來讓大家坐飛機，眼看初中就要畢業，這麼下去，還能學到什麼呢」？

經她這麼一講，我想起每次胡媽的囑託，便答應專門為她從初一的課程開始補習，這樣我也好熟悉整個初中的數學和物理教材。從那天開始，她每天都帶著書包和一顆渴求知識的心，到我所住的病房裡同我一起做作業。

學校開學前兩天，按校方通知，我去二十四中報到，行政辦公室的總務主任辦理了我的入校手續，並在靠學校北端的松林坡教師宿舍裡，給我安排了一個單人房間。

第二天，我便正式搬到了二十四中學的教員宿舍。在邊僻蔡家場，有了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安息窩。

雖說地處邊僻，但校園卻是滿不錯的，足足有五萬平方公尺的校區被濃濃的綠茵覆蓋，周圍被農田所包圍，東面臨著一個高聳的懸岩，山下便是從北碚通往重慶的公路。

一幢四層的教學行政辦公樓位於中央，兩幢三層的教師宿舍樓分別位於南北兩側，掩藏在叢林中，加上學校前方大約八千平方公尺的操場，整個學校相當大，抗戰時期，這兒原是國民黨駐軍建立的一所軍需學校。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就將這裡改成一所國立中學，取名戰國時期燕國的賢士樂毅。其中含寓著陪育求賢的宗旨！

真的，它的優美的環境自畜著一種陶冶學生情操的魅力，那山林的氣息，又含著穩居求讀的氣氛，這真是一處難得的求學聖地。

可惜，這樣聖潔美麗的校園，卻被中共糟蹋了。

在風雨吹打之下，早先軍校的建築黃色的粉壁從泥牆上剝落，房樑被白蟻蛀空，連同泥牆倒塌成一堆堆廢墟，不知什麼時候建的教學樓，像無人管理，窗檻破損、桌椅殘缺。那片寬闊的操場上長滿了一人多深的茅草，好像一片荒蕪的草地無人清理，校舍中的石板通道上長滿了青苔。

走進教學大樓，二樓開始是初中的教室，一大群孩子在整個的教學樓裡狂奔亂吼，不時傳來玻璃被砸碎的響聲，和桌椅倒地發出的沉悶衝擊聲，令人心神不寧。上課的鈴聲響過後，大樓裡傳來的雜響仍沒有間斷，一直要等到十分鐘以後，走廊裡才漸漸的安靜下來。

我在第一天並沒有課時，教研組的周興，建議我去聽一下高一年級三班的劉老師所上的數學課。

高一年級的教室基本上在三樓，那走廊上的秩序比二樓稍好一點，當我走進劉老師正在上課的四班教室時，頓時被亂哄哄的課堂弄得頭腦發脹。

只見那五十開外的劉老師在講臺上，聲嘶力竭的叫喊！不時的還在手裡的教鞭，拍打著黑板，可是無濟於事。

已經是十五、六歲的孩子講的講話，互相打鬧，調笑不停。有的往前面座位上的學生背上，貼上一張畫著烏龜的紙，引起後面學生的譁然大笑！還有兩個女生在合拍唱歌！這哪裡是課堂！簡直就是頑童的遊樂場！

我深深為講臺上上了年歲的劉老師感到難過！想他苦心備了一晚上的課，全給這些不懂事的少年踐踏了。

一堂課下來，劉老師的授課技巧我是一點沒學到，腦子裡卻想著，明天我上高一年級二班的課，第一個動作該是整頓這遊樂場般的課堂秩序。

晚上，當我想到白天所看到的亂哄哄的課堂秩序後，無心備課，便聚在李興全的宿舍裡，同隔壁幾位老師一起聊天，那話題從簡單的身世介紹開始，接觸到學校現狀，大家無不為紛亂的教學秩序而煩惱。

唯獨只有李宏老師，最無所謂。他是接他父親班來教化學的，他的父親曾在文革時被趕出校，最後死在憂鬱之中。他說，他決不會像父親那麼死心眼，上課時，學生不聽，乾脆便停下課來給他們講故事。

「反正學校的任務就是管著這些孩子不出校門，不到外面惹事就好！」他無所謂的說，只有對文革遺風無可奈何的人，才用這種自欺欺人的辦法對付學生，這倒合符統治者的要求，當然，這不是教書育人的態度。

在文革中這所學校並沒有逃掉厄運，原先一位資格最老的數學老師羅某，在一九六八年因忍受不了學生們的打罵，在王家大院裡懸樑自盡……

晚上十點鐘左右，聚在一起的老師們已散去，各回各的宿舍。我獨自走下樓來，心情極不舒暢。

自己冤獄半生幾乎喪命，在監中我自比『奴隸』，『

平反』並未沉清是非，冤屈舊賬遠未了結。而今『命運』還操在他人手上。我對在這種邊遠學校，管束頑劣少年的差事，心中憤憤不平。

想著想著，便獨自向那棵教學大樓門口最大的老槐樹走去。聽學生們說它已有百年歷史，是這裡百年變遷的見證人。

一邊走，腦海裡還在不斷湧現白天所看到鬧哄哄的課堂。聽那百年老樹在寒風中瑟瑟作響，似乎正在述說那漸漸遠去的故事。

想到在獄中那麼苦的環境中，仍以讀書為樂事。那可真是：「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當年，為了保存一本書不被鷹犬搜去毀掉，我曾絞盡腦汁藏書於瓦礫、草垛，拼著命來保護那被當局蹂躪的知識！

卻沒想到，生在如此優美環境下，如今的孩子們竟視知識為糞土，視讀書為蠢事！毛澤東你的罪惡滔天！

### 第三節：在課堂上

今天是我上課的第一天，為了建立良好的上課秩序，一上課堂便與全班同學約法三章：課堂上不許喧譁嘩；不許看小說，做與本課無關的事；所佈置的作業必須完成。

這個班的四十名學生，果然被我特殊的上課風格和嚴肅態度所震懾，沒有出現我在劉老師課堂上所見到的喧譁嘩吵鬧，這使我相信孩子畢竟是可塑的，只要教師作風嚴厲，對事認真，沒有政治流氓的干擾，文革攪亂的學風仍是可扭轉的。

怕只怕執政者的頑劣，視教育如敝履，教育只當成粉飾社會一團糟的遮羞布，以此忽弄世界。用「教育興國」欺騙百姓，用改善教育環境和教師地位的空話來欺騙社會。今天只要看看教學設備的簡陋，教師素質的低下，教師地位的卑下，便知道中國教育事業今天難以康復。

上第二堂課，按照教學大綱上的安排，仍是複習初中的數學：解一元二次方程，按照寒假備課時準備的題目，寫在黑板上準備叫兩名學生上黑板來做，其餘的在黑板下面做，然後就黑板所做的訂正評講，指出常常容易錯解的地方。

於是在點名冊上隨便叫了一個周雲的學生，可連喊了兩遍卻沒有答應，我向教室裡環視了一下，發問道：「周雲同學來了嗎？」全班的人一齊把頭扭向了後面，那裡有人發出了頑皮的笑聲。

遲疑了好一陣，一個坐在最後排座位上，個頭高高的男生，滿不在乎的站了起來，既不答應，也不走上黑板。

這時，坐在第三排座位上的一個臉蛋圓圓的男生，傻裡傻氣的說道：「老師，他是啞巴！」課堂上頓時哄堂大笑！我聽出這笑聲中嘩眾取寵的味道。厲聲的向他喝道：「我沒問你，你多嘴什麼？」

哄笑的課堂嘎然靜下來，那孩子沒料到這位剛來的老師竟當堂給了他一個沒趣，不甘示弱的向那站起來的男生嘻皮笑臉的吼道：「週二娃，你有本事不站起來！」這一挑逗，那周雲果然撲通一聲坐了下來，課堂上又是一陣笑聲。



沒想到這才第二堂課我便遇上了難堪，我看出那坐在第三排的圓臉孩子，一定是這個班的最有影響的調皮生，如若不堅決回擊這種公開挑釁，今後，我就休想在一個較為安靜的課堂上講課。

於是毫不猶豫的喝令他站到講臺前面來，課堂的氣氛頓時又靜下來。

估計按過去的慣例，恐怕沒有老師對這調皮生的挑釁回擊過。那圓臉的孩子也許沒料到，這種在平時根本就不當一回事的「小玩笑」，會遭到如此嚴厲的制止。這種出乎意料的處置，他被怔住，乖乖的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態度雖然仍那樣傲慢，但畢竟不敢對抗，站到黑板跟前後，課堂又恢復了安靜。

課堂裡所有的孩子正在注視老師的態度，窺探老師的水平，這時會因處置不當掀起軒然大波。抓住這個肅穆兩分鐘的氣氛，我開口說道：

「你們想過沒有，是誰讓你們在這裡讀書的麼？你們想過沒有，此時此刻，你們的爹媽正在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在地裡揮汗勞動嗎？他們省下了辛苦掙來的口糧，將賣豬、餵雞的錢，省吃儉用捨不得花，卻積攢起來給你們繳學費讓你們讀書，容易嗎？難道他們把你們送到這裡來，是讓你們在這裡上課做遊戲，頂撞老師，調皮搗蛋嗎？」

我停頓了一下，用眼睛掃過那站在黑板面前學生時，我看見了他臉上多少顯示出無可奈何的沮喪，我的態度在他身上發生了抑制作用。

於是接著說：「如果你們的家長同意你們到學校來鬼混，那我想，何必到學校來自尋約束呢？如果你們已不願讀書，你們完全可以不進課堂，在課堂外不是自由得多麼？何必坐在課堂上自討苦吃？」

課堂一片沈默，看樣子，我的話，至少給仍在蒙裡蒙懂的少年們一個思考！我堅信，如果我能恢復這些孩子們的理智，便能有效的整頓課堂秩序！

「如果你們不是到學校來鬼混的，還真想學到一點文化知識，今後也還有一點對生活的理想和追求，那麼，我還要告誡你們，古人說得好：『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們不可以跟著那些混日子的人鬼混，你們還年輕，正是少壯時期，從現在起就抓緊時間還來得及，如果你們要荒廢自己的學業，到頭來會很後悔，不但辜負了你們的父母，也對不起自己的生命！」

我繼續的說下去，我注意到有人在用心的記著筆記，有的把眼睛盯著我，從他們眼神裡可以看到他們接受了我的話！

下課以後，我把兩個學生喊到辦公室裡，詢問了兩人情況。那圓臉的孩子叫楊福他說他的家裡父母都是農民，周圍的親戚朋友中，除了有一個表哥考進大學外，其餘的沒有一個人是靠讀書混出個明堂的。

反而他的小叔和堂兄是從來沒有讀過書的，但做生意發了財，還有一個叔伯長兄，幫人開汽車挺闊氣，也沒讀過書。所以他得出結論，讀書實在是傻瓜幹的事，與其有時間浪費在讀書上，不如去學做生意。這就是他的「人生經驗。」

當我問他：「那你又為什麼要來上學呢？」他說：「那是爸媽逼他的，像我們這樣的蹺腳學校，一學年下來，沒有一個考得上大學，最後還是回農村」。讀是這個命！不讀也是這個命！所以他便選擇了不讀書。

我實在沒有理由來反駁他，但我聽到了幾乎所有學生都這麼說！二十年後當我在一次偶然中，在北碚街上看到燈塔建築公司所打一則廣告，上面竟寫著：總經理楊福先生，我才好奇的打聽到，這當年的調皮蛋，竟然現在成了擁有千萬資金的建築老闆，並擁有兩處別墅和小轎車，這就是殘酷的生活！看來，在這個社會中，教師簡直是最沒有出息的職業。當我問到周雲時，他很直率地告訴我，除了他同意楊福的觀點外，他現在沒有值得擔憂的。他父親就是附近蠶種場場長，他早已安排了兒子的工作，說好了，中學畢業，就任蠶種場辦公室秘書兼小車司機，所以到學校來讀書，只是為了拿一個高中畢業文憑。

他說：「我會開車，現在最吃香的就是開車的。」他說的完全是實話，當時一個窮教書的，無論在收入和社會地位上，都無法同一個汽車司機相比。我這才明白，他所以在課堂上對我裝啞巴，是因為他根本就看不起講課的我。

在他的人生中根本就沒有「求知」，求理想這種想法，有幸於他父親的權位既給他的前途打了包票，他還有什麼「理想」可以追求呢？這種社會裡產生的特權階層，壓根就把教育當成一種裝飾。

他中學畢業後，我就一直沒有看見過他，但聽到學生們講到他在蠶種場開小車，而且，看見在他的小車上，經常有年輕的女孩子坐在上面與他打笑調情。

後來我在教育某些孩子時，他們會用周雲的例子反駁我說，「什麼讀書，前途光明，再用功也頂不上像周雲那樣有一個好父親。」

這使我無話回答。

嗚呼！中共提倡人為的階級劃分，因黑五類而受踐踏，因紅五類而成新貴，已現端倪矣！今天，出身好而平步青雲的「太子黨」，應運而生！看來，真正懵懂的不是這些孩子而是我了。

嗚呼！教育照這樣發展下去，社會豈不被徒有一張空文憑，實際上是文盲的群體所充塞？何況中共的老德性，吹牛撒謊已是習慣。只苦了「教育」這頭飽受摧殘的老牛，又套上了「四個現代化」的枷鎖，拖著「實用主義」這沉重的破車。

當世界的知識每年按等比級數在猛烈增長時，中國教育肯定也是「突飛猛進」增長。例如大學生每年增長的數量中，定會把相當大比例「文盲」「科盲」泡沫般充數。所以在中共專制主義領導下，振興教育是絕對的空話！

#### 第四節：天下靠自己去爭

聽田大媽和胡德明向我介紹，在我還沒有回來之前，母親在這所醫院受夠了這所醫院品格下流的員工欺侮。這不僅是中共劃分五類實行「階級鬥爭」的結果，也是醜陋中國人最惡劣的品性——欺弱畏強。

我的母親個性並不軟弱，但她是一個多年從事教育，有相當函養的人，怎能同滿口髒話，作風橫蠻的造反天棒相對？加上她多年失去兒子和親人，孤身一個老太婆，又怎經得起無產階級專政野蠻的壓力？所以，從旁人眼裡看，她是太軟弱太可憐了。

我剛回到她的身邊，因為我熟諳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人性多有淪喪，弱肉強食這種動物低劣的品性尤為顯著。所以我常常滿身芒刺保護母親，醫院的下三濫們都畏我三分，母親在我的保護下才相安無事。

就是那些對母親一貫欺侮的人也一改老態度，表面上至少是客客氣氣的。

去二十四上課之初，既要複習數學知識，寫教材，加上忙於整頓教學秩序，所以一連就有兩周沒有回家。好在，我的努力立刻收到了好評。學生們的家長已有口風，傳言二十四中來了一個大學教授，教書頗為內行，課堂上清風雅靜，既有此評，算是對我的鼓勵。

天氣日漸暖和，帶在身邊的衣物已到了換季的時候，所以，我選擇了一個沒有課的上午，八點鐘為拿幾件夾衣回了一趟醫院。

我剛跨進醫院的大門，便被醫院後院裡傳出一陣女人的喝斥聲驚住，那聲音尖聲吼道：「方堅志，我身上沒有錢，今天伙食團的菜你自己去買！」

那命令的口氣令我震驚，這女人名叫何玉，醫院伙食團的炊事員，今年才二十歲，頂老漢班來的。大致因為從小受文革風氣的習染，不但好吃懶做，工作極不負責，唯獨長著一張尖刻的臭嘴，擅長潑婦罵街。

我來醫院這半年多，便經常聽見她同院內的病人爭吵。所以無論是醫院的職工還是病人對她頗有微詞，給贈了一個「小刁婦」的雅號！

今天聽她剛才的這麼一喊，使我首先感到刺耳的是，她用輕蔑的口氣直呼其名，吆喝年齡比她大三倍的老人！何況買菜是醫院伙食團定在炊事員份內的事，怎麼現在命令起掛號室裡忙得不可開交的母親去做？

倘若這事發生在幾年前，母親尚被全院職工監督勞動的時候，這種年輕人對母親呼奴使婢的口氣倒也聽慣了！而今，六十三歲的母親雖入過中共的另冊，但也是中共為她平了反，怎麼還被呼喝？

於是我停住剛剛上樓的腳步，此時那何玉並沒有看到我，還在一個勁的狂喊：「方堅志，我先給你說好，今天中午沒有菜吃是你不去買造成的，如果大家要罵就罵你！」

這一天正逢趕集，來醫院看病的人特別多，我看看掛號室裡正忙得不可開交的母親，根本無暇顧及她，這小刁婦明明是喊給醫院職工聽的，奇怪的是竟沒有一個職工勸阻這蠻不講理的女人。

今天我只好親自殺殺這刁蠻女人的歪風了，否則母親在這所醫院休想安渡晚年。主意打定，便向後院走去。正在歇斯底里吼叫的她，沒料到這時我會突然出現，見我滿面怒容向她走來，預感到不妙，嘎然停止了叫嚷。

「買菜明明是你的事，你有什麼資格去叫一個老太太代你去做？」我劈頭責問她，語氣充滿了怒氣！她一時答不上話，頓時感到難堪極點，趕緊折回身，縮回廚房去了。

但她馬上覺得當著這麼多圍觀的人，就這麼縮頭，一聲不吭也太輸面子，何況她所呼喝的是大家呼喝慣了的右派老太婆。別人能呼喝，為什麼她就不能？於是便使出家庭婦女罵街的本事，吼道：「嚇！你管得著嗎？醫院的事關你屁相干，你管得著嗎？」

我立即竄上臺階進了廚房，向她喝道：「你搞清楚點，今天不是你橫行霸道的時候了，你這種不明道理，不懂禮貌，沒有家庭教養的人，就得好好地管教你！」說著抓住她的手怒喝道：「你今天非得當著大家說清楚，這買菜究竟是誰的事？」她見我氣勢洶洶，生怕挨打，終於不敢吭聲了。

正在這時，王明從院裡鑽了出來，走進廚房便問道：「你們吵什麼？在他眼裡，我和母親向來只能埋頭幹活，規規矩矩做奴隸，平時連說話都不敢大聲，今天哪來這種「囂張」氣焰？」

便向我正色道：「你是知識份子，是知書達理的人，有話好好說嘛！怎麼同我院的炊事員在廚房大吵大鬧，當著這麼多人，氣勢洶洶像打人的樣子，未免有失你的身分。」

他的話為本已理虧，無言以對的何玉壯了膽。立刻大聲的說：「書記，你看他好凶，憑啥要他來管我們醫院的事？又憑啥來教訓我。」

圍觀的人喧嘩起來，七嘴八舌各有評議，二樓窗口上也探出許多身子來。看來，醫院職工這種蠻不講理，對母親任意喝斥欺侮，根子還在這書記身上。對付這些兇惡的下層官吏，還不能憑吵罵，當著這麼多圍觀者只能講理！

於是我把臉轉向他問道：「你是醫院的頭，請問，我的母親究竟現在幹什麼工作？」這王書記將問就答的說：「這個，我們已根據政策，為她平了反，恢復了幹部職務，現在是醫院的出納兼掛號。組織上把經濟大權都交給了她，足見對她的信任，她本人表示組織上對她的安排很滿意，不信，你問問她。」

我又追問道：「那麼請問伙食團買菜的工作該由誰做？」這意外的追問使他沒有轉過彎來，脫口回答道：「那當然是炊事員的事！」，

「既是你安排給炊事員的事，你的炊事員無理的把份內工作，像呼奴使婢一樣叫一個年齡長她三倍的老人去做，這像不像話？」

圍觀者驟然間哄鬧起來，喊道：「不像話，那小刁婦一貫不像話！」我指著掛號室高聲喊道：「大家請看看，今天趕場，那麼多的人看病，這何玉卻要喊別人做本該由她自己做的事這叫什麼？」

大家的視線集中到門口的掛號處，那兒還排著一排長長的佇列，圍觀者又是一陣哄鬧！一陣對何玉的苛責！

那王支書見到這種形勢，已極不利醫院方，連忙向何玉喊道：「小何！你為什麼叫方老師去買菜？」何玉見眾怒難犯，畏怯的說道：「沒有把錢交給我，我拿什麼買？」

「你沒看見她忙著嗎？你為什麼不去向她取錢？還在這兒喊什麼？」那女人像洩了氣的皮球，從地上揀起剛被她扔到院子裡的背兜，上掛號室取款買菜去了。

王明打發那女人走後，看看院子裡圍觀的附人漸漸散去，便向我不冷不熱的說道：「你看，醫院的職工都是很聽話的，有什麼事，不要動不動和他們吵，你也是當老師的，更要注意影響。」

我看著他那張圓滑的臉冷笑道：「醫院這種隨便欺侮老人的作風，本是你們醫院的傳統。今天要不是碰上我，那何玉非逼著我的母親去買菜！」

中午下班後，母親回到寢室搖頭嘆息道：「歷來就是如此，在你回來之前，炊事員到我的辦公室來，動不動就把菜背兜往我面前一攔。那時，我只有忍氣吞聲駝著背兜去買菜，有時耽擱了時間還要挨罵！」

### 第五節：對母親的歧視

母親受到的多年歧視和壓迫，至今還在繼續蹂躪她的心，她怎麼能安心在這個醫院呆下去？幾次三番請求調出這個醫院，其實只想圖一個清靜的晚年，夠可憐了！但是她仍像一個叫化子那樣，被政策落實單位一次又一次的當成皮球踢來踢去。

我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後，母親便積極籌畫能在蔡家醫院分得「家」所必需的房子。鄒銀雙的婚事告吹以後，我的安家便成了她最關心的事。

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雖被冤獄奪走了青春和戀愛的黃金歲月，剩下的就只是娶妻生子的大事，「房子」便成了母親需要迫切解決的頭等大事。

眼下醫院正在原來兩層樓的基礎上加高一層，以解決職工的住房要求，兩年前，這個擴建工程開始實施時，也是母親改正右派落實政策之始，黨支部書記，曾指著加高樓層的圖紙向母親保證說：

「我們醫院像你這樣身兼數職，又要掛號，又要作出納，又要負責全院工作的報表，真是難得，我們缺不了你，現在按工齡排，你的工齡也是沒人能同你相比的，這一次分房無論從道義上，還是政策上，你當之無愧的排在分房的第一名！」

眼看著一天天修好的房子，耳聽書記的甜言，她盤算今後的新家規劃，心想能在身前了卻這樁樁人生大事。然而，她低估了，對她多年的歧視依然存在。

中共統治三十年來，老百姓普遍沒有休養生息的高。近年來靠恢復農民單幹，老百姓肚子在逐漸填飽後，安家的「窩」便空前緊張起來。

農民住在簡陋的茅草屋裡，還有一個可供遮風避雨的立足之地，城市居民住房的匱乏堪稱為世界之最，據當年重慶市統計，城市居民每人住房面積平均不到1平方公尺。

一個三口之家有一間10平方公尺的小屋已相當不錯。幾世同堂共擠一間或幾家擠住在集體宿舍，中間用布遮擋一下的情況相當普遍。在毛澤東淫政下，城市裡的「吉普賽」人，長期在政治運動中耗盡自己的精力，沒有國家的投資和計畫誰都不敢在「國有土地」上擅自修建自己的「窩」。

毛澤東駕崩，中共新的統治者，提出撥亂反正口號，庶民們為了爭這些破房爛屋，發生打架鬥毆、殺人縱火事件層出不窮！。

儘管國務院頒發了一個國企職工分配住房的條例，規定單位分房按職工工齡進行打分，再按分數高低排隊分房。

但這個條例一到各級基層黨組織手裡，便徹底變樣！掌握住房分配大權的基層黨棍們，運用自己手中的分房大權，或公開串通，或暗地交易，他們現在又成了搶住房爭待遇的強手。

一幢住房從剛剛開始平地基開始，一場圍繞分房排隊的爭奪戰就明裡暗裡展開了。這種爭奪戰是世界上罕見的中國特產，準確說這是共產主義牛皮吹破後，赤貧者如夢初醒的爭搶。

這種蠻不講理，手長心黑之風一直延續到今天，在利益分配上，此風要一直延續到專制政體徹底解體的那一天。

新房建成後，便成立由支部書記「掛帥」的分房小組，按照本單位中勢力大小和利害關係制定分房辦法。

按小組成員意見塞進「貴獻大小、在本單位工作的時間、業務水平、職務高低」的條款。以體現小組成員利益的打分辦法。任何單位所執行的分房條例，與國務院規定按工齡打分的辦法根本是兩回事！

共產黨一貫有「保密」的規定，凡是黨的政策、會議決議，老百姓是不能過問的。這一條被分房領導小組利用得很好，他們把本該由職工討論決定的分房條例，和打分辦法當成了黨的「絕密決定」。

膽小的醫院職工，事前沒有人探問分房條例，就由醫院的領導和掌紅吃黑的職工在「暗箱」中，任意塞進有利於自己的私貨。

按照當時流行的規矩，蔡家醫院為分配新的房子，也成立了王明為組長的分房領導小組，然而，分房條例卻遲遲沒有公佈，蔡家醫院首次住房分配，充滿了詭秘，四十幾名職工預先都不知道分房辦法是怎樣制定的。

分房時，到了公佈結果的時候，即使是錯誤的也成了既成事實，這樣的單位，奉行欺善怕惡這個處世法則，成了無可救藥的現象。

然而，老實巴交的母親，吃了二十多年的虧，還在輕信王明給她灌的「迷魂湯」，認為許給她優先照顧的保證，無論從哪一個角度都不容懷疑，雖然她一輩子都在受共產黨的騙。在建房中有人悄悄告訴母親，王明是騙你的，但她還是將信將疑地相信了王書記的許諾！

她搬著指頭算，四十多名參加分房的職工中，工齡在二十年以上的僅只有五個人，這五個人中她排在第一，新的一層樓一共建了二十間房間，第一梯隊的五個人每人占兩間房還剩一半……

蒙冤二十三年，她一直住在廁所旁邊，一個有起碼人性的人，不會做出再剝奪她正當分房權的事！

然而在分配落實住房的前一天，分配的辦法仍然沒有公佈。提前幾天，她已在原來住的三人房間裡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些裝衣服的紙箱子和破爛捆好，一心一意等著搬進那盼了不知多少年的，一個像模像樣的「家」。

因為我從未見識過分房子的事，不知道這分房中，有那麼多的詭計，也從來沒有見過分房條例和分房方式，不會想到掌權者在那裡面塞進那麼多暗算。

加上我剛剛才接手高中的數學教學任務，連日正在加班加點的熟悉教材，對於母親分房的事情並未充分關注。

直到星期天我回家去，母親告訴我，下周星期三醫院就要分配新的住房了，等要我回來搬東西時，我才問母親：「搬進哪一套房子？」她搖搖頭說：「還沒有公佈呢。」

星期三上午我請了假，當我跨進醫院大門時，便聽見樓上人聲嘈雜，一股股的灰塵從樓梯口上直灌下來。我捂著嘴連忙奔上二樓，只見那醫院職工的家屬們正忙著往三樓搬東西。忙跨進母親原先住的那間「病房」時，只看見屋子已是空的，滿地的廢紙破布、空瓶，人卻不見了。

母親的紙箱和木床已經搬走了。不是說要等我回來搬的嗎？我正感到詫異，急忙又抽身向三樓跑去，炊事員秦國秀的兩個兒子正在把一口大木箱抬上樓去。過道上到處都塞滿了紙箱、罐罐罐。

好不容易擠上去，在一個屋裡找到了母親。只見她正坐在那堆搬上來的橫七豎八紙箱面前發呆。我環顧了那屋子，只有東北方向那垛牆上留一個窗子，偏偏那窗子的外面便是過道，平時因為要過人所以根本沒有打開。

所以，只要進了屋便成了四面不通空氣，不見陽光的「口袋屋」。

我忙坐到母親的身邊向她詢問這是怎麼一回事？母親木然的看著我，講述了剛剛發生的「分房過程」。

原來，直到昨天下午，分房領導小組的人，才把每個職工這次分配住房的決定，張貼在樓下的佈告欄裡，母親這才知道，這王書記花言巧語向她許諾讓她滿意安渡晚年的，也是她盼了一輩子的「家」，竟是一間四面不通風的口袋屋。

這位道貌岸然的王書記已消逝得無影無蹤了，反倒是分房小組的人向母親發出最後通牒，必須在明天之內將所占的病房騰出來。

這天晚上，她整整一夜沒有合眼，想到自己的命苦，想著共產黨給她帶來那麼多災難，整得她家破人亡，她被迫害，被欺騙，為共產黨作了半輩子奴隸，受了大半輩子的欺侮，至今還在受人欺侮不覺潸然泣下。

第二天她還想等兒子回來後，再與醫院交涉，所以遲遲未搬動。誰知，早上剛剛上班，護理室的四名護士和傳達室的小張，五個人奉命一齊擁入母親住的那間病房，不顧母親的反對和制止，便將她打了的背包、紙箱全部搬進三樓「分配」給她的那間屋子裡。

恰是：「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公然抱茅入竹去……」

她就這樣被連哄帶逼地搬進了分配給她的新居，……直到十七年後，她逝世時都再沒有給她一間遮風避雨的房子，使她臨終抱恨而去！

我聽到她這麼一說，便走了出去，對整個樓層巡視了一遍，整個樓層的十套二十間住房都已被佔據。位於西南面的兩套兩面凌空的房子，已被工齡未滿八年的院長李德富、會計許曉龍佔據。另一套則已堆滿了家什，是給即將赴任的付院長留的。

所有通風好，光線也好的房子，全被醫院裡大小「幹部」們搶佔一光。

直到此時，醫院領導們為策劃新房而挖空心思，暗中私自交易並隱瞞一年的私分方案，終於才公開！以王明、李德富為首的分房小組，完全沒有按工齡分房的原則，而是利用職權將本該由大家公開評分房子私自瓜分了。

對老百姓公開掠奪和霸道、欺騙仍是中共執政的慣技。我們忍受了二十多年，看慣它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幌子下，幹的對善良百姓的公開搶掠。眼前發生的只是一個小小鄉村醫院，在住房分配時所表現的強盜行為。

當然，這種既要搶人又不准被搶者出聲的作法，早就被我領教，並預先告誡母親，然而我卻沒想到人心會那麼壞！！

此刻我已按捺不住這種被騙，被辱的憤怒，衝上樓去，找王明討公道。行政辦公室裡，王明不在，只有李德富心神不定的坐在那裡。不時把頭抬起來，從窗子裡窺視著樓上的動靜顯得心虛，見我滿面怒容的衝了進來，心中早已明白，便從坐椅上站了起來。

「你們醫院這一次分房子是根據什麼辦法？」我一進屋並沒有向他打招呼，覺得沒向他大吵大鬧已是很客氣的了。

面對我的責問他自感心虛，他參加工作才七年，在醫院第一次分配住房時就搶在母親的前頭，畢竟有點說不過去，不敢像王明那樣說什麼「這是我們醫院內部的事，你們家屬無權過問」的蠻不講理的話。

「你是講你母親分的住房吧！」他沈住氣，有準備的回答道；「她的工齡是全院最高的這不假，我們已對她進行了特殊的照顧。分給她的房子，不當西曬，不受風寒，還是整個樓層裡面積最大的一間。」

睜眼說瞎話是黨棍們的擅長，決不會因此臉紅。

我立即向他喊道：「既然這麼好的住房，我娘就同你掉換吧！你們把一間四面不通風的口袋屋，光線和空氣最差的房間逼她搬進去住，你們還有人性和良心嗎？再說，我也回來了，你們憑什麼把她放在單身職工的檔次。你們不怕她上統戰部去告你們嗎？」

我憋足了一肚子氣提出：「所有的人統統從所占的住房搬出來，直到弄明白了以後再來重新分配。這是最起碼的辦法。否則，我們不會答應的。」

李德富自覺理虧，心裡很虛，怕我指責身為一院之長，竟公開搶奪老職工住房，當著全院職工不好交代！正陷於尷尬語塞時，王書記突然從門外走了進來。

李德富看到來了解圍人，便退到自己辦公室去了。

王明聽到我的責問，板著面孔回答道：「你憑什麼推翻分房小組集體確定的分房方案，你又憑什麼說我們按單身職工的標準對待你母親？本院的職工像游再郁，蕭肖信芳都是有家的，她們都只分了一間，你也不想想全院這麼多人，人人都要分房，這點房子怎麼夠分配？現在已經優先解決了你母親的房子，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看來他早有準備，想繼續維護他一手遮天的地位。職工的權利和公道在他的眼裡，一直就有桿他自認為必須維護的「秤」，這次分配住房就是用這桿秤稱出來的。分房必須抹良心，這就是他悟出來的「黨性」。

他剛才列舉的肖信芳是一個才廿多歲，才參加工作的護士，按工齡分配怎麼也輪不上她，就因為她是中共黨員，丈夫又在本地的供銷社供職，仗著這小小的背景，她能堂而皇之與六十歲的母親爭房。

王明給她安排的房子，就在母親的隔壁，並與母親共用僅三平方公尺的「廚房」。這蔡家醫院當時僅只有五名共產黨員，除王明本人而外，其餘四人全都分了房子，這些人全是工齡不滿十年的「年輕人」，按正常的工齡排隊，他們沒有一個人夠資格在這住房緊缺條件下，與工作一輩子的母親爭奪。

我問道：「我想向你們請教兩個問題：第一，你們憑什麼不按國務院按工齡長短排隊分房的規定，兌現這次住房分配？第二，你們為什麼沒有一個分房條例，供每一個分房的人評分，並預先張榜公佈？」我提高嗓門，因為我注意到門外被我們的爭吵聲吸引，圍攏的是全體住院病人和全院的護士。

在這種場合下不爭是非曲直，不僅在這一次分房母親受欺侮，今後她恐怕仍會處在抬不起頭的地位。

上一次因為伙食團買菜，我已經同這個一手遮天的人物較亮了一次，我不會放過這一次，我知道母親的處境是要靠「爭」才能改變的。

王明也注意到，在這麼多圍觀者的場合，敗在一個剛剛刑滿的勞改釋放犯手上，他的威信怎麼說都要掃地了。所以他的聲音帶著明顯的「以勢壓人」，故意挑撥說：「分配住房不僅要憑工齡，還要根據家庭人口的數目，你母親就一人要占兩間住房，全院的職工也不服。」

這真是睜眼強辭奪理，母親的老伴鍾治淵在德陽，退休後要回蔡家場安居的。這是他故意抹掉的事實。而我就站在他面前，難道也要被他抹去麼？何況我已四十二了，馬上就要安家，都要靠母親分配的房子才成。

何況，當初把我安置在二十四中的教育局，口口聲聲要照顧我們母子團聚，沒有住房，「團聚」的許諾豈非空話！？

當我一連串的揭穿「落實政策」的假面具後，王光明居然說：「你的住房應由二十四中解決」，理由是我是那所學校的員工。

看樣子，像母親這樣老實忠厚的人，豈有不被他的花言巧語所矇騙？至於教育局對我的騙人鬼話，我壓根就沒有把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

我知道，要爭取較為寬鬆的條件，除了靠自己鬥爭，不會從天上掉下餡餅來。而王明眼看我當著這麼多人面，被一個過去踩在腳下的右派指責，怎不惱羞成怒？於是使出黨棍蠻不講理的本領，把桌子一拍，喝道：

『你是幹什麼吃的，你要明確自己的身分，你沒有資格干預本院的內部事務，有話也輪不到你在這裡責問我們』。他聲嘶力竭又著腰，狂怒已使他不顧一切！我看到這是一個同派出所汪禿子一個模子裡倒出來的，這種人表面兇狠可怕，心卻是虛的。

在政治上未佔優勢時，除欺哄、赫詐別無他法。尤其對死纏他們針鋒相對的人更沒了招數，不甘示弱的我也拍著桌子，回敬道：「你瞞著大家私自分房，一手遮天違背政策的規定，我可以去區委告你。」

這一逼，他氣得臉色鐵青，渾身發抖接連拍著桌子吼道：「出去，滾出去！」

幾名年輕的醫護人員在李德富的帶領下，一邊勸著，一邊推著我，將我攔出了辦公室的門外。門「乓」的一聲關上了，這時門外過道上圍觀的人們，七嘴八舌的議論開了。有的圍著我，紛紛訴說蔡家醫院過去欺侮母親的事。

我走到後院的天井裡當著上百名圍觀者，朝著辦公室的那扇窗子扯開了嗓門，痛痛快地聲聲斥責著。這不是罵，蔡家方圓十裡地，誰人不知道這蔡家醫院對我的母親和出身有些不良的人，多年來的歧視和虐待？現在是當著蔡家街的居民，替我母親控訴她十幾年受到的欺凌和冤曲的機會。

此時，我聽見了辦公室傳出來大聲吼叫電話的喊聲，那王明拿起話筒正聲嘶力竭的吼道：「喂、喂，是蔡家派出所嗎，請你們馬上派人來一下蔡家醫院，這裡有人正在鬧事」。

那喊聲分明是喊給我聽的，眼看著「階級鬥爭」喊不應了，鬥爭會也不開了，往日欺壓五類份子那套辦法沒用了，今天要想繼續維持自己的霸道，只好求助於員警了。越是想到他還在用昔日對付我們的一貫手段——網綁，打罵來封我的口，我越是更加起勁地吼開了。

此時樓上搬家的人，紛紛探出頭向下張望，也不知道王明打的是假電話故意嚇唬我們，還是那姓汪的自從在戶口簿上討了個沒趣，對王明報來醫院剛剛發生的事，袖手旁觀了。

我站在天井裡整整數落了幾個小時，仍未見一個民兵，或員警之類的人走進醫院「維持秩序」。直到我的母親走下樓來，勸我回屋去時，我才慢慢離開那裡，院子裡圍觀的人才漸漸散去。

我被母親勸進她的「新屋」，但氣還沒有消，當即我就主張把母親的東西搬回她原來住的那間病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事情鬧大一點，最好鬧到市衛生局，甚至市委去，把母親為落實政策，要求回到北碚的正當要求通通捅出來，看看這區委和區衛生局該如何處理？看看這蔡家醫院仗勢欺人的作風該助長呢，還是該遏制？

但是，善良膽小的母親卻依然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她說「忍著吧，不就是為了一間房子嗎，退後一步自然寬，能住下就算了，我們總會看到這些人遭報應的時候。」

在母親看來，這天下是共產黨的，那裡都是共產黨說了算。母親這種忍讓使醫院的人，在她生前繼續欺侮她，以後幾次加工資升級都儘量的卡她。晚年移居北碚，直到她逝世，她連一個養老終生的窩都沒有！！

中國人的「忍」可謂一種傳統美德，勸告的人編了忍字的歌訣，寫成警語字幅，張貼在家家戶戶門口的牆上，我向來認為這同勸人向善的「百過格」，用委曲來求眼前的平安，則終究得不到平安。

「忍」固然在某些場合，是反對專制主義在策略上的一種需要，但無原則的忍，就變成向統治者的妥協。

相安無燥，有時恰恰是中國專制主義施行霸道政治的需要，立足在這個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老大中華民族，受發達國家民主思潮的衝擊已快兩百年歷史，然而專制主義政體還在中國大陸上巋然不動，其原因之一就是專制主義扎紮根於被壓迫民眾所積沃「忍」的土裡太深。

毛澤東統治二十八年間，中國人民屈從冤獄和慘無人道的奴役；在刺刀下把嘴封起來；在獨裁者製造的遍地餓殍中，寧可忍受啃樹皮草根，茹毛飲血的生活，不敢奮起反抗，還以固守自己祖宗所留傳下『忍』的遺訓為美德。

想我二十三年像畜牲一樣忍受皮鞭抽打，除怒對中共的奴役，在語言上表達憤怒外，也只能適可而止，今天我除了還是忍氣吞聲與母親擠著，『團聚』在口袋屋裡外，還能搬石頭打天麼？

我不幸的眼看中華民族在未來的日子裡，還將忍受特權階層剝削，眼看他們貪污，荒淫無恥，窮兇極惡騎在勞動者的頭上作威作福。忍受著道德淪喪所造成社會各種醜惡現象。眼看賄賂猖狂，盜賊叢生、賭、毒、嫖的毒害而無所作為；

中國的專制狂和中國人的忍讓，相輔相成危害著這個古老民族。

忍者誠然少了不少眼前的麻煩，卻因此犧牲了公理，犧牲了老百姓保護自己的人權護身符。

忍者助長了掌權者的猖狂，不忍者會因奮起反抗而遭到獨裁者的屠殺，所以才會有：「小不忍則亂大謀」的智者警句，和「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的傳世名言。

現在我悟出了橫掃四舊的毛澤東，把忠孝仁義批得體無完膚，卻對這「忍」的名句格言卻沒觸及的原因。



從那以後，每天早上，各家把爐子一起提到那僅一公尺寬的走廊裡逞威，頓時濃煙夾著令人窒息的煤氣，便會從各家的門縫裡竄進屋去。因為沒有出氣的窗口而留在屋裡瀰漫盤旋，常常噙得母親咳嗽不止。

而我也只好跟著被迫在這間屋子裡結婚生子。

倒是與我們隔壁的肖芳，充份利用了母親的忍，擴大著自己的地盤。

兩家人共用的廚房，基本上被她的鍋、盆、碗佔據，她的丈夫用供銷社的車，成天來往於蔡家鎮所轄的基層政府之間。物資局倉庫，農機站及至武裝部，派出所都有他的熟人和朋友，那間屋子裡幾乎天天賓朋滿坐，熱鬧非凡。

晚上九點一過，樓下面響起汽車喇叭聲後，不一會，便有一群人跟在男主人的身後，上樓後便擠進那屋子裡，少不了兩件事：搓麻將，喝酒。那三平方公尺的廚房頓時煙火滾滾，在油煙夾煤氣之中，一盤盤的炒菜端進那小屋去，頓時猜拳行令之聲響震整個醫院大樓。

吃飽喝足後，便在香煙繚繞之中，鋪開了麻將桌，希裡劃拉的總要鬧上一整夜。住在隔壁的母親被鬧得無法睡覺，被迫只好天天吃安眠藥。

第二天起身打開房門，本想買一點豆漿之類的早點，可那走廊裡，卻滿地堆了空酒瓶和沒洗的油鍋，菜盤以及魚、鴨、雞的骨頭。

至於廚房更是堆得連腳都插不下去，根本就別想進廚房。小心翼翼的把這些杯盤端開一個剛剛插得下腳的小空間，走進去，將自己的小煤油爐好不容易從廚房的角落裡清出來，躲進自己那口袋屋裡，放在那個沒有丟掉的小方桌上，點燃了火，重新過著在二樓病房裡自炊自食的獨居生活。

那廚房已被她完全霸佔，母親組建一個小家的美夢，終於破滅了。

由於長期的監獄生活，我的身體很虛弱，稍不經意咳嗽感冒是經常的事。為了改變這種狀態，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後，我摸索出規律的生活習慣，因為那裡樹木茂盛，空氣特別好，每天清早六點鐘按時起床，接著便圍著操場，堅持兩千米的長跑。

晚上保持著一個獨自靜靜思考和回憶的習慣。準備著寫出我一生的經歷，用事實抨擊黑暗統治。我和母親在落實政策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和歧視，在客觀上起著鞭策我的作用。

中共改革開放時期，在經濟上實施改良，而政治制度仍然奉行毛澤東那套，人民要求把暴君焚屍揚灰遭到拒絕。對中共欺壓我們的種種霸道，只好奉行『忍』。

恰好，二十四中這種遠離鬧市的偏僻環境，給我提供了回憶和思考往事的條件，同時也提供了忍的空間，我開始實現早已定下的計畫，寫了許多回憶片斷，為我今後長篇記實的撰寫，作了準備。！

## 第六節：我的初戀和婚姻

我在二十四中工作安定後，婚姻便成了我個人首先要完成的大事，然而，結婚首先要戀愛。在封建時代，那時中國人在男女授受不親和舊禮教的束縛下，婚姻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來決定。看孔雀東南飛，梁山伯泊與祝英台這些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戲中悲劇人物往往觸動我。

不過，導演我的悲劇，正是當年抨擊封建制度的中國共產黨。

大學裡那段因反右鬥爭釀成的冤魂戀，成了我剛剛踏上人生的一場噩夢，我知道當年演出這種悲劇的人遠不止我一人，好多人自殺，好多人殉情，又好多人被逼著走上不歸路。

但是我沒有死，生命從冤獄中延續下來，婚姻和愛情也延續了下去，直到今天。由於我特殊的遭遇和不甘屈從命運的擺佈，使我的婚戀故事，充滿了傳奇和悲哀——

一九七九年，42歲的我回到蔡家場，冤獄好像決定我此生只能接一個老婆回家過日子。

同鄒銀雙那場「見面散」的戲演完後，結婚對我只留下延續後代的使命，可是我生性倔強，硬要把快死去的愛情拽回來，老天又把一段孽緣賜給了我……

中共統治三十年來，一面空喊消滅城鄉差別的口號，一面為鞏固它的統治，實施了嚴密的戶口管理制度，人為將國民劃為城市和農村兩類，農民在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上都比城市的貧民更苦，城裡的一個職工再窮，好歹每月也有二十多塊錢的工資，就是沒有工作，吃糧按居民供應也有「保障」。

農民起早摸黑，還得自己掙口糧，常年勞累不得溫飽，形成中國社會的最窮困的階層。農村這種低下地位，成了中共統治者，關押不服從其統治的「五類」份子「大監獄」，每次政治運動，都要把相當一批人下放農村，作運動的

懲罰，獨裁統治有意製造並擴大了城鄉差距。

惡毒的是，為了防止飢寒交迫的農民向城市逃荒，中共的政權機關加強了戶口管理，一旦發現流入城市的逃荒者，便被收容和勞教，其生活條件的惡劣甚至比勞改更差。

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這種人為差別，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公開等級，農村人要落戶城市，除了嚴格的審批還要交高額的戶口費。

農村女孩子為了擺脫又累又苦的農村，老夫少妻的家庭悲劇層出不窮。這樣的家庭沒有愛情基礎，說穿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買賣婚姻，是中共製造的社會不公平產物。

1980年我和母親的工資加起來總共每月150元，在低收入的蔡家平民和貧困的農村中，我和母親算是蔡家地區的「富人」。

加上當年國營單位的職工老來退休後，直系的后代有頂替父母崗位的規定，我的母親眼看就要退休，誰能成為她的兒媳，便有可能獲得進這家醫院工作的機會。所以我的條件，對蔡家場的貧民和農村女姓，是有誘惑力的。

當時向我母親提親的人並不少，只是她們中屬於街道居民的，都是傷偶或離異的二婚嫂，而且都帶有孩子，在計劃生育年代，要和她們再生一個孩子是不可能的。

沒有結過婚的女孩子，要未在外地已經有了男友，要未是十八歲以下還沒有到結婚年齡的少女，到了法定結婚年齡難說不會變卦，更主要的是，這種單純從經濟利益考慮的婚姻，無異於買賣婚姻而暗藏悲劇。

在我的心目中，未來的伴侶要有相當的文化水平，同時應當不妨礙我的寫作，所以對伴侶的選擇有了要求，可是冤獄註定我今後建立的家，會出現許多不幸。

### （一）\*\*「片斷」的第二個讀者\*\*

我寫完第一本「片斷」時，第一個讀者就是我的母親，她在讀完後，老淚縱橫，並在篇末的扉頁上，留下這樣的話：「看了我的孩子這本用血和淚寫成的片斷，情真意切發人深省，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一頁一頁再現其間，我的心也隨之振動」。

這期間范小妹已經初中畢業升入高中，仍留讀二十四中，因為她已經長大，不便再寄居母親那裡，她的家距二十四中太遠，只能寄宿學校，晚上上自習時，她常到我的宿舍裡補習功課，久而久之她對我晚上的寫作引起了關注。

有一次，她很天真的問我：「哥，你晚上常常深夜還在寫東西，看你寫東西的樣子，好像什麼都忘了，心裡也很傷心的樣子，有時邊寫邊流淚，你在寫什麼呀？能給我看一下嗎？」

小妹在我母親身邊生活多年，對母親的不幸很同情，加上她出身農家，對農民的處境，有切身之痛，不公平的社會現實，使她萌生了對現實的反感。雖然她根本不懂政治，在信仰的領域尤如一張白紙。

我想我寫的片斷，會有助於年僅十六歲帶著探索來認識社會的她，所以我答應了她的要求。

我只告訴她，我寫的「片斷」是中共絕對忌諱的，所以我暫時還沒有拿給任何外人看，請她看後不要向任何人張揚。

她便在我的辦公桌上翻開了這些「片斷」，她是繼我母親的第二名讀者。讀著讀著很快她由好奇變得嚴肅，漸漸雙眉緊鎖，看得出她的內心已進入我所描述的境界。兩小時過去了，我已將第二天的課備好，她仍在專心讀著並不願釋手。

我輕輕拍著她的肩說道：「夜深了，明天再看吧。」她才如像從夢境裡初醒，閉上了眼睛好像在回味片斷裡的情節。

好一會，她才抬起頭來，眼裡綻出一陣很奇特的光，是一種極為柔和的光，我曾接觸過這樣的眼光，低下頭，輕輕地說道：「你寫得真好，像詩，像歌！我差一點都要哭了！」說時，她又抬起頭來，這一次那眼裡分明噙著晶瑩的淚。

我情不自禁伸出雙手，輕輕地樓著她那割著小辮的頭，一面掏出手絹，為她擦去已經奪眶而出的淚，我的心中立刻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暖流在竄動，她把頭靠在我的手臂上，靜靜的聽得到我的心跳……

那以後，她見到我總有一種異樣的眼光，偶爾兩人的眼睛在課堂上碰到一起，她總會低下頭去。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她的弟弟在中午時到我的宿舍裡告訴我說，「姐姐病了，請你向他們的班主任請一個假」。

那天下午正逢我沒有課，吃過午飯，便專程去了她家。

從二十四中到她家，足足要走半個多小時，穿過正街和通向廣場的一段機耕道，途中全是田間阡陌小路。今年春節期間，第一次同母親一起到過她家，這一次我是第一次單獨去她家。時值九月中旬，正是收割中稻的季節。

繞過她家門口那池塘，見圍牆上的小門半掩著，走近小門，我在那門上扣了兩下，裡面並沒有人應，於是便輕輕推開門，走過豬圈向那灶房屋走去，灶房裡堆滿了曬乾的玉米桿，我向通向裡院的小門望去，院子裡堆滿了玉米棒，胡媽正在忙碌著。

再向裡屋望去，裡面一共三間臥室。最裡面的一間，放著一張古式的大木床和糧食的圍囤。靠著外面的兩間小屋，各放著一張小床，一間屋子裡放著一張極陳舊的木櫃，一間屋子裡放著一張桌子。沒有粉刷的泥牆上貼著發黃的報紙，已剝落下來吊在那裡。范小妹正面牆而臥，我進屋時她並沒察覺。

抬頭望去，春節時吊在屋樑上的燻臘肉已經沒有了，這比我在鹽源時詹大娘的家好不到那裡去，看來，胡媽辛勤一生將五個兒女拉扯大，卻落得一貧如洗，這便是當年中國普遍的農家。

我的單獨作客，是胡媽沒有料到的，見了我，比春節那一次還要熱情，連忙招呼我坐下，並馬上走進裡屋，取出一隻裝著白糖的瓶子，給我泡了一碗糖開水。當時，白糖「憑票」供應，農村裡是不分配白糖的，所以白糖很稀貴，糖開水是農家用來招待貴客的「飲料」。

小妹被母親的動作和人聲所驚醒，翻過身來已查覺到是我來了，便坐起身來。我走進了她的房間，用手摩了一下她的額頭，果然很燙，便從衣兜裡取出帶來的阿斯匹林片。

她的母親正忙著燒火弄飯，說一定要我吃了飯再回學校。

屋裡只留下了我們倆，看她臉色青黃，頭髮蓬鬆好像很憔悴，但仍保持她少女的光彩。此時睜大著一雙發紅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我，流露出一種樸實的羞澀。我輕聲地問道：「頭疼嗎？」她點了點頭，問道：「哥，你這麼忙還過來……」

我端著那盛糖開水的碗，拿著感冒藥，遞給她叫她吞下。因為窮，鄉里的人偶感風寒，極少找醫生開藥，一般的就只有靠自己身體的抵抗力了。

吞下藥片，我便教她躺下，給她蓋好被子，輕聲說道「吃了藥，好好睡一覺，發身汗，就會好的」。她順從地躺下，兩隻大眼睛卻盯著我，好像有一種難以啟口的話從那眼裡向我傳遞。

不知是一種下意識的衝動，還是人們稱作的「情」在作用，我彎下腰，親了親她那發燙的額頭，那一瞬間就像有一股電流，從我的身上流進了她的體內。

她緊閉著眼睛，體驗著那種感覺。

為了讓她安睡，我起身走出了她的房間，去幫胡媽弄晚飯去了。

吃過晚飯，已下午六點鐘，我便起身告辭。臨行前囑咐胡媽：「發燒病人胃口不好，熬點粥給她吃，我拿來的藥一定要按時服下」。說完，便站起身來，向裡屋望瞭望，沒料到，她已穿好衣服坐在床沿上，見我要走，便走出屋來一定要送我，說：「天快黑了，那田坎路不好走，我帶你走上面那堰溝鋪的石板路。」

見她已不像剛才我來時的面容，精神也好多了，顯然是剛才吞下的藥力發揮了作用。床前已換下了一大堆衣服，畢竟年輕，出了汗，燒也就退了。她一邊說，一邊梳紮蓬蓬亂的頭髮，重新紮好了小辮子。

「不行，你還在發燒，就是燒剛退也不能敞風，否則病情要反覆發作的」！我反對道。然而她卻走到我的面前抓起我的手，放在她額頭上，我感到那帶著汗跡的額頭確實已經涼下來了。

她固執的說：「我在床上已經躺了一整天了，現在全身的骨頭節都睡痛了，我也想出去走走，活動一下身體。」見她執意要送我，我推遲不過，便囑他多穿一件衣服，胡媽拿出了一件夾衣給她穿在外面。

走出木門，天色已經暗下去，但沒有風，於是她走在前面領路，我跟在後面，一前一後的出了木門，轉過一個彎，便踏上了那用石板鋪成的堰溝小道。

走出不遠，小道伸進了一片茂密的竹林。走進密林中，我們倆便被包圍在綠色的竹林中。夏末的黃昏，竹林裡蒸發出一種清新的氣息，這是我倆第一次在野外單獨相處，好像進入了一個只有我倆的二人世界。

我聽得見走在前面，僅一步之隔她那心臟裡發出的跳動聲。

我忽然覺得，如果此時，她突然停下腳步，回過頭來只消深情地凝眸望我，我定會立刻將她緊緊地擁抱在我的懷裡，那種我原先以為永遠都不會再屬於我的愛情，突然奇蹟般的降臨給了我。

然而，她沒有這樣做，我也沒有這樣做，我們之間始終保持著一步之隔的距離，我們雙方都在用理智約束著自己，因為她太年輕了，一個高中學生，年僅十六歲。而我已是四十二歲的中年人了，而且是她的老師和義兄，中國古老的道德理念，發生了強烈的制約作用，我們都應當自重……

我倆穿出竹林走出堰溝，前面便是蔡家廣場的出口了。

在暮色中，我還來不及向她叮嚀，「等病好了以後，再來上學」。她便已經站在溝上，向我揮了揮手，扭過身去，迅速消逝在暮色籠罩的竹林中了……

不過，感情像一頭脫韁的小馬駒，衝擊著理性的約束，帶著與范小妹初戀的感情，我向母親表示過，我要娶她為妻，但是受到了母親的反對。

## (二) \*\*逆緣\*\*

在二十四中，近百名教職員工中，與母親有過相似遭遇的一共有八人。其中，外語組的王基敏老師和已經退休的鄭修老師，與母親交往最密，雖然處在兩個單位，但處在同一蔡家地區。

過去，「公社」開批鬥會便將她們聚在一起遊街，批鬥，加上兩位老師常到醫院看病，親眼見到醫院職工對母親的欺侮，同病相憐，結下了患難之情。

我到二十四中後，她倆又是我的鄰居，除了常常給我燒開水、弄飯，提供生活上的幫助，還常向我介紹，當年蔡家場和二十四中打手的「赤色」暴行。

兩位老師最關心我的便是婚姻，她倆比誰都替我

的婚姻著急，主張找一個能配得上我的，最好也是教師的人作女友。

正好住在我的對面，一位高中政治教師名叫徐樂生的，正為他的表姐尋找對象。他的表姐叫劉啟建，在蔡家地區的衛東中學任語文教員，年齡比我小七歲，已經離異，但無子女。

有一次，蔡家地區的中學教師在二十四集中學習，王基敏和徐樂生便商議，將這位劉老師介紹給我，在那次活動結束的當天下午，由王基敏撮合，我和劉啟建就在徐樂生的房間第一次相見。

她中等個子，五官也還端正，據說也有一段因家庭出身發生的辛酸經歷，受過「勞教」，並與前夫離異。

第一次見面，留給我的印象說不上好，也說不上有什麼致命的缺陷，只是感到她與人交談有意無意流露一種不順眼東西，講到文革年代，眼睛老是愛翻白眼，兩手還在空中舞動，以幫助她表現出某種「造反」的意態，那揮手說話間，不時叉腰的動作，像從當年的紅司令那裡學來的。

這種動作，大大傷害了她那女性應有的風韻。

恰恰我的弟弟就是被造反派殺害，我對文革的狂熱深感痛恨，從她身上折射的那種陰影，除讓我反感還憑添了一層防範的隔膜。我這種先入為主的成見，已把她拒之門外了，我完全沒有與對方戀愛的初衷。

所以，當王基敏問起我第一次見面的印象時，我只是笑了笑，把這個初次相見的印像埋在心裡，並沒有說出口。

大約過了兩個月，她第二次到她的表弟處來取一些語文教參書，王、鄭兩位熱心的老大姐抓住這個機會，主動當起義務紅娘。把我們單獨地關在她表弟的房間裡，我們兩作了第一次交談，我們不僅各自介紹了自己的「遭遇」，還介紹了各自的「家庭」。

她的父親劉學理，年輕時就讀於國民黨成都軍校。抗戰時期，原國民政府川東峽防局行政長官盧作孚，曾聘他擔任北碚市的民政局長兼城防長官。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共軍隊佔領重慶，身居北碚區域城防長官的劉學理開城迎共，北碚遂和平「解放」。劉學理也成了國民黨「起義投誠」軍官。

不過未到五年，這些本想僥倖自保的人們，一個個被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房屋被沒收，家被洗劫，劉學理被劃為反革份子，受到三年的監督勞動管制，淪為無產階級政權下一個赤貧的黑五類。

劉學理五個子女中，劉啟建是老三，自從父親被管制，她才七歲就要帶弟妹。稍大一點，便在垃圾堆裡揀二煤炭，拾破爛，沒少受鄰人和同學們的歧視，但她卻因天性的軟弱，從不敢對加給她的不公正表露反抗。

中學畢業後，因為家庭出身，使她沒能考上大學，但卻幸運的當上了小學教師。在她二十四歲時，被西南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一個姓王的講師看中，雖然那姓王的比她整整大了十幾歲，並拋棄了他的前妻。結婚使她得到一種新的虛榮，做大學講師又是黨員的妻子，使她感到社會地位膨脹了。

據她自己講，為了裝扮自己體面的家，她不顧工薪條件，追求高檔的家俱和擺設，寧可負債，向她的學生家長借錢，向兄弟姊妹借錢。

借的錢越來越多，背上的債務越來越沉重，為了躲債，她不得不欺騙上門討債的債主，學會了向債主施以小利來減緩債務壓力，並趁文革期間，學校財務的無政府狀態，將學生交來的學費挪用還債。

於是債主的公憤和無產階級高壓的專政，毫不手軟的將「詐騙」和「貪污」的雙重罪名，扣在她頭上，就因為大約幾千元的債務和幾千元的挪用，她被關進了西山坪勞動教養營，由當時北碚軍管會處以三年的勞動教養。

而那位王姓講師，在判處她勞動教養的宣判大會上，向法院起訴離婚。結果姓王的講師拋棄了她。

三年勞教期滿，她回到老父親的身邊，在她再三懇求下，教育局把她發沛到離北碚二十多裡大山上的這所學校，「繼續」當她的老師，那可是一所無人願意去的學校。

我們談完，已是七點鐘了，吃過晚飯後，看天空上月明星稀，一輪上弦月已懸在半空中。她執意要回衛東中學，說明天還要上課。鄭修並不勸阻，只是建議我一定要護送她，王基敏叮嚀道，「燈塔那一帶地勢荒涼，文

革期間公路上夜間行劫搶人的事常有發生，所以你一定要把她送回學校去」。

經過一下午的交談，我對她還沒有任何好感，我們雖有相似的家庭出身，經歷也有相似之處，但對於中共的專制政權，她的認識卻與我完全不同，由於相似命運而產生的同情，並沒有讓我對她發生愛憐。但耽誤到這麼晚，也是為了我，我總不能眼巴巴看著她一個人摸黑冒險去走那山路。

我們一前一後走出蔡家場，沿著通向燈塔的馬路上走去，兩旁齊人高的玉米林裡黑鴛鴦在月光照射下，好像路邊預先埋伏的不速之客，會突然從那裡竄出來，用刀和棍棒比著我倆，心便仆通仆通地跳了起來，彼此都緊張的窺測著茂密的玉米林並不說話。

我緊握著一根打狗棒，走到燈塔鄉的十字路口看看手錶已是晚上十一點了，月亮已經開始偏西，光線漸漸暗下來。

當我們走上到衛東中學那段山坡小道時，突然一隻山耗子，從路邊的草叢竄出，從我腳下竄過，驚出我一身冷汗，她在田坎上搖晃起來，好像要跌進田裡，兩手一張便拽住了我的手，為了替她壯膽，我也就緊拉著她的手，走過了那段田坎。

同女人牽手，是我劃成右派後整整二十四年來的第一次，三更半夜的在一片荒野之中，這原是很浪漫的事。然而當時處在緊張之中，我卻什麼也沒有感覺出來，只覺得背上泛出一陣陣的冷汗。

走完田坎，她才掏出了一支預先準備好的手電筒，依靠它，邊用棍子驅趕著藏在草叢中的毒蛇。最後總算到達了沉沉靜睡的學校大門。

校門口的兩條狗向我們狂叫起來，狗的吠叫驚醒了守校的工人，當木門打開時，我們總算舒了一口氣，將她送到了校門內已完成了我的任務。

於是我轉身告辭，然而她卻堅決不允。來開門的校工是一個四十上下的女工，兩個人一齊勸我等到天亮再回去，因為太晚了，周圍荒山野地，即使沒有盜賊也要碰上野物毒蛇，再說此去蔡家十裡路，少說也要走兩三小時，何必冒此危險走夜路。在兩人苦苦挽留下，我不得不改變回返的主意，跨進了校門。

這裡地處偏僻，起居十分不便，比起我所在的二十四中條件還要差，這就是給曾勞教過的劉啟建一個安置！比那供銷社姓秦的又似乎好多了，總算還有一口飯吃。若不是現在「教師」奇缺，在這種誰都不願來的邊遠學校急需補充，恐怕她連這麼一口飯都沒得吃的。

在入過另冊，從地上爬起來的「五類」中，劉啟建算幸運的。

學校很小，這裡原是一家「地主的宅院」，四周兩公尺高的圍牆圍著一群泥木結構的瓦房，院中兩棵大黃桷樹，顯得非常的清靜。

她忙著把我請進了她的房間，房間裡收拾得挺乾淨，在一張桌子上陣列著一個煤油爐，滿桌堆著蛋、米、醬油、和鹽糖之類的東西，她在同那位開門的工友商量一陣後，走進寢室，點燃了煤油爐，安上了鍋，倒了許多油。

我說別去弄了，天已經這麼晚了何況我也不餓，但是她並不聽我的，一面說：「在王老師那裡，我根本就沒吃，她弄的那菜連油都不放怎麼吃？」聽到她的話，一時答不上話來，只好默默看著她弄「飯」，只見她在碗裡，打了整整八個雞蛋，然後往已經燒燙的油鍋裡倒。

八個雞蛋，我還真沒看到過這種吃法，那年月雖已經什麼都能買到，雞蛋也並不算貴，但畢竟還是非平民食品，整整八個油煎荷包蛋也夠出手大方的。

沒出十分鐘，兩碗面弄好了，每碗面上放著四個黃澄澄的荷包蛋，將其中一碗，端到我面前，那時我一點都沒胃口，又不好推遲！於是順手拿起一個小碗，夾過一個荷包蛋和半碗面，心中暗想，這女人不像一個受過苦的人。

吃過麵條已是下晚兩點半鐘，距天亮充其量還有三個小時，我就留宿在她的床上，她到守門的校工那裡住了。

當我鑽進那白紗紋帳裡，一股濃烈的香水味向我撲鼻，好像鄉巴佬初進了大家閨秀的閨閣，迷迷糊糊地一點都沒有睡著。

腦子有些紊亂，好像缺乏條理。這是我第一次同一個初識的女人半夜結伴同行，並且寄宿在她的床上，這肯定因為東方人的習慣與西方人完全不同，別說這種沒有愛上對方的情況，就是已經熱戀而沒有結婚，也不允許發生這種性突破，腦子裡很奇怪，自問是不是這就是大陸人的要女朋友？

然而不管怎麼說，我這一夜印象深刻，尤其對她那種灑脫大方，感到非常的格格不入。管他的呢，還沒有確定任何關係，我想……

夏天的早上五點鐘，天已拂曉，我忙著起身，一夜幾乎沒睡，頭昏沉沉的，好像生了病。好在今天星期天，我得馬上趕回蔡家場，在母親那裡睡上一天。

劉啟建已經起床，如昨夜的那般熱情，忙著給我端上熱騰騰的洗臉水，並忙著去煮豆漿，不過事前已說好，天一亮我就走。

她和那女工一再挽留，我被拖到了七點鐘，還是獨自走出校門，臨別時她一再叮嚀我，下周星期六再到衛東中學來相聚。

當我匆匆忙忙急步趕回蔡家醫院時，已是上午九點鐘了。平時按照慣例，周末我都是回母親那兒住的，昨晚一夜沒歸，自然引起她的追問，我便把昨晚發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母親很不以為然的說道：「沒見過這種女孩子，初次見面就要留人住宿的」。

我連忙解釋，那確是因為天太晚，加上夜半更深，路上又有狗、蛇，獨自回來確實不安全。她只是囑咐道，下個星期天千萬不要再去了！我點頭答應了母親。說心裡話，劉啟建在我心裡沒有任何位置，當時我心理真愛著小範。

自古以來被活活折散的情侶，總是歸於「無緣」。一聲天意難違的悲嘆，也不知結束過多少恩愛情人的生命，其實認真思索每一個悲劇的後面，必有一雙導演悲劇的黑手。

「梁山泊與祝英台」，「孔雀東南飛」這些名戲也不知賺了多少善男善女的眼淚，然而並不因一曲梁祝，隨蝴蝶翩舞，使現實中新的梁祝不再發生。

儘管「茱麗葉與羅密歐」以憤怒的控訴，痛斥中世紀貴族們帶給人們世仇的災難。貴族們用相互拚殺，來繼續世仇，甚至酋長的親生兒女，也不能不為種族仇隙雙雙殉情。

而我們這個社會，殘酷的『階級鬥爭』，與中世紀專制的野蠻相仿，難道反右運動殘酷地粉碎了我和馬開先的初戀，同中世紀的故事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嗎？當年因為階級出身而被強行拆散的戀人還少麼？

而在今天，造成我中年未婚，難道不是這場殘酷階級鬥爭悲劇的延伸麼？偏偏老天在將一個聖潔少女賜給我時，當我們真心相愛，卻受到市俗的阻繞。於是我愛情的第二幕悲劇，便毫不留情的降臨給我。

後來在好心的王基敏，鄭修以及其他老師的撮合下，我聽從了母親的勸告，屈服於市俗壓力，狠心地割捨了同小妹的初戀，身不由己的帶著傷感，同意和劉啟建結婚。

毛澤東時代，這種悲劇太多，兩個受害者，因缺乏彼此瞭解和相互包容，蒙裡蒙懂建起的家，充滿吵架，這樣的不幸豈止我一人。

殘酷的事實證明，兩個不相愛的人結成的家，不僅雙方是痛苦的，最後必然破裂，我的晚年註定了鰥居，而受害最大的莫過於孩子……

結婚那一天自己弄了幾個菜，請了熱心我們這婚事的王老師和鄭修，買了一些糖果，吃飯以後去蔡家相館拍了一張結婚照，就這樣沒有舉辦任何儀式，悄悄的我們就在母親那間小屋子裡渡過度過了新婚的第一夜。

後來劉啟建逢人便說，我和媽媽太吝惜，一千塊錢就打發了一樁婚事，想起來確實寒酸。我和母親平反後，靠自己這點工資白手起家已經不容易，再說，我對這場婚事充滿了無耐。

范小妹我幾乎沒有和她往來，今天突然聽到我結婚的事，一定心裡很痛苦，而她的情影、笑聲卻縈繞在我的耳際。

果然，結婚還沒有一個星期，我們就為在那裡住，發生了矛盾。按照我的意見，我們三人都應當住在蔡家醫院，我不可能因結婚而拋下母親不管。平時三個人在三個不同的單位上工作，倒也算了，遇到星期天和放假，三個人往那裡聚？

三人住在一間口袋屋中，安上兩張床，且不說擠，沒有活動空間，拉屎拉尿怎麼說都極不方便。何況，婆媳同住一屋，本來就有悖於中國民間規矩！

三個人既不願擠在一間屋裡，劉啟建重新恢復了她的習慣：星期六就回北碚同她的老父親團聚，而我也像以前那樣，星期六便回蔡家醫院與母親團聚。

分居成了我同劉啟建「蜜月」期的奇怪現象，這個剛剛建立起來的家就出現破裂的危機。這難道不是這小小醫院黨支部的壞心眼造成的麼？不是中共二十三年迫害結出的苦果麼？

#### 第四章：母親擺脫了傷心地

一九八二年春天，母親正為「落實政策」而心煩時，接到北京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寄來的信，孫起孟告知媽媽，她的來信已轉給重慶市工商聯合會和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請他們協助解決母親落實政策的善後事宜。

##### 第一節：\*\*劉老\*\*先生相助

四月一個星期天的上午，醫院的門衛突然來說：「方老師，樓下有一個姓劉的來找你，他坐的是一輛麵包車，看樣子好像是市里的幹部。」

母親跟著走下樓去，來人大約六十多歲，身著中山服，腳上穿著一雙布鞋，此時正站在大門邊上，面部極為和善。

母親打量著他，在腦子裡竭力思索著，對面前站著的他感到陌生。一面向他走過去，一面詢問道：「您找我嗎，請問有什麼事嗎？」那人立即謙和的向母親自我介紹說：「啊，我姓劉，在農業局工作，請問您就是方老師嗎？」母親詫異地點了點頭。

此時那停放在大門石階下那輛麵包車司機，從車裡伸出頭來，高聲的喊道：「這是我們的劉局長！」母親終於恍然大悟，連忙說道：「啊！劉局長，劉老先生，劉昆水先生，我早就聽說過了，北京的孫老師給我來信中介紹您的，沒想到您親自跑來了，請吧，請樓上坐！」

對方回應道：「唔，不敢當的，我今天是因為到北碚農業局檢查工作，順路來看看您的，孫老師囑咐過我了，要我盡可能地照應您。」他一面上樓，一面講明瞭自己的來意。

我站在樓梯口迎視著他。回重慶以來，這是我見到第一位市里的局長。那外表似乎在那裡見到過，或是在什麼小說裡讀到過的，但我卻說不上來。

上得二樓，面對本已很狹的過道兩旁，雜亂地堆著破紙箱，爛木頭和煤炭，他皺起眉頭好像在說：「怎麼會這個樣子？」當走進母親那口袋屋，他摘下了那副深度金絲眼鏡，迷逢著眼睛，露出一種走進貧民窯洞的那種酸澀感，小心翼翼地跨進了門，屋裡的濁氣，使他下意識地捂著嘴巴。

走到緊緊關著的窗子下面，重新戴上了眼鏡，試圖去打開那窗戶。正好，許小龍的母親從那窗前走過，使他縮回了伸出的手。

接著他又回過身，反覆掃視著這間被兩張床鋪占去，只剩下一條過道的小屋，似乎明白了一切。

母親並沒有介意來人在觀察什麼，熱情的張羅著請客人坐在床鋪上，然後從廚房裡端出剛剛泡好的花茶，向他遞了過去。那劉局長忙站起身來，謙恭地接過茶杯答道：「唔，別客氣了，方老師，孫老師接連給我來了兩封信，托我關照您的，我也因為工作忙沒能抽出身來。」他第二次重複了來意。



接著問：「最近醫院工資改革了吧，他們給你加了幾級？」眼裡露出一種關懷的眼光。

「唔，工資嗎，按調資檔規定，像我這種二十年從沒有升過一級的人，應當在本次連升三級，但是醫院調資小組的人說，我的工資已是全院最高的，再說已經超過退休年齡了，動員我自動的拿出一級來，照顧那些業務上的骨幹，我也沒有什麼意見，所以最後上報時，我只升了兩級。」母親回答他。

劉局長聽到這裡，不停地皺著眉頭，中國人怕硬欺弱已是風氣，被欺侮的人是明也欺，暗也欺，到處都一樣，今天他已看到這個醫院不僅在住房分配上，在提升工資上對母親的欺侮，他還沒來得及深入瞭解平時母親是怎麼忍受周圍人對她歧視的。

「孫先生要我能幫助你，調整一下生活和工作環境。」他終於說出了來意。「我也沒有什麼辦法，民建雖說是民主黨派之一，卻連調動一個人也是無能為力的。我已就此向區統戰部聯繫了好幾次，他們說眼下沒有好的去處。」

我看這樣吧，民建重慶市委已報教育部核准，準備在今年暑假後辦一所財經學校，中國要搞四化，沒有經濟管理人才是不行的，你看在這所學校裡增設一個以培養幼兒師資為目標的專業，由你出任這個專業的負責人怎麼樣？」

劉局長的坦白和開門見山，顯示了他對民建全國主要領導人孫起孟盡責盡心了。母親的眼裡露出了感激的眼光，她那渴望已久離開這野蠻無理，欺侮她，傷害她的蔡家醫院，總算盼到了。

這不是由中共的基層組織衛生局，教育局，落實政策名正言順解決的，而是由中共的一個小「夥計」以私人交情的辦法解決。中共對如此不光彩的解決，連看都不肖一看。不過對於母親來說，問題總算解決了。母親早在抗戰時就創辦過中學，一個教育部門的老前輩，被中共踐踏成這樣！現在他仗著民主建國會幫助，才逃出眼前這人間地獄！

「這樣吧，你儘快地辦理退修手續，爭取暑假就到工商聯來準備夏季招生的工作。我已經為你安排了住宿，你就安心在財經學校發揮晚年的餘熱吧！」

他說完，便站起身來，告辭道：「今天我還有許多事要辦，所以不能再多給你說什麼了，好在今後來日方長，到重慶以後慢慢地說吧。」

我看著兩位老人緩緩下樓的身影，母親一直把他送到他的麵包車上，熱烈地握手道別後，還站在那裡目送那車消失在場口轉彎處。！

我心裡一面替母親感到高興，她終於擺脫了這個令她傷心的地獄，也替母親擔憂，她已經六十五歲了，要單獨地在市中區獨自開闢一個天地，她能勝任嗎？尤其是，為什麼一個堂而皇之的民主建國會，對中共這種落實政策欺人太盛的作法，不敢直接提出來明正言順加以解決？而是想出在一個與幼稚教育毫不相干的財經學校，辦一個師資培養班的辦法來解決？

六月份暑假到來，母親按照劉先生的吩咐辦理了一切手續，打點了自己的行李，把自己的隨身行李裝成了兩個大包，在我親自陪送下離開了蔡家醫院。當我們顧了一輛運貨的人力三輪車，離開醫院大門時，除幾個與母親保持著友好關係的護士外，沒有人知道母親上哪兒去。

當我們離開了那場口的汽車站向三溪口行去，母親連頭也沒有回。

從一九六一年，她被強行在這所醫院接受「監督勞動」至今，整整受了它二十年奴役和歧視，在她身上沉澱的傷痕怎麼也無法消褪。

我們到達市區的下半城解放西路的重慶市工商聯合會，已是下午五點鐘了。工商連接待室裡走出了四個中年人，將母親的行李接到一個歐式三合院裡，母親被臨時安排在招待所樓上住下了。

一位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熱情地為母親搬行李，介紹工商聯的情況。他自我介紹說，他叫李重生，是工商聯的伙食團長，劉局長特別吩咐他對母親的生活起居進行關照，今後有什麼事只需喊一聲小李就行了。

母親從這個小夥子的樸實語言和憨厚的態度中，感到在蔡家醫院二十多年來從沒有過的親切。

今天對年過六十五的母親，有一種背境離鄉的傷感，但很快被周圍和睦的人際關係所沖淡。從今以後，也許有一段較為舒心的生活，記載在她夕陽的人生之旅中了。

## 第二節：解救范小妹

中共建政三十年來，一面空喊消滅城鄉差別的口號，一面又為建立統治秩序實施了嚴密的戶口管理，將國民劃為城市和農村兩類。農民在生活和勞動條件上比城市平民更苦，城裡一個職工再窮，每月好歹有幾十元工資，吃糧按城市居民供應也有保障。農民起早摸黑，常年勞累不得溫飽，成了中國社會最底層的階層。

農村這種低下地位，成為毛澤東關押，奴役「五類份子」的大監獄。每次政治運動，都把被整的人「下放農村」以示懲戒。

文革以後，到1988年十年光景，從二十四中學校畢業的高中學生，累計三千多人，考上大學僅只有十餘人，在一九八二年到1985年連續四年中竟沒有一個升入大學的，學生在學校混了幾年以後回到農村去，只消一兩年便把在學校所學的東西忘得一乾二淨，並變成農民。

就在這樣的氛圍中，一九八二年，范小妹在這所學校裡「混畢業」了，她要算在她的同學中最勤奮的一個。

但是無論她本人付出多大努力，她的母親寄多大希望，我對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她同她同年級的兩百多學生一樣，只能在高考的榜上名落孫山，她只好回到蓮花大隊的家，同她所有同學一樣，接受回家當農民的命運。

隨著畢業，原先的理想變成了泡影，前途一片茫然，呆在家裡又怎麼解決生活的壓力？她偷偷地哭過，我明白，她那白紙般的心靈難以渡過面臨的歷程。而她的旅程，是一條充滿文革留下來的欺騙、搶劫、危機四伏的路。擺在她道路上的荊棘是她難以預料的，也是她的父母和我難以預計的

她的母親和范大伯商量後，決定讓她高中畢業，到德陽九五汽車廠去學一門手藝。范大伯是該廠的退休職工，按照「政策規定」就業人員沒有讓子女「頂班」的條件，這又是一種偏見和歧視。

她將離開的前一天，突然跑到學校來，懇求我讓她帶走我寫完的兩本片斷。我體會得出，那片斷帶在她的身邊，就意味著我在她的身邊，她說片斷上所有的句子，都會在遠行的途中，響在她的耳際。

就這樣，她像一個在大松樹林裡到野地採磨菇的小白兔，懷著惴惴不安踏上了遠程的路。

那天早晨五點鐘，天還麻麻亮，在牛奶場的大門口，她的母親提著一大包衣物，同她一起搭趁了牛奶場去火車站送奶的卡車，當她俯身在車上接過我遞給她的書包時，我看見她的眼圈紅腫，眼眶裡充滿了晶瑩的淚珠，我心裡一陣酸楚，淚水奪眶而出。

卡車緩緩地開動起來，她站在車尾，一再招手，一邊抹淚，一直到消逝在轉彎處的茫茫晨霧之中。

一周以後，也就是六月七日，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那上面寫道：「平哥你好，現在，我獨自一人到了德陽，一個人關在屋子裡頭昏目眩，想到你對我的關照，心裡就痛，我沒考上學校對不起你對我的一片真心。現在，我真有點後悔，想到我還是不該離開你們，我看穿了這世界的欺詐……」

第一封信的到來，使我陷入了一連串迷惑之中，她為什麼一個人關在屋子裡？為什麼看穿了這世界的欺詐？難道這些話隱含著一種陷阱？更令我奇怪是信上沒有落下地址，讀這封信越感到一種不祥之兆，她此刻在哪兒呢？

七月中旬學校剛放假，母親和我、劉啟建便坐火車到成都，再改乘北上的火車到德陽並在黃許車站下車。

德陽九五汽車廠前身，是重慶新建勞動工廠一部份，遷川西而建立。

它坐落在寶成鐵路旁，同鹽源農場一樣，就業隊是就地滿刑的「勞改釋放犯」充實的，就業人員一方面繼續受殘酷壓迫和剝削，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混雜的集合體，這兒有受迫害的政治犯和受到傷害的老百姓，也有流氓、騙子、殺人越貨的強盜和妓女。管理它的監獄管教，多半是貨真價實的無賴和惡棍。

它的東邊靠著黃許車站，川西平原的靈氣，使這裡風景宜人，然而同大陸美麗的土地一樣，秀麗的山水掩蓋不了這片土地的罪惡。

到了九五廠，我們很快見到了范小妹和她的父親，聽她的哭訴，短短兩個月的經歷，在她稚嫩的心靈上紮下了無數的毒刺。

出來幾個月一無所獲的回去，撞蕩生活的美好幻想不但破滅，還要重新回到那破屋裡聽母親沒完沒了的嘮叨？準備著像母親那樣，在分給她的土地上勞碌一生，留在黃許鎮上吧，又怎麼能應付周圍人群無休止的騷擾？

在中共「改革開放」的年代裡，無數同她一樣的農村少女，在向城市游離的過程中經歷幻想破滅，痛苦徘徊的歷程幾乎是相似的。她們經過生活的摔打，因處在弱勢，只好出賣自己的肉體和良知。一些人變成了城市的妓女，販毒的犧牲者，詐騙新的參入者。

這些不幸的遭遇，成了這個時期駭人聽聞的市井故事。雖然他們都知道，毀滅別人的人自己必將被毀滅的道理，然而他們在毀滅別人的同時，並不願接受自己也被毀滅的嚴酷現實。

不過，範萍就幸運多了，我告訴她，目前地處農村的學校嚴重缺少師資，估計十幾年內這個矛盾無法解決，就在蔡家的幾所邊遠學校都在請代課老師，工資雖不高，但也夠一個人的生活了。只要肯鑽研，肯吃苦，走上講臺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如果她願意從事這項職業，我願為她提供輔導。

建議她暫時到邊遠的學校代課，再看今後的情況來尋覓新的就業機會，總比在社會上瞎撞強多了。經過我這麼建議，她決定跟著我們回蔡家場去。

從成都返回重慶，在母親那裡住了四天，我就和範萍一起回北碚，將她送回她母親身邊，母女相逢酸辣苦澀自有說不盡的心裡話。

這一段初闖社會的經歷給她多深影響，她雖沒說，但從以後她一直避諱提起這段遭遇知道，給她留下了一生難以消弭的傷痕是很深的。

回到蔡家場後她安下心來，聽從我的意見，就在附近的中小學代課，雖然代課的工薪十分薄，但也夠她個人糊口了。

### 第三節：峨眉遊

當我們從黃許坐上回歸成都的火車時，三天來在這裡碰到的種種不愉快終於結束，解救范小妹的成功，雖可以告慰我，但她回到重慶是逃出了一個罪惡深淵，還是失去了一個求職的機會，是好事還是壞事？要等今後下結論。

我們在回歸重慶之前，按照原訂計畫，便是遊覽川西壩子的名剎古寺。

記得我們在抗州居住的三年裡，隨父母游於西湖，我特別喜歡天竺、靈蔭兩座寶寺。現在還能想起每當我走進那林蔭覆蓋的寺前小路，就被隨風吹來的香煙和隱約的頌經聲所吸引，彷彿已進入了一個神靈居住的仙境。

走進大雄寶殿，一股天地靈氣會使我肅然起敬，不由自主雙膝便跪在那高大威嚴的如來尊者腳下，清理自己浮躁妄動的心。次數多了，靈蔭寺的老主持便認識了我們。

有一次，他撫摸著我的頭，對母親說，「阿彌陀佛，這小施主人面善，我觀他與佛有緣，他有善根哪！好自重吧。需知，從善者得善，無緣者舍之，全憑自己的造化了！」當時我睜大了眼睛，揣摩他話中的意思。

外婆是常年吃素的，在她開導下，我常用零花錢去賙濟沿街行乞的殘廢人。

而今三十多年過去，回想在獄中逃過幾次殺身大劫，便以為是佛的救助。我自悟此生苦不堪言，歸結於種有惡因。所以在我的內心惡念有一念之差，幹過蠢事後，都必在事後加以懺悔。友人勸我在大難後，看破紅塵，從此遁入空門，求得解脫。

只因畏懼修行之孤單，於是雖有從佛的意願，卻仍徘徊空門之外。不過我是報應論的信徒，所以我在佛祖面前坦露心扉不敢隱瞞，抱定萬事隨緣的意念。

遊歷名勝，閱覽中華千古文化仍國人之共同心願，總想親身體驗暴政對我中華文明之破壞。所以在菲薄工資中省積了兩年，以供旅行路資和生活所需。

同行四人中，各懷著不同的心情難以敘說。母親抱定求孫的宗旨最是虔誠，劉啟建心裡在想什麼她沒有吭聲，范小妹在經歷了這場歷時兩個月，初逢社會的驚嚇正在反思，所以很少說話。四個人複雜矛盾心理作用下，使這次旅遊帶著說不清的味道。

乘車從成都出發，抵灌縣後，中午時分，我們在縣城一家小飯館裡吃過午飯，便徒步從灌縣城向青城山攀登。

時值盛暑，我們沿著石板路，一階一階向上走去。幽靜的小道兩旁濃密的林蔭之中，蟬聲纏綿，像唱不完的迎賓曲，起勁為遊人鼓勁。到了長生宮，參天的大樹已將酷暑擋在幽徑的外面，氣候十分涼爽。

三十年來母親是第一次出遠門，畢竟年紀大了，能夠徒步十裡已很不容易。懷著新鮮感，她一路上詢問所到處的小地名，以及這些地名的由來，說明她對美好生活仍懷著渴望的激情。

將到天師洞，那蓋定集仙橋的濃蔭，使古道特別幽暗起來，空氣變得壓抑，彷彿許多的精靈聚集在橋洞中，把世間的仇殺、冤恨，統統擠到橋的入端處，我相信有意上得此山求清靜的香客們，會從這裡找到新的靈感來。

如果有在政壇上叱咤過風雲的政客，或在戰場上顯過戰功的老將，雙手沾著他人鮮血的人，一定會在橋下的淙淙流水中，洗淨身上的血污。

人生驕娃和失意者，當回憶自己一生所造下的孽債，在此領悟萬事皆虛仰天長嘆之餘，所剩下的只有在玄虛的妙境之中，生出悔恨二字來。

我看見那些長跪在天師靈麾下的，不但有善男善女們，還有面帶凶相，似有過嗜血經歷的頑凶。那兇惡的毒魘，口吐毒霧在用權欲，財欲迷竅著人的良知時，將醜惡不斷灑向他們。

當我們快進青城山的山門，在夕陽的斜照下，仰視上清宮闈的蒼穹，俯身去拾掇那些刻在石碑上的經文時，我的心被古代的聖靈洗滌。在巨大的香爐面前，凝視那一縷直衝沖太極之顛的香菸煙，我的心溶解在那嫋嫋直上的青菸煙中。

天地漸暗，太虛之中，萬物伏地，唯有瑟瑟作響的晚風，給人清涼的爽意，四周是那麼肅穆。突然間，一記宏亮的鐘聲，使那些聖靈腳下山谷裡，還在胡撞亂蕩的惡鬼，也心驚膽戰規規矩矩，伏聽天尊講那懲惡揚善的訓戒。

當夜，我們就求宿在上清宮玉皇尊者的腳下。

第二天天剛拂曉，西邊山腳下剛現魚肚白，我們用過寺廟的齋食，四個人緩緩下得山來。走出數百米外，我還在一步一回首，從不同的遠近再次仰看太虛之巔，一再聆聽從那上清宮裡傳出山來的隱隱鐘聲。

此時我感到遺憾的是，忘記了帶上筆記本，沒有記下那雋刻在石碑上的碑文，但我一路還在咀嚼昨夜青城山頂元始天尊的佈道。

從灌縣縣城出發，繞著環山路蜿蜒十餘裡，去二郎廟。西元前256年正秦始皇統一六國，舉兵韓趙之際，蜀郡郡守李冰率領蜀地百姓，深溝作渠，低灘圍堰，分洪成功。原來這蜀地，雨季淋淫，水患橫溢；日出驕陽，千里乾旱的地方，從此旱澇保收。

川西平原十三個縣，從此成為天府寶地，兩千多年涓涓流水不斷地灌溉著這千頃良田，長年使這裡的大地披著碧綠的盛裝，一年四季五穀豐登。

二郎廟前蜿蜒的山路上，老百姓和遊人沿路供著不絕的香火，李冰父子的塑像目光炯炯，二千年凝視著眼前這都江堰，好像在講天經地脈，又像關照著他腳下的子孫。一路上進香的善男善女絡繹不絕，他們所供奉的香火是中華民族居安思源的寄託。

他們雪亮的眼睛裡有一桿稱評人間善惡的公平秤，他們絕不會忘記給他們創造幸福的先人，也不會忘記給他們帶來災禍的混世魔王。」無產階級專政」在這裡所造下的罪惡，他們都銘刻在心間，謹記著這歷史。

九江東去，佛法西來，我們乘車南行，傍晚到了樂山。第二天一大早，我們懷著虔誠的心，來到凌雲寺前那百丈巨佛的腳下。舉世聞名的樂山大佛，初建於唐玄宗年代，直到唐德宗才修成，歷數十年之久。

當我從大佛腳下，凝視三江口，向外望去，江水浩浩蕩蕩。岷江、青依山、大渡河三種顏色不同的河水匯聚在此，合成一體，清濁分明，其景甚壯。

傳說當年三江在這裡初曩，惡風兇悍，濁浪排空，常將航行到此的船隻無端的沖去觸礁，沉沒江底的木船無數。

當年有真人騎獸而過，對當地的父母官說：「此水怪出沒作怪所致，欲止此怪，須面三江而建一如來尊者的石雕巨像，以作鎮怪寶物。」說畢，當江一指，一尊巨石，傍山而出，遂驅獸而去。

當地父老鄉親向真人焚香跪拜，便以此石為本，大規模的修鑿從此而始，前後凡經九十年，大佛雕成，佛高71米，比世界最大的阿富汗佛還高出11米。建成以後，果然咆哮不安的三江匯彙口從此風平浪靜。

如來的石像，為航行在他腳下的船夫織者保駕護航，從此水怪再也沒有肆虐過往船隻。

於是，人們從懸岩絕壁上，下到石佛的腳下，沿著佛身兩側和對面的山路鑿出石梯小道。最寬的地方也只能容兩人上下，並沿著石梯小路，在岩壁修出數百小石洞，其中雕供著上千尊小石佛，其工精美。

唐代佛教盛興，天子的兄弟玄奘曾出西域西游取經，吳承恩所撰西遊記，將神和魔怪寫成身份各異的故事。這樂山大佛成了遺留至今的盛唐古跡。

可惜那時這些小小偶像，既沒被當作珍貴的文化遺產與以保護，卻在一夜之間，被毛澤東指揮的「千鈞棒」統統搗毀。為了樹他的皇權竟可以不尊重他人的信仰，可以在一時興起，而毀掉千年文化，連這些小佛像也未倖免。

我牽著母親沿著那石梯緩緩向上登去，此時我才看到在我身邊山崖上的小石像，竟找不到一處完整的，我立刻回想到在鹽源的馬鈴薯地裡，相遇的冷軍當年講的革命行動中一個細節，紅衛兵破四舊的瘋狂，使小石佛無頭缺肢，這些殘骸現在依然很淒涼地立在這裡，訴說當年毛澤東的惡行。

毛武斷的說宗教是虛妄的，其實剝開幻想的外殼，宗教不但反映了人們的善惡主張，還反映了他們對罪惡的一種揚棄。古時的工匠，能在懸岩絕壁上刻畫這些栩栩如生的石像，反映了他們內心的千變萬化。

坐落在凌雲山頂的一片寬闊的石板平臺上，東坡樓就立足在這裡，據看守人介紹，蘇東坡生前的大量詩文真跡，都珍藏在樓中的「文苑之華」裡面。文革把這裡當成橫掃封資修的重點。東坡先生生前的手跡被洗劫焚毀，至今許多散失的文物已去向不明，東坡樓受到空前破壞。

這次親眼看到那些已空蕩蕩的文苑書櫃，便對過去口口聲聲標榜，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的黨棍惡吏窮兇極惡臉嘴，看得更清。

再行五裡，便是烏龍寺了，據說這是樂山地區最大的佛家寺廟，當我們向它走近，就被那些隱沒在密林之中的梵院寺廟，和遠遠傳來的香煙和肅穆氣氛所懾住。進入山門前的小道，進香的香客背著香袋錦囊，雙手就已經合十，精神漸入佛境，絡繹不絕進得山門，四大金剛威嚴的守護著山門口，再向裡是維陀護法。彌勒在大雄寶殿門口挺著大肚子，笑迎八方來客。

進入大雄殿，十八尊羅漢於過道兩側依次排列，其像貌迥異，佛經中對它們都有過詳細的解述，這些形狀怪異的尊者，維護著殿堂裡的莊嚴和清淨。千羅萬幃中，那大雄寶殿的最高位置上，至高無上的阿彌陀佛威嚴的高踞其上。

少年時代，中共教科書，將佛教同其他宗教，一道歸併於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將佛教徒，說成是一群靠鬼話來矇騙百姓的寄生階層。中共利用執政的權力，強迫僧侶還俗，將寺廟的田園宅地荒廢了，搗毀了。使那些

「泥菩薩」陷入了幾十年滅頂之災。

然而這樣做的後果又怎樣呢？共產黨的整個統治在無神論的天地裡，為所欲為，因果沒有輪回，善惡沒有報應，精神上失去約束的人，藉口掃除舊社會的污泥濁水，把人性說成是資產階級的，把道德說成是虛偽的。於是人類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宗教文化全被毀滅。人和人之間赤裸裸仇視外，便一無所有了！

而今人們才開始反思，開始頓悟，思想家們終於明白剝奪了別人，其實也就剝奪了自己。植根於人民之中的宗教信仰，實在是社會道德的一種補充。既不能破壞，也無法破壞。

廣大農民把這些年所受到的災難，歸之於得罪了天地眾神，於是在民間，那些為防止災禍的天地君親師牌位重新供奉了出來，最終還是召回了曾被社會擯棄的神。相反，共產黨的信仰危機卻出現了。儘管中共目前仍然想用霸道的的方法，讓人們接受他們的那一套，結果肯定適得其反。

我之所以篤信因果報應，根本上因為我是一個受壓迫的弱者，監獄中所受殘酷的壓迫啟迪了我，往往我用命中注註定來解釋所遭的惡果，更容易解釋我面臨的厄運。生活樹立起來的信仰是不能用唯物主義來替代的，中國大多數從毛澤東暴政下過來的人，大抵都會有這種切身的體驗。

此刻我被那高大阿彌陀佛的莊嚴所折服，從他那身後的靈光中受到啟迪，真誠地懺悔我一生中的罪過，心中雜念也收斂起來。

汽車到達峨眉山腳的報國寺已是中午時分，在那裡的餐館裡用過中午飯，從報國寺乘車抵達清音閣，已是下午五點鐘了，清音閣底穀的泉水清涼宜人。從清音閣沿著陡峭險峻的山路通向雲霧重重的金頂，一般年輕人只消一天時間。然而我卻要攜著老母親一步步艱辛地向上攀登，至少也要花三倍的時間。

我們決定歇腳，在這裡留宿一夜養足精力，準備第二天攀登。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同在這裡過夜的遊人一道，開始了第一天的登山旅程。在導遊的指點下，我們這一支向著白龍洞方向前進。山間小道走起來很崎嶇，但另有一種樂趣，每過一處的寺廟，不論大小，我都會虔誠的禮拜，讓繚繞的香煙把我包圍。

到達洗象池，金頂距我們已經不遠。天色已晚，住在洗象池的大客房裡，準備明天一早，登上峨眉山巔看難得一見的「日出」和「佛光」。

這夜正逢我四十五歲，三個人將我圍在客房中，大家祝我生日快樂。劉啟建還專門的買了一瓶精裝的文君酒，四個人都不喝酒，只是登山三天來大家都感到腰酸背疼，借酒驅散高山的涼氣和疲勞，每個人斟了半杯酒，酒一下肚，心裡熱辣辣的，似乎有了醉意，為了第二天登金頂，大家早早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為了趕看日出，我們在早上五點鐘便起身向峨眉山之巔進發，因為光線黯淡，走在山路上高一腳低一腳，我看到母親走路特別的艱難，問到她才告訴我她腳上打起了泡。

這麼長陡坡中，她能在我的攙扶下，一步步登上山來已不容易，此時一來怕天黑道路不平，在她精力不濟時跌倒，二來也趕個早，別因她步履艱難，延誤了觀日出的時間。就在洗象池外，我為她雇了一個專門背旅客的「背夫」，我仍怕背夫因天色未明出事，便緊緊跟在後面，叮囑小范和劉啟建儘快跟上。

六點半鐘，我們終於登上了天下名秀峨眉山之巔的「金頂」。

平目望去，一輪紅日在雲海中噴薄而出，整個山頭已被朝霞染紅，如蒸汽如棉花的白霧，已經退到腳下，將下面的人世與我們隔開。

金頂海拔3100公尺，西望天府平原，北瞻貢岷山脈，當紅日一出，頓時氣清雲朗，一目望去，窮極宇宙。只那白霧阻斷的千溝萬壑，好像仍不能看破。

忽而，一片白雲從南邊急速湧來，頓時四周茫茫四裏，咫尺之內朦朦朧朧。一會兒從北面掃過來一陣輕風，將白雲卷去，好像誰一聲號令，先前的白霧漸漸退去，再細看那兀立的群峰，青翠碧綠，一個個隱隱地站立在在溝壑深處。

當山腳下的霧漸漸退去，就留得幾朵游浮於山峰之間的彩雲，若那雲頭上站立的是仙人，告訴人們，今天群仙又要在這裡聚首，那朵朵白雲上下巔動像是神仙在磋商。快樂無過於那些無拘無束的神仙們，他們今天的聚會是巧合，還是預先有約？

此時我睡在寬闊的草坪上，一如睡在軟綿綿的雲端。好想縱身躍進那浩翰的雲海中，去洗洗這二十多年地獄留下的積垢，再學學那些快活自由的神仙，超脫自己，讓我的心不再積鬱和憂慮。

仰視蘭天，品味著無窮天籟的奧秘後，我俯身去撫摩那突兀而立的山崖，被那些附在懸崖壁上的山花吸引。紅的，白的，黃的，星星點點地分佈各處，一叢一叢到處都是。她們向朝聖者招手致意，在山壁上發出清脆的笑聲，平添著絕處的生機，令人收斂對絕壁的恐怖。

就在那靜得可怕，連山禽走獸都無法攀登的絕處，她們也會在那裡吟唱山歌。這些大山裡的天使，敢在懸岩絕壁上與萬神共進野餐，這是那些在溫室中芳香迷人的玫瑰，永遠不可及的！她們自由屹立在山崗上，留芳在天地中。

再往下滑移，我的目光便停留在那崎嶇小路上義務的佈施者，那是些為進山拜佛的人鋪路修橋佛家俗家弟子。他們在自己鋪路的兩端，擺著對求過者佈施的木匣，那上面寫清了鋪路化緣人的姓名。

我明白了那山間的小路，原出自他們的一鋪一墊，那上面留著他們的汗水和虔誠。看到他們從遠處背來的一石一土，我深深為他們的努力觸動：只有邁過艱難歷程的人，才更加珍惜平坦大道，他們除了用對佛的虔誠去感動那些同樣虔誠的佈施者，相互間全憑信仰的力量在溝通。

再看那一路上的朝香者，有瞎了眼的，有斷了腿的，有失去雙臂和已經耄耋的老人，結伴著趑趄在那險惡的山路上。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既是他們的信仰，又是他們對虛妄者的歸勸！他們之中必經歷過人生苦海，來領受佛的勸勉，求得一個善果。

至於那一路上花花綠綠的少男少女們，匆匆而過，是不會理解的。他們同我少年時代一樣，在沒有受過生活的煎熬時，是不會領悟佛所指點的迷津。

忽然一個背著遊人的背架，在那崎嶇小道上慢慢地蠕動，一位力夫，皮膚黑黝，滿身泥汗，雙顴突出，青筋暴突，汗水像雨注傾瀉著他的小腿，向上蹬的雙腳也不知在這懸岩山間打過多少顫，那背架上的遊人，那些走到這裡欲上不能的遊人，就靠著他的「鐵背」「銅腰」，得以飽覽金頂的風采，而一家人的生活便靠他這種賣命的下苦力掙來的錢。

我知道這裡沒有人比他更苦，需知他腳上的任何閃失，都會讓他滾下萬丈懸岩粉身碎骨，那背架上背的老人或殘廢倒不說了，竟然也有的打扇賣俏的公子哥兒和打扮妖豔的少婦，他們那配進入這靈山佛境？如果佛有靈氣，會怎樣的處置這種人間的不平？我不知道但我相信。

我們在金頂照像，遊覽，流連往返，直到下午四點鐘，一團白霧將它團團籠罩，看樣子像要下雨的樣子，我才扶著母親向山下回歸。我們從十八拐下行，天色將黑，我們無心償玩遍山的猴群，終於趕在天黑之前進入白龍洞。

第二天我們回到清音閣，從報國寺乘車回成都的時候，我們這次歷時八天的峨眉山之旅，便告完結。

八天留給我們的除了疲勞，便是心理上的寄託，我筆記本裡夾著的野山花，便是我最好的紀念。有時候，我真把自己也當成了在這險峻人世中的野山花，然而我心靈的透白還不能像野山花那樣的公開，我的片斷，我的回憶錄，便是我透明心靈的吶喊，但它們也只能掩藏著，否則我就連這一點空間也要失去。

逗留成都期間我想趁此再訪故友，一九七九年我回重慶後，一直陷於『落實政策』的奔波，有空把精力放到「片斷」的撰寫，竟沒同陳容康和張錫琨大哥保持經常聯繫。此時當我再尋西城大菜市，那兒正在拆遷，老陳的高棚不知搬到那裡去了。問到解放中路1268號，乾脆就沒找到這個地方。於是從此斷了同他們的聯繫。

我到成都前後四次，第二次是十六年前，即一九六六年春天，被鹽源農場的獄吏們「押著」來成都「參觀」，既要無端的殘害百姓，又要讓受害人唱頌歌，這便是近代專制主義的醜惡心理。那次成都展出的全國五十二面大寨紅旗巡迴展出的圖片，就是在花會期間在青羊宮裡展出的。

然而在這次參觀中我回答當局的是一篇：「從南滾龍溝這面紅旗看大寨精神」，令鹽源農場的管教當局瞠目結舌，我將「大寨精神」與「大躍進」聯繫起來，得出「勞命傷財」的結論。因為文章的全部依據均出自毛氏自己拿出來自吹的東西。

而今往事過去，故地重遊，當我尋找當年參觀大寨圖片的展廳，卻沒有找到。問到青羊宮裡的遊客他們都搖頭，中共已對這「大寨」絕口不提了！遺憾沒有清算，糊里糊塗地不了了之了！。

去杜甫草堂，這裡已經培修。當年詩人窮居惡臥的故居，記述著一個傲骨清風的偉大作家到了晚年拮据度日，終老他鄉的經過，不禁令後人為之傷懷。詩人當年的心懷，今人又有幾個具有這種情懷？後人將宋的陸遊和清的黃庭堅共祠一堂於此，號稱三聖堂，以表達後人對偉大宗師的緬懷和敬仰。

歷史對於那些敢於抗拒獨裁統治的作家，幾乎安排了同樣悲涼的一生。這使正直的作家難以保持文壇的神聖。隨時俗，無聊文人多的是，有的是統治者奸佞的吹鼓手，有的以迎合市俗們庸俗的口味。將一些污濁的垃圾充塞書刊，純粹不以觸動統治利益而苟活。

然而，歷史又將那些偉大的作家供奉在文壇正位上，使後人永遠紀念那些敢於秉筆直書的文學專門家。這證明人心追求光明，正義依然是社會的主流。

武後祠，我是第一次來拜謁，提到它，我總是同那篇偉大的唐詩聯想在一起：「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陌生生……」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一代奇才諸葛亮輔蜀漢後主，以三分天下平息大亂，得到一個休整社會的『三國』時期。

近代的一些政治家包括趙紫陽也曾在這裡抄錄下一些史家的名文匾錄，我想人心嚮往和平民主這種共同的追求一定會決定中國的未來。

從七月二十日，我和母親、劉啟建三個人，在菜元壩乘火車到成都，到八月十日回到重慶，整整二十天的成都、峨嵋眉之旅便結束了。

行程的回眸，所見一幕幕交織在我的心頭，錯綜複雜，尤其是一路上，到處都可以看到毛澤東時期破壞的痕跡，當年我們在監獄中備受獨裁統治的煎熬，而我的國家卻在暴政中被蹂躪，大陸至今仍那麼貧窮，不正是獨裁的傑作麼？

當火車載著我們四個人回到重慶帶著不同心情一齊回歸！我在想，什麼時候我會心情舒暢的再重遊峨嵋眉，看到她變得燦爛美麗？

母親仍暫住市工商聯的招待所，距火車站僅僅只有一裡之隔，我們決定暫時在母親的住處休息幾天。

她到重慶財經學校已有一年多了，靠劉昆水先生支持以及周圍那些與她有過相似遭遇的同事幫助，她開辦的幼兒師資班已經招了兩屆學員，這些人畢業後充任了工商聯在市內所辦的各地幼稚園的老師，受到好評，解決了當時奇缺幼兒師資。

由於母親心情比過去開朗得多，她的面容紅潤，身體健康得多了。她每每講到李重生夫婦對她的照應充滿了感激之情。她告訴我說，四個月前她得了一次急性腸炎，腹瀉不止，人也幾乎虛脫，全仗重生把她背上背下，送附近醫院搶救治療，才使危險過去，幾天就恢復了健康。

後來，由母親作媒，重生娶了媳婦。我們在工商聯短短暫停的幾天，就得到他們夫婦倆熱情的照應。母親每談到這段晚年的流浪生涯，她都顯出一種幸福感。可見在蔡家場的二十多年間，蔡家醫院的「造反派」對她的傷害有多深。

「四人幫」跨台，鄧小平粉墨登場，為清除毛澤東死黨的政治需要，借全國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對各民主黨派許以相互監督，共存共榮的諾言。



使已進入棺材的各民主黨派有了還魂的機會，保持這些黨派的名稱並在政府的席位上占著一個頭銜，例如各級政府機構中保持一個「付縣長」「付市長」的職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都給一個付職。

但這一打一拉，因為出手太重，實際上早使小夥計懷上了鬼胎。言行那敢違背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大哥？那曾在建立民主黨派初期有過的為民請命的陽剛之氣早以殆盡，實足變成了專制主義黑幕的遮羞布。

#### 第四節：第二次落實政策

像我這種既不沾親帶故，又沒有重禮相贈的書呆子，要想毛遂自薦正大光明講我的學歷和專長，那就准碰軟釘子，若靠我的騎術我就一輩子也找不到馬的，好在我心裡明白，我的調動除靠上級硬壓是沒有別法了。

一九四九年父親將我們全家寄住北碚後，我們全家就從此時開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地獄裡經歷了長長的煉獄，一九六二年外祖母在飢餓焦慮中去世，已戴著右派枷鎖的母親，在當局強迫下帶著十八歲的弟弟，悽悽惶惶從北碚街上「流放」到偏僻的蔡家場。

經歷了漫長的三十五年，直到1984年我們這個重新組成的家，在各方支持下才從蔡家場從回北碚。

##### （一）重回北碚

1984年七月我還守在應屆高中畢業生考試的考堂裡，從報上得知市里由重慶人事局牽頭，組織了一次規模空前的「人才交流會」，我決定去撞一撞。

正逢暑假，我便專程去了重慶大學，我因獲悉，當年劃我們為右派的朱批人，宋殿賓已「落實政策」官復原職。這位宋書記在文革時期，因妻子張大珍被劃地主份子，撤去衛校黨委書記一職，並交農村監督勞動。

中共重慶市委，責令他在愛人和黨籍間選擇，這位宋殿賓因不忍拋棄愛妻和兩個幼小的孩子，拒絕黨委離婚的「忠告」，因而被打成重大的第二號走資派，削去重大的所有職務，還將他貶到衛校去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

派給他的工作就是打掃廁所，從此整整十三年，在廁所邊將孩子拉扯大，自己也親自嘗到了共產黨整人運動的滋味，對當年無緣無故由他朱批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右派們，才產生惻隱之心。

當一九七八年母親找到重慶衛校，請他為我當年冤情作證時，他便寫了材料，使重大落實我的政策時，減少了不少麻煩。

一九八三年春天，母親在重慶財經學校工作僅一年半後，劉昆水創辦的財經學校因為經費上的困難，決定裁減最初設置的專業。

工商聯的頭頭，對母親長住招待所也表示了異議，說母親佔用的是工商聯用來招攬客商的經營性客房，從來沒有住過本單位的職工。劉昆水和母親商量結果，母親決定辭去財經學校的工作，於五月份重新回到蔡家場。

劉昆水為了表示他的歉意，專門用配給他的黑色伏爾加轎車，送母親回北碚，並親去北碚區委統戰部，請求他們考慮在北碚為母親安排一個工作和住所。

蔡家場本來就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鎮，八十年代初，在橫貫小鎮的馬路上只有幾架由農家裝的手扶式來回奔跑，充作小鎮的運輸車，雖然它那令人耳聾的巨響和濃濃的黑色廢氣令人煩躁燥，街上的居民也生活在廢氣排出的濁氣中，但居住在這裡的居民習以為常了，手扶式成了鎮上人唯一代步工具。

唯一溝通蔡家場和北碚的公共汽車已破舊不堪，雖說從蔡家場到北碚的車票僅僅只有一角二分錢，但窮苦的蔡家居民也要算著來，能搭上手扶式的就是再危險都要擠上車，他們把命看得很賤。

除此外便是北碚物資局的幾輛綠色解放牌，以及燈塔鄉的八四五廠過路的東風牌卡車，蔡家那十字馬路上很少看到小轎車之類的「洋車」。

當母親乘坐的轎車，從場口向蔡家醫院緩緩駛近時，蔡家街上所有的街民都投以好奇的目光，他們心底裡在嘀咕：不知道又是市里的那一個重要官員來視察了，萬萬沒想到車裡面坐的，竟是過去被醫院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方老太婆。

黑色轎車在醫院的大門口停下來，母親從車門裡走出來時，正好王明站在門口，他一直眯縫著眼睛注視著從場口向醫院緩緩開來的這輛轎車，心裡產生著各種猜想，卻完全沒有料到這是專門送母親回來的車。

車停穩後，從車門裡走下我的母親時，這位王書記用笑臉向母親迎了上去。一面喊坐在掛號室裡的小曹和藥房裡的小李，要兩個年輕人趕快去提從車上禦下來的兩包行李，醫院裡的護士都出來迎接，一時熱鬧得很。

我接到母親回到蔡家醫院的消息，從二十四中趕回醫院時，母親的房間裡聚著小陳、小周和王書記。王書記正在吹捧母親在落實政策以後，如何煥發出「革命的青春和活力」。

他當著母親的面說道：「自從你走了，我們才知道你起的作用，你移交的三個工作，掛號、出納和伙食採買，現在是交給三個年輕人在管，要他們任中兼一點工作都不幹，而且還幹不好，上個月出納就錯了三百元錢，這麼一對比，才顯示你老人家才是我們醫院的老黃牛了。」

兩個年輕人不高興的看了他一眼，顯出很不屑的樣子。他對母親另眼相看，是因劉昆水的關係，還是經過對比的確改變了他原來的偏見？但想起兩年前他在母親分房時的那付臉嘴，對比現在，使我產生一陣陣噁心。

據他本人介紹他的母親過去是要飯的，當孩子的他，常跟母親拿著打狗棒沿街行乞，看來他真的「根正苗紅」，是共產黨的真正依靠對象。可是為迎合我們，常把攻擊共產黨掛在口上。

不過我心裡倒是生了警惕，大陸人生活在這種人的管理之下，可要十分小心，切切不可隨便附會他，以免在莫名其妙時從遭「禍從口出」之難。

當時北碚區政府正在組織力量編寫北碚地方誌，為此專門組織了一個修史小組。從圖書館和文化館抽人收集材料，母親就被定為修史工作組成員，在編寫工作地騰出一間小屋供母親臨時居住。後來她又在衛生界朋友的幫助下，長期居住北碚，擺脫了蔡家醫院這個囚禁她二十多年的人間地獄。

騎馬找馬』是劉老教給我的方法，但要調出蔡家的路，還得自己去找，到北碚統戰部去了幾趟，我說我的母親既然已經到了北碚，那麼當初將我安置在蔡家的理由已不存在。統戰部的老吳卻說：「你看吧，在我們的管轄區域和許可權範圍之內，有那個現存的單位空著位子來安插你，你最好自己找單位吧！」

1981年，宋殿賓回到重慶大學「官復原職」，他的夫人也調到了重慶大學，只因我在二十四中，並不知道這個消息。直到我回到重慶大學，講明重慶市人才交流的幾個要求，請重大黨委為我進一步落實政策時，才找到宋殿賓。他當即叫我去找重大的校長張文澄。

同我們一起劃為右派份子的張文澄，原是西南政法學院的團委書記，一九七八年獲平反後，1981年接任重大黨委書記。按宋殿賓指出的路子我找到張文澄時，他正被任職為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並且正在辦移交手續。

張文澄熱情地接待了我，他一方面要我去找重大的第一付書記高某，對我重新落實政策，一方面打電話給市委宣傳部，由他們出面對我的工作重新安排，不過市委宣傳部說他們沒有辦法強行的安排我去那一家工廠，建議我自己就在北碚地區確定一家最滿意並願意接納我的單位，再由他們出面調動。

我本人是學機械的，能夠吸收我的對口廠，在北碚地區恐怕便是地處區中區的重慶農用汽車廠了。湊巧這家工廠的黨委書記彭季灰的愛人周生碧，正是當年母親工作的北碚托兒所的共青團支部書記，此人正是當年劃母親為右派的負責人。

後來的二十餘年間，除了我和我母親被劃為強迫勞動的「專政」對象，剩下一個七旬的外祖母和一個年僅十四歲的弟弟，都因黑五類，受盡生活折磨和精神迫害。

二十五年過去了，冥府帶走了我可憐的老外婆和稚氣的弟弟。

現在我的母親找到這位周生碧，請她出面向她的老公推薦接納我進入這家工廠時，在良心發現下，當即表示接受母親的委託。

就這樣，我在張文澄，宋殿賓的幫助下，重大校方重新做了對我個人的改正決定，除換掉了一九七九年發給我的肄業證，補發了重慶大學的正式畢業文憑，確定了以一九五八年開始計算我的工齡，還專門加了一級工資。

當我一手拿著張文澄給重慶市教育局長的信，在得到市教育局批示後，責成二十四中立即放人，又拿了市委宣傳部和重慶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批復，到重慶農用汽製造廠，換得了由該廠廠長親自簽署的調動令，我的調動就在短短一個月內辦妥！

## （二）搬離蔡家場

我很明白，對我個人的落實政策的進展之快，全因毛澤東淫政之下共產黨的分化，沒有對宋殿賓的十三年懲罰；沒有張文澄再次複職；沒有孫起孟和劉昆水這些從地獄裡活著出來的民主黨派人士相助；和周生碧的良心發現，我這麼一個無名小卒憑什麼說調動就調動了？我算「右派」中與命運抗爭的一個特例。

工廠的勞動人事部門雖有許多調進調出的事。但工廠管理者並沒有引進人才的熱情！自從政府提出人才交流以後，超編制的企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規矩：求調人首先要得到本單位頭頭的點頭。其依據除了行政的安排，便是廠長指令，根據從後門湧進來的親朋關係，掌權者進行著權力交易的平衡。

求調人若沒有很硬的『臂膀』，在調動時，必須準備給工廠人事部門送上一份滿意的禮物。一切擺平以後才能談調動！至於調進的人，是否合乎工廠發展的要求，那是只有傻瓜才會擺在第一位。

所以，沒有關係的人要調進一個企業，提著調令和檔案來人事科，科長會坐在太師椅上接過介紹信，連看都不看就塞進了抽屜，不屑的回答你：「等領導研究後，再通知你。」你若急著問：「要等多久？」那科長必會冷冷的答道：「辦事得有個過程，這工廠又不是為你辦的。」

當我提著檔案袋到重慶農用專汽製造廠到廠長辦公室報到時，接待我的黨委辦公室周主任，接過介紹信後，滿臉堆笑，熱情表示對我歡迎。他說：「新上任的廠長李友正缺得力的幫手，只是眼下工廠還相當困難，所以不能解決我的住房問題，請我暫時克服一下。只要工廠一有起色，什麼問題都好說。」

據說這位周主任原來是前任廠長李友的姐夫，李廠長的姐姐是中共北碚區委的組織部長。我一來就碰上了這種與地方親上加親的裙帶關係，知道這本是中共基層組織多年形成的關係網，同這些多年吃黨飯的人是沒有什麼共同語言的，以我為人耿直的秉性難於適應，所以還是對他們取回避為上策！

所以我從進廠的第一天開始，就像孫悟空撞進了玉皇大帝的蟠桃會一樣，應付著眼花繚亂的新環境，適應它，幹我自己想幹的事。

由於農用汽車廠沒有房子可分，搬家前我同劉啟建商量好，暫住在天生橋她的父親的舊房子裡。

我們的家便於1984年八月底搬離了蔡家場，經歷了整整二十五年，家破人亡後，只剩下母親和我，費盡周折，我們才從回北碚街上。

就在我們舉家遷到北碚不久，接到劉昆水先生寄來的信，這封信仍寄到二十四中，由那裡的老師轉給了我。在這封信裡再度重複我騎馬找馬的老聲長談。

母親在北碚區參加的編史工作已告一段落，又碰到了當年在北碚煉鐵廠一同接受監督勞動考查的患難之交，原衛生局的一位右派科長李秀貞在衛生局申辦了一個為病人就診的門診，取名縉雲諮詢門診。

母親在李秀貞的邀請下，參加了這個門診所的組建，並在正式掛牌營業時，擔任門診的掛號和財務工作。這個門診集中了北碚地區有相當名氣的老醫生，他們除了醫術，還保持著較良好的醫德，所以，求診者門庭若市。

## 第五節：盧文南

這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母親在下班回家的歸途中，與一個拖著板板車，穿著襤褸的中年人邂逅相遇，當那名漢子走到母親身邊，突然把板板車停了下來，並且呼喊「媽媽」時，她才認出對方來。

原來他是二十年前我弟弟的電力學校的同學，名叫盧文南。他的母親原是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的一名工作人員，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份子，與我的母親在北碚煉鐵廠一同接受「監督勞動」。一九六二年母親從煉鐵廠

調到蔡家醫院時，她仍留在北碚煉鐵廠。

盧文南與我的弟弟在電力學校畢業後，兩人同時下放蔡家農村，在同一個生產隊落戶，算得上黑崽患難之交，只是盧文南生性比弟弟更懦弱。當一九六七年弟弟貿然離開蔡家場時，盧文南卻因害怕沒有跟著去，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弟弟一去不返，盧文南隨即也離開了蔡家場，從此以後，兩個孩子便與我的母親失去了聯繫。

現在突然出現在媽媽面前的他，頂著一頂破草帽，遮著那張冷得鐵青的臉，瘦削的身子在寒風中瑟瑟作抖。認出他時母親幾乎驚叫了起來，蔡家一別已經整整十五年沒有看到這孩子了，而今見到他如此狼狽，不但十分可憐他，還勾起她對失蹤多年小兒子的思念。

弟弟失蹤當天，母親曾到他們住的那間小茅屋裡找到他，問起弟弟去向，盧文南根本不知道。而今站在面前的他像一個被人遺棄的乞丐兒，心中好不心酸，一面叫他把板板車停在路邊，牽著他的手問他媽媽現在那裡？

文南只是搖頭，好像有許多苦水堵在心裡不能吐出，母親牽的那手正在發抖。看看時間，已近六點，天正黑下來，便在附近麵館裡給他叫了兩碗雜醬麵面，一面仍不停地詢問他住在哪裡、母親的近況以及他現在如何謀生？

盧文南在那麵館的長板凳上坐定，兩眼直楞楞看那灰色的大街，那形態使母親想到魯迅筆下的閩土，向他提問，他依然一聲不吭。等到兩碗面端上小木桌，他並不謙讓，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

看他那餓極的樣子，母親心裡想著自己的兒子，說不定現在也像他一樣，潦倒地流落在不知哪個城市哪條街口？

第一碗面已經下肚，文南臉上也由青色泛出了一點紅暈，精神似乎也恢復了一些，才慢慢地講話：他的母親已於前年死於肺癌，當母親撇下兒子而去時，留給他的唯一遺產，便是幾十年來母子相依為命，所住文星灣半山坡又矮又潮的破瓦房。

破瓦房幾十年來沒有變化，那裡是北碚區的貧民窟。留給文南的兩間破瓦房還是解放前他父親購置的遺產，那時父親在國民政府裡當雇員。

「解放」以後，共產黨以他的父親歷史罪逮捕了他，那時文南僅只有八歲。後來母親好不容易通過民政部門，謀到了一個在西師圖書館擔任管理員的工作，勉強維持母子倆的生活。沒想到一九五七年他的母親被劃成了右派，從此更大的災難便降臨到他們娘倆頭上。

把兩碗面吃完，盧文南繼續講自己的遭遇：母親獲得西師平反後，並沒有回到原來的圖書館工作，說她已到了退休年齡，所以給她辦了退休手續，每個月發給她三十元的退休金，母子倆就靠這點退休金維持著活命。

盧文南多次去找電力學校和街道，要求給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但是他們說你是一個弱智，什麼都不能做。母親多方托人，始終求職無門。

後來媽媽單位工資改革了，物價也跟著飛漲，幾次退休人員增加的工資抵不上猛漲的物價。一九八二年基本生活物價漲了兩倍，而她的那點退休月工資卻仍只有五十多元，生活一天天更加貧困，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母親終於病倒，因缺錢上醫院，只找了小巷裡的遊醫抓了點草藥，聊以應付。

等到她大量咳血時，已經難以起床，醫生診斷說她得了肺癌。

母親眼看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為了給自己的孩子求一條生路，掙扎著從床上爬起來由兒子攙扶著到街道辦事處，請他們可憐他們母子兩的悲慘命運，無論如何在她死前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個職業，以求謀生，哪怕是掃大街，或拉板車當苦力，只要有口飯吃怎麼都行。

在那個年代裡，街道辦事處之類的中共下層機關，如果沒有特殊的人際關係，又無靠山可傍，就憑那一貧如洗的臉嘴，誰會伸出同情和援助之手？憨厚的盧文南依然眼巴巴守著家門口，望著過路行人發呆。

帶著垂危的病體，母親最後一次到區委統戰部去，請他們為孩子安排一個工作。

統戰部的官員說：「你現在提出來的，已超出了中央落實政策的範圍，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但看在你得了重病和你的兒子的具體困難，我們仍在考慮怎麼來解決，你還是回去等著，一面靜靜養病，一面等一段時間，今後還是由街道的辦事處來具體解決吧！」

於是把「球」重新踢回街道辦事處，這麼一踢，不但無助於文南困難的解決，還得罪了街道的頭頭。

等到盧文南再度找街道辦事處時，那街道辦事處的老頭昂著頭，鼻子裡哼著冷氣，冷笑道：「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耐，還想跑到上面去告狀，老實告訴你，萬丈高樓平地起，像象你這樣的問題，還得靠基層。」

按照下鄉知青返城的有關規定，當年他也該由街道或民政部門在城裡安排工作，也不知什麼原因，那時他就沒有搭上返城知青的車，從蔡家回來便是一個無業遊民，在貧民窟中，混到四十歲了，連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

打著光棍的盧文南，眼看母親病得奄奄一息，卻無錢無力將她送進醫院。最後幾天，守在西師的衛生所裡看著她閉上了眼睛。同他一起辦理喪事的是他住在合川縣的一個姑媽。

母親草草安葬後，按照國家統一規定，還有十個月的退休金作她的安埋費，他悄悄的把他母親的骨灰，安葬在松林坡的一棵大樹下，就守著那大樹，癡癡地過了三天三夜，他希望與死去的母親，這麼永遠相倚的陪伴著。

母親去世後，盧文南失去了生活來源。姑媽幫助他領出了所有的撫恤金，叫他去河邊的碼頭做點小生意，開始他早出晚歸，挑著蘿筐做點河邊菜販子打出來另賣的小菜生意，不料他因為人呆板，不善於觀察行情，小菜卻賣不出去爛掉了，把本也虧了，只好另覓生路。

看他形同乞丐的樣子，產生了惻隱之心的一位緊鄰老大爺，給他找了一架破舊的板板車。每天他便拖著車替附近的商店裡運點貨得一點報酬，過著飽一頓餓一頓的日子。每逢自己生活過不下去，幾頓沒有飯吃的時候，他都要跑到埋葬他母親的大松樹底下，默默在那裡哭泣。

他講到這裡，傷心地哭了起來，天已黑了，街上的路燈早亮了，看見他精神振作了一點，估計是兩碗麵面的效果，母親還要給他再下一碗時，他卻擺擺手！依然呆呆的坐在那長凳子上面，望著沉沉黑下來的天空發呆。

兩個母親遭遇如此酷似，成了她們結下不解之緣的原因。

如此又沈默了一段時間，母親關切問他今後有什麼打算？不料這一問卻猛扎紮了他那根埋得很深的神經，他忽的從木凳上站了起來，好像在用力掙脫鉗著他喉嚨的無形鐵鉗。眼睛裡閃出一股怒火，悶聲地喊道：「反正活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用我的一條命去換他們的兩條命，也賺個對本，值得了。」

聽得出這是鬱積在他內心醞釀了很久的打算，帶著以命抵命的決心，用砸碎這吃人世界的最後一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不過他要同歸於盡的是誰？是街道辦事處欺他太甚的「頭」，還是在他腦海裡無時不在浮動的魔鬼？然而他咬著牙再不吭聲了。

母親心裡明白，越是沈默，這孩子就越處在「風蕭蕭兮，易水寒」之中。在這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年代，就不知有多少被欺凌的弱者，積蓄著仇恨，隨時都會被引爆！！搶劫、殺人中有多少出自悲傷？社會沒有引起關注！是故意漠視這些現象，還是社會有意回避這些？

現在母親完全相信，這個小時候性格內向，從不多話的人，並不是一無感覺的癡呆。那心裡可是鬱積了隨時可能讓人粉身碎骨的一團復仇怒火。既毀滅自己，也消滅對方。

為了拯救這孩子，她想撲滅它。想到這個孩子的危險和可怕，連連叮囑他看在他母親在天之靈份上，千萬不可造次，一定冷靜處理，何況天無絕人之路，總有一天他會得到母親的保佑。！

臨分手時，母親打開皮包取出五十元錢塞進了他的衣袋，並且把我們住的地址抄給了他，關照他，今後如果遇到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就到天生橋來找我們，叮囑他堅強地活下去，看看這個世道還會變成什麼樣？

聽罷母親這一段敘述，感到對這個以強權欺凌弱者的社會，光同情盧文南的遭遇，是無濟於事的，今天連在報紙上公開為之呼喊不平的自由都沒有，這種不平何以消弭？

像街道辦事處的頭們的惡棍，誰又能動他一根毫毛？就是他們做出販毒，聚賭、窩匪藏盜，逼良為娼這些危害公眾的事尚且無可奈何，何況像盧文南這種只能歸錯於「落實政策」不力的悲劇！就更難解決了。

我自然想起了劉昆水老先生，一來，他本人有過類似的遭遇，對盧文南現在的處境不可能無動於衷；二來他身居重慶市的要職，作為「父母官」請他為一個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害者的遺孤作主，向民政部門反映，促使北碚地方官，給盧文南安排一個可以維持生活的工作，並不是一件難事。

雖然這兩三年來，我個人請他幫助，另找一個專業對口的工作，被他用「騎馬找馬」搪塞了毫無結果，但像盧文南這種需人救命的事，他該不至於拒絕。

出於這種估計，於是便提起筆來，為這件事專門的向他老人家寫了一封信。兩周以後，便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回信，信上說，他正在開政協會，工作極忙，所以只在會議的空歇時間抽出時間，回答我給他提出的問題。

我想他能認真閱讀我的信，並及時答覆，是中共各級組織不可能辦到的。

懷著一種敬意細細讀信，那信的前半段講共產黨的人事安排，奉行逐級管理的原則，接著便說他個人無權越級給任何人安排工作，甚至於連自己的子女，他也從來不為他們安排做什麼。

在申明他本人許可權後，點出像盧文南這樣的情況，只能由北碚的民政部門根據街道辦事處的具體條件來處理。

讀到這裡我心頭納悶起來，這劉昆水的清官原則本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我向他提出了一個有違中共政策的難題，要他破例『違背』中共「組織原則」，作一樁樁好事，竟關上了門，怪難為他的。

其實眼下無論那一級中共官員利用關係胡來的事還少麼？難道他沒有看清當前官場的腐敗？他可以不為自己的子女著想，那自有巴結他的下級妥善代勞，但對這個生存受到威脅的盧文南，他怎麼也不能推卸仗義執言的天責。！為了保持「清廉」和奉公守法，連道德正義良心全都可以一古腦兒丟掉麼？

需知盧文南的遭遇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啊。

他像站在貪官衙門口的一個乞丐，被擋了出來。即使那坐在官衙位置上的青天大老爺，過去也曾經是乞丐的同伍者。但中國人的品性就像洪承疇被努爾哈赤所俘，關在滿人的天牢裡說過的一句話：

「漢人在危難相共時是一條龍，而當共同的危難消失後，就是一盤散沙」。

想到這裡，心潮陣陣上湧，便提起筆給這位先生寫了回信，那信上除了替文南這位無辜的受害者再次吶喊，呼喚正義和良知，並痛斥北碚地方官吏的麻木不仁。聰明的劉老先生當然讀得出這辛辣的指責實際上包含了他自己。

尤其是信的結尾，還從當時正在流行的電影「七品芝麻官」中，錄下了其中一段老百姓通街吟唱的歌詞：「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作為晚輩，我絕無指責長輩的惡習，更何況一個已為中共入過另冊的人，我更要小心講話。

何況在舉目無親的重慶市，我們就這麼一位在我們身處逆境中，給我們多少幫助過的市一級政府官員，更不願隨意傷害了他。

然而，我還是這樣的把信封好！交到了信箱裡。這大概是二十年煉獄中，注入我秉性中那種橫眉冷對當權者的東西，使我失去了對自己的約束力。一筆瀉下，覺得自己心中被壓抑的折皺得到舒展，而不顧及後果了。

母親在得知這件事後，曾責怪過我：首先因為造成盧文南目前這種困境的畢竟與劉昆水毫無關係。！對罪魁禍首無可奈何，卻去責怪一個同情我們的人，畢竟是非顛倒了。

再說劉老先生是受孫起孟先生所托，看在師生之誼上，對母親給了力所能及的照應，這在當時社會風氣日益敗壞的情況下，已算是盡心盡力了。現在反倒為盧文南的事，被無端指責不如回家賣紅薯，是失禮了。

何況明知他雖掛著官牌，卻並無任何實權，對盧文南這樣涉及中共的敏感事件，更要看坐在「主席」位置上共產黨的臉色辦事，他的回信正反映了小夥計的軟弱，所以不該對這位善良老人橫如指責。

劉老先生從此以後就再沒有給我寫過回信，我們之間將近三年的通訊友誼，就這麼結束了，也許他是真正生氣了，也許他理解我的心情，不願與我一般見識，主動停止這種爭論。

我至今回想起來，給他的信中很尖刻的話，不過是把他當作一個長輩，當作執政黨的夥計來要求罷了。

過了幾天母親收到了他的回信，提到了我給他的信中指責當官不為民作主的話，忠告我吸取過去的教訓，不可以滿身長刺去恣意刺傷他人。也罷，話不投機三句多，想劉老作為長輩大可不必這麼小氣，過於拘謹的做人活得夠累。

我雖窮，住的是破瓦寒窯，天天奔波勞累。但卻不為五斗米折腰，見人矮一頭，能時時保住心中這塊自由的福田。而他當他的官，進出轎車，住別墅，但心裡未必舒坦。

後來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運中，集中表現了「小夥計」缺乏自信和自尊的難堪。當然，在這個時代，劉老絕對是一個好人，一個直不起腰板的民主人士。

至於盧文南，後來碰到了縉雲門診的那些老醫生們，當母親向李秀英等人介紹了他的遭遇，門診部便從門診收入中湊了點錢，盧文南就在大家的資助下做起了小小的百貨生意，在滿街琳瑯滿目的攤位上，佔據了一席之地，維持著自己的清貧生活。

## 第五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上集裡我已將「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大陸實施的真相象記錄下來，從中可以看到，勞改隊是一個法西斯集中營的遠東版。

史達林之所以在蘇聯推行「國家所有」，那是為了要建立一個與獨裁政權相適應的經濟基礎。毛澤東效仿蘇聯，在中國建立一個適應高度獨裁國家的經濟基礎，這便是中共國有制的由來。

同蘇聯一樣，毛施行「國有制」二十八年，不但無法超越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連本國老百姓的吃穿都解決不了，數千萬中國同胞為共產主義的試驗白白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生命，作為基礎的經濟，最終裁判了「公有制」的淘汰。

在這一集裡，我回顧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過程和結局。鄧部份順應客觀規律，捨棄「共產主義大鍋飯」，知道「白貓黑貓能逮耗子的就是好貓」。但是這一過程依然保存了「獨裁」衣鉢，它走向了另一極端---

本來，現在大陸社會中與公有制並存的民營企業，以其各方面的優越，令人信服證明，代表私有制的民營經濟優於獨裁專制的國有制。

但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將共產黨騎虎難下的「公有制」變成統治者的「私人佔有制」，這與自由競爭而發展起來的「私有制」，具有本質的區別。中共主張的『私有』，是竊取權力者少數人的私有，帶有對社會財富的掠奪性質。它恰恰加劇了社會的矛盾。

這樣來認識鄧氏的改革開放，才可從「中國特色」的現象中，透視這種新的奇形怪狀體制產生的尖銳矛盾，這是一種用「中國特色」包裝的統治集團佔有制。它與資本主義所奉行的自由經濟完全不同。

私有制的生命力發源於競爭，沒有競爭，私有制只能萎縮。事實告訴中國的權力握有者中國可以實現的進程應當是：先從取消專制制度開始，才有「改革開放」的實施，俄國已這樣做了。那麼中國的改革又怎樣呢？

下面我客觀地把這個轉型過程記載下來，並預測它的未來。讓我以親身經歷看看這個過程，看看它的後果吧。

### 第一節：進入工廠

在進入重慶農用汽車廠之前，除聽到這家工廠不景氣的傳聞，對那門上掛著的大牌，門衛森嚴的表像究竟是怎麼一個內幕，我一無所知。只因我當初要求調進這家工廠時，在統戰部幾次碰壁後對它產生了好奇。

第一次進這家工廠，原去勞動人事科報到的。當我走進那黃色的辦公大樓，找到勞人科，並從那位勞動人事科長手裡接過「履歷表」填寫時，正好碰到了一件奇怪的調動糾紛。

當事人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女工，正哭喪著臉糾纏著這位科長。這位年輕女士原是北碚區法院的民事庭庭長的侄女，她本在河對面玻璃器皿廠當一名玻璃製品的磨花工。因為家住北碚市中區，嫌每天趕輪渡上班太不方便，便扭著她的伯伯，要他在北碚市中區的工廠中為她安置一個工作。

農用汽車製造廠的好幾位職工是法院的家屬，這位庭長也不知從那裡打聽到，金工車間正準備向外招聘兩名萬能磨床的磨工。便私下打電話託托了當時任廠長辦公室副主任的老同學，

對方立即找人事科長商量，將兩個準備從外面調進的磨工名額讓了一個出來，私下商定「成交」後，就向她發了調令。

像這種法院利用國有企業安插私人子女的事，極為平常。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工人拿的是國家發的工資，調進人不過是在國家付的工資名額中多造一個，工資雖薄卻是鐵飯碗。由於交通便利，所以誰都削尖了頭往這裡鑽。

再說滿足法院提出的要求，還可以巴結政府的權力部門。因此調進來的人再沒用，工廠再人滿為患，依然很快可以成交。這種調動大家給取了個名，稱做：「走後門」，成交雙方叫：「關係戶」。

而我在勞人科偶然碰到這位女士，卻發生了一點小小曲折。當她被金工車間的李主任帶到萬能磨床上時，她終於說出她是磨玻璃的工人，從來沒有見過龐大的磨床。更不知道怎麼開動這個龐然大物，不知道怎麼來操作它。

李主任哭笑不得，只好將她退回給勞動人事科。然而一切調動手續已經辦完，生米煮成了熟飯，這位「關係戶」已成了農用汽車製造廠的正式職工。

那林主任只好再次出面與生產庫房商量，那兒可是一個容納閒人的最佳場所。不過生產庫的編制總共十二人，現在由於各種後門戶，容納了整整三十個人，主任說既然早就超編，再加一個也無妨。

大陸上的「走後門」配以各種形式的賄賂，成為這一時期國企的主要人事原則，也成為國企管理者貪污的來源。國有企業駁著人員雍腫的包袱，在商品經濟來潮之初便迅速『累垮』。重負荷成了國企倒閉的原因之一。

我填寫好履歷表交給這崔科長後，他通知我說：「黨委辦公室的周主任，請你去一趟。」並且將市人才交流辦公室的表交給我帶上，悄悄告訴我說，這周主任是新任廠長李友的姊姐夫，你的工作要由周主任安排。

第一次同周主任見面，他告訴我，李廠長為將我調入這家工廠，暑假中就教育局放人，連續跑了許多次。李廠長才上任，正缺得力助手，所以你進廠後希望能全力支持他。

聽這話，心想到了一個新環境，我的德性恐怕要改一改才能適應，可惜該怎麼改，我卻不知道。

按照周主任安排，第二天，我便被安排去總工程師辦公室上班。

從黨委辦公室出來，今天還有大半天，我可以仔細看看這個很難調進來的工廠，究竟如何的廬山真面目？

站在工廠大門口，我仔細辨認了工廠的位置，認出這兒正好是我初中一年級求學的實驗中學所在地，算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當年，實驗中學搬到毛背沱與兼善中學合併，改名為重慶第十三中學。

現在工廠大門還依稀看到當年實驗中學的舊貌，這幾年隨著城區改建，雲泉路和雲天路半圍了整個廠區。

廠房十分破舊！中心地帶的山包上立著一幢黃色大樓，大概是抗戰時留下的歷史遺物！黃色大樓下方整個廠房分佈在四周，全是泥夾牆結構，因長年雨水浸蝕變成危房，很像一些戴著灰色破舊帽的苦力，匍匐在四周。

廠房之間按照天然地形，彎彎曲曲寬窄不等的過道上，散亂的停放著仿蘇制吉斯卡車，有的車身已生滿了鏽，這是當年取名為北泉牌的農用汽車。



幾幢廠房黑漆的鐵門敞開著，從那黑漆鐵門走進去，黯淡的光線中機油和霉氣的氣味迎面撲來，令人感到窒息。

只有衝壓車間光線比較明亮，有幾台像樣的衝床和油壓機，其餘的車間，冷作、工具、金加工、裝配幾乎都是五十年代的舊設備，在黯淡的燈光下有氣無力的運轉著，斷斷續續發出尖銳的金屬切削聲。

走進一個車間，工人們躲在黑角落裡吹牛，打牌，只有車間辦公室和技術組的辦公室還亮著燈，我看了看手錶已十一點鐘，距下班還有一個小時。

走出車間，轉過廠區，沿過道朝工廠大門走出。

從圍牆外的馬路向市中區方向走，過了雲天路右轉，朝車站方向去便是雲泉路，圍牆外的房屋漸漸多起來，不過那些房屋破爛不堪，過去從這裡路過，並沒有留意。

今天帶著瞭解工廠的目的，我才仔細看清楚，那房屋像是當年抗戰難民築起來的貧民窯，有些牆體已經垮塌，房頂上鋪著破碎的石棉瓦。

想像得到，住在這裡的主人在風雨交加時，最提心吊膽的便是整個房子會在風雨中垮下來。好在這些鴿子棚背靠工廠的圍牆外，相互依靠著免得被平地的大風捲卷走。

走進一處門窗像樣的高棚前面，向一位正坐在門口的老太太詢問，她回答道：「這一片爛屋子都是農用汽車廠的職工宿舍。」

那周主任所說的許多人削尖了腦袋往裡鑽的工廠，職工們竟住在這些破窯子裡度日，一絲後悔的念頭拂過了我的腦海。

當初離開二十四中時，老師們都說我這下終於擺脫了二十四中那窮地方，調到這麼一個市屬單位，好比從糠兜跳進了米兜，現在看來這裡除了在地地理位置占著交通方便的光，少走些蔡家場的爛泥路外，並無其他優勢！

其實暴政之下焉有福地？！我現在暫住天生橋劉啟建父親的家裡，那住房也是危房。半邊的房樑已垮塌，地上常年潮濕，平時屋裡散發著霉氣，一到雨天，整個腳下就沒有一處是乾燥的，別說孩子，連我常住下去也會受不了。

我是階級鬥爭戰場上活出命來的難民，能尋個遮風避雨的地方就不錯了。

按照周主任的安排，第二天我便去總工程師辦公室上班，總工辦就在底樓，從正門走進過道的最盡頭，我被帶進那間排著六張辦公室的屋裡。這時因為沒到上班時間，辦公室裡面還沒有人。

五分鐘後，總工程師王重夾著一個皮包來了，他是王庸的五哥，又是重慶大學先我們三年畢業的校友。

在總工程師室丟下皮包後，他便來我們辦公室安排了我的座位，並帶我領了一套繪圖儀器。

當人到齊後，王重介紹了辦公室其他五個座位上的人。給我的任務是協助和統計全廠各車間的技術革新。

第一天上班，辦公室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看報紙，我卻忙碌著收拾那些剛領到的東西。打開抽屜，把領的那些資料和筆記本，繪圖儀器放進去，便打開資料看起來。

辦公室裡很安靜，除了翻動報紙的聲音，便是喝水聲，誰也沒有同我打招呼，使我感到十分陌生。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靠窗子坐在第一個座位上，年齡已五十歲多歲的女人，開始說話：「也不知道雲泉路那兩幢的房子方案出來了沒有？這一次大家要盯緊一點，不要讓總務科再像上次那樣塞了私貨……」她喃喃自言自語。

坐在她後面那個年齡與我差不多的，臉上長著絡腮鬍的男子接了嘴：「總務科上周就把這次分房的方案訂好的，只是那姓馮的還遲遲不與公佈，又不知他在搞什麼鬼！」

「明天就要公佈分房的第一榜名單了，我是盯著了，我幾輪都被擠掉了，就看這一次有沒有我的份了。」坐在最後面的那位頭髮花白的老頭說道，全辦公室看上去他的年齡最大。「如果我再分不到，那麼退休以前再也沒有我的份了。」原先辦公室的安靜頓時被熱烈的討論代替。

大家討論的就是我昨天所見雲泉路上兩幢新建的樓房，從大家的討論知道那兩幢房子只修了五層樓，一共才四十套。全廠一千多號人，盼了快兩年了，現在就眼巴巴盯著這四十套新住房，怎不緊張？如果按照工齡排隊，這辦公室所有的人恐怕都有份，就看誰手長、關係好了。

我聽了很久，已聽出他們談論的無非是：有分房資格的老職工雙眼緊盯著總務科，想方設法保住自己的資格不被意外的關係戶擠掉；沒有分房資格，便會利用有利的人際關係，千方百計地擠掉那些已排上號的老職工。

估計自己分新房無望的人，就把眼睛盯著那些將要騰出來的舊房上，以各種理由來調整自己原本太擠太潮濕，太惡劣的住房。

總之各自打著小算盤，至於為什麼今天大家都在住爛房子，怎麼才能讓大家都住好房子，卻無人提到。

想到這裡，我回過頭重新看了看辦公室的其他五名同事，論年紀除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一位女士還只有三十歲左右，其餘的人都是四十以上的人。而且能在這個辦公室裡工作的，大多都具有大學學歷，可是他們看問題的深度，對問題的態度一點都不比文盲大老粗的工人高。

且聽那在臨窗座位上，臉上長滿絡腮鬍的中年人提高了嗓門吼道：「老子工作二十多年了，這個工廠怕沒有幾個敢跟我比的，現在一家三輩六口人還擠在不到二十平方公尺的爛棚子裡，幾次分房，都被那殷白毛的關係戶占去了，這一回再分不到房，老子全家就搬到李友家裡去住。」

那最先引發討論的老大姐，也不甘示弱：「老娘到這廠來足足幹了十八個年頭了，如今娃兒都長大成人了，一家五口還擠在那牛毛氈破房子裡，前年分房，第一榜，第二榜都有我的名字，獨獨落實最後一榜時，我的名字卻被刷掉，這次再刷掉，我絕對要問個憑什麼？」

她的話音剛落，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年輕女士，喊道：「你們曉不曉得李友的那個小舅子馮西，這一回排的分房人員中就有他的名字。」這話像點了一把火似的，點燃了整個辦公室。

「怪不得李友叫馮西當分房領導小組的組長，他才來工廠幾年？他憑什麼上了榜？大家盯緊點，這一次如果他馮西分到房子，我們到李友家去鬧。」絡腮鬍吼道，然而那老大姐朝絡腮胡壓低嗓門說道：「輕聲點，隔牆有耳。」

她指了指對面的那間曬圖室，然後轉過身朝那年輕女士問道：「劉茜。你這消息可靠不可靠？」那年輕女士被這麼一追問心裡老大不高興，悶聲回答道：「你不信等後天張了榜就明白了。」

絡腮鬍卻並不理會老大姐的提醒，站起身憤憤的吼道：「真他媽缺德，這麼大的工廠，一千多職工一大半就住在爛棚子裡，苦苦等了許多年，眼睜睜地看到這兩幢新房子，又只有四十多套，李友那傢伙，還想拿去照顧他的小舅子。」

說到這裡，坐在後面的兩位，嘟囔著說：「這個廠啊，連當一個班組長都會利用手裡頭的那點「權」，往私人腰包撈，李友當廠長了，正該他撈的時候！」

正在這個時候門口閃過一個人影，那老大姐咳嗽一聲，辦公室剛才熱烈的討論便突然的軋板。果然門口走進一個大約二十來歲的年輕姑娘，她便是對面曬圖室的描圖員，走進來問道：「你們有誰有圖或資料要描，要抄的？」沒有人理會她，於是她便走出門去。

我後面的那位告訴我：「這就是李友的侄女，安在總工辦專門當耳目的。」！

這李友仍是我的初中同窗，大學以後又走著很順的路，遭遇與我大不相同。三十年後，又在這童年相聚的地方再次重逢，今天怎麼才一上臺，便陷入了「後門」的各種是非中，成了眾矢之的？

我既進了這家工廠，也希望工廠興旺，真如大家所說這種狀態，別說等三年五載，就恐怕一輩子也別想「天下寒士皆歡顏了。」

便想把聽到和看到的與他本人交換看法，讓他明白面臨的諸多不利，希望他能趕緊調整自己的做法和作風，把工廠組織得像樣一點，迅速改變目前這種一盤散沙狀況。

李友住在雲泉路上一個三合院裡，那院裡一共兩幢五層樓房，每一套住宅都有成套的寢室和客廳廁所，算是當時這家工廠最好的住宅。

主意打定後，便在一個中午，在街上吃了一碗小麵面，看看手錶距下午上班的時間還足有兩小時，便向三合院走去。

走進三合院的門口，問清他住在進門左手那幢樓的四樓上面，找到他的住所，敲門卻一直沒人應。我懷疑他不是在家，後悔當初來時該在辦公室通知一下他本人，也不至於空跑一趟。

緩緩地走下樓來，在二樓樓梯口碰到一位中年職工，向他詢問李友下班後回家沒有？對方答道李友是否回家他沒看見，但肯定他一家人都在，上午看見他的母親上樓，剛才他的大妹還來過。

於是我又折轉身重新去敲那閉著的門，仍沒有動靜，我又繼續敲下去，反覆三五次，那門手終於搖動了，門輕輕的開了一條不到一公分的細縫。

「你找誰？」那聲音是從那門縫中擠出來的，聽去是一個中年婦女的聲音。「我找李廠長，我是新來的，是李友的老同學，」我回答道。

心中已十分警扭，怎麼明明屋裡有人，敲了這麼久的門才來答應？這種無禮的「神秘」使我頗有看法。門裡面有了響聲，好像是悄悄的對話，又過了一分鐘那門才慢慢打開了。「請進吧」，黑屋裡傳出的仍然是那女人的聲音。

我朝門洞裡望去，黑黑的什麼也看不清楚，我不安的剛舉步，「噢，請換拖鞋」那女人在洞裡發令道，我接過了遞過來的拖鞋換上，跨進了門，門重新在我的身後被關上。隨即，「啪」的一聲電燈打開了。

一間略微講究的客廳呈現在我眼前，抬頭望去，那兩邊的窗戶被厚厚的窗簾遮蓋得嚴嚴實實，心中正思考這位老同學，為何在大白天把自己關在寓所裡？

客廳裡正對大門的長沙發上坐著三個人，一位頭髮已經全白的老太太，緊靠著她身邊坐著一個約十五歲的男孩，旁邊還坐著一個大約三十多歲的中年人，從年齡上判斷，眼前四個人沒有李友。

剛才開門發話的女人戴著金絲眼鏡，四十歲上下。此時，她很有禮貌的指著右側一個單人沙發說了聲「請坐」。

沒見李友，我心裡又生了疑惑，難道這位老同學今天中午沒回家？我見過不同層次的人，以這種神秘方式接待客人的，好像在那篇偵探小說裡有過描述，雖然很尷尬，卻又充滿好奇。

於是我一面坐下，一面再次自我介紹道：「是這樣的，我是剛剛從蔡家場一所中學調來的，想找李廠長隨便聊聊，他在家嗎？」

話音剛落，只見左側的寢室門簾動了一下，一個戴著黑邊寬鏡框眼鏡的中年男子，閃身從裡面走了出來，向我伸手，握手致歉，那面部卻是冷冷的，缺乏熱情，也許因為我是空著手來的，有違市俗規矩。

我從沙發上站起身來同他握手，他一面示意我坐下交談，一面解釋道：「真對不起，不知道是你來了，所以遲遲沒有開門，你不知道這家工廠有多煩人，這幾天就為了兩幢剛剛修好的職工宿舍分配給大家，全廠鬧得烏煙瘴氣，這幾天不管中午休息，晚上睡覺，只要我在家就有人來找，全家雞犬不寧。」

我打量眼前這位西裝革履的「紳士」，人變到這種程度似乎有些可怕，本屬於人性本能的東西，不知為何丟失了。他邊說，邊從茶几上的水果盤裡取出一個梨子遞在我的手上，繼續解釋道，「我被纏得沒法，只好將妹妹請來，對付這些成天纏我的人，凡在休息時間來找我的，一律說我不在家。」

他向方才放我進來的那位女士點了點頭，算是自我介紹了。隨即他指著坐在沙發上的老太婆和中年男子介紹說，這是他的母親和小舅子。

我朝那中年人看了一眼，猜想在辦公室議論的馮西大概就是他了，接著主人又詢問道：「聽舅舅說，你安排在總工辦，手續辦完了嗎？」我遲頓了一分鐘，剛才我進門前，所存下的映射還在回映，一時腦子裡還在那黑洞的房門口徘徊。

更主要是，兒時的同學相隔這麼久，不管現在的身分如何，同學之誼總該放在相見的第一位，因為童年的情誼最能喚起激情的。三十年相別，初次相逢且不說多麼驚喜，也不會板著面孔，擺出上級對下級的那付臭架子來。

心裡面的這點隔閡，已將我來之前準備好的話吞了回去，一面口中應付著他說道：「噢！手續已辦完了，並且上了兩天班了。」

「有住的地方嗎？我們工廠目前最緊張的恐怕就是住房了。」

「暫時只好在天生橋的老丈人家擠著住了。」

話說到這裡，便覺得再也沒有什麼好說似的，很為今天空手而來，感尷尬，這些年中國人到別人家裡是不興空著手的，更何況是剛進廠的人到廠長這裡來，本來抱著看見老同學既聊家常，再將兩天來所見所聞婉轉講出來，結果見面竟弄得這麼僵。

看到對方大概因為心緒煩躁燥，再去說些他所不願聽的話，弄得對方反而不高興，而適得其反。

那沙發上坐著的人盯著我，更感到渾身不自在，如此尷尬了幾分鐘，我便起身告辭，他也沒有任何挽留的話，站起身來，關照道：

「老同學了，今後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有什麼情況我們常常通氣，你個人有什麼要求也儘管直說，凡我能辦的，我一定盡力去辦。」

客套話一邊說，一邊去開房門，最後叮囑我說：「以後你如果要來，在預先沒有通知我時，就要按約定的暗號敲門，暗號是這樣的：\* \* \* 我們就知道是自己人來了。記住了吧。」

我看著他那寬大的眼鏡框裡透出一種令人猜不透的眼光，不自然的點了點頭，便出得門外，穿上自己的鞋趕緊離開……

剛走完那樓梯，見兩個氣衝衝的中年人向那扇已緊閉的門走去，然後使勁地敲那房門，可那門靜悄悄地的一動也沒動，直到來人沒趣的走開。

我下了樓梯，一邊走，一邊還在回味剛才所見到的廠長，感到今天實在不該空手到來，自覺唐突，對這位千餘職工的頭，怪僻的神秘頗感不安，預感到今後，怕難以同他相處，心中未免泛起了一陣失望。

我們一家從蔡家場遷居北碚以後，劉啟建還暫留在衛東中學，我和母親以及兩歲的兒子，暫住岳父的私房中，我的母親和老岳父都已是年過七旬的人，母親又在縉雲諮詢門診上班早出晚歸，不到兩歲的兒子只好托鄰居劉大媽帶。

可是不久，劉大媽的外孫出世，本想請母親出面送去北碚機關托兒所全托，但看看不到兩歲的孩子就離開父母單獨生活，於心不忍。再說，托兒所也不可能在學期末了中途收插班生。

經過與本廠托兒所商量，暫時把兒子送到那裡去上日托班，從那時候起，我每天都五點半摸黑起床，在街上打回牛奶煮好後，再叫醒兒子餵了奶，便急匆匆地把他馱在肩上去上班。

從天生橋住地到工廠相距兩公里，而且通公共汽車，但是上下班那趁車的擁擠實在駭人，公共汽車一來，等在站上的乘客，並不排隊，而是一擁而上爭著搶座位，擠上車以後，坐著的都是精強力壯的年輕人，別說我這種抱著孩子的人，就是單身年齡偏大的人，也常常在上車被擁擠人群推倒跌傷。

同時趁著擠車的混亂，扒手十分猖獗，像我這種經歷二十年監獄見過許多竊賊的人，也會在擠公共汽車時，遭到洗劫。

第一次從蔡家到北碚來，身上帶的三十元錢被扒一空，還是向駕駛員說了許多好話，才免交了車費。後來我吸取了教訓，上車時只帶著一元錢的車費，但即使只揣了一元錢都會被扒去。

偷扒成風，有兩個原因，一是老百姓太窮，無業遊民生活無著。二是文革遺風，道德淪喪，搶劫殺人已成普通的事。「打砸搶」既成為執政者認可的「好得很」的革命行動，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加以提倡，文革晚期刑事犯罪，便成了社會上令百姓心寒的公害。

中國老百姓長期生活在亂世，對文革業以形成的社會陋習已經習慣，加上處於弱勢狀態，事不關己別自找麻煩，是老百姓最常用的明哲保身態度，即使對眾目睽睽下的行兇搶掠也視而不見。

擠公共汽車，既有受傷和被扒兩大危險，加上住地到工廠不過兩裡地，所以我不再去湊那坐車的熱鬧。

每天一清早讓兒子喝過了牛奶，自己一邊啃饅頭，挾著帆布的工作包，馭著兒子，冒著清晨的寒霧，匆匆地走上公路，趕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工廠的托兒所，再匆匆趕往黃色大樓。

時值初冬，每天早上這一趟就得弄我一身熱汗。好在我勞動慣了，權作早上鍛鍊身體，開始時還覺得太緊張，過了一段時間漸漸形成習慣也就無所謂了。

到了下午五點半鐘下班，我又到托兒所接出孩子，依然地把他馭在肩上，當然回家就沒有上班那麼緊張，抓著兒子的小手，慢悠悠的往回走，一邊還問他今天阿姨教了他那些兒歌，跳了什麼舞？搬著指頭數數能數到幾？有時還教他背唐詩，在我的肩上響起，「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那日子雖很累，但與天真可愛的孩子朝夕相伴，換來的天倫之樂讓我忘掉一切。有一次托兒所流行腮腺炎，孩子被傳染了，喉嚨和臉腫得胖官似的，晚上還發燒，整夜啼哭，我就把他抱在懷裡輕輕地哄他，給他講故事，唱兒歌直到睡著。

那一周我幾乎整夜沒睡覺，我可是快五十的人了，硬撐著，終於自己也得了病，咳嗽不止。

但我想在鹽源時，得了病還要被抽打趕上山去，便無所謂了。依然一早起床生爐子打牛奶，然後馭著孩子，冒著寒霧，急急的往工廠托兒所趕。

有時路上碰到同廠的職工，逗著我馭在肩上的兒子，有意無意地向我發問，「老孔！這是你的孫子吧。」其實兒子也好，孫子也罷，這是命中注定的，也是中共給我造成的，既是命中帶來，我都認。

## 第二節：鬧嚷嚷的達標

1984年，重慶農用汽車廠正處在發財的時候。不過在那汽車特別缺的年代，只要有生產許可證，裝上四個輪子，一個發動機，再裝上一個車身，再整腳的汽車都能賣錢賺錢的。

剛從飢餓中活出來的農民，從三自一包的土地上收穫了糧食，基本上解決吃的問題以後，便把眼光轉向城市裡掙錢的「付業」。跨出家門的農民盯上了在馬路上來回奔跑的汽車，十分羨慕坐在駕駛室把鼻子翹上了天的司機。

擠在手扶拖拉機上冒著翻車危險的農民，夢想自己有一輛普通卡車跑運輸，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擠進中國第一代的萬元戶。

然而要走這條致富的路，可不比養雞養鴨投入飼料的小本買賣容易，他們手頭至少得有幾萬元買車的錢，這對剛剛吃飽飯的農民，好似海市蜃樓。

正好就在這一年的十月，國家銀行向個體農戶發放了低息貸款，凡持有地方政府的證明，所有的農戶都可以貸到他們所需的錢，那些做著「運輸」發財夢的農民，終於得到了一個實現夢想的機會。

排著長隊在國家銀行貸到款的農民，匆匆背著錢袋，擠到有卡車出售的工廠或商場，農用汽車廠平時十分冷清的銷售部窗口下，很快排起了長長佇列，過去很少人問津的農用車，一時變成了緊俏貨，車庫裡停放的車早已售完，那停放在車間過道上，遍體鏽蝕的將報廢的車被爭搶著。

有一天，我見一個背著錢包的農民，正將一個上了車正在發動的人從車上拉下來，並大聲喊道：「這車我已交了預付款，是我要的。」那被拉下的人跳下車後，氣勢洶洶向對方吼道：「我剛才交了錢，是這位大哥叫我提這輛車，你憑什麼攔我？」他用手指著不遠處站著的發車員。兩個人互不相讓，抓扯著，像公雞打鬥似的直著脖子。

這時那發車員走了過來說道：「我可得給你們說清楚，誰要我不管，這車交給你們發得動，開得走，成色雖然舊了點，可是你們自己爭著要的，今後出了問題別找岔子，說什麼質量不好要退車的話，我一概不認！」

那已拿到車鑰匙的農民，連忙從他那剛才裝錢的帆布包裡取出一包精裝的「大前門」來，向發車員遞過去：「大哥，你說那兒的話，這車我是定了，現錢現付，整整六萬元，你是開了票的，現在冒出這個人來，你給評理。」

發車員接過香煙，對著那搶車的農民吼道：「誰收你的預付款，我可沒聽說，你還是乖乖的去排隊吧。」發車員的裁判，看來是那包大前門的作用。

「不，大哥我上個星期就來了，就怕到款提不到車，專門找段科長預約好的，就是這台車，你不信段科長還在辦公室可以當面對質。」搶車的農民摸出了打火機，打起了火，向那嘴上刁著大前門的人遞過去，還想竭力的挽回敗局。

我環視了一下周圍過道上平時排列著的車已經騰空，地面上留下了幾灘機油和從車身上剝落下來的鐵鏽，再看看這台兩人爭搶的車，蘭色的漆已經發白，底盤上的黑漆已經鏽蝕，少說也是在露天存放了一年的。這樣的車開上路，沒有人能保證它不拋錨，再碰上這些初學駕駛的黃司機，今後難保不會扯皮。

「算了吧，這車已是人家的了，你還是另外再賣一台吧，段科長既與你有約在前，他一定會安排的，說不定你買的比這台車好得多。」中間人最後作了裁定，搶車的農民只好提著脹鼓鼓的錢包，向著銷售科辦公室走去。

看來農民搶購卡車的熱浪正在這家工廠盤旋，隨著這股搶購風，原來只值五萬元的農用車，一路價格節節攀升。僅銷售科公開亮出的牌價，以增收購置費，手續費，付加費等名目，兩個月就上漲到七萬一台。

有的農民剛剛才從庫房接過手的車，便會有人以高出買車人兩千元的買價，從他的手中把車接過去。有人盯上了這汽車轉手買賣的生意，一輛車轉手之間便可以賺到兩三千元。這年代，以「萬元」作致富的標準，轉手之間不費一點氣力便能成萬元戶，可謂小爆發戶！

李友可是交了好運氣，汽車的緊缺，為汽車製造廠創造了比其他機械加工廠優越得多的條件，在他上任時碰到了這機會，如果指揮和組織生產不失誤，這家工廠可以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時間改變虧損局面，由一個職工住爛窩棚的窮廠變成名符其實，人人羨慕的富廠，可李友在想什麼呢？

他首先對本廠生產的汽車頒發「汽車供應券」，這本來就是從共和國的票證學來的，對供不應求的產品發供應券是大陸的常規。

然後在廠長常務會議上作出決定，以對外聯繫業務的需要為名，為他和負責銷售工作的付廠長每人提供了幾張汽車供應券。

這個決定立刻引起了其他付廠長的反對，「狀」告到了新上任的黨委書記那裡，為了擺平這件事，李友決定給每個廠級幹部也發幾張汽車券。

廠長們暫時攔平了，卻將剛剛卸任不久的廠長殷某的紅眼病引發了，於是他一面暗示李友，要求重新『分贓』，一面指示他的兒子殷老大，到每個廠長那裡，私下以每張附加價格收買這些汽車券。

在殷老大軟硬兼施之下，給廠長髮的汽車券被他收買了一大半。膽大包天的殷大公子，將這些收來的汽車券加價，在離廠門不到五十公尺的地方，出賣給那些排在佇列後面，又急於求購的農民。

一張汽車券，在殷老大轉手之間，便憑空賺了幾千元。一個倒賣汽車券的黑市交易市場，就這樣在工廠大門的側面公開的營業了。

這段時間，中國已形成了專門從事倒賣為業的特權階層，並且還形成了一個以這種官方為背景的倒賣市場。掌握了物資的特權階層使倒賣合法化。老百姓給這種一經轉手，就得到巨額利潤的「爺」，專門起名為「倒爺」。

經這些倒爺之手，控制著剛剛起步的市場經濟，控制著國計民生。

開始，倒爺成立公司，經政府批准正式做起了生意，凡百姓緊缺的日用品，大米、食油，甚至肥皂火柴，後來發展到成噸的鋼材，汽車、彩電，那生意越做越大，公司也越來越大。這一切只需要一個先決條：「批條」。

「批條」只能由各級官吏開，大倒爺靠大官得到大買賣批條，小倒爺靠芝麻官得到小買賣批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靠了這種不受大眾監督的政體，成了貪污的溫床，「倒爺」們的樂園！！

這一時期，對於汽車彩電等等國內緊俏物資的倒賣，已成了「讓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原始積累。像殷公子做點北泉汽車票的小買賣，確是小巫見大巫，消息證明，到了1985年已有軍隊替走私貨護航保駕，保駕的走私貨已由百貨發展到槍械、毒品且發展趨勢驚人。

面對十分嚴重的投機，貪污，腐化墮落，中共各級政府不時抓幾個替罪羊，在向全國的小倒爺們打招呼的「宣判」大會上，真正的大倒爺便是大會的主持人。他們依然架子實足的在電視節目上，振振有辭的作著振興中華，維護社會穩定的報告，摘幾頂奴才的花翎頂戴給百姓做做樣子。

在這樣的大好時機下，老同學召開了廠長會議，我們辦公室的王主任開會回來傳達說，企業要立即進入三級「達標」驗收，現在全廠人員必須緊急動員起來，全力投入這個中心工作。從那時起工廠的廣播裡天天宣傳這個中心工作。

所謂「達標」是指工廠在管理水平，生產能力，職工素質，利潤指標達到國家對企業三級的要求。

達了標的企業在國家貸款，更新設備，職工宿舍申報和增加工資，獎金發放上有諸多好處。而本廠這種萎靡不振，工人們幹活磨洋工；辦公室裡看報紙，喝茶和吹龍門陣，都必須在達標運動中統統克服。

在獎金的刺激下，在一再講明三級「達標」關係大家切身利益的鼓動下，一場我從未見識的「運動」，便在工廠沸沸騰騰開展起來。

總工辦在這次「達標」運動中是全廠核心組織之一，大家忙碌的搬出過去制定的工廠管理條例，在市機械局派出的臨時工作小組指導下，按當時市機械局認可的江北機械廠的管理「本本」，進行「整改」：抄寫他們的工廠方針，從管理部門的設置以及職能的確定，到各種原始記錄的存單和報表，無不連夜連晚的進行騰寫，印製。

最困難的是，必須趕緊補上從來沒有做過的原始記錄和報表，例如，設備利用率，原材料消耗率，工時利用率，以及成本核算的原始資料原來是根本沒有的。我們的任務是要讓驗收工作組在驗收時，可以根據這些「原始記錄」，來核實工廠是盈利還是虧損。

根據原材料和配件的質量檔和製造過程的現場記錄，檢驗報告來證實生產出來的都是名符其實的合格品。在幾天內憑空仿造江北機械廠的蘭本，偽造記錄和單據，便成了我們的中心工作。

這本是中執政的法寶，毛澤東就是用欺騙和偽造愚弄百姓整整二十八年。

鄧小平講「實事求是」是講他繼任的是一個爛攤子，用一窮二白，以否定毛澤東的形勢大好。但是為了愚弄民眾，這欺騙作假的傳家寶卻一直沒有丟掉。政府部門如此對付國際輿論和老百姓，企事業單位如此來應付政府，相沿成習，不用怕「一經查出，國法不容」。

只是所有的記錄，單據法票，檔要前後一致，有名有據，這編假偽造的工作量就不小了，為了保證在規定的「驗收」時間內按時拿出來，廠長辦公會議作了硬性規定，凡在規定時間內拿不出這些「假」證據的，一律扣

除獎金。

於是，所有的職能部門從經營辦公室，到車間負責統計的人員，動用了所有的人手，加班加點趕制這些「驗收」依據。這段時間，辦公室裡平時喝茶吹牛的現象收斂了，連工會，黨委辦公室，這些平時閒得無聊的部門，也被組織起來成為「督戰隊」，不分白天黑夜參加了這場「戰鬥」。

整整忙碌二十多天，各辦公室常常終夜燈火通明，一般的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二點，這可苦了我這個既當爹又當媽，又工作的三位一體的人，除了白天加快了接送孩子的腳步，晚上加班時，我只有臨時的把孩子托咐給隔壁的劉大媽。好心的劉大媽也樂意幫這個忙，靠了他才解了我二十多天的加班之憂。

正當全廠準備迎接達標的驗收準備工作正酣之際。有一天晚上，大約已是一點鐘了，突然從總務科傳來了一陣嘈雜的人聲，聽去像有人在打架，又像有人偷東西被人抓獲。

不到半小時，一段頭號新聞便在黃色大樓裡傳開了。下去的人在總務科的辦公室門口看見，三個老工人正在抓打著小舅子，有人在廚房裡找到了一根繩子，準備將他就地捆紮起來。而辦公室的燈光下面，站著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看熱鬧的年輕人，一眼就認出了那分明是財務科的核算員。

一個小時後，值班的紀委書記，叫開了三合院李友的宅門，將這個醜聞告訴了他，並且講黃色大樓已因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

尤其是總工辦，要求當場將二人扭送到派出所。李友不得不立即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將舅子撤職，並將他開除工職留廠查看，至於那女人只能嚴辦了。

第二天下午，全廠職工大會在農汽廠後院大壩召開，老同學在會上痛罵小舅子在全廠驗收定級的關鍵時刻，做出這等破壞驗收工作的蠢事，並將對二人處理決定，當眾宣佈。第二天以廠長辦公室名義，向各職能部門和車間發出印刷好的處理決定，以示他秉公執法的決心。

正愁悶之際，機械局來了電話，通知他，工廠驗收工作組，決定在國慶日後，進廠驗收。

「國慶」節剛過，廠辦工作人員身著清一色筆挺的西服，站在工廠的大門邊，振耳的鞭炮聲，迎接著幾輛從雲泉路上徐徐開來的轎車，大門左側立著一塊足有兩公尺高的巨幅標語上寫道：「熱烈歡迎上級領導同志光臨我廠指導工作」。

正對大門的黃色大樓房簷下掛著二十多米長的紅幅，上面寫著：「全廠職工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和飽滿熱情，迎接我廠達標驗收的順利完成。」

銷售公司的門口仍排著長隊，但已經增設了幾間接待室，買車的用戶可以在那裡休息洽談價格，並簽訂合同，辦理提車手續。工廠門前的那個「黑市」被廠的保衛臨時驅散，不知到那裡去「暗箱」操作了。

黃色大樓已打掃乾淨，粉刷一新。會議室重新換上了新的辦公用具，各車間的泥牆上都被「整容」，用石灰水重新粉刷，雪白的牆壁上貼著紅紅綠綠的標語。所有的辦公室都把各自的職能條規，框在鏡框中掛上了牆。

所有的車間大門、過道、辦公室打掃得乾乾淨淨，並在牆上和剛剛添置的玻璃燈箱裡，貼上各種工種的操作規程，勞動紀律和安全條例。

三級企業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驗收的評分怎麼打？怎樣演完這場驗收戲？這對於剛剛進廠的我全都一無所知，而且我敢說憑我的直覺，就是這家工廠的大半老職工也絕對弄不明白。

大家擔心塞給驗收組的那些趕製和偽造出來的「資料」，會不會被明眼人識破？使二十多天來的辛勞功虧一簣？

大家心裡明白，工廠依然是一個月前的那個設備陳舊，管理渙散，編制超員，工人消沉，產品低劣的老樣子。只是老叫化子臨時的換上了一套新裝而已，它的本體無論如何都無法達到「三級」所規定的那些標準。

工廠所以出現短期的興旺，純粹是國家向農民發放貸款促成的，與報表上、資料上顯示的資料、記錄風馬牛不相及。



至於驗收工作組嘛，都是些經過局裡挑選的處理「假材料」的好手，他們對企業上演這種假戲非常熟悉。何況那些手冊，報表、擺得清清楚楚，驗收的標準又統統上了牆，那是氣氛極好的舞臺。

餘下來就只要廠級領導工作「做到家」就行了，經過廠長工作會議研究，驗收開始的那一天，廠級領導全體出動，隆重接待驗收評定小組的全體人員，安排最好的賓館和最好的伙食。對於娛樂，驗收過程中，都分派了小姐相陪。加上對驗收組成員，準備了一份不薄的「紅包」，三級達標萬無一失。

驗收工作組進廠的第一天下午，老同學主持了一個場面熱烈的歡迎會，當時還沒有攝相機，廠部的五部照相機和廣播室的答錄機全部出動，第二天便從廣播裡傳出了李廠長主持歡迎的致詞，那聲音高亢而樂觀：「工廠近兩年來，由於形成了一個團結務實的領導班子……」

他介紹著自己的工廠，但我的腦海裡，立刻浮現出他同所有副廠長的貌合神離的實況，這種關係成因於制度，他們不必為工廠的生死而過慮。所以從名義上講，他們與工廠的頭是「平起平座」的。動輒可以指責企業的「法人」，但又絕決對無權控制他們，貌合神離便是工廠中必然的廠群關係。

那李友繼續在喇叭裡喊道：在領導班子，實幹苦幹和務實精神的帶動下，全廠一千三百職工擰成一股繩，扎扎实實推行了工廠方針和基礎工作，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有力促進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一連串八股式的廢話，見於報紙，聞於廣播，實在是浪費聽眾的時間。

接著是編了一大堆謊話：「我們的職工每天都滿負荷工作……今年迄今為止已裝車八百台，預計年內將突破一千台大關……在年產量達到五千輛的能力時我們會把上級驗收組的領導們，再請來為我們廠驗收二級達標。我們一定會完成黨和人民交給的任務！」

李友的結束語激動而有力，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王主任說：她看見他那時對著麥克風的臉通紅通亮，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他帶著微微的顫抖，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說他在公開的撒謊，其實也不全是，例如職工們滿負荷工作，加班到深夜就講的這兩個月來的實情。

不過，這加班所幹的事是絕決不能公開的。工廠年產究竟多少，誰也沒有核實過，估計也是事實，就是說今年這橫財到來時也才出車一千台。按正常的利潤，每生產一台車三千元，每個職工每人平均只有0.7台，年收入2000元，平均每月150元，有什麼好炫耀的？

可惜即使這樣容易的計算，也沒有人去算過，靠正常收入來算，今年工廠的利潤總共不到三十萬，何來兩百萬的利稅？這一點，銀行也是容易計算的，然而兩百萬的收入肯定是勝券在握，否則老同學也不會在那裡吹大牛。

至於老同學最後的豪情壯語，純屬自我欺騙。然而國家向農民的貸款能堅持多久？在高額利潤的誘惑下，有多少工廠都會擠到農用卡車的生產行列？農用汽車廠的內部管理竟如此空虛，空虛的管理能把這種高利潤支援多久？老同學難道沒有想過嗎？

我一邊聽李友的演講，一方面暗自為他捏一把汗，他果真在玩著自欺欺人的勾當，須知古人言「志」：「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閒來寫盡青山賣，不用人間造孽錢。」然而今天「吹噓」又是中共習以為常的作風。想想它的開國宗師當年如何在貧弱的中國土地上，向世界吹噓實現了共產主義？

歡迎會開完，第二天驗收組的成員在廠部指定人員的陪同下，忙著在各職能部門和車間翻閱那些「資料」，抽本廠人員詢問，核對有關的記錄、照片、報表，整整忙碌了三天，基本的分數都打出來了，李廠長又雇了豪華旅遊車，安排驗收組所有工作人員去大足、統井等附近的旅遊景點「放鬆」了三天。

一周以後，驗收組圓滿完成了這次驗收工作，只等幾天以後，由機械局正式根據評分結果發文，認定農用汽車製造廠經過「嚴格」的企業達標驗收，正式成為市級合格的三級企業，工廠也升級為標準的國有企業。

李友為此，召開了全廠「達標暨歡送市驗收工作團」的大會，廠門口響了半個小時的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機械局的局長將企業正式命名為市三級企業的證書交給了李友。隨後，李友驅皇冠轎車跟在市達標驗收組的轎車後面，開出了工廠的大門，結束了長達兩個月「緊張」的驗收鬧劇。

然而，在這兩個月裡越演越烈的工廠內部矛盾，在工作組剛剛離開就迫不及待的爆發了。第二天，李友以總結達標為名，在廠部會議室召開了廠務會議，他一開始就用咄咄逼人的語氣，公佈了這次達標中各職能部門的扣分值。

總工程師下管的六個部門除總公辦外還有設計科，工藝科，檢驗科，計量科，資料室，本來就是達標檢查的重點，需要應付檢查而偽造的圖紙，工藝檔和質量記錄數量最大，因圖紙工藝檔的錯誤和不當最多，所以扣分多本是正常的。再說總工是廠長最得力的助手，李友對他應更加幫助才對。

然而小舅子的醜事一直令他耿耿於懷，加上平時矛盾日積，使李友借驗收小結機會，當著全廠所有職能部門訓斥王重疏於職守，說總公辦人浮於事，超編超員，無事可做。說王重千方百計把廠裡的漂亮女孩子調進描圖室，並且說他幾次路過總公辦時，都看到王重同描圖員摸摸打打。

當著全廠中幹的羞辱，使王重惱羞成怒，當即拍桌而走，退出會場以示抗議，整個辦公大樓為之一振。事情鬧到這個地步，雙方都向機械局告狀。

王李二人的矛盾，已經表面化。老同學利用自己的權利派自己的侄女安排在描圖室的用心，是人人共知的，李友為緊俏的農用車設制車券；並以「便於工作」為名為自己私分汽車券的事，被王重聯合其他副廠長成功的將到嘴的肉拖了出來，使李友心中結下一個大疙瘩。

當然，廠級的頭們何止王李二人之間的勾心鬥角？在日常工作攤派，安置「後門」，形成自己的小山頭。在收買和刺探對手的隱私，各有自己的親信，八名廠幹八仙過海，對工廠巧取豪奪，早已不存在開誠佈公了。

老同學在向驗收組，吹噓工廠「擁有一個團結務實的領導班子」，實在令知情者聞之嗤鼻。

第二天老同學將我叫到了他家中，詢問王重在驗收達標過程中有哪些言論？我說什麼也沒聽見，老同學臉色很不好，我是絕對不願意夾在兩人中間當一方的槍使，古人有戒：「諍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

想到在兩人間，難以應對這種無聊內訌，第二天我便主動向王重請求調離總工辦，到金工車間幹點實事。得到王總同意後，便遞呈了請調報告。於是，我便以一名普通技術員的身分調到了車間，脫離了總工辦這個是非場所。

走進金工車間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牆上張貼的那些應付驗收的東西已經撤去，打掃乾淨的地面，重新是鐵屑、垃圾滿地，那剛剛粉刷的牆壁，又被霉氣和廢機油所污染，失去了光澤。

九點鐘，我在車間主任陪同下，走到技術室門口，只見那左邊的鉗臺上圍著三四十個工人。一個中等個兒胖胖的中年人，正站在一米多高的鉗臺上，眉飛色舞的向圍聽的人「公佈」剛從財務科透出來的「快訊」。

「昨天下午，財務科又給機械局開了五萬元支票，財務科說，那是李友答應的驗收諮詢費，嘿！這些機械局當官的，工廠虧損的那一段時間，鬼都看不見一個，這幾天，工廠的大門都要遭這些人擠爆了，你們數過沒有，驗收那天，工作組開來的轎車就是五輛，他們剛下車，李友就點頭哈腰把他們接到泉外樓賓館，中午在縉雲餐廳開宴會，喝得醉醺醺的，晚上還要請跳舞，你們算算看，旅遊、吃喝、加上紅包，這些龜兒子，又從我們身上括了幾萬塊走？」

經他這麼一煽，人群議論紛紛，有人說：「機械局已經許下的，這次企業達標，李廠長年終就要分到一萬元獎金」。有人說：「這次達標驗收的最後一天，李廠長，在小車子裡一次就塞給帶隊每人三千元……。」

當他發現張主任在聽，胖胖的中年人解嘲的喊道「張主任，這次驗收你分了幾千？向大家坦白坦白。」那張主任笑了笑說道，「陳左派你在這裡亂說，總有一天要遭李廠長炒你的魷魚。」

然而那胖子卻越說越起勁，繼續用大喉嚨壓倒大家的聲音說：「昨天早晨，稅務局的所長帶了兩個稅官來，說工廠前幾年虧損，免交了稅錢，今年盈利得把這些老帳還清。李友怕他這一攪，會最後影響達標的結論，趕快把那所長請到泉外樓去，也不知悄悄塞了好多包袱才擺平。」

殊不知那稅官剛走，銀行又來找李友，要他把去年欠交的利息一併交清，李友又趕快應付銀行。這兩件事還沒有辦完，那重慶日報和四川日報的記者，又在廠長公室等他，說要採訪他。我看哪，採訪這個寶器還不如來採

訪我陳左派，那李友上臺幾天，洋相出盡了，小舅子又不給他爭氣。」圍聽者嘩嘩大笑。

我忽然想到這幾天銷售科的緊張狀態，他們因為缺貨脫銷。一再向生產科和車間催促生產進度，便下意識向裝配後轎工段望去：

車間大門左邊的落地車床前面，堆著一大堆制動鼓，工人還在那裡悠然的抽菸煙。三台磨床和五台銑床的周圍全被堆積滿地的毛胚另件阻塞著。兩名女工，好像在那裡打毛線，前方排列的二十台C614和C612車床，只有幾個床開亮了電燈，那裡面堆積著雜亂的工件。

再往裡看，三台搖臂鑽床前面除了堆積的毛胚也沒見一個人影。而車間最深處兩台滿身油污的座標鏜床前，則由堆成小山一樣的差速器殼堆得難以插足。

在微弱燈光下，機床似乎因為年事已高又很累，靜靜的躺著不願意啟動。車間的左邊一排鑽床旁邊堆滿了制動器、後轎軸等等另件，點著燈卻不見幾個人影。一看上班的人幾乎大半集中在胖左派所站的鉗台周圍。

看看手錶已經九點半鐘了，張主任催道：「喂，上班已經一個半小時了，該動得了，還圍在這裡吹什麼牛？」人群才開始慢慢的離開，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一邊走一邊嘟囔著：「急什麼？反正只有那麼幾個錢，這幾天天天加班……」另一個附和道，「是呀！幹活的是幹活的，撈錢的是撈錢的，不管你幹出多少來，賺的錢還不知道流到哪個的腰包裡去了？」

一個女工，拉著他的夥伴催促道：「周燕，你還不快把你的床子趕快調好，昨天你整整一天停了機，一個制動鼓銷子也沒有車出來，鉗工等著要裝的，今天你再車不出來，這個月的獎金，全要被取消了。」

那被摧的女工卻吼道：「你別裝積極，前天晚上加班你跑到那裡去了，是不是又去那皇冠舞廳找那姓何的，小心我告訴你老公剝你的皮。」於是兩個嘻哈打笑地拉扯起來，向車間左邊那排車床走去。

原先黯淡的車間，開始亮起來，幾台洗床開始有氣無力的運轉著，工人們慢慢地回到自己的車床前，或鉗臺上去，一天的工作算是啟動了。我回過頭去看看技術室前面的鉗桌上，那剛剛口若懸河發佈「快訊」的胖子，還坐在鉗桌上同幾個老工人繼續在講這個月的獎金分配。

看到這樣鬆散的工廠，又一次使我後悔，但這年頭，到那個單位，那一個地方還不都一樣？看今後怎麼發展吧？於是提起裝著繪圖儀器和記錄本的帆布包，隨著張主任一起跨進了技術室。

那屋子裡光線極暗，迎面一股霉氣向我們撲來，仗著那辦公桌檯燈我看清了，屋裡放著三張辦公桌，裡面的牆和門對著的地方，兩張辦公室桌前已坐著兩個人。只有左面牆邊的辦公桌是空著的。

我們進去時門對面的那一位轉過身來，張主任向我介紹說，他叫黃祥老師傅，看上去他的個子很矮，但非常結實，年紀與我相近，在總工辦就聽到關於他的介紹，知道他是工人出身，由技工提拔起來的技術員，頗有實幹精神，是我今後長期合作的夥計。而另一位姓張，原是部隊轉業到地方來的技術員。

張主任出去以後，我在剩下的那張辦公廳室上放下帆布包，打開抽屜，三個又肥又大的蟑螂在裡面亂竄。抽屜也生霉了，我一邊從屋外打了一盆水，洗擦著生了霉的辦公桌，將帆布包裡的繪圖儀器，一邊往裡放，一邊擔心的說，這些儀器和書會不會今後霉壞，或被蟲蛀咬？

黃師付向我介紹說：這屋子是靠山修的，與地下室差不多，已二十多年歷史，修房子時我才進廠，每到下雨那牆上就滲出水來，當時正是災荒年間，國家沒有錢，在車間旁邊傍山塔個磚柱棚臨時用著。

我又抬起頭來看，屋頂蓋的石棉瓦，有幾處已經破裂，看得見那裡漏出來的光縫，於是我指著那光縫問道：「下雨天不漏雨麼？」老黃回答道：

「這石棉瓦，早已老化，後勤科的維修工也不知來了多少次，他們說那石棉瓦是整塊式的，要換就得整個屋頂都換，只好將就著，等到工廠掙了錢，把車間重新拆掉，可惜，從建新車間的話，已二十多年了，我的頭髮都等白了，工廠一直窮得連廠裡的環廠道路都修不起。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看到新的車間在這裡重新站起來。」

他說時聲音裡很悲觀，這可是在這裡土生土長的人對工廠前途的估量。

「工廠今年賺了那麼多錢，李廠長不是提了一個工廠技術改造的方案麼，改造各個車間可是這個方案的第一內容。」我說道。

然而黃師傅卻說：「你別相信他的話，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拆了車間又搬到那裡去？何況這錢賺到那裡去了？李友這個人，我已同他相處多年，他能幹得出什麼好事？除了安置他的親親戚戚他還能幹出什麼來？」

黃師傅介紹的李友為人和業務能力，大致與總工辦所介紹的情況相吻合。

然而，福星高照，1984年農用汽車製造廠當年實現了100萬利稅，不僅順利達到國家對三級企業這個指標，為李友塗上了一圈光環，在全國普遍的經營不振，虧損嚴重的國營企業中，鶴立雞群的脫穎而出，榮登四川省1984年度四個盈利大戶的光榮榜，李友碰上了最得意的時光……。

那些正為國營企業的困境，弄得市政府的官員一籌莫展的時候，記者便抓住了這個典型，頻頻來廠採訪，大量報導農用汽車廠的「事蹟」，以及不知道怎麼拍出來的照片，把這家工廠吹得上了天，不但突破了重慶範圍，還突破了四川省的範圍，好名好利的李友豈可放過這人生一世，只此一回的風光時日？

他頻頻地和藹可親接待著所有來訪的記者，李友的巨幅照片見諸重慶日報，四川日報以及經濟日報報端。而他的長篇論述，在經濟日報的顯著版面登載，農用汽車造廠1984年底醉醺醺地蹣跚在農民搶購汽車的春風中，而李友卻駕著這搶購的春風，名利雙收。

然而，正當這位四川企業的明星每天出入各種招待會，酒醉半酣同來訪者，上級和政府官員合影留念時，全廠幾乎所有的職工，從「財務快訊」中知道，工廠每天都把發橫財得來的錢，通過李廠長等「領導」的手，大把大把的塞給那些對工廠毫無貢獻，甚至是些與工廠毫不相干人的口袋裡。

那被獎金激起的興奮，迅速地化成牢騷和唾罵，人們指著這段時間進出廠門的小轎車罵道，又是一個「吸血鬼」來吸我們的血了。

國營企業的所有權是不明確的，大家說工廠是廠長的，這太荒唐，因為工廠真是廠長的，他能將自己的錢隨便亂撒麼？他能對工廠混亂的管理置若罔聞嗎？他能自欺欺人做表面文章麼？

國營企業的大鍋飯分配是使職工怠墮的溫床，是千真萬確的！表現之一便是職工借各種渠道從生產工人向著科室和庫房管理「擠」。

偷懶的工人被管理者督促時，反唇相譏的回敬道：「你再積極也只是個工頭，你有本事去叫那些坐著小轎車，吃得嘴角流油的人幹活嗎？」更惡毒的人當即咒罵道，「你看你那熊樣，只會欺侮我們這些窮工人，在當官的面前你自己照照自己，還不如一條狗。」

被罵的人只能張口結舌，久而久之，車間主任也講，「得過且過，何必多得罪人自討沒趣，」無論生產任務有多急，每天早上必延至九點半才開動，平時斷斷續續地勞作，每天工作時間一般不會超過六個小時。那怕工廠再好的效益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這便是大陸中國的國有制企業。

正當農汽廠銷售正旺，產品脫銷，十二月底，總裝車間卻傳來了停工待料的消息，因為缺車輪鋼圈，看看已經裝好的底盤卻上不了輪子，底盤因此中斷供貨，總裝車間停產。黃色大樓的生產調度會，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

管生產的副廠長在生產會議上責問經營廠長，說道：「你怎麼連汽車走俏，汽車零件也會跟著走俏這點常識都不懂？為什麼不理生產科第三季度提前預報的採購計畫，造成這種缺鋼圈的事情發生？」

經營廠長面對生產廠長的怒容，明白在目前狀況下停工待料，就像行軍打仗斷了糧草一樣嚴重，他會因此被扣獎金，甚至降職撤職。

所以連忙解釋說：「因為對零件漲價因素估計不足。其中漲得最快的是輪輞，與今年年初相比價格漲了一倍，如果在五月份按生產科所報計畫採購，那麼，資金投入就會大大超出預算。李廠長預先就打過招呼，凡是超出

的資金必須經過他批准，所以我們把採購輪輞壓了下來，請示李廠長的結果。

他指示說：『到今年年底還有好幾個月，估計年底時價格會回落，等到十一月份再買不遲』。這麼一決定，輪輞就沒有按生產科的計畫採購，殊不知等到十一月，輪輞非但沒有降價反倒來了個缺貨，再高的價也買不到了。』

一般說，責任追到法人身上就告終止，李友又是走紅人物，日理萬機情有可原。何況這「估計」誰又能算得那麼准？

生產會議兜著圈子整整吵了一天，毫無結果，責任者一個也沒有找到。所有參與生產、供貨、技術各部門都可用恰當的理由，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雖然他們心中十分明白，如果工廠是為自己在生產，那麼無論哪個部門都有辦法克服這種事發生。

生產會議最後只能責成供應科，趕快派人到全國各地去搶購，過年也不許休息。商場如打仗，對於瞬息萬變的供應市場，誰又能料到農汽廠會因一個另件，而眼看千載難逢的大好賺錢機會白白丟掉。

過細想來，這位連汽車緊俏時該多多備貨這點能力都沒有的老同學，怎麼配帶領這千餘職工在商海裡去拚拚殺？他是否知道在自由競爭之下，商機都抓不住的人只有淘汰出局？

眼看那些提著錢袋，焦急等在銷售科窗口下的農民，聽到幾天內無車供應的消息，早已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帶著失望匆匆散去。

他們可等不起，私人貸款的利息並不會因為買不到車而免付。春節時期運輸黃金時節，他們巴望買到一輛貨車，拿來搞運客運貨，把賺的錢儘快抵償這筆「貸款」，於是背上錢袋連夜起程到省外搶購卡車去了。

這位老同學的危機感和緊迫感還比上了這些普通農民。農用汽車製造廠在脫銷情形下，因缺汽車輪胎鋼圈，元旦將要到來的時候放假三天。

在農汽廠有史以來的「大好形勢」下，每個人只領到五十元的過節費，卻要拿五十萬去賄賂鋼圈廠的廠長！

李友被鋼圈的事擾得心煩意躁，但看到他的巨幅照片仍照登在重慶晚報上，在那畫面上，他微笑著向全市全區拜年，代表農用汽車長恭祝大家1985年元旦快樂發財，心裡便心安理得下來。我卻對他笑容可掬的照片發愣，難道他真失去了自知之明，不明白他所管的這家『明星』企業多麼混亂和虛弱嗎？

1984年在熱鬧和爭吵中過去，鞭炮聲迎來了新的更加熱鬧的1985年，按傳統的中國民俗，舊曆臘月三十才是一年的年底。元旦過後，年關在耳，所有職工的眼睛都緊緊盯著年末獎金的分配。

沒有幾天，勞人科關於1984年末獎金分配的紅頭文件，下發到車間和科室，黨委書記馬兵根據機械局頒發的文件精神稱：「要打破平均主義的傳統作法。」所設的獎項和每個獎項的金額規定，獎金按發放的係數「拉開距離」。

如果現有工人領到的係數為1，那麼凡屬廠級幹部的負責人，包括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幾個副廠長獎金係數規定為4，中層幹部及車間主任係數為3，技術人員和一般幹部和工人中的班組長為2，第一線的工人為1.5，勤雜工為0.8。

廠長的獎金是工人的四倍！但馬兵還嫌不夠，接著又拋出一個各部門負責人，兌現承包合同辦法，對於完成任務的廠長，職能部門和車間負責人發給額外的承包獎。這樣一來，廠級的頭頭們可從1984年年末分配中得到六千元的獎金，車間主任也不低於三千元，而工人只分得三百元，於是這距離在年終獎上就拉開了足足20倍。

同時他還拋出一個名額占全體職工的5%的「先進」指標。被評上先進的人當年工資增加一個序號。獎金分配、承包兌現、評選先進三大年終分配辦法，頗費了馬書記一翻心機！這敏感的分配方案，以職代會的名義，由勞人科正式發佈。

胖左派迅速站到工廠門口，當著做工族們吼到：「工廠是工人的，廠頭們白天坐在辦公室裡不勞動，還要借開會出差公費旅遊，吃吃喝喝全是我們工人的血汗，而工人們成天埋頭在車間裡幹活，到頭來一年辛苦，我們掙

到的獎金只有他們的二十分之一，這叫飛起來吃人，這裡還講不講理？」

勞人科辦公室為年末獎金分配鬧得烏煙瘴氣，可惜再怎麼鬧，獎金的分配仍按紅頭文件規定條文執行，工人們也只有吵吵架，充其量說些：「老子幹得再多，還不是替別人幹。」「老子巴不得停產，大家都不要得那錢。」磨洋工，上班遲遲不動工，提前下班，懶懶散散。

別以為工人們會團結起來聲討這些「吸血蟲」。工人們發發牢騷是可以的，遇到具體的利益衝突，照樣可以自相廝殺。這都是文革的遺風！！

馬兵正是看中了這一點，那百分之五的先進推舉，自然成了工人間相互指責的導火線，因為這5%的先進是與當年工資升級掛起勾來的，工人們在提名上相互攀比，車間到處是推選「先進」的爭吵聲……寧可使生產停下來。沒有選上的人說：「讓評上先進的人去做。」

這樣鬧了幾個月。在大鍋清水湯長期泡慣了的國營企業職工們，本就習慣於低工資這種「平均」所營造的寧靜，現在被馬兵們擾亂了。

權利在手的工廠經營者，在中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拉開差距」的掩護下，故意放縱貪污。掌權而不受監督的中共，使工廠管理者腐化！他們羨慕資本家的富有。認為富裕是人當然的追求，不必追究怎麼致富。然而，靠權力致富這種共產主義效顰，恰恰成了公開的掠奪。

按照工廠的規定，進廠不滿一年的職工，獎金是要「打折」的，但我在車間主任那裡還是領到了三百元的年終獎。我才進廠，還不知道同人比較，但這筆獎金是我在學校幾年所得獎金的總和，加上進廠五個月發的月度獎總共五百元，夠買一台「福日」彩電了，鄰居們羨慕我走了好運，調進了一個「好單位」。

年三十的那天下午，我在電影院門口的人群中碰到了李友。又碰上廠辦的黃色伏爾加轎車從左面公路上開來，我遠遠看到那輛車就在李友身邊停下，滿面紅光的馬兵精神抖擻地從車廂裡走了下來。

他身著黃色皮大衣，提著裝有保險鎖的高級提包。一下車便迎著李友向他伸出的手緊緊相握。在一片「辛苦了」的客套話聲中，兩人互道問好並拜了年。

馬兵是奉廠務會議決定，專程派往南京汽車製造廠乞討鋼圈底盤的「欽差大臣」，今天上午才趕回來過年。只見馮、李二人肩並肩向廠門走去，那馬兵還不停將嘴湊到李友耳邊，好像密告不容他人聽見的秘密資訊。我的心中又是一陣納悶。這麼緊急的採購件竟沒有帶上採購部門的人同行，令人疑心。

與馬兵幾乎同時外出的工廠生活廠長蕭肖足，據說是為籌集即將動工的油漆車間的廠房，和已經批下來的三幢職工大樓的木料，專程去西雙版納等地採購木料的。

油漆車間的技術改造是李友在驗收達標時，向市驗收工作組和上級主管局提出來的。他要求工廠今年實現盈利的三百萬全部留在工廠，作為他上任提出來對工廠實行技術改造所需資金。

為了在主管局換得信任，他曾起草了工廠技術改造近期和遠期發展規劃。在這個「規劃」中提出了一個改造油漆車間、衝壓車間、金工車間、冷作車間和總裝車間等八個技術改造項目。

這個誇誇其談的技改方案，當時曾贏得重慶市主管局的喝彩。由於這個計畫，李友被提名上了四川省1984年度的四大明星企業廠長的光榮榜。在四化口號下，有多少趙拓應運而出啊！

我判斷，這樣的計畫是當時最時髦的假大空產物。因為以後的實踐證明，計畫提出既沒有市場需要為根據，更沒有工廠所能承擔的物資、資金為依據，單憑一個突然因國家向農民發放貸款而暴富怎麼可能實現？

至於李友心裡打的什麼算盤，是用農汽廠發橫財的機會贏得中共當局的好感，還是另有圖頭，自會在不久之後暴露。不管怎麼說，1984年工廠發橫財掙來的350萬盈利，全部留給了工廠作1985年技術改造資金投入。

根據1985年度李友技術改造規劃的第一項目——改造油漆車間，老同學趁熱打鐵，啟動了重慶市的媒體在各種報紙和廣播瞎吹，說這是迄今為止，前處理容量最大，自動化程度最高的，除塵效果在全川最好的一個車間。在油漆車間掩護下，新的職工宿舍大樓同時啟動……

三幢職工宿舍，各七層，共78套住房，其中二樓三樓全是「工程師住宅」，共十八套。每套建築面積近100平方，每套三室一廳，一廚一廁，是當時北碚地區的廠長們都沒有住到的最豪華住宅。

竣工後，搬進去住的第一戶人家當然是李友，當我和工人們一樣，還在為遮風避雨的陋屋發愁，老同學卻嫌那三合院的兩室一廳欠氣派。他打的這個算盤，可比馬兵在獎金分配上的主意高明多了。

三幢大樓預計投入百萬，然而破綻還是被基建科的楊科長識破了，他說：「按照李友提供的三幢住宅的房屋設計要求，這一百萬恐怕只夠修一幢大樓。」

與此同時，去雲南採集木材的肖付廠長，被人發現，買回來的近二十個立方的木料，運回北碚時並沒有在大白天正大光明的返回本廠，而是深更半夜，開進了天生橋附近的一個竹木社壩子裡卸下了。過了兩天，又派車到那裡向竹木社「購回」。

這種奇怪的過程立即被胖左派抓住，他們私下從竹木社採購人員口中證實，兩天後從竹木社買回工廠的木料，價格竟然高出了雲南價格的兩成！這種倒賣使他把五萬元撈進了自己的腰包。

聞到這貓膩味，胖左派並不甘心，再深入的向竹木社打聽，由運木料的司機證實，在購木料期間，利用派去運木料的卡車，從途中的威遠鐵廠將幾十噸生鐵運到重慶倒賣給鐵作社，估計從中至少又獲利五萬元。

問題迅速傳到了工廠紀律檢查委員會羅書記那裡。那羅書記竟然不作調查取證，而是將這件事全部的抖給了蕭肖付本人：「有人反映你在雲南運木料時，與竹木社勾結，經過竹木社的倒賣，從中牟利，請你講一講這是怎麼回事？」

後來案情發展，我都是聽說的，不想在這本書中佔據篇幅，只想說羅書記正式的提訊冉某，冉某被追急了，最後兇相畢露說：「我勸你還是知趣點，不要再追了，追下去這個工廠所有廠長書記沒有一個脫得了手。」羅書記自覺棘手，他明白不能再追下去，案子在他手裡便不了了之告了終結。

那時倒手買賣已經在國內成為風潮，大官大倒，小官小倒，正名曰：「做生意」，搞活經濟，似乎於經濟發展有利。倒的錢也不知道滾出多少利，最後都落進了中國特色倒爺們的腰包。

社會主義先富起來的「階層」，便從這些手段中一步步累積起來。倒得不好，暴露了，受到查處（以後叫雙規），充其量只是一個撤職查辦的行政處分，何況倒爺們互相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不久傳來消息，說某地銀行負責人，因收不回向農民發放的貸款而受到追究，看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摸索中又遇到了問題。銀行不可能向農民持續發放這種難以保證收回的「風險投資」，農用卡車也不可能長期由幾家農用汽車廠「獨家」生產。

然而在諸多不利條件下，最不該因缺件而影響生產的因素，首先起了作用。因為輪胎鋼圈遲遲不到位，在短期的發財季節裡，八五年一月份的產量僅僅只有十八台，二月份裝車實際上只完成了十二台，三月份也只完成了三十台，三個月裝車總和不及正常情況下一個月生產量的一半。

黃師傅氣憤的說：「這點產量，別說是發獎金，恐怕供一千人喝水都不夠。」

然而，人生一世幾回才逢得風光的機會？該出風頭的時候還得抓緊機會。春節剛過，全廠便抽出一天，整隊到油漆生產線的工地上，那天正好起了大霧，佈置在工地周圍的彩旗在大霧中隱隱拂揚，黨政工團敲鑼打鼓的捧場來了，也不知道從哪兒來的一群記者，背著照相機在大霧和彩旗中穿梭！

今天選了個黃道吉日，定為給油漆車間奠基剪綵的好日子。李友態度嚴肅的主持了這個儀式，他發表了工廠未來四年中美好的規劃，他的演說依然那麼富於詞令和感情。四面的照相機照例又對準了他，發出一陣喀嚓喀嚓的響聲……

可惜，光陰並不饒人，農用車走俏的大好時光，也是老同學躊躇滿志的歲月，像箭一般倏忽而過。到了四月份，所缺的鋼圈和其他總成的供應源源不斷的跟上，生產也開始恢復正常時，唯獨排在銷售科辦公室窗下等候「提車」的佇列卻悄然地的消失了。

有人說是農忙季節來了，買車的農民要趕著回家種糧食、插秧。有人說是我廠生產卡車的質量常出問題，所以買車的人都跑到其他生產廠家去了，農用車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便由脫銷變為滯銷。

但是，既是「明星」廠長，豈甘束手無策？更不可能露出半點慌張，為了挽回即將到來的危局，他必須擺出一付胸有成竹、穩紮穩打的樣子。於是他立即在銷售公司召集了緊急工作會議，短短的開場白以後，便從皮包裡取出了一大紮的材料，打開後，攤在與會者的面前。

那是些用戶一大堆關於質量投訴的複印件，以及幾十封用戶的檢舉信。那上面指名點姓告發銷售科的工作人員如何無禮地謾罵顧客，如何變著花樣逼著用戶掏錢請他們進高級餐館，送高級香菸煙和高檔名酒，以至於錢。

廠辦秘書小吳一邊讀著這些信，李友兩眼盯著這些在汽車走銷時，動輒就在顧客面前甩牌子的「驕子們」的反映。今天他是來抓替罪羊的；李友把滯銷的第一板子打在銷售公司的段經理身上。小吳剛剛把選擇出來的信讀完，老同學故作憤怒，責令銷售公司經理老段對這些用戶來信作一個交代。

然而老於事故的段經理，可不是隨隨便便可以抓來的替罪羊。工廠短期爆發時廠長一舉一動他都看在眼裡，誰才該負這個後果責任他心明肚亮。那時，廠長吃飽喝足名利雙收。現在工廠走下坡路，卻要他不明白的承擔所有的責任，他當然不會聽人作弄。

他不緊不慢從夾子裡取出一疊三包服務的記錄和用戶來信，從容地朗讀起來，那上面不僅記錄著用戶剛剛才接手的新車子，在路上就發生諸如煞剎車蹄片沒有調整好，使制動抱死，剎車失靈；因為線路接錯，而使全車線路燒壞線；因汽缸油路不通，而使發動機活塞卡死；等等。

大家一聽都明白，這些問題是裝車件的質量低劣，供應質量保證體系沒有建立的原因。

於是整個會議將責任從銷售公司轉移到產品質量。段經理把滯銷的原因歸結為產品質量的低劣，以及生產部門和質量部門和供應科的失職。

然而供貨廠家和檢驗科長又在會議上出示了檢查報告和記錄，證明各種質量問題早已記錄在案，並且上面批著「不准進廠」的檢驗記錄，只是因為脫銷和缺貨，由李友在不合格的判決書上簽上，「此批放行，下不為例」的批示。

問題又重新追回到李友身上，廠長主持的廠長會議就這樣玩著踢皮球的遊戲，從早上八點鐘，一直踢到下午三點鐘，整個會議室被香菸煙的濃煙包圍著。所有部門負責人，都起勁把球從自己門口踢到其他部門，誰都不承擔責任，誰都對挽回滯銷的禿局提不出任何可行的辦法。

像這樣的扯皮工作會，十年一貫如此。我看見老同學在香菸煙的濃霧中顯得焦頭爛額，工廠發財時風頭出盡，如像過雨雲煙般恍晃然而去？他曾在半年前聽到的後果，竟這麼快降臨了。他看著面前正在猛踢足球的人，那一個沒在工廠發橫財時沒沾過光？而現在又有誰能替他分憂？

他腦子裡浮現著滿壩的「蘭地毯」，庫房堆積著數千萬元的另部件積壓，面對財務科長哭喪臉，第一次感到給全廠職工發工資的擔子這麼沉？他在考慮怎樣從明星廠長的位子上體面退下來了！

反過來一想，虧損出現使他混不下去，充其量將他另調個地方，重新東山再起。於是他又鬆松了口氣，現在該思考如何找客觀原因體面的退下來了。

於是，他從濃濃的香菸 / 菸煙霧中抬起頭來，打起精神作了小結，在對各部門各打二十大板後，發出了一道責令限期整頓的指令。

然而他回避了因輪胎鋼圈缺貨造成的停產。也不提各部門的頭們如何用公款吃喝玩樂，對於汽車券的倒賣和蕭肖付倒賣材料隻字不提，對馬兵過年前提走的五十萬就像沒發生一樣，他知道，提及這些眼下很敏感的問題會引火焚身。會議毫無結果散去。

正當農用汽車造廠開始虧損滑坡之際，一個由馬兵簽發的勞動人事科〈關於1985年度農用汽車廠調整工資的決定〉的紅頭文件在全廠下發。按照當時機械工業部有關企業職工調整工資的條款規定，企業只有在當年獲取利潤以後，才可以按照所實現利潤的一定比例用來增加職工的工資。



由於連年虧損，農用汽車製造廠的職工已經整整三年沒有升過工資了，據黃師傅告訴我說，北碚市民有一段時間曾評說，在菜市場上為兩角錢一斤的毛毛菜，同菜販子爭得面紅耳赤的都是農用汽車製造廠的工人們。物價飛漲而沒有效益的農汽廠職工們，都把目光集中在工資升級上面。

牢牢掌握工廠管理大權的馬兵們，不顧工人們的反對，下發了由他親手制定的1985年工資升級辦法。

這個辦法把全廠職工按崗位和業績劃分了四個等級，廠級領導和對工廠有「特別貢獻」的人列為第一等，可以在本次調資中晉升七個「半級」；中層幹部和有工程師相當職稱的列為第二等，在本次調資中可以升五個「半級」；第一線工人列為第三等，本次可以升四個「半級」；勤雜工、清潔工、庫管人員列為第四等，本次晉升三個「半級」；同時規定凡是無故曠工，不服從分配，有過違法行為受過拘押的將視情節減少升級的數目。

老同學在職工代表大會上說得很漂亮，他說，現在是在企業獲得大盈利後的豐收季節，也是大家分享勞動成果的季節。

而工人們則一針見血的說：「掌權的人那一個不是在任職期內往自己的腰包撈錢？暗地裡要撈，走後門，倒買倒賣，收回扣，權錢交易花樣百出！公開的更要撈，獎金要多占，住房要多占，升工資要多升，否則一個人當了幾年廠長，不明不白的「富」起來了，今後查起來也有個依據。

中央既有政策，所以在利益上，職位越高心也越黑。以經營付廠長李德為例，他的妻子是財務科長，女兒是工會幹事，女婿是總裝車間工段長，在本次調資中，全家共增加了二十二個半級，而工人中的生產骨幹在本次調資中只增了四個半級。兩種家庭，經過這麼一調資，增加的工資就懸殊了五倍。

工廠的貧富分化過程大抵正反映了全國的兩極分化過程：仰仗權力而富有，無權無勢則貧窮。不義之財是臉厚心黑得到的，然而恰恰也加速了這種制度的解體。

一場爭奪升級的大戰又一次被點燃了。能運用關係與權力掛鈎的，則幹著偷雞摸狗的勾當，不能講關係的就憑吵罵和拳頭來挾持各級調資領導小組。科室之間，車間之間，人與人之間幾乎都放下工作，互不相讓的打「爭級戰」。

這種白熱化的爭奪，一直延續了兩個月。在吵架語言的流利和用辭的刻薄方面，我素來以為四川人堪稱全國之冠，這罵街尤其是城市平民家庭婦女的「長項」，這是一種以使對方當眾出醜所產生的威懾力，壓迫對方讓步的方法。

我所在的車間計畫員王某和庫管員周某便是全廠聞名的吵架能手，兩個人就憑著一雙利眼和揭人隱私的利嘴，使車間裡的人誰也不敢輕視她們，就連車間主任在爭執時，都要讓她們三分。論年紀她們還都只有三十來歲，一個車工，一個鉗工，正是生產第一線幹活的「骨幹」，但是，在全廠「向第二線轉移」的熱潮之下，她們就憑著自己的潑辣，向張主任提出安排二線工作的要求。

開始，這位車間主任對兩位潑嘴提出的要求採取緘默的態度，結果被王、週二人抓住私下安排過車床在夜間幹私活的幾次「違章」事件，一陣冷言風語，迫使這位主任對她們策略一下。許諾了兩人從鉗工班和車工班退下來，一個安排去做「計畫」工作，另一個則安排為車間的工具庫管理員。

國有企業的職工對於調資的認真，遠遠超過對工作的認真。因為工資級別決定了一個人長期的收入水平，一次調整和升級在毛澤東時代幾乎十幾年不會遇到。鄧小平時代開始，工資經常調整，但是因為過去留下來的窮困使升級特別敏感，工廠的調資向來採取平均主義。

幾年前工具車間，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因為一個工人的病假超過了工廠的規定，在調資時少調了一級。

雖然這一級區區只有四塊錢，但那工人卻以「一輩子」為藉口，提著磚頭去找主任評理，當場用這塊磚頭，猛擊對方的頭部，當即昏死過去。工人被拘留，他的家屬就到這位主任家裡坐著要飯吃，嚇得這位主任在外躲了一個月，後來就辭去主任的工作不幹了。

馬兵四級劃分的辦法保證了廠各級管理層的利益，他心中十分明白，因為生產工人最苦，因不滿而發生的越規行為也最多，所以他指令把調資的總金額劃到部門，矛盾因而下交。崔科長自然明白馬兵的意圖，金工車間在得到勞人科所劃的升級方案以後，不敢怠慢，便將分到的名額又攤給了班組。

車間對所分到的級別落實到人頭時，對照檔算的級別與勞人科調撥的級別差了兩個級，與勞人科再次核對，問題恰恰出在兩位新近才從第一線下來的女工身上，工廠管理在編制上極為混亂，計畫員本歸於幹部的名額，但若從工人轉崗時，兩個人既不屬於幹部編制，又不屬於一線定額工人。她們只好委屈於少升一級了！

兩人找車間主任說：「工廠已有三年沒有調資了，這三年裡兩年零十個月都是在第一線幹。現在才幹了這麼一個多月的庫管，怎麼在確定升級時，把她們當成了勤雜工？」車間明知公開照搬調資方案，一定會大鬧一場！於是，把他們向勞人科一推，要她們直接去找勞人科理論。

兩人商量好了，就去找勞人科崔科長，崔科長明白兩人的來意，還沒有等她們開口，就把馬兵關於這次調資定級的辦法拿給她倆看，王秀根本就不去看那檔，吼道：「那馬兵從西雙版內轉業回來才幾年，就想欺侮我們在這裡土生土長的老職工了，他在這次評級中升了七個半級，而我們才升了兩個半級，你把馬兵叫出來，我們評理。

黃色大樓裡兩張利嘴尤如兩挺機關槍，整個樓裡回蕩著女人的尖聲叫罵，所有的辦公室都打開了窗口，伸著頭向勞人科指指奪奪，罵聲隨處可聞，勞人科處在責罵包圍之中。

馬兵挺知趣，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給李友打了一個電話，請李友幫忙調停。李友勸說兩個女工回去，條件是立即給二車間增補兩個半級。

兩個女將得勝班師，臨走出黃樓還大罵崔科長，一場風波才平息下去，可是沒有一個星期，車間的張主任被解聘。但為了怕戰火再持續下去，張雖被解聘，但本次調整工資還是保留了他原來加的級。。

升級的風波剛剛在金工車間平息下去，卻在工具和總裝車間重新點燃，工具車間一位姓黎的女工平時因為愛跳舞，住在單身宿舍經常深夜不歸，白天睡懶覺，遲到曠工多了，這黎小姐該被取消升級資格，不過車間主任知道這女孩不是好吃的果子，沒敢全部取消她的升級資格，只留下了一個半級指標。

殊不知黎女士將這件事與她相好的男舞伴通了氣，沒過幾天，車間主任在上加班回家的路上被一群來歷不明的人，圍在小巷裡痛打了一頓，幸好沒有被捅刀子，只是渾身青一塊，紫一塊的在家裡睡了整整十天。

廠部報了派出所，可是那兇手卻一個沒抓到，從此以後，這位車間主任，只好自認晦氣，再不敢行夜路，對以後的獎金再也不敢剋扣工人了。

總裝車間一位女工，因病假超過了工廠規定的時間，這次被取消了升級的資格，結果她想絕了，喝農藥自殺，幸好被及時發現，當即送醫院搶救，等她從昏迷中醒過來，對丈夫的第一句話就是要為她報仇。主任聽說，慌忙趕到醫院陪小心。

中國人的膽子像一根橡皮筋，有時氣壯如牛，有時膽小如鼠，十分脆弱。為升半級工資，可以拚拼命，而真正要拚拼命時，偏偏退縮了。馬書記一個調資辦法弄得全廠雞飛狗跳！

根據「上級」有關檔，所謂按「貢獻」和「業績」拉大差距的原則，本就可以隨意解釋，誰掌權，誰都會站在確保自己利益的立場上。

對比起來，在「收穫」中搶得最高明，搶得最快，也搶得最隱蔽的，莫過於我的老同學，對他最大的收穫，就是趁工廠發橫財機會，撈到一套100平方的高檔住宅。

工程師住宅樓的興建，是李倫根據國務院檔提出來的，當設計人按照這位廠長的意圖繪製了設計圖以後，財務處曾根據這個設計方案預測十二套工程師樓層，耗資之大，相當於整個住宅投資的三分之一，職工代表大會上，大多數人公開反對工程師樓，主張增加戶數，減少投入。

然而，李友心中十分明白，錯過這一次機會，以後恐怕再也不會得到了。所以，他再次利用權力，武斷做主，批准了工程師住宅樓的設計方案，並從原先用於技術改造的資金中硬撥出錢來，並令頗有「倒」爺經驗的生活廠長蕭肖付，全權負責三幢職工大樓的建築工程。

繼油漆車間動工後僅一個月，雲泉路上的三幢住宅大樓便開始了平填地基。

胖左派再次發表「快訊」，說蕭肖足在確定住宅承包商時，從承包商手中得到了三套紅豆木傢俱的回扣，他除了給自己留下一套，也給李友留下一套，不過，當時在輿論作用下他沒敢接受，等到房子分到手，人們才發現，那套傢俱已放在他的客廳裡了。

用工程師的稱號，修的工程師大樓，主意是李友出的。大樓一修好，罵聲便跟隨著他走墨城而雀起。

就在八四年下半年至八五年上半年，農汽廠走運發財的好日子，也成了「後門」最擁擠的時間，由李友帶頭，工廠各級「領導」都爭著把自己的親戚或「關係戶」子女，巧尋藉口拚拼命往工廠裡「塞」。這些人沒有任何調動手續，就只要廠長們點頭，都可以從勞動人事科進入這家「肥得流油」的工廠。

僅我在的金工車間，在這段時間內招入的「工人」就有幾十人。這些「工人」進工廠後，又被陸陸續續調往各辦公室、後勤部門以及庫房。「後門」現象既已成為工廠常見現象，習以為常，連胖左派的「快訊」中似乎都忘記了這件事。因此，這家千人編員的工廠不到半年便增員為一千三百人！

改革開放年代初期的企業，由政府機關任命管理者，在階級鬥爭年代，窮得沒房住，現在他們發現真正需要的原來是房子，票子和兒子！於是他們便附在剛剛有一點血液流動的工廠血脈上，拚拼命貪婪的吸血。

在所能伸及的範圍裡，用手中的「權」唯恐不及，伸出去的手唯恐不達。在這個中共懲戒貪官的辦法僅限於「黨內警告」的年代，正是中共大小官吏抓緊進行原始積累的大好時機。

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綠燈下，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利用掌權的機會，從上到下的貪污。中共各地官吏無不如此，國有企業更是如此。鄧小平為權力致富大開綠燈。

到了一九八六年以後，中共上層才迫於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不得不對嚙羅們殺雞給猴子看。用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主任余鐵民案子的處理，在報紙上大張旗鼓的給以公佈，以收受賄賂三萬元，判處餘鐵民無期徒刑。其實三萬元是當時高層官員的一筆數目極小的「外快」，三百萬、三千萬又算得了什麼！

到了十八年後，即2004年，中共自己公佈的數字，2004年1~十一月全國抓出的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案子共36509件，涉案四萬多人，增長之快數量驚人，僅僅披露的原溫州市付市長楊秀珠，1996年竟在辦公室裡用批示檔的形式一次就吞了1100萬公款。

僅據1993年全國紀律監察機關向全國公佈的資料，九十年代，共有三萬名地廳級以上官員，因貪污賄賂受到查處。從1990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各種涉及高層的案件110萬件，立案50多萬件。

以我所在這麼一個千人工廠，掌權的管理者沒有不撈的，上面所記僅一年所見所聞，這種制度下吃虧的當然是工人。

不過在這「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底層企業中，蝨子們所吸的血常常面臨枯竭的危險。充滿貪污而脆弱的市場經濟中的國有企業，總是逆著那些做著橫財夢的蝨子們的意願，使他們的夢想在現實中變成了一串串的泡影。

正當這家工廠廠長們為升工資和營建職工大樓鬧得烏煙瘴氣時，85年八月，經營辦公室便向廠長們傳遞當月虧損的報表。報表顯示，因滯銷而造成材料和部件在庫房的積壓已突破了兩千萬，而且當月已呈現了十六萬的虧損。

李友在得到這個報表後，馬上趕到經營辦公室，向全廠職工宣佈已經找到了扭轉虧損的辦法。相信眼前出現的這點小困難，一定會在不久之後得到克服。可惜，那些由一輛輛卡車編織起來的蘭色地毯，每天都在將工廠虧損和積壓的噩耗，無聲地告訴給全廠職工。

正是：「……枉費了意懸半安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多。忽嗽嗽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

### 第三節：遭逢絕境的農汽廠

僅僅保持了半年旺銷的農用車，由於技術落後，產品質量差，在國家取消了向農民貸款後變成了滯銷貨。到了年底，停放在工廠範圍裡已裝好的卡車已超過了五百輛，成了無人問津的積壓貨，地域本來不大的工廠實在停不下，還租用了廠外的場地。

密切關注本廠經營情況的銀行，早已向工廠的財務科提出了「質詢」，認為農用汽車製造廠再不打破滯銷局面，繼續的盲目投入，無疑會造成更多的積壓，工廠像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只好停止注入資金。

老同學已明白，自己已經騎在狂奔的虎背上。農汽廠像一個陷入賭場的賭棍，發夠橫財後，隨之而來的是狂輸。賣不掉的農用車僅僅因為資金凍死，工廠就要承擔可觀的利息，為了減少虧損，最好的辦法就只有停止生產。

但這樣一來，工人領不到工資，一千多人的生存面臨著威脅，工人們首先會到市政府請願，憤怒的工人會砸他的家，一切後果都要發生，當然也包括要到手豪宅全都只好泡湯。

雖然他大不了被撤職或調一個工作，但他經營的一翻事業，和利益全都沒了。這個時候他如坐針氈，他給農業局打電話，給各個在幾個月前熱銷的農機公司經理打電話，想辦法打開銷路。然而，那些熱銷時的酒肉朋友居然不接他的電話，有些連人都不知躲到哪兒去了……

胖左派的「快訊」卻因此發得更勤，把工廠的虧損及時的向大家公佈。從85年年底開始，農汽廠的虧損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銀行首先將準備為職工調整工資的專用儲備金凍結了，理由很簡單，上級有明文規定，處於虧損期間的企業是不能調升工資的，於是吵吵嚷嚷的調資終於沒能實施，這是蝨子們始料未及的。

現在，眼看大禍正在迫近，工程師大樓卻抓緊進度，儘量提前竣工成為李友最關注的事。

工人們在這個時候「團結」起來了，他們自發地組成了以曾元為首的調查小組，收集證據，寫成了馬兵、蕭肖足等人的材料，在這些材料中列舉夥同倒賣鋼材、木料，收受建築承包商賄賂，以及公款旅遊，吃喝玩樂的十大「罪狀」，並以聯名上訪的形式將這個材料送交市委。

在老黃介紹下，各車間準備到市府上訪的工人們找到了我。

我進這家工廠才一年光景，情況並不很熟悉，加上來廠時李友的友好表態，我一時還不好同他鬧對立，但我已經憑著我一年多的觀察，獲得了這家工廠一個輪廓的概念。在老黃介紹下，我把大家提供的情況整理出來，寫成上告材料。

然而，接到這個材料的市委信訪辦經過了一翻「認真」研究，認為現在否定半年前還在報刊上發表「治廠經驗」的「明星廠長」，實在有點自己擱自己的耳光，何況，全國的工廠像農汽廠類似的多如牛毛。

現在最好把這些收到的「檢舉材料」原本的交給馬兵他們，由他們自己來「正確處理」吧！這叫依靠基層！是中共又一法寶，否則全市上千個企業工廠，哪一個沒有這種烏七八糟的事？主管局這幾個人處理得下來麼？

我所代筆的材料，沒有逃出所有寄到上級機關的上告信所共同遵守的軌跡，一個月後便回到了馬兵的辦公桌上。看到這封材料竟是出自我的筆跡，老同學和馬兵感到十分意外。進廠一年半來，由於我的沈默，所以李友和馬兵幾乎將我遺忘。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這些材料令他們震怒不已。

尚在毛澤東時代，投寄這類材料的，是五類家庭出身或本人就是五類分子，那麼輕則把投信人叫到辦公室裡訓斥一通，指責對方無中生有；重者召開批判大會，把寫材料的人抓到鬥爭會上鬥到低頭認罪『當眾消毒』為止，甚至根據材料摘章引句，申報專政機關立案偵察。

倘若是普通職工聯名上告的材料，則由基層黨組織逐個調查。凡檔案中有污點的人，立即傳喚，給以警告。就是『根紅苗正』的革命群眾，也要按組織方式，不能越級突然襲擊。『黨天下』之下，基本上不會有告發組織的材料越級寄到上級部門去。

現在形勢變了，黨內分裂變成公開，腐敗也一天天暴露，五類沒有了，批鬥會也不開了。

有一天，母親從北碚區府帶回了她的好友，北碚九三學社負責人倪爾雲寫給我的一封信，那信上對我才從蔡家鄉下調進這個廠才一年光景，就同廠領導唱反調表示擔憂，她提到了我傷痛的廿年牢獄。

不久，馬兵正式在他辦公室裡向我「攤牌」。那一天，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裡時，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羅志，黨辦主任王珍及金工車間書記幸才已經等在那裡了。看到這個「陣營」，我立即想到我在當年反右鬥爭會的場面。

他輕輕咳了一聲緩和著緊張的氣氛，然後慢慢地說：「你是本廠的職工又是幹部，你應當熟悉幹部應當遵守的組織紀律，我們廠的確面臨著嚴重的困難，今天專門抽這麼一個時間，想聽聽你對工廠領導的意見和建議。」

我瞅了一眼放在辦公桌上由市里退回的這份材料，平靜的回答道：「我向市里寫的那份材料，是受託於工廠部分老工人的意見，如果你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請你提出來。但是我認為既然是上告材料，那麼上級部門有義務替我保守秘密，派人作認真調查。」

現在既沒有認真調查，又原封不動把材料轉了下來，這是什麼問題你們自己清楚。至於我所寫的這些材料雖不可能絕對正確，但那上面提供的事實和證據，我可以對它們真實性負責，但你們也應當對你們的行為負責。」

旁聽的人面面相覷，是啊，誰又能保證上告信上所舉的不會有錯？馬兵嚴肅的臉上迅速換成了笑臉，開始緊張而嚴肅的氣氛緩和下來：「哪兒的話，老孔，我們是想同你交換一下看問題的方法。」

馬兵滿臉假笑：「我認為你看問題陰暗面多了一點，主流卻被你忽略了。比方說：工廠今年的產值和產量都是建廠以來最高的，油漆的技改工程已經開始，車身面漆的起泡和質量會得到根本的改觀，職工的住房樓也是我廠建廠以來從沒有過的。工廠的一窮二白面貌一天天在改觀，看問題不要老看陰暗面。」

不看主流而看支流，這正是中共當年在反右派運動中打擊我們的主要理論武器。可惜，當年右派對共產黨的「攻擊污蔑」不幸被言中，在二十年鐵的事實面前，後來中共給我們平反，正好證明了這點。於是我抬起頭來回答道：

「既然你說看問題應當看主流，我就來談談這個主流吧！你如果是尊重事實的，那麼去年這個時候達標升級整套東西是不是假的？當然，你會說這是為了應付升級，不得不這麼做。那麼工廠靠一時的機遇，把汽車漲價說成是領導的「業績」，是不是也是假的？」

「就算天時地利盈得了一個能使企業發展的機遇，而工廠的領導卻不趕快加強基礎工作，在產品的品種和質量上下功夫，卻忙著在毫無貢獻的條件下搞升級方案，廠級幹部不論其貢獻，就憑職務拿高過工人十幾倍的獎金和升級，問心無愧嗎？平時你們有誰踏踏實實考查過生產怎麼在運行？有誰在認真的關心技術改進，卻在大報小報上吹噓工廠如何提高了產品質量是不是又是假的？」

我停頓了一下，看看馬兵今天招來的人不但沒有反感，還露出贊同的眼光，便繼續往下說：「內部的混亂幾乎無人過問，如果你硬要否定這些，說我寫的材料只看陰暗面，對工廠的成績肆意詆毀，現在工廠每月已經產生了十幾萬的虧損，從整個趨勢看，工廠的虧損已不可逆轉，一旦工廠虧損超過了破產的警戒線，工廠是要破產的」。

「到了工廠無可挽回的時候，恐怕全廠一千多職工便要打你的扁擔，你的職務未必能保住，到時候不但你的升級和住房保不得住，恐怕更可怕的後果都會發生。現在不是追究我所寫的材料是不是誣蔑，而應當把這些工人們反映的材料，當成警鐘嚴肅的加以對待，採取措施來挽救工廠了」。

「同時我還要建議你，你最好公開的把你批示的調資方案宣佈作廢，並主動將自己在這次調資中所升的七半個級，還給工廠，向工人們認個錯，也許還能盈得人心，有助於啟動大家一起止住已相當嚴峻的虧損勢態。」

我的話完結，辦公室裡沈默了，馬兵沈默了，不管他對我向市里投書材料有多麼的反感和憎惡，今天他本想達到制止我的目的，現在也覺得考慮不周。他的沉思反應出他的尷尬。他原先精心安排的，「公開審問」以求壓制不同意見的做法，只好到此收場。

工廠的不景氣卻無情地撩撥著這一千多職工，他們再也沒有像半年前那樣，拿著比工資還多兩倍的獎金，到市場上去稱燒臘打白酒。而是重新回到一年前那窮樣子，同挑擔進城的菜農爭分論兩。貧困激發了他們去市府上告的勁頭，。

然而我一點都沒有因此心中感到舒暢，相反的，焦慮籠罩著我，我所爭取進來的工廠，完全不是當初大家所羨慕的「米兜」，工廠的底子那麼薄，現在又眼看著它朝著破產的軌道猛滑下去，年近五旬的我，恐怕要借助於「落實政策」再跳一次槽就不容易了。

何況我明白在這片國土上，大家都在窮窩裡過，想尋找世外桃源是沒有的，特別是我年近五旬還寄人籬下，若要想從天生橋那又霉又黑的危房中，搬進高樓大廈恐怕就再幹上十年八載，等到我已經退休時都未必如願。

到了這一年的年底，胖左派發佈的廠部「經營快訊」已把工廠累計虧損六十萬的噩耗向全廠職工公佈了。各個車間又一次提前放假，關心工廠前途的中老年職工，到工廠來每天打聽情況。當他們走到工廠後面看到這一天天拔地而起的工程師大樓，不免又一翻強烈指責，他們對這工程師大樓是竭力反對的。

面對職工的反對，李友笑著回答道：「眼看工廠富起來了，今後還要不斷的建房，而建造新房的檔次，只會一年比一年更高，到那時，難道低檔次的房子還要拆掉重建麼？」在他的力爭之下，建房便保留了原來的較高檔次的建房標準，建房預測資金的不足從油漆車間的資金去挪用。

由於資金枯竭，油漆車間已完全停建。現在工程師大樓已經矗立在地面上，李友面對的除了罵聲和爭吵什麼也沒有。這一次，胖左派站出來大罵馬兵和李友，說他們那還像是工廠領導，簡直就像一群蛀蟲。

工程師樓已接近竣工，老同學十分清楚，全廠一千三百雙眼睛都盯著這五十六套新住宅的分配。除了這五十六套新宅分配，還會帶來五十六家遷居人所住舊房的再分配，這可是一件隨時都會帶給他煩惱和不安的頭等大事。

在他的幕僚策劃下，仍以勞人科紅頭文件的形式，向全廠頒發了一個「關於六號七號樓的分配方案」，為穩住全廠主要技術骨幹，讓他們在分房中站到自已這邊來，這個方案明確，凡工廠裡有工程師稱號的十二個人，都會分到一套「工程師住宅」，

這一次，李友算是聰明一點，不再將自己的親友拉出來充當分房領導組的成員，而是將分房領導小組的權力，交給了素與他貌合神離的付廠長王泉，條件是許給他本次分房權。這等於將分房的矛盾，全部轉嫁到他的身上。

從十一月份開始，一場分房的明爭暗鬥，就在李友與王泉為一方與全廠一千多戶職工之間，勃然掀動了。每天分房領導小組辦公室門剛打開，等待的人擁進來以後，便是一片吵架聲。王泉雖然得了一套意外的住宅，但是他必須承受精神上的高壓和對付各種質問。

老職工在子女的陪同下，向他傾訴成古八十年的住房辛酸；中年職工逼著他出示本廠分房辦法的政策依據，列數鄰近廠礦是怎麼來分配住房的；魯莽的年輕人用拳頭和石塊警告他看著辦。

他一時成了全廠的磨心，又是李友最恭順的奴才。可惜唯一能依託的李友卻用陰陽怪氣的態度使他為難。

老同學這些天是格外的小心，晚上從不出門，白天走過牆邊或屋簷下都要警惕的東張西望，害怕隨時都有一塊飛石從不知那個地方向他的頭上飛來。

人活到這個份上才體會到當廠長的悲哀，這時他時時從心裡咒罵一年前把他捧成明星的政府官員和別有用心的記者。

十二月初，當整個住房已經粉刷和外部裝修，完全可以住人的時候，四十八套新房的分配名單以及五十六套舊房的「再分配」名單，在辦公室大樓下面的公佈欄中貼出了第三榜，在圍觀者的一片咒罵和怨聲中，王泉在辦公室裡，突然得到後勤科的報告，說有三家住宅，房門已經被下了鎖。

三戶人家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神不知鬼不覺的搬了進去。他聞報不敢怠慢，立刻電話通知了李友，電話的這一頭氣急敗壞，而電話的那一頭卻冷靜如常。也許李友早料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或者明知而故作鎮靜。

兩分鐘後，保衛科長率領兩名保安，趕到了搶搬地點，然而面對搶佔戶的一家老小，誰也不敢動手！李廠長的指令是將搶佔戶拉出來，將他們的東西甩到馬路上去，但是那一家在工廠都有三親四戚，師兄師弟。保安們誰都不是傻瓜，甘心為李廠長當槍手使。

在王泉親臨現場的督陣下，只有軟硬兼施，一邊勸說，一邊動手將搬進去人家的家俱一件一件的又搬回原來住的高棚裡，許諾在舊房子的調配中，給他們增加舊房的面積。

正當大家為分房而拼殺之際，農用汽車廠的虧損卻像下坡滾去的雪球，越滾越快，越滾越大，到了這一年年底工廠累計虧損已逾百萬大關，去年同期那種高獎金和名目繁多獎項的熱鬧局面，已經消失。工廠已經連續四個月沒有發一分錢獎金，為了過年，老同學七拼八湊每人發了三十元錢的過年費。

在年底召開的工作總結會議上，曾科長以質問口氣要書記和廠長就工廠在本年度工廠規劃實施情況，向全廠職工工作一個交代。還就新建的職工住房大樓的建設和分配，提交職工代表大會專門進行「審查」的建議。

經過他的「點火」，到會的人紛紛向老同學責問起來，工作總結會變成了牢騷指責會，使老同學感到十分狼狽，一年前他在全廠年會上的自我陶醉已變成了沮喪。除夕的茶話會也取消了，只在食堂裡進行了冷清的「聚餐」。

為了防止意外，老同學像偷東西似的趕在除夕前一天，顧用幾個捧捧，最先將自己的家從三合院裡，搬進了他籌畫整整一年的工程師大樓。搬完後他才獨自坐在寬敞明亮的大客廳裡，深深地舒了一口氣，慶幸自己平安喬遷。

這時候他感到了一種喪家之犬的悲哀，他真的沒想到他的好景竟轉瞬即逝了，剩下來的殘局該怎麼收拾，心中沒有把握。也罷，充其量工廠垮了，自己再調一個單位的想法又浮上腦際。無論如何，住房總算到手了。夜已深了，心裡特別的悶，信手推開臨街的窗子。

黑夜中，他似乎聽到樓下過道上腳步急促，意識到又有誰連夜在搬家，定睛再看，朦朧的路燈下，王泉和老婆，兩個兒子也像是做賊一樣的將家俱朝剛剛分到手的房子裡搬。他鄙視的向下淬了一口唾沫罵道，「賊兒子，全是賊。！」

1985年底，五十六戶人家忙著搬家，在第一輪競爭中沒有分到房子的職工，繼續地圍住分房領導小組的幾個頭，一面吵罵著，一面等到舊房子的再分配。王泉既然已占了房子便學著李友躲起來了，當然，無論是李友還是王泉，在工廠那一個角落都會聽到滿街對他們的責罵。

他們只能把自己的房門關緊，只當什麼都沒聽見。三十晚上，圍爐吃年飯的農汽廠職工沒有幾家沒在詛咒，他們把無錢過年，無房可遷的罪過。一股腦兒地傾瀉給老同學，以及與他並駕齊驅著農汽廠的同僚們。

然而在我的記憶裡，自回到重慶，沒有比此時更冷的冬天了，當時對於我來說最最重要的便是一塌之地，我沒有老同學的福氣，也不存在他那種有了房子還要圖更好房子的貪婪侈望，看到工廠如此糟，我只求一間乾燥一點的舊房子便心滿意足了。同這個工廠的工人們相比，我可是連舊房都沒有一間啊！

晚上我睡在那充滿霉氣的危房裡，望著頭頂上那已經折斷，隨時都可能垮塌下來的房樑，眼前浮現出全廠爭奪五十六套新房子的那亂勁，想到倘如在這一次舊房大調整中，再不爭得一間舊房子，我就可能流落街頭了。

何況我的這位老同學還在各種會議上一再宣稱，本次分房向知識份子傾斜。第二天，我帶著這個理由到分房領導小組去，請他們在舊房調整中給我考慮一間舊房。得到王泉的答覆令我感到寬慰，他說：「你儘管放心，我們一定會按規定處理好你提出的要求，使你滿意。」

可惜，我完全沒有料到這個答覆，夾雜著奸意。十天以後，在公佈舊房調整名單時，滿有把握的我竟沒有看到我的名字，開始我還不相信我的眼睛，從頭到尾再看了一遍，依然沒有我的名字。周圍的工人看見我焦急的樣子，有人給我打抱不平，他們都因為親眼目睹，每天清晨我馭著兒子上班的那種狼狽相像。

於是我第二次跨進了分房領導小組的大門，王泉不在，大概他又避風頭去了，接待大家的是勞人科的崔科長，聽到我的責問以後，他翻著白眼回答道，「你進廠時不是親自寫過不要住房嗎？怎麼，親筆的諾言不算數？」

這一下子我完全明白了，我的住房問題是老同學和馬兵商量好了的整人行為。否則這崔科長怎麼歪曲我進廠時的本意？甚至還專門查了我進廠時的檔案。我回答他：「當時由於李友說，暫時沒有住房給你，等以後有條件時再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種放棄住房作為進廠先決條件的承諾，永遠不能曲解為在工廠有房時，我也不要。」

我一個落實政策的人，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你工廠有房時不給我，是承心給我為難吧？再說，你可以把我進廠時填寫的東西拿出來公開嗎？」

這麼一逼，「吹」科長開始那輕蔑態度收斂了，推說道：「我也是執行上面的意思，至於你填的表根本是不可能拿出來公開的，那可是在你進廠隨調的檔案裡存放的。」看來我給市委寫的信，確實給我帶來了麻煩。

我現在才體會到了什麼叫「收拾人」，什麼叫軟打整。比起不動聲色的老同學，比起年輕氣盛的馬兵，我遠遠不是他們的對手。但是事情既已經弄到這一步，我就只能迎戰了。於是我準備立即進城去市政府信訪辦公室找張文澄。

但再一想，落實政策我已經麻煩過他了，他當時毫不猶豫的給我開介紹信，給我調動開綠燈。現在又接而連三地為我個人的住房，再去找他，於情理上顯得過份，雖然同是右派，我不能為個人問題再給他出難題，何況我們素無交往，僅憑都是同一運動的受害者這點同病相憐之情。如此一斟酌，我便躊躇起來。

想到已經和老同學鬧翻，我給市委寫的檢舉材料還捏在馬兵手裡，倒不如把臉撕破，用二車間那王，周兩位女將的辦法，興許還可以奏效。何況在住房問題上我是無房者，再不力爭，我可是真要露宿街頭了。而老同學卻是高檔房的利益佔有者，我撕破臉鬧起來他肯定會心虛。

我決定去找他，然而一連幾天老同學好像駕了土遁，從農用汽車廠消失了。每天辦公室裡見不到他，夜晚去敲他那鐵門，沒有絲毫回應，鄰居說「李廠長從那鐵門的貓眼上就可看清來人，看來他躲起來了。」

我不得不寫了一封掛號信，交到了重慶市政府，一個月以後，區政協主席張××親自來到了農汽廠，對廠裡的住房分配進行「專題調查」。預先他就給廠工會打了一個電話，詢問到我的住房，希望他們妥善的處理。張主席的到廠觸動了工廠的神經，出來擋駕的是工會主席向雲。

向雲在工會的辦公室裡接待了張主席，並向他介紹了一名至今三代人共居一室的一個老工人，以此證明工廠確實沒有房子分給我，這位老工人一家人分居兩處這個真相，卻被向雲隱瞞了，中共黨員沒有其他能奈，唯有這種編假說謊個個都是能手。

既已驚動了上級，又有張主席的調查，老同學知道情勢不妙，迅速轉舵，指示黨委付書記施安出面，將離廠兩公里以外，地處文星灣熊家院的危房群中，一名後勤雜工騰出來的一間大約二十平方公尺的危房打發給了我。

當我不久在廠門口見到這位老同學時，他故作驚訝的說「啊呀老同學，你的住房我們早就考慮了，工具車間主任本次分到新房後，騰出來的兩間磚結構的房子，就是專門安排給你的呀。都怪那王泉太不會辦事，這家人搬出來空出來的房子卻沒有上鎖，便給另一個工人鑽了空子，擅自搬了進去。

我還為這事專門追查了王泉，現在那占了房子的工人，也趕不出來了，沒辦法我們為你的住房，專門開了辦公會，研究了一個多小時，才決定把文星灣蔣老工人搬出來的房子，安排給你暫時住下，施書記給你落實好了嗎？」

我望著他那假惺惺的樣子，實在是太令人噁心了，要說他低能，可在玩弄兩面三刀和整人的戲法，卻不能同他相比的。但事已至此，心中在忿忿說，都怪我自己瞎了眼，怎麼會鑽到你當廠長的這家工廠來！

同這樣的小人生氣真是犯不著。他見我沒有任何反映，假惺惺地說：「這幾天分房子真太亂，文星灣那房子如果已經騰出來了，那麼你要趕快搬進去否則再被人占去，就不好辦了。」說畢他嘴角邊流露出得意的奸笑。他真還以為這樣收拾我，洩了他那卑鄙報復的私憤。

為我個人住房在廠裡攪起的風波，曾科長找到了我，從他那裡我才知道，這文星灣的破房子是農汽廠的職工都不願搬進去的，除離廠遠，上下班不方便外，那房子是一間漆黑的口袋屋，白天沒了電燈，就什麼也看不清。由於年久失修，每逢颶風下雨，多年的揚塵會像細霧一樣瀰漫整個房間。

更重要的是分房條例中有一條沒有公開的「內部規定」，凡有私房的，或廠裡所屬住房在主城區外的，一律沒有分配新住房的資格，文星灣屬於主城區外，所以我只要搬進去了，今後再不要想參加工廠新房的再分配。



我不禁讚嘆這位追求虛名，見利忘義，治理工廠毫無能力的老同學，將中共鬥爭的這一套兩面三刀，借刀殺人的鬼把戲操練得如此純熟！為了報復這一個「異類」，竟在住房的分配上玩弄了這麼多心機！

人心叵測，什麼事凡不涉及自己切身的少說為佳！但秉直的我永遠都改不掉我的老脾氣。粉刷一通，第三天便搬入了「新居」。

在那裡整整住了三個冬夏，那時我已半百年紀，從搬進去的那一天開始，我的三歲的兒子，每天早晨六點鐘就被我從被窩中叫醒，匆忙的吃了早點就將他馱在我的肩上，步行兩公里，將他送到托兒所後，我又步行到工廠上班。

由於匆匆趕路，完成這種「苦力」後，我常常汗流浹背，再加上居住條件惡劣，原先監獄受到折磨，身體本來就多病，所以我三天兩頭的感冒、拉肚。命運折磨著我。

就這樣，我的孩子在我的肩上渡過了整整四年的童年，直到七歲他上小學，我們才重新搬了家，結束這段扛著孩子，早上「晨練」的生活。

好在，文星灣的老宅院裡雖窮陋，但鄰居卻十分的和睦敦厚，隔著天井，對面住的幾家人都是重慶棉紡五廠的退休工人。

當他們目睹我的困難，孩子那麼小，我的年紀又那麼大，上班那麼遠，請不起保姆，實在照應不過來，有時家裡沒人的時候，又正碰上托兒所裡放假，孩子沒人照應，他們會主動的義務照看我們的孩子。

晾在天井裡的衣服，下雨了，他們會幫助我們把衣服收回來，上街買菜順便給我們帶些回來，這些細小的事表現出來的關照都深深打動我的心，讓我牢牢記著這些善良的鄰居。

那時，我們的住房靠近嘉陵江邊，我和孩子經常在星期天去河邊，捉蝌蚪和小魚，當春天到來時，我教孩子做風箏，去寬敞的河邊去放，我的心回歸到童年中去。

中國民眾的人性和互助，雖經中共摧殘變得冷酷，但在老百姓中她依然溫暖著每一個人，住在文星灣那破舊的大宅院裡，就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裡。對面的劉爺爺和胖胖的劉婆婆，像親人一樣，關照我們並溫暖我們的心。「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廿兩棉花裝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鍋。」那時生活雖苦卻感受到人間的暖意。

而住進工程師宅的李友竊喜後，馬上就陷在矛盾之中，他的住樓是在缺資金情況下靠挪用油漆車間的專款建立起來的，遇到貪婪的蕭肖某，馬虎的工程質量很快顯現了出來。

新宅搬進去兩個月後，趕上第一潑春雨，雨水毫不客氣地從牆壁的裂縫中，滲進李友的客廳裡。雨水浸進了廚房，那從牆上浸出來的黃水流進了他的天燃氣灶台，他把後勤科負責施工的人叫來責問，那人指著蕭肖某住的地方說他心太黑，吃的回扣太狠。

那施工員承認，地板和糊牆用的水泥全是次品。不過李友也只好背著蕭肖某罵娘，當著肖的面還不敢吭聲。

繼85年虧損一百萬之後，農用汽車廠從一九八六年開始，便以每月三十萬虧損的不可逆轉的頹勢，向破產絕境「大滑坡」。當然農汽廠是同一時期國有企業的一個，但卻是當時全國國有企業的一個縮影。

國有企業相繼在市場經濟的風浪中紛紛倒閉，中共把「工廠破產法」向全社會公開宣佈，被中共奉為絕決不放棄的公有制禁區被打破了，我在的廠不到兩年時間便從全川盈利大戶，變成一九八六年四川省名列第三位虧損大戶。

工人們的上訪，使市政府不得不關注這個被他們捧紅的「明星」企業。機械局組成調查組到廠調查時，問到他們私吞工廠的穩私，大家緘口不言，使局裡派來的人莫衷一是。李友是他們瞎吹出來的明星，而今怎麼自圓其說？調查組只好勒令李友限期整改，止住虧損勢頭，否則只好對他「組織」追究了。

不過李友並不是沒看到今天這種結局，他也不是束手待斃的高囊廢，在他任廠長時，供應130底盤的南京汽車聯合公司，看準他的虛榮心，除在上任時特邀他參加南聯公司的年會，還特別將他的名字寫在董事會常任理事的

名單上，在私人利益和個人虛榮心誘惑下，李友同南汽的接觸一直在秘密中進行著。

南聯公司為實現在西南建立銷售和組裝基地的計畫，以便打開西南市場，打算在重慶建立一家南聯集團的子公司。但是當時重慶政府出於地方保護主義的立場，一直拒絕將農用汽車廠變成南聯集團的子公司。

眼下看農用車滯銷，日趨嚴峻的虧損，加快了李友依靠南聯的步伐，他向重慶市政府建議，認為如能投靠一家大企業也未嘗不是一種上策。

南聯集團的董事會成員便帶著進一步接收這家工廠的決定，來到了重慶。當南京的客人剛剛走下飛機場，迎接「貴賓」的是李友和馬兵。

南京的貴賓一走，李友像被注射了一針強心劑，精神振作了許多。他隨即召開一系列的生產會議和經營會議，向與會者宣傳目前在市場競爭中，由於設備陳舊，技術落後，資金困難農汽車廠很難存活，只有尋找與有實力的大企業合併，才能活下去。

正當他焦慮萬狀之際，卻收到了南京汽車公司董事會發來的請貼，要他參加一九八七年度的董事會新年團拜。他豁然心中一亮，明白這是一次將農汽廠歸併為南聯汽車聯合公司的一個絕好機會。他決定利用工廠法人的機會，抓住這一根從天而降的救命稻草，借南聯的資金和力量解脫捆在他身上的繩索。

併入南聯後，幾百萬虧損一筆勾銷，工廠也可以引入南汽的品種和其他專用車技術。經過一夜緊張的思考，他終於破釜沉舟，準備迎接一場「地震」。弄得不好，他會因此而下臺並受到處份，弄得好，他會因此而解脫。

第二天他便從家裡打了一個電話到廠長辦公室去，說他去市里開會。便獨自一人在家裡正式的向機械局某局長，起草了一份進入南聯的絕密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把工廠虧損的原因歸結為工廠缺乏技術設備的落後。

現在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只有向國內有實力的大公司敞開大門，走聯合的道路。否則很難依靠自己落後的車型和技術走出困境。

同時，他拿出幾天前起草的向上級的報告，寫到工廠虧損的人為原因時，將責任全部轉嫁給馬兵和蕭肖某兩人身上。這兩個人原是他上臺時，由上級安排在他身邊協助他的臺柱子，在農汽廠發橫財時，許多撈私利的鬼主意都出自他們，因此成為他最好的密友。現在眼看厄運已至，他只能分道揚鑣了。

但這種在背後下刀的做法，終於點燃了一場內戰……，李友寫完報告立即進城到機械局，交給局辦公室秘書，隨接去了機場。

正當李友同南汽的主人碰杯互致一九八七年新年快樂時，他卻接到了機械局發給他的加急電報，催令他立即返回工廠，李廠長敏感到「招回令」中，某種不祥已經發生了。當他趁坐的飛機在江北機場著陸後，提著行李走出機場四處張望，卻沒看到往常在機場停車場裡場部派出的皇冠車。

這已使他不安起來，在機場電話廳裡他接通了廠部辦公室的電話，廠長秘書回答他，小車已經派出去另有任務，所以只好委屈他自己坐公共汽車回來了。

在汽車上他的思緒非常複雜，到北碚下車時，他想立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沒有人來接他並預報情況，只好硬著頭皮匆匆步行回廠。跨進工廠的大門門衛只朝他點了點頭，好像並不知道他剛剛出遠門歸來……

匆匆走進辦公大樓，平時見到他畢恭畢敬的廠辦主任不知那裡去了，這才發現整個辦公大樓裡，除了過道上平時做清潔結的臨時工外，一個人都沒有。進得辦公室忙去翻日曆，今天是星期二不可能放假，他們都上那兒去了呢？

正躊躇間，辦公室桌上的那架電話鈴響了，接過話筒原來正是辦公室主任打給他的，叫他半小時以後，立即到廠部大禮堂開會。

他的心中一驚，彷彿他的辦公室已四面布控，牆上全是竊聽器和攝像的鏡頭監視著他一舉一動，暗覺奇怪，那些平時仰仗著他開後門進廠的親戚朋友，和受過他的小恩小惠的人們，都到那裡去了呢？誰把這裡發生的情況通告他一聲，也好讓他有一個準備。

看看牆上掛的那張中國地圖，在大陸那張海棠葉上，重慶相距南京那麼近。

拿起電話筒想向南京方面掛一個電話，卻沒有打通，這才想起臨去南京時，他已將長途電話上了鎖，忙去皮包裡翻找鑰匙，但轉而一想，事情還沒弄清，向對方告訴什麼呢？就是發生農汽廠已把他就地免職，這個南聯分公司難道還能塔救他不成？

看來現在只能乖乖的按別人給他布下的路，硬著頭皮走下去了，於是便匆匆地離開了辦公室向大禮堂方向走去。

走進會場的第一眼就看見那個平時對他千依百順的廠長辦公室主任，正在會場的主席臺上忙著張羅，主席臺上機械局的高局長和曹書記已坐在主席臺正中，幾個付廠長坐在兩旁，連馬兵也坐在上面。心中已覺查自己陷入了陷阱，可惜為時太晚，硬著頭皮向前臺走去，那辦公室主任從左側的樓梯上走了下來，招呼著將他安排在台下落座。

直到現在，他終於明白了他所要面對的現實：主席臺上已沒有他的座位，他已被免職了。在無數雙含著敵意和渺視的目光逼視下坐落，把頭埋得低低的。

會議開始，氣氛嚴肅。主持會場的廠辦秘書宣佈全廠起立，唱國歌。他從座位上站起來，兩腿僵硬發直，依然保持著低垂頭的那種反省姿勢，有點像站在高高的懸崖上失足滑落下去的感覺。心中一陣緊張，也不知怎麼坐下來。

耳朵卻緊張聽那喇叭裡傳出來的聲音，機械局曹書記不緊不慢的宣佈道：

「今天我代表機械局向農用汽車製造廠的全體幹部和黨員宣佈機械局一九八七年第一號檔「關於農用汽車廠的任免決定」。……李友聽得非常真確那1號文的第一條就是將他就地免職，卻一字都沒有提到他另調其他崗位的內容，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大概因為預先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他耳朵裡發著嗡嗡的長鳴。尤其是使他痛心的是全場雀躍，歡呼聲中夾雜著十分熟悉的咒罵聲，有人喊道：

「要李友回答他把工廠搞得了資不抵債了，工廠關門了，我們的飯碗找誰去？」；「不能就這麼一個免職讓他便宜地下臺」；「你不是在一年前還許下那麼多大話，今天要你回答我們，我們這些普通職工拿你怎麼處置？」

人們憤怒的吼聲使他無地自容。現在他完全明白了，兩年前自己被人抬得高高的，現在他已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他感到一陣陣的心慌，喉嚨裡一陣發癢，猛咳一聲，咳出來的竟是一口血。他終於徹底地崩潰了，癱在座椅上。當他的家人聞訊，將他扶出會場時，他的耳朵裡分明還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向他喊道：「李友，別裝熊，拿出你上報紙的威風來，別像臭狗屎」。那分明是總工程師的聲音。

從「政敵」嘴裡說這樣的話，本不奇怪，而今聽去是那麼挖心的痛。他想回答他：「你身為廠領導，難道出現這個局面你沒有一點責任麼」？但他實在沒有氣力說出來。

在家人的摻扶下，他不知怎樣跨進五號樓他家的那扇鐵門。「家」倒是挺氣派的，今天就連那套肖付送來的紅木傢俱也擦得發亮。當著眾人受羞辱的那種感覺坐在家裡的太師椅上，變成了一連串的焦慮，兩年來體驗的「橫財」，會不會受審計部門和紀檢部門的清查和追究？

一會兒又在想，今後去工廠上班到那一個部門報到？千萬別弄到總工辦或技術部門，那些人都知道他的底，自己隨時都是別人踏的對象。

當他的妻子催促他趕快換一件衣服去醫院時，他才猛然想起，剛才才咳過血，心裡一陣害怕，好像死神就在他房間的一個角落裡向他窺視，覺得喉嚨裡癢癢的，好像又有一口血要咳出來……

正當他被兩個早已等候在那裡的侄兒扶著走下五號樓的大門時，猛然聽見三樓的窗口鞭炮聲大作，他下意識地抬起頭來，只見那窗口正對著的陽臺上，吊著一長串正在乒乒乓乓炸響的鞭炮，那旁邊還掛著一幅長長的字聯，上書「送瘟神」三個大字，那分明是××工程師幹的事。

這人素來看不起自己，這次分房給了他一套自己一樣的住宅，意在安撫和收買，誰知道他並沒有感謝李友的恩惠，反而認為，李友不過是借工程師們的名來拉攏他。所以在自己最窘迫時「落井下石」了，心中一恨，喉嚨一癢，又咳出一口血來。

此時他才覺得虛弱得很，對人們這種公開的羞辱除了只有「忍」以外，連反唇相譏的力量都沒有。

這正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花柳黃，一載赴黃泉。」

關於對農汽廠人事任免的決定中，紅頭文件中接替他的是機械局一名姓孫的處長，同時還任命總工辦的副付總工程師王桂林為常務副付廠長。

黨委書記馬兵雖被免職，卻調到重慶市汽車公司擔任那裡的黨委書記，蕭肖付剛被調到北碚區鄉鎮企業局但任了付局長，兩人明裡撤職實際上是升級了。尤其是蕭肖付，在鄉鎮企業局撈油水的機會更多了。

李友，則因為向上級參奏了自己的同行，破壞了「行規」，才落得替罪羊的處境。若不是他在市委裡的姊姊姐姐，說不定會落到想不到的泥潭之中。

誰教他心太大，倘若他放棄了南聯的計畫，老老實實接受上級的保護，還不是照樣同其他人一樣，異地發財？而今他氣得吐血，擔驚受怕成為全廠笑料，是誰造成的啊！也許他真是被新聞界，捧得昏了頭。

其實在國有體制下那有獨闖天下的奇才，靠吹捧鄧小平而發的全國著名巨富牟其中，最終以詐騙外匯罪淪於武漢監獄。自吹創業的天才，在中共炮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過是為一定政治目的炮製出來的玩偶。

玩偶是沒有獨立人格，也沒有他們獨立生存的土壤，所有改革家都是依附於中共皮上的氣泡，像幻影一樣出現於瞬間，又消失在剎那。

不過，被這種「政策」作弄得最慘的，還是農汽廠一千多普通職工，按照銀行接到的指令，虧損的農用汽車廠的虧損額，早已超過了倒閉的警戒線，工廠已領不到職工的基本工資，只能按每月領取幾十元的「救濟金」。據銀行說，李友為了不准在他任職時就停產，結果積壓的農用車變成了一堆堆的廢鐵。

胖左派站在黃色大樓最高的石梯坎上對著全廠搖頭哀號道：「完了，農汽廠完了，我們也完了，工廠死了，我們就此等著流落街頭」。接著又指著黃色大樓大罵道：「你們這群敗家子，工廠賺了幾個錢，你們自己吃花不算，還要請客送禮，巴結記者，現在幾個錢被你們吃完了，你們卻像蝗蟲一樣飛走了。」

機械局新任命的「領導」絲毫沒有阻擋虧損下滑的能力，陷在廠後坡荒草泥濘中的農用車，依然靜靜的躺在那裡鏽爛，大家在唾罵李友出了一口惡氣以後，不得不重新回到嚴酷的現實中，我們已經有兩個月沒領到工資了。

在廠的生產經營會議上，個子矮矮的孫廠長像菩薩一樣，眯縫著眼睛一言不發，那王桂林卻操著廣東腔的普通話，呱呱空喊著強化產品管理的空話。銷售公司在他的主持下開的會爭吵一陣，毫無結果的散會了，車間照樣死氣沈沈金工車間聯繫了渝洲汽車廠，為他們加工車身覆蓋件和非標……。

過年時，由於農汽廠不斷有人上訪市政府，他們怕年關之際，被逼的工人會在春節期間上街鬧事，為穩住危機四伏的國內形勢，維持中共控制下表面歌舞昇平的政治氣氛，市政府悄悄向銀行指示，農汽廠的職工總算領導到了一九八六年底所未發的工資。

然而一九八七年春節一過，工廠又是兩個月未領到工人的吊命錢。當工人們圍著新來廠長向他索要維持生計的基本工資時，這位上級派來的廠長兼書記竟然喊道：「你們向我要，我向誰要？有種的就不要向我要，我帶著你們搶銀行去」。

第二天，黃色大樓的正門上，貼出了一付打油「對聯」，上聯是「桂林貧（憑）嘴一付畫（話）」下聯是：「要搶銀行找有餘」，橫批「左右無路」，那分明是寫王桂林和孫有餘的「無能」。

農汽廠在一團死水中掙扎，到了這個時候，反倒有人替李友打起抱不平來，公開說：「這是市政府的小人們搞的陰謀，如果南京集團兼并了我們，恐怕也不致於落到今天連飯都沒有吃的地步」。

曾元領著幾個老工人去找剛剛赴任的市委書記蕭肖秧了……

#### 第四節：柳暗花明

事情既然鬧得市政府整日不安寧，新官上任三把火，蕭肖秧親自過問此事。一個「明星」企業才一年多就走到破產絕路，新聞界一苴要弄明白，想炒作一翻的事，也該到水落石出的時候了。

蕭肖秧批示，令機械局派出工作組弄清情況，採取措施，務必與以解決。一九八七年五月，接到批示的機械局，組織了以付局長為組長，市汽車公司生產科長，李倫為付組長的「扭虧幫促小組」進駐本廠。

當中國商品經濟的大潮，第一次衝擊苟延殘喘的封閉式國有企業大門，使毫無生命力的大鍋飯企業遭遇與農汽廠相似厄運時，中共基層中，一些從事國企管理多年的「才子們」，從旁邊看得十分清楚中共國企的病。他們想嶄露頭角，一抒舒多年被壓抑的身心。

紛紛倒閉的國有企業，給了他們一試身手的機會，因為他們相對超脫了那過時的僵死思維方式，敢於試探一下新的企業管理方法，成為第一批轉型時期草創性企業家，登上了中國這一時期的「經濟舞臺」。

例如當時聞名全國的史玉柱，以及張樹新和她的贏海威，支撐他們的只有一個動力；成名成家。毛澤東禁了一輩子的事，被突破了。

身高1.88米的李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推動他勇於挽回這個資不抵債，瀕臨破產絕境企業的動力，是他從不惑之年一事無成中感到時不待我的緊迫感，他決定抓住這個嶄露頭角的機會……至於他是否洞察國企致命之處而有起死回生的「秘方」？我可不知道。

中共的後極權時期依然緊緊依靠國家權力的控制，使權力以追求金錢為目的，便是貪污，行賄滋生的原因。這種交易出現李友這樣的怪胎，權力捧著他上臺，並指揮著這個傀儡演出一出又一出的醜劇。

在企業毫無根基的條件下，用「假」報表，假資料換一頂上等級的假桂冠，利用農汽廠短時間的發財，讓這個木偶一再登上媒體和廣告的舞臺，為行將就木的國有制唱讚歌。最後在企業跌入不可自拔的泥坑時，便將這個被他們捧上舞臺的是明星「寵兒」重重的扔進垃圾堆中。

李友的可悲就是他的那一顆被中共牽著走的虛榮心。機緣使他成了明星，又很快把他變成垃圾，它失敗的全部過程被旁觀的李倫窺測清楚了。

李倫清楚地看準了，中共體制下的企業管理和官本位之間，許多完全可以利用的「中空」。這種漏洞百出，憑一人決斷的體制可以牽著它走，成為一時，一地資產聚斂的源頭。

這同蒙在鼓裡的被人玩的木偶不同，雖然挽救這麼一個看似沒有希望的企業困難重重，前途渺茫茫，但是只要牽牛鼻子，這種局部性成功完全是可能的。這種成功的奧秘是當時以上管下，絕對服從的官僚體制還沒弄清的。

剛剛開始「摸情況」的李倫，每天夾著一個日記本，開始了他那種意志和體力的馬拉松運動，他最先就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平素愛發牢騷，被工廠領導視為「搗蛋」的胖左派們，他想這些人總有獨到之見。

同他們中的年長者交朋友，稱他們為挽救工廠難得的「智囊團」！給他們提出一個問題，「假如你現在當廠長，該先從那些事著手？」「家」由這些平常一貫唱反調的人來當，「策」自會出現。他認真的傾聽著每一個新穎的意見，將這些意見寫在筆記本上，編成了一幅治廠蘭圖。

古希臘偉大哲人蘇格拉底說過：「當許多人在一條路上徘徊不前時，他們不得不讓出一條路，讓那些珍惜時間的人走到他們的前面去」。懷才不遇的李倫當時看準了農汽廠十分糟糕，迫使不敢接招的庸才們為他讓路。所

以他得到了一次嶄露才華的機會。

我同李倫的初交開始於同車間管理的一次碰撞。事情得從1985年十二月馬兵因我向市委寫的信，同我的那場舌戰開始。那一次舌戰，使我成了整個農汽廠領導班子的「眼中釘」。其實我進廠兩個月便要求下車間的舉動已向他們表示，我對工廠的權力爭奪毫無興趣。

我之所以向市委寫信，一方面是工人群眾的推動，也因為工廠搞得這樣糟，別說住房連工資都發不起，我的生存受到了威脅。然而當我通了馬、李的馬蜂窩後，我受到了諸多的威脅，不但在分配住房時給我穿小鞋以示警告，工作上也被壓制，受到歧視。

論學歷和工齡，還是能力，早就該得到工程師技術職稱的我，進農汽廠已三年，每年年終，由技術部門和勞人科向機械局上報職稱名單中，從來就沒有我的名字。理由是，你在重大唯讀了三年，不具備本科畢業的水平，何況以後因勞改而荒廢學業多年。

但是我自調入這家工廠，便在車間埋頭苦幹，自修完了汽車製造的大學專業課程，很快恢復了被中共荒廢的學業，親自設計和製作了許多簡易的夾具和模具，成為當時全廠百十名技術員製作工藝裝備最多的一個。

正當李友被免職，陳桂林主持工廠的技術生產指揮時，發生了一起價值大約八萬元的鑄胚報廢事件：因為翻砂木模失修，造成模芯錯位，五千件鋼板彈簧後支架的翻砂鑄胚的翻孔位置錯誤。倘若仍按原來的加工路線選擇粗基準時，眼看將導致五千件鑄胚全部報廢。

負責胚件供應的生產科老張，把我叫到堆放胚件的現場和我商量，他提出這批胚件，更改粗基準的加工工藝建議。我經過實地測量同意了張師傅的意見，工藝科的人竟說我不知收了鑄造廠多少回扣，在生產科填報的回用單上大筆一揮將這批五千件鑄胚全部報廢。

當然報廢的是工廠的鑄胚，損失是工廠的，與我無關。但迂腐的我卻認為眼下工廠正在虧損，毫無道理的將這批可以使用的鑄胚報廢回爐，等於往虧損上雪上加霜，問題吵到了陳桂林那裡，那陳桂林皮笑肉不笑的回答道：「報廢了的東西誰使用出了問題，便由誰負責，我看，乾脆報廢算了，損失一點不傷害人，何樂而不為。」

我不甘心這種不負責的處理，中午自己動了刨床，想用事實來證明這是一批不該報廢的鑄胚，沒有料到那刨床上值機的工人發現以後，罵我是一條廠長的看家狗，工廠到了這個時候已無是非可言。

既然對是非沒有了判別的標準，我還有什麼必要在這裡上班呢？便向車間主任遞了一個請假兩個星期的假條，回到家裡，晚上面對床上睡著的孩子獨自發呆，工廠陷入破產絕境，今後該怎麼辦？我現在才感到出獄後第一次面對生活的壓力。現在我再去找市裡面的那一位當官的都沒有用了。

另調一個單位，調那裡？我已五十歲了，效益好的單位接受我麼？正為難之際，一個星期以後的一個下午，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突然出現在我所住的文星灣三合院的門口，他戴著一付寬邊眼鏡，一邊向院子裡的人打聽我的住處。

正在猜測來人是誰，他已向我的屋子走來。跨進院子大門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他的一雙大手，自我介紹說：「我姓李，是一個剛剛才從扭虧工作組正式轉為重慶農用汽車廠的職工」。

我很詫異的的握著他的手，猜測來人的意圖。握手以後，他便四面環顧，打量著我那陋屋的門口和院子的整個環境，說道：「我是在後勤科查到你住在這裡，你寫的假條是昨天上午我才接到的，看到假條，使我對你產生了瞭解的興趣，我想就從你身上開始摸一下工廠員工的想法」。

他一邊說一邊跨進我們的屋裡，繼續說道：「你這個地方可真不好找，不但藏在幾道拐的深巷子裡，過道又窄又黑而房子又矮，我是足足花了半個小時才找到的。」

當我把他讓進那黑屋子裡，他的頭卻碰在那門棟上，一面接過我拿給他的凳子，四壁環視後，連聲說道，「委屈你了，一個老工程技術人員竟住在這種爛房子裡，太委屈你了」。

我明白了他的身分份，看他的表情不像在說客套話，便回答道：「唉，你還是第一個走訪我這個窮技術員的人了，單憑這點我得向你表示我的感謝」。

大約已是六點鐘，我們坐在黑屋子裡，藉著黯淡的燈光，開始了第一次談心。他從上衣口袋裡摸出了一個筆記本，一邊交談一邊作記錄。從我的身世講到平反，講到如何進廠，最後講到李友的失誤。一直談到深夜，因為談得十分融洽，時間很快過去，我送他回廠時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一九八七年三月農汽廠在行政大禮堂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取名「扭虧」動員大會。為了顯示「危機感」，扭虧工作組向全廠職工亮出了政府對農汽廠發的「黃牌」警告。其實破產，這本屬於商品競爭的殘酷事實，無須誰來「警告」。

致農汽廠今天這種狀態的，是中共龐大的官僚機器。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國有制。

工廠破產後，還擺出主人的姿勢鞭打工廠的全體員工，這不僅是戲劇性的，也是殘酷的，台下的我心中十分明白，捧著李友這個木偶玩弄夠了的政府，現在要捧出第二個木偶來了！。

然而，被中共恐嚇慣了的農汽廠職工們，聽到這種嚴峻的警告時，全都皺蹙眉沉思，將一年來的謾罵和爭吵收斂起來。工廠一旦關門，一千多賴以生存的職工及他們的家屬，都會被拋向街頭，這對吃慣國有大鍋飯的窮職工怎麼才能掙到生活的飯碗？產生了最大的憂慮，但當時誰也不敢說中共害了工人群眾。

李倫被大會正式任命為「扭虧組長」，第一次主持了全廠工作大會，當他提出用『自願兵』精神『生產自救』的口號，我看不出他的信心和措施在那裡？用這些戰爭的語言來喚醒誰呢？由於生活逼迫農汽廠的職工天天都在上訪，他們所盼的，關鍵在帶領這些職工的領頭人怎麼辦？

農用汽車製造廠的招待所，是一排占地大約五百平方的平房，那房子足有三十多歲了，總共二十來間房間，平時白天走廊裡也要亮著路燈，否則一進去便是漆黑一片。由於背山而築特別潮濕陰暗，房間裡一到下雨天，地上總是泛潮，下段牆上的石灰層因霉變而剝落，露出一片一片的黃泥牆。

貧困至極的農汽廠職工的住宅就是那種檔次，當然也沒有能力建好漂亮的招待所來接待客人。所以招待所裡面住的，是配套廠家派駐本廠的修理工，外地招來的鉸金工和油漆工。稍有「身份」的來客，是由廠長辦公室和供應科長專門安排在泉外樓，或其他較高級的賓館。

李倫接廠長後，廠辦主任為他在泉外樓安排了一間帶浴室的房間，李倫找到了這位主任說，「工人已經有幾個月沒領工資了，我還住那麼高檔的賓館不符合志願兵作風，請你把房間退掉吧！」

於是他住進了廠招待所的5號房間，我第一次造訪他，便在那房間裡，房間被剛剛粉刷，顯得比平時亮堂。靠門邊擺著的一張床上，一半推著足有兩尺多高的書籍和文件，靠窗一張課桌上，放著他的吃飯盅和洗漱用具，兩個翻折凳用來接待來訪者，一盞檯燈立在課桌上，這便是他的全套辦公和生活用品。

經這麼一佈置，那12平方公尺的小屋還算「寬裕」，自從他搬進這間小屋那天以後，這間屋子裡經常燈光通明，有時候通宵達旦。就在這小小課桌上，這小小陋室內卻醞釀了一場創業方案，贏贏來這家工廠未來七年的一段輝煌。

農用汽車廠的飯堂位於工廠中心地帶的盆地中，那兒的竹泥夾牆，年久失修，早已失去抵抗風雨的能力。一到冬天或風雨襲擊，那飯堂中也如露天一樣平地來風。裡面原先還安著的幾張木桌和凳子，不知何時被人搬走。單身職工在廚房的窗口上接過飯菜便席地蹲下，趁熱儘快把它們送到肚子裡去。

那些天，飯堂的角落裡突然增加了這個很打眼的高個子，因為身材高大，蹲下顯得很吃力，食堂的管理員連忙把總務科的辦公凳子給他送來，他看著那紅漆辦公凳，笑了一下指著同他蹲在一起的其他人說道：「人家蹲著能吃，為什麼我就非要坐著吃？」

這一謝絕反倒引發了就餐人一陣議論：「唉！這種鬼地方，連科長都不會在這裡吃飯，從沒想到過廠長會光臨的。」一個矮過子工人忿忿說：「那些敗家子，把廠敗了一拍屁股走了，誰來管你窮工人在那裡吃飯的小事。」一個年紀稍長的工人回應道：「這地方當官的，除吃團年飯，就沒見他們來過。」

後來，他在大會上常提這事，說一個連職工吃飯都不關心的人，怎配當廠長？

然而，被中共騙夠了的工人，特別是經歷文革後，對這種表面一套內心一套的兩面話早已聽厭，不會因為幾句話就輕易相信，至於他心中真想在這個被前任搞得一踏糊塗的工廠，幹出點讓工廠翻身的事，還要拭目一看。

文革剛結束的那幾年，四個堅持喊得很響，工人們壓抑在心中的不滿，因餘悸而不敢坦露。隨著時間推移，耳聞目濡對中共漸漸看清，先前的迷信被捅破，如今它的無論那一級官員，小到科長，業務主辦都公開用公款吃喝，奢侈漸成風氣。原先在恐怖壓力下不敢伸張的人們，公開咒罵共產黨了。

對李倫初入工廠的調查之風議論道：「還不知上面給了他多大的好處，一旦虧損扭轉過來，工廠成了他的搖錢樹。定把自己的腰包撈滿才卸任？」似乎只有這種評價，才符合當今的時代和人心。人心在這個年代裡，被著上了黑色。

然而真心幹事業也好，做樣子也罷，這位高個子的豁達健談和平易近人，逐漸產生魅力，市場觀念被他灌輸給每個職工，他指著剛剛才從『一碗水』買來的越野車說，按照目前市場，能產生較高利潤的不是那些已經很陳舊的農用車，有市場要求的是國家的公用車，是大小官僚們所尋求的小車。

他造訪了從1985—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獨佔川內汽車鰲頭的成都客車廠，這個廠就是靠開發越野車，三年成了全國首屈一指的利稅大戶。

而適應於小批生產的手工製作模式，正好適合我們這樣的小型汽車製造廠。投資不大，見效快，這在當時叫做汽車製造業打「短、頻、快」的方針。一方面利用政府官員的出行追求「氣派」的心理，一方面又利用目光短淺的中共「關稅保護」政策，將外國發達國家的小車擋在國門之外的機會。

利用中共的普遍腐敗，對機關採購人員高額回扣的引誘，使李倫心中已經對農用汽車廠形成了快步扭虧的方案。這是政治經濟學和營銷學根本就找不到的，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特有的市場：政府官員用納稅人的錢，去買生產方式極其落後的汽車品種，附帶著中飽採購者私囊的畸形市場。

產品結構調整的方針確定後，以合同的形式把工廠生產品種定下來。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專用車的各歸口部門，以自己的口舌和交往的應酬能力，贏得這些部門的領導層的讚賞。為了打開這些部門採購汽車的胃口，從銀行貸款中抽出錢給對方經辦人以「豐厚」的回扣。

他花了大量時間，在這些部門來回奔跑，獲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訂貨合同。

市場打開後又回過頭來，向當時扼著農汽廠脖子的銀行、稅務局、工商部門作了大量工作。他知道，這些部門有著大量的空隙和水份，只要經過某掌權政府官員的點頭和批示，可以動用無息的扭虧專用款。

欠稅也可以掛起來，享受三年免稅甚至更長時間的優待。這樣一來，過去一年多來，像滾雪球一樣的「前帳」可以不與追究。

於是農用汽車廠在李友時期所背的包袱基本上甩掉了，而職工的工資暫時按照原來的標準發夠，而不再按市里對資不抵債企業的職工只發生活費，全廠的浮動人心平穩下來了。所有原先被李友捆死農汽廠的「綁」，很快在李倫努力下一一鬆開。這家工廠贏得比較輕鬆的起步條件！

在做政府部門的工作時，各衙門口中對於小到門房的看門人，都得低三下四，有時候奔跑了一天，回到工廠是晚上十二點鐘了，他一臉灰色感到又累又倦，回到自己的宿舍，白天那些羞侮人格的話，還在腦子裡反嚼，但是為了實現他想幹的事業，他必須有一般人都不屑為的阿Q精神。

為迎合各個政府口子裡的大小官員，他把這套經營方略濃縮成「上靠、外聯、內團」的六字方針。三方面中上靠為首，他說上靠就是依靠政府，就是鑽政策的空子。他把他的六字方針寫在辦公室裡的寫字臺前，寫在聯營辦公室裡，寫在農汽廠最醒目的地方。

這六字方針濃縮了鄧小平為首的『人治』政策，中共在經濟建設中沒有理論只有『政策』，因此隨意性極大，誰有權誰說了算，用賄賂說了算的人風靡官場。當然要拿產品出來的工廠，對內部的管理又是另外一回事



了，擺著用戶所需的，在馬路上飛馳的汽車，要戰勝同種企業的競爭，在外觀和性能上，在同樣的手工製作的條件下，必需「略勝一籌」。

競爭毫不講情的淘汰掉弱者。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工廠要不被淘汰出局，必須不停地改造原來已經顯得陳舊了的車身和底盤結構。工廠在調整了產品結構以後，跟上的是不斷的質量更新，這是農汽廠原來那種老牛拖破車的步伐是無法想像的。

鍾師傅畢竟是老技工，他在接受負責越野車的時候，就已經思考了一個保質保量的施工方案，對所有的施工細節都考慮好，所以他說的話帶有權威性。按照他的建議，李倫召集了所有參加者的現場施工會議，初步將現場工序分為四個組；一個製作車身的組零件；一個是負責車身分塊的焊接組合；一個組專門負責車門的製作和焊接；另一個組是負責車門的安裝。

所有的工程技術人員全都要跟著施工的工人，一方面應證圖紙正確性，一面組織現場的施工，繪製必要的成型手工模具，並且根據施工發現的問題及時的修正圖紙和採取補救措施。

被窮困和失業困繞的農汽廠職工，一種「玩命」精神貫穿在李倫煽動性詞令中！現場會幾乎通宵，邊做邊議，一個個解決開發中所碰到的具體問題。從此，試製組每晚上都要加班到第二天凌晨，為了給加班試製的人加班時醒腦，他吩咐廚房每晚十二點送來酸辣面，疲勞和困倦被強烈的酸辣味驅散了。

古人雲，「年少雞鳴才就寢，老來枕上待雞鳴，轉頭三十餘年夢，不道消磨無數聲。」他說：「回看少年時光今已半百還一事無成，過去沒有機會，現在機會來了，我只有再來一次雞鳴就寢了。」他用棗書寫成的杜句鶴的名句：「少年辛苦終生事，莫向光陰惰寸功。」壓在他的辦公室桌上的玻璃下面。

1988年的夏天，在工具車間前面的空壩子上，搭起了半露天鍍金臨時工棚。夏天多暴雨，然而在這裡，燈光和焊弧光交織著送走了一個月的不眠之夜，即使大雨滂沱也從來沒有打斷過這裡的夜戰。

第一台客車和第一台越野汽車相繼問世，當慶龍戰了整整一個月，臉色蒼白的志願兵們，歡呼本廠建廠以來第一代獨立製作的換代產品誕生時，胖左派也不禁為之驚嘆：「李倫的兩刷子農汽廠起死回生有望了。」

樣車的第一個顧主、公安部裝備處的處長趁飛機專程從北京趕來，認為在當時農汽廠的簡陋條件下，僅靠手工製作，短短一個月內開發出兩個品種實在不容易。他認為雖然第一台樣車問題百出，但一股拚拼命精神是國營廠職工所缺的。就憑這精神，專用車就有了希望，當下簽訂了兩百台的訂貨合同。

在一千多職工工資低微，人心渙散，既無模具又缺焊裝條件下開始，第一台樣車就像學畫的孩子用心描出，遠遠看去整個越野車似乎有近代的味，但經不起走近了細看。

細看車的外觀，車殼的外表並不對稱。車上腰線像蚯蚓起伏不直，車的平整度僅用鋼尺比劃了一下，凹坑和凸包之間相差了十幾毫米，找來經驗豐富的油漆工看，要填平這種差距需20毫米厚的膩子灰。門與門框的高度差，至少也有十個毫米以上。

門是鎖不上的，如果用力的鎖上，那麼就打不開了。車身上相鄰部位不相吻合，留著很寬的縫隙。搖窗機就更糟了，裝上去以後，是不能搖動的，勉強的搖動，那麼內襯的防水膠條不是擠在一堆，就是脫落。

那負責冷作的鍾師傅，圍著車反覆細看琢磨！也低聲的嘆氣道：「這樣的車，拿去交給用戶，別人怎麼會要？我看乾脆重新來過。」

然而很懂得「士氣可鼓不可洩」，「凡用賞者貴信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的道理。！李倫專門召開了樣車的評議會。

幾十個由設計、工藝、和工人組成的評議小組，圍著車身數落著這個樣車一百多條的不足，他叫技術員作了詳細的記錄，一方面他佈置了下一輪製作的整改條款。另一方面，召集黨政工聯席會議，作出「特別嘉狀令」對於樣車的主要製作人和技術人員實行嘉獎。並且令樣車披紅戴綠的繞工廠一周。

在會上他說：「我們必需對這種拚拼命精神加以激厲，否則我們的事業就會在冷嘲熱諷中死亡。你們知道這兩個樣車雖然帶著許多的缺陷，但它是我廠有史以來自己製作的換代型越野車，這是我們廠的產品方向，也是我

們活出來的希望，這就是我們要大張旗鼓表彰宣傳的理由。」

在會下他還說：「我曾經把一句巴頓將軍的話當成了座右銘：「沒有不好的戰士，只有蹩腳的將軍。」他的這種熱情評價，曾被人當作攻擊他的政治把柄，這對中共僵死的官僚體制是一種叛逆。

嘉獎令頒發的第二天，他召集了得獎的志願者說：「今後你們就是新車型的基本施工骨幹，你們手中決定是著農用汽車廠的生死存亡。」他逐一的數落樣車的毛病，規定出，車身的平整度，門鎖，風窗搖機三大整改的主攻方向，他說到這些致命的毛病顯得特別激動，他說：

「這樣的產品拿給用戶豈有不罵娘的？為什麼國營企業多了幹不好事的公子哥兒？臨到工廠生死存亡的關頭，不能再耍這種公子哥兒氣了！」

其實工人們的隋性容易改變，最難的，也是最怠墮的是這架由黨委，工會行政組成的龐大管理機器，包括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和付廠長在內的十一個在上級卵翼下的天之嬌子。面對商品大海裡將淘汰的工廠，這些人從來沒去鑽研一下解決問題的方案。

也難怪，上級規定他們的職責，就是「指導」並掌握企業政治方向的。說白了，就是貫徹中共統治利益的。扭虧開始，為扭虧而開的辦公會，他們指手劃腳的亂說一通，讓幹事的人畢恭畢敬的聽他們訓示。

會議不客氣的把具體的任務分派給他們，並限定他們完成的時間，寫在會議紀要上，作為會後執行會議決議的書面依據。於是平時慣於用鞭子抽打別人的人，在扭虧非常時期不得不忍氣吞聲接受李倫甚至他的手下人的指派。

但，虧損的危局逼迫他們，他們只有悄悄背著廠長向委任他們的主管局數落李倫，說他凌駕於黨委之上，是嚴重違反組織的行為。於是李倫處在領導班子的冷彈伏擊圈子中，古人雲：「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扭虧雖然打響了，可他感覺自己處在各方面的夾擊之中了。

越是向前發展，這種「夾擊」會越來越厲害。他既然沒有能力搬掉這些絆腳石，就只能聽命小人們的夾擊。在他的事業順利的時候，反對他的人會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向他施放冷箭，一旦他的事業稍有失利，他便會遭到痛打落水狗那種圍殲。

他的威信越增加，越潛藏著危險，改革開放預設了事業者葬身的墳墓。

在引進外籍藉技工的問題上，便爆發了他同反對者之間的第一次公開較量。當第一個批量越野車將近完工後，他親自同我一道檢查了這些「產品」。結果發現，製作樣車出現的幾個主要毛病仍然沒有改觀。連續的跟班觀察，使他體會到國有企業，習染多年的舊習，牢牢纏著工廠。他看到工人們並不是幹不好，而是大鍋飯的分配制度作祟。

「幹不幹，一月一百半」這是工人的口頭禪。「虧損又怎麼樣，國家還能不拿飯錢給我們？扭虧又怎樣，再賣命工資卡上不會給你升一分錢。工資是政策規定死了的東西，扭不扭虧還不都一樣。」年紀稍長的工人這麼說。「工廠條件就這麼差，那能保證出好車呀！」年輕的工人總是這樣替自己的粗製濫造作辯護：

「李廠長，一個月就只發這麼一雙手套，我們的手都要冒煙了，眼睛天天流淚，這樣惡劣的勞動條件，我們也是人，要不李廠長你也來同我們一道玩兩下。」調皮工人的挑釁使他無話可說，他看了看瞪在那裡磨磨蹭蹭的工人心裡別說有多麼焦急。

當他回到辦公室看到保定汽車廠為他寄來的「太空」車照片時，想到別人為什麼會做出那麼好的車身？於是他千里迢迢親赴保定汽車廠實地考查，考查結果告訴他，保定汽車廠從浙江引進了一批鍍金工和油漆工在那裡「大顯身手」。他們拿的是計件報酬，做一台車得一台車的工錢，要想多拿錢回家，只有靠自己儘量多幹活幹好活，否則解雇走人。

於是他從那裡以高報酬招聘了幾名浙江工人，經過實地的操作，從農村裡出來經過幾年嚴酷訓練摔打的「雇用」工人，無論在技術水平和吃苦耐勞，工效等方面都是本廠工人無法企及的。

在黨政工聯席會議上，他第一次提出引進外籍工人的主張。同時將那些只會在操作工地上散佈消極情緒的人，就地「掛」起來送勞人科「待業培訓」，待業期只發給生活費。他的建議一出口，聯席會便「沈默」了，既不熱烈同意也沒有反對意見。

可他沒想到第二天就在那簡陋食堂，他按平時的規矩，中午去吃飯時，那裡已圍了一大圈老職工和他們的家屬。見到他以後，人們七嘴八舌向他發問，「你準備把工人送到勞人科去究竟怎麼處置？」「誰給你的權力把本廠的工人的飯碗拿給外廠工人去吃？你究竟拿了好多錢給外廠的人，他們給你分了幾成的回扣？」叫聲越來越高，責罵越來越難聽。

在經歷了這麼一場謾罵和聲討後，晚上，他獨自睡在床上反思，難道，黨政工聯席會上，有這種號召力極強的與他貌合神離的「領導」背地與他作對？他們是誰呢？在這種孤掌難鳴的壓力下，他不得不把這個本來只需廠長取捨的人事任用權，提交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

職代會召開討論表決，引進外籍工人雖勉強「通過」。但引進來的人報酬，卻要與本廠工人拉平。而對本廠子弟送勞人科「掛」起來培訓的意見，則被全體與會者否定了。吸引外籍工人的「高報酬」既被取消，應聘來的外籍工人只好打道回府，李倫第一次嘗到憑他的直覺和需要辦不了任何事。

眼看引進外籍工人就要擱淺，他仍不甘心，晚上同幾個到他住所來「聊天」的「智囊團」成員交談，把這個問題提交他們討論。有人向他竭力主張推行計件工資制，使有能力多做事的人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這本身是天經地義的，這種合理辦法，可以留住從保定召來的工人，他立刻採納。外籍工人算留下了。

經過一年努力，到了一九八九年底，產品結構終於改變過來，原來生產的農用車交給了大集體去做，主廠全力以赴加大越野車和小客車的投入。過道上停塞的農用車開始漸漸疏減，年底由財務科公佈連續兩年的虧損終於止住。

然而財務科放出空氣，說這全是把工廠虧損的利息掛起來不計的結果，如果過去虧損仍然算在工廠的頭上，那麼到了1988年年底，依然虧損上千萬。

李倫有何德能，還不是靠政府政策的挽救？李倫心中明白，自己的事業才剛剛開始，要徹底改變這家工廠的面貌，要讓農汽廠在政府部門購置專用車的潮流中「存活」下來，還要付出很大努力。

專用車生產已成定局，根據他的提議，農用汽車廠正式更名為重慶專用汽車製造廠。不知內情的媒體，各大報社的記者們，又在中共負責宣傳產品的官員指派下，重新來專汽廠對李倫個人進行專訪，並且像兩年前捧殺李友的老方法，對李倫進行吹捧，要他講一年多來止住虧損的治廠經驗。

不過李倫畢竟比李友聰明得多了，他知道記者的宣傳，不過把自己扮演成中共玩弄的木偶，木偶那能貪天之功據為己有？更何況雖然第一仗他打贏了，工廠要真正站起來走出困境，還有一段極其艱難的路。

但是他畢竟是「事業家」，他同他的幾個「左右手」商議以後，第二年的第一步，要在全廠所有工種推行計件工資，用按勞動件數付酬替代計時工資。

此外還用劃小核算單位到班組，來迫使工廠的每一個庫房，每一個班組建立成本意識。同時還要破除工廠的原來用工制度，不拘一格吸收有志為廠興旺的有志之士，以改造工廠管理層的素質。用建立第三產業消化那些平時不做工，專門發佈「快訊」的人員……

一大堆的改革方案，仗著當時鄧小平的「體制改革」為依據，他準備一試自己的「身手」。

## 第五節：李倫的兩手

正當他為這家瀕臨絕境的國有企業開刀時，他的同僚們無不權巧取豪奪，使自己囊中的票子，兒子，房子在任職期間三豐收。沒有機會巧取豪奪的人，也會本著得過且過，能撈就撈的態度，撈不到也不會拚拼命，能維持工廠不死不活就是好廠長了。

老天滿足了這位大個子的期望，在一九八八1988年平過以後，一九八九年經營決算告訴他，工廠當年實現了四十萬元的利潤，連續虧損幾年以後第一次盈利，對他不能不算是一個事業上的成功。

這一天恰逢工廠建廠三十周年大慶，為了慶祝這一大捷，也為下一步盈利創造精神上的條件，他組織了一次盛大的廠慶遊行。遊行佇列從廠門源源不斷列隊而出，穿過雲天路、中山路，浩浩蕩蕩的隊伍佔據了北碚的主要街道，然後繞道人民路返回。

他興高采烈站在馬路的十字路口，不斷領著佇列的啦啦隊喊口號，唱著由他譜詞的廠歌。殊不知職工們並沒有積極回應他，遊行隊伍在從人民路回歸的路上就自動散去。

當他興致勃勃在工廠後門迎接歸來的隊伍時，卻剩下稀稀拉拉的少數人。領隊人說各有各的家，有的要回去弄飯，有的要照應孩子。

中午大家散去時他一再給大家打招呼，下午按往常一樣上班。

下午三點鐘，他獨自站在黃樓最高處臨窗向下眺望，這時秋風卷刮著梧桐殘葉，滿地都是。也許因為自己的妻兒一個也沒在自己身邊，一種莫名的孤獨和悲哀在心頭油然而升了起來。……遊園會雖然進行了，但參加的人極少，工人們並不理解他的巴頓式激情。

第二天早上七點鐘他便站在廠大門口了，為了組織和整頓這支虧損「潰軍」，他曾三令五申整頓遲到曠工現象，規定凡上班遲到早退者一律由門崗登記，當天在黑板上公佈。

恰好這一天八點半鐘了，上班時間已過，還有人稀稀拉拉從街上竄進廠門來。他陰沈著臉責問門崗，為什麼不對遲到者進行登記？那門衛卻用藐視的口氣回答他：「你身為一廠之長，站在這裡卻奈何遲到者不得，我一個小小門崗能管誰呀？」這回答激怒了他，當即把勞人科科長叫來，把頂嘴的門崗撤了。

當場他攔住了一個剛剛來上班的年輕人，問他知不知道工廠勞動紀律的新規定？可那年輕人傻呼呼回答道：「我不認識你，你管誰的閒事，那麼寬？」一大堆圍觀者哄然大笑，還替這年輕人辯解說：「他是新來的」，令他感得孤單失助。

過了幾天，黨委辦公室電話通知他，說市機械局黨委要他到局裡去一趟。晚上回來時，他的臉上黑沉沉的，看來不知又受到上級的什麼「規勸」。

晚上，我在他的臥室裡與他單獨交談時，他拿出一份複印的手寫文稿，遞給了我，我接過一看，封面上的標題是「創業者憂思錄」付標題寫道：「活著難道比死去更煩惱？」並簽上他的名字。

這麼快就止住了工廠習慣性的虧損，還實現了略有盈利的驚人成績，上上下下都有很好評語，本應使他高興，怎麼反而使這位創業者如此悲嘆起來？

回到家裡，對這篇文章細細拜讀。現不妨摘抄於後，以饗讀者：

「……創業者的孤獨往往比常人更深重，創業者活的極苦，最累者無非心扉宇宙裡的重重重壓，……積鬱下的苦惱，使人到了無話可說，也就到了苦悶的低谷。是因為不堪重負才華髮早生，在熱望中的失望才形容憔悴？……」

所幸人生一世也不一概心如止水，也有心扉的一角在歡笑，在愛和恨。其間也有萬夫莫敵的爆發力。如此來到煩惱的人生，應作些有益於人類的事，於是有了春波蕩漾，才有極端的物我兩忘，才有無我的奉獻，才有公而忘私棄家不顧之舉，才有不識人間煙火的愚人之稱。」

這開頭語說他極痛極苦，雖沒有說出苦在何處，痛出何因，宛如受委屈的孩子受人欺侮而又無法說清欺他的人是誰一樣，對比他的行動與心情似不相符。我想創業猶如一把鋒利的刀，在大業初成時所向披靡，但就在這個過程中卻漸漸的磨鈍，磨鈍的過程就是一個痛苦過程吧。

不過大個子的人生價值和善惡標準，細想起來卻含糊不清，含糊的人生價值觀和樸素的人性愛憎，並不容易恰當的配合默契。但內心的悲哀，沒用虛假的東西來掩蓋，以欺人之談矇騙世人和社會，說明他良知尚存，向人傾瀉內心，令人可親可愛，這一篇他用了很大篇幅呼喚著理解。

呼喚理解，其實就是呼喚人性，在今天，理解的稀缺，正是人性泯滅的表現。不過，難道李倫真不明白，人性在我們的社會中，是被中共幾十年摧殘而泯滅殆盡了麼？他看問題的淺近，使他行動發生盲目，每遇受挫折而產生的悲哀，成了他『得不償失』的興嘆！再往下看 - -

「怪物，一個飄忽不定，卻與人類的存在同時出現的黑色怪物，我們不知道其稱謂，姑以阿Y呼之，創業者足跡所到之處，阿Y都漂然而至，形影相隨，阿Y畢生追逐創業者，不置死地難以後快，此屬命定，姑妄看之。」

「創業者立誓捨棄一切，參與挽救破產企業，阿Y卻說，這些人另有所圖，不然那有的這麼傻？」

全文以阿Y的十六種非議來揭示「守舊勢力」的阻礙，以自己推行「新措施」所處的尷尬來描述創業者的艱辛，最後以這樣的一段話作全文的結尾：「所不安者只是哀憐造血者的血色反而蒼白，補天者的天職累遭詆毀而已，專氣汽人啊，專氣汽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似比愚公移山還難，路漫漫其修遠兮」。

大個子以他的理想主義設想了專汽文化，以最常見社會主義文化表現，來描述芝阿Y的種種非議，在常人看來似乎是無病呻吟，喚不起他想喚起的人性同情。專汽文化是他的理想主義，還是一種在現實中本來就沒有的東西？

在我看來他嘔謳歌並需要建立的東西，早就被市俗的不倫不類，例如懶散、自私、欺詐弄得來面目全非了一。

因為人們還沒有理解，怎談得上接受？連接受都不存在，繼承和發揚就只是寫在紙上的東西，對日常老百姓的掙錢吃飯，這種普通行為硬套上某某文化就簡直是多此一舉。

他的專汽精神，好像有一種口號標語的毛病，經不起挫折，因一個員工和他頂嘴而產生那麼多的感慨。所以他的拚搏讓人難以理解，惡意者把它當成另有所圖的障眼法，說他像演戲一樣。說他無病呻吟，裝腔作勢。

然而就比如一場惡戰擺在統帥面前，他必須想出讓人衝鋒向前的激勵口號，例如「不攻下某高地絕決不收兵」、「與陣地共存亡」、「誓死血戰到底」之類！除了萬不得已的殺身成仁，那也是名垂千古死也值得的。

不過，按照中國國情，他的事業注註定成功不了，他的悲哀註定在他的性格之中，被人無法理解，只好任人肆意歪曲了。中共腐敗的政治制度，永遠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礙，使他產生哀嘆的日子還在後面呢！

不過，從這種矛盾百出之中，他能總結出一套專汽文化，確是他才華的表現，雖然他對各種阿Y無可奈何，但他終於以他的堅韌不拔的精神，把各種類型的人捆在一起，駕馭他們。讓他平時最看不起的黨委書記和工會主席也聽從他的指揮，當然他也同樣付出了耐心，容忍他們的裝腔作勢。

有時還必須用最腐敗甚至為人不齒的手段，去迎合政府裡一個決定工廠存亡的小吏所提出來的要求。總之戲臺上要求演員的一切，他都必須具備並要得體的表演出來，同時還要將自己的人格一齊加以扭曲，而扭曲自己不願幹的事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雖然他並不承認。然而旁觀者親，若要細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那是連他自己都無法解釋的。

他只有在十分冷靜的反思後才能寫出「創業者憂思錄」這種內心獨白，那獨白中的空虛，正好反映出他的盲目性與現實的衝突，這些衝突是他自己不能回答的，也許這正是他被統治力量利用之所在。

當然，就像一個學生寒窗十載，在畢業考試中獲得了優良成績，得到一張從事某種事業的畢業證書，他也利用這個機會變成了中國的富有者。

後來的事實證實了這一點，在他告退後，利用同市里的關係和自己開創專用汽車廠的名聲，經過幾年努力，從經營外國進口的組裝車積累了自己的資本，在商海中升級，最後成為一個擁有上百萬資產，經營一個以房產開發和旅遊休閒的中型農場。

但是，當年正在為他個人事業打基石的時候，他必須對工廠作出貢獻：在經營上打開銷售渠道後，必須打開生產不出產品這個瓶口，他清楚打開這個瓶口，首先要砸爛低工資的「鐵飯碗」。然而真要砸爛這個已經吃了幾十年的鐵飯碗，卻並不容易。

習慣計時工資，混天日的社會主義企業的主人公們，對「計件工資」歷來採取抵制，得過且過的工廠管理人員，被推到了這個矛盾焦點上，他們在辦公室泡茶過日的安閒日子被破壞，並且還要面對習慣勢力控制的工人們。

「忙」和「風險」使他們對李倫產生反感，工時定額的不公，使定額偏低的工作無人去做，強制性的分配使工廠管理層與工人發生直接對立。

於是生產任務受著那些定額偏低的工作阻礙，成了一個又一個的「瓶口」，工時定額的壓力使勞動者自然趨向於只圖數量不管質量這種慣性，而質量又往往成為用戶最為敏感的東西，人稱質量是企業的生命。

數量與質量的矛盾，工時分配不均的矛盾，夾雜著老廠自然形成的親朋戚友關係網帶，人與人之間這種，「權」「錢」「關係」的複雜角逐，令他舉步唯艱。

計件工資施行以後，使本廠職工中留在生產崗位上的「第一線工人」人數越來越少，稍有「關係」的憑著父母親友的幫助，拚拼命鑽向無定額的崗位。這同官方公佈，中國吃皇糧人數在國有企業中要占一半以上的比例相當。

而農村中大量剩餘勞動力，填補了這些空虛的勞動崗位，工廠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僱傭工，各類非工時人員充斥了各個辦公室和庫房，除了相互扯皮發生「內耗」消磨掉工廠活力外，難以再發揮他所希望的「志願兵」精神。

一張報紙一杯白開水渡日這種現象，使他試圖用一次又一次「崗位培訓」，「待崗」來精減那些人浮於事的辦公室和車間。結果又傷到了工廠裡層層交錯的關係網，而招致了「黨」「工」兩大巨頭的反時，於是三駕馬駕馭的工廠中樞中。只得靠他那高大的身材強制大家一齊行動，使他事必恭親，勞累至極。

計件工資總算在他的竭力主張下，排除重重障礙推行起來。然而推行計件工資的直接後果，便是粗製濫造，為產品質量而發生的無窮無盡的扯皮多得令人心煩。

每次發生重大質量事故，李倫便親自和我一起召集現場質量分析會。一輛汽車從原材料進廠到總裝成一台成品，從底盤組裝到車身製作，從油漆到總裝配，成千個工步，問題出在那一個環節？若對每一個環節不熟悉，對事故不深入調查，事故的責任絕難準確判斷。

李倫把事故的處理權交給了我，使我感到就像捏著一個燒紅的炭團。最難的是，事故的責任究竟落實到誰？每次質量會都會招來無窮的扯皮。

於是我成了工廠的磨心，產品的質量是來不得半點虛假的，它必須奉行真正的『人性』。這與奉行毛澤東的假、大、空是無法並存的。

不過，在專制統治最後解體之前，獨裁者所奉行的文化沒有被公開批判之前，「人性」的解放還在艱難中掙扎，處處受到排擠和壓抑。

一位署名周炎來的作者，在廠長辦公室出刊的『每日談』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組『孔令平精神』的討論文章，目的在排除傳統觀念的阻力。不過作者似乎把他所寫的對象寫得太悲觀，悲觀得有些過了頭。文中把『孔令平精神』說得那麼孤立無援，比成銜石填海的精衛鳥。但我明白，這就是李倫領唱的歌。

這就是他提倡的專汽文化所賦予豐富人性的底蘊。當他在中華大地上這麼一個小小角落裡，為挽救一家早該淘汰，即將伴著舊體制殉葬的企業拚搏奉獻時，人們花費在精神上的折騰要比耗費的體力多的多。

1990年下半年，借助於李倫對我的「關懷」，我終於從當年工人都不願去住的文星灣的破舊四合院中，搬到了離工廠大約只有兩百米的菜市街。雖然是新居，入室仍要彎腰，口袋式的小屋依然陰暗潮濕，地處菜市，環境複雜而骯髒。

但新居離廠近了，孩子的讀書以及我上下班就方便多了，用不著再背著他上下班。加上燒的是天然氣，避免無煙煤的污染和毒氣。

當時工廠新的職工住宅還正在平地基，職工住房依然是那麼緊張，大部分職工仍擠在陋室破屋之中，所以我只有知足的餘地，知足者常樂。看來，我們的窘困將隨著李儉的成功而成為過去。

在搬進菜市街的新居之前，我向後勤科要了幾袋水泥，將潮濕的地面重新鋪墊過，幾張牛毛氈將破爛的瓦面重新遮蓋。幸好，我習慣了用自己雙手改善自己的寒窠。在這陋屋的頂上留著一處通氣的天窗，口袋屋便是憑藉著它流通空氣！每當夜深時間，天上下起綿綿細雨，經風一吹，便從那天窗處浸下雨滴來。

黑色的雨滴打進我迷濛的夢中，打在我的臉頰上很是難受，彷彿秋雨也要藉著黑夜給我奚落，如像一個高踞在豪華大廈中的權貴，向我的臉上吐著唾沫，心中一陣噁心。驚醒後，我很快聯想到白天，因為車身銲焊不良同冷作車間的主任爭論不休，或者為錯裝了真空助力器，而將工人訓斥一頓！

便覺得那份「認真」勁確有點唐·吉柯德。便自嘆何必爭此你強我弱，因此招來諸公們「打倒孔令平」的喊聲！的確是自找麻煩了。

顧影自憐，我已經年過五旬，被專制獨裁折磨了大半身的殘軀，還蜷縮在這「冬來似冰窖，夏日如火盆，雨中覓蓋瓦，風裡倚圍欄」的陋屋之中，想到這裡，我會獨自悄然坐起來，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發呆。

側耳聽妻正在打著雷鳴般的呼嚕，孩子那顯得焦躁不安的翻身，他那掀開的被子掉下床來的響聲，使我悄悄站起身來，摸索著在漆黑裡悄悄進裡屋給他蓋好，再深深親吻他的臉蛋，好像唯有這種愛才在我的心中熨上了歡樂。凝眸良久，再回到我那被雨水浸得潮潤沾手的床上，蒙頭而睡……。

所幸人有睡眠，睡眠伴著忘卻使那積鬱在心頭的悲涼，連同白日沉積下來的勞累在沉睡中消散。大抵因為這黑屋太不能遮風蔽雨，我在這段時間夜裡常做惡夢，經常回到那鹽源農六隊的高牆內。把過去三十年的故事，從我大腦中太深太深的溝紋裡重新翻印出來：

因為偷拔了一個蘿蔔，當兵的用槍尖逼著我連蔭帶泥一起嚼到肚裡；因頂撞那張棒棒，我被捆在大黃桷樹下學老鴉叫！彷彿就從來沒有獲得過自由似的。唉！我們這不幸的一輩人能夠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受噩夢干擾就很幸運的了。

在中共刻意的扶持下，李儉的事業蒸蒸日上，隨著虧損的扭轉，專汽廠從1990年開始，利潤呈現了大幅度的增長，強烈的商戰意識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把工廠成員公開稱為克己奉公的志願兵，攻堅闖關的敢死隊。他的口號是「進攻」。唯有進攻，工廠才有生存的空間；唯有進攻我們才會獲得進入國際汽車工業的機遇。

他還用其他人幾倍的精神，晚上開會運籌必至十二點過，他說晚上十二點鐘屬於正常的工作時間，因為「人在此時頭腦最清醒」。剛剛在會上做出的決定才幾個小時，第二天早上八點鐘他就已經站在工廠大門口，向每天早上參加碰頭會的付廠長或者主管幹部們，詢問他們對昨晚佈置工作制定貫徹的計畫。

商機意識正是國有企業的那些不知產權歸屬，上級指派的廠長們所缺乏的東西。專汽廠憑藉著這點，脫穎而出了！

久而久之，他成了工廠的一部動力機，不過這動力並不出自國營企業，而是發自他個人的。雖然他在各種場合都以黨政工集體的名義，並稱為志願兵和敢死隊精神。然而他比誰都明白，他的事業心並不會感染工廠裡由上級部門指派的原班人馬，這正是他在憂思錄之中所發出的種種悲嘆的原因。

他「自詡」的黨政工領導班子，是一塊只能應對上級的招牌。不管他在玩傀儡戲也好，或者他常常發牢騷說是挾著他們一起前進也罷，他在完成各項扭虧部署時只能滿頭大汗，疲憊不堪！不過由於他個人能力，使這個廠很快扭轉了虧損，實現了李友規劃了幾年的改變產品結構夢想，便是事實。

市政府卸下一個多年都有工人去找他們麻煩的包袱。所以，不管他怎麼搞，機械局的領導對他怎麼另有看法，但宣傳的媒體仍竭力的吹捧他，他在工廠裡樹立了絕對的權威，人們管他叫「天牌」。便可以證明他在這家工廠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為這樣，也就不會有後來繼承人來延續他的事業，因為這些是國有企業無法產生的。

1991年五月，重慶市政府組織了一次有關汽車的赴美考察學習。由重慶市各個主要汽車製造廠長們參加，預計學習兩個月，他成了這個考察團的成員之一。

工人們戲稱「天牌」要出國兩個月，大家可以輕鬆一下，反映出他的獨柱支撐的局面。！那時，新開發出來的越野車賣點正好。臨行時他關照五一期間雖放假，但生產不能停，總裝、油漆和車身製作按照輪班休息的原則，照常上班。

扭虧以來，每逢假節日都要應生產部門需要，指定檢驗人員現場跟班，檢驗科於是便沒有了星期天，這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有星期天的工作，是這段時間國營企業也是絕無僅有的，我也養成了習慣，就是大年初一我都要去車間巡查一下，以便協調發生的臨時需要。

四月三十日，李倫由廠辦派的專車送到機場，正巧這一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雨，一直下到五月一日早晨。八點左右，我撐了一把傘，從菜市街向工廠的後門走去，到了辦公室，雨停了，我放下雨傘，逕直向總裝配車間走去。

今天與往常的「節日」顯得不同，除了廠後面新的辦公大樓還在忙碌著掃尾工程，整個廠區靜悄悄的，連通往車身製作的過道也不見人影。「天牌」不在，小鬼偷閒了。今天是國家規定的大假，別說八點鐘沒人上班，就是全天無人上班也是正常現象。

當我穿過通往總裝車間的過道，向總裝車間的大門走去時，我突然奇怪的看到，大股流水正從那十公尺寬的車間鐵門門檻上向外翻湧，並且順著那天橋過道的兩側，像瀑布似的直瀉而下。

「不好！總裝車間裡面怎麼會關著這麼多的『雨水』？難道總裝車間屋頂漏雨麼？」我被那大股的流水驚呆了。顧不得大水的阻攔，脫了雨鞋，挽起褲腳，踩著齊腳背的積水順著那天橋過道，向大鐵門淌去。

總裝車間的大門緊閉，門鎖鎖在大鐵門的鐵柵上。我走到鐵門前，扒在鐵柵上向裡張望，只見沿著車間外廊上長六十公尺的生產線旁，均布的五個洗手槽上，水正從四十個水龍頭向水槽裡猛灌著。然後從灌滿的水槽裡翻過槽壁，向車間的地面上直瀉。整個車間的地面已經積著大約有一公分厚的積水，滿地漂浮著包裝零部件的塑膠袋子和泡沫塊。

當我的眼光掃向車間中部三個通下一層庫房的升降運輸口時，車間地面的積水，正朝三個洞口向著下面大庫房猛瀉而下。我急忙側著身，扶在天橋的鐵欄杆上向下望去，下層庫房的鐵門門檻上也如這總裝車間一樣，昏黃的濁水從鐵門縫裡湧出來，溢過二層樓的天橋過道，翻進了最底層的冷作焊接車間。

情況已經十分清楚，北碚水廠的自來水在五一節前一天晚上，「洗劫」了我廠總裝車間，零部件總庫和冷作車間。

總裝車間被水淹沒的損失，比起下麵的總庫房裡面淹沒的損失還算次要，總庫房裡堆積的價值上億的配件和物資，平時都要保持嚴格的通風和防潮的措施，以確保防銹防霉。現在這些物資全泡在浩浩黃湯之中。

底層冷作車間配置的電動工具、焊機開關都泡在水裡，構成了人身觸電的巨大危險。想到這嚴重的後果，我抬起頭，向四下張望，在過道上沒見到一個人。

看來昨天晚上，夜巡值班的門衛和巡視警沒有人來過這裡，情況使我顧不上多思索，我急忙三步並作兩步赤著腳，顧不上穿鞋便向辦公室跑去。抓起電話，先向李倫的第一助手，常務付廠長陳增「報警」。

「嘟嘟」！那電話響鈴響了十餘下之後，話筒的那一端傳來

了他睡意惺忪的回問：「誰？」他大概才從床上爬起來，問話語氣很弱！我向他報告了總裝車間大樓、總庫房、以及冷作車間全部遭淹的情況。

可我還沒有講完，電話的那一端就被不耐煩的語氣打斷：「別大驚小怪的好不好？情況不要講的那麼嚴重、那麼誇張好不好？」

陳增早在我進廠之初，一次去醫務室看病的機會，我便認識了此人。那時我在二車間，上班看病本來就不合工廠規定，心想趕緊看完病，好回車間上班。醫生桌前已排著三個人，陳增正好排在我的前面。輪到他，囉裡囉嗦向醫生講了足足二十分鐘的「病情」，其中拉扯了許多與病無關的閒話。



好不容易看他接過醫生開的處方，不料門外湧進他的愛人、女兒和女婿，插著輪子依次問診。我只好耐心等待他的家人一個一個看完，看看手錶，足足耽誤了一個多小時，一家人才離去。

李倫擔任廠長後，大概被陳增表面冷靜的表像所蒙蔽。在向雲推薦下當了常務付廠長。殊不知這陳增上任才一年，便私自串通勞人科管工資的劉豐，在年終呈報工資報表時，篡改了自己的工資檔案，私自晉升了一級。可惜，事情很快被察覺，陳增受到了李倫的嚴厲訓斥。

過了不久，又發生了陳增同銷售公司總經理老婆私通的醜聞。為了替這個鋼班子遮醜，李倫暫時還將他留在常務付廠長位置上，向全廠職工封鎖了他的斑斑劣跡。不過，儘管他表面裝得道貌岸然，老成持重，儘管他熟悉上層領導的脾氣，而將這種關係處理得很好。但可卑的行為已使他暴露無遺。

現在，聽到他這種無理、無責任心的回答，我可絕對不示弱，語氣一下子變得強硬起來，向著話筒吼道：「你是常務付廠長，李廠長剛走，工廠就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你怕不好交代，現在災情嚴重，現場又沒有人，你必須立刻到現場排除災情！」我幾乎在用命令的口吻向他吼叫，說完將電話重重地摔在電話坐機上。

我第二次重返庫房時，庫管的總負責人蕭肖芳正踩著積水，打開庫房大門，那積水從門中洶湧而出。整個庫房已經汪洋一片。大股的水還在從升降機運輸口中直瀉而下，進入庫房的水柱正好沖在裝著零件的紙箱上，打得劈啪作響。庫房裡的配件像落湯雞似的呆呆地佇立在黃澄色的污水中呻吟。

望著那從上面灌注下來的水注，我想現在第一件事是打開總裝車間大門，立即關掉還在繼續狂瀉的幾十個水龍頭。！便朝樓上沖去，此時，值班的保衛人員已聞聲出現。正從側面的欄杆上爬進車間的側窗，翻進了第一個窗口。兩分鐘以後自來水的龍頭一一關掉，車間和庫房開始緩緩的退水。

半個小時後，陳增和盧瑞到達現場。庫房門口聚集了十來個人，正在用桶和碗將庫房的積水向大門方向向外拂！看他們的樣子狼狽失措。我在門口喊了一聲：「趕快把淹沒電器的紙箱搶出來，不要堵在一個口子上打擁堂！」我這麼一吼，其實是代替了陳增在指揮救災。而他直起腰來白了我一眼，並沒有理會我。

想到剛才他在電話中那輕蔑口氣，便不屑擠進去，免得他又認為我在貪功邀賞了。轉身，繞過盤道向樓底走去，那樓底滿地已汪洋一片，庫房的積水滲過預製板的縫隙，還在不斷地瀉到排列在車間中的鐵皮車身上。

而焊接的電插板好幾個都泡在水中，發出劈啪的火花，從浙江招來的冷作工在水中工作了。看到這情形，我想他們隨時都有觸電的危險，便沖他們喊道：「不要命了麼？馬上關掉電閘，暫停工作！」電閘關上了，車間裡靜寂一片。地上的積水在寂靜中向四周溢去，從庫房上面漏下來的水也漸漸減少。

十點鐘，整個總裝大樓的水算是退去了，太陽也從濃濃的雲層中伸出她火紅的頭。總裝車間和焊裝車間暫停工作，打掃積水，清理配件。唯有總庫房的庫管工們正忙碌著將沾了水的內飾和坐椅以及裝著電器的紙箱，往庫房外的運輸過道上搬，讓它們照照太陽透透氣。

陳增們已經離開，一場搶救水災的事故平靜下來。我望著那些堆在運輸過道兩側的水淋淋的紙箱，心中暗忖損失少說也有幾十萬，造成水災的直接責任人總裝車間的負責人，是否受到追究，我不知道，也不打算追究這些李友的驕子。

只是在這一週周末的生產調度會上聽他聲明說：「四月30號上午水廠就停了水，我們車間沒有接到任何停水通知。那天下午休息，除了幾個加班的工人都沒有上班，這些水龍頭一定是工人忘了關上，晚上什麼時候來的水沒人知道，因為第二天是五一節放假休息，當天晚上下了大雨，再沒人回過車間……」

經他這麼一說，水淹總裝車間的責任，應由與專汽廠無直接利害關係的水廠來承擔，而與本廠和他本人不相干。經他這麼一講，坐在會議室主持人位置上的陳增未作任何追究。

我坐在會場中間，心中想到李倫經過多少日日夜夜，熬更守夜所掙來的這份家業，還沒等到結果就呈現解體的徵兆了。他剛一轉身，放假不休息的規矩便守不住了；車間主任的責任制也不執行了；工人都再不輪流加班；庫房管理制度乃至警衛人員的職責全部都變成了一紙空文，好像迅速回到工廠原來的狀態。

由此想到他的憂思錄，想到這家工廠從虧損的泥潭中爬出來的日日夜夜。

李倫既是一個匆匆而去的過客，他的努力，他的心血無非只換來了一個「天牌」的美名。

這陳增原是中共很稱意的代表人。還有那參加會議的王惠書記，向雲主席，他們在這個缺「天牌」壓陣的事故責任交代待會上，無一不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如此看來，對李倫的事業只能抱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了，因為這是國有企業！大家遲早要散夥的。

兩個月後，李倫從美國歸來，當他在向全體中幹和黨員幹部的傳達會上，講到美國企業的職工對工作崗位那盡職的態度，還在為他的事業培養人的素質時，我注意到，全體與會者對五一期間發生的這一重大事故隻字不提。

我當時想，他的鋼班子鐵隊伍在向他隱瞞此事呢，還是他那志願兵領導班子對此事達成了什麼默契？或者就有一種無形力量在牽制李倫，使最親近他的人抱識時務者必緘默的態度？只要沒人問起，千萬別提此事！

又過了三個月，李倫應我的邀請作為朋友，光臨我剛剛住下的菜市街新居，「查看」我的陋室時，我才在吃飯時試探地向他發問：「五一節發生的事是怎麼處理的？」他圓睜著驚訝的眼睛，帶著一種沒頭沒腦的疑惑，奇怪地問道：「五一節發生什麼事情，我怎麼沒聽說？」

聽他這麼回答我心中便有了底，打趣地替他解嘲：「你別故作不知，發生這麼大的事，你的得力助手不可能不與你商量處理辦法。」他越聽越奇怪，放下碗摘下了眼鏡，嚴肅追問我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才將五一節水淹總裝大樓的事向他敘述了一遍。

從他那驚愕的眼神裡證明，對此事他一直被蒙在鼓裡，邊聽邊站起身來，臉上泛起了紅暈。我知道，此刻他有些激怒了。按常規，發生這樣的事情李倫剛去美國當天陳增就應該通知他，可是事情竟然過去了整整五個月，竟沒有一個人向他匯彙報。可見他同這個廠的親和度究竟有多大？

人若缺了感情的支撐，單憑單方面的事業心，再大的熱情也是要熄滅的。為止住他正在亢奮的情緒，我說道：「對這件事你先冷靜下來，最好不妨先單獨瞭解一下庫房人員和總裝車間的工人，把經過瞭解得更透徹一些。當然你也許最想不通的是，你最信任的人這次是一手遮天地向你隱瞞了事情的全部經過。」

李倫已經深深地陷入一種難以抑制的憤怒中。自言自語地說：「怪不得這段我離廠的時間，還有人督促財務科查壁山坐椅廠的帳目。」

事情得從三年前說起。那時李倫接任廠長的第二年，因為資金匱乏，開發新車品所需要配件一時採取從配套廠家賒購的辦法，討回來裝車的東西多有殘次品，幾家沙發廠送來的坐椅，不僅做工粗糙，顏色和款式的配套上也難於一致。

這使他萌發了建立一個由勞動服務公司管理的坐椅廠想法，由本廠職工自己生產坐椅。結果被全廠職工代表大會否決，理由是自己做出來的成本高，未必比買現成的坐椅划算。這時候家在壁山縣農村的孫鏞找上門來，從自己家的農家茅舍中辦起了坐椅廠，取名重慶專用汽車坐椅分廠，專門為我廠的車配套。

幾年後隨著本廠的日益興旺，孫鏞的坐椅廠也越辦越大，由農村茅舍搬進了壁山縣城。三年內發展成為擁有資產百萬、廠房二十畝的民營企業。

與此同時，廠裡反對李倫的勢力有了「把柄」，說他用國家給專用汽車廠的專項貸款，暗中挪用給壁山坐椅廠，並成為這家私營企業最大的「私人股東」，每年都要從那裡分得幾十萬紅利。

因為先前兩件醜事，受李倫嚴厲訓斥之後，對李倫懷著私仇的陳增，早就把眼睛盯住了壁山坐椅廠……李倫出國兩個月的學習時間，給了陳增一次難得的好機會，經過當時的黨委付書記王惠的默許，他調集了財務科的兩名辦事員和有關坐椅廠全部帳目，進行了秘密清查。

結果，出乎陳的意外，他在查帳中並沒有找到李倫挪款的證據，也沒有找到李倫年終分紅的任何收據之類的憑證。

李倫從美國歸來回廠以後，財務科長將陳增組織查帳的事情告訴了李倫，在李大倫追問下，陳增將這件事情歸結廠的職工代表大會所要求，並說清查帳目，還這些代表一個說法也是一件好事，查帳已經惹惱了李倫，現在

又聽到水淹車庫的事，無異於火上澆油。

國慶日後的第一次全體幹部大會，他終於揭開了五一水淹總裝大樓的事故。在嚴厲的斥責了責任者對這次事故的失職行為後，宣佈免去陳增常務付廠長的職務。但因為陳增與黨委書記、工會主席有說不清楚的關係，在機械局有相當影響力的後臺支撐，所以，在免去他原來職務後，仍給他封了一個中層幹部頭銜。

在行政職務上降了一級，但工資津貼年終獎金並不少拿。

陳增卻並不甘心他的失敗，一直到了四年後，李倫「病退」，陳增死灰復燃，重新竊取了工廠的常務廠長職務。並對李倫進行了一場瘋狂的報復，幾乎使這個高個子中箭殞身。

在扭虧致富的春風中，李倫的「團結得像一個人似的鋼班子」，其內部不可調和的鬥爭拉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帷幕。

這原本就是共產黨內的黨風決定的。不論李倫在專汽廠有什麼報負和追求，也不論他個人的素質如何出類拔萃，他所作的貢獻有多大，他都必須面對這種無法擺脫的內耗。

但是，不管怎麼說，李倫終於成功地在四面埋伏的危機中完成了他的「專汽的大業」。從一九八九年開始，工廠每年的贏利以幾何級數在增加，不出五年，工廠實現累積利潤達2.5個億，奠定了他事業的物資基礎。

### 第六節：我為一榻安身處而爭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專汽廠已在李倫領導下擺脫虧損，總共七百套職工住宅的修建藍圖，就在李倫的親自審閱後，擺到了工廠職工代表大會的議事上來。這七百套住宅幾乎使在廠職工每人一套，是歷年興修住宅總和的六倍！他們分別以9號樓、10號樓、11號樓分期分批的在奔月路、雲泉路和雲天路邊聳立起來。

在它們竣工以後，專汽的職工們將永遠告別三代同住一間房、一家人擁擠在陰暗潮濕的「灰色」貧民窟時代。實現了他「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的豪邁諾言，告別那「冬來似冰窖，夏日如火盆，雨中忙蓋瓦，風裡倚圍欄」的日子終於才到來。

這才是李倫留給專汽廠三千員工最有價值的紀念，也是對我的「忘我」工作最好的回報！這才是「孔令平精神不死」的最終目的！不然，救工廠幹什麼呢？

1991年底，第一幢共75套住宅的9號樓在月亮田正式竣工。我因為所住的菜市街已被房屋開發公司徵用，住在那裡的全部居民房馬上都要拆掉，所以面臨著搬遷的緊迫形勢。滿以為根據工廠的分房條例，無論誰玩什麼花招，我都可以排在分房佇列的最前面，住進9號樓不會再有什麼意外。

可我臨到在分配9號樓之前，想都不會想到，在向雲把持下，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拋出一個新的「分房方案」。在原來的「進廠屆滿五年才有資格排隊」的規定後，加進了「以進廠的年限進行計分，並按這個分數進行排隊」的條款。

理由是只有廠齡才算對工廠作了貢獻。在廠的年限越長對工廠貢獻越大，應當越有資格享受工廠的福利。

按照這個邏輯，比起那些在廠幾十年的老病號，坐吃大鍋飯的懶漢，我的貢獻微乎其微。能分給一個棲身住地已是工廠賞臉，要分房子請站在後面。

按照這個修正辦法對原先名次重新進行調整，我被排到了三百名以後去了，不但9號樓沒我的份，就是10號樓建成，我也排在最後幾名。我不知道這個一貫捉弄人的惡棍，是對付我呢，還是給李倫看？我尤其不能理解李倫為什麼還讓這個惡棍主持這次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的分配？

其實這已不是李友搶機會給自己修工程師樓的年代了，在那個年代，好多職工為盼望能住上一套兩間的住宅，硬是等到頭髮都白了；

在那個年代，為了搞亂分房次序，沾著權的人，以花樣百出的理由，千方百計地在分房條例中塞進有利於自己的條款；

在那個年代，就為了一個分房排隊的前後，可以與同事爭得打破頭，千方百計把別人擠出分房的佇列。蔡家醫院收拾母親那一套，重新浮在我的腦子裡。

那向雲和他的老婆占了兩套住宅還不滿足，還偏偏利用工會主席的權力，來捉弄他心中不滿的人，令人憤怒；這世道人心怎麼變得如此之壞？

比著工廠破爛的過去，講今天輝煌的業績，李倫這種有意無意的自我欣賞，既中傷了機械局的老前輩，老上級們，又刺痛了像向雲這樣的痞子。用進廠工齡算成績，其實是對李倫的又一種否定！別看這混混在公開場合下將李倫捧在天上，他對這個人有一種說不出的嫉妒和仇恨。

不過眼前卻大不相同了，眼看著工廠四周新房子一幢幢建了起來，房子的質量也越做越好，好房子還在後面，何必去擠著爭？本來我大可不必在名次排前排後計較，更不屑同王惠、向雲為代表的小人一般見識，但是對向雲的流氓地痞本性，敢於同他作對的我，應該讓他明白世道已經變了。

趕上菜市街的拆遷！北碚城建指揮部貼出來的告示，要求所有的拆遷戶都必須在當年年底之前搬離現場。否則推土機進場，不搬出的住戶後果自負。我處在9號樓搬不進去，10號樓又還沒有建好的兩難境地。

在城建局最後通牒面前，我只有再去找工廠總務處，請他們在分配完9號樓騰出來的舊房裡，為我家安排一個臨時的住處！當我走進後勤辦公室找陳濤的時候，他卻向我亮出了廠工會關於安排職工臨時宿舍的「書面通知」。

那上面寫道：「由於進入新房的住戶所騰出的舊房已安排完畢，對以後要求住臨時房的職工，一律停止安排。」

「通知」上的落款，又是向雲。真是尋釁者路窄，每每我最迫切需要解決住房時，都是這個向雲同我過不去，究竟是巧合還是有什麼我所不知道的仇恨，使他像鬼似的纏著我？

奉行整人的共產黨人，其用心之黑，整人之不擇手段，我足足領教了四十年。整人不因別人錯不錯，凡是看不順眼的，整倒別人以為快意。整倒了別人還要踏上一腳，這本是中共頭子毛澤東的座右銘，也是共產黨人的最高原則，「與人鬥爭其樂無窮！」嘛！挨了這麼多年的整，我也摸熟了共產黨員的德性。

欺善怕惡是他們的共性，對付向雲這樣的下三濫，只好使出對付地痞流氓的辦法，就比如我曾在監獄對付監獄官吏和找麻煩的「狗們」；對付鄭樹勳；對付過蔡家場的那個汪戶籍；對付二十四中校長何希濂，以及蔡家醫院的書記王光明等等。中共統治的天下遍地都是咬人的狗，狗性不能以人性理解。

有幾次我都想將向雲攔在廠大門口，當著工人的面臭罵他一頓，以洩心中的憤懣，但反而又一想，現在情況不同了。一來因為我現在在工廠所處地位已不同於一般職工，二來，尚有孔令平精神的美譽，動輒使出那潑辣辦法，有損李倫的面子，他已兩次親自過問我的住房了。我不能為羞辱一個無賴而傷了李倫。

所以對這個流氓我一直採取忍讓的態度，但是眼下我周圍的鄰居已紛紛他遷，城建局的推土機，已經蹲在我們那最後幾座孤零零的房子面前，隨時都像要「鏟平」那裡！。

傍晚時，我在外經辦的過道上與向雲對面撞過，聽說他在安排迎接全國總工會的一個來廠視察工作的付主席。便上前攔著他的路，冷笑道：「要不要我來替你向全總匯彙報一下你的成績呀？」他見我橫眉怒視，語氣逼人，話中有刺，立即虛了膽，不敢迎戰，垂下眼皮，一語不說，繞開了我走了過去。

他剛進去，門裡出來了李倫的秘書小楊，他一面勸我說：「年紀大的人不要動怒，發火傷肝，對身體損害最大。」一面將我拉到一邊低聲向我說道：「李廠長正在召開迎接全國總工會來廠視察的準備會議，裡面還有重慶兩家報社的記者，你就是有再大的意見也要忍耐一下，等視察完結後怎麼都好說。」

餘怒未消的我，恨恨地指著外經辦說到：「這老混蛋欺人太甚」。接著便向這位年輕人，講述了向雲三番兩次阻撓我正當參加分房的經過。

正在這個時候，通向廠後門的石階上，突然冒出了我母親的身影，她在劉啟建的攙扶下親自來找李倫了，眼看我們馬上就要露宿街頭，她實在不能再等了。

李倫已經聞聲在門口迎接了她倆，並且將她攙扶進去，連連聲明：「我們的工作做的差，勞煩你老人家了。」

第二天陳濤電話通知我，要我下午兩點鐘左右去後勤辦公室，參加由李廠長親自主持的關於我的住房問題的會議，參加這次專題會的是本次分房的領導小組組長向雲，付組長王惠，要我準備一下。

與其說這是一次徹底解決我六年之久的分房資格糾紛，還不如說我當著李倫的面，揭穿這一對曖昧男女長期搞的陰謀。早在六年前，因為我向市里反映了本廠的情況，李友故意通過他倆編造了一個理由，說我在進廠之初就寫過不要住房的承諾，把故意不分給我房子，曲解為我自己為了進廠而不要住房。

從此以後，每次廠內職工的分房都沒我的份。

這一次我要從頭到尾徹底的捅爛這個陰謀！逼著對方在交不出我寫的不要住房的承諾書時，痛快地將他們長期非法剝奪職工權利的陰謀公佈在全廠職工面前，逼迫他們承認這是他們卑鄙的打擊報復。

主意打定，下午兩點鐘，我準時來到了後勤辦公室。

當李倫宣佈會議開始以後，我便單刀直入追問道：「在我廠房屋調整中，是王書記和向主席說我在進廠時，曾書面承諾來廠不要住房的書面保證，現在，請你們二位當著李廠長的面，把我所寫的這個書面保證亮出來。」

這突如其來的逼問，幾乎是二人所沒料到的。

其實，在檔案中塞私材料是中共整人的常見慣例。當年在大学生中為了劃某同學為右派份子，就曾經在竊取被害人的一句話或一段日記，經過「無限上綱」臆造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使好多人含冤幾十年，無緣無故死在冤獄中。

當時很多人就提到「黑檔案」應與本人見面，後來平反當局詭稱這些整人的冤檔已銷毀。然而現在，我有理由認為專汽廠的黨工，又在使用這一下流的辦法繼續整人。現在面對我的追問，老奸巨滑的向雲，回避正面回答，連忙重申他在李友掌權時，就主張將文星灣舊房解決我住房的舊事。

於是我不緊不慢地把老事翻了出來，從向雲在六年前隱瞞真相，回答區政協主席張文新的來訪，講到分配八號住宅他那蠻橫態度；從85年的分房條例，講到眼前分房條例許多條款的變動，揭看向雲的煞費苦心……

「一個工會主席理應在我廠扭轉虧損的重大轉折時刻，做一點有利於全廠員工團結的工作。例如把工廠暫時的困難向職工們經常解釋，讓他們樹立克服暫時困難的信心；經常深入到生活特別困難的家庭，向他們問寒問暖，解決具體困難；對職工中發生的家庭矛盾及時解決，以免鬧到廠裡干擾扭虧大事等等」。

「可是作為工會主席你幹了哪些實際工作呢？幾年來我還從來沒聽」

「舉幾個例子，總工辦的瞿工，老母親因重病向工會借錢，你執意不給；逼著他只好到醫院去賣血；廠裡面的交通車壞了一停就是半年；職工食堂裡為了單身職工有一個吃飯不被風吹雨打的場所，伙食團找你批一點牛毛氈你就整整拖了一年……這種事真是太多了」。

「就以我的分房資格，明明是被你們有意剝奪了，你知道我的工作忙，你說，你腦子裡打的什麼鬼主意？我們就真是愚鈍極點的人，任你把我們當猴耍？」

我怒斥這個一向盛氣凌人的工會頭，使他像一隻失了神的木雞！呆呆地坐在那裡，也許他的腦子裡正盤算著進一步收拾我的陰謀，但我卻並不怕；幾十年我同這些鬼蜮鬥，不但練出了膽，還練出了智。

我把話講完，李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看來，這位仁兄的自信被無情的事實動搖了。他並沒有能力挾著黨、政、工一齊，率領全廠的自願兵。！他那「團結一致」的鋼班子依然同中共下層的普通官僚一樣，攝於他在工人中的威信，玩著兩面三刀，對他採取陽奉陰違罷了！

此時他抬起那顯得疲憊和煩躁的眼睛，望著兩位『助手』發問道：「那麼，你們看，孔令平的住房該怎麼解決？」他今天是有意讓我同兩位工廠的最高頭目當面交鋒的。因為只有這種交鋒才會把平時裡二人的陰謀戳穿。

兩個木雞在他追問下一言不發，陳濤終於開口了。他建議道：「根據工廠職代會的決定，九號樓留有七套由廠長處理的住房，我建議李廠長可以動用這個處理權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麼處理既不提過去的事，又解決了我眼下的困難，也給兩個人一個體面下臺的機會，以免「傷了」領導班子裝出來一致那點面子，可謂用心良苦。！然而此時，兩人表面不說，肚子裡還不知耍什麼花花腸子，同這樣的人共事夠累。

在這種「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到來的時刻，我們是用自己的勞動來換這個果實的，真正覺得問心無愧啊！看看我們周圍的廠，垮的垮了，有的維持著倒死不活的狀態。！專汽廠沒有這幾年李倫帶領我們拚搏，能在今天分到住房嗎？

所以，我不願接受任何人的特殊照顧，我說「今天，我是要討回黨委和工會長期剝奪我正當的分房權，他們應予公開認錯。然後，按糾正錯誤的名義解決我的住房。這才令人心服」。

不料，我剛一說完，那原先打算沈默的王惠，像被針扎紮了似的立刻跳起來叫道：「這怎麼行？黨所作的處理，也是組織的決定，是不存在糾錯的。」

死不認錯，整人後不准別人申冤，這又是中共的傳統作風。作為執政黨的中共，若不是被打倒過的鄧小平，胡躍幫替毛澤東製造的冤案收場，誰會為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平反？小小工廠黨委付書記不認錯是當然的事。

第三天，《重慶專用汽車廠關於獎勵分房》的條例，由廠長辦公室簽署的紅頭文件，下發到專汽廠的所有科室和車間。受獎的七人中，我排名居第一位，雖然仍是一種變通的方法，卻是創下了這家工廠的首例：我已五十五歲了，才第一次以獲獎的形式分到了屬於我的住房。

然而，若不是全廠員工，在李倫領導下創下這段業績，我的住房恐怕還遙遙無期呢！不過，像我這樣的普通職工，像我這樣的年齡，甚至比我年紀更大的，在毛澤東瘋狂作亂下，沒有自己住房的人家還多的是呢！偌大的中國大地上，『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的日子還遠遠沒有到來！

1992年八月，我終於在城市規劃指揮部的通令緊逼之下，在推土機隆隆的催促聲中，雇了一台長安車，匆匆將我的家從菜市街，那四面廢墟的包圍中搬離出來，搬進了陽光充足的，專汽廠九號宿舍一套三居室中。結束了我屈身霉而潮濕的貧民窟歷史，當年我已55歲。

我坐在客廳裡感慨萬端，儘管我並不心服這種以廠長名義的獎勵，但我想，農汽廠繼續爛下去，難說我現在還不知道住在哪一個街邊屋角？至於在中共統治下的社會中，我又哪裡同向雲們去爭「公正」啊！

## 第七節：專汽大業的破滅

專汽廠能在短時間裡「振作」起來，是因為它遇到了面臨破產的危機。破產後，一千名職工及其家屬總共三千餘人擁上街頭向政府要飯吃，是對中共政府一個不安。在這種時候碰到官場腐敗沾染較少的，又有很強運籌能力的李倫，以他拚命的精神和敏銳的天賦，才得以成功地完成「專汽大業」。

一千三百多專汽職工看到了工廠短暫的希望，享受了它的效益，在北碚的街頭不用為幾分錢的菜錢同農民們爭得面紅耳赤，他們又可以在街頭粗聲說話。然而，那些多年「指導」這家工廠的上級機關，卻增長了日漸膨脹的嫉妒心。至於那新聞版頭上，獵取專汽廠新聞的小報記者，又重新圍了上來。

「爆發戶」是機械局的領導們對李倫的看法，他們從來不會掉過頭去看看過去，思考之所以有這種隔世之變的原因。

他們沒有體會到大資本家李嘉誠、霍英東們當時是怎麼創業的？而老是站在中共這個相互猜疑的，帶著嫉妒心和這個政黨根深蒂固的缺乏人性的立場上，來看待創造事業的人。當然，大資本家創業是為了他的家族集團，而李倫也是為了他今後的事業前景！雖然，這裡埋伏著李倫事業一個悲劇性的結尾。

可悲的是，李倫的剛愎自用，使他當時還沒有洞察這個政局的能力，還一味沉醉在一群為他捧場的「敢死隊」迷魂陣中。當時就有人向他提醒過：「你在那個工廠幹了那麼一番事業，一定要傷害一部分與你貌合神離的

人，同時，中共領導下的國有企業是沒有前途的，你要多加小心。」

可惜，他在面對朋友的忠言逆耳時，只是一笑了之，而且誇下海口說：「誰能否定我這些年所創下的業績？我一年就可以賺回過去的十個農用汽車廠，誰敢污蔑我，他就也上臺試試！」

但是，最後終於不幸的被他的朋友言中了。

同當年人民公社養一批不做事的公社書記和社長們一樣，國有企業養著一批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工廠的廠長書記們。他們擔心的不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存亡，他們只知道執行上級部門下達的任務，奴才般貫徹一個接一個名目繁多的指示，時下他們只認錢和權。

專汽廠自一九八七年，換了一個將工廠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來做的李倫，就能實現每年1千萬等差盈利，成為重慶市（也是全國的）國營工業企業的佼佼者。雖然專用汽車廠的上級對李倫的桀驁不馴很不以為然，但前有李友、孫余等人都一個個敗下陣來，所以對李倫的傲慢也只好忍氣吞聲。

在他任期七年的時間，前四年用來彌補他的前任480萬虧損，從1991年工廠虧損已提前扭轉時，新的辦公大樓落成，新的總裝大樓，新的焊裝生產線陸續投入使用，新的金工車間在破土建立，新的七百餘套職工宿舍先後竣工，專汽的職工們搬進了新居。

在辦公大樓的左側升旗台邊，留下了一塊兩公尺高的大理石碑上，他親自醮著創業的酸甜苦辣，將他的深情，傾注在那石刻的碑文裡，那碑文叫扭虧紀念碑，上書道：

「西元一九八八年工廠虧損四百八十萬……是時，悲嘆之聲隨處可聞，淒涼之井到處可見，人人思散，能者思走……後經三載，夏曆三伏，冬博三九，一日不徹底翻身，餘一日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終至1991年春提前九個月向世人宣告，重慶專汽重新站起來了……環顧乾坤，古往今來，適者生存，當今之世競爭激烈，改革為先。飽受虧損之苦的專汽人立下海誓，決不重演虧損歷史……前世不忘，後世之師，為後者誡，特立此碑。」

七年前這家資不抵債的農用汽車製造廠，現在已變成一個擁有固定資產2.5個億的大廠，形成了擁有越野和公共汽車兩大類別，五十多個品種，年產值超過五個億的重慶市汽車生產大型企業，成為政法、公安、農業、衛生環保、郵政等二十多個政府部門指定的專用汽車生產基地。

在雲泉路和雲天路的交叉區，原有的那十分沉重的灰色破舊帽，已經在原先荒涼的土地上聳立起一片嶄新的廠房。位於中央地帶的黃色辦公樓，已從它立基的小山包被炸平，原先長滿荒草，停放蘭色農用車的場地上，一幢占地六千平方公尺的八層辦公樓，拔地而起。

在辦公大樓的東面，一排五層樓房共兩百套帶有浴室和空調的客房，以及與之配套的鍋爐房和餐廳，取名北泉賓館的豪華招待所，以它的嫵媚迎接著到這兒來作客的八方賓客，永遠結束了李倫所住的陰暗潮濕小屋，以及端著飯碗蹲牆角的寒慘日子。

回過頭回憶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片沉寂了幾千年的八萬多平方公尺的土地上，從荒涼的狀態發生的變臉。在驚訝之余自然會想到這裡換了一屆又一屆的廠長和書記，怎麼就沒人想到在自己任期上作點改變它面貌的創業？

好像這裡就等著這位1.88米的大個子到來後，才開始改換它的舊貌？而今，只有那些不計名利，無聲勞動的建設者們，才十分清楚這一切來之不易。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1993年春天在持續七年的日夜奮戰之後，在一次開到第二天凌晨兩點的會議中，他昏倒在會場上，當會議的工作人員把他從昏倒的椅子上扶起來時，才發現一層厚厚的坐墊已經浸透了他的鮮血——因為脫肛造成的大流血，整整折磨了他一個晚上。

他的妻子、孩子和貼身的工作人員，抹著眼淚將他抬送到重慶醫學院的住院部，他不得不一連躺在病床上三個月，在這期間他仍一如既往的通過他的秘書，關心他一手扶持起來的「專汽大業」。

1995年四月重慶市政府對他個人進行了特別的獎勵，他的名字載入了當時山城創業的企業家——山城之星的光榮榜。並且一次性的向他發給了十萬元的獎金。頒獎時，他表示為表彰和鼓勵為專汽廠的科技進步作出貢獻的

人們，他決定將這筆獎金捐獻出來，成立北泉汽車集團的科技發明獎勵基金。

當時黨委書記王惠、工會主席向雲曾代表黨政工領導集團在病榻前發表了「極其動人」的講話，王惠稱李倫為專汽事業之父。錄影的鏡頭攝下了她流淚激動的片斷，當場決定由黨政治處攝製，取名為「逆流奮進」的長篇記實紀錄片，記載專汽廠在他的領導下如何克服困難，扭虧為盈的七年歷程。

這部紀錄片的開場便是李倫在任職時臨危受命的錄音講話，以及他親自參與編寫的專汽廠歌。當我看到王出現在鏡頭，注意到她幾次摘下眼鏡擦去流在眼角的眼淚時，我雖有一種不適的噁心，但還是半信半疑了她。

幾乎沒有人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然而，正當人們議論他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忽然有一天他從病榻上醒來，感到自己其實是幹了一件自命轟轟烈烈的蠢事，他突然感到生命已不能支持他繼續完成他的宿願。

然而，就像一曲美妙的樂曲突然弦斷了一樣，李倫在專汽廠開闢的事業，就此中斷了。

1996年五月一日前一天的晚上，黨政工召開了全廠的職工大會，決定成立北泉汽車集團公司，並同時成立集團公司的董事會。這一夜，李倫帶著初愈的病體到廠主持了最後一次「交權」大會，在作了長篇的工作講話後，便宣佈了他的工作交待，接任他擔任廠長的是原汽車公司的一名生產處處長王窪。

會議一直開到了晚上十一點鐘。還沒有完全康復的李倫不知是因為身體原因，還是心理上的障礙，坐在主席臺上，燈光映著他蒼白的臉。

散會後，他不像往常一樣被一大群人簇擁，而是獨自一人走出辦公大樓，坐上在那裡等候他的車匆匆離去。我當時只聽說「升任」北泉集團公司總裁的李倫，在專汽廠某個辦公室裡繼續在策劃他的集團公司大計。

換班就這麼戲劇性的完成了，李倫再也沒有回到專汽廠來。所謂北泉集團公司，也從來沒有掛牌，專用汽車廠一段「輝煌」的創業，隨著他的離去而結束了。沒有後繼者繼承他事業，專汽廠像一個斷層出現在他任職七年後的一瞬。誰也不會像他那樣拼命，換取這個廠從未出現過的輝煌。

令李倫沒想到的，兩個月後他的兒子李嘉，因套購北泉汽車組裝進口汽車的合格證，被檢察院刑事拘留。那個被一度貶為外經辦主任的陳增，重新由王窪聘為常務付廠長，紀錄片「逆風奮進」停拍，這一切厄運好像早就等著這時到來。

李倫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根本沒認清，在中共統治下，任何有才能的人沒有掌權者作後臺是休想幹成任何事的！！專汽大業的成功，只說明中共一部份人的主張，沒有認識這點，怎不到頭一事無成？

一個以王惠為主任，劉貴為組長的審計組宣佈成立，那審計組的辦公室就設在辦公大樓五樓黨委辦公室對面，開始了對李倫在職期間的財務大審計，審計組放出風聲，說李倫在離任時至少卷走了數百萬公款。她舉著一把檢舉信，聲稱審計室將拿出一個令全廠職工都滿意的結論報告大家。

這種說法，挺合乎中共改革時期企業法人的一般邏輯，所以頗能盅惑人心。現實過程應當這樣：一個在任職期間一無能力的人，把一個企業搞得一塌糊塗後，也要撈足自己的腰包。

有權就撈，過期作廢，是鄧小平中共管理下國營工廠的通行法則，有人把這時期的工廠管理者比喻成一群蝗蟲，蝗蟲飛來飛去，吃完地裡莊稼，留得荒涼一片。李倫既把廠搞富了，也有條件撈了，收穫一把也是應該的，要不然，他的兒子也趁他離任機會，連走私車合格證也要撈幾十張？

但是專汽廠的一部份職工們卻替李倫打抱不平了，黃師傅說：「貪財的人不可能把這個廠從死地裡救活。再說，李倫就是拿了一筆錢走，他也應該，一份貢獻一份回報。這些年來他把我們這個廠救活過來，工廠贏了那麼多，他得一點也是天經地義的，反正總比吃光了莊稼再飛到他處的蝗蟲好多了」。

而另一部分人，像陳增以及曾在李倫從嚴治廠的刀口挨了宰的人們，別有用心的鼓動職工聯名寫信上告機械局，要求徹底清查李倫任職期間的所有帳目。

李倫被一群小人當成落井下石的罪人。



中共這種令人寒心的官場格鬥，那王惠令人作嘔的變臉，就會想到今天人心不蠱。中共統治令人感到道德處在敗壞的末日！中共的黨員有幾個不是當面是人，背地是鬼的呀！君不見那毛澤東是怎樣對付劉少奇們就明白了。先師楷模沿襲至今，成了中共的黨風！

靠走私進入大陸的小轎車經過倒賣，每車可以賺到二十萬人民幣。官僚集團為了控制這種轎車的分配，嚴格卡住這些走私黑貨的合格證，掌權者利用發放合格證也能躋進中共「中產階層」！。

為支持李儉日野生產線所需資金投入，蕭肖秧曾給李倫特批了走私車經營權，以政府名義給每台組裝進口的小車，以每台二十萬，向專汽廠輸入了「資本」。這比之由市政府調撥三個億，簡單又快捷。三個億相當於1500台進口車的組裝權，每一台組裝車充其量只消兩個人裝兩天就成功了。

李倫退休後，正是進口車組裝進入高潮。重慶市大小官倒們像一群蒼蠅，盯著這轉眼就可賺二十萬暴利機會展開了爭奪。他退休以後，進口車的發放權力落到了王窪的手裡，正兒八經的做起倒賣合格證生意來了。這比六年前殷大公子在工廠門口倒買農用車卷，大進了一步。

1996年初，王窪批給成都的經銷主任陳平，一次性出售的合格證就有一百張。這個消息是通過什麼渠道讓李嘉知道的，我不知道。反正，當時已成為北泉車經銷商的李嘉，從陳平手裡一次性買下了三十張組裝車的合格證。

然而，因為暴利太赫人，很快中共派出專人查封和清理走私車。陳平因此而被公安局傳訊。於是李嘉從陳平手裡買下三十張合格證這件事，便成了殊連李倫貪污的「證據」。在這鐵證之下，李倫便由眾口稱頌的創業功臣，一夜之間降為受到追查的「准階下囚」……

人在劇烈的運動中頭腦發熱容易盲目衝動，有時會犯很大的錯誤卻不查覺。等到激情過去，靜下來反省已經過去的事，有時就會發現自己所做的事極其荒唐需要修正，甚至發現基本方向全錯，誤入了迷途，必須調整方向。

李倫在中共特權者階層利益分配的傾軋中落魄，改革開放時，財權歸屬不定的狀態下，這種掠取最後必表現為奪權鬥爭，奪權使他昔日的輝煌歸於消亡。所以他大可不必把個人的失意，歸於某些職工不講良心，普通的專汽職工除了聽命擺佈外，充其量也是一些發發牢騷的受難者。

在浩瀚的中國古代文庫中，記載並論述經濟的典籍顯得不足，十三經傳了幾千年，無非都是圍繞統治這個題目，以仁義禮信為「宗」，禮樂官爵遵守的制度都沒有擺脫社會關係這個總綱。這是因為中國還處在封建主宰時期，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統治階級只關注社會的治和亂。

當辛亥革命給中國輸入建設國家的民主大綱時，卻被北方輸入的共產主義所截斷。三民主義被蒙上了反動資產階級的不自之冤，被趕到大海一個孤島上去了。在大陸所施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獨裁統治下的封閉經濟。中國老百姓在吃盡了苦頭以後，才重新將中國歷史拉回到市場經濟的起點上。不過這種權力支配的「市場經濟」最終滑向何方，大家可拭目以待。

從李倫手中接過專汽總廠廠長位子的王窪，摘取了我們奮戰七年辛辛苦苦換來的勞動碩果，他不僅享受了前任為他創造的條件，還享受了一家富裕大廠法人的榮譽和利益。低能而貪婪的他，很快將工廠管理大權交給野心勃勃的陳增，在陳增的操縱下勾結向雲，王惠這幫專汽廠「舊臣」，把持了工廠的大權。

好端端的北泉廠，在內鬥中兩年不到，就失掉原有的盈利慣勢，到了1996年重新轉盈為虧；這一年這家工廠實際虧損了五百萬，陳增為了怕露了馬腳而失寵。用假報庫存物資，虛報基建投資來掩蓋實際已發生的虧損。

機械局的頭們裝做什麼也沒有看見，因為他們的口袋裡塞著王窪在年底送來的「慰問金」，他們的桌子上，擺著仍然顯示專汽贏利的報表。欺哄行賄，是這個時期國有企業廠長們都會的伎倆，在種種骯髒交易的狗肉上，還要掛「學邯鄲精神，力創第一流」的羊頭。

1996年五月我正式提前內退，結束了我對這家工廠所作十二年貢獻。時年年58五十八歲，此時我的兒子才十四歲，初中三年級的學生，為了籌集今後給孩子求學的學費，也為了積蓄一點晚年的生活補充，我走上了打工的生涯。

離開專汽廠偶有回廠的時間每次回到車間，工人們都圍著我問長問短，曾在品質處當付處長的蕭肖森告訴我：

「自從你走以後，原來制定的質量法規全部取消，產品的質量實際上無人管束。購車業主，將出故障的車開到工廠大門堵死。他們拿著事故鑑定找廠長交涉，嚇得王窪躲在辦公大樓裡不敢出來。堵門的司機們吶喊示威，久而久之，專汽廠的老用戶，都一個個離開了這家工廠，售出的車輛每年大幅度減少，而售後服務忙碌得團團轉。」

他還告訴我最近開往新疆的十台車，因為制動不靈，電器等毛病，不但用戶不要了，反而叫專汽廠自己開回來，這麼發生的往返路費，修理費就上了好幾萬。說完以後，便沮喪的搖頭說：「今年虧損預計已超過千萬，我看，工廠是沒法再維持下去了。」

第二年夏天，我回工廠經營辦公室辦理我的退休手續，碰到了戎露，她正在辦公桌上翻閱一大疊我當年起草的，而後又被陳增打入冷宮的品質管制檔，她見到了我，好似見了久別的師長。連忙請我坐下，端上一杯開水後，問我離廠後在那裡工作，還詢問李倫現在在幹什麼？說大家都希望我們再次回廠。

我回答道「世上並無救世主，李倫也好，王窪也好，只要心存事業，都能振興工廠。」說著順手翻了翻桌上堆放的檔案發問道：「近來工廠的經營狀況還好吧！」她搖搖頭說：「自從你走後，產品質量基本上就沒人管。」

她還告訴我：「因為工廠重新出現了虧損，市機械局最近還派了一個工作組，審計了陳增，沒幾天陳增也下臺了。王窪眼看著車庫裡積壓了幾百輛車賣不出去，一面召開廠務會，決定重新翻印過去你所起草的管理辦法，和質量考核的經濟責任制，由總師辦整理後，重新頒發執行，並令總工程師督行。」

聽到她的介紹，我心裡很平靜，六十歲了，深刻體會「天命」不可違抗，陳增以為人意可對抗客觀規律，為拔除眼中釘而廢了全質辦，從此專汽廠再也不會出死心眼的孔老二！當年唯一想得到一個堂堂正正的名，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我們應當掙得的房屋和待遇而已。

現在我們的退休金可求溫飽，住房也有了，我們還圖什麼虛名？何況接替李倫的是一些肖小。李倫所提倡的敢死隊精神，成了笑話！現在還有誰像李倫那樣傻幹啊？面對戎露期盼的眼光，我只有笑而不答，這正是：「一曲新辭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陳增因免職引發專汽廠的一片譴責，兩年後，王惠也灰溜溜退休了，當人們用解嘲的口氣問她「李倫的問題，要到什麼時候才會給全廠職工一個滿意的答覆？」時，她只好苦笑而不能回答。

而那個被撤了職的李小兵，在王惠退職時向她家打了電話，恭喜她終於從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了，願她不要再像任職時瞎整人了。聽到這公開的奚落，她也只能當成一瓢潑向她的污水。這真是「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銷」。人何必爭高低！任何是非曲直自會得到公論。

從1995年王窪接替李倫後，專汽廠重新被虧損纏住，1998年，盧瑞接替專汽廠後，2003年虧損已達一個億！1990年李倫在「扭虧紀念碑中刻下的誓言，終於變成一代創業者留下的一廂情願！一個從虧損開始創下三個多億的大型國有企業，由重慶市政府坐東，以五千萬的「跳樓價」，出賣給了重慶市一家私人摩邦立帆集團。重慶專用汽車廠在這塊土地上掙扎苟延，直到消失。

盧瑞這個納縉子弟，便在中共市政府庇護下，靠「賤賣」這個大型工廠的昧心回報，換來老闆尹三的嘉獎，在力帆公司謀到了一個付總經理的頭銜，拿著年薪十萬的報酬。進出有轎車，有豪宅，過著老闆生活。

而賤買專汽廠的尹三，根本就不想在這塊土地上，繼承專汽廠有過的雄風。從盧瑞手中以五千萬買下這片黃金寶地後，便迫不及待向北碚區政府以四個億的價格，準備將它們拋售給北碚房地產公司。

可惜，這私下的買賣尚未成交，就遭兩千專汽職工群起反對，紛紛上告市政府，迫使尹三暫時沒能得逞！當然這都是中共某當權者背後在搗鬼。

經過盧瑞的穿梭，條件談妥，專汽廠『改制』鬧劇於2003年拉開序幕。所謂『改制』便是處理原國有制的職工，其退休部份已交給「社保」，有一口餓不死的飯吃。沒退休的拋向社會。

於是以人員超編為藉口，重慶市政府以七百元一年的低價，買斷了最後七百人的工齡，當然，在面臨生存危機時，被解聘者可以奮起反抗。可惜中國人的醜陋，使他們像一盤散沙，不能團結一致，只好淒淒惶惶各奔生存之路。

這使我聯想到中世紀時期，英國的農場主為了獲取暴利的目的，將世代依附土地的農民驅逐出他們耕作的土地，並將這些土地變成種植草場的牧場。因為他們看到在土地上圈養羊群所得的利潤，遠遠高於農奴們種植糧食。便演出了一段羊吃人的歷史悲劇，史稱「圈地運動」。

被逐出工廠的職工們，猛然由『主人』地位，跌進了出賣勞力的深坑。專汽總廠的職工從此流落街頭。

我的一個鄰居，譚某因家庭經濟拮据，夫妻離婚，如果不是李倫當年為她的父親留下一套房子，她將帶著年僅九歲的女兒流落街頭。

專汽廠只短短存活了十年，李倫為此所付的一番心血便告消失，他立的扭虧紀念碑被後繼者盧瑞推倒打碎，成為行人腳下的碎石。寫在大門立柱上的志願兵敢死隊精神，變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每想到當年沒日沒夜的「拚拼命」，就在我的心頭湧起對這種傻勁的羞恥回憶。現在只有大倫時代留下的八百套住宅，才在這些住房裡棲身的職工心坎裡，留下一點紀念！

問到失去工廠的幾百名職工，為什麼被盧瑞這麼輕而易舉的賣掉？

需知，李倫創業時，同樣的地盤上依靠一千三百名職工，在這裡建起了專用汽車廠。並創下了每年盈利四千萬的成績，就可以明白，人多並不是企業衰落的原因，其實盧瑞只是中共「改制」新花招的小小槍手，毛澤東從乾爹史達林那裡搬來的國有制行不通了，又變了一個花樣，吃苦頭的還不是工人！！

寫到這裡的時候，正好發生了我所在的重慶專用汽車廠現任廠長李安林，被人在辦公室裡暗殺的事件。

那一天，他的妻子在晚上十一點鐘見她的丈夫遲遲未歸，當天下午又沒有打一個電話回家，以為他手機沒有電了，於是從家裡帶著充電器，到他的辦公室裡找他。一上丈夫辦公的二樓，整個樓層黑壓壓的一片，靜悄悄的。

打開過道的路燈，走到丈夫辦公室的門口，見門是虛掩的，黑壓壓的屋裡沒有任何聲音，順手打開室內的照明燈，眼前出現的場景使她頓時嚇蒙了。

她看見她的丈夫倒在他的辦公室沙發前，地上的血已呈黑色，身體已顯得僵硬。看來，已死去半天了，連忙戰戰兢兢驚聲地喊醒樓下值班室裡的值班保安，據保安說他是下午六點鐘來接班的，並沒有發現樓上有異常響動，立即打電話通知了「110」，李安林身上被砍十一刀。

李安林被殺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十一幢家屬樓，人們議論紛紛。

李安林被殺第二天早晨，便有人告訴了我，與我們這幢八號樓只有一牆之隔的專汽廠大門邊的露天廣場裡，正在搭造死者的靈堂。

自從97年我退休以後，至今整整八年了，前幾年還偶爾去總裝車間去一趟，多是受買車的朋友所托，要我選一下他們所要的車，近四五年，我已完全不進廠了，嚴格的遵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風聞王窪繼任專汽廠廠長以後的種種無能，也是當了耳邊風。

後來與我同是這七套獎售房的得主，搬了三戶出去，其中兩家搬進了在雲泉路口，新建的一幢每戶占地兩百平方公尺的樓層式「豪華」住宅。我感到奇怪，有了住房本該滿足，緣何想好還要好，占了一套又一套？

殘酷的事實擺在專汽職工的面前，自從李倫離任以後，任何由官方指定的人沒有人讓它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站穩腳跟。從王窪、陳增、到盧瑞僅花了五年，三個億的資產，便被繼任者虧光了。

短短十年的專汽大業就這樣謝幕了！！

## 第六章：如此霸佔民宅

從八七年開始，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時，也包括了毛澤東時代在「清匪反霸」、「土改分地」、和「鎮壓反革命」中被無理強佔的私人住宅的清退。

當年相當數量的受害者，被無緣無故扣上惡霸、地主、國民黨特務遭受屠殺，倖免於死的被帶上五類份子帽子，遭受了幾十年的身心摧殘。

遭整者家裡一點可憐積蓄被搶去，尤其是賴以遮風避雨的住房被強佔，還要延及他們的兒女受到牽連，其涉及人數之廣，受害人之無辜，恐怕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

毛澤東自己就不打自招供認，「革命對象占人口的10%」，這樣算來，六億人口禍及人數至少也有六千萬。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九年間，五類份子絕大多數已棄屍荒野。所餘余的倖存者到一九七九年已不多，這些倖存者中還有相當部份，是『解放軍』兵臨城下就已繳械投降，束手獻城的「起義投誠」人員。

有人說中共原本是山裡的土匪，土匪以搶劫起家，土匪當了政，將原先政府的制度廢除，抓一頂「革命」帽子戴在自己頭上，成立「革命政府」但骨子裡仍是土匪，老百姓的房子，幾畝薄田，一點女人用的戒子耳環，都在『沒收』名義下搶去。

一九七九年當時中共組織部和國務院，曾對私營企業改造中，和起義投誠的國民黨人員私宅，作了一個清查並作出發還的政策性規定，以檔形式下發給各級政府！一個清退霸佔房地產的工作，便在中共統戰政策的鼓譟噪下開展了。

然而，這比右派落實政策還要馬拉松，其中藉口政策界限不清，藉口沒有錢和種種對清退對象所作的限制，使最後體現政策得以歸還的人數微乎其微。被北碚區政府列入清查的人數僅只有十餘戶。

尤其是在政策貫徹過程中累累受到干擾，使政策落實備受阻撓。所以受害的人罵道：「中共真是活搶人的土匪！」

我的老岳丈劉學理便是其中一員，他的住宅被中共搶佔去四十年，最後仍未歸還。直到1991年，高齡九十的他，抱著被人搶佔家園的終身遺恨含恨九泉。

他曾任北碚城的民政局長，當時的北碚屬於盧作孚管轄下，山峽防務局的一個重鎮。劉學理只是跟隨盧作孚先生的一名普通地方官吏：民政局長兼任北碚保安部隊司令。

抗戰時期，保安部隊算成國民黨正規軍編制，劉學理被授了一個上校軍銜。一九四九年十月劉鄧大軍進軍重慶，二野下屬的十二軍沒費一槍一彈便和平地佔領了這座城市，率軍歡迎共軍入城的劉理，也就成了國民黨部隊的起義投誠人員。

十二軍入城後，劉學理變成了普通老百姓，家中五個孩子還小，他要自謀生計。當他怯生生的到軍管會去求職時，他的身份一下子從率軍起義的城防司令，變成了被軍管會召去思想改造的學員，入了反革命另冊。他本人被判管制。

唯一的積蓄是1946年在上海路購置的一幢四百平方公尺的私宅，被一直覬覦著它的北碚工商聯合會看中，並於一九五二年用軍管會簽署的命令加以「徵用」。

在槍桿子押送下，他只好同妻子一起帶著五個未成年的孩子，離開了自己的家，哭哭啼啼遷居到北碚天生橋偏僻郊區一所破房子中，一住便是三十年。

同大陸上成千成萬計的五類份子一樣，在共產黨暴虐的歷次運動中，被街道居委會欺凌，年過半百的他，當過街段下力的搬運，挑涼水的力夫，為豆腐坊商店磨豆腐的夥計。為了把五個孩子拉扯成人，他每天起早貪黑的做別人不願幹的活，忍辱負重，把一腔怨恨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劉啟建每提到她的童年，都會傷心的說，她八歲時就要背比她小五歲的小妹妹，撿二煤炭和木工房裡砍下來的木屑時被狗咬過；每天她同姐姐抬著一桶水，走兩裡路送到父親做工的豆腐坊……

直到一九八二年，中共才按照上級檔給劉學理平反，取消了管制，並以起義投誠人員身份得到一張平反證書。

毛澤東咽氣後，民間響起的怨恨聲一直在沸騰。在為無數冤魂平反的同時，歸還被強佔的民宅也提了出來，這本來就是一件壓了三十年的事。被霸佔當事人的房地產契約，和當年軍管會所發出的「徵用」通知，都寫得明明白白。

1984年，中共中央有關清退過去歷次運動中被強佔民宅的政策公佈後，劉理正式向北碚區政府提出歸還上海路房產的要求，他同北碚區同時被沒收的幾十戶人家，開始了向中共有關部門提出歸還私宅的長期馬拉松交涉。

中共的任何『革命』藉口，都無法掩蓋無理強佔民宅的惡名，其實無需經過調查核實。只要有誠意，全國這種種霸佔民宅的惡劣行為，完全可以在幾個月內全部清退。

但是中共政策的制定者，向來按他們的需要出發，難以光明正大的糾正錯誤。加上中共內部派系林立，以『頭』為本，並沒有什麼共同遵守的法律和原則可遵循。今天一些人發出的政令，明天另一些人就可不認帳。而且共產黨「左」風盛行，朝令夕改，在清退民宅問題上，便有幾個前後矛盾的決定。

例如先前的檔案說對強佔的民宅一律退還，後來又有了一個補充規定，把土改中沒收的地主房產和反動會道門帶有封建性的房子，排除在清退之外。後來又加上了凡有剝削性質的民宅都不與清退一條，這樣一來範圍越來越小。

中共政策的執行者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把這事結束在一連串「上級批示」的推諉之中。對這種有附加條款的軟指標，慢慢就變成根本無法兌現的零指標，以各種藉口將被強佔的民宅繼續地霸佔下去。

在國際人權組織對中共的譴責所施加壓力的結果，為了向國際社會做點樣子。中共除了對有影響的國民黨上級軍官，以及有統戰關係的人士，給以歸還外，其他被強佔的民宅根本就沒有動。

看不清中共骨子裡面的東西，心存僥倖的絕大多數被掠奪者，花費了無數的精力，備齊了各種證明房子的材料，等在統戰部和民政局的信訪處，一等就是幾年，最後除了白白等下去，沒有任何結果！

然而，已經八十高齡的劉理老人已經等不及了，自一九八三年老伴死後，他天天都在搬著指頭算自己還能活幾年？被人占去他的老宅，是他晚年最不能嚥咽下去的一口惡氣。他要趁著這剩下的一口氣，要回這被人搶去的家園，給五個親生的兒女一個明明白白交代待，否則他就是死了也嚥咽不下這口氣。

這一天，他手捧著「人民政府」發給他的，那張蓋著政府大印撤消管制的『平反』通知書，在小兒媳婦和孫子們的摻扶下走到區政府去。

在信訪接待辦公室等了好幾個鐘頭，一直等到下班。一個中年男子向他說：「你不要在這裡等了，我們要下班了，你回去還是準備好自己的有關房屋的所有資料，說明房屋所在地、占地面積以及何年何月購買，以及房地契的複印件，還要寫明，何年何月那個機關簽發的沒收令，因什麼理由沒收等等……」

當劉老從懷中掏出已經帶來的材料時，那中年男子還算耐心的坐下來翻了翻，說：「現在辦公樓的人都下班了，我看你還是回去再按我向你說的範圍重新整理，備好所有的資料再來吧。」

整整等了一天，陪伴他的孩子們都已離去，老人連衙門裡管事的官都沒見到，便在這裡花了第一天的上訪。「解放前」他為官十幾年，沒想到中共的官架子這麼大。他無奈的喊了唯一沒離開的小兒媳婦，沒趣回到天生橋的家中。

當我聽到他在信訪辦公室受到的冷落，便自告奮勇由我陪他去。

按照我的經驗，中共這種官僚體制對這種找上門去的告狀，非經長期多方力爭不可。北碚地方的衙門叫不開，就把材料轉發給重慶市，依次向四川省政府直到中央國務院呈送。

劉老把當年的房地契找了出來，由他親筆重新起草了一份有關上海路住宅被沒收的材料，經我刪改後，複印多份準備逐級投遞。

由我陪同劉老伯去區政府信訪辦，向接待人出具了有關我們預先準備好的材料後，劉老伯又被接待人支到北碚區房屋管理局。

北碚房管局接待我們的是一個中年婦女，看樣子是那裡的負責人，她在看了我們的材料以後說：「你們的問題屬於天生房管所經辦，你們還是去那裡找他們吧！」我又陪同老人到天生房管所，看來誰都不知道經管的辦事衙門在那裡？

一番口舌後，天生房管所的辦事員，終於收了劉理寫的材料，並且告訴我們：「我們已經接到了有關北碚區給各所發的需要清退房產花名冊，但是具體怎辦還要等到市房管局的通知，你們還要回去等一段時間，如果有了明確的規定，我們會通知你們的。」

事情總算有了一個「開端」。劉老伯回家又等了半個月，可是仍石沉大海毫無音訊，老伯終於焦急的又一次在我的陪同下，又訪天生房管所。

然而這一次他們回答說：「你們交來的材料已交到了市房管局了，有關這次房屋歸還的問題，還不知道怎麼辦？上面沒有批示我們無法操作，這裡有一個經費問題，沒錢拿什麼給占房戶？發還給你們還缺乏具體的規定，所以你們最好去催一下市房管局。」

又將老人踢到市房管局去了，我想我在落實政策時，就被當成球在幾個衙門裡踢來踢去，那被踢的滋味真讓人難受。按著心裡的一團火，我吼道：「你們把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當球踢來踢去講良心嗎？現在天氣又熱，你們不感到這麼做太過份了麼？」

但是他無奈的攤開手說道：「你們也知道，現在辦事真的很難，天生房管所變不出房子來，拿什麼還給你們？」接著說了一大堆的安慰話，給了一個使上訪者不完全失望的話，他說：「這件事老大伯盡可以放心，反正中央有政策，房子歸還只是一個遲早的事，你們總有熬出頭的一天。」

事情雖然已過去三十年了，老漢總還盼到了一線「希望」，受騙了一輩子他仍把希望寄託在中共政策上。

時間就這樣，在劉理告別人生的最後幾年，白白的等下去。然而越是在中共的衙門門檻上打坐，越使這位老人感到不明不白被人搶去的住房，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羞侮。

他多次在假日裡，請我們一道去看他的那幢住宅，嘮嘮叨叨不斷講當年被趕到天生橋那揪心的痛。他不能再等下去，他不能將這個羞侮帶到冥間去。除加快了他去房管局催辦的頻次，由每月去一次，增加到每週去一次。每次徒勞無功的空返，又增加他新的一份怨怒記進了他寫的材料中。

有一次我們又去天生房管所，這次接待的是一個女人，老人怒道：「你們辦事怎麼這麼拖拉，你們要的材料都寫清了，你們一次又一次要我重寫。你們欺我老是不是，你們這種工作態度我會寫信到上面去告你們，我就不信真理會被你們踐踏掉了。」然而那女人卻漫不經心的回答道：

「跟你講過，我們要按政策辦事，我們是普通辦事員，沒有權處理你的問題。你寫的材料我們統統都轉了上去，等上面批示怎麼辦。我們也想早一點落實你老人家的住房，免得你天天跑，夠累的，我們也夠麻煩的。我們要你寫補充材料也是上面的意思，請你不要找我吵好不好？」

這話裡有辦事人員的苦衷，但也許又是她故意的編造，或是授意的編造。氣急敗壞的老人，只有拄著他的木頭拐杖在那信訪辦的地板上發出篤篤的響聲，以示抗議和憤怒。他還能把她做什麼呢？他只好等……直到感覺自己再無力繼續呆在那裡，才悻悻的離去。

為了解除這件事對老人的煩憂，我還親自陪同他兩次夜訪區長陳超。陳區長夫婦是我母親蘇州的小同鄉，多年在北碚與我母親很熟。

他住的家是一般平民根本不知道的，就是上他家去，也要受門崗的盤問和阻攔。但由於這層關係我有幸得了進出的機會，加上劉理本來就是北碚區統戰名人，當時市政協的付主席盧子英的舊友，說什麼也不能將我們拒之門外。

但是，在態度謙和的陳超那裡，除得到與天生房管所辦事人員相似的回答外，依然一無所獲，不過他答應將在區政府召開的辦公會議上，將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為此，還留下了劉理帶去的上訪材料。

作為一區之長，他照樣不敢違忤那自相矛盾的中央政策，甚至於不敢對這種前後矛盾的上級批復和中央文件妄加評論。不過從他那裡，我們知道了，要求清退的房產必須同地主和封建財產相區別。

一九七九年，彼此以炮轟來對話的台海兩岸關係，出現了緩和。「告臺灣同胞書」有幾分誠意？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歷了長期封鎖的大陸百姓，知道海峽對面早已進入了富裕社會。

五年後首批回大陸探親的臺灣人，好像外星人一樣被故鄉的家人和鄰居當成貴客。各種過去根本不敢亮相的臺灣親朋關係，到此時才慢慢公開。

最開始，這種帶著離亂傷感的相見，是在中共統戰官員的陪同和監視之下進行的，有了這層監聽，縱然家破人亡，再大的悲情也難以暢訴，那真的是「相對無言，唯有淚雙行。」

一九八七年我還在文星灣時，第一次見到臺灣歸來的客人與親人團聚的場景。來人姓陳，大約五旬開外，但紅光滿面精神煥發，是一位一九四八年隨國民黨部隊去臺灣的普通士兵，接待他的主人便是他的親弟弟，但弟弟已滿臉皺紋，看上去比他蒼老十歲以上，宛如一個貧苦老農。

主客相對，淡淡相視。哥哥首先向弟弟詢問了家人的下落，弟弟講一九六〇年，雙親先後得了「水腫病」相繼去世。一個妹妹因沒飯吃而跟了一個城裡的人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否還在人間？弟弟講這些傷心事卻好像一點都沒有動容的表情，像數落著普通的家事。

大陸老百姓對毛澤東帶給他們的災難麻木了，餓死被當作正常死亡。然而從旁聽來，陳家真是家破人亡了，中共統治下的和平年代，比之戰禍還要淒慘。

陳家大哥從臺灣歸來，召來了一大群鄰居，尤其是那些抱著孩子的女人，她們懷著好奇，看看一直被毛澤東宣傳為處在水深火熱的臺灣人，究竟是什麼樣子？陳老哥在弟弟這裡住了五天，回去時來看他的侄兒侄女每人都給了一百元到五百元數量不等的人民幣，在窮極的中國農民眼裡，一百元人民幣在當時農村中相當於一個人一年收入了。

1988年，劉啟建的隔房三哥劉信，從高雄隨「大陸觀光團」回到了他的老家合川，合川原是劉理的祖籍。劉信父母早亡。當年家境貧寒的劉信三兄弟，便拜給了大伯父劉學理，從小就得大伯父的資助得以早年去軍校深造。劉信軍校畢業就去了臺灣，他大哥仍在合川老家，戴了幾十年的地主份子帽子。

劉信歸來前，合川大哥和成都二哥便計議了好久，決定他回來後，先去成都再回合川祭拜祖墳，最後才回到北碚作一個禮節性的拜訪。但聽到劉信歸來的劉啟建五兄妹，在劉學理的指示下與劉信三兄弟一共八個家庭，想藉借統戰關係由劉信出面向北碚區政府交涉，促使上海路老宅的歸還。

劉信來訪一個月前，劉啟建的長兄聯合了北碚區其他十四家盧作孚舊部，聯合向中共重慶市委進行了請願，要求歸還當年被沒收的房屋，托區長將請願信向市政府和房管局呈遞。緊接著他又將請求歸還上海路私房的申訴，分別寄給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辦公廳。

採取這麼一系列行動後，終於有了回應，天生橋房管所正式通知聯名請願的十四戶房主，約定了時間在北碚房管局的會議廳裡，向他們作正式答覆。

給劉學理的答覆附有當年軍管會沒收上海路住房時，一個沒頭沒腦的通知，那上面寫著軍管會以地主產業加以「徵用」。

這個用詞含混的通知，成了區政府不能退回的依據，至少變成了有爭議的房產。因為「徵用」不是沒收，這上海路民宅還有一線歸還的希望！！但這個通知將上海路房產劃成地主產業，就不能歸還了。

當場老人向宣讀檔的人申辯，說他少年就離開合川本家出外求學，後來的戶口以及各種證件都把他的出身寫成學生。這用作居住的民宅被定為地主產業從何說起？然而答覆的人說，他不知道過去的底細也無權去過問，只能宣佈檔，並按上級檔執行。

因為沒有法律依據就憑中共政策，而政策是可以隨意制定和解釋的，對老百姓可以任意戲弄的。激動不安的劉理回家後，就關於當年的房屋劃為地主財產的消息，電話通知了合川老家，按照他的理解，只消由老家證明這棟樓的主人，屬於什麼出身，就可澄清當年軍管會所作的結論！

所以關照劉中柱在老漢出生的故鄉，開一張關於自己出身和經歷的證明。並加蓋合川政府的鋼印，叮囑他辦完證明後請他派人專程送到北碚來。

看來老人安心非同政府就上海路那幢老宅的歸屬，爭個誰是誰非了。

按照劉老的吩咐，合川的大哥將他所需要的證明開好，並且派他的侄孫專程送到北碚。劉老伯在接到這張證明後，立即複印了好幾份，拿著複印件再度上訪天生橋房管所的張所長，張所長望著那蓋滿了紅大印的紙淡然一笑，他這種基層辦事人員，雖然不一定能準確洞察出中共各項政策的背景和底線，但他從實踐中很懂得落實中共政策該怎麼來對付這個老頭。

近來接觸到老百姓要求歸還被政府占去的房產店鋪的「案子」太多了，不管這些要求是否該同情，合理性有多大，在上方沒有明確指示時，最好的態度是採取不值可否應付了事。否則犯了錯誤還不知究竟怎麼錯的。

張所長回答道：「我一定會把你的材料轉上去，等到有了消息，我會立即告訴你的，所以你還是回去等著吧。」既不表態，也不得罪上訪者，「回去等著」四個字，成了落實政策年代裡，向上訪者最權威、最準確、最不擔風險、也最不負責的回答。

但是，快九旬的劉老伯還能等多久？然而，除了無可奈何而外，對這樣的回答他連反對的話都說不出來。

第二年春天，也是六四事件爆發的前幾個月，劉信按照約定時間第二次赴大陸探親。為了增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此行他掛了回國觀光團團長的頭銜，加蓋了臺北市政府的官印。劉信兄弟倆與劉啟建五姊妹，在劉理主持下，專門召開了一個關於上海路住宅的小型家庭討論會。

劉老伯當場拍板，若在劉信交涉下房子歸還後，便立即將舊宅進行改建，樓下做成鋪面和庫房，專供劉信主持的台商獨資的中藥材營業廳；而樓上修成幾層，分給兄弟七個每人一套居家的住房。

大哥劉中柱的積極性首先調動了起來，當時他的大女婿正任中共合川縣委管理財經的付書記，在家庭會議上，劉中柱表示他的兒女們一定會根據大伯的要求，在老家合川，全力以赴促成上海路房產儘快歸還。

出於政策和統戰的規定，北碚區政府辦公室的趙秘書，代表北碚區政府，在區辦公大樓的會議廳裡，接待了劉信和他的劉大伯。

賓主坐定閒話不多，很快就進入了正題。有備而來的劉信，引證了一大堆國際上公認的法律條款，盛讚了中共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以及關於清退房產的政策。接著便談到了臺灣政府中公務員的「辦事效率」。

在臺灣執行公務時，不但嚴格依據規定得十分詳盡的法律條款，而且還必需在規定的時間內執法，否則所有的公民都有權根據公務員法，對執法徇循私舞弊或拖拉不辦的行為上告法院，使之受到處分。

在這種主題十分清楚的「接待」上講這些話，趙秘書就是再笨也聽得出來，這是劉信藉借臺灣來責問和諷刺北碚區政府，在落實他伯父的房屋歸還上，使盡了拖拉和故意找碴的伎倆，使這個糾紛久拖不決。

當然臺灣講的是全民都要遵守的法律，而中共興的是中共一黨規定的政策，法律是不變並可監督執行的，而政策是可以任意解釋的，兩者在實質上截然不同。這位趙秘書心裡十分明白，只有在大陸才會有這種本應法律解決的問題卻由中共「政策」管著，甚至還用與歸還無關的問題來搪塞，一拖五年不解決。

所以他聽到這種指責，依然面不改色，從容的給劉信和劉大伯的答覆依然是「回去耐心等待」這五個字。

「接待」就這樣無結果的收了場，還不如我們到陳區長的家裡作私訪來得積極。在歸途上，劉信很感嘆中共這種無法無天現狀，認為中國不健全法、制，會拖著社會進步的後腿，在這種環境之下什麼事也辦不好。

可惜，開放的中國，還有一條主權不容外部干涉的閉門羹，這給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一個不論怎麼胡來，都可以對外界的批評置若罔聞的保護傘，至於大陸上的老百姓因長期暴政馴服而麻木了，這種條件只會助長官僚作



風！他感嘆地說：「中共的官既不懂法，也無所謂執法」，

劉老伯發往中央統戰部各衙門口的信件如石沉大海，等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中國的政治空氣突然收緊。

在穩定是壓倒一切的藉口下，劉理等十幾名請求落實房屋歸還的聯名上告，被公安機關明令「下不為例」。從此以後，再也不敢為歸還自己的家而竄門，寫請願書，上了年紀的老頭們只好眼巴巴的伏在窗口前，伸長脖子耐心的等下去，一直等到被火化的那一天。

1990年，重慶市政府建設局，奉命對上海路的平民住宅進行了全面的拆修改建，強令那一帶的居民搬離久住的家園。劉老伯聽到他那被霸佔去了四十年的家，將被政府拆除修成商品房和店鋪出售。便請兒子和媳婦孫子牽著他，帶上照相機，一同去了他那暮年魂牽夢縈的地方。

他的家已被一排高大的木柵隔斷，正在工人們拆毀的煙塵中倒塌。城建局的工作人員帶著紅色糾察的袖套在外面遊弋，不時的發出吆喝聲，不准任何人靠近它們。同一大群圍觀的市民們站在遠處，劉老伯的兩眼發直，他明白這一拆，原先屬於自己的證據就會全部被毀掉，今後再提起歸還他的家，就更難了。

現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叫孩子們將他家的遺貌，儘量地拍攝下來。……

良久，孩子們催他回去時，他還直癡癡的站在那裡，半天他才吐出一句話：「我要告，我要告你們，非法的霸佔我的家，我要告你們像強盜一樣，拆毀我的家……」

站在一旁的大兒子勸阻道：「沒有用的，這是共產黨的天下，小老百姓往那告？法院還不是共產黨的法院？難道會站在你這邊來，反對同一個共產黨的房管局和市城建局嗎？」

他脹紅了臉，那種受羞辱，但又不屈服的表情重新浮上了他的臉，無奈的被孩子們牽著他往回走。突然背後響起轟的一聲，全家人回過頭去，見他們的「家」終於倒塌在一團泥灰夾雜的氣浪之中，彷彿在那裡向他們揚手告別……。

唯有小兒媳還不服氣，她拿了拍下的照片和1944年那張房地契，再度去天生房管所評理，見那經手辦理清退的張所長理直氣壯的責問：「房管局為什麼在城建局拆毀劉家的私宅時，竟連通知都不通知一下房主？」

質問他知不知道「這幢房子還在打官司，這樣單方面的拆毀會發生什麼惡果麼？市政府給我們的答覆叫我們等，你們居然在房產歸屬都沒有結論的前提下，私自拆除這所民宅，你們可知這是一種犯法的行為嗎？」

可是那張所長絲毫不動聲色，只朝著氣勢洶洶的小蘭冷笑，雖然嘴上沒吐出一個字，心裡卻在暗暗的嘲笑道：「你這黃毛丫頭懂什麼共產黨的政策？朝我裝熊發狠沒有用，有本事的去找沒收你房子的共產黨鬧呀！」

小蘭見對方並不回答，以為自己占了理，便借勢向對方提出一個「補償的辦法」，說道：「你們既然奉命拆了房子，也知道這片房子中有劉家的一席之地，那麼修好新房後，也該按我家的房地面積如數補給我們，否則，我們會一直都要找你們的。」

這種請求一點都不苛刻，但是那房管所所長，心中暗暗的笑道：「只要共產黨的天下還在，你們家要求清退房產只能是一場夢。誰教你們的房子當年被中共占去，那已成了不可改變的死案了」。為了不得罪這個撥辣的女人，他淡淡地的冷笑道：「只要政策有這個規定，我們肯定照辦。」

然而，天不絕人，小兒子劉才所在天燃氣公司，效益特好，那幾年有條件為職工建起了三幢生活大樓。無房可住的劉才分得了三室一廳，他的父親也隨著他搬離開了那個又潮又黑的天生橋危房，搬進了新分的房子中。

在新居房中，劉老伯開始慢慢的形成了有規律的作息，每天他把門外送來的鮮牛奶煮好，喝下以後，就到樓下的街心草坪散步去了。

然而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他都習慣的站在陽臺上朝東邊上海路的方向佇立良久，他還在牽掛著他的故居。

兩年後，上海路的新建的大樓群已經竣工了，其中就有他舊居的那一塊地方，他不願去看他的舊居！因為這會觸發他四十年前攜兒帶女在軍管會的押解下，離開自己的家去到天生橋那段傷心的往事。

這四十年來，他像乞丐一樣的日子已深深留在他記憶裡了……

1991年夏天的一個早上，小蘭像往常那樣，早上七點鐘起來，打開門將送來的牛奶拿進了廚房，卻沒有聽到老人屋裡的響動聲，也沒有聽到老人輕輕移向廚房的腳步聲和打開天然氣灶煮牛奶的聲音。

直到上午八點多鐘，她從街上買菜回來，廚房灶頭上今天清晨端進來的奶，還放在那裡，而劉老伯的房間還緊緊的關閉著，他放下菜籃子心中疑惑地去推老人的房門，門卻關得很緊，裡面沒有人應。她還懷疑老人是不是到樓下的街心草坪散步去了，所以把頭探出陽臺，四下張望卻不見人影。她重新去推老人住的房門，確實怎麼也打不開，帶著疑惑只好去忙碌中午飯了。

直到劉啟才下班歸來，小蘭問他看到爹了嗎？劉啟才不解的問：「發生什麼事了嗎？」小蘭指了指灶頭上放著的瓶牛奶和老人的房門說：「一上午都沒見爹，他那房門關得太緊好像上了門門，無論怎麼喊裡面沒有人應。」

劉啟才聞言連忙去敲那房門，裡面沒有人應，推那房門重重的好像被什麼東西抵著，使足氣力猛力一推，只聽見撲通一聲門門斷處，劉大伯倒在那門裡

面，兩眼卻直直的瞪著煞是嚇人。劉啟才連忙把自己的父親抱住，已是滿身冰涼，才知道自己的父親已經死了好幾個小時了。

從他倒下的地方和姿勢判斷，老人跪在門裡面，面朝門溘然長逝的……

大家傷心的辦理老人後事時，紛紛議論，上海路被人搶佔的住宅沒有收回來，對老人精神上的打擊太大了，那份被強盜搶去家園的羞恥心，一直耿耿於懷，加速了他的亡故。君不見對這件事直到臨終時，老人跪朝著蒼天，還在傾訴他的憤怒和傷心，而上海路的家至今都沒有歸還給他……

## 第七章：暴政扭曲下人性的畸變

出於立黨為私的目的，中共一九七八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把持下，將獨裁這根套在中華民族脖子上的絞繩，原封不動的繼承下來，他說批判毛「將會犯歷史性大錯」，現在「改革開放」施行三十年的事實證明：貪官污吏，貧富懸殊，畸形的社會反而明目張膽的為毛澤東招魂。

毛的幽靈正在召喚與他相似的野心家捲土重來，重新控制這片土地，演出第二次井岡山、第二次清匪反霸、第二次「反右」、第二次文革，因為毛的暴政惡果被鄧包庇著，原封不動沒受任何清算，這是多麼危險！

毛澤東為獨裁目的，是他對中國人人性的扭曲。

記得，剛進重大，正逢基層人民代表的換屆選舉，我們系高年級一位女生在競選系人民代表時，曾發表競選演說，宣佈與地主父親斷絕父女關係，並在一份聲明上簽字。

為個人前途公開斷親情的做法，曾成為許多同學竞相學習的榜樣，特別在一場觸及「靈魂」的反右以後，校園裡爆發了一場向黨交心的熱潮……

「革命嘛」，要有鮮明的階級立場，誰又甘願站在挨打一邊呢？

### 第一節：右派

毛澤東把大陸的人分為「紅五類」，「黑五類」，倘若你被劃成了黑五類，便永遠矮人一頭，充當奴隸。若再要反抗，必入另冊，押進監獄。他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就是指這種整人的章法，死死卡著每個人的脖子，令人只好被他牽著鼻子跟他走。

對人的「劃分」，並不是什麼新鮮玩藝，而是從中國封建王朝中異民族的統治者那裡學來的，元朝就把人按民族劃分為四等人，最低的叫南人，是毫無人身權的奴隸，毛共最惡毒的，是把被踐踏者反誣為剝削者，不惜一切扭曲他們。

當年『右派』，本身是毛澤東為建立獨裁統治而抓出來的犧牲品，在五類中排名第五，他們中多數並沒有認識自己已被劃成「南人」，其中的學生更是一張白紙。在毛澤東時代，如不對中共下有毒藥的宣傳進行抵制，不但受愚弄，而且會在長期被壓迫環境中，變得自私、虛假。

所以並不因為右派是一個被殘害的無辜群體，而把他們不加區分加以肯定，把他們誤作社會的精英，其實他們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人，只不過在經歷了一場人為的劫難後，重新認識了中共，也重新認識了自己。

隨著右派維權鬥爭的開展，右派們的許多未曾公開的行為也日益暴露，當我讀到宋永毅先生：「中國知識精英的醜陋和恥辱」後，知道這「右派」被社會誤解，它絕決不是什麼先知的精英，事實上他們中出現叛徒，幹出不齒於人的勾當並不值得宋先生髮指。

看待右派必需從兩方面：一方面它遭受殘害是一個值得同情的群體；另一方面又是一群魚龍混雜，對他們必需分別評價。

逆「反右」而抗的人，以行動證明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他們在毛澤東倒行逆施中醒悟，在反抗中無畏的犧牲了，他們的名字應當刻在紀念碑上，讓後代永遠記住他們，永遠做學習的楷模。

我的父母原來都是教書匠，自從我的父親被捕後，原先自持從未參加任何黨派，有一大批「進步」同學撐腰的母親，不得不折腰做人。思想匯彙報，成了必尊制度。每當在政治學習會上，主持人朗讀報紙，讀到「階級敵人決不甘心失去他們的天堂，定要蠢蠢欲動」時，向她掃過一眼，都會使她低下頭來，像芒刺在背，令她痛苦不堪。

那年月能向誰說清？在家中也無法向老母說清，更無法向兩個年幼的孩子們表露，唯有在半夜裡躲在被窩裡偷偷的哭泣。

為了解除這種壓迫，也為了自己的老母親和兩孩子的生承，她不得不向「組織」上表示：劃清與反革命丈夫的界線，她要求離婚。人性終於屈從中共的政治壓力，使她的人格變形了。

同時也強烈影響著我幼弱的心靈，為了擺脫父親的壓力，我選擇了那位競選時對父親「一刀兩斷」女同學相似的做法。可是，沒有超過屈服極限的壓力一旦減少，發生的彈性變形就要「恢復」。父親入獄後他的音容笑貌，每時浮現在我的夢境中。

母親的記憶裡查覺不出父親的猙獰可憎，「反革命」帽子戴在這麼一個勤勤懇懇從事教育耕耘者的頭上，怎麼也不近情，同時中共不是向他有過「交代清楚」，許以「安排工作」的承諾嗎？怎麼會自食其言，突然又把他抓進了監獄？

後來，當大鳴大放出現時，壓力好像在瞬間減輕了，畸變的人性立即恢復，可是她剛向「組織」上提出「政策」執行有無偏差時，便成了我家第一個「陽謀」的犧牲品；而剛剛長大的我，便成了我們家「陽謀」的第二個犧牲品。

扭曲人性是一個極端痛苦的事，在鬥爭會上，猝不及防的我，稚嫩的神經承受不了這種壓力，精神失去了常態。今天回想當年為什麼那麼多人發瘋，投河或上吊？毛澤東罪不容赦！！

慶倖的是我還沒有丟失人性，變成連我自己都無法辨認的佞鬼！也沒有因此而自殺，消失。而是繼續扭曲著自己，大聲為自己的冤枉辯解。

投入監獄後，原先復學的幻想徹底破滅，飢寒交迫和奴隸般的生活，使我從幻覺中驚醒。當我看清了屈服我的魔鬼怎樣使我的國家，使無辜的老百姓在飢餓和苦難中掙扎，我猛然醒來，不再屈服於壓力，漸漸的我變成了另一個樣子，我把生死置之度外，變成了一粒反對獨裁的響噹噹銅豌豆。

直起身來，同一切反抗暴政的人們一道，向這魔鬼拚拼死一搏。

毛澤東扭曲人性，除奉行政治掛帥，頻繁進行『改造世界觀』的洗腦運動，同時肆無忌憚的製造冤案。追朔歷史，從延安整風已有大規模整人的經驗，冤死的人何止王實味一人？依靠史達林取得全國政權後，毛澤東靠整人登上獨裁寶座，成了令人恐懼的共產皇帝。

在整整二十年的『勞改』歲月裡，獄吏們執著皮鞭抽打我們。奴役我們似乎是統治者本性，尚可理解。最奇怪的是與我們遭遇相同的人中，也會出現一群『靠攏政府』的『狗』，有時他們比管教更厲害，仗著熟悉奴隸生活的內情，掌握著管教們也沒法掌握的秘密，對我們有很大『殺傷力』。

在我的《血記》中描寫胡俚、周學祝、馬文華、劉知遠等人占了很大篇幅，雖然他們幹的骯髒事，無法用人的正常行為解釋，不能簡單用『狗』的稱謂洩恨。他們的行為歸結原因，都是被暴政扭曲的結果，暴政徹底毀滅了他們的人性，使他們變成了不齒人類的臭狗屎。

右派中即使共過患難的人，也照樣有騙子，你諾不信，那就聽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1992年九月的一天，一位長住我廠的江淮汽車廠從事售後服務的李師傅付，手裡拿著一張名片走進了我的辦公室，他告訴我：「上周去九宮廟的八橋客車廠進行售後服務時，該廠總經理問到了你，我告訴他你的情況後，他便拿出他的名片，拜託我回北碚來交給你，還囑我最近請你去他們廠一訪」。

我細看那名片上寫的是毛貫益總經理。

自從一九五九年南桐叢林一別至今已33年，也不知他在何方，現在突然出現在不遠處與我幹同一行道。帶著好奇心，我一個星期天去到他的工廠，幾次交談後，我才知道袁如從美國回國，答應投資五萬美元，支持他在大渡口區辦了一個旅行車改裝廠。後來她與毛交往中，察覺此人能力低微，大陸也決非投資場所，最終合作中斷。

第二次拜訪他時，他就向我伸手借錢，我是一個靠工資糊口，兩袖清風的窮光蛋，雖近年工廠有較大盈利，但我從一無所有，白手起家。我的孩子正讀高中，正處在花錢之際，就只有母親在落實政策時，中共扣了她二十年工資，退還給她兩萬元，這筆錢被我存下來，以作她養老之用。

他聽到後，一再要求將這筆錢暫借給他，幫他度渡過難關，答應有錢後立即歸還，花言巧語說了一大堆好話，毫無心計的我推託不下，借錢時說好這筆錢是母親的，歸還我時折成美元。

從此，他當著一齊劃右的同學稱讚說：「在所有同學中只有孔令平才真心幫助他，拿出他僅有的積蓄不吝相助。」我聽後只感到肉麻。1996年他還要我陪他去李倫家借錢，幸好被李倫識破拒絕。

後來我才知道受發財夢支配的他，經營兩年來，不僅賠光了當年袁最初的投入，外加大渡口國債服務部貸款六十萬及市鄉鎮企業局五十五萬元，並到處向過去的難友們伸手，用支持他辦企業的名義大施騙貸。

等我識破他向我伸出骯髒的行騙之手，已經晚了，就這樣，我對他同難之情換回一場騙局，將我母親帶有血淚的兩萬元養老金騙去。

與此同時他大肆在受難者中舉貸，受他之騙的例如難友之女彭萱十五萬元，陳先菊九十老母二萬元，難友蔣伯林（律師）幫他免費法律服務還倒借別人一萬元，直到現在也沒還。

1995年我接到夏光然電話，說他生活無著，要我為他尋找一個打工場地，能夜宿吃飯就滿足了。為老夏淪落市井深感不安，想到在老毛廠裡安排一個看門值班的工作他不會拒絕。於是打電話求他出於同是天下淪落人給以相助。

想不到口頭稱我恩人的『毛總』在電話上冷冷回答我：「我這裡不是社會慈善機關，安置任何人都要經大家同意，何況工廠如此困難，你怎不顧我的難處」。

看他產品落後，設備簡陋，資金奇缺，管理混亂，知道他斷無能力繼續發展下去，從1996年開始，我竭力勸他解散工廠。同時我也好從這家沒有希望的公司抽出我借給他的錢，為孩子升學作準備。

為了幫助他擺脫自己陷進去的泥坑，我動員本廠的銷售人員幫忙賣掉他積壓多年的老車，聯繫四川省汽車運輸公司接受他們的九龍牌新型車，把他當成一個同難來幫，殊不知他八方借錢，全國旅行到處行騙。

2003年我因頭部跌成腦出血，需動大手術，要他還我的錢做手術時，他竟矢口否認他私人借了我的錢，此時我才看到他出具的借條竟是以八橋公司名義開的，而八橋公司早在他被關押前一年就關門了。

2007年在我的孩子追問下，他仍以八橋公司的名義信誓旦旦說他決不欠來生債，2008年我獲悉他的私宅十分富麗，大家支持我申告法院解決。

區區兩萬元就蒙昧了良知，玩盡心機，令我都羞於啟齒。

沒想到母親晚年被毛貫益狠狠咬了一口！毛貫益欠我母親的兩萬元就被他癩過去了！

「金錢至上」和「精神至上」本來都是反人性的兩個極端，它產生於專制主義的總根源中，這肯定是立志行乞以「教育救窮人，教育強民族」為己任的武訓，所萬萬沒有想到的結果。

當年一批年僅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學生，為「階級鬥爭」需要，淪為政治上的犧牲品，這些受害者中由於本質決定，泛起一些渣滓有什麼奇怪？

所以對「右派」的成份，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描述，這對即將到來對「反右」徹底平反有重要的意義：

(1) 整個「右派」純屬毛為建立中共專制獨裁，對受害人的誣讟，「反右」是一次對民主的無恥背叛，他所定下的「六條標準」對中華民族帶來政治，經濟的破壞必需徹底清算。這已是大家的共識。

(2) 照理說「右派」指共產黨內的劃分，矛頭本應指向共產黨內，但為了把打擊面擴大，毛澤東把出身定為「右派」的重要標準，產生了「五類」這個「奴隸」階層，從此中國老百姓人人禁言，媒體禁聲。

(3) 當年的「右派」基本上分成了兩大類型，一類「共產黨原型」，包括了共產黨共青團內，和民主黨派的下層和文化教育界知識份子，他們有一定政治主張；與中共具有先天聯繫；

另一類便是按家庭出身為主要標準的「社會另類」，他們在面臨「討伐右派的猖狂進攻」中，幾乎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意識，是一群純粹無辜的無知者，他們人數最多，這些「初生牛犢」在認識毛澤東的詭計後產生的冤恨很樸素。

(4) 緊接著反右，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總路線，完全是一場違反經濟規律違背民意的好大喜功瞎折騰，對這場災難，首先起來反對的，恰恰是「初生牛犢」們，他們的許多人對中共沒有任何顧忌，反抗最堅決。他們中出現了為追求真實，向暴虐的中共進行堅決的反抗，這就是林昭，陳力，張錫錕等人能以身同專制制度搏擊的原因，這才是中華民族偉大的精神，它才值得歌頌，這些英烈應同譚嗣同，秋瑾一起記載在中華民族的青史中。

(5) 由於無知，他們中出現的敗類並不足奇。至於右派中出現的「告密」、「出賣」、「損人利己」等等現象，只能歸罪於毛澤東對社會道德的破壞，對人性瘋狂的扭曲，使傳統「禮義廉恥」失去了約束。

五七右派是暴政扭曲的知識群體，四百多萬知識份子長期處在屈辱中，是中華民族的羞恥，它在中國大陸留下了：「誰反對獨裁就遭厄運」。這才是使中國長期不能崛起的原因。

## 第二節：幾個常見社會現象

毛澤東建立了「檔案」制度，個人檔案必須嚴查三代，上至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都要按階級成份嚴格登記。成份在檔案中跟隨一個人一生，本人的工作安排，職務升降都要以此為依據。它像緊箍繩，捆得人不敢動彈。

### (一)「假」像猖行

在中共統治下，因人為的劃界，並以『階級鬥爭』所毒化，人與人間的行為，再無傳統的道德所約束。

許諾給全中國民眾的「共產主義」天堂，原來比哄騙都不如，飢寒交迫的民眾誰都不敢說真話，因為有武裝的員警監視。我在古柏記載的辛志華那段「吃飽了」的故事，在毛時代可說遍地都是，還不准人說出來，否則李管教的繩捆索綁有幾個受得住？

從此人們對中共赤裸裸的欺騙只好銘記胸中。改革年代這種造假公開氾濫，社會主義既是假的，說假話，做假事成為上上下下的通則，毛澤東以身作則，叫做：說不來假話便成不了大事，李宗吾找到了毛澤東這絕配的搭

當，可以說說假話辦假事便成了這時代「官」「民」的通則。

報紙上媒體上承然是假的，戲當然全假，工農業計畫，國家的指標沒可信的，文教衛生全是假的，有段時間媒體揭了假文憑，人們聲色俱厲的譴責考試中雇槍手代勞作弊，抓了幾個賣考卷的考官，其中大言不慚為之辯解的人會公開指證說：「你沒看到連官都可以買到，何必對我手裡幾張考卷看得那麼真？」

由假衍生出來的是「騙」，發達國家為保障正常生產活動，講品質管制，但遇到了中國假貨害市，監督部門一經發現，只好公開退貨或焚燒，用的日用品還不危及人體，若是吃的可就小心：「千萬不能賣中國生產的食品」。

假酒假煙只害嗜好者，倘若是米、麵面、油和餵養嬰兒的奶粉中，滲雜有害嬰兒的化學物質，可與謀殺同罪的，權貴們當然會在無毒無公害的供應站買，唯有可憐的中國平民百姓只有靠提高自身的免毒能力了。

其實每個人只要勇於說真話，直揭事物的假像，撕下這欺世騙民的偽裝，就會清算毛澤東的罪惡。

在同一地球上遠隔大洋，出現令人羨慕的美國。在美州南北戰爭中取得勝利的聯軍司令華盛頓，站在時代的最高點，在美國剷除奴隸制後，立即還政於民，經過兩百多年，美國人建起了繁榮昌盛的美利堅合眾國，華盛頓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

而在中國，一群從山裡出來的『綠林人士』在北方熊的支持下，利用日寇侵華，在淪陷區八年擴地為王，奪得全國政權。從此共產主義加獨裁統治，使中國陷入另一絕境。

暴力是同欺騙同時橫行的社會惡象，人們交往不懂禮義，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早被「階級鬥爭」踐踏無遺，連中學生講不清「禮、義、廉、恥」，忠孝節義既已「批倒批臭」，代之以罵娘對話，拳頭裁斷是非，這便是毛澤東遺留在我們幾代人身上，難以洗淨的污漬。

毛澤東說政治是靈魂，是指導一切的核心，把人性放在絞架上受刑，把人人平等，把禮義廉恥統統列為封資修，他說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先鋒份子，是一批由特殊材料鑄成的。

經他這種神化，中共黨員變成了沒有人性，無需制約的統治者。

改革年代，鄧小平只管能刺激生產的「貓」，中共對社會道德從來只有踐踏，人們不顧一切的追逐金錢，有權的利用手中那點權，不顧一切，見錢眼開，有錢能使鬼推磨成了辦事的手段，在這種冷酷的社會裡「見義勇為」成了傻瓜信條，所以才會有路見行兇打劫的事再不會拔刀相助的義士。

中華民族遭到這翻浩劫，真正變成了一盤散沙，敵若再有一次兇狠的武士道武裝起來的強寇侵入，恐怕蔣中正複生，也難以「地無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人人皆有抗戰守土的天職」相號召，組織起民眾，再寫一篇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詩篇了！

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原則，是毛早年延安整風就提出來了，隨著中共「武力」統一全國至今，已整整統治中國六十，好端端的家被破壞無遺。父不父，子不子，社會亂成一團，幾十年毛氏獨斷專行，不顧老百姓死活，不但弄得百姓啼飢號寒，餓殍遍野，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園裡，好像來了惡鬼，百花凋謝了。

中國人為搬動這塊巨石，也不知付出了多少犧牲。

隨便打開最近的報紙，擇其中幾段摘抄於後，值得說的，這只是冰山一角：

河南駐馬店平與縣一個名叫黃勇的人，當兵出身，使用一種被稱為神奇木馬的『遊戲』，從2001年經三年時間共殘殺青年中學生十七人，直到2003年才被一個未殺死的青年檢舉告破；

另一殺人魔楊枝芽，報載說他從2001年在安徽、河南、山東、河北共作案26起，殺67人，重傷10人，強姦23人，他採用滅門屠殺，殺死全家後又殺另一家，多少無辜百姓就白白死在他屠刀下，直到三年後才告破；

一個拾荒者陳能殺死的十人，全是與他一樣的拾荒者，遇害者的屍體全被肢解。這些殺人者沒有同謀，沒有高智商的作案手段，沒有武林的真功夫，就這樣殺人如無人之境，國家法律和公安機關形同虛設，一百多條生命就輕輕鬆鬆死在這麼三個低級劊子手手中，令人聞之聳然。

與以上案同時見報的還有四川南川縣的符文生案；

四川萬洲的楊天勇案；公安部通緝的李天佑案；河北石家莊爆炸案……

2004年五月兩個殺手馬勇、段智勇在廣東某職業招待所以招聘為名，將12名單身求職的女青年殺死；

2003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鞍山一計程車司機用繩子勒死一回家的女服務生；

河南省汝州市，殺人兇手嚴明一次殺人9名；

2004年2月23日昆明大學馬加爵殺死4名學生；

2004年十一月十一日馬漢慶，在武漢和烏魯木齊所幹的四起搶劫案，造成5死6傷；

2005年瀋陽王強，自2000年五年作案34起，殘殺45人，強姦10人，被捕時公然說：「若不是抓住我，還要繼續幹」；

2005年河南沈長銀、沈長平先後協迫四個坐台女一起作案，先後殺死11名坐台女，肢解並食用屍體的器官……

以上血跡斑斑的案例，是近年來零星摘下報上登出的消息，殘缺不全，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惡性作案罪犯全是四十歲以下，其中多數是部隊轉業兵，有相當避偵能力，不由令人想到『解放軍』成了罪犯學校，社會被恐怖籠罩著。使人想到一黨專制的共產黨，已成為孳生暴力犯罪的土壤！

除了以上報紙註銷來的，平時社會上還經常傳來各種恐怖殺人事件，就以我居住的小城，去年西師校園教工宿舍傳出入室搶劫殺人不久；又傳遼寧路某小區的入室搶劫殺人案；下水道經常發現被害屍體；去外縣的長途公共交通車上經常傳出有人持刀搶劫的凶訊；

至於孩子們上學路上發生的殺傷、鬥毆案；校園裡的吸毒販毒更是不計其數！！社會治安如此壞，完全歸罪於執政黨本身的腐敗，前文已列數中共黨內的腐敗，『無官不貪』的帽子戴在今日中共頭上真是恰如其份。

這麼腐敗的執政黨，怎麼不使人民怨聲載道，怎麼敢實行民主選舉？這樣的政府，除了強化員警外是沒有任何辦法來維持的，當然，不順應民心的中共不得不被推著前進，只不過執政者不得不提心吊膽！

冤獄是中共執政最大的惡政，本文通遍都在控訴冤獄，這不僅是我的個人不幸，而且是全社會的災難，其根產生於一黨專政的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要當皇帝，在中國的歷史上製造全國大冤獄，目的是排除異己，掃清稱朕的障礙。他所親手建起來的專政機器，上至最高司法機關，下到地方法院檢察機關無一不行霸道，缺監督，只要有上級的保護傘，瞞天過海，毫無顧忌。立案辦案明知不對，能騙的絕對要騙。如此旺法，怎不冤獄遍國中？

大陸經中共統治六十年，欺騙和假話扼殺了純樸的民風，以誠信為本的市場經濟，受到毀滅性的破壞，中共自己就是欺騙老百姓的禍首，假貨充斥了市場，衣食住行所有國計民生裡，以騙為綱，含毒的食品豈止菸煙酒，連毒米，毒肉，毒菜使老百姓缺了健康的保證，連救死扶傷的醫院也頻傳致人於死的藥物器械。

人走在大路上，會擔心腳下馬路踢陷，天上會突然降下致命的墜墮物，經濟越發展，人的安全感卻在降低，大家想過沒有，這怪現象的原因何在？

不過，說也奇怪，被中共誣害為邪教的法輪功，竟以『真、善、忍』喚醒了中國人的人性，並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發揚得淋漓盡致至，最近『神韻』在世界各地演出，贏贏得轟動效應，不但場場爆滿，賺盡世界各國觀眾的感激之淚，真正為中華民族藝術爭光添彩。

一個備受中共踐踏殘害的團體，一些被中共棄如蔽敝履的中華子民，為什麼在自由的國度裡，能發出這般異彩？這不是很值得大家深思嗎？

## (二) 紅衛兵遺毒

人性復甦一個重要表現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召開，一品大吏彭德懷敢於犯顏皇上，顯示毛皇上的獨裁受到中共上層的反對，中共發生了裂變。

文化大革命是什麼？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獨裁受到中共上層孤立以後的瘋狂報復，他想用年輕不懂事的孩子們為他火中取栗，重新坐回已經坐不穩的帝位，當年幼稚的孩子們被他那套政治掛帥的毒液麻醉，人性再次遭扭曲。

我在獄中看《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新聞紀錄片，很為那組成「紅色海洋」的紅衛兵感到難過，他們既不知道外部世界已進步到電子時代，人民享受自由民主，享受現代科學文化的成果，享有自己選舉國家領導人的權力，享有人權作為人最高權力的保障。

這些被中共欺騙，不能正視自己奴隸地位的人，不但不起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反而捧著一張毛澤東開出的路條：「沿途吃飯住宿不要錢，坐車招手上」，『威風凜凜』的打著紅旗到北京朝聖去了，若問他們，「你們上北京去，向偉大領袖要什麼？」他們一定說：「去看望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太陽。」

人性被毛澤東的暴政扭曲，在毛澤東主義邪教教唆下，紅衛兵幹下打砸搶抄抓，還要把槍對準生養自己的父母，對準與自己無怨無仇的「五類份子」，這些五類已衣衫襤褸，形同乞丐！而毛澤東說他們是資本主義的殘渣餘孽，是隨時要爬起來騎在人民頭上最危險的「敵人」。

紅衛兵被毛氏邪教控制，幹出對無辜者斷手臂，割舌頭，挖眼睛的暴行直到若干年後進行懺悔，但那有什麼用啊？根據最近的揭秘，毛皇上已在他臨終前幾年眼睛已瞎，中國就在一個瞎老頭獨裁把持下，怎不出現暗無天日的黑暗時段？這是一段中國人值得好好反思的歷史！！

我的弟弟被造反派無端殺害，就因為他是「黑崽子」，兇手知不知道，他們殘害的是一個無知的孩子，他們殺了他，曾使他的母親，一個善良的教育工作者，一個被無端劃為右派的人痛不欲生，並產生自殺這種悲劇後果嗎？兇手做人起碼的良知和人性那裡去了啊？

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面對毛澤東扔下經濟崩潰，人民啼飢號寒的爛攤子，本當痛定思痛徹底拋棄獨裁政治，開創一個民主新紀元。可惜，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功過三七開對這位亂世梟雄「蓋棺論定」。他的腐屍裝在水晶棺裡，原封不動保存「四項基本原則」，保留「一黨專制」的政體，掩蓋毛對人性扭曲的滔天大罪。

在鄧小平看來，毛澤東的全部「錯誤」，在於放棄了經濟建設。如果埋頭經濟和物質的生產，對以往罪惡處以「無為之治」，而對專制獨裁給中華民族所犯下的罪惡則以「向前看」，一筆抹掉。

至於那個社會積累的民怨沸騰，冤獄遍中國，則以「路線」的左傾而不究既往。對它形成的傷害，不與認真清算，對整個中華文化的慘重破壞閉口不言，對道德淪喪，似乎只要用輕描淡寫的「五講四美」的空口號，就可以解決了！於是文革後期的餘毒依然流毒於社會，並在新的條件下更加惡化！！

### （三）冤獄繼續氾濫

在中共獨裁統治下，大陸上正氣無法抬頭，毛澤東時代，冤獄猖狂氾濫的重要表現是文字獄，然而文字獄之根，是從獨裁政體的土壤裡生長出來的。鄧小平保留獨裁，也埋下冤獄的毒根！

改革開放之初，社會混亂和冤獄可以推給「四人幫」，那麼毛都死了幾十年，深感文革大亂的鄧小平怎麼治亂？又治了些什麼呢？

實在瞞不過了，才在媒體上曝了出來。下面又舉幾個報載，並以冤獄為例，略窺一般：

2005年四月全國公開披露，湖北一普通農民余祥林，十幾年前因殺妻被公安機關定為殺人犯，公檢法機關不顧當事人一再申冤，刑訊逼供下，屈打成招，處以死刑緩刑兩年已成鐵案。那知十餘年後其妻活著回鄉，冤案始告大白；

同一時期披露，湖南麻城當地屠夫滕興善，起因一九八七年錦江河邊發現六塊女性碎屍，被當地公安機關認定為留居當地的貴州女青年石小榮，並將滕於次年執行槍決。五年以後，石小榮返回貴州，才供認被槍殺的人根



本就不認識她；

同期，另一個因強姦殺人被判死刑的聶樹斌，被殺十年後，真的殺人犯王樹全歸案才使聶樹斌『平反』；

2002年七月十二日，唐山市南堡開發區住戶郭其夫婦，在家中被殺成重傷，唐山冀東監獄二支隊政治部主任李明久，在刑訊逼供下招供此案系他所為，直到200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真凶現身，李才得以出獄。

冤獄不斷乃中共一大弊政，民間的上訪，就是申冤。中共不得不驚呼：『人死而不能複生，判處死刑應慎重...』並收緊死刑的復審制度。對可用事實認定的刑事案，用『復審』加以制約，卻不能排除整個中共黨風壞死、制度不全的作用造成冤獄叢生。毛澤東發明『思想罪』，所謂『顛覆政權』『

破壞穩定』則是陷人民於恐怖，扼殺民主意識，助長冤獄的罪魁。

現在揭示的歷史證明，早在中共建立「革命根據地」紅色政權已欠下了屢屢血債，直到今天建國六十年冤獄伴隨一黨專制長期存在！令人觸目心驚的殺人案頻頻發生，冤案不斷，足以說明暴政猖狂地扭曲人性，蒙昧社會良知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良心黑透的打砸搶罪犯，依靠共產黨內仍佔據領導地位的後臺，和自身變色龍那套拍馬屁逢迎的能事，搖身一變成了大貪污，大倒爺，大投機商的「師爺」。這些人像癌細胞一樣，潛藏在社會的肌體中。一旦條件和機會形成，必會惡性發作。

那時新的陰謀家，重新繼承毛澤東的「遺志」，奪取最高權力，再演一次文革之類的大浩劫是完全可能的。即使建設得無論多好，「國力」恢復到什麼程度，都將毀於一場新的內亂！！經歷過去的災難的人們，不能不對此深懷憂慮！！

中國封建的帝王，可以偽稱「君權神授」的愚民意識，規定出「王者沐浴五步者死」「王者入葬從陪三千」。在這種特權者吃人的社會裡，中國黎民蒼生對專制主義的容忍，遠遠超過了對異族入侵的容忍。

毛澤東死後，被誣陷的成百萬右派，只將他們頭上強扣的帽子一風吹，這種平反顯示中共是一個沒有章法的組織，誰在臺上，誰說了算。

被毛澤東扭曲的鄧小平，因人格的缺陷，使他根本不可能按「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抹掉中共歷史上這可恥的一頁。

到今天為止，中共既沒有勇氣承擔該負的歷史責任，更不可能為受害者徹底洗雪冤情。所以他們只好禁談過去，把這一頁可恥的過去遮掩過去。

跨入二十一世紀，中共日漸腐敗，社會財富集中在竊取權力者之手，舊恨未平又添新冤，人民的上訪與日俱增，社會矛盾更趨尖銳，為了保護少數統治者的利益，找了一個「維持穩定」的理由，建立了龐大的員警隊伍，一遇假節日或讓他們感到內愧的紀念日，尤其對群眾遊行，必大批出動武警，生怕走上街頭的人民起來反抗他們。

這樣一夥代表少數人利益的政治團夥，那有資格代表人民執政？

### 第三節：人性的復甦

我的父親是一個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在他任職期間，只是從教育者的良知出發，從國家在抗戰勝利後需要安定，需要建設出發，做了一點於國於民有益的事，卻被中共認定是反革命，以破壞學潮治罪，才四十多歲便戾死中共獄中。屈死他一人還沒消中共之恨，將他全家幾乎趕盡殺絕，家破人亡。

然而，被暴力扭曲的人性卻在復甦，1985年，一直不敢講真話的母親終於向法院遞交了替父親申冤的訴狀，雖然她知道，父親已離開人世整整二十六年了，她的申訴是一份對知識份子迫害的抗議書。但是，重慶法院仍維持著當年軍事法庭的判決，重複著加給他的「罪名」。

老百姓追求人性復甦，是中國大陸廿世紀九十年代的民意主流。在這一期間，一位臺灣的女作家瓊瑤所寫的《還珠格格》傳入了大陸。

這個故事選擇皇宮為背景，皇宮是中國專制主義的大本營。《還珠格格》劇描寫了一個千里尋父的女孩把『人性』帶到這裡，描述一群追求自由的男女，怎麼在重重包圍中戰勝專制主義這頭怪獸，歌頌了『自我犧牲』、個性解放、追求自由這個主題。

《還珠格格》熱的出現，體現了中國民眾對喪失多年人性回歸的盼望，當「階級鬥爭」把中國大陸弄得兄弟、父母可以反目成仇，把人性踐踏成荒漠一片時，只有回歸的人性才滋潤中國人心，喚起人們對生活和愛的渴求和希望。

幾年來《還珠格格》劇不但家喻戶曉，老百姓交口讚譽，它賺盡了中國百姓的熱淚，它反映了中國大陸人心所向。

人們會發生一個疑問，為什麼大陸十幾億人口，竟沒有產生一個像瓊瑤的作家？大陸的中國作家真的沒有那種反映人民心聲的熱情嗎？

只要看看中國的影壇，看看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電視螢幕，那上面老歌反覆，電視劇不是古人登臺就是戰火塗炭，加上時髦口號，和俗不可耐的對話。

專制特權封住了作家的喉嚨，中國有那麼多近代的歷史事件：從戊戌維新，康梁變法；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抗日血戰；臺灣民主政體的建成這些大幕的題材，夠好多歷史家、文學家撰寫，夠好多藝術家表演，夠好多中國的觀眾從中受到教育啟發。

中共血腥統治六十年，民主同獨裁搏鬥的可歌可泣故事，千千萬萬。如果說中國需要民主主義啟蒙的素材，那麼這些都是最豐富的素材。然而它們卻被中國的獨裁勢力緊鎖著，埋於地下，使它們無法傳播！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的獨裁勢力是中國進步的巨大障礙！！

一九五七年的受難者地獄二十三年，受盡折磨，大半都折磨死去，埋骨於流放荒野。今天逼得他們在風燭殘年，守在中共的衙門口討要二十三年工資。在中共眼裡「右派」是一個沒有任何的反抗能力。掀不起任何風浪的人群。

但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大陸歷史上的大事，當年驕橫跋扈的毛賊撕下他的偽裝。三面紅旗的慘敗，毛賊東不僅完全喪失人心，在大陸失去統率一切的地位，鄧小平能竄其位，重打鑼鼓再開張，證明中共已無可挽回走下坡路了。

衝沖軍邊荒的人中產生陳力，張錫錕，劉順森這樣的中華精英，在黑暗中舉起了「火炬」，引領人們反抗暴力冒死無懼。這些人用生命證明在暴政下，中華民族反抗壓迫的精神永存。他們的人性在反抗暴力中閃耀，他們的精神是右派的驕傲，傳揚他們就是繼承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

《血紀》告訴人們，反抗暴政才能保持自己的人性。

今天大陸上在中共壓迫下的民眾，普遍呼出人性復甦的聲音，表達他們對毛澤東暴力的普遍揚棄，古人教誨，民可載舟，亦可覆舟，把老百姓當奴隸使喚的中共頑固派，總有受到民眾懲處的那天！

「以事實為依據，以史為鑒」向來是中國史學家共同遵守的準則，中國古代為了秉筆直書，有多少史官寧可殺身。

然而中共統治下的史學工作者，有多少能繼承這一傳統？

這使我又想起了一九七二年，中共邀請訪問大陸的義大利電影大師，米開基朗·安東尼奧尼，曾冒著所獲資料被沒收，甚至人身扣押的危險，在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攝下反映大陸當年實況的照片，回國後整理成新聞紀錄片《中國》，並在世界上傳播，讓世界知道被恐怖神秘隱藏的中國大陸真實情況。

一個信奉民主的外國人，尚能通過沿街的乞丐，武漢長江大橋頭的貧民窯，表達對陷於災難的大陸百姓以深切同情，對帶來災難的中國獨裁者以聲討。

而大陸的史學家，依然對這種罪惡噤若寒蟬。這難道不是獨裁專制扼殺人性的又一結果麼？

## 第八章：風雲滿布的年代

### 第一節：山雨欲來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中共控制下，社會從階級鬥爭『內戰』向經濟建設的一次『和平』轉變，客觀上國家和庶民得到一次休養生息的機會。

但是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塘塞世人，是不能掩飾少數人霸佔社會財富的不義的。這種建立在權力基礎上的財富私有和殘酷剝削，需要獨裁的政治制度來保護，這是鄧小平繼承毛澤東衣鉢的原因。靠特權佔有的私人財富與自由資本靠競爭佔有完全是兩回事。

推行農業的『改革』不是什麼新發明，只是農民和平要回了被毛澤東搶去的飯碗，從飢餓桎梏中掙脫出來。解散人民公社，階級鬥爭不提了，對五類這種類似中世紀的奴隸制度一風吹掉，有它進步一面。卻不讓人們批判毛澤東反動的獨裁主義核心，而是改頭換面繼承它，就是它的反動一面。

用裁軍一百萬，向世界證明中共需要和平的誠意。這得到了世界的好評，美國全球性權威刊物《時代》週刊，鄧小平被譽為86年世界風雲人物，出現在該雜誌封面上。

不過，鄧小平用「向前看」掩蓋毛澤東滔天大罪，暴露了自私頑固的本性。

「不談過去」，以回避中共背叛民主，抹掉歷次運動對無辜老百姓所欠的血債；用反對自由主義氾濫，壓制人民的言論自由，不准人民對它進行批判；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掩蓋統治者佔有社會財富的掠奪性，達到保留共產黨的特權，便是中共後極權時代的目的。

但是昨天剛發生的事能忘記嗎？中共怎麼盡幹這種掩耳盜鈴的事？鄧先生「不談過去」難道能抹去毛澤東的罪惡嗎？老百姓不是失聰的傻瓜，他們之所以順著中共說瞎話，實在是怕滿街帶槍的衛巫。

今天權力是特權聚斂的保證，它造就了中國新的官僚階級。毛澤東所造成的物資匱乏和強權秩序，加上道德文化被摧殘，使這個社會充滿了欺詐、貪污、腐敗，「改良」充滿了權力與金錢勾結造成的兩極分化。構成了畸形改革開放社會的特徵！

百姓只好怒目相對，卻不能在新聞報刊上公開仗義執言。中共在言論上的封鎖，暴露了『改革』設計師鄧小平的本性！

然而一部份對世界不瞭解，缺乏政治頭腦的人，包括過去的權力擁有者，而今天失去權力的人；一些沒有認真思索造成社會今天這麼壞的原因，因而一齊來攪昏是非的人，讓人們陷入到另一個誤區。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我因公出差去重慶市中區，早上七點鐘登上了一輛川運二十二隊的中客汽車。剛剛跨進車廂，就看見司機台前擋風玻璃的後面醒目位置上，掛著一張足有八寸的毛澤東頭像，那頭像在風中搖晃，依然十分得意。這段時間說來也怪，全國一股風，汽車的駕駛台前都掛這玩藝兒。

據說交通事故太多，就因為他在陰間作祟，掛了它可以免車禍之災。

這時坐在我前排的一位頭髮花白，教師模樣的老人，指著那懸空的彩色掛照，向司機發問道：「掛上這麼大像片，不擋你的視線麼？」那司機卻笑了笑回答說：「沒關係！人人都說他老人家生前是惡神，要不然那時貪官都不敢猖狂？現在他死了，貪官污吏便成了災，掛他的像就是請他老人家回來殺殺這些貪官。」

那老師顯然對這位司機的回答不以為然，再問他：「照你這麼說，還是過去的好囉？」那司機看上去大約四十來歲，顯然是經歷過文革風暴的過來人，見他沉思片刻後回答說：

「照我看都不好，毛老頭當權吃不飽，說句話都提心吊膽，大家都過的苦日子，又不敢吭聲，活像啞巴吃黃連，有苦也說不出來；現在呢，飯倒是有得吃了，可是貪官太多，苛捐雜稅太多，失業也多，反正老百姓倒楣。」

這是一段老百姓內心對中共專制政權的無可奈何的評價，可惜老百姓不明白中共之所以如此，根源於它的唯我獨尊，黨章就自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不能受任何約束的「神」，毛澤東所有運動目的都是「造神」。

我在專汽廠任檢驗科長，手下有一名年已五十上下叫雷昌的檢驗工，常常有意無意的對當今中共的腐敗憤忿不已，他常說「現在這些當官的要在過去早就抓起來關監或殺頭了，所以還是毛澤東那一套鎮得住人。」

當我問他過去那麼多人遭整，那麼多人餓死，老百姓不敢說真話，吃飯靠糧票這種日子，你認為也好麼？回答是：「我也不是說毛澤東好，我是說今天不搞階級鬥爭了，貪官污吏實在太不象樣了。」我又問他：「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和中國大陸比較，你擁護那一種？」他盯著我的眼睛，神秘的默不作答。

那雷昌就住在我的隔壁，他的老婆所在企業倒閉，失業在家，平時最關心的就是糧、油、肥皂之類的供應和價格。菜油取消油票的那天，她便借了錢買了一大桶的菜油囤屯起，以為油票取消後油價會翻番上漲。

她排在油店門口長長的求購者隊伍中，搶著去買菜油。

除了菜油，還有肥皂、牙膏、草紙等等極為普通的日用品，在這漲價的風潮中，老百姓把所有錢都換了日用品和消耗品，似乎只有這樣才可以躲過那幣值貶值之災。

雷家的錢全變成了幾百斤菜油，那菜油可不能放得太久，充其量一年以後，油就變質了，如果再拿到市場上去賣，別人一聞就走得遠遠的。

搶購風潮時期，大量的假貨劣質貨，尤其是食用油、米、麵粉，霉變的東西經過「處理」後購進老百姓的家，直到過一段時間才發現。雷家就為了自己消受變質的菜油，夫妻兩沒少吵過架。

我在前面介紹了我所在的廠李友，馬兵、肖付等人的故事。在84年工廠靠農用汽車短期走俏時期，一個普通的提車員都知道利用手中這點攤派權，向急欲購車的農民伸手，表明社會風氣已經壞到了何種程度？上行下效，沾著權的邊，能夠不貪的反而成了怪物，往往還要遭人譏諷說成是大傻瓜一個。

無官不貪已不夠概括這個執政黨，應當說，「無權不貪」更切近描繪這個政府，鄧小平主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包含無權不貪這個潛規則，貪官的氾濫卻要社會消化，但社會的承受力是有限的！

現實告訴我們，腐敗根源於專制之中。這一時期中共統治下的社會又怎樣呢？獨裁的中共政權向來對政權內部的醜聞諱莫如深。

我沒有專門收集中共各級政府腐敗的資料，在這裡僅僅根據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中所載，摘下1985—一九八五

——一九八七年中共公諸的幾個材料：

中共對海南區黨委書記雷宇1988年給了黨內警告，這種以『家法』處置的老傳統實在是欺人欺世，中共豈能以私黨的規矩替代國法？

事實證明，用輕描淡寫的黨紀處理，已無法抑制中共的腐敗，腐敗的惡性膨脹使中共整個的爛掉。於是被迫使出他們一貫認為最有效的老章法，借高壓和運動殺人，將個別人當作整個統治的替罪羊。

一九八六年六月24日，中共上海市對市委辦公廳主任余鐵民，利用職權收受三萬元賄賂被處無期徒刑。事實上同一時期中共官員貪污上百萬的案子相當普遍，對余餘鐵民案的嚴處，正好暴露中共黨內腐敗已相當嚴重。

1985年福建查獲的鄧國楨案，詐騙、走私、套彙、倒賣、行賄金額達兩億，到2004年，中共官方公佈當年十一月發生的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的大案共三萬六千餘件，人數四萬二千餘人，比2003年增加五倍。

一九八七年三月2日江西省南昌人民檢察院，對江西省長卞兒

獻策循私舞弊和包庇走私受賄等罪起訴，判處他兩年徒刑，成為鄧小平向「刑不下大夫」開刀的信號，這是為了「神化」這種不得人心的政治需要，造成共產黨「偉大」、「清廉」、的假像。

像這位卞省長級別的貪官不是一個，而是一批，就其漫延趨勢，將是整個統治集團。估且不論卞兒

獻策是否因與「中央」政見相左，而身陷囹圄，這一時期貪污者的官職及貪污金額和手段，都是中外歷史上貪官們望塵莫及的，其中尤為觸目驚心的是公安檢察人員，辦案人員所發生的「犯罪」。

震驚全國公安系統大案，雲南普洱縣刑警大隊長喬躍忠從1985年開始販毒，殺人越貨，強姦婦女無惡不作，直到十年後才披露出來。

中共官方報紙不得不驚呼「毒品，暴力兇殺與黑社會聯合在一起，產生嚴重刑事案件，聽任發展後果不堪設想。」

貪風日盛顯示獨裁專制正走向崩潰。

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共已無法遮掩已入膏肓的腐敗了，對外開放期間一開眼界和胸懷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從劇烈的社會鬥爭中，產生了民族危亡感。毛澤東獨裁在知識份子烙下切膚之痛，使他們親身領受黨天下的專橫霸道，雖然他們對中共的暴虐心懷餘悸。

但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反腐敗爭民主的運動首先從學校開始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正在進行人民代表選舉的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們，組織競選論壇，活躍在整個校園裡。

十二月1日校園裡貼出了「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首先向人民代表這個橡皮圖章宣戰，號召選民越出中共提名的框框，在選票上寫上自己擁護的人。約有四千名學生呼喊，「打倒封建獨裁」的口號上街遊行，並衝擊中共安徽省委。

與此同時，上海、武漢、南京、長沙等地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要求民主政治反對腐敗。全國各地高等學校陸續出現一些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字報。

其實這些要求在三十年前的學生大鳴大放中已提到了，只是毛澤東當即就採取了嚴厲的手段，扼殺了學生剛剛提出的正當民主要求，從而導致了更慘烈的後果：大陸陷入了「三年自然災害」，大約五千萬老百姓餓死。

我們的工廠距西南師範學院僅一路之隔，早晨鍛鍊身體時，我常去西師的風雨球場，經過該校的大禮堂，順便看那時學生們貼出的大學報。在禮堂旁的玻璃櫥窗張貼欄內，學生們設計的《民主園地》已一改過去的東西，代之以宣傳民主自由的啟蒙文章。

堅持一黨專制的中共死硬份子，不能不對這種山雨欲來的形勢擔心。

鄧小平連忙在北京發難，他向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趙紫陽喊道：「凡是鬧起來的地方都是那裡的領導態度（執行獨裁）不堅決，這是近幾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思潮態度不堅決的結果。」這話至少說明了兩點：

第一，與民主為敵的中共頑固代表者，在它的統治時期，沒有一刻放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氾濫的殺手鐮，這是中共從毛澤東那裡繼承的最核心精髓。

第二，共產黨執政期間，黨內鬥爭和分化勢不可免，靠近民意的改良派與堅持獨裁的頑固派的鬥爭還將繼續下去，直到獨裁統治的勢力完全退出執政舞臺。

我們這些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經過的政治運動，使我們親眼看到並牢記，一批又一批的「異己份子」，在兩條路線殊死搏鬥中被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當鄧小平祭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旗，使我們馬上看到毛澤東獨裁魔影在大陸上的再現！

皇冠與法典二者不可兼得，中國的韋斯巴癩，曾高唱過法制替代人制的鄧小平，到了危及其獨裁統治的時候，堅決地選擇了皇冠。

延續幾年的「反對精神污染」，就是保持「四個堅持」的洗腦慣例，就是保衛獨裁統治的新格局。

到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幟亮出來後，等於在指示各級中共黨政組織，要按過去對待右派的手段，來收拾爭取民主和法制的學生。看來面對越來越強大的民主勢力，中共要採取極端行動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由他親自點名，開除了方毅之，劉賓雁、王若望等敢於主持正義，為民請命，疾言中共貪官劣跡的幾位領袖人物的中共黨籍，一九八六年三月開始在上海、南京出動軍警，以破壞安定團結，擾亂社會治

安的罪名，向初萌的學生運動揮起了屠刀，學潮暫時被中共暴力壓了下去。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胡躍邦在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咄咄逼視下，請求辭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職務。中共內部的政治反對派，在素有獨裁經驗的中共頑固派面前的軟弱，反映出中國民主力量的軟弱。

這使中國當時傾向民主主義知識份子感到憤怒，對於在中國統治三十年間，血債累累，已經民心殆盡的中共專制主義，仍能照常執行其統治職能這個怪現象，引發了思想界的思索和爭論。

從傷痕文學開始，到苦戀一書出版，受到了中共文痞們的清剿。探討中國民心，繼「醜陋的中國人」之後的代表作，莫過於1988年由中央電視臺播出的六集電視連續劇「河殤」。

說河殤是一部探索中國文化尷尬狀態的政論評說片，那麼在我看，由中共主要喉舌中央電視臺來播送，至少反映了中共上層的分歧。

正因為這些意見是分歧的，使它一改老傳統。『河殤』列舉顛狂的大躍進和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這些為世人所共感的反面材料，哀嘆在中國失去了一次選擇自由民主的機會。並證明，毛澤東當時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欺騙性。

其實「河殤」的傷感，何償不是每個希望在中國實現民主制度人們共同的傷感？正因為這樣，它有強烈的感染力，以致於當局在《人民的報》《光明日報》等中共把持的刊物上，對「河殤」的文化圍剿也只能風聲大雨點小。

中共上層領導，已經越來越明顯分裂成頑固保守派和主張和平改革深入的民主派。在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危機中，民主向專制主義發動的思想交鋒，為思想啟蒙開路。

## 第二節：六四，大陸民眾在怒吼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躍邦含憤去世，一場學生運動終於爆發，學生們對胡躍邦因反對黨內腐敗主張民主，而被戴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撤去總書記職務感到憤怒。他們悼念胡躍邦，反映了日漸成熟的民主要求。

### （一）在北京

四月二十二日，四萬名北京學生上街遊行，將他們醞釀已久的要求公諸社會。這些要求僅僅是：（1）中共中央應重新評價胡躍邦的功過；（2）為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受過處份和批評的人平反。

這兩個要求絲毫沒有推翻共產黨，取消共產黨執政地位的成份，同時這也是中共自己制定和頒佈的憲法所容許的。

下面僅就我當時從媒體上摘下的報導，對這場運動作一個不完整的描述：

運動一開始，遊行的學生舉著「反對腐敗，打倒官倒」的小旗。

當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旨意刊載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使我想到三十二年前，毛澤東在同一張報紙上發表：「這是為什麼」？

（順便要說，三十二年前這道格殺令，毛澤東發動了反右派運動，不僅把屠刀對準了無辜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而且惡毒的把奴隸社會鎮壓社會的那套方法，應用到當今社會。）

五月四日新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將中共分歧公諸於眾，學生們受到鼓舞。

五月五日以後，學生們再度走向大街並成立了自己的組織：「高自聯」。

五月十三日，「高自聯」在北京發動了一場歷時七天，三千人參加的絕食請願，大批的市民擁向街頭，聲援學生。中共統治下的一部份員警，為學生的和平請願和絕食運動所感動，開始倒向學生一邊。

五月十七日驚慌失措的頑固派，通過李鵬操縱的國務院宣佈：從五月二十日開始，對北京地區部份實行戒嚴，並且在戒嚴令中宣佈，所有反對政府的行為都屬於非法。

這些消息證明在某種程度上，這次學生運動，只是中共內部的較為進步的民主派，向堅持獨裁頑固派的鬥爭，是符合於中共自己提出來的「改革」綱領的，它反映出社會對財富集累的不義產生了強烈的不滿。

可悲的是幾十年被中共暴政壓扁了的中國百姓們，還沒有人公開喊出打倒這個腐敗的政府時，言論和思想，已被中共密佈的特務封殺得萬口緘默。

現在，學生沖出了禁鎖的校門，走上北京街頭、一洩積鬱在心頭多年的憤怒。衝擊中南海新華門的學生們喊出了「打倒官倒！」「打倒腐敗！」的口號。

工人在街頭為學生組織募捐，有的把賴以為生的冰棍箱，糖水攤推到了學生中間，把冰棍，糖水葫蘆遞給學生們。

北京市民已不像前清那些盤著大辮，穿著長衫的「老北京」，望著譚嗣同喋血長安街頭黯然神傷。更不像三十年前看洪水猛獸般的「紅衛兵」，愁得只好皺眉頭。

幾十年中共暴力的淫威在人民心靈上的折皺，第一次被展平。

時間正好倒轉兩百年，一七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巴黎的市民高呼著「消滅財主」，「消滅剝削」的口號，簇擁著向巴士底獄前進，他們高舉自由宣言，掀起了歐洲民主主義大革命。

然而這股人類爭民主的熱風整整刮了一百年，才遠涉重洋登上了華夏這塊封建凍土，讓北京市民第一次向世界對話！！

清廷的皇室在國土分裂，民族危機深重時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努力，光緒皇帝尚有實施民主的戊戌變法行動。

然而世界上產生了新專制主義的中共，連光緒皇帝不如。

歷史在俄國和在中國同時應證了，新的披著革命外衣的專制主義，比滿清王室更兇惡的虎視著民主力量。

然而民主仍然戰勝了新的專制主義，經濟這個最活的社會原動力，是任何獨裁勢力不能征服的。

於是，距法蘭西大革命爆發剛剛兩百年，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的事變再次雄辯證明，民主以其強大的生命力一直頑強的同專制主義鬥爭。

五四運動發生在北洋軍閥統治十分虛弱，中國民主初潮蓬勃興起的背景下，無論從運動所受的阻力和運動的動力看，當年民主力量占著相對的優勢。

而今天，「六四」是在中共統治相當強大，人民又因長期中共的暴力禁鎖，自身缺乏強有力的組織背景下，由人民自發的發動起來的。！

一句名言「劊子手只有在真理的面前才會感到虛弱而顫抖。」被應證著。能對震撼人心的提問置若罔聞嗎？能對反對腐敗振臂高呼「拯救祖國」的孩子們開槍麼？能在這種洪流面前心不驚，肉不跳，膽不怯麼？

就連中共最頑固的候舌，人民日報的編輯佇列，花白頭髮的老人披著「高級編輯」，「高級記者」的條幅，今天也要公開與中共中央「劃清界線」。這些七十高齡的人記得他們的前任，鄧拓，胡績衛，秦川，都因無法蒙昧良知充當毛澤東的打手，最後落得被徹職批鬥自殺的結局而悲憤。

在學生和市民的聲勢浩大遊行隊伍支持下，中共改良派。與中共獨裁勢力，一天天發展到怒目相持的地步。

由毛澤東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獨裁統治，已在民心振撼下，迅速呈現解體。繼胡躍邦而上任的總書記趙紫陽，比鄧小平對「共產主義」的叛逆走得更遠。

中共黨內的這種分化，是他們對學生運動猶豫不決的原因！

良知和殘酷的現實，民心的強烈震撼，使趙紫陽流淚。

共產黨理論上的矛盾，猛烈衝擊著統治集團。

於是他呼籲：關懷、理解、克制和對話！

五月十七日，北京各界民眾一百萬，從四面八方湧向天安門廣場，沒有統一指揮，沒有統一口號，浩浩蕩蕩的群眾隊伍秩序井然。

即將回歸的香港市民舉行了持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他們反對回歸到中共的暴政統治之下，他們清楚此刻申援北京等於伸援自己的明天。全世界人民同聲聲討北京的專制暴行，反對中共把專制主義帶給香港的人民！

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樹起了自由女神像。表示民主和自由是中國年輕一代知識份子的信念，這同一味追求專制的中共是水火不相容的，這個舉動向世界宣佈他們同北京政權決裂！

然而，中共專制的淫威依然僵而不死。

遊行的隊伍裡，有人在焦慮呼喊：「當心，中共的政權機器是一具殺人不眨眼的絞肉機」。幾十年內它屠殺了幾千萬中國人，儘管它已喪失人心，但只要它的統治還在，在面臨其生存受到威脅時，它會以百倍瘋狂殺人。

有人則說：「不要使社會失控和動盪，不要給老百姓帶來苦難，中國不能再亂，社會需要安定。」

有人在勸阻那些熱血沸騰的學生，要注意語言上的分寸，以免激怒槍桿子，給這次運動帶來災難的後果。

然而，四十年的屈辱，第一次伸直了腰，學生們搖動他們手心裡的小旗，上面寫著：「反對腐敗和專制」，大學生們為民族的前途擔憂，義無反顧的用正義和理智為自己開路，用赤誠感動道路兩旁年長的一輩。

佈滿蒼桑的父老們一臉警惕，儼然以孩子們保護者姿態出現，他們準備這些孩子受到傷害時，用自己的身體保護他們。

## （二）在我周圍

北碚這座位於重慶偏北的小城，因為集中了重慶市兩所著名的大學：西南師範大學和西南農業大學，以及市一師等專科學校和幾十所中學，所以被稱為重慶市北部文化中心，這段時期比較集中反映了重慶市學生運動的發展情況，使我沐浴了這場運動的洗禮：

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四萬名師生上街遊行開始時，北碚兩大院校學生也結隊走向了街頭，開始時，他們只是散發來自北京的資訊和資料，宣傳北京市的學生向中共當局提出的各種要求，並將巨幅海報張貼在人民會堂前。

這個一向被北碚區中共區委用來宣傳的中心，現在被學生們用作學運的講臺。人民會堂門前成了北碚老百姓瞭解時事的窗口，學生們除了在那裡摘抄海外各大媒體對中共醜聞的報導，還散發學生和市民們反抗中共的傳單。

每天下午七點鐘，兩院的學生都要上街進行遊行，在街上同其他學校的同學會合成浩浩蕩蕩的隊伍，沿著環城路一面舉著小旗向市民演講，一面呼喊口號，直到深夜才從街頭陸續散去。

每到這時我都要擠進市民的人群中，去聆聽他們所呼出的每一口號，同他們交流共同的感受，我的思緒和呼吸被同學們調動著。

有時候我的母親和我一起，當我問她，當年國民黨時代是否見到過這種群情激憤的遊行場面？她那昏花眼睛裡陷入了半個世紀的回憶，點點頭，嘆息道：「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麼氣勢磅礴的隊伍。」

我看到兩名學生舉著，「鎮壓愛國運動就是犯罪」的橫幅標語走在最前面。後面的數千名學生呼喊口號用堅定的步伐緊跟著，他們神情凝重。



我的母親和朋友們一面向他們歡呼，一面怯生生的勸告我：「不要輕易捲卷到遊行隊伍中，因為你是再經不起燃燒了。」

上了年紀，被專制折磨傷痕太深的老人們，懷著激動和憂慮混合一起的複雜心情，他們被中共欺騙了一輩子，奴役了一輩子，他們的性格被中共幾十年的高壓壓扁了，難以恢復他們的本來面目了。

我看見一個頭髮蒼蒼的老太太，跟在孩子的身後，顫抖的呼喚著：「你還小，不知道中共的霸道，小心呀我的孫子回來呀！」好像災難是遊行人們激怒了統治者造成的。

但是，我回答他們：「我的學生時代是夠聽話、夠軟弱的，而我們的遭遇卻是最慘的，我們在皮鞭下忍受飢餓和酷刑，我的同難壯烈犧牲，難道這不是因為我們忍讓屈辱而造成的麼」？

沈默了幾十年的學生，在中共專制下失去理想和自由的中國學生們，怎能放棄爭取重新生活的鬥爭？

那時每天早晨上班和中午回家的時候，我都要特意繞道去人民會堂前，閱讀學生們新貼出來的大字報，接受學生們的宣傳教育。

雖然，大街的兩側高樓中，潛伏著一些訓練有素的怪物，它一直在窺視著遊行的隊午，在那黑洞洞窗口後面，把攝影機對準經過的遊行學生，將他們此時此地的作為，全部攝入鏡頭。準備這場「動亂」平息後，進行清算和鎮壓的依據。

五月23日，北京城雷雨交加，寒風襲擊了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示威的絕食者，數百位中華民族優秀的孩子，終於在飢餓和風暴中昏倒了，同伴們迅速地救助受難者，這裡響起了悲壯樂曲，遠遠超過了魯迅筆下的劉和珍時代。

消息傳來，北碚的學生立即在傍晚舉起了醒目的標語，走上了街頭，萬眾一心表達聲援！那標語上寫著：「媽媽我餓，但我們吃不下！」

迎著這悲憤的標語，我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這是稚嫩的孩子們向祖國母親的哭訴，這更是遊行佇列中發出令人驚醒的吶喊，目睹這一幕，劊子手被震撼了，退卻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獄中的三次絕食，尤其是一九六七年文革野蠻的批鬥中，我一個在獄中長期反抗迫害的無辜者，以絕食這種文明方式抗議文革殘害，竟成當局摧殘的藉口！當時所有在我身邊的同難們，目睹我受到的摧殘，除了下淚誰都不敢對我表示同情和聲援，支持我的僅僅是我對野獸暴行的憤怒。

在那艱苦的日子裡，我數著一秒一秒的熬。為了戲謔我，他們居然剝奪我喝雨水的權利，這樣的鬥爭等於讓野獸笑看我活活餓死。

他們幸災樂禍說，絕食而死又怎麼樣？獄方充其量向人宣佈，又少了一個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的傢伙！。當年被打死、餓死、和凍死的人，引不起他們內心的顫抖，因為他們是一群沒有人性的野獸！！

今天的絕食者們，在經歷了中國近一個世紀的反反覆覆動盪，認識了什麼叫民主，什麼叫欺騙？什麼叫專制？什麼叫復辟？今天已不是二十年前我在監獄裡孤軍奮戰的時候。

「是的，我餓」，六十年代的孩子們從一生下來，就生活在張鐵生虛無枷鎖封閉的年代。奶娘乾癟的乳頭上，已擠不出五千年文化的乳汁，而是無知和野蠻的毒液。孩子們哭喊著掙扎著，而無情的「奶娘」卻向他吼道：

「忘記你的祖先那些封、資、修的東西，你現在要學會吞食用鬥爭和戰火練成的鐵丸。你應當從此脫胎換骨，學會用階級鬥爭征服你的父老兄弟，長大後，除了事奉那至高無上的教主，呼喊毛澤東萬歲，什麼都要拋掉。因為從你降生的那一天開始，你只能在「階級鬥爭」的火線上練成專制主義的打手，永遠成為張鐵生類型的狂人」。

哦，媽媽！這樣的精神糧食我怎能下嚥？

### (三) 今天和昨天

天旋地轉，老魔頭的幽靈歸天，繼承他的鬼魅像煙雲散去，先天發育不健全的孩子們在新的課堂裡，手捧著發給他們的新教材，從書包裡裝進自然數學課本。

讀吧，讀啊，文憑熱在召喚著我們：中學、中專、大專……可惜就在那憑文憑才能晉升的熱潮中，有幾個亮出的「文憑」是真才實學的？在這麼大群的小學生，中學生中有幾個能進入大學門檻？大學成了無數求讀者可望不可登的境界，畢業變成了失業。

在城市裡，窮人的孩子因為無錢上學，只有排在待業的行列中等候有錢人的雇傭，在陰暗潮濕的工棚裡做苦力。而在貧困山區裡的孩子，蹲在危房的教室裡，一邊聽老師頌念：「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一邊聽那教室的房樑被風吹得搖搖欲墜的響聲，擔心它何時會垮跨下來。

於是那些在政府權力保護下順利上攀的佼佼者，便向那些學校大門外的大批學生們發出嘲笑：你們這些愚蠢的苦讀學生們再有天大的苦功失，能值上我那有權有勢的父母麼？

在擁有權力的大款們的樂園裡，讀書求知變成一種天大的傻事。一個善於周旋於政府和富人間的富仔，要比一個老實巴交的求學者「精明」百倍。

這貧富懸殊的現實在教會你懂得，今天這裡絕沒有求知者的安樂園。

這樣的書我怎能讀下去？媽呀，我餓，我渴望知識，然而擺在我面前的課本裡再多的科學知識都毫無用處，靠它們賺不到錢，解決不了我的生存。在這個社會裡，我除了被迫學會對權勢順從和依附，奉獻自己。血淋淋的現實告訴我，這裡不需要知識，有的是欺騙，有的是對良知一刀一刀的切割。

媽媽，好心的媽別勸我麻醉自己的神經，蒙蔽自己的眼睛，坐在擺著人肉筵席的席前，看著富人啃同胞的骨頭，跟著也醜著弱者的血和淚去吃那饅頭。我知道終有一天我也會被人在這筵席上吃掉。

所以媽媽呀！我好餓好餓，但我怎能安心坐下來「讀書」，去同吃人者同桌享那有毒的「盛宴」。

一九八九年四月的春天，對我來說是我四十年來經歷的最溫暖的春天。

四十年來壓在我身上的這沉重的專制巨石下，我像一顆羸弱的小草，將根深深扎紮進了巨石下的泥土中，在磐石的縫隙裡頑強地向上生長，我看到我的同類一顆一顆地因為缺乏養分和水，缺乏陽光而爬在泥層某一個斷層裡枯死掉。

四十年來此時此刻，我第一次強烈地體驗到我們民族覺醒的生命力，我緊緊地貼著這支遊行隊伍，體驗它溢出的熱流溶貫我的全身。

四十年來，我還是第一次在大街上貪婪呼吸充滿了民主氣味的新鮮空氣。

五月底的一個下午，我看見西師的一隊學生捧著募捐箱向我走來時，我忙從口袋裡取出了一百元錢投向那箱口，一個女孩走到我的面前恭敬舉起一個簽名本，要我在那上面留下我的姓名。

我笑道：「不用問我的名姓。」說著舉筆在那本子上寫下了「一個普通老百姓對六四運動的心意」，我那時已經被一種虔誠支配著，這些天來我感謝孩子們給我上了令我感動的一課。

不料我的旁邊卻傳出一個聲音，低聲說道：「他們拿這些募來的錢上館子大吃大喝。」我立刻警覺起來，大聲說這是別有用心的中傷，這種冒生命危險的街頭募捐，誰願意？

堅持中共專制獨裁的核心人物和他們的狗腿子，正用瘋狂的仇眼來看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他們認為專制倒臺了，自己的特權消失，他們會失去搶來的一切，此時正全神貫注的尋找破壞學潮的機會，這些人像曹英一樣造謠生事，無中生有，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

#### (四) 屠殺

一個多月來，北京部隊在市民們的阻礙下，一直屯兵城外「無法進城」，而城內的部隊拒絕鎮壓的密令，他們不僅因為受到愛國學生們的感染，而且已經感到在北京市民面前「眾怒難犯」了。

外電報導，三十八軍軍長被青年的軍官們軟禁，拒絕鎮壓愛國同胞，他們不願當歷史的罪人，並成為這座城市裡人民的死敵，所以喊道：「我們是打仗的，而不是打人來的」。

北京的父老們為保護自己的孩子們挺身而出，橫臥街頭，用身體作路障，六、七十歲的老人流著眼淚勸說這些還不明真相的部隊。

在中共的辭典裡，民主是特權的最大敵人，「動亂」不是指社會秩序的破壞，人民生命塗炭，而是指獨裁專制受到了全體人民的反對，處在不穩之中。

中共建國以來，凡是出現威脅他們統治的任何跡象，甚至於出現不與獨裁者相一致的言論，都會被斥為「反黨」和「反革命」，並以「動亂」誅討之，鎮壓之。十年前，魏京生就是在西單牆，刷了幾張要求民主的大字報，就抓去蹲了整整七年大牢。

其實，自稱人民大救星的這個政黨，恰恰是陷社會於動亂和災難的元兇禍首，在高壓政策之下，在經歷了長期痛苦的過程，過去許多人沒有認清或不敢直言的事實，今天已成為中國老百姓的共識。

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比當時北洋軍閥奸詐得多，殘暴得多的新的暴力集團，他們所付出的艱苦，曲折，和努力是當年的劉和珍們無可比擬的。

就在同一時刻，天安門城樓下有人用雞蛋裹著顏料向天安門城樓上那張中共政權的奠基人，混世魔王毛澤東的掛像擲去，這個行動證明，隊伍中有人把中國災難的元兇點了出來。

凡是年過四十以上的人都知道，只有徹底的將毛批臭，讓它現出專制魔王的真身，中國社會問題才算真正點到了要害。如果這個舉動能得到遊行基本隊伍的回應，針鋒相對的提出打倒毛澤東，打倒獨裁的口號，樹起民主革命的旗幟，那麼它將奏響向現代專制討伐的戰鼓。

恰恰相反，在隊伍中卻有人對此喝倒采，一幫夾在遊行中「支持」學生運動反對社會「混亂」的人，對鄧小平存在著另一種見解；舊的毛澤東黨羽專橫跋扈的天堂失去了，他們想用學生的力量來恢復毛氏獨裁的舊秩序，所以怎麼也不能容忍，把運動的矛頭直指他們的祖師爺。

天安門三君子之一的喻東嶽被抓，並處以無期徒刑。

這足以說明鄧小平集團的改革開放，一點都沒有放棄毛澤東的專制主義，也說明學生運動的頭頭們認識和步調極不協調，運動並沒有昇華到它所應有的歷史高度。沒弄清一個不受約束的權力，不僅是暴政的根本原因，還是產生貪污腐敗的根本原因，陷在姓資姓社這種可笑的爭論中。

毛澤東的嫡系們，也反對腐敗和官倒，但他們是非顛倒的把腐敗說成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為了讓過去毛澤東專制主義再度復辟，拚拼命的叫囂只有老魔頭才能將貪污腐敗收拾乾淨這種謬論，嚴重干擾了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使它最終向獨裁勢力屈膝。

專制的寡頭，終於端出毛澤東的衣鉢，大聲驚呼這是一場反革命的動亂。他們召集緊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撤去了趙紫陽的中共總書記的職務，並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平息動亂。」瘋狂喊道：「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歷史在這個決定性時刻，毛澤東復活了！

六月二日，屯兵北京城下的勤王部隊待命入城。BBC台立即播報了這支部隊的底細：這是一支以少數民族為基本骨幹，沒有文化素養，不瞭解學生運動內情和底細的虎狼之師。

六月三日殘暴的中共當局，終於為專制集團的利益孤注一擲，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命令這支虎狼之師用坦克開路，以摧毀一個月來北京市民築起的工事和路障。受命鎮壓的部隊從駕駛倉裡，用機槍掃射那些橫臥街頭進行阻攔的老百姓。中共的專制寡頭血洗了北京城！

赤手空拳的學生紛紛倒在血泊中，在這種情況下的市民和學生用胳膊和棍棒，血戰坦克。一時間到處血肉橫飛，哭喊聲聲振環宇，一場在中共導演下空前慘烈的血腥鎮壓，在全世人民的面前公演了！

連日來因為絕食而虛弱不堪的學生們，高自聯的指揮者已來不及從自由村撤退，有的飲彈坦克履帶和機槍子彈之下，有的帶著傷、流著血，還在繼續指揮著從人民紀念碑前撤下的大學生們繼續後撤。

六月盛暑的北京，血流成河，橫屍街頭。一切「克制」、「愛護」和偽善的許諾，一切「解放人類」最美妙的頌詞，被他們吃人殺人的行動，當著全世界拆穿無遺！全世界的衛星上，自帶的錄影設備，記錄下這一段中共統治老巢中發生的血淋淋歷史

它們拍下了北京的市民和學生倒在坦克的履帶下的經過；它們拍下了履帶碾過自由村裡的帳棚留下一條條長長的血帶。！

當時，北京的大學生們已經沒有後退的路，他們除了用肉體阻擋著坦克的前進，一批一批倒下去的人們，又在憤怒和淚水在鮮血中奮起。他們揀起了鐵棍向瘋狂的軍警們還擊，把那些最猖狂的屠夫，懸吊在立交橋上，用火燒死這些畜牲，以表達他們對屠夫的仇恨！

北京城在火海和吶喊中掙扎！這番同胞相殘的實景，比當年北京城裡任何被鎮壓的學生運動，更慘烈！！

就連中央廣播電臺的播音員，也帶著哭泣的悲聲，把這件中華民族最羞恥的消息向世界播報！他們感到良知在受折磨，從而違背了統治者的意願。那裡發生了槍戰，大學生們衝向電臺，四百名學生倒在機槍的掃射之下。士兵衝進了播音室，那裡傳來了最後的槍擊聲，電視螢幕消聲斂光了。

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血腥罪惡的日子，這個罪惡是繼土改時的清匪反霸屠殺地主富農和「反革命份子」；繼文化大革命由中共挑起的紅衛兵武鬥，文革期間從嚴從重的殺一小批，又一次對人民大開殺戒，特別是，它發生在當權中共的眼皮底下，動用了陣地攻堅的坦克，令人格外震驚。

歷史記載中共屠殺無辜者之多，羅織罪名之奇，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幾十年來，殺人後把血跡和真相一蓋，便由他們編造謊言任意篡改歷史，向來是毛澤東的老章法！事後這些中國土地上血淋淋的故事，被緊閉的國門封鎖了。

然而，科學進步了，發生在天安門城樓上六四血案，通過衛星轉播，讓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目擊了這場大屠殺的真相。

它非常鮮明的記載著中共專制王權的猙獰面目，也記載了鄧小平的改良是多麼偽善虛假！由此足以證明，只要中共仍在堅持共產黨一黨獨裁，中國的社會不可能得以根本改變。

今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成千的愛國青年，在一天內飲彈天安門城下。與北京幾乎同步，上海、天津、廣州、蘭州、成都相繼演出了軍警對人民的血腥暴行。傳聞當時攝製的底片湊起來足有萬里長城長。

我雖沒有親眼看到坦克碾過自由村的畫面，但我們圍聽BBC台的報導，面對這種在人類歷史上對人權的公開踐踏毛骨悚然。

根據衛星錄相顯示，北京發生的是，一個政府，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動用坦克機槍，大規模屠殺和平抗議的人民，若問那裡的人民在幹什麼？回答是，「他們在反對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猖狂的官倒。」

於是各國人民群情激憤，一致支持本國政府向這個喪失理智和人性的政府發出制裁通牒。海外華僑目睹衛視轉播的中共暴行，憤怒的組織起來衝擊中國的駐外使館。

香港、澳門、臺灣的民眾組織了大規模的燭光遊行，聲援還在坦克履帶下呻吟的學生。全世界幾乎所有的人，從捍衛人的尊嚴出發，同聲向北京這個反人類的政府發出聲討和譴責，要求中共當局立即停止這場滅絕人性的屠殺。

那天晚上，收音機響著外台的新聞報導。我含著眼淚走出了那漆黑的小屋。

這一夜，我目睹著這座小城發生的一切——灰朦朦的夜空下，街上的人流如潮，沿著大街，頭戴白花搖著白色布帶的學生們，向區政府結集，吶喊聲滾動在夜空，今天他們已經一反往日安靜有序的狀態，隊伍裡嚎啕的哭喊聲此起彼伏，眼眶裡沁著帶血的淚吶喊著：

「劊子手放下屠刀！」「絞死鎮壓學生的劊子手！」「以血還血！」

他們向小城的百姓喊道：「憑什麼要殺我們的兄弟姐妹？」「今天北京學生的噩運將降臨在我們頭上！我們正等待著明天，我們將被驅出校門，被押著去邊塞充軍，因為中共早已證明凡被定性為「反革命」和「動亂」的，那麼已同這個政府結下了不共戴天大仇！我們今天除了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別無他路！」

聽著這些發自肺腑的悲壯的心聲，有良知的中國人怎不垂淚？！

我站在十字街頭，看著一隊學生，為首的頭纏白巾，身穿白服，腰繫黑帶，拿著高音喇叭，向圍觀的市民讀著BBC發出的最新報導，他的聲音已經嘶啞，他的眼睛已經紅腫，一遍又一遍地向圍觀如潮水般的百姓喊著，彷彿此刻他帶領著人們置身在天安門前，歷史正在苦難中邁過這血腥的一天！！

遊行向北碇的父老鄉親們喊道！「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啊！堅持專制的中共當權者，已把我們帶進了一個縱容貪官污吏的絕境，現在又舉起屠刀，你們可要看清！國人啊！同胞啊！趕快醒來，站著死也不要跪著求生呀」！！

觸景生情，我的腦海卻檢索著三十年前的親身經歷：——

三十一年前也像在這十字街頭，燈光拖著我跌跌撞撞的身影，由長變短，又由短變長。周圍是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大字報和標語，校園裡到處是批鬥會的喧囂，年僅二十歲的我，一個在「紅色校園」裡長大，既無涉世經驗，更不懂政治為何物的「孩子」，卻被同班同學圍在教室裡揪鬥。

先前的羞辱感以及對生活追求的熱情，已完全被恐怖和疲勞取代。

「為什麼會這樣？」潛意識發出了反抗信號，卻被四天四夜連續批鬥消融得乾乾淨淨。我朦朧的認識到我之所以被戴上右派帽子，哪裡是因為家庭出身？我單純到向這個「黨」去解釋，我與家庭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關係，卻沒有動腦筋問：「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兩位從事教育的人，他們對社會犯了什麼罪？」

在我還沒有來得及理解和消化這些莫名其妙罪名時，那些年齡與我相同的同班同學，卻向我投射輕蔑的眼光，狂喊著：「休想蒙混過關」。

在極度需要睡眠的條件下，曹英這個惡棍要我交代待永遠無法說清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動機！」要我戴上國民黨遺少，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的帽子，承認為資本主義復辟充當幫兇，夢想從中共手中奪取「失去的天堂」！

那時我只有哭，我怕！我怕將我從此趕出大學求學的課堂；我怕，我不敢想像我會從此落入囚犯的行列；我只好乞求！我乞求共產黨的饒恕，在我的腦海裡除了設想這是一場可怕的「誤會」外，我是無法解釋並面對這一切的！

然而，當我匍匐著向它乞求時，我聽到魔鬼奸詐的獠笑聲，「要你充當殺一儆百的犧牲品哪，懂嗎？！」

我被送到荒野的深山和農村去參加人民公社「大兵團」作戰的勞役，去體會大煉鋼鐵的苦役，去領受飢餓奴役。

這時候我的一位「老師」才告訴我什麼叫玩弄政治權術，並且幫助我悟出了「階級鬥爭」的真正「用意！」我才開始明白，已經被毛澤東推入社會最底層的我，原是專制狼爪下的一隻小小綿羊。這裡面既沒有「誤會」更不需要「解釋」，我漸漸看清楚這毛澤東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一心為當皇帝挑逗百姓自相殘害以取樂的魔鬼。

殘酷的煉獄使我們的幻想終於破滅，經過二十多年漫長的時間，我懂得我們青年時代，被暴政剝奪了求知的追求，尤其使我明白，我必須面對掉進地獄的現實，拋掉麻醉自己的幻覺，最後認識到在獨裁統治下，讀書是沒有前途的。

學者教授縱有滿腹經綸，不照樣同我們一樣，戴上右派的帽子忍受著飢寒交迫，在皮鞭下，歪歪倒倒的在水田裡種試驗田；去深山野穀中挖鐵礦，肩挑背磨從山裡運出來；在山林裡充當扛坑木的苦力；在煙塵瀰漫的土高

爐中呼吸有毒的空氣煉成一堆一堆廢鐵！！

到了這個時候我才猛然清醒，我們「接受改造」的過程是一場冤獄裡的煉獄，我們的同難成批成批餓死累死在荒心野嶺中。當魔鬼將我們這些清白無暇的學生推到煉獄之中，就成了我們覺悟的開端，所以苦難拯救了我的靈魂！！

今天，中共的後繼者仍在回避它的過去！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要我們忘掉過去的歷史？

而我們能做的就是三十年來所見中共所作所為，剝開畫皮，讓所有的國民都明白，他們怎樣製造飢餓，還要逼著快餓死的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們又怎樣製造武鬥，讓無知到學生們相互拼殺；他們又怎樣讓孩子們為了「統帥」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去死，到死時自己腹中空空，衣不蔽體。

今天，專制主義舊病復發了！中共的獨裁再次向和平人民舉起屠刀！！

### （五）歷史會記住這天

忽然，我的眼睛一亮，就在中山路的十字路口，在那幢最高的建築屋上，垂掛下一幅巨大的大字報，醒目的寫道：「我們是幾個老共產黨員，當初我們懷著對共產主義理想幼稚盲目的參加這個組織，我們幻想著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世界大同的美好願望。」

「想不到這個黨執政幾十年使我們飽賞了一切苦難，幾十年來我們盲目的執行著它的政策，結果一個國家反而被弄得經濟凋蔽，民不聊生，我們同老百姓一樣，嘗到它對國家建設的破壞和對文化毀滅」。

「到了今天貪污成風，民怨沸騰。當我們看到它血腥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時，我們的心顫抖了，今天我們深深為作這樣政黨的一員而感到羞恥，所以我們今天向全體市民公開宣佈，我們集體的退出這個政黨。」

落款的地方寫明，北碚郵政局的幾名工作人員，並簽上了他們的名字。

看來中共是該回到被告位子上，接受全民審判的時候了！！

記得羅曼羅蘭的名言：「人的特點就在於能夠追求真理，發現真理，熱愛真理，為真理而犧牲自己。」這張大字報表達了當年幾個投身革命的青年如何迷信共產黨的宣傳而加入這個組織，但是事實無情的糾正他們初衷的盲從，而毅然的宣告退出這個政黨。

差不多與此同時，有一天我同李倫去重慶單獨出差的機會，討論到六四運動，他的表情十分沮喪，嘆息道：「在我的一生中，參加中國共產黨恐怕要算是一個最大的錯誤。」

中共黨員對中共領導倒行逆施的這種認識，代表這個黨的基本群眾的共同認識。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靠著邪教，欺騙而奪得江山的共產黨現正從強大走向滅亡。

老天保佑我，能親眼看到它衰亡的過程，滅亡的結局看來是天天臨近了。

如果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皮天明等等，當年為反對毛澤東專制而殉難的烈士們在天有靈，他們會對此而感到欣慰含笑九泉的。

如果他們有興趣，不妨在這個夜晚，附在普通的三口之家的窗下聽他們與電視機是怎麼對話的——

電視機：「學生們阻攔交通。」妻子立即反問道，「靜坐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學生怎麼會到馬路上去阻攔交通，這真是太離譜了。」

電視機：「學生們的行動妨礙了國民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丈夫接口道：「靜坐在廣場上的學生們招惹誰了，他們又不是到工廠礦山去鬧事，這個罪名簡直『莫須有』。」

電視機繼續說道，「暴徒們圍攻民警，製造了一個又一個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女主人回答：「這就更奇怪了，赤手空拳的學生怎麼會對拿槍桿子的士兵動手，這不是找死嗎？」

男主人接口道，「軍隊向和平的示威者開火，殺人太多了，激起了民憤，才有市民的自衛行動，不然學生們就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對解放軍動手腳的呀。」

這時候，小女兒從裡屋裡探出頭來，報告說：「爸、媽BBC台最新消息，聯合國正通過要制裁中國的決議。我在學校裡學不下去了，大家都說書沒法讀，這個昏庸腐敗的政府那天垮了，我才回校讀書去。」

電視機裡還在喋喋不休地報導「平定」天安門事件的真相：

「一部份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入警戒目標的過程中，極少數人製造謠言，煽動一些人設置路障，阻礙軍車，搶奪軍用物資，焚毀軍車，殺害解放軍戰士，他們還打算第二天，（即六月四日）造成更大的暴亂事態，企圖一舉推翻政府，奪取政權……在這個緊要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命令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熄反革命叛亂……在戒嚴部隊進入市區的過程中，一夥暴徒大搞打砸搶，搶走槍支彈藥、殺害、綁架解放軍戰士和公安幹警，部隊不得不實行必要的武裝自衛，嚴懲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全部完成，六月五日清晨戒嚴部隊全部到位，反革命暴亂被一舉粉碎。」

這就是中共的喉舌報導的天安門流血的全過程，然而中共當局忘掉了高懸在中天的天地良知，忘掉了地球衛星已拍下了整個事態的全部過程，並將這些真實的錄影公佈於全世界，如實地報導了震驚中外的六四慘案！

按中共的說法，手無寸鐵的，已被絕食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學生，忽然變成全副武裝，青面獠牙的魔鬼，也不知從那裡爆發出的巨大魔力，焚軍車、搶槍戒、殺士兵。按照這個說法駕著坦克的軍隊，「不得不」實行自衛，「不得不」嚴懲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可惜，今天的科學技術對資訊的傳播能力已不像二十年前那樣，可以任由毛澤東封鎖和竄改歷史了。

「有消息說，北京發生的焚燒軍車的事是軍人自己幹的。」如果確實如此，中共今天也墮落像當年日本野獸進佔滬溝橋的故伎從演。還有消息說，北京「六四」事件之前，執行戒嚴任務的軍隊接到上峰密令，「對一切阻攔者，格殺勿論」，這是可以從執行屠殺任務的軍人那肆無忌憚的瘋狂證實的。

如果沒有上面的密令，加上封官許願的刺激，面對同胞，軍隊也難以發揮出如此瘋狂的獸性。

人類有時簡直比動物兇殘百倍，因為他們有掩蓋罪惡的能力，而動物卻沒有。人在傷失理智時，比猛獸更可怕，他們可以無緣無故地殺害自己的同胞。！中國人的悲哀，大致出自一群傷失人性的「革命家」！

我想旦丁的神曲裡，地獄的第十圈外應當增加第十一圈，那一圈就是為假革命者和獨裁者準備的，他們死後所遭到的報應，應比所有的惡鬼酷吏更嚴。

我前面講的故事，還沒有收場。當電視機播完了這一段以後，那男主人再也按捺不住，走到電視機前忿忿地關上電鈕，對著那黑黑的螢幕大聲喊道：「誰還不知道你們這一套賊喊捉賊的假新聞，今天明擺著你們出動的是坦克，機槍來鎮壓無辜的學生，怎麼顛過來反說學生在殺你們的人，中國的百姓真被你們一直在當傻瓜耍啊。」

陳力，張錫錕，劉順森們，你們聽見了麼？你們今天在天堂，為天安門城下浩大的學生和市民奮起的隊伍而興奮嗎？

算起來陳力犧牲了十九年了，張錫錕也犧牲了十四年了，當年只有你們喊出的聲音，今天已成為普通百姓的共識了！！今天老百姓那一個不唾罵這個兇殘貪婪的統治集團？善良老實的中國民眾已從中共的欺騙中清醒過來。

我相信，我會親眼目睹，這個實行專制失去民心的黨走向滅亡的那一天。那一天我一定備酒到鹽源的山崗上與你們一道共慶。

當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一再以與會國聯合的形式，向中共政府提出抗議，要求立即停止這種暴行。國際金融組織一再對中國政府的這種暴行實行制裁。在全世界人民的強大聲討聲中，中共當局竟然無恥的公佈如下「六四」傷亡記錄；

「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武警戰士公安幹警共6000人受傷，數十人死亡……暴亂中有3000多名非軍事人員受傷，200多名死亡，其中包括36名大學生，……在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同時，上海、廣州、武漢、成都貴陽，哈爾濱，蘭州等一些大城市接連發生暴徒衝擊執法機關，殘害無辜等嚴重事件……。」一貫黑白顛到，中共真面目百姓看清了嗎？

為了歪曲六四真相，他們在以後的時間裡在報紙上、電臺、電視，連篇累牘的刊載暴徒襲擊民警的暴行。由中共舉行「為六四事件犧牲的英烈記功表彰大會」這些矇騙國人的手段，令人肉麻。

可是這一次不可比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這次無論在參與者的廣大，市民覺悟的程度都大大的與毛澤東當年不同了。

這一次，普通百姓家裡家家都在抨擊當局的無恥顛倒！北京死亡的學生豈止36名。

僅北師大教授丁子霖女士，在當局極端封鎖下，徒步走訪登記六月三日晚，有姓有名的死難學生就是155名，另有65名傷殘者。這僅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僅北京一地死於這次中共暴行的不會低於數千人！

「六四」已永遠銘刻在中共的歷史上！

### 第三節：「六四」以後的那幾天……

七月初，我借出差重慶的機會，順便走訪了重慶大學同劃右派的老同學，想聽聽他們對『六四』的見解，順便也想瞭解重慶大學的學生在「六四」運動中的具體行動。

早上十點鐘，當我順著漢渝路重大的後校門支路，走到松林坡楊家銘家。剛剛跨進她家的門檻，她連忙關上門，屋裡門窗關閉，顯露出十分緊張的樣子，開口的第一句話竟向我問道：「你怎麼這麼大膽，這幾天是什麼時候，還敢東走西竄的？」我被弄得十分的驚奇，反問道：「我又沒做錯什麼事，何來畏懼？」

她凝視了我好幾分鐘，像是在試探我似的，用一種十分神秘而略帶恐怖的眼神望著我說：

「你在工廠還不知道嗎，這幾天學校水緊得很，全校正在大清查，凡是六四期間上了街參與遊行的人，都要由學校保衛處進行登記，算有了新的『歷史污點』。有的頭頭已被隔離反省，聽說正在甄別，有的要逮捕送監，有的遣返回原籍下鄉落戶，輕的也要開除學籍。」

好了，一股正義熱情湧動下反腐敗反官倒的人，現在卻要面臨銀鐐入獄的下場。學籍沒有了，前途渺茫，當年我們曾有過這種親身經歷的痛苦，而今卻要這些孩子們從蹈我們的足跡！

我望著面前這個三十年前同在南桐叢林溝與我共過患難，現今已白髮蒼蒼的老女人，一時不知該向她說什麼才好。

中共這一套用運動整人，制服學生運動的手段我已領教過了，從這位老同學的身上，使我深深感到歷史傷痕多麼深的刻在我們的身上。難道中國的命運就這麼長期操持在幾個寡頭手中嗎？如果大家都被紅色恐怖嚇成這樣，中國的民眾還有什麼希望？

我們相對的默默坐了兩分鐘，看得出她越來越不安，囁嚅著告訴我：「昨天黨支部書記還專門上我家來過問，最近有沒有人來找過你？」

時值七月盛暑，四周的門窗卻緊緊關閉，悶熱的空氣使我大汗順著臉頰淌下來，而心卻像冰凍一般，一陣陣戰慄。知道剛剛她的話已是逐客令，便立刻站起身來，告辭出門。

當我離開松林坡，朝著漢渝路往回走時，心裡說不出的懊惱。看來我完全不應該在這種時候跑到學校來，中共對付學校和學生的那一套，依然沒有變。今後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校園永遠不會是學生們安心攻讀的樂園。



舉目望公路兩旁的水泥電桿上，還殘留著六四那幾天學生貼出的標語殘跡，那激憤的人流彷彿還在眼前，耳中還響起那激昂悲壯的口號聲和歌聲……

專制！令人淚咒的中國獨裁，中華民族還要馭著你走多久？中華民族還要為這具僵屍付出多大的代價？中華民族的民主前途究竟還有多遠？今天我算是又上了一堂沉重的課。此時此刻，我的心情如當年在獄中一樣的沉重。

大約又過了一個月，我想去拜訪一下隔著一條龍鳳河，住在重慶儀表錶材料研究所的程貽舉，因為他當時已是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想來可以在他那裡採訪到在六四中，民主黨派發出的聲音，瞭解他本人的態度。

當我走進他的家門，也如楊家銘的家那樣，大熱天窗門緊閉，連窗簾都拉下了。他見到我時同樣面露恐懼的表情，決不比楊家銘更好，我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後，他告訴我說：

「北京這次全國八大民主黨派，都參與了聲援學生運動的遊行。現在已將這次運動定性為動亂，八大民主黨派看來又一次在重大政治關頭『站錯』了隊。一如當年反右派運動一樣，現在只有聽憑（中共）黨中央『發落』了，我們都等候著中央的處份！」

說罷臉現陰沈，很失落的樣子。看到他的面容，腦子裡浮現了一個平時一貫在中共鞍前馬後，待候主人的奴婢像！

既然他不敢直言說「六四」孰是孰非，卻在小心翼翼地等著開庭審案，未免替他感到汗顏。也罷，就是中國民主黨派的天牌人物，還不是一付唯唯諾諾的相，除了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的日子，以「幫閒者」的身分份出現，坐在主席臺上，貌似木雕，平時是不敢輕言表態的。

看見他的禿傷樣子，我也找不到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只是重複的說，「大家上街和平請願，實在是對腐敗已經看不下去了，還不是為了中國好，希望政府知過而改。我們每個中國人在六四期間問心無愧，你也不用擔心。」

一場恐怖過去了，留在人們心坎上的又是一道深深的鞭痕，無論是自己燒自己的軍車嫁禍於無辜的學生和市民，還是軍人駕著坦克屠殺學生，罪魁禍首都是明白無疑的，罪魁的目的也是明白無疑的。只有目擊事件全過程的北京市民，都清楚記住這些軍人的番號。

北京市民因此在未來的歲月裡，長期將遺恨放在四川人身上。

兩年後，我因公出差北京，有一次我的同事操著四川口音向一位北京市民問路，這位北京老鄉向他直翻白眼，眼裡透出極其鄙視的神色，白了他一眼，什麼也沒回答他便走開了，口裡帶著鄙夷的口氣罵道，「四川豬！」

看到這種情景，為了防止在北京遇到更大的麻煩，我只好決定，在北京期間任何人上街都不要同當地人說話，凡事都由我操東北口音向當地的老百姓詢問。人民之間竟因六四如此隔閡！

其實慘死在「六四」中的，無論是學生工人和居民，甚至是軍人過後都應當清楚，他們都是專制和腐敗的中共政權的犧牲品。

在這些犧牲者中唯有投入靜坐絕食，要求中共當權懲治官倒，懲辦貪官，放棄特權，放棄獨裁實行真正民主的善良學生們，才是這次運動的主角和英雄。可惜他們沒有組織起一支足以摧毀中國專制政權的大軍。

在六四中以屠殺學生而暫時占上風的中共獨裁勢力，效發他們的老祖宗毛澤東，不顧全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開始了又一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趙紫陽被軟禁；接著在全國範圍內，尤其是大專院校，開始了搜捕參加六四愛國運動的領袖和中堅人物，大搞人人過關，層層清理。

北京市把在六四中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陳希同推上了北京市長的寶坐，由他負責對六四民主運動的發起人狠下毒手。

當時由北京軍管會發出通緝令，通緝著名的民主運動領袖嚴家齊，萬潤南，陳一諮，以及學生運動的主要發起人方勵之，李淑嫻，追捕學生運動的著名領袖吾努爾開希，王丹等一大批精英。

當時落入軍警特務魔爪的人，數以萬計，一場真正的白色恐怖籠罩了各大專院校。對六四參與的學生登記，並受到處份，情節嚴重的與以逮捕勞教。

三十年來無論是我們這些不更事的少年，還是老教授們糊裡糊塗的被劃為胡風份子還是右派，糊裡湖塗的「認錯」，後來又將這些糊裡糊塗的人，押到邊荒農村糊裡糊塗的流放，像牲口一樣的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鞭打，殘酷的折磨使他們大多數人死在流放地的深山峽谷中……

三十年後的今天，北京的學生走上街頭招喚民心，同全副武裝的軍警搏鬥，在兩個月中把中共的內部矛盾，和危機四伏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無餘。

尤其是在強大民心的催化下，中共政權一度汲汲可危，而它的內部也在這種民主潮流中分化互解，彈指一揮三十年，這又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每一個人都看到中國，絕決不是中國獨裁勢力能所欲為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23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會議題目便是「公審」趙紫陽。李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中說；「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

趙紫陽是鄧小平一手推到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僅僅幾個月又把他打翻在地，這既說明共產黨在失去民心的作用下已亂了陣腳。鄧小平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氣勢洶洶以叛徒罪名將趙紫陽「永遠開除出黨」。更沒像史達林對付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處以絞殺。

鄧小平看到史達林，毛澤東眾叛親離的晚年，他想逃避焚屍揚灰的厄運。他的內心又是何等虛弱。

李鵬在這個報告中不是公開承認，當時中共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上麼？實際上獨裁的中共，不得不在專制和民主的較亮中，修改一黨獨裁的臉譜。

如果趙紫陽能與鄧小平相抗衡，實際上反映了共產黨已經到了沒有主義的時候。所以六四事件雖然又犧牲了許多為民主而戰鬥的年輕人，中共也不得不答應，嚴懲貪官污吏，放寬黨禁。讓各民主黨派稍稍有一點生存的餘地，敢於在某些問題上行使監督的權力。

當然，鄧小平自己便是毛澤東的叛逆，他知道趙紫陽所做的僅僅是對學生運動的同情，趙所主張的，不過是政治體制向民主方向再邁進一步。對於學生運動殘酷鎮壓的決定，也讓鄧小平足足猶疑了兩個月，畢竟國內日漸猖獗的腐敗是他的一塊心病。

所以，在六四學潮的推動下，六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還通過了，「堅決」把懲治腐敗作為頭等大事，特別要注意抓好的決定。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以反貪污，反賄賂為主要內容的運動，便掀開了帷幕，八月十五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關於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份子必須在限期內自首坦白的公告》規定，貪污份子必須在十月31日前向政府自首坦白，八月19日監察部發佈《關於有貪污受賄行為的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在限期內主動交待問題的通告》，說明中共中樞機關不敢對六四事件無動於衷。

他們明白，逐漸腐敗的政府正坐在失去民心的火山口上，再不整治將會使整個統治大廈崩塌，但是它卻不想用人民的力量，自下而上的開刀這個腫瘤，而是採取了一個內部的行政命令辦法來處理它。

這就正好對爛瘡自己下刀，爛瘡是永遠割不掉的。事實證明中共這些年來貪污之風越來越嚴重，貪污腐敗與專制政權結下了不解之緣，仗著不受約束權力的掌權者，對另一批同樣掌著權力得到賄賂的人實行整肅貪污，能治得了誰？

事實上，對六四的鎮壓，客觀上放縱了中共各級貪污的膽子。從九三年開始全國紀監機關自己公佈的數字，貪污賄賂案件以每年9%的速度遞升，而受到黨紀政紀處份的官員，又以12%的速度遞增。從中共檢查機關1990年至1998年共受理各種腐敗案件達110萬件，立案五十餘萬件，涉案人員達六十餘萬。

後來為了專制，中共的獨裁頭子江澤民喊道，「對腐敗現象如果不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而任其發展，就會葬送改革開放大業，最終也要失去黨的執政地位。」他的擔憂是必然的，但他的驚呼絲毫沒有阻止中共腐敗的大勢。

到了跨進二十一世紀，據中共自己所公佈的資料，新華社2004年公佈，1月——十一月查處的貪污賄賂以及各種瀆職侵權的案件3650件，涉案人數42225人，比2003年增加了五倍。足以說明中共的腐敗已病入膏肓，整個的國家行政管理可以說是無官不貪，甚至於還出現了所謂59歲效應，官吏在退休以前都要大撈一把的事，成為國家機關腐敗的公開現象。

89年八月十五日國家審計局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公佈了對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光大公司，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等全國最大的幾家公司的審計，對這些公司的內幕沒有公開。但據傳它們與中共天字第一號掛勾，並由太子黨的實權派所操縱，並以這些中共的實權派為後盾則是明白無疑的。

這些公司，從事私自買賣外匯，倒賣國家緊俏商品和走私偷稅漏稅數額之大要以億來計算，由於劣跡昭著加上統治集團的內訌，五家公司被責令追交了五千萬稅金了事，實際上這些公司都是當權者私人資本的基地，以後發展成了中國最大的金融集團，以分贓並保持著相對平衡而相安無事。

五月19日監察部發佈限定全國的貪污份子，規定在十月31日的最後期限主動交代待問題的通知，本身說明中共的大小官吏無法無天，全無顧忌，若不是六四的推動，監察部也不會向全國大大小小貪污份子發通牒了。

現今限期已到，檢查機關隨後公佈戰果，在這一階段受理投案的人達到三萬多人，中共自己十分明白這個人數只是事情敗露，沒有必要再隱瞞下去的小魚小蝦，真正的蛟龍還藏在深水處，永遠都不會觸動他們。

當時社會流行著，「大鬼坐衙門，小鬼跪階下，三堂審貪官，只給外人看」這樣做做樣子勢必還要使中共更進一步腐化。到了2004殺了一個廣西大員成克傑又怎樣？不在制度上下功夫，中共的滅亡是遲早的事。

設計師因在國人中名聲太臭，不得不引咎退出政壇，轉到幕後當起太上皇來，十一月9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作出同意他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算是對六四運動的引咎自責，無論怎麼說，他交出了軍權。從此個人專制主義的標誌，行政長官終身任職的權力，在全國人民民主運動的推動下取消了。

但是中共一黨專制仍頑固地保持下來，在國內外強大輿論的震懾下，統治集團重新改組，一方面清理趙紫陽這樣的政治異己，另一方面為緩和國內矛盾，在肅貪、扶貧、禁毒、平抑物價、綜合治理社會治安，等方面作出一些收攬人心的動作。

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次年，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決定，從1993年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進行體制改革，毛澤東最後一點僵死的國有模式終被衝破。

然而頑固的中共獨裁勢力並不會因此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在血腥鎮壓六四後，將六四領袖人物驅出海外，想以此消除他們在國內的影響。

流亡在外的民運精英們，紛紛組織民主政黨繼承發揚六四革命播下的種子，繼續同中共的獨裁勢力作鬥爭。

1990年1月，北京解除戒嚴令，並對王丹等人進行審理，儘管這是違背民意和憲法的，但比之當年毛澤東對政治犯的趕盡殺絕，殊及無辜，無中生有等等暴行就緩和多了。

同年六月28日一直在美國大使館請求政治避難的政治犯方毅之，李淑賢夫婦得到准許讓他們赴美「治療」，使他們得以流亡海外。

令人感到驚心的是，鄧小平用坦克對付『六四』卻給毛澤東這個惡棍找到了腐屍還陽的藉口！一股專制腐敗勢力在民間蠢動，使毛澤東惡名得以抬頭，他們把政府貪污腐敗以及學生鬧事，歸結為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的結果，不但這魔頭當年所犯的累累罪行沒清算，還公開鼓吹：「只有毛澤東才會禁絕貪污腐敗」。

中共後極權時期為了防止老百姓打倒他們，對毛澤東時代強行灌輸的文化遺毒，根本不清算，只將露骨的文化獨裁收斂了起來。毛澤東『愚』錄，雖沒有再氾濫，『欺』世歌「東方紅太陽升」，「大海航行靠舵手」卻沒

有列為禁歌。

尤其對幾千萬的飢民被餓死，人民一貧如洗，人民之間尤如野獸般的相互殘殺，知識份子運動中大量被虐殺，流放，人性已普遍為獸性所替代，父子不相識，兄弟相殘等極其嚴重的罪惡，並沒有得到清算。

我原以為，毛澤東專制遭到否定後，在信仰危機中，應當出現一個對獨裁的批判時期。但事與願違，連我寫這個自傳時，仍處在擔驚受怕之中，並出現了「只有毛澤東才會像惡神一樣鎮住貪污、腐敗和煙毒娼妓」等等奇談怪論。由於歷史相去越來越遠，這種奇談怪論竟成為民間輿論就更令人深省了。

曾經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現過一點「傷痕文學」卻像小媳婦那樣嘔嘔哭泣了一陣，便很快銷消聲了，1981年由白樺編寫的『苦戀』，哪怕是哀訴獨裁對知識份子任意殘害的作品，都遭到黨閥們的口誅筆伐。

午臺上，千方百計掩蓋獨裁統治下殘酷鬥爭和冷酷的人際關係，表現那個年代竟是：「純真可愛，開誠佈公的人際關係。」我舉一個最露骨的電視片「真誠年代」，那是徹底歪曲了當時的社會關係！令人噁心。

今天，大陸上再有才華的作家提到毛澤東如骨梗喉，要末繼續寫『愚民作品』，要末寫些無聊的武俠豔聞，或家庭糾紛的低俗東西。

鄧小平一方面頑固堅持把毛澤東這個死人像，照樣懸掛於天安門城樓，以對付民主運動；另一方面大肆宣揚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這個時代中共政策的兩手，然而毛澤東的罪惡不得以清算，中國的獨裁不與揚棄，中國社會就始終難以進步，這一點也是六四失敗的原因。

人心背離促使中共進一步的分裂，『六四』後，中共中央的總書記趙紫陽，

於2005年1月十四日在北京含恨去世。六四以來拒絕中共要他承認六四期間所犯「路線錯誤」；拒絕承認學生在六四事件中使社會動盪的指控。

他以行動證明，中共在八九年的歷史關頭已不是一個意志統一的，目標明確的執政黨。並說明中共除了用軍隊和暴力來實現它的集權，別無他法！證明當前中共內部的腐敗正在醞釀著巨大的社會動盪。

而我們這些經歷了這幾十年中共暴虐的人們，看到中共這種內幕，要想社會長治久安，必須重新建立中國的政治制度，建立和經濟發展協調的民主社會。

最近在世界主流思潮推動下，許多知名的學者，不怕中共打壓，在○八憲章的簽名運動中，簽上自己的名字，這證明「民主」已逐漸成為大家追求的共同目標，堅持獨裁的中共頑固派睜開眼，不要等著被歷史唾棄那一天。

今天「六四」那一尊在自由村裡樹立起來的民主女神，像一輪朝陽，照醒了億萬昏睡的人們，接著又在悲壯的歌聲中緩緩離去。

『六四』之火雖被中共用血腥手段撲滅，但是放開眼看看世界，『六四』期間戈爾巴契夫造訪北京，學生運動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共產黨所建立的奴隸制，被撕下他們獐狎面具後，再也難於維持下去。

這一年東德人民在古城萊比錫發生大規模遊行示威，要求民主改革，十一月9日德共在國際新聞發佈會上宣佈放寬東德公民出入境制度，隨之東德人民擁上柏林街頭，自發用錘子榔頭電鋸敲打柏林牆，建於一九六一年經歷二十八年之久，一九八九年十一月10日，人民終於推倒了這堵155公里長，對東德人民禁錮與奴役的牆。牆倒之日東德人民歡聲雷動，喜迎德意志祖國統一。

葉利欽在蘇共中央成立民主綱領派，1990年九月民主綱領派退出共產黨，並在競選中當選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

早在六十年代，中蘇兩國互爭『領導權』的共產黨頭目，早已分道揚鑣，社會主義陣營早已解體。

1991年八月19日葉利欽當選為首屆俄羅斯總統。蘇聯成為歷史名辭。

中共可以在大陸這塊落後的封閉故土上，用暴力繼續維持他們的獨裁，然而，違背民心和民主潮流的反動能堅持走多遠？大陸築起的壩，終有倒塌的一天。

以後每年到六月四日這一天，不獨北京的獨裁執政者如臨大敵戒備森嚴，我們更透過當局的層層封鎖，聽到來自全世各個角落中國人謳歌六四的紀念歌聲，這歌聲帶給我們多少懷念和思考！。

#### 第四節：從遊行想到的

1999年五月九日凌晨零點，我被一陣口號聲從夢中驚醒，坐起身來，側耳傾聽。樓下的街道上人聲嘈雜，由手提麥克風傳出來的口號聲，和人群中有些節奏湊的吶喊，匯合在一起，雖然有些混雜，但仔細分辨仍聽得清楚。

其中頻率最高的呼喊聲分明是：「強烈抗議北約轟炸我駐南使館的野蠻行徑」而那有節奏湊的吶喊是：「中國，雄起，……中國，雄起」。口號和吶喊在剛剛入睡的小城上空匯集在一起，顯得非常的刺激。

我馬上想到昨夜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已播出：「五月七日晚，北約的三枚導彈襲擊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致使大使館被炸毀，三名駐南記者遇難，一名失蹤，二十名使館人員受傷」的消息。

同時還播出了中國政府所發表的嚴正聲明，稱：這一事件是北約蓄意對中國的挑釁……云云。在表達了憤怒和譴責後，提出「最強烈的抗議，並保留進一步採取行動的權力」。

與此同時，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處理這一事件的緊急會議。隨著，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和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相繼發表聲明，擁護政府維護主權尊嚴的嚴正立場。

此刻我已明白，北碚的兩大院校師生，現正走出校門組成遊行隊伍，表達他們的「愛國心聲」。

我連忙從床上翻身坐起，很快穿好衣服，走下樓來。只見一支大約幾百人的隊伍，經我們住的大樓前，向著天生橋方向前進。

從佇列後面向前看到最前面的幾排學生，用身體並排地裹著一付紅色的橫幅上，猜得出是抗議北約「暴行」，捍衛民族尊嚴的內容。

領頭學生兩旁及佇列周圍，稀稀拉拉跟著幾個手執麥克風的年輕人。口號聲正是從這裡發出，再由遊行人們合著節拍回應而成。

學生隊伍後面是一群住在附近的市民，他們進進出出人數不定，最後面跟著十餘兩出租計程車，大約是些專跑夜路的青年司機，跟著「看熱鬧」，也順便給中途從遊行佇列中退出，準備回家的人，提供一點交通方便的。

計程車佇列的後面，便是十幾名騎著摩托的武裝員警「斷後」，人聲喧譁嘩，似乎並沒有人專門去注意他們的「特殊使命」。

就這樣，這個由學生、市民、計程車和警車組成的隊伍，在狹長的街道上排了足有一百多米緩緩前進。在昏暗的街燈下，我認出他們是附近的工人和居民，商店的營業員、三輪車夫、小飯館裡的服務人員，以及還沒有找到工作的下崗工人們。

我插進他隊伍中，想聽聽生活在社會下層老百姓的議論。

自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學運以後，我已整整十年沒看到學生們組織的規模壯觀的遊行隊伍了。但眼前看到的這支隊伍，無論在規模和情緒上都無法與當年的『六四』相比。

平時他們聚在一起，多半都花在麻將桌上那點事。而今天，他們都以好奇的口氣，議論著從早到晚電視裡重複播送的消息，發著莫名其妙提問。

「克斯握是什麼國家，在那裡啊？」一位小飯館的中年女人，向她身旁的一位戴眼鏡的附近小學的教師發問道。

「北約在那裡？為什麼要轟炸中國，他們隔我們很近嗎？」一位工人打扮的人向他身旁的老者發問道：「我們在這裡幹吼幹鬧的，美國政府會理睬麼？」

儘管政府所掌握的媒體、報紙、電臺和電視天天都在宣傳報導在南斯拉夫發生的戰爭。但從周圍人們令人可笑的問題中知道，除了為數不多的人知道南斯拉夫的地理位置，以及在那裡發生的民族衝突和近期以來發生的戰爭。

這種漠不關心，正是中共長期愚民所造成的。

『六四』後在中共統治下，長輩們對年輕學生的擔心一直沒有消退。上年紀的人還用十年前看『六四』老眼光，認為學生上街，又不知為反那一個貪官？

至於那些新近下崗的失業者，他們被面臨的艱難生活弄得心力憔悴，所以一看到遊行隊伍馬上就敏感到，又不知是那裡生活不下去的失業工人，被迫起來向政府請願；或者就是那條街的拆遷戶，因為所住的陋室被房屋建築公司老闆強行拆遷流落街頭時，被迫起來向政府吶喊請願。

居民們在遊行隊伍中相聚，各聊各的家常，干涉那些剛從床上被鬧醒，跑上街看熱鬧的自家孩子，且聽他們的對話：

「你們廠的下崗生活費定了麼？」；

「孫二娘的下崗飯館昨天才開張，張嫂的擦皮鞋攤證是昨天向段上去要的，擦皮鞋還不錯，一天也掙個十來塊錢，相當於吃低保了。」

「這該死的江澤民把我們工人是整慘了，今天可不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了，工人們都下崗討飯。」

「娃兒要讀書，學費書費往那裡去湊錢，生活這麼貴，低保費就只有百十元怎麼活呀？我們家的小三，小學畢業就只有上街賣報紙了。」；

「去當棒棒吧，可是那有那麼多請棒棒的？」；

「李二嫂就只好去幹那事，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她，在黃昏時候去守電桿」；

「拾破爛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們家的小子也幹那事，每天滿街頭揀爛紙，一天下來只能揀兩塊錢的東西。」；

「昨天西師的員工宿舍又發生了殺人的事件，員警出動時殺人犯早已逃之夭夭了」；

「這社會亂了套，晚上我就關照我們那口子，不要上街，謹防半夜三更撞上鬼」；

「封三哥兩個娃兒都沾上了毒癮，你們的小二要小心，他常常與封三哥鬼混，那天說不準撞鬼，怎麼死在下水道裡還不知道」；

「前天開到壁山去的公共汽車，又發生公開的搶案，那趟車上，余二哥被殺成了重傷！」

「你們知不知道天生街段自殺的那兩口子，失業幾年了，女的又有病拖著兩個娃兒，段上的人去處理，那住的地方比狗窩不如，屋裡沒有一樣像樣的家俱，兩張破床上沒有一床好鋪蓋……可憐丟下兩個娃兒，唉！」

我身後的兩個年輕人卻另有高論，一個說：

「這世道太不公平了，窮的窮富的富」。說著他指了指身後不遠跟著的摩托民警唱道：「一等公民稱公僕；二等公民叫大款；三等公民算倒爺；四等公民大蓋帽；五等公民公務員；我們呀是新生的無產階級」。

另一個接著說：「誰叫我老漢是窮工人。原先說地主、資本家騎在他的頭上，現在啊，五等公民騎在我的頭上了。」

忽然隊伍中不知是誰爆出一聲：「江澤民雄起」的喊聲，隊伍中原先有節奏湊的「中國雄起」喊聲中，在人們的笑浪聲中掀起軒然大波。於是「中國雄起」的口號聲變成了「江澤民雄起的」吶喊。

一種對當局的無奈，點燃了這支隊伍的後半段，而跟在遊行隊伍後面乘坐摩托的刑警們，若無其事的任佇列中怎麼喊，只要不喊打倒共產黨，打倒江澤民的口號，誰又願意去干預那些分明有怨恨情緒，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人？

此時我隨著遊行佇列走到了隔西師大門不遠的上坡馬路段。原先在月亮田參入遊行的人紛紛走出佇列，在馬路兩旁的人行道上漸漸散去，但「江澤民雄起」的笑浪聲，卻並不因此而減退。

好在這年頭不像毛賊東年代，動不動用暴力對付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現在老百姓在私下可以不避『皇上』忌諱，說些不為當局喜歡的話，那也僅限於『私下』，這種有限的牢騷話正反映了民心失去，中共已處末代。

國民政府時期，組織民眾遊行示威以反對政府，是中共欺騙民眾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共建政後，依然用民眾遊行作欺騙民眾的重要手段。此刻，處在遊行佇列中，六十年前的往事不斷在我腦子裡湧現：

記得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個晚上，夜空中突然飛起了幾道耀眼的照明彈，接著位於嘉陵江邊解放台，傳來了隆隆的禮炮聲，不一會安在自來水塔附近的高音廣播喇叭，傳出一個宣佈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當夜地處北碚附近幾所學校和機關就在老新華書店，舉著火把在川東行署官員指揮下舉行了這座小城的第一次環城遊行。以後每年『五一』和『十一』都要在解放台舉行遊行慶典，

建政初期那三年，都會在這裡舉行殺人的『公判大會』，每次要求學校組織參加，使每個參會的學生領會那種『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的慘景，這便是中共特有的『洗腦』方式，那時紅色恐怖籠罩著大陸。

1953年以後，這種遊行慶典成了『制度』，開會那天九點鐘，所有該到會的單位到齊後，主持會議的人宣佈大會開始，全場起立唱國歌，按慣例三部曲一完，到會者原地坐下。

各「領導」在主席臺前相繼講話，內容都千篇一律的口水話。但對於盤腿而坐的我們，則是最難熬的兩小時，直挺上身正襟危坐，就是練了幾天禪功的人，也要逼出一身大汗，每次遊行前又要舉行貫常閱兵典禮。

一九五五年，我考入重慶大學後，這種每年兩次由官方組織的遊行，在重慶市中區解放碑舉行。前去參加的單位是指定的大專院校和機關，人數也有規定。

參加單位準備了象徵性的大彩車，那是按照組織者的意圖，製成的鋼鐵廠、發電站或農莊的模型，車上盛裝的彩男彩女，在遊行時，揮動花束向周圍的圍觀者致意。

遊行佇列中最打眼的是由重慶軍事院校組成的佇列，他們在列隊通過解放碑的檢閱台時，禮炮齊鳴，坦克和軍車隆隆開過，步兵方陣整齊的邁著閱兵式規定的步伐，接受重慶部隊長官檢閱。

佇列中舉著：「隨時準備粉碎來犯者」的巨幅橫幅，其勢殺氣貫足。現在回憶，這樣的遊行示威完全為了鎮懾老百姓，同時也是做給民主世界看的，此乃毛賊東全民洗腦的重要手段！這種慶典，也不知耗費了多少人力財力。

可憐的大陸百姓在這種長期折騰中怎麼不窮！除了嚇唬老百姓外，起得了什麼作用啊？

一九五八年五月末，我已成了被監督勞動的右派，在指定管理教師的監督下，參加了校園裡的遊行。

反右剛告一段落，校園裡的「陽謀」暫時收場，二十多名下放幹部在一片喝彩聲中，被校方戴上「光榮下放」的大紅花，簇擁著登上披紅戴綠的彩車，遊行隊伍鑼鼓齊鳴，繞校一周以示告別。

吃過午飯後，我們這七十多名已被認定為第一類極右派，打好了自己的背包，連人帶包的塞進了幾輛卡車中。在幹放幹部乘坐的包車押解下，離開了學校，向南桐馳去。我就這樣結束了我十五年的學生生活，並從此告別了校園。

這一去成了我人生的轉捩點，慘痛的遭遇，過早地結束了我的幼稚期。

我在蒙懂中開始了我長達二十多年的煉獄，監獄的『年輪』在我身上刻了整整二十圈。

當我從死難者身邊走過，我暗暗發誓，我不能死，爬也要爬出這地獄，把我所親身的經歷寫成書，永遠留給後來的中國人！！

中共自吹自擂，把這種非人的折磨，說成是無產階級對反動派最人道的改造，說只有那樣，才能脫胎換骨，改造剝削階級的世界觀。

經歷這種『改造』後我才明白，無產階級專政是怎麼一回事。

至今這種法西斯專政並未向公民公開揭露，施暴者沒有向受害人道歉，那些遍佈全國的集中營（勞改農場和監獄）並未撤除，裡面還關著異議人士，甚至反抗中共壓迫的老百姓（例如法輪功信徒），繼續進行見不得人的殘害。

像眼下南斯拉夫使館被北約導彈轟擊，發生中國駐外使團人員的傷亡，在真相不明朗時，煽起學生毀壞外國駐華辦事機構，舉行遊行示威，又是多麼危險的玩火行為。

反過來說，一支為聲援政府抗擊外侮的遊行隊伍，卻要用員警騎著摩托車跟在後面，豈不是對遊行者的莫大諷刺？由此可以看到中共統治者與老百姓存在的距離有多麼遠？當然這種對立，中共又要千方百計掩蓋了。

其實在民主社會裡，發生歹徒危害社會時，絕決不會大驚小怪，因為人民會起來制止少數人的為非作歹。如果人民真到了對危害自身的行為熟視無睹，那麼這個國家用什麼來抗卸外侮？

### 第九章：在中共摧殘下我的家解體了

母親幾天來經常感到氣緊心悸，加上夜尿頻多，想去醫院檢查一下，這天，打定主意到距我們住地二百米的九院分院去。

看看壁上的掛鐘，正好是十點半，於是我馬上向醫院內科室掛了一個電話，詢問陳開第醫生今天是否值班。這年頭的大陸上，什麼都要講「熟人」，尤其是看病，非熟人莫去就診，成了醫道的行風。

電話中回答陳醫生正在查看病房。

我自己因為要弄中午飯，便請臨時請來專門為母親做清潔的鐘點工小周，陪伴母親去那裡就診，關照她，母親已八十四歲高齡，雖然表面看，她身板還硬朗，但由於遭到長期折磨，加上年事已高，每晚我陪她出外散步一個小時，總是我牽著她走，生怕在不經意中跌倒，造成意外。

沒料到母親走後才十幾分鐘，電話鈴響了，小周打來電話，說她們剛到醫院，母親就在門檻上跌了一跤，現在正在陳醫生辦公室裡，要我馬上來一趟。我最擔心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

我急忙丟下廚房裡備好的小菜，向醫院走去。在陳醫生的辦公室裡，我看到她坐在椅子上痛苦地呻吟著。

陳醫生告訴我，暫時無法判斷母親跌傷了那裡，從她痛苦的表情看，她的右手和右腳都摔得不輕！小周把我帶到醫院的進門處，那是一扇雙開的活頁門，小周指著進門的門檻上一道高五公分的階梯說：「媽媽在進門時就是踢著那階梯跌倒的，等我慌忙去扶她時已經晚了。」

我看了看那階梯，內外沒有色差，沒有警示標誌，加上這一天天氣本來就陰暗，老年人在這裡被絆倒是非常容易的。

回到陳醫生的辦公室和他商量怎麼處置母親？他說：「暫時因為沒有設備可以確定母親受傷的部位和嚴重程度，現在已到下班時間，我建議你下午一定要到照光室去照個片。」

#### 第一節：致命的跌跤

這真是飛來橫禍，母親的身體沒有檢查先就把手腳跌傷了。無奈，只好同陳醫生一起把她扶回家，等下午上班時再說。



那幾天，正好劉啟建辦了退休手續，為了償還自己平時拖欠的債務，她到南充她妹妹那兒聯繫找一個臨時打工的工作，所以去南充了。我回到家裡趕緊給她打了一個電話，把母親跌傷的消息告訴她，要她立即返回北碚。

一面忙著弄好中午飯，等孩子回家吃午飯下午好按時上學。匆匆忙忙打發了孩子，給母親弄了一點稀飯，看她睡在床上呻吟不已，弄的稀飯只吃了一口。因為還不知傷勢如何，按照陳醫生的吩咐，下午就雇了一輛長安車在我的一個學生幫助下，把母親送到中醫院去檢查。

照片的結果，證明母親已跌成了右腿股骨頸和右手手腕兩處骨折。等到我忙著為她辦完了住院手續，住進了骨科普通病房，已是晚上九點鐘了。忙了一天，把母親住進病房後，實在疲倦已極，就在病房裡暫時請了一個扶持病人的臨時工，請她在晚上照應一下母親。

晚上十二點鐘，我才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家裡。聽醫生說，八十多歲的老人凡跌成股骨頸骨折的，十有八九都有生命危險。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叫醒了孩子讓他喝了牛奶，督促他上學，這孩子好像突然變得懂事多了，說中午放學後要到中醫院來，叫我不必為他準備中午飯，就在學校食堂隨便買點麵食過一頓吧。

我到醫院時，還沒有跨進病房，就聽見了母親的呻吟，說她受不了牽引。病房裡的病員們都說昨晚她幾乎是喊了一晚上。我忙去病護室，找到值班醫生，詢問能否取掉牽引？醫生說，根據片子上的情況如果去掉牽引，那麼她就是出院了，也只好永遠躺在床上，不能起立了。

我又忙回家，找到她的病歷，匆匆趕回醫院，把病歷交給醫生，向他們說明她患有較嚴重的冠心病和肺心病，加上年歲已大，受不了牽引的劇痛，建議他們取消對她的牽引手術，至於今後怎樣，就只好到時候想辦法護理她了。

牽引取消後，她仍呻吟不止，直到打了一針鎮定劑，她才昏昏入睡。

中午放學後孩子來了，我輕聲告訴孩子說祖母剛剛睡去，要他不要驚動她，

問他吃過飯沒有，他點了點頭。

我囑咐他婆婆跌傷了，他自己也要考試了，不要再像往常那樣上網貪玩了。下午按時回家，自己熱飯吃後完成當天老師佈置的作業，儘快上床睡覺。

直到母親跌傷後的第三天上午，劉啟建才從南充乘車回到北碚。

我們商量後，白天由我們輪流守著母親，晚上暫時請了一個臨時護理。

受傷第六天，母親叫我備上紙筆，要我給她寫下遺言，說，她感到不久將辭別人世，她死後骨灰灑在嘉陵江中。因為她從二十二歲開始就到重慶嘉陵江畔居住，這裡是她的第二故鄉。雖然漂離他鄉，一生坎坷，一生痛苦，但那生養的恩情卻始終不忘。

另囑她死之後，不要舉傷，不要驚動故年老友，最擔心的是我和劉啟建關係，母親認為，我年齡已老，沒有條件另外組成家庭。如果再因家庭破裂，鬧出難以想到的後果來，是她最不願看到的。

她又說：「我自幼在上海教會學校讀書，少女時特別喜歡聽唱詩班唱歌，所以一生都想買一架鋼琴。但，一生顛沛流離，在毛澤東時代，積蓄被抄去，受盡折磨和凌辱。這些年，老年打工留下一點積蓄，只因沒有自己安身的窩，買琴便成了她終身沒有實現的夢。現在孫子既然喜歡藝術，那麼就將積余的錢買成鋼琴送他，以此作為我的遺托。望他彈著鋼琴，讓祖母在天堂裡聽他的琴聲，垂望他成為國家有用之才。」

我靜靜地聽她臨終的遺言，將她的話寫成遺囑，至於和劉啟建離婚，要看事情的發展，如果有一天我違背了她的意願，我會焚香請她原諒……囑我買鋼琴的事，我一定照辦。她去世後，我立即實現了她的遺願，買的鋼琴放在客廳裡，琴的抬板上留著她遺像。

那時正逢十二月初，是重慶地區一年之中最冷的幾天。年邁的母親因手腳骨折，翻身十分疼痛，加上她本來就腎炎發作，尿水頻多，每次小便又要別人幫助她，將她下身抬起來，將尿盆塞在她盆骨下面，尿盆與尾椎骨

幾經磨擦，使她的尾椎很快擦傷，形成血淋淋的褥瘡，使她疼痛呻吟不止。

因頻繁排尿，稍不注意尿水就灑在床上。醫院的大病室內，又缺專用的接尿設備以減輕她的痛苦。一天之內就因尿水打濕了被褥，被迫頻頻更換，天氣又冷，使她很快感染了感冒，迅速引發了她的老年肺氣腫。

氣喘和口痰，傷痛和尿水夾攻著母親，使她在生命的最後幾天，還飽受折磨。幾天住院，她原來就體弱的身子已完全垮了，死亡正逼近她。

就在她最傷痛的日子裡，她的孫子成了最後生命中給她安慰的親人。這幾天，這孩子特別懂事，每天晚上他都按時從學校歸來，再沒有上過網，九點鐘他從學校來到醫院，靜靜地守在他的婆婆身邊，悄聲的附在她的耳邊講許多安慰的話，叨叨講今天學校裡發生的事。

每次祖母要小便了，他便伸出他巨大的臂膀，把婆婆抱起來輕輕放在尿盆上面，讓她減少痛苦。有時候從學校伙食團或沿街賣過夜小吃的攤上，買上一個羊肉串，送到婆婆的嘴邊，雖然他的婆婆根本沒有胃口，但那份孝順之心使她臨終前得了極大安慰。

在中醫院的大病房裡，母親終日因傷痛而呻喚。眼看她一天天虛弱下去。肺氣腫和冠心病代替了骨折，成為威脅她生命的主要病因。

第八天，我同九院的主任醫生商量，將她從中醫院轉到隔家很近的九院分院，住進了單人病房。

然而母親的健康狀況卻更加惡化了，開始住進第九醫院單身病房那幾天，她已有兩天沒有排洩了。但還能勉強吃一點稀飯，陳醫生說，那是她體內電解質紊亂造成的，囑我一定要煮酸菜魚給她吃。

那幾天我徹夜守在她的身邊，晚上，等到劉啟建來換我回家後我便忙著給她弄酸菜魚湯，每天一大早，我就把煮好的新鮮酸菜魚湯給她送去，可是她卻只能呷兩口再不張口。

由於極度的衰竭，她的最後幾天，完全處於半昏迷狀態，有過瞬間的清醒，這時候，她微微伸開眼睛，好像有什麼話想要努力說出來，當我俯下身子，耳朵貼在她嘴邊，卻只聽見她輕微的囁嚅聲，很快閉上了眼睛。

我們母子在中共殘酷迫害下，前後合起來渡過了四十年，掙扎到今天已非常不容易，她對我的牽掛，只有趁這片刻清醒的分分秒秒想傾訴出來。

我的兒子每天都照例在放學後來守望她，每一次來，第一個動作便是伸手握住她的手，好像是他攙扶著走過這最後的幾步。但是她已不能像住在中醫院開始那幾天可以同他交談，而只有含淚相望。看到婆孫倆噙淚相對，我也禁不住要掉下眼淚。

我在重慶地區沒有任何老家的親戚，來探望母親的人是她晚年在北碚縉雲諮詢門診裡共過事，一起度過晚年的同事們；市工商聯的代表和李重生；此外五指山療養院的楊桂明夫婦；嘉陵中學的老師和學生以及崔老的同事和三個兒女。

到臨終的前三天，嘉陵中學六位代表，在校友聯誼會總負責人陳自立帶領下，專門從成都趕來，探望將一生勤懇獻身的這位教育先行者。

六個人送來了鮮花，圍著病床，但母親已經不能開口，只是張開嘴吐著大氣，好像在拚拼命地表示，她無法完成她畢生使命的遺憾。

她的褥瘡更嚴重了，背部擦傷的地方大片的已經潰瘍。在楊桂明指導下，我每天在醫護人員幫助下，給她潰爛的地方消毒，如此度渡過了最後的十一天。

在九院住到第九天時，她已進入了昏迷狀態，眼看著吊著的的鹽水一滴一滴的輸入了她的體內，而接通的輸尿管裡再也滴不出尿液來，她全身已呈現水腫，我意識到她的生命已進入了最後的時刻。

只聽見她喉嚨裡響著呼嚕呼嚕的口痰聲，我怕那不斷湧出的口痰，會堵住她的喉嚨，使她窒息而亡。所以拿著藥棉花去她的喉嚨裡不斷去掏那些口痰，我的孩子放學以後，也同我一齊掏，好像在從死神手裡爭奪她的生命。

十二月十八日，九院的住院部正式向我下達了母親病危的通知書，十二月十九日，在護理人員的幫助下，我用熱水給母親擦了一下身子，並用蘸頭孢的藥棉花給她的褥瘡上了最後一次藥。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冬雨啾啾，中午餵過她半小碗魚粥以後，她又一次昏昏入睡。醫生搬來了心臟監測器，她的心電圖已非常微弱。我和妻子以及兒子三個人全都守在她的病床前，見她安詳祥的熟睡了一般。我把藥棉籤子再次伸進了她那呼呼作響的喉嚨，掏出的痰越來越多。

從下午六點鐘我就不停地摳那源源不斷湧出來的痰。一面摳，一面痛哭，一面又聲聲地喚著，「媽媽！媽媽！」

我多麼想能幫助她把她無力咳出的痰摳出來，幻想她會因為最後的阻塞被一下了掏通了，出奇般的長長

舒一口氣，然後睜開眼睛看著我。但是，我的努力終於成了永遠留在我腦海裡的，最後一刻同死神的爭奪。

下晚一點鐘左右，她永遠閉上了眼睛，不管我怎麼喊她，也再沒有睜開眼看我一下！！心臟監測器圖像表明心臟永遠停止了跳動，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室外的冬雨下得特別大，天氣也特別的冷……母親就這樣離別了我們！！

我們連夜在樓下的過道上搭起了棚帳，一直忙到二十一日天亮，楊桂明取出了為她特製的壽衣，替她洗漱完畢，為她換上壽衣，將她的遺體裝進冰棺。六個人抬著她的遺體，放置在我們樓下的靈堂中。此時，我的腦子裡一片茫然。

母親是一個獨生女兒，唯一的母親一直跟隨著她直到去世，我唯一的兄弟，死在文革中，只剩下我和妻兒替她送終。

來為母親送行的除去崔老的三個兒女全家，和她的縉雲諮詢門診部的老同事，以及她退休醫院的代表，便是嘉陵中學的師生了。

但我並沒有按她臨終前的遺言，處理她的遺體。只是沒有通知生前七旬以上的好友，特別是高自強老師。前來送別的足有兩百餘人，其中，李重生專程從市中區趕來。靈堂裡擠滿了人。

十二月二十二日晨，就在母親的靈堂裡，我主持了一個小型的追悼會，我在悼詞中，追述了她坎坷而平凡的一生：

「1916年十月23日，她出身在蘇州河畔的一戶貧民家庭。1933年她考入蘇州女子師範學校。

1936年她在蘇女師畢業後，便在南京開始了她的教育生涯。時值日寇入侵，國難當頭。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她與一家人隨國民政府從南京到了重慶，積極參加中國紅十字會抗日戰地服務團，投入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在雙碑二十五兵工廠子弟小學任教育主任，與當時全國著名的教育前輩，梁漱溟等人一齊為教育救亡，貢獻力量。

1944年她在兵工署支持下創辦私立嘉陵中學，抗戰勝利以後，她一直埋頭默默為中國近代教育貢獻著一生。

不料一九五七年被冤劃右派份子，在「監督勞動改造」的壓力下，忍辱含垢度過了長達二十二年「監督勞動」生涯。

在這二十二年中，她經受了家破人亡的慘禍，受盡精神和肉體的折磨。

直到一九七八年始獲平反，時年六十二歲。但她仍堅持工作，直到1994年，才因上班擠公共汽車而跌傷，加上此時她已年屆七十八歲高齡，才停止了工作。

一生辛勞使她壓彎了背，但仍與嘉陵校友聯繫，為編寫校史和回憶錄繼續貢獻她的餘生。」

母親是一位中華普普通通的二十世紀中期知識份子，她教人和處世恪守誠信待人的原則。如果說中國的知識界，是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群體，如果說她（他）們千千萬萬人的努力起到承前繼後，為建立新的教育做了自己該盡的社會責任，那便是母親留下的一點紀念。

她的一生，見證了中國的民主教育的啟蒙。更多的用自己的生命和經歷，見證了中共專制主義對中國近代教育的殘酷摧殘！。

我由此聯想到一位，偉大的中國近代教育傑出的先行者武訓，他以忍讓、委曲感動著他生活的時代，為中國的教育提出了一個苦行僧的口號。因為人性的感化，仍是教育的道德基礎。他的行乞辦學的精神，雖然表面看，缺乏同一個沒落王朝鬥爭那股轟轟烈烈勁，而是用道德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全社會。

武訓沒有想到，在他逝世五十五年以後，一個自稱為解放全人類的獨裁者，用卑鄙的心理對他不朽的精神，進行了公開和殘酷的鞭撻。

結果，在摧毀武訓的「投降主義」「向統治者搖尾乞憐」的「革命」藉借口下，一個反人性的專制主義和文字獄，牢牢地控制了中國人民幾十年。一個新的更殘酷「教育為政治服務」的枷鎖，套在民主教育脖子上，使教育成了統治者的工具，母親就在它的驅咬下，度渡過了淒涼的一生。

當我們今天生活在這種社會風氣中，處處看到人與人的欺詐和虛偽，一個新的怪物在中共的創導下，從另一個極端腐蝕著國民。拜金主義和道德淪喪，就在人性被摧毀的社會背景下長出了新的毒牙，當我們興嘆教育淪落到今天這種見錢眼開的地步，那是中共另一個巨頭：新專制主義者所期望的。

## 第二節：對母親的懷念

我的母親為教育奮鬥一生，勞碌一生，然而就在中共蠻橫地剝奪了她教書育人的權力！仍矢志不移。她的晚年淒涼，中共連一處她能棲身養老的「窩」都沒有給她。

若不是倚靠她唯一的兒子，得到一間八平方公尺的棲身地，她只能孤苦地去養老院度渡過她的晚年！！但迫害設能扼殺她的終老之志。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獨裁專制所推行的愚民政策，終會以不恥人類的狗屎堆而載入中國的史冊。

今天大陸，表面上看似統一的專制政體，卻因喪失人心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被迫也在向民主政體作轉型的姿態。中共專制主義必以代表少數人而讓出自己的地盤，吃盡毛澤東獨裁苦頭的中國勞動大眾，也絕決不會自甘愚昧的境地。

母親去世以後，一個當年沒有錢讀書，是母親免費為他入學的窮孩子給母親的信寫道：

「得悉1999年十二月二十日晚母親不幸病逝，頓時悲痛至極，心情一直平靜不下來。收到你十二月三十日的信，紀念母親的悼詞和照片，實在無法抑制內心的悲痛，而流淚不止。母親的許多經歷，往事不斷地湧現在我的腦海裡，引起了極大的共鳴。母親高尚的品德，淵博的學識，出眾的工作能力，使我對她產生了內心的摯愛。她是我心目中最善良最無私最慈愛的母親，她對我的關愛像春日陽光溫暖著我的心，使我感到很幸福，生活很充實。母親走了，我深深地懷念她，母親生前寫給我的許多書信，我將整理好，保存下來，經常翻來看看，以寄託我的哀思和思念。」

我因此想起在毛魔猖狂年代裡，對母親屢下毒手的人，至今不知天地良知該怎樣報應他們？當年母親受到迫害時，蔡家場的農民敢向摳打她的劉巴斥責，證明人性是專制迫害狂所不能摧毀的。

出殯的那一天，為母親送行的時候，嘉陵校友會還專門送來他們編寫的《回憶嘉陵中學》一書，校友聯誼會總負責人陳自立從成都打來長途電話，囑咐道，一定要將這本書隨同母親一齊火化。

倘若母親悲涼的一生，能使後世有志振興中華教育的兒女有所激厲，那麼她在天之靈，就得到了應有的告慰，而安心於九泉之下了！

於是我把她的一生，寫成了《我的母親》一書以志紀念。

她剛去世的那幾天，每當傍晚，我都會獨自沿著她生前每晚散步的街道獨自徘徊。特別在附近街心花園裡，我會坐在花園角落裡，靜靜坐著，彷彿又回到每天陪伴她的過去，想起她看我在她身邊做操。一邊聽她叨叨重複我童年的故事，禁不住在樹蔭下潸然下淚。

### 第三節：為保護生存權的一場官司

在去九院清理母親住院間期的費用時，聽到住院病人講，該院進出使多人摔傷，該院護士抱怨進出時，腳下常發生磕碰，過去就有人向九院負責人反映這情況，引起了我的注意。去那門上仔細看，這是一扇僅1.8寬的雙開活頁玻璃大門，門在關止處，留著內外高差十分不明顯的門檻。

我取來尺子一量，那門檻只有5cm高。由於進門時，光線陰暗，病人進出門時不會引起注意，又無警示標誌，特別老年人多數老眼昏花，提腳抬腿很低，很容易使他們在進出大門時，被這個不起眼門檻絆倒。我向醫院負責人提出門檻致人傷害的危險，要求他們為老年人安全著想，填平它，卻遭到拒絕。

2000年1月十四日，我在消協王爾金秘書長支持下，填好投訴表，並按他的吩咐，整理了有關母親跌傷的病歷記錄，陪伴人的目擊證詞，傷害我母親的門檻照片，拿著母親的死亡通知，1月18日我把這些材料交給了王秘書。

當即我同他一起步行到九院去找該院的院長，本想通過說理使九院的領導承認他們工作上的疏忽，並能及時治理好這條致人摔傷的門檻。我倆在九院的接待室裡等了足足一個小時，等出該院處理人身傷害的唐付院長，當我們向他呈訴母親摔傷致死全過程時，那姓唐的面帶輕蔑的冷笑說：

「在我院門檻上跌倒，這首先是出事人本人的責任，何況，醫院只對醫療事故負責，所以，這件事是不應當來找醫院的，你們回去吧！」

我倆沒想到醫院的負責人，這麼乾脆的給了我們閉門羹。王秘書長顯得非常尷尬，我卻用憤怒的眼光看這盛氣凌人的小官僚，一時還沒有找倒足夠份量的話給以還擊。

這事倒引起西南工商行政報記者李良軍的關注，在他採訪王秘書長，核實了我整理的取證材料後，於1月二十日，在該報上發表了題為『老人之死誰之過』的報導。不料這唐付院長不但嗤嗤之以鼻，還打電話到報社公開威脅小李。

過了兩個月適逢三月十四日，北碚各有關單位擺攤紀念消費者權利日之際，在九院攤位上我公開斥責來參加活動的唐某，本意敲打一下，對病人不負責任臭名在外的九院負責人，說完後，定睛看那姓唐的，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看來一場官司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良軍關於九院進門門檻傷人致死的報導，在西南工商行政報上見報後，立即引起重慶媒體廣泛的關注，也引起了市民的強烈反響。長期以來，被病人視為活閻王殿的醫院，一直是市民怨聲沸騰的焦點。

2000年四月，我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將第九人民醫院推上法庭，要求九院對母親傷害致死負起賠償責任。不料素與法院某院長關係密切的唐付，不知玩的什麼招數，長達七個月審理後，竟無視該門檻無數次傷人的嚴重後果，不顧全市市民的反對，北碚法院駁回了我的投訴。

醫院對本該由醫院方承擔的醫療事故責任，成立專門機構對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常被新聞媒體逮住，在報上曝光的事層出不窮。於是，母親的死亡賠償，被當作社會關注的焦點……！

2001年四月8日在民意和輿論的壓力下，北碚法院對老年康復中心的門檻傷害責任，進行了第二次開庭，那天到會的共有一百多北碚居民，坐在後邊的是各媒體的新聞記者。作為人證出庭的是由雷春隆等四人組成，包括新疆石河子醫院的劉醫生。在新聞媒體和全國消委的介入下，這個案子驚動全國。

劉醫生以雄辯的不容推卸口氣，講述了九院大門檻頻頻發生事故。矛頭直指九院領導，那姓唐的付院長不再像上次開庭，故意做出虛張聲勢的狂妄態度，他在被告席上搭拉著腦袋。

北碚法院對事故的責任很快重新劃定，九院終於負起賠償的責任，一時各大報社報導了我們勝訴的消息，醫院和病人的關係，原來由醫院說了算，向前邁了一步。病人作為消費者的權益納入消法保護，便成了有名的案例記載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典型案例之中。

九院在北碚法庭上輸了理以後，唐院長們並不甘心，背地裡的交易始終在進行，他們利用上訴機會，再次與中級人民法院商量，請出專門打「疑難官司」的重慶政法委書記女兒辦的律師事務所，擔任他們上訴的辯護律師，在事實無法推翻情況下，利用法律的漏洞引用舊賠償標準，使賠償金額大大降低。

九月二十日判決生效，至此、整個門檻違背建築法致使我母親跌傷，致死的人身傷害，九院只作了低額的賠償而結束。

#### 第四節：我的父親

父親出身於蘇北鹽城新興場一個地主家裡，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祖父去世後，老大占去了祖父留下的大部份田產，在新興場上繼承了祖業，當起靠田租和放高利貸的地主。

父親因為憎恨老大的貪得無厭，中學畢業後，將家裡所有放高利貸的借據，當著伯父的面一火而焚，從此兄弟反目。

1931年他變賣了分到的房產作為學資出外求學，在南京，他考上了中央大學，攻讀教育學，拜師顧毓秀門下。

1935年大學畢業，眼看當時軍閥混戰，日寇入侵民不聊生，中華大地在日軍的鐵蹄下痛苦呻吟，喚起了他救國志向，1937年十月他帶著一家從南京逃難到重慶，投奔顧老，去中央大學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育學系副主任等職務。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時，剛滿八歲的我，住在沙坪壩的雙碑鎮，那是國民政府兵工署所在地，住著許多逃難而來的下江人，「八年抗戰」中，在異鄉整整熬過了八年，對抗戰勝利後的生活充滿了憧憬。今天當我翻開記憶中這一頁，它仍鮮活的保存著。

這年九月，我們一家隨中央大學復員回到南京，不久父親擔任杭州師範校長。

按『新生活運動』要求，他身體力行，每天清晨提一把大掃帚，在杭師「東升樓」前打掃校園和校門；主動撤去為他配的黃包車，把配給他的車夫派去為學生伙食團磨豆漿。

我親眼看到杭師學生的伙食，中午和晚上，每餐至少三菜一湯，常聽炊事員責備學生不知谷米來之不易。而那時各校都有學潮，學生喊著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每當學生遊行打這些標語，我不知內戰從那裡爆發，飢餓在那裡發生，禍端起於誰手？

1946年春天某一天，「東升樓」前集合了幾十名學生，手臂上戴著紅袖套，稱他們要到市中區參加全市舉行的反內戰大遊行。

早晨八點鐘左右，父親高大的身影出現在東升樓前，站在他平時站立的升旗台南側，面向準備上街的遊行學生講話，他講到八年抗戰的艱辛。

講自己1937年從廈門返回南京，沿途只有人推的獨輪車，又逢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九死一生回到南京，趕緊帶著母親，外婆抱著剛出生的我，在日機轟炸下，從下關乘船逃出南京。

日本飛機尾隨著插著紅十字的輪船，像追一片只有挨打而毫無反抗能力的「綠州」。「綠州」中彈了，著火了，它的甲板上倒著死人，「綠州」用鮮血染紅了長江，炸彈爆炸聲掩過難民的慘叫，倒在血泊中的母親，掙扎著把乳頭遞給那撲在自己懷裡的孩子！

當他講到毫無反抗能力的和平居民，受到鬼子的屠殺，淚珠奪眶而出，聲音也嘶啞了。

他說：「我們犧牲了幾百萬抗日將士，好不容易打敗了日本鬼子，昨天嘗盡了苦難，今天正需要和平建設中華時，如果你們是祖國的好孩子，就只有懷著一顆報國心，而不要聽從謠言和煽動，將來不易的和平時光白白浪費掉。」

他含著淚珠，希望學生們從國家和平建設大局出發，不要離校。

這一席以心對心的講話起了作用，準備去市里參加遊行的學生，紛紛摘下袖套，收起已打起的校旗，悄然散去。

到了大約九點鐘左右，從膺白路方向打著「浙江大學」旗子的學生隊伍，向這裡緩緩走來，經過校門口時，只有兩個學生加入了那支隊伍，原來準備的校旗也丟在升旗台前。我記得那一天是陰天，寬闊的馬路上行人很少，他們匆匆趕路，向遊行的隊伍投去好奇而陌生的眼光。

母親站在家門口，一個勁喊著我，生怕我被那大隊的學生吸引了過去。

1947年下半年他又在顧老的推薦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學總務長，以後又改任政大重慶分校的校長，成為大陸上中央政治大學的最後一任校長。

一九四八年我們離開上海時，為「中共打來了，我們怎麼辦」？父母親發生了激烈爭吵，母親堅決反對「逃」。她說：「我是無黨無派，共產黨不會把我怎麼樣。」爭論結果她贏了，全家放棄了去臺灣。

一九四九年中共佔領重慶後，父親在成都放棄了飛赴臺灣的機會，回到重慶北碚家中。一九五〇年在當時中共西南軍管會川東行署的指令下，去西南革命大學受訓。並在那裡得到中共的「政治結論」，要他去貴州參加土改工作組，回來後進行工作安排，他們說父親是統戰對象。

不料，一九五一年底，在中共掀起的大鎮反高潮中，他在北碚家中被捕。

被捕後，由北碚法院的陳文俊（該員2006年還活在北碚）帶人對我家進行大搜查，不僅將父母親多年積蓄搜槍一空，還以「國民黨大陸潛伏人員的活動經費」沒收。

在父親的反革命罪狀中，首要一條就是「鎮壓學潮」，被捕五年後他便被關死在勞改隊裡。

父親被審訊判刑嚴格對我們家封鎖了消息，禁止我們家人探視，尤其是拒絕向家人出具他的判決書，透露他的情況。父親就這樣被他們「黑辦」了。

當我的父親成為共產黨的階下囚時，我們小小五口之家面臨了滅頂之災。而我是當年父親「鎮壓學潮」的目擊人，很替父親鎮壓學潮的罪名不服。

那時電影話劇都宣傳『解放』戰爭，專題講學生運動的題材，都是描述學生運動受到國民黨軍警、憲特的鎮壓，大批學生倒在槍林彈雨中或被抓進牢房，在陰暗的審訊室裡受到老虎凳，燒烙鐵等等酷刑折磨。

可是後來，我親身領受到中共監獄的殘酷折磨，才使我體會到中共的裁贓、誣讎，領會他們不擇手段的殘暴。

從此，我們一家幾乎遭到了中共政權的滅門之災：我的母親因為對父親遭受不明不白前後矛盾的審判，在大鳴大放中提出質疑，一九五八年被劃為右派。

同年，求學的我因同一罪名被劃右派，並於一九六〇年鋸鐺入獄，我的兄弟於一九六八年被造反派不明不白殺害，我們一家幾乎家破人亡。

直到三十年後，我死裡逃生回到母親身邊，她才深深後悔自己的無知，並一反過去的害怕和回避，向法院投遞了為父親的申訴。

而幼小的我，早聽到中共佔領區逃亡出來的人介紹中共的所作所為，此時腦海裡更清楚中共的獸性。

一九七九年經歷九死一生以後，我和母親才得以在二十三年後，重新相聚北碚，在我十幾封追問區、市、省的公安檢察機關後，才由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回復，說他於一九五六年就因肺結核勾蟲病瘐死獄中！時年僅47歲。

我們家，是千千萬萬無辜家庭，在中共暴力下破滅的一例！

## 第五節：合葬

母親去世時，我想父親帶著一腔報國志向，從1931年離開故鄉，在外闖蕩二十年，尋求救世救國的道路，一生為教育奉獻，也該讓他流落他鄉的孤魂，回故鄉入土為安了。

然而我無法找到他的屍骨丟在何方。於是我把母親的骨灰與父親的遺物，作成衣棺塚合葬一墓的打算與鹽城新興場老家聯繫，在他們支持下，就在父親故鄉買下了一方墳地。

2000年清明後，我親自背著母親的骨灰盒，和當年父親留下的唯一遺物：一條旅行口袋，與我的孩子一道乘火車輾轉到了鹽城新興場。

鹽城這個地方我還是第一次來，過去我聽說蘇北地區地域苦寒。若不是讓二老魂歸故里的原因，恐怕我今生未必能專程到這個地方來。

來時正值初夏，在這一望無垠的平川上，空氣猶為清新，比之霧氣橫彌的重慶簡直是一個仙境，就是不知冬天到來時如何。但我想這麼肥沃的水鄉，定是一個適於安息的地方，

若不是中國遭遇到了戰爭，遭遇到民主和專制的生死較量，才使父母背景離鄉，發生這段傷心的經歷。今天歷史故去，留給我們的只有對歷史的反思。

為了表述二老的生平，我在墓的後方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塊，上面簡述了二老生平的簡歷。

他們倆都是新的教育事業先行者，只因為黑暗政治對他們的迫害，使他們坎坷一生，無法為振興中華教育奉獻一生，連他們組成的家庭也橫遭離散之劫，家破人亡。

在中共統治下，沒有他們的生存空間，更那裡談得上事業？像他們的遭遇在中國大陸累見不鮮！這是一個時代的謬誤！中華民族的浩劫！

現在他們到了冥間，可以在一起切搓他們生前獻身的事業了！！

當我將骨灰盒和父親遺物送入墓中，當一吊一吊紙花揚向天空，入殮的頌唱在耳邊聲聲哀響，我和馨兒長跪在一派茫茫的天地之間。

人生何求？歸宿何在？我們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又如何？

## 第六節：孩子在絕世裡掙扎

我的父母都是好人，我的母親求學時還是鬧學潮的參與者，同民主建國會關係親密，但是反右運動她失去了所有親人，我唯一的親兄弟死得不明不白，若不是老天保佑，我也是要被屠殺的，對生活絕望的母親幾乎自殺！暴政無端毀滅了我的家。

一九七九年當我回到重慶，母親獨自一人住在醫院的集體宿舍裡。見面時，我們母子倆面對她睡的單人病床，一張木桌一個凳子幾個紙箱，重新開始建家。被中共摧毀的家已無法再恢復，要把家延續下去唯一只有看我了

1980年經過我教書學校老師們的撮合，我和劉啟建結婚，當時我年過44歲了，為了急於求一個孩子，一九八二年我們婚後第一次去峨眉山旅行。

也許是峨嵋眉求佛的靈驗，回到蔡家後劉啟建便懷上了孩子，次年六月四日，一個姍姍來遲的男孩便降生了。當我們的孩子降生後，老來得子，我倆從內心都十分疼愛這個遲來的獨生寶貝，我又經歷了家破人亡的二十多年，僅僅留下我和母親。

現在因妻子和兒子到來，似乎在枯木之上接上了新生的幼芽。孩子的降臨改變了我生活的軌跡，本來同劉啟建幾乎離婚的僵局，因孩子降臨暫時緩和。

孩子的可愛之處積存在我的記憶裡，給我安慰和天倫之樂。也許因為中共獨子政策，家裡沒有第二個孩子作伴，他從小喜歡小動物，在他的能力範圍裡可以弄到的小魚、小鳥、小烏龜、小狗從來就是他童年天地裡的摯友



孩子九歲這一年過年，母親買了一隻大黑雞，捆了雙腳，放在廁所裡準備年三十的下午殺。中午孩子放學回家，看到廁所裡捆著的雞，便把它鬆松了草繩，放到樓下壩子裡讓它飽飽吃了一頓，再用一個木箱子，把它裝好，藏在自己的床下。

下午母親發現黑雞不見了，到處找，終於在他的床底下拖出那個木箱，明知孩子有喜歡動物的習慣，當天下午就提前把雞殺了。

下午馨兒放學回家，第一件事便去自己床下找木箱，當他發現木箱不見了便跑到廚房去，看到被打整得乾乾淨淨的雞已經裝在盆子裡面了。

他頓時放聲大哭，扭著婆婆定要還他一隻活雞。

哭罷，便從畚箕裡撿出一把黑羽毛，插在陽臺的花盆裡，並用一塊三層板，上書「黑雞之墓」，插在裝雞毛的花盆中，旁邊還點上兩柱香。站在那花盆面前抽泣良久，將他愛惜生命的本性，表現得很真摯。

在他的中學作文裡，多次寫他觀察小動物的生活世界。寫培植花草的方法，在區的中學生文藝徵文中得過獎。

他讀初中時，每逢週末，我們照例要到龍鳳溪去撈小魚捉蝌蚪，逮蚱蜢。

我和孩子經常不顧龍溪河剛剛退水留下的泥濘，也要去那裡捉小魚。有時穿的鞋、褲弄得全是稀泥也在所不惜，孩子給我留下不可抹去的回憶。受到孩子童心的薰陶，我自己彷彿也年輕了許多。

到了初中三年級，他常常向母親要錢，獨自去商店買一些奇裝異服。袖子特別短，管口特別小，腰身很瘦，還綴著許多彩色的邊條，穿在身上，對著鏡子津津有味按照歌星影星的模樣打扮自己。

特別是買了染發藥水，把頭髮染得紅紅的，模仿著歌星們時髦的髮型，在鏡子面前又唱又舞。

我告訴他染發的藥水是有毒的，但他並不接受，追星在他身上變成學星，他那童真的愛好和天真的幼稚一天一天消退了。我擔心地規勸他，講穿這些很不合身的奇裝異服，有礙於他的健康和發育。

為了教育孩子，我常把我上中學背著背兜打豬草的故事講給他聽，意在用自己童年的甘苦教育孩子，講述從小節儉，長大後養成良好習慣的道理。

但這種故事講了幾遍後，孩子卻不耐煩的說道：「老是聽你翻那本老皇曆，讓人煩不煩呀，總不能用你那個連飯都吃不起的年代要求我吧！」

為了應付聯招考試，初中三年級，我們不得不將孩子從22中學轉到北碚的118中學，這所學校因考入重點高中的升學率連年攀高，而在北碚地區出名。我們想在這一學年裡，專門的給他進行教材難度的加餐。

「填鴨」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必需做大量超過大綱的偏題怪題，考前一個月內為強記這些怪題的有關公式，規定每天起床前，必需把前一晚上要記住的東西統統默念一遍，凡有不記得的強記二十遍。

經過聯招考場的篩選，我們的孩子以1：3的錄取率被朝陽高中錄取，說明孩子在學業上完全可以跟上。

孩子考進朝陽中學以後，我已從工廠退休到城裡打工，沒有時間再督促他。劉啟建更認為翻過重點高中門檻，考大學便沒有問題了。

當每週星期天，我回家檢查孩子的作業時，才發現平時作業教師根本沒有批改。照說高中課程比之初中難度大得多，加上孩子在課堂上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使他在課堂上留下了許多似懂非懂的疑問。佈置的作業，教師既沒有檢查，更沒有督促。課堂上拉下的帳在作業上沒有及時彌補。

久而久之，孩子越來越聽不懂老師在課堂上講什麼，加上文革遺風並沒受批判，學而無用的觀點在他腦海裡起了作用。主觀上沒有及時彌補的積極性，放學以後受到社會上壞風氣的干擾，同班裡和幾個本來就是差生的議價生，交上了「哥們」，我們孩子的功課就這樣一天天踢下了。

老師的師德很差，他的班上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上英語課時，年輕的羅老師在一次課堂抽問時，抽到了他，當時他沒的回答出來，直楞楞地站在那裡。那羅老師不是善意的督促，而用尖刻的語言嘲笑道：

「你上課一直在講話，以為我沒看見你，你自己不好好學習，還豬八戒倒打一釘耙，說我們只知道收你們學生的錢，卻不負責任管教你，你反正也不像一個學生，如果你不聽，就給我滾出去，沒有你這個學生，看我會不會在月底工資中少拿一分錢？」

倔強的孩子因此賭氣，走下座位出了課堂。從此便完全放棄了英語課，後來期末考試，孩子的英語成績是全班最差的。

劉啟建接到成績通知，才開始翻看孩子的作業，發現已經整整有三個月英語課堂作業沒被老師批改過，追問孩子，他回答說，我討厭這女人，她講的我根本沒聽懂過。再追問下去，孩子才講出在上英語課時發生過的這件事。

高一學年下半年，孩子迷上了網吧。開始時，他還僅僅在有電腦的同學家中上網，時間也選在週末晚上。後來上網成癮，在幾個同學相約下，每晚都去網吧，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

為了怕母親跟蹤發現他在哪一家玩，他還故意變換離校的時間和走出學校的位置，使去校門口接他的母親每每撲空。

直到有一次，幾個輟學的小流氓在網吧裡動手搶了他的錢，還打了他兩耳光，他還久久的瞞著我們，當然更不會向學校報告了。這件事發生後不久，更大的事情發生了，使他瞞不住了，才講了出來——

有一天，直到晚上十二點了他還沒有回家，劉啟建焦急的向幾個平時和他在一起玩的同學家裡打電話。這幾個孩子都睡了，從床上爬起來回答說：「晚上下晚自習就各回各家了，所以不知道他回家沒有，也不知道他到那裡去了。」

我和劉啟建的心像貓兒抓一樣，社會上很亂，生怕他在夜半更深出事，我忍不住走到街上去找他。但此時街上市夜霧迷茫，行人已十分稀疏。我對著街上像瘋子般喊著孩子的小名，靜下來的馬路上並沒聽見孩子的回應。

直到第二天凌晨四點鐘，他才回到家裡，進門時臉上帶著傷痕，衣服上沾著泥巴，在我們追問下，他才講出他們學校與街上另一所學校學生打群架的事，他們學校還打傷了兩人，住在醫院。

接連發生了兩次放學途中被搶被打的事後，我不得不與他們班主任商定，今後凡下了晚自習，他的母親到教室接孩子時，沒接到的，發生問題一律要由校方負責。

事實證明，把精力放在議價生的校長，對學校發生如此嚴重的事件根本無所謂，議價生這種不花精力和努力的橫財，使學校的頭們利令智昏。

名牌的重點學校教育，完全被校長之流追逐蠅頭小利變質。他們哪能肩負培養品學兼優的國家建設人才重任？要轉學校，就要交幾萬的轉學費，何況那一所學校不都是半斤捌兩。

孩子高中階段陷入「網聊」以後，每夜也不知與螢屏相隔多遠距離，同另一個不相識的人用奇怪的稱呼，嘻嘻哈哈把道聽塗說的消息，天南地北的神侃起來。開始是好玩，漸漸的彼此交流著厭學和對人生前途

為了弄清他在網上同誰交談，我專門搜了他的課桌，在我收搜他的網友來信中，還發現了一個南昌的網名叫巴比的來信，信中告訴我，他不是一個中學生而是一個工人，愛好唱歌。

不久，這年輕人來了北碚，在我家住了三天後才離去，每天晚上都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放音樂碟子，因為離高考，只剩下最後一學期了。

在他離去時，孩子還向我告假，說巴比請他在春節到南昌去玩。在遭到我拒絕後，一味遷就他的母親，給了他兩百元作路費，春節前與我不辭而別，去了南昌。當我知道後，孩子已經上了火車。

大年三十的下午六點鐘，天色已暗了下來，防盜門的門環上響起了拍擊聲，早已守候得望眼欲穿的劉啟建，像一個皮球一樣從沙發上蹦了起來，衝沖到門口。

我從劉啟建身後，看到他穿出去的那套最華貴的棕色西服上糊滿了泥，那平時精心梳理的頭髮，髮型也被破壞變成了一蓬黃色的亂草。！

臉頰顴骨突起，平時孩子氣的臉蛋變得又黑又瘦，精神十分沮喪，眼皮耷拉著，看樣子好像幾天幾夜困在礦井下剛脫險而出的礦工，那一刻他給我的印象是累極、餓極、疲倦之極。

我當時低估了社會的影響，儘管孩子吃了到南昌的苦，但影響他的東西卻沒有變。過了幾天，他依然故態復萌，依然地染紅頭髮，依然的穿奇裝異服，依然堅持他選擇的生活方式。

高考以後他便獨自去了成都，幻想走上舞臺的孩子，被一家酒廊的歌舞廳看中，要他去那裡擔任報幕員。我雖心中疑惑怕他在那種環境，被煙毒、娼妓、黑社會所害，陷入可怕的深淵，但已回天無力。

為了幫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家，我仍拿出平時省吃儉用節省下的七萬元積蓄，給他購買住房，沒想到，他根本就沒有買房子，而是用這筆錢與他的男友，開了一家小餐館，尤其沒料到，開店剩餘的錢，被他母親以撫養拉下債務的名義，還了長期累積的債務。

二〇〇九年我已七十二歲，還必須面對老來的孤獨。人到晚年，倍覺淒涼、夜半一覺醒來，感到枕巾上沾著剛留下淚痕。

就因為我和劉啟建本來就缺乏瞭解、相愛、相尊。時間一長，裂痕不斷在孩子面前公開暴露，於是寬嚴不但沒有得到互補，反而偏執的雙方對對方橫加指責，在孩子心理上留下惡劣後果。

二〇〇九年七月，接到派出所打來的電話，說劉啟建已被刑事拘留，一個家落到這步田地是我人生的失敗，但此時最難受的莫過於孩子了，所以當他責問我，家破碎成這樣，媽媽落到這步下場，你要負幾成責任？並說他之所以2001年獨闖成都，就因為逃避父母的吵架。

2011年六月，我收到他從渝中區看守所打給我的電話稱：他被拘留兩周，含糊其辭說了拘留原因。

真沒想到，他二十八歲生日，竟和他的同性戀男友在看守所渡過。拘留滿期滿回到家中，我才看到他已經完全變異，欺侮身生的父母，成天沉埋在音色中。

可悲的是，他長期受了中共洗腦，對我的教育和警告置若罔聞，還在天真寄希望中共會安排他一個滿意的工作。

至此，我和母親團聚後建起來的家實際已經破敗。我們這個教書為業的家，從此就在大陸上消失了。

難道這是蒼天懲罰？我們何以歸終？去敬老院還是能去一個足可讓我完成我的寫作，較為安定的去處？那兒才收留我？

而這個可憐的孩子，從此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

至此，我們的沒有了後代，按中華民族觀念，孔家解體了。大陸上無緣無故遭此家破人亡厄運的何止我一家？

常聽人說，不良社會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利刃，我唯一的孩子難道就這麼無聲無息的喪身在這柄利刃之下？

## 第十章：退休後的打工

### 第一節：四輪摩托

馬剛原是重慶機床廠的一名普通幹部，七十年代曾以武鬥出名，外號人稱馬司令。改革以來，他利用和重慶市政府的老關係，靠走私車發家，並且買下重慶機床廠的幾台重型淘汰機床，打通了重慶重型汽車製造廠的配套部門，從配套處挖出了一些配件生產銷售，1995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在瞭解發達國家汽車發展的一般規律後，估計隨著經濟發展，汽車正在進入轎車時代，自以為能為中國轎車進入家庭做點貢獻。完全不懂汽車製造的馬剛，1996年從附近屬於部隊的山花汽車廠，以低廉價格買回一台發動機後置的微型車。

買進後，雇請了幾個汽車駕駛員和修理工，在南坪臨時租用了一個場地，開始了他對微型車的研製。當時他急需聘請一位懂得汽車結構和製造的工程師，便求助於原來的老朋友李倫，在李倫的介紹和推薦下，1997年初夏，我到了位於南坪的金彙公司，開始投入了微型車的研製。

在一無生產場地，二缺資金和設備，僅僅只憑買來的極不完全的圖紙，和一台樣車，四個人開始組裝第一台「金彙牌」微型樣車。

馬剛給每個組裝的人開始只給幾百塊一月的工資報酬，他靠造反派的傳家本領，不斷向我們做思想激勵工作，說只有在這種白手起家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出每個參加者的創造性和水平，還說中國首批民族工商業產品，都是在白手起家的環境中出生的。

當時，重慶地區熱銷三輪摩托，它的輕便，載客量，和安全都優於普通的兩輪摩托。加上銷售中享受摩托車的優惠，很受運營者的歡迎。

但它行駛中震動和雜訊，車身發抖和易傾翻的缺陷累出事故，使乘客日漸不滿，特別是交管部門十分反感，所以每逢節日慶典，為裝點城市的文明和市容，各級交管部門除了貼出告示，還要出動軍警，沒收、禁止三輪車上街載客。

在試製人員的建議下，金彙公司產品的開發思路由「微車」改為「四輪摩托車」，1998年馬剛向市申報該年度重慶市科技成果項目。

兩年以後，樣車也製作出來了，不過這才經歷了最初的幾步，它的開發能否成功，誰也沒有底。

整個底盤實際上是東拼西湊而成的，零件圖紙和買來的實物不相符合，經常發生裝不起，裝起後相互干涉的故障，要重新拆裝，所以安裝進度極慢。

最後勉強湊合，裝成的底盤，又遇到市場上沒有現存配件的困難。縱使開發成功，今後由於市場上買不到零件，又會碰到售後服務的困難。

1998年秋天，兩輛掛著金彙牌試車牌照的四輪摩托車，開出金彙公司的試製場地，向車管所的檢測站開去接受整車性能檢測。

能在不到一年時間，裝出兩台樣車，掛上試車牌照，開去檢測，已相當不容易了。

進入市區時，被一大群路過的三輪車夫圍住，他們停下自己的三輪車，七嘴舌地問道：「這是什麼款式的車，從來沒見過？」「這車的外觀造型小巧玲瓏、頂好看的。」

樣車向車管所前進時，到了通往新橋的支路口，兩個惡狠狠的交警攔住了樣車的去路，開車的小劉預感到意外的麻煩又降臨了。交警將樣車攔在馬路邊上，先把駕駛員的駕駛證拿了去，把我們統統叫下車來。

小劉咕嚕道：「年關到了，交警們又在打過年獎金的主意了，看來，我們今天恐怕開不走了。」

好不容易老馬與交通局周局長聯繫。用錢打通了關節，傍晚才把車開到車管所的檢測站。

第二天，檢測結果令我們大大失望，七個必須通過的強檢專案中，在制動，測滑，燈光，雜訊，排放上就有五個指標不合格，整車總體評分挨了一個「×」。

原先盼望著整車順利過檢的馬強，滿臉掛著不滿，向試車組全體成員兜頭潑了一盆冷水，辛辛苦苦裝了一年的車結果仍是一個不合格品。

在大陸上，由於冗長的過程和資金不足，經歷的衙門太多，一個自行設計的新產品常常經不住這些關口的扼殺，而在過關前，就已死在它的漫長途程中了，除非靠行賄買通這些部門。

馬老闆哪有那麼多錢作買路錢？

試製組又經過了兩個月對四輪車整治，並在租來的場地內反覆試車。這時候一家廠址在成都龍泉驛的軍工廠，經重慶市經委介紹，來我們的試製場地參觀。

這家軍工廠家正在物色一個適合於他們生產的民用汽車產品，他們看到了我們組裝的四輪摩托，相中了它的靈巧和外觀。

當即在老馬的公司本部商談，決定由該廠出場地，金彙公司提供圖紙和樣車實物，並以這家工廠購買的方式解決所需的生產資金。

為了進一步合作，對方邀請金彙公司去龍泉驛九二工廠進一步進行商談。

正在想對這個新產品進行一萬公里可靠性試驗的試製組，本想借往返成都，在行駛中對四輪車的可靠性作結論。

1998年底，由試車組的全體成員駕駛的樣車，便在馬總小車跟隨下，向龍泉驛進發。從早上五點出發足足行駛了十四個小時，到了下午七點鐘才行駛到達這家工廠的大門。

龍泉驛九二汽車廠屬於部隊編制下的民品生產廠家，既是軍工企業，門衛森嚴。

進入大門後，工廠裡靜悄悄的，藉著昏暗的燈光看，近萬平方公尺的生產車間裡，除了設備和一些材料堆放著，車間裡並沒有任何的產品擺在現場上。

來迎接我們的工廠領導人介紹說，這家民品工廠成立三年來，因產品滯銷，所以已經停產半年了，他表示廠的領導十分重視我們的到來，望我們帶來的產品能給工廠帶來活路。

四輪車是第一次長途運行，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經過日行五百公里行駛，樣車沒有發生重大的質量故障。

第二天大約十點鐘，九二廠接待我們的人來了，我們一起步行到昨晚到過的車間。

這下看得更清楚，車間裡稀稀拉拉的分散著身穿制服的工人，辦公室就在車間的樓上，當我們登上樓梯時，忽聽辦公室傳出激烈的吵架聲音，那是一個待崗員工因為兩個月沒領到工資在勞人科大呼小叫。

眼見這種氣氛，令我想到了十年前李友當政時的農用汽車製造廠，軍工廠都不死不活，足見全國有多少工人面臨沒事做，沒飯吃的生存危機中。

下午，與九二廠汽車分廠領導，在會議室中舉行雙方第一次會議，正式討論聯合開發生產四輪車的事宜。

會議開到晚上十點半，廠方在九二廠的招待所裡包了兩桌酒菜，名義是為了歡迎我們到廠協商聯合生產，其實這是虧損廠常有的規矩，一桌酒席少說也在幾千元。

虧損工廠平時沒錢來吃喝，遇到這種可以向軍方上報的機會，借上級的錢，來安撫一下職工中的大小頭目們，何樂而不為？

那一天，對方來進餐的人足有二十多人，一些與商談業務毫無干係的「頭」們都到齊了。這使我看到軍管企業中，國有體制的遺風是多麼頑固。

對方明擺著是想尋找一個讓他們渡過目前狀態產品，老馬對這個產品質量心中無數；整車的排放和雜訊兩大難點還沒有解決；生產許可證還沒取得的條件下，與九二廠聯合，是想借軍隊力量強行取得生產許可證。

強行走向市場的四輪車，一切質量和安全的責任，將落在我們這些負責研製的具體人肩上！

所以一進入談判，我使用國營企業的工廠那種無人負責，遇事推諉的眼光，來看待馬總選的合作夥伴，預先感到合作困難。

聯合生產四輪車的意向性合同第二天就簽訂了，金彙公司需要提供四輪車的全套圖紙和指導人員，協助九二廠汽車分廠作好技術和生產的準備工作。

還好，我已把車架的工藝裝備圖紙，以及車身分塊的工藝卡預先準備好了，我和馬總商量後，決定把剛剛進廠負責工藝的黃輝祥接到龍泉驛來，一邊完成底盤焊接工藝裝備的製作，一邊對九二廠試製第一台樣車作工藝指導。

我們立即返回南坪作下一步的準備，像來成都的行駛一樣，樣車在馬總小車監護下從成都出發，車到潼南已是下午兩點鐘了，為了趕路，老馬大膽建議走高速公路。

根據高速公路管理辦法，禁止試車駛進高速路的。好在潼南高速公路的進口疏於監視，等到四輪車買了票，已經駛過路口好幾百米了，管理處的人才疑惑的喊道：「那紅車子是什麼車？」另一個檢票的回答道：「我也沒看清楚，好像是進口汽車，樣子很漂亮。」

當我們兩輛車駛過了路口監視人的視線之外時，我們才松了一口氣。

汽車在高速公路上提速，使我們能在傍晚時分駛抵南坪。老馬對樣車倍加稱讚，第一次長途連續行駛千餘公里，整車沒有發生任何故障使他十分高興。沿途對樣車造型交口稱讚，說明造型美觀，很受一般人的青睞。

回到重慶已是1998年的除夕前夜，大家只放了一天假。

1999年1月2日，第二次與黃輝祥一起乘坐四輪車到了九二廠，這一次我和老黃花了幾晚上詳細的校對了四輪車工藝小車的圖紙，以及四輪車車架各組合焊的分件尺寸，並且初步計算了初期投入的成本。

在九二廠派來的專職技術員參與下進行校對後，初步確訂了單車底盤的材料定額，工時定額，以及焊裝工藝的過程。整整進行了十天緊張工作。

沒有想到我們回到重慶後，還沒有一個星期，黃師傅打電話回南坪告訴馬總，所要製作的車架材料遲遲沒有買回，招來裝車的工人，也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經常不見人影，這些工人的理由十分充足，九二廠的工廠管理方面沒有給他們一分錢的工錢。

這年頭拖欠工人工資事太多，這家工廠實際上處於停工待料。整天面對著冷冷清清的車間，黃師傅自己一個人怎麼幹？因為天氣冷，得了感冒，反正幹不起來，他要求從成都回來，另換他人。

自此原先熱火朝天的計畫和圖紙很快變成紙上談兵，我在開始談判的擔心終於發生了

回想起來，我從96年為賺取孩子學費，打工三年處處短命，處處碰壁。最先的青槓幹了才半年，就碰到了政府封殺走私車，只好離開；接著就為陳家橋的防彈服專案，全套檔已經準備好，鑑定會也開過了，又遇到了領頭人因利益衝突很快散夥；

這一次四輪摩托車搞了一年多辛辛苦苦的爬地溝，加夜班苦思苦想解決四輪車存在的問題，又因缺乏資金，看來又幹不下去了。

後來由於道路和車輛管理的部門扯皮，設置層層障礙阻攔，而不得不使這個項目中斷。儘管老馬絞盡腦汁，眼看這麼好的專案只好夭折了，我的打工生涯佈滿荊棘！

## 第二節：槍桿子也搶民品

2002年初接到馬剛電話再次邀請，電話上告訴我說，他的公司在南坪找到了新的合夥人：「xina電腦公司」，這家公司與九二廠同屬軍工系統。

在電話上他告訴我，這幾年他在四輪摩托車的研製中，對發動機後置結構暫停研製：新的結構仍取發動機前置，前橋取獨立懸掛，傳動機構和後橋結構採用這些年進步很快的三輪車結構，動力用125單缸發動機。

同時這幾年將四輪車劃在摩托外的規定有所鬆動，為實現原先金彙公司的計畫提供了條件。只要對原先的事業持之以恆總會有成功的時候。

對他的事業心我很讚賞，但我對成功的希望並不樂觀。

我帶著猶豫和試探，於2002年2月份第二次來到位於南坪的金彙公司，它已在南坪西路的中段臨街左側，租到了一套普通民房作為辦公室。

他見到我以後，對兩年前四輪車試製中一點挫折當了『逃兵』作了責備。我只是啞然一笑，說像你這樣幾百塊錢一月請人幫傭實在為數不多的，去留當然會隨便一點，我已退休，不像你有事業的想法，低工資對我沒有約束力，更不存在與產品共存亡的那種豪氣。

但是他卻拍著胸脯說：「男兒所追求的是一番事業，有我老馬在，就有四輪車在。」說話中底氣十足，對他的事業充滿了信心！說著把我帶到了試劑廠旁邊的一個十分簡陋的廠房裡。

我們從金彙公司出來坐的是公共汽車，我隨口問道：「你的兩輛日本豐田車呢？」他苦笑道：「因為四輪車的開發，耗盡了我的家當，兩輛車也變賣了，我現在也靠公共汽車上下班了。」

當他帶著我跨進他租來的破舊廠房時，裡面雜訊刺耳，塵灰飛揚，廠房裡七八個工人，正揮舞砂輪機打磨幾個玻動鋼做成的車身。

用玻璃鋼替代原來鋼板結構的車身，這大概就是他這兩年來對四輪車作出的重大改進。

接著他又帶我到Xina公司的本部，四輪車生產安排在公司底樓一角，大約占了五百平方公尺的場地，在主樓的北側用石棉瓦臨時塔起了一個工棚，場地很簡陋。工棚中間排放著兩排共十台車架，電焊的火花此起彼落。我看了看那房頂雖是牛毛氈蓋的。但離地足有十公尺，不會發生安全事故。

工棚外側的過道上，放著兩個已裝上了玻璃鋼車身的四輪車，裝配工正在裝內飾和校正底盤的操縱機構，他們邊裝邊埋怨，整車許多地方裝配很困難。

我在這底盤前觀察良久，發現安裝轉向器的橫直拉桿系統左右相差太大，同時因為缺橫向穩定桿，估計就是勉強裝好，整個轉向系統不會協調。

再去看安裝車架的預裝工位上，亂裝的現象十分嚴重。一看就明白這些工人都是生手。問道：「你們是從那裡調來的？」回答說：「我們原是從公司的各個車間裡抽調出來，並不懂車，也沒有經過培訓，不懂怎樣才叫正確的裝配」。

我問道：「現場上的施工人員在那裡？」那工人指了指車間進門口坐著一位大約五十多歲的人，說「他原是金工車間抽出來一名工程師，姓張」。

經過瞭解，我心中已經有了大概的印象，裝車的工人基本上是一批生手，沒有技術指導，我又問道：「你們裝這種車裝了多久？」回答說：「才裝了兩個月，公司說邊裝邊熟悉」。

下午我將要離開時，我向馬總介紹了我看到的情況：「整車全是生手在裝，乘用車尤其要注重安全，裝車錯誤出了事是要人命的。」

老馬才說：「正因為這樣，我請你做現場指導，至於月薪，暫時按每月一千五百元給，是四輪車工段最高的工資了。」

這種四輪車結構，是馬總從一個姓趙的手裡買下的，底盤採用了長安微型車的懸掛結構改造而成，但極不成熟，還需要大幅度改進。

2001年十月經過仲介人的撮合，馬剛與Xina電腦公司劉經理。簽訂一項開發金彙牌四輪客車的合作協議。

根據這個協定，製造出來的四輪車在推向市場實現盈利後，金彙公司佔有60%的利潤，而接受委託加工的Xina公司只能得到30%的利潤。

在自己的地盤上以自己軍工資格向國家貸款，用自己的工人生產出來的產品，自己僅只得到30%的利潤分成，再大的傻瓜也不會答應的。但對四輪車一無所知的劉經理，利用國家的錢冒多大的風險，只要私人得到實惠都是可以的。

何況，若四輪車開發順利，「一無所有」的小小金彙公司，將被Xina關起門來吃掉，「貪婪」這個怪物產生出陰險的算計。

當然，在這場賭博中無論是Xina還是金彙，都在用國家資金下賭注。這便是當時流行國有資產「流蝕」的合法方式：拿國家銀行的貸款和國有設備，實現利潤，這是兩家牽手的基礎。

不過合作人之間各謀各的打算，使這種「開發」帶著爾虞我詐。

我到Xina上班的第一天，老馬就向我打招呼說：「我們和Xina是委託加工的關係，所有圖紙和技術資料都必需經過我的手，他們的內部關係很複雜，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的不良後果，所以你在現場上最好少發表意見，遇到問題要及時向我講」。

兩年不見，原先不懂車的老馬，現在是技術主管了。從別人手中買過產品，又用Xina公司的資金和人力將這個未成熟的產品生產出來，老馬想出四輪車開發的路夠絕的。

Xina可不是一個破產企業，也不同於龍泉驛的九二汽車製造廠，這裡的制度表面上極其嚴格，進出大門都必需出示工作證。

第一天上班大約半個小時，車間裡走進一個夾著點名冊大約四十歲的中年人，張工告訴我他是專門負責思想工作和考勤的楊書記，今後在他面前說話要當心點。經張工提醒，在我忙碌的糾正現場各種錯誤的裝配時，偶而也對這位翹著二郎腿的人投以警惕一瞥。

十點鐘，工間休息的鈴聲響過以後，這位楊書記走到我的身旁，以詢問的口氣漫不經心的問道：「你是那一個廠退休的，今年好大年紀」？我平靜回答了他提的問題後，他又問道：「看樣子，你的身體不太好，你能勝任這個工作嗎」？我馬上就警覺到，他是在嫌我年老體弱。

心中產生了一種防備對方挑剔的警惕，便毫無懼色的冷笑道：「你們Xina有的是年輕人，隨便挑一個出來試試，他敢在我面前充狠嗎？」碰了這麼一個軟釘子後，他自覺沒趣，退到他的的凳子上翻自己的報紙去了。

在中共國營工廠中，像這位楊書記，上班時不做工，而是轉著一雙賊眼，專門靠找人岔子為職業的人並不少見。尤其在軍工企業中，憑著官票和一張打小報告的嘴，占著上風的小人到處都是，同他們打交道，最好是不與理睬。好像這種人不存在一樣，便是上策。

我和老馬分了工，他專管試劑廠那邊的玻動鋼車身，而我主要負責底盤的安裝和整車的裝配，現場反映出來的問題的確不少，有的是設計上的錯誤，大量則是工人缺乏裝配常識亂裝。還有的是從市場購進的不合格品而帶來的，那張工程師因為不懂汽車幾乎不能搭上幫手，使我在現場忙得團團轉。

剛剛才接手一個多月，便接到四月底，全國摩托車產品展銷會在陳家橋開幕的通知，Xina的毛總，親自下令組裝兩台樣車參加展銷會。

而我知道這個車目前在裝配時，就已毛病百出，更因為它沒有經過行駛的驗證，心中對它的質量和可靠性本就無底，所以反對草率參展。

結果毛總說裝車已三個月，已經花費了近百萬的投入，工廠不能老試製下去，見不到效益，投進去的錢怎麼向主廠交代待？

他儼然從被委託加工，變成主持生產的主人。下令由楊書記督促，務必按時完成展車的生產進度。

展車是從已裝好的成品車中選出來的，這位楊書記在展車的車廂外，貼出了Xina的大幅商標，並且以Xina的牌名，印製了產品說明書。

這就像一則外國寓言裡說的，老虎從貓那裡學會了捕捉動物的本領後，就反過來要吃老師了。不過這楊書記也太性急了，老馬可不是一個隨便向Xina交底的貓。

我清楚四輪車處在當前質量狀態，距成批生產投入市場還遠。



負責整個產品質量的我更明白，雖然這個車能夠開走了，但是，負責生產行馳系統的廠家還要花大力氣，重新思考新的結構，才能確保安全。

經過一個多月瞭解，我對Xina這般人馬接手四輪車開發毫無信心。

國營企業那種見利就上，見困難就讓的作風是改不掉的，四輪車前途堪憂。

我對楊書記這種輕狂感到氣憤，於是我把他貼在車上的商標撕去，那姓楊的當即氣急敗壞追問撕下商標的人是誰，工人指認是我，他便破口大罵說我每月拿的工資是他的雙倍，現場那麼多問題沒解決，要我立即滾回去。

我看著他歇斯底里的狂叫，並不答話，把我填寫的工作記錄當眾向他擲去，告訴他我才進廠一個多月便發現和解決了兩百項的問題，叫他睜開他的狗眼看清楚了。

大聲喊道：「我不是你叫來的，而是老馬叫我來的，要我走，也要老馬叫我走，還輪不到你。」

中午時分老馬來了，他已聽說了上午在裝車現場我和楊書記的對吵，他對這姓楊的蠻不講理作風心中早就不滿了。

一面安慰我，一面就這件事專門找到了毛總，雙方約定下午在金彙的辦公室裡，再次對委託加工進行「磋商」。

名曰協商，雙方都不加掩飾表示出爭奪四輪車研製成果的意向。Xina指責首批的三十台樣車進展緩慢，技術根本不成熟，邊做邊改，實際Xina已不是原來委託加工協議中的被委託方，而是研製的主體。

現在憑他們佔據的試製場地，投入成本，提出成立新的股份公司提案。根據這個提案，Xina所有的八個中層幹部都在這個公司中佔有一份股份。

這樣一來，金彙公司佔有的股份不是原來的60%而是20%，同時四輪車的牌名應由金彙牌改為西金牌。才四個月月的委託加工，Xina已由剛剛試製時一無所知的狀態，而變成主人了。

老馬沒有估計到形勢如此陡轉直下，原來與四輪車開發完全無關的Xina中層幹部，全部成了毛氏股份的股東。

這就是中共統治下的新型社會主義私有原始積累：Xina用國家的錢作資本，如果賺了錢就落進股東們的荷包裡，如裡虧了，這些股東分文不會掏私人的錢來抵虧的，這種用國有銀行貸款進行的公開掠奪非常精彩，當然，Xina入股分紅的八名幹部，又絕不會按機會均等的原則平均分贓。

到果真四輪車撞入市場，獲得的利潤，楊書記和毛總，豈容費盡心機賺來的錢與其他人平分共用？

拿去參展的兩台四輪車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最佳效果，四輪車以價格低廉，樣式美觀，安全可靠，受到了使用三輪車代步的外國用戶青睞，這些國家的貿易代表團在展銷會開完後，便到Xina公司四輪車生產場地進行了參觀，並且分別與Xina簽訂了每年供貨兩千台的意向合同。

利令智昏的Xina領導班子欣喜若狂，那毛總跟著下達每月安裝出一百台的生產計畫，並加大了對裝車配件的資金投入，公開加緊了對老馬的侵佔和排擠。

自從毛總向馬剛亮了重組聯合公司的底牌，老馬很後悔當初找錯了搭擋，現在對手吃掉他的面目已顯露出來，而所有的四輪車又都在對方的場地上，沒法撤了，繼續合作下去，只能反被當雇傭使喚，他的研製全都完了。

為了做好同Xina撕破臉的準備，他決定要我將四輪車的圖紙和牌名，向重慶專利局申報專利，一旦撕破了臉，馬剛唯一指望的，用合同法在重慶法院的經濟法庭上指控Xina。

但中國人都明白，在中共人治的霸權下，所有法律是那麼蒼白無力，尤其是對於Xina這樣的國防工業生產廠家，他們完全可以在槍桿子保護下，置之不理。萬般無奈的老馬，只有通過各種途徑向政府呼籲了。

他立即打電話通知公司的常任法律律師，請她草擬一份狀告Xina的投訴材料，將Xina告到重慶市經濟法庭，同時他動用了在市里的關係，向付市長吳某提出了一份備忘錄。

其實Xina的頭們在搶奪四輪車成果時，顯然缺乏全面權衡。

Xina的頭們根本就不懂，機動車這種產品，是不同於其他任何民用品的。在大陸，機動車的管理和生產，是由公安部和交通部聯合頒佈的「公告目錄」加以規範的，凡對於目錄中沒有的廠家和車品要取得生產許可證，是要通過業內人士並花費大量金錢才可買到的。

再說，這現場所擺的三十台樣車，在懸掛、後轎、轉向上存在著致命的危險，急待解決時，公司領導卻大打內戰，還有誰能安下心來一個個加以解決？

正好，五一節前，原來長沙地區已經禁止三輪車進城，原先從事三輪車營運的殘跡人迫於生計，奔跑全國各地到處尋找四輪車生產廠家。

他們得到四輪車已在Xina批量生產消息後，便蜂擁而至，一到Xina，看見高大的廠房和森嚴的門崗已產生了一種盲目的信賴，在Xina的四輪車車間裡賴著不走，硬要將停放線上的三十輛有嚴重缺陷的四輪車全部買走。

五一節那天是法定節日，全都沒有上班，天也下著很大的雨，馬總為此事專門找我對長沙殘跡人要車的事表個態。

我說：「那三十輛車我是不敢簽字放行的，全部的車都要更換懸掛搖臂和輪轂，尤其是輪轂已在試車時飛出了兩次，差點造成翻車，合格的配件等了四五天還不見買回，現在老毛叫放行，說賣出去後再來補救，那是設下一個陷阱，翻了車出了人命，坐監獄的是我。」

三十輛四輪車終於沒人敢放行，長沙的殘跡人是什麼時候走的，我不知道。

第二天，老馬傳達了Xina總部的通知，為了防止外聘人員混入Xina廠區對軍事秘密竊密，Xina剛剛成立的四輪車分廠總部，立即遷入第二機床廠租借的廠房裡，六月初就在Xina總部的督促下，四輪車車間遷出了Xina本部。我的工作場地暫時也遷到了第二機床廠裡面。

三十輛等候換輪轂的樣車，在二機床廠的現場上足足停放了兩個月。

七月底按照老馬佈置，試製組全體成員，從三十台首批四輪車中，挑選了兩台車準備完成規定里程的行駛試驗。在更換不合格的部件後，準備交重慶技術監督局作首次質量鑑定。

正當辦完所有手續，第二天就要開到質量監督局進行檢測時，Xina突然單方面宣佈，將所有試製的三輪車統統開回Xina，兩輛已開到半路上的待檢車也中途折回，開進Xina的大門內。

那已經好久沒出面的張書記，帶著兩個人突然收繳了二機廠庫房的鑰匙，並在門上貼上了Xina的封條，一場強盜式的搶劫四輪車，及庫房四輪車配件的行動，便在二機床臨時租用場地突然打響。

我在車間的樓上親眼目睹了這場窮兇極惡的搶掠，一夥軍人在利益的驅使下搶劫了自己的合作夥計！

Xina的五架卡車在車間搬運工的配合下，幾個小時之內，將三十台樣車和全部庫房物質，裝配車架用的工藝裝備全部搶走，運到Xina本部，交給荷槍實彈的守衛人員看管起來。

當時，我忍不住在樓上向指揮搶竊的楊書記罵道：「強盜，簡直是一夥強盜。」那姓楊的竟毫不介意的從樓下抬起頭來看著我。

我不禁想，這夥從貴州大山裡遷到這裡來的山野村夫，看著幾輛四輪車都眼紅，日子久了，不定還會幹出更出格殺人越貨的勾當。他們把這些車搶去了，可沒有弄清存在重大問題，他們實際上是搶了一個禍事捏在手心裡。

深夜三點鐘，當樓下的東西已基本上一掃而空後，安在樓下的電話鈴響了，電話筒裡傳來了老毛的聲音，他說：「你不要誤會，我們因為場地租賃費太貴，現在重新搬回了Xina，等待著安排新的場地，眼下我們正在重新調整四輪車的技術力量和勞動力，我們歡迎你到總部來上班。」

聽到他的話我渾身陣陣感到肉麻，姓毛的不僅搶了東西還想搶人，我恨恨的回答他：「沒看見你們這樣公開搶老百姓東西的部隊，你就不怕金彙在法庭上指控你嗎？」對方的手電筒裡傳來了哈哈大笑。

按他的邏輯，他們是保衛公家的東西，不被私人老闆占去。從來沒有民營企業告倒軍隊的先例，毛澤東早就說過了：「槍桿子裡出一切」！

搶劫事件的第二天早上，金彙公司辦公室裡，撞進來了南坪工商所執法人員，他們說接到舉報電話稱，金彙公司『私自』組裝沒有任何許可證的「黑車」，按照工商管理條例，非法組裝的黑車，不但要沒收，還可追查黑車組裝者的法律責任。

看來Xina的毛總和楊書記十分通曉黑吃黑這一套，四名執法人員要馬鋼帶他們去黑車的現場。

到此金彙老馬反被反咬了一口。

馬剛走到他最不願看到的一步，請律師向重慶法院就違反合同法和侵佔他人專利權，將Xina告上了經濟法庭，就這樣從2001年十一月開始至2002年七月份止，為時八個月Xina和金彙公司合作對四輪車的開發研製，最後以Xina撕毀合同，搶佔四輪車宣告了它的終結。

垂頭喪氣的老馬被迫解散了四輪車所招納的金彙公司全體成員。

然而他並不甘心失敗，一邊將我留在他的公司辦公室裡，根據張工繪製的殘缺不全的四輪車另件圖紙，以及我對整個四輪車底盤的回憶，依憑在試劑廠的廠房裡還控制在自己手裡的玻璃車殼，繪製了整車的裝配圖。

老馬不甘心就此放棄奮鬥多年的研製成果，一面應付著與Xina的這場官司，一面四處尋找新的投資夥伴，準備時機成熟東山再起。

可是，靠槍桿子搶奪他的人產品的頭頭，把到手的產品看得太簡單了，股東們坐在辦公室裡打著如何「分贓」的算盤，爭吵聲在大樓上響了好多天。

但對於四輪車的結構和基本性能一無所知，聽憑一群Xina本廠的工人在現場上瞎裝的Xina頭們，嚴重連反邊試製邊試驗的科學方法。對初期試製樣車已發現的問題又不知怎麼去克服，便匆匆將帶病的三十台樣車賣了出去。

結果賣出去不到一個月，便陸陸續續的被用戶退了回來。在殘疾人用戶的一片譴責聲中被迫關門整頓。面對這種惡果，Xina的領導們為追究責任，又一次爆發了激烈的狗咬狗的爭吵。

好在Xina頭頭們自有彌補損失的招數，三十輛長期積壓在庫房中的舊車，被當成產品試製的正常報廢，名正言順地報銷了。其後果，無非是給上交國庫的中國億萬納稅人，增加了一筆小小的負擔而已。

在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市場經濟，產生出中共官僚中的貪婪、外行和荒唐。他們在走向富裕的過程中，用正常情況不可能給他們提供的冒險機會，以卑鄙手段掠奪弱勢個體，不用尊守道義規範和失敗的風險。

### 第三節：城市貓

十月底，金彙公司的辦公室裡，接到重慶市國際公司一位楊經理打來的電話，自稱是馬老闆在機床廠的師兄弟，現在承包了該公司進出口車輛的業務。

最近他得到了國外需要批量很大的四輪摩托訂貨單，他知道老馬從事四輪摩托研製多年，所以特地來電話和他商量。

姓楊的打電話來時老馬沒在，等到中午老馬回辦公室，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正在焦頭爛額中尋找合作夥伴的馬剛，得知這個消息，立刻與這位楊師弟通了話，並在下午親自到國際公司去了一趟。

下午回公司時，他滿面紅光，心情顯得興奮起來，將近三個月堆積的一臉愁雲，似乎消失了。

回到辦公室裡，便把幾張我們沒見過的三輪車照片往辦公桌上一攤，指著它們說：「這便是國際公司得到孟加拉國訂購的樣車照片，名字叫「城市貓」，對方說，只要在外形和質量上得到保證，生產多少他們就要多少。」

這對於三輪車相對生產過剩的重慶大小三輪車廠家，都是一個有誘惑力的客戶。

城市貓的發動機是義大利比亞特公司產品，我聽後心中卻在想，要上批量並不那麼容易了。何況發動機還要靠進口，製造成本經過初步核算沒有？

正想提出問題，老馬已向我佈置了任務，要我根據照片的外形，立即繪製一張整車的效果圖，再用電腦進行修正複製，達到這張照片的正面和側面的效果。並說外商在兩三天內就要來公司洽談，達到外商要求後，再把效果圖傳真到孟加拉，國外公司本部去。

第三天，國際公司的老楊帶了一位廣東籍的外商代理人，到了金彙的辦公室裡，那外商代理姓羅，看上去很年輕，他看了繪製的城市貓效果圖後，介紹了孟加拉國對這種車型需求的市場前景說：「只要按質按量在二十天內拿得出樣車，他便能夠代表孟加拉訂出年需求量三千輛的訂單。」

三位老闆級人物的樂觀，使金彙公司小小辦公室裡泛起了一陣起死回生的春潮。我們商議了在二十天內出樣車的方案，老馬表示金彙公司雖受Xina的影響，但生產四輪車玻璃鋼的廠房可馬上用作新樣車的試製場地。

剛解散的人也馬上可以召回來，他們都是有經驗的摩托裝配工，可以根據樣車的照片和效果圖，確定出它的結構和基本尺寸。所缺的就是購買裝車部件的資金了，老楊立即表態，初期製作樣車的錢由他負責籌集。

於是三個人初步定了分工的方案：馬總負責生產場地重新佈置及今後的現場管理；楊老闆負責試製資金以及外銷的運輸集裝箱準備；羅總答應馬上通知孟加拉國，並負責運發的國際手續和樣車出售後的資金回籠。

生產場地很快地整理出來，原來四輪車用的玻鋼車身和模具暫時全部堆放起來，第二天楊老闆帶來了一個叫陳大發的投資人，據楊老闆介紹那陳大發原是在渝州大學讀書的同學，現在正在宗申公司協助袁老闆籌建壁山三輪摩托車分公司的建設。

重慶的摩托業私營廠家，經過幾年拚拼殺殺兼併，已形成了宗申、隆興和力帆三大托拉斯集團，他們各自擁有幾十億的資產，雖然民間對三大集團的總裁口卑並不好，但誰也說不清，他們同中共重慶市委有什麼樣的淵源。

壁山新成立的三輪廠，把過去套用宗申銘牌的各小三輪車廠實行了兼併，正積極地尋找新的三輪車樣車。所以在得到老楊資訊後，決定將金彙公司納入到宗申集團，專事開發新的三輪樣車。

那陳大發一到了金彙公司的辦公室，將腋下夾著鼓鼓囊囊一個皮包向老馬辦公桌上一扔，老馬見財神到，滿臉堆笑躬身站起來，打開我們製作的城市貓效果圖請他審閱。

一面介紹金彙公司開發四輪車的經過和積累的經驗。那陳大發對老馬的自我介紹並不感興趣，他需要看準備製作樣車的場地是否已就緒。

在參觀了生產現場後，那陳大發倒也爽快，回到辦公室從他的皮包中取出了一疊百元面值的五萬元現鈔，往辦公桌上一甩說：

「這是宗申公司的初次投入，用作兩台三輪車和一台四輪車開發，購買零部件和材料的專用資金，如果不夠，隨時通知我。樣車如果按外商要求，按質按量完成，那麼今後你們就是宗申公司的一員了，我們以你們為基幹力量共同開發外銷車。」

說到這裡頓了一下，臉色一沉，繼續說道：「如果樣車搞砸了，那麼金彙公司就砸了自己的飯碗，我們充其量就當作在澳門的賭場上輸了一把。」

聽到了這帶刺的話，我心裡實在不是一個滋味。在這些沒有長大的資本家看來，唯有錢才是萬能的，有錢可以兼併小公司，像我們這些讀了一輩子書，掙到了高級工程師這個「虛」名，只不過是人家用幾個工錢召來，可以隨意使喚，不滿時可以炒魷魚的打工仔。

五萬元在老馬看來是一筆拯救本公司的救命錢，而在陳大發的眼裡，不過是賭場上一局小小賭博的賭資。

當然小老闆的灑脫會使老馬拱手把五年辛苦的奮鬥，交給這個賭棍左右。想那宗申集團，也是近來才從市政府通緝夾縫中存活下來的小摩幫，時來運轉，也不知使用了什麼招數，居然替代了嘉陵集團這樣的獨霸四川的摩托王，成了重慶市三大摩幫巨頭，連他手下的一個小頭目，也敢今天在這裡說大話。

真可謂社會主義江山無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共在推行建立市場經濟的主意時，絕對遵守誰逮到耗子便是好貓這個原則。

錢，在初期長大的小老闆眼裡才是適應生存的手段。

回憶起來，八十年代後期，我去機械局參加會議時，就聽說重慶市幾個摩托幫主為求一席生存，躲避工商部門封殺通緝的故事，私人的摩托業主當年，最難弄到的就是生產許可證，而生產許可證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權，沒有錢買到生產許可證的工廠，即被認為非法經營。

對於重慶摩幫，我不清楚他們具體的發展過程，從沒有認真思索過它存在的理由，因此也無法估量他們今後的無量前途。

只聽說他們上午被工商查封了店面，下午又在另一個地點開了張，像遊擊隊作戰一樣，想不到這樣頑強拚鬥了幾年後，竟然長大了。

今天產生像牟其中這樣的中國巨富，那一個又不是鄧小平及其官僚集團玩弄於股掌之中的木偶？然而，隨著中國權力變幻，這些風流人物有幾個能逃掉階下囚的最終歸宿而曇花一現？

小業主們在市場經濟苛捐雜稅的重壓下，難免偷稅漏稅，或在流通領域中『違法亂紀』，是使他們淪為階下囚的原因。同時為了私企的發展，對這個失去了監督的官僚體制實行賄賂，就成了常有的現象。

重慶的幾個摩幫巨頭中，無論是左宗申、尹明善和涂塗建華都是善觀統治者臉色的投機者，只消看看他們在種種公開場合中打出來的旗號，就會明白他們向權力諂媚的程度。

左宗申的：「拳拳報國心，款款宗申夢」的巨幅橫幅，撐在交通樞紐的上空，尹明善大吼：「民族工業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中共在「政治是統帥和靈魂」這些叫得泛味的標語後，提出來比較切合民眾心理的口號。

中共的專制政體最命脈的一條，就是強迫全國人民在他們的意志下統一，儘管這些民族主義的口號與中共的綱領，牛頭不對馬嘴！！

中共所扶植的私人老闆，在改革開放中拚拼命扮演一黨獨裁的代言人，我在摩幫幾年打工就知到摩幫的底，他們絕決不願為科技發展而獻身的。

研製四輪車，在馬老闆這裡找不到一本設計資料。

後來在宗申和隆興的研究所，看不到屬於本公司自己設計思想的理論闡述和計算資料。在他們的開發室裡，找不到一輛屬於自己民族研製的樣車和換代產品，甚至於找不到一個獨特的樣車模型，裡面除抄襲和模仿外什麼都沒有。

至於摩幫研究所的領導人，無論是總工程師，總設計師，完全熱心於短期效益，照抄國內現有的其他廠產品，照搬國外過時的設計，工廠標準互相抄襲。

然而，只知抄襲別人的民族是一個永遠跟在別人後面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民族。這些老闆拿不出任何治理企業，規劃產品的方案來。國家和民族決不會因他們的出現而振興，也絕決不能依靠這些私企老闆求發展。

國家要這些老闆為生存而拚拼命賺錢，並交納徵稅，以取代原來的國企！！

在私企工廠的勞動者可以隨意被解雇，每個勞動日的勞動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星期天加班和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並且經常拖欠工人工資，這些就是走投無路的國企，所要達到的目的。

私企是靠盤剝更多的勞動力而生存的，所以在中共體制下的私人企業，是比任何資產主義更殘酷剝削工人的怪胎。

馬老闆在接到陳大發的五萬元後，立即派人買回了樣車製作所需要的鋼材及配件。三輪車無論是車架和車身上的設計，是現有機動車輛中最簡單的一種，對於從未從事三輪製造的我，仍堅持根據車的最大載荷，畫出每根梁上所承受的力。以選擇材料和斷面保證其剛度和強度。

三輪車結構絕大部份由焊接而成，為消除每個焊接點所產生的應力集中，選擇焊接材料及焊接方法，保證行駛中不致發生斷裂、變形等安全隱患；需要編制工藝，進行設計計算。但我翻找所有公司技術資料，卻找不到有關設計和工藝的資料。

而我按常規進行這種計算時卻受到三個老闆的譏諷。

陳大發板著臉問道：「像你這樣搞，等到你把整個計算拿出來了，雇主恐怕就另求廠家了，你懂不懂什麼叫商機，商機就要講快，沒有像你這樣站在講臺上給學生講力學計算的時間。我們宗申集團，不能讓你們這種書呆子當成試驗的場地，坐失商機」。

那老馬和老楊喊道，「老孔你要明白整個製造交貨期只有二十幾天，我們不能讓你慢條絲理的搞計算了。」他們的意見具有權威性，他們話語中刺激人的用詞使我懂得，這裡需要的是一些懂得普通三輪車結構的熟練工，而把我這樣的人當成絆腳石，我預感到我在這裡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實際上三輪車從來就講的「類比設計」，根據現有的車，憑經驗，甚至憑感覺選擇材料，確定斷面尺寸。

至於這樣定下材質斷面，會不會斷裂和變形，或者因為過份粗大而浪費材料，帶來功率損耗，就只有在今後從行駛中才能發現。

老闆為爭得商機，關鍵能不能在用戶所規定的時間拿出樣車，耽誤交貨的時間是決不允許的。我一個打工仔，怎能拗過財大氣粗的陳老闆？

明白了這層道理，我心中便有了主意，第一，三個老闆已經視我為障礙，既然他們已經跳到指揮開發的位置上，所以我只能儘快地躲開，走為上計。

第二，在我物色到新崗位前，千萬沈住氣，老闆怎麼說，就怎麼執行，同這些把精力花在賭場和女人身上的有錢人，犯不著爭誰是誰非。

就是看到明明錯誤的加工方法，只要是老闆定的，我就要裝做沒有看見。這樣，今後出了問題也不會算在我身上。

到了這個時候，我才體會到私人老闆有時比國有企業的廠長更不講理，更不懂科學，那怕兩個老闆在高等學府裡混過幾天。有了幾個臭錢就變成了凌駕一切的主宰了。

「城市貓」試製的開工的時間選在2002年十一月8日，楊經理說，這一天，恰恰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的日子，日曆上寫得清楚，這一天是黃道吉日，共產黨都相信天命了，陰陽八卦，講天道輪回，對於不信鬼神的毛澤東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他吩咐在簡陋的試製場地掛起了三大串鞭炮，燃放後，將臨時召來十多名工人召集起來，朗聲宣佈，宗申三輪自製的第一台摩托車就此開工。整個簡陋工棚裡立即被電焊的弧光照得通明刺目。砂輪機，敲擊聲，震耳欲聾，一改三個月的戚靜。馬老闆在下料工段指導著每一個下料尺寸和焊接方法。

從那以後，陳大發每天晚上十點鐘駕著他的進口立桑車，趕到現場對已焊好的車架，指手畫腳地發表一通意見。

根據誰出錢誰說了算的原則，現場的工人們都要根據他的意見，把已焊好的結構重新割斷，重新焊接，誰也說不出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種既不耽誤進度，毫無根據的返工更改，只好以延長工人的加班時間來補償，所以經常要做到晚上十二點鐘，而召來的工人對這種只加班不加工錢的蠻橫做法，心裡只有暗自罵娘。

但是，社會上的失業者到處都是，馬老闆招來的都是附近的國營長江電工廠下崗的待業工人，他們忘不掉失業待崗的尷尬，只好用白天消極怠工發洩不滿，並不敢違抗。指定的組長秦三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了討好老闆，背地裡把工人說的牢騷話都悄悄報告了老闆。

所以，小小工棚裡幾乎天天都要聽見陳老闆對工人的訓斥聲。

陳大發驕橫，楊老闆跋扈有餘，馬老闆陰陽變臉，三個小老闆各有手段，為了爭：「我說了算」誰都互不相讓。他們本就是為了「城市貓」優厚的外匯，臨時湊合在一起的利益聯盟，無所謂謙和和團結。加上他們那一個都憑著「我看這樣才好」的主觀意願，所以誰都不能說服對方。

有一次就所占廠房的租約，楊老闆和陳老闆沒說上五句話，便當著工人的面大吵起來，並不顧及他們同窗情誼，開口就拿對方的媽出氣，摩幫內說話粗俗已成習慣並不奇怪。

工人們看到小老闆為一點小事翻臉，也在老闆間拔弄是非，所以這個總共不到二十個人的集體，從成立開始就在吵吵鬧鬧中過日子。

看來，開工的黃道吉日並沒有選好。這使夾在這些人中的我特感難處，我本抱著拔一下動一下的態度，在這種一盤散沙的集體中幾乎動彈不得，最後，連秦三都認為我可欺，動輒當著老闆指責我。

我雖將技術上的決定權拱手還給了馬道剛，但老闆們隨意定出來的尺寸到頭來卻要我表態。我只好聲明，整個的設計都由陳大發決定，我憑什麼下結論？於是馬剛把編寫產品說明書和企業標準的任務交给了我。

車還沒造出來，技術參數憑什麼定？雖然可以胡弄我國商檢部門，但要騙用戶就困難了。當然，中國的商品基本是從外國偷學來的，造假仍是中國大陸的拿手好戲，我就只好根據馬老闆的意思，把我眼睛閉上，瞎抄別人的東西。

然而，我一雙不識時務的眼睛，看不慣缺乏機動車結構的外行胡搞，例如焊接車把龍頭，不能用切斷材料對接焊起來，這樣焊接起來會造成應力集中，潛伏把手折斷的危險；秦三將減震器焊成與車架幾乎平行，使它不但失去了減震作用，反而會因行駛中車架來回振動力作用，成為撕裂車架的原因。

當我糾正他時，他說：「那裡的位置不好焊，經請示馬總以後叫這樣焊的。」

我見他把Xina楊書記那一套原封不動的學了過來，忍不住長期所受的委屈曲，怒罵他是一條圍著陳大發的腿轉來轉去的狗。

一個三輪車底盤因沒有在動工前進行設計，違反機動車常識的地方，到處都是。這樣的「搶」字當頭裝出來的車，怎麼不發生致命的故障？就是陳大發不提出要辭退我，我早就準備離開了。

然而老馬，卻反對辭退我。經他們的商議，改派我去當採購零部件總成的技術顧問，買回來的配件因為買東西的人根本不懂這些件裝在何處，它的功能怎樣，買回來不是裝不起，就是材質不對，要反覆買幾次還不行。例如一根進汽管因彎曲度不對就反覆買了幾次。

試製就這樣在忙亂和吵吵嚷嚷之中進行下去，誰都說不清焊成的車架有幾成合格？正好，那位廣東的小羅，卻帶回了孟拉加國需要鐵殼四輪車車身的資訊。於是我乘機向老馬提出，將我派駐指導四輪車的外協。

鐵殼的四輪車身，是離南坪五十公里外的專汽廠大慶分廠製造的。每天一清早，我就起床，匆匆去乘坐從南坪到北碚的公共汽車。

晚上要摸黑才趕回來，回到臨時租的房間裡已是半夜，疲憊不堪，肚子還是空空的。插上電爐自己弄飯吃，一直折騰到十二點才能脫下衣服，皮膚觸到已很久沒有換洗過的被蓋，感到沾糊糊的，疲憊不堪的我還經常不能入眠。

在這種夜深人靜的時候，想到我已六十五歲了，仍隻身淒淒惶惶在外打工流浪。離婚後還不知家在何處，心中牽掛孩子，也不知道在成都入學怎樣了，現在可是他決定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

想到孩子祖父畢生獻身教育，到頭來，身陷冤獄，葬身囹圄。他的祖母一輩子立志教育，冤冤枉枉戴右派帽二十三年。我是中共政權下的黑崽子，家庭的不和，給孩子產生的壓力，在孩子幼小心靈中刻下了深傷痕。社會影響對他的傷害，致使他對前途迷茫一片，我想不出一點可以彌補的辦法來。

窗外飛起細細的雨來，又是半夜了，冬日的夜雨對於僵臥在租用房裡孤伶伶的我，感到特別冷，白天受那陳大發故意的刁難和刺傷，心裡真不是滋味，睡在床上難以入眠。

經過連夜加班，外銷的「城市貓」樣車終於在奮戰了一個月後，橫躺在工棚裡。進度倒是如期完成了，陳大發還按照比亞特公司的照片，將車架上發動機的位置移到了大樑的中段位置，並且為上下方便，取消了加強橫樑，拿出去在附近馬路上行駛一圈以後，車架的脊樑好像得了佝僂病似的，塌陷了下去。

我仔細地察看了整個的縱梁，除因為多次返工，反覆的焊了又割，割了又焊，留下無數癌細胞一樣重重疊疊的焊疤，使整個車架退了火似的變軟了。

所以當駕駛員一坐上駕駛台後，還沒有裝上車殼，車架中部便先掉下去了三公分，我心中明白，這是一台無論如何都不能正常行駛的車。我由此想到摩幫們的膽大不就是因為不懂嗎？不懂車的人指揮做車，發生的車禍比正常情况下更為可怕。

我正在對這些車架發怔，那陳大發卻在一邊衝沖著我吼道：「你站在那裡怔什麼！整車要按時交貨，進度必需得到保證，你現在根據車架尺寸，將車廂的結構圖畫出來，明天就去道角的車廂廠，無論如何要他們在五天内，拿出車廂，連夜裝車油漆不得有誤。」

我從蹲著的位置上站起身來，正想向他講我剛才測量的結果，勸阻他千萬不要把這種車拿出國境外出醜，但耳朵裡突然響起了他第一次到這裡來就曾說過：「……如果樣車搞砸了……我們充其量就當在澳門的賭場上輸了一把。」

又想到他已累次對我非禮，並揚言要辭退我，便一聲不吭的走到辦公室裡。

畫好草圖交給老馬審閱後，第二天，便拿著草圖向道角的方向趁車到車廂廠去。到了車廂廠，他們要求將車架運過去，他們好根據實際測量出車架和車身有裝配關係的地方，再定出車身的尺寸。

我告訴他們，老板正追著搶進度，不可能將車架運過來量尺寸。

下午我回到南坪的加工現場，馬老闆在吃飯時就命令我說：「光有車身還不行啊；你去把樣車的座椅給我定回來。」

吃過飯我又急忙奔座椅廠，與座椅廠的周廠長商量可不可以按我提供的尺寸先做一套？周廠長冷冷的說：「你們那個金彙公司一點信用都沒有，要新的座椅可以，但先要交付開發費。」

聽了他的話，當即向老馬打了電話，講明現貨沒有，要想另做座椅必得先交開發費。馬老闆在電話那一頭，惡言說道：「他們不供就算了，摩幫沒有先支付開發費的規矩，只是請周廠長想清楚，今後我們的外銷車開發成功，上了批量他想擠進來供應，就已經晚了」。

摩幫這種主廠吃配件廠兼以訛詐利誘相威脅，逼迫對方上勾是一種經常的慣例。我明明知道這次開發的失敗結局，四輪車的門鉸鏈還要等我到大慶溝定下來，不允為座椅糾紛耽誤時間。

於是便要了幾個長椅子拿回去改制，等到尺寸定好之後，再批量定貨不遲。主意打定，便買了一套長安車用的座椅，急急忙忙回到了試製車間。

老馬已經在門口等著我了，見我拿著長長的凳子回來，便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我說按照我們車的尺寸，長豐座椅廠確實沒有現存的貨，我只好拿回來現存的凳子，由長改短，確定安裝的準確尺寸後，再交由加工廠批量的供貨。



不料，他把臉一沉，訓斥道：「現在大家都在加班趕進度，派你去半天什麼問題都沒解決，拿回兩個這麼長的凳子怎麼裝？」那陳大發從工棚裡攢了出來說：「我們是私營企業，不能拿你國營廠什麼都等現存的工作作風來混日子」。

兩板子不輕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我實在忍不下去了，便將好幾天早已沃在心中的怒氣衝口說道：

「你們究竟要我幹什麼？是設計車身，我已經做了，拿座椅我也落實了，並且有了解決的方案，今天一天從早上六點起床，直到現在，工作變了三次，還沒有坐下來休息一下，我被你們當作一個棋盤上的走卒一樣，一會兒擺在這兒，一會兒擺在那裡，如果你們實在看不順眼，我走好了。」

說著我把扛在肩上的凳子往地上一擲，那秦三在一旁火上澆油說：「你這是什麼態度？」那楊老闆見我動了怒，便緩了口氣說道：「你吃了晚飯沒有，先去廚房把飯熱一下，填飽肚子再看怎麼辦？」我一看時間，已是晚上九點鐘了。

吃過飯，按照我在歸途中想好的方案，同一個工人一齊動手，將座椅改短，支架重做，一直忙到凌晨兩點鐘，兩付座椅已改制成功。馬老闆自覺下午說的話有些不妥，向我解釋說：「外商的交貨期逼得緊，你看我還不是和你們一樣，忙到這個時候還沒有回家……」

我想到再不離開，這種車出了國境線，今後打起國際官司來，我真要兜著禍事走了。晚上便寫好了離職的報告，第二天交給了馬總。

馬老闆看著我的辭職書一言不發，此時他從兩個多月的吵吵嚷嚷中似乎清醒了下來，他明白我們合作多年，開發四輪車走過了多少政策、技術、人辦、資金所鋪設的坎坷路。

2003年，一月份，宗申集團的基地從南坪，遷進了他們在大堰溝租好的廠房裡面。

就在我執意離開宗申公司的前兩天，兩台已油漆好，準備運往海關的「城市貓」三輪車，雄糾糾正開出了試製場地，在馬路上作裝箱前的最後也是第一次試車。秦三得意洋洋坐在駕駛員旁邊跟著試車，樣車順著銅元局一路下滑。

此時他的心裡很得意，因為這是他「指揮」的第一台外銷樣車的製作。

不料剛剛開出去不到一小時，估計兩台車駛到河邊的最低處向上回返的時候，馬老闆接到了秦三的電話說：「兩台樣車在上坡時，無論如何都爬不上來了，現在正停在河邊，只等公司派汽車把它們拖回來。」

等到兩輛新車拖回試製工地的廠門時，秦三沮喪的從樣車上走下來，我看到那里程表的讀數才十公里，再仔細看大樑已明顯壓彎，發動機離地面只有10cm，秦三嘆道：「後轎的速比裝成了平原型的，當然爬不上坡了。」

然而，我最清楚，還不知道有多少問題等著這輛第一台「城市貓」。還好，沒有傷著人，新開發的『城市貓』僅僅跑了十公里，便不能再開了，這個車架最後只能割斷，重新來過。

承諾按時交貨的羅老闆只好立即用國際長途告訴接貨方，因為客觀的原因，海關沒有通過，至於何時才能發貨？要等海關手續辦完以後。

當時對重慶三大摩幫有一句評語說：「只有摩幫那麼大膽，因為他們不懂。」這無疑是指的現象，要探究摩幫興起的原因，只能從國營企業的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生產不能創新，長期成為國家負擔上尋找。

摩幫的出現，幫助中共新的當家人，完成了甩掉國有企業摺得越來越沉重的包袱。國營企業「破產了」，大量的富餘人員順勢被推出了國有企業，留散到市井中，工人成了社會主義最慘的試驗品。

我不知道，重慶的摩幫怎麼會熱衷於「衝出國門」這種壯舉？被中共利用和操縱的摩幫，對自身產業所知甚少的水平上，盲目衝出國門無疑於「找死」。

也許把摩邦的『冒險』精神，說成中共改革開放的主流意識，未免誇大，但是用無知和冒失代替科學態度和誠實工作，個體戶短淺的暴利追逐，拿出質量極差的『中國貨』，無疑要在走出國門後受到國際制裁，今後會證明，廉價勞動力的中國產品，同中共的獨裁制度一樣將受到主流社會的抵制。

自從今年2月，我辭別了含穀，來投馬剛後，短短一年時間經歷的所見所聞，親身體會在市場經濟浪潮下的社會百態，目睹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期的表現，只感到亂麻一團，理不出頭緒來，更看不出它今後發展成什麼樣子？

#### 第四節：在勁隆公司

我將要投奔的是屬於大渡口區大堰工業園區裡的勁龍公司，它屬於三大摩幫之一的隆興公司。據這家公司的總經理譚總介紹，這幾年重慶摩幫從發達國家那裡引進了三輪、四輪，以及用於水上、雪地、沙灘等等道路的專用車。

他告訴我隆興公司準備成立一個特種摩托車輛廠，在聽到我的經歷後，他欣然的接納了我。

譚總大約三十多歲，他說他在萬虎摩托車廠當了八年的銷售經理，對於摩托新產品的開發，有濃厚的興趣。但因為他原本是學會計的，所以對機動車是外行。在我來前，他已從摩配廠家那裡聽到了我的情況，表示歡迎我來他的公司做技術指導，他的謙虛使我從樹了信心。

第一天去，我就在他的陪同下參觀了剛剛鋪設的生產線，如果說經營得好，特種摩托車，有很可觀的前途。

這一天返回南坪我原來租房時，已是晚上七點鐘了。沒想到，在我住宿地門口的馬路邊，碰到了馬老闆。他見到我，滿臉堆笑說，為了等我，他已在這裡恭候多時了，問我上那裡去了，怎麼手機一直關著？

我告訴他我已勁隆公司應聘，過幾天我就要搬過去了。他連忙勸阻我說：「過去一段時間大家都忙於產品開發，外銷的任務使我們彼此沒有交換意見的時間，對於一些誤解也沒有及時疏通，相互產生的不愉快希望不要往心裡去，我們已合作多年，彼此都十分瞭解，何苦為口角而離開？」

我心裡暗想，如果沒有試車對「城市貓」來了一個大揭醜，暴露出它的致命失誤，使他清醒，他會對主動疏通麼？

我告訴他，我雖是一個打工仔，但知道為人誠信。我既然已答應了譚總，豈有失信於人的道理？何況那陳大發對我已下過多次逐客令，我豈有再回去的道理？

他明白已經無法挽回了，說了聲「如果你在隆興工作不如意，我仍然張開雙手歡迎你歸來。」唉！有他這麼一番話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到勁龍公司第一天上班，我就被安排在開發部裡。技術部裡的工作人員小陳和小曾向我介紹了公司的情況，他們拿出一大疊香港著名影星，在公司成立慶典上與公司要員們的合影照片，在這些精製印刷的廣告中，最顯眼的是本公司特聘的「形像大使」成龍。

這幾年，重慶的商業廣告已為各行各業採用，重慶的摩幫為了銷售戰略的需要，用重金聘用一些名演員來作自己的代言人，李連傑，周傑倫，成龍等等巨幅照片佈滿了馬路兩旁。

至於摩托車的技術和質量究竟如何，是無法從廣告上知道的。

小陳和小曾打開了靠牆的檔案柜，裡面除了存放著勁龍牌兩輪車的企業標準以及原總工程師留下四輪車裝配示意圖外，連三輪車的裝配圖和部件圖都沒有一張，更不要說有關特種車輛的技術資料。

小陳說：它們全都儲存在開發部的三台電腦裡。

但是，我請他們打開電腦，看看裡面究竟存放了哪些資料，小陳卻說：「你不要拿正規的工程設計去要求摩幫，計算是沒有的，它們有時連參考的價值都沒有。一個車的車架就只要尺寸就夠了，至於講新品開發，只能按要求選擇現存的類似結構就可以了。」這大致就是摩幫們共同的技術狀態。

兩個年輕人向我介紹了公司的人際關係，他們說公司成立還不到半年，各部的部長都是新到位的應聘者，宗派關係還有沒形成，本公司工作作風還算正派。這使我感到很高興，以為可以放手幹點事。

於是，進入公司第一天，我就草擬了準備開發特種車的工作計畫。

按照譚總的工作安排，我們在裝配車間的樓上，開闢了一個足有五百平方公尺的樣車試驗基地，樣車在電腦上經過繪製結構圖，便可繪製車架圖。

利用這個便利條件，三台全新的三輪車底架圖，僅花了一個多月時間，便繪製出來，它們陸續在試製場裡誕生了。

下一步就是對樣車進行可靠性的行駛試驗，只有經過長途試車，才可以驗證我們所作初步設計的可靠性。也才可以驗證整車的動力、動力傳遞和結構是否合理，找出需要改進的地方。

然而試車的牌照卻一直遲遲地沒有拿下來，由我起草並經過譚總批准的試車申請報告，一直押在公司的經理辦公桌下。

公司的頭目說什麼「摩托車」試什麼車？這一筆費用該由誰來開支？他們根本不同意自己進行有創意的車體結構設計。

他們問道：自己設計的車身，用戶能接受麼？市場能接受嗎？我們是靠自己的錢來開工廠，而且又是小廠，開發後能否打開市場？即使一舉成功，大家爭著去學，你的新車說不定還沒有賣出，別人已經仿製成功了。這筆試制費豈不是替人家付了嗎？

譚總在公司決策人面前被問得啞口無言，試車工作由此受阻。

為了糾正譚總的開發計畫，隆興公司派了一個姓羅的人來擔任總工程師，乾脆取消了我領導的技術開發室。

這姓羅的積極主張「撿別人現存的東西做。」這是摩幫們對新品開發的原則！！這種時候我只好採取回避，獨自一人在開發室裡悶坐。

停在開發室裡經過兩個月辛苦開發的十幾種款式新穎樣車，被全部封存，！公司的管理機構卻像腫瘤一樣長大。這個總共六十名成員的小公司，就有一半以上的科室管理人員。

總經理以下有六個科室，分設五個部，最大的銷售服務部就占員十五人，幾乎是全體員工的1/4，物流部的採購人員就有五個，還有庫房管理人員五個，這樣的公司恢復了國有企業的所有弊端。

譚總為了推行部長責任制，排解天天都發生的扯皮現象，不得不每天召開生產協調會，然而，扯皮的生產協調會，除了拖住譚總的全部精力，並不能推動工作的按時完成。

這與我很熟悉的李友時代的農汽廠幾乎一樣，生產協調會上到會的部長們各說各的理由，然後毫無結果的散會。可是虧損卻像鬼魂一樣的附在這個新成立的公司身上。

我曾建議譚總少開會多調查，多調整不協調的部門，可是他說這是公司選擇的日本管理方法，誰也無法違背公司的管理思路。

貧窮百姓在中共致富誘惑下，重慶的三輪摩幫在其開始興起時，是由許多彼此獨立的家庭手工業組成。這些向大公司採購發動機和配件，借用大公司的牌名，一哄而上的，分散在重慶九區十三縣的街道小巷中的私營小「作坊」，從來沒有正規的設計。

這些質量低劣的三輪車，從四面八方湧入市場。小業主說如此總比失業好，正是靠著廉價的優勢，滿足了視生命很賤的城市貧民和農村苦力的營運需求。

這些帶著結構和材料的先天缺陷，使三輪車不斷發生翻車、車架斷裂、制動失靈、方向失控的致命事故，危害窮苦下層百姓的生命。

中國的車輛管理部門想通過國際上推行的3C認證，來消除或減緩這些層出不窮的人身傷害，扼制粗製濫造所帶來的交通隱患。但是中共各級官僚的腐敗，使3C認證機關把這種神聖的使命變成金錢的交易。

小作坊找到大企業，大企業出錢買認證，小作坊出錢買合格證，最後還不是維持老樣子。隆興公司也同相當規模的大摩幫一樣，絕決不會把3C認證的過程當成認真提高產品質量的企機。

在上級部門發出通知以後，一面向政府機關交錢，買過關的認證書，一面指示下屬子公司對過了關的3C材料依葫蘆畫樣照抄，偽造標準中規定的檢測資料，便成了公司獲取3C認證的方法。

譚總知道，我在專用汽車製造廠負責質量工作，所以把認證工作交给了我。我雖不願做這種花錢作假的事，也只能隨大流。

坐在辦公室裡抄襲其他單位弄來的檔案，填寫假資料，親眼看到公司把幾十萬塊錢拱手送給市的認證中心。承接這種抄襲的文牘工作，整整忙了三個月。

沒有多久，這個剛剛成立才十個月的企業，就處在內無新品可生產，外無過硬產品開拓銷路。在隆興公司高層管理層的干預下，已嚴重出現虧損。

到了2003年七月份，隆興公司的財務總監，拿著一張勁龍公司十個月來總計虧損百萬元的通知轉給了譚總，接著由隆興公司派出了一個審計工作組，進駐勁龍公司本部，把譚總推到被審計位置上去，他不得不引咎辭職。

我也被當成虧損的一般成員一齊下課，離開了這家公司。

早已等候我的老馬，聽說勁龍公司的人事變動，當即打電話給我，表示歡迎我重新回到宗申公司。他們那時已從南坪全部遷到大堰工業園區，就在勁龍公司的附近。從勁龍公司出來，我準備去老馬那裡看一下現場。

剛出門就被老馬碰上，他說今天湊巧，楊總、陳總都在辦公室，我們正缺3C認證的負責人，這一次你就不要推諉了。

我只好同他一起到了宗申現場，試製的場地擺滿了各種新型的摩托車，尤其已投入了孟加拉國所需的「城市貓」的成形手工模具。相比起來我的起步比他們早，可惜被開發不如抄襲的思想占了主位，勁龍公司在後期沒有投入，所以這裡反而先行了一步。

我們一邊參觀，一邊聽老馬介紹，宗申現在新品開發的工作全由老馬負責，大概因為擅自作主，使第一批的樣車完全失敗，陳大發已完全不干預開發工作，老楊也只負責外銷，不像原來那樣，多頭變成了無頭。

我心中有一些動搖，加上我已經脫離了勁龍，所以對老馬的誠意不得不加以考慮，畢竟我們是多年合作了。

我們走上了辦公樓上，果然老楊和陳大發都在那裡，他們見我到來，都起身相迎，陳大發第一句話便向我作了道歉，這種誠意不可以隨意傲對。

私營企業用人沒有那麼多手續，沒有那麼多彎子，靈活調整的優點，是官僚氣味實足的國營企業所無法企比的。原因很簡單正如陳大發所說：「我們花的每一分錢都是自己掏的腰包！」

賺的錢和虧的錢全要落在老闆肩上，是他們曆精圖治的原因。縱然有主觀盲目，不講科學，但吃了虧後便及時改正也是可取的。想到這些，我當即便答應暫時留下來試一試。

## 第五節：腦出血·打工的終止

「城市貓」開發的失敗，客觀上促進陳大發的反思。對他來說，最深刻的教訓是沒有認識到技術不是簡單抄襲可以得到。好在他本人也讀過幾天大學，明白設計和計算是一個產品必不可少的。

其實，私人老闆個個都是人精，趁我與譚總因勁隆公司大換班的機遇，便招我重回宗申，本來就是老馬一直關注的事。

然而，正當我準備重新搬回來時，一件我沒有想到的事發生了，它使我不得不結束我的打工生涯，進入了人生最後的晚年。

我在勁隆短期的聘用，是住在譚總原來的辦公室裡，這是一間只有一扇窗子的口袋屋，時值八月盛夏，我住的屋子十分悶熱。

當時我從舊貨市場買回一台舊的窗式空調，舊空調風力太小，白天已很累，晚上開足空調也只是一束解不了熱的風。

八月4日因為太熱，我睡在躺椅上。迷糊中漸入夢鄉，沒想到躺椅突然傾翻，我隨著躺椅跌倒地上，頭先著地。頓時天崩地裂，腦袋炸裂般的疼痛。

掙扎著從地上坐起身來，撫頭呻吟。打開電燈，穩了一刻，頭痛並不見減輕，但心裡對眼前發生的一切十分清楚，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難道我跌到了致命地方？」想到《血紀》還沒有整理，也沒列印，今生最起碼的工作還沒完成。回憶我一生曾經多少風雨和磨難，豈能就此結束？

忍痛從地上爬上床，看看手錶，時間正凌晨兩點，心中想，只有等到天亮再打主意。

我來勁隆後，剛剛在彈子石一家電力配套廠分配了工作的王玲，曾到勁隆來找過我，想到勁隆來。在我的介紹下，譚總接納了她，在我所在技術室裡擔任技術員工作，那時她已結婚兩年。我既碰到了眼下這種事，舉目無親的我，只好依靠她了。主意打定，靜靜等著天亮後，用電話通知她再作定奪。

迷迷糊糊中，感覺頭痛減緩了，不知什麼時候，廊沿的扶梯口有了腳步聲。窗上已漸漸眨出白光，勁隆公司的工人們正陸續起床下樓洗漱。

我用手機給王玲掛了一個電話，告訴了她昨夜我跌倒的事，請她上班進辦公室前，務必到我這裡來一趟。

九點鐘不到，王玲來了，我馬上囑她去藥店，為我買回兩盒「腦心通」。中午，她買回藥來並告訴我，藥房的人問起我的情況，關照她說：「像這種年齡，頭部跌傷，切不可大意，最好能馬上去醫院檢查一下。我服藥以後，感到頭痛已經減輕，並沒發生嘔吐，說不定就是普通跌了一跤，我命大不礙事。

反正今天還沒有去宗申報到，我可以好好休息一天，看情況如何！

第二天，頭痛減輕了，起床時除有些恍惚，還能行動。於是我並沒有告訴老馬我跌倒的事，照常去宗申車間上班，為現場解決了一個三輪車制動管路的鋪設，下午回辦公室著手三C認證標準的起草工作。

如此堅持了半個月，我的頭部傷勢一天天嚴重起來，吃藥並不見效，白天頭痛加劇，晚上睡不著覺，尤其是走路雙腳不聽使喚，一向以硬漢自居的我，終於感到無法再硬撐下去了。

八月二十一日，我向宗申公司告了假，獨自一人踉踉蹌蹌走到公路上，搖搖晃晃的爬上了過路的公共汽車，到袁家崗的重慶醫學院第二門診的腦外科就診。

在那裡，一位才從北京醫學院畢業的腦外科醫生，在測了我的血壓，翻看我的瞳孔後，囑我趕快去CT室照片，他說我的病情已相當嚴重，延誤治療我的生命都會危險。

CT照下來確診我是硬膜血腫，我的後腦勺裡微血管破裂，後腦勺下部已經積存著大量的淤血，必需馬上做開顱手術清除淤血。

我在門診裡接通了王琳的電話，請她趕快到重醫來。

下午五點鐘，王琳為我辦了住院手續，醫生將王玲留下來守護著我。晚上七點鐘，我被送進了開顱手術室，這種手術有生命危險，進行手術前，一定要我的家人在手術通知書上簽字。

但此時，我到哪裡去找我的家人來簽字啊？我已離婚四年，唯一的孩子遠在成都，這時候，我才感到我行為的冒失，痛感到離婚以後獨自流浪在外無依無靠的狼狽。果真我就此一命嗚呼，連收屍的人都沒有！

簽字總算由王琳代筆了。

在無影燈下我漸漸地麻木過去，只恍惚地感到手術臺周圍，幾個穿白衣服的護士來回忙碌著，耳邊響著手術刀打開顱骨時撕碎頭蓋骨的聲音。

忽然我看到王琳還呆呆的站在我的病床前躊躇，她說：「醫生不准我離開，要麼有人在這裡守著你。所以從現在開始，得請一個看護，我要回公司上班。」看看時間已是下晚一點鐘了，原來她一直守護著我沒有離開。

一個臨近病床上的男看護走過來說：「每天只要給我二十五元看護費，病人就交給我吧！」我才想到王琳明天還要上班！於是催她趕快回公司。

一連兩天，我徹夜不能入睡，頭部開刀的地方像一把刀在傷口上不停的紮，我摸摸我的被子，分明感覺到那粗糙的棉布。

見我開刀後效果很差，醫生復查的結果證明第一次開刀，淤血並沒取淨，而且原來破裂的血管也沒紮好，他們決定還要開第二刀。

我囑看護接通了範萍的電話，請她無論如何趕緊到醫院來一趟。

那一夜可是最痛的一夜，我感到我的靈魂已經超離了肉體，從病床上飄了起來，我想我已經死去，人死後，靈魂便從肉體上出竅，在空中自由遊蕩。

迷糊中我在空中尋覓著我的母親，母親始終沒見著，倒是蔡家場那池塘邊的老宅見到了愛萍，她還是像當年的少女那樣迎接了我，我握住她的手說我自由了。可以牽著你穿過山坳河灣去尋找那屬於自己的家了……

接到我打的電話，中午範萍帶著她的侄女和同事五六個人站在我的床前，並在我開第二次手術的申請書上簽了字。

我再次回到了無影燈下，又一陣風吹來，將我飄起的靈魂又沉沉地攆到塵埃，我聽見我躺的擔架護理車車輪滾動的響聲。

晚上，當麻藥解除以後，我的頭部像炸裂般的疼痛，像一把尖刀截著我的傷口，一下！一下！耳邊隱約響起愛萍的哭聲。

我安慰她說：「別哭、別哭」人的靈魂是不會死的。人死只不過是靈魂從原來的軀殼上超脫開來，依附到另一個軀殼上，所以只要你記住我的靈魂，我們可以在另外的地方重新相聚，那地方也許就是人們常說的來生吧，只是來生千萬不要重演今生的悲劇。

好久好久，我又重新回到了那四壁白牆的病房裡。

我明白，我還活著，身旁已沒有親人，范萍她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走了，剩下的依然是那陌生的男看護。

此時此刻，我最需要的是親人的安慰啊，但是能給我安慰，撫平我創痛的人在哪裡啊？頭痛加劇，眼前除了天花板便是白色的牆，我只好心裡數著數，一、二、三……打發著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

第四天，手機的振鈴響過以後，電話裡傳來馨兒的喊聲：「爸爸你怎麼啦，王琳姐才打電話告訴我你跌成腦出血了，我這就請假從成都趕回來看你……」

兒子帶哭的喊聲使我暗自流淚，常言道：「知子莫若父」。孩子生長年代對生活的追求，與我們這一代相隔太遠，他沒有按我的希望成才，卻被社會奪了過去。

小小年紀就離開家，獨自在外闖蕩，我對他缺乏理解和耐心，幾乎對他失去了信心……此刻我為我沒有盡人父之責而倍感痛心。

蒼天保佑，現在，在我孤伶伶的一個人與死神較量的時候，在我最需要親人關心的時刻，孩子終於要來到我的身邊了，我枯瘦的臉頰上淌下了熱淚。

高效的消炎藥物和疼痛的傷口日夜折磨我，使我一點胃口也沒有。整整一個星期我不想進食，只能靠喝水度日，但是體溫和心臟證明我的身體能夠抗過這場死劫，重新活過來。

第六天，我的孩子終於來到我的床前，他給我帶來了蘇打餅乾，還帶來在醫學院工作的小陳，他們忙碌的查我的病歷和服用的藥物，儼然像醫生，好像在檢查給我的治療方法是否正確？

吃飯時，他用匙子餵我，問我好不好吃？我看著我的孩子想到他兒時，我駝著他去上學，一邊教兒詩的情景。從兩歲開始到十歲的繪畫作品至今還保留在書櫃裡，等我康復後一定重新把它們整理出來交給他。

第七天，劉啟建終於來了，她一來就聲明說是孩子叫她來的。她那人格的尊嚴，是無可厚非的，如果不是法院的判決，她到了最後都表示拒絕在離婚協議上簽字。現在既然已經離婚了，她就不能主動看我了。

回想起來，在我們結婚的十八年中，我一直沒有愛過她，活了一輩子也沒人關愛，她也夠苦的。天哪！「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我千絲縷，天涯地角有情時，只有相思無盡處」我是生錯了時代，建錯了家哪！

我在動手術後的第九天，第一次從病床上站起來，在看護人員的幫助下走出病房，穿穿跌跌的走出病房，那天是陰天，我的語言功能還沒有恢復，我多希望有人能同我談心啊！我記不得有多久沒同人交談過了，當我在醫院的花園裡慢慢在陪伴人的摻扶下散步，我多麼希望有人同我講話。

下午，我的中學同學申德榮來了，他與我中學同班，從初一到高中畢業。我平反回北碚，常和他相聚。

後來他退休不久遁入佛門，從此篤研佛經，我們經常在一起談論世間的善根惡果，與風輪法師一樣，他以人間因果報應為依據，勸我皈依佛門。

這一次他聽說我跌成腦出血，來看我時，專門給我帶來了神龕上供佛的水果，和一盒頌念阿彌陀佛的磁帶。教我跟著磁帶上放出的音樂，每天頌念百遍，自會心裡平順，傷勢也會在菩薩的保佑下很快康復。

其實我本來篤信因果報應。若非雜念無法排除，而信守了隨緣自生的安排，還在凡間徘徊留戀，飽受人間的苦難，也許我已隨他出家了。

他坐在我的床邊開導我說：「人生無常，你要切記，就比方說，你突然跌了一跤，肯定是有緣因的，那一刻改變了你的一生，這就是無常。無常不定因欲而煩惱。」

跌那天正是我的生日，難道這是佛的警示？他繼續說：「我勸你抓住這個機會，從此信佛，免去了六道輪回，再不受人間輪回之苦，豈不善哉！」跟著老同學出家山林，在心理上尋找依託，但又怕晚年孑然一身，怕我烈烈一生就此消影山野。左右思來，不得其果！我與皈依佛門失之交臂。

自從申德榮來過以後，我循他教導，每天放頌他給我的磁帶，從此以後，我的病床前一早一晚，都會響起悠揚的阿彌陀佛頌唱。就如他的說法，我果然一跤瞬間就改變了我此生的道路。人是多麼脆弱，就跌了這麼一跤，便永遠結束整整七年的打工生涯。

以後，在我病體恢復期間，我的心靜下來，成天很少出戶，整理我一生的回憶錄，最後，完成了《血紀》的長篇整理和列印，我決心用自己親身經歷來記錄這段中共所創下的歷史。

從此，早晚在佛的面前焚香、悔過，雖然我心與潘老相仿，時時還有雜念纏著。

## 第十一章：尋訪

1980年，在二十四中任教工作暫定後，生活暫時安定下來，隨著片斷的撰寫，每當夜闌人靜，死難者的音容笑貌都會來到我面前，與我交談，大致因為我在他們犧牲時走過他們的遺體前留過誓言：「只要我能活著出獄，我定要將你們的事蹟告訴全中國，把你們寧死不屈英勇就義告訴全世界。」

現在，是該把烈士們的噩耗告知他們的親人了。

### 第一節：尋找烈士的家

可惜我連他們生前準確的住址都沒有，當時又沒電話，在人海茫茫中，我與他們又從未謀面，大海撈針，徒步尋訪，他們在那兒呢？

根據劉順森生前留下的地址，我曾兩次去大陽溝尋找他二十五年前的家，據他講，他的姐當年是重慶共青團委的幹部，一九五六年他被抓進少管所以後，便與那個三代工人的家庭斷絕了聯繫，為了不受到劉順森的影響，他的姐姐割斷親情以求自保，這在中共統治時期是普遍的。

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口號下，扭曲人性破壞家庭。但我不相信人性因此而泯滅。我相信劉順森的老父老母不知為失去親骨肉流過多少淚！我甚至還相信，劉順森的姐姐在經歷了這二十八年的風風雨雨，體會中共宣傳的欺騙和虛妄，

事久以後，在中共法西斯真面目越來越暴露，被扭曲的靈魂也在恢復，割斷的親情必將重新建立。

劉順森的親人們，一定會像張錫錕的親人一樣，翹首等待他的歸來。因為她們比誰都瞭解劉順森，他的聰明，正直和冤曲，他們沒有理由死守曾作過的荒唐決定。

如果此時，我把劉順森的死訊告訴他的父母和姐姐，她們會怎樣反應呢？我雖不知道，但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正是帶著這種心情走進了大陽溝。

整整一天，我的足跡走遍了那裡所有小巷，挨家挨戶詢問：二十五年前，這裡有沒有一個曾在市團委工作過的姓劉的女人，然而我每穿出一個小巷時，總是帶著悵罔再穿進第二個小巷。最後在一無所獲後，只好改變主意，讓歲月將她們浮出來了。

尋找皮天明就更難了，在鹽源我就沒有打聽到他家的確切位址，只知道他還有一個親弟弟在漁洞，可漁洞那麼大的地面，那一家才是他的家？

漁洞屬九龍坡區，從北碚到漁洞要轉兩道車，過長江到南坪再轉車，光趕路就得花五個小時，所以我特別作了準備，選了一個晴天，早上五點鐘乘上公交早班車，天不亮就出發了，直到上午十一點過，我才到達漁洞車站，下車以後，不知該向那個方向找，懷著僥倖去叩開那些街邊一間間簡陋小屋的柴門，詢問有沒有姓皮的住戶？

依據他生前對他的後娘和兄弟的描述，應當就在街上，然而走遍了那裡所有的巷道，只問得兩家姓皮的人家，他們都不知道我所說的人，更沒聽說皮天明的情況。

想到他赴義前，在六隊的大監門口臨就義前的囑託，我便挨著大街一戶一戶的問下去。

花了整整一天，人雖渺無蹤影，但我的心意已盡。直到下午過了五點鐘，證明我的尋訪失敗從回車站，望著灰色的街道，我擦著汗水悻悻離去，再次寄望未來的歲月或偶然機會，將他的親人們浮現出來。

陳力就更難了，他壓根就沒有向任何人講過他的家在何處，只有他被捕入獄時的華龍橋彈簧鋼板廠還在，興許在那裡可以問到他的父親，和他家的下落。然而，就在鋼板廠的門房那裡，便將我擋了出來，他們說，從來就沒有陳力這個人，更沒有聽到有關這個人的事。

在中國為民主和正義而獻身的人怎麼這麼淒慘？難道他們的家都被毀滅了不成？當然，他們的檔案會提供他們的下落，不過，那一定是在民主革命勝利後。好在，我的《血紀》有他們的記載，不會讓他們在地下默默無聲。

## 第二節：馬開先的下落

一九七九年的九月我從鹽源平反歸來後，就一直打探馬開先的下落，原因出在劃我為右派後，這是我心靈上烙下的最厲害的隱傷。二十三年來每次想起，心裡一直很傷心。

自從一九五八年我離開重大後，我們就被強行拆開，從此，我和她天南地北各赴冤獄。尤其是，我要弄清當年曹英為鬥倒、鬥臭我倆，是怎樣誣害我倆的？她怎樣度渡過這二十三年，現在又在何方？

當年重大來鹽源為我「平反」時，我嘗試向鄭老頭詢問過她的下落，但被拒絕回答，79年回重慶路過成都一直留意尋訪，想在偶然中找到她。



後來我向重大保衛科和落實政策辦公室詢問她的下落，結果都被拒絕，這就更加令我懷疑，當年給我們的誣陷，定有不敢公開的東西。

受到這種羞辱，而不理會，還算七尺男兒麼？

### （一）線索

一九八九年冬天，有一次在街上，我偶然碰到了離別整整三十年的鄭業文，她姐姐當年也在北碚托兒所工作，姐妹倆父母早亡，從小進了孤兒院。這次與鄭業文相遇時，她已滿頭花發，相互傾訴二十五年遭遇後，她滔滔不絕倒出一肚子苦水。

原來一九五八年反右運動尾聲，七十六名極右份子離開重大去南桐後，鄭業文姐姐在托兒所向黨交心時，說他們兩姐妹的祖父曾是合川縣地主，鄭業文因此從重大實驗室「清理」出來，下放到北碚東陽公社。

開始她在一所小學當教師，文革時卻被公社的幹部誣為地主階級的後代，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拉出來批鬥。

那時她剛懷孕，仍不能避免站在凳子上受到一連六小時的鬥爭，殘酷的懲罰使她小產，幸好中醫院老醫生相救，母子終於逃脫了生命危險。

後來她拖著孩子打掃過廁所，拉過板板車，掙扎著度渡過了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歲月……

她一邊叨叨不絕訴說經歷的傷心事，一邊痛哭起來。其實她們的祖父早在她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中共的運動並沒有饒過這對可憐的孤兒。

那一次相遇，我問到楊明彥下落，鄭業文告訴我：「楊明彥自一九六一年重大畢業後，分配到四川農機學院任教，在文革中她受過批鬥，但遭遇比我好。一九八七年四川農機學院改名四川工學院，她就一直在那裡任教。當年重大在成都老校友的下落，她幾乎全知道，興許楊明彥能提供馬開先的下落。」

正好，我廠有一位叫陳孝牧的檢驗科人員，他是一九六七年應屆四川工學院畢業生，是楊明彥的學生，他說過幾天他要參加學院建校三十周年大慶，我當即拜託他回校參加校慶時，務必不要忘記去看楊老師，並向她轉告我的問候。

為了說清我找楊明彥的目的，我專門寫了一封簡單的信，托他當面轉交給她。那封信簡單講了一九五八年我被劃成右派後二十多年遭遇。

陳孝牧參加校慶後回廠不久，我便收到了楊明彥從四川工學院發給我的回信，在這封整整八篇長信裡，她的傷感傾瀉無遺，讀罷我的身心溶進二十年前那段天真童貞的回憶。——

「看到你的來信，我久久不能平靜」，她寫道：「一個勤奮好學，喜歡探索，有理想有上進的青年，被整得這麼慘，使我萬分痛心……你是我敬重的中學時代的校友和兄長，要不是挨整，你一定比我的成績更好」。

少時友人對我的遭遇表示痛心和惋惜，給我帶來了安慰。

楊明彥也許是我當年同窗中最幸運的一個，她在這封來信中，講到她的家，她的丈夫是在我們大學求學就認識的，她在讀書時他已工作，在那種險惡的年代，她倆從大學開始戀愛，終於有了善果，這在同時代人中要算稀貴的。

信中還介紹了她的事業，她已是有多篇著述的機械專家，眼下還帶著幾個研究生。信中追述了她家在58年的遭遇，她的父親也在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當時剝奪了他在西農正常的執教，將他放到一家勞改工廠，後來死在獄中。

一九六〇年以後，她們姊妹三人被拆散，一個流落他鄉，一個在工廠做工。唯獨她才僥倖從重大畢業，分配到四川農機學院執教至今。但她沒有逃脫文革的風雨，挨鬥抄家，對她這種被稱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人是免不了的。

對我托她尋找馬開先的下落，她寫道：「歷次運動中私心重的人確實害了不少好人，這筆賬就算在錯誤歷史上吧……如果整你的人有點良心和人性，他們自會受到良心責備。你夠苦了，去找這種小人算帳反而傷自己，不值得」。

無辜受害者，到今天也只有懇求「歷史」懲治那些做盡傷天害理壞事的人，而無法懲戒這些壞人，甚至於連控訴餘地都沒有，還蒙在鼓裡的楊明彥把一切只看成個人整個人的行為。

後來我接連收到她的幾封回信，告訴了我一大竄在成都地區工作的，我的同班老同學地址或下落。其實人的相聚是要講緣份的，想到我被揪鬥的那些日子，同班中幾乎沒一個人向我表露同情，哪怕講幾句值得我永生紀念的關懷話！想起他們在鬥爭會中學舌的醜惡嘴臉，我就對他們感到噁心！。

## （二）訪少年學友

第二年春天，利用一次出差成都的便利，我專程去拜訪了楊明彥。記得那天正逢成都的花會期間，座落在成都郫縣的四川工學院風景格外美麗，但不知為什麼，我的心情卻一直很沈鬱。

汽車在四川工學院的大門口停下。走進校門，按照門衛指點的路線，我在教學大樓西側的一群老式三層樓的樓群中，找到了她住的那排房子。

從一九五八年一別至今，已過了整整三十多年，從她略呈花白的兩鬢中，我仍可以認出她來，她那男孩子般的倔強，以及特別清晰的五官，讓我記起少女的她，看她那樣子，心情肯定也很激動。相見一剎那，表面裝得十分平靜，心裡翻騰著複雜的波瀾，

她伸過手來接過我提的皮包，一邊解釋道：「早上我去校門兩次都沒有接到你，今天又不湊巧，天倫又在開系務會，女兒出差去了湖南，家裡丟著兩歲的孩子，我怕母親照應不過來，就沒有去車站接你，太抱歉了。」我奇怪的望著她，聽著她那毫無驚訝很隨便的口氣，好像我們是分別了不久似的。

於是我問道：「我真的還是三十年前的模樣，讓你一眼就認出來了？」她微微一笑說道：「你不是在上封信寄來過照片麼？我怎麼認不出來？」聽她這麼一說，我也笑了起來，回答道：「你雖然老了，但少女的輪廓還沒有脫形，這就叫『本來面目』。」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我原來憂鬱的心情頓時輕鬆了許多。

當我跨進她家那扇已經褪色的朱紅木門時，我才意識到原先估計她住的「教授」別墅，同眼前所見相差太遠。這套房間還是二十年前的「遺產」，毛澤東時代，大學裡的臭老九們住這樣的房子已經相當不錯了：兩間臥室，沒有客廳，也沒有過道，外面一間放著兩張大床和一個兩開大櫃，這便是大陸十年「改革開放」後，中年知識份子的家境。

臨窗放著一張辦公桌上面，堆滿書籍資料和字典，牆上掛著繪圖用的三角板、丁字尺和繪圖儀器，證明這裡是集臥室、工作室、研究室為一體的「教授房」。一張木桌四個凳子證明這又是吃飯的地方，房子裡已經十分擁擠，沒有任何可以接待客人的地方。

通往裡屋的，同樣是朱紅木門裡掛著簾幃，門半掩著。主人打開那門，裡面同樣擺著兩張床，床的四周被整齊的大櫃子包圍。大櫃裡整齊的插滿了各種大部頭的精裝參考書和工具書，這樣一佈置只留下了不足三平方公尺的「活動空間」。

靠門邊那床上，一個兩歲的小男孩正在那裡搭積木。當我們走進去，他朝我們望瞭望，依然聚精會神的在設計著他的「建築群」。我取過提包，從裡面取出那可愛的『唐老鴨』，放在床上按動電鈕，便在床上「撲」動起來，還發出「呷」、「呷」叫聲，孩子立刻被吸引到它的身上來，從床中間搖搖晃晃的站起身來試圖捉住那「怪物」，逗得我們都哈哈大笑。

這時楊明彥忙教孩子：「小迪快喊孔爺爺」。聽他這麼教，我頓時感到時間已在中共迫害中，將我們拉成兩「代」，我的孩子還只有七歲。

門外傳來一聲老嫗輕聲的招呼：「明彥，紅燒雞的醃料還沒有買，我這就去小賣部，灶上熬的排骨湯你看著點。」

估計她是楊明彥的母親，少年時我曾在西農見過，今天怎能不向她老人家打個招呼！當我跨出過道，便見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太提著菜籃子向樓梯口走去，我連忙喊了一聲伯母。她同我母親年齡相仿，退休時還是西農講師。

從她蒼老面容，可知她過去吃了不少苦，她回過頭來，向我點頭，明彥介紹說母親專職在家帶孩子。說中國知識份子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青黃不接，其實也未竟然。

中共統治下，幾乎沒有什麼知識份子「潰缺」的時候，就是到了改革十年初，知識份子依然被閒置一旁，並無他們的用武之地。

現在我明白，楊彥信上所說的四代同堂，便是講她的家四代人口，濟濟一堂於這兩間陋室之內的現狀。這樣的四代同堂，客廳可以省略，但人要吃飯拉屎拉尿，這廚房和廁所就少不得的，好奇的我向楊彥發問。

她指著過道對面的一個磚牆砌起來的小屋說：

「這裡原來是學生宿舍，每層一共十間房子，新建的教學大樓竣工後，學生宿舍搬到西側的教學大樓南面。這些騰空的舊房子便加以『改造』，將兩間房中間打通，增加了一道門又封掉了一道門，成了一戶人家的一套兩居室，用來分給老知識份子住。臨時過道上又搭建了小廚房，浣洗間和廁所，兩家共用。」

我走進了那兩家共用的廚房，那大概就只有五平方公尺，裡面放著一個爐子和一個燒木材用的灶。那爐子上的銚鍋裡，正溢出排骨湯的香氣。這種住宿條件，與我在80年初回重大時所見右派的家情況相似，至今十年來依然如故。

他們在極不公正待遇，在歧視輕蔑裡，仍保持著那勤奮的韌勁，無怨無悔的勞動著。有詩雲：「陽和不散途窮恨，霄漢長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

九十年代，中國的大款已紛紛上市，住的小洋房，駕的小汽車，請的是保姆。游泳池花園，高檔生活設施應有盡有，還要養情婦二奶，靠的是官本位的錢權交宜，隨手撈來，八旗子弟們發福得輕飄飄的人們，從八九年的六四民運以來，更感到這特權不可丟失。

現在對「性資姓社」的無聊爭論不感興趣的官僚們，只盯著權和錢，活得快活的人，不屑於知道創造財富的下苦力都市勞動大軍；也不屑於知道，中國的科學家和專家們，在怎樣條件下奉獻自己的奶汁。

我忽然想起一九七九年回重大時，已癱瘓的錢企范教授。

可惜，中國知識階層這頭「牛」除了耕耘，被人鞭打，被人擠奶外。最令我不解的是，他們為什麼不像正常人那樣反抗施暴者？卻以德抱怨。

「過去的不就談了」這是我的舊友們共同的口頭禪。

能不談麼？能不知羞恥麼？能不知雪恨麼？能做一輩子忍字當頭的順民麼？毛澤東對知識界的一個斷論，就陷死了中國知識界的一生？他說「知識份子是在統治階級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正談話間，忽然樓下傳來了喊聲：「楊明彥接電話」。她向我做了一個歉意的手勢，便匆匆下了樓。我再次環顧了四周，暗暗自問道：教授也夠可憐的，不但身居陋室，連電話都沒有一部。

兩分鐘後她上樓來了，帶著無奈對我說道：「真對不起，本來今天，為了你遠道而來，我專門請了一天假，但連這一天假我都不能自由支配。剛才系上來了電話，叫我把資料室的鑰匙拿過去。」

她的母親剛從付食店回來，不聲不響的獨自到廚房去忙碌了，我又插不上手，便在屋裡教她的小外孫玩唐老鴨。

大約十二點鐘了，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家，我們互致問候後，便忙著將她母親已弄好的菜餚端上方桌，今天除了我這個「遠道」來客沒有外人，相互之間沒有拘泥。一到吃飯照樣會與十年前聯繫起來，大家都是飢餓年代的過來人，對那段數糧票過的日子印象太深，比較起來，眼前日子算是「天堂」的生活。

席間，她告訴我，她已問遍了過去重大畢業來成都工作的同事，他們並不知道馬開先其人，更不知道她的下落。

不過在成都科技大學機械實驗中心工作的楊治國認識馬開先，而且是馬開先的遠房親戚。看看能不能在那裡得到馬開先的一些下落？

楊治國是我在重大同一專業同年級的同學。在重大時，因為詩歌文學創作方面愛好，我同她都曾是重大業餘話劇團的成員。一九五六年的暑假和寒假，我們還在重大話劇團的組織下，去重慶市話劇團受過培訓，在參觀了當時該劇團彩排的曹禺名劇「雷雨」時有過交往。

在楊明彥家吃過午飯後，便在他們夫婦的陪同下轉了一下校園，直到下午五點多鐘我便向她道別，回到了我出差住的川南旅舍。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楊明彥提供的電話先給科技大學掛了一個電話，證實楊治國確在成都大學的機械實驗室裡工作，並且這些天沒有外出。

吃過早飯便乘坐公共汽車外環線路南進，過了九眼橋，大約九點鐘，我已順利地走進了科技大學的校門，並在門崗指點下向學院東側的中心大樓走去。

當我走上實驗大樓門口的石階上，一位工作人員接待了我，在他帶領下，我走進楊治國的實驗室，見一位穿著白色大褂年近半百的女士，正同兩個年輕人忙碌在一台拉力試驗機前。引路人指著她，示意她便是我要找的人。

學生時代一別至今整整三十三載，眼前的她已兩鬢花白，只是托老天保佑，在亂世後，和楊明彥一樣，在她多年耕耘的天地裡忙碌奉獻，若不是因為我突如其來的尋訪，恐怕我們今生都難以重逢。

按學校規定，工作時間謝絕會客，但她破例轉過身去向兩個年輕人交待了幾句，便引我到隔壁的小會議室就坐，我明白，雖然是久別重逢，但這裡不是暢說舊事的場所。在遞出了我的名片後，簡單介紹了我現在工作和近況，聽完了我的故事，她喟然一聲長嘆傷感的說：

「這些年大家都有一本辛酸經啊。」這簡單的感慨已勾畫了這三十多年來，她所走過的人生道路。

明白我的來意後，她走出會議室，兩分鐘後拿了一張名片遞給了我，告訴我說，馬開先現在何處她不知道，但她有一個親堂弟就是名片上的這一位，你不如去找他，說不定他能告訴你。

那名片上寫著馬開運，工作單位是成都氣象學校總務處。看來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年尋找，我終於在浩如煙海的人流中覓到了她的蹤影。

從成都科技大學乘公共汽車奔氣象學校的路上，我坐在公共汽車上，想這些年，我在中學同學中每次打聽馬開先下落，就聽他們說我和她的種種誹聞，這些誹聞，全是曹英們為批臭我們而編造的！

至於我的冤情和當年事實卻無人說起。他們寧可道聽塗說，為什麼不顧事實和受害人長達二十多年痛苦，起勁向受害人傷口上撒鹽？也不願為被害人說幾句公道話！

母親聽到這些謠言，勸我再不要找馬開先了。

然而不明真相的人還在向我身上潑髒水，就越堅定了我揭示真相的決心。雖然我將拜訪的是馬開先的弟弟，這個人會持什麼態度我心中沒有底。

十一點鐘我在氣象學校的門房裡，馬開運的愛人接待了我。當時這位女人並不知道我是誰，更不知道我的來意。當時該校正在建設，建築承包人經常到總務處找馬開運。

那女人熱情的招呼我，忙著請我坐下，一面端上茶杯，一面殷勤的告訴我說，馬開運今天出差到龍泉驛去了，要到下午很晚才回來，如果有什麼事，儘管向她說，她會如實轉告的。

於是我只好向這位從不認識的陌生女人，亮出自己的名字和「隱私」。我預計如果她和她的丈夫知道馬開先的下落，至少也會把她現在何處告訴我。

但是我的話還沒有講完，令我吃驚的看到，她那薄施粉黛的臉突然一沉，眉眼立即倒立起來，原先謙和的態度傾刻變得兇惡，充滿敵意訓斥道：

「最好你別再找她，你還嫌當年害她不夠是不是？你現在聽明白了，她已經有家，有兒女，她恨著你，也絕決不會再理你，你還是走吧！」

在這突然變化的臉面前，我鄂然了。遭到拒絕的可能雖在我的預料之中，但，聽她那種對我和馬開先的事是那麼熟悉，又是那麼敵對的口氣，使我的心涼透了。

面對向我撥來的這盆污水，我太難堪，看到辦公室裡另外兩個年輕人，都莫名奇妙地看著我，心裡說不出一種什麼滋味，嘴巴也像被堵著說不出一句話來。

懷著一股被羞辱被驅趕的惱怒，我從坐椅上霍的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走出那學校的大門！

此刻我的臉熱辣辣的，好像被剛才那女人狠狠搨了兩耳光。憤怒和羞辱頓時集中到剛才這個毫無教養的婦人身上，卻又罵不出口，無法渲洩，小跑著向車站走去。

這一次算是給我上了一堂深刻的「世情」課，哪怕在大陸這塊災難的土地上，中共害死了那麼多無辜百姓。鄧小平平反冤假錯案，也只給被害了一生的人有一口飯吃而已，八十年代，一度興起的「傷痕文學」，用被害人淒慘遭遇，也只贏得善良人們的一抹眼淚。

只要中共的獨裁統治沒有被推翻，那段漫長而血腥的歷史，沒有拿出來公開受到揭露審判。在平反中還有一堵：「不要過多糾纏過去，而應向前看」的牆，嚴嚴實實堵著國人省視歷史的視線，公開說：「反右是必要的，錯誤在於擴大。」受害人悲慘的過去永遠不會得到昭雪。

受害人對自己被害在那裡都沒有弄清，怎麼平反？

與全國千千萬萬被害人一樣，我同馬開先這段被當局封殺的冤情，其中必有他們不可告人的內幕。我持續幾十年努力尋找她，就是要找到當年受侮辱的原因，揭這層黑幕。

匆匆上了回程的汽車，想到『平反』後奔波已快十載，正是：「回首西川月又斜，天涯孤客真難度」的時候，那女人尖酸刻薄誹謗之聲：「你還嫌害她不夠是不是？」不斷像炸雷般響在我的耳際。她那話是代表馬開先本人，還是代表她的家人？

從中，我可以隱約感覺出，這些年來馬開先被中共糊里糊塗整得生不如死的慘景，也許只有這種悲慘的遭遇，才會強烈的震撼著她的親人們，也才會讓她的兄弟媳婦有如此「一觸即發」的憤怒。

上有毛澤東，下有曹英，統治著善良的中國老百姓，那來的生路？我不知道這道理至今有多少人認識？所以尋找馬開先將這段被中共掩飾的罪惡真相公諸於世，不但是關係我和馬開先個人的事，也是我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晚上，我沒有心情去楊治國那裡作客，按照她給我的電話號碼給她打了電話，沒有提及馬開運的妻子那令人咀傷的「接待」，只告訴了她，馬開運因為出差沒有碰到，因為我將回重慶，在成都該辦的事還得抓緊辦理。所以晚上就不去她家了，今後若有機會到成都來，一定擠出時間拜訪她。

### （三）意外得來

說來也巧，冥冥之中自有牽引，兩年以後的春節，在邀約重大當年赴南桐監督的右派同學小小聚會上，我在王澤庸家裡獲悉了馬開先的下落。

原來，正逢1990年60屆重大校友畢業30周年紀念，重大校友會，曾向全國各地同系同屆校友發出回校團聚通知，十月中旬來自全國各地的兩百多校友重聚饒家院，各訴三十年來的事業和人生遭遇。

王澤庸回憶其中一名來自西北的女同學，在聚會的第二天晚上自由發言時，講到當年她被劃右派而遭受批鬥侮辱，聲淚俱下，控訴了當年機械系六〇屆中共黨支部委員曹英，對她的脅迫和威脅，她因不堪侮辱而逃離學校，於是被開除了學籍。在生活無著，萬般無奈下，嫁給一個工人，不久就流落到北方去了。

王澤庸還告訴我，機械系六〇屆的同學，總共六百多同學，當年劃成右派的就有一百多人，而這次參加這難得的聚會僅只有十來人。

這種聚會，不可能專門反映那個年代裡令人傷心的往事，也不可能記載他們的血淚仇恨。僅僅幾個人的哭訴，已把聚會帶到了那個血腥年代裡。

曹英正好就是當年這個年級中共支部委員，同學們紛紛控訴這個對無辜學生的迫害狂，為了瘋狂撈取政治資本，在反右中大搞逼供信。

王澤庸回憶說：根據這位女生的揭發，曹英對當年稍有姿色，而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女生，進行肆無忌憚的調戲和玩弄。畢業時，利用決定畢業生分配的政治評語，強迫她們同他發生「初夜歡」，居然把中世紀奴隸主對奴隸的虐待帶到校園裡重演！。

從北京來的同學告訴大家，文革中曹英調到北京某機關，因為惡習太深，獸性不改，被人打斷了了脊樑骨，已直不起腰，終生殘廢。所以，他不可能來參加這次聚會，逃過了這次當年被他殘害同學們對他的控訴！

易曰：「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癩皮狗拖著一生罪過，最後怎麼到閻王老爺那裡去下地獄，了結骯髒一生啊！

聽王澤庸這段敘述，我想起當年曹英組織對我晝夜不停的疲勞轟炸式鬥爭，硬逼著我按他的意思，編造與馬開先的「不規」行為，以達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原來他自己就是實足的禽獸。

直到我入監後，他那獐獍的嘴臉，還常常出現在我的夢境。有人說，在這個暴虐時代，「臥兒狗比主人更兇狠。」在那個年代，類似於我的遭遇豈止我一人？只要中共的一黨專制存在一天，這種罪惡還會不斷發生，像曹英這樣的禽獸還會公開的加害無辜者。

王澤庸所講的西北來的女同學，是不是就是我大海撈針一樣尋找的她？

我問起他當年聚會時的同學通訊錄，他便從抽屜裡找出來給了我。

我當時就在這本同學通訊中，找到了她的名字，後面留下了她的地址：甘肅蘭州西固區第二十一中學，在這本同學錄的最後一篇，《重慶大學機械系55級畢業三十周年活動紀錄》中寫道：「……甘肅省人民代表蘭州市西固區政協付主席，一級教師馬開先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和工作。」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想不到她已離開了四川，去到大西北的蘭州，過著「名人」的生活，她是怎麼會從右派奴隸升到省人大代表？是她遇到了奇人，還是她的親人中有中共的新貴？我卻不得而知了。

要不是王澤庸，我恐怕還不知道那年那月獲此資訊！尤其是馬開先不是因她以甘肅省人大代表，在這種會上涕灑淚流的「介紹自己不幸的經歷」，怎麼知道至今我所獲悉的這一切？緣分嗎？巧合嗎？

也罷，既然馬開先的下落已經找到，不管她現在的情況如何，我都必需馬上與她取得聯繫。

回到北碚，我立即按照通訊錄上的地址提筆給她寫信。

當我發往蘭州的信過了十來天，我終於收到了從蘭州寄來的「回音」。

當我拆開這封信的信封，我的手在下意識顫抖！她那弟媳婦尖刻的警告聲，此時又回蕩在我的耳際。

「我幾乎是在痛哭中讀完了你的來信」，她寫道：「收到你的來信整整兩天兩夜都沒有合眼，淚水一次次地浸透了我的枕巾，現在又一滴一滴地灑落在這一封長長的信紙上。」

「三十八年前，我含恨離開了重大，我當時恨一切人，尤其恨你，那時我真想得很絕，真想找你拚拼命，一刀殺了你再結束我自己的生命！」

說毛澤東是殺人狂，他的殺人不但在戰場上，在刑場上，在監獄中，也包括在和平年代用挑鬥辦法，製造出人和人間的自相殘害。

馬開先兄弟媳婦的怒斥，不應說完全無理，在「階級鬥爭」年代中，有多少子殺父，夫殺妻，兄弟相殘的悲劇啊。馬開先當年對我如此的憤恨並不足怪，要怪就怪我們生在這萬惡的毛賊東時代！

此時此刻，如煙的往事，喚起了有關她的一段回憶：

鳴放初期，在正義感和同情心支配下，曾為她的一位長輩，鳴冤，伸張。據她介紹重慶鋼鐵公司一位工程師和他的妻子，在三五反期間被認定「大老虎」。為逼迫他們承認大筆貪污款項，雙雙隔離審查，毒打折磨了兩個多月。兩人不堪冤枉和羞侮，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趁監押他們的人不備，逃出囚禁地。

天地茫茫，大雨傾盆，兩個走投無路的人在雨中抱頭痛哭一場，便雙雙觸電自殺。丟下兩個女孩，大的六歲，小的才四歲，無人收養，被送進了孤兒院。

兩年後，事情終於水落石出，這對夫婦並沒有貪污劣跡，可是，當時的中共重慶鋼鐵公司黨委拒絕對他們平反，反誣他們「革命意志不堅定」戴著「自絕於人民」的帽子永遠的含冤九泉。兩個孤兒，也不知如今流落那裡？

不過當時的馬開先，並沒有看清這一點，僅僅出於正義感，站在同情受難者的立場上「幫助黨整風」。在大鳴大放會上她贏得聽眾熱淚橫溢，也成了她「借題發揮」向黨猖狂進攻的罪證。

死者的「冤」沒申成，反而自己也被搭了進去，成了連環冤。中共統治下，正義被蹂躪，這又是千千萬萬活生生的例證之一。

批鬥我的時候白天開鬥爭會，晚上派人輪流守著我，按照他們已定好的罪名強迫我寫「交待」。因為幾夜沒有合眼，倦困不堪的我剛剛閉上眼皮時，他們就用預先準備好的竹棍敲我的頭，用針紮我的臉。五天五夜下來，我的頭上也不知留下了多少青包。

我寫的交代待寫了又被他們撕碎，撕了又喝令我重寫，直到第五天我實在熬不住了，只好按照他們口授的東西一字一句成了我的交代待材料。我不知道我是怎樣按的手印，只知道等我醒來時，我還睡在反省室裡。

就這樣，年僅二十歲的我，被逼著開始了我長達二十三的冤獄之路。至於當時交待中我寫的是些什麼，已全然忘記，當我聽說，我寫的材料重重的傷害了馬開先時，我便負著良知的重枷。

對馬開先的誣害，恐怕是曹英最惡毒的絕招！！中共的無恥，深深烙印在被害人的心中，永遠不會消褪。

「六月雪」有唱：「你道是暑氣喧，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錦，免著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竇娥雖含冤而死，但為此東海大旱三年。民間傳說在臨刑前，傷心過度的竇娥，怒撞在劊子手的尖刀上自盡。古來的烈女，節婦比比皆是，中共統治下的大陸，還少了這樣的事嗎？

而曹英三十年後成了爬不起的一條癩皮狗，天道是怎麼編寫人間故事啊！

寫這封信觸到她一生中最悲痛的經歷時，在信箋上留下了兩行「……」，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直到今天她都無法用文字來表述。在她的一生中這是切『魂』之痛，是一個永遠都無法癒合的心靈傷口，一觸這傷口就會流出血來。

她從此就沒有和機械製造專業沾邊，她流向社會後的經歷沒有寫出來，使我無法為她這段經歷落上句號。

信中接著介紹了她的家，她的丈夫姓張是一位老實厚道的工人，眼下正和最小的兒子承包了一家車輛維修店。

她一共三個孩子，兩個女兒都已成了家，一家人過得挺平靜。阿彌陀佛，慈悲為懷的佛祖爺在她身陷絕境的時候，將她引出了重大這塊是非之地，引到了這北國古城，重新給了她生活的天地，重新給了她的家。

來信的最後，她還告訴我，九〇九〇年，當年她所以不辭千里迢迢的專程回重慶參加同學聚會，主要正是尋訪已整整失散了三十三年的我。開會期間她問遍了到會的同班同學，可惜沒有任何人告訴她我的下落。問到重大黨委，他們故作驚訝回答說「不知道」，當時她根本沒想到我已重回北碚了。

《詩·國風·漢廣》有雲：「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蒼天安排人間的緣份陰差陽錯，更堪統治者故意的攪亂！處在音信杳渺無的她，喚起的豈止心靈的惶惑？他死了？他是怎麼死的？他埋在那裡？他的這本悲劇怎麼沒有一個結尾！曾經愛過，卻被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無緣無故地拆散，整整三十多年以後，天涯各方，你在那裡？

從此又負著心靈的責備！這責備會有盡頭嗎？到了生命結束時，這責備變成了悲歌長泣，她因不能彌補，而把這段永生的恨唱出來，哭出來的呀！

「現在突然之間，苦苦尋覓的人從遠方寄信來了。還是北碚，這令人斷腸的地方！！不是說你早已離開了那裡？怎麼你又回到了原處？拿著這信，怎不使我傷傷心心的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啊！」

從此以後，我們萬里尺書，遙寄著向對方的祝福。「雁來音訊全無，路遙舊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她來信還介紹了她眼前的生活，說她因為身體很差，有幾次幾乎因心臟不好而死去，現在滿頭已佈滿了銀霜。

後來拜了西藏一位高僧學長壽秘功，受益匪淺。93年還隨甘肅省人大代表團，到了青海省塔爾寺拜了藏醫院院長紮西活佛為師，並皈依佛門，成了俗家弟子，長期素齋。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鍾磬音。」人生自此，已近歸途。搬著指頭，年已五十五矣，但經歷年輕時代的痛苦折磨，早已領悟了人生苦諦。

後來，她來信告訴我，她長期練功顯了奇效，白髮轉青了，精力充沛。還練了一身好功法，常常為他的家人摯友發功治病。但凡鄰人相求從不拒絕，不收分文，只圖善緣。

當我告訴她我患嚴重的氣管炎而苦惱時，她便抄摘了一篇長長的氣功療法，囑我貼在牆上對照著早晚修練，還介紹了很容易製備的藥方，用她介紹的方法，泡制服用。

這正是「寄身但憂蘭州遠，顧影無如白髮何。今日龍鍾人共老，愧君猶遺慎風波。」（劉長卿詩）

97年一封信，告訴我她已退休，並說苦了一輩子，晚年希望搞一點實業，以資兒孫們的不足，這封信整整寫了一篇，介紹了蘭州的地理風貌，把這座甘肅走廊上的古城，描繪成了瓜果滿市，綠茵成林的西北樂土。

說蘭州尤其適易住家，並恭候我去蘭州一遊。

蘭州乃我國通西域絲綢之路上的名城古都，西漢時期張遷和班超都曾經過這裡，我雖然沒有去過，對這座沙漠上的綠州所知甚少，但仍可以想像到她的美麗。唐代詩人王維的「渭城曲」，王之煥的「出塞」，以及宋明許多大詩人的詩詞遺作，也許賦出了身在北國的馬開先的心情。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小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落根蘭州的重慶女孩，是思鄉情切而產生自我安慰，還是蘭州真的那麼美？

我在電話中問她是否打算回重慶，與我今生作最後相見？她笑著回答：「那只有看老天爺的安排了。」我說「事在人為，只要我們都下了決心，今生相見完全是可能的。」到2003年摳指算來，我倆已分別了整整四十六年了。



這段封存了近半個世紀可悲可嘆的故事，直到今天我對其中的細節還沒有完全弄明白。極想將這些不明白的地方在有生之年寫出來，向我的讀者們作一個更完整的交代。

當我告訴已經入佛多年的她，我正把我們的悲劇寫出來時，她卻反對我寫這本《血紀》，說我逆緣，走遠了，阿彌陀佛……！在漫漫黑夜裡能熬過來的人，是要付出好多人無法想像的犧牲啊，意志柔弱的女孩子選擇逃避是很自然的。

後來我們就再沒相見，這樣了結，算不算演完一場有始有終的悲劇？

在這個中共一手導演的悲劇舞臺上，暴力和恐怖扼殺了多少人性？被踐踏的美好東西不能恢復，受害人選擇了逃避！所以更增加了它的悲情！！

### 第三節：王大炳和他的女兒

回重慶後，按留給我的位址，給王大炳發出的信過了十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告訴我，自77年同老婆一起回到長壽後，當年她的女兒就出生了，第三年又生下了他的兒子，現在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家」就靠他像牛一樣辛勤勞作，總算能圖一個果腹，近年來他又自己打土胚，築牆，建起了能讓一家人遮風避雨的高。

在鹽源農場，大家因他的勤勞管叫他馱牛。信上告訴我，他原來的判決，是以叛國投敵作結論的，所以一直沒有給他「平反」。對他來說，平不平反，反正是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在那塊土地上當牛馬。

來信告訴我，今冬歲末農閒時，一定要到重慶來看我，一敘久別之情。

一九八二年冬天，我在蔡家場迎接了我這位患難中的兄弟。我怕他在蔡家車站下車後，找不到偏僻角落裡的二十四中，所以預先和他約好了時間，他到蔡家場以後，我到車站去接他。

按照預定的時間我在車站上足足等了他兩個時辰。中午時分，從車廂裡走出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老農」。

他身穿灰色補丁的棉衣，腳踏綠色的解放鞋，由於終年的勞累和省吃儉用，那乾瘦蒼老的臉，高高突出的顴骨，頸項上黑黃的皮膚裹著深深的皺紋，下巴被樹皮樣乾燥的皮膚拉得長長的，配以壓得略彎的腰，榨幹了油似的雙肩。

那外形，酷似中共在四川成都大邑縣的地主莊園，展出的兩尊屹立門前呆望天空，手裡拄著打狗棍的老農奴塑像。只是他那形像不是地主劉文采壓榨出來的，而是中共強迫『改造』出來的。

正在下車的他，手中提著一個沉重的麻布口袋。

他比我還小一歲，正逢壯年，但那樣子好像足有六十開外了，我們大約五年沒有相見，相逢第一眼我幾乎沒有認出他來，比之鹽源他新婚的歲月，真變成了另一個樣子了。我連忙迎了上去，把他手中提的麻袋接了過來。

我們一邊走，一邊講敘六年前，給我的母親送信和帶來一包瓜子的情景，指點著所經過的街道上那些沒有變的地方。我說：「世道變了，現在已不是當年，吃的東西並不缺，你不該路遠迢迢帶這麼重的東西來重慶！」

他說自己土裡一點綠豆，算我對你母親一點心意，他對人的忠厚可想而知。

我望著他的臉擔心的說：「你的孩子還這麼小，你自己更要注意身體健康，不要太勞累，不要太節儉，留著身體是最大的本錢。孩子要你撫養成人，千萬不要還像馱牛一樣的幹，身體拖跨了什麼都沒有了。」

算來他的大女兒已經六歲，小兒子才四歲啊！

說話間，我們不知不覺到了醫院，因為他曾來過，所以並不陌生。

母親早已在她的房間裡等候了許久，今天特別買了很多菜。吃中飯時，她還回憶當年大炳送瓜子仁來的事，用她的話來說，當時在這個人間地獄裡，他給我送來的不是普通的瓜子，而是一種生活的希望。

吃過午飯後，我倆便到二十四中我的宿舍裡，在我的宿舍裡，他住了三天，晚上便是我們促膝談心的時候，我告訴了他去成都探看張錫錕家的經過，還告訴他我去潘朝元家，又去漁洞、化龍橋、大陽溝等地尋找陳力，皮天明，劉順森的家。告訴他，由於中共的封鎖失去聯繫的人尋找很難。

第二天，拿出了我寫的片斷給他看，看後他深情的說：「我可惜沒有那個水平，也沒有那個精力了，願你能把我們在監獄裡所遭受的苦難，特別是進行的反抗以及犧牲難友們的大無畏精神，如實寫出來。」

並表示非常渴望我的文章交付出版，並且預約，成為我第一批的讀者。

當我問到他眼下生活上的困難時，他說，這幾年，原來的茅草房要重新蓋瓦房，更換破爛的家俱和農具，給大人孩子添置衣被，平時稱鹽打油、買種子化肥都需要錢。眼看明年大女兒就要開始讀書，孩子們的學費全指望他在農閒時候替人幫工，換點力錢。

我看看他身上穿的補疤棉衣，便將我的衣服，翻出幾件來送給他。看著他皮包骨頭的身體，暗暗替他悲哀，這是一個經中共長期煉獄的「政治」犯。

不管外形如何，他內心裡那一團熊熊燃燒的反抗烈火，他那裸赤膽忠心永不會泯滅。

臨走時，我給了他一些錢，雖杯水車薪，解除不了他的貧苦，但總是我的一翻心意，叮囑他明年歲末農閒時一定再來我這裡，那時我寫的片斷就更多了。

從此以後，我和潘老，大炳一直保持著親人般的交往，看到他們的信更使我想起獄中的經歷。

遠在長壽的大炳，除了隔一定時間給我寄信來，問候侯母親的身體健康，談他的孩子們上學的情況。

直到一九八六年他才在北京的舅舅幫助下，在一所學校裡謀到了一份燒鍋爐的工作，以後每年秋收完結，他都要赴北京打工。

每次到北京去和歸來，途經重慶都要來我家一聚，人雖窮而情誼濃，每次相

聚如親兄弟，除了拉家常也談國內外大事，有時我們一起到潘老家共聚，暢談。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突然接到他的長女王琳給我打來的電話，在電話那一端傳來了她斷續的哭泣聲。告訴我說，她的父親因煤氣中毒身亡！

聞此噩耗，我吃驚不已。三個月前他去北京打工前繞道重慶時還來看過我，當時我提醒他已近六旬，身體沒有原來利索年齡不饒人，遠離家人更要小心。

沒想到，意外厄運真纏上了他。

現在他丟下妻兒，在為人打工的路上一去不返了。

大炳在北京中毒後，沒有馬上身亡，煤氣把他變成了不能動彈的植物人，直到那所雇用他的學校通知他的妻子時，一家人才匆匆趕到北京。

他這一走，丟下了兩個孩子，長女才十四歲，小兒子十二歲親朋都是些窮苦農民，加上在這個人情菲薄的年代，誰又能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傾力相助？在邊遠的農村，娘兒三人活下去更加艱辛。

可恨的，對大炳的死負有直接責任的那所僱他的學校，想草草了斷此事，在三個孤兒寡母到了北京後，趁已變成植物人的王大炳說不出話來的時候，把責任往死者身上推，僅拿出八千元人民幣了結此事，將母女三人打發回重慶。

身處異鄉，舉目無親，不知怎麼才能保護自己的母子三人，只好含著眼淚將行將咽氣的王大炳，送上了火車，哭哭涕涕一路回到重慶。

剛下火車，王大炳便閉上了他的雙目，與這個奴役他一輩子的社會永遠長辭了。悲痛欲絕的妻女三人只好在車站附近，草草辦了喪事，將他送去石橋鋪火葬。

他的離去，使我痛失一個可以交心的摯友。他那誠懇，質樸的語言，乾瘦的外形，都會喚起我內心對他的無限思念。

也罷，大炳逝去，從此再不為兒女牽掛，再也不受中共奴役，也再不對不平世道憤懣不平了。

面對他丟下的孩子，王琳正面臨初中畢業即將升入中專或高中的學業關頭，按他母親的意願，只要她在初中畢業後，能在城裡謀到一個可以糊口的工作便心滿意足了。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她才只有十四歲，就必須應付世道裡處處潛伏的危險。稚嫩的肩上，過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擔。

我竭力支持她讀書，至於經濟上拮据，可在我的工資中省下一部份來供她。便當著她母親的面，承諾了幫助她繼續求讀，至少也要讀到中專畢業。直到她取得工作，能獨立生活為止。

我這許多年來，在中共統治的天下，天天耳聞目濡，不平的事太多，對受害者充滿同情，卻無可奈何。漸漸把我性格上固有的棱角打磨得平滑光整，有時碰到替人打人命官司討回公道的事，也往往沒有去做。

聽王琳母親講，致大炳中毒身亡的那所學校，因暖氣煙道前年堵塞，並未疏通，所以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何況人死後只付了她們母女僅八千元了事。為亡友，為他的孩子向學校討公道，索取應賠的損失，便成了我義不容辭的事。

中共把保護勞工權利，口頭上唱的比什麼都重要，而實際上看看他們制定的勞工權利保護法，便知道他們的虛假，公認的勞工基本權力，中共並無可行辦法給以保障，連他們的生存權受到侵害時，所得的賠償也是低得可憐。

為替王大炳討回一點公道，為王琳向北京僱工單位多爭一點賠償，我到我廠勞動人事處借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護法」，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有關貫徹勞保條例的細則，想找到一點關於用人時，被僱傭者死亡或工傷致殘，勞動者可以訴諸法律的條款。

遺憾的是，勞動保法及各地配套檔，隻字不提勞動者保護自己的生命不被侵害的規定，以及遇害時，如何索賠的條款。

只有一段「職工因病傷死亡的『處理辦法』」其中規定，凡職工在職期間因工死亡的，僱人單位除承擔死亡過程中所發生的醫療住院費，補發十五個月的工資作為一次性撫恤費；承擔死者治喪的全部費用；……其配偶在農村的，因死者亡故後而失去了勞動力，應由所在單位給與死亡者每月基本生活補助費，子女未成年的，由所在單位承擔生活補助費直到成年，如此云云。

據用人單位說，王大炳的基本月工資僅400元，十五個月工資只有6000元。而給與王大炳妻子的生活補助費，在四川省勞保條例實施細則中規定，每月僅只有三十元。在九十年代，三十元的生活補助是連吃白飯苟延生命都不夠的。

8000元拿給三個人用來買糧食吃，能維持多久？何況大炳一條人命豈可以八千元了結？當然，這比草菅人命的毛澤東時代，算「進步」了。那時，像大炳這樣中毒而死的五類，就只有用席子一裹，拋屍荒野的命。

既然找不到其他的依據，只好按「勞保條例」中的撫恤標準，找用人單位算帳，看能不能多爭到一點撫恤金，以救救將面臨失學的孩子們。

想到這裡，便提筆以王琳的口氣，寫信給那所學校，一面據理陳述有關國家勞動保護條例對死亡職工的撫恤規定，如果以四川省政府的最低標準進行計算，一次性需要這所學校所付出的撫恤金，至少需再補一萬的費用。

寫完了這封信，把它交給王琳，囑她將原件保存好，一次性複印三份，一份掛號寄給那所學校的校長辦公室。！如果這位校長抱著不理的態度，則可以將其他兩封向勞動部投訴。當然這些信都只能抱著試的態度，因為，這種老百姓的「人命官司」在中共的天下一向是不會重視的。

兩個月後，給學校發出的信，終於有了回音，答應再增加三千元撫恤費作為一次性了斷，面對這種「軟打整」，王琳猶疑了。

她說介紹她父親去北京找工作的「舅公」來信說，王大炳去北京打工，純屬他的面子帶著「照顧」，並不是該校聘的正式員工，所以還不能完全按勞保條例交涉，勸王琳母親在學校增加撫恤金後，不要再糾纏了，不然他不好處事。

同時馬上就是初中畢業生考試，孩子正面臨著一場激烈的競爭，據她說長壽地區當年初中畢業生要求考中專的學生，在一千人以上，而各中專學校招收長壽農村學生的總數不到一百人，在這場競爭中她必須取勝。

她說「爸生前對我的最大希望就是長大成材，他外出打工，一心讓我上學，現在他去世了，考大學受經濟條件限制，唯一只有應考中專學校。窮人家的孩子最需要是從學校畢業後得一個就業機會，所以暫時只好將替亡父打官司的事押一下，等到考試以後再作計較。

其實她已經在舅公和社會的壓力下，放棄了追索父親死亡賠償的念頭，無可奈何地了結了這場人命糾紛，在中共專制時期受苦受累的大炳一命，最後以1.1萬人民幣了結了，在中共眼裡普通勞動者人命多麼賤！！

1996年夏天，在長壽初中應屆畢業生報考中專的考場上，王琳在一千多考生只錄取96名的高難競爭中，沈著應對，以總成績486分，遠遠超過了當時對農村學生的苛刻錄取線440分。

但是在如此優異的成績面前，她的面部沒有任何興奮。在她那孩子氣臉上不但佈滿了倦容，還憂慮的告訴我：她報考第一志願的學校已半月，一直沒有發來錄取通知書。並且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在重慶市工業學校有沒有相識的朋友？我看得出她被一種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難困繞著。

在我追問下，她終於告訴我，這次報考她填寫的第一志願，是重慶工業學校，在通知她的中考分數時，她的中學校長特別叮囑道，重慶工業校是重慶市經委主辦的一所重點中專學校，因為該校包畢業生分配，所以是重慶報考生最多的一所熱門學校，考進去不容易。

加上工科類畢業生常受人單位拒絕女生的影響，所以工科專業，女生被錄取的機會比男生更苛刻，過去長壽地區常常發生女生上了錄取線，沒被錄取的事。所以請求我設法與工業校疏通關係，說關係不到位，就是上了分數線，也有被落榜的危險。

像王琳這樣遠在長壽偏僻農村裡的女孩子，那來與工業學校攀親沾故的關係？萬一真的落榜，要未前功盡棄回家務農，要未交足兩萬元讀該校的議價生。兩種後果，對王琳都是致命的。

她的父親為她讀書連老命都丟在異鄉，還不是讓她能走升學這種唯一前途，她從小刻苦讀書，為了節省開支，她背米上學交學費；放學了打豬草餵豬；內衣爛了也沒有換的，補了又補；做作業把其他同學用過的作業本翻過來打草稿。這一切都近在眼前，她不能把父親用生命代價換來的錢去交議價費。

世道的不公平在她年幼的心靈上烙下了銘心印記，這也許是那個年代，想在求學中找到一碗飯吃的窮孩子們，最痛苦的事。報紙上每年都有這種因考不上學校的考生，走上自殺輕生的消息。

事不宜遲，病篤亂投醫了，王琳在幾個親戚的商議下，在老校長的建議下，從銀行裡取出來一千元，這可是她父親的喪命錢，用這錢買了煙酒之類的常規「禮品」，戰戰兢兢懷揣著剩餘的幾百元錢，到重慶找到了工業學校。

工業校已放暑假，就連操場上也沒見幾個人影，怯生生的她跟著老校長，找到了往屆長壽中學畢業後就讀工業校，至今仍留校工作的老校友李某。李某表示他可以為王琳介紹現招生辦公室工作的林老師，據這位李同學介紹，報考同學只要上了線，都可托他來決定入校的資格。

於是老校長和王琳跟著他，爬上半山上的教師住宿樓。不巧林老師放假後回鄉下老家一直沒有回來，但是這位校友答應林老師回來後，立即辦這件事，勸他們暫時回長壽聽候消息。

王琳回到長壽，在焦慮和盼望中等了十天，工業校的錄取通知，仍杳無音訊。王琳心中想：是這筆私下交易出手太輕，還是那位李校友另生了枝節？鄉下又沒有電話，正夏日三伏，王琳在嬌陽下天天往學校跑，猶如熱鍋

的螞蟻，經過發奮努力考試成績名列前茅的她，還要為求學送禮，撞後門！

又等了十天，她終於耐不住，再度從長壽鄉下來重慶，這一次跑來求助於我了。學校在國家統一下達招生指標外，增收應屆落榜生的規定，稱之為「議價生」，教育上的投資，大陸向來是世界最低的國家。經費嚴重不足，成為學校招收議價生的『正當理由』。

我不知道這種議價生的招生人數和價格是誰定的，也不知道這種制度是什麼時候興的。只聽說收議價生是為了『滿足』老百姓子弟期盼求學的一種措施。大陸實行一胎的計劃生育，一個家庭一個獨生子，特別是貧窮的家庭，砸鍋賣鐵也要讓唯一獨兒進得一所較好學校。

在中共毛澤東時期窮怕了的臭老九們，盼來了發財的好機會。議價學校遍地開花，教育也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商品之一。古時候賣官鬻爵是可殺頭的，而今中共領導下，文憑變成了社會主義流通中特別的商品。當然雙方都心甘情願本無可非議，不過買方往往成了無力支付的窮人。

而且「文憑」不是日用的商品，買賣文憑這種公開的腐敗在中共後集權時期的猖獗，窒死了求知識求本領的學風。

中國是一個文明教化的國家，自古我們祖先辦教育是以「修身，致知」為目的，古來聖人辦學完全是為了修好社會風氣的。提倡苦學，以立身為本，老師也只滿足於束脩之禮。

而今文憑既成了進身的通行證，成了有錢人炫耀自己的階梯。辦學的人也從事販賣假文憑的勾當，在社會上招搖撞騙。

報上偶然看到對買賣文憑的批露打擊，那是行騙者搞得太不像話，拿個別人開刀做做樣子的。學校都這樣，教師收取學生賄賂，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內，敲詐學生便一點不奇怪了。

令王琳煩惱的就是為了求學的這份禮該送多少？這是不比商場上的商品，掛著「明碼實價」「童叟無欺」的牌子，使買賣雙方都明白的。送給老師的這份禮，其多少也要根據求學人數變化的「供需」關係來調整，俏時可以幾千元，濶的也是幾十塊。

再加上，這種議價為世人所不齒，需要遮遮掩掩進行，王琳再煩惱也只好委屈著忍受，好歹這也是社會主義特色一絕！

不過，已經付出去了一千元，穿著揀來的比自己大兩個碼子很不合身的花褲子，對於剛跨進城裡，在工業學校的大門口徘徊的王琳來說，就是一筆了不起的巨大開支，要知道僅僅這麼一送，就送走了他的父親用生命換來的撫恤費十分之一的數目，是長在農村一個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苦了一年的收入！

《儒林外史》開頭講元朝末年有一個叫王冕的少年，他十歲時就給人放牛，因為他七歲的時候父親早逝，母親為人做針線活，供他到村校讀書。每天黃昏回來，放牛的東家給他的一些魚肉，用帕子包好，帶回家孝敬母親。白天放牛時常騎在牛背上，畫池塘的荷花，日漸成名。

長大以後，他常常以自己畫的荷花拿來集市上換些柴米，後來有人發現他不但才藝高超，且胸襟開闊，便舉薦他去當官，王冕卻為了逃官跑到山東濟南靠測字繪畫為生。沒有好久，明朝改代，禮部擬定了在民間行科舉考試辦法，凡要考取功名，三年一試，以四書，五經，八股文考士。

王冕說：「這種科舉制度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以此為進身之道，必會把文行出處也看輕了。王冕後來隱居會稽山中。

古人連科舉制度都有非議，而今天卻興出來賄賂作弊。王琳既然跑來求助我，也是天有巧合，工業學校校辦工廠的廠長陳明生，正好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八六年我和陳明生在同學會上重逢，當時參加這次同學聚會的人留下了通訊位址和電話，現在王琳入學的問題正好請他出面幫助疏通。

當我接通陳明生的電話，告訴他有事相求後，他欣然答應了。事不宜遲，我馬上帶著王琳匆匆地乘車趕到了化龍橋，在工業學勢校教職工的宿舍裡，我們很快地找到了頭髮已斑白的陳明生。

自上次同學聚會後又相隔了十年，十年的時間對於老同學尤其顯得光陰摧老。他告訴我，他剛剛才退休，校辦工廠和學校的大小化驗室他都沒有介入了。今年招生辦公室負責的教務主任張某正是他的學生，向來關係處得不錯。

當我講到當今社會上教育的種種醜惡現象，生活在我們這個層次的人感受是相同的。他當即表示，現在不是評論中國教育危機的時候，而是要趕快落實王琳入學的具體問題，於是他又親自帶著我們去到了張主任的家裡。

張主任的愛人接待了我們，但她告訴我們，張老師去成都招生還沒有回來，估計要下周才能回家。陳明生當即寫了一張便條，把王琳的名字、考區、准考證的編號以及所考的分數全部寫在上面，拜託這位張主任務必關照。

便條寫好，交給了張夫人還一再地囑託張夫人等到張老師回來後，務必落實這件事，這麼一來王琳的錄取才算是有著落，但終究還沒有最後的敲定，回到陳明生的家裡，我把和王琳父親同我在獄中多年交往告訴了他，他感嘆說，現在人和人之間感情的空間已越來越窄，社會上除了金錢關係什麼都很淡。」

教師為了多撈幾個違心錢，與學生關係搞得如此庸俗，仔細想來難道不是中共統治設下的隔閡麼？師生已經談不上什麼感情。

活在這個世界上，真情喪失，人與人之間全是勢、利關係，何等可悲。

當我們起身告辭後，我囑王琳暫時回長壽家裡，好好的休息幾天，準備好上學的行李和學習用具。中專學習的時間足足有三年，在這三年裡所需要的費用還很多，固然我可以幫助她，但畢竟是有限的。

大約十幾天以後，我終於接到了陳明生的電話，告訴我，王琳被工業學校正式錄取，我問老同學需不需買點禮品，這是因為社會風氣已經如此，他和這位教導主任縱有師生之誼，也該隨著俗流有所表示。否則王琳就是被錄取了，今後還要拜託工業校的老師和校長們對她多多的關照。

他在電話上說：「不必了，否則也太小看他這位老同學了。」但是他關照王琳先前送的禮也不要再去追究，禮是王琳自己送的，只能看成是她自作多情了，何況收禮的林老師今後是王琳的班主任，在今後三年的學業中，不但要依靠他對她的關照，還要在三年以後的畢業評語上得到他的肯定，千萬不能得罪他。

但我還是主張找個適當時間，大家認識一下，就在附近找了個乾淨食館吃頓飯聚一聚，一來為王琳順利入學慶祝一下，二來也算是我代表他的父親向學校拜託王琳今後三年中學業順利，陳明生同意了。他們把聚會相識的時間訂在該校開學的時候，那天我反正要到學校來給她付開學第一個學期的學費。

王琳在得知她被錄取的消息，究竟高興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我想到千千萬萬個類似王琳的孩子，不一定都會得到她這種比較滿意的結果，中學畢業升入中專，以及今後處社會的人際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開學前三天，王琳拎著一個沉甸甸的大包來到我家，那包裡裝了一袋綠豆，一袋芝麻和一大塊農村的「老臘肉」，滿臉汗水，臉蛋漲得通紅的王琳向我解釋說：「這是我媽的一點心意，本來還想把家裡的幾十個雞蛋帶來的，但我實在拿不動了，再說路遠迢迢的，雞蛋在汽車上又容易打爛，所以我沒帶。」

我知道在偏僻的長壽農村，她送來的東西恐怕要算農家最值錢的禮物了，我那能收下？便對王琳說「你母親對你的用心，你應當牢記，這些東西，你在大熱天這麼老遠的扛來，謝謝你媽的心意，但你還是帶到學校去，酬謝一下你的陳伯伯吧。」

後來我知道，陳明生也沒收她的禮物，最後還是送給了班主任林老師了。

後來，陳明生告訴我，他已問過張主任，知不知道王琳送禮給林老師這件事，張主任說林老師壓根就沒有提起此事。若不是陳明生起了作用，王琳能不能走進工業學校的校門，並坐在課堂裡上課，恐怕還是一個未知的事。

後來為托附王琳的入學和學業，我曾兩次去過林老師的家，在他的家裡家庭電影，櫃式空調，國外進口的高級VCD，講究的傢俱擺設，應有盡有，比我富裕多了，他那裡希罕王琳帶來的一包綠豆，一塊臘肉啊。想到可憐的王琳連內衣都沒有換的，我心裡真有說不清的滋味。

聽這位林老師說，他除了工作外，還兼任好幾個業餘的職位，他拿給我的名片上寫著，某機械進出公司的推銷員。

因窮而逼出來的致富狂熱，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鼓動下，對窮得上無片瓦的中國人，產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誘惑力。尤其是像林某這種人，鄧小平的政策意味著一個富人集團從社會中分化出來。古人說：「人無橫財不富」。

所以現在知識份子，也學會了這種從更窮的人身上進行「原始積累」的手段。這可是中國人中前所未有的，這種現象無疑是文革道德墮落的繼續，有這種行為的人，怎麼能擔當塑造人類靈魂的神聖使命？

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經歷毛澤東瘋狂的摧殘已完全墮落，人們以隨意的罵人打人為習慣。以公開搶劫為樂事，社會道德的危機日趨嚴重。接著就被一群打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者搞得面目全非。

教育的危機，可說是當前社會最大的危機。形形色色的腐敗以及公開的損人利己已嚴重腐蝕了青少年，據報上透露，未成人的犯罪年齡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低了三歲，1999年公佈的我國青少年作案數，占整個刑事案件的19%，並以偷、盜為重點。

先前還有在報章媒體上發一點「救救孩子」的吶喊，也漸漸的淹沒在「怎麼發財」的囂聲中，人們似乎對社會的墮落感到麻木，當局更擔心的是救救孩子的吶喊會引發六四的回聲，會因此而動搖中共統治的大廈。

「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口號，就像包著無數腐肉的儂包，越包越爛，人們擔心，為維持一個腐敗政局的穩定，究竟會把中國引向何處？

我們古代的哲人主張內心的修養。把修心養性當成教育的出發點，百年樹人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業，被一群打著「解放中華民族」，「砸爛封建禮教」的革命家們糟踏得一無所存了。

當然，王琳送給林先生的禮物，既無聊也無知，然而這恰恰是被社會看作可行的途徑，林先生對給他送去的酒和煙不屑一顧，這區區一千元的禮物，對聚財有道的林先生哪裡算得上是「禮」？但對於連布衣服都沒多一件的王琳，恐怕就是一筆想了又想湊了又湊的大數字。

同在一個課堂上的師生怎麼面對這種不公平的尷尬？所幸工業校求學三年，王琳在班上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我想這大概是王大炳的遺傳基因作用，是他那雙死不瞑目的靈魂，在陰間對他女兒的督促？

1999年夏天，她從工業校畢業以後，在南坪一家電力公司下屬的配件加工廠從事技術室的工作。算是她擠躋身城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一業之地」，實現了她的母親最低的要求。

由於我已年老，這幾年很想找到繼承我的遺志，完成對這個時代無情批判的大業，我曾傾注於我的兒子身上，但令我羞愧的是，在和社會爭奪我的孩子時，我卻失敗了。

曾一度把這種神聖的希望寄託在王琳上，然而沒料到，我的影響終於沒有戰勝惡劣社會空氣對她的影響，三年的中專生活，在環境的陶冶下，她那原先誠實的品性被漸漸改變，漸漸地我們失去了原先那種感情，自2003年她結婚以後，我們就很少往來了。

但是我的兒子是我的延續，王琳是王大炳的女兒，他們身上固有的秉性會最終會起作用，我想我終生反對專制主義那種不懈鬥爭，終會在中國這片熱土上結出碩果。

#### 第四節：潘朝元

一九七九年回重慶後，有地址可找的便是潘老，回重慶後還沒有電話，我就按他信上留的地址很快接上了同他的通信聯繫，從信上知道他回渝後，在大坪黃沙溪一家百貨商店裡站櫃臺，並暫住在大女兒家裡，大女兒是重慶乾電池廠的職工，

1980年一個星期天，我乘車去了大坪大黃路，並問到了去乾電池廠的路。

到了重慶乾電池廠，大門傳達室裡的人將我引出廠門，指著山下傍在嘉陵江邊陡壁懸岩半山中的「吊腳樓」，告訴了我潘老大女兒潘麗娜的門牌號數。

我向山下遠遠望去，認得那些依傍著絕壁割下的「鴿子棚」，還是當年抵抗日寇長驅入侵，國民政府從南京西遷，以重慶為陪都時，跟隨著國民政府流落這裡的難民留下的遺跡。

這些不願在日寇鐵蹄下當亡國奴的子民們，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也為了從簡建起可以遮風避雨的窩，選擇了這些絕壁，用木板石頭為材料砌成臨時「吊腳樓」，成了當年國民政府抗戰的珍貴紀念留了下來。

它們曾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和「八千里路雲和月」中被搬上銀幕。它們的屹立，證明中華民族的子民不屈強暴，誓死抵抗外侮的氣節。為抗拒日人入侵，他們寧願在這裡風餐露宿過著流浪生活。

沒想到四十年過去了，這些簡陋的建築依然還在，中共三十年來既沒有將這些遺跡保護和培修留為文物，現在卻被編上門牌號碼，變成了貧民窟。毛氏三十年統治，建設竟是白紙一般。

而潘老回到這裡安居，真是想都沒想到啊！

我沿著曲曲折折的山壁小路一路問去，大約走了足足半個小時，終於才找到潘老的「家」。他的女兒潘麗娜一家住在傍岩而築的小木房裡。當時沒有電話，事前我也沒有寫信告訴我那一天來訪，所以當潘老的女婿打開小木門的時候，帶著詫異和陌生問我找誰？

這時在木屋門口僅一尺寬的山路外側吊腳樓裡，響起潘老的回應聲。我定睛去看那吊腳樓，靠三根圓木柱，從更低的岩石上支立著。兩塊厚木板架成了通路。遠遠看去令人心懸，說不定那陣巨風就會將它連根拔起來吹走。

潘老的回應響過以後，他從關閉的小門裡走了出來，一別四年乍然相逢，我和他都喜出望外，熱烈的擁抱後，他喊道：「啊呀！我的天使，你真是從天而降，來這兒也不給個信。」他還是那麼幽默。

看上去他比在鹽源時精神了許多，雖然頭髮更花白，但臉卻是紅潤的，顯得很健康。他的身後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跟了出來，那是他的小外孫，我來時他正教小外孫做作業。

他拉著我的手，走進了他的木屋。那小屋整個面積不過六平方公尺，頂上蓋著石棉瓦，地上是木地板，地板下面是空的，小屋上面有半山裡的大樹作蔭蔽，可以減輕太陽對小屋的幅射。

屋裡擺著一張小木床，一張小桌和兩個小凳，小桌上還攤著小外孫的作業本。雖簡陋，但主人卻將它打掃得乾乾淨淨。

我環顧了一下小屋問道：「這小屋冬天恐怕夠嗆，下面麵的江風往上直灌，你老人家受得了嗎？」

他尷尬一笑，說道：「這總比監獄強些吧！何況，這小屋通風和光線都好，有益於長壽。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復行，去去適西秦。』我在此山岩下已歷曆三冬，倒也習慣了，被共產黨磨出來的，什麼苦也不當回事。」

接著他向我介紹了他的大女兒一家。大女兒在廠裡任會計，大女婿姓汪在工廠任技術員。兩個外孫，大的已上中學了，小外孫還在讀小學。

因為事前大女婿沒有任何準備，中午他執意邀請我到大坪街上用餐，我們便踏著山路向上走去，邊走邊以這些吊腳樓為話題，談到當年抗日戰爭。

抗戰時，他才從軍校畢業，在湯恩伯的部隊裡當排長。由於累立戰功，抗戰勝利時他升到少將軍銜，內戰時期他的部隊打散了，輾轉回到重慶。一九五二年因在深圳偷渡，準備去香港事情敗露，被中共邊防部隊抓捕入獄。

他一生追隨孫中山信仰，若非遇到76年中共大赦令，他是下決心要把牢底坐穿的。我對抗日戰爭和對國民黨軍隊的瞭解，頗得他的教益。

我告訴他，『平反』後，我回重慶路過成都，曾去張錫錕家。他聽到張錫錕母親和兄妹悲慘遭遇後，唏噓不已。



講到徐伯威時，他說：「一九七六年我回重慶之初，市委統戰部也曾把我請去市參事室工作，但遭到我拒絕，因為我不願意按共產黨的意圖，寫國民黨當年在重慶的歷史。我寧可去商店站櫃臺，也不願說國民政府消極抗戰。」

於是來勸說他的中共統戰部官員，將他分配到黃沙溪一家副食品零售點，接受每月四十元的工資，聊夠糊口。

他說：「當局之所以今天對我們保持統戰的「客氣」，不僅因為三十年統治，原形畢露，民心喪盡，統治地位動搖了，更因為臺灣今天發達的經濟和實力。隨著大陸的開放，國民逐漸瞭解真情，臺灣贏得了中國越來越多的民心，歷史定將證明臺灣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我寧可住在這裡晝迎江風，晚看漁火，過著超然脫世的生活」！

說到這裡，他停下腳步，望著絕壁下滔滔東流的江水嘆道：「幾年來，我常常獨自站在這裡仰望藍蘭天。

春天，當候鳥從南方飛來，秋天大雁從天空掠過，我的心就想到南歸，我常常仰天長嘆，蘇武牧羊十八年，尚有歸期，而我也許只好終老這裡了」。

這真是：『幾日避風北海遊，回從楊子大江流，臣心一片磁石心，不指南方不肯休』。少年讀陸游絕命詩，對詩人臨終念念不忘『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殷殷之情，尚理解不深，今天便有了切身的感受。

在他挽留下，當晚我就留宿在他那鴿子棚裡，我們倆將他大女兒屋裡的沙發抬進他的吊腳樓閣裡。與他的小床拼在一起，我倆就在這「加寬」的床上同榻而眠。

是夜正逢上弦月，黃昏一過，月光便從那石棉瓦逢裡透了進來，銀色的月光灑落到地板上，令人不由得想起李白的「靜夜思」。！

他是我在重慶最知心的知己，我在他面前可以輕鬆坦露心懷，甚至於個人隱私也無回避，我們很自然地談到我的安家娶妻，我講了鄒銀雙的故事，長嘆道，年輕歲月被中共所踐踏，身處蔡家場偏僻的鄉間，不知我底細的「好人家」，又有誰願把自己的黃花閨女，許配給我這個勞改釋放犯？

記下了潘老住地的通訊位址，我在第二天一早就告辭了，好在北碚到重慶並不遠，今後每逢假節日重逢團聚的時間還多，那時雖然家裡還沒有電話，但平時，通信問好互道近況則是經常的。

一九八七年春，我接到潘老給我的信，說他隨著全家從黃沙溪懸崖壁上的吊腳樓裡，遷到了重慶電池廠新建的職工宿舍，說我半年與他沒相見了，很思念我。在信中附來了一張他所住大黃路新宅的位置圖，按照他圖上提供的座標，我在一個星期天再度專門去拜訪他。

從公路上到達那樓房的底層，大約有二十公尺高的石梯坎，我心中暗暗想，這樣的新居，雖然免卻吊腳樓那種風雨襲擊的驚恐，但從馬路登到他住的八樓，足有二百餘臺階。潘老已七十多歲，每天上下都要徒步攀登，夠嗆的。

但這年月有一住處已相當不易，誰還管它進出方不方便？

我正仰面望著那高聳入雲的八樓窗口，便聽到那窗口處傳來了他的喊聲，他早就在這裡扶窗相望了。

爬上三樓，他已從樓上下來接我，好在多年勞動鍛鍊，他當時身子還很硬朗，見到我後握住我的手一個勁的搖。我知道，長期的孤單今日得與我相見，那心情一定很高興。

我們一起走到八樓左邊的房門前，他取出鑰匙打開了他的房門，進門第一間小屋，大約6平方公尺，便是他的房間。進到屋裡，一個平櫃，一張小床，一張供他寫東西看書的辦公桌。

與黃沙溪舊居相比，聽他打趣說道：「高高在上，空氣清新，更加遠離人間，進入仙境，我搬來時，想既成了仙，本不應有任何的東西，連這床、櫃、桌、椅都不要，中共關了我整整二十多年，出監後又過了十一年，菲薄的工資夠糊口，便是中共在我身上體現的人道主義。不知臺灣政府知道我們這些當年黨國倖存者，住在這高空上有何想法？」

進他房間後，他張羅著給我倒茶，我們倆在小床上對面而坐，他細細打量了我以後，嘆氣道：「你老多了，大概工作夠操心吧。」我微微一笑道：「你也顯得蒼老多了，心情大概也不怎麼痛快吧？」

他擺了擺手說道：「我今年已七十三歲，來日不多，這把老骨頭被中共消磨殆盡了，我只希望在回到陰曹地府後，來生再不受這種折磨。」

說了一會話，便邀我到客廳就坐，自己到廚房去了，不一會從廚房裡傳來了他的嘆息聲：「真夠嗆！又停水了。」他告訴我說：「臨近中午大家都在用水，水廠的水壓不夠，上午就停水了，天天如此。」

為了解決白天的用水之需，他只好在半夜起來接水，自來水像一條線一樣，開著龍頭一直流到天亮還留不滿蓄水缸。夏天經常鬧水荒，只有等女婿下班回來，到樓下去一盆一盆地端上來，有時候我也要下樓去端水」。

活到七十三歲，已過古稀之年，生活的苦澀仍在困繞他。

我聽到後，忙拿起盆子要下樓端水，他阻止道：「下午的水已經夠了，晚上如果要洗澡差也差不了多少，湊合著用吧？」

正說著，他的小外孫放學回來，我已經五年沒看到他了，現在已經長到一米五以上，儼然一個大小夥子，潘老說他已小學畢業上中學了。小外孫告訴我，外公為了到樓下端水，前幾天還在三樓樓梯口上跌了一跤，所以我們都不准他下樓端水。

城裡的居民，樓房建起來了，卻陷入水電供應不配套的難事，這種本來很快可以解決的問題，一拖就要幾年。

潘老嘆道：「我們的生活就這麼缺著過吧！」

門外響起了敲門聲，女兒麗娜夫婦下班回家。麗娜提著一把寶劍，從客廳裡拿進臥室。潘老笑著對我說，他的女兒也學起國粹來了，每天一清早都要提著劍到樓下的水泥壩練半個小時，直到身上起汗方才停止。

我笑著說：「可不可以賞光，施展幾手給我們開開眼界？」她笑著說：「明天早上就請你在樓上看我現醜吧。」

看來，他同女兒女婿生活還融洽，唯一是他同老伴之間，因為二十幾年的隔閡一時沒能疏通，所以她基本上還住在縉雲山的西山坪養殖場，很少回來，暴政給他們留下的傷痕難以彌合。

下午女兒和女婿上班去了，小外孫也上中學去了，屋子裡又剩下我們倆人，我才翻開他遞給我的雜記，裡面有律詩雜文和回憶錄，那是他在深夜裡的憤世之作，我曾建議他能夠系統的寫下人生回憶錄。

一篇『南歸賦』就我記得的，錄下了下面幾句：

「余南國之弟子兮，祖皇考於民國。自幼崇仰中山兮，立志三民主義。少時求讀軍校兮，正逢國難當頭。壯年從戎恩伯兮，啟於浙中金華。烽火連天生死兮，敗軍於亂賊中。獨苦戰眾寡兮，身陷敵虜。囹圄流刑卅年兮，苦鼎鑊求生！……」四十載，他對國民黨的嚮往，至死沒有改變。

《七律·十年動亂》寫道：「筆鋒戰緊更兵鋒，國事不堪問吉凶。敗寇成王功罪判。降官敵婢死生從。強扶拓魯宣邪道，肆詆孔靈黜正宗。野種獨根無好果，民族敗類史難容。」

另一首是對勞改的真實寫照，反映了煉獄的過程：「十年勞改不尋常，欲說真情淚滿腸。『思想鬥爭』如烈火，精神炙灼勝驕陽。飢勞索命動魂魄，偶語毒刑寧啞盲。壓力重重呼吸緊，使人癡慨使人狂」。

一九七一年六隊的惡吏，張劍波為了和姘婦交歡而虐殺髮妻的案發，他寫了《惡吏傳》。痛斥那些人面獸心瘋狂虐待流放者的中共酷吏，他寫道：「殊世之共產政權在其階級鬥爭之腥風血雨中，對已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的國民黨人仍加緊迫害，除一批在歷次運動中殺掉外，四十歲以下的多數投入「勞動改造」

我入監以後，從蒙昧狀態到政治上漸漸覺醒，便有潘老啟發和影響的成份，所以，我一直把他當成我的長輩和獄中的良師益友。我們同監十五年，最令我終身難忘的，便是一九六七年八月那個血腥之夜，我被軍警打掉門牙，被打得遍體鱗傷，無法動彈。

獸警還向全體流放者警告說：「誰敢幫助孔令平，替他送飯送水、倒糞倒尿，就將同他一樣受到懲罰」。然而潘老挺身而出，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我度渡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日子！。

六隊在中共獄頭猖狂的年代，能凝聚相當一批人高舉起抗暴的『火炬』，也有他淺移默化的作用。

下午五點鐘光景，他叫我將他早已準備好的收折床，從客廳搬進了他的屋子裡，仍同在黃沙溪懸崖的舊居一樣，我睡的床對著他的床安下，中間只留下一個拳頭的距離。

夜間，同以往一樣，是我們倆久已盼望的促膝對話的難得時光，在小屋內縱論天下大事，盡情釋放積鬱在內心的煩悶。

夜深了，聽那自來水如線的水滴，從龍頭中掉進水缸裡發出淙淙的響聲。他打開那壁上的燈，看看掛鐘已是第二天凌晨三點鐘了，便起身去看了廚房的水缸裡的水有沒有接滿，然後和我肩並著肩坐著繼續講他的經歷。

一九四九年，他所在的部隊被打散，他從浙東一帶逃出包圍圈，在兵荒馬亂中步行千里，形同乞丐，歷數月終於到達深圳，想在那裡越境投奔母黨。想不到第二年被邊防部隊抓獲，緊接著被遣回重慶關在二監獄中。

他的妻子直接受到株連，那時她才三十歲，戴著反革命，反動軍官家屬雙重帽子，拖著兩個女兒替人幫傭，受盡欺凌。一九五八年被縉雲山西山坪勞教所關押勞教，做了共產黨的奴隸，因為常年勞累，嚴重缺乏營養，使她瘦如乾柴。

一九六〇年，兩個女兒姐姐才十三歲妹妹十歲，做娘的不忍看孩子飢餓的眼睛，把分配給她的口糧從牙齒縫中節省下來，自己卻用菜腳葉充飢，因常年飢勞，經常昏倒在縉雲的山路上。

每每講到帶孩子的傷心往事，她那乾澀眼眶裡常擠出淚來。

一九七二年，大女兒在重慶乾電池廠找到了一份包裝電池的工作，依附著大女兒在黃沙溪的懸岩壁上原先無家可歸的她，築起了歸巢。一九七六年在這裡迎接潘老從鹽源歸來，這個被中共暴力打碎的家，總算依附著大女兒，「破鏡從圓」了。

人說破鏡從圓乃人生幸事，只可惜二十七年來這面被中共打碎的鏡子已碎成了粉末，那心靈的黏合力失去了復原的能力。

潘老歸來面對骨瘦如柴的妻，因身患肺氣腫，冠心病，嚴重的貧血和心衰，宛如一支風中殘燭，隨時都可能熄滅。病床上的她反覆嘮叨，好像二十多年母女三人所受的欺侮都源於他。

性格固執的潘老因為忍受不了這種折磨，就把自己封閉在他的小屋中，實際上仍處於鰥居獨處，逃避著妻子的嘮叨和抱怨。

她咳嗽剛停，便又重新住到西山坪的老屋中，她說，那兒空氣新鮮些。

看到潘老與老妻實際已分居兩地，我幾次勸他考慮重新建立家庭，但都被他拒絕，理由只有一個：「我已年老不願拖累別人」。

直到1988年春天，他的妻子因病醫治無效去世。

在他寫的〈水調歌頭〉悼亡妻中，我深深體察他內心裡用苦水泡出來的愛，那辭是這樣寫的：

「生命如重返，一死何足悲。

曾經十載醫護，病告幾番危。

眼看一絲游遊息，明滅半支殘燭，斷續又光回。

婿女多勞苦，絕地救娘歸。

畢生苦，磨折盡，瘦如柴，能經多少風雨，長壽永不埋。

忽爾一聲噩耗，魂斷縉雲西去，從此棄塵埃。

已矣今真死，遺我有餘哀。」

原來，人生的真感情是偉大人格鑄成的。

聽他的小外孫說，外婆死後，外公曾閉門三月不出，從門縫裡看到他每夜三更伏案疾書。

這時他原先退休的那個黃沙溪付食商店，因為承包給了私人，承包人因為他為人正直，一絲不苟，再三懇請他回店值夜班。

他考慮到繼續打工會有三種好處，一是與店夥計們相處聊天，可以抵消亡妻帶給他的思念和孤單；二來每天去那個店步行兩裡地，可以練煅煉身體；三來可以增加一點收入，為老來進養老院籌點錢，所以欣然答應了。

我知道後，勸告他因年紀已大，行動不靈活了，萬一在路上摔倒，不但自己痛苦，反而增加女兒一家負擔，至於靠守店那點收入無補所缺。倘若需要，那點錢重慶市的朋友都會樂意相助。

但是他執意的去商店值夜班了，反而把每次店裡發給他的「誤餐」糖果留下來，每一次我去看他時，他便將它們包好，硬塞在我的提包裡，關照說：「帶給你的小馨馨吧，就說潘爺爺十分想念他，希望他見到這些糖果就像見到我一樣，潘爺爺祝他快快長大，好作國家棟樑！」

1992年我喬遷月亮田後，便把我分到新房的消息首先告訴了他。我誠懇的請他認真考慮我的建議，請他在我這裡住一段時間。

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信上寫道：「我一年一年的老了，身心衰微，舉步唯艱，黃沙溪的差事也力不勝任了，所以也不再去了。

然而，每每雜念累累……正到處尋找我此身的歸宿地，效外？市內？老家？總要覓得一個合適的去處。有時整天納悶，情緒很不正常，所有的遠近親戚，鄰居良朋，一概不住來了，願意小屋一人孤寂獨處，一年多來斷絕外緣……對於生死，我早有準備，很少去專門思考這個結局。」

他年近八旬也許預感到了什麼？本來經過中共關押二十七載，經歷長期的洗腦和奴役，其遭受的精神傷害和家庭破碎的痛苦，終身折磨著他。現在他感到妻子彷彿就在天堂口等著他。

由於堅強的信念，經二十五年監獄萬般折磨，他晚年仍保持思維正常。

收到這封回信後，我決定立即去他的住處。

這次到了他住的八樓，他仍和上次一樣在底樓迎接了我，我仔細端詳他，他的確更加蒼老了，然而上樓時仍保持著矯健的步伐，他告訴我說，明年他就滿八十了，這歲數已令他滿足了。

進到他的房間，我指著他放在桌子上已寫的回憶錄囑他：「共產黨將我們下獄二十多年，鬥我們整我們，目的就是在精神上壓垮我們，好給良民百姓們展示一下，反共的下場，但他們不但沒有整垮我們，相反的，使我們成了這段中華民族最黑暗歷史的見證者，成為今天最有資格揭露中共欺騙的人。

這一夜，我們倆再次促膝到雞叫時才合眼睡去，第二天，臨走時，我再次相邀他到北碚住一段時間，他說雖然我的新居提供了條件，但一來他本沒有到北碚居住的打算，二來事前也沒有和女兒商量。

自從妻子死後，他的女兒把他管得很嚴。我說：「你老人家行走如果不便，我可以用廠裡的車來接你。」

講價還價了好久，最後他答應，過幾天到我那裡看看我的新居，尤其想看看他最關心的德馨小兒，但講好了的，當天去當天回，不在北碚過夜。

一個星期後，他果然來了北碚，給德馨小兒帶來了四尾金魚。

在我勸說下，他留住了一夜，翻看了我所寫的「片斷」，並且在回去時，帶走了我寫的一些初稿。以後在它上面批了他的斧正，使我的《血紀》注入他的心血，給後來的讀者以更多教益。

1994年，當他得知王大炳因煤氣中毒身亡的消息，嘆氣道：「怎麼天公老是整善良的好人啊。」當我把王琳帶到他那裡講述孩子的困難，並告知他，我已經收她為我的乾幹女兒後，他立即從他的櫃子裡取出兩百塊錢拿給孩子，表示對她求學的支持。

在他已近垂暮，僅靠菲薄的退休金勉強度日，這錢實際上凝聚著對死難者後代的關注和希望。王琳含著淚水說了聲謝謝，便跪倒在地。

1995年他滿八十，不知是因為阿彌陀佛的佛力召喚，還是因為尋找此身歸宿的嘗試，他應磁器口寶輪寺主持風輪法師的邀請，去那寺院當了居士，其實是應法師邀請，為寺院抄寫經文。得到這個消息，我當即去了寶輪寺。

當我跨進寶輪寺的山門找到他時，他正向一群圍坐的老人講地藏經，我站在遠處不敢驚動他，只能從他那微閉雙目抑揚頓挫的語言中體會他的虔誠。

一個小時後講經完畢，他緩緩地向我走來，我迎著他，牽著他的手低聲問道：「在這裡習慣麼？」他說：「四海為家到那裡都一樣！」

他告訴我：「女兒和女婿去貴州開了一個鋅礦，我一人整天悶在屋裡，正覺無聊，這時風輪法師在街上碰到我，他說我面帶佛緣，於是我就來了。」

我進到禪堂，潘老將我介紹給寺廟的主持。聽他說橫行於世的大盜和殺人如麻的劊子手，對自己罪業一遭頓悟，皈依佛門是常有的事。

過了兩個月，我再度登寶輪寺山門，這一次我們在主持的禪堂裡相見，風輪法師縱論當今世道險惡，極言世界末日正逼臨人類。

他說：「潘老已將你在獄中情況告訴了我，端詳你的面像很像鍾馗，佛祖將你降生，專打惡鬼。仗佛祖庇佑，你在獄中累次逢凶化吉幾次逃過死劫，正因為還要繼續留在世上打鬼啊」。

吃過齋飯，潘老從他的寢室裡取出了他新作「等待皈依的居士」。這一篇就一直珍存的在我這裡，成為他留給我的遺筆之一，現摘錄於後：

「我身入佛門，俗念未淨，仍然煩惱在心，痛苦難除。時時回憶一生顛沛流離，蹉跎歲月，本有清明的智慧，卻被無明掩蓋，凡夫的貪嗔癡，三毒迷住了心竅，種下惡業，造了不少人間惡果。

「……我小的時候，大概尚在襁褓中，吾父，吾母，晚年得子，愛如珍寶，生怕養我不活，長不大，便去拜寄了寺廟，求佛保佑取名小和尚，化緣縫起了一件五顏六色的百家衣，穿到了十多歲，還在叫我小和尚。」

目睹大陸腐敗，而無回天之力的他，晚年淒涼心情可以想見，他只好以依靠皈依佛門解脫自己。

在寶輪寺，他仍以勤奮謙恭待人，詼諧幽默的談吐，博得寺廟眾僧的尊敬，但是，誰能料到，這便是他度渡過晚年的最後一歲。

1996年春天，寄住在寺廟中的他，開始咳嗽咳咯血，起初還以為是普通的支氣管出血，半個月服用中藥不見好轉，痰中的血越來越多，在他小女兒勸說下，由風輪法師親自攙扶去三軍醫大檢查，檢查結果初診是肺癌。

等到我獲悉趕到醫院看他時，他已經穿上病號服，住在大坪醫院的肺科病房裡了。我走進病房，見他一如往常談笑風生，正在同對面床位上的一個病人講「精神」治療法：

「為什麼叫生活呢？生活就是生龍活虎，死氣沉沉沈沈還叫什麼生活，你看我有多大年紀？每天早上我還要打太極拳，起來在陽臺上練氣功，像我們這樣的病，如果就這樣躺在床上，沒病都要躺出病來。」

病房裡的病人向我介紹說，他每天早上六點便按時起床，還要幫助其他病人打開水，真是一個熱心快活的老人。鄰床還有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女孩說：「爺爺給我講故事，他的故事，我從來沒有聽過，好聽極了。」

我問他：「誰替你辦的住院手續？怎麼連陪伴人都不請一個？」他說：「五天前是小女兒替他辦的住院手續，請人服侍每天還要開給他三十元工資，我那裡給得起？就是這住院費，退休單位承諾一半，你看，我那有這個經濟力量住院啊？」

貧病交加，他心裡十分淒涼！

我又問：「麗娜呢？」他說：「從貴州回重慶一趟光路費得上千元不說，耽誤的時間也補不起，我囑咐她的妹妹不要告訴她，現在病情還沒有下結論，用不著大驚小怪！」

我暗地裡詢問了主治的醫生，醫生搖頭說：「晚了，沒有康復的希望，何況他這麼大年紀，最多只能三個月的陽壽了。」

然而，他依然地談笑，依然講些有趣的故事，依然的每天按時起床，依然自己走出病房，打飯菜，打開水，依然的為鄰床的病友送藥遞水！

一個明知自己死期已近，仍然置之度外，坦然迎接日常發生的事，這除了仰仗他那畢生的人生毅力和一貫的臨危不懼外，未必沒有佛在暗中相助？潘老是聰明過人的長者，每天清早他不可能面對著大口吐出的鮮血，而不知察自己已入膏肓。

又過了兩周，他索性的出院了，得知他出院的那一天，我又趕到他的住處，這時他的家剛從八層高樓上搬到了臨街的新修樓房，不用再爬那麼高的樓。

我去時，他正在收拾他的床鋪，很坦然地告訴我說：「一個人生死有定，陽壽多少都是在閻羅王的生死簿上圈定的，何況我已過八十一歲算是知足了。」

我擔心他這麼出院是由於經濟的原因，醫院未必答應，他回答說：「醫生囑咐我還是回家調養，開了許多中藥，在家裡熬藥方便，過半月再來複復診一下，我在醫院，每天所付的昂貴的住院費使我反而擔心，女兒在貴州找點錢也不容易，我怎麼能多花他們的血汗錢？」

我走進廚房揭開鍋蓋，鍋裡面正熬的稀飯。

我問道：「你現在咳那麼多血，如果不再在營養上補充，就是健康人也受不了的。」他搖搖頭說：「吃不下啊；再說誰能替我上街買菜啊？兩個外孫都已在電池廠上班了，早出晚歸，我不願麻煩他們，自己慢慢的下樓上街，生活也從簡了，一天兩頓都吃稀飯，這樣反而腸胃受得了。」

聽他這麼說我真想放聲大哭。

我忍著悲傷，向他說：「我替你在北碚請一個保母媽過來，專門替你買菜弄飯吧！」他很堅決的拒絕了，告訴我：「我的二女兒和住在楊家坪的外侄女都先後來幫過我，但是我反而失去了活動的機會，你看我一個人能走，能做事，一旦停止了必要的運動，病情反而會加重的！」

面對著形體骷髏的潘老，我忍不住淚流滿面，他卻反而拉著我的手吃力的說道「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放聲痛哭起來，這是一個傲骨一身的好人，他一塵不染的品格，如青松傲立在這個世道昏濁的人間，已經不多見了。

撥通了他侄女家的電話，對她說：「潘老在人間已是最後幾天了，麗娜又沒在家，千萬對他要盡最後幾天的責任，請你馬上過來，千萬不要讓他再一個人上街了，萬一不小心摔在馬路上，那我們這些做晚輩的怎麼忍得下心？」

電話那一頭傳來了哭聲，答應馬上趕過來。

還沒隔上十天，六月十八日下午五點鐘，我便接到了潘老的外孫打來電話，帶著哭聲在電話中他通知我說：「外公已於今天下午兩點鐘離開了人間。」我的心頓時收縮得厲害。

我沒有遲疑，立即乘坐公共汽車趕到他家時，已是華燈初照。

就在他家樓下的巷道中，靈堂已經布好。逢布遮蓋的「靈堂」裡除了他的小女兒，外侄女和兩個外孫，裡面空蕩蕩的坐著幾個緊鄰的鄰居，老家涼平的兩位老哥和遠在貴州的大女兒，都只發了通知他們的加急電報，還沒有趕到。

靈柩前方的一張桌子上兩位寶輪寺的僧人正身披袈裟，正襟危坐，一邊敲著木魚，一邊還在不斷地誦經，為他的亡靈超度。

那悠揚哀怨的頌經聲，吸引著一群周圍鄰人的孩子們。我坐在靈堂前放的一張長凳上，聽著那抑揚頓挫的經文，腦子裡正翻滾著幾十年回憶的畫頁：

我與他相識於一九六〇年八月重慶南岸彈子石四川第二監獄中，剛入獄那時我才滿二十二周歲，雖頭頂著「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大帽，實在講還不懂什麼叫「政治」，那時他還不到五十歲，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長者。

靠著這天賜的緣分，我們倆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份一起從孫家花園在槍押之下，流放到涼山自治州甘洛農場，在那裡九死一生地撞過老母坪，同年十月死裡逃生又從甘洛農場再發沛西昌黃聯關。

以後又一齊押送到西昌地區的鹽源農牧場，這其間除了短期的調散，到農六隊以後的十四年間都在同一中隊，編在同一個組，鋪褥相依，朝夕為伴。無論是年齡、資歷和學問，他都無愧於我的長輩，在我政治上日臻成熟，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都受到了他的啟迪和教誨。

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六年獄中相伴十六年，有難同當，有危相扶。我遭受獄吏殘酷折磨，被打傷後，在生活無法自理的情況下，他敢於頂著槍桿子的威脅幫助我勉勵我，渡過最難熬的日子。在飢寒交迫之下，我們相扶為生存而拚搏。十六年令人難忘的共勉共扶的往事似悲歌，一曲一曲回蕩在耳際，不敢忘懷。

一九七五年中美建交，上海公報發表以後，中共對國民黨縣團有以上人員頒佈大赦令，他得以先一步回到重慶，一九七九年平反冤假錯案中，我脫離鹽源的地獄回到重慶。以後，我們又在重慶相逢，以不斷的書信、互訪聯繫著我們間的友誼，共勉共勵，成為精神上不可缺少的摯友。

然而憑著他在獄中的堅定信仰，待人平和寬容的人品，憑著他的博學和自我犧牲的獻身精神，卻贏得了獄中共患難的難友們普遍的尊敬。人們恭稱他為「潘翁」，是獄中最有號召力和威信的「國民黨人士」。

五〇年銀鐐入獄以後，他的妻子直接受到了株連，為人奴傭。不久就被收押進行勞教，從此帶著政治上的歧視，拖著兩個小女兒，大的不滿三歲，小的未足兩歲，也在監獄般的管束下，終身為奴。可以說他的一家都因投身三民主義事業，而獻給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大業了。

臨終前，在他的陋室中伏案留下「生活與遺言」，我在這裡摘抄下來，一面給我的讀者留下對他的簡介，一面也讓我們知道，老一輩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對後人的教誨：

「由於我過去親自感受飢餓二字，深有體會，又來自農村，熟諳莊稼人耕田種地的辛苦，正如古人雲：「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須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生逢亂世之我，感受而加以認識，深深懂得物力艱難，從來敬愛農民，從來不敢拋灑糧食，也足見我的生活節約刻苦有了根，再苦我也能過去。

因為我從苦中來，早已苦慣了，君子憂道不憂貧，窮困威脅不到我。

出獄二十年來，一直自炊自食，自洗自補，逢人從不說苦，在經濟收入低於普通職工，受著不斷上漲的物價壓力，不得不更加節約，不抽菸吃煙和茶，酒在嚴冬喝一口。好在我一個人又已年老，消化機能減退，齒牙搖落，咀嚼困難。每天吃兩餐粥，有時候換吃麵條，一菜下飯無兼味。

看起來我生活確實清苦，但比起那獄中的日子就好多了……

告訴麗娜麗施兩女，我死了不舉哀，不辦喪事，不穿壽衣，不燒香燭紙錢。臭皮囊一火焚了，不要骨灰，不詳之物，要來何用？人生道路上我是一個失意者，沒有任何留戀，灑脫而去，豈不快哉！」

好一位徹底的無我者，臨終前留下的這段文字瀟灑灑灑，對這個痛苦不堪的人間，沒有任何牽腸掛肚和遺憾，沒有任何的遺產留給他的後人。當我問主理後事的外侄女，有沒有追念他的悼詞在他的追悼會上宣讀，她卻搖搖頭。

在這種臨終的時候，縱有千言萬語，豈是一段家人的悼詞能說清？

好在他身雖歸去，靈魂尚存。信仰和追求都隨靈魂而一起長存。至於一生，後人如何評說，對於置生死於度外的他也不會計較。更何況，又有誰為他寫傳記，留存人間呢？於是我默默寫了下面這段文字：

《他的一生，出生農家，六十年前從政治大學畢業，後來去黃埔求讀，從此在心中紮正了三民主義的根，追隨著國民黨從事中國的民主革命事業，在國難當頭，日寇入侵之際，毅然從軍，官拜浙江金華行轅主任，並掛少將銜，抗擊日寇，八年倥傯。

抗戰結束共軍蜂起，他憤然率軍抗擊兵匪，終因兵敗成囚，銀鐐入獄，然而由於信仰堅定，在中共高壓刑鑊之下，獄火垂煉了他整三十五年。

自比蘇武，用他的精神鞭策自己，激勵周圍。做到在獨裁淫威下，威武不屈，信守了對三民主義的忠貞不渝。其人格，可以昭日月，他一生中無愧於孫中山之最為忠誠的信奉者。

這同那些把自己打扮成中國人民之「救星」，貧苦者之救世主，卻在國難當頭之際挑動內戰，塗炭生靈，殘害無辜，製造人為的戰爭飢荒，殺人如麻的人比起來，顯得光彩奪目。這同那些爭奪權位，呼風喚雨，窮奢極欲的當今各級貪官污吏和毫無正骨的人比起來，又是何等磊落！

歷史一定會對一代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向邪惡鬥爭一生的人作出公正裁決。歷史會永遠紀念潘朝元這個忠誠的民主戰士。》

是夜，就在那燈光昏暗的靈堂之中，在他的遺體之前，我把這段文字在他的靈前默默念後，再一火而焚。就在他的腳前，我將四條長板凳，拼在一起，從溫過去鬢髮相觸的情誼，俯身在他的耳邊悄悄說了聲：「潘伯，我來矣，就在你的腳前與你作最後一次相伴吧。」言畢和衣悄然躺下，似與往常那樣，面對面促膝相對，只可惜此時我們已不能對話了。

心中似有一團烈火在燃燒，一摸我自己的額頭燙得灼手。又感到板凳下面涼風突起，凌晨二點左右忽狂風大作，雷電驟起，我定了定昏迷的眼，看那靈前燭光隨著狂風而搖曳不止。昏昏屯屯之中，感到那南方尊者來迎接在空中久久徘徊的潘老遊魂了。

緊接著傾盆大雨狂瀉不止，好似要衝淨這地面上人間太多的濁泥垢土，沖淨這人間太多太多的不平。

到了凌晨四點左右，樓下響動，他的大女兒麗娜和丈夫才下火車，匆匆趕到。兩個女兒扶靈柩慟哭，我看四下，除梁平老哥外並無他人，連生前最密切的摯友都沒有在場，我知道他生前的朋友不計其數，僅鹽源同過患難，而今就在重慶仰慕他人品的就不少，而今一個也沒有來。

後來我才知道，自他身患絕症後，全部斷絕了同周圍友人的資訊。他的病來得突然，他的靈魂走得倉卒促。

後來我問到唐元澄等人，他們壓根就不知道潘老得了肺癌。就連黃沙溪付食店，他站過櫃檯守過夜的那家商店的小青年們，都不知道他得絕症的消息。

我若不是特別的關注他的晚年，主動獲悉他的消息，未必又能守著他的靈，度渡過這最後的令人難忘的一夜！

這段晚年的淒涼和悲景，以及他為自己設計的瀟灑灑灑離世的全部過程，真正實踐了他的臨終遺言。

這同那講排場，囑兒托女活得快活，死得悲傷的市俗人們比起來，有多大差異啊！



上午九時許，一輛卡車載著他的遺體，一駕舊中巴客車，載著送行的不到三十個親朋，就在陰霾的天色裡緩緩馳向石橋鋪火葬場。

夜間下起的雨變成了霏霏細雨，就像老天爺的淚水永無止盡。

送葬的隊伍沒有樂隊，沒有儀仗，沒有鞭炮。靈車緩緩馳出巷道，悄悄的，那氣氛可以說十分淒涼。

身處此情此景，我淚流不止。十點鐘，潘麗娜在火葬場院弔唁廳裡，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家庭遺體告別會。告別會剛剛結束，我已難以堅持，前一夜風寒感染，此時已使我渾身發燒，滿腦袋的昏昏沉沉說不清是病還是過度悲哀，坐在那告別會廳前的廊沿長凳上，我止不住哭出聲來。

我想，日後在臺灣的國民黨中央，得知像潘老這樣的忠忱三民主義之士，在鐵蹄，圍圍之下守著這信仰的方寸，矢志未移。而今天又如此淒涼與世長辭，何時才能為他補上一個追悼會，昭揚他光明磊落的一生，以及他為民主事業所作的貢獻，他的在天之靈便可告慰了！！

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一點，我在淚眼中目送他那枯瘦的遺體緩緩推進火化爐，眼望著那伸入蒼穹的濃煙，把他的魂靈和他的肉體一起帶入到天堂，永別了這塊苦土。

和著他寫的「吊亡妻」我填詞一首：水調歌頭·悼潘公

《人生如燈燭，燭盡光難收。明滅半載默忍，咬牙獨徘徊。

蒼然枯槁今去，六魂悄然蒼穹，消灑南天回。驀然回首處，我在守忠骨？

八十終，坎坷盡，魂瀰留。萬事蕭蕭，曾經沙場英雄事。兵敗階下成虜，囹圄自比蘇武。晚年佛門皈依，方悟萬事空。從此蓬萊去，淨土迎君回。」》

潘老骨灰安葬於哥樂山陵園。

十年後，我同他的侄女一同拜謁了他的墓，在蒼柏叢中，彷彿又見他的遺容，於靈前填《江城子》一首：

《君臥山崗已十年，今複見，松柏間。夢裡拾遺，故事有多少？縱使陰陽已隔離，五十載，舊時日。

指處荒塚憶昔時，正伏案，憤疾書。促膝相對，歲月能倒流？唯有正義攝人心，一曲在，永唱吟！》

## 第五節：夏光然

毛澤東時代，在反抗中共迫害的鬥爭中，我和夏光然結下了共生死的患難之情，當年張錫錕和劉順森相繼慘遭毒手以後，我和老夏便成了「火炬」生還的主要成員。

回重慶後，當我知道他在出獄後混跡市井的遭遇，對他深為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資助過他。我幾次為他找工作的努力沒有實現，深感力不從心。

中共長期的虐待，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留下性格被扭曲的傷痕，鐵打的漢子也難避這種傷痕的惡性發作。所以倖存者之間保持相互慰勉，成了我們之間共同約定。

一九八九年他與王正印鬧得很僵，決定離開重慶，回到成都金牛鎮的老家去，回成都之前曾到北碚我的家中一聚，那次我們同去北溫泉和縉雲山玩了一天，並且合影留念，我問他回成都以後的打算，他不無傷感的回答我說：

「隨遇而安吧，我不像你有了家，我是孤身一人無牽無掛，在江湖上漂泊多年習慣了。我最牽掛的是那些在鹽源犧牲了的先烈們，民主尚未成功，我一定要回一趟鹽源五號樑子去，憑弔當年已經犧牲的難友們，他們的遺骨如何處置我也要打聽一下」。

以後的幾年中，我常常收到他的短信，這些短信只有幾句相報平安的話。直到1996年才收到他從資中城關寄來的一封信，說他準備到重慶來投奔我，我敏感到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恐怕到了流浪不動的時候了，想來重慶找

一份工作暫時棲身。

我當即與毛貫益聯繫，看看他的八橋客車有限公司能不能給老夏安排一個看門的工作，不料，老毛嚴辭拒絕了。

想他從資中到來後，再作商議。那時我已在璧山投奔李倫所辦的海山公司，正同孫庸利用璧山坐椅廠的場地，開辦一個製作防彈衣的工廠。

接信後，我立即回了信，答應無論如何我要為他安排一個安渡晚年的事做。

八月份，我在璧山接到家裡打來的電話，說他已到了北碚我的家裡。我忙從璧山匆匆趕回，到家已是中午時分，進門見他端坐在我的客廳裡，穿著一件灰色很舊的中山裝。大概因為心情不佳，再加上旅途勞頓，那滿臉的皺紋，花白頭髮已蓋滿了他的兩鬢，比之五年前從重慶離開時蒼老多了。

灰色的中山服，又髒又黑，好像有幾個月都沒洗過似的。腳上套著一雙綠帆布的「解放鞋」，那模樣與進城打工的鄉下農民沒什麼區別。完全是一個窮愁潦倒的流浪人。真乃「匆匆又作渝市客，晃然如隔數十秋，亂世今日撫昨日，今日仍在街中乞。」

我本想問他怎麼稿得如此狼狽？但我卻不知從那個標準和那個狀態來問，事實上夏老三從我在孟平店裡與他久別重逢後，一直都處在窮愁潦倒的狀態中，想來他在89年從王正印家離去後，恐怕日子一直過得十分艱辛。

今日中共統治下，過去的五類份子及其後人，一直掙扎在貧困線上。

何況像他這種不甘彎腰事權貴的人，半生囹圄，幾十年折磨，到了晚年仍在漂泊流離。看到他，想到近幾年為生活而死在打工路上的王大炳。因不願低頭，苦難伴隨著他們的晚年。

見到他們如同對鏡照見自己，相比他們的命運，我中年後得到了一個正當的謀生職業，免去了在社會上流浪，近年又蒙李倫不棄，取得了一個小小科長職位，卻因天性不苟與濁世同流合污。不但與一些發財的機會失之交臂，還在工廠內部的鬥爭中提前退席。

退休後，立即進入打工仔的佇列，雖平時節儉刻苦，仍無多餘積蓄可用來支付窮朋友們的求助，面對著形同乞丐的老夏，平添了我的壓力。

好在這些年我認識了一些朋友，解決個把人的生活還不成問題。

當我倆坐定後，我向他問道：「你現在生活來源靠什麼？」見我直端端的發問，他很不好意思的向我囁嚅了一陣說：「離開重慶時，早先有一點積蓄，本想做點中藥材生意，卻上了別人的當，本錢也被人騙走了。」聽他這麼一說，便不想追問下去，從口袋裡掏出一百塊錢來。

他接過錢捏在手裡繼續說：「來前在資中，往在朋友家，已經身無分文，這次從資中來重慶，火車票還是朋友給買的。一下火車到北碚來，因為沒有錢買汽車票，便將自己貼身衣服脫下來，當給汽車售票處了。」

他一面說著，一面脫下那又髒又舊的中山服，裡面居然沒有任何襯衣。

他怎麼會混成這樣子，我不想追問，連忙到廚房裡熱了熱現存的菜飯，同他將就著共進了午餐，按照我原先的安排，下午就立即帶他去璧山坐椅廠，請求孫庸念在我和李倫的交情上，給他安排一個看守大門的工作。

他狼吞虎嚥吃著我給他熱好的飯菜，一面告訴我他在火車上已經一天一夜沒吃東西了。面前的他完全像「風雪夜歸人」中的老乞丐，所不同的只差一根打狗棍和向人討飯的破碗了。

吃完飯以後，我在衣櫃裡給他搜索了一大包我穿過的衣服，重新再添了五十塊錢，要他去汽車站把押在那裡的襯衣贖回來，一面掛通了璧山坐椅廠孫庸的電話。

這孫庸原是李倫的童稚之交，從小一起在含穀的農村中長大。據李倫介紹，文革時他在璧山公安局供職，因家庭出身，在文革中被劃為走資派的黑狗崽，後來在李倫母親的掩護下，躲過造反派的追捕，免去一場殺身之禍，不得不離開璧山，離井背鄉到外地混了幾年。

文革結束後，孫庸得到平反回到了璧山縣公安局，不久下海，以老家的農舍為基地，開始做一點汽車零件的買賣，辦起的公司起名海山公司，李倫任專用汽車廠廠長，他依靠專汽廠而爆發，1994年璧山坐椅廠已成了占地50畝的廠家，並獲得四川省私營明星企業和重慶市私營企業十強的桂冠。

我與孫庸從丁家開始接觸，是以質量部門負責人的身分在質量上扶助他們，從丁家茅舍到璧山坐椅廠的建立，開始時，因為「生存」關係，對直接扶助他的部門極為謙恭，虛心接受客戶反映出來的各種質量問題，認真加以改進。

一年後，他對專汽廠的幾個大綜產品，例如坐椅，側窗，不僅形成依附關係，而且形成了包銷包用的關係，乾脆取名為重慶專用汽車製造總廠坐椅廠。而專汽的職工，因為他們售後服務態度好，幾乎包攬彌補操作者操作不當所造成的損失，所以總裝車間的裝配工並沒有不滿的意見。

孫庸本人原是璧山公安局的員警，他熟諳共產黨權錢交易的訣竅，知道除了依附專用汽車廠外，還必須有一個「保鏢」，他的小兒子頂了他退休讓出來的位置。

為了應付政府各級衙門，孫氏父子承包了璧山街上最豪華的酒店，璧山市政府官員和公安局的刑警是他酒店的常客。

後來，孫庸從相隔不遠的某機械廠私下用重金挖來技術骨幹，並購置了一條生產摩托發動機的生產線，以最快的速度在坐椅廠地盤中心，建立了一條年生產能力千萬台的摩托車發動機裝配生產線。

開始半年果然獲利頗豐，孫氏父子，便將利潤很薄的坐椅換成生產摩托發動機。殊不知這一次獨立運作的結果，卻沒有逃掉商品的經濟規律，重慶摩托車發動機一哄而上，產品很快出現過剩危機。上千萬流動資金被卡住，整個工廠無法繼續運轉，生產線停止了運轉。

而這時，無錫常州一帶更為狡詐的商人，探聽到發動機處於滯銷的海山公司，便從江蘇專程到重慶璧山與孫庸商定，以賒銷的辦法，將這些滯銷貨運往沿海，答應一定在裝配後，將這些賒銷的貨款如數返回。殊不知這些發動機有去無回，運出去一年了，賒銷的貨款卻連個影都沒有看到。

在短短一年多的發動機熱中吃了這個大虧，使孫庸明白他那點功夫，只有依附一個主廠，保證他的產品銷路，才能存活。他沒有掌握一支為他提供適銷對路產品和營銷班子，唯一手段就是賄賂國有企業的頭。李倫下臺後，竊取了專汽廠領導班子的陳增，向他伸出了『雙贏』之手。

中共「改革派」想用經濟建設的成就，使自己迅速成為有產者，尤其想證明一黨執政比多黨制優越，為繼承獨裁衣鉢辯護。然而，失去競爭所帶來的粗製濫造，失去監督所帶來的腐敗卻難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貧富分化使社會秩序日益混亂，搶劫銀行、搶劫珠寶店的事頻頻發生，老百姓幾乎家家有防盜門。

防彈衣及防彈車應運而生。

1996年重慶市把各銀行配置的防彈車生產權交給了專用汽車廠，雙方進行了『協商』，孫庸以豐厚的回報，從陳增手上接過了防彈車的生產權。

老夏大約就是在璧山坐椅廠陷入困境，孫庸剛剛與陳增搭上關係時，來到了這家工廠。根據我的估計，看在與孫氏幾年的老交情上，由璧山坐椅廠接納一個夏光然應當不成問題。

我從家裡打電話到璧山坐椅廠時，電話的那一端傳來了老孫大兒子的聲音，說他老子去浙江討債去了，雖然他沒有拒絕我的請求，但聽得出態度非常勉強。他向我訴說了一大堆的苦衷。

聽他的回答，讓老夏一個人去恐怕要碰軟釘子，所以決定親自陪他去一下。下午三點鐘便與他一起乘公共汽車去了璧山坐椅廠。

我在總經理室裡終於碰到了孫露，彼此寒暄後，我向他介紹了夏光然，著重地向他介紹老夏的能力和現狀。孫露皺著眉頭，重複著在電話裡已經說的話：「工人已大幅裁員。」

講了好半天，最後孫露表態說，只有將原先守門的人數再壓縮一個，讓老夏暫時充任。老夏就這樣免強地留了下來，工資沒有定。

那時，李倫的海山公司正在規劃防彈衣的生產線。我在陳家坪為防彈衣生產線繪製流程圖。

幾天後，我又專程從陳家坪到壁山探望他，看他住在其他看門人一道，問他孫老闆給他每月多少工資時，老夏苦笑著沈默不語。在我追問下，他搖頭說：

「誰叫我無一技之長，又在這種垂老時寄人籬下？我的處境在別人眼裡如乞丐並無兩樣，能夠有一碗飯吃，夜容一宿，我沒理由向東家再講待遇。再說你也不容易，孫氏父子已不像從前那樣為產品過關而討好你，你也在人家的管束下拿點打工錢。」

最後他才告訴我，孫庸每個月只給了他兩百元，除了節省著吃飯就一文不剩了。聽到這個情況，我立馬想找孫露去論理，因為我知道，重慶市門衛的待遇一般都在五百元一個月，怎麼會給老夏這樣少的工錢？

我剛剛站起身來，就被他拉住說道：「孫露是晚輩，你找他有失你的身分，再說我來時，他把話說明瞭，他這裡不需要人，換句話說，我是從別人碗裡分飯吃，何況我才剛來，試用期也是三個月，等到以後你找他父親平心靜氣商量這件事也不遲。」

我又問道，你們除了看門還包含那些附帶工作？他說：「看門的人已經少到三個人，其中還有一個半兼職的飲事員，所以我們的值班時間，每天已增加到十二小時，除負責對進出員工登記，收發公司來往信件，還要負責廠區前的清潔衛生打掃，登記員工的遲到早退，督促工人們按時上下班。」

壁山坐椅廠開辦初期的雇傭者，都是孫庸老家的子弟，開始他們為擺脫農活，甩掉農民帽子感到新鮮，不久他們被煩重的（有時是沒日沒夜的）生產任務，和不小心報廢產品扣除工資的懲罰，使他們對孫老闆感到憎惡。他們在背地裡咒罵他比《半夜雞叫》裡的周剝皮還要周剝皮。

工人們把工廠的工具，原材料、半成品，趁下班時夾帶出工廠大門，千方百計買通門衛，偷拿之風盛行。甚至發展到深夜用汽車，把整車的鋁材、窗框、汽車坐椅偷出門去，日子一久，被孫老闆發現，除了增派狼狗夜巡，並毅然的撤換了「門崗」，將最親信的外侄和娘舅充任這些崗位。

身為中共黨員的孫老闆，其剝削手段一點不比資本家差。

恰恰好在夏老三當門衛的這段日子裡，1997年初，在壁山坐椅廠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有一天由七八個人組成的「索債隊」，氣勢洶洶的撞進工廠大門。他們不聽老夏的制止，逕直穿過庭院，直端端的向辦公室大樓撞去。

在兩個戴大蓋帽，身著藍色制服的『執法』人員帶領下，撞上二樓的總經理辦公室。孫庸辦公室外的財務和管理人員阻攔不住，兩個「員警」亮出了自己的工作證，證明他們是壁山縣工商局的執法員警。

來人口稱，縣工商行政管理所，收到了二十幾家工廠的狀告信，說壁山坐椅廠長期拖欠他們的摩托車零件款，現在已是年關在即，所以特別來查對這個事實。

索債隊伍中有兩個女人，在樓下尖聲的吼道：「今天你們不還錢，我們就要把你們的摩托發動機搬走」。那時孫庸還在浙江催款沒有回來。

手頭沒有錢又想發財的小業主們，常常憑著一時產品的適銷熱，一哄而上，在產品熱銷推動下，小業主竄合一起，將自己的零件材料盲目投入一個組裝廠，開始時哥們相稱，大碗的酒喝出了最初的『兄弟』關係。

但是好景不長，積壓發動機欠下配件款，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常見現象馬上出現了。一半因需求嚴重跟不上生產，一半因一時脫銷而粗製濫造，產品滯銷加質量低劣產生了小業主間的欺詐和鬥毆，很必然發生眼前這一幕了！

現在兩個自稱縣的工商民警，在經理室門外亂吼了一陣，卻不見裡面的動靜，其中一個一面狂喊：「孫庸你給我出來：」一面在陽臺上拾起一塊磚頭向總經理室玻璃隔窗上猛砸過去，只聽見嘩啦一聲，足有8毫米厚的毛玻璃窗就像驚雷一樣被砸開一個大洞，碎玻璃落得經理室門前一地都是。

在裡面躲著的孫大少爺，馬上陪著笑臉走了出來。為了平息對方的怨氣，他連忙從褲包裡摸出一包「紅塔山」來，連聲陪著小心說道：「諸位有話好說，消消氣」，一面吩咐在過道上辦公的辦事人員快給客人倒茶。

然而兩個大蓋帽將自己的公文皮包朝孫露辦公桌上一甩，打開包，從中間拿出一大疊欠條。原先在樓下喊叫的女人，見兩個員警在樓上攻破了辦公室，便連罵帶恐嚇的攆上樓來，隨行的其他人挽袖擦掌，口口聲聲喊道：「我們廠反正活不下去了，今天不拿錢來就砸了這家工廠。」

那用磚頭敲碎大門玻璃的大蓋帽，將手中的「警棍」交給了一起來的年輕人，年輕人會意，立刻揮動警棍將辦公室其他幾扇窗子一扇扇敲碎，一時辦公樓亂成一團。

孫露被來勢兇猛的討債人嚇昏了頭，呆呆坐著，連大氣都不敢出。他明白，今天這種場合，自己有一句失言，都會招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正當辦公大樓裡鬧得烏煙瘴氣，孫露束手無策時，突然樓下壩子中一聲大喊，只見此時的老夏戴著門崗執勤的紅袖套，手裡拿著一根一公尺長的鐵棍，另一手叉腰、怒目圓睜的大喝道：「那裡來的，敢在這裡撒野？這是工廠重地，那個敢在大白天撞到這裡來鬧？」

樓上的肇事者，被樓下這突如其來的吼聲震住，一起停下了手，把臉轉向樓下老夏站在地方，等到看清楚吼聲正是看門的老頭發出的，為首的大蓋帽推了一下帽沿，輕蔑地回敬道：「你一個小小看門的敢來干擾老子執法，小心弟兄們一個給你一拳，就要叫你扒在地下起不來！」

幾個正在興頭上的年輕人立即在樓上向他揮動著拳頭。

殊不知老夏冷笑一聲，毫無懼色，接口道：「你那戴大蓋帽的人聽著，你這一套只能詐騙那沒見過世面的年輕人，你們一進門我就看出你們是一群雇來的二流子，我已經打電話問過壁山工商所了，他們說他們根本就沒有派人來要債。」

現在，你們別在這裡裝腔作勢的哄人了，我已經把你們來這裡搗亂的事報了警，一會員警馬上就到，你們這些冒充工商的人一個都脫不到手，我奉勸你們還是趁早滾出去，否則你們就要倒楣的。」

他一面厲聲的警告，一面還走到鐵門前伸手把門關上，做出一付關門打狗的架勢。老夏的出現不僅使那些大喊大砸的人停止了手中的動作，大家都一齊把臉扭過去，朝著從縣城馬路上駛來的汽車張望。

辦公室前剛才還殺氣騰騰的大蓋帽，一下收了剛才的架勢，為首的那個大蓋帽下意識的把頭上戴的帽子摘下來提在手上，接著用手向他帶來的人馬一招，所有的肇事者便跟在他的後面，一面小聲罵著，一面向樓下「撤退」。

只有那兩個女人還拉長了嗓門，但已不像剛才那潑婦罵街的架勢，而是帶著哭聲嚎叫道：「老娘已經快一年沒有領到工錢了，本來老闆答應我這次催債如果有了錢，就首先補給我們的工資，砍腦殼的孫庸你教我們怎麼活下去喲？」一面還是跟著討債隊的後面，向著樓下「撤離」了。

走到工廠的那兩扇大鐵門口，一臉晦氣的大蓋帽，指著孫露吼道：「我還要來找你的，等著吧！」當他喪氣的跨出大門時，他又歪著頭狠狠的瞪了這看門的老頭一眼。恰恰好這個時候，遠處傳來了警車的鳴笛聲。

這支隊伍不敢怠慢，一齊跨出廠門逕直向路邊的一輛過路的中巴車奔去，叫停了那車，蜂擁爬上了中巴車，一溜煙的跑掉了。

院子裡沸騰起來，年輕的本廠子弟，把夏光然簇擁著。他們對這個老頭已有了敬意，今天親眼看見，老夏在兇惡的催債人面前不慌不忙解圍的風采。孫露正準備打開保險櫃，取出最後一點錢來退敵，卻沒想到這些人被老夏退去，他對這個平日不大開腔的老頭刮目相看了。

這時，老夏才向包圍他的工人們吐露了真情，他根本就沒有報警，也沒有打電話去縣工商所，他這樣的嚇唬來人，是從這支討債隊，自己語言上出現了矛盾，暴露出肇事人是廠家雇傭來的打手，當老夏道破他們是冒充縣工商局的，使他們感到心虛。那有不預先通知工商局就直撞工廠的？

這種以訛對訛，本是從中共常用的慣伎學來的。

想當年，林扯高抓到一紙「火炬」刊物，想訛詐出一個驚天的反革命集團大案，趁此機會，將他們十幾年最棘手的六隊人物一網打盡，趕盡殺絕。在險惡情勢下，面對氣勢凶凶的劊子手，不被對方設置的坦白從寬陷阱所迷惑，變被動為主動，反而質問何慶雲的證據。接連幾天籠罩六隊的恐怖氣氛被擊破，創下了以往一經被抓住把柄，只有挨鬥、挨整的被動局面，轉危為安。

這也許就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的道理。老子兩千多年前的論述，而今能用的人已經不多，這是坐椅廠的工人，無法理解的，也是孫庸和他的兒子所不知道的。

自從這次風波後，孫老闆覺察到靠上層的「權」和手中的「錢」是不夠的。他開始對這個過去兩個多月來從沒正眼看過的，衣著破舊，沈默寡言的守門人刮目相看了。

原來孫鏞的轎車出入廠門，從不停一下，更談不上對守門人招呼一聲。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他從浙江回來後第二天，轎車進廠門時，破天荒停下來，跨出車門主動向夏光然握手，並從車廂後備箱裡取出從浙江帶來的水果。詢問工作所遇到的困難。他知道老夏常犯胃病，專門給他帶來了胃藥。

不過老夏並不願改變他一貫的不卑不亢態度，從此，每當白色的桑塔那經過工廠大門時，不論孫老闆是憂是喜，老夏只禮節性點點頭。

而他同工廠裡的工人們，相處得就不同了，大家一直尊他為夏老師。他同打工者相處得很融洽，晚上他的門房裡總是聚著一大群小夥子，有說有笑的談古論今，倒也沖淡了他的孤獨，使他並不感到淒涼和貧苦！

然而他的病情卻一天天惡化了，先是吃飯老是感到喉裡不暢，漸漸出現嘔吐。1998年四月，他已不能正常吃飯，小夥子們替他在廚房裡熬粥，熱中藥。他變得十分消瘦。然而他卻忍著病痛，不露聲色照常值班，守門，打掃清潔。

那時，我正按李倫的佈置，加緊準備防彈服的鑑定工作，聽說老夏病體越篤，便在五月份專程趕來特地探望他，在他的寢室裡他躺在床上，形如骷髏。無力的說：「我已不能進食，現在連喝下一點雞蛋花也要兜肚的吐出。」

我真想不到半個月沒有看到他，竟變成了這樣，忙詢問他到醫院看了麼？他說，孫庸親自用車送他到縣醫院去作了胃鏡，只說是胃炎，開了許多中藥。

我看他床邊擺滿了大包小包的藥，告訴他防彈衣廠審核一旦通過了，我就立刻把他安排到我那裡，做一點編制計畫方面的管理工作，也用不著值夜班。這樣，生活上有條理，我們就可以相互照應了，對他的病會有所幫助。

這一夜他才把隱藏在心中的家事，告訴了我——

他一共五兄弟，他排行第三，夏老三便是他的小名。金牛鎮本是他的老家，兄弟中三人都是當地的農民，最小的弟弟十五歲，便考入了成都軍校，畢業後入伍，參加了共產黨。而夏光然，一九六二年在一群中學生中組織了金牛鎮人民黨，不久被中共破獲，以組織反革命集團將他下獄。

當年老么出於仕途原因，登報斷絕了與老三的親兄弟關係……二十年後，他從鹽源回到金牛鎮的消息，很快傳到了五弟的耳中，這時候這位五弟已是成都軍區的一個大校軍官。不知這位五弟良心發現，還是骨肉親情，看到自己的三哥，流落街頭替人代筆書信維持生活，便派人把他帶到軍區大院。

向他表示不要再在街上流浪，答應他在軍區大院隨便幹點事，以度渡晚年。老夏心中明白五兄弟找他來，是對當年他的不認親哥表示懺悔。畢竟眼下在金牛鎮只剩下他們兩兄弟了。

對中共早已認清的夏光然，懷著複雜的心態，不久隻身離開了成都，他說：「天地有正氣，人活就為這一口氣。撥出去的水難以收回，他不願一個曾公開宣佈將他趕出家門的親弟弟，今天再招他寄住他的籬下。從那以後，十幾年過去了，成渝沿線布著他流浪的足跡。

一種無牽無掛交織著流浪者共有的失落感，伴隨著他親身體驗監獄外整個社會底層的酸楚，餓一頓飽一頓，晚上經常在車站碼頭露宿過夜。

據他口述，一九七九年他因刑期剛滿，調到農四隊，一九八二年在鹽源農場為張錫錕和劉順森作戲劇性平反會上，他當場責問鄧揚光：「人都被你們殺害了，現在憑你們一張空頭平反書有什麼意義」？

刑滿後，他仍保持著「火炬」成員的本色，繼續反抗中共對留場人員的壓迫，負責管理他們的敖麻子說他反革命本性絲毫沒有改，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將他「釋放」，離開鹽源農場，回到了他的金牛鎮老家。

返回金牛鎮後，他在場口擺了一個替人代寫家信和訟狀之類的小書桌，晚上又在附近茶館裡為喝茶人講評書，得點茶水錢，維持著清苦的生活。

一九六三年，他入獄後，懷著遺腹的妻子，被所在生產隊長強娶，並逼她墮胎，遭到她拼死反抗，總算把懷胎八個月的孩子生了下來。

老夏回到金牛鎮時，他的兒子已滿二十歲，兒子面對著這個站在面前的「陌生人」心情極為複雜，要認吧，想起幼時被人欺凌時，這個本該保護他的人到哪裡去了？不認吧……

回到金牛鎮，房子早已歸他人佔有，妻子也成了他人婦，看著站在跟前兒子眼裡的尷尬眼光，知趣的老夏悄悄的離開了他們，用發給他的安家費在昔日幾個朋友的幫助下蓋了一個乾打壘的土房子，聊作棲身之榻，不久便同路經成都的鹽源同難結伴，一起流浪到重慶。

他用平淡的口氣講述著他的經歷，他的處境很像狄更斯筆下的奧立弗，只是他並不是濟貧院裡長大的孤兒，而是經過中共十幾年監獄錘煉出來的火炬戰士，同他們認錢不認人，奉行大魚吃小魚作風完全不同，他靠自己的正義感和正直，影響周圍的人，雖然他常遭人算計，弄得往往連飯都沒得吃的地步。

他講完了這段從未向任何人講述的隱情後，顯得非常疲倦，最後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得的病我最清楚，如果真的得了不治之症，那麼我想，我最後投靠五弟的時間也許到了，我預計要治好我的病，需要大量的金錢，在這個時候我再不花他的錢給我治病，就未免太傻了。」！

認定終身反對共產黨一黨專制，那麼他寧可流浪飄泊也不會去討權貴的恩賜。中國自古就流傳著叔牙、伯夷餓死在首陽山下的故事，我們這個年代中，像陳力，張錫錕這種寧死不屈的中華精英，真值得我們的後代大樹特樹，否則怎麼說中華魂猶存？！

那天晚上，我倆相聚在我房間，夜半我還給他做了一碗雞蛋湯，大概因為我在他身邊，使他感到寬慰，喝下了沒有嘔吐，平靜的睡去。我卻沒有睡意，突然感到我同他可能是最後一夜相聚了。

直到五點鐘與李倫約好，今天是防彈服鑑定會準備工作的最後一天，我匆匆的起床，在離開這位難友時，我一再叮囑他，現在他的病情未知，身體已十分虛弱，一個人回成都，我絕不放心。必須有人護送，所以請他無論如何等我兩天，在我開完鑑定會以後，由我專程護送他回成都。

兩天以後，當我回到壁山坐椅廠時，門崗上卻不見了他。我連忙去他的宿舍裡找他，正碰上與他同值夜班的老吳。他告訴我說：「你走的第二天，老夏開始大口吐血。昨天晚上，他告訴我不能再等你了，再不走恐怕真走不回成都了，我再三勸他再等一天，等到老孔回來，他也沒有聽，臨走時囑託我，把你給他過冬的衣服歸還給你。」

聽他這麼一說，我馬上問道：「有人陪他一起走嗎？」老吳回答道：「他臨走時說是去丁家找小王，是不是請小王送他一下，我就知道了。他剛走才半天，現在要去小王家，興許他還在那裡？」說著從懷裡掏出了一張字條，我接過那張字條時手在顫抖。

令平如晤：我不能再等你了，這次給你增添麻煩了。我這次打工教訓太大，真實瞭解基層打工仔的艱辛。我的性格決定我不向新貴們賣笑，同時，我的病情又發，不得不走。等你四天你還未來，我只好離去。我決定到成都醫病，如能康服，九月二十七日一定再到鹽源憑弔死難的友人。然後叫我在共產黨的顯貴「弟弟」供我晚年，（他是求之不得的事，我還要慎重考慮再作決定）。今後可能經常見面暢談今生事，或寫點小東西，握手。

友：光然 1997年六月7日

讀罷，我的淚水奪眶而出，心中喊道：「為什麼在這個社會裡好人老是沒有出頭的日子？敢於反抗暴政的人老是被人整得無路可走？

」九月二十七日，正是「火炬」最後一位烈士劉順森犧牲於中共屠刀下二十一周年的忌日，病篤流浪的夏光然仍念念不忘，其忠已表，只是大陸上何年何月有這些英烈的紀念碑，使他們的英魂為更多的民主事業後繼者所紀念？

來不及多想，把信折好存放，向老吳說：「你能不能帶我去丁家找小王，興許他還沒有走。」老吳為難的說：「你知道，孫老闆的規矩門衛值班是不准換班的。」

我只好到車間去問幾個家在丁家的人。找到以後，在廠門口登上一輛去青槓的客車，等我們匆忙趕到小王的家找到小王時問他，他卻說：「老夏一直沒有來過。」我心中一陣緊張，這個老夏，這個在監獄裡經歷過多少磨難，好不容易活到今天的硬漢子，此時究竟在那兒呢？我迷惘的望著通向青槓的馬路自問。

難道他自己獨自上了去成都的高速公路，我們上那兒去找他？

我和帶路人只好返回坐椅廠。回到宿舍，老吳將他臨走時，囑咐轉交的一包棉衣提出來交還給我，那是我為他準備過冬的東西，現在人去物留，看著它我此刻掛欠他能平安到成都嗎？他能康復嗎？

唉！這些年來，從毛澤東地獄裡熬出來的摯友們先後離我而去了，王大炳、潘朝元、現在難道輪到夏光然了嗎？這些相逢時可以傾吐內心的至交血友，今天還剩下了幾個？鄧自新、鄧小祝、陳孝虞、王文典這些人如今生死不明，不知漂泊到何方了？

每想到這裡，便將他留給我的那張字條拿出來讀了又讀，不願相信他就這樣走了，難道這一張質樸的留言，真的是留給我的訣別書？人生何其短暫，算起來，他不過比我大五歲啊！今年才六十多歲呀？

從那以後，大約三年的時光，我都在盼望郵遞員會突然送來告知他下落的信件，甚至希望突然有一天他會來信約我同去鹽源祭拜已犧牲的難友。

1999年，我專門寫信到如今還滯留在鹽源農場的朱凌飛，王文典，告訴他們夏光然在我這裡離去的經過，並告訴他們老夏若康復他要重祭先烈的宿願。並請他們注意一有老夏回鹽源的資訊立即通知我。

然而一年一年過去了，夏光然從此再沒有給我來過一封信。成都的朋友來電話告訴我，老夏沒有去過成都，鹽源就更是杳無音信了。

倒是每年我卻在做著一個夢——在鹽源二月的砂塵暴中，我看到了令我傷心的二道溝，在風砂瀰漫的五號樑子上，在那些埋葬這些烈士們的亂石堆中，夏光然正在向那些熟悉的墳塋鞠躬，一遍又一遍！！

原先的「火炬」成員一個個離去了，我越來越感到，揭露中共監獄黑暗的任務，在我肩上的擔子更沉重了！

### 第六節：散落在市井裡的鹽源難友

1985年，我還住文星灣的危房時，有一天中午下班回來，鄰居劉大爺告訴我「你早上上班後不久，就有兩個與你年齡相當的中年人來找過你，我告訴他們，你在農用汽車製造廠上班。他們立即留下了一張字條要我轉交給你。」

我接過那張字條一看，那上面寫著：「令平兄，別來無恙，聽說你回重慶後，現在在農用汽車製造廠工作，今天特別的專程從市中區來到這裡拜訪你。不巧，你不在家，我們又不好去廠裡驚動你們的門衛，加上還有其他事要辦，所以我們就沒等你回家，特留下我的地址，希望你能抽空到重慶一聚」

字條落名孟平，地址是市中區五一路某街100號。

在蔡家場聽到從鹽源返回的何福安講過，張錫錕和劉順森後來得到「平反」。同劉順森一起，當年以「反革命越獄」逃跑集團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孟平和楊漢群，也從南充監獄中獲釋，孟平回到重慶後便在大陽溝一帶居



住。只是不知道他住的詳細地址，也不知道他謀生的職業是什麼？

孟平比我小十歲，據他本人講，被捕前是西南鋁加工廠的一名工人，因派系武鬥而被捕，人很機靈，今天他突然出現，並找上門來必定有事。我本來就想弄清楚劉順森當年逃到重慶的經過，也想知道孟平等人的平反過程，瞭解他們從南充監獄放出來的夥計們下落和生活情況。

當時決定下個禮拜，到市中區按字條提供的地址，會見這位當年小兄弟。

我按字條上提供的地址找到那裡時，已接近中午，而門卻鎖著，據隔壁的鄰人講，他平時一大早就出去了，白天很不容易找到他本人，只有在晚上十點鐘左右他才回家。我從門縫裡向裡張望，只見室內堆放零亂，也沒什麼傢俱。

問他的鄰居，那人說，他一個人住在這裡，房子是租來的，如果你要找他，可到大陽溝菜市場去找，他弟弟在那裡開一家火鍋館，門面叫「兄弟火鍋館。」

到中午，我才找到了那裡。火鍋館正在營業，生意不錯，但是除了他的弟媳婦在那裡張羅，孟平卻沒有在。問到老闆娘她說：「他去買火鍋料了，你等一下吧。」

十分鐘後，只見他提著一個籃子，身後跟的人竟是夏光然。自鹽源一別整整七年沒有相見，看他的穿著打扮已與當年完全不同。見面後，最先問孟平，鹽源宣判後，什麼時候改判的？現在各在那裡謀生？

夏光然穿著中山服，還是那個老樣子，他告訴我說：「我成了無業遊民，至今落魄江湖，四海為家，前年我到了重慶，一直住在王正印家裡，幫他在朝天門的水果市場販運水果。」

「我打聽了你好久，都沒有弄清你在那裡，後來，還是在王明豐那裡問到你北碚。最近，我和孟平合開一個五金商店，做些買賣標準件的生意，上周我和孟平到北碚聯繫一批業務，問到你的住址就去了文星灣……」

從老夏介紹中，我已聽出，他出獄後，四處流浪，為求生活和孟平在市井相遇聚在一起。我指了指火鍋店，向孟平問道：「這店的生意不錯，想來你發了」孟平淡然一笑回答說：

「這是我弟弟和弟媳婦的根據地，我們只是暫時在這裡歇個腳。從監獄出來以後，我在南充監獄結交的那幫朋友纏上了我，前些日子又在江北碰上了蔣真富，他從鹽源回來後，回到他以前的鐵作社，鐵作社現在改行生產螺絲螺帽。我們商量從他那裡拿來的標準件，擺到大陽溝租的一個五金門市中來賣，大家都想弄口飯吃，權且以此謀生吧」。

聽他這麼一說，我對他們的近況已明白幾分。問到他們，這麼多年來是否安了家，老夏苦笑道：『四海為家，我們這種處境，誰看得起我們？』

我們在火鍋店吃過午飯，便由夏光然陪著我到了他們開的五金門市，在大陽溝的偏僻弄堂裡，我們找到了他們合夥的五金店。

那是一幢居民住宅樓的底樓用作出租門面，門面大約五公尺寬，縱深不到兩公尺，擺在玻璃廚櫃裡，全是些普通的連接零件和一些扳手之類的小工具。裡面坐著一個小夥子，正伏在廚櫃的玻璃臺面上打瞌睡，看來生意相當清淡。

我們穿過門市旁邊很窄的巷道，進去後，便是一個通向地下室的石梯坎。走下石梯坎進入地下室。過道裡漆黑一團，拐過彎，才看見從地下室射出來的燈光，進去是兩間套房，昏暗的燈光中瀰漫出劣質香菸煙的嗆人氣息。

外面那間房間裡擺著兩張麻將桌，大約五六個青年男女正圍著一張桌上玩著麻將。見有人進來一齊把臉扭向我們。

用不著介紹，我已經猜出這些人是孟平在南充監獄裡結交的朋友，他們的年齡差不多都在三十歲上下，從那穿著看，男的全是新潮的牛仔衣褲，女的袒胸露肩，披著沒有鈕扣的連衣裙，腳上拖著拖鞋，口裡叨著香菸煙，頭髮蓬亂，好像才起床的模樣。

從他們的外形上判斷，這些狄更斯小說「霧都孤兒」裡，所描寫的社會底層人物。用我理性的眼光認識他們，這些隨時都同看守所打交道的社會棄兒，是一群被生活遺棄的社會另類。

跟著老夏向裡面的房間走去，那裡面擺著三張床，一股低檔香水夾著霉氣迎面撲來，那床上亂扔著骯髒的被褥，以及亂堆在一起的衣褲，地上丟著滿地的菸煙頭。證明這些男女們過著群居的流浪漢生活。

看到他們的生活現狀後，我馬上會想到，為了求生存，他們極有可能就會在今晚的某次行竊中，被當成嫌疑人抓進看守所，他們從小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權力，不知什麼時候成了社會棄兒，沒人關心過他們的苦難和內心痛楚。

其實我在鹽源渡過的十六年時間，早瞭解他們了，他們是些從市井和農村流落出來，生活失去來源的人。他們被抓起來，又被監獄放出來，正常人謀生的路在他們腳下已經斷絕，只好落到這種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田地。

中共不但對知識份子造下了罪孽，尤其對勞苦大眾，造下了比歷代王朝更深更廣的罪孽。

下午留下夏光然與我單獨相處的時間，他向我講了他目前的生活，特別講到在與孟平合夥做機械零件生意過程，他說「不久前，孟平背著我將價值三萬元的零件，私自拉了一車到成都出賣。突然說雇傭的包運車是黑車，車在運送過程中失蹤，這件事發生得太蹊蹺，那是大家好不容易湊起來的本錢。

車是孟平雇的，想不到這小子給我玩黑吃黑的把戲，現在底金抽空了，生意也做不起來了，所有的人就只好在這裡鬼混了。」

我聽了他的話心中禁不住一陣驚異，孟平的底細我並不清楚，當年在六隊物色越獄的人也是劉順森親自定的，我和他的交往並不深。那一次三個人從六隊出逃。究竟怎麼栽在重慶，我也不清楚，但獲刑的人中除劉順森飲彈刑場，其餘兩人都判了無期徒刑。

論人品他縱然變得再壞，也不可能拿大家湊的錢做出這種缺德事，就是黑社會裡也講兔子不吃窩邊草！否則怎麼在江湖上混？

沈默好半天，我憂慮的問他：「你同孟平推心置腹的交談過了嗎？我想現在社會極混亂，運輸車發生這種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當然也不排斥你講的黑吃黑的可能，眼前我覺得你總要找一個正當的謀生職業，不能老在社會上混。」

為了規勸他，我介紹了潘老的為人和晚節，他晚年只是幫人站櫃臺，用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過他的晚年。像老夏這種經歷比潘老驚險的人，更要保持一個政治犯的本色。我建議他最好找一個企業單位，從事管理的職業，千萬不可在當前的困境中消沉墮落。

一九八七年我在朝天門碼頭附近的水果市場上，碰到了王正印，在王正印家裡再次與夏光然相見，當天晚上在王正印家留宿一夜。

這一次有比較寬裕的時間向他們較詳細瞭解。

老夏刑滿釋放後，便同賴開明，張映國等一起做收購黃連生意，據他說受商販騙，賴開明被人暗害，生意也散了夥，便跟王正印來朝天門做水果生意。

同孟平交談到過去農六隊可歌可泣的鬥爭往事時，他的評價是，「我們當年在做蠢事。」他對中共有一種特殊的看法，他認為同中共講真理是可笑的，更不主張同他們正面的硬拼。

他說：「真理在共產黨眼裡，只有大傻瓜才會孜孜不倦追求，只有愚弄人的時候才會講『犧牲是偉大的』。」

他斷言人是自私的，他說：「與其抨擊當局，觸惱他們，還不如去做破壞這個社會的事。例如不惜手段賄賂當權的，通過他們撈回大把鈔票，或者把毒品販到這個國度來，或從事走私，總之『生意』做得越大才算好漢！」

1992年，孟平兩次到北碚來找我。第一次拿了一個摔壞的轎車面罩，叫我找人給他焊補一下，他說他最近已經在作進口車的走私生意，自己也有了一輛本田車。我告訴他日本車的面罩，不能用普通焊補，只有另外下材料仿製一個，價格要五百元，他沒有思考的一口答應了。

那一次，我雖然沒有問他的生意是怎麼做的，也沒有問他現在有多少錢，但我根據中國人還很少有私車年代，他就擁有了轎車，一定在按自己的計畫，在做很大的生意，大把撈鈔票，一步步躋身於「中產」行列了。

第二次他拿了一大卷英文資料，我看是一部全自動洗衣機的圖紙和清單，於是我好奇的問他：「你怎麼又在做走私車，又在做洗衣機？」

他說：「重慶洗衣機廠生產的洗衣機是我從國外搞來的，我已經買斷了它的專利，現在我已查明，這個廠未經我的同意，大批仿造這個產品，所以我將向重慶市經濟法庭，按盜用專利的名義起訴該廠，並要求索賠。現在請你找一個懂英文專業的翻譯，把這些圖紙和說明書翻譯出來。」

聽他說的我已猜出，他已混跡進出口商貿場，並在外貿上初露頭角了。

我為難的說：「英語我完全還給老師了，要請人翻譯，我不懂這方面的行情，不知道你能出多少錢完成這套資料的翻譯報酬？」

他說：「我也是一個外行，所以特來請你幫忙，你們廠的技術室裡從重大畢業的年輕人能不能為我介紹一個？」三天以後，我回答他請人翻譯全套大約要三千元，只是他們需要的時間要三個月。他聽後說錢不貴，只是打官司的時間恐怕不允許延續那麼長，我只好另找他人了！於是他收回了他的圖紙。

那時，我家還沒有安電話，他已使用「大哥大」了。

1994年夏天我在沙坪壩參加一個質量體系培訓班，在培訓的地方他找到了我，他開的是一個新的凌志車，車上還帶了一個很年輕的女秘書，他本人不但西裝革履，帶著一付太陽鏡，很像近代派被尊為大腕的人物。

1996年，我已辭去了我的工職，在壁山的四亨公司「打工」，這一天晚上大約已經八點鐘了，我正在青槓車站旁的馬路邊，碰巧他駕駛的凌志車順著高速公路剛從成都返回重慶，在高速公路青槓出口站把車停下來，向我打招呼，他的坐旁坐著他的小秘。

這次邂逅，他毫不隱諱地告訴我，這兩年他已在進口車生意中站穩了腳跟。他以商人身份，在重慶和成都擁有兩個規模可觀的銷售門市，專門在西南邊境同東南亞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做「進出口生意」。

說罷他還從皮包裡亮出泰國和越南的護照，和一張出入邊境的特許通行證，上面蓋有四川省公安廳的大印。

他說他已經取得了泰國的國籍，我明白，他是瞄準了這些年進口汽車的熱門，靠走私小轎車發起來了，手裡有的是錢。

我問他兄弟現在在幹什麼？他說現在在重慶賓館擔任業務經理。

重慶賓館是重慶市政府對外接待的窗口，也是重慶官員們的小金庫之一。這裡有來自各方的「黑道」「白道」人物與市政府搭線聯絡，幹著各種『秘密』勾當。能擔任這裡的業務經理不是一般的市民可以攬到，看來孟平兄弟今天是混跡在中共權力富有階層之中了。

按此推斷他們的家庭和出身，當與中共某當權者有很深的聯繫，或者說他的父輩有當今中共的掌權人物。但是我問到孟平有關與當今中共權力者的親緣關係時，他從來不作回答，只說自己原來是西南鋁加工廠的工人。

不過當與他交換對毛澤東獨裁政權的看法，他毫不掩蓋他對這個殺人魔王的切齒憤恨，透露他與中共內的某種傾軋有關。

一九七一年他入獄不久，便到了六隊，與劉順森交為摯友，一九七五年劉順森組織向重慶地區的逃亡中，首選的成員便是他，其中他那機靈過人，以及對重慶地區文革狀況的熟悉，是劉順森選擇他的主要理由。但是我除知道他的兄弟外，對他的家庭背景一直沒有弄清楚，這也許就是他的狡詐之處。

那天晚上，我們在青槓鎮街邊的一家館子裡吃過晚飯後，便在四亨公司的花園裡交談得很久，他說他在出獄後經過認真的反思，對張錫錕劉順森的人品推崇備至，替他們的遇難深深惋惜，但認為當時劉順森的逃亡是件蠢事。

講到他對當前政局的看法，他說：「我對政治已經失去了興趣，就是感興趣也沒用，今天的老百姓那一個不是為賺錢謀生活而奔忙？那一個不是對中共既抱著一腔怨怒，但不會走上大街散發反對鄧小平的傳單！

我現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賺錢！賺政府的錢，賺共產黨的錢我決不半點手軟，因為共產黨內有的是貪官，像我現在幹的買賣，首先就是逃關稅，巧妙利用這些貪官為我批條子做護身。我現在就是要撈大筆錢來補償我十年的牢獄之災！」

好明確的主張，好熟悉的手段，這同那些被文革打成走資派的黑崽子們，到了今天父母官復原職，以後被稱為「太子黨」的人們，冒出來的肺腑之言，簡直是一模一樣的。

他算是擠進了中國新生的富有階層了，憑著他的機靈他會混得很愜意。

深夜十二點鐘，他才起身告辭，他的「女秘書」一直待呆在車裡沒有出來，我說夜深了就在四亨公司住一晚上吧，他說已與他的幾個夥計約好，今晚回重慶賓館住，我問他結婚了沒有？他反問：「人為什麼要結婚找約束呢？結了婚，行動要受限制，要是再拖上一個孩子，簡直就是受罪，像我現在這樣無拘無束不是很好嗎？」

看來他在家庭問題上也是時髦的現代派，同居的雙方都不受道德和責任的約束，這是不是新的家庭觀念，我不知道。

當我講起王大炳子女的困難，以及其他掙扎在貧窮線上的人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資助，把自己用不完的錢做些慈善事業可是一件積德的事。他雖然口頭上表示同意，可是他從來沒有做過一件這種好事。

不久當潘老去世時，我打電話通知他，一同去參加潘老的追吊會時，他卻沒有應諾前往，這令我感覺到他與我們當年獄中同生死的人相隔甚遠，沒有必要同他保持聯繫了。

至於我所知道的從鹽源農場獲釋的幾十名人員中，除了幾位獲平反回到機關企業的人員，如張忠信，王明豐、王平依靠工資而過活外，鄧自新回了西南毛紡廠，陳孝虞身體很不好，曾帶信到蔡家場尋找過我，至於陳蓉康因家被拆遷，當時缺電話，隨後便失去了聯繫。朱凌飛、王文典還留在農場的老殘隊。

1991年當我出差成都專門尋找解放中路張錫錕的家，準備第二次探訪他的大哥，但那裡已重新拆修，原來的1268號早已消失，因不知電話號碼同他大哥失去了聯繫，不知他們現在何方？

刑滿釋放人員絕大多數處於市井最底層為生活而掙扎，如像我第一次在上清寺的那個地下室裡看到的那樣。也有些實業小成的人。例如唐元澄，從事一個塗料小作坊，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掙扎度日。

散落在菜市場從事開麵館的危君福，王正印，中共給了他們一點可以求生存的條件，他們年紀都已六七十歲，再沒有精力過去想其他的門道，並以他們親身經歷訴說中共當年「改造人」的真相。尤其見證當年高舉火炬，英勇抗暴人們的事蹟。

## 第十二章：前途

在毛澤東對中華社會大破壞以後，中共的腐敗醞釀著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除所涉公職貪污、賄賂成風、官霸民宅、抄家竊財、冤獄橫生、煙毒無忌、道德淪喪外，還要將我從日常生中所見到的貧富懸殊、社會不公、乞丐娼妓、市井欺詐記載在下面，看看這個以『解放人類』為宗旨建立的社會究竟怎麼樣了？也從中看到社會的未來。

### 第一節：市井公害

六十年中共統治的實踐證明，中華民族損失最慘的是道德的敗壞，毛澤東時代講階級鬥爭，人和人之間的真情友愛被無情鬥爭代替，今天中國人又被金錢利益毒害，街上受傷的老人沒人去扶救，乞丐玩著花樣騙人憐憫，投機商用低劣假貨騙人，大米蔬菜肉蛋牛奶無不含危害人體的毒素充斥市井。

社會道德已淪喪到這種粉碎性程度，令人對中華安危感到憂慮，一旦大陸出現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重演盧溝橋事變，恐怕就再不會出現「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少，人人都有抗戰守土天職」，出現與入侵者拚死相搏的淞滬戰場壯井了。

### （一）如此建設

再看看中共吹得天花亂墜的「四化建設」。

上世紀末重慶綦江門戶彩虹橋突然垮塌，致使四十多過橋行人頓時命傷黃泉，這種慘案實際上充滿了這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為減少這種惡性事故重複氾濫，當時朱融基特派中央電視臺赴重慶，就虹橋事件負責人舉行公判會，用電視對公審現場進行了報導。

可是道德淪喪已深入國家中樞，人們對人命關天的事已麻木不仁，劣質工程有增無減，進入2007年以後礦井垮踏、瓦斯爆炸造成危及工人生命的事務頻發，除翻牆得到許多消息，這些被認為「負面」東西又為中共噤聲。

近三十年來高樓大廈不少，又有多少是服從於國計民生需要呢？

新近距我的住處不遠，落成了一家私人營業的休閒娛樂餐廳，因為每天傍晚我都要去龍鳳河邊活動身體，經過那裡的門口。看到幾十個工人在那裡忙碌著裝修，只是門面和招牌沒有扯出來，所以並不知道這裡幹什麼用場。

待到裝修初具眉目，並且在霓虹彩燈下映出了《月光·28》幾個大字，才知道它同遍地開花的餐廳一樣，名字取得很漂亮。

因為它的位置選在環城公路通北碚市區的第二個路口，隔著公路，面對龍鳳河，門前是寬闊的丁字路口，可以擺放幾十台小轎車。整個場地樓高五層，每層長約七十公尺，每層大約千餘平方公尺。面對環城馬路的一面，全是玻窗結構，視野開寬，環境幽美，算適合於小車一族者們進餐的地方。

中間過道隔開的後面，是一處處隔開的小包房，大概用於玩的人洗澡泡妞！臨三岔路口的一方，還有一個圓拱形的玻璃窗裝飾的透明機動升降裝置，可供食客玩者上下。

整個餐廳入夜以後，燈光通明。我雖沒有進去過，但從設備條件估計在這兒休閒費用一定不低，在北碚地區，屬於中檔以上消費的用餐娛樂場所。近十幾年來，這些場所頻頻建立，反映的不是一般平民生活的提高，而是貧富的兩極分化。

忙碌了一個多月，前幾天終於竣工，開業慶典是從前天開始的，接連兩天，門口站著打扮入時的年輕女招待。下午五點鐘，門口停滿了以轎車為主的車輛，每一輛車開來，便從後備箱裡抬下一個個花籃，表示來客對業主的祝賀。

我走到花籃前，看到上至重慶市委、市政府辦公室、北碚區政府、渝北區政府、北碚公安局，依次是財政局、稅務局、房地產公司、北碚技術監督局……幾乎本地市政管理機關，都統統名列在花籃的條幅上。

一個北碚私人開辦的餐館老闆，請來這麼多政府部門為它開業慶典捧場，足見這種靠當官的作背景，不但是一種時尚，簡直就是一種規矩。

商而無官，缺了靠山，也缺了財源，要想私人獨撐，應付稅收、治安等等的糾纏，簡直是不可能的。官為商提供條件，商為官提供賄賂，可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標致！一個小小酒樓老闆都能貫徹這個宗旨，可見它的普適性。

我正在想，突然門裡撞出來的一位稅務稽查胡某，他曾是我在中學教過的學生，後來在稅務局升了官。此時他滿臉通紅，後面跟著是他的老婆和兒子，手裡都提著一包「禮品」，他已帶有三分醉意，但還認得我這個「老師」。打過招呼後，便偏偏倒倒提著東道主送的「大禮包」，走到他車前，一家人上了車。

看到這個學生，我又在想，東道主送給捧場人的大禮包，甚至還有「紅包」，也不知價值究竟多少？幾十個單位，每個單位來人至少是五人，帶上他們的家眷連吃帶包，老闆要拿出多少錢應付這些白食客？

然而商人當然不會作蝕本生意，花出去的錢，開業後在幾天之內就賺回來的。有句民彥：「捨得會花，便懂得會賺。」投入的本錢越大，賺來的錢越多。不管胡錦濤如何講八榮八恥，也不管他口頭上如何扶助三農和消除貧富懸殊。實際上起決定作用的是權。沒有監督，一黨獨裁對少數人就有這些好處！

當我走過那兒，一個醉漢從旁邊的小餐館裡出來，對攔住馬路的小車群，臉上顯出鄙夷，帶著點醉意怒喝道：「滾開！你們這些吃人不吐骨頭的傢伙。」搖搖擺擺走過「月光

28」門口，指著站在那裡的女招待說：「我不敢惹你，只有大佬才玩得起你們，哈哈……」

表面看，後極權時期，中共把工作重心投入經濟建設，中國經濟的增長比某些發達國家還快，那是因為毛澤東留下幾乎是沒有公路橋樑的「處女地」。人口眾多，勞動力剩餘的中國，只要將資金投在公路橋樑，高樓大廈等等，實現8%的增長速度是容易的。

地方政府為湊足工業增長的百分比，不惜重複建設。本來市政建設已夠畸形的，拆了又建，建好又拆，這種加在貧弱經濟上的可怕浪費，處處可見。

另一方面，在關係國計民生的工業和農業生產上增長甚微，百姓收入和民生改善幾乎停滯，甚至倒退。

同時，高樓大廈下，藏著無數窮愁潦倒的蒼生，他們蝸居在城市角落。走進這些貧民窟，裡面的髒臭，使人不敢相信，他們就是高樓大廈的建設者，配稱為城市的主人，居住的小屋潮濕陰暗，四壁破牆難遮風雨。破床上堆著骯髒發臭的破絮，夏秋蚊蒼繚繞，冬日壁上生風。

然而新聞媒體，在攝下高聳的大廈時，卻很少用筆為貧困的民眾吶喊。是被人遺忘而忽略？是因為新聞主管的特務緊盯？

## (二) 乞丐、娼、賭、毒

我剛跨過丁字路口，就看見馬路旁，一個跪地行乞的乞丐，蓬亂骯髒的頭髮遮住了他的臉，衣衫襤褸，年紀已經不小，手裡捧著一個破盆子，正在一個勁的向過路人叩頭。有好心人見他可憐，動了惻隱之心，摸出五毛或一元錢丟在那討錢的盆子裡。

「月兒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古老的悲歌在貧窮中國大地上反覆吟唱了千年。毛澤東時代，老百姓越是水深火熱，飢寒交迫，越是讚歌不斷，誰在大街上唱悲歌以抒發壓抑的內心，就要作好被抓被鬥的準備。

這幾年，殘跡的乞丐可以推著一架破舊的小車，放著民間傳統的哀歌，向路人乞討。若是在飢寒交迫的毛澤東時代，誰敢在大街上公開說一句『我冷，我餓餓』，發一聲『你們發發善心救救我吧』的求救聲，必會受到員警嚴厲盤查。弄清那乞丐從那裡來，家庭出身是什麼？倘如出身五類，定遭鬥爭會，領到一頓暴打當即性命難保。倘若是一個平民出身，也定會關進看守所，在那裡有一群專等二兩罐罐飯的無賴打手，圍著乞丐開鬥爭會，直到把他折磨到生不如死才了結，所以大街上看不到一個乞丐。

現在，我在小城街上隨處都會看到這些可憐的人們，他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鶉衣百結的中年殘廢人，斷腿、斷手、四肢畸變的；有的扒在人行道中，以路為紙，用粉筆，或以口嚙毛筆，寫出頗公整的仿宋體，自編出五言或七言詩句，傾訴自己不幸的遭遇。

從他們所寫的，我還讀到對貪官污吏的控告，說當地鄉長村官，不但不施捨他們，反而驅趕他們，背井離鄉流落天涯。社會的不公平暴露無遺，同時說明中共無能治理不公平的社會；

衣衫襤褸，頭髮髒亂的女人，抱著殘跡的孩子，面前擺著一個碗，押著一張紙，上面寫著她和孩子的身世，跪在地上，埋著頭，向路經的行人伸出她的手……

新近，中山路最寬闊的步行街口，擺著一張桌子，桌子前面的地上，擺著主人的文憑，和他身分份的證件，一張白紙上寫出他流落街頭的原因，它告訴人們，殘跡人並不像鄧大少爺吹噓那樣，受到『黨』的陽光普照，即使讀到大學，眼睛失明，依然只有流落街頭賣藝行乞的命。

桌上放著電喇吧和電子琴，肩上掛著一個吉他，彈動吉他，一邊和唱著歌，喇吧裡放出他唱的歌聲，音色哀怨，桌子周圍吸引了一大圈路人。從他的琴藝和歌喉，我判斷這是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盲人，桌前的盆子裡甩著一些零鈔……

有人悄悄議論，說瞎子的文憑是假造的。但我想偽造文憑，已成時下熱門。馬路上，牆壁上到處書寫著土『廣告』，上書『辦證』兩個字，留下電話號碼，這種民間廣告被稱城市『牛皮癬』。

社會上縱然假文憑、假證件滿天飛，機構龐大的城市管理機關，卻視而不見，任由它們「裝飾」市容。

不過乞丐卻大可不必使用假文憑，因為人們對求乞者的施捨，幾角塊把錢，不會因求乞者有無文憑取捨。

可是報紙上把這些因失學、殘廢的行乞者，說成騙子，並說有百萬巨富的『叫花王』，列數他們的招數。

而我認為，這是對中共統治下貧窮失業現象的漠視，乞丐是社會底層中最可憐的人群，他們都是身體殘疾，或被社會拋棄，走投無路時不得已而為之，他們除了靠人的惻隱心給與施捨，幾乎沒有有效保護自己生命的手段，更不會顧及人們對他道德上的非議。

前幾天就有一則消息，一群惡少，無憑白故的圍毆兩名行乞者，致其死亡，媒體卻流於一般報導，對如此兇惡的行為，並沒發出社會應有的譴責！

又一天下午，靠汽車站不遠擺著兩個攤，一個七十開外的老人坐在地上，他的面前放著一台洋琴和擴音器，和一個盛錢盆子。聽他拔動琴弦，演奏『天涯歌女』雖不悅耳，卻足以表現他行乞的哀怨和無奈。

老乞丐對面相隔十公尺處，又是一個攤，卻是一個女孩手拿一個話筒在那裡哀唱，面前攤在地上是一張求乞書，標題醒目：『請叔叔阿姨們幫幫我』求乞書告訴路人，她是一位家在合江的苗族姑娘，今年初中畢業，父母是農民因負擔不起昂貴學費，要她小小年紀便打發人家……於是她流浪乞討，期望遇到好心人，幫她繼續讀書。求乞書旁擺著她的學生證和幾張證明品學兼優的證書……

一老一少，並沒多少人圍觀，鬧市街上，這種事司空見慣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在天奇廣場前散步，又碰上了一男一女兩個年輕的行乞賣唱者，男的拿著一把提琴，女的提著一把二胡。

被男歌手哀怨低沉的歌聲吸引，我擠進人群，仔細看了放在地上他倆的身世介紹：他倆是貴州某音樂學校的學生，家在農村，今年秋天，因家遭水災，家園被洪水沖毀，不但不能供他們繼續念書，還巴望他們拿錢回家救災。

兩人只好輟學賣唱。那男歌手正好廿歲，正是我當年輪為右派的年紀。聽他歌聲哀怨淒涼，不知怎麼聯想到讀書時代的我，聽著聽著，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正是「淒淒不似向前聲，滿街重聞皆掩泣。街中泣下誰最多，七十老翁青衫濕」。

從身上摸出十元錢，放進他們面前的盆子裡。不料兩個孩子放下他們手裡的樂器，站到我面前，恭恭敬敬行了一個禮。

每逢週六，遼寧路、中山路、勝利路的街心花園附近，會出現許多年紀在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他們身背書包，面前地上擺著一張寫著『家教』的紙，一看就知道他們是一群還在西師，西農求學的窮孩子們，利用假日出來，為自己找一點伙食費或書費。學費的昂貴，社會的貧窮可以由此窺見。

有人解釋滿街挑著水果、小菜叫賣的小販；背著皮鞋箱替人擦皮鞋的婦女老人；或手裡提著一個電喇叭沿街收買廢舊的『破爛王』，是農村富裕勞動力流向城市的正常現象。

我住的這條街又是城市的『紅燈區』，多年來沿街布著髮廊、按摩店、洗腳城。大白天塗脂抹粉的年輕女郎，坐在門裡向過路男人頻頻招手；甚至於遊走在大街上，見到上了歲數的，便湊上去搭答訕：「耍不耍」？會意者如果答應，便會跟著『介紹』人走進背街小巷裡，那裡幾個三十歲上下的『紅嘴鯉魚』半裸睡在被褥亂扔的床上，見有客進來便打起精神與來客討價還價。

城市郊區，去重慶的馬路上，一過白馬橋，黃昏時間，就會看到一個接一個紅色的大傘，像一朵朵罩撐在大路兩旁。傘下坐著稍加打扮的女孩，不斷向過路汽車司機招呼，敞若是『熟客』不用多話，司機煞住車跳下駕駛室，便挽著從傘下走來的女郎，很快消逝在叢林中。

聽說重慶市中心附近，還有專供上了歲數的女老闆的『三陪男』，打的招牌很別致，什麼『明月樓』，『醉仙居』。低檔的茶樓，消閒房遍及背街小巷，一方面因精神無寄託；一方面失業人群無以為生。

先前受禮義約束，廉恥規禁，皮肉買賣就是在十里裡洋場，百樂門裡，為普通市民不齒，有識人士所不肖。自文革以後，禮義廉恥掃蕩貽盡，皮肉生意得以在大白天公開在大街上攬客。

因為久居月亮田，周圍的居民都知道鰥居獨身的我，樓下一家『美髮廳』的老闆娘，幾次向我示意，叫我進去『玩』，都被我拒絕，她因此說我太吝嗇，其實我打心眼裡替這些不滿二十歲的『美容小姐』難過，也替她們的父母難過，將心相比，一個正常人家的父母，怎忍心自己的女兒去幹這種事？

自鄧小平執政以來，最大政績，無過於麻將的普及，八十年代五講四美風行一時，掃黃禁賭雖風聲大雨點小，一般小百姓行賭還要藏著玩，後來，生意做大了，為官者應酬所需，賭場愈多，賭資愈大，賭風益盛。會賭的不僅以此賄賂官場，奸商以賭為媒，興風作浪。

乾脆賭也市場化了，專營賭場的老闆像開妓院的鴇婆，大小兼有，公開的於大街上擺幾張麻將桌，以應付查賭的，暗處則在地下室，或山間別墅，那排場就大了，那裡往往就是黑社會的高，兼營毒品，也是大官二奶的消魂處。

因為教育淪喪，道德的頹落，使社會秩序惡化，市民麻痺了，這又是毛老魔頭給社會造成的災難。人們交談動不動用對方的媽出氣，小市民三句話不對，便要捋拳搓掌，甚至於拔出兇器逞強，傷人性命。

中學生打群架之風盛行，三十年代上海灘上因幫會廝拼，青紅幫大爺為爭碼頭，打群架的事已遠去多年。中共後極權年代，流落街頭的青少年，打群架而釀成流血的事件屢見不鮮，警方視而不見，就是死了人，也取擱平了事。他們害怕惹惱了黑社會，招來意外麻煩。

毒品氾濫已成災害，返毒的人，瞄準位於市中區的天生民中和四十中學，兩所學校學生廁所經常發現用來注射大麻的針管。

母親的義子，工商聯的李重生，家住望龍門，他兒子李輝上高中時因碰到吸毒成癮的周兵，為籌毒資，周兵逼迫李輝向家裡要錢，為躲避亡命的周兵，李輝幾次翹課，被李重生追問查實，無奈之下只有被逼轉學。

### (三) 假

因為商人為賺錢而不講道德和誠信，假貨充斥，欺行霸市，直接危害著貧苦的人民大眾。假藥品，假農藥，假化肥、假種子充斥市場，其根源就是專門欺騙百姓的社會風尚。

有奸商就說：「毛主席就是騙老百姓的山代王，我們跟他學一點，真是雞毛蒜皮，那算得了一回事？」

有一天，我碰上一個年齡與我相當，衣著破舊，面相老實的農民，正提著一籃雞蛋站在天生菜市的進口出售，他向詢問的顧客許以「假一賠十」的承諾，當時我相信了他，從他的籃子裡選了二十個蛋，拿回家打開一看，真上當了，懷著一種受騙，想藉借此勸告這個農民大哥，我提著蛋當即去找他，幸好他還在那裡。

我從五十年前的大躍進講起，（他不致於忘記，那一次運動，農民被共產黨的邪說騙得一無所有並陷入餓殍遍野絕境），一直講到今天，嚴肅的告訴他，受欺騙之害最深的是他們這些老實的農民。

中共「不談過去」，反而使它不光彩的過去，變成備受年輕人關注的「敏感」話題。鄧小平為了推翻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取而代之，便說，國家已處在崩潰邊沿，既如此，又為什麼自相矛盾對毛三七開，可知不讓人說真話，正好暴露了中共一貫的欺騙臉嘴。

從毛澤東開始，就提出「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從此開始，為了吹噓政績，做假成了中共一黨專制的政風，國內宣傳的『建設成績』，拿到國際上沒有不被懷疑的，這些資料或指標，既沒有權威的核實機構，假風氾濫不



止，人們『習慣』了，但全社會中毒了。

假貨可以沒收，可以一大堆的燒掉，即使如此，不做假何以圖利？所以罰沒一時，假貨又源源不斷地從地下冒上來。野火燒不盡、過後定猛生！打假辦公室也形同虛設，而對於「軟體」，就更不能用罰沒這樣簡單的辦法可以禁止。

中國的教育可說是受害最深的一個領域，既然走後門，靠老爸可以輕易入仕。要文憑幹嗎？何況文憑本是一張紙，原本可以偽造，大街小巷貼著假文憑製造人的電話，只消一個電話花幾百元錢辦妥了，何必十年寒窗苦？

六四運動不是早就吶喊，學生沒有一方可供容納課桌的「地方」麼？年輕孩子們只好相沿著做假了。這些年來，凡遇考試，學生在卷子上幾乎人人作弊，從小學一直抄到大學，考場成了作弊的公開場合，高考的考堂裡有所謂代人作試卷的『槍手』，每次考試只要花上幾千元請槍手代考，如此而已。

被錄取的學生，怎能見得真成績？反正那種靠父母入仕的，與請槍手過關的都差不多。在這種考試的競爭場上如此，那裡尋覓真才實學的苗子？我的幾個朋友嘆息這一代不如一代的教育。

進入2010年，當權官僚後代，逐漸取代統治，所謂「老子打下江山，兒繼位」，中共太子黨漸漸得勢。儘管胡錦濤用「和諧社會」掩蓋太子黨間日趨惡化的內鬥，但官僚腐敗，民怨沸騰加劇了太子黨間的內鬥。

在第二年中東茉莉花革命期間，在民主潮流衝擊下，中共體制越益腐敗，民主運動越來越顯示取代獨裁專制的趨勢。

二〇〇九年重慶唱紅打黑運動，從我區公安局長謝某家中搜出的現金就達兩千萬，謝某任職僅一年，這便是他的「政績」？其實而今中共當官的，包括那裝正神的薄公子，哪個不雙手沾滿大陸無辜百姓鮮血，哪一個不在任內不成腰纏萬貫的富翁？

本次運動中，市公安局長文強被抓，接著，檢察長烏小青在看守所裡自裁

市長王鴻舉被免職。老大們稱王稱霸，平日裡，哪一個老百姓都不敢正眼一視！啊！原來我居住的直轄市，窮的窮，富的富，卻是一幫黑幫的樂園。

有人若要展示一下，不過是腐爛窩窩裡的蒼蠅耗子，翻出來令人噁心。黑幕裡隱藏了多少見不得人東西？再瞎的人也可看到這樣腐敗的政權還能維持多久？

## 第二節：臺灣是中國的希望

想來臺灣當局不會忘記，從中共建國之日起，三十年間，藉口「鎮壓反革命」，前前後後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毛澤東還不甘心，還要製造一個「五類份子」，對他們的家屬肆意殘害，三十年間成千萬的中國人冤死在運動中，五千萬同胞被餓死。這個數目比抗日戰爭死亡的人數還要多得多！

至今僥倖存活者，每逢天陰下雨的夜晚，還依稀聽得到死者從天空裡發出的悲泣聲。

當年逃亡到臺灣的人更應牢記，若不是海峽的阻斷，毛澤東定要「宜將趁勇迫窮寇，」追著殺盡一切國民黨人，好像殺不完他們，留下他們就留下了禍根。

### （一）不該出現的

2005年五月臺灣國民黨負責人連戰首次訪問北京，他把這次訪問稱為「破冰之旅。」倘若中國人一時沒看清國共雙方，誰是內戰和分裂的罪魁？誰是陷中華於落後的禍首？那麼這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中，臺灣海峽兩岸的同胞，已看得很清楚了。

特別是現在，事實證明三民主義才是求富強的中華坦途！而中共所主張的才是一條絕路。

可是，中共一直對臺灣的成就『恨得要死』，時時刻刻都想消滅這個「異類」。中共用自己行動再次證明它是多麼邪惡。

連戰在向北大師生發表「有歷史意義」的演講中，一再聲稱：「國民黨現在要做五件事，」可惜他所說的五件事，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如果從一九四九年算起，在六十年後的今天，國民黨在小小臺灣站住了腳，其根本原因是國民黨治理臺灣拿出來與中共比試的，無非是順應了臺灣民眾民心的民主政治！！

現在國民黨要做的最最重要的事，便是擴大民主政治制度的成果，向大陸的執政者和民眾表明，要想求中國的統一，大陸應當儘快向民主轉型的路上走。

值得一提的是，連戰怎麼就沒有想到在此行（哪怕是做做樣子）去慰問一下多年生活在中共壓迫下，被殘害的當年國民黨人的家？去那些被中共害死的國民黨黨政人員和將士送上一個花圈？

可知這些犧牲者是在抗日戰爭中用生命保衛這片熱土的民族英雄！他們才值得國民黨痛心，對他們的撫恤才能贏贏得人心，激厲保衛民主臺灣戰士的士氣！也才能贏來臺灣本土人民的民心，否則像棄如敝履般拋棄他們，就是拋掉了民心，今後怎麼贏得執政的支持者？

不知連戰在接受中共款待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他住的地方竟是瀛台，這個地方是當年清朝末年慈禧囚禁光緒的地方？安排他住在這裡，是巧合呢還是中共有意的暗示？連戰此行只能使人相信，國民黨當今領導人是一群好了傷疤忘了痛的人，但是，劉阿斗是不能效仿的啊！

如果正如連戰在北大的講演中所說：「兩岸所走路的方向已使我們兩岸存在的差距越來越小」，那麼他應當強調的是，「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已經從毛澤東的陰影下，走向同我們的差距日漸縮小的道路上」。可惜他的演講中卻讓人聽不出這個意思。

他還說：「我們的目的是要『聯合中共治台獨』」這種提法犯了社會學最基本錯誤，曾經不共戴天的敵人，在他們沒有放棄他們的錯誤立場時，就忙著認作聯合的對象，來對付本該由臺灣內部的和平競選解決的台獨問題。

大陸在毛澤東時代經濟上一窮二白，連當年鄧小平都驚呼墜入到崩潰邊沿，這幾年修了點高樓大廈，卻陷入高層爭權奪利，人民貧富分化，中共上下腐敗不堪，老百姓依然過很苦的日子，儘管中共刻意維持極不穩定的民心，然而群體事件逐年增加，國民黨當局急著向中共示好，難道他們是瞎子？！

在臺灣民眾的努力下，不但在自然災害特多（三百年前還是一個荒蕪的小島）的條件下，建成了一個舉世矚目的經濟繁榮，政治上進步的寶島，這其中與國民黨曾付出的代價（包括大陸上好多人的犧牲和奉獻）密不可分，無視這一切的人，小看人民的貢獻不覺得可恥嗎？

蔣中正說：「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命於度外。」繼承人連戰可曾記得？禮義廉恥四個字概括了中華民族傳承數千年的精髓，這個精髓已被中共完全破壞，而只有原臺灣國民黨人才把這「國之四維」繼承了下來，難道連戰在繼承和破壞中華民族文化的大是大非也分不清了嗎？

特別在慶祝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勝利六十周年之際，大陸上本該回首這一頁，真誠悼念那些在抗戰中浴血犧牲的抗戰將士，建立抗日紀念碑，並在上面刻記英雄們的偉跡，撫恤他們的後代，但他們除做些表面姿態，並沒有任何實在的措施。

抗日戰爭中，面對著裝備和訓練占絕對優勢的日本侵略軍，國民黨動員和組織了全體人民，用血肉築起抗日的萬里長城，出現了空前同仇敵愾的抗日氣氛。

中共卻還在抹煞殺事實，將抗戰的功勞掠為己有。編寫和拍攝了大量影視劇，繼續為中共趁抗戰中，國民黨全力抗戰的機會，拓占割劇勢力範圍，製造摩擦的陰謀塗脂抹粉。

更有甚者在『內戰』中，共軍大殺在抗日戰場上與日軍浴血抗戰的國軍將士，毫不軟手。

不妨讓我們都來回憶一下當年的抗日戰場：國民政府投入軍隊，歷經南口戰役，瀘溝橋保衛戰，太原會戰，忻口會戰，娘子關保衛戰，淞瀘保衛戰等大會戰二十二次，有些高級將領在戰場上負傷不致被日人生俘，殺身成仁。

以淞滬保衛戰為例：參加當年會戰的老兵易謹，勞聲環回憶往事，老淚縱橫，泣不成聲，他們親眼看到有的師團投入戰鬥，不到三小時，便犧牲了一半，在殘暴的野獸面前，抗日將士除了盡忠報國，團結殺敵，再沒有其他想法！淞滬戰之壯烈，震撼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他稱中華民族的精神是世界上最優秀的。

在這場戰役中，半數團職以上將領以身殉國，使驕狂的日軍大量傷亡，空軍炸毀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炸沉日海軍第三艦隊旗艦，迫使日軍改變原來的戰略計畫，並為國民政府西遷贏得了時間。

整個抗日戰爭，國軍陸軍三百二十餘萬壯烈犧牲，其中包括八名上將，四十一名中將。空軍六千多名血染長空，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戰機被擊落，海軍全部覆沒。

現今大陸人又知道不知道，讓國際刮目相看的是孫立人指揮的新一軍，他以傷亡一萬七千人的代價斃日軍十萬，成為皇軍剋星，使日本司令部喪膽。另一位讓日軍喪膽的抗戰英雄張靈甫，在長沙會戰中夜襲張古峰時掉了一條腿。這樣的英雄，卻被中共誣為殺人魔王。

而中共吹得天花亂墜的平型關大捷，不過是太原會戰的小部份，也只打掉了一支日軍運輸隊。另一個虛構的李向陽更是無中生有，而真正讓日人聞風喪膽的委員長衛隊，以兩個營阻擊進攻南京的一個師團，每個衛隊士兵阻擊著50倍於自己的日軍。

因抗戰的勝利，才扭轉了近百年來中國被列強分割的極為屈辱的歷史。

這才是中華民族之魂，才是中華民族振興的希望，中共抹煞殺它，除了暴露自己民族敗類的本性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再舉一例，今年人們在紀念抗戰六十周年之際，九月3日在重慶竟發現了：「一位死去的將軍正以另一種方式迎接這個日子」，原國民黨陸軍中將，朱鴻勳將軍的墳墓，首次暴露在記者的鏡頭下。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位身經百戰，聲名顯赫的抗日將領，竟被埋在重慶南山黃桷埡的一塊地瓜地裡，長眠達半個世紀！他那在天英靈何等悲傷？而中共不肖子孫並不以此汗顏。

1937年，瀘溝橋事變爆發，當時國軍53軍與日人將戰於黃河南北，晉鄂之郊。朱將軍不為寇懾，奮勇率軍而起，1940年宜昌市相繼陷落，他率軍進駐湖北境內藕池口，使日軍揮戈南下的計畫不得實現，1941年除夕，他率部偷襲日軍，日軍利用空軍反襲，朱將軍飲彈犧牲。

犧牲後，蔣中正代表中國革命軍，追贈他為陸軍中將，當時因湖北是日本淪陷區，國民政府將其遺體暫時埋葬於重慶南山復興村，準備抗日勝利以後，運回他東北老家安葬。

抗戰剛剛勝利，中共便迫不及待的挑起了內戰，東北三省悉數為共軍佔領，致使國民政府安置朱將軍遺體的後事，便被耽擱下來。

共軍佔領重慶後，便把當年浴血奮戰的抗日英烈，棄之如敝履，長達半個世紀，他的忠魂無人照料。將軍墳塋早已煙沒在南山腳下的地瓜地裡，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痕跡。

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時，八個大漢用鐵鍬硬是把將軍墓碑撬出來，打算用來砌煉鐵爐，由於碑石僅十公分厚，根本不夠作爐圈，故將它改作煉鐵廠伙食團用的水缸。石碑被撬出後不久，人們將墓石等材料拆出，充作煉鐵爐的材料，將軍墓橫遭肢解。

誰也說不清將軍的屍體被弄到哪裡去了？成了實足的游走在南山叢林荒郊中的孤魂野鬼！！六十年代初，鐵廠垮了，一個村民見鐵廠的水缸蓋材質不錯，便請人把石碑抬回家來，充作豬圈石，後來豬圈拆了，石碑又改成了洗衣石。

像這類的事，在中共統治之下可以說是絕非僅有。這種辱沒先烈的恥辱又該由誰來承擔，誰來洗雪？

兩天後（九月5日），媒體又報導了陣亡的國民革命軍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的犧牲事蹟，總算使中國老百姓對真正抗戰的中流砥柱，得到了一點支離破碎的資訊。這還是因為李家鈺之子，李克熙曾任重慶人大副主任之職，這一報導就是記者在組織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時，訪問李克熙所寫的一篇文章！

1937年抗戰爆發後，李家鈺率二十二軍從西昌徒步北上，輾轉跋涉四十餘日，到達山西前線。1938年2月，日軍在飛機大炮掩護下，進攻東陽關，想一舉驅逐駐守長治的李家鈺部。李親臨前線，明知在裝備上數量上，與日軍無法相匹敵，仍率部殊死搏鬥。

當時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報導長治守軍，幾乎全軍覆滅，子彈打完後，繼以拳頭、大刀、亂石！！城破，巷戰中擊斃日軍兩千……1944年，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發動豫湘桂大戰，同時強渡黃河，五月二十一日、36軍奉命阻擊日軍西進潼關，結果在行軍途中遭日軍伏擊，李家鈺陣亡。

陣亡後家人留下血衣帶回四川，1944年六月十三日，國民政府追贈李家鈺為陸軍上將。七月十六日南京國民政府對他下褒揚令，入祀忠烈祠。1945年蔣總司令題詞：「勳烈常昭」，其夫人安淑范，親自撰寫挽聯：「馬革衰屍還，是男兒得意收場，亦復何恨？」

抗日戰爭喋血沙場的英雄千千萬萬，可與日月同昭，我大陸作家卻在中共操縱下放棄了這許多的素材不去謳歌，而是寫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范傻兒」，以他的粗獷無知和魯莽，博取低級市民一笑，豈不知日寇的殘暴，中國軍隊在抗日的鼓勵下的英勇犧牲，怎麼容博得一點票房價值？

中共這樣做不正好暴露出了他們的漢奸嘴臉嗎？無數的抗日英烈在天之靈，怎不對這般不肖子孫扼腕長嘆！

特別要再提的，在轟轟烈烈八年抗日戰爭中，中共為取得割據地盤，在日占區助日軍剿殺正浴血奮戰的國民黨抗戰部隊，更有甚者在大陸建政後還以鎮反為名，大肆屠殺抗戰有功的國民黨將士，據最近統計並披露的材料，被殺的僅將軍以上軍官就有百名，將士三百萬！與整個抗日戰爭中犧牲的人數相當！

中共欠下中華民族的這筆血債該怎麼算啊！

應告訴後人，今天大好中華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是當年英雄的抗日烈士們用自己的鮮血換來的，而獨夫民賊毛澤東居然說，沒有日本入侵就沒有中共今天的天下，並表示不要日本對中國進行戰爭賠償。對這樣的執政黨，臺灣憑什麼向它示好？

中共接待連戰「破冰之旅」中，也受到各界「熱烈」的歡迎。不過大家馬上要聯想到當年國內戰爭中，中共與八個小夥計，也有城下之盟，答應組成反蔣統一戰線，並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

但一經奪得了天下，先前的諾言全都在「不斷革命」口號下撕得粉碎：那怕小夥計稍對「黨天下」表示了一點異議，例如小和尚瞿安平，竟死無葬身之地！

為了掩蓋自己背信棄義的嘴臉，他們還在借八個已成為政治僵屍的小夥計，玩什麼風雨同舟，長期共存的騙人把戲。

每逢過年過節，為了贏得一點民主的美譽，把他們從棺材裡扶出來，招待一翻。其作用難道不是胡弄給國際的民主力量看，做給臺灣地區港澳地區看的麼？

我看今天接待孤懸海外臺灣的一個在野黨主席，正好說明毛澤東那一套已經行不通了。今天的中共，已將先前的偽裝剝去，被矇騙的老百姓已經覺醒，失去民心是當今中共最感恐懼的。這使我相信由貪婪、權欲、欺騙發動的戰爭，雖可能得逞於一時，但終將失去一切。

如果中共真的要洗心革面，把自己溶入世界民主大家庭的一員，他們早就該向人民清算毛澤東所犯的累累罪行，天安門城樓上那魔頭像，該早就摘下來了。對歷次運動受到傷害的無辜者早該賠罪，認錯。然而他們依然堅持一黨專制，依然在抹殺歷史真相，依然對他們迫害過的無辜者拒絕陪禮道歉。

在這種基本態度沒有明朗之前，連戰慌慌張張跑到大陸上來向中共示好，這不是「好日子過得不自在了」麼？，國恥忘了，甘做李後主，蜀漢劉禪這樣的亡國之君，又是為什麼？

## （二）對臺灣的希望

六十年來，當年退守臺灣的國民黨人在蔣總統領導下，忠實地沿著孫中山確立的三民主義道路走，經過蔣氏父子兩代人的勵精圖治，在一個荒涼的孤島上終於民主建國成功。民主政治實行以後，臺灣人心穩定，生活富

裕。

現在大陸上，人們翻牆就可以聽到，頻頻傳來大陸民眾越海峽之險投奔臺灣的消息。

在民心歸順民主的趨勢下，站在北京大學的講臺上，2010年一位臺灣女作家龍應台發表了精采的講話。

她用赤子的情懷，對中華民族的深深眷戀，唱出了一個兩岸人民共同的一曲：「中國夢」。

她明確地指出：「禮，義，廉，恥」是中國夢的基石！她以泣血情懷，用周厲王縱容衛巫的故事相告誡，堅決地摒棄了中共以軍事為後盾，政治上唯我獨尊，經濟上炫耀財大氣粗，欺壓民眾，殘害異議人士的「崛起」。無情揭發「血濃於水」的欺騙，這無疑是對中共病入膏肓的「獨裁病」下的一劑猛藥。

她特別介紹了臺灣選舉的「亂」，說這種人人都有發表主張的自由權，使各自見解充份發揮出來，怎麼可能「清風雅靜」？所以表面看起來的亂才是「民主政治」的必修課，然而正因此，才能使決策真正集中了人民的意志，臺灣快速進步，因此雄踞海峽，為表面強勢的中共國所畏懼！

特別是講到臺灣小學教育中以「反攻大陸」為教材的那段，令中共聞之膽寒，一九七六年毛澤東輸光了所有政治資本，致使被他打倒並踏上一隻腳的鄧小平，堂堂皇皇走進中南海，抓了毛欽定的接班人下了大牢。直到今天「九常侍」明爭暗鬥，使中共王朝腐敗，逃不掉滅亡下場。

中共長期的打壓和收買，對臺灣人也是一個巨大考驗，一九四八年至49年，台島軍人，有許多投共的，例如當年空軍中就有徐邁，韋大衛感到走投無路，在中共收買下「駕機叛離」。

結果過了幾年，他們全都被劃為「國民黨殘渣餘孽」遭到殘酷鎮壓，他們本人在折磨和監禁中紛紛選擇了自殺，一家老小淪為黑五類，逃不掉家破人亡之災。

中共對人性的扼殺和破壞，是對中華民族犯下的最大的罪惡。

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一位臺灣女作家瓊瑤，以一部『環珠格格』電視劇，贏得了大陸觀眾的交口稱譽，因為被毛澤東扼殺的人性，在老百姓中並沒有得以恢復，人們對人性的渴望和追求便成了《還珠格格》熱產生的原因。

另一位臺灣的歌手鄧麗君，毛曾用淫晦歌相侮，然而她的歌聲以頌唱和平、自由、愛情、人性進入普通的千家萬戶，她的歌，滋潤著億萬被毛共扭曲的中國百姓的人性。『小城故事』用友誼化解敵對，幾乎成為中學生人人都會唱的歌。

『四季歌』、『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多愁』淒惋美麗，就是她最善長的愛情歌曲，膾炙人口，打開毛封閉多年的人性窗牖，將人回歸到本來面目，而不是相互殘殺的嗜血野獸，在文化封鎖的毛澤東年代，在海峽兩岸只有用大砲隔絕的毛時代，卻封鎖不了鄧麗君的歌聲！

早在五十年代後期，電視已傳入大陸，可是電視作品受到獨裁統治的把持，毛澤東時代幾個「樣板戲」稱霸舞臺，而鄧小平時代，同樣禁止優秀的電視作品佔據銀屏，文化部的官僚們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寧可讓低俗，無聊、色情、平庸，佔據電視，也不敢讓「敏感性」的題材留在文藝作品中。

在中共統治下，像樣的現實主義，人文主義，能激發人的良知、友愛和正義感的影視作品真是鳳毛麟角，寥寥無幾。

最近，文化部的統計表明，國產電視劇每年有一半壓倉。就是搬上銀幕的收視率也極低，他們驚呼每年有二十個億白扔了，這已經說明獨裁統治對文化實行專制的結果了。

幾位報社記者和新聞撰稿人，他們在私下對我表露，普遍感到「壓抑」，他們說心中最大的苦衷，便是不能說心裡話，真話。文藝工作的裝腔作勢和假話連篇，反映中共不得人心。

而腐敗文化趁機在大陸上氾濫，更促進了大陸社會的動盪不安。

比較起來，還是亞洲自由之聲的編輯和主持人，比連戰清醒多了。因為他們飽賞中共統治年代裡所有的痛苦，知道中共的底細，清楚毛澤東的罪惡和後繼獨裁者的猙獰，他們才是最有資格的發言人。

他們寧可亡命海外，通過電波飄洋過海，以他們的忠誠，以他們傳播的事實，揭穿中共專制的霸道和虛偽，向全世界和大陸上傳播著真理之聲，而贏得中國聽眾的愛戴。

前幾年，我常在深夜中收聽他們聲音，瞭解被中共封鎖的世界真象和中共內幕，知道我的同胞們一天都沒有間斷對專制的鬥爭，聽到他們的聲音，就如同與他們共呼吸、共歡樂、共哭泣，他們的聲音和傳播的資訊。成了我生活的鼓舞和精神食糧。

「瞭解這世界，探索它的未來」，在亞洲自由之聲電臺編排的節目中，我最喜歡收聽的是馬平和史東編排的「一周時事評述」。聽他們用雄辯的語言，辛辣的諷刺，直刺中共專制無法掩飾的瘡疤和內部的勾心鬥角，不斷揭發中共出賣領土的賣國行徑，使老百姓更好地認識中共政權。

魯南則以其渾重，低沉的噪音播報的「文學禁區」節目，把聽眾帶到了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聽到那些死難者的名字從地下發出來的呼聲，使我難忘那個慘痛年代獨裁者所欠下的筆筆血債。

亞洲自由電臺之聲以令折服的語言，在浩翰的天空中織成了一個強大的火力網，無情地射向中共所設置的新聞封鎖網鏈，讓一切陰暗角落裡用政治欺騙矇騙老百姓的鬼蜮，現出原形，無法繼續得逞。

所以，中共對它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在無可奈何情況下，竟使出了痞子慣技，根據亞台的波段和頻道，播放強大功率的雜訊，在它們播出的時間，同步播出。真理之音，被一片雜訊包圍，使渴望真理的中國大陸居民，在剛剛得到一片陽光後，立即陷入嘈雜的鑼鼓的喧囂中，回到又聾又瞎的狀態。

大陸本屬國民黨，是毛澤東依靠史達林洋爸從國民黨手中搶去的，「反攻大陸」合情理也合時宜。

當然，如果忌諱這黨那黨，中國人要選擇什麼制度？民主和自由，得由中國人自己決定，那就在大陸實行選舉吧！

把槍口挪開，讓人走上大街發表施政的競選演說，像臺灣那樣，讓選舉出來的人組成政府吧！中共你們敢嗎？而臺灣的人民就憑這點精神建起了這棵美麗的東方明珠，今天中共卻用上千枚火箭相虎視，你們真要做民族大罪人，受後代子孫的萬世唾罵嗎？

### 第三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一）「真善忍」與「假惡騙」

不願放棄獨裁衣鉢的中共執政者，明白自己處在人民的對立面，六四以後，特別加強了對民主運動的防備，對於萌芽中的反政府苗頭一經發現，立即斬斷。但是腐敗使自身百孔千瘡，小心防備反而增加了人民的反抗情緒。

舉個例子來說明江氏集團的惶恐狀態：許多年來中國大地出現了練氣功強身的修練團體，本身不帶任何政治色彩，八十年代最著名的有香功和法輪功。九十年代，名目不少的練功者從山林，寺廟中「脫穎」而出，在民間廣為傳播，其中尤以法輪功傳播最廣。

由於法輪功提倡真、善、忍，反對奢侈，練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頗得普通老百姓的青睞，練功人數迅速擴大，幾年來參加修練的學員發展到數千萬之眾。

中南海廣場因環境安靜，空氣清新，歷來是老百姓練功的去處，選在這裡練功的法輪功學員漸增，守衛人員以中央首長要在這瑞安靜辦公為理由，橫加干涉。試圖禁止學員在這裡練功。

干涉的官腔，惹惱了練功的老人們，開始相互攻訐，警衛人員用武力強令禁止，江澤民用毛澤東鎮壓百姓的章法，用暴力驅散練功的百姓，並在1999年七月二十二日，以中共中央民政部、公安部聯名發出不准修練法輪大法的通知。用一頂新帽子「邪教」扣在法輪功學員頭上，取締了法輪功。

於是，一起本來很容易協調安撫的練功場地糾紛，變成了與全國數千萬法輪功學員的對抗，這便是獨裁統治的惡例。

練功者的反抗怒火，迅速燃遍全國。江澤民法法毛澤東，出動全國警力搜捕堅持練功的法輪功學員，拘押他們，查封數以千計的練功站，焚毀他們的練功資料，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反邪教運動。

為了對付這個人員巨大的練功組織，成立了「630」專案辦公室，恐怖再次籠罩了大陸，數以千計的人，因邪教罪名關進勞教場和精神病院，進行肉體和精神摧殘。借天安門廣場的『自焚』事件，製造驚世醜聞。

被迫轉入地下練功的信徒，並沒有屈服，他們像當年活動在日本鬼子佔領區的遊擊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散佈傳單，張貼標語，揭露中共當局對法輪功學員的暴行和虐待。

許多法輪功練功學員被迫流亡海外，將中共破壞信仰自由的惡行傳遍了全世界。他們與流亡海外的反中共力量結合一起，形成海外聲勢浩大的統一陣線，使江跨出國界如喪家之犬，處在一片喊打聲中，凡江澤民參加的國際會議，必遭受自發組織起來學員們示威抗議。

江澤民的霸道源出毛澤東，證明，毛澤東在大陸陰魂不散，國無寧日。

打開法輪功的書，明白它的宗旨是提倡「真善忍」。「權」「錢」交易和物欲橫流讓人們窒息，他們用「真善忍」對抗中共的「假惡騙」。

記得我是1998年，在南坪的打工現場第一次看到法輪功印發的小冊子，從中瞭解了李宏志其人，但初初接觸印象很淺。

1998年春天，有一天，老馬公司的一位管理生活和伙食的女工周某，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老孔，你要不要戒指和項鍊？」我好奇地問她，我從未帶過這些東西，你問我是何意？

她說：「我想把我戴的這些首飾賣掉，托你找個買主。」

我說：「你缺錢是吧，要不，好好戴著戒指折價賣掉豈不可惜？」

她說：「我因為心臟不好，長期失眠，甚是痛苦，三個月前我看到我的老鄰居李大媽的老肺氣腫居然好了很多，問她吃的什麼藥，是怎麼治療的？她才告訴我，這是她練功收來的效果。在她的勸說介紹下，我同她去了石坪法輪功點，加入了他們練功行列。

現在已三個月了，果然見效，失眠，氣緊，心律不齊的毛病大有好轉。聽老師指點，練功時不能穿金戴銀，練功先要練心，做到心靜，欲斂，方能收效，並說法輪功學員要三忌，忌貪、忌色、忌追求功名。現在練功收到了實效，我的首飾留著沒用處，倒不如賣掉，給孫子上學用。」

又過了幾天，她給我帶來了「轉法輪」的小冊子，上面除介紹法輪功宗旨，還附有練功的圖片。從那時開始，我更了解法輪功，江澤民法法法輪功定為『邪教』，卻啟發了我。聯繫我的一生經歷，把毛澤東的學說定為迷信和邪教才恰如其分，中了他的毒的中國人，有幾個是保留了做人良知啊！

沒想到2002年我重新回到馬老闆公司打工，有一天又碰上了這位周師傅，問起她現在還堅持練功嗎？她擺擺手壓低嗓門說：練功站早被搗毀了，我還受到了追查，但我回答他們說：「我這把年紀用不著他人來訓斥我」現在為了躲避麻煩，明裡不練了暗中我還堅持天天練，否則心臟病要發作！

說完後沉思良久，嘆口氣說，這麼好的功被禁了，那些公安對貪官污吏卻一點辦法也沒有，這是個什麼世道啊！說罷她又大罵江澤民，說他只能在國內老百姓面前充狠，他出國訪問那一次不受到法輪功學員的臭雞蛋「迎接」，只好像蛤蟆一樣躲在防彈車裡，連面都不敢露……

然而，事情遠沒有就此結束，法輪功在海外以其『真善忍』的人性魅力，不僅在國際上贏贏得廣大信眾，他們在國外創立神韻，用美麗的藝術，真正繼承並發揚了華夏傳統文化。他們用事實在全世界面前揭穿中共法律的隨意，虛假，中共是一夥無法無天，顛倒是非，混淆善惡的惡棍，毛教才是禍國殃民的邪教。

特別是中共借審訊為名，對無辜者大施毒刑，割摘信徒的器官，活顯出中共野獸面目，在大量確鑿事實面前，二〇〇九年十一月西班牙國家法庭，承接了海外法輪功信眾的起訴，正式以滅絕人類罪起訴江澤民等五名中共高官。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道有常，審判結果罪犯的罪名若成立，從此這些人只要跨出國門一步，在世界任何地方，法院即可按引渡辦法，立即進行抓捕。看來他們總有一天會以罪犯身份接受人民正義審訊的，而今天距『邪教』法之頒佈才廿年。

## （二）群體事件——民情

毛澤東死後，全國民主運動蓬勃興起，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九七八年北京西單牆民主運動尤具代表性，例如北京民刊《探索》主持人魏京生，與此同時相繼有任曉暉，《四五論壇》主編徐文立，民刊和民眾組織聯席會召集人劉青人，上海人權協會王輔臣，武漢市朱建斌等人成立武漢民主牆，與秦永敏合辦民刊《鐘聲》，他們都為大陸民運開道，是大陸民主啟蒙的先師。

然而這些民主啟蒙的運動，一開始就遭到中共殘酷的鎮壓，『六四』以後，老百姓仍被禁鎖在專制主義的牢籠中，基本權力被剝奪。爭取人權的民運領袖們紛紛被捕，有的逃亡海外，在海外與六四民運人士劉賓雁、王若望等人相呼應，成立以爭取實現中國民主為綱領的民運組織，攜手戰鬥。

山雨欲來風滿樓，大陸正處在獨裁全面解體的過程，用和平方式去推動頑固的中共結束中華歷史上的專制主義同去世界接軌！是大陸的主流

中共推行的專制主義的罪孽越深重，所背的包袱也越沉重，中國註定還會徘徊在表面平靜，而內部動盪的年代。它那搖擺不定的步伐走向何處令人悵惘。

鄧小平繼位後，出於與毛相同本性，除吸取經濟上到了崩潰邊緣的教訓，提出經濟建設是硬道理外，原封不動的繼承了獨裁衣鉢。

現今中共在制定國策時，無論開中共黨代會或人代會，都清風雅靜聽到一個聲音，看一個表演，抬著傀儡：一起舉手，一致通過。

專制主義視民主為大敵，它拒絕任何民主制約，經濟雖然發展了，統治集團的腐敗卻無法控制了。人民被激怒了，『六四』燃起燎原大火，證明獨裁統治必然引起政府與人民的對立。

所謂公民的合法權是指選舉權、人身自由權、生存權、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等權利。這些各國憲法公認的權利，一直被獨裁的中共誣為資本主義自由化而被剝奪，中共統治下人民是沒有任何自由權的奴隸。

反對失業，維護就業權；反對對住房的強迫拆遷；反對剋扣工資；反對徵收苛捐雜稅；反對不顧生存環境的建設；反對對農民土地的強迫徵用等等。所以目前所指的中國民眾的維權活動，絕大部份還僅限於維護公民的生存權。

『六四』，中共在光天化日下，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可見它的本質多麼邪惡。『六四』運動是因貪污腐敗，中共各級政府大量侵害老百姓生存權的非法行為所引發的。

說這些年來『六四』的幽靈在中國大地上徘徊，就是指人民在它的啟發教育下，懂得用維護自身的權利向獨裁作鬥爭的道理。越來越多的群體事件證明，老百姓不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任人宰割不知反抗了。

對於貧窮老百姓手裡極其有限的錢，都要收入國家金庫，這本是專制政權的『絕招』，從上一世紀末期因扶助民營企業而允許民辦銀行建立，是經濟的一種進步現象。可惜沒有多久，對民辦銀行便以擾亂國家金融秩序加以取締，給取了一個新罪名：『非法集資』。

後極權時代，中共對錢的好處有了濃烈的興趣，民間那點可憐的錢也成了他們聚斂的對象。2001年，中共突然決定，凍結所有非國有銀行的民間集資，窮苦百姓為了買住房、準備兒女上學、籌辦婚事、生病住院等等需要，平時辛辛苦苦換來的錢，集存在這些銀行中，不說清原因便加以凍結。



加上中共素有霸佔民房，以沒收名義強搶老百姓錢財的惡跡，這個荒唐決定剛一出爐，立即引發了大規模民間抗議。人們立即聚集到各地政府的衙門口，表達強烈抗議，我看見各集資銀行外的馬路上，被抗議者占滿。

他們舉著各式各樣的標語，上面寫著：『堅決抵制政府的無理決定！』；『強烈要求政府歸還我們的血汗錢！』；『責問政府，你們的做法同強盜還有什麼區別嗎？』；『朱鎔融基，你就這樣用老百姓的血汗錢當的總理嗎？』……

馬路再次被老百姓圍斷，面對憤怒的民眾，集資銀行的職員嚇得緊閉大門，龜縮在工作室不敢出來。這樣相持著不知過了多少天，集資銀行向每天圍聚討債的民眾貼出『安民告示』，說：『大家的錢已轉存國家銀行，請大家保存好集資的憑據，聽候通知，到國家指定的銀行兌換現金。』

至此，市民不知多少不眠夜，懸在心頭的大石頭才暫時穩住。

以後市民們不斷的攔馬路、上訪各級政府、圍銀行，也不知鬧了多久，集資銀行門口才貼出了『兌現通知』，叫集資者根據集資金額的大小，按口家利息分期分批兌現。整整鬧了一年多，一直懸著的貧苦市民的『血汗錢』本金，終於在市民們群起反對所施加壓力下，重新要了回來。

那段時間，我只要一出街，就會看到寫著『還我血汗錢』，的橫幅、標語到處都是。市民的交談中少不了這個話題，也不知多少家庭主婦與丈夫為此口角，甚至鬧到離婚的地步，貧窮的中國老百姓還要對自己糊口的工資，提心吊膽，害怕被中共『沒收』了。

這起因集資引發的民運整整持續了五年之久，待到歸還時，本金要了回來，但利息取沒有按集資銀行所承諾的償還，而是按國家規定的極低利息償付，從此老百姓手裡的錢又被國家控制起來了。獨裁統治者搜括民脂一貫不擇手段。

大家都知道，毛的獨裁統治是以國家壟斷為經濟基礎，工業、礦山、能源一律實行『國有制』，農業實行集體化。

人民公社這一毛獨出心裁模式搞得全民餓飯，天怒人怨，鄧小平就是從這裡找到突破口，從被打倒的位置上翻身取代毛指定的接班人，進到了鄧小平時代。

在『改制』名義下掀起一場由國有變私有的運動，實際上把國有這種獨裁佔有，變成中共權貴掌管的『公司』『銀行』『部門』所有，在權力與金錢等同條件下，吃虧的當然是一無所有的工人。

接手老闆在中共的卵翼下，第一件事就是把『多餘』人員裁減出去，大量工人被解雇，在生存面臨威脅的時候，他們走上了維護生存權之路。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除各級中共大小官吏貪污、包二奶的醜聞鬧得沸沸揚揚外，民間鬧得最凶的便是『下崗』。

所謂下崗就是失業，窮人一家因此而斷了生活來源，劉歡一曲『再從頭』的歌，響遍大街小巷，也不知唱哭了多少下崗、待崗者。

命運讓他們蒙裡懂蒙懂跟著共產黨在國有企業中安身立家，已將一輩子都貢獻給這『家』的四、五十歲的老職工，怎麼也沒想到，中共竟無緣無故拋棄他們，家破滅了，他們已到行將退休的年紀，便被輕易甩問街頭！一家人生活無著，夫妻因此鬧離婚，家被撕裂的悲劇我沒有統計，這一定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附近一家電器器材廠破產後，一對夫妻雙雙下崗，家裡已有半年沒買過肉。有一天中午，兩個幼小的孩子看到鄰家孩子端的碗裡有紅燒肉，便吵著媽媽要肉吃。

父親心裡正煩，突然把左手擺在菜板上，右手提起菜刀，眼睜睜揮刀向自己左手指頭砍去，只聽到大女兒驚叫一聲，看著父親從菜板上撿起砍下的血淋淋手指頭，怒目圓睜向小兒子甩了過去，吼道：『給你吃！給你吃……』

被驚呆了的兩個孩子抱在一起，呆對雙手血淋淋的父親。

說起肉，又使我想起鄰居一個下崗工人家裡已有好幾月沒買過肉，父親為滿足孩子吃肉的要求，有一天父親到肉店裡偷了一塊不到一斤的豬肉，不料被人當場捉住，肉沒偷成反而挨了兩耳光羞侮一頓，回家後，一家人抱頭痛哭。

一位母親因違犯『計劃生育』政策生了兩個女兒，男主人因下崗，丟下妻女獨自外出打工。先前還寄點錢回家，半年前錢也不寄了，電話從未打一個回來。女主人替人幫傭，但要維持兩個孩子的生活，早就無法維持。

有一天清早見街上還沒有幾個人，牽著才六歲的小女兒，經過街心池塘，突然停下腳步指著池裡的一雙鞋，叫女兒下水去撈上來，趁女孩不備，她竟將孩子推入池中，倉皇黃逃離。

池中孩子大聲呼救，過路人把她從水中救起。在目擊者指證下，派出所民警抓走了孩子的母親。從破屋裡帶走這女人時，女孩哭喊著一路追著帶走她母親的警車，喊道，媽媽沒有把她推進池塘，她的媽媽是好媽媽，一面哭唱世上只有媽媽好，而警車裡的媽已經泣不成聲。

周家岩下的一個小廠破產後，由於生活無著，有一家人，男的勒死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後，上吊自縊。

這種悲劇在大陸上充滿大街小巷，人們聽多了，習以為常也麻痺了。然而這些大陸正上演的幕幕悲劇，雖不像毛澤東時代，大批餓死、成批槍殺那樣令人心驚肉跳，但這些老百姓的斑斑血淚天天都在發生。

2001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5點多鐘，我正在楊公橋尋公共汽車準備回家，見公路中間，聚集了許多上了年紀的老人，他們簇擁著一些牌扁和標語組成的方陣，將馬路攔斷。方陣上方扯起一幅橫亙馬路的橫幅，上面寫著：『失業工人爭生存有理，防暴員警無理打人有罪』十九個大字。

一股文革的遺風，陡然襲入我的眼簾，那欄在路正中的牌扁上方，貼著一張毛澤東彩像，下麵貼著「請願書」，結尾上寫著燈泡廠和水泥廠的職工簽名，那上面橫七豎八的寫著幾百個名字。

牌扁的後面，是許多由老頭老太婆手執的竹干板做的標語牌，每一塊標語牌都貼著毛的像，內容相似。幾百個老人和他們簇擁的『牌扁 - 標語』方陣，儼然像一座祭神的壇，壇的前面，並排正襟危坐著滿頭白髮的老人。已是下午六點鐘了，這些老人表情嚴峻，嚴陣以待。

我擠進人叢，聽圍觀者七嘴八舌議論：「工廠是國家的，現在破了產，工人只給幾十元的生活費，就叫他們回家，物價那麼漲，叫人怎麼活？」

「活不下去了，年輕人還可以跑生意，做小工，老人只好餓飯。」

這馬路也紮了快一個月了，員警打傷了人，把帶頭人抓進看守所，關了十來天還沒放人，市里下來了幾個人，談判了幾回，什麼也沒解決。帶頭的人被員警打成重傷，住院一個星期，醫藥費也無著落。

一輛滿載身穿尼采軍裝員警的警車，就停在附近，他們手中個個握著警棍和電擊棒，路人說他們打人從不手軟。

這些原國營企業工人，現在因破產而處在生活無著的人們，他們落到這種地步，都是中共造的孽。現在他們用堵馬路的方法，意在引起政府和社會關注。

毛皇上為控制國計民生，將工人集中在類似集中營的地方從事生產，給極低的工資，起碼的供應，以苟延他們的生命，禁止他們自由遷徙。

可惜又犯了中共安定大局的忌，吃虧的當然是工人。

選擇攔斷公路的辦法打著毛旗反當局的策略，爭生存權的鬥爭，卻不敢明目張膽的提出，足見中共當局的霸道。

他們可以在各種年會上稱臺灣和香港居民為『同胞』，卻狠狠咒罵被生活所迫起來反抗的工人為暴民，動輒以警棍相對！

本來代表國法維持秩序的員警，在公眾心目中應是公正的化身，但是毛澤東把它變成了維護統治、施行暴力的工具，從此它與老百姓處處作對，〈血紀〉上、中兩集，記述監獄老管的種種暴虐就是最好證明。

可以說中共統治下，幾乎沒有維持正義和良心的老管，不久前在上海發生的「襲警」事件中，公共輿論為什麼異口同聲支援楊佳，說他是抗擊暴力的英雄，而異口同聲譴責員警？

坐落在重大下方，靠嘉陵江邊的重慶造紙廠，因為技術落後，環保能力極低，一直是毒氣、毒液的排放地。我沒有資料提供死於該廠排放毒氣毒水人數的統計數目，單知該地區屬於癌症高發區，該廠職工一般壽命只有四十歲。

在這種恐怖籠罩下，該廠的『領導』經中共地方組織紛紛外調，離開了這個鬼門關。職工為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頻頻上訪，被拒絕後湧上街頭，曾聽說他們截斷了江北區觀音橋大道，聲勢很大。直到1992年在市民的強大反對聲中，該廠宣佈停產。

停產後，該廠工人連續進行了長期鬥爭，直到2001年工廠破產，市政府按工人工齡每年九百元買斷工齡後，工人們帶著被污染而受到傷害的病體離開工廠，自謀生路，還要按規定交納養老金，直到退休。今天那裡的工人們還在為增加傷殘、毒害補償費向政府進行長期的交涉和鬥爭。

生產特殊鋼材的重慶第二鋼鐵廠，工廠改制後，生產日漸萎縮，面臨工資發不出的危機，原先募集工人的股金又退不出來，工人生計面臨威脅，引發了持續的截路鬥爭。中共的特務和特警部隊在對付他們使盡了手段。

他們高唱『團結就是力量』、『國際歌』，表達出新的內涵，他們意識到自己在中共統治下的奴隸地位，原來的中共黨員紛紛宣佈脫離中共組織，並公開向社會宣傳。

雙碑是殊鋼廠的中心，工人們攔斷了雙碑通往市中區的路段。經過很長時間鬥爭，中共把他們無可奈何，只好另外開通北碚到重慶通道。軍警們緊緊包圍了罷工範圍，禁止罷工車輛越出，封鎖與外界的通訊，嚴禁記者採訪報導，隔斷攔路者與外界一切聯繫。

有一天，攔馬路通重慶方向開來了幾輛軍車，向攔路者說：『重慶市政府正在哥樂山上開工作會，特邀請你們上山當面提你們的條件，市長在那裡公開答覆你們，特派我們來接的，請上車吧！』指揮部聽到這話正在猶豫，卻經不住大家七嘴八舌，性急的已爬上了前面的軍車，接著大家喊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且上哥樂山看個究竟」便一齊上了車。

等到車隊開到哥樂山，大家下了車，看看開到的地方，卻並沒看到任何開工作會慣有的會場佈置，也沒看到一輛市政府的小車。正要詢問開車人，司機們已紛紛坐上各自的駕駛台，軍車已經啟動，開足馬力一溜煙的跑了……

工人們對中共墮落到將工人騙到哥樂山倒掉的行為極為憤恨，殊鋼廠攔路請願中軍警曾揚言：「打死人算不了那回事，老百姓只要有幾萬塊錢什麼事都可攔平，錢不過是國家拿出一疊紙罷了。」

可見在事件中，軍警奉了中共指令，對攔路者進行毆打和抓捕，並打死人，然而這留下新的血債又算給誰？

為了平息這場風波，中共對鬧事者也作了『善後處理』，對死者安埋，被抓的參與者釋放，攔路者大多都安排了工作，上了歲數都作了退休或內退，將他們交給了民政部門。就這麼一些『實惠』也是工人十幾年的長期鬥爭換來的。

在我生活的城市，各『改制』廠礦的職工，紛紛為爭取增加遣散費和抵制由『資方』單方面制定的改制方案，走上街頭，舉行頻繁的示威遊行。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山峽洗衣機廠，他們選出代表與區、市級地方政府交涉，進行為時十幾年的鬥爭。

就是最沒有聲勢的專用汽車廠，也在廠門張出橫幅，譴責趁改制侵吞職工們多年創造出來財富的碩鼠，幾次派出代表到國資委和機電公司（中共指定負責改制的機關），進行歷時六年的『破產 - 改制』談判，為『虧損』而被拋棄的職工，聲討無能腐敗的中共官員。

民運推動了社會各階層人們，公交公司為爭得自身待遇罷運；摩托車經營者為抵制交通警察的無端罰款，動輒扣車，在北碚街上聯合『計程車』司機進行過多次環城示威。

此外為反抗市政管理機關，工商局無止境無理增收高額的營業稅、場地租金而開展的小經營主的罷市鬥爭；

教師為政府對待的承諾食言，邊遠地區為極少的工資而罷教事件累次發生，總之各行各業貧苦的職工向中共展開的鬥爭，方興未艾。

以上所列均我親眼目睹，親耳所聞。

工人為維護生存權的鬥爭，還帶動了市民和農民起來向中共展開維權鬥爭。村民因爭取村鄉基層選舉的民主普選，向中共基層組織展開的鬥爭曾遍及全國。河南鄭州市南曹鄉七裡河村1998年至1999屆換屆選舉中，村民推選的村長提名，被原村中共支部書記殺害，恐怕是農村基層選舉一個典型慘案。

這個慘案揭露中國今日的『民選』遇到層層阻力，根本原因是中共維護一黨專制所致。農村中少數靠權力富有者，決不會放棄使他們致富的，那點手中竊據的權力。

因建築開發商強迫徵用土地，而引發的涉及貧苦農民生計的反征地運動，一度遍及全國農村。我母親當年流放地蔡家場，去年因『開發』渝北區，向該地居住的農民大興征地，今年三月農民為徵用土地補償太低，與開發商雇用的打手發生多起鬥毆事件，被打傷的農民，至今還在為爭取住院期間的治療費用，向政府控告肇事開發商。

全國因強迫征地而發生的流血事件，不斷發生。

城市居民因城市建築，要拆遷他們久居的貧民窟，眼看自己久居的破屋將被待命剷除的推土機推掉，政府卻沒有安置他們的新居，或草率給了起居十分不便的另一陋室，而引發貧民們的抗議。腳跟腳地跟著拆遷辦人員到政府衙門訴苦評理的事層出不窮，發生摑打阻止拆遷的流血事件，成了民間最多的傳聞。

胡錦濤所提的和諧社會，原意在維護獨裁政體下，建立唯穩體制，但是病入膏肓的中共獨裁政體，把「和諧」，當成與他的祖宗毛澤東「為人民服務」完全一樣的欺騙！

#### 第四節：獨裁的沒落

一九七六年，一代梟雄毛澤東，帶著眾叛親離的遺恨，拉下幾千萬中國老百姓的命債見閻王爺去了。

在他晚年，毛澤東思想已為他的謊言所徹底否定，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解體，信仰危機使獨裁面臨厄運。國家弄得民不聊生，毛氏深感帝位無人可繼，匆忙中，將他的私生子叫來榻前，以一句：「你辦事我放心」草草完成了帝位世襲的最後交位，匆匆去見專制獨裁的列祖列宗去了。

這本書僅從我親身的經歷，如實反映中共六十年來用社會主義欺騙中國人民，一步步暴露它的獨裁、虛偽真面目，走向滅亡的過程。

毛澤東在取得政權後掀起一個接一個的運動，目的是迫使整個社會臣服於他的獨裁。他將人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建立一個新的人壓迫人，等級森嚴的社會。

為了鞏固帝位，他甚至不惜使用專制王朝最殘酷的文字獄，要人唯讀他的「經」，強迫人進行『思想改造』，把人的思想禁固在他要求的範圍內，不准任何偏離。

他的「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就是餓死那麼多人，也必須按他的路子走！皇令如山，就是他的大臣們，稍有偏離也必須領死。因反對他的『三面紅旗』而死的中共元老還少嗎？

鄧小平並不想改變這種個人為所欲為的統治秩序，只是改變了毛澤東在經濟建設的禁律，他認為毛澤東所以「失敗」就是忽略了經濟建設，所以「經濟發展」被他列為「硬道理」，擺到了第一位。

人民公社行不通了，用包產到戶替代。然而土地所有權仍在國家手中，而在中共統治下，代表國家的是掌握政權的各級地方官吏。這樣作把農民變成置於中共地方官吏監督下的農奴，他們隨時可以「建設需要」為藉口，

拆遷農民的家園，驅趕農民背井離鄉流落城市。

國有制行不通了，他們可以以一紙檔，對工廠實行「改制」，將剩餘勞動力趕出工廠，而把工廠廉價賣給了剛剛新生的小業主，為他們繳納利稅；靠權力將子女以公務員身份安置到國家管理機關，員警，學校，醫院，銀行，稅務，房產形成一個新的統治階層。

這樣，一方面是以地方權力所有者為基礎，直到中央的寶塔式官僚統治階層；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業的工人組成了供他們隨意驅使的城市建設廉價勞動建設大軍。這才是鄧小平設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用「發展經濟」代替「社會主義革命」；用「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代替「平均主義分配」。中國在他的帶領下走上的不是人人奔小康，而是一種滲入權力的國家資本主義。

「六四」幾乎要改寫鄧小平歷史，在大勢所趨之下，他宣佈退位，並結束了中共的個人終身制，當然也結束了世襲制，同時以「安定團結，壓倒一切」代替了「無產階級專政」從此換來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後極權時期。

既然，利益向權力敞開了大門，中共內姓資姓社的激烈爭吵，暫時的安靜了一段時間，太子黨們，人人有份何必爭呢？毛澤東獨裁帶來的災難，鄧小平含糊糊地掩蓋著。既不清算，也不繼承，結果反而激怒了毛澤東的舊臣們，他們並不安心退休療養、享受！

而是指責靠權力發起來的太子們腐敗，反而替罪惡的毛澤東招魂了。

在這一時期，中共惡習——說假話依然是官方少不了的「黨風」。新聞管制，剝奪人權，在反資本主義自由化的旗幟下，建立了新的統治秩序。

可是，不受監督，使貪污腐敗惡性腫瘤般長大。而今成了對中共政權致命的威脅久治不愈。因為「權力資本」只有在不受監督的條件下才能長大。

隨便舉一例子：血腥屠殺六四的元兇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希同的案子。據官方公佈1990年結案，僅他挪用重點建設資金為他營造豪華別墅就達3511萬元之巨，收受貴重禮物55.5萬元，吃喝揮霍公款165萬元，國家金庫成了他任意取用的保險櫃。這種『碩鼠』在中共現政權中到處都是，他們是由一黨獨裁孕育出來的。

到了2004年，『六四』過了整整十五年，這支碩鼠大隊日漸龐大，各級公務員、法院的法官，公安刑警隊長、檢查官、緝私隊長、反貪局長等凡與政權沾邊的人都爭先恐後加入。中共官員有「五十歲不貪是傻瓜」的說法，生怕為官期間錯過發財機會，令人終生遺憾。

在湛江走私案處理時，最高法院院長感慨面對媒體驚呼：「在這起走私案中，所有涉及湛江市及海關，大小兩百名官員無一不貪！」連逃亡在外八年即將遣送歸來的賴昌星，也敢出大話威脅中共：『我若回國被追究，少說也有上百人人頭難保』。可見中共腐爛到什麼程度？

據透露這個海關使國家蒙受的利稅損失高達數百億，其中海關官員的主要份子，貪污賄款均在數百萬以上。當採訪鏡頭攝下被採訪的海關一般職工時，他們竟要繞開採訪鏡頭，不敢回答記者所提問題，要求記者隱匿自己身份，以免遭受「飛來橫禍」。

可見，政府與黑社會相勾結，猖狂到了何種程度？中共官場腐敗已入骨三分，誰跳出揭底，誰就逃不掉粉身碎骨的下場。

但，這種腐敗終因「狗咬狗」而不斷揭發出來，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佈：自2003年1月至2003年十月的十個月中，全國發生濫用職權案1841件，造成6.5億元損失，致人死亡460人，傷117人。

僅從此官方公佈的數位看，大陸每天發生濫用權力的案子就達六起，根據中共一貫粉飾太平，虛報瞞報的傳統，這無疑還是大大縮減了的數位，真實情況只有讓歷史來記載了。

另一說明官場腐敗的例子，便是買官鬻爵，這種事就是在封建社會也是絕對要受制裁的，一旦被皇帝老倌發現，往往帶來「滿門抄斬」的後果。故雲：「尚利者亂，尚義者治」，「貪夫殉財」便是市井的警句。可在中共統治之下，買官鬻爵卻成了家常小事。

仍以報載為例，黑龍江市委書記馬德從1992年1月至2002年，十年因賣官所得就達六百萬元，馬德就憑這種「人事買賣」進入了中國的「中產階層」，卻並沒有傷之毫毛。從他手裡買得中共高官的人數涉案人員達265人。

其中包括大貪官，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黑龍江原政協主席韓桂芝都是投他的門下入道。據綏化縣市各部門靠他得官當上一把手的大大小小的「貪官」，就達五十餘人，以致於他的案子層層受阻。中共官場之黑，馬德算是一個典型。

國家官員掌權的可以賣官批條，大有大的吃法，小有小的「收入」。甚至於將統考的考卷，犯罪人所獲的刑期，都成了有價證券「入市」，堂而皇之進入流通。雇用打手保鏢也成了「自衛」的手段，光天化日之下，買兇殺人，使「秉公」執法者望而生怯。如此猖狂的黑惡勢力控制之下，又有誰敢秉公執法？

報紙上偶爾出現抗爭惡勢力的義勇之士，其報導也限於對付雞鳴狗盜的小賊，這些報導，新聞記者是在黑暗中尋找一點光明的飢渴心理支配下寫出來的。如此黑暗統治，怎麼不發生煙毒氾濫，車匪路霸橫行，殺人越貨，強姦賣淫？

失業工人為反對無理解雇的遊行；居民為抗議橫蠻的住房拆遷；老百姓為反惡吏和貪官的抗議；國家機關的弄虛作假這些為當局禁發的消息，遠遠還沒有登載出來。

當然這比毛澤東統治年代有了「進步」，那時，對大量餓死人的事；逃荒流竄他鄉凍死街頭；逼使水腫病人下地幹活；五類份子被鬥被打致死的事，是不准見報的。這樣比，算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了。

也罷！我們現在就以官方允許在報紙（2007年）所登載的消息，歸納成下

列五點：

第一，上層官僚集團的貪污案，已成了中共統治集團的不治頑症，這些消息只選登了百萬以上的大案，至於幾萬的小耗子，可以說遍地皆是。無官不貪，是概括當今官場的特點之一。雖然中共設立了紀委檢查委員會，後來又設反貪局，百萬以上的大耗子仍在逐年增加。

第二，由於官僚集團疏於管理，使社會上人身死亡的事故（包括交通事故和近期突出的礦難事故）醫療事故、傳染病、天災、礦難等災害事故層出不窮。中共素來就有報喜不報憂的習慣，報紙上已經傳播的事件肯定是相當嚴重，並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公開報導的事。

例如河南的愛滋病傳播，2003年非典的流行，都是在國際衛生組織提出警告，並在亞州自由之聲連續報導以後，才在媒體上公開曝光的。而隨著這些病態社會現象的曝光，又暴露出與國家管理的相關上層機關的腐敗。

第三，毛澤東「共產主義」被現實扯穿以後，代之以「金錢萬能」。社會道德的墮落是這個社會是最危險的信號。

為了獨裁統治所需而提出的「維穩」，形成人們相互間除利害關係，見義勇為被認為是傻瓜才幹的，代之以欺騙氾濫，欺軟怕硬，弱肉強食造成整個社會一盤散沙，這種不關心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氣氛害了中華民族。

毒品空前氾濫起來：據報載：世紀大毒梟劉招華在廣州過堂，他曾在1995至1998年間製造冰毒18噸！搜查出裝在紙箱內的冰毒，整整堆滿了一個籃球場，當場繳獲的冰毒相當於1998年全世界查獲的冰毒的總量！

值得一提的是冰毒集團的成員，大多是中共軍隊的退伍軍人，劉招華本人曾榮立過中共獎給的三等功！大陸變成了毒品的運集、生產基地。

盜劫、殺人、販毒等刑事犯罪和黑手黨的猖狂，使老百姓民不聊生，終日生活在恐怖的陰霾之下。

第四，鄧小平口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全民奔小康」，是太虛假了，他明明知道，資本原始積累是赤裸裸的剝削，哪有全民同富的好事？至今城市貧民每戶人平均一百元的生活費的赤貧戶，官方沒有公佈統計的數目，但不會是少數。農村裡的人，每戶人均每月收入不足五十元所占比例更大。

城市中到處是擦皮鞋的，下苦力的，賣小菜的，挑著擔子沿街叫買水果的，收破爛的。洗腳城、髮廊裡的小姐遍街都是。問他們的家住在哪裡？先前還有人說是農閒時節，出來到城市裡找活幹。

近幾年，由於擴大了城市建築面積，傍城周圍的土地被徵用了，除了幾千元的土地徵用費，他們已沒有土地，只好流落城市。

這些因中共『圈地』運動失去土地的農民，是一股使社會不穩的潛在力量。這些人如果身體還健壯，往往因不滿自己赤貧處境，鋌而走險，殺人越貨。

2004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扶貧辦公室主任劉堅驚呼，2004年未解決溫飽的年收入僅637元以下的貧困戶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八十萬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最近發佈的中國國情的「居民收入分配預警系統，稱2003年中國人收入差距拉大，已進入值得警惕的「黃燈」區。

貧困家庭中，姐弟倆因解決誰繼續讀書而抓鬮，釀成姐姐跳崖自殺，恐怕就不是個別的悲劇；在這樣情況下，少女被迫賣淫慘遭惡徒在臉上用刀刻字，也不是個人的慘劇；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垃圾堆中刨廢鐵，而被虛空的渣層垮下來，命喪黃泉的夫婦豈止一對？

第五，中共是中國歷史上最無恥的賣國集團：與中共對百姓的殘暴統治相對應，為了取得政權，在國際上一味遷就俄國。毛澤東為此而甘拜史大為幹老漢，根據俄國外交部公佈的解密檔案，國人才知道毛澤東暴政的另一面：

1945年毛澤東在一邊倒政策指導下，引狼入室，這一年，為奪得江山，投入史達林懷抱的毛澤東，與蘇聯簽訂了賣國的「哈爾濱協議」，把軍政大權拱手讓給史達林指揮。

一九四九年又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秘密協定」，蘇俄得到中國大陸地下資源的開採權並武力控制東北、新疆。讓中國人民為蘇俄充當炮灰和工奴；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六日，中央通訊社又公佈了「中美協議」秘密條款13條，集哈爾濱與莫斯科兩協定，並補入內蒙設自治區，進入西藏條款。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關於處理在押日本戰犯的決定」，以「有助於中日關係正常化，推動國際形勢更加走向緩和」為理由，對在押的1063名日本戰犯處以「一個不殺，對個別罪大惡極者只處以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將1000名雙手沾滿了中國抗日將士和幾千萬中國老百姓鮮血的劊子手，悉數免於起訴，「交中國紅十字會遣送回國」。（見外交部2006年公佈的解密檔案）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又未經全國人民討論，毛的皇位繼承人華國鋒根據毛氏遺願與日本政府簽訂了「中日共同聲明」，正式放棄了日本對中國進行戰爭賠償的國際協議。

鄧小平執政以後，為了統治目的，壓根就沒想到糾正這些可恥的賣國勾當，而是將大陸繼續出賣給周邊國家，那怕相鄰小口看到中共國內亂象環生，也乘機在沿海地區爭地爭海，對此我就不一一列舉。

由於國內形勢不穩，不惜以國土為代價，在他統治下，與周邊國家簽訂了「有爭議地段」的邊界協定，最嚴重的是承認毛與俄國所簽的賣國條約：

1999年「中俄國界議定書」，中共放棄了160萬平方公里領土主權（包括黑龍江東64屯，唐努烏梁海，帕米爾高原等相當於44個臺灣領土），

2004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俄國界補充協定）中，俄國竟占去了黑匣子島一半的主權，正式承認了1999年的議定書。

有人質疑，鄧小平剛上臺時，曾指天發誓，五十年絕不搞運動，寫在紙上還沒過三十年，由中共挑起的『六四』、『鎮壓法輪功』、大規模運動，未曾間斷，當時便有人斷言：中共離了運動便無法生存。

中共建政之初，不但向全國各界許諾了一大堆民主建國諾言，一篇聯合政府的文章欺人民，騙國際，把民主黨派哄得圍繞它團團轉，至今建政六十年了，任何中國人都看清楚了：

六十年來，前三十年，老百姓別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家家有洋房小汽車』，給人民不是享受民主和共產主義夢想，而是弄得連飯都沒得吃，三十年和平年代餓死、整死過億，毛賊東是製造冤獄最大的統治者；是古今中外殺人最多的劊子手。這本書只揭其冰山一角而已。

後三十年鄧小平執政，老百姓有口飯吃，開始建家，但人民依然權力一無。至今貪污猖行，貪官遍地，他們用國庫的錢到國外消魂；貧富兩極，賄、賭、毒、淫盛行，鄧公喜麻將，在他竭力提倡下市井農村遍地開花，也是他一大『功跡』，如此建國，還提倡什麼五講四美！

舉目世界，獨裁統治正一點一點被逐出人類的惡夢，幾個不識時務的權力擁有者：朝鮮？古巴？伊拉克薩達姆想用殺人渡日，自己卻上了絞架。

經歷了六十多年中共獨裁勢力在大陸的折騰，國家傷權辱國，神聖領土遭可恥肢解，實踐告訴每個現代中國人，現在，重新回到民主憲政的大道正是時候，以和平方式再造共和，已是萬心歸一。

可太子黨內竟出現了一個官迷心竅薄熙來，為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想出唱紅歌的藥方，為行將就木的獨裁起死回生，一時官辦的大小會議紅歌一派。

聽到令人肉麻的頌詞歌聲，我會立刻聯想毛賊東的大躍進年代，社會主義好的歌聲正掩蓋了餓殍遍地的大陸哀鴻。

一個『假』便能概括當今大陸，不光假貨充斥市場，假話充斥社會，假像迷漫官場，然而紅歌企能為妖孽壯膽？可知，紅歌陡起時，恰恰是中共危機深重時！

在這朝野貪腐背景下，『紅歌』猶如為獨裁下葬時的『挽歌』！

既然中共無自知之明，作為中華民族一員，讓我在這本書中簡略回顧中共統治大陸期間的所作所為，《血紀》就秉筆直書寫到這裡。

其實這本書所記載的都是我親身經歷，每個情節斷無虛構，由於年代相隔幾十年，記憶有所丟失之處，使讀者讀後可能感到不足。

有人打電話給我，勸我在中共天下，不允再提舊事，今天拿了中共發的養老金安安穩穩怡養天年吧！

但是，我卻正告規勸者，我的一生都被毛澤東肆意踐踏，他使我家破人亡，知恥而忍辱，我的秉性決不相容。何況供養我的是中國民眾，不為他們說話，我為誰說話？

加上白白被奴役我們二十三年，中共連工資都還欠著我們，我不向奴役我們的人要，又向誰要？

那些犧牲的摯友們在天之靈，還時時叮囑我：為我們共同的「民主」大業奮鬥！生就了我至死不悔的脾氣，何況今日全家人都去到極樂世界，我是天天準備與他們天堂相會。

生活在今天，有冤不能申，有恥不能雪，家徒四壁，我有什麼顧忌呵！

說假話的人心是虛的，原蘇共頭目也會尊「古拉格群島」的作者為俄羅斯良心之父！為什麼？就因為憑著良心說真話，就像一柄正義之劍會穿透騙子的心臟，是假話連篇的政治騙子最害怕的！

若要問中國的前途是什麼？我說是民心！。東方雄獅不能再長睡不醒！我們絕決不是任由暴政凌辱的奴隸，在大陸一黨獨裁必須讓位給民主共和。

## 後記

已醜酉年，離開鹽源整整三十年了，《血紀》已完稿，想為它的故地配以像片，向讀者介紹這些血腥故事所發生的地方；更想知道經歷「改革」整整三十年，這血腥的故地，變成了什麼樣子？

這些年來，從那裡出來的人，告訴我那裡還在不斷散出陣陣血腥，例如前年的徐友全告訴我，兩位留場「右派」，因收入拮据，一家人難以生活，分別投水庫自殺。



他還告訴我，留場就業的幾十個人，連與國營農場職工同工同酬都沒有實現。被中共奴役了一輩子，他們現在只憑每月四百五十元生活費，聊渡晚年，有人只好守在這裡終身鰥居。

所以，我決定二〇〇九年清明節期間，重返鹽源農場故地。因為我們聽說前幾年，有人為挖掘這裡被中共掩埋的血腥罪證，拍照時，被留守人員阻撓未果，所以本次重返鹽源農場只約了荊楚同行，對還在原地倖存的鹽源難友今日並不通知，決定快去快回，拍下照片後馬上離開。

同三十年前不同，從重慶到西昌已不用繞成都，石棉，雅安的汽車路，四月八日，我和荊楚直接從重慶到西昌。當四月十日晨，我們突然出現在原農場的中心十字路口，（鹽源農場已撤多年，這裡已改為鹽源果場）我和荊楚走下公共汽車時，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很快問到了車站不遠處朱凌飛的家，見到了朱的愛人，在她帶引下我們很快找到王文典，羅玉楊，周德漢，徐友華等人。

當天我們步行到了農六隊（這裡已賣給了私人），過去的高牆電網已全部推倒削平，大門已重修。所幸崗樓、探照燈架，六隊大監房以及院壩尚存，好像留下這些遺物是專門為我們提供斑的。

離開六隊，我們立即沿水渠步行三裡，登上五號山樑，當年張錫錕、皮天明的遺骨就被棄置於此，而今改建成兩類人員墳場。

此時，正趕上已醜年清明節，我當即點燃了隨帶的香燭、紙錢、鞭炮，祭拜了當年在鹽源灑血的烈士們，以及被毛澤東當年殘害在這裡的數百無辜怨魂！

第二天，我們一大早雇了一輛麵包車，驅車水庫、農五隊、農科所，回顧鹽源農場建場之初，從甘洛押赴這一片不毛之地的奴隸們，怎樣在槍桿下開墾出這個農場。

再驅車去原農七隊，在當年農七隊，槍殺張錫錕和皮天明的宣判主席臺，和院壩，以及陳屍張錫錕的白樺樹拍下照片。它們好像為了今天的取證，而完好保存了四十多年。

當年由張錫錕們高舉的『火炬』，照亮了地獄裡反抗暴政的奴隸，當年喊出反抗獨裁迫害的呼聲，彷彿還響在耳邊。

我們隨即還找到了鹽源農場『場部』，攝下關押我和陳力的『反省室』，以及當年農三隊和基三隊舊址。《血紀》記載了當年我們向施暴者針鋒相對，以牙還牙的經歷。

一九六四年春節，我和陳力從場部的「反省室」，搬到附近一排廢棄的羊圈裡，當年我們親手澆灌的核桃樹，而今已成了一棵傍山而立的大樹。是夜靠它的指引，我們找到了當年的「羊圈反省室」，羊圈已不復存在，那裡留下了一窪積水，觸景生情我彷彿又想起，月影朦朧中金梅的悲歌！

下午我們雇車，在當地老百姓的幫助下，我們找到了當年屠殺陳力和劉順森的『刑場』，當年目擊者說，槍殺陳力時，只見他滿臉是血，劊子手為了不准他臨終時吶喊，而割掉了他的舌頭！！為讓他跪下飲彈，劊子手刺穿了他的腿！

毫無人性的劊子手，用自己血腥的暴行，永遠在人們心中刻下了一道永不會消褪的血痕。同車去的人還回憶槍殺陳力八年後，在同一刑場上槍殺劉順森時，給他打了啞針，使他無法在臨犧牲前呼喊……

《血紀》裡嘔歌犧牲者的壯烈場面，已在當年目擊者心中留下了完美的形象。

四月十二日，我們又從西昌坐汽車去了甘洛，這一段經歷，是當年我們在流放途中最慘烈的一段，如果一九六二年甘洛農場在短短七個月，將從內地調集的年輕力壯小夥子餓死了一半，這場全國性大量餓死人的災難，從一九五九年算起至少持續了五年，數量之多就更不是四千萬所盤點得了的。

甘洛可算我們這批無辜流放者的鬼門關，我從車窗搜索著當年經過的老母坪，直到下午汽車進入甘洛都沒看到，下車後我們詢問當地開環城車一位司機，他告訴說，離甘洛城偏北二十多裡路有一個小地名就叫老母坪。

查地圖我才猛然想起，當年是從雅安經榮經進甘洛，恰與本次路線相反，告訴路線的司機還警告我們，城附近聚居的僱僱見了漢人很可能行搶劫，要我們警惕。我回頭看了一眼荊楚，估量兩人人地生疏，不能貿然行事，決定雇了他的車去西西卡看看。

沿著馬路，司機把車只開到西西卡山下，遠遠相隔，荊楚攝下了山上西西卡的景像，便請司機將車開回火車站。考慮到我們連日趕路，兩人都得了感冒，怕在途中發生意外，所以當晚返回成都。

在成都，我們受到省城彭慕陶先生組織的二十餘『右派』同難熱情的迎接，熱心的彭先生已於半年前，將我所寫的《血紀》第一稿付印一批，交給同難們傳閱，本次聚會彭先生介紹了我們重返鹽源的初衷和經過，期望大家抓緊餘暮晚年，寫下自己過去的經歷，以供歷史考鑒並流傳後人。

在中共嚴密監視下，大家的熱情，是對我最大的支持和鞭策。

四月十四日，我們回到重慶，按照《血紀》記載的故事，我們還將去南桐。

南桐是我們初入『右派』煉獄的進口；是我們最初受到毛澤東虐待的地方；更是我們認清中共的虛偽欺騙，看清『三面紅旗』帶來的災難，從而放棄幻想堅決抗暴的開始。

當然，大浪淘沙，在中共殘暴的催化下，當年『右派』這個懵懵懂懂的受害群分化了，甚至也有不齒人類的佞鬼出現。

四月十五日晨，我們乘車到了南桐礦區的萬盛市，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當年只有獨街狹路的小城，已是高樓林立的渝南重鎮了。正感到人地變異，舊地難尋時，同車到達的一位姓朱的當地婦女自告奮勇為我們領路，在她的指引下，我們找到了南桐法院，和隱沒在居民平房裡的南桐看守所舊址！

回憶五十年前，我像一個迷路的孩子，背著破爛的行囊，跟著帶我來的魯召到了這裡，由於信任和依賴，我根本就沒去看掛在門口的招牌，當我進得陰深深的監房時，我還誤以為這是

『母校』為我另換了一個場地呢！！

就是今天，我也無法理解一個為人師表的人，怎麼會這麼忍心，將一個無知的孩子，拋棄在地獄中！中共對人性的扭曲太可怕了。

然而正是殘酷的煉獄，使我扭曲的神經恢復了正常，使我踏上了正常的人生之程，《血紀》就從這裡開始，記載了這條我走過的路。

當我們重走當年拉著成噸鐵礦的『板板車』，飛奔而下的『海孔』馬路，當我們拍下遺棄了半世紀的高爐煙囪沖時，我們再次知道中國學生群體的大規模災難就此開始，我們是這場災難的受難者，因此也是這場災難的見證人。

若從清匪反霸、土改開始，按毛所規定每次傷害5%計，三反、五反、鎮反、反胡風、反右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殺一小批、武鬥、四五運動、六四民運、鎮壓法輪功、鎮壓西藏新疆和全國民運中，有幾個中國人沒有挨整？

恐怕中共也知道，毛的那一套必亡國，當然也必亡中共。

從一九七九年我離開鹽源至今又過去三十年了，初初那種希望中國會從毛澤東的惡夢中醒來，重新開始中國的未來，像新的惡夢破滅了，時至今日，引中國進入這場災難的魔頭畫像，仍懸於國門之上，中國依然是一黨專制，中國人難道生就了是在專制政體下做奴隸的命？

大陸所以停滯不前，是因為毛澤東獨裁的毒瘤長得太深，他雖在萬民唾罵中結束了他的獨裁，但他發動的那麼多運動，卻使中國失去了凝聚力。

今天，中共的當權者搬著指頭算一算，你們的黨欠下無辜者的命債每個人攤幾條？加上你們已高度腐敗，縱能掌控槍桿子，他們能聽你們的話，甘心為你們賣命幾天？毛澤東魔力能管多久？回首你們欠下那麼多血債，你們不感到討還血債的一天隨時都會降臨？那一天來臨是非常可怕的。

2010年十月十四日重慶國安部三個人造訪了寒舍，領頭姓白的人看到我獨居的地方十分簡陋，便問到我的家人，我說都被你們整死了，我也幾乎被你們的人整死。他見我態度強硬便接著開門見山說明來意，勸我不要出版《血紀》。

我也不繞彎子，回答來人：「這是不可能了，你們也知道，你們想槍殺我，牛頭馬面已帶過我去閻王殿了，古人雲：士不懼死，耐何以死懼之？」

當然你們可以不依法而按「政策」辦事，但「無法」怎麼治理若大的中國？至於我寫的書既敢在全世界人面前公開，只要我能按事實陳述，而不考慮個人的得失，我是無所顧忌的。你們可以就我所寫的事挑骨頭，但你們決抹殺不了事實。」

今天，大家已經看到，連中共上層都在驚呼：「不進行民主變革，中國是沒有前途的」原因就在奉行獨裁只有死路一條，獨裁將導致民心殆盡，在世界民主巨流的衝擊下，中國不會長陷於獨裁的泥坑，我們翹首跼足中國民主大業的成功。

人生如夢，夢醒後方覺自已不過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微塵，生逢惡世，我不知逃過了多少死結，不知不覺今年已過七十二載。當我最後回顧一生，只有這本記載我一生的書留給後人了。希望後來人好好讀這本書！從中吸取自由民主的教訓吧！

全書於 2007年十月寫完

2007年第一次修改

2008年第二次修改

2009年第三次修改

2010年2月第四次修改

2010年八月第五次修改

2011年七月第六次修改

作者：孔令平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